



書名：邱會作回憶錄
Memoir of Qui Huizuo
作者：邱會作
頁數：上、下兩冊，共 1028 頁（照片：98
幅）

简介：

邱會作（1914-2002）

江西省興國縣人。1955 年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1981 年 1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邱會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判有期徒刑 16 年。1987 年刑滿。2002 年 7 月 18 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 89 歲。

《邱會作回憶錄》

上冊目錄

寫在前面的話

第一篇 戰鬥的歷程

第一章 少年時代

我的家鄉

紅軍來了

蘇維埃

三代同堂幹革命

第二章 戰鬥在家鄉

第一次戰鬥

巧當紅軍

肅清「AB團」

參加粉碎第一次「圍剿」

參加粉碎第二次「圍剿」

參加粉碎第三次「圍剿」

第三章 紅色瑞金

在瑞金

長征前的準備

周恩來、葉季壯救了我的命

出發前夕

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第四章 兩萬五千里長征

出發「上前線」

「全權代表」

為紅五軍團送餉

在遵義

「娃娃科長」

相識毛澤東

第五章 艱苦的歲月

過大渡河

翻越大雪山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

過草地

紅軍的重大分裂

最後的難關

第六章 永遠的延安

初到陝北 任糧食局長

在抗大學習

任軍委供給部長

解決經費問題

開展生產運動

邊區的財經和供給工作

抗戰初期的國共兩黨合作

第七章 華中三年

《邱會作回憶錄》上冊目錄

中央財經工作團

淮北往事

從四師回延安

到綏德

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戰鬥作風

第八章 參加七大

在中央黨校學習

整風與七大

會場集錦

選舉與閉幕

打回老家去

第九章 「我們的八縱」

戰鬥在熱河

八縱成立

戰鬥力提高了

第十章 遼瀋戰役

吉林會議

政治整軍與軍事訓練

錦州攻擊戰

遼西會戰

遼瀋戰役的歷史地位

第十一章 平津戰役

奉命進關

重要的決策

三分鐘突破民權門

城市政策紀律

勇猛果敢的黃永勝

第十二章 向中南進軍

四野高幹會

將革命進行到底

向江南進軍

山地運動戰的典範

衡寶戰役的重大意義

進軍廣西

執行粵西和桂東南剿匪任務

統一對剿匪性質的認識

第二篇 軍隊建設的征程

第十三章 從廣州到北京

到廣州工作

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

部隊文化教育

重返後勤戰線

關於肅反問題

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

第十四章 新軍委成立

軍委統帥部的改組

軍委辦公會議

穩定軍隊的高級幹部

總後的新班子

林彪批評了朱德

一點教訓

第十五章 林彪對我軍建設的貢獻

廣州軍委擴大會議

北頂南放

北京軍委擴大會議

全軍編制裝備會議

研究確定我軍編制

我軍後勤的編制

部隊後勤裝備

林彪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講話

第十六章 準備打仗與後勤建設

後勤戰略方針與後方基地建設

全國的戰略勘察

後方基地的勘察和建設

軍馬生產

戰備物資儲備

劃區供應

機關工作的整頓和建設

妥善安排老幹部

第十七章 後勤業務改革

調整幹部隊伍

學校整編和學制調整

加強與建設科研機構

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改革軍服質量和顏色

改革物資供應

改革醫療衛生

改革財務管理

第十八章 軍隊農副業生產

三年災害對軍隊的影響

生產渡荒

軍隊生產以「副」業起家

軍隊生產以「自」業傳家

全軍歷次農副業生產會議

軍隊的生產效益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附：《五七指示》

第十九章 後勤工作的天職

正確認識後勤工作的地位

充分發揚革命幹勁

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

局部與整體的關係

認真管理業務

反對空頭政治

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第二十章 軍隊的風雨歷程

林總推選羅瑞卿為總參謀長

羅瑞卿的變化

軍隊內部兩個陣營的形成

全軍大比武

劉亞樓、楊成武、蕭華的作用

葉帥打招呼

毛主席的底牌

林彪給毛主席的信

第三篇 人民軍隊忠於黨

小引

附：林彪同志給賀龍等同志的信

第二十一章 軍隊文革的序幕

上海緊急會議

我過了關

中央工作小組會議

關於「四條」的問題

羅瑞卿的錯誤和林總的態度

羅瑞卿檢討與「自殺」

羅瑞卿炫耀自己

葉帥的總結

楊成武是反羅的幹將

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

第二十二章 炮打司令部

端掉彭、羅、陸、楊

要進行反擊戰了

劉少奇談彭、羅、陸、楊

嚴慰冰事件

首都工作小組

毛澤東點火

十一中全會的特點

歷史的教訓

附：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第二十三章 軍隊文化革命的方針和三個階段

附：「一〇五」緊急指示

《邱會作回憶錄》上冊目錄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八條）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十條）

第二十四章 全軍文革支持造反

總政李曼村與總後結「冤家」

二醫大「紅縱」發難

軍隊院校進京

天安門上被告了一狀

「一〇五」緊急指示

江青接見「紅縱」頭目

第一次昏倒在批鬥場上

「紅縱」把總後變成鬼蜮世界

五大部長

兇惡的武鬥昏天黑地

上冊照片索引

邱會作，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一九六九年當選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二〇〇二年春節，人生最後一張照片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組在西山軍委前方指揮所

一九七〇年，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

一九七〇年在京西賓館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

一九七〇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期間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組在西山

一九九二年，老戰友在北京相聚

邱會作對胡敏說：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

「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是我軍後勤工作的天職」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邱會作將軍去世六年後魂歸故里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楓木凹現貌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老家

軍委供給部長兼政委葉季壯

一九四〇年，新四軍六支隊部分領導

《邱會作回憶錄》上冊目錄

- 一九三七年，胡敏在八路軍前線野戰醫院
一九四五年，胡敏在延安重逢
一九四八年冬，胡敏與承光在齊齊哈爾
一九五二年，胡敏在廣州任軍區總醫院小兒科主任
一九六三年，胡敏在總後大院家門口
一九六〇年，胡敏任解放軍通信兵部衛生處長
胡敏晚年
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
一九四六年在熱河
一九四六年在承德
任赤峰地委書記
八縱第一任司令員黃永勝
任東野八縱政治委員時留影
和八縱戰友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遼河三江口檢查浮橋
一九四八年遼西會戰勝利後，八縱老戰友在一起
遼瀋戰役後，八縱召開慶功大會，邱會作時任八縱政委
林彪突擊隊獎旗
整理遼瀋戰役總結報告
和二十四師戰友
平津戰役勝利後留影
和一三五師戰鬥英雄、毛澤東獎章獲得者在一起
和四十五軍戰友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十月與到該軍採訪的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合影
與父親分別二十年在廣州相見
一九五二年中央慰問團在廣州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
一九五二年在廣州向中央慰問團匯報工作
一九五六年在後勤學院開學典禮上講話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高級黨校學習期間於頤和園留影
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參加將軍合唱團練歌
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八元帥合影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在廣州接見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
一九六三年在南京靈谷塔

《邱會作回憶錄》上冊目錄

一九六四年在越南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林彪接見革命群眾



邱會作回憶錄

【作為歷史的親歷者，有責任做一個誠實的傳媒人】

方块字读书社区 <http://book.sinozi.cn>

滿江紅

怒髮冲冠憑系虧
靖康耻猶未雪匪
蒲雨歌拾坐眼
子恨何時威加長
仰天長嘯壯懷激
車蹄破賀蘭山缺
烈三十功名塵与
此志飢餐虧虧肉
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笑談渴飲匈奴血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清白歸收拾舊山河

大悲切

朝天闕

己巳年夏仲月

邵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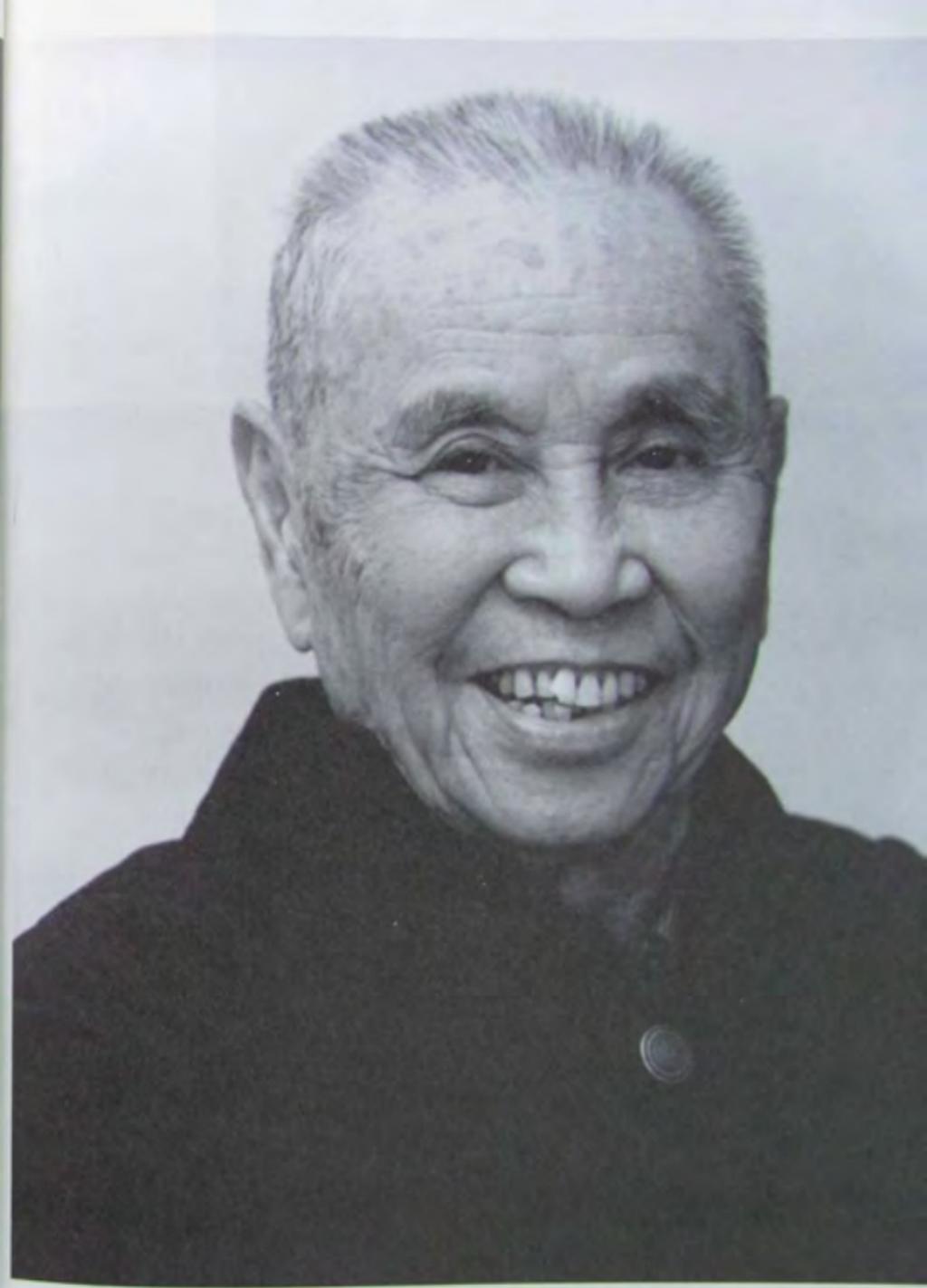




邱會作（1914-2002），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一九六九年當選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二〇〇二年春節，人生最後一張照片。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處在西山黨委前方指揮所。
前排左起：溫玉成、劉賈福、何會作、吳法高等。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處在西山黨委前方指揮所。

前排左起：溫玉成、劉賈福、何會作、吳法高等。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左起：李作鵬、邱會作、胡敏、葉群、陳經折、吳法憲、黃永勝。



一九七〇年在京西賓館。前排左起：董其禹、胡敏、葉群、吳法憲、項輝方、陳經折。
後排左起：李作鵬、黃永勝、邱會作。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左起：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陳錫聯、葉群、胡敏。



一九七〇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期間。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組在西山。

左起：溫玉成、劉賢權、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李德生。



一九九二年，老戰友在北京相聚。



風雨同舟六十載。邱會作對胡敏說：我是江西的窮苦人，你是陝西的窮苦人，不參加革命我們怎麼能走到一起，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邱會作將軍去世六年後魂歸故里。



目錄

上冊

照片索引.....	xxiii
寫在前面的話.....	1

第一篇 戰鬥的歷程

第一章 少年時代.....	5
我的家鄉.....	5
紅軍來了.....	9
蘇維埃.....	10
三代同堂幹革命.....	12
第二章 戰鬥在家鄉.....	15
第一次戰鬥.....	15
巧當紅軍.....	16
肅清「AB團」.....	20
參加粉碎第一次「圍剿」.....	22
參加粉碎第二次「圍剿」.....	25
參加粉碎第三次「圍剿」.....	26
第三章 紅色瑞金.....	32
在瑞金.....	32
長征前的準備.....	35
周恩來、葉季壯救了我的命.....	40
出發前夕.....	42
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43
第四章 兩萬五千里長征.....	46
出發「上前線」.....	46
「全權代表」.....	48
為紅五軍團送餉.....	53
在遵義.....	57
「娃娃科長」.....	59
相識毛澤東.....	63
第五章 艱苦的歲月.....	67

一九四九年十月與到該軍探訪的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合影	206
與父親分別二十年在廣州相見	220
一九五二年中央慰問團在廣州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	224
一九五二年在廣州向中央慰問團匯報工作	224
一九五六六年在後勤學院開學典禮上講話	228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高級黨校學習期間於頤和園留影	229
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參加將軍合唱團練歌	235
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八元帥合影	251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在廣州接見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	253
一九六三年在南京靈谷塔	281
一九六四年在越南	286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林彪接見革命群眾	448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主席接見軍隊高級幹部	499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天安門城樓上	569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時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571
一九七〇年周總理參觀我軍新研製的69式40火箭筒打坦克表演	574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九大開幕式上	617
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681
九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講話	692
「簡來簡去，把帽子給我們扣上了，可憲法草案上...」	725
林彪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照常吃飯，照常睡覺，頂多做個彭德懷第二。」	729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	731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會見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	732
一九七一年「五一」節	768
有口難辯，在一九八一年「公審」中	921
黃永勝總參謀長	945
胡敏拜見黃永勝陵墓	951
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952
邱會作的母親	957
一九八〇年，經過近十年的磨難，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見面	963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964
路光一家合影	965
和承光一家合影	966
和光光一家合影	967
和小光一家合影	968
光光、小光同在一個部隊、一個城市	969
一九九五年，胡敏和老戰友項輝方在西安家中	971
胡敏和林立衡（豆豆）在一起	972
一九九九年，和老戰友李作鵬在一起	980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982
真情實意	988
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	990 - 994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995

寫在前面的話

一九二九年初，毛主席領導的隊伍從井岡山下來，到興國、雩都一帶開闢新的根據地，革命的紅旗把我們一家窮苦人都捲入革命的隊伍，我們家是三代同堂鬧革命，那時我剛剛十五歲。經過了槍林彈雨，經過了艱苦歲月，經過了南征北戰，在黨和毛主席的教育培養下，我逐漸成長起來了。在幾十年的革命征程中，我都是積極工作、努力奮鬥的，為之流過鮮血、負過傷並付出全部力量，這一切都是我認為是革命者的本色。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偉大的，是英雄輩出、群星燦爛的，我祇是燦爛群星中的一顆小星。因此，我過去從沒有想到去寫個人的回憶錄。

在公審之後，我想寫回憶錄的願望越來越強烈。

我原以為公審祇是走個過場，是讓我們為毛主席、為周總理、為黨中央在文革時期工作中的錯誤擔當一些責任。沒想到公審竟是以「創造性」的法律形式解決黨內路線問題，用不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衡量文革時期的工作，還給我們帶上一頂莫須有的反革命帽子，甚至還無端地把我們和江青一夥捆在一起。這一切表面上是打擊我們，實際上直指毛主席、周總理及黨中央。

在文革期間，林彪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並被毛主席欽定為接班人；周恩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當時我正工作在一線，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和當時在臺上的老同志們一起為黨工作。在極其複雜困難的情況下，大家怎樣支撐著黨的工作，怎樣支撐著共和國的肌體，怎樣用夜以繼日的工作來使損失減到最小程度，被公審搞得黑白顛倒、面目全非，看來我有必要向黨和人民做一匯報，再了此殘生。當然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的錯誤和失誤也要認真地總結教訓。這就是我寫回憶錄的初衷。

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現在的當權者常自詡和江青一夥做了鬥爭。他們怎麼做了鬥爭？他們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已經去世、「四人幫」為階下囚

之時，是在文革已被徹底否定的時候；我們怎麼做了鬥爭？我們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健在，江青一夥還是黨的領導人，文革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時候。有些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委曲得不得了，但是他們把別人打成反革命又毫不客氣。

八一年，我「保外就醫」到西安時，才知道老伴胡敏還在「監督勞動」之中，五個兒女也受到無端的株連，我的震驚難於言表！在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們在人大會堂被抓起來時，周恩來總理當著黃、吳、李、邱的面說：「毛主席決定你們離開工作崗位，反省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你們的老婆、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以後，如果他們遭到什麼不是，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周總理用手在胸脯上一拍。也許這就叫信誓旦旦吧。

我和老伴已分別十年，真是生死兩茫茫。當老伴從勞改農場坐上馬車，轉坐手扶拖拉機，再轉乘長途汽車風塵僕僕趕到西安與我會合時，我眼前出現的已不是飽含熱情、充滿朝氣的胡敏，而是一個飽經苦難、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我們祇有含淚相望。我對老伴說：「我是江西的窮苦人，你是陝西的窮苦人，不參加革命我們怎麼能走到一起，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雖然我們經歷了這麼大的磨難，但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幹革命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我們都是以革命為職業的人，失去了革命工作就等於失去了一切。不過我們還是要堅強地活下去，我們要把一生的經歷寫出來，看看是不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兒女，對得起黨和人民。」

我的回憶錄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從八二年的冬夜開始動筆的，當時不但沒有任何資料，生活困難的連紙張都買不起，幸有老伴四處請鄰居幫忙，第一部分草稿是用百家紙寫就的。我的回憶錄，談不上什麼教益，僅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有責任做一個記錄。但其中肯定會有不少缺點、不準確之處甚至錯誤，請讀者批評指正吧。

謹以此書獻給與我幾十年革命在一起、磨難在一起的老伴胡敏和因我受到株連的老戰友和同志們。

第一篇

戰鬥的歷程

第一章 少年時代

在我的記憶裏，我少年時代的生活情景，是從紅軍來了之後才是最清晰的。我十四歲參加革命，十五歲參加紅軍，一直在人民軍隊中生活。因此，我把參加紅軍作為對少年生活回憶的開始，也是很自然的。

我的家鄉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西省興國縣高興圩上密村的楓木凹。這是一個小山村，每個山坳裏三五戶人家。我的家鄉自然條件還不錯，農民世代以耕作為生，主要農作物是水稻和紅薯。

我們屬客家人。江西南部是本地人和客家人雜居的地方。我們的祖上在河南、山東一帶，邱氏祠堂供奉的是姜太公，這就是我們的祖先了。姜太公封邑在山東淄博，繁衍其後的有撰《左氏春秋》的左丘明……。古時候戰亂不斷，我們的祖上為躲兵亂而南遷到廣東省梅縣地區，後因災荒，又逃荒到興國縣高興圩。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楓木凹現貌。

從我記事以來，我的家庭就是過著勤勞的生活。祖父邱順接是一個治家非常勤儉的人，全家祇有一套共用的外出穿的衣服，我祖父、我父親出門時，輪流穿。我們這些小孩子穿的很破爛，我從不記得我穿過新衣服。

我的祖父是個能幹又能吃苦的人。祖父種田不算裏手，他就在路旁的石檻下賣茶水為生，無論天晴、下雨，一年到頭天天如此，因為茶攤在路邊，過往的生意人、官差，甚至挑東西的腳夫，都在這裏喝茶休息，他們能帶來一些外面的消息。老俵們幾乎都是幾代人沒有出過遠門，十幾里以外是個什麼樣子都不太知道，到過縣城的就是能人了。

祖父為人非常本分、正義，在全村他都是人家的上客，大家對他十分尊敬。祖母從小是一個孤兒，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祖母從小靠要飯為生，以後她就給地主家餵豬賺飯吃。我的祖母是最善良最勤勞的人，她耕田、做農活，做家務活、撫養孩子。我小時候同我的祖母是寸步不離的，晚上和祖母睡在一起，祖母是我最親的人。一九三一年，我祖母去世，埋在家後面的山坡上，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和還鄉團對紅軍的家屬進行迫害，我祖母的墳也被毀了。

父親邱時昕。他是一個非常忠厚的老實人。父親在全村德高望重，人們都稱他為「時昕老大」，村子裏各家有事，都請父親到場，都願意聽他的意見。

我的父親也是勤勞一生。他青年時期以挑山貨為主，挑運山貨要付出很強的勞動力，賺錢不多，但無須本錢，活計靠得住。歇息在家時，他每天總是天不亮就出門去拾糞，幾十年都是這樣的。因此，同樣的土地及水利等條件，我們家的田地要比別人多收一些糧食。我祖父去世之後，父親就接著擺攤賣茶水了。我很尊敬父親，也很想念父親。自一九二九年我離開家之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紅軍長征後，全家吃盡還鄉團的苦。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打過長江，在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下，我正率領部隊南下。當時部隊到了萍鄉，離家鄉祇有不到一天的路程，從十四歲離家，已經二十年了，真想家啊！毛主席、共產黨把我從一個窮苦小孩，培養成我軍的高級指揮員，我戴著望遠鏡，坐在吉普車上，望望身後的千軍萬馬，又望望家鄉的方向；思念家鄉的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老家。

淚水就在眼裏打轉。為了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還要追擊敵人，揮師直奔湘西南，又與家鄉擦肩而過了。

一九五三年，我把父親接到廣州住了一個時期。分別二十五年了，他一直好奇地看著我，不說話，他覺得一切都不可思議。後來，因為臺灣國民黨的飛機要轟炸廣州，軍情越來越緊，我又把父親送回老家去了。在廣州的時候，我給父親做了一床絲棉被子，他非常滿意。可是父親臨走時，忘記了把被子拿走。我一想起了這件事，心裏難過極了！我尊敬的父親對我從來沒有提過任何要求，唯獨喜歡一床被子都未曾如他所願。父親於一九五六年病故了，當時我已調北京工作，因工作太忙，我沒有回家為父親辦理喪事。這件事祇有藏在我的心底，一輩子遺憾！

我的母親蕭寅秀是一個勤勞吃苦，能幹的勞動婦女。母親會耕田（使牛下田），能挑擔子。我能記事的時候，母親經常早出晚歸從六十里以外的地方挑一擔百十斤重的石灰（肥田粉）回來。有一次，母親在離家還有幾里的地方，看到路旁有一堆牛糞，她就把自己的頭巾把牛糞包回來了。待我長大後，我認為這件事是母親勤勞的標誌。

我有一個哥哥邱會佳，早我參加紅軍，一九三四年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時，陣亡於廣昌戰場。另外，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他們沒有跟我享過什麼福，可是「九一三」後受我的株連是很厲害的。

我九歲那年，祖父決定送我去讀書。由於家裏太窮，我祇讀了不到兩年就停學了。小時候讀書的時間雖然很短，卻對我在革命隊伍裏成長起了積極作用，這是祖父的恩德。

現在，我的文化程度比我參加革命之初，當然是提高多了。我的文化知識是在革命隊伍中一點一點學來的。依我看，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無非是兩件大事：工作和學習，這兩件事是分割不開的，工作就是學習，同樣學習也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有人把工作和學習結合得好，進步很快，反之，進步就慢。在長征的路上，毛主席教導我的三勤：勤讀、勤寫、勤查字典，我是很有體會的。我比較愛讀書，也有學習的習慣，也愛翻字典，把字典看作是隨身不說話的「教師」。我可以認真地說：「我的一生是沒有枉度光陰的！」

在我們那樣的山村裏，孩子們的生活非常簡單，沒有讀書的孩子早就跟隨大人參加了勞動，讀書的孩子，也要輔助大人參加勞動。

家鄉的老俵對「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少，孩子們就更無所知了，但聽老人講故事卻成了重要的啟蒙教育。晚飯後村裏的男女老少喜歡湊在一起說東道西。老人講故事的內容大都離不開鬼、神兩件事。愛聽故事是孩子們的天性，聽鬼、神的故事是越聽越害怕，越怕還越想聽。聽故事長不了多少知識，但一件事有前因後果的關係，在腦子裏就逐漸形成了。

我少年時代懂得一些道理，來自於我的「同年哥」楊秀全，也是他把我帶進了革命的隊伍。我的父親和楊秀全的父親是同年同月生，他們結成了「同年親」。這樣，我和楊秀全的關係自然就很親密了，他比我大五歲，對我關心備至。楊秀全有個叔父叫楊宜佳，他是讀過洋學堂的，在學生時代接受了馬列主義革命思想，是我黨早期的黨員。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回到家鄉從事地下革命工作。陳奇涵、楊宜佳和我的本家堂兄邱會培等人都在當時興國縣共產黨的領導人物，影響很大。一九二八年初冬，興國縣高興區成立蘇維埃政府時，楊宜佳是第一任區蘇維埃主席。因為邱、楊兩家關係很親密，我常從楊宜佳那裏聽到許多新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影響。

我的童年時代，是在封建落後的山村度過的。共產黨、毛主席領導革命，不僅使家鄉變了樣，也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紅軍來了

我十五歲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不是我有多高覺悟，而是革命的紅旗把我捲進革命隊伍的，我趕上了這個形勢。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聽到大人對紅軍的許多傳說。我家裏是大家聚談的中心地點，每天晚上都有滿屋子的人在閒談，參加談論的人都是些「鄉巴佬」，不懂又愛談，這恐怕是鄉裏人的特點，大家談的最多的還是對紅軍的傳說。紅軍是什麼樣？也說不清楚。等到外面的消息逐漸多起來了，大家對紅軍也就有了模模糊糊的瞭解：在我們家鄉西邊的大山裏有紅軍，紅軍的頭人叫「朱毛」，紅軍是窮人的隊伍，要打土豪、鬥地主，把他們的地和東西分給窮人；男女平等，女人要剪掉長頭髮……這就是最初對紅軍的傳說。

一九二八年舊歷二月間，我的家鄉的農民運動開始了。我跟著父親去參加了家鄉的第一次農民大會，這是我們村農民革命的第一次會議，大會是離我家不到五百米遠的羅家祠堂開的，全村的男人幾乎都來了。我能參加了這樣「改朝換代」的第一次會議，我感到很光榮。

主持會議的楊宜佳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人，他身穿前面有口袋的衣服，還留著分頭，當地人稱之為小洋頭，他這身打扮在農民心目中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他主要說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打人，不抓壯丁。

村子裏這次開了農民大會以後，就經常開會了，人們稱之為「農民會」。開了農民會之後，種田的人心裏高興極了，過去那種愁容好像都沒有了。我們村子唯一的一家地主，同農民的精神狀態恰好相反，地主發愁，整天不敢出門，窮人向地主借糧食非常方便。村子裏的氣氛變了，看來窮人真要翻過身來坐天下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我父親在耕地，我也在地邊玩，快到中午的時候，大路上有一個身上持著槍的人，在一個本地人陪同下走過來。那個本地人邊走邊大聲說：「鄉親們，紅軍來了，大家不要害怕，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今天晚上就住在我們村子，紅軍蠻好，不打不搶……」父親停下農活時那本地人認出我父親了，他說：「紅軍是從萬安來的。告訴老鄉們，紅軍來了，大家不要驚慌，不要害怕。」

此時，父親很高興地說：「我們這裏，兩三天以前就知道紅軍要來的。我們這裏的人喜歡紅軍來，不會害怕的！」不多一會，部隊開來了。

走在前面的人打著一面紅旗，部隊到了一個山凹子裏，突然一個什麼東西響了，紅旗插在地下，大家都不走了。當我聽到這一聲響的時候，真把我嚇了一跳，那個會響的東西後來知道是軍號。我抄小路三步並兩步地跑回家去，到家不久就有隊伍來了。晚上，在我們家裏住的紅軍除了借鍋做飯之外，什麼也不動我們的。他們祇住在廳堂裏，根本不進臥室。這天見到的事是有生以來沒有見過的，心裏新鮮的滋味也是難以形容的。

第二天一早，住在我家的紅軍就向高興圩方向走了。走前把地打掃乾淨，借用過的東西都放回原處，此外，還給我們留下大半盆的大米飯。村子裏好多人都集中在大路旁的石巖下閒談起來，他們談的非常熱鬧，紅軍僅僅在村裏住了一夜，大家對紅軍就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不久，紅軍在高興圩附近打了一個勝仗，消滅敵人靖衛團一百多人，並且立即開展了接濟窮人的活動，深得人心。紅軍打了勝仗的消息很快就會傳遍全村，大家又興奮又震驚，震驚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那時無炮，也無從有炮聲）怎麼就消滅了靖衛團呢？興奮的是，看來紅軍的確是窮人的隊伍。

蘇維埃

一九二八年冬天，紅軍攻佔了興國縣城，革命的紅色政權興國蘇維埃政府就建立了。紅軍一到，從北邊的老營盤，到南邊的高興圩，其間距離約六十里都是紅軍佔領了，一片都紅了，我的家鄉也在其內。紅軍佔領了高興圩之後，很快就有一個小分隊回到我們村子裏來，他們在村裏干了三件大事：成立村蘇維埃政府，農民當家做主；組織赤衛隊，拿起武器保衛家鄉；成立土地委員會，把地主的土地分給窮人。

大家對成立蘇維埃是擁護的，祇是讓紅軍放（委派之意）一個村長是最好的辦法，給窮人當也是當不了的。紅軍小分隊卻一直說要在老俵中找一個。我們家鄉的村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的盛況，是我永遠難忘的，到會男女老少有數百人，這麼多人聚在一起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村政府的主席竟然是我們上密村的雇工廖明光，他當主席是大家沒有預料到的。大家都感慨說：「沒有想到大字不識一個的老廖當了主席，窮人真是要做主了呀！」

在成立大會上，一個紅軍幹部講了話，他說：什麼叫蘇維埃？蘇維埃就是農民組織起來的政府，我們窮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政府，祇有這樣才能保衛自己的利益。革命是什麼意思？就是要把靖衛團，地主都打倒，窮人自己管自己的事，這是完全能做到的。

這個紅軍幹部還說：鄉親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的軍隊會不會到我們這裏來？我看大家要準備敵人來，我們自己要拿起刀槍，組織赤衛隊。敵人來了就同敵人打，不要怕敵人。打得過敵人就消滅他，打不過就先躲開他，有好時候再打，對敵人祇能鬥，不能怕。我們要保衛革命的成果，保衛家鄉。

這些話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靈裏。

村蘇維埃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在紅軍小分隊的號召下，向地主開戰了，首先沒收地主的財產分給窮人，其次是沒收地主的土地，並開始丈量土地分給村民。我家的村子裏祇有一家小地主，他早已逃跑了。離我家比較遠的地方有一家大地主，家產多得很，對這家地主由紅軍派人直接分配財產。附近的窮人都去分東西了，這家地主的糧食分了三天才分完。

我同我的父母都去分地主的東西了，人人是滿臉喜氣。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人們把能分土地看成是自己擁護紅軍最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深入農村，調查研究，體察民情，寫就了《興國土地法》，也就是後來的《中華蘇維埃土地法》。在貧窮落後以農業為主的中國，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誰就能得到民心，毛澤東做到了，這是歷史事實。

分完地主財產之後，村蘇維埃政府就著手建立群眾武裝了。在農民心中赤衛隊和革命是同樣意義的名字。楊秀全是最早的赤衛隊隊長，我的哥哥是最早的赤衛隊員，赤衛隊沒有什麼武器，祇有大刀、梭鎲和棍子。因此搞到武器、壯大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家鄉不遠的地方有個稅卡，是國民黨政府設在隘路口上向過往行商的人收稅的。他們有一短、一長兩支來火槍，這種槍射程並不遠，這在當時來說就是最好的武器了。赤衛隊很想搞到這兩支槍，楊秀全和我的哥哥等幾個人，在我的家經常商量搞稅卡的槍的事。他們商量時，他們提出過幾個方案又都感到不合適，我在一邊聽了幾次之後，向他們獻了一計，採取「偷」的辦法。他們非常同意，於是就佈置實施。

稅卡收稅的人最喜歡打牌賭錢，如果賭興上來時，可以打通宵，這是偷槍的好機會。要能進到稅卡去偷槍，關鍵問題就是打開稅卡的後門，這個任務就落到我們三個小孩子的身上。

行動的那一天，楊秀全派三、四個人去找稅卡的人打牌，從上午打到黃昏的時候，他們完全失去警惕，我們三個小孩佯裝在稅卡的院子裏玩，然後就悄悄溜到院子的後門把門打開了，楊秀全帶兩個人進來把槍拿走了，不到十分鐘就完成了任務。

楊秀全等十餘人剛回到村裏就開會了，他向大家宣佈赤衛隊正式成立。新生的事物祇要一出現，又在適當的條件下就會迅速發展。我的家鄉是紅軍解放的，家鄉的人民積極參軍又壯大了紅軍隊伍。我們村的赤衛隊是最早編入紅軍正規部隊的，是隊長楊秀全帶走的，我的哥哥邱會佳也一起參加紅軍了。

三代同堂幹革命

一九二八年春節前後的時候，各村蘇維埃政權先後都建立起來了，我們一家三代人都參加了革命工作。我的祖父是檢查站站長，父親是村土地委員會委員，母親是婦女挑擔連（為紅軍挑物資的運輸隊）的排長，哥哥是赤衛隊員，他不久就編入紅軍正規部隊離開了家鄉，我是兒童團副團長。我們都積極努力地幹自己的工作，那時，村蘇維埃開會，我們經常是全家三代人一起去，像這樣全家參加紅色革命的家庭並不多。

我的祖父是檢查站長，祇有被信任的人才能擔任這個職務，那時，防特防奸是很重要的工作。我們村前是一條北通吉安，南通贛州的大道，蘇維埃政權沿路每十里一站設下了若干檢查站，防止白區的敵人混入蘇區。過往行人要有路條才放行，本地人外出也要到蘇維埃政府去開路條，以便通過其他地方的檢查站。

我父親是土地委員，是執行分配地主土地的管事人，從丈量土地到分配都要負責，因為事關大家根本利益，祇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承擔。當時分配土地的原則是實行平均分配，我家分了土地，全家高興，因為土地是農民的根本。

這裏我要特別地說一說我的母親，她是個出色的蘇維埃紅色婦女。蘇維埃政權剛建立時分地主的財產，農民們還不敢向地主鬥爭，也不敢

把從分得的東西拿回家，怕以後地主報復。我母親第一個勇敢地把分的東西挑回家，這是非常大膽的行動。我的家鄉是白區和紅區交界的地方，局勢複雜，一九二九年初敵人靖衛團突襲了我們村子，殺害了三個人。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赤衛隊藏到山裏去了，村蘇維埃主席廖明光叫我母親為赤衛隊送糧，每兩三天就要冒隨時可能被敵人抓住殺頭的危險上山一次，堅持了幾個月之久。

我母親是深明大義的人，按規定，我哥哥參加紅軍後，我就不用去了，但後來她還是支持我去當紅軍。三〇年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母親不怕犧牲，領著婦女擔子排上戰場為作戰的紅軍送糧。三十一年六月，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正是莊稼青黃不接的時候，紅軍的糧食極其缺乏，農民田里的稻穀抽出穗，祇有頂上的一些略為發黃接近成熟。蘇維埃政府號召農民把上面的半熟稻米剪下來，送去當軍糧。農民對此極不願意，因為不但麻煩，浪費勞動力，而且會減產，我的母親則積極執行命令，日夜下田，超額完成了任務。事後，區蘇維埃政府給我母親發了獎狀，並獎勵給了她一套衣服的布料。那時的江西南部農村相當封建落後，婦女很少出門，而我母親卻是婦女裏參加革命的積極分子，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

解放後，母親一直生活在農村，七十多歲還在忙農活，沒享什麼清福。六六年，文化革命一開始，我遭到殘酷的批鬥，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就氣瘋了。七〇年我把她接到北京來，住在三〇一醫院。沒想到七一年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我被打倒了。母親因我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很快就去世了，據說母親死的時候，瘦得祇剩下幾十斤，想到此我萬分的難過。

村蘇維埃成立三天後，在一個比較大的祠堂裏召開了兒童團成立大會，到會有幾十個少年。經楊秀全提議，我當了兒童團副團長，團長是鄰村一個孩子。那天的會先唱剛學會的《國際歌》，然後團長做報告，他講組建兒童團的意義、任務和當前的工作。團長僅比我大二歲，他能在幾十人面前作報告，講得又很好，我很佩服他。會議接著是我講蘇維埃政府要求各村「破除迷信」的問題。因為我會前有些怯怕，楊秀全一句一句地教我該怎麼說。但是，到開會講話的時候，我心裏還是有些慌，講話有點「卡殼」，兒童團長在一旁幫忙，我才能把背好的那一套話說出

來，主要意思是「泥菩薩不好，要把它打了」。那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大會上登臺講革命的道理，雖然有點出洋相，但心裏很高興。以後不斷地鍛煉，就好多了。

會後，兒童團就向菩薩開戰了。我們村有一座坊神廟，一座和尚廟，一座關公廟。關公沒有專門的廟，關公的神像立在大路旁一個茶亭之內。據說若干年前大旱，全村人向其求雨，事很湊巧，果然下了雨。後來，全村就按人頭攤派錢，修好茶亭把關公的像供奉起來了。村裏人得知兒童團要打菩薩，反映很強烈，老年人更為不安。有個老頭把關公的像藏起來了，兒童團連著幾天也沒有偵察出藏匿的地點，原來那老頭把關公像藏在自己被子裏了，晚上睡覺也守著它。

和尚廟坐落在村外山溝裏的石巖上面，有一個和尚和一個做飯的伙夫。廟產富足，廟宇也堂皇。村民對這座廟沒有好感，因為三年前發大水，大家去求神保佑，並不靈驗，還是淹了田地和房子。

那一天，我帶著幾十個兒童團員打著紅旗到廟裏去，和尚嚇得躲起來了，我還沒開口，孩子們早按捺不住了，動手就打，很快就把廟裏的菩薩打得亂七八糟，那些昔日受人跪拜、不會說話的「大人物」們被打得缺胳膊短腿地躺在地下。離開廟之前，有人發現泥菩薩後腰上有個洞，洞裏裝有桂圓、稻穀、豆子，大家就分了，算是小小的戰利品。

兒童團經過打菩薩等活動後，主要是站崗放哨和軍事化訓練。後來我們兒童團一夥的人，多數一起去當了紅軍。「三代人同堂鬧革命」至今已經相隔七十多年，我從一個孩子變了老頭，往事雖然朦朧，但仍依稀記得。我從少年時就走上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道路，是共產黨、毛澤東領導的武裝革命鬥爭正好在我的家鄉發起了，使我成為紅軍較早的參加者。我十四歲參加了蘇維埃革命，一年後我又參加了紅軍。在我的記憶裏，我的少年生活，與其說是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度過的，倒不如說是在紅軍的革命大家庭中長大的。

第二章 戰鬥在家鄉

第一次戰鬥

一九二九年初，紅軍主力離開興國一帶到東邊去開拓新區，一些地方部隊也跟著出發了。這時興國以北泰和縣那邊的國民黨軍和靖衛團活動猖狂，經常向興國蘇區擾亂、搶掠，形勢比較緊。蘇區邊緣地區的防衛由當地的赤衛隊和兒童團擔任，我們兒童團擔起了站崗放哨的任務，監視泰和那邊敵人的動向，除了查路條之外，還要傳遞情報。

那時，我家鄉的青壯年幾乎全部都參加了赤衛隊、少先隊（十五歲以上少年參加），適齡兒童都參加了兒童團。為了保衛分得的田地和勝利果實，人民群眾非常積極。這是人民戰爭最初的萌芽。

村蘇維埃指定我們的崗哨設在村外大路的隘口處，哨位就在原來放關公像的茶亭裏。第一次夜裏放哨我確實有些害怕，幸虧村子裏有幾個好夥伴和我一起出哨，我膽子就大多了。晚上在哨位上，小夥伴們高興地說了好長時間的話，大家都是頑童，很是天真，時而用鬼神嚇人，時而談起革命成功後的家鄉，充滿美好的憧憬，直到瞌睡得睜不開眼了，大家就先後睡下，我第一次放哨就這樣完成了。兒童團放哨多流於形式，但有了這種形式，敵人也多少有些害怕，這些小夥伴後來也大都參加了紅軍，大都死在戰鬥中和長征路上，我算是一個倖存者。

兒童團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參加生產勞動。兒童團主要擔負了三種農活：一是放牛；二是積肥；三是割飼草。農忙中孩子們要做的事更不計其數。那些男人上了前線的家庭，孩子的勞動更是辛苦，甚至成了主要勞動力。儘管如此，兒童團還要堅持訓練、站崗、放哨、宣傳等常規工作。有一次，我們分隊還捉住了敵人一個偵探，受到了區政府的獎勵。

一九二九年秋天，我參加了消滅興國縣龍口反動武裝的戰鬥，那是我參加紅軍前第一次參加戰鬥。

我家鄉以北二十五華里有個龍口村，那裏有家姓鄒的大惡霸地主。鄒家私自設卡收稅，為此還建立了私人地主武裝。

區委決定消滅鄒家地主武裝。但赤衛隊武器很差，沒有戰鬥力，主力紅軍又遠離這裏。因此區委認為對他們只能智取，要深入虎穴打進敵人內部去。並叫我冒充羅招蓮的「表弟」，進出鄒家傳遞情況。羅招蓮是鄒家地主小老婆，是窮苦人出身。經過工作，羅招蓮和長工董長庚成了內線。

鄒家依山傍水，房高牆厚、路徑曲折，不熟悉的人進去後根本找不到門路。我冒充「表弟」，幾次進出了鄒家大院，裝得若無其事，其實每次進去都很緊張，全憑腦子記，沒有多久就摸清了裏面的情況。治安隊集中住在前面一個小院落內，他們的槍在晚上全集中到一個房子裏統一保管，領導治安隊的二少爺不和治安隊同住。

區蘇維埃根據我帶出來的情報，決定動用一百名赤衛隊員作戰。行動當天下午，先讓幾個膽大心細的人假裝成幫工隨董長庚潛伏進鄒家，赤衛隊則埋伏在鄒家大院附近。午夜一到，董長庚率潛伏進去的幾個人突然衝進二少爺那裏抓了他，另外幾個人把集中放槍的房子佔了，然後偷偷開了院子的大門，把已經準備好戰鬥的赤衛隊放進去。我因為熟悉情況，跑在最前面，一點也不怕，帶領著一百多個赤衛隊員，直逼治安隊的住處。治安隊員們從睡夢中被叫起來，一見赤衛隊的槍已經頂在腦門上，自己又沒了槍，只好投降。這次戰鬥，裏應外合的方案周密，一舉成功，一槍沒放就消滅了這股强悍的地主武裝。

巧當紅軍

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後，在井岡山建立了紅軍。朱德率領的南昌暴動部隊幾經輾轉，在湘南暴動後，率隊伍上山與毛澤東會合，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武裝力量，在佔據了井岡山為根據地後，又增加了彭德懷領導的平江暴動的部隊。井岡山是黨領導工農武裝開闢的第一塊革命根據地。但是，井岡山地方很小，要向外發展和擴大才行。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主力從井岡山下來，在

興國縣一帶擴大後，又向東打去，開闢了贛南和閩西一大片地區，影響很大。毛澤東、朱德到了興國縣一帶，我們家鄉很快又成為紅軍的根據地，這裏的不少青年人當了紅軍。

一九二九年四月以後，我十五歲了，我也想當紅軍，這件事在我家中是很難的，因為我哥哥已經當紅軍走了。

同年冬天，我的「同年哥」楊秀全回到了興國高興圩老家來「擴紅」，他已經是紅三軍的一個連長。他對我如實說了當兵是很苦的事，平日裏白天要出操訓練、執勤幹活，晚上還要放哨，生活也很苦；打起仗來，犧牲和受傷的事經常發生。但我的決心已經下了，我什么都不怕，我一定要參加紅軍。

當紅軍是我們那裏青少年的嚮往，村政府宣佈「擴紅」徵兵之後，不到幾天就有四十多人報名。但所有報名的人都比我年紀大。那天我去報名，村蘇維埃主席不給我登記，還開玩笑說：「你當兵？你有槍高嗎？晚上害怕了怎麼辦？難道讓你奶奶跟著你一起去嗎？」

楊秀全知道我要報名當紅軍，他就哄我說：「你現在參了軍跟我們走了，就回不了家了。」我堅決地說：「當了兵還回家幹什麼？再遠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次和楊秀全一起回來「擴紅」的人裏，有一個連隊的書記也是青年團負責人叫楊唐夔的，外號叫「黑子」，他很支持我當兵，和我商量好了，這批新兵什麼時候走，他一定事先告訴我。於是我就做好了準備，藏好了一雙新鞋，一旦有消息就跟著他們走。

幾天後的清早，黑子趕來告訴我，早飯後他們就要帶著新兵走了，要我別錯過這個機會。我本想和祖母告個別，但是怕她攔住我不放，就死了那個念頭，把一雙新鞋插在腰帶裏就出了家門。我離開的時候心裏很難過，難過的是十分不想離開我的祖母。走出沒多遠就幾次回頭，但當紅軍的思想戰勝了一切，我橫下一條心離開了家，跟著隊伍走了。我跟著當紅軍的這夥人走時，好在那天楊秀全有事，是下午才趕上來帶隊的。

這次我們幾個村子裏去當紅軍的有二十多人，都是十八、九歲的青年，祇有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叫柳元福，大家叫他「福叔」。走了大約二十多里路，我的腳就打起了血泡，我脫了鞋打赤腳勉強還可以走，但腳上是通紅的鮮血。我的腳無論怎麼痛，也不叫苦，反而裝作無事的樣子。

隊伍走出五十里路休息了，當地政府為我們準備了飲食，這時趕上隊伍的楊秀全發現我竟然在新兵隊伍裏，他急了，一定要派人把我送回去。我知道這時多說無濟於事，就死死地祇有一句話：「我一定要當紅軍！」同去當兵的人都為我向楊秀全求情，福叔也說：「這孩子當紅軍的心，已經扎根了，讓他跟著我試試吧。」楊秀全雖然歎了口氣，但他見我當紅軍的決心這麼大，祇好妥協了。

飯後的繼續行軍，對我實在是苦不堪言，除了腳痛得難以忍受，胯檔裏的大腿內側也磨爛了，疼得連邁步都很困難，但那一天真是人小決心大，我一直堅持走到宿營地。

事也湊巧，我們到了宿營地之後，上級就來了通知，要我們這隊新兵就地休整，等前方的部隊回來之後，合併在一起進行訓練。這對我十分有利，我算是命好。當天晚上，福叔為我燙好了腳，挑了腳上的血泡，包好了傷口，我們在一起有說有笑，白天的痛苦幾乎都忘光了，不久我倒頭就睡著了。

幾天後紅軍大部隊從前線回來了。那支部隊中絕大部分是我家鄉一帶的人，熟人一多，我也就不想家了。大部隊回來之後，楊秀全帶來的二十個新兵就補到連隊裏去了。福叔當了伙夫班長，不久當了司務長，因為我年紀太小當了一個「超編的傳令兵」。連部編制上祇有兩個傳令兵，加上我就變成三個了。我很快就習慣了部隊生活。我終於成為一名正式的紅軍戰士。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我被關在北京衛戍區、秦城監獄以後，也常常做夢。戰鬥的歲月很難夢到，卻偏偏多次夢到參加紅軍第一天的情形，每每老淚縱橫。

在連隊經過一段時間的操練，我簡直成了另外樣子的人，並且特別能走路。有一天黎明出發練習急行軍，來回約有六十多里路，我沒有掉隊，腳上也沒有打泡，我高興極了。

我在部隊各方面都有了進步，一九三〇年一月間，黑子介紹我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青年團是幹什麼的？我當時並不完全瞭解，祇知道是要求進步的青年應當參加的。當時，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在我們那支紅軍隊伍裏還是不公開的。不久，黑子調到江西省青年團委當巡視員。

去了，他走了之後，我們再也沒見過面，他後來在紅軍第二次反「圍剿」的戰鬥中犧牲了，我至今還懷念他。

黑子調走之後，連部裏沒有書記，我這個讀過點書的人成為連部的文書。文書和書記不一樣，雖然做的是一樣的工作，但書記比文書職務高一級。我當紅軍沒多久就當了文書，是很大的進步，我能有這樣的提昇，是因為連隊裏一百多號人中沒有一個比我識字多一點的人，我才有機會提昇到文書的職位。

我當了文書，才知道我們部隊的正式番號是「興國泰和紅色警衛連」，共有一百五十來號人，其成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興國縣高興圩的人。雖然我們是地方部隊，但裝備不錯，戰士差不多都有槍，子彈也不少，這在地方部隊中是很少見的。這支部隊在興國和泰和交界的地方打過不少勝仗，同群眾聯繫也密切，我們完全是家鄉人民自己的子弟兵。我的同年叔楊宜佳和同年哥楊秀全是這支部隊的創始人，他們在家鄉的群眾支持下創建了一支紅軍地方部隊，對革命有貢獻。

我們的部隊由於有一定戰鬥力，最後江西軍區決定把我們歸屬省軍區獨立團，以後又隨獨立團編入中國工農紅軍江西軍區第二十五縱隊。不久二十五縱隊就改為紅三軍九師二十五團。楊秀全昇任營長，我們的連長姓石。

我們部隊整編後不久，一九三〇年十月執行了一次護送一千多名新兵到紅軍主力部隊去的任務。我們向北出發離開興國到吉安，這是我第一次進到城鎮裏。原先我連興國縣城也沒有去過，吉安雖然是個小縣城但是在我眼裏已經是太大了。

有一天，我正在連部，忽然聽到外面響起了「嘟、嘟、嘟……」的聲音，我嚇了一跳。連長告訴我說，那是贛江上的小火輪（蒸汽機輪船），我們都到江邊去看新奇。正在這時，值星排長急忙跑來向連長報告說：「不好了，幾個新兵連的人大多數跑到山上去了，說是『小火龍』來了，一口能吃下一個人。現在有百十名新兵跑了，散在城外滿山都是。」石連長馬上帶部隊上山去找人，我也跟著去了。我們用家鄉土話向新兵們喊：「大家不要怕，不用跑。江上的小火輪是一種船，不是小火龍，它不會吃人，也上不了岸。」我們的話起了作用，一部份人不跑了，下山回到宿營的房子裏去。後來各單位清查人數，一千多名新兵少了一百

多人，跑了的人找回來的不多。幾天艱苦的部隊生活就難倒了他們。另外，也有些人是當地蘇維埃政府為完成上面壓下來的任務，被強制性地送來的，那些人原本就不想參軍，正好借這個機會不辭而別跑回家裏去了。

執行護送新兵的任務完成後不久，我調到團部宣傳隊任宣傳員。

我們紅三軍九師可以說基本是興國縣的地方部隊，但是編入紅三軍之後，部隊活動的範圍就大多了，不久我們離開吉安，開到樟樹一帶活動，轉一大圈後又回到興國和泰和一帶。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開到了萬安縣境內的東固山，準備粉碎敵人剛發動的對蘇區紅軍的第一次「圍剿」，在這段時間裏，部隊都是在行軍中生活的。

上面說的是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真實情況的寫照。今天，紅軍已發展成了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現代化的軍隊。作為這支軍隊初期的參加者，我基本上看到她發展的全過程。中國人民解放軍能從那麼一支以沒有文化的農民為主的軍隊發展成現在這樣強大，是很了不起的。這是幾代人、特別是最早參加的一代革命者努力奮鬥的結果。

肅清「AB團」

我們部隊從贛西北返回吉安後，駐在東固鎮以東一個叫龍崗的地方，在這裏駐防時，紅軍裏殺「AB團」風潮傳到我們部隊裏。

「AB團」到底是個什麼組織？我當時根本不知道，祇聽說它是壞人組成的一個秘密反革命組織。幾年後，我到瑞金紅軍學校學習時才知道它是「反共團」英文字母的縮寫。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江西南部就有了「AB團」，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一九二九年夏天開始，敵人又把這個名字拿出來使用，主要是給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內部的人栽贓的，用這種從內部攻破的方法來瓦解革命政權和紅軍。一九三〇年七月在蘇區內亂打「AB團」就開始了，入冬之前在紅軍中也風行開了，誤抓誤殺了很多自己的人，敵人的陰謀得逞了。

我們部隊在龍崗駐紮下之後，開始就地整訓，積極做著反「圍剿」的準備。我們團宣傳隊員都分散到基層各連隊去做青年工作。我被分到原來所在的八連進行政治鼓動。整訓開始時，我的思想和工作都很好，經常受到團部的表揚。但做著做著就不對味了，上級要求官兵們發動起

來揭發混進革命隊伍裏的壞人，宣傳隊員要帶頭，本來正常的生活突然被打亂。肅反運動開始了。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革命隊伍內部的整肅，雖然我還小，祇是個小小的團宣傳隊員，組織上沒有審查我，但我被一些眼前發生的事情嚇得很厲害。

我們部隊的肅反運動就是抓「AB 團」、殺「AB 團」，運動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發生的「富田事件」時達到高潮。在那次事件前後，紅軍和蘇維埃內部都錯殺了一大批無辜的人。運動開始沒幾天，八連政委就被抓走，聽說他是「AB 團」。沒幾天，我們的二排長也不見了，不久又有幾個班長沒了，被抓走殺了。看到這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喪了命，我有點緊張。殺「AB 團」處決人的場地離我們的住地有十里路。那時每天都有人被綁到那裏去執行死刑，殺人的恐怖新聞我也聽到不少。掉腦袋雖然輪不到我頭上，但我總覺得心裏有什麼事，整日也是愁眉不展的。

肅反期間，有一次我隨福叔去部隊駐地附近趕集，我們買好菜之後，正要往回走，突然聽到軍號的聲音，這種聲音以前我沒有聽過，聲音使人心裏很難受。我們趕快往處走，當我們走到河邊時，已經戒嚴了，橋上不准過人。不一會兒，我看到河灘上綁著幾個「犯人」，接著執行人用大刀砍他們的腦袋，那幾個人躺在沙灘上，血染紅一片，這可把我嚇壞了。因為前幾天傳來的消息，說已經調到省裏當共青團巡視員的黑子也是「AB 團」，而我正是他介紹入團的，這會不會牽連到我？

回到連部之後，我死死地把石連長拖住，反覆問他：「黑子（楊唐藝）是不是也是那個……」，石連長聽得懂我的意思，他一句話不說，讓我更著急了，晚上我就病倒了。很快楊秀全來了，楊秀全問明情況後說：「我知道了，他的病，三班長（士兵肅反委員會主席）就可以治好。」不一會兒，三班長來了，向我做了解釋，我這時才明白了我參加的不是「AB 團」的團，而是共青團的團，「肅反」不會牽連到我，我的「病」也很快就好了。

我對自己不是「AB 團」，心裏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是紅軍部隊殺「AB 團」的風並沒有停止。有一次我到上級機關去送信，回來的路上又看到別的部隊殺「AB 團」。為了不讓那些人行刑前喊叫，用小樹杈橫在嘴裏，用繩子綁住，行刑的方法比我們那天在河灘上見到的更殘酷。

爲了節約子彈，執行人把要殺的人綁起後推倒在地，用大石頭砸「犯人」的頭，砸得腦漿四濺……我一見這個場面，嚇得就跑。回憶起那一天的情景，現在仍然感到不寒而慄。打「AB團」活動不久就停止了，但紅軍中相當一批中下層指揮員被無辜地殺掉了，使初建不久還很弱小的紅軍大大地傷了元氣。這場政治大災難，有政治路線錯誤的原因，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後地區農民組成的紅軍部隊的愚昧也加重了這場風潮的災難性。

參加粉碎第一次「圍剿」

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江西蘇區的形勢明顯緊張了。蔣介石對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企圖在三至四個月內一舉消滅江西蘇區的紅軍。

我們這支部隊在沿溪渡過贛江後就開始動員反「圍剿」。當時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水平不高，不能通俗地說明反「圍剿」的意義，祇講一些「捍衛紅色蘇維埃」之類的口號。戰士們對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心裏沒底，不少人有些害怕。恰好我們紅三軍和紅四軍一個師的部隊住相鄰的村子。一天，紅四軍軍長林彪來給紅四軍部隊講話，上級通知我們也去聽。

這是我第一見到林彪。他根本不像老兵們傳說的那樣是威風人物，而是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個子不高，濃濃的眉毛。他如果不是騎馬來，後面還跟有護兵，誰也不相信他是紅軍第一主力的紅四軍軍長。

林彪在打穀場上的檯子上對著下面一大片部隊說：我們現在集合兵力回到自己的「家」門口來打這一仗，是因爲我們熟悉這裏，老百姓又擁護我們。敵人對這裏倒是很陌生，我們把白軍引到山溝裏來，牽著敵人跟著我們轉，把它像蛇一樣，拉的很長，我們在適當的時候猛地一回頭，把敵人切成幾段，像獾子吃蛇一樣，一段一段地把敵人吃掉……。林彪用通俗的道理來說明我們能打敗敵人，士兵們聽了林彪的講話之後，明白了紅軍的戰法，提高了認識，主要是解決了「怕」的思想問題。我那時當兵已有一年，聽了林彪講話，我第一次明白了戰爭有「戰略戰術」問題。前段時間，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反「圍剿」的戰略方針進行了討論，要在贛江以東蘇區腹地有利的地形下，發現敵人的弱點，再對其進行攻擊。這個戰略被林彪深入淺出地向士兵們講明白了。

十一月中旬以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蘇維埃政府對粉碎敵人的「圍剿」進行了緊張的準備工作，在部隊和群眾中，採取多種形式進行深入的宣傳和政治動員，解除戰士和老百姓的種種顧慮，樹立必勝的信心。臨戰前，總前委在小布召開軍民誓師大會。會場上張貼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的大標語，這些都是毛主席最早的軍事思想。紅一方面軍總部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思想，頒發《三十條作戰注意》，簡明地規定了指導思想，原則和要求，戰場紀律後方工作和戰後注意事項等等。毛主席的指揮是我們能夠粉碎敵人「圍剿」的保證！

我參軍之後打過的仗都是打的地主武裝和國民黨地方武裝靖衛團，國民黨的「中央軍」是個什麼樣子卻沒見過。現在要和他們打大仗，我並不害怕，反倒有新奇感，希望仗最好早點打起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底，我們連進行戰前動員。石連長說：「敵人已經被兄弟部隊牽著鼻子走到龍崗的山谷裏了，我們要把他們堵在山溝裏消滅掉。在戰場上，誰活著誰就要打下去，絕不能怕死！」

第二天，紅三軍各部隊在龍崗的稻田地裏集結，第三天拂曉，我們部隊上戰場，這是紅三軍九師參加反「圍剿」作戰的第一天。我們連是九師參戰的前衛連，走了十多里路的時候，大家看到紅一方面軍毛澤東總政委、朱德總司令站在路邊土崗上檢閱上戰場的部隊。因為部隊走得很快並且已經聽到槍聲，我無法細看自己的最高領導，祇看到毛總政委身軀很高大。當時紅軍中對毛澤東有很多傳說，說祇要他在，就能打勝仗。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毛澤東，並且是在戰場的槍聲伴奏下看到的。

我們連繼續向前急進到亭子嶺的狹窄谷地。附近突然一陣陣槍聲，而且越來越激烈，這時國民黨中央軍衝過來了。那時打仗很簡單，兩軍相逢勇者勝，我們發起一個衝鋒，敵人轉身就退。我們追著敵人打，敵人邊退邊戰。白軍武器好，槍也打得準，我們不斷有人犧牲，前面的倒下，後面的接著追，農民出身的紅軍在山路上跑的快，很快就追上敵人進行肉搏。我們連傷亡很大，兩個排長也犧牲了，二、三排在一個山頭上沒有人指揮，石連長命令我這個青年委員為代理排長，我領著大家勇敢地追擊殘留的敵人，這一下子敵人基本潰散了，多數人停下來投降。龍崗戰鬥的時間並不長，傍晚太陽西斜之前，戰場上槍聲最後「熱鬧」了一

陣子就平靜下來。我們連還剩下三十多人，接到命令打掃戰場，把犧牲紅軍的屍體集中在一起掩埋，把受傷的人向後面送。

這時有人說，山坳裏有一個會叫的東西，用手一搖「嗡、嗡、嗡」地響，誰也說不出是什麼，嚇得心驚肉跳。我們把情況報告上去，一會兒，來了幾個紅軍和兩個穿白軍衣服的人把它抬走了。事後我才知道那是手搖發電機，是無線電電臺發電用的。來識別和抬走發電機的人是剛從白軍參加紅軍的電臺臺長，叫王諍。王諍是人民軍隊無線電事業的創始人。在長征途中，我同王諍就熟悉了，對那次戰鬥繳獲了手搖發電機，不止一次地作為笑料談得很高興。

這次戰鬥我們連傷亡很大，我們團把剩餘的部隊集中起來，立即帶隊向亭子嶺集合急行軍，翻一座大山時，我摔倒跌進山溝裏昏了過去，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傷得動也不能動了，我一摸槍還在身邊，我咬著牙努力往上爬，終於被戰友發現了，把我救上來送到救護站。軍醫查了我的傷情，很嚴重，在前面的戰鬥中，我左小腿已被手榴彈炸傷，骨頭都露出來了，我怕下火線，叫衛生員包紮了一下，就又上陣了，我囑咐他不要說出去。我這才搞明白，因為腿傷了沒有力氣，腿一軟才跌進了山溝，真是禍不單行，現在又骨折了。醫生給我作了簡單的包紮後，轉送到後方醫院去。紅軍後方醫院算不上是真正的醫院，沒有專門的醫生、護士，祇有少數中醫和招呼傷病員吃飯的人。但我很幸運，遇到了一個福建籍客家老中醫，他對我特別關心，仔細檢查傷情後說：「你的左腳小骨錯位了，很快就可以好。」他用客家話反覆安慰我。第二天，醫生來給我治腿，同來的還有幾個身強力大的戰士。老醫生表情嚴肅地說了一句：「你的腿很快就會好的。」他的話剛落音，幾個戰士用勁把我按在床板上一點不能動，醫生則把我的腳腕子用勁一扭，我聽到「嚓」的一聲，就疼得暈了過去。我甦醒過來之後，老醫生說：「你腳上錯位的小骨必須正位，炸傷的傷口也要清理。我們沒麻藥，祇有用蠻辦法。」給我治療彈片的傷口時，也沒有治傷的藥，祇能用鹽水洗傷口，每一次洗傷口都把人痛得死去活來。十天之後我的腿好多了，可以下床動動。我幾次到醫院院部要求回部隊，回答說：「現在部隊離這很遠，你暫時不能走，先臨時參加醫院的工作等待出院。」於是我就參加院部組織的宣傳工作。我從上級發下來的材料中知道，紅軍反圍剿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殲滅白軍一萬

人，繳獲七千多支槍，還活捉敵軍中將指揮官張輝瓈，召開群眾公審大會，當眾把張槍斃了。傳說蔣介石對張的死很痛心。

不久上級通知：九師傷癒人員出院到江西軍區軍事部集合。我們二十幾個人到位於興國縣的江西軍區軍事部報到，在這裏我看到了「同年哥」楊秀全。他奉命來組織興泰萬赤衛隊，他提議將九師傷癒的傷員都調到赤衛隊，得到批准。

幾天之後，以九師傷癒戰士二十多人成立了「興泰萬赤衛隊」，後來發展成「興泰萬獨立團」，在兩年多的時間裏發展到二千多人。由主力部隊派骨幹組建地方部隊，是當年擴大紅軍搞「豐收」的方法，興泰萬獨立團就是一個典型。

參加粉碎第二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對贛南蘇區的第二次「圍剿」開始了。蔣介石坐鎮南昌，何應欽任前線指揮，帶著二十萬大軍分四路向蘇區殺來。

那時興泰萬赤衛隊剛成立，不過百十多人，但在反「圍剿」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1、西渡贛江佯攻。敵人這次進入「圍剿」區後就固守不動，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為此，紅軍必須調動敵人才能在運動中取勝。那時敵主力在贛江以東，紅軍西渡贛江會牽動敵人。於是興泰萬赤衛隊和友鄰的赤衛隊三百多人，由紅三軍九師指揮，向泰和縣以北的沿溪渡出發，佯作紅三軍主力西渡贛江作戰。我們沿途寫了大量標語和路標，落款全是紅三軍的番號。我們在沿溪渡街上最熱鬧的地方派出糾察隊高舉紅旗在街上巡邏，敵人相信紅軍西渡贛江的意圖，我們的行動對敵人起了牽制作用，為紅軍主力的集結爭取了時間。

2、捉敵人的「活口」。敵二十八師在泰和、富田一線固守不動，紅軍要捉「活口」瞭解敵情。紅九師偵察參謀帶著我和十個戰士到富田、泰和之間去活動，天遂人意，在那裏捉住了敵人一個軍官和兩個護兵。軍官立即將一張紙塞進了嘴裏，我們趕緊掐住他的喉嚨把紙掏出來了，原來是敵師長傳達的命令，要富田的敵人給二十八師準備五天乾糧物品，三天後向蘇區東面一帶進攻。我們隱蔽到天黑返回，那個敵人軍官要死

狗不肯走，我們用繩子把他胳膊和雙腿綁了，向老鄉借了一個大筐抬着他走，送到了師部。根據這個重要的情報，紅軍做了反擊的準備。

3、為紅軍主力鉗制敵人。敵人剛沿著富田河向東固方向前進，那裏正好在我們的預定的戰場裏。紅九師立即進入戰鬥準備：一是破壞山區道路，使敵人行軍困難，道路缺口破壞了，敵人短時間修不好，卻把兵力分散了；二是由我們興泰赤衛隊作嚮導，協助紅軍引誘敵人進到水官河一帶後鉗制住敵人，紅九師主力擇小路繞到敵人後面把道路切斷破壞，再把敵人切成一段一段地消滅。戰鬥打響之後，紅軍在二十多里長的一條山溝裏把敵人截成了四段包圍。敵人進退不得，祇得交槍投降。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損失就消滅了敵人，俘虜一百一十多，繳獲步槍九十餘支，新卡機布軍裝一百餘套。紅九師接收了繳獲後，當場留給赤衛隊每人一套軍裝以示嘉獎。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了洋布衣服。

第二次反「圍剿」的富田戰鬥，紅軍殲滅王金鈺的二十八師大部和四十七師一部，繳獲五千多枝槍，還有一部100瓦電臺。富田戰鬥後，紅軍後續又打了白沙戰鬥、中村戰鬥，總共消滅敵人近二萬，繳槍一萬多支，基本粉碎了敵人的「圍剿」。後來又進行了廣昌戰鬥，建寧戰鬥，第二次反「圍剿」戰役至此結束，總共消滅敵軍三萬多人。第二次反「圍剿」戰役前，紅軍一些主力部隊還要用土火槍和梭鎲，但戰役後，都換上洋槍，大多數部隊還有了正規的軍裝，紅軍壯大了。

參加粉碎第三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離第二次「圍剿」結束還不到一個月，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又開始了。這次蔣介石親自掛帥指揮，調集三十萬兵力，企圖「長驅直入」一舉殲滅紅軍。

紅軍遇到的困難比前兩次反「圍剿」更大了。除了雙方力量懸殊之外，主要是出現了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敵人來得突然。蘇區軍民還沉浸在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的氣氛中，紅軍當時也正處於分散狀態，必要的戰爭動員、戰場準備、徵集糧食都沒進行，而敵人的進攻已經開始。直至七月中旬，紅軍主力才由蘇區的東北部連日行軍回趕到一帶集結，應戰十分倉促。

第二，敵人長驅直入，很快就扼制了蘇區的城鎮和要道，使紅軍運動十分困難。蘇區地盤不大，交通不發達。另外，還有許多沒打下來的地主「土圈子」武裝，敵人深入蘇區後，隨同而來的地主還鄉團很快同「土圈子」聯繫上了，扼住蘇區咽喉，給紅軍運動造成很大困難。為防止被敵人包圍，紅軍就要在蘇區邊緣山區較大範圍內緩慢集結。過去紅軍的迅速運動、集中兵力殲滅敵人的老辦法，在第三次反「圍剿」中一時難以實施。

這個仗怎麼打？發動人民群眾直接參戰！人民戰爭的思想此前已初露萌芽，在第三次反「圍剿」中趨於完善，是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的特點。這次戰爭的勝利，有諸多的原因，但集中到一點就是，毛澤東創造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基本概念是，紅軍為骨幹，有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革命戰爭。

1、動員蘇區全民參加戰爭。把敵人的進攻和可能發生的問題和對人民群眾參戰的要求直接向群眾說清楚。我們把底（即敵情）交給群眾，使群眾心中有數是最能啟發群眾的積極性的。戰爭動員就是把要求群眾參戰的具體任務，如站崗放哨、籌糧送糧，招呼傷病員等都說清楚。蘇區人民的參戰熱情十分高漲，我自己一家人就是例子。我年老的祖父母，父母和幼年的弟弟，全家六口人都參戰了。

蘇區農民從地主手裏分到土地，反對敵人「圍剿」就是保衛勝利成果，因此參戰熱情很高。蘇區農民知道沒有紅軍就沒有土地，也沒有飯吃；紅軍也很清楚，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援，紅軍難以存在。歸根結底，黨和群眾的關係就是互相依靠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群眾哪有不關心紅軍的存亡呢？事實上，群眾關心紅軍也就是關心自己的利益。蘇區的農民，把自己的兒孫都獻給了紅軍，幾乎家家都是紅軍家屬。

2、蘇區各處實行堅壁清野。老俵們把糧食、生豬、耕牛、家禽等能吃的東西和牲畜送到深山裏藏起來。敵人對堅壁清野很痛恨，他們吃不上飯喝不上水，生存都有了問題，一氣之下常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甚至把整個村都燒掉。

3、籌備糧食。蘇區小，糧少難養兵。第二次「圍剿」後紅軍主力向贛閩和贛粵交界方向開闢新區，也是為糧食。第三次「圍剿」是六月底，稻穀離收割還差一個多月。於是蘇維埃政府提出要求：一是節食，群眾和

地方政府兩個月內每人每天祇吃二兩糧，以紅薯和野菜補食，以此算出可節出來的糧食要一次交清給政府，解決紅軍作戰部隊三萬人的糧食。二是「剪黃」，在稻子成熟之前先將谷穗頭上成熟的剪下成糧，「剪黃」很費事，要用剪刀一穗一穗地剪，收穫很少，但「剪黃」解決了紅軍的急需。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蘇維埃政府答應日後補償群眾損失，老百姓戰後向各級政府算賬。興國一帶蘇維埃政府創造了奇跡，居然解決了紅軍部隊的糧食。

4、赤衛隊配合作戰。蘇區的赤衛隊、少先隊全部參戰了。

5、破壞道路，破壞道路能夠為紅軍出擊爭取時間，並在敵人退卻的時候截擋他們，增大紅軍殲滅敵人的機會。反「圍剿」開始後，我們對蘇區道路實施破壞，有很多險峻地方的路破壞了不容易修復，甚至不能修復，群眾為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山區的老百姓對道路很珍惜，捨不得破壞，動員群眾破路比動員堅壁清野更困難。

6、救護和看護傷病員。群眾裏的中年人和壯年婦女為擔架隊，老年婦女則照顧傷病員。當時紅軍的衛生機構和戰地救護很簡單，藥品也很少，老鄉家裏就是「醫院」。傷員在戰場就近交群眾看護。這次我家招呼了五個傷員，一切「護理」工作，都落在我七十歲的祖母身上，她成了遠近聞名的「紅軍奶奶」。

紅軍有了群眾的支援，就敢在盤踞蘇區的國民黨部隊的眼皮底下和「肚子」裏鑽來鑽去。蘇區面積小，來了幾十萬敵人，不僅每個縣有敵人，甚至每個鄉都有。紅軍由蘇區西部的雩都、興國轉移到蘇區東北的寧都的幾次作戰，都是從敵人之間的縫隙中鑽過去的，有時空隙祇有幾里寬，鑽過去很不易。後來紅軍在寧都以北，君埠以東集結時，被敵人發現，結果還是從兩股敵人之間一個不到幾里寬的山溝縫隙中鑽出去，脫離了危險。敵人進入蘇區後開始分散，佔的地方越多越分散，越有利於紅軍殲滅敵人。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牽著牛鼻子走」，紅軍分出一部分和赤衛隊一起騷擾、阻滯敵人的進攻。大部隊則隱蔽運動，聲東擊西，往返穿插於敵人重兵集團之間，避強擊弱，速戰速決殲敵，從被動中爭取了主動。

敵人在蘇區已經奔波兩個多月，一直被紅軍牽著走，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士氣急劇下降。紅軍也不輕鬆，長距離運動作戰，常常走

幾天的路才能打幾個鐘頭的仗，又要遠距離轉移，得不到休息，糧食供應不上，沒有鞋子穿，非常疲勞，但人民的支持大大地鼓舞了紅軍的士氣。紅軍從八月初至中旬，在半個月的時間內繞道千里作戰，幾乎沒有睡過一次完整的覺，極度疲勞，行軍中休息，戰士們祇要坐到地下就呼呼地睡著了，再出發時要人拉幾次才能醒來。

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進行了蓮塘戰鬥、良村戰鬥、黃陂戰鬥、老營盤戰鬥、高興圩戰鬥、方石嶺戰鬥。興泰萬赤衛營主要打的是老營盤戰鬥。

老營盤戰鬥前紅軍主力進至興國、萬安邊界的均村、茶園一帶隱蔽待機，紅軍此前已經取得了蓮塘、良村、黃陂戰鬥的勝利，累計殲敵、俘敵萬餘人，士氣正旺。九月六日赤衛營接到命令派一個連到楓木凹破壞橋樑，我是楓木凹人，即隨該連去執行任務。我到村子裏一人未見，村民們都到山上躲藏起來了，我用火炭在自己家的門板上寫道：「我一切都好」就走了。我們把各處隘口橋樑破壞後，敵人就好像割地為牢似的不能動彈，最後被紅軍逐段地消滅了。老營盤戰鬥是一次很漂亮的戰鬥，紅軍傷亡很少，消滅了敵軍一個旅，俘虜了二千多人，繳獲各種槍支兩千多。紅軍總部對老營盤戰鬥的非常讚譽，曾發過一份教材專門論述這次戰鬥的經驗。後來的瑞金紅軍學校、延安的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的軍事教材中，都把這次戰鬥列為優秀戰例當教案。新中國成立後，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科學院進行戰役戰例學習研究，都要介紹這次戰鬥。老營盤戰鬥成了人民軍隊作戰史上的經典之作。

在粉碎敵人的三次「圍剿」中，紅軍受到了嚴峻的考驗。由於戰略方針的正確，人民全力支援，紅軍英勇作戰，打了一場有聲有色的人民戰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的戰鬥風格形成了，一直保留到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其中以中央紅軍為基礎的第四野戰軍等部隊繼承發揚這種作戰風格尤為顯著。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贛南和閩西的蘇區聯成一片，形成了擁有二十一個縣城、五萬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萬人口的中央蘇區。到一九三二年底第四次反「圍剿」開始前，在一年半的時間裏，中央蘇區相對平和，紅色政權得到鞏固和發展，我們興國這一帶的蘇區也得到了擴大。

粉碎敵人連續三次「圍剿」的多數戰役是在興國境內打的，興國人民對蘇維埃革命的重大貢獻眾所周知。我們興國縣在蘇維埃革命前人口不到三十萬，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將近十萬人參加了紅軍。我們家鄉被譽為「蘇區模範縣」。

第三次「圍剿」後，敵人向中央蘇區的侵犯就改在東北方向，即在閩贛兩省交界一帶。興國等老蘇區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和擴大紅軍。一九三三年一月，黨中央由上海搬進中央蘇區。在王明路線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紅軍的戰略有了改變，要和敵人打正面陣地戰，紅軍急需擴大。一九三三年四至五月間開始的擴大紅軍的辦法是很特別的。名義上是動員，實際是強迫。農村裏祇要是能當兵的人，是非去不可的，有沒有勞動力種田都不顧了。地方蘇維埃政府把可以送到紅軍的人幾乎全送去了。誰也不敢不辦，否則就以反對蘇維埃論處。紅軍數量雖然迅速膨脹，但質量下降了，蘇區也大傷元氣。

擴大紅軍在敵人第五次「圍剿」之前一直是蘇區的主要任務。地方領導幹部如果完不成「擴紅」，常常要受撤職處分。當時「擴紅」的非常措施大致如下：

1、中華蘇維埃政府發佈《動員令》，提出要「保衛蘇區的每一寸土地」，擴大紅軍，誓死保衛家鄉，保衛勝利果實。

2、各地以鄉為單位張榜公佈應徵名單。名單一公佈，該當兵的人誰也跑不掉，互相監督。上了榜而不報名的，鄉政府就在門上掛「恥辱牌」相威脅，對報名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3、發《應徵令》。由縣級蘇維埃政府對應徵的每個人發給《應徵令》。蘇維埃憲法規定所有蘇區人都有當兵的義務，如果不執行《應徵令》就是反對蘇維埃，這是很大的罪名，可以嚴厲處理。

4、公佈懲罰破壞「擴紅」行為的命令。凡是破壞「擴紅」，都必定嚴懲。我記得當時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劇社編了一出宣傳「擴紅」的戲，戲中富農婆搗亂「擴紅」時唱的歌詞是「當了紅軍很艱苦，天天行軍兩腿痛，夜裏放哨沒覺睡，凍得身上好冷喲……」劇社本意是宣傳「擴紅」，但演出後起了負作用，結果對這個戲的作者和演員都當作破壞「擴紅」罪給予嚴厲處理。

「擴紅」中「反徵」的現象很嚴重。最常見的就是躲藏起來或自傷，入伍後開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隊如發現某個戰士有了開小差的苗頭，會立即派人做說服工作，一般允許你回家呆幾天，到時主動歸隊就算沒事。如果不回來，「擴紅」人員就會把不歸隊的人抓到鄉政府去，被強制送到部隊去，對開小差的處理，地方政府比軍隊還嚴厲。我參加革命後，遇到過第一次過左、過激的群眾運動就是這次「擴紅」，中國共產黨從那時起就有了「寧左勿右」的思想。

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了，被迫長征，過去祇強調是王明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我認為中央蘇區的政策也很有問題，如過度徵糧、「擴紅」，以及土地革命中殺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過激行爲，各地都打「AB 團」肅反擴大化，使紅色政權有些失去了民心。我們興國縣在蘇維埃革命前人口二十三萬，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八萬餘人參加了紅軍。這被說成是我們家鄉的光榮，被譽為「蘇區模範縣」，實際上已經是竭澤而漁了。

第三章 紅色瑞金

在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在江西寧都舉行暴動，參加了紅軍，被編為第五軍團。這是紅軍另一種方式發展起來的力量，必須很好地改造建設才能真正成為共產黨的軍隊。這時，正逢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提出「政治建軍」的方針，即在各個部隊加強政治機關的建立和建設。中革軍委從其他紅軍老部隊調給五軍團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幹部，從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統，我作為骨幹也在其中。此前我們在瑞金附近進行了短期訓練，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弼廷是我們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隊中開展了「三大運動」，即以反對軍閥主義為中心，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要團結共事。

軍團的領導人董振堂、趙博生等革命態度堅定，加上他們在部隊裏有極大的影響力，使紅五軍團很快成了共產黨領導下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一九三二年初，紅三軍團和五軍團在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指揮下攻打贛州，攻城打開突破口之後，三軍團衝進城內。由於沒有經驗，突擊進城的部隊遭到敵人的反突擊，這時五軍團發揮了他們城市巷戰近戰的特點，進行肉搏戰，用大刀殺開了一條血路，救出三軍團。這是紅五軍團暴動後編為紅軍的首次大戰鬥，打得非常英勇，在紅軍中樹立了威信。從此，五軍團不僅和紅軍其他部隊團結了，內部也更加團結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際，我由紅五軍團選送到瑞金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期學習。瑞金是中央蘇區剛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中央蘇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工農紅軍學校滿足了我學習的願望，紅

軍學校的校長是劉伯承，他是我軍軍事教育的開拓者，後來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不少都出自這所學校。

我進紅軍學校之後先在政治團學習，後來上級要求由政治團調部分個人政治條件好的學員到特科營軍械班學習，我被調到軍械班。不久軍械班與供給隊合併了，我在供給隊學習，一直到畢業。我很珍惜這次機會，我在紅軍學校學習祇有八個月，學習非常努力。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學習了戰術戰鬥條例，和粗淺的天文、地理知識，還學習算數和簡單財務原理。這些全新的文化，對我又是一次啓蒙教育。學習中，我不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從士兵一步一步上來的，在紅軍戰鬥部隊受過基礎軍事訓練，到了紅軍學校裏，我對隊列、射擊、投彈、田徑等樣樣在行。在校期間，我曾是瑞金紅軍學校評選的模範班的班長，一百米賽跑還得過一等獎。一九三三年春，我以優異的成績從紅軍學校畢業。

由於我學習成績突出，家庭成份好，是黨員（我已於三二年由團員轉為黨員），畢業時就和另一個叫劉吉仁的學員被留在瑞金紅軍總部機關，分配到總供給部。我們兩人都到財政處工作，他任出納，我任會計。不久，我兼任總供給部的機要統計員，管理全軍與總供給部有關的軍務實力統計，這是一項絕對機密的工作。

總供給部機要統計員的業務範圍為：進行紅軍人員、兵力、槍支、馬匹、軍械、彈藥、糧秣的全部實力統計工作，各部隊實力都分別定有秘密的代號，總供給部除楊至誠部長、葉季壯政委外，祇有我一個工作人員知道全軍的這些數字。我擔任這項工作之前，經過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專門審查並由周恩來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來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殊工作證，我要是去中革軍委辦理這方面的業務，紀律規定我不能個人行動，至少有兩個保衛人員（特工）與我同行。

我擔任總供給部的機要統計工作不久，在行政職務上又擔任了供給部政治指導員，主要是在總供給部部長楊至誠、政委葉季壯直接領導下工作，就好似總供給部的機要秘書一樣，成為部長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可以這樣說，楊至誠、葉季壯，尤其是葉季壯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楊至誠比我大十二歲，是出身於黃埔軍校和參加過南昌暴動的老資格，但他把我當作忘年交，我倆不僅是上下級，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時

供給部沒有秘書，楊至誠就把我當秘書使用，叫我為他辦理不少文書工作。他出差辦事一般都帶我出去，我隨著楊至誠到過福建長汀、江西寧都、興國等地檢查工作，這讓我開闊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給部後不久，已經來中央蘇區一年多的原上海黨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傾路線更厲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推向了頂點，在組織上大量肅清和他們意見不一致或無辜的人。楊至誠因為供給部工作人員有貪污銀圓行為被抓住不放，受到執行王明路線的人的迫害，被打下去，之後葉季壯出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兼政委。

葉季壯上任後，我已擔任了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一段時間了。當時總供給部機構非常精幹，政治工作範圍內的具體事都是我一個人在管，因此我這個政治指導員就是總供給部政治委員的直接助手，其實我早已同政委葉季壯的關係甚為密切了。葉季壯參加過廣州暴動、百色暴動，參加革命前曾做過新聞記者，社會知識豐富。他對一般人不愛多說話，但和我則時常聊天，從不把我當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親。楊至誠、葉季壯是我的老領導，他們對我的教育和培養，我銘記在心。一九六七年六月葉季壯去世，在他的追悼會上，總理拉著我的手說：「以後軍隊的後勤工作就靠你了。」總理的話意味深長，雖然我已當了多年總後勤部長，但是我軍的後勤工作是葉季壯、楊至誠他們開創的。

我由紅軍學校分配到供給部後，當時的總政治部組織部指定我為總供給部機關黨支部書記，長征開始之前，又任命我為軍事工業局的黨總支書記。軍事工業局是中革軍委獨立的部門，但由總供給部指導工作。此外我還是一九三四年在瑞金召開的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人民檢察院工農檢察委員。總之，我從紅軍學校出來後，組織上就把我列為政治上特別可靠的人來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軍委總供給部工作，是我從事軍隊統帥機關後勤工作的開始。那時人民軍隊後勤工作正處在創建時期，我們那一批人是人民軍隊最早的後勤工作者了。這些人在長征途中大部分犧牲了，後來又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苦歲月，到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活下來的人已經很少。而其中曾在紅軍總供給部工作並先後擔任過領導的只有楊至誠、葉季壯和我。

長征前的準備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控制了黨中央領導工作，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王明沒有什麼實際鬥爭經驗又愛瞎指揮，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很快，他們就全面推行「進攻路線」，批判毛澤東「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清除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影響。毛主席實際上失去了對紅軍的指揮權，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開始在中央蘇區佔了統治地位。

一九三三年九月，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了，不久就有紅軍失利的消息傳來。一九三四年四月廣昌戰役中，紅軍和白軍打陣地戰硬拚遭到重大失敗，人們就不那麼樂觀了。我哥哥邱會佳就是在廣昌戰役中犧牲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開始，我參加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領導下的紅軍退出蘇區的準備工作。紅軍可能要進行戰略轉移的決策在當時極為秘密，直到紅軍長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為什麼。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葉季壯通知我，他帶我到總司令部（當時都習慣地稱中革軍委為總司令部），去接受一項特殊任務。我因為工作關係每月都要去那裏幾次，報抄統計數字，我每次去都要如同「大官」出門一樣帶兩個佩帶短槍的保衛人員。保衛員並非保護我，而是保護紅軍實力統計資料這樣絕對保密的文件。國家政治保衛局規定：如果發現機要人員有離隊或投敵行爲，有當場槍斃的權力。

那天葉季壯親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進總司令部的門口，葉季壯才說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親自向我們交待重要工作。」聽了葉季壯的話，我立即緊張起來。在王明路線的肅反後，紅軍機關裏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恐怖氣氛，越是機要的人，如果發生了問題越是要死，我懷疑自己是否出了什麼事要倒黴了。這次周恩來這樣的「大官」為什麼親自找我？我心裏一連串疑問。

我們到了周恩來住處，門口有背長槍的衛兵站崗，院子裏還有背短槍的內衛。進了屋子就是周恩來的辦公室，中間是兩張方桌拼成的會議桌，四周牆上掛的全是軍用地圖。周恩來聽到來人就從內間出來了。他

身材中等，絡腮鬍子又密又長，雙眼睛炯炯有神。葉部長把我介紹後，周恩來客氣地邊說邊擺手勢，叫我坐下，我卻不知所措。周滿臉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緊張的心情一下子鬆弛了下來，看來不會有「那種事」發生。

周恩來第一句話說：「啊，你就是邱會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參加了蘇維埃革命，我雖然祇有十九歲，已參加革命快五年了，打過不少仗，當過基層幹部，一年多以前又畢業於紅軍學校。周恩來對我非常滿意，他說：「在我們家鄉，不滿二十歲的人還叫小孩。你現在就參加處理紅軍戰略上的大事，這叫『小人辦大事呀』！」周恩來的話我似懂非懂，「小人辦大事」是說我年紀輕，至於說處理「戰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來問了我個人情況後向葉季壯點點頭說：「人就這麼定了，任務你和邱會作談過嗎？」葉答：「沒有。」這時周恩來向我介紹了他身邊的一個人，叫馬紀元，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一個副隊長。周恩來向我交代任務說：「我們可能同國民黨軍隊在蘇區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準備。」周恩來的話祇局限在準備打仗上，對準備撤出中央蘇區沒有明說。其實他也是說不明的，因為當時中央並沒有明確的打算，不僅沒有長征到陝北的計劃，連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蘇區也還沒有最後定下來。

周恩來對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把幾處兵工廠、藥品材料廠和幾個倉庫一律炸毀。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財埋掉。幾個倉庫裏的東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毀了。東西要處理得乾乾淨淨。你們要絕對保密，無論如何不能讓當地人和廠裏的工人察覺我們的意圖。要是知道了，傳出去了，就會對根據地軍民的士氣引起動搖，於當前的鬥爭十分不利。你們對兵工廠的處理可能會比較困難，最好採取夜間行動。這是一項蘇維埃國家最高機密的工作，如有洩密，軍法不容。馬紀元同志參加這次任務，帶保衛局一個警衛班去協助邱會作。邱主要負責，馬保證邱執行任務和安全。

周恩來說完就帶著我們到了地圖跟前，問我：「會看地圖嗎？」我答：「在紅軍學校裏學過。」周指著地圖上畫的一個圓圈裏箭頭的標記問：「這是什麼？」

「它代表指北針。」「要是沒有指北針標記的地圖，你怎樣區別方向？」
 「上北下南、左西右東。」周聽了我的回答後放心地說：「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立即提出來。今後還有什麼問題，葉部長還可以和邱會作談。」從這次談話中，我知道了周恩來的工作風格，他雖然是紅軍最高領導，但佈置工作卻喜歡事無鉅細，凡事都要一一關照到。

從那天開始，我就放下了總供給部的工作，專心執行周恩來交辦的任務。馬紀元帶了一個警衛班，班長是李青山。他們穿中央保衛局保衛團的制服，佩帶特別樣式的藍色領章，每人都帶著短槍和一把大刀。我從總供給部帶了一個傳令兵、一個飼養員，一共十六人組成了一支分隊。

我們按照計劃沿著兵站線每天行軍大約六十里，都是早出發、晚宿營。我同馬紀元都不願騎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當時年紀輕，一點也不覺得苦。祇要肚子吃飽就行了。我和馬紀元熟悉了，曾開玩笑問：「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還有監視我的任務吧？」他祇是一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按平日的規矩，這次最高軍事機密行動中，馬紀元監視我，隨行的人裏肯定還有監視他、有權處置他的人。在我們執行任務回來後，我曾在周副主席的辦公室還看到過馬紀元一面，但不敢相互打聽什麼，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不知馬紀元是犧牲了還是被「保密」了（處死了）。我軍有史以來，幹部們對保衛機關都很害怕，特別是抓「AB團」和紅軍肅反後更是這樣。

我們執行這次任務是分幾站完成的。

第一站，勝利縣水頭寨。我們來這裏處理倉庫物資，這個倉庫存有數千支雜色步槍及軍械用品，這在當時都是寶，但祇能忍痛割愛了。我決定先接管倉庫，把現有的人員全部調走後再處理物品。為了保密，我們全部自己動手。我們要工作人員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們交接完就全走了。怎麼處理物品？我權衡利弊後，決定把東西沉沒在深水中。倉庫裏有一個水運碼頭，裝船就在白天公開進行，說是運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沒在河裏深水中。

第二站，橋頭鎮。橋頭是勝利縣政府所在地，有個大型的彈藥庫，庫主任是個負傷殘廢的紅軍營長。這裏庫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廢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彈、飛機炸彈等。倉庫在橋頭鎮東南的群山裏，那裏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幾座很大的洞是倉庫區。這個倉庫已經

封閉了，工作人員撤走了。祇有殘疾的倉庫主任住在橋頭，行動不便管不了事，那裏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天我們恰好搜查出三個從家逃出來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們捆綁住，押回來交給縣保衛局。我們把物資集中起來放火燒了。我原以為對橋頭倉庫的處理很難，沒想到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第三站，江面鎮。江面鎮在勝利縣和興國縣交界處，屬勝利縣管轄。這裏是紅軍兵工廠所在地，工廠有三個分廠：子彈廠（翻造）、翻砂廠（造手榴彈）和修械廠，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廠所在的二十多里長的山溝早已劃為軍事禁區，沒有居民，有一個警衛連專門保衛工廠。這裏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以工廠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建廠來掩飾我們毀掉工廠的目的。

首先，進行深入的動員。我召開工人大會講話說，為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需要加強軍工生產。要把現在的工廠分為三個，分別遷到不同地方擴大生產，在不同的作戰方向滿足戰爭的需要。我的講話很有「說服力」，他們完全相信了。

我們按照原定計劃把工廠的設備分為三個部分，名義上是分成所謂要擴建的三個工廠。其實一部分設備要帶走，一部分要毀掉。

人員也是一樣，名義上按三個「新工廠」的形式調配人員，實際上按照將來要帶走的和遣散的分開，開到不同的地點去。兵工廠的行政組織積極配合，人員調動很快就完成了。我再用公函調來一千五百運輸員的隊伍，把要帶走的物品搬運離開工廠，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約十天後，工廠那裏除了我們和警衛連外，什麼人也沒有了。

怎麼銷毀物品很難辦。機器等鐵製品不怕火燒，不少機器一時無法拆開。後來還是工廠警衛連的連長提出一個辦法：把工廠留下的炸藥和瞎火的手榴彈集中，和機器堆在一起，爆炸毀掉。

紅軍兵工廠是幾年辛苦逐漸建設起來的，機器和器材都是戰爭中繳獲來的。工廠的主要負責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黨介紹到中央蘇區來的，有的是從白軍解放過來的。工廠經過數年的經營才形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能生產出木柄手榴彈、地雷，用舊彈殼翻造子彈和修理各種槍支。紅軍粉碎敵人五次「圍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繳獲不到敵人什麼東西，一切都要自己供應。紅軍兵工廠做出過很大的貢獻，現在馬上就

要毀掉了，當然非常心痛。但是爲了執行上級命令，除了毀掉，別無他計，我下炸毀令時心裏很不好受。

我們完成這裏的任務之後就回到瑞金。我向葉季壯部長匯報了工作，他表示滿意，並要我隨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匯報。第二天，我們到了總司令部，周恩來已等在那裏。我預先準備好了一個小提綱，按稿子讀了大約半小時，周恩來坐在我對面用心地聽著。我讀完之後，葉季壯補充了幾句，葉在給我補臺。出乎意料的是，周恩來對我滿口讚揚：「你說得很好，很簡明，要點也突出。我知道了你們出色的工作。這麼一項複雜的事，被你這麼順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還這樣年輕，思維能力很強，大有前途！」

說著說著，周恩來興致一下來了，說了一大段培養農民子弟當幹部的問題。他說，對學生出身的人著重要去做實際工作，到實際工作中去鍛煉。而對農民出身的則要千方百計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如果學生出身的會做實際工作，農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們黨就會有一支很好的幹部隊伍。當前我們農民出身的幹部多，提高他們文化水平是事關革命前途的一個戰略任務。

周恩來勉勵我說：「你很年輕，今後你要下功夫學，讓你的文化與你的思維能力能夠成正比例發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給你下了一個學習文化的任務，下次再見面我就要考你了。」我聽了周恩來話，不知道哪兒來的勇氣，站起來把我自己釘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記事本）送到周恩來面前，請他給我寫上幾句話。周恩來隨手拿起墨筆在我的本子上寫上了：「誠實、勤奮周恩來一九三四年八月。」這個本子我一直珍惜地帶在身邊。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後，我的家被抄，這個本子不知所終。

從周恩來那兒回來後，我對學習抓得更緊了，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紅軍供給學校去請教宋奇峰校長。我在紅軍學校學習時，宋是我們的教導主任，畢業後我常去請教他。宋奇峰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學問很高，曾是國民革命軍二十六路軍的軍需處長，寧都暴動中參加了紅軍，一九三四年紅軍退出中央蘇區之前，再一次進行了肅反，他被國家政治保衛局處決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懷念他！

周恩來、葉季壯救了我的命

完成這次特殊任務之後，心裏非常高興。但工作一忙，對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沒想到一場大禍要降臨到我的頭上。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時候，第五次「圍剿」的形勢非常緊張了，紅軍內部的肅反更加嚴厲。

十月初，紅軍的長征就要開始了。這時我發現了一個反常的現象，國家保衛局派到總供給部的特派員表情很蹊蹺，一直死死地盯著我，甚至我上廁所他也一步不離。我掌握全部紅軍的實力，現在又知道紅軍準備退出中央蘇區的絕對機密，他們怕我「開小差」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國家政治保衛局已經開過會，決定把我徹底「保密」了（秘密殺害），祇要保衛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隊來了就動手。當時中央蘇區裏正是王明路線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別說是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是各部隊的保衛局也可以殺人。隨便殺人是王明路線的罪惡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線的冤鬼！

有天黃昏，突然衝進來幾個人把我綁了起來，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張炎和把鄧發簽署的要處決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後把我綁成處決死刑的樣式。我知道要被處決了，連喊冤枉，但沒有用。張炎和把我拉出去行刑的時候，要先向葉季壯打個招呼，可是葉季壯不在，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但真是湊巧，在押我執行的路上，正好周恩來、鄧發、葉季壯三個人騎馬迎頭而來，葉季壯見此症候大吃一驚，立即問周副主席，周恩來也有些驚愕，但沒有說話，祇是面向鄧發，鄧發向周恩來擠擠眼睛（意思是按老規矩辦），我則死死地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略加思考對鄧發說：「他還是個孩子！交給葉季壯帶回去吧。」這樣又給我鬆了綁。我跟著葉季壯的馬後，一溜煙跑回供給部。

回到供給部，葉季壯又給周恩來打電話，他心裏有點火，埋怨殺他的人連個招呼都不打。過了一會，周恩來又來了電話，要葉季壯和我立即到他那裏去把我的問題談一談。到了



軍委供給部長兼政委葉季壯。方块字读书社区 <http://book.sinozi.cn>

周副主席那裏，看見張炎和也在，我沒有進去。祇過了一小會兒，葉季壯和張炎和就出來了，周恩來送他們到門口。他看見我反倒沒有說話，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睜大眼睛直盯盯地望著周副主席，也不敢說一句話。周恩來決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還要對我加以特別保護，並帶著一起走（長征），並交待對曾想處決我的事要絕對保密。

在延安的時候，周恩來提起這件事，跟我開玩笑說：「你當時直盯盯的眼睛望著我，給我的印象很深！」真是無獨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決定把我們關起來，在大會堂和總理告別時，總理握著我的手，我雙眼也是直盯盯地望著總理，我對總理說：「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總理有些激動說：「好嘛！」此時此刻，不知總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雙直盯盯望著他的眼睛。

葉季壯一個爭辯，周恩來一道命令把我的腦袋保留下來了！讓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來、葉季壯在世的時候，我多次向他們表達謝意，感謝他們的救命之恩。他們總是說：那是王明路線的罪過，不應該死的人被處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僥倖的了。

出發前夕

長征出發前的準備工作十分緊張，那時並無「長征」一說，名義是「上前線」。長征前，葉季壯部長沒有別的助手經辦此事，供給部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是他自己組織，特派員和我配合他進行工作，因此祇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上前線」的真實含意。

各項準備工作中最複雜的就是對人員的審查。凡「上前線」的人都要經過嚴格審查，報上級批准才能定下來。走的人確定之後，留下的人都到離瑞金不遠的七堡集合去了。當時王明路線非常左、非常殘忍，我至今還記得幾例被無辜殺害的人。

總供給部糧食處長羅鳳章是湘南暴動參加革命的。有人檢舉他貪污過三塊銀元，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把他抓走了。對此，作為總供給部部長的葉季壯居然事先不知道。羅鳳章的事情發生在離「上前線」較前的時間裏，形勢還沒有那麼緊張，葉季壯又幾次找周恩來，羅保住了腦袋，祇是被國家保衛局送到兵站去罰做苦工。對羅鳳章的打擊就是懲罰主義路線的具體案例，羅當了苦役，頭髮上被開了一條「馬路」（中間剃光一條頭髮作標記，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運重物。今天我們提到在革命隊伍裏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人人痛恨的，但在當年是很革命，很時髦，很風行的，是人人必須執行的。有一次羅鳳章挑運物品到總供給部來，我沒有像別人那樣歧視他，給他喝了水。羅比我大十幾歲，過去我對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說了幾句責怪他的話，沒想到他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現在比當處長好，晚上睡得穩當一些了。」他見我很不以為然，又說：「老弟，你年輕！對現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對羅鳳章的話，我想了幾十年才想明白。當我想明白的時候，我已經比羅鳳章倒霉百倍了。

在臨出發前，供給部送出去了一批剛修好的步槍到前方去，兵站檢查出來有生銹的，向上報告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立即派人來總供給部檢查追究。負責槍支管理的軍械處軍械科科長胡子昂十分緊張，知道自己縱有十張嘴也說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於是偷偷在自己內衣裏藏了一個手榴彈。當我陪國家保衛局的人到軍械科找胡子昂查問時，他從容不迫地說：「我是軍械科長，槍生銹由我個人負完全的責任，請不要連累其他人。」胡子昂說完，扭頭就向房子外面跑。祇見他跑出門外不遠，

榴彈就響了。他沒在房子裏拉響手榴彈，是爲了不傷害我和其他無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處決了的情況下，痛恨的祇是肅反制度，還不願意傷害別人，甚至包括不願傷害要執行他死刑的保衛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後，供給部把胡子昂當作「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批判。我一言不發，認爲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祇是工作中出了點差錯。但是，在王明路線之下，在長征前的那種特殊氣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沒有別的選擇，他死於共產黨的懲辦主義。

還有總供給部的管理科長李躍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是個二十幾歲的大學生，這在紅軍中是很少的。因爲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國家政治保衛局開始沒有批准他「上前線」。後來經過我們第二次報告，保衛局總算是同意了。李躍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長征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無意中發生了輕微的火災。保衛局認爲這是反革命發出的「燈火信號」，告訴敵人我們要行動了，於是把李躍抓走了。雖然對李的下場並未宣佈，但無須多考慮，就是用「保密」的方法處決了。

上面談的我死裏得救的經歷和另外三件事，說明了紅軍離開中央蘇區之前，恐怖的氣氛是相當厲害的。可以說，當時沒有一個人是不怕犯錯誤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總是積極苦幹，謹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說話。當時如果出了什麼問題，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

那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是革命隊伍中的「活閻王店」，想要誰死是輕而易舉的事，幾年來殺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羣衆。一九三〇年開始的殺「AB團」，是敵人挑起的反間計在內部殺共產黨；一九三四年的肅反是我們共產黨自己挑起的殺共產黨。一些所謂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寧都暴動起義過來的紅五軍團的一些幹部，殺了不在少數。長征前的肅反亂殺人是中國共產黨永遠要記住的教訓。

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紅軍的長征還沒開始，國民黨軍隊就佔領了蘇區的邊境地區。那裏的人民開始遭到苦難，紅軍家屬被殘酷迫害的消息不斷傳到瑞金。那時我和家裏已經失去了聯繫，與國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難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才知道的。

國民黨反動派剛佔領興國，就對這個中華蘇維埃模範縣的人民進行了屠殺。興國縣在一九二八年蘇維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二十三萬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紅軍退出中央蘇區後，銳減到不足十五萬，參加紅軍走的約八萬人，絕大多數戰死了。有人統計，僅長征中，犧牲的有名有姓的興國籍戰士有二萬三千多人，沒名沒姓的犧牲者應當是多數，但無法一一收集名單了。興國參加紅軍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時活著的並在革命隊伍中繼續工作的僅剩下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為新中國開國第一批將軍，其餘至少也是師以上的領導幹部了。

一九四九年興國縣經過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調查推算，全縣戶口平均減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蘇維埃革命前有四十戶人家，解放後祇有十九戶，減少了二分之一。從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興國縣人民對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貢獻！興國縣人民是這樣，我的家庭同樣也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我家付出的第一個代價是，我兄弟兩人當了紅軍，哥哥還獻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參加紅軍後，家中沒有了壯丁，養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擔就落在我父母親二人身上了。我母親很顧家，對紅軍卻很慷慨，把兒子交給了革命。後來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戰場上我們母子巧遇了。她對我說：「你要狠狠打白軍。不然地主回來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個普通農村婦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聯繫在一起，就會改變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廣昌戰役中陣亡，紅軍長征後，我母親才知道她大兒子死了，哭得死去活來。失掉親人的痛苦壓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後解放了，他們才知道我還活著。這樣人間悲歡離合的事在興國不止我一家！

我家為革命付出的第二個代價是，家裏房子被毀、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間房子，是幾代人辛苦建起來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時已經遭到過破壞。那次白軍被紅軍包圍時，佔據我家裏進行野戰防護，在牆上開了許多射擊孔，還搞塌了一間房。

白軍第五次「圍剿」時，戰略是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即進到哪裏，堡壘就築到哪裏，公路隨後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毀壞紅軍家屬的房子為主。國民黨部隊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為一片廢墟，我父親急得連吐幾口血就病倒了。因為我家是紅軍家屬，鄉親們不敢攬救。我家分得的十塊地，種些紅薯。

加上砍柴挑賣，以吃紅薯和野菜為生，我九歲的弟弟還要去要飯。最困難的時候，祖父和父親光著上身，穿補過「千層」的褲子，洗的時候，要用稻草編的草片子遮羞。為避風雨我的一家人在墳洞裏一住就是兩年。

我家為革命付出的第三個代價是，父親用勞役還地主的租子，摔成重傷。地主從一九三〇年共產黨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權恢復計算，地主要我父親補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沒有能力償還，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別人一樣緩交。地主惡狠狠他說：「別人欠租一百擔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糧也不能少！」地主逼著我父親上山到他的林場去砍伐樹木挑到公路上，以勞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擔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連人帶著擔子掉到深山溝裏差點摔死，跌成重傷殘疾了。紅軍長征走了，地主回來氣勢洶洶地把奶奶的墳地扒開暴出骸骨，說是「他家墳地的風水破壞了」。地主扒墳時，我爺爺奮力阻擋，被打得口吐鮮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興國縣許多家庭一樣，為共產黨的革命吃盡了苦頭。興國縣在人民革命鬥爭中犧牲了數以萬計的優秀兒女的生命，無數的家庭遭受到摧殘。他們犧牲流血，為新中國的建立鑄成了一塊塊奠基石。

第四章 兩萬五千里長征

出發「上前線」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革軍委機關開始由瑞金長征。

出發之前進行了動員，說是「上前線」。當時「上前線」很有動員力，除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願意上前線殺敵立功的原因外，前後方的待遇不同也是一個因素。前方每人每天一斤十兩糧（十六兩制），後方祇有一斤二兩，而且沒有油，有時連鹹鹽也沒有，整天吃清水煮南瓜。

出發前，我被任命為軍委軍事工業局的黨總支書記，加上我原來的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兼機關黨支部書記的職務，身上的擔子不輕。中央機關長征組成了兩個縱隊，各轄若干梯隊。一縱隊為軍委機關的大部分，葉劍英任司令員，紅軍最高領導「三人團」的博古、李德等隨此縱隊行軍。二縱隊由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供給部等組成，是中央領導機關長征的主體。李維漢任司令員（沒到職），鄧發副司令員實為司令員，蔡樹藩任副政委，毛澤東等隨此縱隊行軍。以總供給部為主編成的二縱隊第二梯隊，還有通信教導隊、軍委軍事工業局和運輸大隊。出發前幾天，葉季壯帶著特派員和我去向周恩來匯報總供給部的準備工作。周表示滿意並指定葉季壯、我、特派員三人組成總供給部工作小組，由葉總負責，統籌處理總供給部長征事宜。匯報後，葉季壯帶著特派員提前到雩都去擔任中央縱隊的渡江（贛江）司令員，總供給部的行政工作實際由我負責。

這一下我的工作就更多了，那時也不知道什麼叫累，工作再多也不怕。長征出發的前一天下午我們就準備好了一切，我在開晚飯之後很久才到炊事班吃了一點東西。我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手拿著飯碗靠著牆就睡著了。炊事班長很心疼我，在門口「放哨」不讓人來打攪我。晚上有

事找不到我，就有人懷疑我開小差跑了。通信班長很快找到了我，他看我累成那個樣子，就對大家說明了，仍然沒有叫我，直到凌晨才叫醒了我。出發前的這一覺我睡得實在痛快。

總供給部機關本身並不大，軍事工業局合併過來，還有地方工作團和一些女同志也編過來一起走，變成二百多人，雖然人不算多，卻相當亂，管起來很麻煩。一是官多兵少難管，除了管理科的三個班（炊事、飼養、運輸）和通信警衛排之外，其他人都是官；二是大官多，每人都有牲口，飼養員、特務員（後改稱警衛員），少數還配有運輸員挑東西；三是機關的各個處、科都是獨立單位，現在湊合在一起，這些人毫無紀律，誰也指揮不了。

行軍開始集合時，這支隊伍根本聚不起來，有的祇到集合場去看一下不去站隊，行軍時站起來再走，工作一有不慎就會冒出一大堆意見。行軍走起來毫無秩序，距離拉得很長，有時把別的單位的隊伍都攬亂了。到了宿營地不服從分配，誰先到了，誰搶到了好房子誰就住。先到的人住得寬，後到的人沒有房子住，也不相讓。飯好了隨便就打，後來的人吃不上飯……。離開瑞金第一天行軍中會進行過防空演習，防空號一吹，人四處亂跑，除通信警衛排和管理科的人有組織地到達宿營地之外，幹部無論有牲口的還是沒牲口的，都逍遙自在地走，有的天亮才到，有的因為累了就在途中找地方睡覺，第二天中午才到。他們自己不聽指揮，還大發牢騷指責別人。

對此，中央縱隊嚴厲地進行了批評，說這樣很快就會掉隊掉光了，這哪是行軍？是自己消滅自己！我召開幾次支委會討論，也做過不少規定，但效果不大。因為大家看到，各單位除司令部機關好一點之外，其他的彼此都差不多，中央縱隊在長征初期差不多都是這樣。

我們對總供給部行軍管理動過不少腦筋，教育的方法不靈就實行嚴格紀律，組織戰鬥化。葉季壯召過一次開幹部會議並宣佈了四條規定：1、成立隊部統一組織指揮，我任隊長，下設宿營組、收容組；2、所有人員一律按班排編組，總供給部機關及軍事工業局編為第一排，地方工作團和女同志編為第二排，騎馬的幹部編為第三排。其他官都是「兵」，有事找排長；3、規定了行軍秩序，警衛排在前，隊部、一、二、三排其次，牲口全部集中在最後，幹部想騎馬祇能到後面，不能騎馬在隊列內行進；

4、制定了集合、宿營、開飯等制度和紀律，每個幹部都要管好自己的警衛員、馬夫，他們如果犯紀律，追究幹部的責任。

規定實行起來阻力很大，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硬性強迫執行。有一個高級幹部的特務員有恃無恐，屢犯錯誤，我下令把他的槍下了，到達宿營地關了禁閉，這下震動了全隊，多數人擁護，少數人不滿。有人向縱隊鄧發司令員寫了告狀信，責罵邱會作是個「小霸王」，沒想到這卻給我們幫了大忙。鄧發認為告狀信中的指責正是優點，應當表揚，必須有幾個「小霸王」才能管理好中央縱隊裏那些大大小小的「老爺」。鄧發把自己看法和告狀信呈報給周恩來，周對我大加讚揚並在路邊查看了總供給部的行軍。周恩來向鄧發說：「機關不戰鬥化，不提高組織紀律性，就不能完成緊張的長途行軍任務。」周恩來、鄧發認為我提出的「機關戰鬥化」的口號很好，要全縱隊向總供給部學習。

誰告了我的狀？事後我才知道是中華蘇維埃全國總工會軍事工業工會主席伍江洲。周恩來嚴厲批評他說：「你反對戰鬥化的生活很不對！邱會作很年輕，工作經驗不多，但他肯動腦子。你應當支持他工作。」周恩來親自出面批評，那些「老爺」都服帖了，主動服從指揮，行軍情況進步很大。

「全權代表」

中央機關的長征是從瑞金到雩都西進的，在河上架了幾座浮橋，夜裏就過去了。紅軍長征幾天之後，運輸部隊「走不動」，問題很多。葉季壯認為加強那裏的領導是當務之急，讓我把總供給部的工作暫時交給糧食處長劉明德，立即以軍事工業局總支書記的身份到運輸總隊去指揮。

中央機關從瑞金出發是「大搬家」。兩個中央縱隊各有自己的運輸隊，主要是二縱隊，由一千五百多運輸員編成了總供給部運輸總隊，兵工廠政委鄒林當總隊長。他們一出發就「走不動」，拖了中央縱隊的後腿。

我到運輸總隊時鄒林總隊長已經患重病不能工作了，我實際上成爲負責人。我很快就發現了運輸總隊的三個困難：一是沒有預備運輸員，每人都挑一副擔子，天天長途跋涉不行；二是不少大機器要多人抬着走，根本沒法子走長路，更別說山區小路了；三是運輸分隊的行政組織沒有建

立，運輸員吃飯、走路、睡覺沒有人管。運輸總隊名義上是紅軍的一個部隊，但如同民工一樣是「一盤散沙」。

為此，我們就日夜不停地抓緊工作：第一是整編隊伍，把運輸總隊分成了三個大隊（一個抬運大隊，兩個挑運大隊），大隊下面再組成連隊式的十二個分隊。分隊裏有炊事班、收容組、宿營組。第二是加強行政領導，管好全隊的調度、行軍、吃飯、睡覺四件大事，讓運輸員沒有後顧之憂，有體力完成任務。第三是清理運輸物品。全隊約有一千副挑子，約三百副是手榴彈半成品。抬運的機器中多是「洋機器」，用電才能開動，在兵工廠從來也沒有用過（因為沒有電）。

我提出把它們處理掉，但遇到嚴重的阻力。工廠技術人員什麼都想留，好像明天就要開工生產一樣；而行政幹部則要多扔，否則會把部隊拖垮。幾經周折我才上報了必須處理的物品清單。葉季壯立即轉報鄧發司令員和周恩來副主席審定。

批回來的清單使我大失所望，祇可以處理手榴彈半成品約一百擔，其餘物品則務必運到「新根據地」。儘管如此，這次處理後總算有了百分之十幾的預備運輸員，再加上軍事化的整頓，情況有了好轉。

在將要通過第一道封鎖線的前兩天下午，周恩來、鄧發親自察看中央機關兩個縱隊的運輸部隊。運輸員挑著抬著東西一天要走近百里路，大多潰不成軍，一幅慘狀。中央縱隊帶著這個「大包袱」無法快速前進。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到了路邊一個村子，看到幾百副挑子在村口放得整整齊齊的，就問：「哪個單位的？」聽到是軍事工業局的以後，又問：「你們有多少掉隊的？」

「一個掉隊的也沒有！我們吃了中飯馬上要出發。」運輸員們回答。

周恩來一聽大吃一驚，我聽到聲音從房子裏出來了，周恩來一見我就說：「隊伍好整齊呀！管得比其它運輸隊都好！你們應當好好總結！」我簡要報告了我到運輸隊後的做法。

中央縱隊在通過封鎖線之前，要等後衛的紅五軍團，就地休整了一天。周恩來召集了一次專門討論運輸部隊問題的會，要我在會上介紹整頓總供給部運輸隊的經驗。我說了我們在行政、生活、行軍上的「三管好」之後，又大膽地說：「運輸部隊的問題很嚴重，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就有人財兩空的可能。物資要丟，運輸員也要丟了……」中央縱隊副政委

蔡樹藩馬上打斷我的話，問：「有這樣嚴重嗎？」他的話裏包含著政治態度，顯然在指責我不要把問題看得過重，犯右傾錯誤。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還在高峰的時候，對蔡樹藩的問話我當然很害怕，立即住了口。

周恩來看出我的顧慮，用既是鼓勵我，又兼有批評蔡樹藩的話說：「我們是討論運輸部隊的問題，要把實際情況說出來。至於決心，由我們來下。邱會作你繼續說下去！可以大膽提出建議。」

我這才敢接著說：「在人和物都不能保證的情況下，應當要人不要東西，或多要人少要東西。爲了保住人，東西就要丟。否則不要說過封鎖線，正常行軍也難以堅持。當前要解決的是：第一，運輸員與擔子比例應當是三比二，三個人兩副擔子，如有可能，最好是五比三。第二，擔子不能超過四十斤重。戰鬥人員負重不過十多斤，運輸員的負重是戰鬥員三四倍，而每天行軍一步不少，體力吃不消。第三，抬著走的大件一律丟掉，因爲今後要走山路，有的地方抬著走根本過不去，現在不丟，走山路時還是要丟。」聽了我的發言，主管此事的中央財政部長林伯渠、總供給部長葉季壯等都不敢表態。他們好像已經知道紅軍要到湘西與賀龍部匯合，新根據地離這裏並非天涯海角，東西以不扔掉爲好。而我不知道這些，就「放了一炮」。

周恩來看到大家不表態，會議結束前總結地說了一句：「物品的處理是一個嚴肅的問題，處理不好，後果不堪設想，大家考慮一下再定。」周恩來是唯一對我的意見認爲是值得考慮的大人物。

第二天，葉季壯向我傳達了中央領導研究後的指示，「對物品現在不能做大的處理」。我雖然有想法，但祇能執行命令。我想，祇要急行軍兩天，大部分東西都會「自然」處理掉的。

我們要通過的贛粵湘交界處的幾道封鎖線，縱深約有二百多華里，從封鎖線前的幾十里外就開始急行軍，要經過兩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險峻山路和一條較大的河流，封鎖線兩側敵情相當嚴重，戰鬥部隊兩天急行軍即可通過封鎖線，而運輸部隊即使每天急行軍走八十里以上，連續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過得去，運輸部隊面臨著一道「鬼門關」。

果然，運輸部隊第一天過封鎖線就發生了嚴重的掉隊，但還勉強可以行軍。第二天就演不成軍了。抬運的東西幾乎一件沒留，機器、擔

丟棄在將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裝銀洋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邊，蘇維埃票子到處可見……一片狼藉。運輸員有的開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國家保衛局的人催促威脅、以槍口逼迫也沒有用。

通過封鎖線的第二天晚上，除了總供給部的運輸部隊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潰散邊緣。周恩來聞訊後從縱隊的後衛趕了上來查看，在一個村子裏遇到我，問情況怎樣？我說，我們的隊伍基本還在，掉隊了百十人之多。運輸員徒步跟上都困難，更不要說挑著東西了。我們運的東西已丟了上百擔，抬運的都落在後面了，可能會全丟掉。

這時，周恩來認為不把東西扔掉是不行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知道離宿營地還有二十五里，中央縱隊兩邊的護衛部隊均在十里左右，還有機會下決心。於是周恩來在現場架上電臺，一面對全軍的行動指揮，一面通知林伯渠、葉季壯、鄧發、張經武（中央縱隊參謀長）等相關人員到這裏開會。

在等候開會的時候，周恩來對我說：「前天你提出的意見看來是對的，因多數人不同意實現不了，現在要下決心了。否則真要人財兩空。敵情祇會越來越嚴重，現在祇有少要物品，才能保住應留的物品，保住人。」

開會的人到了，周恩來示意我也列席，他說，從瑞金出發時近八千人的運輸部隊，現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祇剩下總供給部這一千二百多人。我們過了這個封鎖線，前面又是封鎖線，這樣下去，家當要全丟了，我們不能人財兩空。

會議很快就討論決定了三條：1、擔運的東西要嚴格控制，祇能帶彈藥、醫藥、現金（主要是銀元和金條）、宣傳品，其餘一律處理掉。抬運的東西一件不帶（包括印蘇維埃幣的印刷機、石版等）；2、把幾個運輸部隊剩下的人全部集中編成一個運輸總隊，邱會作爲負責人，代表縱隊全權指揮；3、對物品的處理和運輸隊的整編，授權邱會作、曹菊如（財政部局長）、姚××（名字忘了）三人在此就地進行。

這時前面傳來了消息：敵人在反撲由紅一軍團打開的封鎖線，後面從贛州方向追來的敵人也不遠了，情況緊急，周恩來指示後衛的紅五軍團阻擊追敵至明天中午，給中央縱隊以突圍的時間。他同時下令我們三

個人（邱、曹、姚）處理物資，重組運輸部隊，明天上午十二時前要隨大部隊繼續前進。

我們在附近一個叫八丘田的村子裏對中央縱隊歸過來的零散運輸人員進行了整頓。按周恩來指示的原則反覆清理後，祇留下 1600 多名精幹人員。選 100 人組成炊事班、收容隊、救護隊和通訊勤務隊；擔子減少到五百副，每擔四十斤，三人一副擔子輪流挑。除子彈和銀元全帶走外，帶不走的東西全部毀掉。一時間，八丘田村爆炸聲不斷，火光沖天。我們提前三小時出發了。後面負責護衛的五軍團不斷來詢問情況，他們說，你們提早了三小時出發，我們不知道減少了多少傷亡呀！

通過了第一道封鎖線後，在前邊開路的紅一軍團遭到敵人在粵漢鐵路線上新的封鎖，雙方正在作戰，中央縱隊就地休息了兩天。此時，我召開了一次新組建的運輸部隊的會，把全隊組成了三個大隊，下屬若干分隊、班排，如作戰部隊一樣設立了隊長、指導員、班排長。原來運輸員們不堪勞苦，人心惶惶。現在每人負重合理了，三人一副擔子，輪流休息，大家不僅體力恢復，也樹立了信心，軍心穩定了。

在十一月底中央縱隊突破粵漢鐵路和強渡湘江的封鎖線中，運輸部隊再也沒嚴重掉過隊，擔運的東西保住了。我們到了湖南後，把追敵甩在後面，敵情有些緩和，但氣候一直不好，大雨滂沱，山路之難行真是無法形容，有時是在沒有路的「路」上走。半個月裏，紅軍總數又比剛過湘江時減員大約四分之一，而我們運輸總隊雖也減員卻祇有十分之一，還剩下了 1500 多人。十二月中旬，中央在貴州東部的黎平開會，決定放棄北出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北部去。中央兩個縱隊合併前進。這時，我們挑運的子彈發到了各部隊，銀元等財物分散了保存，運輸部隊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於是祇保留一個二百人的運輸分隊歸軍委四局三科指揮，其餘一千多人補充到紅五軍團。

在長征最初的一個多月裏，我親身經歷了中國工農紅軍這支運輸部隊悲壯的奮鬥和艱苦的生活，一定要為他們說上幾句。

首先，運輸部隊付出幾乎耗盡生命的消耗。人的體力有限，而運動員的消耗幾乎沒有限量。他們每天都有一個幾十斤重的擔子壓在肩上，很多時候是連續急行軍。一個戰鬥員負重祇有十幾斤，而運動員的負重是戰士的三至四倍，物品一點也不敢丟掉。這麼一比就知道運動員體力

消耗之大了。通過封鎖線時，除前衛部隊在作戰之外，多數部隊不過就是走路，還常常受不了，而運輸部隊挑著重擔，比部隊一步也不少走，艱苦可想而知。我們進到湘南之後一直在行軍，天天下雨，運輸員的衣服是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天濕漉漉的，擔子濕了越挑越重。由於道路泥濘，部隊走走停停，而運輸員幾十斤的擔子在肩上，欲走不能，欲歇也不能，壓著重物受「站刑」。

其次，運輸部隊吃不飽飯。他們沒離開蘇區時因為管理不善就常常吃不飽。進到白區後紅軍的行軍是密集縱隊，大量部隊在一個比較狹窄的空間裏通過，前面的把能搞到能吃的東西都吃了，後面的什麼也吃不上。打土豪沒有可打的，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後面的運輸部隊幾乎天天餓著肚子走路。在湘南的一個山區裏，一個三百多人的運輸大隊走錯了路，兩天沒有進一粒米，一個個餓得昏過去躺倒了。我們找到他們後，立即做飯，吃下飯他們才走得動。

第三，是沒有時間睡覺。運輸部隊因負重走得慢，常常很晚才到宿營地，如果路上遇到什麼故障，到了宿營地已是拂曉，第二天的出發時間到了，立即又要走。運輸員還可以找些「零星」時間打個盹，而幹部則忙得連一點睡覺的時間也沒有，運輸部隊的幹部搞垮了身體的人很多。

第四，是運輸員沒有鞋子穿。運輸員打赤足是普遍現象。公家沒有鞋可發，運輸部隊幾乎人人雙腳潰爛，有的爛到了腿上。

運輸總隊在黎平縮編後多數人要到部隊去，我們舉行了歡送會。周恩來高興地接受我的邀請來講了話。他說，我們運輸部隊所受的艱苦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可是大家都忍過來並且戰勝了困難。你們是紅軍中最能艱苦奮鬥的一部分，你們是鋼鐵煉成的人，希望大家到部隊去繼續作紅軍的骨幹力量。我們的紅軍是光榮的，運輸部隊在吃苦耐勞、艱苦奮鬥方面勝過大家。因此我特別提出，你們是光榮之中最光榮的人，運輸部隊是最光榮的部隊。大家聽到這裏，許多人流下了淚。

為紅軍團送餉

一九三四年冬紅軍進入貴州，周恩來要找一個人帶隊給紅軍團送餉，葉季壯建議我擔任，周恩來批准了。

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紅五軍團擔任殿後，他們的物質供給很困難。因為前面的部隊把糧吃完了，土豪地主打光了，走在後面的五軍團經常斷糧，不得不用現洋和硬通貨高價買糧。中革軍委籌集了大洋一萬五千餘元，大煙土六百多斤，還有部分蘇維埃鈔票，要盡快送到在中央縱隊後面二百多里跟進的五軍團去，經電文往返商量，定下了交接的時間地點。

我去總司令部接受任務，沒想到周恩來在那裏要向我當面交待。他在地圖上指出了五軍團現在的位置和交接款子的地點，然後說，送款不像帶運輸部隊那樣艱苦，但需要智慧，要隨機應變和獨立處理問題。這裏離交接地點有二百五十多里，如果不發生意外，五天就可以到達。要是情況變了，你就要自己決定如何行動。你帶一個運輸連、一個警衛連去，相信你可以完成任務。

任務交待清楚後周恩來又囑咐說，中央已經決定在貴州建立新的根據地。五軍團的前進方向是遵義以北的桐梓縣，和中央縱隊保持二百華里左右的距離，中間估計不會有大股的敵人。到了交接地點，如果沒人來接，就是情況有了變化，你們不能久等，向遵義方向追我們。如果聯絡不上，就「佔山爲王」，就地生存，等待革命的最後勝利。周恩來說完就在一張印製好的紅軍委任狀上寫了：「茲任命邱會作為中國工農紅軍黔東北邊擊隊司令員」，簽上名字後交給我帶上備用。

我帶的運輸連大約一百五十人、六十多副擔子，警衛連約一百二十人，戰鬥力很強。我和同行的兵站部一位姓丁的科員、運輸隊長羅子明、警衛連長陳生四人組建了一個臨時「小司令部」，第二天就動身了。當時紅軍進入貴州打了許多勝仗，黔軍退後了，地主武裝都上山躲避了，我們每天行程約六十里，三天沒遇到敵人。我們去掉了軍服的紅軍標記，國民黨區、鄉政府分不清楚我們是什麼部隊，以為是中央軍，有時還向我們供應糧食。

第四天早上我們路過一個鎮子，到了附近才發現敵情，向後退來不及了，祇好準備戰鬥。這時有個敵軍官走出鎮子來查問我們是哪部分的，從問話可以聽出來，敵人錯認爲我們是「黔軍」，我們吱吱唔唔地應付，敵軍官一聽不對頭，扭頭就跑。我從他的恐慌中判斷敵人力量

大，下令衝過去。我們通過鎮子時，鎮公所裏空空無人，敵人已從後門溜到山上了。

第五天中午，我們離指定地點新安鎮祇有十餘里時，從那個方向來了一小股敵人，敵人發現了我們，立即退回新安鎮。我們找到老鄉打聽，得知紅軍向北走了，來敵是新安鎮區公所的武裝，並瞭解到紅五軍團的部隊確實沒有到達新安鎮。這時離約定的時間祇過了半天，還不能斷定五軍團就不來了，我決定等一天。我們等了一天還是沒有動靜，我判斷一定是發生了嚴重的敵情，否則絕不會不來接頭，因為這些錢款關係到紅五軍團的生存。於是決定：連夜換到新的地方宿營以防不測；中央縱隊已向西北前進了，我們朝那個方向追。我當時年輕無經驗，又無法請示上級，祇是想無論如何要保住紅軍的財產。

出發之前我找村裏的小學校長談了談，他不清楚我們是什麼部隊。我和他東拉西扯，問到遵義有多遠？他說大約三百五十里，還拿出一張貴州省的地圖指給我看，圖上對道路，縣、區、鄉政府所在地都有標記。我要用錢買地圖，校長怕兵，表示奉送。天還沒亮我們就出發了。

此時已經過了約定時間三天，我判斷接收部隊不會再來了，決定向遵義方向前進。第五天發生了情況，原因是紅軍主力過去幾天了，被嚇壞了的地主武裝甦醒過來，向我們這支小隊伍挑釁了，我們通過一個小鎮的鎮公所，那裏有敵人武裝幾十人。我們從旁邊繞過了，離開鎮子二十里天就黑了，決定住下來天亮再走。我們考慮到鎮裏敵人看到了我們的擔子，做好了防範。果然，深夜裏敵人來發「洋財」了。我們打死了五、六個，活捉了一個小隊長。那個傢伙怕死，答應帶我們出縣境，這一招很有效，兩天之內很平安。但越往北走，情況越緊張，為了應付戰鬥，我們把十幾擔蘇維埃票子燒了，不但輕裝了，還增加了戰鬥員人數。一旦有敵情，運輸連可以自衛，警衛連可集中力量打仗。

第六天我們要通過一個叫水溪鎮的區公所，偵察到那有區中隊五十餘人，有一定的戰鬥力。我們吃掉敵人不難，但是為保住錢款，不能打仗。我們在離鎮子二十多里的小村子裏停下繼續摸了敵情，發現有兩個仗。情況很有用：一是敵人抽大煙，每天早晚兩次集體定時抽煙；二是敵人有一個班出官差到縣裏去了。我們決定以智取勝，警衛連一個班化裝成敵人從縣裏回來的那個班，還僱請了當地老鄉應付敵人的問話。天亮前

到了鎮前，敵人哨兵果然中計開了門。我們直衝敵人營房，他們剛起床正徒手集中吸煙，當發覺了我們不是「自己」人，大勢已去，祇好投降。我們繳獲的槍不想拿走，那會增加我們的負重，祇把槍栓卸下來帶走，叫他們派人跟著到二十里以外再拿回來，敵人服貼了。我們把區長找來了，半拉半推地搞出門帶路。走了一天，估計再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才給路費讓區長回去。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條河，不能徒步，渡口有河防部隊駐守。我們祇有兩條路：一是設法渡河，二是繞道百餘里西行，但西邊能否順利過渡不得而知。這令我舉棋不定，就先在一個大自然村裏暫作休息。

我們住的房子是一家有三套院子的地主家前院。後院有個中年人很有禮貌，我們丁科員是紅五軍團的，熟悉國民黨軍隊，他很快問明了那個人是貴州軍閥王家烈部隊一個師經理處的軍需官，最近因公外出後在自己家裏住幾天。丁科員同他談得很投機，讓他錯把我們當成來貴州的外省雜牌軍，來採買大煙土的。軍需官無意中說了不少有用的情報：從湖南來的朱毛紅軍已包圍了遵義，貴州軍隊西撤了。這和我們出發前周恩來交待的紅軍戰略方向一致。

軍需官急於回遵義方向歸隊，正好遇見我們這支二百多人的部隊，想讓我們陪他走一段路。這正中我們下懷。說好沿途「通關費」由我們出，再送他二斤大煙土為酬金。第二天一早我們上路了，憑借大煙土為禮，河防部隊很快放了行。

我們渡河走了一段路後，才告訴了軍需官我們是紅軍，他並不驚奇，說：「曾想過你們是紅軍，可能是和大部隊分開了。在這亂世，相安無事為好。其實我幫了你們，我才安全。」我表示絕對保證他的安全，歡迎同我們一起到遵義，然後去留聽便。軍需官安心了。

我們走到離遵義不到一百里時，紅五軍團兩個連到了。帶隊的是軍團供給部一個科長，是我在瑞金紅軍學校的同學。我們見面後很激動。他說，五軍團按照約定的時間去新安鎮接收軍餉，但遇到了敵人阻擊，耽誤了三天，與我們失之交臂，現在總算是遇到了。我們交接完款項和那個一路來的敵軍需官話別，建議留他在五軍團躲一個時期兵亂，將來由他自己決定去向。敵軍需官很高興，表示今後絕不與紅軍為敵。

我們完成任務後的第三天回到了中央縱隊。中革軍委對我們沒有能在指定地點向五軍團交接很清楚，但對我們以後的行蹤一點也不知道，從上到下都以為我們可能已經「光榮」了（即犧牲了）。

我回來的當天就去見周副主席，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他簡要問了我情況，對我們的行動和應變處理感到很滿意，說：「你離開大部隊十多天，帶隊在敵人中間穿插來去，除了燒了一些蘇維埃票子之外，祇耗費了幾斤煙土，沒有損失一人一槍。」

執行送款任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那時我不到二十歲，以前又沒有獨立指揮部隊作戰的經驗。向周恩來匯報後的第二天，葉季壯通知我到中革軍委報到。因為周恩來點著我名字說，邱會作這個人他要了。

在遵義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紅軍攻克了黔北重鎮遵義市，進城後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籌備以貴州為中心的新「中央蘇區」政府。林伯渠為籌備委員會主任，葉季壯等人為副主任。周恩來代表中央領導籌委會，決定把我調到那兒管物資分配處的工作。

物資處是籌委會裏最繁忙的部門之一。我們把各級「接收委員會」（也叫「沒收委員會」）沒收的物資都接收下來，然後進行分配。中央和紅軍的黨政軍機關所需要的物資都要經過我們的分配。大家對物資處是既「喜」又「恨」。喜的是，可以到我這裏領到東西，喜歡到我這裏來；恨的是，由於物資匱乏常常得不到滿足，物資處成了「挨罵處」。

遵義是貴州省的第二大城市。我們沒有在城市裏工作和生活的經驗，作為將來的「蘇維埃中央政府」，籌委會面臨了許多新問題。

第一是城裏秩序混亂。

紅軍攻克遵義後出現了不少問題：一是紀律散漫，上街亂逛的多。過去紅軍在農村，偶然進一次縣城都不易。進了遵義城，上街亂走滋事鬧事就多了。二是上飯館、打架鬥毆的多。那時大家沒有什麼錢，大的「嘴福」不能享受，幾個人湊上一點錢上個館子就很滿意。遵義城裏飯館數目和供應有限，吃飯要等，晚了就吃不上，後來的人擠不進去就吵鬧打架。三是強佔好房子的多，大家聽說要成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都想住打架。

的寬敞好一些，強佔房子成了風。遵義城不大，好房子多是工商界人士和社會的頭面人物，對搶佔他們的房子反抗強烈。

對於以上這些問題，大家很著急，但解決不了，祇好請周副主席出面。周副主席晚上處理全軍的軍事，白天主要處理籌委會的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兩三天就把紅軍進城後出現的混亂局面理出一個頭緒，解決了問題。比如分配房子一事，周恩來叫組織了設營組，統一看房，統一分配，很快解決了糾紛。房東和用戶基本都滿意。

為什麼周恩來能把事處理得很好呢？他對籌委會——未來的政府講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是爲大家辦事的，應當認真、商量和公平。認真，就是勇於負責，凡事不要推來推去；商量，就是不要主觀武斷，要善於同別人商量，取得對方的諒解和幫助；公平，就是堅持原則，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要怕得罪人。這段話我至今還記得。

周副主席講話時以我爲例做了表揚，他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是邱會作處理的。有支部隊從遵義路過，提出要在城裏休息一天，我同意了，批了條子要邱會作解決糧食問題。可是過路的部隊要三天的，邱會作照給了。但在遵義祇發一天的，其餘要他們行軍順路到城外六十里的糧站裏去領。部隊不願意，講道理也不聽，發火了，還在物資處打人。邱會作寧願自己挨打也不改變原來的計劃。他一點怨言都沒有，仍在認真地工作，令我十分高興。那個部隊的領導知道打了人的事後，立即到我那裏去認錯。

第二，是城市政策問題。

紅軍生活在農村，物資來源主要是打土豪、沒收地主的財產。打土豪一般不會搞錯，一則我們有經驗，在農村裏搞了多年，二則土豪地主的標誌明顯，在農村裏房子好的就是。在城市裏，我們打土豪政策沒變，但做起來就複雜多了。

進了遵義城，周恩來規定對三種人的財產可以沒收。一是奸商，二是軍閥官僚，三是地主。對上述三種財產，要寫詳細的報告（有專門報告表），經過周恩來批准後才能沒收。

我舉一個例子就可見當時政策的嚴格。遵義城裏有一家商行，好像叫「洪泰商店」，由兄弟三人出本錢共同經營。老大是地主，剝削雇工投資經商。老二和地主家庭沒有經濟關係，另外生活。老三學校畢業後

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門供職。對這個商家，祇沒收其財產的三分之一（即老大的那一份），其餘三分之二的財產一律不動，並告知其繼續營業。

對我們的政策，商家紛紛表示贊成，大多數的商店開門營業了，經銷的貨物也多。遵義的商會還發起了一個「勞軍運動」，捐銀元三萬多，各種鞋子數千雙。我們手上有了捐銀，商舖隨時可以把收到的「蘇維埃幣」兌換成銀元，這起到了穩定軍心，穩定社會的作用。紅軍戰士們的錢很少，多數是蘇維埃幣，如果一下子都成了廢紙，後果可想而知。

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在遵義存在的時間很短。那是我第一次參與如此責任重大的經濟工作，成了我以後參加許多經濟工作第一次重要實踐。

「娃娃科長」

紅軍長征在遵義第一次進行較長時間的休息。但不久敵情發生變化，我們主動有序地退出了遵義，不和敵人硬拚，而是與之周旋，擺脫追擊。我當時祇是感覺紅軍的作戰方法變了。果然，不久就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按他的戰略思想，紅軍退出了遵義。

這時，中革軍委下命令調我任軍委四局三科科長。軍委四局是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的一個行政部門，主管軍務、行政和軍委直屬隊的行政、供給、衛生等工作。我到三科任職後，因二科科長楊更生被敵機炸成重傷無法工作，周恩來決定把二科合併到三科。新的三科是軍委四局業務最重的一個科，雖然編在四局，因工作涉及軍委直屬隊的行政，實際上是由主持軍委機關工作的周恩來和參謀長劉伯承直接管。周恩來說：「就讓這個娃娃來幹！」劉參謀長知道我把總供給部的行軍管得很好，又把潰散的運輸部隊重新組織起來，他全力支持周恩來的主張。

我們三科有幾個科員：涂余恩，廣東人；賴梓昆，湖南人；危才安、劉任農、賴勤，江西人。他們年齡都比我大，但對我很尊重，我們親如兄弟一樣度過了千辛萬苦的長征。

離開遵義以後的中央縱隊人數大大減少了，本部祇有三百多人，帶一個警衛營（含警衛、擔架、運輸連）、三部電臺，還有一個連的老同志（幹部連），這裏人雖少，但大單位多、大官多、牲口多、挑剔的人多、可以指手劃腳指責我的人也多，管起來就難多了。

我上任第一天，周恩來、劉伯承曾找我談了一次話，說今後中央縱隊會長期運動作戰，三科先要把縱隊的行軍、宿營、吃飯三件事抓起來。過去各部門的行政工作各自為政，很分散，現在由三科統一領導，提高了工作效率，減少了利益相爭和扯皮。

過去中央縱隊各部門各顧各，總直屬隊不少單位有官無兵，派不出籌糧人員，各部門饑飽不均相差很大。於是決定由三科統一籌糧，這件事我一做就得了人心，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

紅軍由遵義向西北進軍，在毛主席指揮下四渡赤水，擺脫了追兵。我們行進在黔滇川交界處的一段時間內敵情一度緩和，沿途物質條件也比較好。軍委直屬隊的行政管理加強了，工作和生活條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平日挑剔的人不再說三道四。

這時周恩來又給我加重擔子了。一天，他把我和宋裕和（四局副局長）找去談話說：「我們下一步是北上，那裏敵情少一些，但自然條件很差，會遇到許多想不到的困難。現在二局局長楊立三不能工作了，宋裕和帶幾個人到二局去當副局長。四局留下的事情主要在三科，三科的工作做好了，四局的工作也就好了。我們馬上要過大渡河，希望你們克服困難把工作做得更好。」

紅軍由遵義向滇川邊界西進的時候，中央縱隊進行了改組。中央機關再次精簡整編，精簡後的中央縱隊由林伯渠任司令員，多出的人下到部隊去了，連一些在中央沒多少工作的高級幹部也到部隊任職，由部隊負責照顧，減少了中央縱隊的負擔，如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到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縱隊改組後，經過林伯渠同意，我們對行政管理也進行了相應的改變：分成了幾個隊，中央領導人分別安排在這幾個隊裏，毛主席在一隊，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分別安排在二隊、三隊裏。這幾個隊由軍委一局一科指揮，四局三科管理他們的行政和生活。毛主席那裏總共祇有十幾個人，有他的特務員（即警衛員）、運輸員、馬夫，還有一個擔架班。這樣編隊後，我安排事情再也不用找領導本人，而是找他們所在隊的隊長就行了。我特地把我的老鄉、三科科員賴勤安排在一隊當隊長，我的本家邱長勝當毛主席的運輸員。這樣，毛主席那裏有什麼事我管起來方便。

當時林伯渠已經是個近五十歲的「老頭」了，他比毛主席還大幾歲，已經有不少白頭髮，是中央縱隊裏年紀很大的一位，其他這樣年紀的人都在幹部連休養。我不知道中央為什麼叫這麼一個「老黃忠」當司令員主持中央縱隊的繁雜工作。林伯渠行軍走一天常常很累，一到宿營地就要先休息一下，中央縱隊的具體行政工作，他就放心地交給我這個「娃娃科長」了。

中央縱隊整編後，改變了過去政出多門的情況。這樣一來，我們行軍有序，伙食集中，宿營統一安排，再也沒有混亂了。

整編後的三科還保留一個十二人的運輸班，擔運中央的文件和必不可少的辦公用品。我專門配邱長勝為毛主席挑擔子，毛主席的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大印全在擔子裏。大家給邱長勝起了一個綽號叫「帥印」。還有一個警衛排直屬三科，三十幾人，全部是短槍，行軍時押運中央這十二副擔子，一旦有了敵情，三個人保護一副擔子，人在擔子在。所有挑擔的和警衛排的人，都經過了國家保衛局的政治審查，是最可靠的。這些擔子裏的東西最後都安全地到了陝北。歷經長征那麼艱苦和危險之後，中共建黨初期許多重要原始檔案和文件還能保存得那麼多、那麼完好，得益於此。

中央縱隊警衛營的警衛連是保衛中央機關安全的，武器相當精良，這些人是有牲口的騎兵。每到一地宿營，他們是幹體力活的來源。當然，他們主要是警戒。我把要帶的銀元、黃金等放在騎兵們的馬搭子裏，還放了些食品，這些東西他們不許動，我們要用的時候就去取來。

運輸連有幾十人。除了驃馬，還有擔子。運輸連帶的主要的是糧食、食鹽、臘肉、少許藥品。

擔架連也有幾十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中央領導和李德都配有擔架。他們白天行軍可以騎馬，夜裏行軍可以睡在擔架上，也可以坐在擔架上邊行軍邊談工作。擔架員體力消耗很大，每過一段時間就由作戰部隊挑一些人來輪換。遵义會議後不久，除了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傷未好）等人的擔架以外，其餘的都「自然」取消了。

幹部連由一些老同志和女同志組成。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等，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被當為黨的寶貴財富「隨身」帶著。女

同志主要是中央領導的夫人。離開江西時，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許可帶夫人，有這樣「資格」的約三十個。她們中有賀子珍、蔡暢、康克清、鄧穎超、王定國、廖似光（凱豐夫人）等，當時鄧穎超患病吐血，是坐擔架行軍的，這支由老人和婦女組成的隊伍是我們照料的重點。從遵義出發後，我們在雲貴高原急行軍，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走過了長征中最艱難的一段，幹部連沒有掉隊的。

中央縱隊改組之後精幹了，行軍時，前衛走出一段路後我們才出發，後衛在後面收容。走在中間的中央縱隊本部隊伍大大地縮短了，後面可以看到前頭，前頭也可看到後頭，首尾相顧，比過去好管理多了。

在長征中，軍委機關曾受到兩次敵人襲擊。一次在貴州北部的土城，一次是到了陝北，在離吳旗鎮不遠的鐵邊城。兩次都是意外遭遇到突然襲擊。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的一天下午的五時左右，劉湘的教導師無意中遇到了中央縱隊。當時我們正在住的小鎮子裏開飯，敵人來時恰好我們吹了開飯號。他們以為遇上了紅軍主力部隊，遲疑片刻才攻擊，無意中給了我們一點時間。

我剛剛端起碗吃飯，哨兵報告，發現不少的敵人，我就向敵情方向跑去，一看是大股敵人，情況不妙，即下令三科警衛排的三十多人把能夠拿得動的東西都堆在街上當路障，阻止敵人。同時立刻報告毛主席等領導向西南撤出，要他們步行不要坐擔架，以免被敵人打中，還令警衛營還沒出發的一部分搶佔東北街頭山坡上的制高點，組織火力阻擊敵人。

軍委機關行裝笨重，大家一聽北邊有敵情就向西南跑，一下擁擠在街上動不了。這時敵人已經進了北面的街。警衛營多是短槍，沒有工事，擋不住敵人，祇好準備肉搏。這時聞訊趕來的劉伯承參謀長站出來，他非常鎮定，大聲吼，叫大家不要亂動聽指揮，他下了兩條命令：一是機關有槍的人向北面的街口去佔據每一棟房子進行巷戰；二是用雜物阻塞北面的街道，不讓敵人迅速前進。敵人在拆除北街口的障礙時不斷遭遇到我們的射擊，行動慢了。在這危機時刻，附近的紅軍幹部團團員陳慶洛一個營趕到了。幹部團都是戰鬥骨幹，打起來很猛，敵人突然遇到了增援的強戰鬥力，退走了。這次戰鬥我們三科犧牲了董桂之、張壽

山，三科警衛排陣亡了五人，排長杜庚的左手負傷了。當夜我留下負責把犧牲的人埋好，天亮時追上了機關。

到了扎西，就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上面的事不大知道，也不懂。但知道毛主席是最高軍事指揮人之一，大家很高興！出了遵義後雖然轉來轉去但總是打勝仗或躲過敵人的追堵，整個紅軍精神狀態很好，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

相識毛澤東

在長征中，我和影響我一生命運的毛澤東主席認識、熟悉了。改組後的中革軍委組成了一個行政和伙食單位，由四局三科直接管理，我成了毛主席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和他朝夕相處。

我知道毛澤東的名字很早。一九二七年他領導秋收暴動到江西井岡山後不久，我的家鄉就有很多「朱毛紅軍」神話般的傳說。我參加紅軍後見過兩次毛主席，第一次是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反「圍剿」戰役發起戰鬥的那天；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初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當選為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的委員，毛澤東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在會上做了講演。

遵義會議後我調軍委機關工作，同毛主席朝夕相處。行軍中我們三科常常跟在毛主席的身後走，途中休息就同毛主席在一起。我和毛主席第一次面對面的談話至今記憶猶新。

那天中央縱隊從貴州遵義向懷仁前進，行軍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時大家紛紛脫下衣服捉虱子。我們三科的幾個人苦中求樂，捉虱子比大小。我獲勝了，他們不服地說：「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長身上的虱子自然比我們的大。」我反駁說：「照你們說的，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黃豆那麼大了。」此時忽然聽我們上頭的路邊一聲吼：「哪個說的？到我身上捉出一個那麼大的虱子來看看。」我們不知道毛主席在我們的上面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來，然後我跑上去到了毛主席那裏。

毛主席問我是不是興國高興圩墩丘鄉的？我說「是」。他又問，大路邊岩石下的那家茶攤裏的老頭是我什麼人？我說老頭是我爺爺。這時毛主席說：「啊，老人家就是你的爺爺！我在他的茶攤上喝過茶，那是三一年。

春天，我在你們興國走了幾個地方。我知道你的爺爺、父親、母親都是村幹部，你和哥哥都當紅軍去了。」

毛主席接著說起了興國縣的革命歷史：那裏大革命時期就有黨組織。一九二八年我們從井岡山下山，在連花、永新活動過一個時期，以後就進到了興國境內，立即會見了當時縣委的負責人邱會培，他是黨的早期黨員，那時他已經有了二千多人馬，迎接我們在興國站住了腳。興國人民對革命有過很大的貢獻，當紅軍的最多，土地革命是在興國開的頭，做了好事，但也犯了錯誤。對地主不分田，殺了不算還殺親屬，對根據地造成了破壞。

從那以後我和毛主席就熟悉了，他親切呼喚我「小興國佬」。我的幾個科員和毛主席都很熟悉，賴梓昆是湖南湘潭人，他們早就親近了；賴勤是日本留學生，從井岡山時起就是毛主席的文書，經常參加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領導人的談古論今，甚至談公事，一般也不避他。涂余恩是廣東人，古文功底很好，主管對外的文書工作。毛主席行軍休息時，常和我們一起聊天，那時紅軍的上下關係密切，高級領導人和普通人關係平等，有時大家也敢在毛主席面前吹吹牛。

長征中的毛主席祇是中央領導中的一員。那時中央領導人在生活上和高級幹部相比祇有兩個特殊：一是帶老婆，二是可以行軍時坐擔架。從江西瑞金出發時帶老婆的有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李富春、何凱豐、羅炳輝（紅九軍團軍團長）、周昆（紅八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等人。當時不擔任一定職務的人是不能帶老婆的，許多高級幹部離開瑞金時和老婆是生離死別，非常淒慘。從瑞金出發時祇有幾個人有「資格」配專門的擔架，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李德。這些人並不是一定抬著才能走，而是一種「待遇」。出發時毛澤東並不得志，受著王明路線的壓制，但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國家主席」沒坐擔架的待遇就說過不去了。

毛主席除了有一副擔架之外，還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樣有一頭牲口、兩個警衛員和一個運輸員。他的老婆賀子珍除了偶爾能騎毛主席的牲口之外，沒有任何特殊待遇。毛主席的飯由三科炊事班做，主食一樣和大家一樣，做什麼毛主席吃什麼。菜是打一份公菜之外，再加幾樣。行軍時中午是帶飯吃，給毛主席配有一隻三層的菜盒子裝飯菜，由警衛

員提著行軍。毛主席有些愛吃，但不挑剔、不講究。在甘肅南部行軍中過一個小鎮子，毛主席看到路邊有羊下水賣，想吃。我叫警衛員跑過去用兩個銅板買來一大碗，放了很多辣子，毛主席吃得滿頭大汗，很滿意。警衛員說，看到鍋裏還有羊糞疙瘩呢，毛主席說「眼不見爲淨嘛！」一笑了之。

毛主席不計較穿，衣著簡單。他不喝酒，愛喝茶，抽煙很厲害。毛主席和紅軍裏官兵一樣，自己沒有分文，零用錢由公家開支。在長征中，我們對毛主席的生活管得很精心，這裏有我對他內心的敬重和責任感，雖然我對中央所有領導人都一樣精心管理照顧生活，但我對毛主席更親。

毛主席不善講成篇的笑話，但歷史小故事講得很好。行軍中大休息，機關工作人員都願圍坐他身邊聽他講故事。但是到了宿營地，毛主席必須抓緊工作，有點時間也要讀書，誰也不敢打擾他。長征途中很難找到合適的書，後來毛主席對我說：「凡是可以搞到的書，什麼我都愛看！」於是每到一地，為他找書刊報紙成了三科的一項重要工作。

有一次毛主席問到我的學習，知道我讀過兩年私塾，他認為這樣很不夠，此後和我談學文化的事就多了，他的一些教導至今猶在我耳旁。

毛主席對我說，一個青年人如果不關心自己的文化學習就等於不關心自己的進步和前途。文化這個東西是時時處處可以學，比如觀察氣象、走路、講故事，都有文化問題。一種人學文化先上學校，打下基礎；一種人沒有上過學校，靠自己一點一滴地學。前者是學生知識分子，後者就是工農分子了。學文化沒有妙訣，要有的話那就是長期下苦功。毛主席不但鼓勵我學習，還教我方法。他說要常讀、勤寫，要學會查字典，有個字典在身邊，就是請了個不花錢的先生。

在毛主席的鼓勵下，我很想學起來，但軍情緊迫，沒有時間。後來中央縱隊過草地之後，曾在巴西停留了一段時候，我們恢復了正規的作息生活。除中央領導人之外，機關所有人員都參加操課，還恢復了文化課和晚飯後做遊戲，這時學習的機會就來了。拿什麼做課本呢？我在遵義時帶出來了一套《水滸傳》，它成了很好的「課本」。認《水滸傳》裏的字，順便也讀了故事。毛主席、林伯渠知道了我們在學文化，主動當了幾次教員。林伯渠講的是《水滸傳》裏的事發生時中國的歷史背景，講得

非常認真。而毛主席就發揮了，他結合《水滸傳》的情節，講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講不怕失敗，積蓄力量迎接勝利。毛主席深入淺出，融通今古，講得非常動聽，大家越聽越想聽，往往不放他走。毛主席不忙就再講，若是忙就說「且聽下回分解」。

毛主席教我學文化，對我一生影響很大，他的很多話一直記在我心裏。在毛主席指導下，我開始逐漸養成了愛學習的習慣。我擔任了領導工作後，經常親自動手寫文稿或報告。在以後的幾十年裏，我學習上從沒有偷過懶，文化提高了一大步。我敢自誇地說，我一生一直在堅持學習，無論工作和學習都很勤奮，從不虛度光陰！

第五章 艰苦的歲月

過大渡河

從貴州、雲南到四川西北部，是紅軍長征中最危險、最艱苦的一段。我們一直在敵人的追擊中。紅軍強渡金沙江後向北走，紅一軍團強奪了大渡河安順場渡口，在蔣介石軍隊的包圍中打開了口子，一部分部隊得以東渡。但是那裏河水急渡船少，中央縱隊和大部隊不得不繼續沿大渡河西岸北進，想奪取瀘定橋過河。敵人發現了紅軍的意圖，調大量部隊增援瀘定。我們必須搶在敵人前面到達那裏。

由安順場到瀘定大約三百四十里行程，大渡河由北向南在橫斷山脈的深谷中奔流，兩岸地形十分險惡。河邊的山路一側是高山懸崖，一側是急流深谷，崎嶇的山路沿著河岸時有時無，有不少地方牲口都難以通過。紅軍先頭部隊的任務是急速前進，攻奪瀘定鎮的鐵索橋，對其他無法顧及。中央縱隊必須自己籌糧，修整道路，讓牲口、挑子、電臺等能跟上前進。於是，由軍委警衛營兩個連和部分運輸部隊，以及少數幹部組成中央縱隊的先遣隊，沿路保護橋樑，搶修道路和籌集糧食。周恩來指定我帶隊，出發之前，他嚴肅地向我說：「你們如果完不成任務，我們就不能及時趕到瀘定，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我帶先遣隊出發，一天一夜是急行軍。這段道路情況尚好，從第三天開始就差了。我們開始了緊張的工作：籌糧、修路、在預定的宿營點搭棚子（當時正是雨季，機關和電臺很難露天工作）。

搞糧出乎預料地順利。大渡河東岸比較富，豪紳們預料紅軍會走東岸，都把糧食裝在船上運到西岸藏起來，當他們發現紅軍走了西岸，又急忙把糧食向東岸運。我們趕過去繳獲了沒來得及運走的三船大米和許多用品。

修路異常艱難，祇能一切從簡，祇要牲口、擔子、電臺能通過就行。

那幾天大雨滂沱，大家衣服整天都是濕透的，到宿營地也無法露天點燃篝火取暖，祇好淋著雨過夜。休息的人披著雨衣還可以迷糊一會兒，工作的人就苦不堪言了。我們搭的棚子很簡陋，是「外面下大雨，裏面下小雨」。但中央領導一到就能進到棚子裏看地圖，電臺能架起來呼叫，有炭火烤衣服，吃上我們用繳獲的大米做的熱飯，高興得不得了。

大部隊跟上來之後，我已經跑前跑後忙得三天沒有躺下睡過覺了。那天下午行軍，部隊在泥濘的小道上堵塞，我們停在一個有四十多度的坡路上。因為是人擠人地站著，每人祇有立錐之地，想坐，沒有容下屁股的地方。我站著站著就站不住了，就趴在我身前邱長勝的肩膀上睡著了。邱長勝一動不動地撐著，時間久了，他支持不住，警衛排長杜庚在前面再做他的支撐，前面的人再為杜庚做支撐，我前面的幾個人死咬著牙硬撐著，我站著睡了將近一個小時。戰友們用自己寶貴的體力為我換來了睡眠。

中央縱隊提前趕到瀘定橋，此時瀘定橋戰鬥已經結束。提前過河到東岸的一軍團一師（李聚奎為師長）三團（黃永勝為團長）首先向橋頭堡守敵發起進攻，拔掉了敵人的碉堡。更為關鍵的是，敵人已經在鐵索橋上埋好炸橋的炸藥包，三團勇士迅速拔掉導火索，保住了鐵索橋。西岸的一軍團二師四團也開火過橋，守敵全部殲滅。過瀘定橋那天我特別激動，它哪裏是橋呀，是懸在相距近幾十米遠兩岸上的十三根鐵鏈子，九根做橋面，四根作兩邊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當橋面，人走在上面時橋就晃來晃去。瀘定橋是我一生中過得最不安全的橋，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橋，因為過了它，我們就轉危為安了。蔣介石想把紅軍當「石達開第二」全殲在這裏的「美夢」破滅了。

我們過了瀘定橋繼續向北走。那時我接到命令，派一個排護送陳賈離隊，後來才知道他是要到蘇聯共產國際去匯報工作。

翻越大雪山

紅軍過了瀘定，經過天全、蘆山，來到了寶興。從這裏向東是成都平原的邊緣，那裏有大量國民黨軍隊防守。弱小的紅軍祇有向西繞道川西、青海、甘肅交界的荒涼地區才能北上。我們要過的第一道險關是

興縣西北的夾金山，又叫大雪山。它海拔4000多米，山上終年積雪不化，氣候變化莫測。當地人叫它神山，說是「祇有神仙才能翻過」。但我們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別無他路可走。中央縱隊過大雪山的準備主要是籌糧、搞防寒的衣物和防病。

紅軍長征離開蘇區後，糧食全靠沿途籌措。但沿途的地主把糧食藏起來，老百姓也跑光了，況且所經之地又是中國最貧瘠的地區，本來就沒有多餘的糧食養活一支外來的紅軍。當時我們的行軍序列是紅一軍團在前面開路，紅三軍團殿後，中央縱隊居中。中央縱隊跟著一軍團之後走，好處是他們常常會替我們搞些糧食；壞處是前頭部隊擗糧之後，我們沿途再也找不到糧食了。中央縱隊在寶興住了一星期，幾乎一點糧也沒有搞到，連續幾天吃「清湯」稀飯。過雪山前，我們決定到近百里遠的一個富裕地區去搞糧食，到那裏要翻過三座山，過一條水深過膝的河流。為了把糧食搞到手，事前不能驚動那裏的敵人，於是決定突襲。

爲了迷惑敵人，白天我帶警衛營籌糧部隊大搖大擺地朝相反方向走，故意讓當地人看見。等到天一黑，我們掉頭急行軍走了一夜，拂曉時突然包圍了目標，擊斃守敵三十多人，繳獲牲口幾十頭和不少糧食。我叫少數人趕著牲口先走，趕緊回家救急，讓大家吃上飯（中央縱隊已斷糧了），我率部隊殿後，防止敵人反撲。當時搞到了糧食就等於是打了大勝仗！我們回來時，劉伯承參謀長走出駐地幾里來迎接，還集中司號員吹了歡迎號。

長征出發後紅軍就沒有發過衣物，一個個早已衣衫襤襯了。我們到天全縣後就採買衣物，又在籌糧中繳獲了一些粗布、羊毛氈（大家稱作綿子布）、棉花。這樣每人至少可以做一件背心。這對抵禦大雪山上的嚴寒差得很遠，但已經很不容易了。

由於氣候不適應，那時病員很多。我們有幾個醫生，但藥品不足，祇有請教當地「土醫生」找些中藥治病。我和衛生所所長王斌組織人了，在山上打了兩天的中草藥。劉伯承參謀長親自向大家動員說：「我們休整在山上打了兩天的中草藥。劉伯承參謀長親自向大家動員說：「我們休整不會太長，要抓緊治病防病。沒有西藥，土藥材也有用，大家一定要聯用，否則就是在消滅革命有生力量。」劉伯承把吃藥防病提高到「政治問題」的高度，強制執行，給我們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

過雪山前周恩來召開過兩次幹部會議，號召幹部發揮帶頭作用克服困難，順利翻過大雪山。周恩來用總直屬隊兩個科長的例子來說明工作中的問題。一個是管隊列的科長，據國家政治保衛局秘密報告，他企圖用掉隊的辦法離隊，保衛局要逮捕他法辦，周恩來不同意，祇是將其撤職並留黨察看。另外周恩來就是表揚我，說了很多鼓勵的話。最使我難為情的是，周恩來為了讓大家認識我，讓我上臺給大家看看。我不好意思，劉伯承就來湊熱鬧，他一把把我拉到臺上推到周恩來身邊說：「就是這個『小傢伙』！」看到我面紅耳赤的樣子，劉伯承哈哈大笑了起來。

根據先頭部隊的報告和當地群眾傳說，越往雪山上走，空氣越不夠弔，如果你一口氣喘不過來，救得不及時就死了。針對這種說法，我們提出了過大雪山的辦法：上山要慢，逐漸適應空氣稀薄和缺氧；到了最高處不能停下來休息，要快下山，連滑帶走，下面空氣裏氧氣多就安全了。我們還進行了嚴密的組織，兩個體力好的和一個體力差的編為一個行軍小組，這一招很起作用，讓一些體力差的人增加了信心。另外，我從運輸隊調來了三十多個健壯的戰士組成了收容隊，這是最苦的工作，我自己任收容隊長。

那天周恩來最先上山，他冒著危險留在山頂上看過山的隊伍。由於措施得當，中央縱隊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了雪山，基本沒有掉隊的，祇收容搶救了十幾個人。周恩來看到我在最後帶著收容隊上到山項，才和我一起下山。周恩來在最危險的山頂呆了很久，卻不許我多呆一會兒。

我們下到半山腰，胸裏頭好像塞了棉花似的感覺沒有了，周副主席邊走邊對我說：這次過雪山，你們的準備和組織得好，應當總結經驗。你每做一件事都要學會總結一次，這樣才能提高工作水平。人的工作能力有強弱，進步有快慢，為什麼？就看你善不善於總結經驗。你們文化低的工農幹部更應當學會總結經驗。

邱長勝對毛主席過雪山準備得充分周到。使人想不到的是，邱長勝給毛主席準備了約有一斤重的熱茶，到了山的那一邊毛主席就喝上了熱茶。過夾金山的那天早上，邱長勝把預備好的火籠裝好了，把水壺放進去。我們早上就開始上山，上山走了大約一半，毛主席就要求停一下，他下了擔架無論如何也不再上擔架了，這時毛主席的感覺和呼吸都還好。到下午三時左右就開始下山了，但下山下到了積雪深不遠的地

方。毛主席突然頭昏，自己就一屁股坐到地下了。此時，邱長勝立即從他竹籬裏取出小水壺，把茶水給毛主席喝了，毛主席就慢慢恢復正常狀態了，他並示意要抽煙。毛主席喝了熱茶，抽了煙，精神就來了。晚上到了宿營地，毛主席又想起來喝熱茶的事，警衛員笑著原原本本地把熱茶的來由告訴毛主席，毛主席心情凝重一時不說話來。待抽了一支煙之後，毛主席祇說了一句話：「你們都是蘇區偉大人民的兒子！」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

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由江西出發，最初想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裏發展。但受敵人阻擋進入了貴州，想在那裏建立根據地，由於敵情嚴重，退出遵義向北前進，要到四川同紅四方面軍匯合，這個目標又沒有實現。紅四方面軍主力在川北，沒有南下接應紅一方面軍北渡長江。而四川軍閥劉湘爲了保全自己的地盤，提前南渡長江迎擊我軍，同時蔣介石「中央軍」追擊的也逼近了。在這種態勢下，中央決定不與川軍硬拚，回師貴州北部。

紅一方面軍爲擺脫敵人，四渡赤水，二佔遵義，然後再向黔滇川交界處敵人薄弱地區前進，後來向北渡過金沙江、大渡河、翻過大雪山。在一個叫達維的地方，碰巧遇到了四方面軍李先念的三十軍，當時高興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和四方面軍會師的希望在即，又走了大約一個星期，終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在四川西北部懋功的兩河口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了。

紅軍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合時，全軍上下無不歡欣鼓舞，高興得難以形容。我記得軍委直屬隊和紅四方面軍直屬隊會合時，人群中最多的表情就是傻笑，興奮得手舞足蹈。那天，我們比紅四方面軍直屬隊到得晚，但我們的住處已被他們安排好了。我們一到，他們就把做好了的飯菜大盆大盆地送過來，大家一起會餐，到深夜大家也不肯散去。當時，紅一方面軍不足三萬人，紅四方面軍卻有八萬多人。

紅軍兩大主力匯合後，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做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確定紅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前進，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創建川陝甘根據地。但會議之後紅軍並沒有行動，原來張國焘等人與黨中央在發展方向上有矛盾，張

國燾不願意北上。這樣雙方的關係很微妙，四方面軍對一方面軍的熱情沒有持續多久就冷了下來，但誰也不明著說破。

首先，他們很少有人上我們的門了，我們去也不如以前那樣熱情，有時還發生摩擦。例如，我們警衛營上山搞到的糧食，還沒拿回來就被他們奪去了，我們忍讓才沒有發生衝突。他們也常說一些諷刺話，如「中央紅軍穿得破破爛爛，個個像要飯的。」「中央紅軍兵不多，老婆倒不少（指幹部連的女同志）。」……對這些話，一天我向劉伯承參謀長匯報工作時談到了一些，他笑著說：「你懂得什麼叫軍閥主義吧，我們共產黨裏難道就沒有嗎？」劉參謀長向來說話隨和，他這時態度很嚴肅，我基本懂得他的意思是什麼。

一九三五年八月初，紅軍分成了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以中央紅軍為主，由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過來任右路軍總指揮和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中央機關隨右路軍行動，毛澤東、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在右路軍。左路軍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由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等組成，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朱德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過去，和新代替周恩來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共事。中央直屬隊跟著朱德到左路軍的人不算少，而我們能留在右路軍的則很高興。

紅軍要繼續北上，必須奪取川西北的松潘縣城。中革軍委已經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張國燾公開不反對，但內心不願意，行動遲緩，結果貽誤了戰機，紅軍未曾打開松潘。紅軍分為右、左兩路軍後，兩個方面軍的部隊混到一起了，接觸多了，分歧漸漸明顯。我和四方面軍幹部交往時常聽到不相信中央的言論，指責中央執行了一條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說「過去聽『洋人』（李德）的，現在聽『秀才』（毛澤東）的。」「你們從江西逃到這，還要向哪裏逃？」「南下好，北上沒有出路。」「現在的中央是無能的，要改組」……一方面軍的幹部就反駁他們，連主要的人物也說了話，彭德懷敢做敢言，公開反駁那種言論。為了照顧大局，當中央對張國燶耐心說服，甚至有些遷就，張國燶才勉強口頭上同意繼續北上，向毛兒蓋前進。由於兩軍貌合神離，紅軍由兩河口到松潘耽誤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蔣介石完成了對紅軍追擊堵截的部署，發出「要把紅軍消

滅在川西」的狂言。面對敵人的強大壓力，紅軍內部分裂的氣氛一時被掩蓋了。

過草地

新的敵情迫使紅軍要通過草地無人區，向甘肅的夏河流域前進。那時我們面臨著兩個嚴重困難：草地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敵人的追堵，前者甚於後者。草地不僅沒有人煙、糧食、道路，還有不少地段是沼澤（也叫水草地），人根本不能走。

紅軍到了毛兒蓋後就開始作過草地的準備。這時周副主席患病了，持續發高燒（多年後周恩來說他得的是肝膿瘍），大家都很擔心，我們把擔架鋪的很軟，勤換擔架員，這樣就平穩多了，我忙完工作，也去為周恩來抬擔架，我嫌擔架員走的不穩。衛生所長王斌是為周恩來治病的醫生，沒有醫藥和器械，他唯一能採取的辦法是要我們搞些冰塊為周恩來高燒時降體溫。毛兒蓋沒有冰塊，要到幾十里路遠的打鼓山頂上才能搞到。我們連夜出發，不到十小時就從雪山上把冰塊搞回來了，敷在周恩來的身上退燒。那時的伙食很差，籌來的糧是藏民的主糧青稞，一般人吃了都不消化，別說是病人了。我派人搞來了一點小米、黍子，這就是珍貴的東西了，我們給周恩來熬粥喝。

過草地的準備工作主要是搞糧。毛兒蓋周圍都住了部隊，百十里內搞不到糧，籌糧的辦法祇有三個：一是搶割老百姓地裏即將成熟成的麥子、青稞；二是挖野菜草根；三是向下面的部隊要一點。

割麥子（青稞）要經過政治機關批准。麥子沒熟時就在田頭插上牌子，標明由什麼部隊收割的，說明紅軍收麥子是不得已的，現在欠下了賬，今後一定要還清等等。部隊割了麥子，中央機關每人都能分到大約二十斤，然後用各種方法（多數是用石頭砸）把麥子加工成像麥片一樣的渣子狀的「麵粉」，這就是過草地的「命根子」。

另外，各部隊也向中央機關送來了一些食物，紅一軍團送得最多。毛主席在長征中一直受到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的特別保護和照顧。過草地前，林彪送了一個八個人的擔架班和一頭壯實的驥子去為毛主席服務。林彪自己的運輸員也來了，是我到紅一軍團二師把這支擔架隊帶回來的，二師師長陳光和政委劉亞樓再三囑咐我要把毛主席照看好。臨行

前他們又把三十幾個麵餅、二十幾斤由牛內或馬肉曬成的肉乾交給我帶給毛主席。

挖野菜草根也是搞「糧食」的重要手段。過草地前大家以吃野菜為主，在野菜裏加上少量麥粉做成稀糊糊吃。吃野菜發生了不少問題，全身浮腫、拉不出屎是普遍現象，也有中毒的人，反正不吃野菜也要餓死，祇好以命一試了。那時的毛兒蓋一帶幾乎被「掘地三尺」了，八月間的草原本應草木繁茂，但很多地方連一根草都看不見了。

當時部隊的情緒很悲壯，過草地之前，運輸隊舉行過一次「會餐」，也就是多了幾種野菜罷了。大家互相托付，過草地誰死了，活著的要給他家裏寫封信……顯得十分淒涼。為保證中央領導安全過草地，我叫運輸隊藏了些糧食不敢輕易拿出來，領導人的擔架隊員、抬電臺和發電機的運輸員糧食不夠時就從這裏取。

中央縱隊由毛兒蓋出發過草地走了七天，這是紅軍長征中最艱苦的一段路，非戰鬥減員犧牲的人最多。

第一、糧食不夠吃。出發之前每人的糧食看起來不算少，實際上不夠。部隊過草地是日日夜夜地走，能坐下休息的機會並不多，體力消耗幾乎超過了人的生命極限。部隊長期飢餓，糧食分散帶在每人身上的，餓了就掏出來吃，多數人一天要吃兩三斤糧食還喊餓。為了不餓死人，部隊邊走邊採集能吃的植物，到了宿營地還要組織採集。把野菜煮熟了吃最好，如果找不到柴火，就生著和糧食一起吃，為了活命，生野菜再苦再澀也不怕了。

第二、通過軟土地帶。它又被叫做「軟草地」，是表面乾、下面濕的沼澤。軟草地上面長的草和乾草地長得一樣，初踏上感到很軟，但是越踩越軟，踩多了就成了漿糊狀了。前面少數人可以過去，後面的人就會陷下去，你要掙扎，會越陷越深，別人也很難相救，因為你去救別人自己也會陷下去。軟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著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數被淹沒了，多數沒有淹沒，屍體僵著，姿態各異，有的舉手在掙扎，有的和別人拉著手……這種慘狀是用生命塑造出來的。長征中期紅軍減員最多就是在軟草地上。

中央縱隊牲口多，擔子多，還有領導人的幾副擔架，過軟草地更困難。林彪率紅一軍團過草地後，專門派一個偵察連等候我們，為我們

引導路線。紅一軍團在一較寬地段之內給中央縱隊留下一條沒被人踩爛的「處女路」，寧可自己減員多，也要中央安全。在繞不過去的地段，偵察連就用鋪樹枝的辦法整好。中央縱隊通過最危險的一段軟草地時，林彪、聶榮臻等還在那兒，看到毛主席等人通過之後才離開。

第三，遭受敵人騎兵襲擊。中央縱隊過草地的第四天，我們宿營地附近有片樹林，警衛營去那打柴，接近樹林子時，突然一股五十多人多的騎兵從裏面出來衝向我們宿營地，警衛營回不來，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我立即叫首長們的警衛員和勤雜人員百餘人集中起來，用人群保護中央領導人，外層的警衛人員準備用短槍反擊，內層的人用身體作「掩體」。敵騎兵離我有百餘米的地方，正巧遇到了一條水溝，馬不好通過，就折回向西南走了。事後分析，敵人並不知道遇到了紅軍首腦機關，誤以為打柴的警衛營是去打他們的，為逃命先衝擊一下，然後逃離。險情過後我向林伯渠司令員報告，告訴他紅一軍團一個騎兵通信連已經趕到了，如果再有情況也可以對付。林伯渠連說：「險，真險！如果敵人真的衝過來，即使是小股，後果也不堪設想。」

第四，暴雨襲擊。進草地頭一、二天氣候好，祇是晚上宿營得在潮濕地上。後來幾天遇到三次大雨，因為一點防雨的辦法也沒有，遇到下雨祇能聽天由命，所以什麼「困難」也沒有了。第六天從下午開始下了通宵的傾盆大雨，整夜淋著雨睡覺，第二天開始行軍時大家連腳都提不起來了。

中央縱隊過草地掉隊的祇有三、四個，犧牲了一個人。犧牲的是運輸隊的林少西，福建汀州人。他挑著中央機要物品的擔子從瑞金走到這裏，身體早已虛弱得不行了，過草地的第一天下午就發了病，來勢很兇，不能行走，我讓他騎在我的馬上，自己步行。我把牲口讓給一個運輸員，在運輸隊裏引起很大的反響。毛主席的擔架員向毛主席說了，他連連稱道。不幸的是，第六天林少西犧牲了，我們祇能把他就地埋葬。沒辦法設墓碑，就把他挑東西的扁擔插立在墓前，寫上了他的名字以作紀念。

第七天我們走出草地，到了班佑。現在許多地圖上可以看到「班佑」的地名，但那時是「有名無實」。那裏沒有房子，沒有居民，祇是在地勢稍高點的地方有幾處石塊木頭堆起來的「窯」。中央縱隊從班佑再向前走

一點，到了四川、甘肅交界處的一個叫做巴西的地方，那個村子很大，但人都嚇得逃走了。先頭部隊紅一軍團在那兒為我們留下了足夠的糧食，中央縱隊在此休整。

過草地前中央縱隊的人數減少了，一部分人隨朱德、劉伯承到左路軍去了。中央縱隊司令員林伯渠兼任總供給部部長，縱隊的辦事機關人很少，我們三科成為縱隊行政管理部門。由毛兒蓋出發到過草地，行軍中我一直跟著毛主席、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生怕他們出了什麼事，一切都要安排周到。新中國成立後，在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難的時候，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我說：「長征時，中央縱隊過雪山草地時沒有餓死人，你會作是立了功的。」

回想起幾十年前的往事，真有點傷心，在最艱苦的歲月裏，自己把生命和全部力量都獻給了革命事業，長征一路也算是和毛主席有生死之交了，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毛主席連我們都不要了，把我們打倒，還往我們身上潑髒水。但我對毛主席沒有更多的怨言，後來，這件事又被鄧小平、鄧真利用了。

紅軍的重大分裂

中央縱隊過草地後在巴西住下。到巴西的第二天，葉劍英參謀長叫我去交代了三點：1、在這要住一個時期休整，恢復體力；2、加緊籌糧。如有困難，可以找三軍團幫忙（一軍團離這裏遠）；3、要恢復軍隊生活制度，不能再像過草地那樣散漫了。

右路軍在巴西住了不短的時間，吃得飽，休息又好，人們就有些「閒情逸致」了，三科那裏成了領導人聊天的地方。常來的有博古、林伯渠、鄧發、李克農、黃克誠……三科吃的東西多，祇要這些人來了，邊吃邊聊，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時機關裏上下級關係親密，說話隨便，張國燾不願北上是經常談論的話題，大家對張國燾意見很大，卻沒人在嘴上說破。我在工作中更能體會到兩個方面軍之間的一些矛盾。比如，中央縱隊和右路軍總指揮部相距二里多路，中間有一塊二十幾畝快要成熟的麥地，葉劍英偷偷叫我派部隊把麥子看好，不要叫四方面軍的人搶割了去。我派警衛營暗中日夜看守，成熟時一夜割完，收穫一千多斤，一點也不給別人。由此可見，雙方存在戒心。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下午大概兩點多的時候，特務員急忙跑來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員那兒開緊急會議。我跑步趕到時，曾希望（軍委二局局長）、李富春、葉季壯（先遣工作團正副團長）、軍委機關工作人員蕭向榮、孫開楚等人和我幾乎同時到達。我見林伯渠心事重重、呆坐著不說話。一會兒，葉劍英參謀長（紅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來了，林伯渠對著葉說：「關於情況和行動，還是你說一下。」

葉劍英精神緊張地說：現在告訴各位一件事，張國燉帶左路軍到了阿壩，中央要他們迅速來和我們會合，一起北上。張國燉回電說沒有糧食，河水大漲不能徒渡。今天（九月九日）中午收到了張國燉電令徐向前、陳昌浩，要他們停止北上，準備南下。徐向前、陳昌浩很快就能知道張國燉的命令，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也會收到，他們聽誰的很難說，中央剛才開了會，認為我們走為上計，行動要快。葉劍英說了幾句短話匆忙離開。林伯渠接著說：祇要我們向林彪的一軍團靠攏了就主動了。我們具體行動方案是：1、中央決定立即北上，右路軍先走，四軍、三十軍如不願意走，我們就和紅一軍團、三軍團單獨北上；2、行動前要絕對保守秘密，不告訴紅四方軍的人，讓他們先跟著走，到了水磨房之後（那兒駐有紅三十軍部隊和紅軍大學），再向他們宣佈我們行動的目的地，走留聽從其便；3、對四方面軍不願走的人不准打罵；4、我們現在就做準備，對外面說是明天全部上山打糧，凌晨三時準時出發。林伯渠佈置完已經是下午五時了。

因為我主管中央機關的行政和生活，我從林伯渠那裏出來立即召開了三科的小會，佈置了任務，分頭去收帳篷、綁行李、裝擔子、備馬、做飯、那副緊張的樣子我現在也歷歷在目。在準備中，曾希望來找我商量了一下，說他要晚些時候才能拆收有線電話線，要我配合他。我說時間這麼緊，為何如此拖拉。他說，是為了晚上行前給葉參謀長打個電話，叫他過來。

葉劍英趕回去徐向前、陳昌浩住處，想到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肅南部的地圖，在指揮部作戰參謀呂真興那裏，壓在他的被子下面。葉把呂派出去辦點事，把地圖偷到手。葉為防不測已安排了脫身之計，大概在晚上十時左右，曾希望按事先的約定，給葉打去了電話，稱「中央縱隊這邊的通訊設備發生故障了」，葉劍英藉機溜掉了。

中央縱隊九月十一日凌晨二時半出發了，黎明時行軍到了紅軍大學附近，紅大還沒有吹起床號。我奉林伯渠的命令跟隨著毛主席先走，不聲不響地過了紅軍大學後，在一個小山坡上坐下等後面的隊伍。毛主席叫我回去把彭德懷的人找到這來。那天，彭德懷派了紅三軍團一個團的部隊，按中央命令於夜出發，在紅軍大學附近隱蔽，如果紅軍大學和三十軍搗亂不讓我們走，這個團就全力保衛中央縱隊。但彭德懷不放心，又率三軍團主力於七時（太陽剛出來）趕到紅軍大學了。

天濛濛亮時，中央縱隊的行動被發現了。紅大教育長李特出校門來查看，他手持一支駁殼槍，氣勢洶洶地出來，在校部門口衛兵站崗處和彭德懷相遇，正好我也趕到了。李特對著彭德懷罵道：「你們這伙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要臉的逃跑主義！從江西逃到這裏還不夠，還要逃到哪裏去？」彭德懷反過來對李特說：「你他媽放屁！老子執行中央的決定，北上抗日，你們要到荒無人煙的川西去，你是什麼主義？你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右傾機會主義！」李特說：「北上抗日像你們這個樣子，這點戰鬥力，還能抗日？」彭德懷發火罵了：「你這個狗日的，屁都不懂，就懂得搞分裂、搞軍閥主義……」他們在爭吵中，李特已下命令要司號員吹集合號，準備戰鬥，很快紅四方面軍的學員們全都持槍上來了。那時四方面軍的部隊不聽別人的，祇聽張國燉一夥幾個人的，祇要李特發令，他們立即就動手。

彭德懷見狀立即拔出手槍指著李特說：「我的三軍團就在你們的前後，你們誰敢開槍，老子就先槍斃了你！」李特對彭德懷的暴躁脾氣很瞭解，沒有那樣兇了。就在此時，學校裏有人急忙跑出來向李特報告說：一方面軍的學員都走了，附近發現了大量紅三軍團的部隊。一聽此話，李特態度就軟了。

毛主席坐著休息的小山坡離爭吵的地方不遠，彭德懷和李特吵什麼他聽得清楚。這時毛主席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說：「彭軍團長，不要同他們吵了。黨中央決定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要堅決執行。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決議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是一定要先執行。」毛主席又對李特說：「李教育長，黨中央的決議你是知道的。我們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軍隨後也會來的。我們會聚

結起來的。」這時葉劍英趕來向毛主席說，中央縱隊全過去了。毛主席揮手叫彭德懷不要理睬李特，去帶好自己的部隊。

後來聽說，九月十日早上我們過水磨房之前，徐向前，陳昌浩就發現中央縱隊率一、三軍團有行動，單獨北上了。四方面軍高級幹部少數人曾主張用武力攔阻，徐向前說了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在中央和張國燾鬥爭的關鍵時刻，徐向前說了句關鍵的話，應當作為他重大的功績載入紅軍的史冊！

以我觀察，毛主席離開紅軍大學後是既沉痛又慶幸。沉痛的是，經過千辛萬苦，付出了重大代價，實現了紅軍一、四方面軍的會合，但還沒有發揮作用就分裂了。慶幸的是，這次沒有造成流血事件是不幸中的萬幸。毛主席原來從不公開說張國燾什麼的，現在他說了很長一段話。那是我第一次當面聽毛主席說張國燾，感到非常的新鮮，這麼多年過去了，依稀記得一些。

毛主席說：他在建黨之初就認識張國燾了，張貌似虛心，實際很霸道，但對他這次用槍桿子稱霸卻沒有料到。四方面軍「認人不認理」的色彩比較濃厚。毛主席還說，四方面軍南下沒有前途。劉湘會積極反對他們才能保自己的生存，蔣介石也一定借反共為由進川，既削弱劉湘也不許紅軍呆在四川，四方面軍最後還會北上。

我們這一隊人向東北方向走了大約二十多里路，突然發現一支百餘人的部隊尾隨而來，喊話一問，知道是紅四方面軍軍事法院的。毛主席停下來休息，要我去請他們領頭的人過來。沒想到我一靠近，他們立即上膛，準備戰鬥。我向法院院長（名字忘了，是個雙腿殘疾的人）說明來意之後，他勉強同意叫部隊解除戰鬥準備，自己坐在一乘轎子上，由四個掛著盒子槍戰士保護下過來了。

毛主席和藹地問他為什麼來這裏？院長板著一副面孔說，紅四方面軍法院在兩軍匯合後劃歸中央縱隊指揮，他們是昨天得到中央縱隊的通

知過來的，現在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們不願意離開四方面軍。

毛主席說，我們北上抗日，張總政委（張國燾）不願去，那你們就回他那兒去吧。院長對毛主席放他們回去很吃驚，想說什麼，但沒張

口，遲疑了一會兒，問毛主席有什麼話要對張主席（張國燾）說？

毛主席說：四方面軍的人誰想回去就回去，你告訴大家，北上抗日是中央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你們現在南下，將來還是會北上的。我們先走一步，等待你們到來。

果然，一年後四方軍第二次同中央會合了。巧的是，我在陝北保安縣吳起鎮又看到了那位法院院長，仍坐在轎子上，我迎接了他們並且佈置宿營和發糧食。

中央縱隊經過兩天的行程到了俄界。先行到這裏的紅一軍團領導林彪、聶榮臻走出了十幾里來迎接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到來，還舉行了歡迎大會，會後是聯歡和會餐。

毛主席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我們黨的抗日主張可以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民抗戰才是出路。我們離開中央蘇區快一年了，深感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我們很快可以到達陝北，我們同那裏的紅軍會合。我們還有革命的「本錢」，現在第一批北上的部隊有百戰百勝的紅一軍團和三軍團，我們有很好的政治家，有重要的軍事家彭德懷、林彪同志，我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毛主席講完話之後，中央領導和紅一軍團領導一起席地就餐。吃的很簡單：青稞面做的餅子和少量豬肉同野菜煮的湯菜，但非常可口。

毛主席的講話裏對政治家沒有點名，軍事家祇提了彭德懷、林彪，對彭、林前面冠以「重要的」三字，可見彭、林在這次關係毛澤東和紅軍生死存亡危機中所起的作用。

由於北上的中央機關和紅軍作戰部隊加在一起不足萬人了，就合編為「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副司令員林彪、參謀長葉劍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紅一軍團部隊編為一縱隊，林彪兼司令，轄二個師，一師師長劉亞樓、二師師長陳光。紅三軍團部隊編為二縱隊，彭雪楓為司令員，因為兵少，下面就沒有師了。中央和軍委機關編在一起，又叫三縱隊，司令員葉劍英，我們三科在葉司令員的直接領導下管理三縱隊行政生活。葉劍英是客家人，從長征中期開始，他對我熟悉了、信任了，以後我們關係一直很密切。

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會議後，中央率領一、三軍團向陝北繼續前進。行前開了動員北上的大會，毛主席講了話，但主要由周恩來講。周恩來一九三一年進入中央蘇區後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

是很有影響的人物。長征過了雪山後周恩來病了，睡在擔架上不能管事，到俄界前他的病才好些，這時黨內發生了重大分裂，他在動員大會上講話是必然的。我記得周恩來主要是講了北上抗日，指出了紅軍下一步行動的明確目標。

周恩來說，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口號是非常正確的，張國燉不僅不贊成北上抗日，還批評這是「空談」，他這是為了掩飾分裂紅軍的罪行。我們很快就可與陝北紅軍會合了。周恩來接著說：我們過了草地，就把敵人追擊大軍甩掉了。蔣介石為了堵截我們，急忙派來何柱國的騎兵軍，祇有幾千人，敵情並不很嚴重，我們不到十分必要時，是不想打仗的，我們付出一個人的本錢消滅一個敵人不划算，消滅兩個敵人也不划算，我們的本錢太小、太珍貴了。我們的目的不是打仗，而是力求以後得到一個不小的发展。

周恩來的講話表明，歷時一年的長征快要結束了，大家歡欣鼓舞。會後搞了文藝演出助興，這是紅軍開大會後必然要進行的程序。那天的節目一直演到黃昏。晚飯進行了會餐，殺了一頭小牦牛。

回首征途，從江西出發到強渡湘江，這一段軍情最緊張，整日戰鬥衝破封鎖線，戰鬥減員最多，中央紅軍少了一大半人。第二階段是到遵義之後，敵情緩和了一些，人心略為穩定。這才有條件召開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的機會主義軍事路線，紅軍絕地逢生了。第三階段是遵義會議之後，又是敵情緊張。紅軍的數量和戰鬥力比剛離開江西時差多了，面臨強敵，有時生死就在一剎那間，隨時可能全軍覆沒。由於毛主席的正確指揮，國民黨大軍一直在我們身邊轉，就是追堵不到我們。第四階段是向川西北進軍到陝北，這時擺脫了敵人的追擊，面臨的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黨內分裂的危險。在少數民族的極端貧困的不毛之地找不到生活來源，減員又非常多，死的都是老骨幹和精華，實在太可惜了。

中央機關在俄界整編後，許多人到了先遣工作團。中革軍委機關的人數減了不少，除了電臺和警衛、勤務部隊以外，幹部祇有二十幾個人，這是歷史上最小的中革軍委機關。由於人少了，毛主席來我們三科的機會更多了，許多事他都是直接找我為他辦的。

中央紅軍從俄界出發再向北，祇要經過了天險臘子口，就從山裏向平川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紅一軍團的紅二師一鼓作氣拿下了

敵人認為不可能丢失的臘子口。當我們從這道天險裏走出來時，高興地說，這一年整天在大山裏鑽來鑽去，天大的苦也吃下來了。

我們出了臘子口的第一天，到了一個叫哈達鋪的鎮子。鎮裏有不少的商店，一所學校和一個郵政所。哈達鋪當地的人稱之為「小岷縣」，是周圍各地通商的口岸。半年來我們一直在少數民族地區，在哈達鋪又看到漢族的院落，坐在桌子邊吃飯，感到特別的舒服。到了哈達鋪，別人急於休息，而我們要為毛主席收集報紙。我安排好機關的住宿和警衛，就找郵政所，在那裏找到了過期幾十天的一些舊報紙和一張陝西省通郵圖。

毛主席看到我送上的通郵圖，激動地喊：「這件東西是個寶貝呀！」毛主席在報紙上看著看著高興了起來。原來是一段報道延安、保安、安塞等國民黨軍「剿共打勝仗」的新聞。毛主席說：白軍在那裏打「勝仗」，那裏就有紅軍。毛主席看了一會兒陝西省通郵圖說：我們在這休整一下，就到那個人民要革命的陝北去「安家」。

中央機關到了哈達鋪，三科召開了第一次軍委直屬隊的行政管理會議，提出了三條：1、整頓軍容風紀；2、恢復管理制度；3、恢復集體吃飯。恢復集體伙食的第一頓飯就出了「洋相」，當天吃白面，這是一軍團留給我們的戰利品。炊事班長劉仁從來沒有吃過白面，他像做米飯一樣把水燒開後把白面就往鍋裏倒，最後煮了一鍋夾生面疙瘩。但大家還是狼吞虎嚥地吃了，劉仁的大名也就揚開了。劉仁在長征中一直在三科裏跟著我，埋頭苦幹，抗戰時在敵人掃蕩中犧牲了。

紅軍出了臘子口之後不久就和國民黨的騎兵打了一仗。我們有些傷亡，毛主席心裏特別難過，千辛萬苦都過來了，現在有些同志卻死在異土他鄉。毛主席在葉劍英的陪同下去墓地憑弔了犧牲的七位烈士。我從來沒看到過毛主席如此傷感。毛主席離開烈士墓後又去看了傷病員，毛主席的問候使傷病員們十分興奮。

在回來的路上，毛主席向葉劍英說：這次打敵人騎兵，我們傷亡了二十多人，代價本來很小，但這樣的傷亡我們也賠不起呀！現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懷的一、三兩個軍團了，死一個就少一個呀。這些人是黨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將來發

千萬個。為了保存好這些「財富」，我們要盡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絕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們大的傷亡。

紅軍長征到這兒是我們人數最少、力量最弱的時候，大家的情緒非常低沉。在以後的行軍中，毛主席不時和大家聊天談局勢，鼓勵士氣。他說：我們紅軍這幾年裏是下了兩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岡山，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岡山時我們祇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岡山不久，紅軍就發展到十幾萬人，還建立了個中央蘇區。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經鍛煉的紅軍，我們還會發展起來的。我們到了陝北先要擴大地盤，那裏南邊有關中平原，自古以來是成霸業的地方，我們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佔領關中平原腹地，也要佔它一個邊。

毛主席心中已有了今後的戰略。在進軍陝北的路上，中央主要是擴大紅軍，一邊行軍一邊籌糧、籌款和擴軍。要求作戰部隊每兩人或三人擴大一個紅軍，後方部隊和地方工作團一個人要擴大兩個紅軍，要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擴招一萬人至一萬五千人，把一、三軍團補充起來。

中革軍委機關到了葫蘆河以東的靜寧地區，陝北地下黨派來找中央紅軍的三個聯絡員到了兩個，立刻被毛主席、周恩來找來問話。陝北人講話難懂，就叫地方工作團的陝西人賈拓夫當翻譯，問清楚了陝北紅軍在陝西的清潤、佳縣、橫山一帶活動，力量很小，主要是打土豪，分糧，沒有固定和穩定的政權。毛主席決定翻過六盤山繼續向陝北進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賈拓夫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他是陝西黨組織派到江西瑞金向中央報告工作的。一九三四年初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會後正逢敵人第五次「圍剿」回不去了，就隨中央紅軍長征。賈拓夫人很精幹，善言談，行軍時人們喜歡和他一起邊走邊吹。「談話走路快」，常常牛皮還沒有吹完宿營地就到了。賈拓夫的名字中有個「托」音，大家開玩笑叫他「假托派」。在瑞金時，紅軍的政治教育中，大家對托洛茨基這個洋名字讀不習慣，有人讀成「偷著吃雞」，成為流傳很廣的笑話。由此引申，大家又把賈拓夫的外號改成了「假吃雞」，算是飢餓中無奈的消遣。中央決定到陝北之後，賈拓夫的牛皮吹得就兌了，把他的家鄉說得比天堂都好。而來的陝北交通員說，安塞縣城祇有三個商店和鋪子，有的老百姓窮得沒有褲子穿，賈拓夫就不吹了。

中央縱隊進到甘肅東部之後敵情比較和緩，但路難走。那裏屬於黃土高原，遠看一望無邊的平坦，近看溝深得嚇人，溝壁多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人不能攀登，祇能走很遠繞道過去。可是這對敵人騎兵活動更為不利，我們寧可選這樣的地方走。

一路上居民越來越稠密，解決宿營、吃飯都方便，但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沒有水吃。黃土高原缺水。一個村子甚至幾個村子才有一口甜水井。我們到了宿營地，首先就是控制甜水井，因為水量不大，部隊飲用時還要照顧到老百姓，時常發生爭吵。一次，我們在一個祇有百餘人口的村子休息一天，紅一師部隊在村子裏取水做飯，水少人多發生了嚴重的糾紛。周恩來親臨井臺下命令：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准私自打水，先供應部隊用水，機器到晚上才供應。

六盤山南麓人口相對稠密些。我們每天行軍里程短，停下來休息的時間多，這是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做群眾工作，擴大紅軍。中央各部門都定下了硬指標，要求平均每人擴大一個紅軍。我們三科人多，警衛排、運輸班、炊事班一起有五十多人，擴大任務很重。軍委機關「擴紅」的積極性很高，但也有方式方法不好的。例如，見到年輕人就問他當不當兵？膽大的可以回話，膽小的聽到「當兵」就跑，我們跟在後面就擋。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嚇得都往山上跑。這種做法及時得到了改正：一是和房東拉關係，房東看到我們是正派守紀律的隊伍，反正當地很窮，人沒出路，就叫青年參加紅軍了。二是打土豪，我們每到一地總是打一兩個民憤比較大的土豪，把浮財分給窮人，事後總有幾個人參軍。三是發動青年人做群眾工作。大約十天時間內，軍委機關「擴紅」三百零幾人，送到作戰部隊去了。長征開始後，紅軍一路都是減員，祇是進了甘肅以後才開始增員，逐漸恢復了一些元氣。

最後的難關

中央紅軍翻過六盤山之後到了寧夏的領旺堡和甘肅隴東的環縣地區。軍委機關準備在環縣的洪德城休整兩天，那裏離陝北的吳起鎮不到三百里路行程了。就在此時敵人的騎兵追上了軍委機關。當時一、三軍團在軍委機關的東邊有相當距離，等他們回兵保護已經來不及了。我們

祇有向前拚命地走，趕上一軍團才安全。軍委機關經過動員之後，以急行軍速度出發了。

從洪德城出發的當天我就突然發高燒，衛生所長王斌診斷是「回歸熱」。當時什麼藥也沒有，好在王斌在自己皮包裏藏了僅有的兩支阿姆拉丁注射藥。他把兩支藥作一次給我打了進去，我注射後幾小時後燒就退了，好在當時我還祇有二十歲，發燒四十度雖然很難受，但還能堅持並照常工作。王斌憂慮地說，這點藥量對我的病祇能起到暫時壓一壓的作用，過兩天還會發高燒。這時，軍委衛生部長黃克誠特意過來陪著我走，我知道他是怕我再發病時掉隊，或是被「安置」丟下不管了，他這樣關心我，讓我非常感動。

軍委機關急行軍到了離吳起鎮不到一百里的鐵邊城附近，敵人騎兵追上來把軍委機關衝散了。我們後衛發現了敵人騎兵，由警衛營一個連在後面抵抗。我叫軍委領導走在最前面，擔架班和警衛員們扶著毛主席等人向東面跑。三科警衛排保護文件和財物擔子，電臺跟著走，機關人員隨著跟進，我在後面照應。由於敵人摸不清我們的情況，遇到警衛營的抵抗又很勇猛，天也快黑了，所以祇是不斷試探性地衝擊，我們就且戰且退。

軍委大隊人馬向東跑了大約三十多里路，敵軍就衝上來了，我們後頭隊形被敵軍衝散了，走不動的人就和敵人搏鬥，拖住敵人，為前面跑的人爭得了時間。就在向東跑這危急時刻，恰好遇上了一個寬有幾米的隘口，我帶著科員賴勤、警衛員藍如桂和警衛營的一個排強行搬來老鄉家的一些木頭和雜物，甚至門板也拆下來阻塞在隘口上當鹿砦，利用它進行抵抗。騎兵最怕的就是隘口和鹿砦，敵人祇得停下來，慢慢通過它進行抵抗。騎兵最怕的就是隘口和鹿砦，敵人祇得停下來，慢慢通過它進行抵抗。騎兵最怕的就是隘口和鹿砦，敵人祇得停下來，慢慢通過它進行抵抗。這樣又拖住敵人兩個多小時，天完全黑了。我們撤出戰鬥追趕大隊。我們走了二十多里，敵人騎兵從右側攔截過來把我們衝散，好在天很黑，我和賴勤、藍如桂、警衛排一個班長無意中躲在了一起，敵人沒有六十多歲的老兩口。他們的話聽不懂，我們做手勢要吃飯，他會意了，給我們端出來一盆小米稀飯，一碗酸菜，我們都吃光了。警衛班長身上有個一角錢的銀毫子給老百姓，他擺手表示不要。

天亮後我們又餓又累走不動了，沒多久我又發起了高燒，連站都站不住了。於是賴勤向老鄉要了一根扁擔和一個筐，把我放到筐裏抬起來走。我在筐裏很快就睡過去了，等我醒來一問，已經又走了一天，後來繩子也斷了，接了幾次又斷了沒法再接了。藍如桂毫不猶豫地脫下自己的褲子撕成條編成繩子抬著我走。快天黑的時候，我們走到一個有幾戶人家的小村子，原來這裏距離陝北紅區的邊緣吳起鎮不遠了。

不久，從東邊傳來了槍聲，從槍聲中我聽得出，是自己的部隊來了，我叫賴勤過去探一下虛實，一會兒賴勤帶來兩個班的部隊，老遠就高興地叫著：「我們的人來了。」來的人是一軍團司令部參謀朱虛之。他說：「軍委領導已經安全到了吳起鎮，和陝北的紅軍會合了。你們和敵人遭遇後，一軍團就由吳起鎮向回打，在吳起鎮和鐵邊城之間把敵人騎兵消滅了一大半。」這時，兩個戰士拿來一副說是才繳獲的擔架，抬起我就走。我們先到了紅一團的團部，團供給處主任梁玉振是我在紅軍學校供給隊的同學，對我照顧得很周到，當夜我就住在團部。

第二天一早，紅一團派了一個排長帶幾個戰士把我抬著向吳起鎮送。吳起鎮很小，街上祇有一家驛馬店，有幾間不像樣的房子。他們以為驛馬店裏就是中革軍委，把我抬進去就回去了，沒想到這裏是彭德懷紅三軍團的司令部。彭德懷聽到聲音，從屋子裏面出來，見到我就說：「原來是你呀！這樣年輕的人也患病？行軍中病了可是不得了，好在我們到根據地了。」彭德懷邊說邊伸出手在我的頭上摸了一下，吃驚地說：「還燒得很呀！我這條件差，也沒有醫生，你自己多注意。」彭德懷馬上叫他的人照顧好我，送我回軍委機關。我從擔架上看到路邊的土牆是被風雨剝蝕後殘留下的幾條標語：「擁護蘇維埃！」「打土豪分田地！」「紅軍萬歲！」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我們又回到了根據地，回「家」了。那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長征終於勝利完成了！我們從瑞金出發，在不停的打仗行軍中走了一年零兩天，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當時不知道，後來算出大概有兩萬五千里。其實那是在地圖上用比例尺量，然後計算的，而真正走的路要比那多得多。紅軍一路上沒有任何給養和保障，前後是敵人幾十萬大軍的堵截和追擊，一路上是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縱橫十個省，平均每天至

少要走八十里路以上，我們沒有被消滅，成功地到達了目的地，創造了一個軍事史上的奇跡。

第六章 永遠的延安

初到陝北

到吳起鎮幾天後我的病減輕了，高燒就退了。我剛能走動就到鎮上去逛，遇到收容隊帶回來一群掉隊的人。深秋的高原寒氣襲人，可他們只穿著僅能遮體的破爛單衣，長褲幾乎磨成短褲，不少人手上拄著棍子，虛弱的身子走路直搖晃。再看我們在軍委機關的人，和他們也相差不多，當時紅軍沒有「窮富」之分，富的頂多祇是多一件衣服、一雙鞋而已。

吳起鎮內祇有三四家店舖，最大的房屋群是東北角一個地主莊子，有土窯洞二十多眼。鎮子四周有用亂石壘的城垣。我們到「家」了，卻是個窮「家」，但這裏是救了紅軍生命之地。到長征最後階段，中央紅軍祇有幾千人了，疲憊不堪，陝北根據地出現在面前，我們心情之高興，祇有經處逢生的人才能感受到。

不久，衛生所長王斌通知我到永坪紅軍第二醫院治病。臨行前我領到了一塊銀元的路費，軍委三科的同志又湊了三十幾個銅板，讓我路上用。永坪紅軍第二醫院，院長李資平，政委易秀湘。醫院條件很差，病員分到老鄉家裏，住醫院和住老鄉家一個樣，和醫院的關係就是領糧食的關係。我們把領到的糧食交給房東，和他全家一起吃飯，很受房東歡迎，因為這裏的老百姓基本上是吃不飽的。

醫院又重新對我的身體檢查了一遍，發現我的腸胃長征中損壞了，要再繼續治療。醫院要我節食，但遇到好飯，我吃起來就控制不住，這是長征過來的人的通病。經過了一個月，我的病基本好了，但腸胃病纏了我終生。我的病將要好時，手腳上的皮全脫了，頭髮也脫光了。這次

生病是我有生以來最重的一次，幸好發生在長征末，如果稍微早點，我就可能早沒命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回到中央軍委機關時，紅軍主力東征了。留在陝北的是軍委後方留守處，周恩來任主任，劉志丹為副主任。周恩來見到我很高興，要我在留守處工作。他談到當前的任務，幾乎說的都是糧食問題，要我協助他抓這項工作，我被任命為中央軍委供給部糧秣處處長。

周恩來介紹情況說，現在糧食成了我們生存的關鍵。在中央蘇區能夠徵公糧地區的人口不到三百萬，吃公糧的人不到二十萬，十幾個人養活一個人。現在陝北根據地人口少得多，不能養活我們這幾萬人。籌糧是周恩來派給我的一項緊急的重要任務，要依靠陝北的同志來完成，他帶我去見一下陝北紅軍的領導、留守處副主任劉志丹。

周恩來把我介紹給劉志丹後，向我交代任務說：「紅軍後方留守處決定成立延川中心兵站，你去兼任站長。負責領導延川、清澗、延長三縣的籌糧工作，短期內要籌足三百擔糧食，接應東征的紅軍回來。你拿著介紹信分別去找三個縣主要負責人辦理。不久我也會到延川一趟。」周恩來交待完了之後，讓劉志丹向我介紹了那裏幹部的情況。

因為籌糧任務緊要，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一直在那裏籌糧。儘管很困難，經過努力工作很快開展起來了。當我把三百擔糧食籌集得差不多時，周恩來來到延川縣，他沒想到我提前完成了，對我的工作很滿意。這時他叫我把工作交代一下，和他一起到黃河邊上的清水關去察看一下渡口，一九三六年五月初，毛澤東率東征紅軍從山西回陝北，就是由清水關西渡黃河的。

由清水關西渡黃河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恩來總理送我回總後主持工作，還提起這段經歷，他說：「我曾經說過，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蘇區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紅軍被迫地離開了老根據地，轉戰北上，集聚在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了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爲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轉戰到西邊，所以那一連

子我們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基本上沒有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

任糧食局長

這次任務結束後，我回到了瓦窯堡紅軍留守處。周恩來對我說：中央決定李富春同志任陝甘寧省委書記，他點名要你去協助他搞財經工作，我同意了。你暫不要回供給部，先到陝甘寧省工作一段時期。

我立即到陝甘寧省的駐地吳起鎮報到了。陝甘寧省由李富春任省委書記，馬明芳任省主席，蕭勁光任軍事部部長，賴傅珠任政委，我是糧食局長。我一到，李富春就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陝甘寧省現在既無財（產），也無經（濟），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搞飯吃，要靠你這個糧食局長了。現在和中央蘇區不同，在那可以徵公糧，和長征路過的蠻子地區（少數民族地區）也不同，在那是見了糧食拿著就走，無所謂買也無所謂征。現在我們到了根據地，不能向群眾直接去要糧，要通過地方政府，以徵公糧的形式要糧。糧食是我們當前最困難的問題，也是同群眾的關係最危險的問題。要是搞得不好，就會『官逼民反』。希望你能解決好這個當前最大的困難。」在富春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我還是第一次，他對我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久，軍委總供給部也搬到了吳起鎮，和陝甘寧省委相隔五里路。我兩邊都有職務，就兩邊跑，主要是在省裏工作，我的工作上幾乎天天要同李富春接觸，得到了他很多教益。李富春是建黨初期的老黨員了，政治思想水平很高，雖然他是一個有文化的人，但他很聯繫群眾，又很平易近人。我們都不叫他的官銜而叫「富春同志」，這在紅軍中是很少見的親切。

那時，陝北遇到的糧食困難極為嚴峻，已到了沒有飯吃的地步。面對這樣的形勢，一九三六年中央由保安遷到延安後，立即決定成立中央糧食部，凱豐任部長，對外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凱豐要我到糧食部工作，富春同志不願意放我走，因為陝甘寧省委當

時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解決紅軍的生活問題。富春和凱豐爭著要我，「官司」打到周恩來那裏，周裁定我去糧食部，任供應局局長。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任糧食部長，是學習蘇聯的「要人管糧食」。凱豐是江西萍鄉人，他夫人廖似光是廣東客人，對我特別親切。我剛報到，凱豐就高興地說：「老弟，你可是我向周副主席打『官司』要來的。供應局是糧食部的半邊天，你的工作搞好了，就等於把糧食部的工作搞好了。」

凱豐對我們來說是大知識分子，他每天讀書的時間多，辦事的時間少，是個「甩手掌櫃」。他甚至坦率地對我說：「我不會搞糧食工作。但糧食工作很重要，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就親自做糧食工作。這個工作很艱苦，要做出成績很不容易。大家要做個列寧式的糧食幹部。」我問什麼是「列寧式的糧食幹部？」他說：「從書上來看，列寧抓了三條，一是向富農、地主強徵多餘的糧食；二是嚴密組織糧食的運輸、保管；三是制定嚴格的供應制度。這後兩條都是你供應局管的事。」我說：「我們和他們情況不一樣。蘇聯那時是地主、富農搗亂，有糧食徵不上來。而我們這兒是地主、富農的糧食也不多。不久前，我已經向毛主席提出了幾條建議：減少邊區的吃公家飯的人數；鼓勵農業生產，部分部隊和機關分散到附近的農村去。毛主席還叫我去談過一次，聽得很認真。」凱豐對我的話非常感興趣，叫我想辦法辦。

為了查清邊區的糧食情況，由我負責組織了一個五人調查組，選擇延安縣南區調查，摸一下糧食情況的底。我們調查發現新區農村的糧食情況比中央蘇區好多了。農民基本上有飯吃，富農、地主手中的有餘糧但不算很充足，這對制定徵糧政策是一個依據。當地可耕地很多，祇要有勞動力，發展農業很有前途。我們寫了一個調查報告，經凱豐修改潤色後上報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視，對凱豐說：「你這個糧食部長倒像個農業部長。從調查報告來看，我們在陝北祇要能站住腳，大概是餓不死農業部長。從調查報告來看，我們在陝北祇要能站住腳，大概是餓不死農業部長。從調查報告來看，我們在陝北祇要能站住腳，大概是餓不死農業部長。」

糧食部的供應工作是最麻煩的，需求矛盾十分尖銳。我的原則是不管需要，祇管分配。也就是說，我有多少分多少，沒有就不分了。供應

局下設若干個糧庫（糧站），因缺糧，有糧就發，沒糧就停，晚十天半月發糧餉是常事，各單位意見大。

一天下午我到延安東關糧站去，正在這時運糧隊趕著空車回來了，原來入庫的糧食在三十里鋪被醫院的人和傷病員搶走了，說醫院最近每天祇吃一頓稀飯，傷病員們鬧起來了。知道了這個情況，糧站站長連聲說：「長了！反了！這是劫糧，是反革命！」當天黃昏，又有三十多頭牲口空著回來了，攔糧的事不僅發生在醫院，其他單位也有了，事態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緊急處理就會發生更大規模的搶糧。

我急忙向凱豐做了匯報。他問我是怎樣處理的？我說糧站說是搶劫，要組織人把糧食追回來，我不許他們去，也不許找攔糧單位的麻煩。凱豐說這樣處理很對，攔糧無罪，責任在我們供應不上，我們做的是「肚子不等人」的工作！你考慮一下怎麼解決，我們一起向毛主席寫報告。

我召集全局科長和糧站站長們開會，議出來三條辦法：1、各機關的人，凡是能離開的都到農村去催糧和吃飯。由糧食部劃分籌糧地區，所徵的糧食歸各單位所有；2、各單位的牲口，包括乘馬在內，集中起來到遠處有糧的農村去運糧；3、延安城內約有私糧和公糧三十萬斤，先強行徵收，以後付款，以解燃眉之急。凱豐聽了我的建議說：「好，好！都是最管用的辦法，馬上向中央報告。」我們的報告很快就被批准了，三條措施實施，搶糧的風潮停了。

不久，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中央決定糧食部撤消，在邊區政府成立糧食局。原中央糧食部的幹部重新安排，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宋裕和任邊區政府糧食局局長，我任副局長。這時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成立了，很多工農幹部都想去那裏學習，我也提出了要求。不少領導不願意放我走，我找到李富春，他為我疏通，得以批准。一九三六年年底，我到了抗大學習。

在抗大學習

興辦抗日紅軍大學是中央一項重要戰略決策。紅軍東征回來之後，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保安開辦了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紅大」）培養幹部，主席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兼政委，後來劉伯承兼任副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劉亞樓任訓練部長（後為教育長），傅鐘為政治部主任。

任，莫文驥為副主任，楊立三為校務部長。由於糧食困難，第一期選集的學員比較少，辦到第二期就改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並於一九三七年一月遷到延安。校址在原延安師範學校院內。

一九三六年秋天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長征也到達陝北，入抗大第二期學習的人就比較多了，有九個隊，約 1300 多人。……二隊為高幹隊，學員至少是紅軍團以上幹部。全校有上千名學生。這麼多的幹部進校學習，是紅軍有史以來第一次。

我進入抗大二期二隊學習。二隊學員近百人，我編在第三組，同一個支部的有張震（來自三軍團）、余秋里（來自二方面軍）、伍書普（來自四方面軍）。我和余秋里、伍書普三人一間窑洞。余秋里戰鬥負傷去掉了一隻胳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學習期間不能帶警衛員。招呼他的事，如吃飯、打水、洗臉、蘸牙粉等，就由我和伍書普做。至於出公差、打掃公共衛生、整理內務等，也由我倆代勞。我們雖然來自紅軍三個不同的方面軍，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離，晚上同睡一炕，親如兄弟。

我在抗大學習了近一年，主要學習了四門課。到抗大講課的人不少，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博古、凱豐、吳亮平等人都來講過課。

第一門課《黨的建設》，授課者朱德。

朱德講課沒看見有提綱也不發講義，警衛員抱好幾本書放在講桌上，但他從來沒翻過。朱老總是個可敬的長者，他講課是「擺龍門陣」式的，大家聽得親切，但中心思想難搞清楚。他講課總是愛舉例南昌暴動、井岡山會師、遵義會議、長征路經贛子區……。朱德講黨的建設有一點我印象很深，就是共產黨員是黨的「馴服工具」，要忠實於黨，黨叫幹什麼都要無條件地服從。即使黨的領導做出的決定是錯誤的，也不能保留自己的意見，不能抗拒。張國焘恰恰相反，讓部下忠於他，自己則以軍閥主義的態度對待黨。

朱德講要把張國焘和四方面軍的幹部分開。四方面軍的幹部大部分都是很好的。當時，也就是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焘錯誤的決定》，抗大積極貫徹會議精神，展開了對張國焘的批判。

第二門課《馬列主義基礎》，授課者博古。

博古講課時講桌上下是大堆的書，有「洋」書本，也有延安土編的。他講課中不斷翻閱，大段大段地讀，有時讀了幾頁也不停口。他似乎不是在講課，而是在領讀馬列主義書本。

博古操一口很難懂的無錫話，講來講去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名字和語錄，枯燥無味。幸好博古發了講義，多少知道要講什麼。但他有時又不照講義講，喜歡列舉俄國革命的事例，他經常舉托洛茨基為反例，念托洛茨基用俄語發音，常引起滿堂人捧腹大笑，博古不知為何？原來我們想起了在江西瑞金紅軍學校中誤把托洛茨基說成「偷著吃雞」的笑話。我們工農幹部文化水平很低，祇能通俗地進行啟蒙教育，祇講高級理論不行。

博古人很秀氣，對人很和善，講課也很認真。他從最高領導崗位下來，還能到抗大面對這麼多幹部授課，而且很下工夫，我心裏還是很尊重他的。

第三門課《戰術概則》，授課者何迪洲。

何迪洲原是國民黨軍隊的工兵軍官，在江西解放參軍。紅軍的技術人員（醫生、無線電、特種兵）多數是解放參加的。何迪洲講課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十分受歡迎。他在國民黨那邊受過正規軍事教育，又有我軍的實踐經驗，能把理論與實踐融為一體。可惜的是國共第二次合後，何迪洲不辭而別跑掉了，否則他就是人民軍隊軍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了。

第四門課《哲學》，授課者毛澤東。

第一天上課，毛主席就說：「我要講的哲學，在場的多數人是初接觸，會感到不懂，但你們又會懂得很深刻。因為我要講的內容就是大家工作和戰鬥中的實際問題。你們很會工作、打仗，難道就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嗎？你們不要去摳那些名詞和字眼，要很好地研究道理。讓你們學一點哲學，我有充分的信心！」果然，毛主席把深奧的理論講活了。

毛主席講課多在一隊學員宿舍門口的院子裏，學員席地而坐聽講。毛主席講課有講稿，不發講義，但他不念稿子，總是用工農幹部熟悉的事情來說明理論。我多少有點文化，即使意思很難一下子全部理解，也能引起我很大的興趣，結合工作一想就想明白了。但有的文化低的學員抱怨說：「聽毛主席講課像過年放鞭炮，聽起來很喜悅，過後都忘了。」

不久就有了毛主席寫的油印本《實踐論》、《矛盾論》記錄稿，通俗易懂。最初記錄稿很少，我如獲至寶地把稿子一字不漏地抄在一個厚本子上，常拿出來讀，為我學習哲學啟蒙，打了基礎。

抗大的生活非常艱苦，吃飯成了嚴重問題。中央軍委供給部把抗大列為糧食重點保障單位，但僅僅是方針而已，沒有糧食一切都是空話。因此抗大的吃飯有了四種情況：一是勉強夠吃，這樣的日子不多。二是不夠吃，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糧，餓得搶飯吃，這樣的日子相當多。三是吃稀飯，多為一天兩頓，這樣的日子很經常。四是喝稀湯，就算頓飯，學員稱這是「哄嘴飯」，這樣的日子不是很多，但卻叫人難忘。由於飯不夠吃，開飯時大家就爭搶。余秋里一隻手，開飯時我要先為他搶上一碗飯，然後再擠進去搶我的一碗，稍慢一點就打不上。余秋里常為我開道，他雖然一隻手，也去拉開別人，我一下就鑽到前面去了。

一九三七年夏收之前，糧食缺得嚴重，祇好用黑豆等飼料代糧，用黑豆、高粱、小米做成稠稀飯，大家叫它「合作飯」，就是這種飯也不能保證，越吃越稀。學員們每天餓得肚子咕咕地叫。全世界的軍隊中，紅軍最有挨餓能力！

儘管生活艱苦，但抗大一年的生活豐富多彩，比如打籃球，這是最熱鬧的活動。祇要朱老總來上課，下午肯定提前下課，朱老總組織大家打籃球。王錚那一幫人打的好，動作很漂亮，他們能打得贏從國統區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那幫人，但有時卻輸給我們這些土包子。我們這些農家出身，哪會打籃球，基本上是看會的，我們之中有幾個人，東推西撞，動作歪歪扭扭，但往往進球，因此常有爭執，朱老總常用四川話說：「進圈圈為準！進圈圈為準！」

回憶抗大的生活，還有幾件重要的事：

一、反軍閥主義

抗大二期有不少紅四方面軍的學員，在二隊約佔三分之一。他們的精神壓抑，很少說話，特別是師以上幹部多是這樣。當時中央要求進行反對張國燦軍閥主義的教育，他們認為是整他們，來學習就是來挨整。

二隊在學習中，教員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連隊指導員講政治課時提問一個原四方軍的戰士，是毛主席好還是張主席好？戰士毫不猶豫地回答張主席好！這個戰士忠厚老實說實話，反受到了懲罰。二隊在討論時，

一、二方面軍的幹部認為戰士很錯誤，而四方面軍的幹部對於用這樣的實例進行學習很憤怒。

對於張國燾的態度，二隊隊長倪志亮和支部書記謝富治的意見也很不一致，謝到處講張國燾壞，而倪閉嘴不說，實在憋不住就大吼一聲：「都光桿兒了，還有什麼軍閥主義！」這句話被支委會抓住了。倪是四方面軍參謀長，而我們幾個支部委員指責倪志亮堅持錯誤。他雙眼一閉，不理睬。倪志亮越是被說成軍閥主義，越要給大家一個顏色看看。三七年二月最冷的一天，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緊急集合把全隊帶到操場訓話兩小時，學員們沒有準備穿得不多，又凍又餓。事後支委會開會指責倪是故意整人，並向校部報告要對倪進行鬥爭，羅瑞卿批准了。全隊開會鬥爭了倪一整天，一定要把倪的隊長反掉。倪見形勢不妙，立即向朱老總求救。朱德親自來到支部大會上，講三個方面軍的幹部要團結，勸大家把事情結束算了。在朱德的壓力下，倪志亮做了檢查，雖然是應付，但他怕了，以後什麼事也不過問了。

二、毛澤東親自整隊伍

三七年初的時候，天氣相當寒冷了，北風又刮的呼呼地叫。就在這種情況下，抗大在師範學校的院內廣場上，召開了全校軍人大會，會議的內容是聽毛主席講政治形勢問題。

一天下午三點，全校都在廣場上集合了。那時對毛主席當然不像後來那樣神化，但沒有見到過毛主席的人還是多數，很想看一下。隊伍集合之後，毛主席、林彪、羅瑞卿、劉亞樓等人都出現在臨時架起來的臺上。毛主席來前隊伍有些混亂，秩序不很好。毛主席站在臺子上表情嚴肅。

羅瑞卿宣佈開會時，毛主席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臺前站得很端正，稍微掃視了一下臺下，就發出口令：

「全體起立！」全體人員都從席地而坐站起來了。

「一隊以羅炳輝同志為標準，向前看齊！」此時，唰唰的聲音持續好久。

「坐下！」隊伍稍微整齊了。

隊伍坐下之後，毛主席掃視了一下臺下的隊伍說：「軍隊祇要為伍就要嚴肅、整齊。」接著，毛主席就講話了。他講的主要內容就是，日本希

國主義正在為侵略我中華民族做理論上和物資上的準備。我們一定要實行全民族抗戰，保衛偉大的中華民族。

毛主席講話之後，林彪和羅瑞卿對今天的情況表示不安，他們根本沒有料到毛主席會用這種親自整隊的方法來表示對學校的指責。毛主席的一次口令，引起了學校對軍容、風紀的極大重視。嚴肅軍紀風紀成了學校在不短的時間內注意的主要問題。我記得，從此各隊都實行早操。

一九三八年春開的時候，全校在東關機場進行過一次大會操。會操的主要內容就是進行隊列訓練。大家對大會操沒有什麼負擔，更沒有料到會出「洋相」。

林彪、羅瑞卿、劉亞樓等都出席了會操。會操由羅瑞卿主持和施教。會操開始，羅瑞卿發出了口令。可是我萬萬沒有料想到，羅炳輝等跋慢步、出左腿用右手都不會，搞得順拐，人們大笑。

三、劫持張國燾出走事件

一九三七年春，四方面軍在抗大的少數人曾策劃劫持張國燾離開陝甘寧邊區，還沒實施就被揭發了。

抗大一隊學員許世友（原四方面軍軍長）、洪學智（原四方面軍軍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張國燾搞到陝南去另外組織紅軍，參加的有二十餘人。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對待四方面軍幹部的政策很有問題，而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指戰員中確實有些威望。

這些人的活動校保衛處早已有聞，原以為是少數人想結伙出走，並不知道要劫持張國燾。為了偵破該案，保衛處的科長陳福生在學員中組織了偵察小組，有一隊張元壽、二隊邱會作、黃克功、三隊李某（名字記不起了）共五人，陳是組長，我和黃克功分工負責掌握二隊的動態。

起初偵察毫無進展。一天，我和黃克功等在延安北門的城牆上無意中發現了二隊學員徐長勳（四方面軍總司令部四局局長）、三隊學員張大華（原四方面軍營長）等七、八個人由城牆腳下的水洞裏出來，見了我們慌張地走了。我們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是雨季時城裏向外排水的通道。洞裏有煙頭、花生皮等雜物，可以判斷有過多次活動。我們向邊區保安處長周興匯報了。

第二天周興召集偵察小組到保衛處開會，偵察專家布魯（在蘇聯學習多年回國的）也到了，周興決定拘留張大華進行審訊。張被捕後供出如

下情況：1、幾個月以前，他們二十餘人開過會，傳達了張國燉的指示。我們必須再創造一支紅軍和根據地，四方面軍多數人會投奔來的。這次先到陝南，做秘密準備工作。2、最近又開了第二次會議。3、已對延安城的地形進行過詳細偵察。城一邊是延河，西邊是鳳凰山，北、東、南是城牆，只有那個水洞是出城的最好道路。4、走的時間定了，行動時在延安城內的鐘樓放火，乘著混亂保護張國燉出城。5、出城後人員集合，保護張國燉直奔陝南。6、預定一起走的人（約六十人，幹部和警衛員各半），都帶好自己的槍，子彈準備要充足。他們幾十個人有相當的戰鬥力，少數部隊很難攔阻住。後來的事，如逮捕許、洪，毛主席又去釋放了他們等情況，多有文章記載，不再贅述。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謂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動我，找找當時的領導人，反映情況，我沒有答應。經孩子再三勸說，我說：「我誰也不找，如果要找，我祇找余秋里。」我寫了一個簡信：「余主任：你好！我在電視裏看見你身體很好，我很高興。我的孩子想去看你，反映我的情況，不要把你嚇死。我心中的苦比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的苦還要多二萬五千倍。致禮！邱會作。」我的大兒子路光找到葉帥的兒子選寧，選寧非常盡心，他先給楊尚昆（軍委秘書長）打了電話，楊的態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會議上反映一下情況，畢竟是到期了，應該由軍隊養起來。為了摸清情況，選寧又把路光介紹給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秘書長顧林昉，顧林昉正好是管這件事的，顧對路光說：「你爸爸到期了，理應安排，他們吃了苦頭，唉，正確對待吧。安排的原則就是原單位管，你爸爸的原單位就是軍隊。但是我們做了很多工作，總政就是不同意，給安置工作造成困難……」選寧又給余秋里（總政治部主任）打電話，余卻把選寧批評了一頓。對黨內鬥爭，我有思想準備，但對戰友之情的變幻，我沒有思想準備，此事我心裏著實難過了一陣子。相反，我另一個「同學」張震，在我一九八九年去北京時，專門在國防大學請我和胡敏吃飯，口口聲聲稱我是他的「老同學」，我不得其解，他說：「我們是抗大老同學呀！」他坦誠地說：「你做的事我管不了，胡敏落實政策我盡力管！」他當了軍委副主席後還給我送了不少治病的好藥，真是沒有白同學一場。

任軍委供給部長

一九三七年八月，由於缺糧，抗大二期學生開到甘泉、富縣一帶去就地吃糧，維持學習，把糧食吃完了就提前畢業。我在富縣突然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要我立即回延安去任職。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遵照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我軍將分兵深入敵後，在不同的地域上建立幾個根據地，各路軍隊的供給也將由各自根據地獨立辦理。為了適應這一形勢，中央軍委決定將原來軍委供給部一分为三：一批人組建八路軍軍需處，同國民黨聯勤司令部打交道，如領取八路軍的薪餉、物資，軍需處駐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葉季壯。另一批人組建八路軍兵站部，隨八路軍總部進駐太行山，部長楊立三。留在延安的供給部一攤子，仍為中央軍委的組成部分，但機構縮小了，張元壽任中央軍委供給部長，我任副部長。半年後，張元壽調新四軍當兵站處處長（亦曾稱總兵站部部長），我任軍委供給部長。不過具體的供應範圍縮小了，祇負責西北地區，華北的黃河以東至同蒲鐵路以西地區，以及內蒙古一些地區的部隊。

我擔任供給部長的前幾天，毛主席叫我去談過一次話。毛主席是從開玩笑說起來的：「恩來同志來電提議你任供給部長，這可是一個不好當的官呀。你不能滿足需要，是要挨罵的。你受得了嗎？」

我說：「挨罵的都是好人！國民黨天天都在罵共產黨，我們不就是好人嗎？」

毛主席笑了好一陣子後說：「我說的會罵你的人，不全是國民黨，今後有的好人也要罵你呀。」

我說：「那就請主席訂一條規矩，我們這裏誰罵人就讓誰當供給部長。」

毛主席說：「好呀，你這一條可厲害！我們的隊伍內有那麼一種人，祇強調自己的工作重要，看不起別人的工作，作風又霸道，怎麼辦？我們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問題。不能靠罵人來解決問題嘛。」

說完這段話，毛主席正式和我談開了，他說：你可以勝任供給部長，因為許多事你都是做過來的。現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別學會動腦子。任何人不管做什麼，都是腦子和手足的統一。比如寫字，好像是手在寫，事

實上是腦子指揮手寫的，做工作也一樣。對客觀情況加以分析，把複雜的事條理化，分出主次，組織實施，這就是組織工作。一個幹部的領導能力，最主要就是能夠正確反映客觀情況，周密謀劃和組織，能夠抓緊貫徹執行。

毛主席最後鼓勵我說：「你現在很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嘛，你就當個『牛犢部長』吧！」毛主席說著笑起來了，一旁的機要科長孫開楚也笑起來了。

陝甘寧邊區劃定為二十三個縣，都是貧窮落後的地區，豐年糧食持平，略有自然灾害就有大批人外出逃荒要飯。延安的工業祇有打馬掌等簡單的手工業，延長出產少量石油。

軍委供給部機關，下屬五科一處：會計科，科長廖靜民；出納科，科長（名字忘了）；軍資科（主管軍械），科長劉光明；糧秣科，科長高文智；管理科，科長楊居桃。政治處主任劉鎮，總支書記楊村，保衛特務員王金國。機關工作人員約五十人。

供給部的直屬單位有七個。

1、汽車隊。三十輛大卡車是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後，由國民政府配給的，擔任延安至西安的運輸任務，剛開始劉鎮是隊長。汽車隊是我軍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的，因沒有零配件，能開動的車慢慢減少了，最後剩下幾輛怕拋錨不能跑遠道，就分給延安的高級領導人作專車用，朱德、張聞天、王稼祥、高崗等人都分有一輛，毛主席用的是一輛救護車。

2、兵工廠。廠長郝希英長征前在就是廠長，兵工廠有三百餘工人，祇能修理槍支和鑄造手榴彈。

3、被服廠。有四百餘工人，廠長曾志賢是江西吉安人，在瑞金時是優秀工人。廠裏除少數踩機器的是男工以外，均是女工。被服廠擔負了全邊區部隊服裝的生產任務。劉志丹的夫人童桂榮就在被服廠工作，是被服廠的老工人，國家一直養著，解放後退休在北京萬壽路居住。

4、鞋廠。有二百多工人，祇能生產布鞋。

5、軍械庫。在延安西的高橋鎮，編制五十餘人。庫內存放的是歷次戰鬥繳獲的一些破舊槍支、洋鎗鐵錘等軍用品，就是這樣一些「軍械」也被看作是寶貝，不敢輕易處理。

6、驥馬運輸隊。這是從幾十頭牲口發展到八百多頭的隊伍，從一個隊發展到四個大隊的運輸大隊，是邊區最大的運輸力量。每匹牲口可以馱200多斤，匹匹飼養得膘肥體壯，一看就知道是供給部的運輸隊，當地老百姓很羨慕。

7、軍人合作社。主任孔祝三。

8、供給學校。有學員二百多人，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兼任校長，我兼任任副校長，耿萬福任教育長，主持實際工作。說起供給學校，我還想起一個故事。葉季壯的夫人馬露貞鬧著要上供給學校，當時要求上學的人很多，不好安排。葉季壯為了起帶頭作用，交代我不要讓馬露貞上學。馬找到我，我不好當面拒絕，就說給她寫一封介紹信，就可以上學。這封所謂的介紹信是給耿萬福的條子，我寫道：「葉部長說不要馬露貞上學，她去後你打發她回來。」馬露貞高興地去了，耿萬福看到條子，對馬露貞說：「收下你了，回去等通知。」學習都快結束了，馬露貞才知道真象，但為時已晚。多少年以後，馬露貞還罵我：「我一生不識幾個字，都是邱會作害的。」

在延安初期，軍委供給部同其他部門相比比較龐大，是實際工作最繁重的部門之一。這是我第一次獨立擔任軍委直屬機構的領導工作，感到壓力很大，但我畢竟祇有二十二歲，充滿了幹勁，什麼困難也不怕。我接任時供給部正是最困難的時候，但窮有窮的辦法，我一上任就採取了這麼幾招：

第一，出「安民」告示，亮出窮家底。

當時陝甘寧邊區軍委直屬隊（包括抗大）約三千人，留守兵團約一萬五千人，由供給部直接供應，但供給部沒有錢。我記得當時駐定邊縣的三十軍死了一個連長，要幾塊銀洋買副棺材，我們都發不起。那時部隊相當苦，每人每天祇有一斤小米或雜糧，要採野菜充飢，一年當中頂多能吃一、二次肉。紅軍和八路軍生活之苦，古今軍隊都少有。

部隊多數領導能體諒供給部的處境，但也有人不相信，認為是有錢不發，來吵吵鬧鬧的事常有發生。有一天，陳奇涵、陳先瑞、武亭三個人同時找我要錢。陳奇涵是綏德五縣警備司令，那裏是統一戰線區。他要上任，我發了一百元錢。他啼笑皆非，領吧實在太少；不要嘛，一文沒有，還是打了領條收下了。陳奇涵曾是黃埔軍校教官，大革命時的黨

員，又是我興國同鄉，我一直視他為兄長。但親是親，公事公辦祇能給他一百元錢。陳先瑞是七十四師師長（後改為警備二團），部隊駐洛川，也在統戰區。他來領餉，我發了二百元。他嫌少，怒氣沖沖地罵：「誰幾個月沒發菜金了，二百元夠個屁用！沒有錢就不要養兵嘛！」不想打僵條。武亭是炮兵團團長，也駐在洛川，但無統戰任務，我一文沒給。武亭說：「他們還領了錢，我一個子兒也沒有。這怎麼行？」吵了起來。陳奇涵硬拉著他們走了。滕代遠參謀長知道了這件事，找陳先瑞狠狠地批評了一頓，說軍委供給部確實沒錢。

我想，與其大家來吵，不如先發《安民告示》，說明沒有錢，這是敵人對我們封鎖造成的。告示一發吵的就少了。在那個艱苦的歲月，後勤幹部要受三重苦：一是和部隊一樣生活苦，沒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二是要受謾罵之苦；三是要委屈地受首長批評和責備之苦。但是我們再苦也無怨言。

生活如此困難，幹部就有思想問題，主要是平均主義。我們對毛主席的生活管得稍微好一點，就有人指責我是為了「往上爬」。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李六如也在會上指桑罵槐地說「供給部忘記了大眾利益」。我不吭氣，向毛主席報告要成立軍委審計委員會，建議李六如當主任。毛主席批准了。審計委員會成立之初，李六如興致勃勃地管事，這一下罵就朝著他去了，過了三個月他受不了了，提出辭職。

第二，賣破爛，應付急需。

當時雖然已經有了中央財政經濟部，但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是一箇窮家，我們不僅向中央財經部領不到分文經費，他們還經常想向我們借錢。實在沒辦法，我想到清家底賣破爛。我們把供給部值點錢的祇有幾匹老牲口和幾輛不能用的大車。統統賣掉，得現款數百元，用它解決了幾個比較大的問題。

比如，買了一批通信器材。軍委三局王諍局長發現延安城剩有一批通信器材，我批給他三百元購買了。對於我不發菜金買器材，不少人意見非常大。毛主席知道了，在召集各單位負責人開會時為我說了話：「今天請大家來開會，發不起菜金是問題之一。有人說供給部有錢不發，這不符合事實。他們最近賣了一點破爛搞了點錢，買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

之一，這個錢用得對。沒有菜金我們可以不吃菜，沒有通信器材，中央軍委就不能工作了。」毛主席把那些人的嘴封住了。

又如，衛立煌等國民黨高級將領來延安，毛主席親自接待，花了五十多元，事後他收到一封告我狀的匿名信，說「供給部有錢請國民黨軍官吃飯，但幾個月不發伙食費，供給部可能變為國民黨了……」毛主席在一次會上解釋說：「幾天前我接待了一批國民黨高級人員，引起了一些人不滿。客人是我毛澤東請的，罵供給部毫無道理。有人問為什麼過去戰場上的敵人現在成了客人，我說這證明革命的形勢發展了，一起打日本。大家對不發伙食費有意見，供給部是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我贊成實事求是。」

這次毛主席沒有發火。按著他的性格，搞到他頭上的事是要大發脾氣的。毛主席聽進了大家的意見，特地把我叫去說：伙食費還是要搞個規定好。過去我們祇發實物，現改為費用定額比較好。規定每人每天伙食費五分錢，上級沒有錢的時候，可欠賬，待到有錢時補發。我們的人唯一的就是能領到幾文伙食費，現在就規定它幾條：一是伙食費按規定發；二是今後欠的伙食費，由供給機關打欠條。有錢時全額補發；三是伙食費絕不准挪作它用，節餘的分伙食尾子。這是紅軍的制度，應當堅持下去。

我把毛主席交待的規定發佈了。雖是「空頭支票」，但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後來財政情況好轉，這些規定實現了。我軍從創建開始一直是以發實物的伙食管理辦法，這一次毛主席親自決定改為費用定額的辦法，是我軍後勤工作上的歷史性改革。

解決經費問題

為了供給部有進賬的錢，我們絞盡了腦汁，最後以辦實業解決了問題。

第一，開驛馬店。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從延長回延安，在東關看到驛馬店裏客人爆滿。於是我想開個驛馬店。供給部以前雖然沒搞過經營，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

我們開辦第一個驛馬店，每天約能賺二十幾元，利不算大，但天天有進賬。不久，我們又在城南七里鋪開了第二個驛馬店，規模和贏利比

中國的店還好。於是我在邊區裏一個一個店地開，開了二十幾個，生意越做越大。這樣，以驛馬店為依托的邊區的運輸線也建立起來了。主幹線有：從延安經較遠到山西西北部八路軍一二〇師為一條線；從延安到寧夏的鹽池為一條線；從延安經富縣到關中為一條線。為來往客商服務，幹部執行任務也可以住宿。全部驛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決了供給部的財政來源。為了加強領導，我們又把驛馬店、交通（郵政）與兵站三家合統稱兵站，對整個邊區的經濟，特別是通郵起了很大的作用。兵站這個組織一直保持到解放之後。

第二、發展食鹽。

鹽池到延安大約二百多公里，運到延安賣至少是三倍利潤，我們決定做鹽。

最初供給部祇有十多頭牲口運鹽，一個月頂多走兩趟，運二三千斤鹽。要把鹽業生意做大，就要銷出去。按那時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國統區運鹽是「賣敵」。而我們認為池鹽可換到西藥、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資，不能簡單地說成是「賣敵」。打破禁運互換有無，對瓦解敵人的封鎖有利，禁運是禁了我們自己。一九三八年四月，販鹽問題被提交中央財經部專門討論，李富春肯定了我的報告，但是同國統區發生經濟往來是重大問題，必須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

鹽業發展起來後，中央決定陝甘寧邊區成立鹽業公司，鹽業對邊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開辦軍人合作社。

軍委供給部開的軍人合作社在邊區影響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經濟「繁榮」的象徵，外來的人都要到合作社去看看。周恩來三八年春從重慶回來，專門叫我陪他去合作社看過。在延安，無論私人或公家的商號都沒有能與之相比的。

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雖然從數字上來說還少，但解決了軍隊很大的困難。三八年在大砭溝蓋的八路軍禮堂，是從合作社的盈利中撥款修建的。另外，總政治部每月還要從合作社盈利中拿出一點作領導幹部開銷費用。

通過以上努力，軍委供給部的工作有了相當大的改變，主要的是：有了一定的供應能力；建立了一些保證分隊，如運輸隊等；建立和加強了

相當規模的兵工廠、被服廠、鞋襪廠等軍事工廠，搞起了相當規模的生產企業，積累的資金有數十萬元之多。這些對渡過抗戰初期的困難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我們的生產中還有一個笑話。為了搞錢，我們開始生產人丹。人丹生產簡單，原料充足，價格低廉，屬於「治百病」的東西，因此銷路很好。這樣我們的歪點子也來了，除了正規產品外，我們在另一種產品中的原料裏用了樹皮，銷路仍然很好。有一天，楊梅生要去看毛主席，他很「神秘」地拿了一大包假人丹就走了，當我知道楊梅生拿著假人丹去看毛主席，嚇的我頭髮都立起來了，我拿了一包真的拔腿就去追他，我追上他，他把人丹抱在懷裏不給我，嫌我小氣。我把真相告訴他時，他的臉都嚇白了。我說：「你還不給我，把主席吃壞了，我們都上軍法處了。」我給他換了一包，他就看毛主席去了，他拉我一起去，我怕他嘴不嚴，沒有敢去，叮囑他一番才回去。

開展生產運動

我到供給部相當長的時期裏，按照我在中央糧食部時提出的方法，分地區自己籌糧。延安縣是分給軍隊的籌糧區，軍隊抽調三百多人、百餘匹牲口組成籌糧隊。當時抽調牲口最難。為了解決運力，規定所有的乘馬都要去運糧。毛主席把自己的牲口也送來了，這樣，有意見的也祇得服從。有了運力，很快就把籌到的糧食運回來了。能解決吃飯問題，大家都高興，沒人在這方面罵供給部了。

當時軍隊糧食來源有兩個：一是從西安運一部分糧食來；二是就地徵糧。後來國共關係緊張，西安的糧食斷了，徵糧也越來越困難，吃飯問題又嚴重了。後來偶然從軍委供給部軍械倉庫搞生產的實踐中得到啓示，發現可以「種地」（大生產的最早提法）解決問題。

這個軍械倉庫在延安西北高橋，有個五十多人。他們種了十幾畝麥子，畝產二百多斤，那時算是高產了。還種了三十多畝大秋作物，養豬十餘頭，牛四、五頭，羊三十多隻，還有一個菜園，糧食副食自給有餘。利用業餘空餘時間種地，對邊區部隊來說很新鮮，過去從來沒有過。一九三七年中秋節，倉庫主任要我去那裏過節。這裏的情況引起了

我的深思：除了有戰鬥任務的部隊之外，其餘的機關、部隊不是可以搞生產嗎？大家生活好了，精神狀態就好，工作就努力，當兵也安心。

我將高橋倉庫的情況向李富春匯報了。他非常感興趣，邊聽邊問，

最後高興地說：「這下可能找到一條活命的路了，你立即給我寫一個報告，向毛主席匯報。」

報告呈上去一個星期，毛主席和李富春叫我去談。毛主席一見我就說：「興國佬，你們的報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決的方法。」接著，毛

主席對生產問題講了一段很長的話。大意如下：

根據地的生產要提高到戰略的重要地位，否則我們可能不打而自滅。你們這個報告的價值在於說明了軍隊搞生產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條出路。我們的供應無非是四條來路：一是取之於敵；二是國民黨政府發給；三是人民負擔；四是自己動手搞生產。前兩項都靠不住，根據地人民負擔一定要有個限度，祇有自己動手搞生產是最靠得住的辦法。請中央財政經濟部對此很好研究一下，並向中央提出報告。軍隊和政府搞生產，可以這樣設想：三八年先小搞，從中摸索經驗，準備以後大搞。先從政府機關、學校、軍隊後方機關作起。

我們回去以後按著毛主席的指示進行了若干準備，一九三八年元旦後中央財政經濟部召集過一次邊區黨政軍負責人的會議，會議開始時李富春說：「今天請各位來，是開個特殊的會，不討論發糧發錢，而是討論各單位要種地搞生產。……」到會的人原想是來分配錢糧，有說有笑，一聽到這裏立即沉默了。接著李富春讓高橋倉庫主任介紹他們去年搞生產的情況和新一年的打算。大家對此根本不感興趣。

一見此狀，李富春說：「大家有意見可以提，但今年黨政軍機關都要開始種地……」這一下會場亂了，有人大聲說：「現在一天到晚紙吃兩頓清湯稀飯，餓得路都走不動，種地能行嗎？」「我們連一個鐵丁也沒有哪有鋤頭？總不能用手指刨地吧？」會場上一片反對聲，會議開不下去了。

李富春祇好抬出了毛主席，他說：「高橋倉庫的生產，毛主席非常讚揚，說他們帶了一個好頭，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毛主席指示，今年黨政機關都要開始搞生產，規模可以小一些，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要搞！」

一九三八年開春，延安各單位都搞起了生產，秋天有了收穫，但非常少。秋收後，中央財政經濟部對邊區黨政軍機關的生產進行了總結。會後，李富春和我商量，又給毛主席寫了個報告。

毛主席看到我們的報告後做了段批示，大意是：一九三八年生產沒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達到了目的，要從實踐中摸索經驗。這個總結提出沒有搞好生產的原因很對，但有一條沒說到，就是壓力太小。明年黨政軍機關（有作戰任務的部隊除外）祇發半年糧，不足的自己動手向地裏要。不想搞生產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飯，就可以不搞。

毛主席的指示對大家震動很大，對生產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中央的領導同志，從毛主席、朱總司令開始，都參加了大生產運動，中央領導同志也在家門口種菜，對延安的大生產運動是很大的促進和鼓舞。

一九三九年延安搞生產的氣氛和三八年大不一樣了，三九年的生產任務下達後，反對生產的話聽不到了，叫苦祇是個別的。通過努力，三九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軍隊生產的糧食夠全年口糧三分之二以上。地方的成績小一點，但也大大改善了。

為了準備一九四〇年的生產並對一九三九年的生產進行總結，中央財經部在年初召開了一個小型領導幹部會議，李富春的主題報告受到大家的歡迎。李富春認為我是搞生產的「發明者」之一，再三要我也講話。

我這兒回憶的是邊區大生產的開端。後來黨中央毛主席總結了各方面的經驗，發動了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就眾所周知了。

紅軍的艱苦生活是多方面的，穿衣和吃飯一樣，也是供給工作的難點。紅軍自成立起就沒有發放被服的制度與標準，有東西就發，沒有就不發。我從一九二九年當紅軍戰士到當供給部長的十年裏，從普通戰士成為領導幹部，我就從來沒有領到過被子。在南方時戰士們睡覺，下面鋪稻草，上面再蓋上稻草。那時後方醫院才有棉被。後來打土豪我搞了一床被子，用了很多年。紅軍除少數老戰士有兩套衣服之外，大多數是一套。夏天洗衣服時祇能光著身子，等衣服乾了再穿上，冬天乾脆長期不洗。每逢滅虱子，祇好光著身子躲在房子裏不出來。而穿襪子我是聽都沒有聽說過。紅軍在江西時冬天曾發過一件薄棉衣，從沒發過棉襪。春天棉衣變成祫衣，夏天祫衣變成單衣，直到穿襪子止。穿鞋更簡單，多數是自己打草鞋。

紅軍到了陝北寒區，要有「棉裝」才能過冬，要有鞋子才能行軍作戰，部隊的穿著成了生存和保持戰鬥力的重大問題。

紅軍的供應在初到陝北時是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自管的。陝北異常貧窮，要解決部隊穿著非常困難。一九三七年秋天，周恩來親自召集

會議討論部隊的冬裝問題。在一次軍隊和有關地方黨委書記的會議上，周恩來把製作冬裝做了佈置，具體到不僅分配有數字，對完成任務的時間也提出了要求。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裝，我們辦了三件事：第一是籌集資金。為了籌集從邊區外購進貨物的「外匯」，就必須賣出土產，陝甘寧邊區能賣出去的祇有池鹽、藥材和皮毛。但中央的政治機關不准我們與皮毛商發生關係，說這是資助奸商，有「資敵」之嫌。我祇好向周恩來請示，他不僅同意，還看得更遠，提出了要利用商人發展向邊區外更多的買賣。後來那幾個商人同我們合作了，從國統區進口布匹遇到敵人的嚴密封鎖，就是那些商人幫我們搞進來的。第二是採購布匹、棉花。當時陝甘寧邊區根本沒有布匹市場。農民是自紡自用，祇是在延安和綏德有規模很小的布店，其他各地祇有少量的土布在賣。所以布匹要從國統區買進來。我們在寧夏、隴東、黃河邊和西安方向設立了採購點，但買進來的布料很少。後來我們發現，商人們知道我們在大量採購，就囤積哄抬價格，我們和商人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強買強購，但還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周恩來下令國統區地下黨秘密向邊區運送布料，僅從關中的淳化就運進了幾百匹，很快就解決了問題。第三是加工冬裝。邊區的婦女幾乎都會做針線活，把布料分發了去，到處都是「被服廠」。一九三七年底冬裝按時製作好了，發放又成了問題。冬裝體積大，牲口馱運不方便，於是周恩來下令各部隊派人來背，成隊的士兵來背棉衣，這種供應方法是古今中外軍隊都少見的奇觀。

邊區的財經和供給工作

當時，中央已決定周恩來負責統一戰線工作，常常在國統區。周恩來臨行前，叮囑富春同志近期抓三件大事：一是抓緊向國民政府請領費用和物資，有多少算多少。此事用八路軍和邊區政府的名義，領到的費用和物資由中央財經部統一分配。二是對邊區財經工作實行統一領導，例

如成立邊區銀行，建立貿易公司等。三是貯備布匹和糧食，以我們的財力為準，盡可能多。

我當軍委供給部長時剛二十五歲，能把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離不開李富春對我的培養和支持。長征中李富春就注意我了，到了陝北，他力主要我參加邊區經濟工作。我同李富春的關係是在經濟工作中密切的，友誼也是在經濟工作中加深的。

按照我軍傳統，中革軍委對供給部的工作有指導責任，但很少有人過問。因為供給工作就是和困難打交道，過問我的工作就是要過問困難了。供給部工作中有很多具體事務，我祇好向李富春請示。他對我的工作特別支持，許多問題都是他親自和我商議決定的。他不僅在業務上支持我，在思想政治上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一九三七年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到李富春家吃年飯。那時我人事方面還不熟，李富春把曹菊如（財經部副部長）、鄧潔（中央財經委員會秘書長）等人介紹給我說：「恩來同志離開延安後，我們幾個人就是管中央財經工作的負責人。中央委託了我們，大家看著我們，我們就要負擔起來。今後財經部每星期開一次會討論日常工作，軍委供給部的業務也一起討論一併處理。」從此，向李富春請示工作成了我的常事。那天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李富春談到當前的困難時說，現在邊區的中央機關和軍隊有兩萬多人，吃穿是大問題。邊區就那麼一點大，養活不了這麼多人。延安的人大部分要到前線（後來稱之為敵後）去工作和搞飯吃，我們要向中央提出報告。後來黨中央提出的「到敵人後方去」的重大戰略方針，最初是李富春的建議，主要是政治動議，但也有吃飯問題。

李富春主持邊區的財經工作是很成功的。他辦事民主，喜歡用商量的態度處理問題。我向中央財經部的報告，如果是比較簡單的事，他立即就批回來，遇到比較複雜的，他找我面談後再處理。李富春聽匯報，無論是什麼內容，都耐心聽下去。他注重傾聽別人的看法，經過商量之後才說自己意見。他說話簡單，從無長篇大論和空談。在日常業務工作中，供給部同中央財經部也有不少矛盾，但祇要到了李富春那裏，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他的原則是按重要性來安排順序，先軍隊，後地方。李富春聯繫群眾廣泛，喜歡到下面的單位走動。他經常到軍委供給部來，有時有事，有時來吃飯。在那個艱苦的歲月裏，敢叫外單位的人來

吃飯，可不是一般交情了。李富春來，我總要伙房加菜，要是我們機關會餐或改善伙食，我打個電話他就來，對我毫不見外。

初到延安時，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尚沒完全形成，但李富春很注意用毛主席的指示來教育大家，我可以從他那裏聽到許多毛主席關於財經工作的想法和指示，作為我工作的依據，有些至今還記得。

那時毛主席說，財經工作很重要，但又常常不被領導注意。不善於領導財經工作，歸根結底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中央規定軍隊的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第二項就屬於財經工作。有人認為中央成立財經部沒有多少事可做，是不正確的。我們要做的事多得很，祇是現在還沒有開展。毛主席提醒我們，領導財經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手」和「口」的量和比例，這是決定政策的根據。比如邊區有 150 萬人，卻有 20 至 30 萬非生產人員，壯勞動力祇有 25 至 30 萬人。一個勞動力要養活五個人還多，這麼一算就知道群眾負擔之重了。我們剛到陝北時多收了九十萬擔公糧，群眾就要「讓雷公打死毛澤東」，這還不是群眾負擔過重，實在受不了才那樣說的？對中央財經工作部成立之初的工作，毛主席說最基本的方針是「開源節流」。不過現在早「斷流」了，菜金幾個月都不能發，無「流」可節了。開源的方面，還沒有真正開始，但又非得從這方面做不可。大家都不想種地，但是到了活不下去那一天，人們自己就會去種地的，因為人總想活著。歷史上李自成在陝南種地活下來了，我們比李自成總要高明一點吧！

早在延安時代，李富春就很注意經濟計劃。當時邊區各部門每年都搞財經年度計劃，但實現不了。因此，大家對此都不感興趣，但是李富春有獨特的見解。他說，我們處於被敵人四面包圍的之中，在戰爭環境中搞財經計劃，學習的意義大於工作的意義。通過搞計劃，我們大體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數，需要與可能這個尖銳的矛盾就能夠認識得比較清楚，就是主動地去認識客觀事物。一切事物都有數量限度，雨水多了會成災，少了呢？也照樣成災，不多不少叫做風調雨順。搞財經工作對數量關係要很明確。我們邊區財經計劃的依據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1、人少土地多。邊區祇有 150 萬人口，土地很多，農業有前途。2、經濟落後。很多地區比刀耕火種好不了多少。3、文化落後。文盲佔人口中絕大多數。4、敵人搞經濟封鎖很厲害。5、長期戰爭，群眾負擔很重。因此，

邊區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一是保肚子，不能餓死了；二是保屁股，不能光著身子。保住了這兩個就能活著幹革命。邊區現在還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但要用計劃去指導經濟活動。

李富春提出的在經濟工作中要有計劃性、要實事求是的觀點，當時並不為人重視。新中國成立後，李富春成了全國經濟工作和計劃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的這些思想對新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抗戰初期的國共兩黨合作

回憶我們初到陝北的經濟工作，不能不提及國共合作時國民政府的供給。

一九三六年初，剛到陝北的中央紅軍出擊山西（東征），後來又向寧夏、甘肅出擊（西征），都有戰略目的，就是求生存。沒有地盤就沒有飯吃，無法生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造成了中華民族存亡的危機，使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發生了日本發動對上海侵略的「上海事變」，促成蔣介石與我們黨達成協議，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並開赴山西，在閻錫山為司令官的第二戰區對日作戰。為了適應同國共合作和八路軍深入敵後的需要，我軍供應機構的變化很大，我們組建了以葉季壯為首的八路軍軍需處，常駐西安，向國民黨政府的請領或報告，都由軍需處承辦。國民政府對八路軍供應的編制數，最初為兩萬五千人。所領的經費、物資，由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統一分配，八路軍軍需處承辦，中央軍委供給部只能分到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以前，由國民政府供給的糧食、物資和軍需品，大部分運往山西供應前方作戰部隊，我們駐在陝北的後方部隊只能分到很小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後，由於日軍打通了同蒲路，向前方的運輸中斷，國民黨政府供給的糧食和軍需物品便大部分運往延安了。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兩年多的時間裏，我軍駐西北部隊的困難相對比較小。

全面抗戰開始後，延安吸收了數以萬計的學生，相當多的人是由汽車隊從西安運到延安的。另外，三九年以前國民黨聯勤總部發給八路軍的糧食也由汽車隊運到延安。但由於管理維修不善，這批汽車逐漸損壞不能用了。那時一些地方軍閥對我們也有過支援。當時新疆軍閥盛世才

曾對我黨表示友善，贈送了一萬五千件大衣，對我軍是很大的幫助。我們下發大衣的時候，留下了一些好的皮大衣給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志。我為李富春留了一件，但祇有大號的，李的身材小，我就為他改做成一件小皮大衣。我給富春同志送去，他穿起來後左顧右盼，非常滿意地說：「我以前從來沒穿過這樣好的衣服，看來這一件夠我穿一輩子了！」抗日戰爭高潮剛開始的一九三七年底，王明從蘇聯回國了，他一下子從極「左」變成了右傾。當時黨內不少人對國民黨有幻想，認為國民黨力量大，有軍隊，有政權，有盟國支援，這為王明的右傾路線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紅軍編成八路軍時，國民政府發了一些國民革命軍軍銜指標，不少人很看重它，爭軍銜，不但爭有無，還爭高低。在國共合作較好的時期裏，黨內看國共合作好的表面現象多了，右傾路線又一次在黨內蔓延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評了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確定了我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不久，高級幹部就開始傳達學習會議精神。

李富春向中央機關各部門負責人的傳達是在延安清涼山最高一層石窯洞裏。在那裏開會，主要是防止日本轟炸。我文化程度不高，但理解能力和記憶力比較好，特別是鄧潔給了我一份李富春的傳達記錄，那裏有毛主席的講話，文件我長期保留著，至今還記得幾處要點：

1、要堅持獨立自主。這是同國民黨合作的關鍵，毛主席說，「別人要問：『你們共產黨是利用抗戰來壯大自己的力量。』發問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點點頭，要是別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沒有人民力量的發展就沒有全民抗戰！』」

2、要建立抗日根據地。過去，我們有根據地就能夠粉碎敵人的圍剿，丟了根據地祇好長征。現在又有了根據地，就有群眾、有軍隊。我們懂得有根據地的好處。現在我們要到日寇的後方去，那裏日本人管不了，蔣介石不敢去，那裏就是我們的了。

3、要執行持久戰的正確作戰方針。我們以遊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這是量力而行，從敵我軍事力量對比提出的。遊擊戰能發揮我軍的優勢，有利於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我們到敵後，從開始就要想到最後勝利。我們要在戰爭中積蓄力量。

4、要搞好陝甘寧邊區。我軍主力應到敵後去，不要留在邊區。國民黨佔領延安、佔領邊區都能辦到，但把我們趕走辦不到。敵人呆在延安城，我們就在七里鋪。祇要我們不犯錯誤，邊區丟不掉。

形勢不出毛主席的預料，國共兩黨合作沒多久就冷了。我們從國民政府得到物資供應本來就少，從一九三九年秋天起，形勢發生了變化，東西更少了，再下去就沒有了，祇有「空頭支票」。後來「空頭支票」也沒有了。

抗日戰爭開始之初，我們曾經幻想過從國民黨政府那裏得到軍隊的供給，也確實得到過一些。但我們早就有意識地著手自己解決物資來源，早有了準備，所以形勢變化，國民政府的供應中斷的時候，引起的困難就比較小。後來，我軍到敵人後方去建立了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由那裏的人民養活。而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我們不僅活下去了，而且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第七章 華中三年

中央財經工作團

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中共山東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大意）：山東膠東地區是一個群眾基礎比較好的根據地。該地區較富足，海運發達，這裏進口日貨，可以取得大量稅收。因為財政幹部缺乏，山東的財政經濟工作尚未健全起來，建議中央派一批財經幹部來山東開展工作。以我們估計僅把膠東的稅收工作建立起來，每月就可以為中央籌到五萬到十萬（法幣）的款子。

毛主席和中央財經部的領導人李富春對山東分局的報告很感興趣，李富春自己都想去，因為我們的財政太困難了。毛主席當時還沒有下決心，他認為把票子搞到延安來，什麼東西都買不到，毛主席認為多搞「通貨」來比較好。毛主席還對李富春、鄧潔和我說過，你們去山東搞票子好呢，還是在延安種小米好？這時山東分局有來電催問此事，李富春就給中央打了報告，大意是：同意山東分局向中央提出的報告，準備派一個大的工作團去山東，由李富春、邱會作、鄧潔帶隊，預計工作兩年。爭取向中央輸送比較充裕的現款和「通貨」，雖然我們面臨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和經濟封鎖，但在邊區周圍，尤其是西安、山西方面還是可以買進東西的。另外從自身的財政角度來說，也應考慮為召開七次代表大會準備所需的經費。

一九四〇年一月間，適逢周副主席在延安，他很重視中央財經部的報告，並向主席提出李富春不能離開，派邱會作帶工作團去山東，限期工作兩年，還是要回延安工作的。

我離開延安之前，毛主席同我談過兩次話。

頭一次談話，主要是談財經工作問題。毛主席說：「你們是以中央財經工作團的名義去山東，從政治上來說，你是可以勝任的。從業務工作來說，你們祇能叫財經工作學生團。……我們的黨打仗、搞黨的建設、搞統一戰線都還可以，搞財經這還是不很行的，這是我們全黨都要開始的新課題。你們到山東去，要向資本家學習，向日本人學習，我們應該造就一大批有作爲的財經幹部。……你就是個農民子弟，過去飯都吃不飽，還懂什麼財經？但是你這個人天資比較聰明，也就是說有一副小科學頭腦，工作努力又好學，是可以學會財經工作的。」毛主席的談話一直對我鼓勵很大。

一九四〇年初，中央組織了一個近百人的財經工作團，準備去山東，由我任團長。我們的工作團以軍委供給部的幹部爲主，記得還有謝勝坤、謝錦文、李建亭等同志。

臨走前毛主席又叫我去，主席說：「你去搞點經費回來，你是能搞得到的，具體工作不談了，到洛陽請少奇同志跟你談。」在談話中主席也講到對彭雪楓同志的讚賞和一些擔心。主席說：「你替我轉告彭雪楓兩個問題。一是，他不願深入到津浦路以東去，是不能求得發展的，祇能成爲日本人和蔣介石的哨兵，面向西爲日本人放哨，面向東爲蔣介石放哨。這樣是不能建設鞏固的根據地的。二是，要多團結多聯合人，排斥張愛萍是不對的。我的話你要原本帶給彭雪楓，希望他在實際鬥爭中改正自己的錯誤。第一個問題，他自己不改正，敵人會強迫他改的，終究是要到路東去的。」

因爲當時是統戰時期，我們就直接到了西安，準備坐火車去，也開了通行證。國民黨表面上講統一戰線，實際上下面處處刁難，等了幾天才允許我們走，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

到了洛陽後，我去少奇同志那裏請示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和少奇同志說話，少奇同志很和藹，說話也很嚴謹，他講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和華中地區、新四軍的情況，也講到對彭雪楓同志比較重的話。現在想起來，這是少奇同志和三軍團彭德懷、彭雪楓、黃克誠的一些歷史淵源有關。我向少奇同志匯報到搞經費的問題，少奇同志才第一次笑起來，他說：「你可能刮不到多少油水。稅收問題也不是很容易。」

淮北往事

我們到達豫東永城縣六支隊所在地後，準備去山東。在那裏我以過路「客人」的身份轉達了毛主席給彭雪楓捎的話。他聽了以後倒還冷靜，但不很高興。他說：「毛主席的話事關重大，除我之外不必和任何人說。」我立即回答：「我絕對遵守黨的紀律。」後來，事實教育了他，一九四一年春，湯恩伯把四師從路西趕到路東去了。

這時，正好發生了安徽太和縣殺害從延安來的十多名幹部的事件，我們去山東就幾乎不可能了，再說隴海路有敵人密集的封鎖線，還要通過很大的國民黨統治區。少奇同志叫我們留下，可能有去彭雪楓那裏摻沙子的意思。我則感到那裏情況複雜，想先到山東去轉一轉。主席知道這一情況，立即來電報，叫我們去蘇北：

雪楓會作並告胡服：

蘇北為最富庶區域，部隊亦最多。邱會作及其工作隊必須即赴蘇北，不得不顧全局，延誤時間。

毛王朱
二十七日（一九四〇年五月）

我們帶去的幾十名幹部就在豫皖蘇分配了工作。這時，彭雪楓也找到我，拿出了主席的電報。後來我才知道，彭是不希望我走的，主要原因是怕我透露出去毛主席對他的批評：

胡服雪楓並告會作：

邱會作等決留華中幫助財政經濟工作，並代中央籌款。今後每月可幫助中央若干款項望即告軍委。

毛王
九日

從主席的電報看，我們的任務還是「代中央籌款」，另外就是決定我們「留華中幫助財政經濟工作」。在戰爭年代沒有部隊做依托是站不住的，我即向中央請示。主席很快就來了電報：

雪楓同志：

(1) 最近你們打擊敵偽有許多勝利，而頑方正佈置進攻你們。請即將勝利消息，擬成通電，用新聞密拍來，以便轉蔣程衛，要求獎勵；反對頑方進攻。(2) 你處財政收入，有無大希望，如邱會作等留你處工作，每月可供給中央好多數目，望告邱等暫在你處待命。

毛王
十三日

這樣我就被任命為豫皖蘇邊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依托在四師。四〇年秋天，黃克誠率三四四旅南下去蘇北組建三師，中央同意留下劉震一個旅開闢蚌埠西北的根據地，湯恩伯大量進口日貨的通道被我們控制，我們立即組織淮上地區的稅收，開闢財政來源。在淮上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的稅收工作，每月能搞到數萬元，甚至十餘萬元。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現金不便集中保管，全師旅以上幹部的乘馬，常常是攜帶現金的地方。我們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績，曾決定向延安輸送三十萬元。

彭雪楓對我們到四師來並沒有思想準備，彭雪楓以為我很快就會走，並沒有在四師安排我的工作，新四軍軍部幾次調我去，彭雪楓沒有同意，讓我給供給部長謝勝坤同志當政委，後來把孔石泉的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長，讓給我一個小的，我就兼任了組織部長。



一九四〇年，新四軍六支隊部分領導。左起：蕭華東

四一年春，路西失敗，我們損失很大，劉震是十旅旅長，滕海清是十一旅旅長，他們認為應兩個旅合起來，集中兵力和敵人作戰，彭則讓他們各打各的，讓敵人幹掉我們不少，四師被趕到路東去了，毛主席對彭雪楓的預言成了現實。路西失敗也不可小視，中央、華中局和少奇同志有意將彭調走，由三師副師長張愛萍來當師長，張愛萍認為這樣並不利，堅決不來。在少奇同志的催促下，陳毅同志親自與彭談，讓他到軍部去當參謀長，彭則堅決不肯去。四一年底，華中局決定派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任四師政委兼淮北區黨委書記，鄧來了不久，即在洪澤湖以東的仁和集整風，總結路西失敗的教訓。

四師的問題有一定的嚴重性，有人提出路西失敗是「小皖南事變」，收編的地主雜牌武裝，沒有解決「槍換肩」的問題……等等。整風會議之前鄧子恢與我談了一次話，鄧首先說：一，你不能到軍部去，這裏工作需要。二，這裏工作相當困難，要團結更多的人，才能開展起來，靠原來他們幾個主要領導開展不起來。三，要敢於鬥爭，要有點衝勁，把問題端到桌子 上來。接著鄧子恢又轉了話題，問我對路西失敗有什麼看法。我就按照毛主席給彭雪楓稍話的精神講了我的意見（我對毛主席批評彭雪楓的話一句也沒有說），鄧聽後很驚奇，他說：「你的思想水平之高我沒想到，我很讚賞。」然後他說：「你把剛才的看法寫成一篇發言稿，對大家會有啓發，能把問題提高到執行路線的高度。」

我寫了一個發言稿，題為《在敵後堅持持久戰》。主要講了三個內容：一，敵後抗日根據地與統一戰線。二，夾縫中的戰略問題。三，建軍的黨性原則。我的發言稿都是根據毛主席對彭雪楓的指示精神做了聯繫實際的闡述。鄧子恢看到我的發言稿甚為稱讚並親自做了補充和修改，並指定要我發言，我說：「我基本上是局外人，送給你發言稿就算交差了吧。」鄧即問我有什麼顧慮，我說不能沒有顧慮，雖然是總結路西失敗的教訓，我感到後面還有較深的領導幹部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吃不準，你發言說的是東，別人會理解為西。鄧向我做了解釋，然後對我說：「你就算奉命發言，一切後果和責任在我身上。我們是對事不對人，對革命負責任。」

我對四師的情況瞭解是不深的，在四師的幹部會上，我的發言對全場有一定的震動。我的發言肯定使彭雪楓十分煩惱。

我的發言確實使我不便繼續在四師工作了，我也的確不想留在四師，後來，我和彭雪楓碰面都幾乎沒有單獨談過話。我向鄧子恢政委提了兩條要求：一，還是去新四軍軍部分配工作。二，把我調到地方上去搞財政經濟工作，當時還根本不敢提回延安去。鄧向我解釋說，這樣辦都不好，不利於團結。到了四三年初，中央為了保存幹部，適遇大批幹部要回到延安去，我也提出了回延安的要求。彭雪楓先入為主，表示同意我的要求。鄧子恢政委雖然不同意，但不好提出與彭相反的意見。於是同我說：「你提出回延安，我同意你回延安的原因是共同的，這就是我們的黨性原則。」我以愉快的情緒回答說：「我理解你的話的意思。」鄧最後說了一句：「你先走，快要開七大了，對孔石泉和你都還有政治上的考慮，以後你會知道的。」我是輕鬆愉快地回延安的。

主席對彭雪楓是很器重的，不幸的是他在四四年九月在戰鬥中犧牲，英年早逝。彭雪楓文武雙全，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優秀指揮員。對於彭雪楓的犧牲我是很悲痛的，胡敏則大哭一場。

從四師回延安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後，中央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就是：「保存和培養幹部。」從一九四二年起，各根據地就逐漸將幹部送到延安「保存培養」去了。這一決策對解放戰爭起了重大作用。

從新四軍四師一起到延安去的幹部共十三人：政治部副主任孔石泉，政治部民運部長康步雲，司令部機要科長馮賢駒，副科長周漢英，衛生部長林土笑，抗大四分校訓練部長藍儔，政治部主任張明河，九旅團政委蔡明，十二旅副旅長黃思佩，蕭縣縣委書記李砥平，供給部駐淮南某部政治處主任賀恩寬。除了康、周、林、藍、賀等五人未婚之外，其餘都結婚了，都是夫婦同行去延安的。胡敏當時懷孕已經三個月了，師部還派了一個牲口專門送她過隴海路北，這可以說是很照顧的了。

我們從安徽到延安是一次艱苦的行程。一九四三年三月間，我們從安徽的泗縣半城鎮出發，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到達延安。究竟走了多少路，無法計算，但走了一年又一個月的時間。我們經過安徽的淮北、山

東、晉冀魯豫、晉西北等解放區。通過隴海鐵路東段、津浦鐵路魯南段、平漢鐵路、同蒲鐵路中段等日本鬼子

大的封鎖線和記不起名稱的很多小的封鎖線。通過這些封鎖線基本上是夜間偷過，或化裝公開過兩種方法，都是在當地解放區軍隊的嚴密組織和派人護送之下通過的。從組織工作的角度來說，是有安全保證的；從敵情的角度來說，是沒有

安全保證的。據我所知，各根據地送去延安的幹部數以千計，都沒有發生過大的問題，這無疑是極大的成功！

我們一過隴海路，就聽到新四軍三師去延安的幹部在海上遇難了。後來才知道他們遭到日本軍的攻擊，三師參謀長彭雄，七旅旅長田守堯等當場犧牲。濱海軍區對我們通過微山湖區是特別慎重的，因為這個封鎖區的縱深是相當寬的，要連續兩三天的行程。

第一天黃昏，我們從路東的抱犢崮山腳下出發，經過一個通宵的急行軍到第二天才到佛山後的秘密交通站。途中偷過了三道封鎖溝，每條溝有四、五米寬，行程約180里，在途中連續走了約二十小時都沒歇息過。我這個還是年青力壯的小伙子，走得都前腳帶不動後腳，幾乎祇剩下半條命。這天行軍，因胡敏有身孕，交通站還特別給她備了一條毛驥。那條驥子特別通人性，對胡敏是幫了大忙的！

我們到了預定的休息地點棗莊煤礦南面的佛山後，我們剛進房子躺下槍聲就響了，而且越響越厲害，像有戰事。我祇好命令大家向山上走，警衛員招呼胡敏走出房子，也向山上走，佛山後是一個石頭山，爬上一步都要費很大的勁，我正在爬山的時候，我同孔石泉商量：「什麼情況也不知道，往哪裏去？走還不如抵抗好。」他同意我的意見，於是就集合了幾個警衛員準備打仗。正在此時，交通員回來了，說什麼情況也沒有，聯絡沒有搞好，是發生了誤會，我們總算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我們很早就從佛山後出發，到津浦路同棗莊鐵路分叉的鎮子上才吃了早飯。今天的路並不很遠，中午就到了微山湖東岸。這裏沒有房子，儘是一些草棚子，有很多的漁民。那天晚上永遠不能忘記的就是跳蚤多得使人難於相信。我一進草棚子，兩條腿上就密密麻麻的一片黑，立即向棚外跑，問房東怎麼辦？他說，有辦法。房東端了木炭火進去，跳蚤就自動跳進火盆，一時吱吱咋咋響了好久。

第三天，是通過微山湖封鎖區的最後一道封鎖線。這一天要通過日本鬼子一個有五里路長的崗樓群，通過敵人崗樓群的時候，事先交通員交代說：「祇跟著走就是，不要說話。」接著我們三人就在敵人崗樓下面左彎右轉的。我不僅看到崗樓上敵人的太陽旗，也看到了日本鬼子的相貌，敵人對我們根本不理，連話也沒有問過一句，我們就勝利通過了敵人崗樓群。這樣也就基本上通過了整個的封鎖區了。這是我們到延安去最危險的封鎖區。後面的封鎖線，都比這容易過了。

我們到了冀魯豫解放區，深深感到這裏是被日本鬼子摧殘得最厲害、最嚴重、最殘忍、最無人性的一個地區。對全區的情況我不瞭解，以我親眼看到的有如下幾個不堪回首的事。

(一) 堅壁清舍。過了微山湖封鎖區之後，不管是小莊子，還是大莊子，都空無一人，至多也祇能看到個把老人。後來才知道，敵人的漢奸隊專門在夜間進村抓人和姦淫擄掠。日本鬼子對偽政府抓勞工是硬指標，限期抓不到，就要他們自己的子弟抵數，因此，漢奸隊抓勞工就特別兇惡。為了躲避抓勞工，白天群眾有聯防，晚上就祇有到野外地窖裏睡覺，老百姓把糧食裝在缸裏，埋在野外。老百姓特別痛恨和害怕的就是強姦。日本鬼子是禽獸，對女的不管老少都強姦，還有特別不能使人忍受的是，漢奸隊抓到了年青媳婦和姑娘，都是集體輪姦。日本鬼子欠下了老百姓數不清的血債！

(二) 一罇子血。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對濮陽縣根據地掃蕩的時候，在這個村子曾過吃了八路軍和民兵的虧，鬼子死傷不少，日本鬼子就決定對老百姓報復。第二天拂曉就突然回來包圍了村子。把老百姓強迫集中到街上廟門口，結果不到半小時之內被敵人用機槍打死四百多人。倒在死者屍體群之內的倖存者祇有三人！街上鮮血像水一樣的向低處流。他們用罇子把死者的血裝上一罇子，作為對全體死者的悼念。

我們請三位倖存者講一罇子血的情況，沒有一個人能講到底就會哽咽講不下去，我們聽的人多數都哭泣不成聲。我在發生這個慘案的村子裏親自受到了教育，並向死者鞠躬致哀！我們大家都進一步具體地認識到了日本鬼子的罪行。

從冀魯豫到太行山是比較容易走的，祇要一過平漢路就到了。到了太行山，回延安最艱苦的階段就基本上過去了。

過平漢路後，我們在安陽市最熱鬧的地方吃的中午飯，晚上的就到了林縣交通站。由林縣再走一天就到了一二九師師部住地，以後就不要交通員領著走了。我們在一二九師師部祇住了一天就到麻田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總部駐在上麻田，我們住在下麻田招待所，相隔約半里路。在麻田經過十多天之後，我們四師同行的人，才先後到齊了。

我在八路軍總部認識很多人。但我除了同總部參謀長滕代遠、總部司令部一科副科長何廷一、二局錢江局長有聯繫之外，同其他任何人都是沒有聯繫過，不是十分熟悉和知已的朋友，我是不會找別人麻煩的。

滕代遠參謀長對我很好，我到了第二天就到招待所看我。何廷一是我到的當天就來看我了。第三天，滕代遠叫我去談過一次話，他說了在延安時期的一些歷史情況，並想留我在太行山當兵工部部長。因為我對兵工方面的業務比較生疏，對工作沒有把握，就婉言推掉了他的留任。

八路軍對過往的幹部都比較熱情接待，尤其是從敵後回延安的幹部有困難總是盡力解決。彭德懷向新四軍二師和四師的幹部做過一次時事報告，介紹了晉冀魯豫的情況。他講話之後，請大家吃了一次飯。每人半斤肉的標準，吃一個燉湯菜和一半白面一半粗糧的花卷。朱德、彭德懷、滕代遠等負責人陪著大家一起吃。這頓飯，吃的很親、很甜、很香，這是我軍的光榮傳統！

由於胡敏產期臨近，我就陪她生下孩子再走。同路的黃思佩的愛人連佩珍也是要生孩子，我們就結合一起走。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們的大兒子就在麻田西北約三十里的隘峪口野戰醫院出生了。因為孩子是在回延安的路上生的，故取名曙光。胡敏生孩子前自己挺著大肚子去敲醫生的門，醫生嚇了一跳，扶她回醫院準備接生。我就在醫院陪著她，但我什麼也不能做。我當時也患了病，躺在胡敏生孩子的隔壁房裏，動也不能動。胡敏剛生下孩子，她自然也不能動。兩個都不能動，祇有心相通就是了。

胡敏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得到日本鬼子掃蕩的情報。醫院要把所有產婦都送到山上去分散在各個石巖洞裏。一片山祇有一個招呼的人，連飯也不能保證吃上，我要同去醫院又不准。怎麼辦？祇有聽天由命了！胡去了，我們都是在戰爭的艱苦條件下生活的，她對艱苦從來都沒有過一

句怨言，我們之間的關係，在工作上是戰友關係，在家庭生活上是兄妹關係，從來沒有吵過大架。半個多世紀以來，經過很多坎坷和曲折，我們的生活真是長長流水，一直到現在川流不息。

路光的上面還有一個女兒，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生，是左齊同志接生的。孩子出生之後，由於戰事緊張，環境惡劣，連個名字都沒起好，就寄養在安徽省懷遠縣以西的龍亢鎮老百姓家裏，孩子長到五歲就病死了，孩子自出生一場，是日本鬼子和戰爭造成的，責任不在父母，我們祇有一句話對不起孩子。

胡敏生路光也是苦不堪言。當時連小米稀飯都吃不飽，要想吃別的東西是千萬不可能的，坐月子就是過難關。還算好，有滕代遠送的一隻公雞，老戰友錢江送給我一個搪瓷缸（還沒有把），這就是胡敏坐月子唯一的補養佳品和用品了。現在有了大兒子路光，又在回延安的途中，當時我們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

要把孩子帶到延安去就非有一個運輸員不可。我向滕代遠寫了一個報告，要求調給我一個運輸員，得到了批准，老戰友何廷一在總部特務團給我選調了一個班長鄭繼忠。這個同志非常好，他是路光最好的保護人，沒有他路光可能不會長大成人。後來，在十多年的時間裏，鄭繼忠成了我們家的生活總管。鄭繼忠同志於一九五五年從武漢來北京開會時發心臟病去世了，我永遠懷念鄭繼忠老戰友！

到綏德

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胡敏生孩子還沒滿月，我們就繼續向延安走，當時條件好多了，孩子裝在一個籃子裏，有老鄭挑著，但胡敏還是不行，孩子還沒滿月，胡敏就開始行軍，落下了走路腳板疼的毛病。我則親自給孩子洗尿布，爲了幹得快，我一隻手拿一塊，邊走邊抖，有時頭上還頂一塊。在文水，交城進入晉西北解放區八分區。

我們從八分區到過黃河要通過山西嵐縣一條封鎖線，路光剛生下來，啼哭是難免的，負責經委工作的藍橋同志告訴胡敏：「過封鎖線時要用雙手放在孩子的脖子上，孩子一哭祇能掐死！」胡敏雖然淚流滿面，但還是照做了，因爲孩子一哭，敵人發現了，大家都活不了，孩子自然也活不了。封鎖線要在晚上通過，當時已經霜凍了。我同胡敏一共祇有三

條褲子，她滿月不久，我就讓她穿兩條褲子，我穿一條。我的孩子祇有一床很薄的被子，怎麼辦？祇有借兵站的一件老羊皮大衣了，這一下孩子的御寒的問題解決了。過了黃河後，我真不想還回大衣，但自己畢竟是個老後勤了，公家的東西不能隨便要，正好有回兵站的人，我把羊皮大衣托人帶回去了。

過了黃河就到了陝甘寧邊區了，大約十月間就到了綏德，我們住在城南的七里鋪。我被留在綏德工作了半年多，才到延安去的。中央組織部在綏德設了一個處理委員會，主任是李井泉，秘書長李樂光，我和新四軍三師一個旅的衛生處長李永春留在處理委員會工作。處理委員會的任務是，對敵佔區回來的幹部進行處理，主要去向主要是分別送到中央黨校一、二、三、四部學習。由綏德到延安還有一些具體的行政事務也是要辦妥的。胡敏帶著孩子先回延安了，為了養活孩子，我唯有兩件「寶貝」，一支舊鋼筆和一隻破舊手錶，我把手錶賣掉了，換到三千元邊區票子。

一九四四年四月間，我到了延安，進黨校學習。本來對延安並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變了，變化最大的是大家都豐衣足食，物質生活豐富，精神狀態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幹部，大家都在精神煥發地攻讀馬列主義，整風學習。我到延安是頗有收穫的。

第一，我看到了中央黨校搶救運動的痕跡。大砭溝口，有臨時監獄，陶鑄的夫人曾志和葉帥的夫人危拱之就關在那裏。我在黨校校部還看到過曾志被捆綁在樹上被打的死去活來的慘狀。這些都是搶救運動的結果。

第二，我參加了黨校的兩條路線學習。經過學習，對黨的路線有了初淺的認識，這對我以後的鬥爭，特別是對毛主席思想的理解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第三，邊區的生產發展起來了，享受到了延安的豐衣足食。中央黨校能夠集中數以千計的幹部到延安學習，也是在有飯吃的條件下，才能辦的事，我在黨校學習就沒有吃飯問題的顧慮。

黨校的生活也是不錯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顯的對照。抗大時期幾乎天天吃不飽飯。現在，黨校不僅有飯吃，而且吃得比較好。早飯是小米稀飯，中午晚上都是小米乾飯，二、四、六中午還有

白麵饅頭。副食，早上有自做的鹹菜，中午和晚上都是兩菜一湯。菜的數量也比較豐富，對填飽肚子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戰鬥作風

我的老伴胡敏（原名叫胡秀英，參軍後改名爲胡芝敏），一九二一年出生在陝西長安縣一個赤貧家庭裏，從小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她三歲喪母，五歲開始和其他窮苦夥伴一起挖野菜、揀垃圾爲生，從而被西安的紅十字會收進難民所，邊做工邊學識字。十三歲到陝西省立醫院當清潔工。一九三六年五月，在陝西地下黨的領導下開始做革命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對日寇的侵略採取的是不抵抗政策，蔣介石搞的是「攘外必先安內」，對長征到達陝北的紅軍進行「圍剿」。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終於釀成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爆發以後，胡敏和省立醫院的進步青年、教職員工，義務爲從抗日前線轉送到省立醫院的傷病員進行救護，敷藥喂湯；同時他們與西安的民眾相呼應，走上街頭，搞宣傳，作講演，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地下黨組織西安的醫護人員，組成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到前線去要與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胡敏是醫療隊十四人中的一員，一九三七年十月奔赴山西八路軍總部，參加了八路軍，在前方野戰醫院工作。三八年組織上送她到延安紅軍衛校學習，三九年，胡敏剛滿十七週歲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和胡敏三九年十月在延安結婚，四〇年，中央決定成立西北財經工作團，我任團長，到各戰區去爲開黨的七大籌些款，我們就到蘇北去了，後來留在新四軍四師工作。胡敏在四師司令部衛生所當所長兼醫生，她當時祇有二十歲，工作充滿革命熱情，任勞任怨，不知疲倦。工作之餘還去教戰士們唱革命歌曲。彭雪楓同志很賞識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戰鬥作風。

胡敏在四師有三件事是值得回憶的。

搶救陳銳霆。陳銳霆同志（解放後任炮兵副司令員、五機部副部長）在國民黨軍隊任旅長時已經是共產黨員，一九四一年，他率部起義，把部隊拉到新四軍來，這是一個壯舉，陳銳霆同志是有大功的。陳部晚上

宿營已在四師附近，沒想到陳部有些反動的基層軍官，發現陳的意圖，甚至陳的副官也是蔣軍嫡系人物，他們決意殺掉陳，再跑回敵軍去，他們摸到陳銳霆的屋子裏，用刀猛捅陳幾刀，陳的腸子都出來了，這幾個傢伙說：「用電筒照照，看死了沒有？」陳急中生智，把肚子上的血，立即抹到臉上，摒住呼吸，敵人一照認為陳死了，就帶一些人跑了。

彭雪楓得知消息後，立即派胡敏去搶救，胡敏去後，立即將陳的腸子推回腹部，嚴嚴實實包紮好，胡敏又去檢查頭部，祇見滿臉血，沒有傷口，陳銳霆用微弱的聲音說：「頭部沒傷。」胡敏叫來擔架，親自壓住陳的腹部把他抬上擔架。經過一段治療陳銳霆恢復了健康，胡敏為此也受到立功表揚。陳銳霆是個非常講情義的人，一直到建國後，祇要見到胡敏，必稱胡為救命恩人。尤其是我們被打倒之後，不論在什麼環境，他見到胡敏仍稱胡是救命恩人，這真是難能可貴。

搶救劉瑞龍。一九四二年有一天，彭雪楓接到告急報告說：劉瑞龍主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後是農業部副部長），因工作過度勞累，暈倒了，要趕快去搶救。因胡敏出診去了，彭雪楓找不到胡敏，很是著急，就叫警衛員先備好三匹馬，胡敏剛回到司令部去見彭雪楓，彭的警衛員一把把胡敏抱到備好的馬上，策馬飛奔淮北行政主任公署。彭在馬上著急的對胡敏喊：「你到哪去了嘛？！我們要去救劉主任，劉主任啊！」胡敏到後就給劉瑞龍嘴對嘴的做人工呼吸，掐上嘴唇的人中部位，並打了強心針，慢慢劉瑞龍甦醒了……。彭雪楓的臉上立即轉陰為喜。

在回去的路上，胡敏體力不支，下馬請彭雪楓先走，自己靠到一棵樹下喘粗氣，這時彭才想起胡敏已經是有身孕的人，彭感動地說：「哎喲，你胡醫生是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我們的模範共產黨員。」當時，正值中秋節前夕，彭雪楓專門給胡敏送了兩塊月餅。

在四師的評功大會上，胡敏被評為模範共產黨員，彭雪楓專門在獎給胡敏的日記本上題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送模範共產黨員胡芝敏。彭雪楓」鄧子恢政委題詞是「戒驕戒躁，再接再厲。贈給模範共產黨員胡芝敏。鄧子恢」。

我們回延安時，彭雪楓專門給胡敏贈送照片，鼓勵胡敏努力奮鬥。並說：「我們延安見！」解放後建好軍事博物館時，總政專門來人索取這張珍貴的照片，胡敏痛快地捐贈了。

忍痛拋子。一九四一年，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大女兒出生了。當時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醫生也很少，孩子剛滿月，胡敏毅然地把孩子送到老鄉家寄養。彭雪楓知道此事後甚為感動，他握著胡敏的手說：「我佩服你的革命精神！」我們四二年回延安時，組織上不讓帶孩子走，實際上也見不到孩子了，因為四師的師部已轉移，我們離孩子的寄養地已經很遠了，臨走前她不能去看孩子，自己哭了一夜，她畢竟是一個祇有二十一歲的年輕母親。全國解放後，部隊打到廣西，胡敏千里迢迢去尋找女兒，不料女兒早已病故。房東老鄉對胡敏說：「孩子臨死前，我對她說，我不是你親媽，你親媽是個當兵的，孩子點點頭就合眼了。」胡敏悲痛欲絕，當即昏了過去，醒來以後，她一直喃喃地說：「孩子連個名字也沒有起就死了，真對不起孩子。」我聽到胡敏的話，心裏也很難過。

因為胡敏是個醫生，在戰爭年代每天忙於工作，晚上還要照顧孩子，是非常辛苦的。一九四六年在承德，胡敏因工作勞累發高燒，沒有見效的藥，正好有孩子要出生，胡敏竟自己給自己打了一針獸用的盤尼西林，撐著病身子去給戰友接生。這一針可嚴重地損害了她的身體。

一九五五年胡敏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三級解放」勳章。

解放後她仍然積極工作，努力奮鬥，幾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地工作，沒有休過一次假。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災害、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胡敏經常下部隊，走到哪裏都要做憶苦思甜的報告，鼓勵青年人艱苦奮鬥，積極向上。六五年，胡敏主動響應中央的號召到寧夏農村搞四清，一直和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胡敏就是這麼一個好同志。在「九一三」之後，因為我的關係，也被打倒，關押了八年之久。還送到勞改農場去監督勞動三年，最後「三開除」（開除黨籍，開除軍籍，開除公職），每月祇發三十元生活費，歷盡艱辛困苦。就是在這麼含辛茹苦的日子裏，胡敏在農場還常常在晚上給群眾治病，贏得了群眾尊敬和愛戴。

一九八一年，經解放軍紀委書記黃克誠的關懷，對黃、吳、李、邱的夫人落實政策，黃、吳、李的夫人都較為順利地恢復了黨籍。總後黨委也擬同意給胡敏恢復黨籍，總後政治部也給胡敏談了話。但總後專案組和總後司令部把持復查工作的造反派（胡敏在總後司令部辦公室任主任），極力阻撓給胡敏恢復黨籍，經常指著胡敏的鼻子訓斥，非叫她承認

不實之詞和莫須有的東西。胡敏絕不拿原則做交易，拒絕強加給她的誣陷之詞。事後，軍委紀委的一位同志對胡敏說：「阿姨，四位夫人，你的錯最少最輕，反而祇有你沒有恢復黨籍。」



一九三七年，胡敏（後排右一）在八路軍前線野戰醫院。



一九四五年，胡敏（左）與當年在西安地下領導下參加革命活動時的戰友在延安重逢。



一九五二年，胡敏在廣州任軍區總醫院小兒科主任。



一九四八年冬，胡敏與方塊字读书社区 <http://book.sinozi.cn>



一九六〇年，胡敏任解放軍通信兵部衛生處長。



一九六三年，胡敏在軍委會通信部工作。



胡敏晚年。

第八章 參加七大

在中央黨校學習

一九四四年四月間，我開始進中央黨校二部學習。二部主任張鼎丞，副主任安子文。在二部是在十六支部學習，大約幾個月的時間就搬到一部去了，搬到一部就編入華中七大代表團學習了。

我到十六支部後，就是支部負責人之一。黨校的部以下就是支部，支部是黨政合一的組織，支部統管一切。二部就有十六個支部，我們是二部最後一個支部。這個支部的學員，大體上是敵後各根據地來的幹部、中央機關來的幹部和高級幹部的老婆，各佔三分之一。毛主席兩個弟弟毛澤民、毛澤潭的媳婦錢希鈞、賀怡都在十六支學習。邵式平、張鼎丞、陳賡、賴傳珠等等的老婆也在十六支學習。十六支別稱「新聞支部」，其意是知道的消息很多。在十六支可以聽到很多在別處聽不到的事。無論是中央的大新聞，延安各個機關的「小」新聞，甚至某些高級幹部的桃色新聞都應有盡有。在十六支學習的女同志，她們的臉皮比男同志還厚，沒有她們說不出口的話。

黨校學員的生活很簡單，在學習方面，沒有教員，也沒有書本，幾乎每天都在「自學」。每天下午一開始討論，三、五成群的在一起吹牛皮，這是最愉快的事了，學習、生活上都是輕鬆自由的。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學習生活又是豐富多彩的。學員的典型事例多得不可勝數。陳賡在軍隊幹部中很有威望，傳奇很多又充滿英雄氣概，他的老婆傅涯又在十六支學習，大家對他的談論也就最多的了。

陳賡交白卷。一九四四年入黨校學習的人，都要經過文化測驗，以做編班的根據。

一天，我按照校部的通知，到食堂去參加文化測驗。陳賡坐在頭排的中間，我坐在第三排。我一進考場就看到了陳賡坐在那裏，手裏拿著一支鉛筆，慢慢地在桌子上輕輕的敲著，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大官參加文化測驗。

主持測驗的人剛發完測驗卷，還沒回到自己的坐位上，陳賡就交卷了。陳賡交卷時，還說了一句帶有「拜」的什麼話。事後才知道，他說的一句英語，是再見的意思。主持測驗的人，看到陳賡是交的白卷，有一個人就趕到門口去大聲叫：「陳賡同志，你為什麼不測驗就走了？回來參加測驗後再走！」陳賡還是用英語說了一句「拜」，就揚長而去了。

測驗卷的內容是什麼？我都記不全了。現在還記得兩條：一是我們黨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是什麼？二是我們國家最後的五個朝代叫什麼名稱？這兩條我都回答出來了。其餘的條文，我知道的也回答了。

陳賡交了白卷，他見人就說，大家聽了，也總是哈哈大笑。事情也巧得很，自從陳賡交了白卷之後，進黨校學習的人，再也不要參加什麼文化測驗了。後來進校學習的人，也都感謝陳賡的白卷交得好，為大家反掉了一個進中央黨校的「關卡」。

陳賡背老婆過河。陳賡在黨校一部學習，他的老婆傅涯在二部學習。一部和二部隔著一條延河，延河在秋冬之交時，常常發水，膽小的人則不敢徒步。黨校在延河上架了簡易的水面橋。並且還是獨木橋。稍微發點水就不能行人了。一個星期六，陳賡在河邊上叫傅涯去過週末。傅涯回答：「水大過不了河，不回去了。」陳賡就說：「你下來，我背你過河。」傅涯和同房的四個人都是一部的家屬，她們都一起下去了，四個女人走到河邊，陳賡果然把她們都背過去了。

陳賡背老婆過河的事很多人看到了，笑聲話語多得很。這件事也傳到毛主席那裏去了，為此主席對黨校有批評，這才引起了黨校的注意。於是，黨校在三天之內，就把原來的老橋改造了，一般的水情也可以行人了。陳賡背老婆過河的佳話，在延安城都傳頌開了，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讚揚陳賡！

陳賡反霸道。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有個秘書，大家都叫他小秘書。有一次大家一起把那個小秘書如何霸道的事實同陳賡說了。他聽大家說了之後，祇說了一句話：「那個小秘書會吃人！」

正巧，當天晚上黨校禮堂有文藝演出，黨校一、二、三、四部都發了票。但票上沒有坐位號數。演出之前，小秘書把前五排正當中的凳子都放倒了，意思是這些座位留給黨校負責人坐的。

陳賡走進禮堂時，正好有四部來了好多學員，沒有地方坐了。陳賡就帶著他們到放倒的凳子那裏，並笑著說：「這裏沒有人坐了，你們就坐在這裏。」

不久，小秘書領著校部的負責人彭真、黃火青等和他們的家屬來看演出了。小秘書一進門看到留下的坐位，別人已經坐了。他立即跑出門外去同正要進場的彭真等人說明了情況，要他們等一下再進場。小秘書又進場來，就指著坐在留下的位置上的人說：「你們是哪個部的？這是給負責人坐的位置，你們立即讓出來！」坐在那裏的人，既不動也不說話。

正在吵的時候，從外面進來一個警衛員同小秘書說：「秘書長（黃火青）叫不要吵。他們都回去了，不看了。」那位小秘書也跟著出去了。

事後，小秘書很快就知道四部學員佔坐位的事，是陳賡「搗的鬼」，他要把管閒事的人整一下。第二天，小秘書就在禮堂門口出了一張告示，主要內容是兩條：一條是罵管閒事的人是「哥爾洛夫」（據說是蘇聯的戲劇名稱，可能是指擺資格的人），一條是警告：管閒事的人「不要多管事」。陳賡看到告示之後，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演出繼續進行，禮堂前面倒下坐位凳子的情況也同前天一樣。陳賡晚飯後手持一條棍子，站在禮堂門口等小秘書的到來。那位小秘書果然大搖大擺地來了。陳賡看到小秘書，開口就問：「禮堂前面昨天和今天倒下那些凳子是你幹的嗎？」

小秘書：「是我幹的。怎麼樣？」

陳賡：「不怎麼樣，我們到副校長那裏講理去！」陳說完後就伸出手去拉那位小秘書。小秘書便跑到禮堂出門的地方，站下來又說：「我們要多少坐位，你管得著嗎？找副校長講理，我不怕！」

陳賡這一下火了，小秘書看到陳賡火氣很大怕真挨打，他就跑出大門，向山上彭真、黃火青入住的地方走去了。小秘書還邊走邊說：「管閒事管到我們這裏來了。」

此時陳賡火氣更大了，他跟著小秘書的後面攆去了，小秘書一頭鑽進彭真宿舍去了。陳也跟著攆進去了。陳賡一進彭真宿舍的外間，立即

指桑罵槐地說：「七大還沒有開，中央委員還沒有選，就擺那樣大的架子。每次演戲都要留幾十個坐位，把你們祖宗三代都叫來，也用不著那樣多的位子。整風光整別人，對你們自己整到那裏去了？」彭真聽了陳賡的話之後，就知道陳為什麼發火了。第二天的下午，彭真親自召開和主持全校支部書記會議。在會上彭真宣佈：「某秘書工作作風不好，現在宣佈決定撤消其秘書的職務。」會議祇開了半小時就散會了。

彭真宣佈撤職其秘書之後，一部的人看到陳賡，都向他翹起大拇指！凡是七大代表都向他表示：我一定在你的名字上面劃上一圓圓的大圈！陳賡對讚揚的人除了有時說一句：「亂彈琴」之外，對多數人都是以微笑作回答。陳賡在幹部中，特別是在老幹部中威信是很高的。他祇要看到的事，例如：新從敵後來的人，進不了一部的大門，在中央醫院看不上病，家屬來一部吃不上飯等等，陳賡司令員都管，而且能夠管到實處。

整風與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六月十一日七大閉幕，會議開了五十天，記得開了二十次全體會議。七大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共計為七百五十五人。代表黨員一百二十一萬人。我們黨在七次大會時，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黨了。七大有八個代表團（中直、軍直代表團，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晉綏代表團，晉察冀代表團，晉冀魯豫代表團，山東代表團，華中代表團，大後方代表團），我在華中代表團。

記得七大開幕式是任弼時主持的，他有很精彩的開場白：「中國人民感覺到祇有共產黨把他們從痛苦中拯救出來，他們把我們的黨看作是驚濤駭浪中的舵手，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我們黨身上，寄托在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身上。在二十四年的奮鬥過程中，我們黨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同志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在開幕式上，毛主席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報告總結了我黨二十四年的革命經驗，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提出了今後黨的任務和方針政策。這個報告對全黨是極大的鼓舞。後來幾天，朱總司令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

報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副主席作了關於統一戰線的報告。

記得七大一結束，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就發表了社論，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以來最盛大的最完美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確，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和統一了全黨，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表明我們黨已經走向成熟。毛澤東同志在開幕式上的《論聯合政府》和閉幕式上的《愚公移山》兩篇偉大的報告，武裝了全黨的頭腦，為建立新中國準備了條件。七大的確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以我的政治經歷來看，七大代表在歷史上是榮譽最高。當時，爭當七大代表的風氣簡直籠罩了整個延安城。

第一、對自己沒有當上七大代表發洩不滿。有些人向中央領導人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領導人寫信，那些信是罵人為目的。華中有幾個幹部聯名寫信給華中代表團團長陳毅，這封信就充分反映了這種情緒。陳老總是個胸懷很廣的人，他把這封信在華中代表團公佈了，信的主要內容還記得一些，比如指責陳毅看不起工農幹部，說：你現在喜歡的是所謂知識分子，對工農幹部根本不放在眼裏。你還記得吧，你上井岡山時，同毛主席，朱總司令下山去接你的是誰？殺豬歡迎你的又是誰？後來在你指揮下打仗流血的又是誰？我們這些人都沒有用了嗎？你常常說，知識分子是革命的，沒有知識分子革命就不能成功。這些話就算你說的是對的，那麼，你為什麼不說，工農幹部也是革命的，沒有工農幹部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

第二，決心討飯的。有個三軍團參加平江暴動的xxx當不上七大代表就給彭德懷寫信說：我下決心討飯，去丟共產黨的臉。我是跟著你從平江暴動出來的，現在連個七大代表都當不上，我沒有前途了。爲了此事，彭德懷大罵他一頓後，又苦心做工作，才把要討飯的人教育好了，沒有產生不良影響。

第三，要求退黨。沒有當上七大代表就要求退黨的，不是個別的人，這些人多數是四方面軍的幹部。他們向劉伯承司令寫信說：你是我們的領頭人，現在向你說點心裏話。我們打仗不比別人差，但我們抗戰以來不能當指揮官，祇能當管理科長了。現在要開七大了，我們四方面

軍的幹部，祇有為數不多的代表，也就是裝點門面的代表，我們祇有要求退黨。這是非常消沉的情緒，在七大之後，中央對四方面軍幹部的作用，提起了注意。

第四，要棺材費。沒有當上七大代表的人思想，真是無奇不有，要棺材費的人也有。有五個人聯名向朱德寫了這樣一封信。他們信上說：「我們參加革命十多年了，現在除了身上的傷疤之外，其餘一無所有。我們要求回家種田，臨走時要求發給一副棺材錢就很好了。」這種人的情緒，比要求退黨的人還消沉。沒有當上七大代表的人的思想表現，確實是複雜的。這也可以看出，當時黨內的思想複雜了。

黨的七大是在黨的整風運動中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召開的。七大的勝利召開與整風的成功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我是一九四四年的四月才到達黨校的，整風運動已基本結束，我對整風運動的情況，是在四四年下半年，學習兩條路線時才接觸的。周恩來在我們華中代表團做了報告，對我學習兩條路線起了重要作用。華中代表團絕大多數都是在整風快結束的晚期到達延安的，沒有參加整風學習。為使全體代表受到整風教育，陳毅團長特請周恩來向代表團作報告。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周恩來在華中代表團對整風的問題做了長篇報告。以我的回憶，周恩來講了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我祇對後兩個問題還記得起來一些。他說：我們黨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之後，我犯了兩次路線錯誤。一次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路線錯誤，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投降路線的錯誤。這兩次路線錯誤都使黨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在左傾路線錯誤時期，蘇區的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九十；在右傾路線錯誤時期，發生了皖南事變。對這兩次錯誤路線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糾正的，才使我黨能夠勝利向前發展。兩次路線錯誤，我都負有重要責任，是錯誤路線的決策者之一。他又說：這次整風運動，從開始毛主席就提出了總的目的就是要解決路線問題，毛主席提出的路線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沒有這樣一條路線，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所以失敗，最主要的是犯教條主義，把馬列主義當成了教條，這不是馬列主義的過錯，而是教條主義的過錯。馬列主義不同實踐相結合，祇記得書本上的話是一點用也沒有的，依靠它來制定路線就一定失敗。我們黨內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是反馬列主義

的錯誤。周說：毛主席提出的整風的方針，是搞通思想，團結同志。不搞通思想團結不起來，我們的團結是在思想一致的基本上的團結。毛主席說過，張國燾要是自己不逃跑，思想又通了，我們還會團結他的。在整風中，換幾個人容易，但沒有什麼用，還是團結不起來。祇有思想一致的團結，才是真正的團結。周恩來說：在整風運動中，毛主席提出了「思想入黨」的問題。什麼叫做思想入黨？周恩來的認識是（大意）：一，入黨為公；二，堅持實事求是；三，遵守紀律；四，服從領導。他說：在整風中，毛主席幫助了我，救了我。我對不起毛主席，毛主席十分對得起我。我怎樣報答毛主席的恩情？我的決心是：永遠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永遠服從毛主席的領導，永遠當毛主席的學生。我的話能說到就能做到！周恩來的講話是在熱烈掌聲中結束的。

會場集錦

七大是在延安楊家嶺中央禮堂舉行。中央禮堂是為開七大建造的，祇能容納七百至八百人。我們坐的帶有靠背的條凳，覺得坐得很緊的。

第一，大會的氣氛。在我的記憶裏，大會整個的氣氛是親切、熱烈、融洽、自然。我連續參加過黨的七次，八次，九次大會，使人記憶猶新的還是七次大會。

七大代表極大部分都住黨校一部。一部到楊家嶺會場約五百米遠，我們去回都是走路的，代表們在往返途中和食堂裏，都是有說有笑的，我當時還祇有三十歲出頭，我們有幾個籃球朋友，每天下午都是打球，再到食堂去吃飯。

在會場上，我多次看到周恩來、朱德、李富春等人，在開會之前都在會場上同代表隨便閒談。我也同周恩來、李富春閒談過，他們並且還約我在楊家嶺小食堂吃過兩次飯。有一天，我們幾個人看到了毛主席的機要秘書葉子龍，我們向他提出要去棗園看看毛主席。在我們提出之後的第三天，我就得到了去棗園的通知。我們一起到達的有我和白如冰、孔石泉、陳光（長征時期毛主席擔架班的班長，他當時在黨校五部學習）。我們四個人一起同毛主席共進午餐。毛主席首先舉杯說：「歡迎大家，乾一杯！」然後，毛主席又拿著酒瓶，走到我們每個人的面前，給我

們每個人都斟了一杯酒，並且說：「你們在敵人的後方鬥爭，很辛苦，敬你一杯酒！」江青來見了一面，但沒有同我們一起吃飯。

在餐桌上，毛主席除了問問敵後的鬥爭情況之外，主要說了開會的問題。主席說：「我們這次會議，可能開成一個成功的大會。但現在祇成功一半，大會可以制定出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還有一半就是選出一個好的中央來，這就叫做組織路線。祇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沒有正確的組織路線，我們的鬥爭還是不能成功的。」稍後，毛主席又說：「在會場上有股議論說，犯過路線錯誤的人，不能當中央委員。這種思想是不對的。我們如果不選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當中央委員，就要輪到我們犯錯誤了。我們大家都要做說服工作，要選犯過路線錯誤的人進中央委員會。」

第二，討論毛主席的政治報告。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是寫好了文稿照念的。對這個報告都是一致擁護的，這是對毛主席的信任和擁護。我參加革命之後，隨著政治思想水平的發展，我向來就是信任和擁護毛主席的。就是「九一三」我下臺之後，我仍然是信任和擁護毛主席的。信任和擁護毛主席與能夠看到毛主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是不矛盾的，關鍵是我們怎麼看待這些缺點和錯誤。

在我們代表團討論毛主席的報告時，有位代表發言說：「我看聯合政府不好。我們陝甘寧邊區已經是三三制政府，再把國民黨請進來，就成了四四制了。」他發言之後，會場上略有笑聲。陳毅立即站起來說：「這位代表能夠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很好！我們就要這樣討論。毛主席提的聯合政府是我們國家的政體，也就是政府的組織形式問題。」陳的積極解釋，又加深了對問題的理解。我們代表團中代表的水平是相差很遠的。從職務上來說，有高級幹部，有普通幹部。老實說，對聯合政府的理解，我當時也是說不清楚的。

另外，在討論到除奸政策時，有位代表發言說：「除奸要十分穩重是完全正確的，左傾教條宗派在江西蘇區殺人太多了。」他這一句話震動了全場。不少代表接著說：「殺人多，殺得慘，把許多好幹部都殺掉了！」有的代表說：「在內戰時期，老根據地的人口減少了近百分之二十。人哪裏去了，戰爭犧牲是主要的，但我們自己殺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許多好幹部都是自己殺的呀。我們對鄧發的肅反政策很憤怒！」

全場還正在發言的時候，當時就有幾處哭開了，有的還大聲邊哭邊述說。對保衛局殺人的事，絕大多數人都可以說出最殘酷的例子來。例如，有位代表說：「一九三四年秋，我們三軍九師部隊有個連長，上午打仗負了重傷，腿打斷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連長拉去殺了。因為腿斷了不能走，硬是兩人拖出去殺了。」這個例子，真刺動了人心。全場呈現出哭的、擦眼淚的悲慘景象。

對殺人的問題，有的代表大聲疾呼地說：「我們要求追查鄧發的責任！」他的話音一落，全場此起彼伏的發出「同意」的聲音。會議結束時，陳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說：「我們今天的會提出了對過去殺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代表團一定向大會主席團報告。」平時散會時，大家都是很活躍的，今天多數人都心情沉重地走出會場。

過了兩天，毛主席親自到我們代表團來講過一次話，毛主席指示說：一，被錯殺了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們悼念他們；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將來革命成功時，我們應在當地為他們恢復名義，並以烈士對待；三，肅反問題是錯誤的，是路線問題，不是某個人的問題，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鄧發的責任問題。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大家沒有再提出新的意見。

第三，大會發言。在大會上發言的人很多，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各根據地的負責人都在大會上發了言。有做專門工作的幹部也在大會上發了言，如當時的中央機要科長李質忠就在大會上發了言。在許多人的發言中，林彪、劉伯承、李富春、周恩來等四人的發言，對我的印象最為深刻。

林彪的發言。他的發言的中心內容講的是根據地建設和群眾觀點，歸根到底講的是群眾路線問題。他說，我們一切工作的起點和歸宿點都要為群眾的利益著想，這才是真正的群眾路線。我們在工作中，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其中要害的一定是有違背了群眾的利益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十分注意和用大力糾正的問題。

群眾利益是很現實的問題。離開當前的利益，專講看不到的遙遠的利益是不行的。我們應該盡可能的做到當前利益與遙遠利益結合起來。他說，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根據地，組織民兵放哨，同生產結合在一起，這就把當前利益同將來利益結合在一起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應當把對敵鬥爭和生產鬥爭緊密結合起來。

軍隊戰士有無當前和將來利益的問題呢？有的。我們打仗當然是人民將來的利益，因為推翻反動統治，是要經過長期打仗才能達到目的。但我們在戰鬥中，減少傷亡就是當前利益了。現在有不少部隊搞軍事民主，並且搞的很好，這就是同戰士的當前利益緊密結合起來了。戰士們知道打仗是會有犧牲的，但他們也懂得，「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是可以辦得到的。這就是軍事民主的基礎。其實，群眾基礎說到底就是群眾利益的問題。

林總在會上就講到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問題，記得他講到：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主要就是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馬列主義。

林彪是軍事家，打仗的人，專講群眾路線，這實在是很引人注意的問題。他在發言的時候，不僅臺下的人專心致志地盡心聽他講，臺上的毛主席也聽得很入神，不斷地發出讚賞的笑聲，待講完時還拍了手。

劉伯承的發言。他的發言是專講「百團大戰」的問題。他說，百團大戰在軍事上沒有取得很大的勝利，或者說是得失相等。在政治上吃了大虧。保護了國民黨，暴露了自己，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掃蕩。

他說，毛主席對敵後鬥爭的方針，在政治上是發動群眾，佔領地盤；在軍事上是開展遊擊戰爭，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總起來說，就是擴大力量，準備反攻。百團大戰是違背了這一方針的。

他又說，國民黨是反共第一，抗戰第二。我們打百團大戰，吸引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更大的力量對到我們自己身上，國民黨的壓力反而小了，他的反共氣焰更高了。

李富春的發言。他的中心內容是什麼，我可記不起來了。不過他在發言中，說了一個「候補」的比喻語，則引起了全場大笑。

他說，他在六次大會，被補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屁股上插黨參——後（候）補」。他講這句話時，還一字一板的講的清清楚楚。他的話引起了滿堂大笑，臺上的毛主席也笑出淚水來了，一個勁地用袖子在眼睛上擦。

李富春同志向來同群眾的關係很好，他講話又很幽默，大家都願意聽。他講的「候補」的故事，後來廣為流傳。這是大家都喜愛的一則政治笑話。

周恩來的發言。他的發言的基調，同他在華中代表團的報告基本上是一致的，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

他說到王明的教條宗派，對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的時候，他流了淚，一時說不出話來。他這種嚴肅的認真的態度，贏得了全場的熱烈讚揚！

他是最後說了三個永遠：「永遠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永遠服從毛主席的領導，永遠當毛主席的學生。我的話是說得到應當做得到！」他的話有很深的教育意義，也取得了大會對他的更大的信任。在七大之後，周恩來就幫助毛主席進行複雜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指揮全國解放戰爭。

選舉與閉幕

選舉在七大是很活躍的一個階段，發生過令人難忘的故事。

對候選人的審查。七大中央委員會地的選舉是先由主席團提出候選名單，交由各代表團逐個反覆進行審查，在正式選舉之前，再由主席團提出新的候選人名單。當時實行黨內民主還是很認真的。如曾鏡冰，是在討論中由代表提出來的，曾鏡冰七大代表都不是，也沒有特殊的功勞，他被選為七大的中央候補委員。解放後此人在福建，後來被冤枉了。

主席團最後提出的候選名單，同代表團提出的名單差別是很大的，名單基本上是由主席團最後審定的。當時對王明的教條宗派主義，大多數人從路線的高度來認識是並非很深刻，但對他們脫離群眾的作風是特別痛恨的。尤其對王明的官架子和王稼祥的訓人、罵人的壞作風特別痛恨。王明，王稼祥兩人在華中代表團是始終沒有通過的。

七大的正式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分兩次選舉。同時在選舉之前，還通過了正式委員落選的人，選候補委員時再選。

由於兩王落選了，毛主席的心情很不安。他在選舉結束就對大會發表了講話。主席說：王明，王稼祥同志落選了按照我們黨章的規定是正常的，但我還是要說點意見。他們是犯有錯誤的，但還是要叫他們到中央委員會來。這不是少了他們兩人不行，而是革命的事業需要他們進中央委員會。我建議大會要延長兩天才閉幕，我們主席團還要討論再選王明、王稼祥的問題。

毛主席除了在大會上講話之外，第二天還到我們代表團來講話（據說，毛主席到所有代表團講過話）。毛主席在代表團的講話是既嚴肅又有感情。毛主席很嚴肅地提出了：「選王明和王稼祥同志進中央委員會，是黨的利益、革命事業、黨的團結的需要，不選他們對各個方面都是不利的。他們犯過錯誤，但他們可以改正錯誤。我們不選他們就要輪到我們犯錯誤了。他們兩個都是好同志，我要求大家仍選他們兩個進中央委員會！」毛主席在講到王稼祥時，是很中肯的，他說：「大家知道遵義會議對中國革命是關鍵的會議，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站在正確的立場上，遵義會議不會開成功，我們不要忘記他們。」我們代表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指示，保證選王明、王稼祥進中央委員會。

第二次選舉開始之前，毛主席又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講話的內容，同在代表團講話的內容大致差不多，但對「選王明、王稼祥進中央委員會」則以宏亮的聲音連著講了兩遍，並說：「我要求大家選他們倆進中央委員會。」說完之後還向大家連連招手。第二次選舉，王明、王稼祥都當選了。王明為正式中央委員，王稼祥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大共選出中央委員四十四名，中央候補委員三十三名。李富春和蔡暢雙雙選為中央委員，我很高興，散會時我去和富春同志握了手。

閉幕式。七大專門舉行了閉幕式，毛主席向大會致了閉幕詞。同開幕式的政治報告一樣的，也是照稿子念的。毛主席在開幕式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及《愚公移山》的閉幕詞，這兩個報告都很好，鼓舞人心，激動人心，充滿勝利信心。

毛主席的閉幕詞，講「愚公移山」故事的情況時，口氣還比較平穩，但一講到「我們不怕敵人！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們一定勝利！」此時，口氣就很大，感情豐富，頭上的筋都鼓起來了。這是勝利的宣誓！當時，還沒有經久不息熱烈鼓掌的習慣，但我記得會場上也有掌聲，也有叫聲，也有站起來說話擁護的，全場上熱烈氣氛幾乎到了就要沸騰的程度！我個人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坐立都不是！大會在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

閉幕之後，接著就是全體代表合影。大家都非常喜氣、高興地參加了照像。在照像的過程中，同陳慶開玩笑是最精彩的了。陳慶當選為

候補中央委員之後，幾天以來同他開玩笑的人很多，大家都叫他「屁股上插黨參」或「候補」。照像那次算是最熱鬧的了，不少人，有的拿一支小棍子，有的拿一塊小石頭，有的乾脆用手向陳毅的屁股頭插去，並且還邊說：「來，再給你補一下！」搞的陳毅招架不住。他為了避免「災難」，他就有意向毛主席、朱總司令、周恩來等人附近靠近。毛主席知道大家同陳毅開玩笑，他也笑起來了，並且說：「這是富春同志的發明！」

打回老家去

七大之後不久，大約是六月就開始選調南下工作的幹部。

一天，我被通知去中央組織部開會，參加會議的有邵式平、張鼎丞等人。在會上，邵式平把我向彭真做了介紹，他點頭說：「名字早知道，富春同志曾要他來中黨校做副秘書長。」彭真看了我一眼又說：「現在就不是做副秘書長了，要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會議開始後，彭真首先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說：毛主席決定要向南方發展，這是對抗日戰爭正確路線新的發展。過去我們祇強調了深入日本佔領區的敵後這是對的，但又不全面，現在要向另一個敵後，即國民黨佔領區的敵後，這就全面了。國民黨佔領區就全國來說，湘、鄂、贛是國民黨的薄弱環節。日本人的勢力也不雄厚。蔣經國在贛南能夠站住，我們也一定能站住！我們黨內，過去有些人（指王明等人）怕得罪蔣介石，不敢到他的「家裏」去搞革命，吃了大虧。現在這些人都改變了認識，糾正了錯誤，我們的事就好辦了。我們祇要堅定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國民黨，我們就一定勝利！中央已經決定，由陳毅同志率數百名團以上幹部，其中要有相當數量的高級幹部，向南方發展，恢復湘、鄂、贛、閩四省蘇區老根據地，南方會成為大的革命根據地。

彭真最後說：選調南下幹部，由中央組織部負責，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辦事人。我們不建立什麼組織形式，定期開會就是了。

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後，南下工作幹部團終於組成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或九月初，中央領導人毛主席、朱總司令、彭真、康生等四人，在毛主席的住地棗園接見了南下幹部中的十餘名代表，接見時陳毅也在座。接見的氣氛自始至終都是感人的，整個接見可以歸納為四個字：親切、莊重。我們一進接見室，中央辦公廳給每人發了

一個很精巧的本子，毛主席、朱總司預先在本子上題了詞。毛主席的題詞是：「不怕敵人，一定勝利。」另外，在接見廳的桌子上，放著一個比較大的本子，每個被接見的人都要自己親筆在本子上寫上自己的姓名、年齡、籍貫。再就是，除被接見的全體人員合影之外，每人都要同毛主席、朱總站在一起分別合影一張。

我同毛主席照像時，主席還拉著我的手說：「興國佬，要打回老家去了！」

接見事項完成之後，毛主席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講的主要內容是不怕敵人。毛主席說：敵人沒有什麼可怕的。你不怕他，他就怕你。在坐的各位同志，開始搞革命的時候，連槍都沒有，也不怕敵人。現在我們有部隊，有根據地，有槍，還會打仗，對敵人還有什麼可怕的呢？現在國民黨的力量是強大的，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們到南方去，要準備在「豆腐格子裏」（根據地被分割成一塊一塊的）戰鬥和生活。即使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比在山上的樹林子生活好多了。預祝同志們勝利！在吃飯的時候，毛主席、朱德、彭真、康生向大家祝酒。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我們南下幹部團第三團在團長邵式平率領下，從延安出發了。經陝西綏德、佳縣到達晉西北的汾河邊之後，中央突然命令轉為到東北去。我們從南下轉為北上了。

第九章 「我們的八縱」

戰鬥在熱河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們南下幹部團在南下的途中，即到了山西臨縣的汾河白崖，中央突然命令全部改為去東北。後來，我們轉道張家口、古北口，於四五年底到達了熱河省首府承德市。

日本投降後，中央以熱河為中心設立了冀察熱遼中央分局並屬晉察冀中央局領導。我們到達承德之後，分局不讓我們的幹部團去東北，留

下分配工作。除了少數幹部自己到東北去了之外，大部分都留在熱河。

一九四六年四月間，北平軍調執行部秘書長李克農知道我在熱河，即電請分局要我到北平去工作。我到北平之後，任執行部機關黨委副書記（李是書記）兼人事組組長，由於形勢變化，準備打內戰，七月間離開執行部仍回熱河工作。從此直到四七年冬，我都戰鬥在熱河。



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軍事調處

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熱北、熱中、熱東、熱遼四個分區和原來熱遼縱隊所轄十六、十七、十八三個旅成立了熱遼軍區，黃永勝為司令員，領率機關位於赤峰。熱遼軍區的成立是我黨開始糾正和平思想的產物。

日本投降之後，蔣介石利用中國是戰勝國的地位，就開始從陸路、空中、海上運輸了大量部隊到東北，其中還有相當多的精銳部隊，名為接受日寇的投降，實際上是和共產黨搶地盤。我軍當時相對國民黨軍隊是劣勢，在東北更是劣勢。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熱河的戰略地位顯得特別重要。為了佔據熱河這個關內外的大樞紐部，中央先後由察哈爾調了一個縱隊（趙爾陸縱隊），由晉冀魯豫調了一個主力縱隊（楊得志、蘇振華縱隊），由陝甘寧邊區調了一個主力支隊（黃永勝任司令，張秀山任政委），這個支隊在遼寧的錦州整編為熱遼縱隊。冀東還有四個旅可以成為野戰部隊。以熱河為中心的這個戰略區，當時有數萬部隊。與其他軍區力量比起來，部隊就不算少了。

當時，在冀察熱遼出現和平路線問題，主要是三個問題，（一）怕國民黨的軍力過強；（二）怕地主階級的反動勢力過大；（三）希望和平的心情過切。

當時在冀東的國民黨軍隊是十三軍，其兵力從秦皇島起，沿著長城一直伸到了承德及其以北的隆化、圍場；蔣介石從雲南調來一個軍，從錦州起，沿承錦線，一直伸到了赤峰。敵人完成了戰略佔領之後，主動向我軍進攻很少。敵人在熱河的軍事力量，並不是大到了我們不能與敵打仗的程度，我軍作戰的機會是很多的，但在四七年秋季之前，將近兩年的時間裏，除了進行了一些小的戰鬥之外，沒有進行過大的戰鬥。

四七年春，希望和平從思想上、組織上幾乎都具體化了。在思想上，主要是進行同國民黨共事的宣傳教育。在組織上，冀察熱遼分局和軍區已經決定解散。有的單位，如軍區政治部已經開過解散會議，熱河省政府已經準備同國民黨「同桌共事」了，我們準備爭當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共方的廳局長都配備好了。財政廳長（分局財政委員會主任高自立）、鐵路廳長（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吳德）、糧食廳長（等待分配工作的邱會作）、民政廳長都是我們的。熱河省的保安司令，內定為軍區的副司令員陳奇涵擔任。



一九四六年在熱河。

此外，軍事力量也大為減少了一縱隊調回晉察冀大軍區去了，趙爾陸縱隊留了一少部分之外，也調回晉察冀大軍區去了，熱遼縱隊領率機關宣佈撤銷了，熱河祇留下了四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旅，同原有部隊相比，減少了一半以上。從此之後，熱河打仗就更少了，例如，熱遼軍區所轄三個步兵旅，在半年之內，祇有鐵路北的十六旅、十七旅，集中在赤峰以南先後打過一次寧城戰鬥和乃林車站戰鬥。

四六年秋，敵人佔領了承德、

赤峰，熱河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冀察熱遼分局和軍區撤退到了熱北的林西，熱遼軍區撤消，我調赤峰地委（二十二分區）任地委書記兼分區政治委員，吳烈是分區司令員。

赤峰地委是敵人佔領承德赤峰之後，在原來的熱中、熱北地委之間，新劃出的一個地委，是熱北的前哨。赤峰地委當時所屬的縣份有：赤峰、赤西、圍北（圍場以北）、經棚、烏丹五個縣。部隊有三個騎兵團，一個步兵團，連縣大隊一起，部隊約有二千餘人。我們分區是處在敵人包圍之中，分區所在地的烏丹縣城周圍都是敵人。赤峰、圍場有敵軍，赤西、經棚是土匪窩子。

地委成立的時候，擺在我們面前有三個問題。（一）敵情嚴重；（二）群眾基礎差；（三）在物資上處於無錢、無糧、無衣的情況嚴重，幾乎到了不能生存的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糾正和平思想，積極打仗，是當務之急。

分區成立時，軍區發給我們熱河銀行的紙幣三千元，我一文不要全部退回了。因為這些錢等於廢紙，沒有商家要這種紙幣。我向軍區領導程子華說：「上面發的錢解決不了我們什麼問題，我們會立即設法向敵人

要東西。我們估計是能夠要得到的！我們的困難是要敵人給我們『解決』的！」

我們分區成立後，不幾天的時間就派了兩個騎兵連到赤峰的公路上去活動。巧得很，部隊出去的當天晚上就在赤峰東南四十多公里處繳獲敵人一輛運冬裝的汽車，繳獲冬裝近千套。後來，我們就經常派部隊活動於敵後的運輸線上，所需的物資幾乎都可以從敵人手中得到，敵人是我們的運輸隊。我們繳獲的東西祇能運走急需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東西，如糧食就不能運走，祇好在當地散發給群眾。這個鬥爭真是一舉三得，打擊了敵人，解決了自己物資上的困難，發動了群眾參加對敵鬥爭。

剿匪作戰是我們最中心的任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地委、分區同分局和軍區存在著政策上的分歧。分局和軍區的指示是，先剿匪後反霸，基本上不殺人。我們認為剿匪反霸同時進行，對土匪頭子格殺不論。我們的報告分局不予批示，我們則堅決執行。實踐證明：地委和分區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一九四六年在承德。左起：馬學湘、陳萬通、李貴平、黃國山、邱會作。



任赤峰地委書記。

四六年冬，我們擺開陣勢剿匪之初，真是兩眼摸黑，民匪不分，找不到敵人，打不上仗。當時，我軍成了「外來戶」，而土匪倒同群眾在一起。經過短時間的實踐，我們總結了經驗，認識到單純軍事剿匪，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於是，我們就轉變為有重點的駐剿。

有重點的駐剿就是剿匪反霸相結合的具體化。熱河的人民群眾是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極大多數都是吃糠、吃草度日。四六年底，我在烏丹縣的東北地方，就遇到一家人，這家人共為五口三代人，我們到這家人去，叫了半天才開門。媳婦光著全身，用一個高粱桿子做的鍋蓋遮住下身來給我們開門。我們走進房子去之後嚇了一跳！祇看到炕上有四個大人小孩的腦袋而不見身子，仔細一看才知道這就是沒有衣服穿的人，用草灰掩住身子取暖。家裏唯一的一件破棉衣和一條破棉褲，男子穿著出門勞動去了。我們對群眾這種苦難都很同情和心痛，我們去的五人中祇我和另外兩人在棉褲裏套有長單褲，我的棉衣內套有一件單衣。我們三個人立即把長褲和褂子都脫下來送給了他們。我的通信員的馬背上還帶有十幾斤的糧食，也立即拿來贈給了他們。這家老小三代都在炕上的草灰內跪下向我們致謝！我們去的五個人都被感動流淚不止，有的還哭出聲大火。

日本侵略者在熱河的統治是十分殘酷的，群眾處在無衣無食的水深火熱之中，但取得了二鬼子地位的保甲長、地主、惡霸、土匪頭等，還是相當富足的。這些人家裏多數都糧食滿倉，牲畜成群。勞苦群眾內心裏求生存的鬥爭是十分積極的，我們的駐剿是以反霸分浮財為突破口的，在鬥爭的開始時分糧無人要，煮熟飯則有人來吃，分衣服無人來拿，把衣服送到家去則立即穿上，這種情況是個好兆頭。

反霸分浮財也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鬥爭，鬥爭必須掌握三個問題

(一) 打得準；(二) 解決群眾迫在眉睫的吃、穿問題；(三) 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對打得準的問題和解決群眾生活比較好解決，關鍵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問題，不鎮壓和亂鎮壓都是錯誤的。在圍場縣以北，在一條十幾里長的溝裏，祇有一家地主霸佔了全川的土地，地主的兒子和兩個土匪頭子是把兄弟，帶領百餘名土匪為非作歹。我們把地主兒子和兩個土匪頭子都抓住了。群眾對我們是既高興又害怕，高興的是把真正的壞人抓住了，害怕的是怕我們不殺那三個人。這三個人的死活，就是爭取群眾的關鍵問題。

我們決定要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處決那三個土匪頭子。開始時群眾白天見到工作組，祇是向工作組作個揖就走了，什麼話也不說，晚上來就不同了，群眾接二連三來找工作組，但也祇做個殺頭的手勢不說話就走了。不久我們張貼出殺那三個人的佈告，群眾的情緒大變，都擁到工作組住地要求殺土匪頭子，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樣我們就召開群眾大會公開處決土匪頭子和分浮財。在十餘里長的一條溝裏住有幾百戶人家，共計千餘人，到會竟達七八百人。處決土匪之後，立即就分浮財，糧食數萬斤，各種衣服千餘件，新農具百餘件，新步槍二十多支，還有機槍兩挺。沒過多久就出現了熱火朝天的群眾鬥爭，祇要群眾一發動起來，剿匪鬥爭也就有勝利的基礎了。有了群眾就沒有土匪的生存之地，因為土匪不躲藏在群眾之中，也失去了生存條件。

群眾發動起來之後，一切問題都好辦了，參加土匪的人自動交槍百餘支，自首的五十餘人。工作組對自首的一律不再追究，並允許他們參加貧農團和其他的群眾組織。反霸鬥爭的勝利，對人民的鼓舞是最大的。由於反霸鬥爭的勝利，軍隊同人民的關係也更加密切了。

八縱成立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在赤峰美麗河組成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

司令員：黃永勝

政治委員：劉道生

副政治委員：邱會作

參謀長：黃鵠顯

政治部主任：邱會作（兼）

政治部主任：林忠照

八縱機關就是原熱遼軍區前方指揮所的同志，原熱河地區十三旅、十六旅、十八旅三個旅編入縱隊建制。十三旅編為二十二師（後為一三三師），師長吳烈，政委陳仁麒。十六旅編為二十三師（後為一三四師，一六一師），師長張德發，政委曹德連（代）。十八旅編為二十四師（後為一三五師，一六二師），師長丁盛，政委韋祖珍。

八縱一成立就在戰鬥中成長。

在四七年的夏季攻勢後，敵人收縮在長春、瀋陽、錦州一線的狹窄地區，並轉為重點防禦。九月上旬，敵新任東北「剿總司令」陳誠想顯示一下自己的能耐，提出「確保北寧路，打通錦承線」的計劃。我們則徹底打破了敵人的計劃，給了陳誠一個「見面禮」。從九月初到十一月中，向敵開展秋季攻勢，先後取得了梨樹溝門，兩戰楊杖子，九關臺門四戰四捷的勝利，並對北寧路錦承路進行了四次破襲，共殲敵 28000 多人。部隊打出了威風，部隊在戰鬥中成長。總部發來了嘉獎令：

遼西前線將士們、遼西前線冀察熱遼解放軍全體將士們：

慶祝你們在楊杖子二次戰鬥中，殲滅蔣匪四十九軍主力的偉大勝利。望繼續努力，爭取新的勝利。特嘉獎此次戰役中有功的部隊和指戰員。

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參謀長劉亞樓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於哈爾濱

四七年十月一日東北日報社論，題為《向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致敬》，部隊上下為之振奮。熱河大部分地區得到解放，立即實行土改，人民喜氣洋洋，熱河人民把八縱隊都稱之為「我們的八縱隊」！



八縱第一任司令員黃永勝。

首戰梨樹溝門。蔣介石為了鞏固東北，任陳誠為東北行轅主任，陳誠派兵向熱河東部進犯，旨在保證北寧路通暢，林總決心殲滅該敵，任務交給八縱。四七年九月初，敵九十三軍暫編二十二師（欠一個團），敵暫編五十師的兩個團，向我侵犯。八縱司令黃永勝把任務交給二十四師丁盛、韋祖珍，並派二十二師六十六團歸丁盛指揮，獨立一師佯攻牽制敵人。這一仗打得很好，雷厲風行，初戰告捷。二十四師在梨樹溝門殲敵暫編五十師千餘人，其中擊斃 400 多人。這是八縱成立後的打第一仗，十分可喜。

一戰楊杖子。敵暫編二十二師剛與我軍接觸就被我們打的倉皇東逃，二十三師一面追擊敵人，一面上報縱隊，黃永勝決心非常快，立即決定在楊杖子部署戰鬥，他親自帶部隊幹。令吳烈的二十二師和獨立一師跑步前進，佔領陣地，限時向敵發起總攻，並令二十四師在敵人退路上堵截敵人，形成前後夾擊。敵暫編二十二師 2600 多人被我全殲，俘虜敵少將副師長和少將參謀長。

二戰楊杖子。過了兩三天，陳誠又派王鐵漢的敵四十九軍主力，向楊杖子進犯，我二十三師六十九團五連經過肉搏戰攻佔了可俯瞰整個戰場的323高地，我獨一師、二十二師、二十四師，也到達指定位置。但是從上午八時同敵人接觸，直到下午雙方進展都不大，基本上處於相持狀態。

當天的下午三時許，我軍已經決心暫時撤出戰鬥，再尋戰機。撤的命令已經下達，電話線也拆了。撤出戰鬥的部署完畢。黃永勝、黃鵠顯和我三個人都在指揮所的山頭後面閒談，搶香煙抽。此時，敵人向我指揮所來一陣子炮火襲擊，在我們三個人不遠的地方還落了一發未炸的炮彈，濺了我們一身的泥土。幸而炮彈未炸，否則我們三個人都送命了。接著，通信科報告，敵方發出了緊急公開信號，但內容不詳。接著，前線部隊又報告，敵人的小分隊向我前沿陣地猛烈出擊。根據得到的三個情況黃永勝立即判斷：這是敵人要撤退的象徵。我們大家都同意他的判斷。

「我們要立即追擊敵人！」黃永勝下了決心。下了撤退命令已經個把小時了，一切通信工具都不發揮作用了，怎麼樣指揮追擊？一時也想不出個好辦法來。就在此時，我想了一個辦法：要司令部可以出動的參謀、幹事，甚至科長都帶著我們手寫的命令一齊出動傳令，要部隊立即向錦西方向追擊。黃永勝立即說：「好！你這個辦法好得很！」不到半小時，集中了有十幾個人，手持命令就出發了。我還向出動的人交代：看到部隊的任何一級指揮員都可以讓他看命令。凡是看了命令的指揮員，都要把他們的番號、職務、姓名登記起來，要是取不到勝利的戰果要追究責任。這樣，一場千軍萬馬的追擊戰就這樣開始了。

追擊戰是第二次楊杖子戰鬥取勝的關鍵問題。不追擊就祇能是「竹筐打水」一場空，除了自己落一堆傷亡之外，什麼也得不到。追擊的結果，我們俘虜敵人上萬人，除敵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帶少數人，化裝擔架隊逃走之外，其餘的敵人全部殲滅了。戰後，黃永勝、黃鵠顯經常同我開玩笑說：「你的點子真高明，你是我們八縱隊的教師爺。」我說：「沒有你老黃忠帶領部隊，部隊那有這麼大的氣魄！」

九關臺門的戰鬥，我們也殲敵幾百人。

此戰，我殲敵四十九軍軍部、七十九師、一〇五師師部及所轄四個團，共 12000 多人。繳獲大小火炮 90 多門，輕重機槍 400 多挺，以及幾十部汽車，車上都是彈藥和物資，我們發了大財。二十三師六十九團五連獲「刺刀見紅」錦旗，連長王紹組獲「毛澤東獎章」。

戰鬥力提高了

熱東的勝利，八縱的作戰能力確實提高了。部隊還是原來的那些部隊，為什麼能夠一下子進步那樣快呢？主要的是黃永勝指揮得當，另外部隊的作戰積極性發生了變化，特別是敢於勝利的思想提高了。在熱河工作過的人都還記得，日本投降後，不敢打仗，不敢發動群眾，大家都有意見。對熱河的國民黨軍隊耀武揚威，地主惡霸殘殺人民，大家是十分痛恨的！對領導上不敢鬥爭，敢怒不敢言，即使提意見也沒有人聽。對此，不少人都離開了熱河，到別處去工作了。八縱的四戰四捷，黃永勝名氣很大，這對冀熱遼的領導本應是好事，但這些渴望「和平」，不願打仗的人，反而對黃有嫉妒心理，挑別人茬子。

八縱有作戰的積極性。在熱東的四次戰鬥，除了九關臺的戰鬥是冀察熱遼軍區前指統一指揮的之外，其餘三次戰鬥都是我們自己主動捕捉戰機的。這裏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如果沒有作戰積極性，祇是奉命搞破壞鐵路之類的事，哪裏還會找機會打仗。沒有作戰積極性，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八縱有指揮能力。祇有作戰積極性，而不懂得怎樣打仗，同樣不能取得勝利。當時，我們的縱隊司令員黃永勝同志是一個打仗能手，一個身經百戰優秀的指揮員。他對情況的判斷、組織戰鬥都很精通。雖然他也祇有三十六、七歲，部隊都稱他為「老將黃忠」，這是對他的指揮信任的尊稱！仗一打下來，縱隊機關都稱讚黃永勝「老將出馬，一個頂倆」。八縱在黃永勝的帶領下，越戰越強，進步很快。

部隊戰鬥作風有很大的提高。一九四七年秋季四戰捷之後，我有一個總結並發表在縱隊的「鐵拳」報上。這篇文字離現在已四十年了，但還是可以看下去的。總結要點如下：

我們經過了秋季功勢的動員之外，部隊士氣非常旺盛。正如林總所說：「部隊是想打，有命令打，有機會沒有命令也要打。」這是部隊好的作風。

的總的表現。部隊的戰鬥情緒首先表現在部隊出動時的行軍中，連續幾天都是急行軍每天都要走一百多里路，獨立一師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七十里路。

在第一次楊杖子戰鬥時，二十三師受領任務是查明敵情和地形，並未受領作戰任務。他們深夜到了楊杖子發現敵人未走，立即投入戰鬥，纏住敵人，造成了殲敵暫二十二師的戰機。二十四師在前進的途中發現錦州附近白庫子有敵一個營的部隊，該團立即投入戰鬥，殲滅了該敵。

秋季攻勢，部隊自己提出的口號是：「這次作戰要讓敵人的血染紅自己的刺刀！」確實有不少部隊，敢於刺刀見紅！有進無退堅守陣地。在戰鬥中，堅守陣地寸步不讓。這次秋季攻勢中，我們能夠守住陣地，是好的戰鬥作風的又一表現。在二次楊杖子戰鬥中，獨一師一個連的兵力堅守白楊術溝的東山，敵人集中炮火向該連陣地發射炮彈數百發，敵人衝鋒四次，均被擊退。我堅守陣地的勇士們，沉著應戰，用刺刀和手榴彈把敵人殺的真可謂「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堅守陣地的連隊，在打退敵人衝鋒之後，又乘勝向敵人進攻。

在秋季攻勢中，各部隊都能比較好的協同作戰，是好的戰鬥作風的又一表現。參戰部隊協同運動越好，對敵人的打擊就越重。第二次楊杖子戰鬥中，獨立一師，二十四師兩部協同得很好，就實際支援了二十三師。在大兵團作戰中，如果企圖偷安，不僅會增加自己的傷亡，也會增加友鄰部隊的傷亡，也就是增加整個部隊的傷亡。

第二次楊杖子戰鬥中，二十二師對奪取三二三高地，就是組織協同很好的戰例。各參戰部隊，不僅瞭解自己的任務，也瞭解友鄰的任務。這樣，雖然分兩路攻擊敵人的陣地，由於協同得好，就成了在不同空間同時打擊敵人了。減少傷亡，縮短了作戰時間。這種好的戰鬥作風是應當很好發揮的。

迅猛追擊爭取全勝。不顧傷亡大，不顧疲勞，不等命令，敵人退卻就追，這是好的戰鬥作風又一表現。

克服一切困難。秋季四次戰鬥中遇到的困難是很多的。這些困難是在大兵團作戰不可少的。如糧食困難，急行軍，氣候不利等等都是困難。

擔架不夠用發生了很大的困難。熱東地區又是新區，動員群眾支援戰爭也很困難，在作戰中的傷員基本上是部隊自己輸送。

糧食供應不上是經常的。可以這樣說：我軍打仗頭一天基本上可以吃自帶的糧食，第二天就有不夠吃的問題了，如果連續作戰三天，幾乎就沒有不餓飯的。在熱東是連續作戰，困難就更大了。比如說，我們九天打了三仗，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沒有不困難的！

走路的困難。我們的部隊會走路，也不怕走路的，最怕的是沒有鞋穿。我們的困難也就在這裏，沒有鞋穿，赤腳行軍，赤腳打仗是常事。光著腳走長路就是不可想像的事，光著腳打仗的就更不可思議了。我們的戰士堅忍不拔忍耐痛苦，肉板腳變成鐵板腳就是辦法。

英勇奮鬥，艱苦奮鬥這兩個「奮鬥」是我軍的光榮傳統。英勇奮鬥的過程也就是艱苦奮鬥的過程，不怕苦不怕死是連結在一起的。這也就是我軍戰鬥作風最本質的問題。

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八縱從熱河東部的朝陽以南二十家子出發，向遼寧西部的黑山新立屯方向前進。當時，東北的冬季攻勢也開始了，從原來的行政區劃來說，我們到了大清河西岸之後，就同東北的部隊一起戰鬥了。八縱直接歸東北軍區指揮加入了大兵團作戰的行列，這對八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七年十一月，黃永勝離開了八縱，到主力部隊六縱去當司令，段蘇權同志來八縱任司令。

在進入東北之前，我們縱隊專門召開了黨委會，討論到東北之後要堅決完成任務的問題。我在黨委會上做比較長的發言，對我縱的主觀情況和到了遼西後的客觀情況，都做了比較充分的闡述，我說：我們到遼西去，會有很多的作戰機會，我們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我們要以積極的精神執行命令。我這裏不妨回顧一下今年的秋季攻勢是一種什麼精神狀態執行命令的。我們是奉令去破壞北寧路的山海關到錦州段鐵路的，但是我們沒有破路就先打了三仗！我們雖然不能背起勝利的包袱，但決不能丟掉取得勝利的積極精神。

八縱在成立之初，即一九四七年的秋季攻勢取得了四戰四捷的重大勝利，我們在戰爭中，壯大了自己，裝備了自己，提高了自己，這對我八縱的發展前途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同時，縱隊在四七年的十月下旬開始又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訴苦運動教育。部隊提高了政治覺悟，整個部隊戰鬥情緒非常高漲。

第十章 遼瀋戰役

遼瀋戰役是解放戰爭時期著名的三大戰役中的第一個戰役。根據毛主席的部署，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初，在遼西的錦州和瀋陽、長春等地進行的一場大決戰。遼瀋戰役是解放東北全境的戰役，我們達到了滿意的戰役目的，這是並非偶然的，而是以林彪為代表的東北野戰軍正確路線的總檢閱。

吉林會議

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兩年多的奮戰，在全國個戰場上共消滅敵人 60 多萬，我人民解放軍壯大為 280 多萬。敵人被迫由進攻轉入防禦，我們則由防禦轉入進攻。

在四七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勢後，整個東北發生了很大變化，解放區的面積佔到 90% 以上。在東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還有 55 萬人收縮在長春（鄭洞國的 10 萬人），瀋陽（衛立煌、廖耀湘 30 萬人），錦州（范漢杰 15 萬人）三個孤立地區。我東北野戰軍有 30 萬人，地方部隊有 30 萬人，敵我人數相當，但我們的武器裝備不如敵人。

一九四八年三月東北軍區在吉林召開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縱隊、各軍區政治委員，吉林附近部隊的領導和省軍區司令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主要內容是講政治整軍。會議開始時，羅榮桓政委講了政治整軍的主要問題；會議結束時，林彪司令員講了打仗的問題。

林彪說：我們進入東北以來，開始我主張不打大仗，從去年秋季開始就打大仗，今後就要打硬仗。從不打仗，到打大仗，打硬仗，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我們必須認識這個變化，才能最後戰勝東北的敵人。這是我們當前在政治思想上、戰略戰術上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林彪接著說：東北的國民黨軍隊，現在龜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為中心的三大坨之內。我們今天考慮打仗，要抓住兩個關鍵問題。這就是：要能牽動敵人的全局和減少自己的代價。我們不能如同賣牛皮糖一樣，敲一塊祇是少點而已，這樣，不能給敵人致命的打擊。因此，今後打哪裏是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

林彪最後說：從東北的敵情和我們自己具備的作戰能力來說，今後東北的作戰方式，就是大兵團、攻擊戰，打硬仗。我們全區的部隊都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大顯威風。

林總在吉林會議上的講話，時間很短，但講的十分精彩，提出了新的重大問題。林總講話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是解放東北「戰鬥號令」。

林總的講話對我們思想啓發很大。我理解林總的講話，就是要部隊進行政治、軍事整訓。把「大兵團、攻擊戰，打硬仗」的思想貫徹到政治整軍，軍事訓練的全過程中去的。一九四八年七月間，我在縱隊部隊幹部會上報告中也著重講到這個問題，我說：「……在東北當前的情況下，我們的作戰就是運動戰，攻擊戰。過去打仗，打與不打我們是有相當的自主決定權，今天這個情況就完全變了，打與不打是屬於東總的權力。大兵團作戰的主要特點是：堅決執行命令，堅決完成任務，堅持整體觀念。」

政治整軍與軍事訓練

吉林會議結束後，從三月中旬開始，到四月底全部時間進行政治整軍。以毛主席《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為指針，開展「訴苦」（訴受剝削壓迫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的教育運動。為了深入進行政治整軍，縱隊黨委發表了《關於實行政治整軍的決定》，我縱提出了「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風、整關係、整紀律、整組織和查階級）。通過整訓，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加強了黨的建設和內部團結，改善了官兵關係，打擊了歪風。

整頓紀律主要是在團以上的領導幹部中進行，八縱二十三師是整頓的重點。二十三師是紅一方面軍九軍團的部隊，在全東北戰區，以紅軍為基礎的建制師並不多，二十三師是其中之一。這個部隊長征到達陝北



任東野八路軍政治委員時留影。

之後，就留在了陝甘寧邊區。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編為警備一旅，當時部隊的駐地出產大煙，有的幹部有秘密販賣煙土做生意的惡習。二十三師到熱河後，紀律也不大好。

全縱政治整軍開始時，我自始至終都參加了二十三師的黨委擴大會，我在會上開門見山的指出：二十三師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戰鬥意志衰退，戰鬥作風不好，政治紀律不強。二十三師是老部隊，應當比別的部隊進步快，但反而慢了。為什麼呢？我現在向大家提出四個問題。

(一) 嚴重的腐敗思想。二十三師的一身都是「病」，最主要的是不少幹部思想腐爛了。貪污現象一般幹部有，高級幹部也有，甚至首長的警衛員都有。貪污的手段主要是做生意賺錢，做生意可謂是「群眾」性的了。有的高級幹部的老婆也經營大煙，這是犯法行為。

二十三師的部分幹部用公款買個人用品。例如：買鋼筆一個人買兩三支。有的人買兩三件大衣。這樣的幹部還有為人民服務的鬥志嗎？我希望這些幹部應當猛醒。

(二) 嚴重的軍閥主義傾向。二十三師的軍政、軍民關係和內部關係都相當緊張。軍隊看不起地方幹部相當普遍，甚至把地方政府看成包袱。有的部隊連敵情都不通報地方黨政機關。有的部隊私自種大煙；有的部隊毆打稅務機關的工作人員。據政治部的統計，去年一個冬天就打過四百多個老百姓。我們是軍政軍民一家，還是冤家？

你們軍政關係也相當緊張，在二十三師這樣的老部隊還有相當的人看不起政治機關，把傳統都搞丟了。打罵戰士的現象尤其嚴重，竟還有連長(王xx)割士兵的耳朵的犯罪行為。

(三) 政治空氣相當淡薄。你們二十三師正氣不足，邪氣昇高了。在你們師裏最感興趣談論最多的是什麼呢？大煙、老婆、地位。這是什麼風氣，這是「烏煙瘴氣」！

(四) 你們師的幹部中知識分子並不多，但反對知識分子幹部則相當厲害。我們用幹部是有政策的，我們的政策是：德、才、資，這是統一不可分割的。我們的幹部政策不是陰路上行軍一個接一個地向前走，論資排輩。我們的幹部政策是大馬路上賽跑。以革命事業為目標，大家都向前跑，這自然就有走在前頭的，有落伍的，甚至有跌到地下爬不起來的。有德有才的人跑到最先頭了，這就是提拔的對象。

我講完話之後，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揭發了問題相當嚴重。其中嚴重問題之一，就是警衛員、飼養員揭發了師長張德發，他的老婆長期做大煙生意，在小孩的搖籃裏就搜出九斤大煙土，並提到黨委擴大會的會場上去了。這對二十三師是一空前未有的大震動。師長無論政治思想作風上，作戰指揮上，對部隊建設上都不能勝任。縱隊黨委決心撤換師長，我們向東北軍區做了報告提出了撤銷師長的建議。軍區在兩小時內，批准了我們的報告。

一九四八年五月間就開始了軍事訓練，訓練的主要課題是攻擊戰。我記得，六月間東北軍區召開過縱隊司令會議，討論的中心內容，是以攻擊作為對象的。

縱隊黨委對軍事訓練主要抓了三個問題。

第一，全縱部隊全部投入軍事訓練。

第二，全縱幹部戰士都要學習攻擊戰的戰術與技術，幹部學戰術為主，戰士學技術為主，技高膽量大。當時，我縱的炮兵不是很強，因此大抓爆破訓練。經過苦練，全縱隊 80% 的幹部、戰士都學會了爆破技術和連續爆破的技術。

第三，發揚練兵的群眾路線，實行評教、評練、評學的三評運動。

這裏有必要提一下「六個戰術原則」問題。「六個戰術原則」是以林彪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廣大指戰員鮮血和生命的總結。開始，林彪提出「一點兩面」和「三三制」。「一點」就是主要攻擊點要選好，「兩面」就是要包圍敵人，打殲滅戰，不要一邊不推，打擊潰戰。「三三制」

就是說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不要扎堆打仗，一個班要分成三個組，互相策應。

在「三下江南」後林彪總結作戰經驗時，又提出了「四組一隊」、「快一慢」。四七年秋季攻勢後，在東總召開的軍事工作會議上，林彪又提出「三猛戰術」，「三種情況三種打法」。

「六個戰術原則」簡單實用，尤其對工農出身、文化較低的指揮員來說簡直是法寶，運用「六個戰術原則」屢屢打敗敵人取得勝利就是法寶！「六個戰術原則」是和東北野戰軍廣大指揮員的鮮血和生命劃等號的。

軍事訓練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底基本結束。全縱隊上下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我們對今後作戰的勝利充滿相信。



和八級戰友在一起。前排左起：韋祖珍、邱會作、謝家祥、任榮。

後排左起：任思忠、徐信、鍾池、林忠照、吳興。

錦州攻擊戰

一九四八年的秋季攻勢戰役目標，是幾經變化才決定攻打錦州的。在攻克錦州之後，又抓住了一個遼西會戰，進而攻克瀋陽，解放了全東北，這就是世界聞名的遼瀋戰役。

關於遼瀋戰役，「九一三」之後給林彪抹了很多黑，甚至說林彪不打錦州是怕死。把林彪的大功，說成大錯，甚至說成大罪。好像林彪提出

打長春就是絕對的錯，毛主席提出打錦州就是絕對的正確，這些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早在四八年四月，東北局認真分析了整個東北的戰局後，決定部隊進行政治整訓和軍事整訓後，攻打長春。提出打長春並不是林彪個人的意見，四月十八日由林彪、高崗、羅榮桓、陳雲、李富春、劉亞樓、譚政等向軍委電告打長春的決心和方案，「以七個縱隊的兵力攻城，兩個縱隊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三個縱隊及獨立師，擔任錦州瀋陽間、瀋陽四平間沿途牽制敵人」。林彪還提出「僅瀋陽之敵北上增援，是較易應付的，如錦州附近之敵與瀋陽敵人會合，再向北增援，則使我軍攻城和打援皆發生嚴重困難。因此我們建議晉察冀以四個縱隊或三個縱隊兵力，……開到山海關以北殲滅和牽制敵人」。四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以軍委的名義回電，明確表示「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意見。……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

毛主席從全國的形勢通盤考慮，提出打錦州，不但「關門打狗」，也卡斷了東北與華北的連接，防止蔣介石企圖放棄東北將兵力撤回華北的打算。四八年九月七日，毛主席電示林彪堅決打錦州，「而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

當時，打錦州的確困難很多，部隊南下北寧線，要從較遠的地方趕來集結，這倒是小問題，人民子弟兵的兩條腿是過硬的。關鍵是準備打仗的彈藥、物資也要從較遠的地方運來，甚至從哈爾濱繞道白城子一線運過來；運輸的汽車也有一些，但汽油卻很困難，萬一錦州打不下，我們撤都撤不及，後果也難以設想。

從敵人來說，打錦州，瀋陽的敵人會來增援，而且蔣介石調兵從南面增援錦州的部隊已經在葫蘆島準備登陸了。這樣，林總的指揮所到了彰武時，林總有新的考慮，並向毛主席提出了報告。我認為一個戰區的總指揮，十分注意敵情的變化是無可非議的，當敵情起了變化後，向毛主席提出什麼樣的報告都是正常的，向毛主席提出回師打長春也是一種方案，總的目的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我認為林彪和毛澤東沒有什麼根本分歧，都是為了打倒蔣介石，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何況，林彪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堅決執行了主席的指示，全力奪取錦州。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遼河三江口檢查浮橋。八縱司令段蘇權（前左）、政委邱會作（前右）、副司令張天雲（前中）。

我縱於四八年九月十二日由遼寧省鐵嶺以西的八面城出發，向錦州方向進軍。部隊在三江口西渡遼河，並繞道現屬內蒙地區的草原和沙漠，經康平、彰武等地，於九月二十一日到達北鎮地區，九天行程 900 多里，聽說要打仗，部隊上下士氣高漲。當日晚，部隊剛要宿營，我們就接到總部命令：八縱急速南下，夜渡大凌河，突然包圍葛文碑、薛家屯之敵，截斷錦州、義縣兩敵的聯繫。為此，八縱又連夜強行軍 120 華里，22 日趕到五樓子等地集結待命。

二十二日中午，我們又接到東總電令：八縱、九縱兩個師、三縱九師，由八縱統一指揮消滅薛家屯、葛文碑之敵。我們立即進行了部署，二十五日各部隊均按時到達指定地點，經過激戰，當天就解決戰鬥，這樣，錦州和義縣的聯繫被我縱截斷。三縱為主、二縱一一六師配屬二縱迅速攻克了的義縣，拉開了遼瀋戰役的序幕，一一六師在這次戰鬥中打得很出色，受到林總讚賞。八縱在總攻前，攻佔了北大營，東大梁，被服廠。這樣，錦州東部、東北部敵人的重要據點全部被我縱攻佔，為總攻錦州掃清了障礙。

錦州的攻城戰，於四八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七時開始，至十五日下午五時基本結束。參加錦州攻城和在黑山、塔山擔任阻擊的部隊共為八個縱隊攻城部隊為：二、三、七、八、九五個縱隊；四、十一縱隊在塔山阻擊。

擊 葫蘆島登陸之敵，十縱在黑山阻擊由瀋陽出援之敵；一縱在錦州到塔山之間為總預備隊。

攻克錦州是我縱加入「大兵團攻擊戰，打硬仗」的第一仗。我們勝利完成了作戰任務。發起總攻後，我縱先後攻佔瓦斯會社、麵粉廠、中央銀行，全殲敵「剿總」特務團，並直接殺向敵剿總前指。截止十五日黃昏，八縱殲滅敵暫編五十四師全部，暫編十八師、暫編二十二師各一部，殲滅敵六兵團司令部、九十三軍軍部，共萬餘人。

在作戰中我們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對那些問題，我們都以「不怕羞」精神，及時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進行了總結，這對促進我縱的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個問題，控制錦州機場問題。九月下旬（二十六日）總部命令：八縱派一個師立即向錦州城前進，佔領高地，用炮火控制機場，阻止敵人空運向錦州增援。這本來是一項很容易完成的任務。

接到命令的時候，我在師裏。總部的命令在文字上，有不嚴謹的地方，現在看來也是執行命令不利的因素，因為可用的機場附近有九縱的部隊，他們執行任務更為宜。但我們卻又發出了缺乏軍事常識的請示報告：綿州有兩個機場（其中一個是廢的），佔哪一個？

總部對我縱的請示報告，接連發了三個電報：一是，不能用的東機場還要控制嗎？二是，按前令立即派一個師向錦州城西北角前進，佔領高地，用炮火控制該機場；三是你們對執行控制機場的命令不堅決。第三個電報，壓在羅榮桓政委那裏了，沒有發出。我們是後來才知道的。

這樣，敵人爭取了一個白天稍多一點的時間，由瀋陽空運了五個營的步兵到錦州。由於敵人空運，增加了錦州的防守力量，如果敵人空運很多的部隊到錦州就有造成錦州不能打的可能。總部把控制錦州機場的問題報告了中央軍委，總部轉發了中央的回電：「八縱隊執行命令不堅決，應進行批評教育。」

我從師裏趕回到縱隊之後，對控制機場的問題採取了緊急措施：一，督促二十三師急行軍向指定的地點前進，堅決完成任務；二，將總部的批評電文轉發各師，我們提出全縱隊要以縱司沒有很好執行命令為戒，堅決執行命令；三，立即向總部做了初步檢討。總部的回電是：「對控制機場的問題檢討很好，今後應堅決執行命令，完成作戰任務。」

第二個問題，薛家屯戰鬥問題。薛家屯在錦州市以東約三公里處，

我縱受命拔除該據點。

是連結大小紫荆山的重要外圍據點，我縱受命拔除該據點。

薛家屯戰鬥是二十三師打的，那次戰鬥主要是師指揮員對組織指揮作戰的能力太差了。諸如，選擇突破口，指揮突破，迂迴包圍等都搞得不好。既使戰鬥勝利了，俘虜和繳獲都甚微，自己反而落了二百多人的傷亡。更為嚴重的是師裏對缺點錯誤都隱瞞了，未曾如實上報。

二十三師的師長是四八年五月間總部派來的，全師上下意見很大。

對師指揮員的問題，當時還沒有條件解決。天津戰役後不久，我們提拔了該師參謀長張曉冰同志擔任師長，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第三個問題，丟掉小紫荆山陣地問題。在錦州外圍作戰時，十月三日二十三師六十八團攻克了小紫荆山陣地，這次戰鬥是該團副團長韓楓指揮的，仗打得很好。但戰鬥結束後，該團祇留了八連守陣地，其餘部隊撤出了陣地，師團兩級對怎樣堅守陣地沒有做任何佈置。敵人反攻時，八連把陣地丟了。這個問題對敵我雙方都影響很大，對敵人起到了鼓勵士氣的作用，對我軍則起到了打擊士氣的作用。況且八連是逃跑式的丟掉陣地，這與我軍英勇作戰的光榮傳統是絕對不相容的。

為了嚴肅軍紀，縱隊黨委決定：對六十八團八連連長於沛然處於極刑，對該團副團長給予撤消職務，到炊事班當伙夫（韓楓同志真是能上能下，很快就恢復了職務）。總部很快批准了我們的報告。為了教育部隊和幹部，二十三師召開了六十八團的部隊和全師連以上幹部參加的大會，對於沛然當場處理了。

第四個問題，羅榮桓來我縱視察問題。錦州戰役總攻之前，羅榮桓政委於十月十二日來到我縱視察。羅政委身體不好，加上敵機活動又比較頻繁，他來了之後祇有三次活動。一次是和我、張天雲、黃鶴顯、師長、政委們分別個別談話。一次是接受縱隊黨委的匯報，一次是出席縱隊黨委會，其餘的時間都在野外水溝裏防空。羅政委在接受縱隊匯報時祇說了四句話：接受教訓、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打好仗。

羅政委同我個別談話時，談了三條：一，段蘇權是個好同志，指揮作戰經驗少；二，一個人的領導水平、指揮水平、組織水平都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都是逐漸積累起來的；三，現在怎樣辦？唯一的辦法就是

發揮集體的作用。張天雲、黃鵠顯指揮作戰的水平是比較好的，祇要發揮了集體領導作用，是能夠完成當前的作戰任務的。

羅政委在軍黨委會上講話很短，他說：我親自到你們部隊來看看，我看你們這個部隊很好，很有希望，對完成當前戰鬥任務也是很有信心的。接著羅政委說：秋季作戰以來，你們縱隊發生過執行控制機場命令的問題，有的小仗打得不好，暴露了指揮和部隊紀律戰鬥作風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從全局來說都是小問題。在你們縱隊內，既是大問題，也是個別問題。對這些問題，你們都嚴肅處理了，表現了你們的領導水平和能力。出了這些事就沒有信心了嗎？這是不對的，總部還是認為你們是個好部隊，有戰功的部隊，總部對你們是有信心的！

錦州戰役結束後的第五天，即十月二十日，總部指名電令我去匯報。其實也不是什麼匯報，而是去和林總見見面，當面以予鼓勵。我在青年的時候就見過林總，以後也會多次見面，但沒有同林總講過話，他是不認識我的。這次去匯報，我是第一次同林總說話。

我到總部時先見到林總。見面時他第一句話就說「啊，你就是邱會作同志，你們縱隊是背著包袱打了勝仗。你們同大家一樣，都打得好。等一會到羅政委那裏去，他會多同你說幾句的。」接著林總問了我參加革命的歷史情況，我都一一向他匯報。

羅政委同我談話的時間比較長，但談的不是錦州戰役的問題。羅說：「在你們那裏說過的問題現在就不談了。遼西會戰，今明兩天就可部署完畢，一會兒一〇一對你還會有交代的。我們簡單說幾句思想方法問題。一年多來，從你們的報告和當面談的，我覺得你這個人是能夠抓住大問題的，而且是能夠抓到底的，這是你的優點。不過優點也伴隨了缺點，就是容易出點偏差。這點希望你注意就是了。但你又決不要束手束腳，八縱的進步與你大刀闊斧的領導是有密切關係的，你的領導是成功的。」

在我臨走之前，林、劉都到羅政委那裏來了。林總很莊重地說：「遼西會戰今明兩日就可實行包圍。敵人祇有兩條路可選擇：退回瀋陽或東渡遼河。六縱很快可到新民以東，攔阻敵人退回瀋陽，你們的任務就是不能給敵人爭取時間在遼河架浮橋。打法就是向敵群裏大膽殺進去，端起刺刀向前殺。你要很快趕回部隊去。你見到部隊的各級首長都要說兩句

話：「哪裏有槍聲就向哪裏打，手長腳快就是勝利。」我二十日晚十二時就趕上了擔任縱隊後衛的二十三師。

遼西會戰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攻克錦州城的戰鬥結束了，這是遼瀋戰役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遼西會戰，第三階段就是攻佔瀋陽了。

遼西會戰是在遼河以西，黑山到新民之間這個面積不大的土地上展開的，在這裏有全部美式裝備的敵精銳部隊廖耀湘兵團，約十餘萬人。

我軍有從錦州北上的一縱、七縱、八縱和長春方向南下的五縱、六縱、十二縱，加上原來擔任黑山阻擊戰的十縱，共計七個縱隊，兵力約三十萬人。敵我雙方參戰兵力約五十萬人。

總部命令指出：遼西會戰是解放全東北決定性的戰鬥，全軍部隊一定要克服疲勞，勇敢地連續作戰，保證取得戰鬥的勝利。

十月二十日我縱就從錦州市郊出發向黑山前進，參加遼西會戰了。我二十日由總部匯報回來，先趕回部隊，進行戰前動員。

我軍於二十二日就對敵人完成了戰役包圍，敵人被圍後，以新二十二師為拳頭，首先是向黑山、打虎山以南突擊，企圖奪取我黑山十縱陣地，繼而重佔錦州由海上逃竄。總部電令八縱在打虎山以南協同十縱三十師阻擊敵人。敵新二十二整編師是廖耀湘最精銳的部隊，全部美式裝備，敵人集中各種火炮有二百多門，按照坐標梳頭式的炮擊方法，左右前後輪番進行射擊。每次射擊的時間都將近半小時，地面上揚起來的灰塵昏天黑地。我縱二十二師擔任阻擊任務，部隊在兩小時內，遭受了很大的傷亡，但該師打得英勇頑強，部隊幾次進入肉搏戰，堅決頂住了敵人的攻擊，沒有讓敵人前進一步。一個副連長叫蔣布林帶著一個排與敵人白刃格鬥，他刺倒幾個敵人後，也被敵人刺成重傷倒地，他真是視死如歸，拉響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英勇的戰士們繼續與敵人拚殺，戰鬥到最後勝利祇剩下三人，十四名犧牲戰士的刺刀上個個都沾滿敵人的血。我二十二師勝利完成了阻敵任務，也確保友軍打虎山陣地的安全。

敵人企圖西逃而未得逞又向營口方向撤退，二十四日深夜總部命令：打虎山南敵新二十二師的部隊，有向東撤退的跡象，八縱除了二十二

仍留打虎山南抗擊敵人敵人之外，縱隊率主力向六間房的大小村莊攻擊前進，攔截敵人東渡遼河的企圖。我二十三師，二十四師立即受命攻擊前進，並在六間房及其西北方向展開了激戰。當時已經出現了敵我交錯的形勢，我們縱隊指揮所也參加了戰鬥。段蘇權司令員親自指揮機關戰鬥，我和副司令員張天雲、參謀長黃鶴顯都持卡賓槍向敵人勇猛射擊。

二十三師在六間房阻擊戰中，英勇頑強，堵死了廖耀湘兵團南撤的去路，為全殲廖耀湘兵團於遼河地區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作戰中我們的傷亡也很大，政治部主任任榮同志持槍作戰，十分英勇，在這次戰鬥負了傷。

二十六日深夜，我縱就進到遼中縣以西和老大房一線。此時總部的通報指出：敵人在新民以東對我六縱的攻擊已經減弱，敵人有向遼中方佔領渡口，東渡遼河的可能。我八縱應集中全力，不惜重大代價阻擊敵人東渡遼河，戰法就是要大膽地向敵人集團中衝殺進去打亂敵人的部署，使其無暇組織渡河。

我們的任務是嚴峻的，當時，我全縱部隊都在同敵人混戰中，通信聯絡，指揮都發生了很大的困難。為了貫徹總部首長的命令，我們決定：除司令員、參謀長不離指揮所外，我和副司令員，司令部、政治部所有能離開工作的人員，一律出發找部隊傳達命令。我們的命令是：勇敢作戰，大膽向敵群中殺，以獲得戰績為標準。全縱很快形成了熱火朝天的戰鬥。我同張天雲同志到了二十二師，該師成了我縱殲滅敵軍新二十二師的主力。

二十七日下午一時許，敵軍從巨流河向遼中縣方向集團式的向我軍衝擊。對我軍的攔阻和火力射擊都不顧，自己的傷員也不要，一個勁地往前衝就是了。我軍很快查清了，向遼中方面衝擊的就是新一軍、新六軍主力，並以新二十二師為先導。敵軍的目的就是要在遼中縣兩岸，建立新的防禦，實行東渡遼河，逃回瀋陽或向營口方向撤退。我們決心一定要徹底粉碎敵人的企圖，才能取得遼西會戰的全部勝利。

我和張天雲命令二十二師把集結了的兩個多團的兵力，以營連為單位，多路向敵人縱隊隊形中殺去，打亂敵人的隊形，分割殲滅敵人。「刺刀見血，衝鋒鎗點名」，驚天動地的戰鬥，在遼河兩岸平原上展開了。經過數小時的戰鬥，敵人的集圓隊形全部被分割打亂了，一個村莊，甚

至一個院落之內，敵我都混在一起了，敵我雙方都失去了指揮，完全是依靠分隊，甚至人自爲戰。在這種情況下，兩種不同軍隊的素質就明顯的表現出來了，敵人在失去指揮的情況下，是越戰越弱，我軍則越戰越強。在西北方向的友軍，也分數路向遼河兩岸衝殺前進，敵人就一塊一塊地被我軍吃掉了。敵人的王牌軍新一軍、新六軍覆滅了，遼西會戰到此基本結束。

在遼西會戰的槍聲還未完全停下來的時候，即十月二十八日黃昏，總部命令：「八縱立即東渡遼河向營口增援。部隊到達營口之後，在作戰指揮上歸九縱統一指揮。」

我們縱隊幾個人看到總部的電令之後，都哭笑不得，仗打到這個份上，大家的革命英雄主義個個高漲，由九縱指揮大家心裏不願意，但沒有人說一句話。我首先說：「張副司令和我先頭走，其餘的人留在後頭集結部隊跟進。」張天雲同志祇乾脆地說了一個字的話「行！」縱隊司令部一查部隊的位置，二十三師靠近遼河邊，部隊開始集結了。張天雲說：「我看總部要我們增援營口，可能是因為我們靠遼河最近，我們對部隊也不偏向那個，誰靠河邊最近就誰爲先頭。」這樣就把部署定下來了。張天雲說：「我們這一覺明天再走，讓部隊先走。」我即說，應當反過來，我們馬上出發並經過二十三師，向他們交代任務後，我們渡河到東邊去睡個大覺，這樣一舉兩得。二十三師看到我們先走了，他們就不會說怪話。同樣我們還可安安穩穩的睡覺。張天雲微笑地說：「對呀！」

我同張天雲帶著一個參謀、一部電臺、幾個警衛人員就上路了。我們不敢騎馬，一上馬就有打瞌睡栽下來的可能。於是，我們邊走邊說話，這是不打瞌睡的最好辦法。

我對張說：「你來了幾個月了，對部隊對領導有什麼看法嗎？」

張天雲說：「這個部隊很好，能夠培養出戰鬥力很強的部隊，我對部隊已經有相當的感情了。另一點就是師、團同志對縱隊的領導充滿信心。」

我們到了河東岸之後，二十三師指揮所和先頭團也跟著就上來了。我們隨即瞭解一下部隊的情況，認爲有休息一下的必要。

鄧首長對我們說：「部隊實在走不動了。上船要一個一個地拉著走，下船不僅要拉著下，有的還要抬著下船。如部隊一休息就起來不了。」

的走著走著就倒在路上睡著了。六十八團有一個連隊剩下四十餘人，幹部祇有一個副連長和一個副排長。該連集結後不到十分鐘，除了副連長之外就全部倒在地上睡著了，副連長吹哨子根本叫不起來，副連長拉起前面的，又拉後面的，前面的又睡著了。」部隊實在是開不動了。

全縱部隊已經快十天沒有宿營睡覺了，晝夜都在戰場上渡過的。不要說沒有睡一夜的覺，連臨時的覺也沒有睡過。這怎能不會在走路的時候就倒在地上睡著呢？根據上述情況，我和張天雲決定：今天十二時部隊「正式」睡覺，明天下午五時出發，夜行軍把白天耽誤了的路程趕回來。這一決定受到了幹部戰士熱烈的歡迎。我問我們隨身的警衛人員：「你們看這個決定好不好？」他很幽默的回答：「首長自己也會認為是很好的！」

在秋季中期的東北氣候不冷不熱，正好睡覺。我也是十二點多一點就睡了，一睡就到第二天十時才醒來了，睡得真香啊！我起來起之後，看到身邊的警衛員，這些年青人睡的那種舒服勁，真為他們高興！我同張天雲寧願餓著肚子也不叫醒大家，一直讓他們睡到自己醒來為止。他們醒來之後，看到我們祇是高興的傻笑。

二十九日我們夜行軍走了六十里路就宿營了，第二天十時繼續行軍。部隊休息好了，情緒好了，無論走到那裏都說戰鬥生活。大家說得最多的是諷刺敵軍新二十二師。他們說：「以前都說敵新二十二師怎麼能打，怎麼厲害，咳！原來並不是那回事，我的刺刀插到他身上，照樣倒下



一九四八年遼西會戰勝利後，八級參戰友在一起。左起：林思
耀、張天雲、周永化、徐蘇強、黃精順。

去！」另外，也有想戰友的，如有的還邊談邊泣，悼念戰友！勝利之師的情緒是非常高漲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我先頭師進至營口以北的牛莊。總部電令：營口追擊戰至此結束，八縱在原地待命。十一月十二日到達鞍山近郊的劉二莊一線整訓，至此，我縱參加的遼瀋戰役勝利結束。

八縱從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建立縱隊番號，到四八年十一月東北全部解放的一年又兩個月的時間裏，完成了屢次戰鬥任務，取得了重大的戰績，在戰鬥中鍛煉成為一支有戰鬥力的野戰軍。

遼瀋戰役即將結束時，十一月一日，中央軍委頒布了全軍部隊統一番號的命令。八縱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五軍，所屬二十二師、二十三師、二十四師，依次編為一三三師、一三四師、一三五師，冀東獨立師編為一五八師歸屬四十五軍。

在解放戰爭中八縱的主要戰績如下：

1、在錦州以西創造了大兵團運動戰的光輝戰績。一九四七年在錦州的西部，八縱一戰梨樹溝門，二戰楊仗子，三戰楊仗子，四戰九關臺門。前三戰是在九天之內連續作戰三戰三捷的運動戰。八縱運動戰的戰績，解放後曾被劉伯承元帥選定為南京軍事學院的典型教材。

2、在攻克錦州戰役中，單獨完成了突破任務。一九四八年十月錦州戰役是三路攻擊。二縱、三縱在城的東北角並肩擔任主攻任務，並配有大量的火炮和少量的戰車；七縱、九縱在城的正南並肩擔任助攻任務；八縱在正東單獨擔任助攻任務。八縱距主攻的距離最近，並配屬有一縱炮兵團，其任務是僅次於主攻的。所有攻城部隊唯獨八縱是單獨攻進城裏的。

3、在遼西會戰，八縱完成了協助十縱在打虎山阻擊敵人西進的任務，完成阻擊敵人東渡遼河南下營口，北退瀋陽的作戰任務。

我們八縱成立後，在戰鬥中鍛煉成為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能夠吃苦的部隊，有自己戰鬥作風的部隊。八縱是一支有發展前途，大有希望的部隊！



林彪閱閱獎旗。



淮海戰役後，八歲召開慶功大會，鄧會作時任八歲政委。



和他母亲（右二）在一起。



遼瀋戰役的歷史地位

遼瀋戰役，對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對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都有重大歷史意義。遼瀋戰役是同蔣介石集團大決戰的首戰，是在如下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一，全國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一九四八年東北戰場上，敵我雖然在數量上達到了平衡，但裝備上還是敵強我弱。在這一情況下，戰役之前祇考慮消滅敵人的主力，並沒有想到解放了全東北。

第二，史無前例的攻擊戰。錦州是敵人連接關內外的大戰略要地，駐有重兵十五萬人。攻打這樣大的據點，在我軍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堅守這樣大的據點，國民黨軍隊也是空前的。東北部隊攻擊戰除了攻克的四平是比較堅固的設防城市之外，其餘也祇攻克過一些比較小的據點。攻堅戰的經驗，祇有少數的師團比較豐富，還沒有出現過攻擊作戰經驗比較豐富的野戰軍。

另外，我軍的裝備也還不適應攻擊作戰，部隊的火炮比較少，坦克屈指可數。打鋼筋水泥碉堡效果比較好的武器很少。攻擊作戰的主要武器還是炸藥包，炸藥包一定要在接近敵堡壘之後送上去，送炸藥包很難一次成功，這就帶來比較大的傷亡。

第三，敵人增援的可能性很大。在錦州戰役之前，東北戰場上的敵人還是相當強大的，並且其中還有精銳的新一軍、新六軍。瀋陽的敵人要是集中主力援救錦州之敵，我軍有可能被迫撤出戰鬥。另外，蔣介石從關內增援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蔣介石也是這樣做了，並且親臨葫蘆島督戰。

遼瀋戰役當然是東北野戰軍的整體作戰，但要論功的話，錦州戰役的頭功應當是黑山與塔山東西兩頭的阻擊戰，尤其是塔山。因為祇要這兩頭的阻擊戰有一頭不能阻住敵人的增援，錦州就打不開。

遼西會戰的頭功應當是六縱隊阻住了敵人沒有撤回瀋陽，次功就是七、八縱阻擊了敵人沒有東渡遼河。

遼瀋戰役的勝利，從全國範圍來說，是敵人轉入被動，我軍轉入主動。遼瀋戰役勝利從基本上來說，就是毛主席戰略思想上的勝利，林彪是有巨大貢獻的。

遼瀋戰役勝利的直接原因是：我軍正確的戰略決策；敵軍在戰略上

的錯誤和我軍敢於勝利連續作戰的軍事素質。

關於戰略決策問題。上面提到了，四八年東北的敵人整個形勢就

是：長春、瀋陽、錦州，三大集團。我軍打哪裏都是戰略決策問題。毛主席、林總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我軍主力出擊北寧路，捕捉戰機，殲滅敵

人的有生力量，創造攻克錦州的條件，這是非常正確的。

關於敵人戰略上的錯誤問題。我看敵人的錯誤有三點：一是對我戰

略決策判斷上的錯誤。我軍向北寧路出擊時，敵人並未判斷到我軍會打

錦州。總以為我們還是搞圍點打援的老辦法。因此，敵軍未曾用主力出

援錦州。待到發覺我軍打錦州時，再用主力出援為時已經過晚了；二是敵

廖耀湘兵團出援錦州過晚了。三是沒有從東北撤退的決心，結果是被我

軍分次消滅了。如果在我軍未打錦州之前，敵軍主力要是西援，迫使我

軍不能打錦州，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我們打下錦州之後，如果敵人迅

速撤回瀋陽和鞍山一線，敵人主力也是完全可以從海上逃跑的。這樣，

東北可以解放，但敵軍主力是消滅不了的。

關於我軍敢於勝利連續作戰的素質。由於瀋陽出援到新民一線的敵

軍是敵軍的主力兵團，我軍要殲滅該敵是要有相當膽量的。我軍在錦州

戰役結束後，祇有四天多的時間就要連續作戰了。我軍除了一縱和五、六縱未曾參加錦州戰役之外其餘部隊都打得相當疲勞，傷亡也不小。參

戰部隊不僅沒有得到整頓，連休息也很少，體力並未恢復，以疲勞的我

軍同敵軍主力作戰，對我軍是非常不利的。我軍是克服了難於想像的困

難，參加作戰的。

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遼瀋戰役歷史地位呢？從直觀來看，我認為遼瀋

戰役的歷史地位是大決戰的開端，奠定了全國的勝利的基礎。遼瀋戰役

第十一章 平津戰役

奉命進關

遼瀋戰役結束後，我四十五軍在鞍山西南的海城、牛莊集結休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奉命進關。先頭師於二十三日開動，軍直屬隊二十五日開動，按照軍委「不惜疲勞，不怕減員，不怕受凍受餓」的要求，一路挺進。部隊跨過遼河、大凌河，在進軍途中到錦州才領取了冬裝，又經梨樹溝，由冷口跨過長城入關到玉田，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到達天津西北的寶坻集結。我們是東北野戰軍最先到達天津外圍的一個軍。

遼瀋戰役勝利結束後，部隊要進行休整是可以預料的，但休整多少時間，事先是不得而知的。但從總部先後的命令來看，則有休整比較長的打算。我軍在瀋陽以南的海城地區集結後，東野總部的第一個電令是部隊準備過冬的工作指示。第二個電令是十二月中旬召開全軍軍以上參謀長會議。第三個電令是四九年一月間在瀋陽召開東北戰區的高幹會議，野戰軍、省軍區以上的軍政首長出席會議。

我軍參謀長黃鵠顯同志去瀋陽出席東野總部召開的參謀長會議。在會議進行中，就接到中央軍委命東野迅速入關的電報，「入關配合華北人民解放軍，全殲華北蔣、傅軍，解放全華北」。因此，參謀長會議還沒有開完，就讓大家回去了。黃鵠顯回來時，我們正在舉行遼瀋戰役的慶功大會，他立即傳達林總、羅政委關於部隊立即進關的指示。入關的命令下達到部隊後，全軍上下熱烈擁護，很多指戰員表示：仗沒打夠，今後的戰鬥我們會打得更好！這真叫人民子弟兵呀，回想當年，我現在還是熱血沸騰。我縱隊的骨幹中，極大部分是關內河北人，聽說要入關解放自己的家鄉，更加興高采烈。遼瀋戰役這麼大的戰役下來，尤其是遼西會

戰，部隊上下疲勞至極。可是部隊接到命令後，祇準備了六天，我們於

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就出發了。

進關後對鞏固部隊就成為重要工作了。對部隊政治思想的主要工作就是解決一個「革命到底」的問題。為此，我們根據東野政治部「關於進關動員的指示」在進關前後都進行了深入的動員工作。

東野政治部動員工作的指示，摘要如下：

甲：我們的秋季攻勢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消滅了敵人四十餘萬，解放了全東北，我軍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大震動。蔣介石在廖耀湘兵團被殲滅後，在北平搞得吐血，回到南京後還繼續吐血。

乙：我們東北人民解放軍決定迅速大舉進關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要迅速打垮蔣介石，並斬草除根，使蔣介石永遠不能死灰復燃，永遠不能再殘害人民。我們在華北，一定要如同在東北一樣，積極作戰，把華北敵人全部消滅在華北的土地上。

丙：全國革命戰爭兩年多以來，我軍在各個戰場上的勝利，不斷殲滅敵人壯大自己，特別是最近數月內（七、八、九、十四個月內）殲滅了大量的敵人，四個月就消滅敵人一百多萬。我人民解放軍不僅在質量上早已超過敵人，而且在數量也超過敵人。全國的革命，已經迫近到最後勝利的時期。根據我黨中央的估計，祇要再有一年左右的光景，即可從根本上打垮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我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的武裝鬥爭，經過艱苦英勇奮鬥二十多年，現在確實已到了最後勝利的時候。因此，我們全體指戰員，應該再努一把力，每個人必須參加這一光榮的最後的解放戰爭。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年，也是每個革命同志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年。……

丁：秋季攻勢後，我們休整的時間是少了點。由於形勢變了，必須立即進關，不能再休息了。我們努力爭取打開天津、北平過新年。我們在北平、天津同華北友軍會師，將會是盛況空前的！

庚：進關是我們的光榮任務，我們應當萬分的興奮和高興進關。在關內的作戰中，建立我們新的功勞和光榮。每個連隊要保證沒有逃亡，沒有打仗怕死的孬種現象。我們要爭取偉大的勝利！

經過動員後，部隊情緒很高，決心要在解放華北的作戰中再立新功。四野部隊入關時，解放區沿途群眾對我軍入關有三點評論：

第一是，部隊整齊。我軍穿著統一的新冬裝，行軍的時候確實是很威風的。從遼寧的鞍山到天津的寶邸歷時二十二天，在我縱隊的行軍途中，隊伍整齊，歌聲嘹亮。群眾對我軍的評語是：「兵強馬壯！」

第二是，部隊裝備好。我縱的裝備同裝備比較好的兄弟部隊相比是中等水平。但在當時來說我縱隊的裝備就很不錯了。為了防空，部隊的汽車、炮兵大車都在晚上行軍，白天休息。在冀東的平原上，每天晚上都有機械部隊行軍，在數百里的公路上從黃昏後到天明汽車的燈光組成一條大的白光帶。站在高處一看，真是盛況空前！

第三是，部隊紀律好。部隊在解放區行軍，地方政府對部隊的吃、住、喝水等都招待得很好。在進軍路上發生了一個同群眾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少數幹部、戰士回家的問題。由於我軍有不少冀東藉的幹部、戰士，有的要走自己家門口過，有人的家離行軍路線很近。這是一個實際問題，解決得不好既會影響部隊也會影響同群眾的關係。經過研究，軍部做出了具體規定：凡是路過家門口的幹部、戰士，在沿行軍路線十里以內的，一律准假三天，回家探親。這一規定，得到了幹部、戰士和群眾的熱烈擁護，絕大多數人都能按時歸隊。當時部隊很窮，但軍部還是規定回家探親的人一律按一百斤糧食的折款下發現款。這一規定雖然數量很少，但發生了很好的效果。回家探親的幹部、戰士都說：「部隊沒有錢大家知道，祇要組織上有心就滿足了。」

部隊行軍到錦州以西的虹螺縣，軍長段蘇權奉第四野戰軍總部的命令，調任東北軍區司令部參謀處長。他即由現地返回瀋陽去了。當時我們軍部祇有一輛小吉普車和一輛救護車。段平時喜愛坐救護車，我們就把那輛車送給他了。老戰友惜別，真有難捨難分的味道。段蘇權是個很正派、很正直的同志，我們並肩戰鬥，配合得很好。

部隊到了天津寶邸時，在寶邸縣電話局我同北平附近的東野司令部劉亞樓參謀長打了一個電話。建議黃永勝回四十五軍任軍長。劉當即表示同意。過了幾天，部隊開進到寶邸黃就來上任了。我們全軍上下對黃都是歡迎的，黃永勝是四十五軍的老司令員、他對組建熱遼縱隊、組建八縱隊都是有很大功績的，團以上幹部對黃永勝指揮作戰的信心是很足的。

重要的決策

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入關後，整個華北的形勢大變。從東面的塘沽起到內蒙的綏遠，千餘里鐵路線上都是戰火連天。當年瘋狗一樣的傅作義，現在變成了烏龜，龜縮在北平城內一步也不敢外出。

爲了統一華北戰區的作戰指揮，中央軍委成立了平津前線指揮部。林彪任前線司令員和前委書記，羅榮桓任政治委員，聶榮臻任副司令員，劉亞樓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

毛澤東原來是決定先打塘沽的。他電示林彪「我軍應不惜疲勞，爭取於盡可能迅速的時間內殲滅塘沽敵人」。但是，打塘沽的情況不盡人意，一是侯鏡如的指揮所已搬到軍艦上，打不贏他就跑了；二是天津的敵人也有向塘沽突圍的跡象；三是外圍的地形對我十分不利，塘沽幾乎都是鹽田、水溝，沒有遮蔽物，而且鹽田不結冰，部隊根本不能展開，祇能沿田埂前進。各軍首長都認爲先打塘沽不利，劉亞樓也到了現場，一看就明白了。先打天津是林彪堅持的，毛澤東幾經考慮終於同意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致電林彪、劉亞樓，「放棄兩沽計劃，集中五個縱隊全力奪取天津，完全正確」。

十二月十八日，我們按照東野總部的電示，攻佔了天津周圍的要點。

一三三師奔襲楊村，斬斷平津鐵路、公路交通線。在這次戰鬥中，消滅敵人 2000 多人，俘獲敵少將師長宋海潮。三九九團五連李慶春副排長一次就立了三大功，榮獲全國戰鬥英雄稱號。

一三四師、一五八師在天津至軍糧城之間擔任阻擊任務，防止天津的敵人向塘沽突圍。

一三五師攻佔楊柳青、靜海一線。共斃傷俘敵人 3000 多人。

我們用了四天時間就搶佔了天津城郊主要的交通要道和要點，敵人向塘沽突圍的通道被我八縱封住。

天津前線指揮部在一月初即成立了。劉亞樓任前敵總指揮。他上任後，親自到我們軍部下達作戰任務，並視察攻城的準備工作。劉亞樓同黃永勝說：「林、羅派我來天津是來實習的，在你們帶領下實戰實習。有請各位多多幫助，爭取考試及格。」黃永勝則說：「總指揮在上，請多多關照。給我們的任務越硬就是對我的關照。」

我縱的任務是「協同四十四軍由東向西並肩突擊，與由西向東的三十八、三十九軍在金湯橋金剛橋會師。爾後先南後北各個殲滅敵人。四十六軍和一個獨立師在天津的東南角實行佯攻。」劉亞樓司令臨走前，我們殺了一條狗招待他，大家吃得非常高興，各個滿頭大汗。當時，黃永勝帶來一臺像一個小箱子的收音機，放在指揮所裏，黃永勝「顯示」說，這是遼西會戰時廖耀湘「送」給他的，不料被劉亞樓看上了，拿著就走，劉亞樓還對黃永勝開玩笑說，你們八縱厲害，叫陳長捷再「送」你一個。當年，我軍高級幹部之間，無論是上下之間，還是同級之間的關係都是十分融洽的，這是我軍的好傳統。

天津以東是平地，土包子都沒有，地面上建築物也很少。這種地形對攻城部隊運動十分不利。必須在總攻之前，下決心挖交通壕改造地形，通道與通道之間必須連接起來，面向敵人的方向多挖避彈坑和「之」字坑道。一三五師、一三三師挖了數以萬米的縱橫交錯的交通壕，對減少傷亡起了極大的作用。在天寒地凍的嚴寒下，敵人的炮火也不斷襲擊，對改造地形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我們的指戰員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準備攻擊器材，模擬訓練。攻擊器材最主要的準備炸藥包和傳送炸藥包的訓練。在城裏，敵人的工事有很多是鋼筋水泥工事，對那些工事祇有使用炸藥包來解決。

在訓練中，除了步炮協同之外，還有一個新的問題就步坦協同。在天津戰役中，總部配屬了我縱一個坦克分隊，步坦協同作戰，是我縱有史以來空前第一次。這對突擊部隊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戰士們說：「過去敵人用坦克來欺負我們，現在該我們用坦克來收拾敵人了。這真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為防止攻城部隊產生依賴思想，我們在戰前進行了認真的思想教育，著重說明了我軍在裝備很差的時候，打仗是靠人的勇敢，今天裝備好了，打仗仍然是靠人的勇敢！要發揮人的智慧與勇敢的作用。

我縱進入攻城準備的時候，十二月二十四日，天津市地下黨主動送來了城內敵情資料。我們立即將這些敵情資料繪製成圖，上報東野總部，總部又印發給了其他部隊。我們根據資料和實地偵察，選定了突破口。擔任尖刀連的班以上幹部，在師團指揮員的率領領下進行反覆地偵察，白天看，夜間摸、同時發揚了軍事民主，解決了很多的問題。這種從實踐出發進行訓練討論是最有效的訓練方法。在總攻前，擔任突擊的尖刀連和指揮作戰的營、團、師、指揮，對敵情，地形、運動道路等都很熟悉了，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數。

三分鐘突破民權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軍對天津發起總攻。在這一天發起總攻，沒有別的任何原因，正是「人等氣候」。因為祇有那段時間，天津護城河才能冰封，攻城部隊才能通過。

一月十四日七時，我軍對天津發起總攻。劉亞樓司令員在陣地指揮所一聲命令下：全軍開火！頓時千門火炮一齊轟鳴，大小炮彈辟里啪啦落在敵人陣地上，看起來就像急風暴雨中雨點打起的水泡一樣，傾時間，天津硝煙瀰漫，火光沖天。這是我軍有史以來最現代化的戰爭。

敵人在民權門的工事是相當堅固的，構築了大小近百個碉堡，並且是夾層的，前後兩道工事緊密相連，副防禦應有盡有，縱深達二百米之深。各碉堡地堡和散兵坑構成了嚴密的交叉火力網，縱深火力可隨時支援。為了防止我軍接近和掃清射界，在四、五百米以內的民房都強迫拆除了。民權門是天津敵人的主要防禦陣地。

在炮火襲擊之後，我縱即向民權門攻擊。一三三師是個老部隊，由他們擔任主攻，但是屢攻不破，黃永勝發了很大的脾氣，讓一三五師上，一三五師對作戰準備十分充分，在副師長吳瑞山的帶領下戰壕都挖到敵人前沿陣地附近，黃永勝下命令後，吳瑞山親自指揮一三五師四〇三團一連在三輛坦克和炮兵抵近射擊配合下，三分鐘就突破了民權門，這是我軍攻擊作戰史上一大奇跡！

該連勇士們十四日下午一時把紅旗插上了民權門。「殺開民權門」的紅旗在城門上飄揚。這面紅旗是一連英勇作戰的象徵，第一個把紅旗插到城門上的是鍾銀根同志，不幸他的雙腿被炸斷了，旗桿也被炸斷了。他被炸昏清醒以後，忍著劇痛，用雙手撐地，又一次把紅旗豎起來，真是氣壯山河！前後有五個勇士前赴後繼地把紅旗插上城門，最後是一個叫李澤山勇士完成的。

這面紅旗是勇士們的鮮血染紅的，整個紅旗血跡斑斑，彈痕纍纍，並有多處撕裂。這面紅旗曾經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我去軍事博物館參觀時，曾見到這面勝利的紅旗，引起了我對烈士的懷念。

一三五師預備隊投入戰鬥後，遭到了敵人屢次反突擊，全師雖然傷亡很大，但在友鄰配合下，縱深戰鬥發展很快。該師四〇四團十五日即進至金鐘河大街，消滅了守敵之後，三營七連即向金湯橋前進，把紅旗插到金湯橋上，七連指導員馬振海同志身先士卒，英勇衝擊，光榮犧牲。天津前敵指揮部的作戰命令是：「東西對攻部隊在金湯橋上會師」。我軍首長給一三五師的指令是：如果友軍先到橋山上，我則舉槍向友軍致敬，要是我軍先到橋上，祇能佔領橋的東頭一半，西頭另一半留給友軍。因為戰鬥還在進行中，對誰先佔領金湯橋曾有異議。後來，三十九軍曾向指揮部正式報告：「金湯橋是八縱先佔領的，我們向八縱學習！」

十四日十四時四十分，一三三師在民權門以北鐵路工人宿舍兩次突破均未奏效。後來軍首長命令該師從民權門進入城內，並向東南發展。該師進城後，巷戰打得很好，起到了積極作用，俘虜敵數千人，繳獲也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戰果。該師團政治主任長征同志在戰鬥中壯烈犧牲。軍的預備隊一三四師、一五八師先後於十四日二十時和十五日十時投入戰鬥。

一三四師直接向北洋大學方向發展，殲滅敵主力一五一師大部。一五八師投入戰鬥後，在一三四師的右側同該師同一個方向發展，完成作戰任務很好並取得了戰果。

天津戰役打得好！八縱共殲敵 28400 多人，俘獲敵少將師長張越群、陳膺華、何卓、陳琨。我軍也有很多戰鬥英雄，其中一三三師的副排長李慶春，一三五師的班長宋生，一三四師的副班長劉瑞林都榮立大功，一九五〇年出席了全國第一屆英模大會。

八縱打得好，但打得也很艱苦，尤其是一三五師，傷亡很大。清掃戰場時，黃永勝親自到民權門一線看一看，敵人究竟是什麼樣的防禦，打得如此艱苦。我們在走的一路上，看到我們自己犧牲的戰士，個個死得慘烈，身上的彈孔和外露的棉花，臉上血汗模糊一片。見此情景，黃永勝先是默默地流淚，走著走著他竟嚎啕大哭起來。他愛兵！為這麼多慘烈犧牲的兵而流淚。我們以後的功名，就是這些烈士的鮮血寫就的，我們深深懷念這些戰友們。

城市政策紀律

天津戰役的城市政策紀律是很好的。東野總部的嘉獎令，就是對天津城市政策紀律總的評價。

嘉獎令

上月中旬攻克天津戰役中，我軍參戰部隊，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三軍之一二八師、四十四軍、四十五軍、四十六軍、四十九軍及炮兵、工兵、裝甲部隊，紀律均極良好，認真愛護人民利益，保護工廠、倉庫、學校、醫院、公共房舍及市內各種設備和軍用物資。認真維護秩序，不亂打槍，使市面秩序迅速恢復。所有成批和分散的繳獲的物資，均交指定機關機關接收，沒有失散，使企業設備和其他各種設備除一部毀於炮火者外，未遭破壞。由於這種成績，使天津市民深為讚揚。從而使我黨我軍政策之推行獲得了許多便利條件。為了發揮此種成績，特對天津作戰各部隊指戰員致以謝意，並在全軍內傳令嘉獎。此令。

林彪 羅榮桓 劉亞樓 譚政 陶鑄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於北平

中央軍委平津前線分會，對天津的城市政策紀律提高到了戰略地位。四九年一月底，東野總部進入北平以前在北平東面的通縣召集高幹會議。專門討論了城市政策紀律問題。林、羅、譚在會上講了話。

林彪講話很簡單，很有力量，他說：現在我們又要過一個大關了，就是城市政策紀律問題。這兩關的性質不同，怎麼辦？要領在哪裏？最主要的是「不動」！不管看到什麼好東西不要動手就是了。一般說來，沒有

犯紀律的戰士，祇有犯紀律的幹部，祇要幹部的覺悟提高了，城市政策紀律的關也就過去了。

羅榮桓講話比較長，是會議的主講，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

(一) 對城市政策紀律的戰略地位問題。我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傳家寶，現在我們提出的城市政策紀律也還是屬於這範圍之內的問題，但它的戰略地位提高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軍民關係問題，城市政策紀律是執政的問題，這就是說，奪取全國政權之後，我們的黨要成為執政的黨，能夠管好城市是執政的重要問題。平津政策紀律好，是我們能夠執政的開始。

(二) 幹部責任性問題。……打仗是最大的政治任務。有一種人認為軍事任務是『硬』任務、政治任務是『軟』任務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是一種誤解。我們的部隊為什麼打仗總是完成得比較好呢？原因很多，從幹部責任性來說，軍事、政治、後勤幹部心齊是關鍵問題。領導幹部心一齊，帶領全體指戰員一起幹，就能夠把這個光榮傳統發揚到管好城市政策紀律上來。

.....

(三) 抓得緊的問題。對搞好城市政策紀律是需要進行政治教育，思想動員的而且越深入越好。更重要的是要有強有力的組織工作，要有具體佈置，要有監督促進，要有實際解決問題的辦法。

.....

對管好城市政策紀律預防是主要的，如果發生了問題再收拾就晚了。各部隊在自己的作戰區，派出部隊維持秩序。派出糾察隊，派出幹部檢查隊等都是必要的。這些也都是『抓得緊』的辦法。

祝各作戰部隊，取得軍政雙勝利！

打天津之前，我縱隊在天津政策紀律做了具體的規定：

(一) 一切原封不動秋毫無犯，打到哪時保護到哪裏。在自己作戰區之內，一切公私企業，市政機關，文化設施，黨團機關、社會團體，軍事機關等等，祇有負責保護，不准清查，更不准破壞。

對外國租界和外國機構，如其內沒有敵對行為和私藏蔣軍軍官，我軍可以不入內，並加以保護。要是敵人利用上述單位實行抵抗，則堅決消滅之。

(二) 實行一切繳獲歸公。

(三) 遵守城市秩序，絕對遵守軍管會的領導。

(四) 絶對不准與友鄰爭繳獲。任何地方，祇要友鄰先到，我軍就不得進入；友鄰到我軍佔領的地方，則應以歡迎的態度與之相處。

(五) 絶對不准搜俘虜腰包。除武器和軍用品之外，任何東西都不准拿取。要堅決執行俘虜政策。

我縱在天津的城市政策紀律是很好的。可以說，做到了市軍管會滿意、人民群眾滿意、部隊滿意。這裏我想在無數的故事中舉三個小故事就可見一斑了。

第一個故事：老少三代團圓。

在民權門西北，有一家老少三代人，老爺爺七十多歲，他的女兒四十多歲，其外孫女十歲。一月十四炮火襲擊時，國民黨把他們擣出家園，在恐慌之中老少三代人走散了。

在戰鬥進行中，我軍在巷子裏看到一個小姑娘孤獨一人在哭。一個連指導員讓一個戰士在牆腳下給小姑娘挖了一個小避彈坑並交代小姑娘不要走，還給了他一點乾糧。指導員將救小姑娘的事報告了團政治處，並得到了主任的支持，派人協助指導員回到了小姑娘避身的地方，由於又餓又凍已經奄奄一息了，他們立即設法搶救了小女孩。待小孩甦醒之後詢問她，孩子祇記得自己家的巷子名，他們三人把孩子送回去時，可是孩子家已經成了一片廢墟了。

部隊幹部一直陪伴著孩子，當日深夜小孩子的母親果然找到家裏來了，母親看到女兒在解放軍照顧之下還活著，感動得痛哭。第二天早上，還是這個團的人又把老爺爺送回來了。部隊指戰員都為之喜慶，老爺爺三人身上帶的錢和吃的東西，一點不差。老爺爺和母親最後祇提出了一個要求：要告訴他們是哪個部隊的，小姑娘改名為軍女。後來這個故事在天津日報連載，部隊南下後，軍女同部隊一直有聯繫。

第二個故事：半瓶酒。

在金鐘河南岸邊有一家十多平方米的煙酒雜貨店子。十四日雜貨店被炮彈打塌一個小角，店內的貨物香煙、瓜子散落得滿地都是，有一瓶酒打碎了，下半截剩三分之一。部隊打到那裏時，把這小店子的東西收拾了一下，把店塌了的地方堵上了。並在店門上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這家店舖主人不在，我們部隊任何人不准入內。

十六日上午八時許，我同天津市軍管會工作人員一起進市去察看市內情況，我們走到該小鋪門口，看到了門上貼的紙條，就停下來了，部隊的同志把前後情況都給我說清楚了。我感到這是一個「小麻雀」可以解剖一下，我即向維持秩序的部隊的同志說：這家鋪子的主人回來後我們移交時，一定要請我和軍管會的同志到場。我們要從這個小小的典型來看你們部隊紀律的執行情況。

過了三小時之後店主回來了，我們和軍管會的同志立即到了現場。我向店主說：現在你和你的家人，立即清查你的貨物，看少了什麼沒有？

因為店不大，貨物並不多，經過不多長的時間就查清了。店主把貨物的原有數和現有數都開列出來了。店主說：中央軍把我趕出家門三十多小時了，我店裏的東西除了打破一瓶酒少了不到半瓶之外，其餘什麼都不少。他最後舉手呼起「堅決擁護解放軍接管天津」的口號。

第三個故事：一桌還未吃的宴席。

天津東城離民權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中國紡織工業第七廠」，簡稱「中紡七廠」，這個紡織廠是當時天津比較洋氣的廠子，廠內有總經理公館。在戰前根據市內地下黨提供的情況，我軍攻城開始炮火襲擊時炮兵注意到了對該廠的保護，整個工廠遭到的破壞不大。

十六日下午，我軍軍部決定從磚瓦窯裏撤出來，搬進中紡七廠總經理公館裏去。

我們到達中紡七廠總經理公館之後，大家上樓到了總經理公館會議室，在當時來說，會議室的設備相當洋化，但一切東西都沒有動，仍然是規規矩矩「各就各位」。

大家坐下之後，我同黃參謀長就到處走著看看，當我們走到後麵食堂時，看到一桌擺得好好的酒席，我看到此景心中正納悶。此時參謀長開口說了：我們小灶司務長（管我們軍首長生活的）還不錯，一來就準備



平津戰役勝利後留影

好了酒席，警衛排長說：才不是呢！我昨天來看房子就是這樣的！這引起了我和參謀長的注意。

我和參謀長走進了廚房等處看到了燉好的肉、雞，案板上有炒好了各種菜，灶房裏各種各樣吃的東西都有，豐富得很！我軍炮火襲擊開始，這桌飯就吃不成了，「一桌還未吃的宴席」這樣留下來了。

我們回到會議室之後，把看到的事同大家詳細說了一遍，引起了大家的興趣。軍管會的同志回來後對大家說：「這次天津的城市政策紀律實在是了不起的，剩下的那桌宴席是最好的戰利品，你們吃了吧。」正好這時黃永勝來了，他說：「不能算戰利品，不許吃。叫司務長給我們做飯。」

我們四十五軍，在平津戰役比較好地完成了東野總部給予的任務。這次戰役同半年以前的遼瀋戰役前進了一大步。

勇猛果敢的黃永勝

關於對「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認識，黃永勝和冀熱遼的主要領導矛盾很大。黃認為和平不會白來，是要打擊敵人並取得勝利才能到來，有些



和一三五師戰鬥英雄、毛澤東獎章獲得者在一起。左一韋祖珍、右一邱會作。

人熱衷「和平」。熱東四戰四捷後，黃永勝卻讓林彪給「盯」上了。四七年冬天，林、羅首長就把黃永勝調到我軍主力第六縱隊任司令員去了，段蘇權同志接任八縱司令。

黃永勝同志一九二七年參加秋收起義，跟毛主席上了井岡山，從此他一直戰鬥在革命鬥爭的最前列。毛主席曾說過，黃永勝是從戰士、班長、排長、連長一級一級上來的，直到當總參謀長。

在井岡山鬥爭最艱苦的時候，那時候能吃上「紅米飯、南瓜湯」還不錯呢！尤其是傷員苦不堪言。不少人要脫離革命隊伍，和黃永勝在一起的，要離隊的人，他一個一個都給勸回來了。

一九三三年，他在一軍團當團長的時候，屢建戰功，榮獲了紅星獎章，這是很大的榮譽。三四年開始長征的時候，他任一師三團團長，三團是殿後的，任務非常艱苦，過湘江時戰鬥相當慘烈；過草地的時候，他的牲口陷到軟草灘裏去了，在不短的時間裏，他都是走路。後來他任紅二師師長；一一五師組建時，他是六八五團團長，一直在重要的軍事指揮崗位上。平型關戰鬥後，他跟蔣帥到西安督去了。

日本投降以後，幻想和平的空氣很濃，冀察熱遼幻想和平的空氣更濃，根本不想打什麼仗，八縱的任務幾次都是去北寧線扒鐵路。黃永勝同志對形勢認識得很清楚，他認為和平不是白來的，祇有打擊敵人，才能爭取和平，我們的思想很一致，軍、師領導的思想也很一致，所以我們在黃永勝的領導下積極找仗打，一下子搞了個四戰四捷，其實是六戰六捷，黃永勝說上面叫四戰四捷，我們就不要亂叫，不要自己吹牛皮，找仗打，不但消滅了敵人，武裝了自己，也鍛煉提高了部隊。

遼西的勝利，給了陳誠一個「見面禮」——當頭一棒！當時，八縱剛成立一個月，兵力不是很強，尤其是炮兵不強，炮少，炮彈更少。政委劉道生也沒有到位，黃永勝擔子很重，我這個副政委和參謀長黃鵠顯都盡力配合他工作。八縱當時還不到兩萬五千人，可是我們不到半個月就消滅了敵人一萬六千多人。當然，這裏面有指戰員的奮戰，但黃永勝是我們八縱的英雄，他判斷敵情快，下決心快，軍事指揮的功力很強。

尤其是第二次打楊杖子，47個小時就殲敵一萬兩千多人，而且是敵人的正規軍四十九軍，敵我傷亡是多少？10：1呀！戰鬥開始前，我們偵察的敵情是兩個團，黃永勝說：「兩個團來找我幹什麼？」部署部分兵力去打，結果沒打動。再去偵察，好傢伙，是兩個師！這下子黃永勝高興了，他很快就定下了戰鬥決心，一下就吃掉敵人兩個師加一個軍部，這就叫軍事指揮的功力吧。戰鬥結束後開幹部會，大家都很興奮，但都說不出話來，都在面對面的「嘿嘿嘿」傻笑！

第二次打楊杖子的時候，還有一個驚險的故事：我們的指揮所設在山頂上，大家已經熬了幾天幾夜，黃永勝最為辛苦，兩眼熬得通紅，他從衣兜裏掏出煙來抽，我和黃鵠顯也很讓煙，就問黃討煙，黃說都揉爛了，我們以為他不肯給就把他按在地上，強行「搜查」，黃永勝說：「別打我的土豪呀！」正在這時，敵人一陣炮擊，向我們射來，塵土砂石像雨點一樣打在身上，此時正好「嗖——」一發炮彈落在我們不到十米處，但不見響，原來是一發臭彈，真是虛驚一場，不然全完了。黃永勝很鎮定，他抖了抖身上的土說：「媽的，敵人要跑，部署追擊圍殲！」

仗打勝了，這個時候承德那邊的怪話、風涼話也來了。自己熱愛和平，自己打仗不行，還說別人的不是。

八縱一下發展到四萬多人，林彪高興地說：「八縱還真有點主力的樣子。」不過林總也抓到了黃永勝，大家痛痛快快一起干了半年多，黃永勝就調到最大的主力六縱隊去了。

六縱是一一五師六八五團的老底子，黃當過團長。遼西會戰，黃永勝領導的六縱又立了大功，堵住了廖耀湘退回瀋陽，廖耀湘要是退回了瀋陽，東北的形勢又大不一樣了。

打天津時，黃永勝又回八縱。八縱天津打得好，三分鐘突破民權門，第一個攻佔金湯橋。平津戰役結束後，在北平開四野高幹會，毛主席特意叫黃永勝到前面來，可能林、羅首長向主席匯報了黃永勝在東北和平津的戰功吧。當時黃永勝很激動，我們幾個也跟著激動。

第十二章 向中南進軍

四野高幹會

平津戰役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一九四九年三月由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奉令向中南進軍，解放全中南。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是有充分準備的。當時的中南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六省。中南地區的敵軍主力為桂系白崇禧集團。

野戰軍高幹會原定遼瀋戰役後在瀋陽召開，但因急於進關未曾開成。後來才在北京舉行。打了兩個大戰役祇開一次高幹會，意義更為重大。

毛主席出席了會議，並講了話。那天毛主席非常興奮，他說：「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即將土崩瓦解。我們三路大軍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做好準備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高幹會的內容是：傳達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討論進軍中南的任務。

林彪傳達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因指揮打仗，林總未出席），有三點在我的記憶裏是比較深刻的，這就是：一，國內形勢問題；二，防止糖衣炮彈的問題；三，將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全中國。

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解放戰爭期間的三大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已經結束，國民黨的敗局已定。長江以北已經解放，國民黨撤到長江以南的軍隊不到三百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已經發展到四百多萬了，整個力量超過了國民黨，我軍解放全中國指日可待了！

防止糖衣炮彈的問題，主要是指階級鬥爭問題。全國解放以後，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被推翻了，但資產階級依然存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問題。過去的敵人是用真槍打我們的，但沒有打倒；今後的敵人會改變方式，用糖衣裹著炮彈來打我們。我們的人在戰爭年間是英雄，沒有被敵人打倒，解放後有的人可能是被糖衣炮彈打倒的，我們大家都必須警惕這個問題。

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是我們的方針。我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決不能半途而廢。首先是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美國人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打不起來。我們向江南進軍，即使美國援助國民黨，我們也不怕，蔣介石沒有多大力量了，我們有力量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在傳達之後，就是大會發言討論了。會上大都是政治委員上臺發言的，發言的順序也是照單的番號排下去的。黃永勝無論如何不肯發言，我就祇好上臺了。我的發言，除了擁護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之外，主要講了解放中南的問題。發言的要點如下：

對解放中南的問題，可以說祇要我軍一到就是勝利，我們四野是有戰鬥力的，又有正確的領導與指揮，林總的指揮本身就是很大的戰鬥力。我們是有勝利信心的！

在解放中南的戰爭過程中，我們認為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艱苦奮鬥的問題。部隊認為半個中國解放了，有吃有穿就不是問題了。但事實上，我們目前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還不能完全適應部隊的要求。我們餓肚子、打赤腳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艱苦奮鬥這個光榮傳統還是傳家之寶，在部隊應當反覆進行教育。

第二個問題是同地方黨的關係問題。南方地下黨長期堅持地下鬥爭是有功的。我們是解放大軍，從南到北，現在又從北到南了，將來必定會有功臣相遇的，功臣碰到一起，不能沒有矛盾。對這個問題，既是軍隊同地方黨的關係，也是軍民關係問題。我們的原則是凡遇到這類問題首先放到軍民關係上來處理，進而一步再考慮到軍隊與地方黨的關係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部隊的思想問題。過去部隊的主要思想問題是與個人生死有關的問題，現在主要的就是與個人前途有關的問題。其中突出的又是家庭婚姻問題。這個問題，對部隊影響是很大的。

軍屬的家庭生活比較好的很少，多數都低於群眾一般的生活水平。多數家庭祇有老人，勞力很少。固然有地方工作問題，但主要的還是戰爭的影響，大家要正確對待，革命徹底勝利了，大家都會過上好日子。

現在，我們同幹部做思想工作，一般的是很被動的。講大道理不能解決具體問題。幹部普遍說：「打仗的時候，我們從來不考慮個人問題，死了就一切都解決了。現在給我一點很少的時間去處理一下家庭問題總算合理的吧！」我們認為幹部的要求是合理的，準備有計劃地解決這個問題。在平津戰役前後，准許了少數幹部回家，絕大多數都能按時回來，反映很好。在今後的兩三年內，我們決定節省一切費用，省下錢來解決幹部和老戰士回家探親一次的問題。

對我的發言，會議做總結時林總還讚揚了我。林總同我不熟悉，事後他還專門向政治部宣傳部長蕭向榮調查了我的情況，蕭又來告訴我。林總對蕭說：「邱會作同志這個人，思想水平、工作能力都比較高，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人。我過去不認識此人。」

林總在高幹會上的總結。他的總結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解放中南的問題；二，農村剿匪問題；三，政治思想工作問題。

一，解放中南問題。林總說：解放中南在作戰問題上，大家不擔心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總的形勢對我們有利，這是同蔣介石打了二十多年仗，第一次出現了我強敵弱的形勢。今後我們打仗，不是打不了的問題，而是打不到的問題。我們祇要把敵人抓住了，吃掉敵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中南敵軍主力是白崇禧的桂系部隊，這個部隊的戰鬥力是相當強的，白崇禧的主力，現在部署在南昌以東的浙贛線和湖南境內的湘桂線。敵人在戰略上是要同我們拖延時間，等待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們則要力求提早結束戰爭，以便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全國實行經濟建設。

我們向中南進軍，擬分為：東、中、西三路。東路四十、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軍。這路主要向南昌進軍，力求抓住敵軍主力在浙贛線殲滅之；中路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軍。這路向長沙方向進軍；西路三十八、三十九軍，這路主要是向湘西和橫南進軍，力求阻止敵人退入

貴州和雲南。各路大軍除四十、四十三軍先行出發了之外，其餘各路大軍都將在四月間先後出發。我們預計在今年內全部解放中南大陸地區。

二、農村剿匪問題，這是徹底解放農民的重要問題。大大小小的土匪是直接壓迫農民大大小小的蔣介石，不消滅土匪農民就不能解放。

我們今後的工作中心，從長遠來看重點在城市，但初解放的第一階段，工作的重點還應放在農村。農村問題不解決，城市就沒有飯吃。沒有農村的支援，城市人活不下去。

三、政治思想工作問題。我們目前正處在大變化的時期。我們將要取得全國的勝利，這是國家的大變化；我們將從長期戰爭轉為相對和平，這是軍隊的大變化；上面兩個大變化，必然引起軍隊思想的大變化。這是客觀變化的必然性。

在新的時期，軍隊政治思想工作應當有新的內容。例如，幹部和老戰士的家庭生活問題，婚姻探親等等都是新的問題。這些問題能夠解決一個，比留下一個總是好的。當然，整個問題還是要由國家來解決問題。

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這個大問題仍然是中心問題。我們祇有把戰爭進行到底，我們才能徹底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我們不少幹部打了半輩子仗了，極大多數幹部和老戰士也打了幾年仗了，這些都是我們大家的光榮。我們大家都要珍惜革命的榮譽，也要珍惜自己的榮譽。榮譽來之不易，但容易毀掉！這是大家都必須注意的問題。

林總的總結最後說：「我們進一步團結起來，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解放全中國！」。

當時，中央駐北京以西香山，四野總部駐城內王府井大街的北京飯店裏。一天下午，參加四野高幹的全體人員，均赴香山接受中央領導的接見。

參加接見的有各軍（四十、四十三兩軍已行動，南下了）和特種兵縱隊，總部各機關負責人。各軍為單位集體入場。我四十五軍參加接見的有：黃永勝、我，還有張天雲、黃鵠顯、林忠照（政治部副主任）。被接見的人入場後，由四野參謀長劉亞樓向毛主席等人一一介紹。毛主席拉著黃永勝的手說：「認識！」；拉著我的手說：「長大了，不認識了！」周總理拉著我的手說：「老樣子，認識！」

接見完之後，就在接見廳裏集體合影。整個接見林彪、羅榮桓等都在陪同。

接見和合影之後不久，宴會即開始了。這時毛主席站起來，邊張望邊喊：黃永勝在哪裏，到前面來。黃永勝從我們身邊到前面去了，他感到很光榮，我們都感到激動和光榮，毛主席跟他說了一陣子話。宴會用的桌子還是老方桌，酒杯是規格不一的老酒杯，飯碗是老土碗。菜很簡單，除涼菜之外，都是大盆菜。整個宴會的氣氛還是「老八路」作風。在吃飯快結束時，我和黃鵠顯看見周恩來副主席尚未退席，即去向周副主席敬了酒。周看到我們也很高興，我們連碰了三杯酒。

將革命進行到底

平津戰役之後，部隊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進軍中南之前專門進行了政治整訓，思想變化的實質上就是戰爭觀的問題，也就是是否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的問題，主要的是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是繼續打仗的問題。我們的部隊，特別是幹部，對必須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必須徹底消滅蔣介石，必須解放全中國，並無不同的意見，都是雙手擁護的。

第二是家庭問題，這是最主要的思想和實際問題。我軍以河北為主體的華北籍的官兵多於三分之二，當時駐在平津地區之間整訓，來隊家屬在三萬餘人次，平均一個河北籍的人來兩個家屬，不少是四、五口一起來了。這次家屬來隊充分看出來了我軍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係，但幾萬家屬來隊，大多數都起消極作用，這對部隊是一個大的衝擊。四九年二月至三月間，全軍開小差或私自回家的有千餘人，這些人多數都歸隊了，我們對這個問題又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對他們祇是說服教育沒有給予紀律處分，穩定了部隊。幹部、戰士的家庭問題是個嚴重問題，主要是家裏都是老弱病小，沒有勞動力，生活困難。為了協助地方政府解決部隊幹部、戰士的家庭問題，我們向冀中、冀東、熱河等地，派出了比較強的專門工作組，深入家庭一個一個地解決，對部隊思想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婚姻問題，這個問題也是主要的實際問題。婚姻問題最突出的是幹部和老戰士年齡都大了，早都超過了一般的結婚年齡。我們採取的政策是幹部和老戰士回家，祇要遵守政府的婚姻法，都可以結婚。

部隊存在上述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是客觀的，實在的。怎樣解決呢？我們提出了教育、忍耐、抓緊六個字的方針。

(一) 思想教育是政治整訓的主要問題，重點是輪訓幹部。以師為單位分兩期對連排幹部，部分班長和老戰士也參加了輪訓，輪訓的規模是很大的。

我在會上幾次講到：我們要進軍江南，要從根本上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今天我們奪取政權需要人民軍隊，將來鞏固政權仍然需要人民軍隊。就是全國勝利以後，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也需要人民軍隊。解放了，在軍隊幹沒有前途的思想是錯誤的。現在的部隊的思想問題，不是怕敵人，不是怕打仗，也不是害怕美帝國主義。現在部隊最主要的思想問題，是個人的具體問題與當前形勢發生了矛盾，也就是個人前途與家庭等實際問題糾纏在一起了。我想，對這樣的問題，要有耐性，不要急躁，要告訴我們的幹部戰士，自八縱成立以來，尤其是在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中，犧牲了多少戰友，他們不要說回家看看，就連自己父母的面也見不上了，他們爲了什麼？他們的個人利益又在哪裏？他們爲了人民解放，爲了建立新中國！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是完全可以解決問題的。我們應當相信幹部的極大多數是會革命到底的！因此，經過部隊各級領導的深入工作，達到了較好的效果。

(二) 忍耐問題。對這個問題首先要承認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我們的幹部是會革命到底的；二是，我們不少幹部當前遇到很多的困難，這些困難落到誰頭上都是問題。部隊幹部的困難是爲革命造成的，對幹部的困難不承認是不行的，我們要商量的問題就是怎樣暫時忍耐的問題，大家要從苦悶中走出來。等全國解放了，問題都能得到了解決。

(三) 抓緊的問題。對幹部隊伍存在的困難，我們軍黨委和軍首長是很注意的也是抓得很緊的。軍黨委的決定是：一，進軍中南一段落之後，在當時的形勢可能時，幹部回家一次；二，由軍派出工作組到各根據地，普遍訪問軍屬並協助地方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三，現在少數人自己回家去了，祇要自動歸隊，軍裏準備正確處理他們的問題。

幹部們對黨委的決定，反映很強烈。大家說：「對黨委的決定，我們心服口服，祇好把困難藏在肚子裏，先執行指示。」極大多數都是比較高興的進軍中南了，在湖南和廣西的仗也打得很好。我軍幹部的主體是很好的，是戰鬥力強大的基礎，四十五軍進軍中南，是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的！

向江南進軍

一九四九年四月間，第四野戰軍轄四個兵團，十三個野戰軍，每個軍轄四個師和若干炮兵師，大舉南下，向中南進軍！

第四野戰軍由平津地區出發，沿著平漢路兩側分兩路南下。大軍到了豫鄂交界時，則兵分三路：一路在平漢以西，直指鄂西、湘西；中路沿著平漢路，直指漢口；一路經大別山以西，直指鄂東。三路齊頭並進向長江及其以南進發。由於人民群眾對自己軍隊的熱愛，親切地稱解放軍為大軍。

第四野戰軍總部駐武漢，司令部設在漢口當年的白崇禧「剿匪」總司令部內，當地人民說：剿總大樓，今天成了林彪大樓。解放後，白崇禧的老樓已經有傾斜之勢，我們又在老樓的旁邊照老樓的樣子建了一座新大樓。在老大樓的北邊，有白崇禧公館，門牌為 100 號。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我軍由天津南楊柳青出發，奉命向長江以南進軍。我軍由天津到湖南湘潭，實際行程約一千五百公里。行軍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天津至湖北鄂城。這一階段走的路線是：先沿津浦線南下，轉魯西曹州，豫東商丘、周口，豫南潢州、新縣，再經湖北麻城，六月二日到達長江南的鄂城。在鄂城進行了約一個月的休整。

第二階段：由鄂城至湖南湘潭地區。這一階段走的路線是：經崇陽通山，翻過幕阜山到了江西境內，再經修水、銅鼓、萬載，八月四日到達江西萍鄉，再到湖南湘潭地區。在該地區休整了一個半月。

四十五軍南下編制序列：

軍長：陳伯鈞（南下開始時，黃永勝還是隨軍行動）
政委：邱會作

副軍長：張天雲

參謀長：雷震

政治部主任：段德彰

政治部副主任：林忠照

後勤部長：劉錫三

一三三師

師長：張萬春

政治委員：謝明

副師長：鄭壽才

參謀長：韓仰山

政治部主任：鍾池

一三四師

師長：黃鶴顯

政治委員：謝家祥

副師長兼參謀長：張曉冰

副政治委員：汪易

政治部主任：藍文兆

一三五師

師長：丁盛

政治委員：韋祖珍

副師長：吳瑞山、韓聲濤

副政委：龍標桂

參謀長：劉江寧

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一五八師

師長：李道之

政治委員：王曉生

副師長：徐其海

參謀長：莫易明

政治部主任：侯全智

四十五軍南下時是四個師，一個軍屬炮兵團，兩個補充團和後勤機關等，全軍共計八萬五千人。我軍南下時真正是一個人數相當多的野戰軍。



和四十五軍戰友在一起。左起：孔瑞雲、丁盛、邱會作、林忠照、謝明。

軍，當時我軍一個軍的人數同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由江西瑞金出發長征時的人數幾乎相等。

我們剛出發十天，就接到四野總部發來的毛主席、朱總司令《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召全軍將士「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這對部隊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四十五軍南下是經過了嚴峻考驗的，大多數幹部戰士是「背井離鄉」了，但是在戰勝了不願離開家鄉的保守思想後，部隊又浩浩蕩蕩南下了。那時哪有柏油路，都是土路，部隊行動千軍萬馬，塵土飛揚，「車轔轔，馬蕭蕭」似一條黃龍翻滾，十分壯觀。但是到了安徽境內，又正值梅雨季節，天天漸漸瀝瀝的小雨，部隊沒有雨衣，戰士們幾乎是穿著濕衣服行軍和生活。六月初，部隊跨過長江就進入雨季，部隊常常冒雨行軍走在泥濘崎嶇的路上，雨一停就是暴曬的太陽，部隊對南方炎熱的天氣很難適應，但是叫苦的反而少了。

七月十八日轉輦行軍到湖南的湘潭地區，在行軍中度過了一個盛暑，發過痢疾或中過暑的全軍近八千餘人，但大部分能堅持隨隊行軍，能夠按時到宿營地的，一般的都祇有一半左右，對這些人幹部都稱之為「神仙」。部隊行軍差不多都要走一天，等一天，兩天的路分為三天走，部隊中暑的慘狀是難以形容的。

軍直屬隊一梯隊四百餘人，大約是七月十五日由湖北通山向幕阜山北麓出發，這是一條由湖北通往江西的大道。我們上路走了約兩小時就有一半的人倒在路兩旁了，當時祇好停下來休息兩小時，經過急救和休息之後，才能繼續行軍。後來，我們軍直屬隊改為早晚行軍，每天行軍路程不超過五十里路。這樣大約經過一個星期之後「好漢」就多起來，對暑熱也挺得過了。

從天津出發，我們已經走了三千多里路，我全軍將士得到了極大的鍛煉，真正成為名符其實的「野戰」軍了！

南下一路沒有打什麼打仗。大約是七月下旬，四野總部組織湘贛戰役，四十五軍的任務是在江西萍鄉一帶切斷湘贛鐵路和公路，堵住白崇禧逃往湖南、廣西。一三四師在江西銅鼓以南，四野總部命令該師截擊由南昌西撤的驃馬牽引的炮兵部隊和運輸部隊。部隊經過三小時多的急行軍到達了離公路六、七里的地方，部隊散了架子，滿山遍野都是人不能繼續前進，不少人甚至都不能動彈了，口裏不向外冒白沫。我拿起望遠鏡一看，公路上向西撤退的敵人車輛多得很，但又一點辦法都沒有。全師能支持的幹部、戰士集合起來共計不到一千人，由副師長帶隊打到公路上去了，但敵人的主力已經過去了，祇截到一個尾巴，繳獲不多。還好，總部並沒有批評，可能知道部隊境況，林總這次很「客氣」地說：「這次跑幾個敵人也無妨，下次一起收拾。」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軍進到了湘潭地區，就停下來休整了。這是由兩個原因決定的，第一是敵情發生了變化。白崇禧的部隊都由浙贛線撤到湘桂線的湖南地區。主力在衡陽至寶慶一線，同時還揚言要在衡陽同我軍決戰。第二是我軍急需休整恢復體力。當時部隊病號很多，幾乎失去了戰鬥力，不休整是不能戰鬥的。總部命令，四野全軍都在就地休整兩個月。

山地運動戰的典範

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四十五軍在江西的萍鄉地區奉命進入湖南，經株洲西渡湘江到了湘潭、湘鄉地區。我軍十月一日進至湘西南的永豐鎮宿營時，從無線廣播上收聽到新華社的消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主席的話真是驚天動地，對部隊鼓舞極大！

原來，我們估計白崇禧可能要在廣西才與我軍決戰。這時，林總獲得絕密情報，立即調整了部署，急令十二兵團司令蕭勁光「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三個軍，直接向寶慶、衡陽之間及其以南前進，設法抓住一股敵人，並斷其後路。」我們也就是在十月一日晚上，接到四野總部的命令：「白崇禧主力還在衡陽、寶慶地區，我們決心在該地區與白崇禧決戰」。部隊立即向衡寶公路一線攻擊前進。那時，部隊勁頭大得很呀！「以戰爭的勝利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消滅白崇禧向新中國獻禮！」成爲我們戰鬥動員的主要口號。

敵我態勢。白崇禧主力第一兵團和三兵團（轄第七軍、第四十六軍、第四十九軍）和十一兵團，部署在西起寶慶，東至衡陽和衡寶之間的水東江地區及其以北的永豐鎮，形成「品」字形防線，企圖在衡寶公路上與我軍決戰，敵人兵力約爲三十萬人以上。我軍當時在衡寶線附近的部隊爲：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九五個軍。四野總部九月九日命令十二兵團指揮上述五個軍會同在寶慶以西的十三兵團殲滅白崇禧第一兵團於寶慶。九月三十日我軍開始戰役行動。

十月二日，四十五軍各師按照軍的作戰命令均向衡寶公路上的水東江一線攻擊前進，各部均與敵有所接觸。這證明了敵人並無撤退的跡象。我軍在衡寶線上與敵人決戰成爲現實。

十月五日，四野總部感到我軍在第一線的部隊過少，決戰力量不足，即命令十二兵團指揮的各軍停止前進，均在現地待命。同時總部命令十三兵團向寶慶、祁陽之線攻擊前進，二野五兵團向衡山衡陽方向急進。我軍可集結十四個軍的部隊，四野幾個重型炮兵師亦向湘潭至寶慶公路上集結，我軍準備強大的兵力與敵決戰。

整個戰場形勢是：白崇禧對我軍的意圖一時捉摸不到，敵人各部隊都在原地未動。由於山地使部隊的運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軍的戰役決心也定不下來。整個戰場出現了暫時的平靜。

十月五日，四野總部考慮到我軍一線兵力不足，不宜推進過快，十二兵團發出各部隊停止前進的命令。一三三師、一三四師、一五八師都停了下來，一三五師在行進中未開設電臺，沒有接到電報，該師五日拂曉突破了衡寶公路上的水東江段，向公路以南急進了。沒有接到命令，實際上也等於「沒有執行命令」。如果該師開設電臺，他們也會是照樣在公路以北原地待命的。由於一三五師意外地跨過了衡寶公路。敵我形勢開始發生急劇變化，也打亂了敵人的部署。

斬斷敵人退路，這是衡寶戰役取勝的關鍵問題。因為一三五師這一行動，敵人認為林彪在搞名堂，敵人要判斷清楚林彪的意圖是要一定時間的；再說敵人就是做出了正確判斷，實行撤退也是需要時間的。敵人佔用的「兩種」時間，恰好就為我們集結更大的力量爭取了時間。四野總部知道一三五師的位置後，林總下令一三五師直接歸他指揮。這樣一三五師跨過衡寶公路，反而「弄拙成巧」，被林總視為插入敵人防區的「釘子」，為整個戰局創造了戰機。林總利用了該師的行動捕捉了戰機，也只有林總這樣的軍事家才有勇氣和決心利用這個戰機。林總直接指揮一三五師並非祇是指揮方法，是有重大的軍事意義的。第一，總部電臺直接同師聯絡，最快時一份電報在十幾分鐘內就可辦好。如果按級指揮，經過師、軍、總部三級，一份電報最快也要一小時才能辦完。第二，能夠最好的協同動作。總部是最有權威的協同組織者，能夠很快決定和解決問題。第三，總部直接指揮到師，增加了下面的信心。

一三五師歸總部直接指揮，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該師表現出了三大特點：一是堅決向前打，不顧慮敵情；二是克服了山地沒有道路的困難，不叫苦；三是克服了陰雨、沒有糧食、沒有鞋穿的各種困難。五日，一三五師在祁陽縣境的白地市、黃土鋪，切斷了敵人的退路，完成了偉大的戰略任務。在兩天的時間內，該師行軍作戰的路程，總在一百六十公里之多，而且又是在攻擊前進的，其困難就可想而知了。我一三五師如果晚五小時切斷敵人的退路，那麼，衡寶戰役就只能打成勞而無獲。

的戰役。林總給一三五師的任務很明確：翻毀湘桂鐵路，炸毀橋樑，切斷敵人南撤廣西的退路。

這時，我四野大軍已做好圍殲敵人的準備。白崇禧也準備全線撤退。四野總部立即下令追擊、圍殲敵人，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四十九、四十六軍，二野十八軍及二野五兵團主力，全力向衡寶地區攻擊前進。白崇禧的七軍（四個師）是他的起家部隊，號稱鋼七軍，北伐時贏得「鋼軍」美譽，抗戰時也是臺兒莊大捷的主力，「鋼七軍」是全部美式裝備。

一三五師打到白地市、黃土鋪一線之時，四〇三團與敵主力失去聯繫，部隊由軍組織部長林謙和師參謀長劉江亭帶領，記得團長是劉世彬，政委是李濟宗。在險惡的情況下，部隊三天三夜祇吃了兩頓稀飯，五天五夜不睡覺，但沒有一個人叫苦，消滅敵人的決心更加堅定，充分表現了人民子弟兵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四〇四團（團長冰野，政委卜占亞）、四〇五團（團長韓統泰，政委荆健）在轉移中恰好與從衡陽向廣西撤退的白崇禧的王牌部隊第七軍軍部相遇，他們向敵人發起猛烈攻擊，把敵人割成數段，甚至經過多次白刃格鬥，終於把號稱「鋼七軍」軍部和四個主力師徹底消滅。四〇五團二連李九龍連長兩次負傷不下火線，三排機槍手少林雲雙腿被打斷，坐在地上還向敵人射擊。四〇四團在平津戰役中榮獲「金湯橋連」的七連打得尤為勇猛。一三五師的勇士們，大都一兩天才吃上一頓飯，幾天都沒有合上一眼。他們用鮮血創建了「腰斬七軍」、「猛虎撲羊群」等英雄連隊。戰後四〇五團榮獲集體一等功，這是我軍歷史上罕見的。

整個衡寶戰役殲敵五萬餘人，其中四十五軍殲滅敵人二萬餘人。白崇禧最精銳的「鋼七軍」全部被殲滅，這是衡寶戰役的最大勝利。衡寶戰役勝利之後，湘南地區全部解放，白崇禧總部退至桂林。白崇禧由於失去了第七軍，在桂林官邸痛哭不止。

一三五師在衡寶戰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都是客觀事實，但集中到一點上就是「五小時」的問題。如果該師晚五小時到達衡寶，白地市，敵人都過去了，就祇能是白晝的一場空談。總之，時間就是勝利，有總的直接指揮下，一三五師爭取了五小時，取得了整個戰役決定性勝利。

衡寶戰役的重大意義

衡寶戰役的勝利對全國有很大影響，對蔣軍有很大震動，對人民解放軍有很大鼓舞。

衡寶戰役是我軍在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之後，又一次重大的勝利。戰役勝利的意義在於：

第一，消滅了國民黨最強大的地方勢力之一桂系白崇禧主力。

第二，加速了廣西的解放。四九年三月四野北平高幹會之後，林總就專門談到白崇禧和廣西的問題。林總說：「中南大陸的問題，廣西是主要的，廣東還是次要的。」白崇禧的主力如果不被消滅，全部回到廣西去了，我們要付出相當代價才能解放廣西。

第三，對國民黨軍隊，特別是對國民黨地方軍有很大的震動。平津戰役時，毛主席提出了三種方式，即綏遠方式（投降改編）、北平方式（和平起義）、天津方式（徹底消滅）。白崇禧走的是天津方式。白崇禧在國民黨中是一個有影響和有實力的軍閥，他都不能避免被消滅的前途，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衡寶戰役的勝利是永留史冊的，四十五軍是有貢獻的。

當時，四十五軍在四野不是頭等的部隊。但這個部隊有朝氣，總是想進步，部隊是有希望的。我軍一九四七年組建縱隊到衡寶戰役，恰好是三週年。在三年裏，四十五軍參加了四七年的熱河東部秋季戰、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這次衡寶戰役，共四次大仗；在四次大仗的前前後後，又打了無數的小仗。我軍得到了很好的實戰鍛煉，是在戰鬥中打出來的。對衡寶戰役能夠做出自己的貢獻，是有堅實基礎的，衡寶戰役殲滅敵人四個主力師，主要是四十五軍直接完成的。

第四野戰軍到江南後，衡寶戰役是第一仗，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四十五軍對戰役作出了很大貢獻，得到了很大的獎勵和榮譽，對部隊鼓舞很大。

四野總部、十二兵團在戰鬥進行中和戰後，對作戰部隊連續嘉獎。四野十七軍除發來賀電之外，還派軍文工團去一二五師演出和祝賀。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日日夜夜》作者）著名記者穆青由北京趕來我軍訪問。我軍軍、師、團、營、連戰鬥英雄等，同他相談了一個星期，記錄了大量的資料，有的被採訪的功臣，淚流滿面地說：

成立啦，新中國都成立啦！我打死十個、一百個敵人不算多，我犧牲了沒關係，一定要蔣家王朝給我陪葬！」這真是氣壯山河。後來西蒙諾夫寫了一本書叫《戰鬥的中國》，歌頌了衡寶戰役的勇士們。華中局（中南軍政委員會尚未成立）動員了中南地區百餘名文藝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來我軍慰問，著名電影演員舒繡文就來我軍慰問了很長時間。慰問團深入連隊同戰士見面，對部隊起到了實際鼓舞作用。

衡寶戰役之後，我軍在湘桂鐵路線湘南地區整訓，軍部駐在祁東縣城洪橋鎮。大約十月中旬，我和陳伯鈞兩人到衡陽市去向四野總部前敵指揮所匯報。林總、蕭克參謀長、譚政主任等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林總一見陳伯鈞和我的面就說：「你們八縱隊（林習慣稱縱隊）打了勝仗，這次戰役消滅敵人的數量不算多，才兩萬人，但質量很高，是白崇禧的主力。消滅了敵人的主力，等於解放了廣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衡寶戰役結束後，四十五軍軍長陳伯鈞（前排中），政委邱會作（三排左三）與到該軍採訪的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前左一）合影。

二排左二為著名電影演員舒繡文。

林總接著說：「你們縱隊是個好部隊，我看有三個優點：一是，戰鬥作風很好，指到哪裏就能打到哪裏。部隊祇要具備了這個優點，就什麼都能辦到。一三五師從衡寶公路的水東江打到湘桂鐵路的祁陽境內的白地市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對整個戰役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二是，部隊軍、師兩級的指揮相當熟練（蕭克插話：陳、邱兩人都是實幹家）；三是，部隊能吃苦。你們這個部隊是哪些部隊編成的？」

我說：我們這個部隊是各個山頭的「聯軍」。主要成份包括：陝甘寧邊區的寶塔山，冀晉魯豫的太行山，晉察冀的五臺山等山頭。

林總：啊，你們部隊同東北部隊一樣，都是「八國聯軍」。我們要用戰鬥作風這個問題來統一部隊的作風。

陳伯鈞說：林總提出戰鬥作風這個問題，對部隊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的邱政委三年來一直抓住這個問題不放，並經過嚴肅的鬥爭，現在抓出成效來了。

林總：「用戰鬥作風這個詞好，通俗易懂。我們部隊無論進行軍事訓練、政治教育和各種工作都是為了提高戰鬥力，因為部隊的主要任務就是打仗。戰鬥作風這個東西是無形的，但又是實際存在的。想打仗，喜歡打仗，不怕打仗是培養戰鬥作風的中心問題。培養出一個好的戰鬥作風，固然要在實戰中鍛煉，但平時工作抓得緊就是為培養戰鬥作風服務的。」

我們談了大約有一兩個小時，我和陳伯鈞中午同林總、蕭克、譚政共進午餐。伙食之簡單這裏就不說了。我們正在吃飯時，情報部門送來一份情報。內容是：白崇禧下命令炸毀濱陽以西通往桂西的一座橋樑。林總對這份情報沒有多大重視，祇說了一句話：「白崇禧防止他的部下到桂西去當小土皇帝。」不久，接著送來兩份情報。其中一份說，白崇禧速下命令所有香港票子一律封存，不准外發。另一份說的是，白崇禧下令所有部隊多裝的運輸，祇送棉衣不送棉褲。林總對三份情報合在一起就十分注意和十分興奮了。

林總說，剛才的三份情報，可以判斷出白崇禧動向來，第一，他不會退到桂西和雲南、貴州交界的地方同我周旋；第二，他下的命令都是準備撤退海南島的，白崇禧已經下決心撤退到海南島。

林總繼續說：中南地區在大陸是最後一仗了，這仗怎麼打法，是很值得考慮的問題。中心問題是，打到敵人撤退的道路上去，關住「海門」。現在我們如果有辦法打到廣東的湛江、廉江、北海和欽州去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林總說，我們來開個簡單的作戰會議。你們兩（指陳、邱）也參加會議。會議開始，林總要參謀人員講三個問題。一是，四十、四十一軍和二野四兵團和四十三軍的位置；二是，由廣東欽州以北地區和江門地區到湛江的地理情況；三是，白崇禧和廣東的張淦兵團的態勢。司令部的工作人員以非常熟練的口氣報告了上面提出的三個問題。

敵人的態勢是：粵西和廣西的敵人聯在一起了。主力在西江以南的高要、梧州、玉林、南寧之線；西江以北的敵人，在對我實行運動防禦。敵人的部署也是撤退到海南島的態勢。

大家對怎樣打法，提了一些意見。林總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仗沒有別的打法，祇有發揮四兵團的作用，由粵西指向湛江才能比較好的解決問題。我們要求四兵團能夠做到三點：一，晝夜兼程前進；二，忍受還沒有發上冬裝的困難；三，要象錐子一樣的向敵人後退的湛江、廉江一路進攻，迫使敵人不能安寧渡海。此舉如能成功就能消滅敵人大部分，我軍忍受一分困難就能多得一分勝利。

林總繼續說：四兵團在沿海從東向西打，四十軍、四十三軍在西江以南也由東向西打，四十一軍、四十五軍則在廣西的中部由北向南打。這樣三路大軍都能向敵人「後院」打擊，我可實行穿插分割，一塊一塊的把敵人吃掉。當然，四兵團是起決定作用的，他們起的作用越大，我軍的勝利就會越大的。大家對林總的指示佩服至極，沒有話說的。粵西、桂東南粵桂邊戰役形成了，戰後的結果，同林總的指示大體一致。

進軍廣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我軍由湘南的祁陽一帶出發，向廣西進軍。四十五軍進軍廣西是尾隨四十一軍之後的，廣西北部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

廣西山多，除了山還是山，能種糧的地很少，而且山好像都是一個一個壘起來的，一個比一個高。另外，廣西有瘴氣，會患惡性痢疾，那

是一種很厲害的傳染病。我們四十五軍在熱河就是條件艱苦的地方，現在又到了另外一個條件艱苦的地方！

廣西是少數民族很多的地方，講話不懂。廣西地主武裝很強，土匪很多，大點的村子都有碉堡。那些地主武裝也好，土匪也好，對我們都是偷偷摸摸幹的。你去拉屎，屁股上就是一刀，什麼時候都有死的可能。廣西人排外也很厲害。

我軍進廣西是沿著湘桂鐵路線前進的，我們路過桂林時，在那裏休息了一天，除略為參觀了「甲天下」的風景之外，晚上我和陳伯鈞還出

席了四十一軍在白崇禧公館專為蘇軍作家西蒙諾夫舉行的生日宴慶。西

蒙諾夫是離開四十五軍後到四十一軍去的，那位大記者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特別高興的是，在我們軍裏訪問時，我們在一起喝醉過兩三次。

據說，按照蘇聯人的習慣，主人和客人一起喝醉酒，對客人是體面的事。那位大記者見到我們之時，總是要擁抱。陳伯鈞很會應付這一套，他彬彬有禮地親吻西蒙諾夫女打字員的手，我們這些土包子高興地熱烈鼓掌。當天晚上，我事先有準備沒有喝醉，大記者和陳伯鈞又是喝得醉成一團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四野總部命令，粵桂邊戰役正式開始。總部給四十五軍的命令是「直插南寧、欽州一線」。

泅渡西江戰鬥。我們接到總部命令，即命令一三三師經黎塘在橫縣渡過西江，並直指南寧以南的小董墟斷敵退向欽州之路。如果我軍在小董墟未曾斷住敵人，則自動向欽州，北海線追擊；一三四師經賓陽直指南寧。如果南寧之敵未退，則對該敵包圍之。一三五師在黎塘、貴縣之間集結，為軍的預備隊。我們要求各作戰部隊，必須堅決執行總部的命令，實行猛打，猛插，猛追的三猛戰術。我軍必須以「手長腳快」的戰法，把敵人消滅在逃跑的路途之中。

軍的指揮位置在黎塘以東的單塘墟。

一三三師在橫縣渡西江。西江是連接廣東廣西的運輸大江。在當時的條件下，我軍渡過西江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難的。例如，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我軍僅有的炮兵也不能使用到戰鬥中去；我軍又是緊急渡江，沒有充分的時間準備。

爲了掩護南寧之敵南撤欽州，敵人對東面的橫縣和北面的崑崙關都是必守之地。橫縣的守敵爲地方部隊一個團。對守敵來說，西江是一個比較好的屏障，敵人有比較堅固的土木結構工事。對敵人的戰鬥力和工事都不是我軍考慮的主要問題，主要考慮是渡江。

當時，江上的船隻都被敵人控制在南岸，在此情況下，一三三師的鄭壽才副師長和擔任渡河的三九八團團長共同商定後，立即決定召開全團連以上幹部會，發揚軍事民主，討論了怎樣渡江的問題。在渡江之前，一三三師偵察連派了一個班在橫縣以西偵察敵情和地形，不幸的是我們有三個偵察員都被敵人抓住，敵人非常殘忍把我軍戰士雙手砍掉了，耳朵和生殖器都割掉了，把活人丟在水裏淹死了，我們在江上撈到了屍體三具。偵察員的犧牲對我突擊隊是一個很好的臨戰動員，更加激起了我軍的作戰積極性，決心給戰友報仇。部隊將全團會水的二百餘人都集中起來，這就是渡江的主要突擊力量。

對渡江戰鬥進行了簡短的準備。第一是，組織突擊隊。突擊隊編爲三個排，成立臨時支部，每個排成立一個黨小組。第二是，集中全師的迫擊炮和重機槍，掩護渡江。軍、師都有炮兵，由於受地形的限制，不能上戰場參加戰鬥。第三是登陸點選擇在縣城東南約三里路的地方。經過四小時多準備後，渡江部隊於十二月五日拂曉一舉渡江成功。我軍登陸成功後，突擊隊立即派人押送船隻到北岸，接應部隊渡江。部隊五日渡江成功，大約十時就佔領了橫縣，在該處經過很短時間的集結之後，立即向南寧南的小董墟攻擊前進了。

小董墟戰鬥。粵桂戰役到了十二月上旬之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四兵團已經進到了雷州半島；十五兵團正在向玉林攻擊前進；四十軍、四十一軍和四十五軍已經在從梧州到橫縣的幾百地段上南渡西江。敵人全線動搖了，主力部隊都南撤了，決心退到海南島去，敵地方雜牌部隊有計劃的進入山溝，並採取化整爲零的戰術與我周旋。我各路大軍按照總部作戰命令，正在猛烈地向敵人攻擊前進。

我軍根據當前的形勢，調了部署，並發出了戰鬥號召。一三三師在橫縣渡江之後，應自擇路線分兩路向小董墟迅猛攻擊前進；一三四師在南寧的西南向小董墟攻擊前進；一三五師在桂平一線南渡西江，向貴縣通往玉林的公路上迅猛攻擊前進。

我們除了向部隊提出了猛插、猛打、猛追的戰鬥號召，還提出了三條具體要求：1、不顧一切疲勞，晝夜兼程勇猛前進；2、各級指揮員要在部隊的前面，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及時調整部署；3、輕裝行進。部隊的炮兵，傷病員及其他笨重的東西，一律不要跟大部隊前進。各師對軍的作戰命令和戰鬥號召執行是堅決的。凡執行得越堅決，取得的戰果就越大。

小董墟戰鬥，我軍繳獲物資甚多。白崇禧老婆新從美國進口的「道奇」小臥車和數以百兩的金條都成了我軍的戰利品。小董墟戰鬥參戰的部隊很多，有我軍兩個師和四十、四十一軍友鄰兩三個師，當時注意友鄰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電令一三三師不與友鄰爭東西，要注意團結，該師做得比較好，沒有與友鄰發生糾紛。小董墟戰鬥結束後，整個粵桂邊戰役就結束了。

平而關戰鬥。一九五〇年二月初我軍一三四師取得了平而關戰鬥的勝利，平而關戰鬥是在粵桂邊戰役結束後一個月才打的，是大戰役的餘波。

敵軍十七兵團直屬隊，一〇〇軍軍部直屬隊，十九師和一七九師共六千餘人。該敵由十七兵團劉嘉樹率領，打算在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同越南交界處以國界兩側建立根據地，或在桂西得到喘息機會，待機由欽州以西之海防由海上撤至海南島。我軍查明情況之後，決心全部殲滅該敵，我們採取了政治攻勢和軍事行動兩手同時並進。

平而關戰鬥是張曉冰指揮打的，四〇〇團董占林，四〇一團鄧長茂、張益三，四〇二團江里鴻，藍亦農都打得很好。平而關戰鬥在軍事上是一個勝利，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勝利。這一戰鬥告訴了殘存在廣西的敵軍，他們的前途祇有兩個：投降或消滅，企圖躲在山上長期存在是絕對不可能的。平而關戰鬥的勝利，對桂西剿匪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敵軍都在當地分散為匪，對我軍剿匪就會增加很大的困難。桂西的土匪比其他地區都少，比較早完成了剿匪任務。

我軍在粵桂邊戰役中取得了重大的戰果，殲滅敵人兩萬三千多人，其中包括二十三名敵軍將官。繳獲各種火炮一百五十餘門，各種槍支八千餘支和各種軍用品甚多。解放了廣西全省。這是在大陸上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最後一仗。

執行粵西和桂東南剿匪任務

一九四九年底粵桂邊戰役結束後，四十五軍在廣西的南部和東南部執行剿匪作戰任務。軍部駐貴縣。一三三師駐貴縣西北之覃塘，一三四師駐南寧，一三五師駐容縣。

爲了統一指揮剿匪作戰，中南軍區命令成立粵西和桂東南地區剿匪作戰指揮部，由四十五軍擔任指揮。爲了黨軍政統一領導，廣西省委決定成立桂東南黨軍政委員會，由我任委員會主任，統一指揮剿匪作戰和領導桂東南地區的黨政工作。

桂東南和粵西剿匪區包括：粵西（高要）、雷州（湛江）、欽州、梧州、玉林、賓陽、龍州、百色等分區，共計八個分區。在軍事上，除指揮各分區之外，還指揮四十一軍在高要的一個師和廣西軍區在賓陽的獨立師，全區剿匪野戰部隊和地方部隊約十五萬人。

一九五〇年初，全國一片大好形勢，中南地區除海南島之外，全部解放了。我軍就開始執行剿匪任務了。

我軍執行剿匪任務之時，廣西的匪情確實是嚴重的。當時，我軍祇能佔領城市，大部分集鎮和交通要道，農村基本上被土匪所佔領盤踞，縣級以下的政權，很多不在我們手中。五〇年的六月間，我軍初進入大瑤山西部時，原敵偽的區政府還爲我們派糧派草。我軍一個排的兵力一般的不敢到農村去，單輛汽車行駛也很危險。要徹底消滅廣西的土匪，最後解放人民，並非一件易事，是要經過殘酷鬥爭才能達到目的的。

白崇禧的主力在衡寶戰役、粵桂邊戰役基本上消滅了，但還有龐大的非主力部隊並未消滅，它的基層政權亦未摧垮。南寧西南的十萬大山，賓陽西北的上林山就是敵人的戰略重點。至於敵人的小塊盤踞地則全省到處都有。廣西是全國的封建軍閥統治的堡壘之一，實際上是國中之國，要摧毀這樣的堡壘當然並非易事。廣西有械鬥的歷史，好勇鬥狠，廣西人是排外是很厲害的。

由於敵人是「地頭蛇」，他的消息特別靈敏，我軍的行動，幾乎都能快就能知道。敵人有周密的情報系統通信聯絡。一九五〇年一月間，我到貴縣西北二十多公里的覃塘一三三師去開會。我早去晚歸「我的行動第二天就被敵人發覺了，敵人在半路上設下了伏擊。幸虧一三三師司令部警惕性高，第二天就派武裝護送，否則我可能早已歸西天了。一九五〇

年五月間，我到六萬大山的靈山縣去視察工作。我頭天經玉林、並住在電白縣，第二天就遭到了敵人的包圍。幸好一三五師派了一個偵察排護送我，那個排四個班，四十餘人，裝備好，戰鬥力強。我們住下之後，還沒有吃飯就發生了情況，我們被敵人包圍了，經觀察敵人有百餘人，我們決心消滅敵人。我們住的是地主院，有圍牆、樓房，院內有水井，有糧食，我們又帶有報話機。我們一方面注視敵人，另一方面調動部隊。一二三師在三十里以外有一個偵察連趕到了，敵人全部被殲滅。

當時，執行剿匪任務對我軍是一個大的轉變，從思想上、作戰行動上、生活管理上都是一個大的轉變。從思想上來說，就是從戰爭轉向和平的大變化，幹部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老婆和前途問題。戰士中的主要思想就是家庭、婚姻問題。我們對部隊儘管經常在進行「我軍永遠是戰鬥隊」的教育，但效果很小。部隊都說，「敵人都沒有了，還需要戰鬥隊幹什麼？」對部隊的思想教育，比之過去打仗更加困難了。

從軍事行動上來看，就是從打大仗變為打小仗了，打小仗我們反而成爲外行了。對剿匪作戰表現急於求成，總想撈大魚，結果小魚也捉不到一個。打不到土匪就消極，對群眾產生埋怨情緒，甚至對立情緒。部隊比較普遍的認爲廣西是「匪民不分」，土匪走了就是老百姓，土匪一來就大家共穿一條褲子。

從部隊管理來說，就是從集體生活變為分散的生活了。這種變化帶來了思想渙散的嚴重的問題。部隊分散時，以連爲單位的都很少，多數是以排爲單位，少數是班爲單位。由於部隊管理鬆弛，事故不斷。在大瑤山以西，有某部一個班，因爲吹牛皮過晚，沒有設崗哨，拂曉時大家都還在熟睡，被土匪全部殺光。

思想渙散造成生活散漫，駐在集鎮的部隊，每逢集市更是遍地都是軍人，我軍單個失蹤的現象幾乎見天都有。而且軍民關係也不夠好，對地方幹部態度橫蠻，犯紀律很普遍。部隊的特點就是集體生活，集體行動，集體管理，在失去管理的情況下，發生問題是必然的。對這個問題，我們領導上是認識到了它的嚴重性，常派幹部深入基層，定期以連爲單位整頓和訓練。

統一對剿匪性質的認識

廣西的剿匪在省委內部存在兩種認識。一種意見認為：剿匪是解放戰爭的繼續，只有消滅土匪才能解放人民；另一種意見認為：剿匪是民主改革，只有待群眾自己起來，才能得到解放。這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上面的意見不統一，對部隊的剿匪工作影響很大，在五〇年整年中剿匪的成績都很小，土匪越剿越多。廣西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李天佑和我兩人是第一種意見的代表人物。

一九五〇年大約是九月初，李、邱共同起草了一個向中南局、中南軍區的報告。報告內容指出了廣西省委對剿匪的態度右傾，要求中南局派要員來廣西解決問題。李、邱拿著電稿去向省委書記報告，並要求他簽發電報，他拒絕簽發電報。後來，以李、邱個人的名義上報，並由李簽發了電報。中南局看到李、邱的電報後，引起注意，並立即派陶鑄代表中南局直接到廣西檢查工作。陶到廣西不久，又收到了毛主席的電報，電文的主要內容是專門說的剿匪問題的。毛主席表揚了湘西的剿匪鬥爭做得好，全省土匪基本上消滅了；指出廣東、廣西的剿匪落後了，是「兩隻烏龜爬行」，牽住了全國的工作進程。這一下對省委震動很大，幾乎不知所措了。

省委立即召開了省委全體會議，對剿匪進行了總結。接著於十一月間，省委召開了地師級幹部以上的省委擴大會議，葉劍英、陶鑄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指令，並對廣西剿匪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到會的極大多數人都指責省委對剿匪是執行了一條右傾的路線，致使剿匪一年了，土匪還是越剿越多。李天佑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他發言的中心內容是把我們在剿匪的問題上同省委爭論的問題都擺出來了，並且把那些問題提高到了路線的高度。這就使會議有了方向，對會議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我接著李天佑之後也發了言。我的發言，除了同意李的發言之外，並以大容山的例子來證明我的發言是完全正確的。我說，玉林東北大容山，是土匪巢穴之一，該處有匪數千人，我們祇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把土匪消滅了，現在的大容山是真正的解放區，人民當家做主了。

葉劍英、陶鑄在會上都講了話。他們的講話，沒有公開批評省委執行了一條右傾路線，但他們又公開支持了李、邱的意見。他們說：「李天

佑、邱會作同志的意見，是從實際鬥爭中來的，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他們對中央的方針、路線、政策講得很清楚、透徹，形成了很大的力量。葉、陶代表中南局、華南分局宣佈：廣西要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剿匪的路線，政策，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命令，限期消滅土匪，徹底解放人民！

一九五〇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之後，剿匪作戰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階段中，我們主要抓了三個問題。這就是：1、軍事上重點圍剿，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同時解決問題；2、剿匪、反霸、收槍、鎮壓反革命四者密切結合起來；3、在剿匪鬥爭中發動群眾與組建縣政權，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有重點地建立民兵組織。這三個問題是完成剿匪任務的全過程。

在軍區統一部署之下，全省劃分為四個重點圍剿區：梧州西北的大瑤山；玉林以西的六萬大山；南寧的西南的十萬大山；賓陽西北的上林山區。這四個區是同時進行的，這是我軍執行剿匪任務以來，規模最大、給土匪打擊最重和效果最好的一次聲勢浩大的剿匪作戰。

例如，對六萬大山的重點圍剿，用了三個步兵團和四個分區的地方武裝。對該區的圍剿是成功的，祇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首先是佈置三層包圍。為了不使敵人過早發現我軍意圖，包圍圈開始要大些，然後逐漸收縮。其次是政治攻勢。包圍圈縮小了，在包圍圈之內又到處是戰鬥，此時就要進行政治瓦解。主要內容是要敵人選擇自己的出路：交槍投降，抓匪首。同時還要動員老百姓暫離開包圍圈，以免傷亡。

第三是火力攻擊。對敵人的包圍圈縮小到不大的情況下，則實行火力的火力攻擊，攻擊一陣子即停下來進行政治瓦解，此時，政治瓦解的效果很好，投降的很多，對死不投降的敵人則堅決殲滅。我軍在六萬大山消滅敵人萬餘人，打死和抓住匪首近千人。

第四是清匪、反霸、收槍、鎮壓反革命密切結合。這是對一個地區剿匪是否徹底的關鍵問題。當地的匪首惡霸，押回各村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槍決。土匪清出來了，槍支收完了，匪首惡霸處決了，人民也就真正解放了。

第五是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土匪真正消滅了，群眾自然就有組織自己的政權的要求。在建立農村政權的時候，選擇骨幹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政權能否起作用的關鍵問題。在剿匪鬥爭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是基層政權的依靠力量。

整個桂南的剿匪作戰，大概用了兩年稍多的時間才解決問題。我軍消滅土匪將近二十萬人，鎮壓了匪首惡霸約八萬人。反動統治摧毀了，人民成了主人！

第一篇

軍隊建設的征程

第十三章 從廣州到北京

到廣州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我由四十五軍調任十五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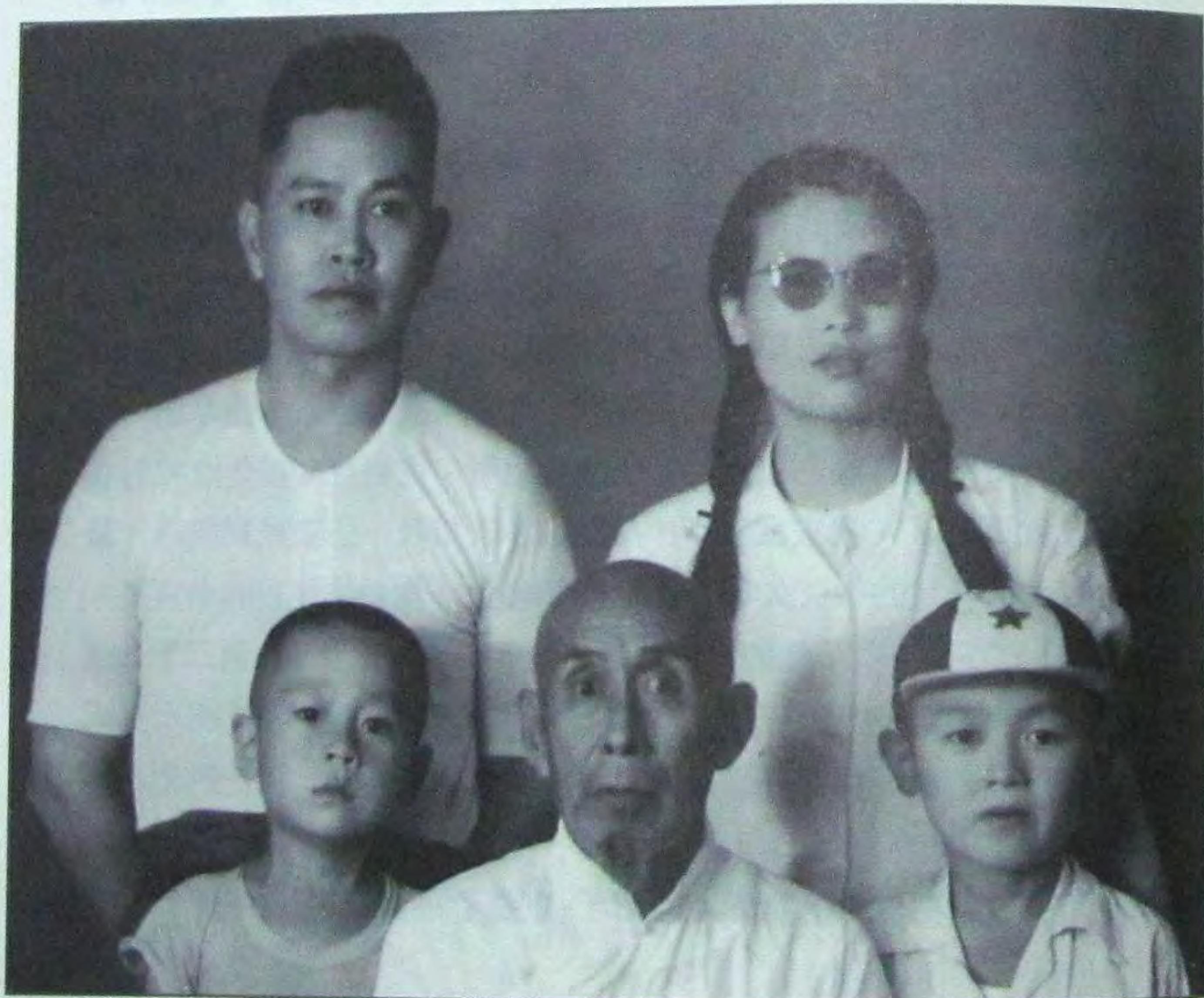
四十五軍是一支由不少紅軍連隊爲基礎組建起來的部隊。這支部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做出過自己的貢獻；在解放戰爭中則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起的作用也更大了，對人民的貢獻也更大了。這支部隊是打出來的，在解放戰爭中打過很多的仗，又參加過三大戰役的遼瀋、平津兩大戰役；南下渡江後，參加了衡寶、粵桂邊戰役，屢建奇功，同全國解放軍任何一個軍團都可媲美。這是四十五軍的光榮！

我離開四十五軍是戀戀不捨的。我從延安到熱河就和吳烈同志戰鬥在赤峰，一九四七年東北民主聯軍八縱組建，整個解放戰爭我都戰鬥在八縱，我熱愛八縱，與一夥出生入死的戰友，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九一三」以後，在家破人散最困難的時候，關心我子女的是八縱的戰友，在公審以後，不顧政治風險看望我的也是八縱的戰友，任思忠、孔瑞雲去西安時，在打聽右打聽，打聽到派出所才找到我。在北京時看我的老戰友就更多了。我去武漢時，吳瑞山多次看我，任榮見到我時，緊緊抱著我，拉著我的手久久不放，他深情地說：「你過去是我的老首長，現在還是我的老首長！」他的話使我潸然淚下。我從三十二歲到三十七歲是在四十五軍度過的，這是我青年時代最有意義的經歷。我在四十五軍工作感到最愉快的是得到了全軍極大多數指戰員的信任。我在四十五軍是一個領導者，同在該軍工作過的許多人一樣，是四十五軍的指揮員也是一個戰鬥員。我和全軍指戰員共同奮鬥，創造了四十五軍的榮譽。

在我離開四十五軍後的一九五二年二月，軍委命令，以四十五軍軍部及一三四師、一三五師兩個師，加上原四十四軍一三〇師，合併成一個軍，番號為五十四軍。五十四軍在解放後，除參加抗美援朝外，還參加了西藏平叛、青海剿匪、中印邊境反擊作戰……，是和平時期作戰最多的部隊之一，對部隊的成長和進步，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十五兵團的兵團部駐廣州，兵團又兼廣東軍區領導機關。兵團司令員是黃永勝，政治委員蕭向榮，我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是葉劍英，第一副司令員黃永勝，蕭向榮和我都兼任軍區副政委。當時的工作關係是比較複雜的，但不管多複雜，核心領導是葉劍英，葉是解放初期華南地區黨政軍領導的臺柱子。

一九五一年五月，為了華南軍事上的統一領導，軍委決定以廣東軍區、十五兵團指揮機關為基礎成立華南軍區，轄廣西軍區、海南軍區、粵東軍區、粵西軍區和廣東防空司令部，兼指揮第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軍和華南各特種部隊及中南軍區海軍司令部。華南軍區司令員為葉劍英，中南軍區第三政委譚政兼任政委，



與父親分別二十年在廣州相見。

副司令員黃永勝，參謀長吳克華，我先任政治部副主任沒有多長時間，繼蕭向榮之後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五三年七月，駐武漢的中南軍區機關遷到廣州，華南軍區即併入中南軍區。軍區司令員林彪，副司令員葉劍英，第一政委羅榮桓，鄧子恢、譚政分別任第二、第三政委，參謀長黃永勝，政治部主任陶鑄，副主任梁必業和我。我除分工管宣傳部、文化部的工作之外，還兼任中南軍區軍法處處長。

中南軍區遷廣州前，林彪已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軍區從武漢遷到廣州後不久，林彪就到北京參與中革軍委的領導工作。軍區第一政委羅榮桓在平津戰役後即留在北京，後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葉劍英名義上代理軍區司令員，但精力主要放在地方，軍區實際工作由第三政委譚政主持。

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

三反運動是毛主席一九五一年底提出來的，毛主席是以十分嚴肅的態度提出我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浪費和貪污。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浪費，反對貪污，「三反」這個名稱由此而來。

我記得，當時主持三反運動日常領導工作的是薄一波。他於五二年的四、五月來過一次廣州，是來督戰的。他在華南分局會議上做了一個長篇講話，會議由分局第三書記方方主持。

薄一波說（大意）：這次三反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兩個階級必有一存一亡，我們要爭取鬥爭的勝利。……我們進城僅僅兩年的時間，但我們的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艱苦奮鬥的好東西丟掉了，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學到了。我們有不少人，被糖衣炮彈擊中了，存在著嚴重的意志衰退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如果不徹底糾正，我們就會被資產階級戰勝。……官僚主義、浪費和貪污，雖然是性質不同的問題，但又是互有聯繫不可分割的問題。官僚主義是浪費、貪污的溫床，而後兩者又會促進官僚主義的嚴重性，所以我們要把三個東西連在一起來搞，這就是搞三反運動的必要性。……三反運動的關鍵是在黨委領導下，發動群眾。對發動群眾要放手，不需要先築起防什麼的「堤壩」再去發動群眾。爲

了充分發動群眾、領導帶頭又是關鍵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要學陳老總（陳毅）的樣子。他在華東軍區的幹部會上是自己脫褲子，讓群眾打屁股。他要後勤部門司令部管理科、秘書等三人在大會上公佈他的開支賬目。這樣做，陳老總取得了群眾的信任，取得了三反運動的領導權，反過來對三反運動就給予了有力的領導。華東軍區的三反運動是搞得很好。

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當時是處在「群龍無首」的狀態。司令員葉劍英是不管軍區的具體工作的，副司令員黃永勝還在外地治病。對三反運動的具體領導工作就祇有落在我這個政治部主任身上了。三反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到廣州還不到一年的時間，這對我的工作是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我進城時間還不長，「洋」生活還沒有學到，大家認為我還是一個「乾淨」人，這有利於開展工作；不利的是，人生地疏，不瞭解情況，從工作上來說，不利的因素反成了好處，使我在工作中更加謹慎，可以少犯錯誤。

三反運動就其實際內容來說，並不是完全新的問題，在戰爭年代接觸過不少這類問題。但把反官僚主義、反浪費、反貪污聯在一起，作為一個政治任務進行鬥爭還是一個新的問題。特別是提高到黨的存亡問題，就更引起我的重視。對三反運動，中央祇有原則指示，中南軍區不僅沒有開過會，連具體指示也沒有發過。我當時領導主持三反運動，即使不是「盲人騎瞎馬」，也是蒙著頭幹的。在鬥爭中雖然沒有犯大錯誤，但也沒有搞出什麼大的成績來。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是比較平穩的。

為了實際工作的需要我們成立了一個辦公室。軍區政治部的組織部長盧文生、宣傳部長江峰、保衛部副部長陳信、司令部辦公室主任楊坤專門協助我進行具體工作。

三反運動開始的時候，中央也沒有政策規定，我們也無經驗，我們經過研究自己確定了三條工作方針：1、充分發動群眾提問題。我們向群眾誠懇宣佈，不管是什麼問題，對什麼人的問題，有問題就可以提出來；2、對群眾提出來的問題，一定要反覆核實清楚；3、實事求是做工作。決不整人，不點名，更不輕易做結論。我們就是根據這三條辦事的。

整理材料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對各單位送來的材料，我們都認真的閱讀、研究、整理。爲了好整理材料，我們把浪費和貪污嚴格分開，把三反同其他政治上、歷史上的問題分開。

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到了五二年五月間，對整個的情況就比較清楚了，有兩方面的問題嚴重，突出來了。一方面是領導幹部的生活確實起了很大變化，浪費相當驚人；另一方面，一些同商人打交道的專業幹部和地方部隊的本地幹部，有不少被資本家拉過去了，受賄相當嚴重。前者是屬於浪費的問題，後者就是受賄貪污的問題了。在幹部中，貪污的公款則是極個別的。

爲了三反工作的需要，陶鑄和羅瑞卿來到了廣州。陶是來代替葉劍英主持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的；羅是專門來檢查華南地區黨、政、軍的三反運動的。陶、羅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聽取了我們辦公室的集體匯報。他們向我們做了如下指示：

第一點，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你們的運動在華南地區機關中處於領先地位，在全軍中也是搞得比較好的。

第二點，你們對中央關於三反運動的指示具體化了，同你們的實際情況結合得很好。特別是你們提出了充分發動群眾和整理材料兩者結合起來，是非常正確的。不充分發動群眾就不能把問題揭露出來；不認真整理材料，就不能對問題有深刻的認識。你們的做法，就是比較好地解決了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問題。

第三點，政策界線問題。中央已經有原則的規定：領導幹部中的官僚主義錯誤和生活中的浪費是屬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吞佔公款和受賄是屬於貪污問題。這是性質不同的問題，將來的處理也是不同的。對領導幹部的問題，要特別慎重，決不能借三反運動來打擊幹部。

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南軍區遷到了廣州，華南軍區與之合併了。從此，我就退出了領導三反運動的實際工作，專門主持部隊的文化教育工作了。

部隊文化教育

我軍的幹部是以農民爲主體的。他們的主要優點是對黨忠心耿耿，鬥爭經驗豐富；主要缺點是文化水平低。因此，建設現代化軍隊的關鍵之



一九五二年中央慰問團在廣州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右一梁必業、右二劉興元、右三邱會作。

一九五二年在廣州向中央慰問團匯報工作。



一，是提高幹部的文化水平。部隊進行文化教育爲主的訓練，是建設現代軍隊的戰略決策。

全國解放後，軍隊建設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以林彪爲代表的，主張部隊以學習文化爲主，並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總結自己的鬥爭經驗，部隊辦了很多學校；一條是以彭德懷爲代表的，主張以學習蘇軍爲主，軍事訓練爲主，並提出了不走樣子的學習蘇軍。這兩條路線是不同的，我自己和許多老幹部都擁護林彪的路線。

我認爲林總不僅是一個軍事家，也是一個很有眼光的政治家，他參與軍委的領導工作時，雖然朝鮮還在打仗，他就從國際形勢分析，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爲此他主張盡快裁減軍隊，省出錢來發展重工業，搞建設，這和他不同意出兵朝鮮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們的新中國剛剛成立，休養生息，搞建設非常重要。當時，我軍有六百多萬人，精簡後部隊不到三百萬人，公安軍五六十萬人，全軍精簡近一半，林總魄力很大。同時，林總主張軍隊大力學文化，他說要掌握現代武器，必須學習文化，要更好的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也必須學文化。當時軍隊一百二十多萬人的幹部隊伍，文盲就佔三十多萬，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就有近四十萬，佔幹部隊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從五一年開始到六〇年的九年中，部隊開展了規模不等，程度不同的文化教育。從全軍來說，部隊的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很顯然，部隊的文化教育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其所以如此，這是兩條建軍路線鬥爭的反映。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軍委召集了各大軍區參謀長、政治部主任會議，中南軍區是黃永勝和我去參加會議的。會議由彭德懷主持，會議主要討論全軍部隊的軍事、政治、文化訓練問題，會議對文化教育給予了嚴厲的抨擊。不少人指責：由於搞文化教育，槍支生鏽了，大炮筒子有麻雀窩了，早操沒有人上了，都去上文化課了，部隊作風散漫等。一部分人的結論是：要是不加強軍事訓練和嚴格管理，部隊就會自己垮掉。

由於部隊要搞文化教育是由林彪提出來的，經過毛主席批准的，這是起決定作用的。同時，不少高級幹部也支持文化教育，他們都提出要下決心解決幹部的文化問題，也有條件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經過討論之後，對文化教育雖然大大「降溫了」，但還佔很大的時間比例。會議決

定部隊訓練時間的分配是：軍事訓練百分之三十，政治教育百分之二十，文化教育百分之五十。

中南軍區部隊的文化教育，在全軍是起帶頭作用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從五一年春開始，到五五年的五年間，全軍區部隊主要是搞文化教育，從未間斷過，也沒有受到什麼大的衝擊。中南部隊的文化教育是有聲有色的，對全軍和全國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全區部隊文化教育取得的成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部隊的幹部戰士百分之九十以上，語文和算術達到了高小的程度，百分之二十達到了初中一年級的程度。

二、團級以上幹部百分之七十輪流進了文化速成學校。經過兩年的時間，語文和數學都能達到初中三年級的程度。大部分文化學校，一九五三年就畢業了第一期，少數學校，到五四年已經畢業了兩期。需要學習文化的團級以上幹部，極大部分都初步解決了文化問題，打下自學的基礎。

中南部隊的文化教育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起決定作用的是當時的政治部主任陶鑄。我是他的助手，做了一些具體組織工作。我自己就需要學習文化，我深知沒有文化的痛苦，我對部隊文化教育是積極的。

重返後勤戰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奉命調北京，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五五年二月，到達北京上任。

新中國成立前夕，楊立三奉命重新組建了軍委後勤領導機關，是對我軍建設的一大貢獻。但是受當時條件所限，也有一些缺陷，主要是：第一、工作方針不明確。第二、幹部老、能力弱、身體差。總後機關總體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水平偏低。第三、規章制度有問題。總後組建不久，我軍開始「不走樣」學習蘇聯紅軍，幾乎把他們那一套全盤照搬來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楊立三為準備召開全軍後勤工作會議，向毛主席寫了一個請示報告，毛主席在回信中嚴肅地指出：「據我所知，我軍整個後勤系統長期缺乏這種民主的自我檢討和相互檢討，以致政治空氣極不濃厚，黨的生活極不健全；許多領導同志胸襟狹隘，思想不開

，作風不民主，祇顧小局，不顧大局；後勤系統中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極端嚴重，這種嚴重性至少不小於政府的財經系統和公安系統。所有這一切，均應以這次後勤會議為開端，徹底地進行批判和改革。」毛主席對總後作的批示是對以上三個問題極為深刻的揭示。那時楊立三重病在身，不久去世。毛主席指示未曾得到很好貫徹。

另外，後勤系統在「三反」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嚴重。為此，一九五二年，毛主席決定選調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長，以便更好地配合彭德懷工作。五三年，周純全從朝鮮回來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五四年上半年，洪學智從朝鮮回來任副部長，周純全調走。五四年十月，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

黃克誠是我軍名將，德高望重，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歷來擔任要職。解放戰爭時曾出任東北民主聯軍後勤司令員，他整頓了東北後勤，工作出色。黃出任總後部長的影響很大，改變了我軍後勤領導幹部的形象。他是我軍有史以來調到後勤戰線的級別最高的領導幹部，後勤機關地位提高了。

黃克誠於一九五三年六月總後黨委擴大會議之後向軍委寫了一個報告。在肯定了「三反」運動以後全軍後勤工作的若干進步的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嚴重問題：一是浪費現象非常普遍而且嚴重；二是醫療衛生工作存在的問題更多，領導上有嚴重的主觀主義；三是許多供應標準不符合實際情況，供應的實物很差；四是後勤幹部中不安心工作、不團結、鬧地位待遇和對領導不滿的情況比較普遍，尤以總後機關最為嚴重。黃克誠在報告中認為，這種嚴重現象之所以發生，有其客觀條件，但主要是後勤領導和幹部中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上存在問題。首先是沒有明確樹立為部隊負責、為國家負責的堅定思想。報告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黃克誠提出的「為國家負責，為部隊負責」的思想，得到軍委批准和後勤幹部的一致贊同。依我所見，黃克誠的這個提法是我軍後勤歷史上最有思想性的方針，它既是處理全局和局部關係、執行國家政策和保障部隊的需要，也是正確處理後勤內部上下關係的準則。

為了加強後勤工作，很快就把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調進總後工作。接著我也到了總後。

黃克誠當時是軍委秘書長，我到了總後不幾天，他召集總後黨委會。他在會上除了對我簡單介紹了幾句之外，即說：「我今天就交班了，都交給邱會作同志了，他是我的代理人。今後，你們要支持邱會作同志的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們大家的事，發生了什麼問題，由我黃克誠完全負責，決不會推到你們頭上。」其實我來之前，洪學智同志已經在主持日常工作，黃克誠的話是什麼意思，大家並沒有搞懂，我也沒有搞懂。雖然我也主抓了不少工作，但黃克誠的話我根本沒有上心，因為我不願意搞後勤工作，對工作沒有安下心來，沒有長期打算。

五五年十月，我又當了（兼）後勤學院院長，工作相當累人。

我和洪學智都是扎扎實實搞工作的人，以誰為主搞工作彭總是有考慮的。五七年春節過後，彭德懷找我談了一次話，他開門見山地說：「你認為你和洪麻子誰搞後勤更合適？」

我一下也聽出彭總的意思，略加思考我回答彭總說：「當然洪學智同

志比我合適，我沒有去過朝鮮，沒有組織現代戰爭條件下後勤工作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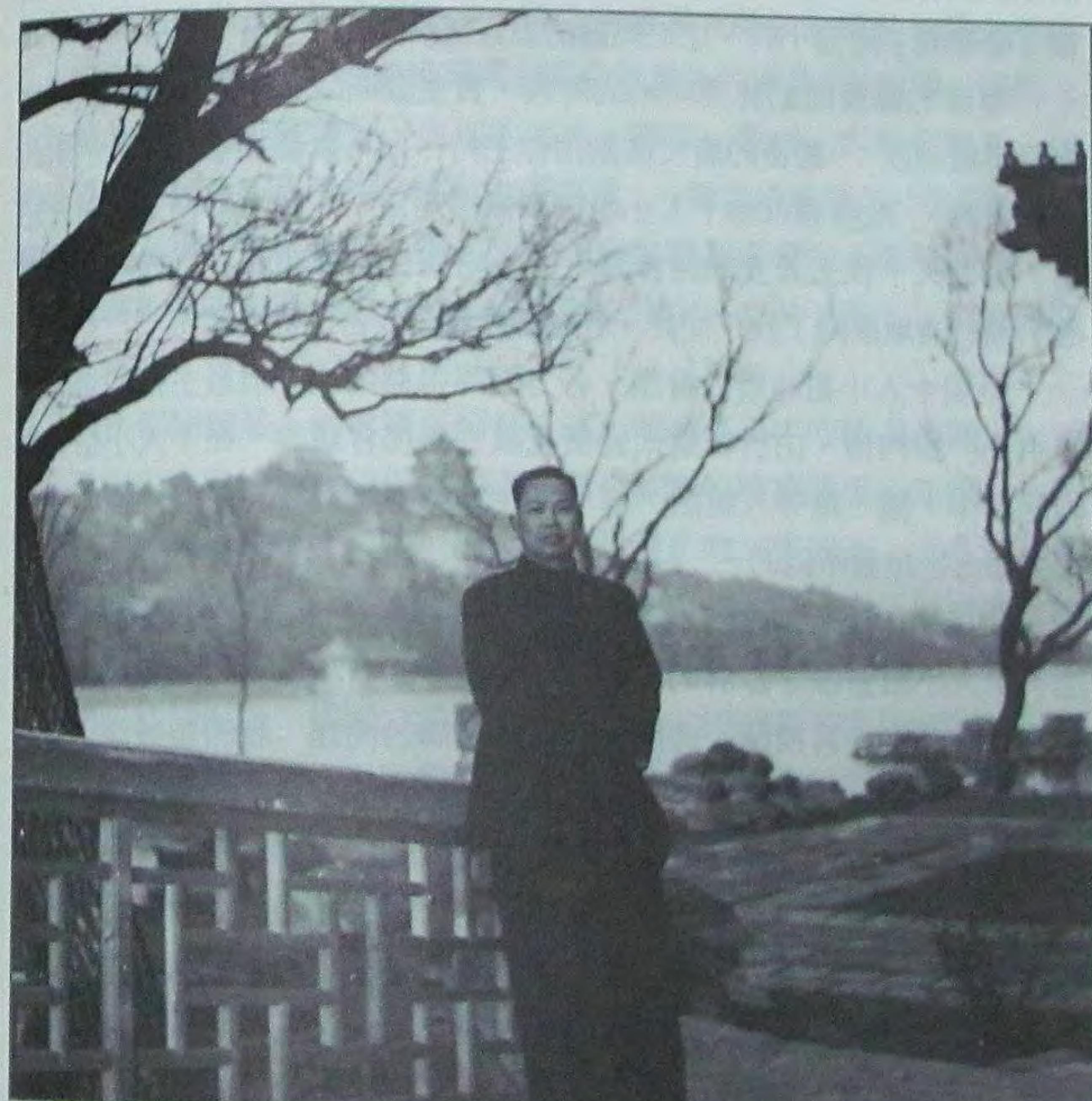
彭總聽後非常高興，對我的態度很滿意。五七年，對洪學智下了部長命令。此時，周總理和富春同志讓我去搞國家經委副主任的工作，並安排我到蘇聯去參觀考察了一圈。回來後，我「娶了賴」，說不願離開部隊，羅帥也去找總理為我講情，我就先去學習了，先上中央黨校，繼而上了高等軍事學院。

彭、黃的問題出來後，洪學智同志被免職。五九年十月，我回到總後任部長。

我在彭德懷、黃克誠領導軍委時期在總後工作近兩年，其間最大的一件事是籌備總後第一屆黨代

表大會。一九五六年年初，總後醞釀召開首屆黨代表大會，黃克誠和黨委分工我負責籌備，並指定我代表總後黨委向大會做工作報告。為了總結總後重新組建六年來的工作，我們比較詳細地瞭解和分析了後勤系統的情況，深感這幾年總後進步的起因，源於毛主席給楊立三同志的信中對軍隊後勤工作的批評，這幾年的工作，就是總後克服這些問題取得成績的六年。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總後第一屆黨代表大會開幕，我代表黨委做了題為《加強領導，為加速後勤建設而鬥爭》的工作報告。我在報告中指出：「過去幾年的後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統一了全軍的後勤工作；完成了抗美援朝戰爭、解放西藏、沿海作戰及訓練；做好了邊防部隊的物資供應、衛生醫療及技術保障等任務；加強了組織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但後勤工作的落後狀態至今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阻礙後勤進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領導上存在著安於現狀、故步自封的右傾保守思想，對於如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高級黨校學習期間於頤和園留影。

何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後勤，對於如何改變後勤工作的落後狀態，缺乏切實有力的措施，表現了領導與實際需要的脫節……」。黃克誠很支持我的看法，對我代表黨委所做的報告給予肯定。他在大會上以《發揚優良傳統、學習新鮮事物》為題發表了講話，他說發揚優良傳統和學習新鮮事物是密切相關的，是不可偏廢的。祇要我們保持一切好的傳統，並且使之發揚光大，又能把新的東西學到手，不斷充實，不斷提高，我們就能夠把後勤工作迅速地向前推進。在講話中，他對後勤幹部中的弊病也點中了要害。

關於肅反問題

一九五五年一月間，軍隊的肅反運動就開始了。我剛剛到總後，對肅反運動，當時什麼說法都有，有的說清理中層、內層，有的說深挖胡風反革命集團。在肅反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找保衛部的有關人員來匯報，硬是問了兩個小時，才把問題的眉目搞清楚了。

軍隊的肅反運動將要開始的時候，黃克誠叫我去他家談過一次，他直截了當地說：「總後的肅反運動由你主持。你可以參加中央十人小組的辦公會議。」他接著就給十人小組主要領導陸定一、羅瑞卿寫了一封介紹信。第二天，我去公安部開會時，把介紹信交給羅瑞卿了。我同羅很熟悉，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從此，我就經常到公安部去開會了。

參加十人小組的辦公會議，各方面都得益匪淺，但最主要的是瞭解了中央一些內情。由於我是代表黃克誠去參加會議的，在十人小組會議的過程中，陸、羅等人說話，處理文件等都不迴避我。我能知道的在中央文件上也是看不到的。

胡風是什麼人，之前是沒有聽說過的。我對胡風問題的瞭解，是參加了十人小組會議才瞭解的。陸定一、羅瑞卿對胡風反革命的問題是反覆講的，講得非常精闢、透徹。對他們所講的問題，我印象最深，現在還能回憶起來的，主要有如下三點：

第一點，清理內層的問題。他們說的反革命大概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社會上的反革命，黨政軍機關裏的反革命，領導機關內部的反革命三個層次。這也就是外層、中層、內層。我們這次肅反運動的中心任務是清

理中層、內層，並力求能夠搞得比較徹底。這對鞏固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胡風是鑽到我們黨的領導層內部的反革命。他是披著文學家的外衣來反對黨、破壞黨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的反革命頭頭。胡風可以鑽到黨的文化領導機關內部來，別的什麼人就不可以鑽到黨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內部來嗎？完全可以的，這就是清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點，黨政軍領導機關，對自己的內層，中層要徹底清理，這是主要任務。胡風祇有一個，但胡風式的反革命就決不是一個了。那種人，可能同我們一起開會，同一個桌辦公，甚至同睡在一張床上都有可能。這就是清理中、內層總的指導思想。

總後直屬系統清理中、內層搞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這有我的領導問題，也有總後的客觀情況問題。

總後直屬機關和各院校都是解放後新建起來的。一種是紅軍時期、抗戰時期的老幹部，都是軍級以上單位的領導骨幹；一種是知識分子隊伍，這個隊伍相當大，總後是軍隊知識分子最多的單位，各大學、醫院、設計院等單位都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專家、教授、大學生很多。他們是科學、技術、教學的骨幹和主要力量；一種是新參軍的小知識分子，抗美援朝之後，總後接收了很大一批參軍參戰的中學生，這種人成了各機關業務工作的主要成份。總後的清理工作中，發現了如下三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社會關係相當複雜。知識分子中的極大多數人，不僅在國內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在國外還有複雜的國際關係。他們之中的不少人懂得幾個國家的文字，他們寫下的很多的文字東西，大多數都是用外文寫的，他們同國內外通信也多數是外文。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問題，都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搞清楚。

第二個問題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大部分人，同政界有密切的關係。另外還有部分國民黨、三青團的骨幹分子，上面這些人的問題，同樣在短時間內是不容易搞清的。

第三個問題，是特務嫌疑。在知識分子中，同國民黨的中統、軍統、日本特務機關有關係的都有發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我們接收了一批日本統治下的蒙疆共和國（河北張家口）帝國醫學院的學生，其

中就有一批日本的特務分子。後來公安部通知我們，總後幹部部幹事陳政就是日本暗藏在學生中的特嫌分子。

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月間，總後對清理中內層做了一個初步總結。黃克誠到會聽取了總結，對繼續深入肅反運動做了重要指示。

黃克誠說：「總後直屬單位清理中、內層的運動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成績之一是對肅反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教育，大家的認識提高了一步；之二是對情況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整理了不少材料，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對今後的工作會起很大作用的；之三是沒有抓人。邱會作同志在總結中提出：肅反是一個細緻的長期的工作，不能像除四害一樣可以隨便打。他說：寧可抓不到一個反革命，也不要抓十個假反革命。抓住一個真反革命是消滅了一個敵人，是很大的成績；抓住十個不真實的反革命，是傷害了自己，幫助了敵人。他的思想和提出的政策界線都是正確的。我們所取得的成績的核心問題就在這裏，沒有抓一個假反革命是最大的成績。現在有的單位抓起來不少大小胡風分子。這難道是成績嗎？……」

黃克誠繼續說：「對知識分子的清理工作要認真進行。這批知識分子是我們的很好的財富，要建設現代化的後勤離不開他們。對他們複雜的國內、國際關係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還有待很好研究。我今天可向你們提出一個基本政策是：知識分子祇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就是好人。我們就要信任和大膽使用。因為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複雜關係就不信任、不大膽使用是錯誤的。」

黃克誠還說：「肅反運動今天祇是總結，並不是結束。你們提出還有些問題，例如，眼科主任的問題，帝國醫科大學學生的問題等。這些問題，你們要向總政治部報告，請示處理辦法。」

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

一九五六年，黨舉行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總後的代表有洪學智、張令彬、饒正錫和我。八大的會場是政協禮堂，大會代表 1026 名，比黨的七大多了一倍，代表著全國一千萬黨員。

八大是全國解放後第一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做政治報告，鄧小平代表中央做修改黨章報告。大會對樹立毛主席的接班人劉少奇的

威信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是成功的一方面。但事後看，八大的組織路線，也是黨內開始不團結的一個不小的原因。

毛主席祇是在大會開幕時致了開幕詞，其餘就沒有說什麼話。但毛主席每次大會都是到會的，不過好像沒有深入小組討論。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參加了黨的八大大會。

八大是比較平靜的大會，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搞，祇是在起草大會對政治報告的決議時，出現過不同意見。在通過決議時，毛主席對《政治報告》中所提出的：「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些論述，有不同意見。他就是在大會討論時，在主席臺上修改的。在臺下，我們看到毛主席在看什麼文件，當時神態很嚴肅地拿起筆就寫開了，寫了之後即轉給坐在他右邊的周總理看。總理看了之後，笑了笑向毛主席點頭，表示同意毛主席的修改，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個問題，當時祇在小組會上做了簡單的傳達。

在文化革命開始後，毛主席和劉少奇反目爲仇，才把文件的內容、修改的經過都作爲中央文件影印出來了，被當成了劉少奇的一個大「罪行」，給予完全的否定。此時，我才知道當時爭論的真相。

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把「對個人突出和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大會自始自終在對毛澤東個人進行歌功頌德，甚至對劉少奇個人也進行了歌頌，這個風一點也沒刹住。

八大也有不成功的一面，就是組織上安排不很得當，劉少奇的人在組織上擺得太高了。過去在白區工作的幹部，特別是華北地下黨的重要幹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相反，軍隊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名額是很有限的，這與我們黨的發展歷史很不相稱。在大會討論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時，各組裏就傳出這樣一些議論：「今後是建設時期，有建國才能的人都應當進入中央委員會。」更有人在樹立劉少奇的威信，說「打仗靠毛主席，建國靠劉少奇」，連「幹白區黨的比二萬五的（軍隊幹部）鬥爭更艱苦，因爲是老虎肚子裏活下來的」等

謬論也出來了，而且傳得很廣。黨內這種潛在的思想分歧從此開始了。在兩年後的八大二次大會上進行了彌補和平衡，補選了一批候補中央委員，主要是軍隊幹部，這說明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儘管如此，這也沒有完全消除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由此而引發的一些矛盾，這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隱患。

一九五八年二月，在北京舉行了黨的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在小組會議上，我不記得是什麼事由，引起討論薪金制度問題。對這個問題，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我的中心思想是，主張黨政軍幹部實行統一薪金制，這在政治上、幹部團結上、業務工作上都有好處。當時，黨政軍幹部的薪金制並不統一，各搞一套。黨政幹部（除技術、文藝級之外）一律實行行政級，即從一級開始一直往下排。軍隊實行職務級別，即從排長開始向上排，一直排到軍委委員這一級。這兩種薪金制的基本不同點是：黨政幹部的行政級是級別高，薪金數額也不少；軍隊幹部是級別低，薪金數額並不多。為了說明問題，我舉了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軍區政治委員王任重做例子來說明問題。我說：「王任重同志勝利後連提六級，陳再道同志一動未動。如陳轉業套級，祇能和以前在他部下當宣傳科長的同志相等。余秋里同志轉業後如不提級，則其政治和物資待遇也相差很遠。」軍隊的薪金制，實際上是圖了高薪制的虛名，落了一個不得實惠的薪金數額。因此，我極力主張黨政軍實行一種薪金制。我發完言，文新生同志立即發言支持我。我的意見小組會也都同意，後來軍隊實行的薪金制同我提出的建議也是一樣的。看來，我的意見還是正確的，但我所舉的例子是不太妥當的，容易造成誤會。因為我舉出的那兩個人恰好是兩種人的代表人物：王任重是新生事物、後來居上的代表人物；陳再道是老資格的代表人物。我把這兩個人排在一起來說明問題，好像我是爲老資格叫冤。這是我後來才認識到的。事後我也落下禍害，成了「資格論」的典型人物了。

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就開了軍委擴大會。這次會議就不平靜了，與其說是反對教條主義、個人主義的批判大會，不如說是鬥爭大會。劉伯承、粟裕、蕭克、黃永勝都在大會上做了檢討。因爲八大的組織路線，軍隊幹部下面有牢騷，要剷這股風，沒有契機，陳毅元帥正好以反對「資



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參加將軍合唱團練歌。指揮李志民，後排左一邱會作，前排左一
李作鵬、左二皮定均、左五吳信泉、左六陳伯鈞、左七黃永勝、左九張賢約。

「資格論」為主要內容在大會上做了發言，對粟裕、黃永勝和我都不點名的進行了批評。大會的氣氛始終是緊張的。

我當時已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陳老總發言之後，我是看簡報才看到的，我立即給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寫了簡要報告，並請轉小平同志轉中央，我還以「打倒資格論」為題，寫了一篇準備在小組會上的發言稿。我把發言稿送給了陳老總，他在我的稿子上批了幾句話（大意）：你在小組會上，有關薪金改革發言的觀點並無錯誤，方法有不妥之處。我對「資格論」的批判是作為一種現象，並非指某一個人。你的發言稿很好，希望安心學習。

正是因為陳老總有指示，我在小組會上就免得受批判了。回到高等軍事學院，李志民政委找我談話，他說：「你為軍隊同志爭，是好事，也是多管閒事，你在學習嘛。你準備挨批評。」當時葉帥是院長兼政委，我找到他，事情很快就化解了。

第十四章 新軍委成立

軍委統帥部的改組

一九五九年八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議批判了彭德懷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作出《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後在北京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我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

廬山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是一次很有影響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央內部開展了嚴重的鬥爭，鬥爭目標主要是軍隊的兩位領導實際工作的負責人——國防部長彭德懷和總參謀長黃克誠，並牽涉到鄧華、洪學智等人。彭德懷主持軍委領導工作，主要是為了工作方便，組班子主要就是用了黃克誠擔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總後部長兼政委，同樣，毛主席也是為了牢握軍權，推倒這個班子，由林彪重新組班子工作，羅瑞卿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這樣大的班子變動，建國以來是第一次，使大家震驚，所以，這次會議對軍隊的影響尤深。

八屆八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七日，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致決定由林總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為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第三副主席。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決定軍委進行改組，成立了新的軍委，毛澤東仍為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副主席，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常委是：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羅瑞卿為軍委秘書長，副秘書長為蘇振華、蕭向

榮，很快又增補蕭華為副秘書長，蕭華雖然是後任命的，但主要由他輔助羅瑞卿工作。

十月二十日，軍委又發出通知，決定在軍委常委之下設立一個辦公會議，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組成，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事務工作。在此前的十月十四日，已任命我為總後方勤務部部長（次年四月，總後方勤務部改稱總後勤部），免去洪學智部長職務。一九六二年，我還被任命為編制屬於軍隊序列的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羅瑞卿）。

對於新軍委各總部領導人選的提出是有個醞釀過程的。後來，周總理談到，毛主席曾對他說：「你對軍隊的幹部比較熟悉，找些什麼人到軍委辦事，你去物色一下。林彪身體不大好，讓他休息幾天。」

對總參謀長的人選，總理在同毛主席交談時曾提到許光達和劉亞樓。毛主席說：「劉亞樓能力可以，但作風有些霸道。除他們二人之外，還可以考慮其他人。」實際上，主席對這兩個人選並不認可。

周總理又找了羅榮桓元帥，交談了物色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的人選問題。羅帥是一個公心很大的人，他提出了一條建議：搞五湖四海，削平山頭又照顧山頭。雖然反掉了彭、黃，但最好能維持原來任職的歷史情況，即總參謀長最好是三軍團的同志或者是二方面軍的同志；總後部長要選四方面軍的同志。羅帥提出的總參謀長的人選是：許光達、蕭勁光，總後部長的人選是：王新亭、王宏坤。周總理對羅帥的意見未做肯定或否定的表態，可能他對毛主席的心思更瞭解一些，總理祇是申明他們是個人交換意見。

周總理是個很周到的人，他隨時把物色人選的情況向林總通氣，並和林總交換過意見。林總對於主席叫他上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並不情願，因為林總解放後，大部分時間養病，很多「紛爭」他很少介入。但林祇要決定幹，他會幹出個好樣子的。點將是頭等大事，林總提出由羅瑞卿擔任總參謀長，總理感到意外又表示同意，周總理提出邱會作擔任總後部長，林總很是贊成，其實林總上臺後，黃永勝、賴傳珠等不少人向林、羅建議我去當總後部長，林心中事先是有數的。林總說這樣大事祇有主席才能決定，為此，林總約周總理一起到毛

主席那裏去匯報。他們到了主席那裏，當時的中央常委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同志都在座，對林、周的建議，他們都同意。

毛主席聽完林、周的匯報後，笑著對他們說：「你們很會選人，羅是個幹將，此人祇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到；邱會作年輕但能辦事。」接著主席又對林總說：「不過羅這個人渾身是刺，你不怕刺到你身上？你不怕他霸道呀？對邱會作的情況，在座的人恐怕就是總理最瞭解。此人在年青的時候，是一個不錯的人，多年不見了，現在的情況怎樣就不清楚了。」

周總理說：「羅瑞卿在公安部工作十年了，在各方面都很好，同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也搞得不錯。邱會作剛四十歲出頭，還是一個年青人，他本人也有一定組織能力，紅軍東征的時候，他就跟我搞後勤，工作幹勁十足，他當總後部長，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人物。」

毛主席又說：「在戰爭年代，我和恩來是分別擔任『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的。不打仗了，對軍隊的事，總理過問不少，他挨了彭德懷的罵也不少，他們祇會向總理要錢，要東西。選羅瑞卿、邱會作到軍委辦事是合適的，我贊成。大家要沒有不同意見就定下來了吧。」

我擔任總後部長的任命下來時，還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爲此，周總理專門把我叫去談一下。一見面他就對我說：「毛主席決定你去總後當部長了，這是我和林彪同志不約而同提出來的，大家都贊成。以前我還想要你去國家經委工作，現在不成了。不過總後和國務院有密切聯繫，今後我們在一起辦事的機會多了。把軍隊後勤工作做好，對我也是支持。過去彭德懷罵人，黃克誠、洪學智就知道問我要東西。」

這次軍委改組，最關鍵的就是換了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全黨全軍是一個很有影響的幹部，我很早就認識他，記得在一九三八年他結婚時，專門請李富春、葉季壯和我吃過飯。一九四四年，我從前線回延安參加七大，剛到不久，富春同志就提出要我去中央黨校任副秘書長，我爲了要學習一個時期，不想當這個副秘書長，曾請羅爲我說情，他很負責的爲我辦了。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我去東北，在路過張家口時，我的牲口的腿摔壞不能用了，在我沒有辦法時找到了羅，他不僅熱情地接待了我，還親自領我去馬廄，任我自己選了一匹牲口。羅當時是晉察冀軍區

副政委，能夠親自爲我解決這樣的具體困難，使我非常感動，革命隊伍中的互相關心是真誠的，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平津戰役期間，東北野戰軍在北平以東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羅當時是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不但親自去看了我們，還請我們幾個人去他那裏吃飯。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期間，羅曾代表中央到廣東檢查工作。我當時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羅在檢查中遇到的許多問題都主動找我商量，甚至他還專門到我家裏同我商量，比如有人想整黃永勝，他問我如何看？我說：「我負責地向羅部長報告，黃永勝沒有問題。說穿了就是幹部之間的關係問題。而且趁老黃外出治病，讓老項亂說，也是不健康的做法。」羅瑞卿同意我的意見，但他還是認真做了調查，並很負責地向毛主席作了匯報，他認為對黃永勝同志是小題大做，毛主席也及時給予指示，黃順利過了關。一九五五年我調任總後副部長兼副政委時，我代替黃克誠去參加中央肅反的會議，但凡去公安部開會，羅每次都是熱情地請我和他們坐在一起，多年的接觸使我感到羅是一個有水平、有能力、有辦法的高級幹部。我當時認爲，中央任命羅爲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成爲軍委工作的實際主持者，是合適的、正確的。

在歷史上，羅瑞卿曾是一軍團的保衛局長，當時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保衛林總。林、羅上臺時，林總在軍委常委會上有介紹羅瑞卿的講話，從這次講話中就可見他們之間的密切程度了。林總說（大意）：在軍委的領導下，成立一個辦公會議，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這個辦公會議，不是平常說的「辦公」的意思，是一個執行中央和軍委意圖的集體領導的組織機構，羅總長是辦公會議的主持人。在座的同志對羅總長都是比較熟悉的，他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毛主席、中央放心。我和在座的不少人同羅總長都是老同事，他很有領導和組織工作的能力，由他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軍委常委對你們的工作是既放手，也會大力支持的。

當時到會的各位元帥都講了話，都表示支持羅瑞卿和軍委辦公會議。

軍委辦公會議

林總對工作向來是提綱挈領的，而且是用人不疑，全力支持下面的工作，給下面的工作創造條件。因此，林總向毛主席建議在軍委常委領

導下設立軍委辦公會議作為執行機構，對軍委常委負責，中央很快就同意了。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列席軍委常委會議，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是：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增補了張愛萍，一九六一年一月，譚政退出。

軍委辦公會議的職責範圍，用一句話來說，就是軍隊日常工作的「總管」。稍微具體一點來說，可以有以下方面：

第一，學習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指示等文件。這項工作得到了全軍領導幹部的熱烈擁護。不少領導幹部說：過去對中央的事，祇知道「外面」的（指看報紙），現在可以知道「裏面」的（指聽傳達文件），我們和中央的距離比過去近了。

第二，討論起草上報下發的文件。各總部凡是要用軍委名義向上請示或報告的文件，都要經辦公會議審議；其中重要的事情要提交軍委常委審議，一般的日常工作由辦公會議處理。

第三，審議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請示報告。各總部除業務性質的問題以外，凡涉及到全軍的方針、政策問題的文件，都要經辦公會議討論、審議。

第四，審議軍隊高級幹部任免事項。

第五，討論、審議專門問題。

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在全軍的威信很高，受到了各總部、各軍區、各軍兵種黨委的支持和熱烈擁護。羅瑞卿領導和主持下的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是成功的，對軍隊的建設和準備打仗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什麼能形成這樣的局面，我的體會有這麼幾點：

第一，軍委辦公會議是一個有職有權有責的機構。它既掌握了軍隊工作的大政方針，又有權力及時處理各種問題。軍隊的日常工作和各大單位的請示報告，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解決，這樣，不管大事小事都能有個著落。

第二，軍委辦公會議作風民主。辦事注意調查研究，對下面的請示報告，凡是沒有說清楚的，不草率做出決定，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同時注意耐心聽取下面的意見，辦公會議成員有自我批評精神。

第三，軍委辦公會議講究工作效率。開始規定每星期開會一次，後來則幾乎天天開會，會議時間有長有短，長則一天有時甚至二十四小時

不散。例如：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期間，軍委辦公會議成員都夜以繼日地集體辦公。對下面的請示報告能夠及時、明確、具體的給予答覆，踢皮球的現象幾乎沒有了。

穩定軍隊的高級幹部

反對彭德懷的鬥爭，重點在軍隊。林總、羅瑞卿是在反彭、黃鬥爭中上臺的，在軍隊中有一大批很有影響的重要幹部，是旗幟鮮明地和彭德懷鬥爭的，如羅榮桓、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羅瑞卿、劉亞樓、蕭華、楊成武、賴傳珠等。我認為當時對彭德懷的鬥爭是既堅決，又防止了擴大化，會議是成功的，團結了大多數幹部。雖然一時有些群情激憤，但積極分子大都是和彭有些過節的人。當時全國都在反右傾，軍隊批彭也正在風頭上，這是勢在必行的事情。

當時，批彭火藥味比較濃的地方，還是劉少奇、鄧小平、康生他們主持會議的時候，尤其是劉少奇對彭、黃的批判很嚴厲。劉少奇在大會上講（大意）：彭德懷這個人手伸得特別長，還管地方上的事（指彭給主席寫信提人民公社的事）。抗戰時期，彭德懷長期與華中局搞對抗，把手都伸到華中來了（指黃克誠、彭雪楓）。劉少奇還挖苦彭德懷說：與其你反黨還不如我反黨。這時羅瑞卿插話說：你們都知道吧，三軍團有大彭和小彭，大彭是彭德懷，小彭是彭雪楓。本來羅的話說到這裏，事情也就為止了，但這裏發生了一個插曲。羅瑞卿的話音剛落吳法憲就站起來說：「我要控訴，過草地時三軍團殺了一軍團的人！」羅瑞卿說：「那就是彭、黃搞的。」吳法憲的話是人人皆知的老話，但羅瑞卿的話一下惹火了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鍾偉說（大意）：情況不是這樣，彭德懷在前面指揮打仗，黃克誠被撤了職，不是他們搞的。我當時就是負責收容的，情況我知道，過草地時有個重傷員實在走不動了，他為防止敵人追上來暴露自己是紅軍就換了衣服，羅瑞卿同志卻說他要叛變革命，要殺他。我說我負責收容，情況我清楚，我們的戰友從江西走出來，現在負傷這麼慘，我們要幫他一把。羅瑞卿同志堅持說他要叛變革命，並親自殺了他。是你們殺的，怎麼是三軍團的人殺的呢？！鍾偉的話使主持會議的羅瑞卿、蕭華有些愕然，大為惱火。過了一會蕭華帶人把鍾偉搞走了。

彭德懷下臺以後，新的軍委對高級幹部一律實行穩定政策，林總、羅瑞卿是把這件事當作一件大政策來掌握的。林總在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說：「新的軍委對幹部不能輕易變動，更不能隨便調換。軍隊的團結、穩定最主要的是對高級幹部的使用問題。高級幹部一換，接著中級、下級幹部都會換，這樣軍隊就惴惴不安了。現在的高級領導幹部有個別的是不稱職的，有調換的必要，但也要在適當時期通盤考慮，適當安排。凡是調整了工作的幹部，特別是本人有意見的，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做到被調整的人思想沒有包袱。」林總講話的精神得到了貫徹。除彭德懷外，被降職的祇有黃克誠、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等人，而且中央都安排了工作。其他人一律沒有作組織處理。

實行穩定的政策，這裏還可舉一個例子，就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的人選問題，成都軍區司令員賀炳炎一九六〇年去世後，本來李天佑同志最為適合，總政也幾次提出繼任人選，後來還是林總執意點名黃新廷擔任。對此，羅瑞卿轉達了林總的話說：「林總關於成都軍區司令人選問題有指示，林總說：由於歷史原因，我們的軍隊是『合股』而成的。我們必須尊重這個歷史，在實際工作中要考慮到歷史的情況，祇有領導對幹部的使用情況做得好，才能把多股合成一股。成都軍區司令員原是由二方面軍的同志來擔任的，這也是個象徵，對該軍區的司令繼任人選就要注意到這種不成文的歷史！」

新軍委成立後，還有一個如何對待所謂「落後」幹部的態度問題：總政的態度是殺一儆百；林、羅的態度是拉一把。對於這個問題，羅瑞卿在一次軍委辦公會議上有個重要的講話，他說：今天的單子裏（指討論的議題）有對xxx同志的處理問題。對總政提的處理意見，我是感到不安的。為此，我昨晚專門去同常委商量過，向他們請示。他們有重要指示，總的精神是對幹部要看本質，要看大的表現，要看政治。對他們的缺點、甚至某些嚴重錯誤是要批評幫助的，但決不能打擊，這是一條嚴格的界限。對幹部採取打擊的政策，領導上就一定犯錯誤。對今天提出的對xxx處罰的議題我提議撤銷，由總政重新審議。羅的這一講話也算是一條準則，以後發生同樣的事情依此照辦，挽救了好幾個人。我記得當時總政曾建議對xxx（濟南軍區副司令員），xxx（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給予紀律處分，說他們都有生活作風上的錯誤。還有一批高級幹部如

xxx、xxx、xxx 都是老「運動員」，他們都經常被「運動」的。經過羅瑞卿多方面做說服工作，保護了一些高級幹部。羅對幹部在政治上要求很嚴，對其他方面的一些缺點總是從愛護幫助的態度出發進行批評教育。我認為，羅的態度和做法，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貫的幹部政策的。但是，「九一三」之後，羅重新上臺後變化很大，打擊幹部很厲害，他又一次投靠鄧小平，我認為這是他的悲劇。

總後在處理和彭德懷有關的同志的問題時，是按總政下發的《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進行的。總政當時的態度和辦法都是嚴厲的，他們給總後定了兩個重點人物，一個洪學智，一個蘇煥清。最後軍委決定撤消洪學智的職務，離開軍隊到吉林省任廳級幹部。當時，他還住在總後原來的房子中，和我的家也祇有十米之遙，我們從來沒趕他。走之前他提出把他坐的吉姆車帶走，我同意了並報告了羅瑞卿，羅瑞卿說：「（車）帶走吧，帶走吧。祇要人快點走就行了。」他六〇年五月間才到吉林去，我和李聚奎政委及幾個在職的領導還和他一起會餐，晚餐後我陪洪學智到每家去辭行。在審查期間，總政一直抓住洪的小辮子不放，上綱上線太高，洪不能接受，洪找到我，我幫他修改過檢討稿，在總政那裏還是沒通過，無奈之時，洪讓我去登譚政主任的門，譚政聽進去了我的話。洪吃大苦頭是在文革，聽說搞到農場勞改去了。

蘇煥清是總後營房部部長，工作是比較踏實的。他是黃克誠和洪學智在新四軍三師時的老部下，硬讓他揭發黃在任東北軍區後勤司令員時的所謂「經濟」問題，軍事檢察院的黃火星檢察長負責審查蘇煥清，蘇煥清說沒有，因為在東北軍區他和黃克誠根本沒有同時在一起工作過，總政犯了官僚主義。看來總政是有人想用所謂「經濟」問題把黃克誠搞臭，在這個問題上說黃老不是的也不止吳法憲一人，最後祇能一風吹，但總政還是示意降職使用，這是何道理？蘇煥清解脫之後，我們立即恢復了他的工作。

總後的新班子

彭德懷下臺後，洪學智受牽連也下臺了，其實洪學智和彭根本沒有什麼「有機」的聯繫，祇是在志願軍的時候在一起工作。我對洪的下臺有同情感，因為洪是一個工作很踏實的人，後勤幹部就需要這樣的人。洪

下臺後，總後政委李聚奎同志臨時主持工作，具體工作參謀長胥光義協助。我任總後部長的命令在軍內公佈時，我還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我的任命的確在原來總後領導班子中掀起了波瀾。

總後副部長張令彬是一九二六年入黨的老同志，一九二七年跟著毛主席參加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他比我年長十二歲，有後勤工作的豐富經驗，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我回總後當部長，羅帥事先找他談了話，叮囑他支持我的工作，張令彬心中有了底，在後來的工作中，我們一直團結很好。

總後政委李聚奎是一九二八年平江起義的老同志，他曾擔任過東北軍區後勤部參謀長和四野後勤部第二部長，雖然他比我年長十歲，但身體結實，工作認真，他很想在後勤戰線做出成績。因此，我當部長主持工作，我們難免有不協調之處。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也專門找李聚奎談了話，讓他帶頭支持我的工作，在老同志中做個榜樣。譚政的話他很難聽進去。我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總後的事都是我在軍委辦公會議上提出研究，軍委的指示也是我帶回總後傳達，可是在總後的會上，開著開著，他就主動主持起來，最後總是他说：「沒有什麼問題就散會。」我有工作要佈置就常發生困難。

後來就發生了推選總後黨委書記的事情。我們黨的黨委書記歷來都是上級黨委決定的，黨委書記也是一種「職務」，尤其是高級領率機關，本單位是不能自選黨委書記的，當然總後也是一樣，總後的黨委書記要軍委定，要中央定。但總後偏偏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在總後的常委會上，由李聚奎同志主持時，竟然研究起總後黨委第一書記的人選。參謀長胥光義直截了當地提出：「李聚奎同志軍銜最高，資格最老，應當為黨委第一書記。」湯平同志立即說：「怎麼還要我們選黨委第一書記？這不對吧！但是如果要我表示態度的話，祇有邱會作同志適合當第一書記，我認為這和毛主席、林總決定邱會作回來當部長，抓全軍的後勤工作是一致的。」張令彬、饒正錫同志都支持我，並認為開常委會醞釀黨委第一書記是不妥的。我當時也發了言，我給李聚奎同志留足了面子，我說：「如果我們可以醞釀總後黨委第一書記，我提議李聚奎同志擔任。」其他的常委都沒開口，就草草散會了。我對自己說，我得了兩票半（湯平、饒正錫支持我，張令彬認為會上醞釀是錯誤的，算半票）。

不久，軍委常委開會，其中一個內容就是總後黨委常委的組成問題，我作爲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也列席了會議。林總、賀老總、聶帥、羅帥、葉帥都參加了。林總來了個開場白，會議就由羅瑞卿來主持。譚政主任代表總政拿出「邱會作任總後黨委第一書記的意見」來討論，他的話音剛一落，羅瑞卿就說：「總後黨委第一書記我的意見就是由邱會作來擔任，在這個問題上，總後的思想相當混亂。本來讓他們醞釀常委，他們卻推舉黨委書記。你邱會作礙著面子，不講原則。」

羅帥接著說：「把論資排輩放在前頭是不成的，總政以後要特別注意。」羅帥當場批評了譚政。賀老總說：「什麼老資格，比我還老？用他們去搞後勤，全軍沒飯吃！」賀總又對我說：「邱會作你給我打起精神來，大膽工作！」最後林總講話，他說：「軍委要支持邱會作同志的工作，現在總後的擔子是很重的，我們相信邱會作同志能夠把工作搞好！」這樣，軍委決定讓我擔任總後黨委第一書記，這個決定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對這樣的安排，李聚奎同志心裏肯定有意見，但這並不是由我來決定的。我祇有處處尊重他，來搞好團結，搞好工作。當然我在工作中也會有缺點和失誤，李聚奎同志也不斷向總政告我的狀，比如在反對總政搞「空頭政治」方面，我也說過隨便的話。直到一九六六年，蕭華主任對又去告狀的李聚奎同志說：「你不要再告了，雞毛蒜皮我也不聽，軍委已決定你調到高等軍事學院工作，任政委。」

林彪批評了朱德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軍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批判彭德懷。林總在會上作了總結性的講話。林總的講話是以軍隊「革命化」這個口號開場的，這個口號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但林總作爲軍隊建設的方向提出來，我聽到的還是第一次，意義非同小可。正是因爲如此，這句話當時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很快林總的講話就轉向批判彭德懷和對朱德的批評了。對彭的批判，完全可以理解，大家都表態，林也必須表態。對彭德懷的批判，林說的話不多，祇說了幾句話：「有意見不去同毛主席當面說，背地裏搞陰謀活動。」林總說到這裏，對毛主席表示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他說：「毛主席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蔣介石，取得全國政

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取得這樣偉大的勝利！任何人反對毛，都是不顧黨、國家、人民的利益的，對這種人，應當堅決反對！主席，對於朱總的批評，我立即就和「革命化」這個問題聯繫在一起了。我理解是：「革命化」就是忠於毛主席的代名詞。林總在表示：對於軍隊，朱德這樣的總司令都不能忠乎所以，其他人就更不在話下了，彭總也是教訓，今後大家忠於毛主席。

其實，朱德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已經對其歷史上曾經犯過的「整頓結案」及舉大支持過「錯誤路線」做出過自我檢查。對這次廣山會議，朱總認為自己對他們「反黨野心家的本質認識不夠，光從好的方面去想，認為他們已經改過來了，同時和他們在思想上又有共同點，所以這次我軍還表現出興奮不棄，沒有及時識破他們反黨陰謀的本質。」朱德的檢討中央後來以中央文件轉發給全國，全軍縣團級以上黨員幹部閱讀。

在廣山會議上，朱德有些偏袒彭德懷，至少是態度曖昧，主席批他「獨裁指揮」。我記得林總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評朱德時，朱德當時坐在林總的旁邊，林說：「今天當著全軍高級幹部的面，對朱德同志是要進行批評的，他是不承認毛主席是黨的領袖的。朱德同志總想認為自己的功勞很大，其實他名譽很大，功勞不很大。戰爭年間，朱德同志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我們的高級幹部，對朱德同志的歷史情況和政治情況，是應知道的，這很有必要。我們黨喜歡的歷史的中心問題，就是認識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是很有好處的。」

林總對朱德的批評，我是有理解的一方面，又有吃驚的一方面。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軍的高級幹部知道得就更清楚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朱德不是一個「真總司令」這個問題，對到會的人震動並不大。但林總指出了朱德是個野心家，不服從毛主席，對大家震動就很大了，像我這樣的幹部都有點吃驚了。對朱德過去怎樣反對毛主席我知道的很少，後來從劉亞樓口裏，才知道了實情問題。劉對我和蕭向榮說：「朱德是總司令嗎？他是彭德懷的總司令。在廣山朱德支持彭德懷反對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朱德是真總司令，他能起到了多大作用？！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才把朱德的問題分開的。」劉亞樓又說：「林總對朱德的批評，不是他個人的意思，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劉還風趣地說：「林總給我們大家吃了一把

到新比林，鼻子通氣了，可以聞到更多的氣味了。」聽了林總批判彭、朱的評，又聽了劉亞樓一席知情話，我對林講的「革命化」的問題，就算是徹底了。

朱德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很大的，南昌起義朱德雖然還算不上是什麼主要領導人，但他和陳毅一直帶著這支起義部隊轉戰，湘南暴動後上了井岡山，武裝割據，建立蘇區，朱德是有功的。一九二八年冬，我的友導開始鬧革命，我雖然還是一個小孩，但也知道「朱毛」是紅軍的領頭人。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的正中央掛的就是「毛朱」的頭像。「朱毛」這個稱呼，在革命隊伍中流傳很廣，正是因為這樣，就更加促使我去想問題。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朱德元帥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主持人是劉少奇、鄧小平。會議結束時由鄧小平宣佈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在會上林彪也批了朱德，主要是過去那些話，說朱德有野心，說朱德不是總司令，毛主席是真正的總司令，說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陳老總的發言很嚴厲，問朱德：「你是不是要搞政變？我看你是要黃道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周恩來也很批了朱德，不過總理是擺事實的。總理說朱德同志的賬是很多的，似乎朱德一直都是錯誤的。（大意）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是盲動主義，流寇主義；執行立三路線、王明路線；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劉伯承、賀龍、任弼時推著走的；解放以後，高談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我們不放心你，毛主席也擔心常系中有你這樣一個定時炸彈。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同樣有不少人批判了朱德，葉劍英則做了長篇發言。我從葉帥的發言中，對朱德的歷史就有比較系統的瞭解了。會上有人提出：「朱德的問題，造反派早就搞的滿天飛了，但從來還沒有正式傳達過，我們希望進行傳達。」周總理当即回答：「可根據葉劍英同志在全會的發言在小範圍內講，即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的黨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可以傳達，中央就不發什麼文件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我在總後黨委會上傳達過有關林總、葉劍英批判朱德的問題。公審的時候把我在總後黨委會上傳達上面的精神，說成是攻擊朱德的犯罪，也太不尊重歷史，太不尊重事實了。

七一年「九一三」之後，主席又說，「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這話已經說晚了。

林總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肯定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我是完全接受和擁護的。我從參加革命起，在幾十年的革命征程中，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都是堅決擁護毛主席的。即使在文革中，我知道主席對造反派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對的，當我受到總後造反派多次的殘酷的武鬥，幾乎要了命時，我對毛主席都沒有動搖過。一九八〇年，我在鄧小平、彭真組成的所謂的公審法庭上，我也沒有把責任推到毛主席身上。

一點教訓

毛主席提倡搞「五湖四海」，他曾說我們的革命隊伍是「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現在想起來，主席自己也沒有把握好，我感到在反彭德懷以後，毛主席對掌握軍權看得很重，從「五湖四海」搞成「雙一」（一方面軍，一軍團），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都是「雙一」，連軍委辦公會議的羅瑞卿、譚政、蕭華、楊成武、邱會作、蕭向榮也是「雙一」。尤其是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更是如此。軍隊這麼多老同志，人家是口服心不服。那時看，這是主席的英明決策；現在看，主席有些失衡。尤其是「九一三」之後，主席打掉了林彪和我們這些「雙一」的骨幹，從羅瑞卿、劉亞樓到蕭華、楊成武，再到我們，死的死倒的倒，可是他又說他身邊沒有（即不用）一個一方面軍的人，四方面軍的人比較謹慎（即比較好），這是非常不妥的，也是蒼白無力的。其實主席並沒有真正接受教訓，在文革中，主席實際上還是摒棄「五湖四海」，而重用「中央文革」（以後是「四人幫」）。主席去世後，受主席重用的「四人幫」頃刻瓦解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十五章 林彪對我軍建設的貢獻

廣州軍委擴大會議

洪學智是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從朝鮮回來到總後的，我是一九五五年初從廣州到總後的。有一次我們閒談時我對他說：「你在彭總和林總手下都幹過，你對兩位老總的指揮風格怎麼看？」當時洪並沒有說彭，他直接說林：「我給你打個比方，林總打仗像打撲克，不檢分，五分看不上，十分也不要，專門摳底。」我認為洪學智說准了林總的指揮風格，林總是不幹則已，一幹就會幹出個樣子來。林總上臺後出的牌，也和打仗時一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是高舉「革命化」這張大牌！軍隊怎麼革命化呢？那就是「三八作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接著又提出「突出政治」、「四個第一」，把全軍集合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

解放軍是一個革命的整體，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山頭主義、宗派情緒也是很重的，不但上級對下級有山頭主義，宗派情緒；下級對上級也有山頭主義，宗派情緒。老上級的批評，對不對都堅決聽；不熟悉的領導批評對了，卻往往口服心不服，嘟嘟囔囔。使用幹部也是一樣，自己熟悉的，不太合適也想用，也想爭；自己不熟悉的，優秀的也不積極推薦。這對部隊建設危害是很大的。

林總就是要打掉這些不正確的東西，把全軍統一在一個思想下，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林總號召全軍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總主持軍委工作以後，全軍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變化，這是林總很大的貢獻。

林總也是一個扎紮實施的實踐家。林總是很能讀書很會讀書的人，爲了我軍建設他讀了大量的書籍，而且取其精華，勇於實踐。林總從南到北，走遍了全軍上下，陸海空三軍都走到了，從我軍的「革命化」入

手，從部隊的編制開刀，把我軍引上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道路。遺憾的是，林總因為戰傷，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六二年就病倒了。

六〇年初，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毛主席主持，林總在發言中講到部隊問題，林總響亮地提出（大意）：部隊要樹立革命的作風，這個作風要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毛主席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三句話，八個字。毛主席以簡單樸素的語言，概括了很多道理。部隊掌握了毛主席這三句話八個字，就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有革命的雄心壯志，我們的部隊就生龍活虎，永遠有必勝的信心。接著在六〇年春節期間的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林總又反覆講這三句話八個字，而且特別強調團結，提出團結就是力量，「我們有了毛澤東思想，才能團結一致」。林總還引用了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話，指出「人和」就是團結。林總對部隊的建設是抓住了綱，是嘔心瀝血的。林總一說到「三八作風」的內容，大家熱烈鼓掌，都高興地笑了，因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毛主席當年為抗大題的校訓，大家都熟悉，因此倍感親切。

「九一三」以後，有人把林總糟蹋得不成樣子，什麼「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無術」，這完全是一種誣蔑。

新軍委成立後，在軍隊建設上同時提出來了兩大問題，一是軍隊革命化問題；二是準備打仗問題。後來又出現一個軍隊搞生產渡過災荒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相互聯繫，相互促進。

一九六〇年一至二月間在廣州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和九至十月間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以及一九六二年二至五月的全軍編制裝備會議是準備打仗的重要會議。這三個會議對部隊革命化、正規化、準備打仗都做出了重要的決策。

一九六〇年春節期間，軍委在廣州召開了擴大會議。各總部、軍種、兵種、院校的負責同志，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後勤部長，各野戰軍軍長、政委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戰略方針問題。在會議期間，毛主席、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常委都在廣州，會議中討論的問題都及時地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還在



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八元帥合影。前左起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後左起羅瑞卿、聶榮臻、徐向前、陶鑄、葉劍英。

廣州郊區的雞頸坑接見了到會全體同志併合影留念，領導和主持這次會議的林彪、賀龍、聶榮臻、劉伯承、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等八位元帥還在一起合影（還有陶鑄和羅瑞卿），這是我軍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象徵著軍隊的大團結，這對開好會議都是極為重要的。

北頂南放

林總代表軍委在會議上做了長篇報告，當天會議的執行主席是賀龍元帥。在我的回憶中，報告有下面幾個要點：

第一，關於戰略方針問題。林總說：毛主席早就提出了我們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禦，但有了戰略方針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作戰方針、作戰計劃。制定作戰方針的主要依據是未來的假想敵、自己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我軍的作戰能力，這三條是互相起作用的。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

力量還很薄弱，準備打仗和經濟建設有一定矛盾，但從國家安全來說又要這樣辦的。

我軍現在還是一個大步兵，空軍的作戰能力稍微好一點，海軍還是個「雜牌船隊」。根據敵我力量對比，我們的作戰方針可以考慮為四個大字：「北頂南放」。北邊以長江為界，對從鴨綠江到象山灣沿海一線的來犯之敵要頂住，要死守，寸土不讓。對南方來犯之敵，可以考慮放進來打，因為南方來犯之敵是從海上來，敵人沒有後方，放進來切斷退路，圍而殲之。

第二，關於部隊建設。林總說，作戰方針是部隊建設的總綱，全面提高部隊戰鬥力是部隊建設的中心。政治覺悟、軍事技術、指揮靈敏、保障能力是部隊戰鬥力的四大要素。我們還必須建設能幹的統帥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都是戰略指揮部。管戰略是重要任務，各總部的工作差之毫釐就會失之千里，甚至導致戰爭的失敗。情報不準確、通信失靈、物資無保障等導致戰爭失敗的例子，在軍事史上是很多的。

第三、關於國防工程。林總說：要立即著手搞國防工程，部隊自己要擔負起這項繁重的任務。要在全國實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現在國家很窮也要搞，等富起來再搞也就晚了。工程搞起來後沒有用怎麼辦？我們寧願它無用。搞工程按防禦任務來說，是先海邊防再內地。按地區來說，先北後南。東北、華北、西北是重點，南方先搞點「卡口子」工程，卡口子指要塞、隘口等險要堅守的地方。各種工程要像「一盤肉磨子」能夠在長時間把敵人磨成肉漿。我們搞國防工程的原則是：既要搞國防建設，又要少花錢，不過多增加國家財政支出。

第四、關於全國基地化。林總說：未來戰爭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問題，一個是防止敵人的原子彈，一個是依托後方的供應。大規模戰爭，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根據作戰計劃在全國建立戰略、戰役供應基地，後勤保障實行基地化，像「開旅館」一樣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夠經得起敵人空襲。

第五，關於國防工業。林總說：我們的國防工業在中央的關心、特別是周總理的過問下，有了一定的基礎。現代戰爭沒有國防工業是不可想像的。我們的武器包括常規和尖端兩個部分，常規兵器生產體系應建立完善起來，我們也要抓緊尖端武器的研製。在今後二至三年內，常規武

器要建立肝膽俱全的系統，對尖端武器來說，我們的決心是原子彈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原子彈這東西打起仗來有多大作用，我們都還不知道，但別人有的東西我們也要有。毛主席、周總理是贊成搞國防工業的，可能有人說搞國防工業是花「冤枉錢」，我看那也不是壞事，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花「冤枉錢」，這種錢花多了可能就不是戰爭了，而是「買」來了和平。

第六，關於邊防問題。林總提出了三條原則：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槍，三是建立邊防「真空」。林總說：全軍都要懂得，對國外打第一槍的權力祇屬於最高統帥毛主席，祇有毛主席才有決定打第一槍的權力，這應該是一條嚴格的政治、軍事紀律。林總還說：為了不在邊境上鬧事，我們的邊防部隊可以在戰事起來，後撤二十到三十公里，和對方脫離接觸。

對於林總的講話，會議進行熱烈的討論。從元帥到軍長登臺發言者有若干人。元帥們一致稱讚林的講話把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講活了，是我軍戰備和建設的根據。陳毅元帥專程趕到大會來講話，以表示對林彪講話的擁護。劉亞樓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他說：林總的報告把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軍隊建設、準備打仗寫成了「描紅」，我們照著填就是了。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在廣州接見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
五排左五為邱會作。

林總的這篇報告解決了軍隊建設的主要問題。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起，我們國家的思想戰線逐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臺，毛主席對於反對修正主義，準備打仗幾乎同時提出來了。林總一九六〇年在軍委擴大會上提出了「北頂南放」的作戰方針之後，「加強戰備，準備打仗」就成了軍隊建設的總方針。全軍進行了持久的、空前的、大規模的戰備工作。

北京軍委擴大會議

軍隊就是打仗的，在廣州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我軍的戰略方針確定下來，林總就放心了。廣州的軍委擴大會議，八個元帥坐下來開會，一開就是一個月，這是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而且毛、周、鄧也來到廣州助陣，使會議開得非常成功。

接下來，林總著重要解決我軍的建軍方向問題。一九六〇年九月，在北京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一）反對修正主義；（二）政治思想工作；（三）軍隊的編制和裝備計劃，重點討論了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問題。

在會議之前，軍委舉行過專門會議，討論了部隊政治工作問題。在會上，林總發表過比較長的講話，對總政治部的工作和對譚政本人都提出過批評。他說，軍委領導上解決了革命化的問題，現在要解決部隊的革命化問題。

在會上，林總提出了乍聽起來陌生爾後又倍感親切的詞語——「四個第一」。

林總「四個第一」是指：人和武器的關係，人的因素第一；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係，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係，思想工作第一；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係，活的思想第一。林總說，政治工作領域中，有四個問題是相互有關係的，這就是：

一是武器和人的關係。打仗時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武器是要人去使用的，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所以戰爭的勝利還是靠人。當原子彈、炮彈打過去以後，到接近敵人幾十米時，還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高度覺悟和犧牲精神。進攻時你能上去佔領陣地，才能取得勝利；防禦時你能頂得住攻擊，才能

打垮敵人。這是決定勝利的關鍵問題。武器和人這兩方面我們都要搞，但更要重視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覺悟、人的勇敢，這比物質的原子弹強得多，有用得多，而且這祇有我們辦得到，我們的敵人是辦不到的，因而這是我們專有的，是帝國主義無法同我們比賽的。

二是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係。軍隊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後勤工作，軍事訓練、文化教育，等等，但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起來了，各種工作就都能做好。從這一環著手，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做好了，思想可以管人，政治可以管人，人也可以管人，部隊就可以搞得。毛主席建軍，首先是搞政治工作，把軍隊建立在政治基礎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覺悟，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就會最充分地發揮出來。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係。政治工作也有各種各樣的工作，有些是事務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種工作都要做，不能祇做哪一個，但是重點要擺在思想工作上。共產黨要把黨的政策貫徹到群眾中去，就是要根據群眾的需要，根據活的問題去進行教育，不能抽象化。

四是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係。書本也要，但重要的是活的思想，書本也要與實際相結合。部隊有什麼問題，中央有什麼政策，國際形勢如何，這是書本上沒有的。要以實際為中心，用無產階級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來回答這些問題。思想工作要反映實際，要按實際情況去進行工作，這是唯物主義。……書本是要的，但進行書本教育時要聯繫實際。政治工作就要使上情能夠下達，下情能夠上達，不要梗塞。政治部的主要部門是宣傳部，這是做思想工作的部。

林總提出的「四個第一」，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讚賞。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的一個批示中說：「解放軍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

林總在會議上講了話，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部隊的問題；（二）政治建軍的地位；（三）發揚我軍光榮傳統。

林總在會上提出「復古」。什麼叫「復古」？就是恢復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在古田會議決議裏，毛主席提出要大力糾正軍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林總在會上說：「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主席說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生命線，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證。」

林總說：發揮我軍的光榮傳統，是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核心問題。我們軍隊的光榮傳統就是：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這是人民軍隊本質的問題，如果離開了這三個「忠於」，軍隊就變質了，變為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軍隊了。

林總繼續說：我是歷來主張政治是第一位的，現在是事在人為的問題，扎扎实實做工作的問題。為了發揮軍隊的光榮傳統，對一些基本問題必須說清楚，否則就會滑到邪路上去。

林總對譚政搞總政的工作是不滿意的，他曾不點名的批評譚政：有的人如同廟裏的老道一樣，祇會看廟，唸經，對政治工作一點創造性也沒有，這種人的腦子與眾不同，對別人提出來的東西，總是橫加指責。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學習，接受新鮮事物。那種抱著一貫正確的人，應當懂得：自己認為自己了不起，別人就會認為你沒有什麼了不起。自以為了不起的人，如不覺悟過來，就會變為沒有人看得起的人。

林總講話以後軍委擴大會議開始了，會議在西直門內專家招待所舉行。由於譚政對會議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跟不上林總的思想，因此會議開始兩三天沒有人管事，一點起色也沒有。一天晚上，陳錫聯、賴傳珠、劉興元和我到林總家去看望。林總一見面就問：「會開得怎樣？」賴傳珠衝口而出說：「我們是來上香的，連接香火的人也沒有，會議根本沒有人管。」林總沒有說話，立即要秘書打電話告訴羅瑞卿，要他第二天召集軍委辦公會議，各小組召集人也來參加，專門討論開會的問題。

第二天上午，軍委辦公會議在三座門舉行。羅瑞卿首先說：「會議怎樣開法，請大家先發表高見，加強政治工作誰都不反對，但怎樣加強法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羅瑞卿正在高談闊論的時候，林彪破例突然來到了會場。對此，羅雖有點難於理解，但他祇有立即轉變態度，畢恭畢敬向林彪說：「林總，今天的會議是專門討論開會的問題，請林總先做指示吧。」林彪說：「我是來聽聽大家對開會的意見，大家先講。」羅瑞卿說：「這幾天我搞國防工業

的年度計劃了，對會議沒有來得及管，向大家做自我批評。從今天起，就同大家專門開會了。」

譚政說：「全軍政治工作，以大單位來說，少數比較好，多數不夠好，總的來說，都落後於形勢的需要。對這種情況，總政治部，特別是我本人是負有領導責任的。這是一次專門討論政治工作的會議，我決心同大家一起，開好這次會議。」

在譚政講完話之後，賴傳珠突然冒出來幾句話。他說：「林總向來關心政治工作。不僅現在，過去也是這樣的，我們在座的很多都是見證人。近年來，林總對政治工作又有很多新的指示，我們祇是從『小道』聽到一些消息。對林總的指示，不僅不貫徹，根本沒有人傳達，這不知道是什麼問題？這次會議要是上面沒有人管，我們就會本著『五不怕』的精神來開會。我相信，會議是可以開好的！」

賴傳珠的話起到了極好的作用，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林總看到大家的情緒已經轉過來了，於是，他也很高興地講話了。

林總說：「昨天，我將這次會議的目的和當前政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向毛主席匯報了，我現在就是來傳達毛主席對這次會議的指示。」

林總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大意如下：毛主席說，軍隊政治工作落後了，主要是沒有人管，以前我是沒有管。有的人自己搞不到飯吃（沒有能力之意），又不服別人管，怎麼能做好工作？

毛主席說，軍隊沒有政治工作不行，會迷失方向，但政治工作不同實際相結合，就會成爲沒有用的東西了。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與實際相結合是完全正確的。……政治工作要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提法是完全正確的，不僅政治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是一樣的。我們自己創造的好東西，爲什麼不去發揚呢？看不起自己的東西，必然喜歡別人的東西。結果是搞得「四不像」，官兵團結、軍民團結、軍政團結等都成了問題。當然，過去的東西要很好總結、提高，否則就不能前進。我們確有很多好東西，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擁政愛民、官兵一致、三八作風、三大民主等都是不能丟的。彭德懷提出不走樣的學習蘇軍是辦不到的。

林總說：「毛主席對軍隊是很有感情的。要我們一定要把軍隊搞好，否則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句空話了。」大家對林總的講話，報以最熱烈的掌聲！

林總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後，第二天的小組會就大為不同了。各小組意見都很激烈，放開了「機關鎗」，會議氣氛一下子就轉過來了。在幾天的小組會上，出席會議的人搞清了一個過去多數人不知道的問題就是譚政不執行林總的指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成了一個頭等重大的問題。大家對譚政不執行林總的指示，既憤恨又感到「謎底」還沒有揭開，劉亞樓氣憤地說：「不執行林總指示的謎底一定要揭開，要順藤摸瓜！」頓時，會議的氣氛變緊張了。此時，林總又說話了：「大家有話要說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林總的話對劉亞樓等人的意見有意抑制了一下。

第四天，軍委辦公會議舉行擴大會議，林總在會議上說：「這幾天的會議開得很好，大家對政治工作軟弱無力的批判是正確的。對這個問題的批評已經很夠了，就不要再批評了。要著重『搞建設』了，這次會議，應當搞出一個比較好的文件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大家完全懂得林總的講話精神。

爲了起草一個比較好的文件，軍委辦公會議指定梁必業、吳法憲、賴傳珠、劉興元、李耀文（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張秀川（總政組織部部長）等五人爲起草小組，還有姜思毅、唐平鑄這些筆桿子。這些人都是部隊優秀的政治工作者，賴傳珠是主持人，梁必業、吳法憲分成兩攤，比著干。會議最後產生了一個《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這個決議，經過軍委辦公會議多次修改並一致通過，又經軍委常委討論並一致通過後，提交大會討論，在熱烈的掌聲中《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一致通過，並上報中央。這個文件是很成功的，得到了毛主席的讚賞和中央的肯定，中央十二月中旬批准了這個《決議》。這是八大以後，全軍第一次明確提出全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其實也是要全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決議》發表之後，對部隊影響很大，對全國影響也很大，因爲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決議》的精神，對地方黨政工作也是適用的。《解放軍報》則做了大力宣傳，稱《決議》爲第二次古田會議決議。

軍委擴大會議之後，部隊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全軍的革命化建設起到了決定的作用，全軍掀起了創造「四好連隊」，爭當「五好戰士」，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出現

了雷鋒和一批雷鋒式的優秀指戰員，特別是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影響就更大了。

全軍編制裝備會議

一九六二年二月開始，軍委又先後在廣州和北京召開了全軍編制裝備會議。林彪、賀龍、聶榮臻、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等元帥出席了會議，羅瑞卿、楊成武、張愛萍、梁必業、邱會作等人組成了會議領導小組。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司令員、參謀長參加了會議。爲使我軍的編制裝備更加切合實戰需要，還請了實戰經驗較多的連、營、團、師、軍五級幹部各十人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在以前「不走樣的學習蘇軍」向適合中國國情軍隊編制進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當時，我軍在編制方面的確存在很大問題，我軍歷來機關精幹，幹部要加強到基層和部隊，但在「不走樣的學習蘇軍」時期，機關變得業務部門增多，辦事手續繁雜，辦事部門也互相推諉，在編制上是「橫寬縱短」。就總部機關來說，我軍歷來是「司、政、後」或「司、政、供、衛」，學習蘇軍後，總部增至總參謀部、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政治部、總幹部部、總後方勤務部、總軍械部、總財務部八大部，每個部門下面平行的業務局、處很多，這就叫「橫寬」。可是下面的部隊機關，又簡單得祇有光桿司令，如野戰軍祇有一名管後勤的副軍長，後勤祇有幾個人，幾乎無機關；再比如野戰軍設炮兵主任一職，但又指揮不了部隊，這就叫「縱短」。在機關裏互相扯皮，互相推諉的事天天有，一個部門起草的文件，都要會簽一串部門，公文「旅行」一圈才能發出執行。這樣的機關，平時是事務主義，戰時更要吃大虧。

從後勤編制來說，遭到部隊最大反對的是以營爲單位吃飯，這是從蘇軍那裏學來的。蘇聯人的飲食習慣，是冷飯冷菜，最多煮一大鍋熱湯，不要說以營爲單位吃飯，再多一些人也可以。我們中國人吃飯，好吃壞且不說，主食要有米飯、饅頭、麵條之類，副食要有炒菜、燉菜、湯菜，因此一個伙食單位不能就餐人過多，否則爐灶、餐具、食堂都有問題。基層單位堅決反對以營爲單位吃飯，有些部隊就「偷偷」恢復以連爲單位吃飯，上級單位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裏還要提及的是，當時我軍請來了很多蘇聯軍事顧問，從總部到野戰軍都有，從後勤系統來說，除了沒有管廁所的蘇聯顧問，各個部門都有，他們有職有權，說話算數，派來的專家，大部分不錯，但也有不少濫竽充數。我們的一個留蘇技術人員，在蘇聯留學時和一個派來的專家是同學，我們的技術人員是優秀生，這個專家是吊兒郎當的學生，可派到中國來就是專家，一天瞎指揮。全軍上下對專家治軍意見很大。

全軍編制會議，就是要大刀闊斧改過來，恢復我軍原來的傳統編制，當然不合理的，也會改進。會議開會的時候，林彪以漫談的方式提出了這次會議的方針任務，林彪說：會議還是要先務虛，然後逐項落實。林總首先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總結經驗。各國軍隊都有自己的傳統、作戰經驗和生活習慣，因此，其編制也是不同的。蘇軍和美國的編制就不一樣。蘇軍是團、師、軍、集團軍和方面軍；美國是團、師和不固定的軍（等於集團軍）、戰區司令部（等於方面軍），這就很不相同，至於軍隊的生活就更不同了。蘇軍以營為單位組織伙食單位，我們在一個時期也是以營為單位吃飯，但不少幹部、戰士意見很大，他們說：這麼多人吃飯，飯都吃不飽。我們學習蘇軍先進經驗學的是精神，怎樣吃飯就不必學了，怎樣組織伙食單位，應當按自己的習慣來搞嘛。

第二，機械化還是騾馬化？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機械化，騾馬化被取消了，軍隊的馬場和獸醫大學都交地方了。現在大家羨慕的都是坐汽車，不是羨慕騎馬了，這個問題值得研究。我國百分之七十是山地，祇有東北、華北東部、西北中部、新疆北部、河南中部和皖北是平地，這些平地也祇是在一定的季節可以發揮機械化作用。我國的公路還有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發達的水平，即使很發達了，對機械化部隊的運動也有一定的限制。根據我國地形的實際情況，我軍的編制裝備應該考慮機械化和騾馬化並重。黃河以北的部隊（包括中原）以機械化為主，其餘則以騾馬化為主。這種裝備編制當然會帶來某些麻煩，但這種麻煩比部隊不能作戰的麻煩要容易克服。

第三，軍隊合成問題。軍隊歷來是合成的，現在我們討論的是要有高級水平的合成軍隊，這種高水平的合成有三個基本環節：戰術是火力合成，戰役是兵種合成，戰爭是前後方合成。單一步兵不是現代化戰爭，我們對後勤在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問題，從思想上、建設上、編制上都還沒有解決，抗美援朝時期出現的一個星期攻勢，就是沒有解決前後合成問題，因此，這次裝備編制會議要充分考慮到後勤建設問題。我軍的定額在平時要控制在三百萬人以內，我們的編制裝備要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

出席會議的各位元帥都認為林總講得很好，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次都可以得到解決，這對戰爭準備是一個重要突破。

我軍編制裝備的確是存在很多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確定我軍編制裝備的原則，再做過細的工作來逐項落實。為了走群眾路線，會議開始之時，由林總，羅總長親自主持，專門討論研究。參加會議的除各級首長之外，還有吸收少數連、營幹部臨時參加。會議開得輕鬆愉快，發言十分熱烈，其中也有爭論的問題，基層幹部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在討論的過程中，林、羅都特別注意聽取大家的意見，凡是好的意見他們都表示贊同，不大合適的意見也不立即頂回去，反而叫大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實質上是元帥同普通幹部在一起的共商軍中大事，這樣生動的工作場面，是很感動人的。

經過充分討論之後，對我軍的編制裝備歸納為如下四條原則：1、我軍的現行編制，不管是來自那裏的不合理的都要徹底破除；2、要尊重我軍的歷史，在全國解放前我軍雖然沒有正規的編制，但我們總是有編制的。在我軍原有的編制中，甚至吸收國民革命軍好的東西，我們都要保留下來；3、要適合我們國家的國情和民情，比如吃飯就要考慮到這個問題；4、要特別注意到實戰的需要，編制裝備是為戰鬥服務的。

研究確定我軍編制

研究確定我軍的具體編制裝備問題，林總是從連隊的定編開始的，由下而上逐級進行。他不但「摳」得很細，而且從四十二軍調來一個齊裝滿員的連隊，作為研究連隊編制的對象，用實兵作業的辦法現場研究定編，這是我軍研究編制別開生面的、空前未有的創造性的辦法，這種方

法是林彪式的。現場會議在廣州軍區的廣場舉行，林總、羅瑞卿和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都同連隊指戰員一起，席地而坐，展開了細緻認真的研究。林副主席對連隊問題是很熟悉的，他問了很多問題都能問到點子上。

連隊編制是從班、排、連部的順序討論定編的。林總領著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同一個官兵連隊，座談了三次連隊的編制，葉群叫警衛員去提議他休息一下，他對警衛員視而不見，一直認真傾聽大家的意見。大家對這個問題提的意見最多，經反覆座談，在最後一次座談會上對連隊的編制就定下來了。連隊新的編制是：恢復以連為單位組織伙食的傳統，按每十二個人編一個炊事員，除司務長、士士外，每個連隊編一個理發員、一個司號員。大家對這個新編制十分滿意，在元帥們離場的時候，響起了經久不息的鼓掌聲。林總這麼鞠躬盡瘁，令大家十分感動，散會的時候，羅總長親自去扶他起來。據我所知，元帥們和各級幹部、戰士一起討論、決定編制問題，在我軍的歷史上是沒有的。

這次對連隊的編制裝備是解決比較好的。這樣平凡的問題，都是林總親自解決的，並對連隊的工作做了許多精彩的指示，現在想起來都是很有意義的，我還記得起來的大意是：

關於連長的職責問題。我軍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連隊是在黨支部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這種制度並不妨礙連長是一連之長。連長是連隊的核心人物，一個連隊作風好，訓練有素，戰鬥力強，主要是靠一個好的連長。連長應當是連隊榜樣，有好樣的連長，就出好樣的連隊。選擇好連長，是連隊建設的關鍵問題。

一個連隊還要選擇一個好司務長。司務長的工作很重要，他的工作做好了，就等於把連隊行政事務大部分工作都做好了。司務長是連長的重要助手。國民革命軍葉挺教導團，對司務長的選擇是很嚴格的。司務長從排長調選，當了司務長，才能當連長，這是教導團的制度。我們對司務長的選擇也要有比較嚴格的要求，絕對不要把吊兒浪當，或工作能力很弱的人選去當司務長。培養出一個好司務長，實在是不容易的。

要注意炊事班的建設。戰爭年代炊事班實際上是「戰士之家」，戰士們戰鬥之後，或平時操課訓練之餘到那裏去呢？主要是到炊事班去。搞好炊事班就要調選好戰士當炊事員，要選擇一個好炊事班長。

在解決了連隊編制之後，接著就解決了營的編制。營的編制比較簡單，是召集幾名營長、教導員和團的幹部共同商定的。有一個指導員是解放戰爭的老子弟兵，在散會的路上說：「過去跟著林總打仗，總是打大勝仗，今天我算知道是為什麼了，用醫生號脈的方法，這麼認真地解決部隊問題，能不打勝仗嗎！」

接下來就是研究軍、師、團三級機關編制。為了使野戰軍軍、師、團三級機關編制合理，林總決定，軍長、政委，師長、政委，團長、政委和三級參謀長、政治部（處）主任、後勤部（處）長、團機關股長以上的機關幹部參加會議，由會議來討論編制裝備的有關事項和分組作業制定編制裝備草案。

在會議開始時，林總首先講話，他說（大意）：凡辦事都要有重點。我們討論研究野戰軍三級機關的編制，師是重點，軍和團的機關都要力求精幹，師則要充實一點。

林總說：提出師的機關是重點有什麼根據沒有？可以說是有。這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從作戰來說，軍是戰役兵團，師是戰術兵團，團是戰鬥兵團。這就是說，作戰的規模可以分為：戰役、戰術、戰鬥。這種分法，在國外的戰爭條令上都有規定，我軍將來的戰鬥條令，也會有這種規定的。另方面，一個師單獨執行任務的機會是很多的，一個師所具有的戰鬥能力可以完成很多任務。反之，一個軍單獨執行任務和一個團單獨執行任務的機會都不是很多。今後我軍作戰，在多數情況下都會是大兵團的行動，越是大兵團作戰，一個師單獨執行任務的機會就越多。因此，師的編制應是重點，師後勤機關更應是重點，其實，平時的工作也應當是師為重點。

到會的幹部學習研究了林總的講話和總部提出的其他有關問題之後，就分為軍機關、師機關、團機關三個組分別討論，在作業的過程中，總部業務部門同部隊之間，部隊軍、師、團三級上下之間都做到了互相交流，共同制定編制裝備草案。正是因為採用了上下結合的工作方法，所擬制的草案是比較地符合實際的，野戰部隊三級機關編制裝備草案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拿出來了，這樣，編制裝備會議也由廣州搬回北京繼續開了。

我軍後勤的編制

在全軍編制裝備會議上，後勤的編制裝備也一併得到解決。為了更好的解決好後勤裝備問題，我召集後勤組的全體到會人員開了一個座談會，在會上我提出三條意見：1、按照實戰需要出發，平時的編制裝備要能適應戰時的要求；2、平戰結合，過去那種平時祇有「廟」，戰時才有「神」的編制裝備不能再重演；3、機關在後勤方面思想統一起來。最後

我說，林總還要同大家開會，後勤的編制最終由林總拍板。

第一、連隊編制。

連隊是基層戰鬥單位，後勤保障的主要任務是吃飯、救護和彈藥器材補充。爲了完全上述任務，連隊定編爲：司務長、衛生員、炊事員十三人。在炊事員中，有一個爲連長、指導員搬運行李的運輸員兼理發員。

對連隊編制爭論最多的是多少人編一個炊事員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存在著三種意見。一種意見仍然提出以營爲單位辦伙食，至少是平時應當這樣辦伙食，持這種意見的人，是堅持向蘇軍學習的重要人物；第二種意見是連隊炊事員人數要少，一個連隊多編一個炊事員，在一個團之內就幾乎佔去了一個排的人數，持這種意見的人，是主管全軍編制的主要人物；第三種意見是炊事員要夠用，並且還要略爲寬一點，因爲炊事班的用途很多，持這種意見的人比較多，林總支持這種意見。

在座談連隊編制時，林總就提出了「每個連隊都要注意炊事班的建設」。我已經體會到林總是很注意炊事員的數量問題了，對這個問題，我始終不說話，因爲我要是提出了具體意見，容易影響林總對問題的考慮和決策。當時，主管編制的張愛萍副總長，並不理解林總的講話精神，不止一次提出了與林相反的意見，林總對這種意見都未曾過早表示自己的態度。到拍板連隊編制時，還有人提出連隊應當三十人編一個炊事員，林總當即回答說：「連隊編制就算是最後定下來了，按一個班配一個炊事員是合適的，你們不要再提意見了。」多少人編一個炊事員是很具體的事情，林總這麼上心，要是提高一點說，這反映出建軍思想和群眾觀念的問題。

林總關心基層還有一個小故事。一九六一年一月，林總在廣東惠陽的四十二軍視察時，專門談到了要減輕司務長的工作，他當場用鉛筆還

爲司務長制定了工作報表，哪些是以領代報，搞得清清楚楚，以後全軍連隊司務長就統一了報表。

第二，營部編制。

在後勤系統，營不是一級保障機構。營部單位很小，祇有十個人，我記得祇定編一個管理員，一個炊事員。對營的編制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很快就定下來了。

第三，團後勤處編制。

團是一級後勤，是保障機構，對全團負責保障任務，爲完成任務，在編制上應當「肝膽俱全」。團後勤機關，除增設了一名戰勤參謀之外，沒有新的增減。團後勤處最大的變動是勤務分隊：

(1) 增編供應庫。這個庫包括軍需品、彈藥等的保管和分發，並還編有勤務班，擔任裝卸作業和警衛任務。

(2) 增編修理所。其主要任務是修理槍械、營具、炊具等，這是團的「加工廠」，對後勤業務是很重要的。

(3) 衛生隊保持原樣，但逐年分期分批配了救護車。

第四，師後勤部編制。

在野戰軍裏師後勤部是重要的機構，它常常接受軍區或基地分部的直接供應，同時，組織全師的運輸、物資供應、傷病員收容轉送、及裝備維修等全部的後勤保障任務，因此，師後勤部必須有合理的組織機構才能完成任務。

師後勤部機關，除增編戰勤科之外，人員增減不多，師後勤部編有：戰勤、財務、軍需、軍械、衛生、營房等各科。

師後勤的勤務分隊：

(1) 師衛生營改爲師屬醫院。這個醫院編有：門診、內科、外科三個科和防疫所，平時可以完成治療任務，戰時可以完成收容後送傷病員的任務。同時，這種編制可以容納技術比較高的醫務人員，軍隊幾個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分到部隊，不但可以充實基層，也能學有所用。

(2) 增編汽車運輸連、畜力運輸連、修理連各一個。修理連的主要任務是擔任槍械、汽車的修理，除了能修槍械之外，車輛要能達到中修的水平。在師建立裝備比較好、技術水平比較高的修理機構，無論平時、戰時都有重要作用。

(3) 增編軍需、軍械、油料三個供應庫。三個庫的編制大小不一，但都是幹部、專業人員和勤務部隊一併俱全。師屬倉庫平時擔任供應任務，戰時即可改稱為兵站，擔任兵站的任務。

第五，軍後勤部編制。

軍後勤部除了擔任軍直屬隊直接的後勤保障之外，對全軍後勤保障以檢查督促為主，在一般情況下，不擔任全軍的運輸、物資供應、傷病員收治轉送、裝備維修等任務。軍後勤部除增設了戰勤處之外，其餘各業務處沒有變動。軍後勤部的機關、分隊都比師後勤部小得多。

整個野戰部隊後勤編制的最大特點是保障戰鬥能力的程度提高了，以自身的戰鬥能力來實現保障任務，新編的野戰部隊後勤編制是能比較充分表現出這一特點的。

部隊後勤裝備

後勤裝備是比較複雜的，有些可以叫裝備，也可以叫家什。我軍有史以來，對後勤裝備沒有比較全面系統的解決過，這個問題在全軍編制裝備會議上是解決得比較好的。

在會議過程中舉辦了三個展覽。一個是按一個連隊編制的全部裝備實兵展覽，二是我軍現有兵器的展覽，三是後勤裝備展覽。從元帥到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都反覆進行參觀，大家邊看邊議，邊議邊定，會議開得生動活潑。

林總對後勤裝備是十分關心的。在編制裝備會議期間，我們在後勤學院辦了一個後勤裝備展覽，從戰士吃飯的碗筷，到廚房的炊具都是林總親自定的，大家以敬佩的心情，把林總譽為「元帥、後勤部長、司務長一身三任的元帥」。

這裏把林總親赴後勤展覽拍板定案的後勤裝備簡介如下。

第一，戰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襪、被子等用品。

(1) 飯碗，過去沒有統一規定，有用缸子的，也有用碗的，現在統一規定用搪磁缸子。搪磁缸子有兩種主要用途：吃飯喝水和漱口等。(2) 鞋襪，鞋子要有矮腰和高腰兩種。行軍和打仗都要穿高腰鞋子，以防砂子進到鞋裏去。鞋帶子特別重要，要盡量做到耐用，每個人都要有一副預備的鞋帶子，在戰鬥的時候，如果鞋帶子斷了，會妨礙完成戰鬥任務。

襪子要做到耐用和行軍時不會「開小差」。(3)衣服，棉衣一律採用緊身棉衣加單衣的方法。棉衣可稍微薄一點，配加絨衣。單衣用現在的樣式就可以了，布料要盡量改進，提高質量，做到能穿著比較長的時間。南方部隊也可以發少量放哨用的大衣。(4)雨衣，一律改方塊式雨布為雨衣。(5)被子，可以分北方，南方兩種，但被子不宜太厚，有大衣再加上棉衣，晚上睡覺是不會冷的。(6)背包，這是我軍不大習慣用的，可以做出兩三種樣品，在部隊試用後再定案。

第二，炊事用品。炊事用品要配套齊全，要做到用自己配帶的炊具就能獨立作業，做好飯。行軍鍋每個連隊兩口，為減輕重量，改鐵鍋為合金材料製作。水桶每個連隊配四隻，桶的重量也要盡量減輕。大小菜盆子，每個連隊二十個，這種盆子改用合金材料，以防生鏽和打破。總之，對炊事用品，要做到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飯，連隊吃飯是一件大事，也是一門大學問。

第三，連隊公用品。每個連隊配馬燈三盞，主要用於連部、炊事班和通信之用，馬燈要經得起風吹雨打。每個連隊配兩支手電筒。每個連隊配一副擔架床，由炊事班管理。每個連隊的炊事班配一副修理工具。

第四，工程車。團以上後勤機關配備工程車，在我軍裝備日益現代化的情況下，工程車是必要的裝備，使之能解決修理中的問題。

林副主席在看完後勤裝備展覽之後說（大意）：這個展覽辦的很好，把東西擺出來，大家容易看得懂。後勤裝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也是很重大的問題。我軍的戰鬥力，除了軍事，政治素質之外，就是物質力量了。最主要的物質力量是武器，但保障兩種「口糧」，人吃飯，槍吃子彈，是決定性的問題。

林總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是經常下部隊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層，調查研究，組織連長、指導員開座談會，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導全軍工作。現在不少部隊的老同志都公認，從林總一九五九年上臺領導軍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是我軍的鼎盛時期。祇要我們看一看林總的工作作風，他曠日費力地撲在部隊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

林彪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講話

題，政治工作問題。林總說：「前年開了會，提出了四個關係：人和武器的關係；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種工作的關係；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武器的關係；思想工作中活思想與書本思想的關係。在這四個關係中，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二，活的思想第三。這四個已經明確規定了的，現在是不是都這樣辦的？到底把政治工作擺在什麼地位？各軍區、各軍、兵種不一樣，認識不完全一樣。到底不一樣，用多少力量去做不一樣，什麼人去做不一樣。因此，工作的辦法就不同了，有的把四個第一，不是當作第一，而是變為四個第二，沒有把政治工作突出來，沒有把政治工作擺在首要地位，沒有認真抓活思想，工作做得不少，就是沒有抓政治思想工作。軍事訓練、保管武器，都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覺悟，才能做好。我們說，軍事訓練時間可以多一點，政治工作時間少一些。但另一方面政治工作是基礎，要抓得更緊些，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基礎上，軍事訓練、武器保管、部隊紀律等才能搞好。有的人很重視軍事訓練，卻忽視政治工作，用什麼力量、用什麼人去搞，安排得不適當，沒有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凡是這樣搞的，任何工作也做不好，一定要出亂子，一定要出政治事故。軍事訓練佔的時間多，政治工作是首要地位，這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談。一定要把政治工作，黨的領導擺在首要地位。這個思想在很多地方沒有貫徹，沒有接受我們幾十年來的理論經驗，沒有很好地體會。不是很多人，有那麼一些人，沒有把政治工作擺在適當地位，他們總是不曉得做

好人的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人的一切行动，都是要通过思想的。不正确地认识客观情况，不做好思想工作，思想搞不好，一切都搞不好。」

第二，工作作風問題。林總說：「工作作風有兩種：一種是鬆鬆垮垮，一種是忙瘋亂忙。」

好事、壞事不抓住，過久了就沒用了。問題不抓住解決，就容易出大。好事、壞事不抓住，過久了就沒用了。問題不抓住解決，就容易出事。如平反問題，本來是前年冬天決定的，有些部隊就是不執行，人家有冤氣，不滿意，不給人家平反，結果有的就投敵、自殺、殺人。我們軍隊留尾巴，不痛快。鬥爭的時候很粗糙，又不及時平反。這是沒有發生戰爭，如果發生了戰爭，有些人是會打黑槍的。梁必業同志給我一個材料，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情節較為嚴重的六十八起案件中，祇有兩起是敵我矛盾，很多是逼出來的，鬥爭的時候亂鬥，對落後的採取粗暴簡單的辦法，不耐心說服教育，管理教育工作條例規定了就是不執行。三十條是全軍的經驗，放著大路不走走小路，如同治病，已找到了好藥單子不吃，又去亂找藥單子。亂抓二、三十個藥單子，抓不住一個好單子。三十條是個好單子，是好藥。有些單位祇搞了半個禮拜，有的部隊下面要搞，上面還不准搞，拖著。發生了問題，該處理的不處理，或者處理不及時，處理又不具體，一般化，沒有想一想這個情況怎麼運用一般原則去解決。對上邊來的東西拖著不向下交代，對下邊來的東西拖著不處理。這種拖拉作風，列寧很反對，他用了很多嚴厲的字句，甚至用國家法令，反對這個東西。不是很緊張地做工作，而是鬆鬆垮垮，拖拉法令，是『懶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亂七八糟。有些單位是這樣，不是所有單位都這樣，大部分單位是好的。我們要提倡緊張，就是要快，上面來的東西要趕快向下交代，下面來的東西要趕快處理，不要讓上面、下面來的事情成堆地堆在那裏。」

一九六一年夏天，林彪在長春休息，他找十六軍的幾個連長，指導員開調查會，研究連隊的工作。連隊在談到了天天讀的情況時說：「我們搞天天讀，開始是讀報，但報紙上的內容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就到毛主席著作裏面去找，作些摘錄進行學習，毛主席著作比課本好多了。」林彪認為，十六軍的連隊以毛主席著作作為政治課本，這種做法是非常正確的，應當肯定下來。後來《解放軍報》宣傳了十六軍的作法，天天讀《毛主席語錄》，以毛主席著作作為政治課本就在全軍逐漸推廣開來。《解放軍報》的同志認真編寫了《毛主席語錄》，對部隊學習毛澤東思想，搞好部隊革命化起到了很大很好的作用，部隊基層幹部，甚至高級幹部，文化水平都不夠高，用學習語錄的方法掌握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好的方法。

「領袖的威望，是軍隊最大的戰鬥力」，這是林總十分重視的問題。

一九四〇年代初，林總在蘇聯治病，他目睹耳聞了蘇聯人民對斯大林的崇敬、忠誠和犧牲精神。林總對蘇聯人民和紅軍戰士，對斯大林忠誠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林總提出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就是一九六三年對部隊調查構思而成的。林總認為，「我軍廣大指戰員能夠真正成為毛主席的好戰士，就是最高的政治覺悟，最大的力量」。

林總上臺以後，對軍隊各方面的工作抓的是很緊的，他自己又身體力行，把軍隊尤其是高級幹部的革命幹勁都調動起來了。這就像部隊出早操一樣，林總一出早操，那些平時不出操的幹部都爬起來出操了。在林總的親自領導下，軍隊各方面決議、條例、規定都出臺了，工作有依據，有標準。我能記得起來的大致有：《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連隊管理教育工作條例》，《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步兵戰鬥條例》等等。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新，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在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很大的步子。

林總提出突出政治、四個第一、三八作風，這對我軍的建設的確是個創造。但是，在那麼一個革命的時代，左的東西很容易發生，現在看來左的程度不小，尤其是總政治部，把「經」越唱越左，越唱越歪，把突出政治幾乎變成空頭政治，遠離了林總的本意。現在把空頭政治的帽子扣到林總頭上，好像林總祇講政治，羅瑞卿是主張搞軍事訓練，大比武是為了更好的軍事訓練，這完全搞錯了，是不對的。林總是打仗出身，真正是身經百戰，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當了師長，二十四歲當了軍長，後來長期擔任一軍團軍團長，軍事訓練的重要性，他應該比誰都清楚。林總歷來是重視部隊的軍事訓練的，林總多次講過（大意）：我強調政治掛帥，這是不能動搖的，但是，不要以為講政治掛帥就不要軍事，那也是不對的。部隊建設要全面考慮，缺了一樣都不行的。現在我們應該這樣想，軍事和政治比較哪個重要？沒有話說，政治第一。可是講時間安排，那個應該多佔一點，那個應該少佔一點？政治應該少佔一點，學文化也應少佔一點，軍事應該佔多些。我看時間比例，軍事應該佔 60%、70% 以至 80%。但政治還是主要的，這是我們的基礎，什麼工作都要政治掛帥。

一九六〇年以後，全軍部隊單一的訓練任務變成訓練、施工、生產三項任務。在繁重任務面前，部隊堅持一定的軍事和政治訓練時間，叫做天天練、天天讀。天天練就是練軍事上的四大技術；天天讀開始就是讀報紙，後來就把《毛澤東選集》裏的警句摘了一些，成了天天讀的內容。爲了保證部隊的戰鬥力，部隊專門有全訓部隊。就是在文革當中，三支兩軍任務那麼繁重，軍委還要求部隊抓緊機會訓練，即在工作的間隙，練上三五槍瞄準，練上三五次投彈。在文革中，部隊的軍政素質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第十六章 準備打仗與後勤建設

後勤戰略方針與後方基地建設

一九四九年開國到一九五九年，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已有十年的歷史了。在這期間，在中央、中央軍委和總後各級黨委領導下，我軍後勤戰線廣大指戰員，在保障部隊完成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抗美援朝作戰的同時，開始了部隊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對部隊的供應，由各地區自己籌措、分散補給，改為由全軍集中統一補給供應；

二、制定和頒發了全軍性的供應標準和規章制度；

三、由對步兵單一兵種的後勤保障，轉變到對陸、海、空三軍的後勤保障體系；

四、開辦了一批後勤專業院校，加強了後勤幹部的培養訓練，組建了一批後勤保障部隊，一支龐大的後勤專業隊伍正在形成。

五、對抗美援朝戰爭中後勤工作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全軍上下對現代戰爭後勤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

這些都是繼續推進後勤工作繼續前進的基礎。楊立三、張令彬、黃克誠、洪學智等同志為我軍的後勤工作都做出了很大貢獻。我是一九五四年十月調到總後任副部長兼副政委，也加入到我軍後勤建設的行列。

但是，從全軍建設的整體說，全軍後勤工作仍然是落後的。尤其是從現代戰爭對後勤的要求來說，我們還相距甚遠。當時，中央軍委提出了「準備打仗」是全軍的中心任務，我們必須緊緊跟上。認真研究後勤的

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工作方針和任務，是後勤領導工作必須掌握的基本原則。

一九六〇年初，在廣州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前夕，我知道這是一次討論戰略方針、準備打仗的全軍最高級的會議，林總要作綱領性的論述。大會也指定要我發言，我認為應該利用這次會議，宣傳後勤建設的重要性，把後勤建設的方針、任務、內容認真地向全軍高級幹部講一番，取得全軍高級幹部對後勤建設的支持。我把我的想法向總後常委一些同志講了，我說：「不把後勤建設的方針、政策、任務講清楚，後勤工作就跳不出事務主義圈子，整天忙忙碌碌，一件大事也辦不成，總後勤部就起不到統帥部組成部分的作用。」大部分常委同意我的意見，但也有另一種意見，他們認為還是按照老辦法辦事吧，能做好「有米之炊」就很好了，後勤還有什麼戰略方針？不要打腫臉充胖子，這樣的爭論有時還相當激烈。經過反覆學習軍委指示，個別交談，第一種意見總算是佔了上風。在此基礎上，起草了我在軍委擴大會上的發言稿，題目是《後勤建設要提高到與戰略方針相適應的水平》。

我的發言大意是：我軍後勤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加強黨委領導，依靠全軍齊動手，發揚全軍後勤人員的革命幹勁，迅速地把後勤建設提高到與戰略方針相適應的水平。根據上述方針，今後後勤建設的重點應該是：規劃與實施後方基地和兵站運輸網的建設，加強後勤科學技術研究，加強後勤部隊的建設，積極培養和建設後勤幹部隊伍，以及進行必要的戰備物資儲備。

現代戰爭的特點對後勤產生的影響最主要是鞏固交通運輸線和準備大量的物資等問題。從朝鮮戰爭的經驗來看，敵人無論在戰爭開始，或在每個戰役開始的時候，都集中力量對我們的運輸線，特別是對交通樞紐進行瘋狂轟炸，使我們的交通運輸陷於癱瘓。在今後的戰爭中，敵人破壞我們後方交通運輸線的嚴重性會更大。因此，我們應該在各戰略方向上建立後方基地。基地建好之後，即使交通運輸遭到嚴重破壞，基地之間、戰略後方與戰役後方之間一時中斷聯繫，也仍然能獨立支持戰爭。

在戰略後方基地的地域內必須包括軍需工廠、倉庫、修理工廠、醫院、勤務部隊等後勤保障機構。在戰略基地之間、戰略與戰役基地之

間以及戰役與戰役基地之間，都要形成交通與通訊網，這樣，一旦有戰事，就可以對前方實施不間斷的補給。

建設現代化的後勤，需要一支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當前培養幹部的重點是指揮幹部、專業幹部和技術幹部，我們培養幹部必須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就是院校培養與部隊輪訓並舉。

在未來戰爭中，我軍作戰物資的消耗和損失必然比過去大大增加。這是由於戰爭的規模大、技術裝備增加、火力加強造成的。所以，加強戰備必須有計劃地進行物資儲備，當然，有些物資應該由國家統籌儲備，有些東西就應該由軍隊自己儲備了。要有計劃，有步驟地組建一批後勤部隊，主要是運輸部隊，建築工程部隊，道路勤務部隊，特種救護部隊和修理部隊。這些部隊必須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和現代化裝備，平時打下基礎，戰時擴編，立即能擔負起繁重的緊迫的供應、技術、救護任務。

爲了落實我軍後勤的建設方針，就要正確處理幾個關係，搞好幾個「結合」。

第一，依靠國家和軍隊自己動手相結合。國家經濟力量是國防力量的基礎，增強一分國家經濟力量就等於增強一分國防力量。但我們絕不能單純做伸手派，一定要鼓足幹勁，充分挖掘潛力，辦好軍隊能夠辦而且應當辦好的事情。

第二，軍隊需要和人民利益相結合。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都很關心部隊的建設，但是，我們做軍隊工作的同志，在考慮軍隊需要時，必須考慮到人民的利益，我們管後勤的人一定要自覺，不要打著軍隊的招牌去向地方要這要那。

第三，專業工作和群衆路線相結合。隨著軍隊現代化的進展，後勤工作形成了許多專業問題。我們的工作必須依靠兩條：一條是依靠黨；另一條是依靠群衆，發動全軍辦後勤。從後勤工作來說，依靠群衆是爲了群衆，祇有樹立全心全意爲人民軍隊的思想，不斷地改進服務態度，改進工作方法，後勤工作才有可能符合部隊的需要。

第四，堅守規章制度和解決具體問題相結合。後勤的規章制度可以解決後勤保障中大量問題，但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強調「特殊」是不對

的，忽視特殊，祇強調「一般」也是不對的，兩者都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

第五，平時和戰時相結合。平時工作一定要為戰時著想，切不可麻痺大意；但也不是說戰爭馬上就打起來，把什麼都搞得很齊全，擺大攤子，佔用國家的大量資金而無效果。怎樣才能「結合」得好，我們要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加以研究和調整。

我發言之後，會議執行主席劉伯承元帥講了幾句鼓舞我的話。劉帥說：「好！話講得好，從理論到實踐都提出了重要的問題。」賀老總在主席臺上直接就說：「講得好！總後提出的問題，應特別重視。」

在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林總找我去談了一次話，他說：「我贊成你的發言。後勤就是要從工作上來提高自己的地位。那種無所作爲、總是埋怨別人、看不起自己的人，是永遠不會被別人看得起的。今天，我祇向你提一個問題：後勤的戰略建設要納入全軍戰備建設的範圍之內，成為一臺戲。軍委決定楊成武管全軍的作戰和戰備建設，你應當同他密切合作。」根據林總的指示，在具體工作上，我把楊副總長看成這項工作的直接的領導，我以總後勤部長的身份對楊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楊副總長對後勤的戰備建設也是大力支持的；我們之間的互相理解和支持，對加強全軍的戰備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全國的戰略勘察

為了落實廣州軍委擴大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在楊成武副總長的組織、領導下，總參謀部召開了四次作戰會議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戰略勘察。我參加了所有這些會議和勘察，我還勘察了幾乎所有的後方基地，領導親自幹，這對於基地的正確佈局，正確的定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戰略勘察是從一九六〇年五月開始的。在楊成武率領下，各總部的有關負責人和有關軍區首長參加，首先勘察了山東半島，從石島開始，沿海到成山角、威海、煙臺、蓬萊，再到內長山列島。山東半島的勘察結束後，渡海到遼東半島的旅順口。從旅順口開始，依次是大連、外長山列島，最後到達丹東。從丹東開始，依次到臨江、長白自治縣、天池、延邊、琿春、張鼓峰，最後到延邊結束了中朝邊境地區的勘

察。從延邊開始，依次到佳木斯、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瀋陽，結束了對東北腹地的勘察。

從一九六一年三月開始，總參謀部又組織第二次戰略勘察。這次是對我國華南、東南地區進行勘察。先從湖南省衡陽開始，依次到桂林、柳州、南寧、百色、友誼關，再折回南寧，經玉林到達湛江，渡瓊州海峽到達海口，從海口沿中路（五指山）公路到達榆林港，然後沿海島西岸回到海口，結束了對海南島的勘察。從海口乘飛機到廣州，然後即對港澳地區和粵東地區進行勘察。在粵東地區採取南北穿梭式的勘察，到了汕頭就結束了對廣東境內的勘察。對東南地區縱深勘察的起點是從潮安開始的，然後上杭、長汀、瑞金、贛州、井岡山、吉安、南昌、杭州、上海、蘇州、無錫。這樣，對縱深地區的勘察就結束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總參組織的第三次戰略勘察，是對西北地區進行勘察。黃永勝也參加了這次勘察，中央和軍委是怎麼考慮他的，我不很清楚，雖然楊成武是領頭人，但他對黃永勝特別尊敬。在新疆勘察時，新疆建設兵團準備了幾輛吉普車，祇有一輛是新產的「北京 212」，其餘都是蘇制的「嘎斯 69」，「北京 212」是給楊成武準備的，但他執意要讓黃永勝坐，楊動情地說：「你是井岡山上的，我是井岡山下的，你應當坐新車。」由此我也對楊成武肅然起敬。

這次勘察是從南疆開始的。我們從北京乘飛機到甘肅的酒泉東北的機場降落後，參觀了導彈發射基地。然後乘飛機到南疆和田，再到的二十一基地，然後到達烏魯木齊。稍事休息幾天後，再到新疆以西等地勘察，對新疆地區的勘察就結束了。

從烏魯木齊回程時，到蘭州地區勘察，是由蘭州飛銀川，經內蒙包頭西邊的石拐子降落參觀了空軍洞庫機場，原定經呼和浩特，二連地區，再到山西的大同地區，河北的張家口地區，直到北京的八達嶺結束。但到石拐子機場後，軍委領導給楊成武打電話：「你們結束勘察，立即回北京。」接到電話後，我們立即就啓程回北京了。

參加了三次戰略勘察，我感到收穫不小。一是對全國許多在軍事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方，以及各地之間的關係，有了概略的瞭解，「腦子裏有了一張地圖」；二是對許多地方的地形地貌，在我的腦子裏都有比較深刻的印象；三是對那裏的交通運輸情況也有了初步的瞭解。我通過這

三次勘察，加上自己過去南征北戰到過的許多地方，對後方基地的佈局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數。

後方基地的勘察和建設

遵照軍委的指示，在全國建成後方基地網，實現後勤保障基地化，保障部隊在作戰時「開得動，打得準，供得上，救得下」，這是後勤工作的中心，也是後勤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總後黨委把戰備建設列入了後勤工作的重心，我自己則用主要精力來抓這件事。林彪曾以在全國各地「開旅館」來比喻建設後方基地網。

全國戰略勘察，還不能解決後方基地佈局定點的所有問題，爲此，我還親自率領有關人員對幾乎所有的後方基地都進行過實地勘察。例如，在東北方向，我勘察過黑龍江的西北部，遼寧省的西部和河北省的承德地區。在華北方向，我勘察過內蒙的集寧地區，河北的張家口地區、保定和石家莊地區，山西的北部地區。在華東方向，我勘察過山東膠東和魯南地區，江蘇的徐州地區，皖南和浙南地區。在中南方向，我勘察過河南的豫西地區，湖北的鄂西地區，湖南的湘西地區。在西北方，我勘察了陝西省關中地區的東部和西部，陝西省的南部。

由於我是帶著問題去勘察的，所以才在勘察中特別注意佈局、定點和交通三個方面的問題。這就是說，基地建在什麼地方符合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的要求，點定在那裏符合「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隱蔽能不能解決大量物資吞吐的要求。通過實地勘察，使我直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爲進一步研究、確定後方基地的佈局、定點做了極爲重要的準備。

對後方基地的勘察是艱苦的。我們搞的建設，上山、進溝是必須遵守的原則。因此，每次勘察都必須爬山涉水，甚至風餐露宿。爲了瞭解邊防部隊的情況，我於一九六四年五月間到西藏去了一趟，由四川成都乘汽車沿川藏路進入西藏拉薩，然後由拉薩乘飛機經青海回北京，歷時約一個月。我是約我的老戰友余秋里一同去的，中途他有急事就先回去了。

總後根據軍委確定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以及對戰備勘察所得資料的認真研究分析，確定在全國建成五個戰略後方基地，三十個戰役後方

基地，組成全國後方基地網。這個規劃，經軍委批准後，按照林總的意圖，納入了全軍的戰備規劃。

根據軍委的戰略意圖，戰略後方基地建設由總後勤部負責組織實施；戰役後方基地建設由各軍區、軍兵種負責組織實施。後勤的戰備建設能夠和全軍的戰備建設同步進行，相應地發展，是和楊成武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的。

大規模地、有計劃地建設後方基地到一九六五年就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和中南五個戰略後方基地已初步達到了規劃提出的目標；三十多個戰役後方基地的也初步完成了。這樣，在全國各戰略、戰役方向上，就形成了互相銜接、互為依托、互相支援的後方基地網，戰役後方基地的工程是浩大的，僅各種倉庫的儲備量就達×百萬噸，其中地下庫就佔三分之一以上。一旦發生戰爭，就可以有效地支援部隊作戰。在過去革命戰爭年代，我們要打仗就要創造戰場，搞好戰場準備，在未來的衛國戰爭中，我們更要搞好戰場準備，而搞好後方基地建設則是戰場準備的重要內容。

這裏我特別不能忘記的是參加施工的廣大指戰員的那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們勞動強度之大，工作環境之差，生活條件之苦，不親臨現場是想像不到的。有許多同志由於長年累月的工作積勞成疾，有許多同志在危險工作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建設後方基地工程量之大，確實令人歎為觀止，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當時的世界還是很不安寧的，戰爭一旦打起來，後方基地對保障戰爭的勝利將發揮重大的作用，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就會小些，原來這些「浪費」就是很大的節約了。所以我們說，建設後方基地是關係國家安危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們為子孫後代辦的一件好事！

軍馬生產

我軍有史以來，除團以上領導幹部有騎馬和少數運載馬匹之外，都是步行的「量地軍」，完全是走路的。解放後軍隊裝備是「機械化」還是「驃馬化」，成了爭論的問題。

為了統一認識，一九六〇年林總在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作戰方針時，就提出了我軍的裝備應當以「驃馬化」為主，少數部隊定為「機械化」。

化」。同時還指出：「這不是現在我們裝備不起機械化，而是完全機械化，不適合作戰的需要。我們應當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認真研究。」

爲了說明這個問題，林總從我國的地形說起，一直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軍的戰例和我軍一九四九年湖南衡寶戰役的戰例。

林總說，我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版圖都是山地，百分之三十的平地，逐步實行農業現代化之後，水利設施的發展也會改變地形的。當然，我們國家的公路是會大發展，但不管怎樣發展也不可能每個山頭都通公路。一九四九年進行衡寶戰役時，祇上去了兩個驃馬炮兵師，炮兵有炮兵讓路，把炮翻到溝裏去。這還是驃馬炮兵，要是機械化炮兵，情況會更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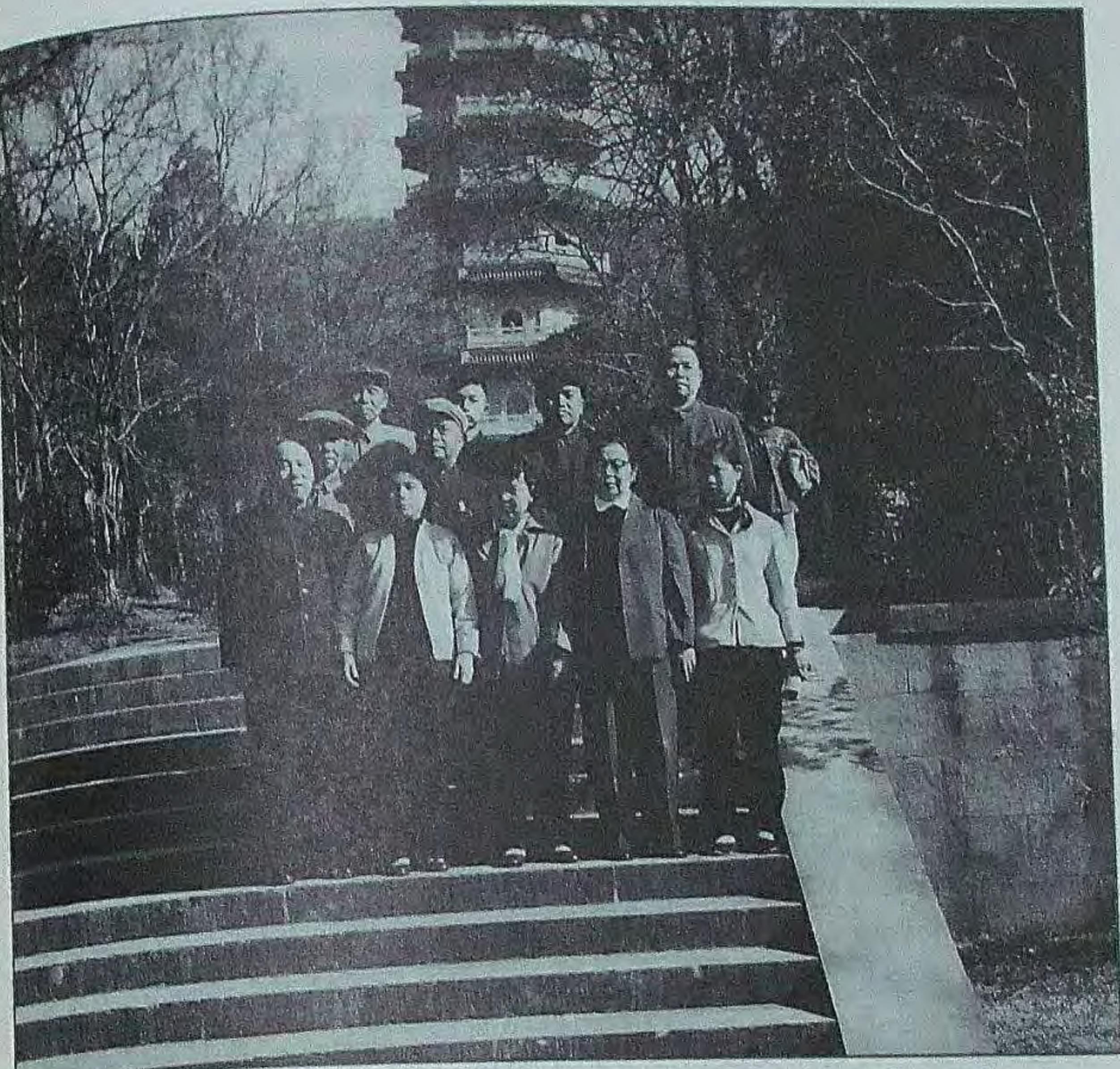
在全軍編制裝備會議上確定：軍隊運載工具以驃馬運載爲主，機械化爲輔。實行驃馬化，對我軍後勤工作，不僅增加了馬匹的管理工作，而且要擔負軍馬的補充任務，從此，我軍後勤系統，增編了軍馬部門。

根據我軍的編制，全軍運載馬匹和乘馬約需二十五至三十萬匹，每年服役和補充約需三萬匹。所需馬匹，當時沒有著落。從我國農村不可能採購更多的馬匹；從外蒙可以進口了一部分，但數量有限，質量也不好。我軍所需要馬匹，要靠自己飼養，並且要在幾年內解決問題，這也算是一個不大也不小的雄心壯志吧。

林總對軍馬問題是經常過問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林總的發言講到路線鬥爭的問題之外，也提到準備打仗和軍隊，還把辦馬場的問題提高到了國防建設的地位，也可看出辦馬場的重要了。

當時的農墾部長王震，對軍隊辦馬場是積極支持的。他親自上林總的門，提出將地方管的內蒙東部呼和浩特一個大馬場和黑龍江的遜克一個大馬場交給軍隊。國務院發了正式文件，遜克馬場很快就辦理了交接手續。呼和馬場辦了三年也沒有辦妥。當時的內蒙區黨委就是不交，我親自找過他們三次也沒有解決問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總後成立軍馬部，確定軍馬場以養軍馬爲主，農牧結合、綜合經營的方針，並制定了軍馬生產發展規劃。規劃要求全軍要建立約三十個馬場。我們除了自繁自養以外，經周總理批准，從外



一九六三年在南京靈谷塔。前排左一甘泗淇、左四李貞，二排左一蕭望東，
後排左四邱會作。

蒙進口了幾千匹幼母馬，這樣就解決了生產騾子的問題。到一九六八年軍隊馬場存欄數達到十萬多匹，年產駒兩萬一千二百匹，提前完成了軍馬生產發展規劃。軍馬供應有了可靠的保障了。

生產軍馬，是軍隊後勤工作一部創業史。一九六九年一月總後勤部向軍委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報告全軍軍馬生產的發展情況，補充部隊的情況，軍隊生產的馬匹，平時補充部隊自給有餘。周總理在報告上批示：「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這對軍馬生產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和促進，軍隊後勤部門，完成了我軍有史以來一個新的任務。

戰備物資儲備

一九六二年，東南沿海戰備會議結束之後，林總在軍委常委會上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說：根據目前的國際形勢，世界大戰有推遲的可能，局部戰爭則隨時都可能打起來。我們要準備三百萬人打一年仗的物資儲備，這一任務要爭取在三年之內完成。這是有關國家安危的大事，全軍工作的重點要放在打局部戰爭上。

儲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當時我們遇到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需要多少；二是需要多少錢；三是錢和物都從那裏來。此外，還有戰備物資的管理問題。

後來，幾經研究，我們想了個計算方法，先概略地計算三百萬人打一年的「正常消耗量」，然後在此基礎上，加大計算係數，最後再計算出物資的總儲備量。按照這個參考數，儲備物資所需經費要二百五十億元。這樣大的數字，是一九六二年國家對國防費撥款的四倍多，簡直讓人瞠目結舌！

儲備這些東西從那裏來？軍隊自己現存的東西很少，全國的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經濟還沒有徹底好轉，國庫空虛，銀行無「銀」。當時國家庫存的物資，除了有點糧食、棉花、布匹之外，其餘的東西就更少了。因此，要全部由國家解決物資儲備是不可能的。那怎麼解決呢？依靠國家調撥、各省市支援和自己動手結合，自己動手為主，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根據上述設想，我讓總後司令部擬制了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物資儲備計劃。我看了這個計劃後，心中有了底，增加了三年內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儲備任務的信心。為此，我主持召開了總後常委擴大會，專門討論戰備物資的儲備問題。在討論中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絕大多數同志都認為只要我們工作做得好，是可以在三年內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軍委的決策，完成戰備物資的儲備任務的。但也有少數人是不贊成上述意見的，這種人說：國務院再三反對積壓，我們號稱儲備，實際上是把東西積壓起來……。說到這裏，湯平同志插話說：戰備儲備不是積壓，要說準備打仗是積壓的話，要軍隊幹什麼，整個軍隊都是「積壓」，何不等到打仗時再徵兵，我們這些吃了飯不生產的人，也是「積壓」。

關於物資儲備問題，周總理要我在國務院會議上專門說了一次。我在會上主要講了物資儲備的問題。最後我提出：要完成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國家預撥款我們祇要一百二十億元就可以了。撥款以三年為期，如果在三年內不打仗，從第四年逐步從國防費裏扣回來。總理聽了我的發言後，帶頭鼓掌，表示贊成！

最後周總理在講話中說：「邱會作同志的講話大約祇有半小時，但講得像連隊司務長報賬一樣清楚，這種思想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是搞經濟工作的人值得學習的。國家雖然有困難，但至今還可以承擔得起，政府可以承擔戰備儲備所需要經費，至於物資你們上報調撥就可以了（李先念同志插話：賣掉褲子也要完成戰備儲備）。關於戰備物資儲備問題，國務院各部委要同總後密切合作，滿足軍隊的需要。他沒有本位主義思想，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從這個意義來說，總後就是小國務院了。」此時總理笑了，在場的其他人也都笑了！

總理說總後是「小國務院」的話，後來在總後也傳開了。

關於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計劃，國務院會議討論後。總後向軍委寫了個報告，軍委批准了總後的報告，並上報中央，轉發全軍。為了落實戰備物資儲備計劃，我們確定了幾項辦法。

第一，堅持軍民儲備相結合。許多物資是軍民通用物資，例如糧食、布匹、煤炭、木材等，這些物資就由地方儲備，祇是由軍隊提出專門儲備計劃，由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儲備，保障儲備基數在就可以了。平時有些東西軍民共用，雖然儲備的數量不是很大，但是需要特殊的設備，例如血漿，軍隊沒有這種保管條件，也只能請地方代為儲備了，至於武器、彈藥、油料等物資，軍隊自己儲備便於管理和使用。

第二，整頓軍需工廠。解放後，軍需工廠一直由軍隊自己管理，爲了完成儲備任務，我們認真整頓了軍需工廠。一是改變了管理體制，由各軍區分管改為由總後統管；二是對一些設備陳舊，技術落後的老廠進行了改造；三是確定了「優質高產，質量第一」的生產方針，經過整頓工廠的生產效率提高了，更主要的是產品質量提高了。

同時，爲了和倉庫儲存能力相適應，對工廠的生產計劃進行了調整。軍需產品的體積大，特別能佔庫房，儲備三百萬人打一年的東西，哪有那麼多的倉庫呢？爲此，我們想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把出廠的正常供

應量、工廠的在產產品和庫存原材料三者銜接起來，形成依次「推陳出新」，不斷流動，這既緩和了倉庫的緊張，也能保證未來戰爭的需要。

第三，籌集儲備物資所需經費。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是需要很大一筆錢的。這些錢，在一九六三年以前國家是在每年國防費以外專項撥款解決，一九六四年以後改為在每年國防費中安排解決。不論在「外、內」安排，祇靠國家撥款是不能滿足需要的，還要靠軍隊自己想辦法擠出一些錢來。多年來，我們主要採取了下面的一些措施，彌補了大量軍費不足。

1、調整人員生活費用。例如，精簡整編，降低全軍的某些生活待遇指標和供給標準。僅一九六五年全軍幹部薪金改套國家行政級標準，再加上士兵降低薪金支出，每年就可減少支出一億元。

2、凍結和清理銀行存款。根據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和指示，總後財務部從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一九六三年三月，對全軍各大單位的經費情況進行了清理。經過審查清理以後，凡是資金來源不合符國家規定的，應當一律交回中央或地方財政。按照中央的這個規定，各單位上交總部近三十億。這次上交的錢，幾乎全部來彌補當年資金之不足。

3、清理、利用庫存物資。從一九六二年三月開始，到一九六四年三月結束，清理各級庫存物資共有二十八億多元，同時對多餘的庫存物資進行處理和利用。一九六四年，利用各種多餘物資計抵扣軍隊經費達一億元。

4、審查軍用物資訂貨價格。根據國務院的批准，從一九六二年起，總後財務部協同總後各業務部門，對訂購的軍品的價格有重點地進行了審查。一九六二年，經審查的部分軍品的價格，就降了4.7%，減少軍費開支近四千萬元；一九六三年，經審查的部分軍品的訂購價格又降低了一些，這樣，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兩年又少支出軍費兩億元。審定軍品價格，既促進了工廠降低成本，又減少了軍費支出，實在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5、組織賬外收入。一九六二年又根據中央和國務院的通知精神，總後對經費的使用進行了調整，規定賬外經費收入，均集中於總部和軍區兩級統一掌握使用，以彌補經費之不足。據總後財務部統計，從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七年時間，祇是總部一級就收進經費達三十多億元。

6、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除了國防工程、後方基地工程和海邊防部隊的戰備、生活設施外，其他基本建設一律從嚴控制，特別是嚴禁修建樓堂館所。直到一九七一年我們倒臺時，在北京除有個總後禮堂外，海軍、空軍連個禮堂都沒有。部隊各級領導幹部的住房都嚴格控制，軍一級幹部也祇有三間住房，那時的幹部大都是四、五個孩子，都是擠著住，都毫無怨言。

7、修舊利舊，節約消耗。祇是將每年收舊的服裝經過修補後改做工作服，每年就可以少發幾十萬套新衣服，新衣服就可以儲備起來。

採取上述一些辦法，不僅節約了國防費用，而且每年還可以擠出不少錢用來購買戰備物資。

第四，籌措儲備物資。儲備物資一要有錢，二要有東西。沒有錢不行，有錢買不到東西也不行。當時，國家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國家的分配是軍隊所需物資的主要來源。但是，需要的東西不一定能分到指標，有了分配指標不一定能到貨，訂到了貨不一定能按時拿到貨，這都是常有的事。雖然國家把軍隊作爲重點保障對象，但國家也很困難啊！所以有許多東西，我們還要在國家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廣開門路，多方自籌，以補國家分配之不足，這更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在那段日子裏，我們總後和全軍後勤業務部門，爲籌措物資儲備的事，真是費盡心機，付出了艱苦的勞動！說到這裏，不能不使我想起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那是一九六三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總後負責人xxx沒有經過我，就批准把儲存在豐臺倉庫的一大批鋼材、電機等戰備物資，賣給了山西省。這無異是對戰備物資儲備的干擾，我發現了這件事，很氣憤！首先直接命令豐臺倉庫不准出庫這批物資，如有違抗以軍紀制裁。同時，我又立即批評了當時的物資部長，當然幹部之間也就有了怨恨。

有計劃地大批儲備物資，是從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示以後開始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已基本上達到了計劃的要求，到了一九六八年，三百萬人打一年所需物資、彈藥、油料全部入了倉。所有的儲備庫都符合「靠山、分散、隱蔽」的要求。

完成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這是後勤戰備的一件大事！為此，得到了毛主席的很高評價。一九七〇年七月，我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上海參觀訪問，毛主席接見代表團後，和我談了戰備問題。毛主席說：「從你的報告來看，軍隊已經儲備了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這樣就主動了。我們既然三百萬人可以打一年，就更大規模、更長時間的仗都可以打下去。」

劃區供應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野戰部隊就是實行後勤分部供應制。當時根據作戰的方向，東北軍區後勤部就設有東線（吉林以東）、西線（吉林以西，遼寧以北）、北線（吉林以北）三個後勤司令部，擔任起各個地區部隊的供應。遼瀋戰役前夕，三個後勤部整編為五個後勤分部，隨軍進關保障平津戰役和部隊南下。抗美援朝時期，對部隊的後勤保障也是同四野一樣實行分部制的。東北的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時期都是大兵團作

一九六四年在越南。



戰，後勤保障工作都做得很好，這就說明了分區供應的優越性了。但當時不在後勤工作的崗位上，對此沒有多大的體會，不能比較全面深刻的理解。劃區供應，除我軍的歷史情況對我有啓示之外，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對我的啟發更大。例如，汽車加油站就是分地區設置，供油部門是共用的。我們國家的商店、銀行、郵政就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全民共用的。我們就是根據這些情況研究劃區供應的。

實行基地化供應之後，經過一些小的戰爭考驗，也證明了它的優越性。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中印邊境反擊戰，是一個不算規模很小的戰役，西線由青藏兵站線擔任供應任務；東線由川藏兵站線擔任供給任務，總後祇下一道後勤保障的命令就能順利完成任務。總後勤部和西藏軍區後勤部祇把瞭解情況，檢查督促就能把事情辦好。

一九六二年六月，臺灣蔣軍妄圖用比較大的兵力竊犯粵閩沿海地區，我們準備調動三十萬以上的部隊，殲滅來犯之敵。這是準備一次比較大的戰役行動，為了實行對作戰部隊後勤保障，總後立即加強了浙贛線上的上饒地區、閩南的龍巖地區、粵東的汕頭地區的後勤分部等五個分部和兵站線，各級後勤部門共籌措物資三十四萬噸。由華北南下的六十三軍先頭師，開進到了福建的南平和龍巖一線，對後勤保障情況表示很滿意。由於我軍嚴陣以待，蔣匪放棄了它的冒險行動。

一九六五年六月，應越南政府的要求，我軍開始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這是援外的戰爭，援越部隊的總數達到三十多萬人，在越境內部隊最高年份達到十七萬餘人。援越部隊，同過去的抗美援朝部隊是一樣的，一切都由國內供應。部隊的蔬菜，做飯的燃料，牲口的草料，都是從國內運去的，我軍真是沒有助越南一草一木。部隊說：「我們除了吸了越南的空氣，一切都用自己的。」支援越南作戰，對後勤保障我完全有決定權，於是，我就決定以劃區供應的辦法，統一實施對援越部隊的保障。當時，北越並無地面戰爭，我國通向北越的運輸有鐵路、水路，運輸距離並不很長。可以說，是平時戰時兼而有之的情況，對劃區供應能夠進行比較好的試驗，是接近實戰的試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決心作好這篇文章。對援越部隊的後勤保障，我們劃了兩條線：

第一條，所有進入越南作戰的部隊，一律由廣州軍區設在桂林和昆明軍區設在開遠的後勤分部擔任供應。

第二條，進入越南的作戰部隊，師級後勤部和空海軍的獨立部隊，一律到廣西桂林和雲南開遠同二十、二十三分部辦理供應手續。在越南作戰期間，所有部隊都由這兩個分部供應，一切補給都由總後直接指揮。

我援越部隊真正做到了不動越南一草一木。我軍後勤提出的口號是：我援越部隊除頭頂越南的天，腳踏越南之地，渴飲越南的水和呼吸越南空氣之外，其餘一切都由國內供應，並保證滿足需要。

我軍援越部隊的全部日用品、生活物品，包括主食、副食和做飯用的煤，引火的木柴等全部都是國內供應的。我援越部隊沒有越南貨幣，在越南一文錢的物品也沒有買過。桂林分部和開遠分部對援越部隊的後勤保障組織得很好的，這種保障方法，可以叫做劃區供應，也可以叫做分部供應。這種供應方法具有如下的優越性：

(一) 便於部隊機動。我援越工程部隊和高炮部隊，接到援越任務之後，祇是按照命令向指定地點開進。不需要攜帶大量物資，也不需要顧慮接受任務後的後勤保障問題。如果不是實行劃區供應，進入越南的高炮部隊和工程兵部隊，就需要各組建一個保障機構。

(二) 能夠保障部隊及時供應。平時部隊以師或以團為單位直接到倉庫去領取，戰時則展開兵站線，由後面直接供應到部隊，這樣，部隊就無論平時或戰時都能得到及時供應。對部隊物資供應，在平時是生活問題，戰時就是完成作戰任務的重要問題。古今中外的戰史中，打敗仗或被迫撤出戰鬥，絕大多數都是物資供應問題。

(三) 節省人力。劃區供應平時祇有倉庫就可以了，不用建設一套供應機構，戰時則依托倉庫，根據任務加以擴大就可執行任務。

(四) 方便部隊。在區域化內供應的部隊，在業務手續上是很簡化的。部隊在自己的上級機關拿到了憑證，到自己駐地附近就可以領到物品，如同憑票買商品是一樣的，這對部隊是非常方便的，特別對單獨執行任務的小部隊更為有利。

總之，劃區供應在一個區域內的部隊就有自己的「家」，過往部隊有了「旅店」和領取物品的「商店」。劃區供應有很大的優越性，但隨著我軍現代化的進程，三軍走上統一的後勤聯合供應是不可擋阻的必然趨勢。

機關工作的整頓和建設

準備打仗，建設一個能幹的後勤機關甚為重要。沒有一個能幹的後勤機關，就不可能完成對現代化戰爭的後勤保障任務。因此，對機關建設，我把它列入戰備建設之內進行。經過比較長期的工作，總後機關建設是取得了重要成就的。

第一個問題，小題大作。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林總在軍委會議上就提出了「要建設能幹的統帥部」。他說：「準備打仗，同機關建設要結合起來。機關建設是戰備建設的重要內容。現代化的戰爭，沒有能幹的領率機關是不可想像的。」他又說：「機關建設不是加人，而是要精幹，真正有工作能力。」

林總的指示對我有很好的啓示，我下決心親自抓機關的整頓工作，就在此時，我抓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一九六一年的八月間，我由國務院開會回來，在進總後機關北門的時候，看到大門口有一個軍人立正站著聽傳達室值班員的訓斥：「你見天來找我們，是要我親自帶著你去辦事不成！」我立即下車問個究竟，值班員向我報告說：「這是新疆軍區某師後勤部的助理員郭豐，來北京辦事已經兩天了，每天都來找一次到兩次，現在事情也沒有辦成。」我即告訴他：「我是總後邱部長，你要辦的事我來幫你忙，你上車跟我一起走。」郭豐不敢上我的車，警衛員小馬連拉帶請拉了他上車，我直接把來人送到機關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我組織了一個三人小組，同郭豐一起，做了一個詳細的調查記錄，從材料上來看，我們機關真正成了冷酷無情寺廟了，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

一、郭豐是第一次來北京和第一次進總後的大門的，可謂是一個「鄉下佬」，他是一個祇有二十幾歲的年青幹部，生性膽子小，是要熱情加以幫助的。

二、值班員作風很不好。客人是來辦理一個有關油料倉庫器材的事情。總後機關號稱大院嘛，客人拿出介紹信給值班員看了，並問：「油料部在那裏？」值班員祇看了一眼就說：「油料部在七號樓。」值班員態度冷漠，郭豐也懵頭懵腦的，無所適從，又不敢進去再問，竟走到宿舍區的七號樓去了，時間過得很快，中午下班的號音響了，於是他就出了機關大門，在馬路旁坐在樹下吃乾糧。下午聽到上班號音，郭豐又去傳達室

打聽油料部在什麼地方，進了北門傳達室，但值班員不在崗位，門衛警衛不讓他進機關大院去，於是他在傳達室外等，等到值班員回來了，郭豐祇問了一句：「油料部在哪裏？」值班員說：「現在快下班了，你明天上班時候再來。」郭豐不但沒辦成事，連招待所都沒找到。

三人小組搞的材料題目爲《機關怪事一樁》，我批示全文發到師後勤部以上，總後機關發到處以上，並指定爲機關學習材料。新疆軍區某師後勤部郭豐助理員在總後受的罪，成了總後整頓機關一個很好的材料。這件事在總後機關大多數人中震動很大，對機關改進工作作風起到促進作用。

第二個問題，拆廟式的精簡機關。

我軍後勤機關原來並無固定編制，歷來幹部人員很少。紅軍長征開始，總供給部祇有十名業務幹部，到達陝北後，業務幹部也祇有二十餘人。當然，不是說人少就精幹，但人少與精幹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爲人多就容易人浮於事。

全國解放後，我軍後勤機關的編制，是蘇軍那裏搬過來的。它的基本特點是橫寬縱短，並且還稱之爲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恰恰相反，業務分工過細，處理一個問題牽涉的面越寬，扯皮的事就多，文件旅行不止，辦事的效率反而更低。

六〇年代初，總後機關總人數兩千五百餘人，經過幾次精簡，當時減少了一些人，但不要多久，人數又回升了甚至比原來還多。當時總政的幹部部門，也常把老弱病殘往總後塞，這是總後機關的特點。這樣的機關像一部質量不良的機器一樣，哪能很好地運轉？例如，總後一級領導幹部中，正副部長，正副政委十餘人，開起會來祇有一半人能到會就算好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對老幹部又無離退休的管理辦法，祇好增加人數就是了。

過去，機關精簡幾乎年年都在進行，但頂多也只能減少幾個人，不能達到精幹的作用。不拆廟，香爐一樣多，我幾次下決心拆廟，但那裏拆得動。到了文革的「鬥批改」時期，毛主席提出要「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總後的廟才真正拆了幾個，我把原有的十三個部局，合併爲九個部局，整編後，人數由原來的兩千五百多人減到一千二百多人。這是很大的決心，沒有這種決心是精簡不下來的。

機關業務工作，大體上可以區分三種：一是屬於出謀劃策的腦力勞動，這是機關最主要的工作；二是各種專業工作，如財務，審計等，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三是抄抄寫寫，這部份人可以減掉不少。

在文革當中精簡下來的幹部，也是沒有去處的，除少量轉業以外多數人參加支左或上五七幹校，這些人的怨氣是很大的。因此「九一三」之後，精簡問題帶來的災難是難以想像的，精簡被當權者和造反派利用，說成了迫害。

原來是司令部門稱參謀，政治部門稱幹事，後勤部門稱助理員，這是那裏搬來的，我不清楚。本來名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祇是稱呼而已，我要求把司令部的助理員改名為參謀，祇是表達我的一點複雜的心情。一九六二年在全軍裝備編制會議上定編制名稱時，我提出，司令部是行政指揮部門，總後司令部的助理員也改稱參謀。當時，主管編制裝備的副總長張愛萍立即說：「這不是亂套了？」我衝口而出說：「亂了什麼套？難道後勤的人叫個參謀也亂套，也有傷大雅嗎？」他對我的話笑而不答。主持會議的羅瑞卿則結論式的說：「應當統一名稱，可以統一起來。」這場爭論就結束了。

原來司令部核心處叫計劃處，我感到名不符實。我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個「作戰勤務保障處」，簡稱為戰勤處，我認為這個名稱是合適的。關於總後司令部稱參謀和司令部計劃處改戰勤處的問題，總參軍務部向劉伯承元帥請示報告了，他點頭同意了。劉帥說：「總後司令部稱參謀，無可非議，既設了司令部，工作人員的名稱就可統一起來。把計劃處改為戰勤處是合適的，比其他名稱都好。你們想的這個名稱不錯，是動了腦子的。」

供應部這個名稱是我起的，這是主管整個後勤的供應業務的部門。對這個部的名稱，有人提議稱供給部，我沒有同意，因為我在延安當過軍委供給部部長，不背這個「樹碑」之嫌。

總後勤部直屬部隊工廠、農場、馬場約三十多萬人，生活艱苦，文化生活極其匱乏。當時不少人提議要建立一個文工團，我考慮此舉並不爲過，也就同意了。

妥善安排老幹部

整頓與建設機關，最困難的是對老幹部的安排。總後機關，二級部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一律「紅一色」，都是紅軍時期的幹部，二級部副部長一級的幹部，也多數是老紅軍幹部，甚至處長中有一部分是紅軍幹部。這些幹部，都是黨的財富，這些幹部有三種不同的情況：1、堅持不退位的幹部，這是少數。這些人中除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之外，領導能力比較差，他們認為不工作，是最大的恥辱，對這種人最難安置。2、要位、要職、要權的三要幹部。這種人在老幹部中不是多數，這些人不去想自己的領導水平如何，總是想到要有自己的位置。3、要汽車、要秘書、要警衛員的三要幹部。這種幹部也是少數，總後原副政委李耀就是這種幹部的典型，我在位期間他什麼都要，就是不工作。對總後的老幹部，我是長期費盡心思，也沒有處理得很好。當時還沒有離職休養的制度，而總後的老幹部又祇有調進來，根本出不去。別處不好安排的同志，都強行安排到總後的就先後有好幾人。

對老幹部的安排，我們自己能辦的就祇有提拔一條路。但我堅持，二級部正部長不能以安插位置來任命幹部，這是我在後勤工作的根本一條，二級部的一把手都是要幹實事的，總後首長一級我反而同意作為安插位置來安排。於是，總後領導中的副部長，副政委就安了十餘人之多。別人向我開玩笑說：「你這個部長，現在還是班長，但不要多久，就要昇排長了。」

為了給老幹部找到適當的出路，我還是給兩位老幹部，車管部原副部長劉顯宜和船舶處長李佐榮以「帶職休養」做了安排。這兩位都是老紅軍幹部，他們都是身體不好，很難繼續工作，這兩位幹部思想很好，很聽安排。本來我打算這條路打通之後，就繼續安排老幹部退出工作專心休養，但總政治部則向羅瑞卿告了一狀，指責我「獨斷專行，破壞幹部工作制度」。羅算做了件好事，沒有同意對我的指責，反而質問總政治部「不能工作的老幹部，怎樣處理，你們提出辦法來。」總政不吭氣了，我也就算免罪了。

對老幹部經初步安排之後，二級部和處兩級幹部精幹了，是真正的工作班子，這對機關建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機關在各个方面都出現了新的氣象。

機關經過幾年的建設，工作能力和戰鬥精神確實大大提高了。我上任總後部長的十幾年，沒有休過一次假，沒有過好一個完整的星期天，每天都是晚睡，但工作還是辦不完。這樣也害得不少同志長期加班也得不到休息。

總後機關經過幾年的整頓和建設，機關面貌漸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機關學習、工作、生活秩序都是比較好的。前面說的那位新疆某師後勤部郭豐助理員，一九六九年又來到了總後機關，他對機關也有新的看法。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沒有見到那位助理員，他給我留下了一封信，我記得，他的信的主要內容是熱情頌揚了機關的變化。

第十七章 後勤業務改革

調整幹部隊伍

一九五九年，我上任總後部長之初，林總同我談過一次話，林總說：「我同周總理不約而同選你當總後勤部部長，毛主席也很贊成。從高級幹部的反映來看，對你抱有希望。」林總又說：「後勤工作很複雜，複雜性就是很多的矛盾，但在這些矛盾中，又必有一個主要矛盾，這就是幹部問題。正確使用幹部，是軍隊建設的核心問題。你現在就要抓住幹部隊伍建設這個中心，就算牽住了『牛鼻子』，這是你要抓住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林總同我的談話時間雖然不長，但對要抓住中心問題，給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我上任之後，幹部問題始終是我注意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總後新舊兩種思想鬥爭的基本問題，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很多心血，按照一般的工作程序，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當時，總後領導幹部的基本情況，用兩句概括性的語言來說，就是「滿堂紅」和「孫子多」。總後領導幹部，二級部正副部長（包括一部分處長）都是紅軍老幹部，各院校領導幹部，除個別之外，也是紅軍老幹部。另外在助理員中又極大部分都是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參軍參幹的初中學生。如果以革命歷史的時期來說，紅軍幹部多，抗戰幹部少，解放後的幹部多，「爺爺多，兒子少，孫子多」就是這樣來的。

總後的幹部狀況是領導人造成的。一九四九年總後成立之初，楊立三部長把我軍的一批老後勤工作幹部都集中到總後來了。另外，總後成立之後，總政治部把一些不好安置的老幹部都送到總後。有不少幹部是總政治部專門「按位就坐」在總後的。當時，總後二級部以上的位置，不僅一個空位沒有，而且「加坐」很多。而抗戰時期的幹部，當時在全軍任

軍一級軍政主要領導幹部，兵團級的幹部，已經很多了，在總後就少見了。

在幹部問題上，我同總政是作過鬥爭的。這裏，僅以彭嘉慶和陳念棣任職的問題為例。

彭嘉慶原是濟南軍區副政委，擬調任總後副政委兼後勤學院政治委員。在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幹部任免名單時，蕭華為防止我提意見以引起麻煩，就對著我說：「彭嘉慶是一個很老、很好的同志，到總後去工作是合適的，對後勤學院的領導會起加強作用。」

我本來就不滿意總政對幹部的安排，聽到蕭華說的那番話，心裏就有點氣了。我毫不客氣地說：「彭嘉慶是個好人，為何不放到總政當個副主任？放到總後不是委屈了他嗎！」蕭華看到我不高興，就不說話了，羅瑞卿站在領導的角度立即說話了。他說：「老邱，對老幹部的安排是個整體的問題，對彭嘉慶的安排就這樣定了吧。」我聽到羅的話之後，也不說話了。

又有一次，也是在軍委辦公會議上討論幹部任免名單時，總後擬提陳念棣任總後科學研究所所長。甘泗淇看到名單時說：「啊！陳念棣搞業務？他是一個很好的幹部。」我火冒三丈地對著甘說：「甘主任，照你這樣說，搞後勤工作的都是壞幹部？今天我才知道，總政把一些沒有人要的幹部都塞到總後，原來是總政的政策！」

甘泗淇自知說話不對，立即糾正自己的話說：「邱會作同志，我的話說得不妥，但不是你理解的那個意思，請不要誤會，我正式糾正我的話，我對陳念棣任職沒有意見。」羅瑞卿接著我們的爭論說話了，他說：「以我所知道的，在幹部問題上，邱部長對總政是有意見的，而他的意見又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工作的幹部確實不要過多地安置在崗位上，否則對工作不利。對老幹部的安置，由總政提出一個具體方案來。」不久，總政就提出了對高級幹部「離職保待遇」的安置方案，這就開闢了一條高級幹部的去路。

我對總後老幹部的情況做了這段回憶，毫無嫌棄老幹部之意，何況，我自己也是一個老紅軍幹部。老幹部的優點這裏不說了，其弱點是普遍的，是歷史帶來的。老幹部的弱點是「老、粗、弱」，這個弱點在總後的老幹部中顯得特別突出。從年齡上來說，是「老中之老」，從文化上

來，是「粗中之粗」，從身體上來說，是「弱中之弱」。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否則對事業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總後對幹部的調整提拔，主要是按照如下三條措施進行的。

第一條，調整幹部。由於總後老幹部過多，位置上是滿滿的，一個空餘的也沒有；不僅如此，常常是一個位置有若干人「共事」。在此情況下，不調整幹部空出位置，就無法提拔幹部。

抗美援朝結束後，志願軍後勤部有一批比較優秀的幹部到了總後，這是加強總後機關建設的一大力量，但由於種種原因，志願軍的幹部在總後頂多是二級部副部長，沒有當部長的。根據調整幹部的原則，現任二級部的老正副部長哪裏去？出去是不可能的，祇有自己消化，總後祇有多設副職來安排。為了把二級部的位置空出來，就先後提拔了一批總後的副部長、副政委張池明、張天雲、湯平、韓振紀，上述位置空出來之後，才有可能考慮二級部正副部長的提拔。

調整幹部是一場尖銳的鬥爭。有極個別的人竟在我的頭上加上一條什麼「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罪狀。他們說：「調整幹部就是調出自己不喜歡的幹部，調進自己喜歡的幹部。」那些不實之詞，當然沒有什麼多大影響。從總後確實先後調出三名、調進三名高級領導幹部，調進的有張池明、張天雲、張汝光等三人；調出的有胥光義（賀帥指名調去國家地質部任副部長），汪易（楊勇指名調去北京軍區後勤部任部長），傅家選（楊得志提名調他任濟南軍區後勤部長）。調進和調出的幹部，都是由總後幹部部向總政幹部部辦理正式手續的，決不是由任何個人調動的。

第二條，加強二級部的領導。調整提拔幹部的重點是加強二級部的領導，經先後調整提拔後的二級部部長為：司令部副參謀長（一九六五年提參謀長）楊恬（抗戰時期幹部），政治部主任盧南樵（紅軍時期幹部），衛生部部長孫儀之（紅軍時期幹部），軍械部部長張明遠（紅軍時期幹部），財務部部長范惠（抗戰時期幹部），軍需部部長王希克（抗戰時期幹部），油料部部長伊文（抗戰時期幹部），營房部部長蘇煥清（紅軍時期幹部），物資部部長喻縵雲（紅軍時期幹部），第二物資部部長范子瑜（紅軍時期幹部），運輸部部長羅文（抗戰時期幹部），軍需生產部部長張和（紅軍時期幹部）。以上十二名二級部部長，紅軍時期幹部七名，抗戰時期幹部五名。紅軍時期老幹部雖然還佔絕對多數，但已經有五名抗戰時期的

幹部當了二級部部長，這是總後勤部空前未有的。二級部的領導幹部調整後，領導加強了，對機關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後調整提拔幹部出現的基本情況是：凡是老幹部上去的意見都不大，凡是提拔起來的阻力都不小。在常委內部，我祇有充分做說服工作，萬一說不服，就祇有以「少數服從多數」解決問題，楊恬任參謀長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定下來的。

第三條，控制機關處長的選拔。機關處一級幹部，是進入領導層的「海關」。因此，對處一級幹部的選拔培養就成為特別重要的問題，也是機關建設的重點。有了好處長就不愁沒有好部長。

對處長、副處長的選擇，我們做了比較具體的規定：一定要選拔優秀分子任正副處長。處一級幹部不准「安位子」，應當注意政治質量、文化水平和身體條件。控制處一級幹部的選拔是打破論資排輩的有效辦法。提拔幹部以德才為標準，就可以克服以資格為標準的現象了。我是提倡在革命道路上賽跑，誰走到前面的就當官，不應當像在隘路上行軍一樣，祇能按照先後一個一個地跟著走。

控制處長的選拔，我們幹部部開始還不十分理解我的意圖，後來，他們向總政幹部部匯報了，並得到了徐立清的讚揚。據總後幹部部對我說，控制選拔處長的做法，徐立清副主任是很讚揚的，徐說：「邱部長親自控制處長選拔的措施，是得力的。其目的就是把住幹部進入領導幹部這個圈子的『進口』。全軍很多領導幹部還不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提拔幹部很亂，從一般幹部提到團以上幹部，數量大，質量差。」

學校整編和學制調整

總後原有高等院校五所：後勤學院、三所軍醫大學、一所獸醫大學，另外，還有六所中級學校。學校的數量和能招收的學員名額，從數量上來說是夠用的，從質量上來說，除軍醫大學之外，其餘的不少是不合用的。總後的學校，沒有起到造就建軍人才的作用，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要使學校成為造就建軍人才的場所，就必須整編學校和調整學制。

後勤學院原來祇是對現有幹部的輪訓，沒有培養新幹部的任務，這種學制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現職幹部質量的作用，不能起到增加幹部數量的作用。按照當時的制度，團級以上職務的幹部，每提拔一級

都要到後勤學院輪訓一次，有的幹部輪訓三次以上，幹部對輪訓不感興趣，擔心學習後提拔不成又丟了位子。

我兼任後勤學院院長時，對後勤學院提出了改變學制的方案。我主張全院改為三個系：輪訓系、基本系、初級系。輪訓系招收團級以上幹部，學制三年，課程安排為文化課、業務課各二分之一。老幹部多學點文化，比學「前送後運」的專業課好得多。老幹部祇要文化提高了，很多業務課都可以自學。基本系招收營級以下幹部，學制三年，除了補習必修課之外，基本上學業務。初級系招收高中畢業，至少也要有高中水平文化程度的學員，軍內、軍外招生均可，學制五年。

我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後勤系統一致同意。但不久，我自己也被送到高級黨校學習去了，方案也就進了「冷宮」。一九五九年，我當了總後部長之後，硬在後勤學院開設了一個參謀系，招收高中學生，從此，培養出來了一批有文化知識的後勤幹部。

軍醫大學的學制、課程沒有什麼改變，祇在招收學員（國家統一招生）上注意了政治條件，否則畢業就復員了。獸醫大學除了開設了一個輪訓班之外，一律在地方上招收高中畢業生，其餘沒有什麼變化。

新成立後勤工程學院，這同成立後勤裝備研究院一樣，又是做了一篇最困難的文章。

前面提到了後勤有六所專業中級學校，招收的學員多數是文化程度很低，畢業出來的學員不少人很快要復員，這對後勤建設沒有什麼作用，這要從辦學方向上來解決問題。我主張把軍械維修管理、汽車維修管理、油料供應等學校合併成立後勤工程學院，在地方上招收高中畢業學生，學制五年。我的主張一提出，在總後內部和總政幹部部門都是「爆炸性」的反對。我則硬著頭皮，為成立後勤工程學院奮鬥到底。

關於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問題，我在總後黨委一提出，就遭到某主要領導人堅決反對。他說：「取消幾所學校，成立一所什麼工程學院得不償失，還是少搞一點新花招為好。幾所學校換一所學校，從後勤業務上來說祇會減弱不會加強，何況取消那樣多的專業學校對各部的業務建設也不利。」事情也湊巧，一天在聶帥家裏談國防科委的問題，我順便同張愛萍副總長談了後勤要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事，出乎我預料之外，他說

的後勤要培養工程幹部，比我說的還多還深刻，最後他說：「在軍委辦公會議討論時，我會積極支持你。」

爲了統一認識，我召集總後各有關部的二級部長商談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問題。參加商談的部長們以高興的心情發表了意見，他們說：「成立後勤工程學院和成立後勤裝備研究院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不僅支持，還要學習邱部長抓大事的思想和作風。」

總後向軍委上報了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報告，在軍委辦公會上討論時，卻遭到了總政副主任徐立清的非議，他以發問的口氣對著我說：「邱部長，後勤也有工程問題嗎？」我要反駁時，張愛萍替我說了幾句很有力的話，他說：「徐主任一定知道後勤是幹什麼的。後勤的工程問題，用很多的話都難於說完。我看抓培養後勤工程幹部，是對現代化後勤建設入了門，我贊成成立後勤工程學院。」我聽了張副總長的一席話感到很開心，如果總後的報告能獲得通過，我就不準備說話了。此時，徐立清趕緊表示了態度，他說：「我失言，失言，請邱部長不要在意。我同意張副總長的意見，我贊成後勤成立工程學院。」總後成立工程學院的報告順利通過了，在後勤建設史上，空前未有的「工程學院」誕生了。

後勤工程學院是一所中等規模的學院。學員千餘人，學制五年，由國家統一在社會上招收高中畢業生，院址在重慶。學院分設軍械、油料、化工、運輸、建築等五個系，學員畢業後，全部分配在後勤系統。

加強與建設科研機構

後勤的科學技術是在加強戰備，準備打仗總的指導思想之下發展起來的。現代化軍隊的建設，離不開現代化後勤的保障，建設現代後勤，就必須掌握現代化科學技術。我在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我軍的裝備將日益現代化，後勤如果不加強科學研究，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培養大量的科學技術幹部，將寸步難行。」我在主持總後的工作期間，一直把後勤系統的科學技術研究，提到工作日程上。應當說我對後勤科學技術是抓很緊的，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

由於歷史的原因，在總後領導中大多數人的文化程度是比較低的。他們是很少懂得科學技術的，包括我自己在內。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懂

又根本不去學習，長期安於現狀，閉眼不看客觀發展的需要，故步自封，以外行自居，他們的根據是「外行能領導內行」，因此，在發展科技這個問題上，在總後常委內部長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爭論。而且這種爭論和分歧，又常常和人事關係、「團結」問題攬在一起，搞得十分複雜，令人頭痛！

當時總後有些領導幹部的思想當時還留在「小米加步槍」的時代，他們說：「後勤是管柴米油鹽的，除了看病需要點技術之外，還有什麼科技！」他們還認為，在後勤提倡發展科技就是「矮子蹬板凳，自己提高自己」，這是在後勤系統發展科技的一大思想障礙。

在總後，發展科技，還有一大障礙，就是在幹部使用上的論資排輩思想。你要提拔德才兼備的年輕幹部，他就說是打擊排斥老幹部！你要提拔一些知識分子，他就問你要靠什麼人管後勤？他們說：教授未必會做飯，而大老粗倒是內行。對於發展科技的問題，在總後領導層內長期思想不統一。

一九六三年秋，賀龍元帥在三〇一醫院住院，我同李聚奎、張令彬等同志去看望他，他在和我們談話中談到了科技問題。他說：「這幾年你們總後的工作搞得不錯，走在幾個總部的前面去了，這是在歷史上少有的，過去罵後勤娘的比較多，說好話的很少。今後，你們除了繼續搞好工作之外，就是要抓緊學習，現代化軍隊的後勤，沒有文化，沒有科學知識是搞不好的。」他說：「有一種說法，什麼後勤是管油鹽醬醋的，土包子比洋包子管得好，這是偏見，是保守思想的表現。」賀帥的這番話，使在座的人聽了面紅耳赤，好不是滋味！後來，我讓張令彬同志在常委會上傳達了賀帥的談話，對總後領導幹部提高對科技的認識，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在主持總後工作後，在加強與建設科研機構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強軍事醫學研究機構。

軍事醫學科學的研究，我們算是起步較早的。解放不久，我們就在國民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機構（在上海）的基礎上組建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當時全院有教授級的研究人員 80 多人，其中有不少是全國知名的專家，學科研究的帶頭人，例如蔡翹教授等，他們在抗美援朝時期就開始

了研究工作。一九五八年新院址在北京建成後，軍事醫學科學院全部遷來了北京，當時擴編為放射醫學、軍事勞動生理、部隊衛生營養、微生物流行病、藥理毒理五個研究所。這樣就成了一所人才、機構各方面都比較強的研究機構了。

由於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主要研究是「三防」，研究成果不是一下子能夠拿出來的，因而許多當前戰備急需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因此，我提議把各軍區衛生防疫研究所改編為軍事醫學科學研究所，主要任務是研究本地區的部隊作戰的衛生保障問題，例如，瀋陽研究寒帶衛生保障，廣州研究熱帶衛生保障，蘭州研究高原衛生保障等等。後來的實踐證明，明確這些研究機構的任務是非常必要的，他們的研究工作也是最見成效的。

(二) 組建五三研究院。(略)

(三) 組建營房工程設計院。

總後營房部的設計力量是比較強的，在五十年代，就設計過軍事博物館、京西賓館和其它一些要求很高的大型的工程。但過去是把設計和建築業務混在一起的，設計人員要用很多的時間去搞業務管理工作，這對發揮工程設計人員的專長是很不利的。

在加強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的「三防」思想指導下，對軍隊的營房工程，特別防護工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加強設計力量，於是就將營房部分散在各業務部門的設計人員集中起來，成立營房工程設計院。該院編為特種工程、營房工程、倉庫工程三個設計所。

軍隊的倉庫工程設計任務很大，營房部設計院的力量不夠用，需要把各軍區的力量統一使用。先後將北京、南京、福州、廣州、昆明等七個軍區的設計室擴編為設計所，由總後營房部設計院統一使用。軍隊的營房設計院除了擔負軍隊的設計任務之外，還擔負過地方上不少工程設計，一般的都能做到用方滿意。

(四) 組建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

過去，後勤系統祇有分散在各業務部門很少的研究人員研究有關後勤裝備，但力量很有限，極不適應現代化後勤建設的需要。為此，我提議把一些分散的後勤科研人員集中起來，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以加強後勤技術裝備的研究。

爲了使大家重視後勤裝備的研究工作，我利用各種機會宣傳成立後勤裝備研究院的必要性。我同大家說，後勤裝備雖然不是武器，但它是裝備研究院的必要性。我同大家說，後勤裝備雖然不是武器，但它是裝備戰鬥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保障發揮戰鬥力的作用的。拿鞋子，襪子來說吧，它的好壞似乎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戰鬥節骨眼上就可能成了大事情。大家都打過仗，如果你在衝鋒，正在追擊敵人，鞋帶突然斷了，對戰鬥不能沒有影響。還有單兵的負荷質量，解放戰爭的那樣，一個戰士身上祇有背包、掛包、槍支、水壺、水瓶等五大件，個時候，一個戰士身上祇有背包、掛包、槍支、水壺、水瓶等五大件，走起路來不感到負擔太重。建國後，戰士的個人裝備逐漸多起來了，現在要背五十多斤，太重了。毛主席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戰士背那麼重，怎麼得了呢？這就要求我們減輕負荷量，但又不能減得影響戰士的生活和戰鬥。這不僅要減輕重量，還要縮小體積，我們要求裝備戰士的東西要一物多用，件數少，但有多種用途，體積要小，但用起來非常順手，各種東西要做得精巧美觀，非常結實耐用。再如吃飯問題，怎樣把飯做快，做熟，做好，這不但需要適合部隊野戰條件下的炊具，還要有適合各種地區需要的炊具，例如高原的、海島的、熱帶的、寒帶的、坑道內的、海軍船上的等等。爲保護部隊有生力量，後勤要做許多事情，無論在什麼時候保障戰士吃得飽，吃得好始終是一個大事情。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部隊要靠兩條腿走路，東西要靠人背肩挑馬車運，沒有什麼摩托化裝備。隨著我軍的現代化建設，機械化裝備增多了，油料保障成爲後勤保障當中的一個突出的問題，不但有陸軍用油還有海、空軍的用油，不但有普通的油料，還要有特種燃料。對這些油料怎麼儲存，怎樣運輸，在野戰條件下怎樣加油等等，無一不是一項新的課題，都要加以研究解決。我們要建設戰略後方基地，戰後後方基地，要建設一批倉庫，要儲備大量的戰略物資，彈藥、油料、器材、糧食等等種類繁多，而且各有儲存條件的要求，溫濕度問題，防潮問題，安全問題以及海島、邊防等地區特殊性的問題等等，都要進行仔細的研究。

細的研究。還有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的「三防」裝備的研究，高炮、導彈等特種作業裝備的研究，都提到日程上來了，都迫切地需要我們拿出研究成果來，否則談何保障軍隊現代化建設？

老大不小的苦心人，我苦口婆心地宣傳，總算說服了總後內部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也爭取到了總參謀編制的同志的同意。後來，總軍委批准，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成立了，從此，我軍有了第一所後勤技術裝備的專門研究機構。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下編軍需裝備，軍械維修，衛生裝備，車輛裝備，車船油料，被裝化工，物資貯存等九個研究所和兩個附屬實驗工廠。

從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成立時起，我們就非常注意掌握他們的發展方向，研究工作的任務和重點，使他們能夠很快地拿出部隊急需的科研成果來，為此，我們多次和該院的領導幹部、科研人員交換意見，大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知識分子政策問題是科學研究中起決定作用的問題。革命的戰爭時期不一樣了，建國後，我軍後勤系統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院校和科研部門更是知識分子成堆。建設現代化後勤需要知識，必須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但在現實中，你會遇到許多問題，如不正確處理，就會挫傷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我從一九五四年來到總後工作後，就接觸到了知識分子問題，不能說我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完全正確，但從總體上來說，沒有出大的偏差。

一是批判「白專道路」問題。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提出反紅反專的號召。毛主席說：「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我們當時認為，「紅」與「白」都是屬於政治範疇的，而「專與不專」則是屬於業務範疇的，這兩方面的東西沒有必然的聯繫。實際情形是：一個政治上「紅」了的人，他可能有專業知識，也可能沒有專業知識，一個在政治還沒有解決「紅」的問題的人，他也可能有專業知識，也可能沒有專業知識。「白專道路」的提法是不準確的，是違背毛主席提出的「紅與專統一」的原則的，批判「白專道路」不是走紅專道路的途徑，而往往是適得其反。我們在總後系統，沒有佈置行政和指

「白專道路」的政治運動，歷史證明，我們當時的認識和做法基本上是對的。

二是對知識分子大膽使用的問題。由於歷史的原因，許多知識分子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有這樣那樣的個人歷史問題，這是客觀存在。怎樣對待這個問題呢？應該是重在表現，給他們創造發揮一技之長的條件。但有些單位的領導，對知識分子有一種不信任的心理，管得太嚴，輕則挨批，重則挨鬥，結果是留不住人才，甚至連自己軍醫大學培養的醫生，都做轉業處理了。

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問題，我多次向聶榮臻元帥提出過我的看法，他對此有同感，他說：這不完全是軍隊政治機關的問題，而是黨的政策問題。他又說：「你對知識分子政策和使用上的看法是對的，在我們職責範圍內應當把知識分子工作做好。」他還說：「沒有知識分子參加，老幹部不大力提高知識，我軍的現代化是沒有希望的。」

聶帥還說：「目前要徹底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時機尚未成熟，但軍隊中注意保留知識分子和大膽一點使用知識分子是可以做到的。我們今天幾個人（我記得在座有的張愛萍等人）談一談，待我向軍委寫個報告，用軍委的名義發個指示，估計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不久，軍委發出了注意使用知識分子的指示，其中特別提到了對知識分子的使用要著眼才能，對個人出身不要過於苛求。我們總後系統堅決執行了軍委的指示，大批知識分子提到領導崗位上來了，這對科研工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是在政治運動中保護知識分子問題。

建國以來，政治運動不少，可以說是一個接著一個。我認為，開展政治運動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些政治運動出現偏差，把知識分子當做了運動的重點，這是應該總結經驗教訓的。我主持總後工作以後，遇到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反右時我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一次是四清運動，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這兩次政治運動，對知識份子的衝擊都很厲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更為突出，在當時我都根據自己的認識和力所能及的範圍，對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採取了保護措施。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總政治部李曼村等人帶領工作組到軍事醫學科學院二所搞四清，總後政治部主任盧南樵也帶工作組配合其工作。他們以抓「兩條道路鬥爭」為名，給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帶上了「個人主義」

「名利思想」、「新興資產階級」等大帽子，一時搞得人心惶惶。我知道這件事以後，在總後常委會上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採取了堅決的糾正措施，李曼村為此與我結下大仇。隨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和五三研究院全體幹部大會上，我嚴肅批評四清運動的極「左」的做法，我說：「十多年來『內戰』不少，傷了不少人。動不動就是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動不動就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是『新興資產階級』，那就祇會挫傷人的積極性，自己挖自己的牆腳。」我的講話，受到了廣大科研人員的贊同，他們認為我說出了心裏話！

為了保護知識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我還到軍事醫學科學院二所給在四清運動中被整過的知識分子開座談會。我鼓勵他們不要害怕，即使在文化革命中重提過去的問題也不要害怕，共產黨是正確的，個別辦事的人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不要與共產黨混為一談。不久，該院的病理科學家兼三〇一總醫院的病理科主任吳在東自殺身亡，我立即告訴總醫院，對吳按照一般死亡處理，不要去追究他的自殺問題，這對保護知識分子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整個文化革命中，軍事醫學科學院、解放軍總醫院對知識分子都沒有大的傷害。當然，在知識分子隊伍中，確有個別很壞的人。例如，三〇一總醫院有個心臟科專家，就是一個很壞的知識分子，政治上、道德上、作風上都很壞，但這是個別的，並不能代表整個的知識分子隊伍。

改革軍服質量和顏色

軍隊的軍服質量很低、顏色難看成了我軍上下共同關心，共同議論，共同罵人的問題。這是一個必須解決又很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一九五三年，我還在中南軍區政治部工作時，經常下部隊，我愛看愛問戰士的吃、穿、住等生活問題。有一次看到一個團的部隊集合一起看文藝節目，大家穿的衣服很難看很破舊，此事成了我的心病，久久不能忘懷。時隔六年之後，我當了總後部長，有一次我去北京衛戍區，看到部隊穿著的情況仍然很差，我心裏想：「對部隊的穿著不好，過去是心裏難過，現在應當是責任難逃了」。從此，我就認真考慮部隊的穿著問題了。

軍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布料不耐穿，染料不保色。軍裝的質量反映了我們國家當時的經濟狀況和技術水平，兩方面都有問題。前者是主要的，後者也有主觀努力的問題，但盡力而為，還是有解決好問題的希望。我決心花大力氣去解決這個問題。後勤部長不為部隊辦好事，就是「飯桶」部長了。

軍裝的布料，長時期都是用的十六磅棉布。這種布料很不耐穿。戰士每人每年發兩套單衣，一套襯衣，一套棉衣不夠穿。戰士的單衣，有的穿上兩三個月之後，就打補丁了。

棉衣的質量同單衣一樣。北方部隊一年有半年穿棉衣的時間，穿上好衣服的時間不足三個月，其餘的時間都是破爛不堪的。鬧衣服不夠穿的問題，成為當時的主要問題。部隊對軍裝的意見，有善意的，有叫苦的，謾罵的，無所不有。

六二年三月有駐山東部隊直接給周總理郵寄去一條棉褲。這條棉褲是用麻繩子串起來的，破爛的程度無法形容，棉花剩了不到四兩，補丁不計其數，各種顏色皆有。周總理把這條褲子掛在他的會議室牆上，抗美援朝時期，彭德懷拿著戰士破爛不堪衣服，曾去國務院拍過周總理的辦公桌。周總理對著這條褲子，不知說了多少次「對不起解放軍！」

軍隊軍裝的供應制度是發新收舊。收回的單衣百分之七十以上破爛不堪，褲子根本收不上來。棉衣收回來的情況，比單衣略為好些。但在修補棉衣時，也要三件以上才能拼湊修理成一件舊棉衣。

軍服的染料是土黃色，據說這種染料還是從蘇聯來的。用這種料染出的衣服，洗一次變一次顏色。而且在一件衣服之上，背上、胸前、腋下的顏色又不一樣，同在一件衣服之內顏色都是「五花八門」的。

有的部隊為了保持好的軍容，單衣總有一套「管制衣服」，這就是有一套單衣要統一穿著和下水的時間，這樣才能保持顏色大體一樣。這套衣服一般是要有一定意義的時候才能穿的，例如開軍民聯歡會、歡迎首長來到，或舉行什麼慶典，戰士們把這套衣服稱為「禮服」。

對服裝問題經過再三研究之後，下決心提高質量，穩定顏色。

第一次改革失敗了。我們的改革方案，國家紡織部不僅大力支持，而且當作自己的任務接受下來了。紡織部向我們提供了樣品：人字呢式布料和草綠染料。

「人字呢」布料不同於平布的紡織方法。布比較厚，在布的表面上有「人」字樣式的紋路。故稱「人字呢」。染料比原來綠色多一些，顏色比原來的好看一些。我們感到高興。但部隊試穿半年之後，暴露出來好多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布料不結實，顏料不保色。同原來的相比好不了多少。

在我們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困難，又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去向總理報告了。周總理聽了我的簡要報告之後，不僅沒有責怪我，反而高興地說：「你把解決服裝的問題提出來了就是好事。現在沒有搞成，明天就可能成功。我們三個人（李先念在座）共同努力，一定在最短時間之內，解決軍服問題。現在已經走出的這一步，不要後退，繼續搞下去。」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把這次搞的改革堅持下來了。

第二次改革不盡人意。爲了服裝改革我請總參謀部二部利用他們的業務關係找國外資料。他們積極行動找到了國外各種資料。我在翻閱香港一本雜誌看到了日本有關石油化工的報導。這一發現，向我們提出了一線希望，日本生產的高級衣料「的確良」就是石油化工纖維加其它材料紡織而成。

爲了研究化學纖維，成立了專門小組對日本的石油化工進行研究。專門小組拿著資料去大連石油化工研究所，這算是找到門路了。我當即撥款一萬元（當時的一萬元啊！）作爲研究費用，三個月之後，石化所研究成功了可以抽出□綸石化纖維。對此，我們同石化所的同志們是一樣的高興！

我們立即進行試織，是兩股化纖線，一股棉線合在一起織布。用這種方法織出來的布，十分令人滿意。這種布比進口的布的確稍微厚一點，但非常軟柔，著色之後很漂亮。經過不多長的時間，幾十套衣服縫製出來了。這次試穿在全訓部隊進行。

試穿的衣服，經過洗水十次水之後，毛病就出來了：三股線，由於成分不同，對顏料的汲取程度也不同，衣服有了相當明顯的花紋，很像麻布，但布的質量性能很好。這次改革雖然不算完全失敗，但也不算成功。不過我們也大膽地向部隊宣佈：兩年以後部隊就會穿上這種軍裝。

第三次改革全軍滿意。第二次改革出了「麻布」之後，我沒有放棄的念頭，指示繼續研究，這也是我們搞改革研究多數人的精神狀態。有

兩名老工人和一名搞技術的同志，共三個人，他們常說：「多做試驗不犯罪。」於是他們三個人共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兩種不同成份（口綸、棉花）的纖維混紡成紗，就像原來織平布一樣的紡織方法，進行試驗紡織。他們說幹就幹，不久「混紡」布就出來了。這種布同原來的三股線織成的布，似乎更軟柔了。

他們接著很快上顏色製成衣服，並發給工廠的搬運工人穿著，每天洗一次。經過一個月勞動的烈日暴曬，下水洗過三十次，顏色的變化不大。三人小組帶著試穿過的十套衣服和布匹，專程來北京匯報。我們聽了他們的匯報，再看實物，我們大家心裏高興的程度，真是無法形容。我除了讚揚和感謝三人小組的工作外，當即決定召集專門會議討論定案。我除了讚揚和感謝三人小組的工作外，當即決定召集專門會議討論定案。

為了鑑定「混紡布」的質量，我們召集了各種專家三十餘人，進行了充分的討論。發言的人除了讚揚軍隊的工作精神之外，從各種技術角度證明了「混紡布」是一個創舉，開闢了我們國家紡織史上的新篇章。大家一致同意，把混紡布定下來。我同意大家的意見，並拍板定案，還將這種布取名為「三元布」。

「三元布」的問題解決了，我帶著試穿過的衣服和原布料專程去向周總理匯報。總理聽了我的簡單匯報和看了實物，他除了高興和頻頻點頭之外，立即拿來了茅臺酒向我祝賀。總理說：「三元布很好，我向你祝賀！」總理又說：「我們原來定的是，我們三人共同努力，解決軍服的問題。現在你替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我向你們搞研究的全體人員祝賀。當年彭德懷拿著志願軍穿的破爛不堪的軍衣，就在這裏向我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我當時祇有忍受，別無什麼可說的。今天，我們也是在這裏在這個桌子上，看到了新軍服布料問題解決了，我感謝軍隊對國務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三元布成功了，不要多久部隊就可以穿著改革後的新軍裝了。我的心情，當然是很高興的，總後黨委個別領導人總是攻擊我「好大喜功」，這回我真要好好喜功一下了。想到部隊今後能吃得好、穿得好，我也不怕戴修正主義的帽子了。

三元布在部隊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可以毫不誇大地說：起到了改變總後形象的作用。從一九六七年冬開始，在不長的時間內，部隊師級以上幹部極大部分都穿上了三元布料的衣服。大家確實是很喜愛的。

中央機關的警衛部隊穿起了三元布的軍裝，毛主席、周總理都看到了。毛主席稱讚說：「這是總後勤部鼓足幹勁鼓出來的。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沒有幾分勁頭能辦得好嗎？」周總理對軍裝改革很清楚，當然是很稱讚的。李先念說：「軍隊的服裝改得好，邱會作爲部隊辦了這樣一件好事，值得學習、發揚。」周總理說：「邱會作很年青的時候，我就看到他是一個很能辦事的人。他確有股子牛勁。他不輕易說話，辦不到的事，從來不說；辦得到的事，是非辦到不可。」

總起來說，三元布的搞成，從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對軍隊來說是一件大事。軍隊上至統帥，下至戰士，都是稱讚和高興的。從供應工作來說，也是提高了質量，減少了數量，又不增加經費開支。

改革物資供應

我軍的實物供應，是根據國家高度的計劃而來的，我們國家從建國以來除日用品是國家專營的商品經濟之外，其他的都是計劃經濟。生產資料全部由國家統一調撥，軍隊所需用品全部要列入國家計劃，就是普通用品，如睡覺的涼席和草墊也要列入國家計劃才能解決問題。邊防和一些特殊地區的所需物資，包括香煙，甚至火柴、食油等，都是國家統一調撥的。

軍隊所需物資都是由總後各部向國務院有關部門交涉，各部門對軍隊也是很照顧的，大體上都可以解決問題。但如果不是國家的計劃指標，有時也就不能解決問題。爲了確保對軍隊的物資供應，一九六〇年一月成了總後物資計劃部，同年九月物資部一分爲二，增設第二物資計劃部，專管國防科委的物資供應。從此，軍隊的物資就統一管起來了，軍隊所需物資都列入了國家計劃，年度或季度都能得到計劃指標通知書。有了指標通知書，所需物資就如同憑票供應買日用品一樣的，除特殊情況都能取到實物。

組織實物供應是比較繁雜的。爲此，在物資部之下又在各大區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成立了物資局和若干供應站。軍隊的物資管理機構，對外一律稱「〇五」單位。從此，軍隊物資供應的組織工作就完成了。

軍隊物資供應系統建立起來之後，解決了如下問題：

第一，國家計劃掛上了鉤，軍隊成為國家計劃部門的固定戶頭。

軍隊的物資部門可以參加國家經濟部門有關的業務活動，可以瞭解全國的經濟情況，對工作和學習都是有利的。

第二，軍隊所需物資列入了國家計劃，一般的還有保證的。這樣軍隊的物資供應就可按計劃進行，對軍隊的供應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第三，軍隊的物資部門，經常要同各省市政府經濟部門打交道，這樣不僅增進了軍民關係，也能得到地方上的支援。我軍的徵購物資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各省市支援的。從徵購中可以證明，在國家高度計劃經濟的條件下，軍隊必須適應這種形勢，才能保證供應。

軍隊物資供應的第二個問題是組織生產問題。

軍隊的車輛配件和汽車零附件都是自己組織生產的。大型裝備，如飛機、船隻、坦克所用零附件，除部分小零件軍隊可以生產之外，其他的都由國防工廠擔任生產。軍隊自己有幾百個車輛工廠和修理工廠，工人幾十萬，軍隊的生產工廠比當時國務院一個中型工業部所管的工廠還要多一點。

爲了統一管理工廠，一九六五年總後原有的取緝生產部改爲工廠管理部，統一管理車輛工廠和修理工廠，這對生產起了重要作用。軍隊的工廠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工廠管理部直接管理工作，面過大，不利於對工廠的管理，爲此，總後設在各地的工廠管理局，除對工廠實施領導之外，還要向省局辦理地方供應生產物資。

軍隊的東、西和軍委三軍隊，根據軍隊的不同裝備，分別設有車輛、汽車修理和平整修理所，這三種修理所，是直接供軍隊裝備和生活服務的。這些修理所的生產所需的物資供應，當時還沒有統一的渠道，多數是由各業務部門自己去採購的。

這裏要順便說一下，在六十年代初期，軍隊的汽車自行小修，「修不外掛」，即由部隊汽車修理所自行修理，這對保證汽車完好起着重要作用。一九六五年東南沿海戰術和後來侵越的軍隊的汽車都是陸路運行修理的，在實踐中證明了一種很好的辦法。對軍隊的裝備修理一定要實行不斷結合的辦法。過去，所有裝備修理都一律送工廠，不知不覺

濟，戰時不可能，部隊如果沒有一定的修理能力，就等於部隊沒有「醫生」是一樣的。在戰時，部隊裝備一律送工廠，實際上等於減少了裝備。

我軍的營房、倉庫、機場、軍港，是最大的不動產。對這些不動產，每年的維修費用是很大的。營房、機場、軍港，過去都是歸所駐部隊管理，管理機構屬部隊的編制，即部隊駐在那裏，那裏的不動產就歸部隊使用和管理，部隊調動時，管理機構隨部隊調走。這種管理制度很不合理，不僅不利於營房、機場、軍港的建設，而且部隊調動時容易發生破壞，無人修理，造成很大的浪費，這種事例，是不勝枚舉的。

從一九六〇年以後，營房、倉庫實行基地化管理，即管理機構固定化，不隨部隊調動，部隊住營房就如同住旅館，對營房只有使用權，沒有別的權利。這種管理制度很好，是既省又好的辦法。營房實行基地化管理，又實行企業化，企業化的基本要求是管好營房、建好營區，以林業、農業、修理業為主開展生產運動。在一年至三年之內，做到營房維修部分或全部自給，這個要求有不少營區一年之內就實現了。對營房維修和營區生產所需物資，由物資部系統按計劃供應。營房管理改革後，對營房的管理加強了，比較好地解決了不動產的管理問題。

軍隊物資供應的第三個問題是發揮倉庫的作用問題。

軍隊的數以百計的倉庫，庫容數百萬噸。但我們的倉庫過去僅僅起到了貯備物資的作用，沒有起到供應的作用。倉庫的幹部和警衛分隊人數不少，但也是像老和尚看寺廟一樣的，祇是把倉庫的物資和庫房看住了而已，這種情況必須改革。軍隊的倉庫應當改為兵站倉庫，是物資的「兵站」，主要任務是三條：收集物資，保管物資，供應物資，這三項任務是統一的。

第一，起到了兵站的作用。平時對部隊的物資供應倉庫能夠直接送到師、團，甚至分隊。一九六二年後，對中印邊境反作戰，東南沿海戰備，援越部隊的供應都起到了這種作用，部隊的反映也很好。

第二，對物資保管進行了科學技術研究。倉庫防潮、防鏽、防腐爛是保管物資的大問題，也是世界各國都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我們的倉庫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以海島儲備為例，大米、餅乾等物資都能儲備相當長的時間，解決了好大的問題。

第三、各類倉庫都建立了修理所。儲備物資需要修理的，能夠及時修理，收回來的舊品，能夠翻修，或拼湊修理都能再用。例如全軍一年單衣棉衣兩種工作服，大約需要二百萬套，極大部分都是從收回來的舊軍服修理再用的。

此外，倉庫的植樹造林，農副業生產也搞得很好，不少倉庫都成了花園，從生產收益中也改善了幹部戰士的生活。總之，把倉庫改革為兵站勤務分隊，除原有的任務之外增加了供應勤務，這對戰備將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我軍平時有幾百座倉庫，戰時就成了分佈全國各地幾百個兵站，這是最為實際的戰備建設。

改革醫療衛生

我軍的醫療衛生工作是後勤工作一個重要戰線，擔負著保障全軍指戰員健康的重要任務，我軍的衛生工作歷史悠久，並有歷史連續性，在長期的鬥爭中，形成了自己的傳統。

(一) 堅持醫療衛生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大方向。我軍的衛生工作人員，長期以來都堅持了為部隊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大方向，並得到了戰士和群眾的喜愛和尊敬。

我軍同人民群眾有著密切的關係。衛生工作也常常起到了建立這種關係的重要作用，衛生工作在一定的條件下，常常成為聯繫群眾的工作。在戰爭年代，我軍新到之地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可以說有三件見面禮，這就是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助民勞動和給群眾治療疾病。在我國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能夠為群眾治病，特別是治好了病，群眾就把軍隊看成救命恩人了，這種情況，在我軍歷史上是很多的。

全國解放後，我軍的衛生工作保持了自己的光榮傳統，不少部隊派出醫療隊深入農村，駐軍也注意了為群眾治病，這就出現了好多的動人故事，例如三十八軍的模範衛生科等等。邊防、海島部隊對群眾的衛生工作，比內地部隊是做得更好的，也是應當這樣做的。我軍衛生工作同人民群眾的密切關係，應當繼續發揮，代代相傳下去。

(二) 堅持面向連隊，面向基層，面向海島，面向邊防的工作重點。軍隊衛生工作的重點應當放在哪裏，是放在醫院，還是放在部隊，曾經有過不同的看法。這兩種思想，在實際工作中統一起來了。我們說辦好

醫院和為部隊服務都是重點，但服務的內容是不同的。辦好醫院是為病人服務，而面向部隊是為部隊服務，從總體上來說，都是為部隊服務，也都是衛生工作的重點。

面向基層，並非把技術力量擺到連隊去，這樣理解也是不對的。面向連隊主要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加強部隊的衛生工作，做到部隊少發病；另一方面就是組織醫療力量輪流到部隊去為部隊解決更多的問題。各軍區組織的海上醫療隊、邊防醫療隊的做法都是很好的，為部隊解決了不少問題，受到了基層的歡迎，我們應當這樣堅持下去。

(三)加強醫院建設問題。我軍有幾百所醫院，對完成醫療任務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我軍醫院的工作，如果以上，中、下來區分的話，就是「兩頭小，中間大」，即是很好的是少數，處下等地位的也是少數，居中間地位的是多數。根據歷史的經驗，對醫院建設要抓住三個主要問題。

第一是領導班子問題。一個醫院的領導幹部，不僅要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針，更要有實幹精神，發揚「有頭腦的事務主義」在醫院是最為合適的。此外是技術力量問題，醫院是治病的，沒有一定的技術是不行的。當然，技術的高低是相對的，但不管怎麼樣，要注意技術力量的建設是肯定的，不注意技術力量建設，就是對自己的事業不負責任。

第二是反對空頭政治。曾經有一種很不正確的提法就是在知識分子中批判「白專道路」；在一般的技術人員中批判「單純技術觀點」。這兩種提法都是錯誤的，應當徹底糾正的，技術人員應當政治掛帥，但技術人員的帥旗應當掛在會治病上，除此之外的帥旗都是空頭政治。我這個人參加革命以後一半時間是搞政治工作的，我主張政治掛帥，但我又堅決反對空頭政治，空頭政治是害人誤事的。我主張技術人員要認真學習技術，現在我們部隊的衛生人員中有各種各樣的小專家，在治病方面能夠解決很多的問題，這是非常好的，應當發揚推廣。

第三是護士問題。一個醫院管理得好壞，護士是起重要作用的。我的看法：在治療方面護士是「戰士」，在醫院管理方面是「衛士」，護士在醫院是有重要作用的。在護士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應當繼續解決那些問題。

總起來說，衛生工作成功的經驗就是：加強領導，預防爲主，大搞群眾運動。我們應當把我軍衛生工作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更好的爲部隊服務。

改革財務管理

全國解放後，我軍進入現代化建設新的階段之後，在後勤中突出的矛盾就是財務管理問題。這個問題與我軍的歷史有關，我軍歷來都過的窮生活，所以領導幹部對錢對物都看得很重的，在戰爭年代，我軍皆大喜歡的是兩件大事：打勝仗，有繳獲。

過去，我軍上下之間的矛盾，表現在後勤工作中就是調錢、調物。上面調東西，下面必須服從，否則就是本位主義。在解放前，我軍都是在不同的範圍之內自籌自給解決自己的供應，部隊的生活情況根本不一样，苦樂不均是經常的現象，部隊搞本位主義，「打埋伏」早就有之，是歷史的產物。在我軍的歷史上對本位主義似乎不在乎，掛在嘴上經常檢討總也改不了，可以說，我軍沒有本位主義的領導幹部是少有的。這種本位主義是爲了本單位的工作著想的本位主義，我自己也犯過不少本位主義。

全國解放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按照財務法規各種經費開支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沒有可機動的。各大軍區和軍兵種，領導幹部能夠批條子也就是爲數很少的預備費。軍區、軍兵種首長，過去對花錢都是「說話算數，批條子有效」的，現在不行了，他們能舒服嗎？這是不可能的。新的矛盾就是一個財權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秋天，軍委舉行擴大會議的期間，一天下午散會後，幾個軍區領導把我拉去共進晚餐，他們半真半假半開玩笑地把我圍攻了一頓。他們說：「你是老政治委員，現在當了總後部長，能政治多點，制度少點嗎？」我說：「要政治也要制度。你們也知道，沒有規矩能成方圓嗎？」他們說：「方圓！我們祇有兵權，沒有財權，你知道嗎？」我說：「你們不是都有自己後勤部，怎麼沒有財權？」「我們的後勤部，是你們總後派來的大使館，我們怎能管得了。我們今天是向你提意見，你聽不進去，我們爲了要開支就給你發電報，一個不行就天天發一個，這樣的權利總有吧？」我是初上任的總後部長，那天大家提出的那些問題是給我上了一堂

很生動、很實際的大課，我認為他們向我提的那些意見，是反映了我軍的歷史情況的。

總後部長難當，我感到最頭痛的就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各軍區首長一見到我，不是諷刺就是挨罵，一句好話也沒有。另一方面，天天電報很多，都是用錢、吃飯、穿衣服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工作之後，我感到自己不是當總後部長，是在為軍區軍兵種首長當管理員，大事小事都得辦。這種情況，是管理制度造成的，讓大家牽著鼻子走，我想應該把這種情況顛倒過來，不僅不要讓別人牽著鼻子走，還要手執鞭子把別人趕著走。這就是我考慮財務改革的直接原因。

在財務管理上，我總是感到有問題，但病症在哪裏？出路就是調查研究，向實際學習。對總後具體業務，我是「半瓶子醋」都不夠，總後機關幹部對我的反映是「講道理可以，掐手指、算細賬還要學」。為了得到真正的知識，我決心向軍區軍兵種首長學習，向部隊後勤部長、處長學習。在瞭解到一定情況之後，再向財務幹部學習，並展開調查研究。部隊的領導同志說：「部隊是執行財務制度的機器，沒有辦法，有困難就寫報告。並不能發揚大家的積極性。要是把錢交給我們管，也並不一定就管不好。」部隊的後勤幹部說：「我軍的後勤財務、物資管理存在的共同問題，都是從蘇軍進口的。要改變就不是修修補補的問題，是要開刀的問題。」

我也閱讀了一些有關財務管理方面的文件、資料。我得出的初步看法是：我軍財務工作最大的問題是財權和軍政首長的領導權分離，黨委和首長對後勤工作有職有權是根本問題，後勤財務工作也應符合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分責制。總後的鼻子上安了很多的繩子，讓別人牽著走了。部隊除了牽鼻子之外，是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確實把業務工作管死了。

經過調查研究，瞭解到我軍財務制度的一些具體情況：

(一) 財務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定額開支。從小定額到大定額都有，這些定額都不是根據消耗得出來的定額，而是習慣性的。

(二) 只有大定額沒有小定額的開支。

(三) 小定額無約束力的定額開支。例如旅差費就是這種開支。旅差費如同辦公費也是按照機關等級規定定額的。規定了出差人的坐車等

級，伙食補助標準等，這種標準並非是計算定額開支的根據。例如一個團可以是十人次出差，也可以是五十人次出差，出差人數之多少，並不一定影響定額規定。為什麼旅差費是超支最多的費用？這也是從財務管理制度而來的。這種費用祇規定了出差人員的待遇，並沒有規定出差人數，各單位祇是考慮工作上的需要派人出差，並不考慮開支的問題。但是，如果既規定出差人員的待遇，又規定旅差費定額，同時還要規定旅差費節省歸單位轉為下年度使用，這樣，就可基本不超支，甚至還可以有節餘。

(四)在年終為什麼會出現突擊花錢，這也是從財務管理制度而來的。在制度規定上，行政費年終節餘要上交，在這種情況下，上交和花了都一樣，但與單位的利益聯繫起來，還是花了為好。如果在制度規定上，節餘可以歸單位所有，轉為下年度使用，極大可能就不會突擊花了。

根據對上面分析，財務制度存在的問題，是從「科學」管理而來的，但科學的進程總是有時代性的，超前的科學是行不通的，後勤工作在一個歷史時期內最科學的制度就是「馬虎」（實行包干，大錢嚴管，具體不要摳的太細）。

實行財務包干制。經費是分配的基礎，制度是分配的方法。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越實行過細的制度越感到不夠，實行包干的「切塊」制度反而可以解決問題，這樣就可以實行大家有權大家負責，全軍辦後勤，不會把困難集中在總後勤部這一點上。

實行包干制的辦法很簡單，主要是三個問題。

(一)把經費分為實報實銷和包干報銷兩大類。人員生活費，牲口飼養費，戰備費為一類；各種行政、專業費為一類。第二類，科目繁多，但可以歸並為三大項：行政費，事業費，臨時費。這些費用，除臨時費沒有定額規定之外，其餘都有規定，規定本身就是報銷的依據。

(二)由總後勤部到團一級，實行層層包干。機關和院校怎樣包干法，由各大單位自行規定，但絕對不許可把經費按人頭分配到科處室和個人手上。

(三)實行包干的經費，節餘歸單位轉為下年開支，絕對不許可把節省費用分給個人。在一個單位之內，各種經費可以調劑使用。在一般情況下，超支經費不予報銷。

包干制是財務管理的一種方法，與供應標準不可混爲一談。例如，人員旅差的乘車標準和旅差費都要按標準執行，不可因爲旅差費包干了，就任意隨便開支。如果因爲經費包干了就隨便開支，是違犯財經紀律的，是要受到法紀處罰的。

包干制是一九六四年從旅差費開始的，然後才普及到其他各種費用。包干制的優點，我在這裏不再多說，但我記得一點是：大大地節約了開支。我還記得一九六四年瀋陽軍區節約的數字是可觀的。

實行包干制以後的報銷方法，很多費用都可以改爲以領代報。一九六一年林總去廣東汕頭觀察工作，回程到惠陽四十二軍軍部，同軍的首長談到要減少連隊的繁瑣工作時，專門談到了減輕司務長的工作。他隨即用鉛筆劃了一張連隊司務長「以領代報」的報銷表。我看到過那張表，是鉛筆劃的，線條很粗。林總是我軍唯一從排長、連長逐級提拔起來的元帥。他是很熟悉連隊的。他能劃出一張這樣的表，正是對基層工作的總結。

經過前後將近半年的時間，對改革財務管理制度心裏有了一些底。我把財務改革的問題準備就緒之後，最初接觸的就是當時的財務部長湯平。他由於沒有思想準備，我們的談話，使他震驚不小。我們連續談了三個晚上，第一個晚上，他不說話，表現心情沉重。第二個晚上，他向我問了好多問題我都一一給了答覆。第三個晚上，他面帶笑容說話了。湯平說了三點。一、他很慚愧，過去我批評財務部就是「數字部」，今天才真正接受；二、他對我提出的財務改革，全部佩服，並稱讚我是管錢的高手；三、他完全站在我一邊，並承擔改革的全部具體工作。我們之間有了共同語言了。經過他向財務部進行動員，大家認識一致了，領導財務改革的力量加強了。

我把財務戰線上的工作做好之後，就向總後的領導幹部做工作了。我把財務戰線上的工作做好之後，就向總後的領導幹部做工作了。我對財務改革的問題，遇到了一些人的強烈抵制，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我軍從來沒有實行過什麼包干制；現行的財務管理制度，是他們制定的，不能改；要是搞財務包干，他們就沒有什麼工作可做了。對財務改革的問題，在總後機關鬧得很熱鬧，正確的東西，總是越辯越清楚，經過各種方式在總後機關鬧得很熱鬧，正確的東西，總是越辯越清楚，經過各種方式各方面的思想都基本統一了，財務包干制定下來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軍後勤工作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討論財務包干制。這個制度一出臺，就得到了各軍區各軍兵種後勤部長的熱烈擁護，大家一致贊同財務包干制。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財務包干制，不僅解決了財務管理本身的問題，而且解決了後勤工作同各方面的關係問題，特別解決了各級後勤同同級黨委和首長的關係問題。這個制度適應我軍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

軍政首長對財務包干制是喜多憂少。他們說：「財務包干制，是把責任交給我們了，我們要把事辦好。過去，沒有錢可以寫報告，今後寫報告也難辦了。」有的也說：「財務包干就是把困難下放，我們當然祇有把困難承擔起來。比較起來，這樣辦比過去辦法還好些，我們主動了，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總的說起來，財務包干制是成功的。我對後勤工作得出了三條主要經驗，第一條要有黨委的真正領導；第二條要有全軍領導幹部的熱情支持；第三條要把改善戰士生活成爲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屬點。這三條歸結到一點就是：全軍辦後勤。

第十八章 軍隊農副業生產

三年災害對軍隊的影響

一九五九年開始，全國連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對災情可能給部隊帶來的危害和影響我是特別警惕，力求防止軍隊餓肚子，發生浮腫病，在困難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保持軍隊的戰鬥力。軍隊搞農副業生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我參加過全國救災的領導工作，對這次遍及全國的自然災害，從局部到全國的情況，都有所瞭解。農村是天災人禍都有，兩者是夾在一起的，自然災害是基本的，由於工作做得不好，沒有及時有效救災，以至發生災上加災。

這裏，我不去說災害的一般情況，祇說周總理要我處理的有關災情的幾件事，就可見一斑了，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廣西餓死人的情況。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領四十五軍參加解放廣西的，在廣西剿匪的整個戰役中，我又同他們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時間。一九六〇年五月間廣西橫縣的駐軍給我發了一個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飢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幾萬斤，我特將電報呈周總理批示，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總理讓我親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廣西貴縣由駐軍派車到橫縣去的，在隨行卡車上帶有數千斤糧食。我到達橫縣時，正是群眾做晚飯的時候，但所看到的情況是有些淒涼，家裏冒煙的都很少。我見到縣委書記的時候，他躺在床上起不來了，祇是有氣無力地向我作揖流淚，他祇伸出四個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沒有吃飯了。我立即要人去車上搬下糧食，熬了兩三鍋稀飯，並端給他們每人一碗。多數人喝了稀飯之後不久，就能坐起來說話了。

由於周總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區黨委聯繫，也不公開露面，祇是親眼看一下情況。第二天，縣委書記的身體繼續好轉，我同駐軍的師政委和縣委書記三人到城外附近的各村莊看了一下。幾乎村村都有餓死人的，每家每戶家裏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數都是青菜葉、樹葉，一粒米也看不到。我問：「你們家的糧食哪裏去了？」他們回答說：「我們家裏就沒有放過糧食，收到的糧食都交給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們又問：「現在食堂還管飯嗎？」回答說：「要有人管飯，就不會餓成這個樣子了。」

當天的晚上，縣委書記和其他幾個幹部同我們談了全縣的災荒情況。他們說：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情況，全縣餓死的人，大約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還在死人，數字很難掌握得準確。我問縣委書記，你們爲什麼不報告，不想辦法搞糧救災，連黨政機關都餓死人了！縣委書記以沉重的心情說，我們縣是一九五八年的「衛星縣」，宣佈糧食增產一倍，一年產的糧食夠三年吃，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體吃飯，無計劃、無節制，今年的春節期間就把糧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面不准我們報災情，說是要保護「衛星縣」的名譽；全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產隊確實是豐產了，豐收的生產隊現在都戒備森嚴，不准向外運糧。食，爲了糧食的問題，已經有些生產隊之間進行械鬥，根本不會互救。

我們向縣委書記提出：應當立即向地委如實報告災情，不要再保留「衛星縣」的虛名了，否則就要犯大罪了。由於我的目的是瞭解情況，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第二個例子，一九六一年冬，空軍作爲一個社情，報告了甘肅河西走廊玉門地區的災情很嚴重。周總理又叫我立即去看一下，並當面交代由軍糧撥出五萬斤，調幾臺汽車，把糧食直接送到村子裏去。總理說：「爭取時間，實行緊急救災，把口糧早一天送到，就要少死好多人。」我把周總理的命令直接下到兵站去了，並要他們星夜兼程把糧食送到安西敦煌去，由汽車團派副團長帶隊，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到達了指定地區。對此，周總理非常滿意。

玉門、酒泉地區發生了這樣嚴重的災情，死人估計上萬。對此，甘肅省委一個字的報告也沒有，周總理追問也回答不出一個所以然。總理是不愛生氣的人也生氣了，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周總理向毛主席作了

比較詳細的報告，毛主席立即調省委書記到北京，向中央報告全省的災情，爲了此事，張仲良也就下臺了。

第三個例子，國務院直接發放鋤草糧。一九六二年吉林省進入夏鋤的時候，祇鋤完了第一遍草，第二遍就不能進行了。因爲農民沒有口糧，必須自己上山下河採野食，度過災荒。在周總理的辦公室，吉林就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給一千萬斤糧食，全省主要產糧區，鋤第二遍草，有的鋤第三遍，今年可增產糧食十億斤以上，這是一個公私都有利的大事。

對吉林提出的問題，在會上周總理沉思沒有輕易表態。過了一會兒總理對著我說：「會作呀，怎麼辦？有辦法嗎？」我瞭解總理處理問題方法，如果他對我不是胸有成竹，就不會向軍隊開口的。我對總理的問話立即回答說：「軍隊借出一千萬斤糧食，但在秋後要歸還，這樣就完全不影響軍隊的供應。」

我的幾句話，周總理立即轉憂爲喜，並連說：「好，好！總後對國務院是很大的支持。」吉林的同志聽到我的話，尤其聽到總理同意向軍隊借糧的話高興的簡直要跳起來！問題解決了。周總理指示給到會的人，每人上了一包餅乾，一碗湯麵條，大家都吃了夜餐才散會。

黑龍江知道吉林經周總理批准，向軍隊借到了糧食，他們也找到國務院去了。周總理批准，也借給該省部分糧食，兩省的夏鋤沒有吃的問題都解決了。

在三年災害的時候，我參加周總理主持的救災工作祇是部分的。我認爲用舉例的辦法來說明情況，比抽象的總結能夠比較好的說明問題。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人禍天災，是全國性的，總的情況是北方嚴重些，南方稍微好些。災情並非全國一律「赤地千里」，那爲什麼抗災這兩股風之外，也還有工作上的問題。

浮誇風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我們國家農業確實是豐收了，是解放以來最好的年成。那麼糧食又哪裏去了？去路主要是三條：一是沒有收起頭來，地裏糧食長得好，但是顆粒還家之類的口號連說都沒有人說了，四腦發熱，認爲糧食吃不了，據事後推算，全國掉在地裏的糧食平均在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敞開吃吃掉了，當時全國很多地方都吃食堂，都放開肚

皮吃飯，一般的要比在家多吃二分之一以上；三是飼料糧過多，用糧食餵豬，喂大牲口，是普遍現象，家禽則根本不愁沒有吃的，這三條都是「人禍」問題了。

一九五八年全國糧食產量究竟多少，這是神仙也說不清楚的問題。從中央到公社的會計都是「豐收」二字。一九五九年全國糧食就減產了，但究竟減到什麼程度，也是神仙都說不清楚的問題，浮誇風、假話風害死人。

本位主義害死人。在一個省，一個縣之內，對於缺糧情況，如果能及時調劑，近水可救火，可以解決很大問題。但在「恐糧病」的情況，要調劑糧食實在是太難了，極大多數地方則根本不可能辦到。

除「兩股風」之外，還有工作上的問題，例如存糧情況究竟怎樣？很難搞得清楚。又如運輸條件也是很大的問題，農村有糧要運到鐵路線是很困難的。當時，不少農村連公路都沒有，人力運輸往返消耗的數量就很大，北方有糧運不出來，南方可調劑一些糧食也存在運輸困難的問題。

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從一九六〇年春起，部隊生活開始緊張了。憑證領不到東西，已經習慣按供應標準過日子，突然來個不能保證供給，對我軍是個致命的問題。這就是自然災害對軍隊影響的實質問題。

三年災害對我軍的影響，由雜糧代替細糧，憑票買不到東西，有錢買不到蔬菜成了普遍的問題。部隊報告很多例子，但誰也提不出怎樣解決問題。這裏我回憶三個例子，來說明當時部隊生活的緊張程度。

地瓜乾。一九六一年夏天駐山東的部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乾，有時一個星期也領不到一顆糧食，這種地瓜乾又是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存下來的，原來根本不是當口糧的，而是做豬飼料，多數都是有霉點的，吃這種地瓜苦得難以下嚥。膠東還是山東比較好的地方，部隊都得不到糧食供應，駐該省其他地方的部隊就更困難了。

雜質面。一九六一年秋駐河南周口的部隊吃的麵粉，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有雜質，樹葉、草、麥桿等都有。這種面就像麥麩子拌乾草喂牲口吃的細料差不多，河南周口是比較好的地方，對部隊供應的糧食都是如此之差，駐其他地方部隊吃的糧食就可想而知了。

砂子米。一九六一年駐四川綿陽部隊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殼，砂子，泥土等，駐在天府之國的部隊都吃這樣的糧食，真是令人不可想像的事。

這裏回憶的三個例子，是我親自在部隊看到的，同部隊一起吃過這種糧食做的飯。這樣做是糧食不夠充數而爲的，部隊的糧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東西，每天每人真正下肚的糧食也就是一斤多一點。戰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見天吃這種飯能行嗎？糧不夠瓜菜代，當然是出路，但部隊哪有瓜菜？

部隊除了乾巴巴地吃一斤多糧食之外，蔬菜，肉食，食油都沒有，多數部隊一年也嘗不到幾次肉味。自己沒有生產，憑票證領不到東西，這種生活不能長期下去。軍隊困難，國家也困難，看到總理那憂慮、疲憊的面孔，向國家要糧我是張不開口的，爲了不「自取滅亡」，必須自己動手解決問題。

生產渡荒

自然災害對軍隊的影響確是嚴重的。怎樣辦？出路祇有一條，就是軍隊自己動手搞農副業生產渡過災荒。軍隊現在搞生產，同一九四二年延安的軍隊搞大生產，時代背景是不同的，但也有共同點，都是逼出來的。延安搞生產是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沒有飯吃逼出來的，現在搞生產是自然災害逼出來，不管願意不願意，搞生產這座「梁山」是非上不可的。

對軍隊一定要走生產渡荒的道路，多數領導幹部的認識過程是比較長。因此，軍隊搞生產的阻力是很大的。以我的記憶，軍隊對搞生產是經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兩年的時間才逐漸統一起來的。

阻力之一是軍隊搞生產會衝擊突出政治。一九六〇年冬，快要過元旦的時候，軍委舉行常委會，羅瑞卿向常委匯報了全國的災情和經濟形勢。最後，羅瑞卿說：「災情對軍隊供應影響不小，請邱會作同志說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我非常珍視這一發言機會，不誇大也不縮小，如實地把軍隊的供應情況，發表了意見。我說：「軍隊還是按照標準供應，但地方並不能保證供應。有的地方供應的糧食，一半以上是地瓜乾，有的地方糧食很不

好，個別地方無糧供應，憑證買不到肉食和食油，蔬菜也很難買到。全國的供應情況都不好，部隊生活比較緊張。

賀龍元帥主持會議，他對著我說：「邱部長，怎麼辦呀？我相信你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你說說這方面的問題。」我立即回答說：「自己動手搞生產，別無他法。」我的話音一落，主管軍隊政治教育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說：「歷史上的教訓值得注意。林總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軍路線在部隊剛形成勢頭，又要去搞生產？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軍隊的供應，當然是重要的，這就不能向國務院提出來解決問題嗎？軍隊搞生產是牽動建軍方針的問題。」對劉志堅的意見，我祇說了一句：「戰士的肚皮最重要。」在當時的情況下，劉的意見是很吃得開的，會場上，對我和劉的意見都無人表態，我心裏想：這可給軍委出了一個難題。這時羅瑞卿用請示的語氣向賀帥說：「我的意見，由邱部長起草用軍委名義向總理寫個報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賀點頭同意羅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我有意不把問題提的過於尖銳，否則阻力會越來越大，不利於解決問題。因此，這次的軍委常委會上，對部隊搞生產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阻力之二是軍隊搞生產會妨礙軍事訓練。一九六〇年夏天，駐膠東部隊要搞一個月的游泳訓練，要求每人每天補助訓練糧一斤，看到這個報告之後，我認為這是解決軍隊搞生產會衝擊軍事訓練的突破口。

針對濟南軍區的報告，我起草了一份復電：「同意給游泳訓練部隊每人每天補助訓練糧一斤，由總後發給糧票。希望你們同山東省特別交涉，以求得到供應現糧」。電報是用總參、總後的名義起草的，我把來電和復電一起送給羅總長了。羅批示：提交軍委辦公會議討論，第二天軍委辦公會議開會，羅總長一進門尚未坐下就對主管軍事訓練的副總長張宗遜說：「宗遜，全國到處都餓死人，游泳訓練還要增定量呀？」張宗遜說：「可以考慮不訓了！」羅總長對著我說：「老邱，有辦法吧？」我說：「我沒辦法。請總長決定！」羅瑞卿：「你是沒辦法的人嗎？周總理說你是最有辦法的人之一。你不是向總理提議，全國基本建設，不分大小，一律『剃光頭』？」

接著羅總長用一種比較溫和的語氣說：我國的災情確實是預料之外的嚴重。在平常的時候，補助訓練糧的問題，邱部長早就處理了，不會

送到我這裏來的。我看訓練照樣進行，可以改每天訓練半天，以保持體力，另外，用多餘的時間，部隊自己動手搞代食品，以補助糧食不足。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最好的處理辦法。我心裏感到高興，部隊生產會妨礙軍事訓練的阻力，事實上就衝破了！

阻力之三是部隊不願意搞生產。一九四九年我軍南下時，中央曾經提出：人民解放軍是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但對生產隊的問題，我軍從來也沒有進行過教育，其實，我軍祇有不願意搞生產的領導幹部，不可能有不願意搞生產的部隊。部隊不願意搞生產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教育，把生產同部隊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解決問題，這樣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對怎樣解決部隊渡過災荒的問題，我認為從自己這個總後勤部長的職責來說，不僅要向中央軍委報告情況，而且要提出解決問題的積極辦法來。我自己下定決心，要做一個稱職的總後勤部長，要認真解決部隊的生活，要拿出魄力來進行鬥爭。

於是，一九六一年一月間，我在河北、遼寧西部、冀東、天津地區走了好多的部隊，並在天津的一個團蹲下來了。經過調查研究，向軍委寫了簡要報告，並代軍委起草了一個文件，於二月間，春節除夕之夜回到北京，並在當晚就把文件送給羅總長了。向軍委的報告，我主要寫到了部隊供應的嚴重情況和部隊一定要自己動手搞生產的建議。在報告中指出：我親自看了一下駐石家莊、錦州、冀東、天津部隊的供應情況，一、糧食還可以按標準供應，但雜糧多；二、肉食和食油停止了供應的時間至少在三個月以上；三、蔬菜根本買不到。這次我在河北，遼寧都同地方政府商量過對部隊供應的問題，也親自去各地糧庫看了一下，糧庫基本上都是空的。用錢買不到任何東西是普遍的問題，省、地、縣的幹部都說：軍民是一家人，我們從良心上、責任上都要負責軍隊的供應，但又是實在沒有辦法了。

我代軍委起草的電文之中指出：部隊的供應出現嚴重的問題情況，政府對部隊按照標準供應都不能保證。在全國災情嚴重的情況下，軍隊也絕對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任何額外要求，軍隊祇有自己動手搞生產來保證自己的供應，我們一定要用生產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以保證部隊的戰鬥力。今年開春在即，各部隊要立即佈置搞生產，把政治教育、軍事訓練、農副業生產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隊的農副業生產，從自己當地的條

件出發，以種菜、養豬，小規模種糧開始。全軍各級黨委要從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認識到軍隊搞生產的重大意義。

我的調查報告和代軍委起草的電文送上去之後，我預料到在春節四天假期之內是不可能開會討論的，這樣大的問題，羅一個人也不會批發的。但到了春節後第五天、第六天還沒有討論，我著急了。我在電話上詢問蕭向榮，他說：「值班秘書作為急件，放在急辦的夾子之內，已經一個星期了，羅總長還沒有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於春節後的第七天，我派人搭乘空軍的飛機把文件送到廣州林總那裏去了，林彪當時在廣州。當天晚上，林總直接同我通了電話，他在電話上對我說：「送來的文件收到，你的報告和起草的電文都很好。你抓住了大問題。軍委明天開常委會，你的報告會批准的。」這下我心中有數了，我心裏十分高興！

春節後的第八天，軍委舉行常委會專門討論軍隊搞生產問題，即討論我提出的報告和建議。羅總長走進會場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即想到可能是我把文件報到林總那裏去，引起了他的不高興。會議開始時，各位元帥在發言中都一致同意我的報告和起草的電文，發言的多數人也說到了，軍隊自己搞生產是唯一的出路，邱會作同志很好地抓住了大問題。羅總長並沒有問到會的人還有什麼意見，就宣佈：「邱會作起草的報告和電文壓在我這裏好幾天了，耽誤了時間，由我負責。」同時就宣佈散會。

會議之後，羅把我留下來談了兩個問題。首先，羅問：「你同林總打電話，還談到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林總祇是說，要我不要過於著急，我的報告會得到批准的。」接著我又說，林總在電話上說：「我的報告和代軍委起草的電文都是很好的，所提辦法也很好，抓住了解決困難的大問題。」此時，羅的表情有些喜悅了。羅接著又說：「林總在電話上，同你說過的話，也同我說了。此外，林總還同我說了一句可能沒有同你說的話，要我重視你的意見。這幾個月來，我們合作得很好嘛。」我祇回答了一句話：「我堅決服從羅總長的領導！」

羅又問：「你發了一個什麼通報？楊勇打電話說，你提出了人吃稻草的辦法。」我回答說：「吃稻草，言過其實，我發了通報，可以在稻草上提取澱粉。」今年一月初，我在天津一個團裏同他們交談搞代食品時，有人提出了在稻草提取澱粉的意見。首先，將稻草用械具砸碎，泡到水裏兩天草粉就可以分離出來。每百斤稻草可以出七斤粗粉。我說：「這個方法

可以。長征路上我們也從草裏提取過澱粉。」說完我叫人把提取的澱粉煮成糊糊，我帶頭吃了幾大口。

接著我就簡單說了一下，我去天津觀看稻草提取澱粉的情況。聽後羅總長笑了起來，並說：「大家一起努力，就是對我的工作最大支持。應當告訴全軍部隊都要因地制宜注意搞代食品，做到能吃飽肚子。當然，在吃的時候，要特別注意防止中毒。」我把羅的指示轉發了全軍。

軍委關於搞農副業生產的電文發出之後，對搞生產就算「立法」了，我們的工作也「註冊」了，這解決了一個好大的問題，可以說是救了幾百萬軍隊的大問題。各軍區，各軍兵種接到軍隊搞生產的電文之後，都向軍委發了擁護搞生產的表態性報告。

對軍隊搞生產，我的指導思想是：搞生產是我軍的光榮傳統之一，這不是課餘的副業，應當是軍隊的任務，是堂堂正正的正業。後勤機關應當做好搞生產的組織工作，更多做實事，力爭做出成績來。

軍隊生產以「副」業起家

縱觀軍隊搞農副業生產的歷史，就是一部鬥爭的歷史，全軍的生產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的時間裏，軍隊生產是搞農副業生產，可以稱之爲以「副」業起家。這是生產的第一階段。一九六一年，軍委發出了電文指示，全軍都要執行農副業生產，生產時間由部隊自己安排，但主要的是在操課之外的時間進行。生產項目以種菜、養豬爲主，以求得迅速解決部隊的副食供應，切實解決長期不見「油水」的生活。

軍隊搞生產，對後勤工作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特點是：後勤工作成了國家經濟工作的一部分，要以經濟工作的方法來管理後勤工作。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全體後勤人員的主要任務，是學會做經濟工作，在當前我們就要通過領導組織全軍生產的實踐，來提高我們的思想認識和辦事能力。軍隊搞生產，後勤部門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就是當好參謀，負起責任。這就是說軍隊生產是部隊的行動，其決定權是屬於各部隊黨委和首長，但決定之後，主辦是後勤，責任也落到後勤了。

當時，我向全軍後勤人員提出：鼓足幹勁，負起責任，深入實際，總結經驗，把生產搞好。我們一定要發揚我軍後勤工作的光榮傳統，責

獻我們聰明才智，為全軍渡過災荒努力奮鬥。在軍委搞生產的統一號令之下，全軍都行動起來了。同長征過草地一樣的，千軍萬馬自己動手搞飯吃。第一，全軍大搞代食品，以解決迫切的不夠吃的問題。搞代食品，是動手即可獲益的勞動，對這種比較容易搞，可以解決迫切問題的勞動，部隊是喜歡搞的，如搞木耳和蘑菇。第二，全軍大搞種菜養豬。第三，部隊的農場生產。全軍除了業餘生產之外，也注意到了農場的生產問題，當時，部隊都稱之為大生產。

連隊業餘生產搞起來之後，從一九六一年夏季開始部隊填飽肚子就基本上解決了問題。特別是秋收之後，基本上解決了吃不飽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不僅改善了部隊的生活，也解決了繼續生產的積極性問題。但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各種問題也出來了，主要對搞生產有臨時觀點。

對軍隊的生產有兩個前途：穩步發展起來，成為軍隊的財富；逐步下降，慢慢取消了。我們爭取第一個前途。這主要靠軍委決策的力量，減少空頭政治阻礙的力量，加強後勤部門組織領導的力量。軍委內部對搞生產都是支持的，但當時空喊「突出政治」的口號喊得也很響。「突出政治」和「空頭政治」完全是兩回事，減少空頭政治的阻力，是最嚴重的問題，搞空頭政治在我軍是不可估計的力量，這種力量是由人的因素決定的，有些人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建軍路線的高度，突出空頭政治也有強大的組織力量，因此突出空頭政治是整人的手段。我軍的政治工作，有提高人的思想覺悟的好傳統，也有整人的壞傳統，有的人對突出空頭政治祇要眨個眼，搖個頭，都有大禍臨頭，甚至滅頂之災的可能，這是極大多數人不敢碰的禁區。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空頭政治壓倒生產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另外，部隊對搞空頭政治並不感興趣，相比之下願意搞生產。

至於我個人，對搞生產是決心負責到底的，在搞生產的問題上，同空頭政治鬥爭，不怕挨整。軍隊搞生產之後，專講空話的空氣有些變化，這種變化的情況是，突出政治要落到實處的講法多起來了。這裏，我不泛泛的談論這個問題，祇談還記得起來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某軍舉行軍生產會議，請軍政治部主任去講話。軍政治部主任說：搞生產是兩條建軍路線的尖銳鬥爭，搞生產比單純軍事觀點

還嚴重，優裕的物質生活是修正主義的溫床。大家當場反擊了軍政治部主任的講話，指出他的講話不僅是反對生產的問題，而且是把矛頭向上的問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某主任當面下不了臺。

第二個例子，步兵某團有四個連的部隊在西南邊境農場搞生產。團政治處主任公開號召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搞好生產上，生產開始之時，他在動員會上說：「生產部隊要堅持突出政治，這是根本問題。突出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落實到完成生產任務上去，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突出政治就沒有目的了。」這個政治處主任被別人打了小報告，接著也就以「深造」為由調去上學了。

總政治部某些人，創造的空頭政治特點是：爲政治而政治，會講空話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極力迴避政治的真實含義。他們從來不會說，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戰鬥、工作、生產中去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光榮傳統，搞空頭政治的人，正是舉著這面大旗做虎皮，在裝腔作勢嚇唬人。

軍隊生產以「自」業傳家

軍隊的農副業生產，從一九六四年以後就轉爲搞生產基本建設爲主了。從一九六一年開始，祇要把這些家產建設得好，就可以代代相傳。

軍隊有大量的農場。這些大小不等的農場，有數以千計，耕地面積可能有五百萬畝。凡是比較大型的農場，都是自己新建的，例如廣東汕頭牛田洋農場是圍海的。

軍隊凡是條件比較好的農場，都建設得比較好。第一，對農場都下了大功夫搞農田基本建設。土地平整，道路和收割場地等都配套齊全，基本上實現了田園化。第二，水利灌溉條件比較好。第三，基本上實行了機械化。這種農場，一年祇有播種（插秧），鋤草，收割三個季節需要比較多的勞動力，平時祇需少數人管理就行了。建設好了的農場所需勞動力是越來越少了。

連隊的生產建設是以保證自己的生活進行建設的。全軍極大多數連隊都有了一塊菜地，一個豬圈，一個作坊。這裏簡要回憶我自己親自看過的幾個連隊，就可以看到全軍的一般情況了。

(一)遼寧南部的一個連隊。一九六四年十月間，我們進到連隊之後，我就信步走進了連隊的伙房。進去之後，真是使我大吃一驚！伙房的貯藏室，不僅米面滿缸，食油滿桶，雞蛋一大筐子，豬肉一大盆，各種蔬菜應有盡有。不到一個小時，就給我們開飯了，那天是週末，連隊改善伙食，主食是烙餅和麵條，副食有一大盆豬肉炒辣子，一大盆炒雞蛋，一大盆炒蔬菜，一大盆豆腐燉西紅柿，我們根本吃不完。他們還想挖一個小魚塘，養上魚生活就更豐富了。

(二)海南島一個海防連隊。這個島離榆林港大約祇有十海里，駐在島上的部隊是以任務定編的，全連不足百人。部隊因地制宜搞生產，雞、羊完全各自吃野食，自生自長，要吃雞蛋，上山隨便拾就是了，石巖裏、路旁邊隨地都是雞蛋。想吃雞等晚上，拿著手電筒去捉，用手電一照雞就不動了，要大要小隨便挑選就是了。羊群更有意思，戰士們祇要發出一種哨子音，全島的羊都全自動「集合點名」，到時候，該判誰「死刑」都是可以的。連隊給我們表演了一次，戰士出去發出哨音，約半小時左右，連部門口就集合了黑呼呼的活蹦亂跳一群山羊。

爲了在島上種菜，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了一小塊不足一畝的菜地。這塊菜地是先造出一塊平地出來，然後就向平地上填土，島上自身的土不夠，就由大陸上運來，幹部、戰士探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從陸地上帶一包土回到島上，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把菜地裏的土壤有一尺多厚。由於淡水不夠，又自己動手造了一口大蓄水池，這樣就自己種菜了。這個守島連隊，經過自己的艱苦努力，搞好了生產建設，自己的生活就完全有保障了。

(三)雲南邊防一個連隊。這個連隊是西盟佤山中部邊境一個以任務定編的大連隊。全連有一百六十餘人。這個連隊所處的生產條件是得天独厚的，土地多，氣候好，一年可種兩季糧食，常年都可種菜。該連養了一群羊，可能有近百隻，該連還有一個大豬圈，存欄豬經常有三十頭左右。駐在西盟佤山上的這個連隊是個老連隊，在那裏多年了，這裏要加以說明的是，該連也是害過「恐餓病」的。難道過去他們就不知道地裏可以長莊稼嗎？當然不是的，而是種莊稼要受批判，過去他們隨便種點蔬菜，或幾個南瓜都是不許可的。上面政治機關來的工作組，經常批判連

隊搞生產，說不注意思想純潔，祇注意物質生活，前途就是修正主義。搞空頭政治的人是一夥蠢豬，連什麼是修正主義都不懂，真可憐！

我軍所有連隊都有自己規模不同的生產建設，全軍又有數以千計的農場，這是我軍一項很大的財富，也是我軍後勤工作注重生產的主要依據。古今中外軍隊的後勤工作都是懶懶散散，吃吃喝喝的，平庸形象很普遍，在士兵和群眾中的影響並不好。但是我軍自己搞生產，參加經濟建設，把後勤工作與國家的經濟工作結合在一起之後，後勤工作的社會地位提高了。

在這裏還可以順便講一下，我軍創造四好連隊時，「四好」的形成過程。四好連隊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這是經過反覆研究才形成的。開始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出過若干個好，就是沒有提出過連隊生活問題。在軍委辦公會議談論這個問題時，我提出過要把有關連隊生活的問題上也加去。蕭華說了一句：「把做飯好也寫上？」劉志堅補了一句：「炒菜好也加上？」很顯然，他們的話對我有諷刺之意，我沒有多加思考立即反擊就說：「兩位主任的指示十分精彩，應當在《解放軍報》上發表出去。」接著，正式討論時，我又提出：創造四好連隊，要有生活方面的內容。羅總長表示同意我的意見。在四好連隊「四好」中，有「生活管理好」就是這樣來的。後來，林總說：在創造四好連隊中，生活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就把連隊的「生活管理好」納入四好之內了，連隊工作也就全面了。

全軍農副業發展起來了，自己是消耗不完的，必須找到出路。另外，當時國家的食品工業還很不發達，各種副食品加工工業銷路都很好，因此，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工業是利軍利民的事業。

軍隊的農副產品加工工業發展很快，各種大小的加工工廠已經發展到數以千計，各種糧食和副食都可以加工成成品。我記得糧食加工品、肉食加工品、鮮菜加工品，多數部隊都可進行生產，例如壓縮乾糧，脫水菜，過去要專門工廠進行加工，現在部隊自己就可以加工了，而且質量都很好。

部隊的農副產品加工的同時，還因地制宜地發展了一些出口產品和特種產品的生產。

第一個例子，種香茅草。在南方特別在海南島可以種植香茅草，這是做高級香水的最好原料，這也是一種出口的高價原料。這種原料很容易生產，在路邊地頭都可以種植。

第二個例子，種木薯。在兩廣多數地區可以生長的高產木薯，房屋前後，路旁地角都可以種植。這種薯類除了可以做澱粉之外，還可以做豬飼料，也可以代人口糧，連隊祇要種上就有收成。

第三個例子，種蓖麻。這是一種全國到處都可以種的作物，路旁、田邊、地角都可以種，是一種高產植物。其用途主要是用來做機器潤滑油，也可以用來做肥皂，當時是一種用途很廣的原料。

部隊所需物品是多種多樣的，不少也是自己動手可以解決問題，這裏祇說部隊自己動手解決了的幾個問題。

第一，做草墊子。部隊過冬每人都需要一個草墊子，特別是北方部隊是不可少的。這種物品，過去需要通過國家計委下達計劃到各省統一收購，並由總後軍需部統一供應。草墊子的收購費加上運輸費，在當時每個就不是幾毛錢可以購到。為了鼓勵部隊搞生產，在供應標準上，由供應實物，改為供應費用。這樣部隊獲利，總後則可減少了工作量，也減少了開支。

第二，打馬草。部隊所需馬草數量很大，駐有團級部隊單位以上的地方都有牲口，都需要馬草，部隊所需飼草都由部隊在當地購用，少數不出草的地方，還要調運。後來，由部隊打馬草，解決自己的問題。每年到了秋收打草季節，部隊都要用一定的時間打三草：墊草，馬草，豬草。

第三，維修營房營具。營房和營具經常有小的維修，一定時間之內還有大的維修。過去，所有維修業務都請各種工匠進行，要花費很大的費用。後來改為部隊自己維修，費用改為部隊的生產費，這樣對營房和各種營具的維修能及時進行。

第四，修理生活用品。部隊的生活用品很多，如炊事用品，還有一些公用品等。過去，對這些用品的修理都要拿到市鎮去修理才能解決問題，後來改為自己修理，既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又增加了生產自給這項勞動，不少單位都是組織隨軍家屬擔任的。

部隊的生產，當時限制在種和養兩個方面，商業是禁區。種和養都是「生財」，對部隊生活有直接的利益，對國家也是有利的。商業是「分財」，這對部隊經濟收入有利，但對部隊建設是極為不利的，因為商業是最容易毒害幹部和部隊的，同時，軍隊經營商業對國家是極為不利的。爲了部隊生活上的方便，在當地商業部門的支持下，部隊建立過自己的軍人服務社，這是爲了服務，並不是商業，我是始終反對部隊經營商業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認爲我的主張和做法是對的。

全軍歷次農副業生產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第一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上報告了全軍農副業生產的情況。

像這樣專門的農副業生產會議，解放以後還是第一次。這次會是根據林總對全軍明年任務的安排而開的。軍委和林總下了很大決心，把軍隊搞農副業生產定爲一九六二年中心任務之一，爲了完成這個任務，軍委對全軍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根據不同任務，將部隊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全訓部隊，訓練是主要的，這就是值班部隊；二類是施工部隊；第三類是全生產部隊，搞生產是主要的，訓練是附帶的。農副業生產在全軍的地位提高了，成爲軍隊主要任務之一。

爲什麼林總和軍委下這麼大的決心？照我的理解，還是一句老話，就是需要與可能。從國家整個情況來看需要這樣做，從軍隊生產供應來看需要這樣做。我們國家連續幾年遭到了災荒，農業受到了破壞，有些東西供應不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在幾年之內主要是靠自己大搞農副業生產，這是需要。另一方面，軍隊搞生產有了前兩年的生產基礎，部隊現在也可以擔負這個任務，這是因爲我們有了值班部隊，它什麼都不幹，就是準備打仗，一旦有事情，它可以頂一陣，所以其他部隊就可以搞生產了，這是可能。當然搞生產的部隊也不是放下武器解甲歸田，而是成建制的組織生產，也進行一定的訓練。我們知道，古今中外軍隊的統帥，他們都是祇抓訓練這一條，而我們就不是這樣。林總是既重視部隊的訓練，同時又把軍隊農副業生產的位置擺得很高，軍委和林總這個決心，對我們管後勤工作的人來說，是個可喜的好事，因爲拿那麼多部

隊來搞生產，對搞好部隊的生活是很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是給了我們一個很重的擔子。

我的心情是既高興又發愁，很多天總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打電話請駐京的一些同志到總後來，和他們研究商量這個問題。林總下這樣大的決心，拿出這樣大的力量，再搞不好生產，就很不應該了。當然部隊還有各級黨委的領導，但是具體組織這件事情的擔子，是要由我們後勤部門擔起來的。

軍隊前兩年搞農副業生產是取得了一些成績的，就現有的統計材料來看，在糧食產量方面，全軍平均每人合五百斤左右，這是很大的數字。在養豬方面，現在全軍平均每四至五人有一頭豬，各單位還養了一字。在蔬菜生產，全軍幾乎是自給的，買的很少。還有一個成績，這就是土地，現在全軍平均一個人有一畝地。這些大部分是靠戰士們開荒來的，是一鋤一鋤挖出來的。

首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提出了「大量生產糧食，大量養豬」的方針。十一月十四日，軍委批轉了這次會議紀要，提出農副業生產是一九六二年全軍中心任務之一。各級黨委必須加強領導，爭取一九六二年農副業生產豐收。部隊解決農副業生產所需土地的辦法，應以開荒為主。一切農副業生產活動，都必須嚴格遵守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不得與民爭利。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軍委辦公會議指出，軍隊搞生產是一個長期方針。並指示總後要抓緊研究生產中的問題，切實加強領導；全軍生產會議要提前開，對生產中的內部關係、和地方的關係、和自然的關係，都要有政策規定；在分配問題上，參加生產的部隊可以多勞多得，但不能自由支配，要定出一套分配的原則。同年七月，總後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主要是討論研究產品分配與生產管理問題，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農副業產品分配暫行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農業生產管理辦法（試行草案）》等，軍委隨後批轉了會議的報告和產品分配暫行規定。

一九六三年十月，總後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會議主要是總結幾年來農副業生產的經驗，研究農副業生產遠景設想。我

在會議上作了講話，講話中說：「這幾年，農副業生產的成績很大，這是大家共同的看法。軍委的領導同志這樣看。主席、中央的領導同志，對我們搞生產也是很高興的。這幾年大搞農副業生產，在軍隊內部解決了很大問題，對人民群眾影響很好。在國外，影響也很大。像阿爾巴尼亞、古巴、阿爾及利亞，他們的軍隊也在學我們的樣子搞農副業生產。」

「當然，我們部隊農副業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有的發展較快，有的發展得慢一些，今年的生產情況也是如此。今年全軍的生產情況與去年比較，大體上也出現三種情況。有好幾個軍區發展，有幾個軍區祇保持了去年的水平，有的軍區還不如去年。對發展得慢的，我們希望他們盡量發展得快一些。」

在講話中，我還著重講了如何解決部隊生產與訓練、施工的矛盾問題：「軍隊平時除了擔負戰備、海邊防和值班任務之外，主要有三件大事，這就是：訓練、生產、施工。在這三項任務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我們的看法是，矛盾是肯定存在的，但矛盾又是可以統一的。不少部隊訓練，生產雙豐收的經驗，說明我們這個看法不僅在理論上講得通的，在實踐當中也是辦得到的。……一個領導者，怎樣看他領導水平的高低呢？我們說，歸根到底，就看他是否善於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我們可以回想一下一九六〇年冬天和一九六一年春天的情況，……如果讓那種情況持續下去，那將是一種什麼局面呢？很顯然，如果這幾年不搞生產，生產和訓練的矛盾固然不會出現，但那就必然會出現另外一種新矛盾，新的局面，而那種局面是更加不好辦的。在那種情況下，部隊的體力受到削弱，思想問題很多，那還能夠搞好訓練呢？因此，我們絕不應該說生產妨礙了訓練，而應該反過來說，生產促進了訓練，這樣說，當然也不是主張要過分地強調生產。任何事物都有一個限度，所謂『物極必反』，如果強調得過份，事物就會走向它相反的方向，同樣會變成不正確的了。」

軍隊的生產效益

軍隊生產的效益怎樣？簡要的回答是：1、渡過了災荒，保證了部隊指戰員的體質，部隊的連隊基本上沒有一個浮腫病；2、軍隊建立了相

當大的家底；3、發揚了軍隊建設社會主義生產隊的作用。這是一部劃時代的經濟賬，也是政治賬。

我國的災荒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後的形勢下突然而來的。人民沒有想到，國家沒有準備。我是在高等軍事學院渡過「大躍進」的，我進學院的第一課就是學的「大躍進」。為了理論聯繫實際，學院領導學員向社會學習，請地方負責同志作報告和去河南參觀。

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向學院做過一次報告。他以十分興奮的心情說了很多的話，對「大躍進」描寫的相當美麗動聽。我記得彭真在報告中最後說的是：「過去，我們總是嫌吃不飽，最少也嫌吃不好，這個時代過去了！今後就是怎麼樣吃好的問題了，你們在學院學習，兩耳不聞窗外事，但決不要擔心吃的問題。你們同市政府有關部門聯繫好，儘管吃就是了。」我們聽了彭真的話，感到很興奮。

我們去河南參觀時，先到新鄉七里營，我們在那裏呆了兩天，吃了不要錢的飯，參加摘棉花的勞動。我們看到的人民的精神面貌確實很好，也看到過糧倉和麵粉廠，確實是「糧滿倉」。在七里營得到的印象，同彭真給我們說的幾乎是一樣的。我們自己感到，對大躍進有了感性認識，對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一大步。

在鄭州，我們聽了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關於人民公社運動的長篇報告。他在講到「大躍進」時，同彭真講的精神也差不多。我記得，吳芝圃說：「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吃食堂改變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必然的。……」對吳的報告，我們信以為真，沒有多想其他的問題。

我是離開工作崗位去學習的。我不僅對全國情況不瞭解，對軍隊的情況，甚至對總後的情況也不太瞭解。一九五九年我上任之後，在不短的時間內，我都是以瞭解情況為主，全國災情對軍隊供應的影響，我在一九六〇年冬天才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一九六一年初，我才提出「軍隊自己搞生產渡過災荒」的建議。

從實際情況來說，軍隊搞生產不僅發揮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也發揮了很好的財政效益，節省了難於計數的財政開支。軍隊在全國解放後，即戰爭結束之後，實行全軍統一供應標準以來，供需就存在很大的矛盾。戰士吃不飽，要求各種補助（野外訓練、各種勞作、開慶功會、來隊家屬口糧等都要補助）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部隊關於這方面的報告、提意

見、發牢騷，甚至罵人也是普遍的。這些問題，自始至終也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更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有些非要解決的問題，也只是臨時批示報銷，整個問題依然存在。

關於供應方面存在的問題，我舉兩個例子就可看出其嚴重性了。

一九六〇年葉劍英元帥在青島休息，就有當地駐軍軍長拿著超支萬餘斤糧食的單子，請示批准報銷，葉帥當時很難處理，但還是硬著頭皮批准報銷了。葉帥回到北京之後，同我說了這個問題，並提醒我要注意研究解決部隊吃飽肚子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我上任總後部長不久，濟南軍區要開辦一期輪訓班，分期輪訓老戰士，需要五千斤補助糧。所需糧食數目不大，但是從批准到領到糧食往返手續兩三次，並且還經過當地領導機關特別打通關係才領到現糧。當時，國家還很窮，物資不豐富，領導幹部自覺遵守財經紀律。但可以看出一個問題是，各軍區的確很窮，這對部隊建設是很不利的。

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後，部隊存在的三大問題成爲歷史的過去：1、戰士吃得飽了。2、長期以來部隊要搞一件什麼事，如野外訓練，開各種會議，沒有不需要補助的，要求補助糧的問題，現在提都沒人提了。3、來隊家屬口糧等都逐漸解決了。軍隊臨時來隊家屬吃、住問題，向來是頭痛的問題。全國災荒之後，來隊家屬猛增。來隊家屬極大多數是專門到軍隊吃的，而且大多數也是不打算再走的。他們說：「橫直是餓死，死在家裏，還不如在部隊死在自己的親人面前。」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後，家屬的吃飯問題就算基本解決了。隨著國家度過災荒的好轉，家屬來隊也就越來越少了。臨時來隊家屬吃飯問題，也是軍隊搞生產才算徹底解決了。

一九六〇年，有一次羅瑞卿總參謀長同我說：「老邱，我們訂一個君子協定，部隊要糧食的問題，我一律不管都由你管。到開會的時候，我總得承認一次我犯官僚主義。」我回答說：「同意訂這個協定，我完全承擔責任。但我承擔了也沒有糧食呀。」後來羅又把話說回來：「不管也不成，這總是我一塊心病，戰士吃不飽我心裏著急，我們應當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未搞生產之前，這個問題始終也沒有解決。」

軍隊搞生產之後，拿不出補助糧的問題根本不存在了。一年之後，即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後，羅總長又同我說：「老邱，一年前我們的君子協

定，可以廢約了。現在部隊是不是幾乎沒有請示要糧食的了？」我回答說：「部隊自己有了，就不會再伸手向上要了。」羅又問：「今年部隊生產的情況怎樣？」我回答說：「多數部隊可以做到填飽肚子了。」

羅總長說：「看來，軍隊搞生產是對的，不搞生產是沒有出路的。這不僅渡過災荒要這樣，不發生災荒也是要這樣的，我們軍隊在自己動手，這是一種不可改變的方針。」

軍隊搞生產改變了後勤工作的格局，從單純向國家伸手，轉為國家供應同自己動手相結合，這是我軍後勤工作思想、作風、方針的轉變。周總理對軍隊後勤的轉變，給了很大的評價。一九六二年冬，周總理要我在國務院的會議上講一下軍隊生產渡荒的情況。總理在我的發言之後，對軍隊後勤工作講了三個重要問題：

第一、林總主持軍委工作以來，軍隊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軍隊把毛主席建軍路線更加具體化了。這就是：突出政治，加強戰備，積極搞生產。軍隊的後勤工作是軍隊整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如果不能把後勤工作提高到建軍路線相適應的高度，祇搞些事務性的工作，後勤工作就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現在我軍的後勤工作，是在建軍路線的指引下，生機勃勃的向前邁進。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軍隊，和平時期的後勤工作的方向是什麼？對這個問題，我同意邱會作同志提出的「依靠國家供應為主，自己動手為輔」的方針。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時期，國家財富還是不豐富的時期，國家對軍隊的物資生活是不能完全滿足的，永遠都有自己動手的問題。因此，邱會作同志提出，軍隊後勤工作，要把國家供應的物資管好和軍隊自己生產緊密結合是完全正確的。

第三，軍隊後勤部門，也是一個特殊的經濟部門，其任務是特殊的。國家的經濟部門是執行政府的生產計劃，產品由政府分配，收入交國家；軍隊後勤部門的生產是列入政府計劃之內，產品不歸政府所有，主要是保證軍隊生活之用。軍隊生產是補充政府供應不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軍隊後勤部門具有國家和軍隊經濟部門的雙重作用，因此，支持軍隊後勤部門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政府經濟部門的戰備工作。

周總理最後說：「我對軍隊後勤工作是過問比較多的。過去的過問，主要的是解決軍隊的問題，現在過問的情況變了，是軍隊支持政府。剛

才，邱會作同志的發言中提到兩個重要問題：軍隊可以吃飽肚子了，到現在還沒有發生過一個浮腫病，這就是對政府的最大支持。全國發生這樣大的災荒，政府無力解決軍隊的問題，一切困難都是軍隊自己戰勝的。在戰勝困難的鬥爭中，軍隊後勤做了很好的工作，這是我軍後勤工作的一大奇跡！」

軍隊的生產是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軍隊搞生產的阻力那樣大，為什麼生產又搞起來了，並且成爲全軍的大事？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問題。

(一) 逼出來的。在全國大災荒的情況下，軍隊的出路祇有兩條：自己動手找活路；等著挨餓。災荒就是最有權威的「找出路令」，沒有這個「找出路令」，軍隊的統帥也不會輕易下決心的，特別是對生產存在不小的阻力的情況上，更是不易下這個決心的。

(二) 軍委和林總的正確決心。在當時，林總的決心，對全軍能夠搞生產，是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的。林總提倡「突出政治」與「空頭政治」是有原則區別的，前者是聯繫實際，後者是脫離實際。他提出的「四個第一」，始終是把抓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人的因素就是最大的實際。另外，林總治軍原則，關心戰士生活，始終是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好的統帥是不關心戰士生活的。林總過去、現在正是這樣一個統帥。

(三) 全軍後勤部門組織生產的作用。這也是一種重要作用，事實上，任何工作都有組織實施問題，全軍的生產就是後勤部門組織實施的。我們做了應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也遭到過打擊，這都是歷史事實。我們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勞，幫助全軍度過了災荒，但不應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勞，而是總後部長和總後黨委及廣大後勤戰線的指戰員應做的份內之事。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四月間，總後向林總寫了一個《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他把報告轉送給毛主席了。五月七日，毛主席就是在那個報告上做了批示，《五七指示》即從此而來。

我們寫給林總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全軍農副業生產情況的簡要報告。報告的內容，除了略談了全軍農副業生產的概括情況之外，主要講

了海南島和雲南西蒙山駐軍的生產情況。對上述兩地駐軍的生產情況：海南島在解放前是基本上不種菜的。人民解放軍進駐海島之初，各種蔬菜都是由大陸運去的，並且主要是乾菜。因為部隊長年吃不到新鮮蔬菜，就自己開始種菜。使人預料之外的是，種的各種蔬菜都長得很好。在軍隊的影響下，當地群眾也種菜吃菜了。種菜是一件小事，但通過種菜，更加密切了軍民關係，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群眾有史以來的生產習慣。

雲南西蒙山在邊境地區，該處土地多，土地也肥沃，氣候很好。過去，駐軍按上級的命令不准種菜，部隊所需蔬菜都購買。自然災害開始時，部隊沒有蔬菜就吃鹹菜，甚至鹽水就飯。從一九六一年，部隊開始種菜了，也種了糧食和養了豬。現在不少部隊都有十餘畝糧食地，莊稼長的綠油油的，菜園子長勢都好。養豬十餘頭，還有幾十頭羊的羊群，部隊的伙食很好。西蒙山是雲南少數民族所在地，解放前後都還是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更不種菜不吃菜。在駐軍的帶動和幫助下，現在群眾也種菜吃菜了。由於生產發展，同海南島一樣，群眾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了。

對毛主席五月七日的批示，我是知道比較早的。當時，楊成武同康生乘專機去杭州兩次，參加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五月中旬，楊第二次回京後，我就看到了批示全文。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中央軍委舉行常委會，其中內容之一是傳達毛主席的批示。楊成武讀了批示全文。各位副主席都以興奮的心情說了話，但總政有一群主任，一個講話的也沒有。我也當了閉口道士，一句話都未說。最後，葉劍英說了話。

葉副主席說：「毛主席的批示是對軍隊最重要的指示，這是對軍隊極大的鼓勵。我們軍隊應當很好傳達，認真學習，繼續創造出更大的成績來。」稍停了一下，葉帥對著蕭華說：「怎麼辦？」蕭華祇「嗯」了一聲，反而接著對著我說：「邱部長，你替軍委起草一個指示，文件發到全軍，要全軍很好學習，並提出貫徹執行方案來。」

我帶著微笑的聲音說：「我起草指示？這是不分油鹽柴米，總後不能辦。」

接著聶帥說：「這是中央軍委的事，還是由辦公廳辦為好。」軍委辦公廳承擔了這一任務。

散會時，蕭華走到我面前，竟拍著我肩膀說：「恭喜你得了大獎！」在中央軍委開會的當天晚上，我就以總後勤部的名義向全軍後勤部門發了指示。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果，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人民日報》對《五七指示》做了連續的報導。一九六六年夏季，《人民日報》以「共產主義宏圖」為題，對《五七指示》發表了社論。據說，那篇社論是中宣部起草的，陳伯達修改後，經毛主席審閱定稿的。那篇社論的內容記不起了，主要精神是提出了人民解放軍是個「大學校」，以一業為主「兼學別樣」是建設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這同總政治部的態度，就無法比了。《五七指示》在全社會產生了很大的效果。後來總政認識到這並不是對我的批示，宣傳《五七指示》的工作很快就跟了上來。

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沒有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全民動手，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五七指示》正是解決全民動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人民日報》「共產主義宏圖」的社論也正是著力宣傳了這個問題。正確的思想變為廣大群眾的行動就是偉大的物質力量，這是真理。「五七」道路就是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

毛主席去世之後，《五七指示》同毛主席的無數光輝著作一樣，都成了他的殉葬品。

附：《五七指示》

毛澤東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的批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同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報軍委，然後報告中央。要在沒有發生世同意，再向全軍發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

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祇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得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業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了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第十九章 後勤工作的天職

正確認識後勤工作的地位

在我軍的歷史上長期存在過輕視後勤工作的問題，過去的說法「能打能沖的當指揮官，能寫會道的當政治官，什麼也不會的當糧食官」。在解放後的一個時期內，輕視後勤工作的現象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加嚴重了，從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開會坐位置等等，都可看出後勤幹部低人一等的現象。一九五九年，我上任總後部長之始，總後幾個老領導對我說：「你又回來了，沒有逃脫這個當孫子輩的地方。」我以帶笑意的口氣說：「別人輕視，我們自己要重視。我們團結起來，做好工作。」我知道總後的思想混亂是有歷史原因的，總後存在的問題非「一日之寒」，解決問題也非「一日之功」，是要有個過程的，並且是要紮實做工作的。

我上任不久，兩大任務就來了，一是戰備準備打仗，二是渡過災荒，搞農副業生產，兩項是全軍的中心任務，再加上一個業務改革，這樣就三大任務交織進行。我們是抓得很緊的，不僅沒有掉隊，而且搞得相當出色。要完成好以上三大任務要解決思想問題，就要學習，從一九六一年下半年開始，開始有計劃的學習，學習的方法主要是辦短期輪訓班，關於黨委生活問題。總後黨委內部的鬥爭是經常的，從一九五九年十月改組總後黨委起就開始了鬥爭，後來無論搞戰備，搞農副業生產，業務改革等等問題，都是經過鬥爭，甚至經過激烈鬥爭才解決問題。

這裏，我想講一件以小見大的小事，就可看出總後黨委內部的思想狀態了。一九六一年總後管理局生產了一些農副業產品，一天，我從外地回來，在辦公桌上看到一張農副業產品分配方案。該方案規定分為四級：總後首長為一級；二級部正副部長為二級；處級幹部為三級；其餘的

人爲四級。我認爲這樣分配太不像話了，必須改變，從總後首長到炊事員平均分配，我還批了：「我的批示，爲最後定案。即照此執行，不可更改。」

我的批示，表示了我對「分配方案」是氣憤的，我下定決心：「寧可不同意的人反對，也不可讓不正之風存在下去。」我的批示，管理局當然是執行的。過了一段時間在黨委常委會上突然有負責人指責：「邱會作同志用平均主義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威信，是搞個人主義的手段。」他們所指的是農副業產品的分配問題。我心想，這雖是小事一樁，但對我的指責是提得很高的，有展開爭論的必要，從這件事開始，也許可能解決一些思想認識問題。

於是，我就號召大家：「儘管對我提出批評，不僅對農副產品的分配可以批評，對其他問題也可以批評。」但一時沒有人說話。在大家要說不說的時候，有的人爲我抱不平，他說：「你們對邱部長的指責，毫無道理。什麼平均主義根本不沾邊，即使是平均主義，也比三六九等好多了。我提議，這個問題不要討論了，如果有人主張一定要討論，在軍人大會上討論。」接著還有人說話了，他說：指責邱部長平均主義毫無水平。看樣子，鬥爭展不開了，我也沒有急於求成，沒有繼續討論下去。

任總後部長之初，黨委常委有幾個委員，我記不準確了。但當時有共同語言的，還有湯平、張賢約、饒正錫、張令彬、李雪三，其餘的人，同我都很難一致。但在今天的常委會上，大家對不同的意見敢於反駁，是一種好現象，正氣佔上風了，在思想上，今後可能還會更健康。

總後勤部常委的思想統一，是經過一個過程的，而且是經過鬥爭，特別是經過取得工作上的重大成績才逐漸統一起來的。這個統一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這一階段最主要的是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認識，打下基礎，在學習過程中，又與整頓機關不正之風結合進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過去，部隊來辦事的人，常常是進門難，辦事更難，這些不好的作風，有很大改正，部隊來人對機關反映很好，部隊的反映是：「同過去相比，總後機關成了兩個樣」。作風是無形的力量，機關的作風好，人的精神狀態、工作態度都好了起來。

第二階段，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五年。這一階段，最主要的是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績。「做好工作，解放自己」基本上實現了。總後當時抓的三大工作：戰備、農副業生產、業務改革從一九六二年起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成績，同部隊的工作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了，是大家看得見摸得著的，對部隊影響之大是空前未有的。

一九六二年進行中印邊境反擊作戰、東南沿海戰備和後來的支援越南作戰，總後對作戰部隊的保障完成地很好，部隊可以不負重行動，走到那裏，打到那裏，後勤保障不僅跟上來了，而且在許多地方都預有準備，部隊不發愁，不叫苦，更沒有罵人的。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這樣大的後勤機關，保障這樣多的部隊作戰，本來就不應當有什麼困難的，但同過去相比，又是變化極大的問題。西藏剿匪，參戰部隊最高到過九萬人，後勤保障是費了大勁的，幾乎動用了全軍後勤機關的支持，也不能滿足部隊的最低需要，由於後勤保障困難，祇有減少駐藏部隊。

一九六二年，全軍的農副業生產發展很快，形勢很好，部隊生活不僅有保障，而且有很大的改善。全國黨政機關、工廠學校、城鄉居民，都在鬧災荒，軍隊反而生活得較好。俗話說「吃飽了不想家」，部隊的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狀態好了，對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促進作用，部隊消除了浮腫病，保持了體力。為此，受到毛主席、周總理多次表揚，軍委各元帥也很高興，這對全黨全軍全國都發生了重大影響，軍隊後勤工作的地位提高了。

一九六二年，業務改革也有了很大進展，特別財務管理改革，得到各級領導幹部的讚揚。總後同各軍區軍兵種的矛盾，部隊各級後勤同各級領導幹部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了。過去，依靠制度管業務，把業務管級黨委首長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了。過去，依靠制度管業務，把業務管活了，後勤工死了，現在，基本上依靠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把業務管活了，後勤工作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九六二年冬，軍委辦公會議舉行擴大會，各軍區、各軍兵種首長到會了。元帥們到會聽取了各軍區、各軍兵種的匯報發言，在會場上，鄧帥即席插話說：「大家的發言都很好，你們對總後為什麼不提批評呢？」鄧帥接著說：「大家的發言都很好，你們對總後為什麼不提批評呢？」鄧帥接著說：「是呀，過去開會，沒有不罵後勤的，現在反而說好話的。濟陽軍區政委賴傳珠接著發言說：「我們不是對總後不批評，為什麼？」濟陽軍區政委賴傳珠接著發言說：「我們不是對總後不批評，而是沒有什麼可批評的。總後的工作做得好，全軍區上下都是讚揚的。」

的。邱會作會辦事，他是全軍的總後勤部長，我們是他的後勤部長，把我們指揮得團團轉。」（全場大笑）接著發言的，對總後都說了大同小異的好話，總後勤部在全軍的威信提高了，是我們繼續做好工作極為有利的條件。

第三階段，一九六五年以後。這一階段，最主要是總結經驗，有計劃搞建設使後勤工作更提高一步。我們主要是抓各項建設工作。

第一是劃區供應。這是後勤戰備，平戰結合的主要措施，祇要這一措施落實了，準備打仗的工作就同平時的工作結合在一起了，戰備工作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落實了。

第二是搞農副業生產基本建設。全軍的農副業生產，向田園化、機械化、企業化方向發展。力爭在兩三年內，連隊的生產實行業餘生產，農場生產實行企業管理，除了農忙季節部隊臨時參加生產之外，平時不佔用部隊時間，全軍的農場都力求能發揮比較好的經濟效益。

第三是抓緊科學研究工作。後勤裝備都要向現代化方向發展，軍需裝備要向「減輕數量，提高質量」的方向發展。還有業務工作的規章制度，要繼續改革與完善，使業務工作能夠走上制度化，這是業務建設的基本問題。

對上述各種規劃已經制定，並且已經開始執行，也取得了新的成績。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林總先後發表了對後勤工作「四加強」的指示和「五七」指示，對後勤工作給予了極大鼓勵和支持，對總後勤部的思想統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毛主席、林總的親切關心下，總後機關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好形勢：思想統一，團結一致，幹勁十足。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國全軍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後勤工作也隨之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造反派對總後的正常工作破壞得很厲害，但總後機關上上下下大多數同志都能堅守崗位，堅持了正常工作，並保證了全軍援越部隊、軍事外援繁重任務的完成。

充分發揚革命幹勁

總後機關，經過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和「老三篇」之後，思想覺悟提高了，對後勤工作的認識基本上解決了問題，收到了新的效果。

這時我們提出：「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三勤的思想，目的就是更具體的為部隊服務。我們總後機關深入部隊的作風很好，蹲點、跑面，不辭辛苦。部隊軍、師、團後勤機關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們經常下基層，同戰士打成一片，並開展送上門的活動，物資上門，財務結算上門，醫療上門，修理上門等等。例如，戰士的衣服壞了，可以縫補好，部隊的後勤人員把工作做到每個人的身上，也就是做到了每個人的心上。全軍後勤系統出現了大批的四好單位和五好個人，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典型人物，這是做工作做出來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間，我在總後勤部領導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會上講的中心問題，是發揮革命幹勁為部隊服務，其中也講到了政治思想同發揮革命幹勁的關係。我講到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同行政工作的任務是一致的，政治工作沒有單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加強政治工作，就是動員廣大指戰員很好完成任務。從政治上保證完成行政任務，就是傳統的政治工作；離開行政任務，單獨談什麼政治工作，就是空頭政治。」我講話之後，立即有人對我說：「你講政治工作的問題，真是大膽，可能惹下麻煩了。」我回答說：「毫不在乎，真理總是真理，你們不要為我擔心。」果然，第二天總後某領導人就把記錄稿送給了總政治部蕭華主任，蕭看了之後，很惱火。

林彪元帥在論述軍隊培養三八作風時指出：我們要緊張，反對懶惰、散慢、疲憊、吊兒郎當，不要今天的事推到明天，明天的事推到後天。我們要有一股革命幹勁，沒有幹勁什麼事也辦不好。我們在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完全正確的，我軍的建設方向和方針也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工作條件很好。我們的任務就是沿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鼓足幹勁，勝利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

沒有幹勁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一種是不想幹事，實際上已經不是幹革命，祇是憑老資格吃飯。一種是怕困難，遇到困難就打退堂鼓。第三種人是辦事不認真不講質量，咋咋呼呼，他們每天上班，好像很「忙」，實則敷衍了事。這種人，把一個革命幹部降低到一個舊職員辦「差」的水平。

有幹勁也有三種表現，這就是想幹、快幹和深幹。

想幹，就是不斷革命的精神。這些同志一個是有很高的積極性，一個是有很大的主動性。很高的積極性就是不甘落後，成天想工作，總想把工作做好，精益求精，永不滿足。很大的主動性必然就是具有一往直前的精神，毫不顧慮，不能前怕狼後怕虎，祇要對革命有利的事，總是爭著去幹，堅決地力爭幹好。像林總論戰鬥作風時所談到的那樣：總想打仗，不是想休息，打仗一往直前，命令規定的戰鬥任務堅決完成，沒有規定的，祇要有仗打就堅決打，槍聲就是命令。具有這種作風的人，在我們後勤系統是很多的。

快幹，就是要搶時間。時間是不等人的，今天過去了就永遠不會有今天了。時間就是力量，快是聞風而動，是政治責任和政治熱情問題。快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要快，要盡可能在短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爲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所以我們辦事就要快，要和時間爭取主動權，今天能辦完的事，決不拖到明天。

深幹，就是深入實際。什麼是實際，客觀事物就是實際，從部隊來說，連隊就是最主要的實際，從業務工作來說，一切具體事物都是實際。深入實際的目的，就是總結經驗指導實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深入實際不可能正確總結經驗指導工作。總的一句話，就是深入實際，深入群衆，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以提高我們的工作質量，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深幹。想幹、快幹和深幹是統一的，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想幹是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可能幹得快，幹得深。快和深是數量和質量的統一，是多快好省的統一，祇有幹得快，才能爭得深入下去的時間，而深入下去，抓住主要矛盾，不失時機的加以解決才能真正的快。工作幹得快，幹得深，獲得了成績，增長了才幹，豐富了知識，必然會更加激勵幹工作的熱情，增加想幹信心，從而幹得更快，更深。

當時，全軍都在大張旗鼓地貫徹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政治工作的決議精神。全軍上下生氣勃勃，熱氣騰騰，爭先恐後，努力上進，各項工作聞風而動，你快人家比你還快。古話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種形勢下，不要說不進則退就是進得慢也會落後，這就是全軍後勤系統的精神面貌，我們後勤系統是一定不會掉隊的，一定會跟著時代的步伐勝利前進的。

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

我軍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這應當是後勤業務建設的基本依據，決不能與之對立。我軍後勤的規章制度，是適應我軍的領導制度還是搞業務獨立，這是業務建設的方向問題。應當承認，我軍在解放後「不走樣的學習蘇聯紅軍」之後，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我認為我軍在學習蘇軍的問題上是所得不大損失不小，這應當是一個教訓。

中國人民解放軍同蘇聯紅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但歷史傳統是截然不同的。蘇聯紅軍的歷史傳統是由俄國沙皇時代的舊軍隊而來的，雖然進行過改造，但保留下來的舊東西還很多，特別是蘇聯軍隊的領導制度是個人集權制，上下之間、官兵之間等級森嚴。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傳統，是由孫中山時期的國民革命軍而來的，這支軍隊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後來以農民為主體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農民革命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鍛煉成了一支新式的軍隊。我軍的領導制度、戰略戰術、內部生活都有自己的一套。我軍除了可以研究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經驗和軍事技術之外，其餘沒有什麼可學的，「不走樣的學習蘇軍」是完全錯誤的。後勤部門與其說學習蘇軍，還不如說是把蘇軍的一本本條例都搬過來了，由於學習「成績」很大，內部造成的矛盾就更大。這些矛盾成了我軍後勤前進的主要障礙，我們必須大力克服矛盾，才能恢復我軍後勤的傳統並繼續向前發展。

對業務改革，當時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後勤規章制度不能改，規章制度是後勤工作的準則，改了對整個後勤工作必定是大的破壞；另一種意見認為，後勤規章制度必須改，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妨礙後勤工作為部隊服務，改得合理的規章制度對後勤工作必定是大的發展。反對改革的意見，從原則上是少數，從具體工作上是多數，因為業務改革常常會涉及到業務工作的職權問題。這就是業務改革的真實困難。

在理論上提高認識之後，大家一致認識到，後勤業務工作主要問題是兩個字：一個字是「死」字，一個是「活」字。用辯證法的方法管業務，就一定管「活」；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管業務就一定管「死」。這裏說的管既為他們服務，又依靠他們工作；這裏所說的管死了，就是實行業務「專

政」，祇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用很多的框框去束縛別人，實際上也捆住了自己的手腳。

我們過去處理許多問題，比如局部和整體，集權和分權，制度和實際等等，往往不是犯這樣的片面性，就是犯那樣的片面性，陷入了形而上學。對這些問題就其中幾個關係來加以分析。

第一，制度和實際工作的關係。後勤的規章制度的構成，就一般情況來說是根據國家的經濟情況，軍隊的傳統和現實情況制定的。現在我們的規章制度，基本上也是符合上述情況的，但任何規章制度都不能解決一切實際，所有實際問題也不可能包括在規章制度之內。

這裏舉一個供應劃線的例子。對冬季服裝的供應，總後對北方地區劃分了嚴寒區和亞寒區。嚴寒區每個連隊供應皮大衣，亞寒區則供應棉大衣。北京軍區一個師駐在河北宣化，大部分部隊駐在宣化及其以北，按標準即供應皮大衣，駐在宣化以南三公里的小部分部隊則供應棉大衣。對此，北京軍區首長親自出馬，對總後進行了激烈的攻擊。

一九六〇年，在一次軍委會議上，當時的北京軍區某首長以上述三公里之差兩種待遇為題，對總後的規章制度攻擊說：「我們現在的供應制度，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權威主義的產物。這種制度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引起了部隊不團結。」他的發言，我認為他是同彭德懷劃清界線，又是向林彪表態，具有政治性的發言，但所選材料是不適當的。

我對發言人說：「對總後的制度提出批評，我表示歡迎。但以三公里之差來攻擊總後制度是不妥當的。宣化發生的問題，不是制度本身問題，是實際工作問題。供應棉衣、皮衣之分是根據氣候不同劃線。既然是劃分了嚴寒區和亞寒區，能沒有線嗎？但駐宣化的部隊是一個師，完全可以實行統一供應標準。這個問題我現在就拍板定案：駐宣化的部隊，今冬實行統一的供應標準發皮大衣。」

我說完話之後，發言人微笑點頭表示同意我的意見。羅瑞卿則笑著說：「你們兩個都是政論家，不要爭論下去了。」

規章制度是必須的，是軍隊各方面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對後勤工作來說，應當肯定需要規章制度，但還要肯定的是在執行規章制度的同時，必須解決實際問題，祇有這樣，規章制度才能行得通，才能為工作服務。

第二，統計和有「數」的關係。爲了心中有「數」，我們要有必要的統計；但有了統計，並不等於心中有「數」。統計數字祇是研究問題的一種資料，而不是全部根據。如果迷信統計，把報表看成是萬能的工具，就會造成報表成災。我主張少一點統計數字，多一點研究，可以做到心中更有「數」，統計過多，調查過少，反而會心中無「數」。後勤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統計資料，否則就不可能掌握整個情況的。比如說：有多少錢，有多少物資，有多少運輸工具等等，都是工作的依據，但反過來說，如果這些數字不準確，也會耽誤工作的。例如，平時在統計報表上看到，某部車輛完好率爲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是接受任務之後汽車則開不動；又如，某部的衛生統計報告，發病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但缺勤率祇有百分之二，以上兩則統計可以相信嗎？顯然是不可以的。

第三，當家和管家的關係。黨委當家，後勤管家，這是後勤工作幹部必須遵守的原則。因爲各級後勤部門是黨委領導下的一個部門，是局部而不是全局。

在這裏我們講的黨委當家，後勤管家，是規章制度的問題。如果規章制度規定得不合理，黨委當家就會成爲有其名無其實，黨委根本不能行使當家的權力。以財務法規來說，從軍區起，各級黨委祇有權批准少量的預備費用開支，其餘的則一律不能過問，這樣的規章制度是必須改變的，後勤的規章制度應當與我軍的領導制度相一致，才能體現黨委當家的原則。當然黨委當家，後勤工作也不能黨委拉一拉就動一動，不拉就不動，後勤永遠要保持「有頭腦的事務主義」的作風，祇有這樣，後勤才能起到管家的作用。

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是我軍後勤的基本指導思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但這個思想的基本含意是什麼？黨委當家也要在制度範圍內當家，黨委當家必須從規章制度中體現出來，但又不能離開規章制度自行決定一切，這兩種偏向都必須克服的，才能真正實現黨委當家。

局部與整體的關係

國家是整體，軍隊是局部，這是決不可顛倒的關係。我軍的後勤工作似乎有個「天生」的缺點就是本位主義，這是必須徹底克服的。

在軍隊後勤工作中局部與整體的關係，也就是本位主義的問題，是有個歷史過程的。在歷史上的三個時期：紅軍遊擊戰爭時期、根據地時期、國家供應時期都有不同內容的。紅軍初建時期，這個時期軍隊既不是局部也是整體，還不存在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問題，軍隊是局部與整體合一的。根據地建起來之後，軍隊始終是處於鬥爭中主體的地位，支援戰爭是黨、政、軍共同的任務，因此，局部與整體的矛盾並不很大。全國解放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經濟建設，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是進入了新的時期，國家的主戰場是經濟建設，對軍隊的供應，是國家計劃的正常部分，擺正局部與整體的關係顯得更為重要。

第一個問題，關於依靠國家供應與軍隊自己動手相結合的問題。

國家對軍隊不能保證供應嗎？我們說能又不能。當時國家的經濟能量是薄弱的，軍隊的需要即使有計劃也常常不可能按計劃供應，因此，軍隊自己動手搞輔助供應就十分必要了。

國家經濟力量是國防力量的基礎，國防事業的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經濟力量為前提。毛主席說過：「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今天增加一分經濟建設力量也就等於增強一分國防力量，這是最大的政治。軍隊後勤工作幹部，對這個問題須有清楚正確的認識，我們除了管好國家供應的經費物資之外，決不能做單純依靠國家供應的伸手派，大力辦軍隊能夠而且又應當辦的事，把依靠國家供應與軍隊自己動手很好結合起來。

第二個問題，支援國家建設問題。

支援國家建設是政治任務也是經濟任務，在和平時期軍隊不僅要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也要直接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是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對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後勤部門一定要有積極的態度，凡是中央的號召，軍委的指示，上級黨委的決定，後勤部門都要積極的堅決的執行。特別是搶險救災，要如同戰鬥任務一樣堅決保障完成任務，從後勤部門來說是要出錢出物的，對這項開支是可以「先斬後奏」的。對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決不可以「先要錢，後辦事」的商人作風去處理問題。

對支援社會主義建設，還有幾個經常遇到的問題，我們應認真做好。

一是醫療隊下農村的問題。軍隊經常派醫療隊下農村是好事，應當有計劃地進行。這樣可以為缺醫少藥地區的農民治病，又可密切軍民關係。

係。這裏主要是藥費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可事後同當地政府衛生部門辦理，能解決就協商處理，如果當地衛生部門無力解決，則由軍隊報銷，決不能因爲藥費問題，而影響醫療隊的工作質量。

這裏附帶說一下醫科學校和軍隊醫院的收費問題。各醫科學校和醫院，城市居民一律按照原有的法規收費，收不到了就欠賬，對欠賬可以催賬，但不准到欠賬人家裏要賬，因爲到居民家裏要賬，容易發生預料不到的問題。

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如海島上的駐軍同島上的居民真正是一家人，有的同飲一口井的水，甚至同用一個鍋灶做飯，在這樣情況下，軍民紙有共同生活了，軍隊應當把居民的治療包下來。

還有邊防，特別是新疆、西藏、內蒙，有些很遠的邊防口岸，交通很不便，一年之內大部分時間都積雪，不能行走。軍隊對這些口岸居民的治病和其它生活上的問題，同海島上的居民同一個原則辦理。

少數民族地區對駐軍的依賴性更大，他們認爲部隊給他們看病和解決生活上的某些問題是「應該」的，是一家人的是。這是好現象，我們不應當視爲經濟上的負擔，而是有重大政治意義的。

總起來說，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是重大的政治任務，軍隊除了保衛社會主義國家之外，軍隊支援國家建設，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式之一，後勤部門應當以很高的政治熱情來完成這一任務。

認真管理業務

任何工作都不是抽象的，都有具體的業務。後勤工作是軍隊的「管家」工作，管好業務，是後勤工作的政治任務。一些後勤幹部和部隊後勤部門的領導管業務不懂業務，「當和尚不會唸經」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不愛學習，尤其不愛學習業務，是後勤部門的老毛病，對此必須大力克服。

根據後勤的特點，對業務學習我們提出了三個相結合作爲應當遵守的學風。

(一) 學習知識與學習管理相結合。對業務要有一定的知識，才能認識這個事物，但同時也要懂得它的規律，才能駕馭它，這也就是經常說

的學與用結合起來。如果說學政治理論要防止脫離實際，那麼學業務就更是如此。在業務工作中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半瓶子醋」，不僅無濟於事，而且會誤事，在我們已往的工作中，由於無知而發生事故的例子是多得不勝枚舉的。

(二) 學習業務與學習文化相結合。由於歷史的原因，我軍的幹部文化水平是比較低的，而後勤工作幹部，又是低中之低，這是提高業務水平主要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克服這個困難，才能達到提高業務水平的目的。

業務的專業知識各有不同，但文化知識是共同的基礎，沒有文化是學不到專業知識的。現在我們的學習條件比過去更好了，我們不僅可以聽講課，而且在我們的隊伍中有很多的教師。學習的方法有多種多樣，我說有一種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恥下問」，我們說，不僅「三人行必有我師」，應當說，隨時隨地都有我們的教師，而且是很好的教師。我們祇要問就沒有得不到回答的，這就是我們學習的最好條件。

學習文化，學習業務知識，是爲了管好業務。管好業務首先要熟記後勤各項業務工作的規章制度，我們必須首先肯定規章制度是必要的，沒有規章制度會使工作雜亂無章，同時，也必須肯定，後勤工作的規章制度必須適合我軍的情況。因此，我們現行的規章制度必須切合我軍的實際情況，必須爲指戰員服務，爲建設現代化後勤服務。

(三) 平戰結合。平戰結合的著眼點，應當是戰時，而不是平時，這是必須明確的指導思想。根據這個思想，我們在具體工作上必須有個大轉變，例如，戰略後方基地建設，島嶼邊防和調整部署後的營房建設等都要考慮到這個問題，否則就有可能既不適合戰時的要求，平時又無多大用處，會造成很大的浪費。除了某些個別問題，戰時有特別要求之外，絕大多數都是通用的。

樹典型的問題。在業務工作中樹起好的樣板，對業務工作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全國有三個響噹噹的樣板：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這對促進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各級後勤都要學會樹樣板這種領導方法。

後勤工作是軍隊的管家工作，可以看到有形的東西很多。所以樹樣板，對我們後勤工作來說，既有利的條件，又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最適

合我們後勤工作的特點了。後勤工作中有好多事情，像服務典型，節約典型，技術革新成果等，光靠嘴說，往往很難說清楚，而有了樣板，就一目瞭然，什麼馬蹄形回風灶，還有什麼雙眼回風灶，就很難說清楚，也不容易說服人，有了實物樣板，演示一下效果，一下就推廣開了。

樹樣板掌握方向非常重要。該提倡的就提倡，該反對的就反對，起促進派的作用，如果方向錯了，問題就來了。我們總醫院有個病室，在搞醫務工作革命化的時候，有的休養員提出倡議，要休養員「放下架子」，參加勞動，自己服藥等，意思是反對休養中的「特殊化」。休養員的精神是好的，但醫院提倡就不好了，這樣做，把醫院的服務對像置於何地？事情幸而發現得早，制止得早，不然推廣出去就很不好了，這說明了掌握方向的重要性。

反對空頭政治

政治和業務的關係，是一個基本而又普通的問題。我當了總後部長之後，由於我堅決反對空頭政治，竟成了我的「罪惡」，可見，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大問題。

政治和業務是哲理問題，從實際鬥爭中來說是個普通常識問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沒有單純的政治，也沒有單純的業務。政治和業務永遠是對立統一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總後勤部黨委舉行擴大會議。會議的內容：1、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錯誤；2、關於解決部隊生活，特別是海防部隊生活存在的嚴重問題。怎樣解決部隊生活問題我提出了具體意見，過了幾天，蕭華以軍委副秘書長的身份，叫我去談過一次話。他首先說：「單委改組已經完畢，軍委辦公會議已經成立了，現在的軍委是以林總為首的新班子，也可以叫做新軍委，我們都是在林總領導下工作，加強政治工作是首要任務。」

我接著說：「林總在軍委擴大會上總結時指示，要總後勤部抓緊解決部隊生活問題。對此我們已經上報了方案，待軍委批准後，大體上可以解決問題。我們學習林總指示時，認為抓緊解決部隊生活問題是全軍後勤戰線加強政治工作的重要問題。」我對蕭華孤立地提加強政治工作是有意不予理睬，蕭華很不高興，立即打斷了我的話說：「部隊生活是小問題，

題，發幾個錢就解決了。大問題是方向問題，沒有政治就沒有一切，你這個老政治委員，為什麼這樣就被人同化了，真危險！你今後抓政治領導是主要的。」我也回敬蕭華幾句：「後勤工作任務同政治工作的任務總有區別吧。後勤部門搞好業務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又過了幾天，軍委舉行常委會，在討論的議題中有總後關於解決部隊當前生活問題的報告。在審議時，各位元帥都點頭說好，主持會議的賀龍元帥，以風趣的語言說了好話，賀帥說：「邱會作同志這個報告寫得很好，祇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過去是有錢不辦事，現在是有錢會辦事，總後勤部就是要有這種態度，才能解決問題。邱會作同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希望不止三把，要繼續燒下去，看來我們的後勤工作是有希望的。」賀帥的這一小段話，到會的多數人都點頭表示贊同。

蕭華立即說了話，他說：「我們各總部發言、講話等都要注意政治內容，要有政治水平，這個報告（指總後報告）是這樣的嗎？」

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即奪口而出地說：「要是寫上幾句毫無意思的政治詞彙，我的報告就十全十美了嗎？」我的話有諷刺之意。我同蕭向榮坐在一起，我的話音一落，他就在桌子下面，用手拉了我一下，並低聲說：「不說話，比什麼都好。」

羅瑞卿帶有裁決的口氣說：「對總後的報告不討論了，按照賀帥的指示辦。蕭向榮同志在文字上過一下目，就立即發出。」

經過幾次接觸之後，我對總政態度就形成了一個看法。我認為他們是「打著加強政治領導的旗號，憑著自己的地位，在軍委稱王稱霸」。會後，我走訪軍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同志，我們的關係很好，什麼話都可以說。我對蕭說：「學習三年都學糊塗了，連話都聽不懂了。我把蕭華以前同我說的話也對他說了。」

蕭向榮說：「我聽了你昨天說的那幾句話，就知道你心中有氣，你說的那些話，別人一聽就懂得是說不務實際的人。看起來你真是真的不懂早晚時價了，現在有的人把政治強調得過頭了，又非要別人跟著說一樣的話，不然，輕則說你沒有政治水平，重則就說你反對政治，對此祇有不說話，別的辦法是沒有的。」

我又問：「林總對加強政治工作（當時還未提出突出政治）的基本精神怎樣？」

蕭向榮說：「林總是注意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但和他們說的不一樣。林總的基調還是過去的提法，部隊要有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才能提高戰鬥力，幹部才能做好工作。」

蕭向榮同我的談話，使我受益不淺，對政治同業務的關係這個問題就心中有數了。我心裏想，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有兩條路：跟著說空話的人一起走，或者自己走自己的路。我既然不盲從，就要好好想想，把問題想通，才能有勇氣去進行鬥爭。

我軍的政治工作是什麼？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搞空頭政治的人認為，政治工作的任務是特殊的，同行政任務是不一樣的。做政治工作幹部，應該站在空中手舞足蹈的指揮一切，才能顯示政治工作的威力，這是絕對錯誤的。基於這種錯誤的認識，必然導致政治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政治工作的任務同行政工作業務工作的任務是一致的，政治工作沒有單獨的任務。這是早在四十年代初毛主席對譚政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就是這樣批示的。空頭政治派，不願承認這一點，標新立異另搞一套是沒有出路的。

我軍強調政治工作重要也是正確的。但這個重要正是爲了完成任務的需要，並不是離開實際需要去空談別的需要。例如打仗，政治工作就要保證完成戰鬥任務；農副業生產，政治工作就要保證完成生產任務；軍事訓練，政治工作就要保證完成訓練任務。離開了真正的需要，去搞別的什麼花樣，政治工作就不能成爲保證作用，而會成爲破壞完成任務的反作用。後勤工作是軍隊的管家，並且祇要管上了的事，就應該管到底的。難道這就是我的單純業務觀點嗎？後勤部長不管業務，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官僚」部長。

空頭政治派使用了三根大棒打擊我不突出政治的「罪行」。

第一根大棒是：單純業務觀點。

1、關於拍賣戰備物資問題。

對這個問題，主要指責我對業務工作抓得很緊，致使別人「無事可做」，指責了我三件事。前文提到過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軍隊要貯備三百萬人打一年仗的物資。從一九六二年起，我們就有計劃的用積少成多的辦法，貯備戰備物資，我們已經貯備了相當數量的物資。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冬，我向周總理簡要匯報過軍隊的戰

備物資情況，總理聽後說：「感謝你為我辦好一個日夜擔心的大事。」李先念說：「還要繼續增加貯備，不怕多，祇怕少。」我們遵照周總理、李先念（他是國務院管戰備的當事人）的指示，繼續積極增加物資貯備。

大約是一九六三年春，總後主要領導人把豐臺倉庫貯備的戰備物資、鋼材、機電物資等，同意賣給山西省政府數十萬元的物資。對拍賣戰備物資，倉庫的領導幹部感到不可理解，於是就直接向我打電話報告了。我立即命令，物資不准出庫。此人很顯然對我不滿，但又不便提什麼理由來，於是就向蕭華告了我一狀。他首先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賣給山西的是「積壓」物資，然後即以憤怒的口氣指責我：「個人說了算，別人什麼都管不了，一點權力都沒有。」爲此，蕭華找我去談過一次話。我們談得很不好。

蕭：「總後領導人之中，現在對你有意見，你知道嗎？」我說：「知道，何止現在對我有意見，我還沒有上任之前，就對我有意見，恨我佔了他的位置。」蕭：「對老資格要尊重，否則就團結不起來。」我說：「怎樣尊重？我放棄自己的職責？軍委如果有這個意圖，我就立即離開，把位置讓出來。」蕭：「事情有這樣嚴重嗎？某人向我寫了一個報告，他說是爲了照顧同山西的地方關係，賣給了他們爲數不很多的積壓物資。（邱：積壓物資？）爲一個具體問題，你恐怕看得過重吧。」我說：「好吧。我回去即向軍委寫個檢討報告。中心內容是『我反對某人賣戰備物資是不對的。他也是首長，我反對他拍賣物資就更不對了。』蕭：「這樣寫對嗎？需要寫檢討報告嗎？」我說：「我盡職責不行，寫檢討又不行。我該怎麼辦？」蕭：「報告不要寫了，今天就談到這裏。」

蕭華是軍委第一副秘書長，他是軍委領導集團之內僅次於羅瑞卿的人物。我們之間的談話，我是有意把問題擺到他面前，看他怎樣處理，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蕭似乎意識到了我是對的，但又不願意表態，所以談話就祇好不了了之。

2、關於青藏線運輸改革問題。

一九六三年夏天，總政、總後各一位領導人在蘭州召開了表揚青藏兵站的運輸革新會議。在座談會快要結束時，總政領導人提出了問題。他說：「汽車運輸可否像火車一樣，即司機分段執勤，汽車不停。」對這個問題，當即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可以試行，一種是反對。由於有人擁護，

又加上青藏辦事處主任立即提出了「堅決執行首長指示」，於是兩個汽車團就擔任起試驗任務了。

擔任試驗任務的兩個汽車團，約有汽車一千輛。因為汽車司機不足，祇組織四百輛汽車參加試驗，其結果是：由青海到達拉薩為六晝夜，縮短了一半的時間。汽車單程在途中拋錨約百分之二十五，回程空車在路上拋錨的約為百分之十五。一趟來回共拋錨汽車百分之四十，近一半汽車沒有了。青藏辦事處的試驗報告，對縮短時間提高運輸效力方面報告說得很生動，對損壞車輛方面，祇提到「汽車也有小的損壞」。提出問題的人看到報告之後大喜，立即下令全線數千輛汽車全部實行「人歇車不停的運輸革新」，並提出了號召：爭取任務半年完成，部隊開回內地整訓。

「運輸革新」對車輛會造成大破壞是常識問題，並且開始試驗就看出來了，但辦事處不向總後報告真實情況。九月間，我從外地回到北京，才察覺了這個問題，並採取了三種措施：1、立即停止「運輸革新」，突擊搶修車輛；2、新調三個汽車團支援青藏的運輸任務；3、派強有力的工作組檢查青藏辦事處的工作。

九月底，總政、總後搞「運輸革新」的領導人高興地去向蕭華匯報，他津津有味的說個不停，蕭華聽得高興之餘還說：「你們兩個創造性地解決了總後勤部加強政治工作經驗。」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匯報會議正進行時，總政袁子欽秘書長急急忙忙給蕭華送來了一份急電，電報是總後工作組的檢查報告。報告內容：「運輸革新，造成青藏線上汽車損失慘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汽車不能行駛了，沿途到處都是拋錨汽車」，蕭華把電報給匯報人看，並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說：「人的積極性是調動起了，辦事處的領導幹部沒有組織好。」匯報草草結束了。

羅瑞卿總參謀長看到西藏軍區「供應告急」的報告，又看到總後青藏檢查組的檢查報告之後，叫我去詢問情況。我簡要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和嚴重情況。羅聽了我的報告之後，祇向我說了兩句話：「你已經把問題處理得很好。我們都要有必要的忍耐！」我懂得他講話的意思，什麼話也沒有說了。在一次辦公會議上，羅總長對蕭華說：「青藏線上發生的事情夠嚴重了。有的人可以不做任何工作，也不要去做外行的瞎指揮。」蕭華沒有說話。

3、關於平調產品資金問題。

一九六五年夏天，總政、總後有兩位領導人對中南地區的軍需產品質量問題寫了一個報告，並附上了幾件實物。

他們認為對軍需產品質量的要求過高了，他們的觀點是：「軍需品中的多數都有使用時間，質量不需過高」。他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軍需產品不能以平時穿著的時間來論質量，而是要以作戰要求來論質量標準，我們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後一種觀點。

軍委辦公會議把這個報告列入了審議的議題之內，他們二人出席了辦公會議。羅總長把報告放在討論的最後面。辦公會議將要結束時，羅總長宣佈：「還有一個報告不討論了，所提問題由邱部長處理。」他們兩人坐在一起聽到羅的宣佈之後，立即起身就走了，他們對軍需產品的報告，事實上是向軍委告我的狀的。我看到他們的報告，我沒有考慮怎樣對待他們，他們也沒有料到羅總長會採取不理的態度。

從上面三個問題來看，我是在認真管理業務，還是「單純業務觀點」？事實完全回答了問題。

第二根大棒：單純生產觀點。

總後有很多的企業，工廠、農場、馬場，同當時國務院的工業部門相比，總後是名符其實的一個生產部門。生產是總後的重要任務，我當然要用很大的精力來領導關心生產。

空頭政治派是反對軍隊自己搞生產的，他們對工廠、馬場的生產向來不聞不問。在這裏主要是簡要說一下，他們對軍隊搞農業生產的態度，他們總的目的是想抓到農業生產中的一些什麼問題，以便給我致命的打擊。

一九六一年軍隊農業生產，是在全國災情到了嚴重時期，部隊面臨餓肚子的情況下開始的。軍委各元帥對部隊的生活是最為關心的，林總則不斷過問部隊的生活和農副業生產。但總政對部隊生活根本看不上眼，從來不過問這方面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軍的政治機關是有權有勢的。由於總政反對搞生產，部隊政治機關同樣有反對生產的，因此，不斷發生指責刁難生產的事件。

一、人畜不分。這是北京軍區首長在軍委辦公會議，指著我的鼻子說我同天津駐東局子的部隊共同搞在稻草裏取澱粉的事。

二、與民爭利。這是福州軍區首長的指責。這主要是指向地方要土地之事。軍隊除營房之內有些空地之外，別無寸土，要自己種菜和糧食就要有土地。為此國務院曾發出通知，要地方政府照顧軍隊用地的實際需要，經過協商辦理，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個別地方確有與民爭利的，當然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三、破壞資源。這是內蒙打黃羊的問題，內蒙打黃羊是存在嚴重問題，也是周總理很關心的，對內蒙打黃羊的問題，總理曾派我去處理了。

四、十個人殺一頭豬。這是《解放軍報》記者的指責，主要是指部隊對改善生活感興趣，記者反映：某連隊殺一頭豬，派了十個人幫忙，還有爭著要去的，反之，助民勞動不願去了，這是一個反常現象，部隊正在向吃好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羅總長在該簡報上批示：「部隊生活好一點不好嗎？但從來沒有看到部隊吃不飽的反映。」

五、流行菜餚經。《解放軍報》記者寫了一篇部隊生活報導，其中有一段提到：某部一個連隊在政治學習，炊事班長來叫人幫助下廚。班長說：「今天的伙食要改善改善。」三個做菜的能手同他一起走了，此時全場活躍，大家七嘴八舌地大談菜餚經了，在兩小時討論時事政治的時間裏，很多人都在談與討論題無關的內容，對怎樣做菜談得津津有味。總政治部在一份簡報上把這一段摘錄出來了，並加了一個標題：「部隊向何處發展？」

六、食物中毒。某軍區以司令部、政治部的名義發了一個通報，主要內容是防止中毒。防止食物中毒是部隊的管理工作，但通報的內容則把中毒歸罪於部隊搞生產的後果。

七、會餐過多。部隊生產發展起來了，生活確實好起來了，不少部隊平時吃的一般化，每個星期天一定會餐。這本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祇要加以管理就行了，但有的部隊則指責生活好了「平時影響訓練施工，戰時會影響士氣」，這是對生產毫無道理的指責。

八、幹部生活特殊化。連隊農副產品很多，有的幹部下連隊總喜歡「順手牽羊」帶些食物回家，這也歸罪於生產搞好了的過錯。

九、家屬不願回家。這確實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特別是一九六三年秋冬以前，來隊家屬更多，部隊對來隊家屬管吃飽飯，幹部戰士很滿

意。這不是搞生產之「罪」，而是一件好事，生產發展了，部隊才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

十、事故增多。部隊搞生產確實出了不少事故，當然有值得教育批評的地方，但部隊軍事訓練，國防施工出的事故還少嗎？這又是什麼問題？

此外，還有許多指責。軍隊搞生產受到了這樣大的壓力，不是我頂住的，我可沒有這樣的能耐。軍隊的生產所以沒有被壓垮，主要原因是：1、毛主席、軍委支持軍隊搞生產，這是最大的力量；2、林總和各元帥不斷親自過問部隊的生產、生活情況，特別關心部隊不能發生浮腫病；3、形勢所迫。在全國嚴重災荒的情況下，軍隊祇有生產自救的道路，才能解決問題，別的辦法是沒有的；4、軍隊生產代表了廣大指戰員的利益，從而調動了廣大指戰員的生產積極性，軍隊搞生產是一件流傳千古的大好事。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軍隊搞生產決不是我的什麼「單純生產觀點」可以辦得到的，我祇是在軍委領導下，做了應當做的工作。也可以說，在搞生產的問題上，我是當了一名合格的總後勤部部長的。

第三根大棒：軍純財務觀點。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對我的指責不僅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是想加我大罪。這裏祇能舉些例子來說明問題。

第一個問題，實行企業化單位的財務核算問題。在軍隊逐漸減少定額的情況下，有些單位要取消，不能繼續存在，例如建築部隊、營房維修分隊等等。對這些單位怎麼辦？這是大軍區以上都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二年全國編制裝備會議期間，總參軍務部要我提出解決辦法來，經過考慮我提出了「編外定編，實行企業化管理」的辦法，這樣既可保留必要的勤務分隊，又不佔軍隊編制。我的意見得到了羅總長和各大軍區首長的贊同。

第二個問題，以高價買軍需產品「使用時間」問題。我的觀點是軍需產品是一種特殊用品，質量是起決定作用的。有的產品因為質量好，使用時間長，反而更便宜。對此，在濟南布鞋廠，我同工廠展開了討論。該廠生產的布鞋一般的來說是比較好的，但祇能穿一個多月。如果提高質量，能穿三個月，成本提高五角，前者便宜，還是後者便宜？他們

同意了我的觀點，後來生產的布鞋能多穿兩個多月，但成本祇增加五角錢。

第三個問題，組織家屬搞服務性生產問題，部隊來隊家屬，有不少生活很困難，來了就不回去。當時社會上還沒有打臨時工的工作，而部隊組織家屬生產，則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家屬搞服務性的勞動雖然不多，但還是有一定出路的，例如縫補、洗舊棉衣等都可得到少量的收入，這是後勤部隊做的好事，受到了家屬和部隊親屬的歡迎。

第四個問題，部隊出賣農副產品問題。部隊搞生產之後，不少部隊的農產品有多餘的，自己消耗不了，怎樣辦？我向周總理報告了，總理立即回答：「向群眾出賣，越多越好。」並要秘書通知商業部照辦。

第五個問題，財務包干問題。前面專門提到了這是後勤業務改革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其它的改革都是空的。當時，主要是要辦的事很多，但國家撥給的費用總是有限的，不能滿足部隊需要是主要矛盾。

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召開的全軍後勤工作會議期間，大家在討論後勤工作突出政治的總結時，一致認為「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以下稱三勤），是後勤工作思想建設的方向」，是後勤戰線的思想武器。一切工作都有自己的方向，後勤工作也應當有自己的方向，而三勤就是後勤工作必須遵循的總方向。

後勤工作是保障工作，保障作戰、保障訓練和保障部隊生活。而這些保障工作，在形式上都是服務性工作，要完成這些工作就必須具有「三勤」思想，這也是要有服務思想，節約的精神和有辦事的能力。我們要在學習和實踐中，不斷提高認識，才能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用「三勤」指導我們的行動。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就要做到三個認真，認真改造世界觀，認真管理業務，認真總結經驗。

一、認真改造世界觀。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不管自覺不自覺，都有立場、觀點、方法問題。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批評總後勤部，「不過問也不認真管理業務」。這是什麼問題？就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當官做老爺。

的問題，也就是兩種世界觀的問題。在革命隊伍中，有進步與不進步之分，這是什麼問題，就是改造世界觀的程度問題。凡是世界觀改造得好好的，進步就快，反之則不進步，或進步很慢。改造世界觀不是一勞永逸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畢生的問題，應當是活到老，改造到老的問題。

二、認真管理業務。後勤工作是複雜的業務工作，管好業務是我們的職責，後勤工作不管業務或長期當「外行」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不能用任何理由去推脫自己的責任。後勤幹部不會業務，就如同和尚不會唸經是一樣的，不會唸經的和尚是假和尚，不會管業務的後勤幹部是什麼？那就是官僚主義。當然我們所說的會管業務是相對的，比如說，一個後勤部長要精通後勤的各種業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也還是一個不懂業務的後勤部長，但我比過去懂得多一點了，比如說，我過去祇懂汽油這個名稱，現在知道汽油有多少種，我們祇要學習是會多懂得一點的。

事業心是管好業務的根本問題。不可設想一個沒有事業心的人，能夠管好任何事業。這種人祇能是當官混日子，反之，一個有事業心的人是不會管不好事業的。事業心、責任心是一致的，一個人有事業心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自己所管的事有高度責任心。總之，在我們後勤戰線上是值得發揚事業心和責任心，沒有廣大幹部的積極努力是做不好工作的。

規章制度是管好業務不可少的，我的觀點是要有規章制度，但反對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用規章制度束縛解決具體問題。規章制度是一般性的，實際情況是複雜的、現實的，在工作中應當很好結合起來。對現行的規章制度應很好總結、改革，使我軍後勤的規章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切合實際，更能促進業務管理工作。

要管好業務，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學習業務。幾年以前，我提出過「學知識，立規矩，鼓幹勁」，提倡學習業務。我們要學習必要的業務知識，更要學習管理業務的知識，後者是學習的重點。業務是具體的，各有不同的特點，但從管理的意義上來說，有共同點，這就是領導幹部學習的重點。

三、認真總結經驗。近幾年來，我們全軍後勤部注意到了總結經驗這個問題，有的軍區做的還比較好，整體來說，發展趨勢是好的。我們

後勤戰線上可歌頌的事情多得很，各種發明創造，各種典型多得很，但我們總結出來的東西則是很少的，總結好的則更少。

人們的認識總是從感性到理性，從少到多從分散到集中，從雜亂到系統。我們祇有把零星的感性認識，集中起來上昇到理論知識，其作用就更大了。現在我們後勤系統似乎有這種傾向：對好人好事祇注意表揚，評上四好五好就行了，這樣做是很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很好總結他們的經驗，把分散的東西集中起來，系統起來，成為指導工作的經驗。

總結經驗是提高思想水平的主要途徑。一個人不可能事事都實踐，但學會總結經驗，學會把別人的實踐經驗總結起來，成為自己的經驗是決不可少的，總結經驗是領導幹部最為重要的實踐活動，我們一定要學會總結經驗。總結經驗，不要貪心過大，華而不實，一鳴驚人，一般的來說，這是不現實的。最靠得住的辦法是從個別問題開始，深入進行，逐漸擴大、提高。對事物的認識，不怕粗淺，質量不高，最怕的是不去實踐。我希望全軍後勤部門，改進作風，重視總結經驗，把後勤建設再提高一步。

我們後勤工作突出政治，也有它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從後勤的共同性來說，有三個具體問題是學習的重點，這就是：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勤懇辦事，就是要有誠懇的服務態度。後勤的各項工作，都是直接或間接為廣大指戰員服務的，都是屬於服務性的工作。這是後勤工作的特點，我們必須深刻認識這個特點，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樹立勤勤懇懇為部隊服務，全心全意為部隊服務的思想。

做到勤懇辦事就要有實幹精神，後勤工作是很具體的，都是要動手動腳才能做好的。我們做後勤工作的，都要當「有頭腦的事務主義者」，一方面要有政治頭腦，一方面要勤懇辦事的作風。我們要反對那些動口不動手的官僚主義者。現在全軍後勤都在大搞服務上門，物資下送，醫院不少專家也到部隊去了。這是非常好的要堅持下去。

勤儉辦事，就是辦一切事情都要講究實效和節約的原則。我們後勤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管錢，管物。管得好，就叫管家，就叫紅色管家人；管得不好，就叫敗家，就是「敗家子」。我們突出政治，就是要把我們革命業務管好。怎樣才能管好革命的家務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樹立高度的

命責任心，要管好革命家務，就必須對工作極端負責，時時刻刻想到把工作做好，責任心的強弱，是一個人政治覺悟高低的表現。

其次，要自己動手。想問題，辦事情，要立足於自力更生的基點上，首先要看到自己的雙手，相信自己的創造能力，不能大小事情總是眼睛向上。自力更生是革命精神，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源泉，這個方針運用到我們軍隊後勤工作上，就叫做自己動手。近年來，我們自己動手搞生產，搞科技革新，搞建設，以至每個戰士一個針線包修修補都能解決很多實際問題。我們自己動手，不僅能解決自己許多問題，還能減少國家的負擔，這就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支援，也就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行動。

勤巧辦事，這就是說要又紅又專。管業務工作，一定要解決會辦事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為部隊服務的實際本領。如果我們不懂業務，不會辦事，那就談不上突出政治，我們反對空頭政治，也要反對祇會說話不會辦事的空頭業務。我們做業務工作的，如果不懂得實際，政治也是空的，因此，我們一定要在政治掛帥的前提下，熟練自己的業務技術，提高自己的辦事本領。

第二十章 軍隊的風雨歷程

林總推選羅瑞卿為總參謀長

一九五九年，羅瑞卿出任總參謀長是林總推薦的。羅瑞卿並不是以戰將的身份出任總參謀長的，但他是一位名將，是軍隊十員大將之一。可主席認為羅渾身都是「刺」，問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說不怕。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不太同意羅幹；林總說「不怕」，是有點堅持自己的意見。後來還是總理給主席做了工作，總理對主席說（大意）：你讓林管軍隊，他那個人的身體狀況，也祇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體工作要找個他熟悉且身強體壯、精力充沛的人。毛主席最後批准了林的意見。

林和羅的關係，淵源是很深的。早在一九三〇年林彪當紅四軍軍長時，羅是四軍十一師政委；林任一軍團軍團長時，羅是軍團保衛局長；在延安，林是紅軍大學的校長，羅是教育長。他們在戰爭年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在槍林彈雨之下，結成革命的情誼。

林的確是用人不疑的，對羅瑞卿是特別地委以重任。除總參謀長這個重要的職務外，羅還擔任軍委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召集人。林總身體不好，難以參加日常工作，爲了給羅瑞卿創造更好的工作條件，林總提議羅瑞卿爲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要職，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歷屆總參謀長頭上掛的職務，數羅最多，比如副總理一職，粟裕、黃克誠都不是。

林總選羅瑞卿當總長沒有什麼錯，羅也是能勝任的。羅瑞卿是很有革命幹勁的人，魄力大、幹勁足、責任心也很強，工作是盡心盡力。羅確實也爲林彪、葉群盡心辦過很多事，對他們的子女豆豆、老虎的生活、學習都很關心。

不過，幾年後主席關於羅渾身是「刺」的話言中了，羅的「刺」刺到了林彪身上，刺到了老帥身上，刺到了不少軍隊老幹部身上。林彪不

怕羅的「刺」，並不等於別人不怕。例如六四年的時候，供應比較緊張，葉帥的弟弟葉道英在華僑事務部門工作，他搞了一點自行車的票證，這件事屬不屬實且不說，就是有其事也與葉帥毫無關係，結果組織人在會上把葉帥圍攻了一頓，敗壞葉帥的名譽。羅垮臺時，喝酒慶祝的，不乏其人。

一九六三年九月間，林總是太累了，身體情況極其不好，一下就病倒了。毛主席叫他休養，抓住大政方針就可以了，並指定軍委副主席賀龍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林總一隻「猛虎」休息，「群龍」就湧動起來，關鍵人物是羅瑞卿。羅瑞卿像一個砝碼，在毛主席對劉少奇、對黨內一線工作有看法時，劉少奇、鄧小平對毛主席有隔閡時，如果羅瑞卿堅持站在林彪這邊，就等於站在毛主席這邊，這樣主席就放心，這也是毛主席、「一」（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這邊，這樣主席就放心；如果羅瑞卿和賀龍搞在一起，疏遠林總，不聽林總的，那毛主席就認為問題相當嚴重了。賀龍和劉、鄧，和一線的書記處是密切的，軍隊的事情，如能被這些人所左右，主席是不能容忍的，主席是必須防範的，必須採取措施的，毛主席歷來對軍權極為重視，不許他人染指的。從林總休息開始，軍隊的情況從有微妙的變化到逐漸有了很大的變化，當然這些問題是不能說出口的，林總只能批評羅，爭取把羅拉回來。但羅瑞卿讓毛、林都失望了。羅有了私心，他把寶押在「林總的身體不會好起來」上面，他這個砝碼倒向了賀，再有就是幾年的工作成績讓羅有些忘乎所以，沒有剛上臺那樣謹慎了。

賀龍、羅瑞卿能夠搞起一個與林彪對立的陣營，其基礎與軍隊歷史上的山頭是有密切關係的。

一九五九年反彭德懷鬥爭的時候，陳毅專門介紹過林彪的歷史。他說：林總在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的時候，在葉挺獨立團擔任排長職務。向廣東轉移的時候，我們在廣東大埔三河壩，和敵人遭遇，林總擔任連長的特務連向指揮部靠攏，我們得救了，後來林總帶的隊伍就成了我們繼續戰鬥的主力了。在湘南暴動的時候，林總帶的連隊戰鬥力更強了，一直是整個部隊的主力。從南昌暴動上了井岡山的部隊就編為紅軍二十八團，林總就是二十八團的團長。林總帶的二十八團是當時紅軍部隊的主

力，紅一軍團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林總二十一歲的時候就當了師長，二十四歲當了紅軍第四軍軍長，後來長期擔任一軍團軍團長。一軍團出了許多優秀的高級幹部，並一直為毛主席器重和依靠。林總對創建這支主力軍團是有重大貢獻的。

歷史上，我軍的三個大山頭是一、二、四，三個方面軍，但其中有些

人的歸屬則有不少變化。這三個大山頭的特點是：1、一方面軍的幹部最多，並且有很多能人。其次是二方面軍，幹部也不少，但能人比較少。又次之是四方面軍，幹部數量不少。2、在黨、政、軍各界擔任要職的情況，也是一、二、四方面軍的順序。3、三個山頭的代表人物實際上

是彭德懷、林彪，賀龍、徐向前。從個人的歷史功績、威望、能力來看，林彪當然屬於第一位的；徐向前由於張國燾及四方面軍的原因，他本人很謹慎；因此，能夠和林彪的陣營相對立的，祇有賀龍的山頭。從搞山

頭的真正意義來說，賀龍這個山頭甚過所有的山頭，在全國解放後也始終是緊密團結的。不僅如此，賀龍還在彭德懷下臺、徐海東得病後，能夠拉過來的三軍團、十五軍團的無「家」可歸的人都收在自己門下了，

賀龍把他們都團結得很好，他甚至說：「茅臺酒勝過黨性。」賀龍還同最高層一些人如鄧，有最為密切的關係，因此，賀龍在黨內鬥爭中是能起「砝碼」作用的人物。賀龍能把好多人拉在一起，特別象羅瑞卿這樣的人也在

利用賀龍做事。羅瑞卿的問題是由林彪身體不好引起來的，如果林總身體好，還在崗位，羅是不會離開林總的。當時林彪的身體確實不好，有一段極其不好，毛主席對林彪的身體很擔憂，專門為他書寫了曹操的詩

《龜雖壽》，並派汪東興帶上自己相當數量的稿費去看他。一九六三年，

在林彪休養前，毛主席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並說：「軍隊的工作，今後就靠你了！」毛主席對賀龍說的這句話，就是林總後來說的毛主席的話

「一句頂一萬句」最原始的來源。毛主席的這句話確實引起了賀龍、羅瑞卿的心事，從此開始，他們二人就在林總身體上做文章了。

羅瑞卿的變化

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之後，我開始感到羅瑞卿同以往有極大不同，這就是羅對賀畢恭畢敬竟到了庸俗的程度。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深思，羅瑞卿當了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之後，以我的觀察，除了對林

總是五體投地的尊重之外，對劉帥也還可以，對其餘的元帥都幾乎不在其眼中。現在對賀的尊重，比對林的尊重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我還認為，因羅同賀歷史上沒有共事的關係，所以羅對賀這樣做是顧全大局的，應當這樣做的。後來，賀、羅對林總的身體同時「憂慮」起來，我就有了新的想法了。

賀龍、羅瑞卿在林總的身體上下賭注是有理由的，他們要大家聽他們的，除了以「關心林總的心情」向大家說明林總的身體是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之外，用任何辦法要在林總身上打主意，不僅不可能，反而會適得其反。因為林總的歷史功績，在群眾中的威望和才幹，是別的任何元帥都不能與之相比的，賀、羅的政策可謂是高明之極了。

羅瑞卿對林總身體的「關心」確實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了。羅瑞卿過去的講話，三句話有兩句都要帶上林總如何說的，如何高明，以後的講話則三句有兩句都要帶上要如何關心林總的身體。他甚至講過「我們身上的血肉，如果對林總的身體有利的話，我相信大家和我都會慷慨的。」

羅瑞卿把大家與林總隔開是用了很多辦法的。首先是，動員大家不要干擾（看望、匯報）林總，其次要軍委辦公廳蕭向榮總把關，對「隨便干擾了林總休息」的人，還要給予批評。他的這些辦法，有效果但效果又不理想。於是，後來就把傅連暲抬出來了，傅在一次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上說：「我們對林總是盡量爭取他多活些時間，別的辦法是沒有的。」他的話，給人的印象是「林彪是在熬時間了」，這席話，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有些人就開始找自己的出路了。

在兩個陣營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從數量上來說，幾乎相等，但力量懸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陣營有一批能人，這是優於賀、羅陣營的，尤其是林彪同毛主席的關係特別密切，這也是特別的優勢。賀、羅陣營雖然有同劉少奇、鄧小平的關係，但他們同毛主席的關係就大大不如林彪了。這個不如，在某種程度上起決定作用。另外，在軍委內部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是支持林彪的，這樣，賀龍在軍委內部幾乎成了孤家寡人。

兩個陣營的鬥爭是很激烈的，但鬥爭的辦法大相逕庭。林彪除了保護自己的人不受打擊外，一般不挖別人的。他認為把別人的收來沒有用，反而成了包袱。賀、羅不同了，他們除了保護自己的人外，還

盡量收羅別人的人，他們認為人越多越好。像我這樣在軍內地位普通的人，在總醫院住院時賀、羅都去看過我，羅還去過兩次。賀龍請我到他家去吃飯，那就不止一次了。

軍隊內部兩個陣營的形成

在軍委內部，由於對軍隊建設的方針看法不同，就逐漸形成兩個對立的陣營。

兩個陣營鬥爭開始表現在對譚政下臺問題上。林彪對譚政的工作能力向來是不滿意的，四野進關時，為了加強政治工作，林彪特意調陶鑄擔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批評總政的工作「四平八穩」沒有創造性。對林彪的批評，譚政沒聽進去，他就是個四平八穩的人，實在沒有能力領導總政，他祇是吞吞吐吐地說幾句要「改正」之類的話，就沒有下文了。在林彪不在場的軍委常委會上，有的人還常說點帶有挑撥性的話，例如，有人說：「你們總政治部那樣多秀才，多寫點『領導』呀，『第一』呀，『鼓勁』的文章有什麼難啊！」有的人則消極地說：「做不好就到他那裏（指邱會作）養馬去。」他們之間這類話說多了，就傳到了林彪那裏，林彪就不能不考慮總政主任的人選了。

當林彪提出要另擇總政主任的人選時，軍委內部出現了激烈的鬥爭，提出了好幾個人選。最後，林彪把提出來的人選都提到毛主席那裏去了，請毛主席選定。毛主席最後決定，由羅榮桓兼任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為第一副主任。蕭華反對譚政是積極的，但收穫不大，自然心裏有想法，這也是後來羅瑞卿把他拉動了的原因之一。

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他們真正是戰友加兄弟，情誼很好，相知很深。但羅有了「心思」之後，他就拉動了劉，林總是心知肚明的。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在江西擊落一有人駕駛的電子偵察機，十一月一日空軍導彈在江西擊落 U-2 偵察機一架。另，一九六四年二月軍委在北京召開學習空軍經驗現場會。林彪聽了匯報後說：「空軍的建設有成就，對空軍應當宣傳一下。」這是學空軍的直接由頭，但還有它的深層原因，林彪知道劉亞樓和羅瑞卿混得過密，經過反覆考慮提出向空軍學習，從而拆散羅和劉的不健康的關係。羅瑞卿對林彪的這一舉動感到突然，他說：

「我們真跟不上林總的思想，學空軍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他在表面上採取了擁護的態度，卻又在辦公會議上說：「學空軍是有政治目的的。」

軍委決定全軍學習空軍的第三天下午，楊成武約作戰部長王尚榮和我一同去空軍參觀。劉亞樓、吳法憲、曹里懷等空軍領導同志都在辦公樓門前迎接我們，我們參觀了空軍的內務、衛生等後，劉亞樓等陪同我們在食堂吃了晚飯，整個接待搞得十分熱情。飯後，我們在劉亞樓家裏閒談時，我問楊成武：「蕭主任為什麼沒有來？」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卻說：「林總說，觀其人先觀其友，你懂嗎？」楊的這句話引起了我許多複雜的想法。

學空軍的時間不長就結束了。羅瑞卿對此一直是消極的，他除了在三座門主持了一次劉亞樓向駐京部隊的匯報會外，其餘沒有參加什麼活動。經過學習空軍的活動，軍委內部兩個陣營站了一次隊，誰站在那一邊都清楚了。

全軍大比武

從一九六四年六月開始，全軍開展了大比武活動，這場大比武的規模，在我軍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海軍在青島舉行了海軍各兵種最大規模的現代化實戰演習，空軍部隊有少數單位進行過以師為單位的實兵演習，各大軍區都進行過全區性的部隊大比武，羅瑞卿等紛紛親臨現場觀看比賽，其排場之大也是空前的。大比武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作用，但搞比武、搞演習中出現的弄虛作假、錦標主義、揮霍浪費比比皆是，也是空前未有的。由於大量的經費用於比武，軍事訓練等費用多開支五億多元。

為了大比武，一九六四年底羅瑞卿在南京召開了全軍陸軍軍長以上的幹部會議，祇有一個軍長因病未到會，還受到了羅瑞卿的批評。會議開始之後，羅要秘書通知我也去參加會議，我也應當去參加，但我因為當時有事脫不了身未曾去，派了副部長張賢約去參加會議。南京大比武回到北京後，在一次軍委辦公會議上，楊勇向我開玩笑說：你怕花不起錢，南京開會都不去。我正要回答時，羅瑞卿以相當嚴重的神氣補充說：「官大了，還能隨便請得動？」對羅的話，我很驚訝，但由於我同羅並非「兄弟」班子，他是我的上級，現在又那樣的嚴肅，我就一句話也不說。

了，但引起我心裏好多的想法。為什麼羅瑞卿會出現這樣一種態度？在我心裏總是放不下。過了幾天，我是在楊成武那裏無意中搞清楚了這個問題。

一天，我到楊成武那裏有事，聽到他交代秘書說：「你同張宗遜副總長打個電話，明天總參黨委會議，請他主持，我有別的事就不到會了。」他接著好像自言自語說：「會議除討論大比武之外，沒有別的內容。想用開黨委會的辦法，也把我套在大比武之中去，沒有那樣簡單。」其實，他不是自言自語，是說給我聽的。從上面兩句話，我心中不解的問題有初步答案了。為了要搞清楚一點，我又問了楊成武一句話：「天津的大比武，聽說盛況空前，你參加了嗎？」楊成武笑著說：「比武也好，比文也好，好戲還在後頭呢，我才不去。你也是辦公會議成員，全軍大比武，什麼時候軍委批准過？什麼時候林總同意過？」當時，楊成武確實是不折不扣的林總的代言人，他對大比武的態度就是林總的態度。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當時還是不清楚的，但不管怎麼樣，從此我對大比武就慎重對待。果不其然，在一九六六年北京批羅時，羅瑞卿在三月十二日的檢討中承認「這次大比武是我個人擅自決定的。現在看來，重開一次那樣興師動眾的南京現場會議，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而且把軍委主管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大比武帶來的嚴重惡果，劉志堅同志歸納了八條，張宗遜同志歸納了四條，全軍比武資料上歸納了十條，邱會作同志特別講了經費、物資、彈藥的驚人浪費，在軍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張宗遜副總長是主管軍事訓練的，曾數次要我組織一次全軍後勤系統的大比武。張說：「現代化的戰爭後勤保障佔有重要的地位，沒有現代化的後勤，也就不可能進行現代化戰爭。組織一次全軍後勤的大比武，實屬必要。」我半開玩笑的回答說：「後勤沒有武可比，也沒有文可比，比吃還可以。」我總是用些沒有什麼用的話，把比武的問題拖著不表示態度。一天，軍委常委開會，在會前張宗遜當著賀龍、羅瑞卿的面又問我說：「總後比武的問題定下來了嗎？」賀、羅都主動說：「總後組織一次全軍後勤大比武很好嘛！」要後勤搞比武的問題，權威人士都在向我加碼，我就不好多說話了。我祇能說：「待研究準備後，再向軍委報告。」要組織後勤搞比武問題，總後內部不少人積極性更高，好多人都要我下決心，

並且還得辦得像個樣子。所以，後勤不參加比武問題，我既要應付上面，又要應付自己內部，真是內外爲難。總後在大比武的風裏浪中沒有太大的動作，不是我有多高的認識，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經費問題，如果總後因比武多花了錢，其它單位都會因比武來問你要錢，全軍花的錢就不得了，控制不住。

林總歷來是重視部隊的，他說：「政治同軍事相比較，政治是屬於第一位的。」據我當時的觀察，有的人並不反對突出政治，林彪也不反對搞軍事訓練的，那爲什麼把大比武的問題提高到了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高度了呢？這裏的奧妙是羅在自己的檢討裏說的很清楚：「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除了自己喜歡獨斷專行，不講民主的惡劣作風外，還有個人主義的好大喜功，想在軍事訓練上搞出一點突出的成績來，以便向主席，向黨，向軍委，向林彪同志邀功報捷，動機是很不純的。自己到處跑，到處看，跑了十三處之多，也證明了這一點。」

羅把大比武當作一種手段，他是借大比武突出自己，急於在林彪身體極其不好時，順當的接班。當時，林彪一發覺賀、羅「聯盟」，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由林彪掌管軍隊的初衷，不顧自己很弱的身體情況，就對羅開始批評了，但羅聽不進去。林的舉動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毛主席，在當時來說爲了毛主席就是爲了黨的大局。那時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說法，就是搞大比武衝擊了突出政治。林總進行這場批評的前線總指揮就是葉劍英、楊成武，這就是當時的軍內的實際情況和實質問題。這場鬥爭使軍委內部兩個陣營鬥爭達到尖銳化、明朗化的程度。

全軍大比武，在我的思想上，工作上都不佔位置。這不是因爲我在政治上就有什麼考慮，而是總後的事太多了，確實沒有時間「陪差」。我自己想：「跟著元帥、大將到處跑，出風頭是夠意思的，但是工作沒有人管，就不夠意思了」。除非公差派到我頭上，我一般的都不參加與我工作無關的活動。

劉亞樓、楊成武、蕭華的作用

劉、楊、蕭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長期在紅軍一軍團工作。劉、楊是福建人，都是由地方部隊編入一軍團的，蕭是在江西興國縣直接參加一軍團的。他們三人都有點文化，又肯學習，當時都算是有知識的人。

了。他們三人在當時的條件下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劉、蕭在長征中和長征後期，就分別當了主力部隊的師長、政委。這裏不說他們的歷史功績，祇說說他們在解放後，特別是在軍委內部兩個陣營鬥爭中所起的作用。

全國解放初，毛主席曾委託林彪提出組建海、空軍和特種兵的方案。當時以四野十二兵團的領導機關為基礎組建了海軍，以四野十四兵團的領導機關為基礎組建了空軍，以四野特種兵縱隊為基礎組建了炮兵和裝甲兵。林彪對海軍的建設是既關心又不放心，而對劉亞樓任司令員的空軍建設是既關心又放心。果然，在同時期、同樣以陸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兩個軍種出現了很大的差距，空軍發展很快，海軍出現了落後狀態。一九六二年，軍委組織了一個檢查團，以東海艦隊潛水艇事故為突破口，檢查了整個海軍工作。檢查團是以楊成武為首的，團員有劉志堅（總政副主任）、李作鵬（總參軍訓部長）、張秀川（總政組織部部長）。事後，李作鵬調任海軍副司令，張秀川調任海軍政治部主任，這是對加強海軍建設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

林彪對劉亞樓向來是器重的。劉在林彪陣營中處於很優越的地位，他們是同志加兄弟，林對他的重視是高於蕭華、楊成武的。劉亞樓同羅瑞卿的關係也是十分密切的，羅在當公安部長時期就曾保護過劉的一些「什麼」問題過關，特別是在一九五五年隨同彭德懷出訪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前一天晚上，有某人服毒自殺，羅下命令緊急搶救，沒有發生人命大事，劉也躲過了一場政治責任。所以，後來的羅、劉搞「四條」是有基礎的，羅是發起者，劉是被利用的。一次，羅在辦公會議散了以後，閒談時說了這樣幾句話：「現在中央領導中都讓別人塞滿了，林總這個人向來都不注意自己的地位，更不為別人去考慮。」劉接著說：「我也是同感，我看可以同一〇一談談心。」

林彪把劉亞樓拉了回來，是經過楊成武多次談話之後，劉亞樓才覺悟的，劉亞樓在一九六五年春天最後說：「我把羅瑞卿這個野心家沒有看清楚，真傷心！我認識林總以來，就祇有這一次對不起他！有關向林總提建議的內容都記在一個本子上了，我請你把這個本子交給林總，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劉亞樓的本子之後說：「劉亞樓是個好人。臨動身

之前(即死之前)把問題說清楚了，還是一個好人。這樣他到馬克思那裏就有共同語言了。」

劉亞樓因患肝癌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去世，去世前的四月十五日，他給羅寫了一封信，對羅表示不滿，因為病重，生前沒有交出去。在一九六五年上海會議時，劉的這封信作為證明材料發給了參加會議的人員。劉的這封信比葉群的發言有力量得多，現在傳言鄧小平對此事說是「死無對證」，怎麼死無對證？劉生前的信還在嘛！

林彪對劉的死是很悲痛的。劉病危時，林在上海，一直等到劉去世後才回北京。劉的骨灰用專機送回北京時，林彪和各總部、軍兵種、院校的指戰員代表一千餘人在西郊機場迎靈。劉亞樓的骨灰停放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骨灰盒上是林總的題詞「劉亞樓同志永垂不朽」，對他舉行的追悼會的規格同羅榮桓元帥的規格是一樣的。劉亞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也可以說是榮耀的一生！

楊成武在全國解放後，基本上就接替了聶榮臻在華北的地位。他不僅成了華北地區的領導人物，也成了全軍的實權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楊的地位突然高了起來，他對華北地區的發言權高於聶榮臻，是能夠掌握華北局勢的人物，他對軍隊的發言權僅次於林彪。他對我軍建設做了許多工作，他的貢獻最大的有兩個：一是國防建設；二是對穩定林彪陣營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根據毛主席確定的戰略方針，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國防建設的方針政策，而楊成武則是具體組織實施者。從一九五九年起到，首先以總參第一副總長的身份總攬全軍戰備建設工作，各項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幾年之內就改變了我國有國無防的狀況。這項工作楊沒有完成，一九六八年他下臺之後還繼續在搞。我們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提出了戰略方針，林彪是執行者，林彪提出了作戰方針，楊成武是執行者。領導實施我軍的戰備建設，是楊成武一生中取得的最大成就。

楊成武同羅瑞卿的個人關係也是很密切的，但羅始終沒有把他拉過去。楊成武不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就是在對待賀、羅的拉攏上，同樣保持和林彪這個「病號」革命同志的關係。羅對楊的一舉一動，楊都及時向林彪報告。例如，羅瑞卿把楊的愛人從地方上調來做楊的辦公室主任，羅指定楊住元帥的房子，羅親自交代為楊

配備專用護士等等，楊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辦的。凡是與賀、羅陣營有關係的大問題，楊都設法迴避。例如，對大比武，楊成武連總參黨委會和軍委辦公會議都藉故不參加。

蕭華在全國解放不久就是總政治部副主任，羅榮桓去世後他就成了總政主任。論地位，蕭華比劉亞樓、楊成武早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但蕭華一直沒有起大的作用，政治上沒有多大作為，所以對總政治部的工作，上到毛主席，下至基層幹部都不滿意。

蕭華在軍委兩個陣營的鬥爭中是個動搖分子。他一九六二年被羅瑞卿拉過去了，後來又被林彪拉回來了。一九六三年，蕭在天津養病，羅瑞卿專程去蕭那裏商量有關軍委領導的人選問題。羅同蕭說：「看來，林總的身體不能再堅持工作了，中央要賀老總主持工作不是暫時的措施。」蕭說：「賀老總身體也不好，軍委的領導責任早晚要落在羅總長頭上！」羅很高興地說：「我們合作吧！」像這樣嚴重的問題，蕭華沒有向林總報告說過一個字，而是在羅瑞卿下臺後蕭華的秘書把這件事揭發了出來。林彪爲了團結大多數，對蕭華採取了往裏面拉的政策，這是正確的政策。

蕭華所以能夠被羅拉過去，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的地位不滿意，譚政下臺後，蕭華已經準備上臺了，但毛主席決定羅榮桓兼主任，蕭華仍爲第一副主任，蕭表面上積極擁護，但心裏面是不滿的。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傳達毛主席的決定時說：「主席說，蕭華同志同羅榮桓同志一起主持總政工作很合適！羅出場有點古人味，這樣很好，梅蘭芳在臺上，即使不唱戲，臺下的人也不會說話的。」毛主席這番話，很顯然是嫌蕭華能力和幹勁都不足。爲了照顧蕭華的面子，林總是用他自己的語言說的。

劉亞樓、楊成武、蕭華三人在林彪陣營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楊成武，其次是劉亞樓，蕭華起的作用很小，在兩個陣營的鬥爭中，如果有楊成武的積極活動，不僅鬥爭會發生困難，而且可能發生難於預料的混亂現象。

葉帥打招呼

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了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

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

我當時就想，葉、聶議論羅的問題決不是犯自由主義，葉、聶都是原則性很強、修養很深的人，這樣的意見如不是來自毛主席那裏，他們是不會亂說的。這也說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給主席寫信之前，早在主席召葉群去談話之前，主席對羅瑞卿已有打算了。葉劍英、聶榮臻、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對主席的意圖早已心知肚明了。因為主席找葉、蕭、楊他們談話可以說是瞭解軍隊的情況，但叫謝富治去瞭解公安部的情況，就和軍隊的問題、林羅之間的關係問題毫不相干了，所以，葉、聶二帥向軍隊高級幹部打招呼，應當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決定的，比如不給賀龍打招呼，這麼大的事，葉、聶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卻沒有聽說林彪給誰打過招呼，林也從來沒有找我談過話，講羅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六月間，葉帥又把我叫到軍事科學院他的家中，專門談「長子」的問題。葉帥說：「我才從林總那裏回來，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主席說，『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今天就同你談長子的問題。」

「長子問題？」我擔心沒有完全聽清楚。

「是的！就是談長子問題。你是辦公會議的成員，要起好作用。我們過去信任你，現在信任你，將來也信任你。」

葉談話的要點如下：

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一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注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一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都不放在眼裏，劉帥、徐帥和你（葉）就更不在話下。

林總接著指出：我從一九六一年就開始敲打羅，主席說我是甩袖掌櫃，我就敲打羅，人是我推薦的嘛，總是要負責任嘛！毛主席對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帥管民兵工作，你羅長子要聽嘛，徐帥按主席的指示講，沒

有錯嘛。你羅長子不能要驕傲，你對人家不禮貌，人家說我用的人沒教養，這不對嘛。

林總還說：羅這個人很會裝自己的「腰包」。在南京軍區著手總結的郭興福軍事訓練方法，他開始不注意，後來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勞硬搶過去了。

郭興福教學法是葉帥發現、總結出來的，羅搶了過去，並以大力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為由，在南京召開了全軍軍長以上的會議，除一個軍長因病未到會之外，所有軍以上的軍事幹部都到會了。這是一次興師動眾的「搶功」大會，大會之後並非搞軍事訓練，而是搞全軍大比武了。比武規模之大是空前的，但羅沒有請示，更沒有經過軍委辦公會議。各野戰軍、各軍種、各兵種都比武，形式主義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葉帥說，林總還指出：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一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為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有時還給他們穿小鞋。有的人不願穿小鞋，有時還敢頂起來。

林總曾對他提了兩點：一是，政治與軍事的關係，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頭；二是，要多團結一點人，總是比不團結人好，你待人處事要把我（林彪）放進來，你看不上人家，人家會說你的態度就是我的態度。

林總說：我看對羅還是批評教育，我盡到心了。怎麼解決羅的問題，要主席來定。

葉帥繼續說，對長子的問題，我告訴林總，已按照主席的意圖同聶帥、劉帥、陳老總、楊成武都談過，還要很快同有關同志打招呼，以免他們陷進去，有的會越陷越深。我們共同商定了一個打招呼的名單。第他們陷進去，有的會越陷越深。我們共同商定了一個打招呼的名單。第一步有你一個，然後視情況的變化，打招呼的人還要擴大。要盡量多爭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長子和他同盟的圈子裏去。不過鬍子（賀龍）的問題不要對外人提起。

葉帥最後說：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一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長子急於上臺，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臺。第三，鬍子

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並不多，於是就注意召集「散兵遊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鬍子、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築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帥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

林彪身體不好，出現了好大的政治問題。

毛主席的底牌

主席六二年開始就想扳倒劉少奇，並在準備條件，等待時機，到六五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劉要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你羅瑞卿把軍隊搞成這個局面，能依靠得上嗎？！再說，老帥的「狀」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羅等於他自己也支持縱容了羅，這樣會得罪一大批老資格，毛主席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必須解決。而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羅，這是主席的決定，這是主席端掉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戰略部署。要端掉劉、鄧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書記處中的幹將拿掉，拿住軍權又是首當其衝的，因而，羅瑞卿的倒臺也是首當其衝的，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況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羅瑞卿的問題，主席自己對羅有所警惕了。對羅的問題，主席的確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毛主席任命楊成武爲第一副總長，並指定李天佑副總長管作戰部；六月十四日，又決定楊成武爲軍委副秘書長。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各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主席已經在吹風。所以，整羅，整楊尚昆，及以後整彭真、陸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盤考慮的，把他們當成修正主義，把他們看成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成員來考慮的。並不是像外面所說的：林要整羅，主席要拉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違心地支持了林。

——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下令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停職審查，由楊成武兼代主任，並兼國防部辦公廳及總參辦公廳代主任；

——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楊尚昆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戰備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的批示，批評折中主義就是指羅瑞卿的。毛主席多次找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謝富治、劉志堅等人談話，叫他們收集材料，這些都是為開羅瑞卿的會做具體準備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招葉群去杭州談話（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說，是林叫葉群去杭州主席那裏的），這是主席準備把羅的問題向林攤牌了，也是給林打招呼吧。為此，林給主席寫了一封短信，林自然也是怕在羅的問題上，把自己牽連進去，成為黑後臺。葉群帶上一些材料，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份在整理劉亞樓遺物時劉的家人上交的劉亞樓臨終前（四月十五日）給羅瑞卿的一封信，信中對羅大為不滿（為什麼不滿，還不是因為「四條」的事劉當了炮灰，被林刮了鼻子）。這份材料才是上海會議十一份材料中份量最重的一份。

在文革中，有一次我和胡敏去毛家灣，葉群和我們吹牛皮時，拿著一雙灰色皮鞋說：「這雙鞋跟太高了，你（指胡）拿到祿米倉（總後服裝研究所）給我改成坡跟的吧。」接著葉群又笑著說：「這雙鞋還是羅長子出國訪問時給我帶回來的。羅對我說：『葉群呀，這雙鞋是我出國訪問時攢的零花錢給你買的，不要讓郝治平知道了，祇給郝治平帶了一條頭巾。』一〇一對羅長子是很器重的，羅過去對豆豆、老虎也很關心。那些年，林對羅是出奇的耐心，一直在批評教育他，希望他改正並得到元帥們的原諒，同心協力搞好軍隊的工作。但羅的問題究竟怎麼處理，林總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態度。有一次，葉帥來看望一〇一，一〇一象對不起人似的對葉帥講，我要經常刮他（羅）的鼻子，不要目中無人。葉帥對一〇一講了主席的決心，說主席讓我告訴你，羅的事你不要管了，由中央來解決。我們知道主席對羅的態度後，我都慌了神。這邊羅對林要態度，可是別人以為羅是仗著我們在要霸道。」

林彪給毛主席的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旬，毛主席下令免去了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的職務，由楊成武代理主任。蕭向榮是一九五二年由林彪點名調到北京的。葉群後來對我們說，蕭的事使他們「為之一震」。

林彪給主席寫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三十日，而且是在主席召葉群去匯報時，由葉群帶去的一封倉促寫就的短信。信中說：

主席：

有重要的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的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有必要向你報告，為了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的口頭的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林彪

主席召葉群去，其實是攤底牌了。後來葉群對我們說，主席對羅的態度和決心，對「首長和我都是震驚和幾乎是措手不及的。」

羅的問題不是一年兩年了，「四條」的事也有一年了，且劉亞樓一九六五年五月就去世了，葉帥五月份都和我們打招呼了，可林對羅的問題還在考慮之中。林對羅的批評是有的，甚至是很嚴厲的，對羅的問題，林既沒有向外散佈，更沒有向主席報告，在此之前，不少老同志向林反映羅的情況，林都壓著，甚至「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的健康，而未報告。」現在，主席都找上門來了（召葉群去匯報），再不說，林就被動了，甚至隨時也會被裝進去，外面說，林如何處心積慮想幹掉羅，真是亂說一頓。另外，為什麼林彪不單說羅的問題，而是聯繫到「楊尚昆的情況」才向主席報告？可見，林認為主席也不是孤立地解決羅的問題，而是對劉少奇司令部的問題通盤考慮。為了愛護羅，「四條」的問題，林當時沒有在信上說。「四條」是主席招葉群去杭州時葉當面向主席匯報的。公開說「四條」，是主席叫葉群在上海會議的小組會上說的。其實，楊成武他們早先於葉群把「四條」的大意說出去了，這樣「四條」已經不祇是羅對林的不尊敬的問題了，而是上升到羅有野心的問題了，我軍的總長有野心還得了？！是毛主席和楊成武把羅瑞卿推到有野心的問題之中的。

為什麼主席又要借葉群的嘴講出這「四條」呢？那就是通過此舉把林彪捆綁在毛主席「倒羅」的戰車上，其實葉群在上海會議上所講的事後並沒有得到很大重視，因為葉群講的都是些個人關係的瑣事，祇是

現在渲染過重罷了。後來下發中央文件，根本沒有葉群的講話，而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謝富治的發言作爲中央批轉關於羅瑞卿問題的報告的附件下發了！

其實林、羅都有彌合裂痕的願望，羅曾說：「這次我認定了，跟定了，今後彈打不飛，棒打不走，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於林總。」林也說過：「現在幾個大將，論身體，論能力，我不用羅瑞卿，用誰？」葉群也說過：「他（林）是把你（羅）作爲最親密的人才給你發脾氣的嘛。」

外面說（包括羅本人），羅是如何如何抵制林的錯誤，也是亂說一頓。在文革中羅瑞卿的確遭受了大苦大難，但他出獄以後曾對他女兒說：「一直到做了林彪的班房，我還認爲是毛主席和林彪對我的誤會。」這才是羅的真實思想。坐了班房還「執迷不悟」，過去怎麼會有抵制呢？！

第三篇

人民軍隊忠於黨

小引

毛主席下決心搞文化大革命，過去都說主要有如下三個問題：斯大林逝世的影響；赫魯曉夫上臺的教訓；劉少奇的問題。但這三個問題，是否就是毛主席下決心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從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和結果來看，有符合的地方，也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

斯大林逝世對毛主席的影響是很大的。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事業，把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打敗了德國法西斯。這三件事，使毛主席對斯大林是敬重的。建國初期，我們決定向蘇聯學習，重點學習三個問題：

第一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我的記憶裏這是學習蘇聯的核心問題。

第二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問題。

第三是，國防工業問題。蘇聯是把國防工業放在國家整體建設的首位，我們先後也成立了幾個工業部，都是搞國防工業的。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上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九大做秘密報告，徹底否定斯大林。這一舉動，影響了中國的政局。赫魯曉夫上臺以後，搞了對國內、國外影響很大的三手：對外和帝國主義搞和平主義，對內搞反斯大林運動，對中國搞大國主義和分裂活動。赫魯曉夫背離了共產主義的軌道，打亂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步伐。毛主席說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路線。

由於蘇聯搞修正主義，改變了我們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的方針，不得不把防修、反修的鬥爭放在重要的日程上。毛主席是堅決反對赫魯曉夫路線的，毛主席不但親自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代表會議，我黨還以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方式，闡述了我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原則，前後發表了九篇評論，這些做法在國際上起了重要

作用。簡單地說，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是：從學習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開始，到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而告結束的。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反對修正主義是提得很高的。但時間不久，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就把「革命」的矛頭公開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的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從此，「反修防修」就成為口頭禪了，打倒劉少奇就是目的之一了。

毛主席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這是一個其他人說不清的問題，這個問題祇有毛主席心裏知道。八屆十二全會，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真正相信的人並不多，但又都舉手擁護毛主席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定。舉手打倒劉少奇的，除林彪、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被列入另類外，其他的人不但有偉大領袖毛澤東及周恩來，朱德、陳雲、董必武、李富春、葉劍英、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蔡暢、鄧穎超等，還有身後也冠名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子恢、粟裕、張雲逸、蕭勁光、徐海東、王樹聲、滕代遠、王震等人，這樣問題就不簡單了。

五十年代，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的很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後來即提出高舉「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績是主要的，但也不能沒有缺點。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召開過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對三面紅旗，對搞人民公社、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對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進行討論，提高認識，統一思想，鼓起幹勁。

在七千人大會期間，毛主席雖然也談笑風生，但第一次感到了「政治壓力」，幸有林彪的講話壓陣，堅決擁護毛主席，維護黨的團結，扭轉了會議的形勢。毛主席對林彪是讚賞的，也是感激的。可以說，軍隊的幹部大都是擁護毛主席的。

毛主席對劉少奇、彭真是不滿的。毛、劉之間在路線問題上確實有了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至少對毛主席是這樣。後來，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說：「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七千人大會的賬，毛是不會忘的。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罷免了彭德懷，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是統領和管理部隊的能手。他提出在人民解放軍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主張毛主席人民戰爭的思想，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林總提出要「復古」（按「古田會議」的革命精神建軍），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軍、治軍方針，如「突出政治」，「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苦練 200 米硬工夫」，「提倡勇敢不怕死，敢於刺刀見紅」等等，把人民解放軍造就成爲一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革命化、現代化的軍隊。對此，毛主席大爲讚賞。毛主席指出：「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毛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後來，毛主席依靠解放軍搞文化大革命，奪劉、鄧司令部的權，這步棋毛主席是早就看準了的。

林彪號召人民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主要是爲了部隊的建設。林彪的想法和做法是健康的，是「無意」的；毛主席對人民解放軍卻是有心的。幾十年以後我才感覺和認識到這一點。

實際上，毛主席早在發動文革以前就想扳倒劉少奇，不過當時的條件不成熟。劉少奇那時掌握著黨的領導實權，這種領導實權也已經運行了多年，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少擁護者和追隨者。當時，毛主席不要說扳倒劉，就是對劉有批評，也未必能完全貫徹下去，因爲中央和地方的很多領導，都是劉、鄧的人，實權在劉、鄧手上，鄧倒向了劉。

毛主席要下決心搞掉劉少奇，擁護解放軍、讚賞林彪是他長期的重要戰略準備。這種準備，長期以來祇有毛主席有數，其他人長期以來沒有數，甚至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也未必有數。當然，毛主席還要做輿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在六四年、六五年，毛主席決定解放軍派出大量幹部支援地方工作，中直機關、國務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主要領導都是軍隊派來的幹部擔任的。

——在六五年，毛主席讓江青秘密組織班子，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擊右傾翻案。

——在六五年，毛主席親自出馬「打倒羅瑞卿」。

——在六六年初，毛主席讓江青去請林彪這個「尊神」支持，搞「部隊文藝座談會」，以此為武器，向文藝黑線開火。

——文化革命一開始，毛主席決定成立了有江青參加並掌實權的中央文革，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毛主席很快就把中央文革這些人演變成主持全國黨、政、軍日常工作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碰頭會的主要成員，實行中央書記處的職能。

——到六六年，毛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五一六通知》，「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

以上這些都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戰略準備，這些準備都是為了端掉劉、鄧的「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雄才大略的準備。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兩個司令部就真正開火了。

關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情況我不瞭解。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決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和回到北京後，六六年三月又召開會議繼續批羅，我是從頭到尾參加了。

江青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情況我知道一些。這個座談會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召開的，不是林彪委託江青而開的。《紀要》的名稱中原來根本沒有「林彪同志委託」這個冠名，江青那麼傲氣，誰敢加這樣的抬頭，「林彪同志委託」這個冠名，是毛主席定的，並親自加上去的。至於林彪有奈也好，無奈也好，當時林彪沒有反對毛主席這樣做，也算是對毛主席的支持吧。

其實，江青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毛主席讓江青去請林彪這個「尊神」，人民解放軍這個「尊神」。也就是毛主席為了打劉、鄧司令部這些「鬼」，借助林彪和人民解放軍這個鐘馗罷了。

平心而論，對文革來說，毛主席認為他發動和領導的文革是「革命」，而不是「運動」。毛主席自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革命就是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的調整、撤換幹部。如果從「革命」二字出發，回過頭來再看看文革，或許能想通一些過去想不通的問題。毛主席說文革

「三七開」，文革就是「七三開」，就是再糟糕的文革，也是我們黨歷史的一部分。文革既然已經存在了，就要認真地總結教訓，不能簡單地用所謂「徹底否定」去了結，去鞭笞。文革有深刻的社會階級鬥爭的原因，有黨內路線鬥爭的原因。具體地說，也有長期以來，首先是黨內最高和較高層面上的領導同志把毛主席擁戴到黨和國家之上，把黨內生活的平臺變成斜坡，使之失去平衡和制約，促使產生毛主席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局面，而且黨內最高和較高層面上的領導同志自己也在起勁地擁護文革，因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在文革開始時打擊同志，直到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才對文革產生怨氣。現在大家都把文革中的「不是」推到毛主席一個人頭上（毛主席是要負主要責任），並推給林彪、江青以及黃、吳、李、邱去承擔責任，沒有多少人把文革作為「黨的歷史的一部分」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承擔一些責任。不是栽贓他人，就是推得乾乾淨淨。

附：林彪同志給賀龍等同志的信

賀龍、榮臻、陳毅、伯承、向前、劍英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一章 軍隊文革的序幕

上海緊急會議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批判了羅瑞卿，會後他就下臺了。這次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他們主事的，軍隊是蕭華、劉志堅在管會議的事。

參加上海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之外，還有軍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主要首長。中央機關少數人參加了會議，吳冷西就分在我們組。記得梁必業、王新亭是後補上來的，會議開始後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才來的。

大會召開之前，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統匯報了羅瑞卿的問題。毛主席聽了匯報之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並同林彪同志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你們告訴林彪同志注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來解決。」毛主席最後叫了葉群，林寫信向毛主席報告羅的問題時，已經離上海會議沒幾天了。毛認為林都反感羅了，那麼，倒羅的條件和時間已經成熟了。

上海會議很突然，很秘密。十二月六日晚上，空軍司令部通知：「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八時，請邱部長帶秘書和警衛員，到西郊機場上飛機，去參加重要的會議。」過了一會，中央警衛局也來電話，對方在核實我帶的秘書和警衛員的名字，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七日，我們同機飛上海的有劉伯承、葉劍英、賀龍、李作鵬等。賀龍不知道到上海開什麼會，劉帥是知道的，在飛機上，劉帥故意逗賀龍說：「賀鬍子，到上海開什麼會呀？」賀龍說：「除了打仗的事，要我們去

幹什麼？我把軍用地圖都帶上了。」劉帥笑著說：「打仗，我們也沒用了。我們都是黃忠的哥哥了！」大家祇有互相一笑，就談別的了。賀龍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連打倒總參謀長的會，毛主席都不給他事先打招呼，說明主席已經對賀老總另眼相看了。上海會議以後，葉帥就替代了賀。

羅瑞卿當時正在雲南邊境視察。羅外出都是帶著電臺和專業通訊人員隨同的，他祇要一停下來，各方面的電臺就會立即開通。據說，羅給留守北京的彭真打了電話，彭真說都到上海開會去了，因此，羅乾脆直接向上海的鄧小平打電話。事情也巧，打電話之前不久，中央常委決定要讓「長子」參加會議，因此，鄧小平的電話就非常好打了。鄧小平接到長子的電話即向他說：「你去一趟邊境不容易，故意讓你晚到幾天。會議還未開始，你現在可以來了。我要空軍派專機去接你。」這幾句話說得長子轉憂爲喜，第二天乘飛機直奔上海來了。鄧小平親自指示吳法憲派專機去「接」羅瑞卿，鄧特別指示吳：告訴專機組的同志帶上槍。

東道主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吳法憲去機場接羅。羅在機場看到陳的第一句話就是說：「有勞大駕。」陳表情很平淡，不說話，打不起精神。羅就開玩笑地說：「大戰通宵（指打麻將）沒有精神了？」陳回答說：「上車慢慢說。總理、小平同志在等你。」羅沒有到會場，而是被拉到建國路一個院子給軟禁起來，警衛都是由北京帶來的 8341 部隊擔任，整個會議羅都沒有露面。

全議開始前，總理和鄧小平召集全體人員開了預備會議，宣佈了大會的紀律，強調會議保密，宣佈編組名單及有關會議本身的其他問題。我編在西北組，組長劉闊濤。會上每人發了一個電話本和一本材料（後面訂著白紙）。材料中有林總給主席的信（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封）；有劉副主席給羅瑞卿的信（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信中劉對羅大爲不滿）；有海軍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的材料，總參作戰部雷英夫的揚發材料及林辦的材料等。我當時心裏比較緊張，因爲我在軍委辦公會議，在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六年，幾乎天天見面，但我當時還沒有懼度。我回來後把這本材料和電話本交給了秘書呂玉潤，沒想到第二天就出了麻煩，劉志堅召集部隊的所有秘書開會，問誰看過了材料，結果祇有劉志堅的夫人劉蘭英和我的秘書呂玉潤承認看了文件。會後他

們兩個人被責令不能出房間，怕消息傳到羅耳朵裏出意外。直到羅到了上海後，對呂玉潤的「禁令」才解除。

會議主要方法是小組會。開會的時間是「九三學社」（上午九點、下午三點開會），開的是「馬拉松」會議。在小組會議上，大家可以隨便發言，沒有長篇大論，大都是「交差式」的發言。這次會議比較特殊的是沒有出簡報。

我所在的西北小組，比較集中的是對長子的「幹將」與「霸道」兩個問題談得比較多。大家異口同聲地指出：他有才幹，他霸道。吳冷西對他的霸道作風說得很好。他說：「長子的霸道作風有很多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手長、嘴尖』……」還有就是蕭勁光等人批判羅搞小圈子也說得比較好。

劉瀾濤對大家的發言稍有異議。他說，大家批判長子的霸道作風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確的，看來羅也在準備搶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準備，問題的實質是後者。他指出長子搶班主要是做了兩方面的準備，一是搶葉帥軍事訓練的成果，搞大比武，這事實上是撈政治資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組織上他都在準備。大家認為劉的發言對羅的問題提高認識很有啟發幫助。

由於會議沒有簡報，又祇是小組會，對各元帥的意見是聽不到、看不見的。以我個人對各元帥的接觸來看，他們都是站在毛主席和林總一邊的。因為羅瑞卿問題的實質根本不是同林彪個人的關係問題。這裏我最積極的，他見人就罵「長子」。他說：「他媽的，長子是娘子養的。他是最卑鄙的，他見人就罵『長子』。」葉帥當著我們這些去用公安部的辦法，在黨內、軍內幹私貨，真卑鄙！」葉帥當著我們這些幹部大聲說：「搬掉兇神，解放元帥！」他說：「你們受壓當然不好，但你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你們還是要客氣一點的，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他就不客氣了。他根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裏的！」

回想起來，上海會議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沒有過火鬥爭。在會議期間，對「長子」都是背靠背地批判，他本人根本沒有露過面。小組會議祇傳達過「長子」兩點意見：一是承認大比武是不對的；二是不承認反對林副主席。他說：「我對林副主席向來

都是擁護的，從來沒有過二心。在林總領導下工作，我是最愉快的。」這樣的傳達也祇有一次。

第二，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任何負擔。在小組會上，可以說話，也可以不說話。

第三，沒有結論。會議結束時，劉少奇、鄧小平召集全體人員開了半小時的會議。劉少奇說的主要內容是：「這次會議開得好，大家都平心靜氣地擺事實，講道理，沒有搞鬥爭。回北京後，中央還要繼續開會，也依照著上海會議的精神辦理。」

上海會議是開了一個沒有「火藥味」的會議。但會議一結束，羅就被撤消了總長職務，由楊成武任代總長。

回北京後，開羅瑞卿的會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鄧小平、彭真他們牽頭，成立中央工作小組進行工作的。會議是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領導的，並不是以軍委的名義領導的。但實際主持會議的又是實際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元帥，林並沒有主持會議。

我過了關

上海會議之後，我回到北京立即著手準備召開全軍後勤工作會議。一九六六年一月底，葉劍英副主席叫我去談話。我看到葉的表情同以前不大一樣，我很納悶，葉帥問我：「在上海會議期間，你同別人談到蕭華同志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祇是在陶鑄同志那裏聽到過蕭華不宜掛帥（任軍委秘書長）的話，我也插不上嘴。」葉帥聽到我說之後，好像稍微輕鬆了一些。

我問：「葉帥是怎麼回事呀？」他回答說：「有些要緊的事。」此時夜餐送來了，我們坐下吃東西之後，他首先說：「沒有掛上帥的人（指蕭華沒有當上秘書長）恐怕心裏總會在想什麼吧？」我回答說：「可能總想找張路條（指整別人以表現自己）回來吧。」葉帥帶著驚奇的口氣反問：「路條？」「嗯，到別人門下去了的人（指蕭華同羅瑞卿搞在一起了），現在要回來，不拿『路條』表現一下自己就不好進門。」我這樣回答。此時，葉帥面帶笑容說：「真高見！你的話我懂得了」。

稍停，葉帥心情比較好地說：「他們已經提出了一個同羅瑞卿一起批判的名單，其中包括你在內。他說羅是單純軍事觀點的主帥，你是單純

業務觀點的代表人物，兩人同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就應當同時批判，他們已經指定人負責整理你的材料了。我已向蘇州（林總在那裏）打了一個電話。林總有三條指示：一、蕭華這樣做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二、此事暫不要查問蕭本人，三、你可向邱略為談一下，要他放心。軍委會正確處理的。」對葉帥的談話，我向他表示謝意。

在全軍後勤工作會議上我要做總結報告，這個報告一九六六年一月中旬就定稿了。總結報告的題目是：《面向基層為部隊服務——後勤工作突出政治總結》，主要內容是全軍後勤戰線為部隊服務的十條經驗。林總看到總結報告非常高興，認為是突出政治聯繫實際很好的總結。林總一是把報告批送劉主席，請他考慮可否印發正在進行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參考；二是要葉帥對總結報告放出一點稱讚的風。葉帥接到林總電話之後，提出了兩點建議：（1）舉行軍委常委會，蕭華要是向軍委提出批判邱會作時，我就用提出討論總後的總結報告來解決問題，這樣也就制止了對邱會作批判的企圖；（2）蕭華要不提批判邱會作，由林總給邱會作打個電話，對他的總結加以讚揚，以資鼓勵。林總完全同意葉帥的意見。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和後勤工作會議同時在京西賓館閉幕。兩個會議結束的前兩天，軍委舉行常委會，審議兩個會議的文件。在會議上，所有到會的人都讚揚了總後的工作總結。聶帥平時對後勤工作是過問比較多，他首先以高興的口氣說：「總後這個總結是好的。從這個總結裏即可看出後勤戰線的實際工作，也可以看出突出政治的成績，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總結。突出政治就是要象總後總結的政治觀點一樣，要結合實際才能見成效。」劉帥說：「業務工作不突出政治是錯誤的，也是辦不出成績來的；突出政治不結合實際也是錯誤的，出不了什麼效果。總後的總結比較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忘了是誰說了一句：「總後有秀才」，亦即總結是秀才寫的。劉帥又說：「這可能不是什麼秀才可以搞有秀才」，亦即總結是秀才寫的。劉帥又說：「羅瑞卿的單純軍事觀點影響整個軍隊建設，要結合實際深入地批判。」

在後勤工作會議進行期間，林總的秘書郭連凱在蘇州給我直接打來了電話。電話內容是林總事先口述好的稿子，郭是照稿子念的，電話內容是「過去歷來軍隊後勤工作最大的毛病，是見物不見人，輕視思想工

作。你們現在改變了這種情況，這是很好的，今後，你們應當繼續加強思想工作，加強學習毛主席著作，加強抓活思想，加強抓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後來我們稱之為林總對後勤工作的「四個加強」的指示。對林總的指示，全軍後勤工作會議立即發給了與會人員，同時還用電文發到了全軍師級以上後勤部門。林總的指示對全軍影響很大，對後勤工作的鼓勵和積極作用是空前未有的。

葉帥看到了林總給總後的電話記錄之後，又立即叫我去談了一下。葉問：「你看林總的電話目的是什麼？」我回答說：「我看一箭雙鵰，既接待了拿『路條』回來的人，也保護我不被打倒，這是林總的高明辦法。」葉帥：「你這個人對問題的看法很深刻。總政出面點名對你的批判是不可能了，軍委也不會同意。」

我說：「我遵照葉帥的指示辦。」我對總政可能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對我的批評是做好了準備的。我寫好了一篇題為《政治和業務緊密結合，堅決反對空頭政治》的發言稿交給葉帥。葉帥看了我的稿子之後說：「稿子的思想性很好，但問題也比較大，現在放下，以後再說。」在林總、葉帥和軍委的保護下，我沒有同羅瑞卿一起受批判，一起打倒。

中央工作小組會議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繼上海會議之後，在北京召開了會議，稱中央工作小組會議。開羅瑞卿的會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鄧小平、彭真他們牽頭，成立中央工作小組進行工作的，外面誤稱軍委擴大會議，可能這個會議實際上主要是軍隊的同志參加的原因吧。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時間進行了一月有餘，主要內容是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會議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大約有兩周時間，主要是軍隊參加上海會議的領導同志，大概有四十多人，羅本人也參加了會議；第二階段參加會議的人，除軍隊參加上海會議的全部人員之外，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同志也參加了，總共有近百人參加會議。

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書記處的領導，組織了第一次會議。會議開始的時候，總書記鄧小平把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接到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全體人員大會。我記得總書記鄧小平說了兩句話，他說：「對會議怎樣開，上海會議結束時，少奇同志已有交代，我就不說了。另外，我提議

成立一個會議領導小組，具體領導會議的進行。」接著鄧指定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蘇振華組成領導小組並由葉劍英同志主持會議。

鄧、彭也多次找羅談話，鄧小平叫他從「關係、工作、個人作風、思想意識、組織紀律」五個方面作檢討。

毛對羅究竟是什麼打算，當時林並不知底。林祇知道羅給他丟了人，他提名的總長有那麼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尷尬之處。上海會議，林彪沒出面，回到北京開會，林既無參加，也無指示，更無主持會議，整個會議沒有聽到林的任何指示，林連面都沒有露。這和開彭德懷的會完全是兩個樣子。

會議上衝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給主席匯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以及總政的一幫人，如李曼村、唐平鑄等人。我從一九五九年就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天天和羅在一起辦公，羅對我有拉也有打，但對我的工作支持還是多的，我當然怕把我劃在羅的一邊，我也積極發了言。當時，積極發言批評羅是很風光的事，但是還輪不上我風光，比如三總部的發言，總參、總政都是由楊成武、蕭華發言單列的，祇有總後沒有單獨向中央的書面報告。參加會議的人都發了言，地方幹部也發了言，我還沒有聽說參加了會議而沒有發言的人。羅的秘書也在會上做了揭發。

因為林總有話在先，葉劍英說服了大家，整個會議沒有直接涉及賀龍的問題。

這次大會同上海會議不同的是：有系統文件、有記錄、有簡報，每個人的發言都可以看到。兩個陣營的人的發言，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特點。林彪陣營的人的發言是有事實、有批判，具有相當的說服力，葉帥、蕭華、楊成武這些大將親自上陣。「鬍子」陣營的人的發言則恰恰相反，除了許光達的發言有份量，刺痛了羅，沒有什麼其他幹將打先鋒，不少人的發言除了講了一點「政治和軍事的關係」之外，沒有涉及任何實質問題。但他們對羅的倒臺又是幸災樂禍的，祇要不扯到賀就行。打倒羅瑞卿，二、四方面軍的幹部高興。

我的發言，著重從形式主義和浪費相關的問題上，揭露了在大比武中經費、物資、彈藥浪費的大量事實，並批判了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我發言時，羅本人在場恰好聽到了。羅兩次想插話，被葉帥制止

了。三月十二號羅瑞卿檢討時說：「邱會作同志特別講了經費，物資，彈藥的驚人浪費，在軍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大會對羅瑞卿的批判，葉帥有意把它形成兩半段，前半段揭發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後半段則揭發批判小圈子。實質在後一個問題。

從上海會議起，林彪就注意做爭取工作。總政梁必業副主任是爭取的重點，因為他是羅瑞卿小圈子裏的重要人物，但梁必業也是林喜歡的人物。林副主席分配李作鵬和我做他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做得很成功，經過幾次談話之後，把問題基本上摸清楚了。梁必業同我們談話的情況大致如下：

梁說：一九六三年羅瑞卿同他談林副主席的病情談得最多，首先是「關心」的口吻談，後來就談「後事」了。羅瑞卿說：「林總的身體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規律，無法抗拒。我們這些人祇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說：一九六四年開始，羅瑞卿定的方針是：「冷林、熱賀」四個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擴大林彪的「病情」，宣揚鬍子的「親政」，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體祇是「熬時間」了。

他說：羅瑞卿再三強調，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沒有人哪還有什麼政治？在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種、各兵種都要搞「兩套人馬」（即擁林、擁賀兩種人）祇有這樣才能「平衡」。羅瑞卿再三交代，對同我們合作的人要特別的關心，現在有很大的作用，將來的作用就大了。

梁必業自己在大會上也發了言，他的發言說得很詳細，態度也很中肯。他自己再三說：「我的檢討還不深刻……」葉副主席也再三說：「你是發言，不是檢討，講的很好。」檢討和發言祇有兩字之差，但可以看出軍委的鮮明政策。林總對他的發言是滿意的，已經下命令調他到南京軍事學院任副政委（未到職），文革時，總政的領導人硬是不容他在北京呆下去，把他下放到安徽去了。一九七〇年準備召開的四屆人大，軍隊要解放的一批高級幹部中就有梁必業等人，黃永勝、李作鵬和我與梁的關係都很好，想把他先安排在安徽省軍區任第二政委，因李德生沒有同意而作罷，祇安排了張宗遜為濟南軍區副司令。

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繼承了上海會議的精神，剛開始羅瑞卿看起來好像沒有多大負擔似的，他祇出席過兩次大會，一次是聽別人發言，一次是自己做檢討。他參加小組會是自由的，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關於「四條」的問題

「四條」的核心問題是「伸手」，即有「野心」的問題。羅自己在檢討中，已經觸及到「伸手」的問題，羅瑞卿說「我對陶鑄、蕭華、楊成武、梁必業說的那些話，我都是說了的。類似的話，還同劉亞樓同志說過，這些都是絕大的錯誤。」

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葉帥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發言，蕭華的揭發以及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都提到「伸手」問題，都確認有「四條」。翟雲英也說有。如果說沒有，首先是葉劍英、蕭華、楊成武他們幾個人給全黨開了大玩笑，有些人後來改了口，那也祇是改了口嘛！

其實，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羅，主要不是因為羅的品質問題，而是要拿掉羅的軍權，防範劉、鄧。那麼，在毛主席倒羅的決心中，「四條」就並不是很重要了，沒有「四條」，毛主席也要拿掉羅的。

林彪和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的關係是很好的，都是擁護毛主席的。一軍團還有一批尖子，陳賡、羅瑞卿、劉亞樓、蕭華、黃永勝、楊成武、楊得志、鄧華、李天佑、賴傳珠、吳法憲、梁必業、梁興初、曾國華等等。劉亞樓和林總共事時間長，他們是「同志加兄弟」。羅靠上了賀龍，自己有了非分之想，他叫劉亞樓去和林總講「四條」意見，這「四條」是葉群在上海開會時，在小組會上揭發的。開完上海會議回到北京後，在批羅的會議上蕭華、楊成武有系統的發言，又講到這「四條」意見。這就是讓葉群告訴林總：（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這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林總將來也要退出歷史舞臺；（二）要認真愛護林總的身體，拜託葉群多費心；（三）林總把部隊的方針都定好了，今後林總就不要多管軍隊的具體事了，由他們去管，主要是把林總的指示落實好；（四）林總要放心讓羅去管，放手讓羅去管。

劉亞樓去世以後，在整理遺物時，有一封劉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寫給羅瑞卿的信，信當時沒有發出去，劉在信中對羅大為不滿。這種不滿總

不會是憑空而來的吧，他們的關係一直很好，這封信是上海會議的文件之一，此信對與會人員的震動是高於葉群發言的。因為畢竟是羅讓劉上了「竿子」去和林講，林又把劉訓了一頓，碰了一鼻子灰嘛。一九六五年初，羅瑞卿到上海，去醫院看劉，劉和羅大吵一架。劉的秘書何汝珍和照顧劉亞樓生活的空四軍的管理員過全都聽見他們在吵。這之後劉的身體狀況下降很快，幾個月後就去世了。他們還能吵什麼呢？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

林總更傷羅與賀搞到一起去了的心，軍隊讓誰掌管，毛主席心中有數，並非林彪能左右，羅瑞卿這樣的意見，肯定被林頂了回去。羅昏了頭，劉也昏了頭，他們昏了頭與當時賀的「興旺」是有密切關係的。林彪生病期間，主席叫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雖然主席對賀龍也有親近的話，但毛絕不會把軍隊交給賀。主席的底牌還是林，我們那時離上面還遠，我們還能看清主席的底牌，羅是應該能看清的，但羅看走了眼，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很快劉亞樓醒悟了，他痛哭流涕地揭發了羅。

現在，有的材料上說，在開上海會議的時候，鄧小平說上面所講的事情「死無對證」，我沒有聽到鄧說過這樣話，我更不相信鄧當時有膽量說這樣的話。鄧小平、彭真都是批羅的主要負責人，他們若表示了相反的態度，不是把自己放到毛主席的對立面上去了嗎？如果鄧小平說了「死無對證」的話，楊成武、蕭華又怎麼可能在批羅的大會上，把這「四條」和羅的其他問題，又認認真真揭發呢？楊成武、蕭華又不是傻瓜，我想他們祇會說有根有據的話，不會說「死無對證」的話。中央工作小組給中央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也鄭重地提到「四條」，這個報告都是要經鄧的手把關的，如果鄧說了這個話，他怎麼還同意寫上四條？！這祇能說明羅的確鑽到劉、鄧司令部裏面去了，鄧小平說「死無對證」是教唆羅耍賴。想想看，羅都投降了劉、鄧，毛主席怎麼能放過他呢！？

羅瑞卿的錯誤和林總的態度

說到羅瑞卿的錯誤，中央工作小組上報中央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葉劍英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發言以及蕭華、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劉少奇對羅的嚴厲批評已經講的很清楚了。

羅瑞卿的錯誤總的來說有這麼幾方面：

一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包括大比武等等在內。但我認為能為黨工作，並以極大的革命熱情和幹勁去工作，比小病大養、養尊處優強得多。我們黨內有個不好的毛病，叫做「牆倒眾人推」。人一遭了殃，從頭算賬，缺點變成錯誤，小錯變成大錯，無限上綱。

二是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羅瑞卿的民主作風的確很差，相當盛氣凌人，相當霸道。這樣，他往往是費力不討好，工作做了不少，還把不少人得罪了，甚至把老師也得罪了，人家不可能不告你的狀。羅瑞卿這個人「權貴」思想很重，他能看得上的人很少，嚴重脫離群眾。對下級、對工作人員總是不可一世的樣子。六四年在福州開會，午休時有幾個秘書在打撲克，影響了他休息，他衝出房間對著幾個秘書歇斯底里地罵，罵了個狗血噴頭，很失領導水準。羅這個樣子，這裏面有雙一（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的優越感，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林彪把他慣壞了，羅是毛、林都很器重的人物，個人關係也不錯。

三是從有私心到伸手，最後變成了「野心」。六二年，林總生病，毛主席決定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從六二年到六五年期間，羅在主持軍委辦公會議期間，擅做主張的事情也不斷增多，我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幾乎天天在一起開會，情況基本知道，羅是要負責任的。比如：搞大比武；對聶、葉、徐等各元帥都不夠尊重，對他們分管的工作都不夠支持；軍委的總結報告，沒有授權讓他來搞，他自作主張地搞了。給幾個老帥看一看，徵求一下意見，他認為充其量是走過場，心裏滿不在乎。

尤其不應該的是，他認為林總的身體肯定不成了，竟開始嫌棄林總，說出「病號就是養病，要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的昏話來。林總生病時，毛主席都為林總寫下曹操的《龜雖壽》來鼓勵他，相比之下，羅的昏話實在不該說。由於劉少奇說過羅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羅認為新一屆人大他應當國防部長。六五年林總身體有明顯好轉，在六五年一月召開的三屆人大會議上，林總又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羅有點意想不到，自己國防部長也沒當上，還把林得罪了，心裏有點慌，他讓劉亞樓把他對林表忠心的話趕快告訴林總，羅說：「這次我認定了，跟定了，今後彈打不飛，棒打不走，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於

林總。這個話我們當時就聽到過嘛，為什麼說出這種話，說明以前開始走了，要改換門庭嘛！

林總這個人是最不愛囉嗦的，但他對羅可以說是苦口婆心、語重心長的，林從內心裏還是想教育羅，對羅仍然抱著希望，羅畢竟是林提議當總長的。

當然，有時候林總嚴肅批評羅，甚至罵羅，但這和想要打倒羅是兩回事，這就是林對羅的基本態度。林是很慎重，很沉得住氣的人。「四條」的事發生後，林就認識到羅的「野心」，但林並沒有向毛主席報告，葉帥、聶帥、楊成武等，早就在林總面前反映羅的問題，並希望林向毛主席報告，林並沒有向毛主席報告，仍寄希望對羅的教育。如果不是毛主席叫葉帥給林通氣打招呼並給不少老同志打招呼，如果不是毛主席決定召開上海會議解決羅的問題，林是不會同意葉群把「四條」講出去的。林是個「不諳世事」的人，林總告訴羅要通氣，因為元帥和其他人到林處反映羅的問題，林往往因不瞭解情況而無言以答，因為林不瞭解情況，很難為羅說話。對於林總的教育和苦心，羅的神經已經麻木了，他反而越走越遠。林總不得不對羅說出這樣的話：「如果我們沒有工作關係，你一百年不來我這裏也沒有關係，你是總參謀長，我還是你的上級吧，你的情況我一點不瞭解怎麼辦？軍隊的工作我是要對中央負責的。」

對林、羅這段關係的發展變化，我認為一開始羅未必存心是對林有什麼封鎖，羅認為自己和林總的關係好，林又不是管小事的人，事無鉅細的匯報林反而嫌囉嗦。另外，林當時的確身體不好，羅也不願意輕易打擾林。後來羅變了，以為林的身體不會再好起來，沒希望了，羅瑞卿倒向了賀龍。賀龍當時「壯」得很，其實羅看走了眼。主席發現了羅倒向賀，賀又和劉、鄧關係密切的嚴重情況，毛批評了林，嫌林是個「甩袖掌櫃」。這時林再找羅談話也認真了，羅也就開始有意封鎖林，有意不主動向林匯報工作了。當時，羅也有擋箭牌：賀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決定的。對羅的做法我真有點想不通，這才叫利令智昏。

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有自己的工作作風，應該是無可厚非的。賀老總對工作也是抓得很緊的。可羅瑞卿倒向了賀龍，就有問題了，什麼問題呢？軍隊是毛主席的命根子，軍隊應該掌握在毛最信任的人手裏。最信任的人是誰呢？就是林彪嘛！林病了以後，就是羅瑞卿了。可

羅瑞卿看軍隊這個「家」沒看住，沒看住的標準就是羅瑞卿與賀龍搞在一起，和劉、鄧搞在一起。這樣，在毛主席那裏問題就嚴重了。羅是不折不扣的「擅離職守」。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況的自有人在。我想這些人向毛主席匯報，是講羅反毛吧！不會祇講羅反林吧？主席自己對羅有警惕了。毛主席信任林彪遠勝於信任賀龍，羅瑞卿完全應該明白這些，但是他沒有真正明白，他還來了個「冷林熱賀」。羅瑞卿厄運的到來主要在此，也就是說在他自己。這種格局的形成，主要責任不在賀龍而在羅。林總身體確實不好，是羅「改換門庭」的主要因素。羅有了私心，這是關鍵。

羅瑞卿檢討與「自殺」

在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之後，他在三月十二日做了一次檢討。羅發言的那天下午，北京的一些「名義會員」（即有名單，平時不到會的人）也大都到會了。會場的佈置有半圈沙發是主持人和元帥們坐的，對面的前幾排也放著沙發，後面有幾排桌椅。羅是穿著便服，後面還是跟著副官來的。他來到會場之後，葉帥招手要他到沙發上去坐，他祇是笑了一下，並未去坐他過去應當坐的位置。

羅瑞卿檢討時，由葉帥主持會議。他宣佈：現在請羅瑞卿同志發言。羅點了一下頭就開始發言了。他的發言還是上海會議的基調，即承認大比武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衝擊了政治，而且他強調大比武是他個人決定的。他說：「這次大比武是我個人擅自決定的。現在看來，重開一次那樣興師動眾的南京現場會議，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而且把軍委主管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我為什麼要這樣幹呢？除了自己喜歡獨斷專行，不講民主的惡劣作風外，還有個人主義的好大喜功，想在軍事訓練上搞出一點突出的成績來，以便向主席，向黨，向軍委，向林彪同志邀功報捷，動機是很不純的。……大比武帶來的嚴重惡果，劉志堅同志歸納了八條，張宗遜同志歸納了四條，全軍比武資料上歸納了十條，邱會作同志特別講了經費，物資，彈藥的驚人浪費，在軍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同時，羅還對一些具體事例做了檢討，如搞形式主義等等。另外，他還以真誠的口氣說了，沒有反對林副主席。他說，過去沒有反對林副

主席，今後也永遠不會反的，羅還特別說了他對葉帥不尊重，對軍委其他領導不尊重的話，並表示檢討，最後還說了幾句對林副主席的身體關心不夠的話。

葉帥、蕭華、楊成武是有防範準備的，蕭華、楊成武事先把我們幾個人叫到一起議了議，葉帥也在座。蕭華說：「如果羅態度不好，總政的同志上，他的問題多啦。」楊成武則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這個會開不好，別人會看笑話。」羅在檢討中雖然嫌有些帽子戴得太大，如「野心家」，「陰謀家」，「篡黨、篡軍」，但他給自己上的綱也不低，他說過：「我的錯誤是十萬分嚴重的！有的同志說是犯罪，也不過份，黨給我什麼處分，我都接受。」最後，羅瑞卿還表示「請求黨重新宣佈撤銷我有關軍事工作的一切職務，撤銷我的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把我放到領導強的基層單位去改造我，考驗我！……」

在揭發羅的時候，他有時並不在乎，如王樹聲發言的時候；他有時很生氣地瞪著人家，如許光達發言時，揭了他不少過去的短處，羅氣得想對質似的，葉帥沒有同意。還有人揭發羅的霸道時，說了一件事：在抗大時羅瑞卿為教育長，說他作風霸道得很，為此主席到抗大去開座談會，在學校工作的譚希林、張愛萍、王智濤、韓振紀等同志對他意見很大，說羅高高在上，他的馬吃的馬料比教員伙食還高，並說羅常往女生隊跑，馬掌都換了幾副。會後有人提醒發言人說：「你老兄嘴上沒站崗的，那時林總是校長，提議羅為教育長，你是不是說林總護短呀，你是不是借古諷今呀？！」其實林彪是兩次為羅瑞卿護短了，一次是抗大當教育長，一次是當總參謀長，兩次都是林提名，兩次都被拉下馬，到頭來還說林整羅，這實為不公。

羅瑞卿講話後，即退席了。大會繼續開，並自由發言。有的人提出，要羅瑞卿到會，面對面的接受批判，有的人對羅的發言則加以讚揚。接著葉帥講了話。他說：「羅的發言比在上海有進步，承認了錯誤，也有些自我批評。對羅的發言，要表示歡迎的態度。……對羅還是不搞面對面的批判，不到會也不妨礙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羅檢討發言後，即把大會揭發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業副主任的記錄稿，他的老婆給林總的信等都給他了。葉帥是很精細的人，給他

的都是原始稿，羅看到材料的當天晚上，通宵未眠，坐臥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殺了。

羅瑞卿住南池子，在北京是屬於一等的院落。他本人的宿舍是三層樓房。他「自殺」的方法是，在三樓兩腳朝下溜下去，有如小孩在公園玩滑梯一樣的。這樣是不可能死的，除了一隻腳傷了之外，其餘地方並未受傷。羅為什麼這樣做，真不得其解。

羅在自殺前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給他老婆的，一封表示對批判他不滿，甚至說他走到自殺這一步是被逼出來的。羅瑞卿為什麼會「自殺」？從後來揭發的材料來看，主要是怕把小圈子的問題端出來。他自己在梁必業副主任的發言的記錄稿上，寫了兩句話：「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集團」，可見他感到痛的是後一個問題。

羅瑞卿自殺未成後，對大會的影響很大，無論過去擁護羅的人或是對羅有意見的人都對羅產生了憤恨。因為羅在檢討中說過「同志們這次所揭發的大量材料，我如果還不覺悟，不在真理面前低頭認罪，就太不像樣子了」，他在檢討最後大聲說：「請同志們繼續批判我！揭發我！」按照羅在會上的態度是不應該自殺的。

中央工作小組對羅瑞卿的自殺向毛主席、黨中央及時做了報告。中央後來下發文件，明確指出了：「中央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中央認為，這次小組會議開得很好。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耐心教育和嚴肅批判。羅瑞卿同志不僅不認真檢討自己的錯誤，反而於三月十八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了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道路。鑑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極端嚴重，中央決定停止羅瑞卿同志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以後再提請中央全會決定」。羅是以「自殺」來抵抗對他的批判，對羅瑞卿的「自殺」，葉帥傳達毛主席的話是這樣說的：「羅瑞卿自殺由他自己負責。閻老子辦事是有原則的，沒有叫他去自己去是不會接受的。」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會上也在批判羅瑞卿，據說大家的發言驚心動魄。羅瑞卿自殺的報告到杭州，連劉少奇、鄧小平都

對羅的自殺十分不滿，劉少奇說：（大意）「羅長子平時盛氣凌人，鋒芒畢露，他對老師都打擊。自己不認真檢討，過不了關就自殺，沒出息。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他是堅決向黨對抗。」「跳冰棍」的挖苦話就是鄧小平說的，說得很形象，大家很快就傳開了。羅的自殺不僅給自己抹了黑，而且給毛主席這邊，劉鄧那邊都抹了黑。

羅瑞卿、楊成武等人，在文革中都屬於勝驕敗餒的人，得志時不可一世，頤指氣使；失勢時經不起考驗，結果問題越搞越複雜，對黨對個人都造成很大損失。

羅瑞卿炫耀自己

羅工作是能幹的，整人也是能幹的。毛主席去世之後，他得到了重新上臺的條件，利用自己的保護人重新得到了權力，當了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把自己吹到天上去了。羅吹噓自己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他歷來就是反對林彪的。羅當一軍團保衛局長（負有直接保衛林彪安全的責任），他就是反對林彪的。他還特別指出了林彪是不會打仗的，另外，就是用全力宣揚他當總參謀長時，搞大比武的「盛況」和空前的成績，過去發表過的大比武的文章，又重新發表。例如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參觀過十三陵大比武的文章。另外，他把他垮臺的原因全部推給林彪，好像他倒臺的原因是因為他和林彪的個人關係不好造成的，他以偏蓋全，其實等於他否認自己有錯誤。

羅瑞卿炫耀自己的另一個手段是鎮壓。後來，他對所謂的「林彪反黨集團」一個不拉地都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對他自己權力範圍內能夠鎮壓的人則進行慘無人道的鎮壓。例如，他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治他的傷腳，為他出過力的院領導幹部、專家、醫生、護士都進行了鎮壓，連給他送飯的護理員也未曾倖免。院長靳來川、副院長曹根慧逮捕法辦，靳來川被關進秦城監獄十年，曹根慧被關在總政白廟監獄，判了重刑，在獄中做了胃切除手術，都不讓保外就醫，仍然關在監獄，吃著豬狗食，到了令人髮指、毛骨聳然的程度。對黃、吳、李、邱的四位夫人，中央決定要從監獄放出來，參加勞動學習，羅瑞卿下令全部押送農場勞動改造。在文革的黨內鬥爭中，羅瑞卿和自己的家庭、妻子、兒女都飽受了苦難，他應當有所感悟，應當更有高風亮節，但他重新上臺以後，沒有

做到。黃克誠同志受的苦更多更長，他有博大的胸懷，能正確評價毛主席，還正確評價了林彪，對黃、吳、李、邱的四位夫人也落實了政策，如果沒有軍內「造反派」的破壞搗亂，會落實的更好。羅瑞卿實行這樣殘酷的鎮壓，一則是他的報復，二則是借此來提高自己的威風，實際上降低了自己。

葉帥的總結

上海會議之後，葉劍英元帥代替羅瑞卿主持辦理軍委的日常工作，葉帥領導和主持的對羅瑞卿批判的會議是成功的。會議遵照上海會議的精神，完全是黨內生活，根本沒有過火的鬥爭，這是大家的共同看法。

葉帥說：「會議從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開了一個月又五天，參加會議的共有九十五人，除了事假病假外，發言的同志有單獨發言的，有聯合發言的，共有八十六篇發言稿。從全部發言中可以看到，同志們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有揭發，有批判，有建議。差不多全部發言，都肯定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最主要的是篡軍反黨。」

在批羅時，系統發言的有蕭華、楊成武（與王尚榮、雷英夫聯名）、謝富治。會議結束時，葉帥代表軍委做了長篇的總結講話。葉帥的總結分為三個部分，大意是：一、羅的錯誤：1、反對毛主席，是反黨的；2、反對林彪同志，是要篡奪軍權的。二、羅歷史上的錯誤，抗戰時與彭德懷勾得很緊，當公安部長時一上臺就大抓個人兵權，大搞「十無運動」，到處大抓大捕。三、到會的高級幹部，應從羅的一生取得深刻的教訓。在總結中，葉帥對羅瑞卿的批判很精彩，對大家的教育很深刻。葉帥說：要有私心，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沒有公心，發展為野心，羅瑞卿這樣的人也不例外。羅是利令智昏，錯誤的估計形勢而垮臺的。

葉帥在談到羅反對林總時說：「他把林彪同志當作敵人，公然伸手搶班奪權。羅瑞卿同志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惡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向黨伸手。他私自封官許願，拉攏一些人，為他效勞，派人當『說客』，以林彪同志遲早要登上政治舞臺為名，勸林彪同志讓權，此外還親自出馬，當作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說：『病號嘛，要像個病號樣子嘛！要讓賢嘛！』『不要擋路！』最後還想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氣死、逼死、折磨死。其實林彪同志的身體，據醫生多次檢查的結果

果，內臟各部都是很好的，祇是負傷以後神經功能有點毛病，現在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這是全黨全軍一個喜報。而羅瑞卿同志卻說想不到這個人還能東山再起！使羅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這個人還能算是我們的同志嗎？！」

葉帥還說：「他拚命反對林彪同志，絕不是什麼個人恩怨。羅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過毛主席許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做過許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寧有幾人？羅瑞卿同志當總參謀長也是林彪同志和總理推薦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讓他工作，對他工作中的錯誤，多次批評，誠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羅瑞卿同志對林彪同志的批評、指責、教育，如果自己認為有委曲之處，何以不報告毛主席？而竟同劉亞樓等同志密談！跟毛主席幾十年，還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師長。難道這樣做法，不是有意背著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對嗎？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友，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緊。他對黨忠誠，對同志和善，幾十年刻苦自厲，好學不倦，帶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論與實踐為準則。他是我們全黨最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林彪同志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託，主持軍委的工作，在羅瑞卿同志看來，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實現他篡軍的野心，我看這就是羅瑞卿同志拚死反對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在談到羅三月十八日自殺時，葉帥說，「『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為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我認為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死亡了。如果要重新做人，必須真正地在政治上脫胎換骨。」

葉帥還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古人說的話。看來這句話對羅說來，不恰當。羅跳樓前，寫了兩封沒有簽名沒有月日的遺書，都印發給同志們看了。他說，『自殺是可恥的』。但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他竟惡毒地說是會議把他逼死的，說他的可恥行動是被迫的。這簡直是對會議的誣蔑，是垂死的反撲。證明羅對自己的錯誤是想抵賴，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東西，想把錯誤帶進棺材去。』其實，毛主席對羅的問題早有察覺。主席幾次在談到羅的問題時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林彪同志帶了幾十年的兵，難道還不懂什麼是軍事，什麼是政治？過

打仗本質上都是政治仗；你們說羅封鎖林彪同志，他羅長子長期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老師，這和彭德懷的錯誤是一樣的；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上是陷進去了；羅是個野心家，又專橫跋扈，別人還不反他？！

葉、蕭、楊、謝的發言，在中央下發《中央工作小組報告》時作為附件也同時下發了。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見他們的發言份量之重，對毛主席向劉、鄧司令部開火是多麼重要。當時，自己的發言能上簡報，甚至上文件，是很風光的事情，這樣風光的事當時還輪不到我們。後來，「兩案」公審的時候，整羅的大幹將們對此隻字不提，我們這些跑龍套的人卻成了犯有大罪，天下豈有此理？！

當時，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誰接替羅瑞卿任軍委秘書長。上海會議結束時中央原則上已定：蕭華任秘書長，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反羅是積極的、堅定的，過去蕭華已被羅拉去半個身子有餘，因此，楊成武對蕭當軍委秘書長很有氣。對秘書長人選，楊成武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對問題提得很尖銳，他說：「這樣的人事安排（指蕭當軍委秘書長），我們軍隊今後能夠清除羅瑞卿的影響嗎？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說穿了，楊認為蕭是和羅沾了邊的人。林總完全理解提意見人的意思，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同時決定由葉兼任軍委秘書長。

葉帥出任軍委秘書長，除了毛主席信任、他自己眾望所歸和德才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林總的建議。以我所知林總與葉帥向來關係都很密切，互相很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林總對葉帥是大力保護的，支持的，葉帥對林總是欽佩和擁護的。

楊成武是反羅的幹將

實事求是地說，在當時，楊成武的確是我軍優秀的領導骨幹之一，軍政水平都很好。他對我也很好，不像有些人愛擺架子，我對他也是敬重的。林總都說，在羅長子的問題上，楊成武是最乾淨的。楊是批羅的第一幹將和先鋒，直到他一九六八年被打倒之前都在批羅。一九六六年在批羅的會上，楊有《堅決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徹底粉碎羅瑞卿篡軍反黨的陰謀》發言，他是中央工作小組的成員，與葉帥他們一起向中央寫

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全軍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楊成武發表了長篇講話，系統地批判了羅瑞卿；十一月，他又發表著名文章《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該文的副標題就是「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該文聲稱：「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羅瑞卿，是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是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惡，就是長期以來秉承中國赫魯曉夫的旨意，惡毒誹謗毛主席，攻擊和歪曲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反對樹立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妄圖按照資產階級面貌改造我們無產階級的軍隊。我們必須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最強大的武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黨內最大的走資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代理人羅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徹底肅清其流毒。」。

楊成武是羅瑞卿專案組的負責人，他對專案抓的很緊，工作既神秘又對自己管專案有優越感。有一次辦事組開完會，他對我說：「老邱呀，我帶你去看看熱鬧。」原來，楊是帶我去看軍隊專案關押人員。楊對專案關押對象的地方很熟悉，他指給我說這是誰，那是誰，然後掀開小窗口讓我看，我們第一個看的就是羅瑞卿。

楊成武和羅瑞卿的鬥爭一直是很堅決的，大的方面他自己的幾次發言說了很多，小的方面他也不放過。文革前，在一次在軍委辦公會議上，研究一些幹部的調級問題，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在會上一個一個提名字，一個一個研究通過。研究完了以後，羅瑞卿就準備宣佈散會了。這時楊成武突然說：「你們拉下了大事！太不公道了，太不公道了。像薛明、葉群（他故意把薛明說在前）也是『三八』式嘛，他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是無名英雄，級別和軍銜都很低嘛，調了這麼多人，我認為她們也應該調。」羅聽後忙說：「哎喲喲，疏忽了，疏忽了」，接著又研究通過了薛明、葉群調整級別和軍銜的事。

「九一三」以後，毛主席解放了楊成武，這也是對的，但毛主席把「楊、余、傅」事件推給林彪是不對的。楊倒臺後不久，毛主席就說過：「如果講楊成武的後臺，第一個就是我」。「九一三」之後，在羅瑞卿的問題上，毛主席也說過一些不實的話，這是我在心靈上第一次感到震撼。

毛主席在工作上甚至方針上有錯誤，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主席煞有介事地說不實的話，我是意想不到的。比如毛主席說在羅瑞卿的問題上「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我太不理解了。其實，對羅的問題的決定權在毛主席而在林彪。林也不得不跟著毛主席走，而絕不是毛聽了林的。

毛主席逝世以後，楊成武就開始說假話了，而且越說越厲害。他甚至說他在總參傳達羅瑞卿問題的會上，竟在主席臺上傷心地哭了起來！這真是天大的謊話。

現在一些報刊上，甚至公審的時候，說我們迫害了羅瑞卿，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要說打倒羅瑞卿是對的，這個功勞還輪不上我們擔；如果說打倒羅瑞卿是錯的，這個主要責任也不該我們擔。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組的會議上發言的都是錯誤的，那人人有份。

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

黨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黨中央、毛主席在上海召開了會議。揭發和批判了羅瑞卿同志的錯誤，和他進行了背靠背的鬥爭。會後，黨中央指定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對他進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幫助，羅瑞卿同志不但沒有老老實實檢討錯誤，反而表示受了委曲，多方為自己辯解。在傳達了黨中央上海會議情況以後，在軍隊政治工作會議上，在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中，又揭發了羅瑞卿同志大量的嚴重的錯誤事實。為了徹底弄清羅瑞卿同志的問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決定，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從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開了討論羅瑞卿同志問題的小組會議。會議本著擺事實，講道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

這次小組會議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第一階段歷時十三天，參加成員包括軍委各總部、公安部、國防工辦、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和大部分軍區、軍種、兵種的負責同志，以及羅瑞卿同志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開始，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根

據黨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第一階段未參加會議的軍區、兵種、軍

事院校的負責同志。第二階段參加會議的共九十五人。

由於三月十八日羅瑞卿跳樓自殺（受傷），第二階段的會議，祇好又轉為背靠背的鬥爭。

根據會議揭發的大量材料，羅瑞卿同志的主要錯誤事實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

羅瑞卿同志極端敵視毛澤東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羅瑞卿同志卻胡說這「不符合我們國家的體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羅瑞卿同志卻胡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的嗎？難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難道還有次活的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羅瑞卿同志卻胡說，「這句話也不要這樣說，對外國人影響不好。」羅瑞卿同志還不准說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包含有「個人天才」的因素，說什麼「現在沒人敢再提個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羅瑞卿同志卻反對向外國人宣傳和介紹這四句話。林彪同志指示《解放軍報》要經常刊載《毛主席語錄》，羅瑞卿同志卻嫌搞多了。總政治部根據林彪同志的指示，把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和軍委的文件，編成教材，作為幹部、戰士的必修課，羅瑞卿同志卻借口發到連隊的東西太多了，不准印發。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羅瑞卿同志卻胡說，「不要單獨給民兵佈置學習毛著任務」。羅瑞卿同志還指責歌舞劇《水兵的光榮》中，唱「敬愛的毛主席」太多了，說要和共產黨聯繫起來，不要單獨地唱。

羅瑞卿同志歪曲和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毛主席一再教導，人民內部也有階級矛盾，羅瑞卿同志卻胡說，「農民有一部分自發勢力，想搞單干，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內

部矛盾。」劉少奇同志指示，軍隊內部也有階級鬥爭，羅瑞卿同志卻胡說，「我們軍隊本身不存在階級矛盾，但是存在立場要堅定，階級覺悟要提高，要抵抗資產階級、封建思想的侵蝕，以及對政治問題要有辯證的分析方法等問題。」

羅瑞卿同志當公安部長的時候，就否定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剛剛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卻大搞什麼「十無運動」，限期做到無反革命、無盜竊、無流氓阿飛、無火災、無車禍，等等。並且把蘇修的東西搬來作論據，鼓吹什麼蘇聯內部已經沒有階級了，那裏的犯罪問題，主要是外部原因了。這是典型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觀點。他這種搞法雖然受到黨中央多次批評，但是他仍然堅持錯誤。他不僅散佈階級鬥爭熄滅論，而且接著又放出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消亡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就公然說過，「現在基層政權在開始消亡，專政的工具也是如此。」「現在反革命更少了，我們的基層政權主要的不是搞階級鬥爭，而是搞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就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在開始消亡。」黨中央、毛主席反覆強調公安工作一定要在黨委的領導下，走群眾路線。羅瑞卿同志卻強調垂直領導，搞神秘主義、孤立主義，搞蘇聯「格伯烏」那一套。

羅瑞卿同志在新疆地區反對蘇修顛覆活動的鬥爭問題上，違背和反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和指示。他誣蔑我們在中蘇邊境上「製造人為的緊張」，對中蘇邊境的糾紛為蘇修開脫罪責，說什麼「不能說多數是他們挑起的，要作具體分析」。一九六二年五月，新疆伊犁自治州的暴亂事件，明明是蘇修策劃和組織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卻極力為蘇修開脫，祇輕描淡寫地說，「我看與他們的領事館有點關係」，接著他又別有用心地說，「不曉得這筆歷史怎麼寫法」。他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國務院的規定，擅自宣佈邊境地區的五類分子不要內遷，責備新疆軍區在中

蘇邊境「製造無人區」。他還胡說，「現代修正主義攻擊我們在進行民族迫害，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羅瑞卿同志反對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反對我們武裝力量的傳統體制。我們武裝力量的傳統體制是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遊擊隊相結合，羅瑞卿同志卻阻撓和反對建設地方武裝，忽視民兵工作。

羅瑞卿同志拒不執行毛主席關於建立和加強地方武裝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〇年就明確指示，要從主力軍中抽出若干師給沿海各省，作為地方武裝的骨幹。羅瑞卿同志對這一極為重要的戰略指示，既不傳達，也不佈置執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連續兩次在會議上提出這一個問題，指定要從正規部隊中撥出XX個師給沿海各省，並且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羅瑞卿同志這時才被迫佈置。但是，他在佈置時卻提出，「究竟抽調完整的建制師，還是抽調一部分建制部隊補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補充新兵和原來的地方武裝合併組建，還可以研究」。結果，毛主席的指示，還是被他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賀龍、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運動中要自始至終地抓民兵工作，參加四清的軍隊幹部要做民兵工作。羅瑞卿同志卻一再反對，說四清運動中的民兵工作「祇在建設階段抓一下就行了」，並且規定，「軍隊幹部下去參加社教工作不要外賦予搞民兵的任務」。

羅瑞卿同志在民兵工作三落實的問題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調。近幾年來，毛主席多次指示，民兵工作的三落實，第一是組織落實，第二是政治落實，第三是軍事落實，首先是有沒有，然後講政治。羅瑞卿同志卻狂妄地反對毛主席這一指示，他反覆說，「民兵三落實，首先是政治落實，在政治落實的基礎上，再做到組織和軍事的落實」，「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個組織不落實還好一點，越落實，被壞人奪去了領導權或者被壞幹部掌握了，那個越落實就越會幹壞事。」「要把關係搞清楚」。羅瑞卿同志在這裏好像是很強調政治，實際上是用詭辯論否定毛主席首先要

把民兵組織起來的重要指示。同時，羅瑞卿同志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實統統給衝垮了。

羅瑞卿同志還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針。毛主席歷來教導，文藝第一是政治標準，第二是藝術標準，首先要解決文藝的政治方向問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評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劉少奇同志也說，文藝戰線的問題「是文藝方向、性質問題。是搞封建的資產階級地修正主義文藝？還是搞社會主義的文藝？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羅瑞卿同志卻在部隊文藝隊伍中多次強調，部隊的文藝方向問題解決了，要突出藝術。他胡說什麼，「光搞政治性、戰鬥性很強的東西，就會顯得太單調、太枯燥」，「我們軍隊有些文藝作品，比較生硬，藝術加工很不講究，使人看了很枯燥。我不主張這樣。不然還有什麼藝術？光讀毛選就行了」。

羅瑞卿同志公然修正毛主席關於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就有先進、中間、落後三種狀態的理論。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說什麼「我們部隊不要提先進、後進，不要提後進戰士」，「後進戰士這種概念可以取消」，「我們軍隊中，祇要有黨員、團員、五好戰士、英雄模範、革命軍人這些名稱就行了」。

羅瑞卿同志還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惡毒的誹謗和攻擊。他多次在大庭廣眾之中散佈對毛主席的不滿。他還向別人說，毛主席不信任他，會整他，他想到上海當市長，早點離開毛主席。以後因為上天安門毛主席沒有要他陪同，到成都開會毛主席沒有讓他一道坐飛機去，他又說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這證明他對毛主席懷恨在心是由來已久的。

羅瑞卿同志這樣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實際上就是反對、敵視和攻擊無產階級的政治，力圖以資產階級的政治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

第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

羅瑞卿同志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是他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大暴露，是他力圖把我們的軍隊，拉到脫離資產階級政治軌道的陰謀的大暴露，是他力圖以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代替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陰謀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羅瑞卿同志沒有經過軍委辦公會議和軍委訓練研究委員會，也沒有請示林彪、賀龍、聶榮臻同志和軍委常委，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還先後十三次到各地委，督戰。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個人擅自決定的。

大比武是比軍事，比技術，是提倡軍事第一，技術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個第一，否定了軍委決定的一九六四年全軍工作的方針。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衝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嚴重的惡果。為了在比武中爭第一，拼湊尖子、弄虛作假的現象非常普遍，單純軍事觀點、錦標主義的傾向大為發展，嚴重地敗壞了部隊的作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嚴重地影響了內部的團結。由於大比武，部隊中資產階級思想氾濫，歪風邪氣上升，四好連隊大幅度下降。為了比武，不少單位選撥幹部和發展黨、團員重技術、輕政治，有些單位排擠工農幹部，把政治思想品質好但技術稍差的幹部撤換了不少，完全違背了毛主席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個條件的指示。大比武也衝擊了正常的軍事訓練，練為看，不是練為戰，搞了一套形式主義、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實戰要求。比武中浪費現象十分驚人，訓練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衝擊了民兵工作三落實，影響了生產，脫離了群眾，增加了人民群眾的負擔，也發生了許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據毛主席一貫的建軍思想、我軍建設的歷史經驗和當時部隊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嚴肅地批評了大比武的錯誤。對於這個指示，羅瑞卿同志不僅不執行，反而千方百計地反對、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內，他對林彪同志指示的內容反覆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閹割其革命精神，塞進了許多私貨。一九六五年初，他在軍委辦公會議第八次

據大會議和全軍學習軍師機關革命化經驗大會上，以及後來多次到部隊、院校的講話中，他都意圖反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並且惡毒地進行煽動。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羅瑞卿同志在高等軍事學院軍以上幹部讀書班結束時的講話中，公然煽動大家說：「對於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們贊成不贊成？可以討論一下。你們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贊成的回去以後寫信來。』」他到處別有用心地講，對於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正確的」、「全面的」、「辯證的」理解。他還說一九六四年的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績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洩，不要潑冷水。他到處散佈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謬論，極端反對毛主席關於政治領導軍事的基本論點，而強調單純軍事觀點，說什麼軍事就是政治，軍事政治應該並重，反對所謂「空頭政治家」。說什麼「政治搞不好別的就搞不好。但是，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哪裏有這種政治！」「一定要正確理解林總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來向後跑。但是，軍事沒有一點功夫，我們訓練就是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撲過來，你說向不向後跑？」「軍事訓練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要亡黨亡國」，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之後，馬上又遭到羅瑞卿同志的反對和歪曲。羅瑞卿同志反對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他還把「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這一條，說成是五項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而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幾條放到次要的位置。軍委已經決定把五項原則作為一九六六年全軍工作的方針，他卻別有用心地強調主要是解決方法問題，說什麼「不解決方法問題再好的方針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項原則是「瞎說一通」。第三，目無組織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說過的羅瑞卿同志個人擅自決定大比武，反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無運動」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嚴重的錯誤，而且在組織紀律方面，也都是嚴重的錯誤。

關於東南沿海對敵鬥爭的方針問題，毛主席、黨中央、軍委會多次明確指示，臺灣海峽的鬥爭，不單是對蔣匪的鬥爭，主要是對美帝的鬥爭，不單是軍事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因此，對蔣匪採取的一切作戰行動，都必須從政治上、戰略上加以全面考慮，由黨中央根據整個形勢的需要掌握決定，未經黨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張，輕舉妄動。羅瑞卿同志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和軍委，竟然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私自指示福州軍區，今後海上作戰，軍區可以根據情況，「積極主動地打擊敵人」，「為了不失戰機，可以邊打邊報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昆明軍區部隊進剿蔣殘匪的作戰沒有打好。戰役結束後，根據周恩來同志和軍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軍委決定由張愛萍、王尚榮同志組織檢查組去昆明軍區進行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王尚榮同志路過重慶，特地把周恩來同志和軍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羅瑞卿同志匯報並請他指示。他還沒有聽完就大發脾氣，暴跳如雷，說什麼「總理他們不瞭解情況，他們所瞭解的與實際情況距離很大，這次打仗的部署是我確定的，部署上沒有什麼不周密的地方，我回去向他們說一下。」還說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話。最後，他交代檢查組不准把周恩來同志和軍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正在昆明的張愛萍同志和昆明軍區領導同志傳達。後來，周恩來同志在上海同他談話時，羅瑞卿同志又扯謊抵賴。

羅瑞卿同志對許多重大的軍事行動和作戰計劃，往往不向軍委常委請示報告。有時軍委常委開了會，作了決定，祇要不合他的意，他就發脾氣，頂回去。如一九六四年擬制的 XX 協同作戰計劃，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邊境的兩次軍事自衛行動，羅瑞卿同志都沒有向軍委常委請示報告。又如一九六二年五月，軍委常委開會討論了中印邊境鬥爭和軍工生產兩個問題，大家根據當時的情況，認為最好調一個部隊到中印邊境西段去，同時軍事工業對常規武器的生產應該加強，使常規武器、彈藥，能增加一些儲備。會議上常委同志要雷英夫同志向羅瑞卿同志報告一下常委的意見，請他考慮決定。他聽了匯報後就大發雷霆，當著很多

人的面，連著說，「不要迷失戰略方向」，「請問什麼地方影響了軍工生產？」

關於國防工業建設和國防科學技術工作等問題，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都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但是，羅瑞卿同志不但不貫徹執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二年底，他在國防工業辦公會議上竟狂妄宣佈，「新軍委成立後，中央、軍委、林總對國防工業提出的一系列方針，賀總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總結的十七條經驗教訓，凡是正確的，一定要堅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確的，加以修改；不正確的，取消。」他否定聶榮臻同志直接領導的國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們的原子彈、導彈出來以後，還狂妄地攻擊國防科研工作是「從資料到資料，從設計到設計，一事無成」。

林彪、鄧小平、聶榮臻同志，不同意羅瑞卿同志提出的在國防工業中馬上取消軍代表制度的主張，多次指出，「軍代表制度的改變應當慎重考慮，在未弄清情況以前暫時不動。」羅瑞卿同志卻狂妄地說，「軍代表制度是不相信黨、不相信群眾的表現」，「有人說取消軍代表制度是彭、黃思想，我就要冒這個風險」。

羅瑞卿同志在公安部工作的時期，就有很多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和軍委，即擅自決定，將軍隊系統警衛北京的兩個師和一個團，改為公安部直屬的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歸公安部建制。受到了毛主席和軍委的批評。以後，他又積極地擴大公安部隊，並且企圖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隊的垂直領導系統，竭力擴展自己的權力。

羅瑞卿同志還利用各種機會，當著下級幹部的面，散佈流言蜚語，破壞軍委領導同志的威信。他對林彪、賀龍、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同志和已故的羅榮桓同志，都曾妄加言論和攻擊誹謗。

羅瑞卿同志身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但是他很少認真地系統地向幹部傳達黨中央會議的精神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有時他雖然也傳達一點，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講述，而且常常和他個人的話攬在一起，使幹部搞不清楚究竟

哪些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東西。羅瑞卿同志還對黨中央、對軍委，特別是對林彪同志，實行封鎖。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來，曾對他多次進行批評教育，希望他通氣。

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確指示，今後軍隊六級（中將）以上幹部和總部各部部長的任免，要先請示報告軍委常委各同志，然後再上報黨中央審批。羅瑞卿同志對這一指示卻置若罔聞，一九六五年五月，全軍中將以上幹部的定級，他不請示報告林彪同志和軍委常委，即擅自決定用軍委的名義上報黨中央。羅瑞卿同志還經常以林彪同志和軍委常委各位同志身體不好為借口，不准別人去請示工作和匯報情況，誰去請示工作或匯報情況，他就訓斥、打擊。

羅瑞卿同志是個典型的「一言堂」，極端不民主，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許多重大問題，他不經過軍委常委，不經過軍委辦公會議，不經過總參、總政，常常是個人批示決定。即使軍委常委、軍委辦公會議上決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隨便推翻，任意改變。軍委辦公會議經常是他一個人講話，別人發言，常常被他攔腰打斷頂回去，不讓人家把話說完，甚至諷刺挖苦，惡語傷人。軍委常委開會，也是他講的多，軍委各位副主席的講話也常常被他插斷。他沒有一點自我批評精神，聽不得半句反面意見，老虎屁股摸不得，誰要給他提了意見，他就長期懷恨在心，尋機打擊報復。

第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

羅瑞卿同志個人突出，飛揚跋扈，鋒芒畢露，稱王稱霸。他想盡一切辦法爭名譽，爭地位，出風頭，不擇手段地為個人撈取政治資本。他特別熱衷於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和講話，極力為自己爭版面，爭頭條，爭畫面，爭鏡頭。在國內外重大政治問題上，他常常搶先發言表態，把自己打扮成黨和國家的權威發言人的樣子。

羅瑞卿同志是最會投機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葉劍英同志親自抓了郭興福教學法，召開了現場會議，並向軍委建議在全

軍推廣，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同意這一建議，並表示很讚揚。羅瑞卿同志一看這裏面大有油水，便把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與師動服，親自召開了一個規模更大的現場會議，把功勞據為己有，並乘機搞起全軍大比武，推行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再如，羅瑞卿同志還把自己裝扮成反彭、黃的英雄，到處說自己是受害者，說延安整風時他批評了彭德懷，彭恨死了他。實際上，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野政工作時，跟彭德懷是跟得很緊的。延安整風時，他看到彭德懷受到批判，就轉過來批判彭德懷。解放戰爭時期打太原時，他看到彭德懷又擔負了重要職務，到太原前線來了，於是又靠上去。當時，彭表示對延安整風受批判不滿，羅接著向彭說：「我也覺得對你的批判是過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饒聯盟反黨時，他又陷了進去。這說明羅瑞卿同志是個很典型的投機分子。

羅瑞卿同志在軍委工作這幾年，一直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從來沒有到基層去作過調查研究，也不願意聽取人家匯報。他在工作上極端不負責任，嚴重失職。他卻裝成最忙的樣子，並且到處吹噓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實，他忙的是撈取政治資本，搞陰謀活動，忙的是吃喝玩樂，甚至在作戰或備戰最緊張的時候，他還照常去看戲、跳舞、釣魚、遊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揮霍無度，糜爛透頂的。

羅瑞卿同志雖然入黨已經幾十年，但是他的剝削階級立場並沒有改變。

羅瑞卿同志對於培養和教育了他幾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對於革命的同志和戰友，毫無革命的階級感情，冷酷無情視若仇敵。

羅瑞卿同志對待他的公務員段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親屬的態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剝削階級立場。段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農民出身的烈士子弟，他在羅處工作十年，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照顧羅的生活，把自己的身體都搞壞了，但羅對他百般虐待，有如奴隸。相反，羅對於他的地主家庭

是很有感情，甚至把有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岳父，窩藏供養起來，成為反動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開向林彪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

羅瑞卿同志在他的篡軍反黨活動中，首先把矛頭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當敵人看待，常常製造謠言，誣蔑和打擊林彪同志。並且採取種種陰謀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劉亞樓同志講過，羅瑞卿同志向他說，林總講他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面的事情要羅獨立主持，要大膽地處理問題，不需要經常向林總請示，也不要到處去請示。又說林彪同志還要羅瑞卿同志現在就多抽出時間去把全國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就要靠羅瑞卿同志指揮了。這件事情經過查對，完全是造謠，明顯地暴露了他的篡軍反黨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國慶節之後，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準備召開之前，羅瑞卿同志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讓賢」。當時他跑到林彪同志處，在談幹部同志問題時，借題發揮，指桑罵槐，說「病號嘛，就是養病，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他走出房門外，在走廊裏還叫嚷說「不要擋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林彪同志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一月十七、八日，即人大會後，羅瑞卿同志到上海私下對劉亞樓同志說，「想不到這個人又東山再起了！」為了騙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羅瑞卿同志對劉亞樓同志說，「我這次認定了，跟定了，今後彈打不飛，棒打不走，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於林彪同志。」並要劉亞樓同志把這些話報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羅瑞卿同志又到上海，先和劉亞樓同志談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見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後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領導，更擁護林彪同志的領導，說今後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黨中央、毛主席。」並要他今後改正過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羅瑞卿同志對劉亞樓同志談了許多不應該的話，批評了他。羅瑞卿同志上年

剛講了更相信更擁護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話，下午一到廣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謠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十五日，劉亞樓同志在羅瑞卿同志的指使下，向葉群同志講了四條意見，希望她勸林彪同志接受。這四條意見是：第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臺，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出也要出，林總將來也要出政治舞臺；第二，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第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什麼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給羅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去管。劉亞樓同志還對葉群同志講，「羅總長說祇要你辦好了這件事，羅總長是決不會虧待你的。」劉亞樓同志提出後，葉群同志說，「這樣大的問題，你和我講是不合適的，你要說，請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說好了。」二月十九日，劉亞樓同志到林彪同志處，向林彪同志講了上述第四條意見的大意，說要尊重羅，更相信羅，軍隊的事情放手讓羅去管。林彪當時嚴肅地批評了劉亞樓同志，並向劉亞樓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來羅瑞卿同志的思想情況、惡劣傾向及近幾年來對羅進行批評的經過，劉亞樓同志表示他過去受了羅瑞卿的騙，上了羅瑞卿的當。關於這件事，劉亞樓同志的妻子羅雲英同志聽說過，楊成武、吳法憲同志也都聽劉亞樓同志在臨死前說過。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羅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見軍委××會議人員的機會，給中央常委，特別是給林彪同志出難題。羅瑞卿同志事先沒有請示報告軍委常委，就佈置各小組選出代表和他一塊向黨中央常委提意見。他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帶頭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隊定額和合併軍區的意見。他發言後，就要各軍區的同志發言，妄圖造成一種聲勢，逼著中央常委馬上表態。羅瑞卿同志這一惡劣做法，當即受到林彪同志和黨中央常委其它同志的嚴厲批評。羅瑞卿同志合併軍區和大量增加部隊定額的主張，林彪同志多年來是一直不贊成的，並且向毛主席請示報告過，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見。這件事，羅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羅瑞卿同志在這裏是玩了一個陰謀。他的如意算

盤是，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見，他就在各個軍區同志的面前，顯示他的功勞，又達到了打擊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見，他就可以挑起各軍區對黨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滿。

羅瑞卿同志曾當著很多人說，「汪東興同志說，毛主席四個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這句話缺乏階級分析。人有好人、壞人，有這一中人的因素第一這句話缺乏階級分析。人有好人、壞人，有這個階級的人、有那個階級的人。」汪東興同志證明，毛主席根本沒有講過這些話，汪東興同志也沒有對羅講過這些話。林彪同志所提出的四個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關係來說的，這正是毛主席一貫的軍事思想。毛主席對林彪同志提出的四個第一，幾年來曾多次稱讚。羅瑞卿同志還造謠說，羅榮桓同志病危的時候，想見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見，等到羅榮桓同志逝世後，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這是補過，也是做給別人看的。羅榮桓同志的妻子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書，都證明根本沒有這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誣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即在××會議期間，林彪同志連續批評了羅瑞卿同志之後，羅瑞卿同志還和梁必業同志私下密談，挑撥林彪和羅榮桓同志的關係，誣蔑和攻擊林彪同志。

羅瑞卿同志長期對林彪同志進行封鎖，受到林彪同志的批評後，雖然他表面上也作過一點檢討，但實際上他不僅不改正錯誤，反而懷恨在心，變本加厲，對林彪同志惡毒地進行造謠、誣蔑和攻擊。他不但自己不報告、通氣，而且也不准別人報告、通氣，誰若通氣，他就打擊、訓斥。有時他也搞一點假通氣，又常常假傳林彪同志的指示，進行挑撥和誹謗。

羅瑞卿同志不僅陰謀篡奪軍隊的大權，他還從中央到地方，到處伸手。本來他是管軍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權越位，常常以個人名義，以命令口氣，向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國務院的副總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批過大量文件，許多事情他不經調查研究，亂加批評職責和瞎指揮。這種事例很多。

羅瑞卿同志為了實現他篡軍反黨的陰謀，還背著黨，同一些和他氣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羅瑞卿同志和楊尚昆、

楊獻珍、劉亞樓、蕭向榮、梁必業同志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

到會的同志一致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他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來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是用修正主義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林彪同志，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他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是打著紅旗造反，是一顆埋藏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时炸弹」。

這次小組會議，大家根據擺事實、講道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嚴肅的批判，並且一再說明允許他申辯，允許他保留不同意見，竭力想把他挽救過來。但是，他不但毫無悔罪認錯之意，反而一再向黨進行敷衍、抗拒和威脅。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檢討中，雖然也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戴了幾項空帽子，但是在根本問題上，還是千方百計進行狡辯和抵賴，並且安下許多「釘子」，進行反撲和準備日後翻案。他的檢討引起到會同志極大憤慨，當場受到許多同志批駁。之後，他又以來不及作檢討為借口，要求先行散會，大家回去工作，待他準備好了之後再來開會。此計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樓「自殺」向黨進行要挾，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走上了叛黨的道路。他在跳樓前寫下的「遺書」，是向黨進攻、向會議反撲的毒箭。在「遺書」中他連前幾天承認了一點點錯誤也全部推翻了。

會議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階級、歷史和思想根源的。羅瑞卿同志出身於地主家庭，入黨三十多年來，他的剝削階級立場沒有得到改造。在民族民主革命時期，他在黨的領導和幫助下，雖然走過來了，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同黨的距離越來越大，終於以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面目站了出來，進行篡軍反黨活動，作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

各國反動派的應聲蟲，充當了地富反壞右的代理人。在各個革命時期，羅瑞卿同志曾犯過許多錯誤。例如，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是跟著王明路線跑的。在一、三軍團的關係和對待四方面軍的幹部問題上，搞宗派主義，破壞團結。在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搞百團大戰、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是積極支持的。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彭德懷違背黨中央的政策，擅自發佈「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的訓令，也是他起草的。建國以後，彭、高、饒反黨聯盟事件，他也是陷進去了的。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對他做過多次批評教育。

一九六一年以來，林彪同志以最大的耐心，對他的錯誤反覆多次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向他提出嚴肅的警告。但是，他還是陽奉陰違，拒不改正錯誤，終於在近兩年惡性發作，來了個大暴露。羅瑞卿同志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世界觀。為了追逐個人的名利權位，他不擇手段，做了各種壞事，直到公開向黨伸手。結果就全部剝落了自己的偽裝，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會同志一致認為，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及時地察覺了羅瑞卿同志的篡軍反黨陰謀，斷然地採取了處理這一問題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繼中央上海會議之後，又召開了這次小組會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羅瑞卿同志的錯誤，粉碎了他的篡軍反黨陰謀，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黨的正確路線的偉大勝利。這又一次證明了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證明了我們的軍隊是黨的無比忠實可靠的武裝力量。幾年來，在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的領導下，軍隊的工作成績是偉大的，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有抵制的。出了一個反黨分子羅瑞卿，絲毫也無損於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光輝。到會同志一致深信，在粉碎了羅瑞卿同志的篡軍反黨陰謀之後，壞事將變為好事，我們黨的事業，我們的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都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取得一個又一個新的更加輝煌的勝利。

會議根據羅瑞卿同志的嚴重錯誤及其自絕於黨的事實，向黨中央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撤銷羅瑞卿同志在軍事系統的各項職務。
第二，撤消羅瑞卿同志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第三，撤銷羅瑞卿同志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第四，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作出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
第五，把中央工作小組的這一報告和小組會議上的幾個主要發言，以及羅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檢討，傳達到適當的範圍，徹底肅清他在各方面的惡劣影響。

彭真同志在這次會議過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問題上，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採取了縮小、掩護、包庇、支持的態度，並且企圖給羅瑞卿同志待機翻案作種種準備。彭真同志實際上是同羅瑞卿同志站在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林彪同志的一個立場上。有關事實，由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四同志，另寫一信報告毛主席和黨中央。

以上報告，是否有當，請批示。

中央工作小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二十二章 炮打司令部

端掉彭、羅、陸、楊

批羅的會還沒有結束，就傳來彭真「出事」的消息。聽楊成武說：「彭真包庇羅瑞卿，破壞中央工作小組對羅瑞卿問題的處理，他們告到主席那裏去了，主席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當時，全國工作的重點，一是搞「四清」，二是搞「戰備」。因此，主席批判《海瑞罷官》，批評中宣部是「閻王殿」，我們認為是地方上的事，對軍隊幹部影響不大。彭德懷是「死老虎」了，雖然，又一次被毛主席點名，沒感到有什麼大問題。後來，主席批評了由彭真主持搞的「二月提綱」，開始搞到彭真頭上了，說彭真「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這時，我思想上才開始重視起來。彭真在中央是個不簡單的人物，除了七個常委之外，就數他是老大了。他都有問題了，可能中央內部有了較大的意見分歧。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重點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撤消了彭真負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組，有江青參加，這個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就是大家所叫的中央文革。會議發出了中共中央《通知》，大家都叫《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裏的話就比較厲害了，《通知》裏說到「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通知》還說到「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

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這兩段話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份量很重。

中央撤消了彭、羅、陸、楊的職務，重點在彭、羅。這對全黨、全軍的震動是很大的。羅瑞卿在軍隊霸道，彭真在黨內張狂，打倒他們，當時在全黨、全軍的確擁護的人不少。七大以後，有毛的提攜，劉的重用，彭真的地位越來越高，可彭真在東北，在華北，都沒有搞好。八大以後，彭真又得到劉少奇的重用，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是劉、鄧司令部的重要幹將。毛主席批判彭真搞的「匯報提綱」，又撤消了他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後來又進一步深入，不久就指向劉少奇，劉少奇成爲革命對象了。

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核心問題，其餘的問題都是由此擴展的。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按照常規，用舉行中央會議的辦法是可以解決的。其實，人民解放軍是支持毛主席的，高級幹部的大多數，祇要不是劉、鄧圈子裏的人，也是支持毛主席的，就是劉、鄧圈子裏的人，祇要主席還要用他們，他們也會支持毛主席的。因此，打倒劉少奇並不一定要把劉少奇說得一無是處，更不用把他說成反革命，或「叛徒、內奸、工賊」。正像兩口子離婚一樣，不必把對方說得一無是處，實在合不來就分開，降低職務或撤消職務就可以了。主席爲什麼要對劉少奇這麼做，不清楚。因爲，當時我所處的地位，離中央高層還遠。但我從五九年秋天開始，就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之一，九大以後，又參加了政治局的領導工作，對打倒劉少奇的問題，還是有接觸的。我盡量把自己接觸過的有關打倒劉少奇的問題，在這裏回憶一下。

如果搞清楚了毛主席爲什麼要自下而上地搞「四大」來打倒劉少奇，那麼對毛主席爲什麼要搞文化革命也就清楚了，或基本清楚了。

要進行反擊戰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楊成武打電話叫我到他家去看一個文件。我到之時，李天煥等好幾個人早在他家裏的一樓客廳閒談，談得很熱鬧。我剛坐下，楊就說：「老邱，要進行反擊戰了。另外，還要祝賀你得了大獎！」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問題。」

楊笑著說：「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大家哄堂大笑起來了。

李天煥插話：「剛才，楊總長（李稱呼楊的職務向來不加『代』字）說，反擊戰就是毛主席決定，要反擊他們正在領導進行的文化革命。楊總長還帶回來毛主席對你的報告的指示。」（指毛主席在林總轉送的《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的批示，後來稱「五七指示」。）

我正在看「五七指示」時，楊成武以高興的心情談了他參加杭州會議的情況與討論的內容。

楊成武說：「前幾天，我同康生乘專機去杭州參加中央常委擴大會，怎麼把我也擴大進去了，我開始也不知道。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去，我去請示林總，他說你去吧，我是代替林副主席去的。會上把羅又批了一通，我向主席報告說要發言，主席說你聽聽別人的發言。會上大家群情激憤，毛主席在會上還做了重要指示，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了。」

對毛主席指示，楊說了三點：

第一點，毛主席說：「他們（指彭真等）迫不及待地搞一個《匯報提綱》，是沒有什麼事可做嗎？不是的，我交代的好多事都沒有人辦，連怎樣做的意見，都沒有提出來。是我官僚主義太多嗎？並不完全是，我官僚主義也有就是了。我們應當仔細觀察。我不同意整左派。」

第二點，毛主席說：「中央分為一線、二線，沒有說要兩個中央。我離開北京到外地時，常委議了兩條，中央的工作以一線為主，我有什麼意見會向北京提出來，我不在外地發指示；同時，也希望北京有什麼大的問題，也向我打個招呼。他們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就做決議，發指示。這是什麼問題，大家想想吧。」

第三點，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不祇是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總要有個辦法吧。跟著他們走，也是辦法，但大家又不願意，就祇好唱對臺戲了。」

另外，楊成武還說了杭州會議一些細節。例如，文化革命的名稱都議論了好久，才定下來的。陳伯達提出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席說伯達提得好，就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楊談話至此，我也吹了楊幾句：「楊代總長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議事了。『反擊戰』一詞用到政治鬥爭上來，也合適，表達力很強。」

李天煥說：「總長同統帥的關係，早就是同桌辦公了。在我軍高級幹部的心目中，早已明確：楊總長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

楊成武面帶笑容，聲音很大地說：「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後，林副主席的事業，總要有人繼承的！」

很顯然，楊成武內心是高興地承認了他自己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這裏順便說一句：楊這個人不愛說笑話，嘴巴裏髒字很少，但非常善於表現自己。他在同人們的接觸中，特別是同高級幹部的接觸，絕大多數時間，都是自我介紹，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樣器重、培養、信任自己，常委以重任。「瀘定橋」、「臘子口」經常掛在嘴上。

我們正在談得熱鬧時，葉群來了。她是來看望楊成武和來取「五七指示」的。

葉群來到之後，首先親熱地拉住楊成武的手說：「我來時，『一〇一』交代，要告訴成武：他這個時候做了很多大工作，很累，要好好休息兩三天。我感激他，代我到杭州去參加中央常委會。我得到了休息，他倒是很累的。」

楊成武接著說：「我一定聽『一〇一』的話，我感到能夠為『一〇一』辦事，是非常非常光榮的。我等一會就去看林副主席。」

楊、葉互相間的談話，使我感到，林、楊、葉之間的關係，不僅是

親密無間，而且有很溫暖的人情味。

葉群看完毛主席的批示全文之後，接著說了一段很長的話，她說：「我看了毛主席的批示，不敢用任何字眼來評價，祇有認真學習。主席對一個部門的報告做這樣的批示，以我知道，解放以來是第一個。主席的工作批示，對軍隊，特別是對總後，是一個極大的鼓勵。我們邱部長的工作做得好，向你祝賀！」

我立即說：「林總領導得好。軍委領導得好！」

這次在楊成武家談話，受益不小。大約談了三個小時，大家才高興地散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陶鑄在京西賓館黃永勝的住房裏，兩人有不短時間的談話，我是去看黃永勝，然後在那裏靜聽的。

陶鑄以自己特有的風度，直接了當地說：「現在，我們黨內不是一個中央……，毛主席說過幾次，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前一段，主席還談到兩頭蛇的問題。主席說：顧名思義，兩頭蛇是一條蛇有兩個頭，一頭向東，一頭向西，總是走不到一個方向，這有好受的嗎？……」陶鑄臨走時，同黃永勝說：「要帶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聞不出氣味，就會上錯了門。」

六六年羅瑞卿的會結束後，有一次葉帥在京西賓館他的宿舍閒談的時候，葉帥也轉述了毛主席說的兩頭蛇的問題。

劉少奇談彭、羅、陸、楊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大家「階級鬥爭」這根弦一下就繃緊了。全黨立即在黨內高級幹部中進行傳達，傳達的主持人都是後來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都堅決擁護毛主席，堅決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決擁護中央撤銷「彭、羅、陸、楊」職務的決定。軍委的傳達會議是葉帥和蕭華主持和張羅的，葉帥講他傳達「彭、羅、陸、楊」問題主要是根據「少奇和小平的講話」。

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的一次重要會議上說：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同志不在的時候，實際上他又是副總書記，他還是北京市的市長、市委第一書記，……他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經常參加常委會議。書記處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的事務。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許多缺點，過去也犯過不少大的錯誤，他有濃厚的宗派情緒，長期地進行了宗派活動；他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架子；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歷史上他犯過盲動主義的錯誤，在晉察冀犯過王明路線的錯誤，兩次王明路線錯誤，他都有份；在解放戰爭中，在東北，他也犯過錯誤；全國解放以後，在參加領導的活動中，他在重大問題上，提不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對彭真，我們批評過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評過他，我們是要把他培養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

人，對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這幾年來，他濫用了對他的信任，極力培植他的私人勢力，他同毛主席、同我們搞兩面派，背著毛主席、黨中央進行了不少地下活動，與羅瑞卿、楊尚昆有密切關係，有些地下活動是聯合搞的；與陸定一也有密切的聯繫，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與毛主席對抗，就是和陸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也是反對的、抵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當前偉大的、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彭真是堅決反對的，他極力把運動拉向右邊去，拉到與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對文化大革命，對城鄉四清運動，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實際上也都是反對的。這是這幾個人的共同點……彭真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在階級鬥爭深入到當前階段，他就不能不站出來，反對毛主席思想，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劉少奇說：

羅瑞卿是軍委總參謀長。國防部部長是林彪，但林彪長期生病，經常工作實際上是由他來做的，可是他還是不滿足。林彪同志在軍隊裏威望比羅瑞卿高得多，他講話，大家都照辦，這就觸犯了羅瑞卿，認為干擾了他。他不願意讓林彪同志『干涉』國防部、總參謀長的工作，因此，林彪講幾句話，他就跳起來了，要林彪把國防部長的位置讓出來（作者註：其實這就是「四條」的核心）；他長期不把國防部的情況向林彪同志報告，別人去向林彪匯報，他反對；林彪同志找人談話，他也反對，甚至採取了惡劣手段反對林彪同志，可以說是虐待一個病人。他還反對黨的軍事路線，毛主席在軍事問題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線，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是一致的，並且有些發展，羅瑞卿是反對主席、林彪軍事路線的。……他實行的是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此人盛氣凌人，鋒芒畢露，對老的元帥、老幹部，都加以打擊，到處搞一言堂，不聽別人的意見；他到處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

處突出個人。羅瑞卿問題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來的，並作了處理，是毛主席親自處理的。處理以後，在今年二、三月間，召集了幾十個人，有地方、軍隊幹部參加的會議，進一步討論羅瑞卿的問題，他在會上講了一次話，大家不滿意，沒有讓他過關，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他的這種行動，是對抗情緒，是嚴重地對抗黨，對抗同志們的批評。在這次會議作出決議的過程中，發現了彭真的問題，彭代表中央參加處理羅瑞卿問題，但彭真在作結論時，在關鍵問題上，包庇了羅瑞卿，這暴露了彭真、羅瑞卿之間的不正常的關係。

劉少奇說：

陸定一的問題。首先是從陸的老婆嚴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兩年前就發現了，當時我們懷疑陸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動。這事是交給彭真去處理的，因為這是一個具體案件，我們沒有直接去處理。兩年以來，嚴慰冰的反革命活動越來越猖獗，她打入黨內，探聽林彪同志的行蹤，林彪同志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住在哪裏，這些事我們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嚴慰冰跟著陸定一，參與很多黨內機密，知道很多事。幾個月前，要彭把嚴慰冰的材料告訴陸定一。而陸定一回去卻把情況全部告訴了嚴慰冰，並用多種方法來包庇嚴。最近已把嚴慰冰這個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據各種材料判斷，陸定一是知道嚴的情況的，陸嚴是合謀的，許多事陸定一如果不告訴嚴慰冰，嚴是無法知道的。

劉少奇還說：

楊尚昆是黨中央辦公廳主任，當了二十多年，掌握全黨的機密文件，各種重要的事情。近來發現他把黨內重要機密、核心機密文件，讓不少人抄走了，有幾萬件，不請示中央就讓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麼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國了，很難講。現在還查不清楚。楊尚昆歷來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鑒於蘇聯的經驗和外國的經驗，多次決定：不論黨內、黨

外、對中國人、對外國人都一律禁用竊聽器。搞這些東西黨內緊張，黨外也緊張，外國人也緊張。我們到外國去，在室內就講相反的話，真正的话是不在那裏講的。歷來黨內是禁止用竊聽器的，楊尚昆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央開會楊是公開安裝錄音機錄音，後來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竊聽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發現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還是不聽，仍然背著主席搞，我們常委開會、談話，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車上他都裝了竊聽器，我們常委幾個人的談話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給毛主席發現了。這時楊尚昆就把機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來承擔責任，說他自己不知道。最近發現在毛主席辦公室安裝的竊聽器就是楊尚昆指示的，這事就不簡單了，就成為政治問題了。這不是一般的紀律問題，是嚴重違反黨紀和國家綱紀的。最近讓楊尚昆隔離反省，要他交代這個問題，楊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後有些會議，要公開錄音的，都要經過請示、批准；安竊聽器是絕對不允許的，任何情況下也一律禁止。

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麼關係，達到何種程度，我們組織了審查委員會，正在進行審查。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他們的企圖不是個人要點什麼東西，而是企圖根本改變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要按照他們的路線辦事，要按他們的面貌改造黨，改造全中國，企圖在中國實現修正主義政策，也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如果他們的企圖得逞，就可能實現政變。

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顏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談，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走，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走？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為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有這種可能的。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

揭露了。這次事件的揭露是黨和國家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後，各單位都在揭蓋子，中央各部委的領導是這樣，各省市的書記也是這樣，不少人都在抨擊黨內自己的戰友，說人家反對毛主席，說人家是修正主義。如譚震林把鄧子恢罵得狗血淋頭。當時革別人的命都是起勁的，等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又怨聲載道，氣餒懼怕，不斷地「檢討」、「請罪」，甚至表示「永不翻案」。可是，文革過去了，這些人都說自己是反對文革的，當年說過的話都是違心的。我認為這麼說是對黨不忠誠的，政治上是不負責任的，文過飾非並不能總結文革的教訓。如果我們黨的高級幹部在黨內鬥爭中都說的是違心的話（違心的話客觀上就是假話），那我們共產黨不就成了一個說瞎話的黨了嗎！？

嚴慰冰事件

嚴慰冰是陸定一的老婆。大約從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年多的時間裏，她給林彪一家寫了幾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內容主要從挑撥豆豆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直到亂編亂罵。例如，說豆豆不是葉群生的，說豆豆長得像劉少奇。嚴慰冰更卑鄙的是在信中竟署名「王光x」，地址寫成王光美母親辦的托兒所所在的西城區按院胡同，這是明目張膽誣陷我黨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劉少奇，惡毒攻擊我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應該是大罪。陸定一在延安追求過葉群，這是很正常的事，嚴慰冰在匿名信中謾罵葉群，給葉群造謠，總之，信的內容惡毒下流。

嚴慰冰的做法，當時是觸及刑律的犯罪行爲，現在看仍然是觸及刑律的犯罪行爲。豆豆鬧，葉群到處找證人，老警衛員、馬伕等等，搞得林總一家不得安寧。這件事對林彪的傷害很大。

黨中央很重視此案，公安部門組織專門力量進行偵破。我記得當時中央指定駐京各大單位黨委書記，親自掛帥破案。劉主席、周總理、彭真等中央領導都親自指導過破案。一九六五年國慶節前就破案了。陸定一爲了包庇嚴慰冰竟逼迫中央保健局長史書翰同志作嚴慰冰有神經病的偽證，結果史書翰同志爲此含冤而死。對此案，周總理的態度是嚴肅到

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會上對陸定一，不僅批評、痛罵，還激動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了。總理這樣發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

總理批評嚴慰冰這種行爲，不僅在共產黨內不應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應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爲。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

陸定一、嚴慰冰是夫妻關係，但他們並非同案。對嚴慰冰應當依法處理。陸定一即使有一定的責任，也還是黨內問題。後來，把陸定一也關進監獄，是錯誤的，至少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了。凡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也就沒有政策了。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汪東興向我直接打了一次電話。他說：「我們這裏有兩個人，現在到你們那裏去拿嚴昭的東西（嚴是陸定一的小姨子，總後副部長韓振紀的老婆）。你先告訴韓，把東西交給來人就行了，不要問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打聽那些事。現在的事，當你能聽到的，不用問也可以聽到；要是你聽不到的事，問也問不到，不僅如此，還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陸定一壞的出奇，嚴慰冰已經被抓起來了。」汪東興的口氣很大，我除了聽之外，一句話也沒有說。

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舉行的。在會議進行期間，一天下午我這裏有一件急事，必須立即向葉劍英副主席請示報告。在沒法可想的情況下，我打電話到懷仁堂仁政廳。

仁政廳旁邊小房子有保密專用電話。接通電話之後，值班的警衛首先問：「你是邱部長嗎？」他對我要找葉帥接電話有些為難，但又不好拒絕，於是他去找葉帥去了。

一會兒值班警衛回來帶著歉意的口氣對我說：「不行啊，不能叫，葉帥在發言呢。」沒有辦法，我祇有自己到中南海西門值班室去等候葉帥散會了。散會時，葉帥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員來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車，我的車跟在後面。葉帥在車裏還很激動，有些言猶

未盡的樣子。他對嚴慰冰寫匿名信和陸定一說他不知道嚴的事特別氣憤；對彭真，葉帥是極其鄙視的態度，一路上說個不停。

葉帥答覆了我的問題，叫我不走，說一會楊成武要來。楊來了以後，祇講了幾句工作上的事，話題又轉到開會的情況。楊說：「聽了嚴慰冰搞的這些特務活動，真是氣人啊！我對陸定一講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我邊講邊站起來走到陸定一跟前，把拳頭伸到他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楊成武邊說邊打手勢，同時把拳頭也伸到我的眼皮底下，說得活靈活現。

首都工作小組

政治局五月擴大會議期間，對首都安全問題，提高到了重要的日程上來了。中央指定葉劍英副主席擔任首都工作小組組長。小組辦事機構開始時設在京西賓館八樓，後搬到三座門。我雖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組的成員，但參加了工作組的部分工作。

對首都安全，主要採取了兩項主要措施。

第一是加強衛戍區，也可以說是建立了有實力的衛戍區。文化大革命前，北京有三個警衛部隊：首都警衛師、公安總隊、中央警衛團。這三個部隊分別隸屬總參謀部、公安部和中央辦公廳建制。另外，還有一個管理人民武裝的衛戍區。

衛戍區改組後，除原有的首都警衛師改為警衛一師，公安總隊改為警衛二師之外，又從野戰部隊增調了兩個主力師，一個是二十四軍的七十四師，這是我軍當時的兩個機械化師之一；一個是駐石家莊六十三軍一八九師。

據楊成武說，在選調首都警衛部隊的時候，林總曾向他說：「選衛戍部隊的條件是要同你（指楊成武）有濃厚感情的部隊，能夠指揮自如，十分踏實的部隊。」林能向楊說這種話，也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密切的程度了。從六十三軍調來的一八九師，是楊成武在抗戰時對期創建的部隊；從二十四軍調來的七十四師，在抗美援朝回國後就駐在北京地區。這兩個師對楊成武都是十分忠誠的。

第二是確定首都工作小組的日常工作。這項工作是十分複雜的，準備花費很大的人力和時間來進行。這項工作，中央由周恩來總理領導，

葉劍英副主席抓總，具體工作由謝富治、楊成武組織實施。周總理指定我總管經費開支、物資調撥等。

對首都安全的任務暫定了兩項：（一）制定對首都的設防、警衛、主要目標控制的方案；（二）準備對首都進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主要對象包括社會人口、槍支彈藥、電臺、監獄、僑民等。

為了具體進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勘察小組。小組成員有楊成武、邱會作、汪東興、萬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李靜（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等，楊成武為主持人。勘察小組對北京城進行一個多月的實地勘察。

對遠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南口、紫金關兩個中央首腦指揮工程；房山、長辛店的廣播發射臺和勞改農場、秦城監獄等。對近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戰時指揮所），象鼻子溝（國務院戰時指揮所），西山（中央軍委戰時指揮所）；還勘察過密雲、順義、通縣、長辛店等處衛戍區部隊的外圍部署地區。對城內曾經勘察過的有：電視大樓、電訊大樓、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圍的高層建築。電訊大樓屋頂上，距離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徑祇有幾百米，內眼看得很清楚。我們

就在樓頂開會，研究過對中南海的保衛和安全問題。

六月三日，葉帥在首都衛戍部隊營以上幹部大會上講話時說：

在今天的會議上，將由楊代總長向到會同志，並通過你們，向首都衛戍部隊全體指戰員，傳達毛主席、黨中央、軍委給予你

們的保衛首都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北京，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所在地，是領導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反對一切反動派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現在，全世界都注視著北京。一切革命人民把北京看作是他們的希望，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則把北京視作眼中釘。我們保衛首都，就是保衛世界人民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就是保衛偉大的革命旗幟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的導師。保衛首都不受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破壞和顛覆，就給世界革命人民以最大的鼓舞和信心。

首都衛戍部隊所擔負的任務，是光榮的，同時也是艱巨的。你們要完成任務，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擦亮眼睛，提高嗅覺，團結一致，不斷前進。在完成保衛首都這一任務的過程中，把我們的部隊鍛煉成為非常無產階級化的革命的部隊，使全體指戰員鍛煉成為堅強的革命戰士。

擔任首都衛戍任務的部隊，同野戰部隊有許多不同的特點。

擔任首都衛戍和一兩個人分散執勤的情況比較多，接觸的環境比較複雜，會遇到資產階級各種各樣的誘惑和攻擊。所以，必須加強對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層，做到每個戰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戰鬥中要發揚孤膽精神。今天在城市裏執行警衛任務，我們要提倡孤忠執勤。在任何情況下，要對毛主席、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要成為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務。

毛澤東點火

六五年上海會議解決了羅瑞卿的問題，六六年間三、四月間，毛主席在杭州兩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批判了羅瑞卿，這是繼上海會議以後，在最高層次的會議上評判羅瑞卿。會上，主席提出「現在有些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主義」，也批評了彭真搞的《二月綱》。

六六年四月，中央組成由鄧小平、彭真、葉劍英為領導的工作小組（實際上葉帥主持會議），又對羅瑞卿批判了一個多月。

中央五月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批判了彭、羅、陸、楊等人，會後立即在黨內傳達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傳達貫徹《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劉、鄧本人也把彭、羅、陸、楊罵的狗血噴頭。這次會議事實上就是劉、鄧「司令部」的垮臺，可悲的是由他們自己「宣佈」的。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宣佈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劉、鄧、彭的老文革小組，從此就不復存在了。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造反。

五月到七月，中央宣傳部、《人民日報》社、北京市委都先後改組了。劉、鄧賴以搞文化革命的機構，宣傳工具，輿論陣地都由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佔領了。六月間，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由毛主席批准，由新華社廣播了，《人民日報》社刊載了。大字報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劉、鄧司令部。

六月初，劉、鄧決定中央各部委往北京的高校派工作組，全國各省市，解放軍的高校也派了工作組。學校的群眾，尤其是激進的，和工作組屢屢發生矛盾。

此間，毛主席一直沒有回北京，主席在背後看。「鎮壓學生運動」的把柄被抓到了主席手上後，七月八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開中央全會倒劉的條件就有了。其實，劉少奇的問題並不在於派不派工作組，在於毛要不要劉少奇，毛決意不要劉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到十二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由毛主席主持。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

一百四十一人，各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師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十一中全會是分兩段進行的。前一段在北京飯店舉行，後一段在京西賓館舉行。兩段之間，大約有個把星期。按照後來毛主席所說，全會是宣佈了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產，毛主席與劉、鄧相對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全會在文化大革的進程是一次重要會議。要說《五一六通知》是指向劉、鄧司令部的幹將「彭羅陸楊」，十一中全會就是向劉少奇直接開火了。

羅陸楊」，十一中全會就是向劉少奇直接開火了。會議開始時，由鄧小平宣佈會議議程：一、通過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中央在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三、確認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一些同志任命的決定；四、通過全會公報。接下來是劉少奇講話，按照常規他向全會匯報了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並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承擔了責任。會議開得「不痛不癢」，毛主席不高興，劉少奇講話時，主席常打斷劉少奇的話，說派工作組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為了把火點起來，八月四日，毛主席舉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有幾段講話，話說得很坦率、很

直接：「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麼分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麼不能反對？」「我規定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麼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正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

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主席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對劉少奇下手。

十一中全會，是因為形勢的變化臨時決定召開的。林總當時在大連休養，原定不出席中央全會，並向中央請了假。全會進行了幾天之後，毛主席突然決定要林總回京參加會議，林總是幾經催促才回京的。

當時，林總毛家灣的住房正在維修，林總回京之後立即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他是上午回到北京的，按時間計算毛主席才睡覺不久。

於是，他想先休息後才去見毛主席。不料，毛主席還沒有睡覺，在專門等林總回來，他們很快會面了。

後來林總見到我們時說，毛主席見到林總時，向他說：「現在形勢變化很快，群眾起來了，這是出乎預料之外的。出了這樣大的問題，你現在是非回來開會不可了！」

林總說：「主席在家坐鎮就好，一切都好辦。對當前出現的問題，令人擔憂；但在主席領導下，是完全可以對付的。我所擔憂的是，主席的身體要緊。現在主席是進入了『戰時』指揮所，希望主席睡好覺，才能更好地指揮作戰。」

在全會中間，林總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向出席會議的軍隊代表講過一次選拔幹部的標準問題。我參加了聽講。

林總說：「看幹部，首先要看他是擁護毛主席的，還是反對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幹勁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幹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佬。所謂人緣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們不要選這種幹部。我們要擁護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幹勁的好幹部。這是方向性的問題，我們的軍隊按照這樣作是一種面貌，否則就是另一種面貌。」

「今後我們的幹部政策應該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罷誰的官；誰反對突出政治，就罣誰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兩種政策，兩種路線。一種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幹勁；一種是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突出政治，單純軍事觀點、技術觀點，謹小慎微。我們不要把我們的軍隊變成萎靡不振的軍隊。對犯錯誤的幹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爭取的要爭取，不可救藥的罷官。」「要通過這次運動，全面地審查幹部，該昇級的要昇級，該罷官的要罷。我們軍隊幹部如果再出現反對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恥辱。」

陶鑄在小組會上，對林總的講話，同樣發揮得很精彩。他說：林總的講話是有目的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浪中，怎樣保護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他接著說，搞文化大革命，有三條是絕對不可少的。這就是：毛主席的絕對權威；黨委領導和廣大幹部上第一線；軍隊支持文化大革命。這三條少一條都不行。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並不是陶鑄所講的那樣，都在所有老幹部預料之外的。最大的變化就是黨委垮臺了，「造反派」奪了權。

十一中全會的特點

十一中全會，可能與以前的全會都不同。中央文革後來解釋，十一中全會是「造反」會議，這種解釋是有根據的。

全會的特點之一：毛主席號召造反。對全會震動的最大的是，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黨內生活出現的新事物。從大字報的內容看，完全可以看出是針對劉少奇的，但為什麼要「炮打」就不理解了。當時，會內會外，都認為要打倒劉少奇了。會議中間的一個晚上，總理把參加會議的不少軍隊的同志叫去，給我們吹風，我是跟楊成武一起去的。總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總理把主席的大字報唸了一遍，直截了當地說：劉少奇不成了，辜負了主席；林彪同志幾十年來一直是擁護主席的，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

接著，總理又說：可能大家沒聽清（總理唸毛主席的大字報），我再唸一遍，不過今天的會議內容不要外傳，聽安排，今後要把會開好。說完總理又唸了一遍主席的大字報。開會前，大家都在那興高采烈、東拉西扯地亂談一氣，散了會大家的話就少多了，不過也沒有什麼緊張的，各自上車回家了。

毛主席除了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外，在兩個月以前還批准發表了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八月一日寫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從上述一系列活動表明：毛主席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就明朗化了，要拉解放軍來為他保駕護航。過去的運動主要是依靠黨委領導，依靠老幹部，依靠群眾的大多數，即使有些偏差運動後期也能糾正過來，關鍵就是有各級有黨的領導。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依靠力量變了，依靠的是中央文革，依靠了少數造反派為骨幹，這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遭到最嚴重的損失和最終的失敗。

全會的特點之二：「革命師生」參政。過去，有過領導幹部列席中央全會，一般幹部列席全會的聽都沒有聽說過，這次是別開生面，有「革命師生」（包括聶元梓）列席會議。

全會特點之三：劉少奇泰然自若。劉少奇是比較成熟的政治家，在十一中全會上表現出老練、沉著的風度。

劉少奇我並不熟悉。一九四〇年二月間，在河南洛陽才第一次同他談話。當時，劉少奇（化名胡服）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秘密住在洛陽。我由延安帶中央財經工作團到山東，路過洛陽。我臨離開延安時，毛主席同我談過兩次中原的形勢和戰略方針問題，要我路過洛陽時，一定要向劉少奇轉達清楚，因為有些話，電報上還不好說，同時也難於說透徹。我到達洛陽時把毛主席的話向劉少奇詳細轉達了。劉聽後說：「你的话轉達得很清楚，對中原今後的鬥爭是一個根本問題。」由於工作的關係，以後同劉少奇就沒有直接接觸了。

十一中全會鬥爭的對象是劉少奇，我總以爲他會很緊張。但他竟同平常一樣的！劉少奇是一個不善言談，更不說笑話的人，也不多說話。以我看到的他在全會的表現，可以歸納爲如下三點：一是，胸懷寬廣，若無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計較。三是，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劉少奇在小組會上，他總是平心靜氣說，在工作上有錯誤和有過不同意見，同反對毛主席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不能混爲一談！在全會開幕和閉幕進場，他也是堅持原則的，開幕時，劉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後面；閉幕時，他走在康生的後面。

當時，我對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嚴重分歧和鬥爭瞭解不多，我認爲劉少奇有錯誤，但決不是反革命。毛主席打倒劉少奇，是他一生中政治上、組織上最大的錯誤。這一錯誤，給國家造成了災難，破壞了黨的組織原則，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本人的形象。毛澤東去世後，給劉少奇平反是完全正確的，但措施又不適當。這樣，給劉少奇的平反，在宣傳上又打擊了毛主席。

全會的特點之四：王光美的活躍。王光美當時是劉少奇的秘書，她在全會上露面的時候特別多。她的一切做法，似乎都向大家表示什麼。

我是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時認識王光美的。一九五五年，我到北京之後，看到她的機會並不多。現在她的打扮變了，穿的很樸素。在全會期間，王光美對人的態度很謙虛，見到任何人都是客客氣氣的。這使我想到她介紹桃園四清運動經驗的報告，我去聽過。她不肯在臺上講話，一定要到臺下同聽眾在一起。一次在人大會堂河北廳講話時，她無論如何不肯坐在臺上去，一定要到臺下才講。

我認為在文革中王光美如果有錯誤，批評她是可以的，運動來了一些過火行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把王光美打成反革命則是完全錯誤的。

全會的特點之五：會議期間，出席十一中全會的人員，到清華看大字報，參觀文化大革命，自由參加，我也參加了。

全會的特點之六：劉少奇下臺，林彪成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據葉帥在京西賓館講過：在十一中全會的後期，即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之前，中央常委開過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會議討論的問題，對中央的決策和黨的團結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參加常委會的，除常委：毛主席、林彪、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外，還吸收了陳伯達、康生、陶鑄、葉劍英參加。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的議題是討論《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但實際上是批判劉少奇。在葉帥那裏閒談的好幾人。其實葉帥並非閒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林彪接見革命群眾。

談，而是在對我們進行思想教育。葉帥還說：十一中全會的最後階段突然根據毛主席的建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根據毛主席的提名，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是新當選，劉少奇、朱德、陳雲的位置明顯拉後了，林總引人注目地排到了被看作爲接班人位置的第二位。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歷史的教訓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往事歷歷在目，黨在這段歷史上有深刻的教訓。毛主席去世後，後來的中央領導人把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看爲是他的「最大罪行」，並做爲反毛主席的主要根據。事實上，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與劉鄧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而來的。也就是說沒有劉鄧的文化大革命在前，毛主席就不一定會有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當然，主席打倒劉少奇，是下了決心的。

說來也是，毛主席不反對劉鄧的搞法，劉鄧的文化大革命就會繼續下去的，其後果也是不可設想的，這種搞法也是不成的。每個大學都派了工作組，都搞幾十個、上百個三類學生（即反動學生），全國就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這如同第二次反右鬥爭，也是後患無窮的。當然，按照毛主席的搞法，事實證明災難更大，因為反工作組，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祇是爲了打倒劉少奇而抓他的辯子，而十六條就直接指出「運動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群衆的矛頭就對著各級領導幹部來了，結果全國的黨政軍都亂了。我所在的總後系統，院校特別多，總後黨委也按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組，結果總後黨委和我本人都付出了沉重地代價，我幾乎被造反派打死。文革後我們的黨並沒有認真反思，不少人重新上臺以後，就忙著打擊報復、整別人，什麼教訓也沒接受。其實，應當說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時，反對文革的人並沒有多少，包括劉鄧在內；文革後痛恨文革的大有人在。他們痛恨的也祇是文革，使他們受衝擊下了臺。他們重新上臺以後，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個人站在黨之上，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

附：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第二十三章 軍隊文化革命的方針和三個階段

軍隊的文化革命對全國的文化革命是舉足輕重的。穩定軍隊，還是搞亂軍隊，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

六六年五月間，葉劍英元帥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林總提出的軍隊文化革命總方針是：軍隊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既要有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戰鬥力，加強戰備。這是完全正確的方針。從元帥到軍委常委及參加會議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院校負責人，都完全擁護這條方針。

軍隊當時的三大任務是：戰備、國防施工、農副業生產。文化革命初期，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各項工作都搞得很好，軍隊的戰備一直是常備不懈的。

在六六年十月以前，對軍隊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央軍委常委直接領導的，從批判羅瑞卿開始的。各級黨委通過批羅，使軍隊進一步團結起來了。六六年十月以前，即軍委《緊急指示》發佈以前，各級黨委的精神狀態很好，認真抓各項工作，一點害怕和顧慮都沒有，甚至覺得文化革命是學生的事情、地方的事情，軍隊是不介入的。地方上的不少領導幹部，對軍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時的狀況是十分羨慕的，他們在軍隊都有老戰友，不少人還在軍隊避過難。

當時的軍隊文化革命小組，是在總政領導下的，組長是劉志堅。工作人員都是總政的，同時，也從各軍區選調一些人來協助工作，每個人的身份做聯絡工作和調查研究。這期間，葉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每個星期至少開一次常委會，而且多數都是擴大會議，討論軍隊的文化革命。全軍文革的正、副組長以上都列席會議。在軍隊還沒有出現造反派之前，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討論都是很熱烈的，發言踴躍，大家說話也隨意。

當時，全軍文革提出的主要方針是：徹底進行革命大批判；徹底批判羅瑞卿的流毒；徹底轉變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對徹底進行革命大批判，全軍文革提出來的任務是：參加批判、出大字報的人數，要達到各單位、各部門總人數的 95% 以上，出大字報的數量按人頭計算要達到 200% 以上。即每個人要寫兩張以上的大字報。此外，對牽涉機密的意見，重要的意見，還可寫小字報，按系統上送。

記得在一次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許光達說：「我就可以寫十張。」王樹聲說：「你寫十張算什麼，一百張也可以。」有的人說：祇要有紙、有筆墨，要寫多少有多少。劉志堅看大家漫不經心，又有諷刺的意味，便解釋說：中央文革提出數量的要求，就是要造成一種革命形勢。我們的意見是，祇要是擁護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修正主義和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就行了。

聶帥說：「這樣做，什麼用也沒有，祇有糟蹋紙就是了。」

接著，也有人說：我看事情也不是那樣簡單，還是不要隨便說為好。今天說了，明天怎麼樣？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想不到的問題。

總之，大家七嘴八舌還說了很多。大家的發言都不著邊際，事實上也就等於沒有討論了。

葉帥笑著說：「會議開得活躍。大家發言時，可以將今天全軍文革提出的三個問題談談自己的認識。」

然後，葉帥要全軍文革劉志堅組長把準備展開討論的問題向大家簡要說一下。劉志堅看大家的思想離他要講的距離太大，就簡單說了一下也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這樣，葉帥就以插話的方式，把劉的話打斷了，他接著說了話。

葉帥說：「當前文化大革命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學習，像過去打仗一樣，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文革是一個大關卡，大家必須過的。毛主席最近指示說，我們的同志，對文化革命不理解，不認真，不得力。這三個『不』，不是正指的大家沒有學好嘛！所以學習是主要問題。」

葉帥接著說：「昨天下午，我去向林總請示今天開會的問題。林總有三點指示：（一）毛主席說，軍隊的文化革命由軍隊自行決定，不照地方的辦法。軍隊堅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會場上熱烈鼓掌）。（二）軍隊高級幹部，不要怕別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軍隊要特

別警惕企圖搞亂軍隊的人。對這種人，不論來自何方都必須嚴肅對待。
上面三點就是軍隊文化革命的方針，我們要堅決貫徹執行。」

葉帥最後說：「今天會議開的很好。當前工作就以全軍文革提出的三個問題，認真去做併力爭做出成績來。」接著，葉帥調轉話題，講了向地方學習的問題。

葉帥說：「我們向地方學習，祇學習好的革命精神。在文化革命中，我們的任務是穩定軍隊，搞好戰備。我們對穩定的看法，主要就是看領導幹部站在那一邊。大家都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林副主席和中央軍委一邊，我們就穩坐釣魚臺。軍隊雖然不搞『四大』，但也決不會是一點風波都沒有的，大家在思想上要有準備。現在有人正在組織什麼『造反突擊團』，並公開說：『主席表揚了聶元梓，軍隊為什麼不可以出聶元梓？』這種想法要不得呀。」

聶帥插話：「軍隊的幹部不許造反，什麼人要造反，我們同他要『涇渭分明』（熱烈鼓掌）。」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總政治部由蕭華主持，制定了軍隊文化革命十二條，對機關、院校、部隊的文化革命分別作了規定，提出了要求。這是對軍隊文化革命「正面教育」的具體化。當時，總政治部的規定是正確的。

軍隊的文化革命，經過了複雜、曲折的過程，但主要的三個階段又是很清楚的。六六年五月到十月初《緊急指示》公佈是第一階段；六七年五月「五一三」開始，到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階段；六七年九月「九一三」，為第三階段。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為第三階段。軍隊的文化革命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有秩序地進行，主要是「抓革命、促戰備」。在轉發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問題的報告時，葉帥、蕭華、楊成武、謝富治批羅的發言，作為附件下發全黨了，各級黨委主要是傳達批判羅瑞卿的文件。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會議之後，毛主席也沒有回京，林總不知主席下一步是什麼打算，就到大連去了。去前他指示全軍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因為社論是毛主席批准的，使北京的政治空氣變的非常緊張，大家開始聞到了火藥味。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播放了聶

元梓的大字報。第二天（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又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和毛主席代《人民日報》寫的評論員的文章。這樣，北京的高等院校沸騰起來，全國的高等院校反響也很強烈，開始亂了。學校的黨組織立即癱瘓，並開始揪鬥學校領導幹部。為此，毛主席非常高興，說這是革命師生「造修正主義的反！」「群眾發動起來了！」

這時軍隊的高級幹部，甚至軍委的領導，感到有些緊張，這種緊張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而緊張，而是害怕地方的風吹到軍隊來。林總說「不介入就不緊張！」林總是高明的。

八月一日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主席不斷催促林彪回京參加會議，林一拖再拖終於在八月六日回到北京，周總理親自到西郊機場接林彪（後來林總說，總理在機場就跟他攤了劉少奇的牌）。林彪這個人考慮問題是很縝密的，在大的問題上一般不會輕易「騎」上去，林總這回被主席召回北京，趕著「騎」上去了，這一「騎」上去，下來就難了。此時，林一方面頌揚毛主席，頌揚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強調軍隊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總對部隊是非常愛惜的。對林總的指示，葉、聶、楊都執行的很堅決。

六六年六月以前，機關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開始，在內部出大字報和小字報，機關的業務工作照常進行。

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上海二醫大成立了造反組織「紅縱」，就違反軍紀跑到北京，鑽進總後機關裏來了。他們在禮堂、飯堂到處帖大字報，矛頭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長饒正錫同志，但機關則秩序進然，一點也不亂。各領率機關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圖搞亂機關，反而把機關鞏固起來了。機關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數是在群眾監督和包圍之中。反對「造反派」成為機關絕大多數人一致的行動。

軍以下的野戰部隊，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

當時蕭華、劉志堅他們是總政的主要領導又是全軍文革的領導，是主管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毛主席發動的，毛主席不斷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斷給軍隊施加壓力，這樣，再不跟上，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了，態度問題就是立場問題。我想蕭華、劉志堅他們有以公心擁護毛主席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擁護毛主席的一面，支持

在軍內造反，就是以私心擁護毛主席的一面，當時軍隊亂了他們是有責任的。李曼村、謝鎧忠和他們手下一大群《解放軍報》記者，這些人就不同了，他們是軍內張春橋、王、關、戚式的人物，他們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並想在軍內培養聶元梓式的人物，同時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飛黃騰達，搞亂軍隊他們是有「功」的。

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是部隊最複雜、最混亂、最黑暗的階段，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同意部隊搞「四大」。《緊急指示》是「放」的指示，這一放不要緊，整個局面亂的不可收拾。六六年國慶節後，參加國慶活動的軍隊院校學生大部分都沒有回去，脫離了學校的領導在北京和地方院校搞串聯，接著就開始在軍內造反，矛頭直指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帥機關，而後又到各大軍區造反。當時，省軍區以上的領導機關和院校都亂了。有的機關，如總後、南京軍區則亂透了。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發佈《緊急指示》，是完全錯誤的，使軍隊文化大革命 180 度大轉彎，這是劉志堅、李曼村、謝鎧忠等人把軍委往邪路上引的結果。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極「左」的東西出來，也是擋不住的，「擋不住」和「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處是不一樣的。蕭華、楊成武沒擋住，葉帥、聶帥沒擋住，林總也沒擋住。這道命令改變了中央軍委關於軍隊文化革命的總方針，允許院校搞「四大」，成了軍隊大亂的突破口。

這樣一來，原來按中央軍委的方針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黨委領導，一下子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軍隊領導幹部被揪鬥得很厲害，軍隊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動，大家怨聲載道。葉帥、聶帥、林總很生氣又很無奈。當時，我們還看不清毛主席的總意圖，但葉帥、林總他們似乎已經體會到了。因此，毛主席對部隊的問題給軍隊發出各種指示時，林彪、葉帥、聶帥就祇有服從了。軍隊內部搞四大，軍隊機關搞亂了；軍隊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對地方搞支左，結果又都支了保，支錯了。葉帥、聶帥終於忍不住了，結果愛護部隊卻成了「二月逆流」。

這一階段是軍隊各領率機關的大亂時期，尤其是六七年一月，徐向前當全軍文革組長（經江青提議、毛主席批准的）和江青搞在一起，把軍隊就徹底搞亂了。造反派衝擊機關，殘酷揪鬥各領帥機關的領導幹部，尤其是我，幾乎被打死。

經林總、葉帥、聶帥、楊成武（楊成武雖然大力巴結江青，但對穩定部隊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總親自起草了軍委《八條命令》。軍委《八條命令》對穩定大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六七年一月底軍委《八條命令》頒布和三月全軍高幹會後，中央軍委決定對部隊的「造反」分子一律實行軍紀制裁，這對部隊的穩定，保持戰鬥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六七年初，在全軍文革的示意下，《解放軍報》社少數造反分子，企圖撰文煽動全軍搞「四大」。《解放軍報》的社論都排上版面了，中央軍委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及時發覺了他們的陰謀，命令立即撤版，果斷制止了。

由於地方造反風潮對軍隊的影響，內蒙古軍區警衛營三百餘人，不經領導批准，集體跑到了北京，要求搞「四大」。葉副主席代表中央軍委命令北京衛戍區用了相當的兵力，採取了最為嚴厲的措施，將跑到北京的內蒙古軍區警衛營全部捉拿並送到六十三軍訓練改造。爾後，大部分的內蒙古軍區警衛營全部遣散回家去了。在文化革命初期，昆明軍區某炮兵團就成立了昆明軍區「造反突擊團」，造反派依靠這個造反組織進行武鬥。

雖然軍委《八條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簽發的，但軍委《八條命令》執行後，中央文革又是不滿的，生怕壓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有一次在毛家灣，葉帥坐在會客室不說話也不走，林總一直陪葉帥坐著，誰也不說話。軍委《八條命令》出臺以後，軍隊各級黨委、各級領導者，誰也不說話。軍委《八條命令》出臺以後，軍隊各級黨委、各級領導者的確當成了法寶，打擊了「造反派」，有的甚至開了槍，如趙永夫。因為二元帥們有氣，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又使他們發火有了本錢，這樣「二月逆流」的發生勢在必然，軍委《八條命令》本身對毛主席的路線就是最大的「逆流」。毛主席把老一輩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大都給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進行批判。「二月逆流」的本質不在於這些老同志說了什麼話，而在於毛主席要壓住這股反文革的「潮流」，所以叫「逆流」嘛。

當時，爲了顧全毛主席的大局，林總和葉帥、聶帥商量，又於六七年四月六日發出《中央軍委命令》，即十條。十條是對八條的否定，毛主席有所滿意。

當時，部隊各機關已經亂的不可收拾，葉帥、聶帥戴著「二月逆流」的帽子，領導已經無力，蕭華搖搖欲墜；楊成武陪毛主席在外，部隊基本上群龍無首，這時看守小組成立了，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組成。

軍隊大亂的主要責任是江青、中央文革直接插手了軍隊的文化革命，直接責任就是當時的全軍文革劉志堅、蕭華、徐向前。江青和全軍文革相勾結，把軍隊搞亂了，最後他們自己也沒保住，反而先行下臺了。現在說蕭華、劉志堅的倒臺是因爲他們抵制了江青、中央文革而獲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尤其劉志堅的倒臺是在「二月逆流」之前，當時葉帥、聶帥還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葉帥有相當的決定權。

按照總政的規定，院校、科研單位、文藝團體等單位是文化革命的重點部門。六六年國慶節以前，在校內可以出大字報，但不准大字報上街，不准到地方串連，也不准地方的造反派到軍隊內來。另外，軍隊院校的大災難，稱爲「黑材料」。「摸底排隊」準備整人是全軍文革佈置的，這是執行劉鄧時期的決定。劉鄧垮了以後，他們看到上面的風頭，鼓動軍內造反也是他們幹的。運動來了，他們想整人，想發「政治財」。六六年九月下旬，軍隊文革提出：軍隊院校的學生想念毛主席，他們又不能串聯，希望批准軍隊院校的師生到北京參加國慶節。其實是全軍文革打著「軍隊院校師生想念毛主席的」幌子，實際上是打算利用軍隊院校來京串連，搞亂軍隊。中央軍委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許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對意見。主持會議的葉帥，開始傾向大多數人的意見，後來由於劉志堅點到了要害處，即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態度問題，葉帥也有很大壓力，就祇有同意全軍文革了。這個歷史性的錯誤，主要責任在全軍文革。葉帥負有決策上的重大領導責任。

十月《緊急指示》發佈以後，軍隊院校就照地方學校一樣搞「四大」了，大約在一個月時間內，軍隊一百多所院校的領導班子，一個不剩的

全部垮臺了。毛主席高興地說：「軍隊院校吆吆吆（111所院校），的確有妖」。這樣就助長了軍隊院校學生造反的氣勢和揪人的風頭。毫無例外，所有軍隊院校的造反學生都衝到他們的上級機關。軍隊機關大亂就是從此開始的。

《緊急指示》發佈後，中央文革非常滿意。全軍院校的學生來京參如國慶節之後，本應回到各自的學校去，但根本就做不到了。在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縱恿和支持下，學生們就在北京立即紛紛成立戰鬥隊，衝擊各總部、各軍、兵種擊機關，鬧的各機關都雞犬不寧，全軍文革的意願實現了。不僅如此，全軍文革還鼓動葉帥等軍委領導，接見來京的軍隊院校師生葉帥對軍隊造反派的破壞力是估計不足的，他同意了。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軍委的領導在北京東郊工人體育場接見了全軍院校的師生員工。參加接見的有：葉劍英、賀龍、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各總部、軍種、兵種的首長。接見開始時，由葉帥領頭，在廣場繞遊一周。我記得，此後，聶帥、楊成武則退席了，未曾上主席臺參加大會。

接見之後，即舉行了大會。蕭華主持大會，葉帥發表了適合學生心意的長篇講話。葉帥講，熱烈擁護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等，葉帥還專門謳歌了林副主席，他說：經醫生檢查，林副主席的身體非常好，可以活一百歲，這是我們革命事業的重要保證！我們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葉帥的講話，贏得了學生最為熱烈的喝彩，學生鼓掌的時間比他講話的時間還長。葉帥也表現了元帥的「風度」，不時站起來向學生揮手致意！

參加接見的領導幹部，有不少人對中央軍委接見學生就很不滿意，對葉帥的講話更不滿意。我同許光達、蕭勁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我們在談論：「今天葉帥的高興，就是我們明天的災難，也許包括他本人在內，都是要受難的！」

六六年十月前後，北京各總部、軍種、兵種、院校的首長，由於特別痛恨「造反派」，經常地三三兩兩「自由結合」到葉劍英元帥那裏去訴苦。葉帥開始時都是聽別人說話，自己不說話，也不搖頭或點頭。後來，葉帥的態度變了，痛恨造反派。葉帥很快就「醒」了，他是個很有正義感的人，雖然他也「馬失前蹄」，卻也實屬無奈，因為搞不好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隨時有被打倒，被衝跨的可能。葉帥為了保衛人民解

放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的領導，又在工人體育場接見了全軍院校的師生。葉帥和陳老總都發表了較長的講話，對軍隊院校師生衝擊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揪鬥領導幹部和其他胡作非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要求軍隊院校師生回到學校就地鬧革命。

會後，葉帥親自帶著空軍司令吳法憲和政委余立金，深入到前門大磨場的小巷子裏，那裏是空軍的招待所，空軍一高專的教員彭謙是軍隊造反派的總頭頭，葉帥爲了保衛軍隊的大局屈就上門與彭謙談話。彭謙這個混帳反而趾高氣揚，不聽葉帥規勸，口口聲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口口聲聲敬愛的江青同志，葉帥震怒之下，立即叫隨從的衛戍區部隊把彭謙給抓了，葉帥深深感到保衛部隊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在葉帥的精神鼓舞和支持下，各大單位對造反派更加不滿，並開始整頓紀律了。總參、空軍、海軍、總後都抓人。總後拘留錢信莎，把另一個頭子王香谷抓了起來，對造反派管得更嚴了。祇要中央文革、全軍文革不借用造反派的名義整人，各單位管好造反派，是一件最爲平常的工作。

在動亂中，林總、葉帥對軍隊幹部是愛護的。軍委通知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都到北京京西賓館來「躲反」、「避難」，宣佈京西賓館不許衝擊，並由衛戍區嚴加把守，在形勢穩定下來才陸續回去。這和地方幹部相比是天壤之別了。

在全軍文革領導下，軍隊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始終都是積極的。當時造反派還成立了「鬥羅（瑞卿）籌備處」，這是一個凝聚全軍造反派的核心組織，幹盡了壞事。我就被二醫大「紅縱」押去參加過他們三次批判大會，以「殺雞給猴看」。

一次是在總後大操場，這次到會五萬餘人，批判大會由院校「造反派」聯合主持。批判的對象有：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譚政等十餘人。羅瑞卿因爲腿傷是用一個筐子抬到會場上的。坐在那個筐子裏受批鬥長達三小時之久，是十分痛苦的。一次是在軍事博物館门前的廣場。這次到會的人數可能兩萬多人，批判會同樣由軍隊院校造反派聯合主持。這次主要是批判劉少奇叛徒集團，那天的會，祇押著我到廣場看了一下「盛況」，沒有要我參加大會，可能因爲我不是叛徒之故吧。還有一次是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晚，在後勤學院禮堂。這次到會的人數有近兩千人，「紅縱」頭子錢信莎主持的批判大會，參加大會的是以「紅縱」爲主

的造反派，還有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數百人到會，哈軍工的造反派頭戴柳條帽，手持短棒，活像要吃人的豺狼一樣。會議開始時，錢信莎命令饒正錫做「檢討」，饒祇講了幾句，就有人把稿子搶走了，並停止了他的講話，很顯然，饒正錫做檢討是陪襯的。接著，錢信莎命令我做檢討。我的講稿很短，講了不到十分鐘。針對我的檢討，「紅縱」即進行批判。我和錢信莎的父親錢益民很熟悉，但她完全不把你當作領導和長輩，整個會場上殺氣騰騰。

其實，在文革中軍隊搞打砸搶的造反派，不論是揪鬥羅瑞卿的，批判「彭黃賀羅」，對我及軍隊老幹部殘酷武鬥的，還是六七年「五一三」後，被我們整肅的，都是一夥人。但奇怪的是，「九一三」後，羅瑞卿重新上臺，他反而把殘酷迫害他的這些傢伙，包括「鬥羅籌備處」的造反派豢養成了他的紅人，用這些造反派又替他去整林彪「死黨」。更有甚者，公審的時候，這些傢伙又坐在公審的主席臺上，煞有介事地裝成「正義」的化身。

六七年初，新的全軍文革成立，徐帥爲組長，江青爲顧問。新的軍委文革的主導思想是「不要怕亂」，這樣，軍隊省軍區以上的機關在軍隊院校造反派的重新衝擊下，大亂了。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多數是受自己所屬學校和文藝團體的造反派衝擊而大亂的，有的也受到了地方造反派的衝擊。

派的衝擊。總後勤部是全軍文革直接調遣來的造反派二醫大「紅縱」搞亂的。徐向前是元帥，是軍委副主席，我應該尊敬他，可是在他任全軍文革組長時，真是左的很，對待軍隊老幹部和葉帥、聶帥、劉帥完全是兩樣。這期間，祇要徐帥接見群眾，必先大罵劉志堅是壞蛋，這明顯是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示好，因為劉志堅得罪了江青。徐帥直接點楊勇、廖漢生的名，讓批倒、批臭；也多次點蘇振華的名，說他是彭黃漏網分子，並批准把蘇振華抓起來。更有甚者，徐帥竟說賀龍要讓許光達當總長，據我所知，這祇是一個笑話，賀老總不會許過這種願。……這樣，軍隊亂了，葉帥火了。他在京西賓館的會上給徐帥拍了桌子，把手指都拍斷了。官方的書上說，葉帥是對中央文革拍桌子斷了手指，這不是事實。

的書上說，葉帥是對中央文革拍桌子斷了手指，這不是事實。文化大革命是在混亂中進行的，這種混亂，後來發展到毛主席自己也難控制的程度。當時，省、市以上的機關，幾乎都讓造反派取代了。

當時，祇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整無損，軍隊保持了穩定，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大事！對我們的黨和國家起著脊梁骨的作用。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軍隊也亂了，就會超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問題。其結果也就不單是大亂的問題，而是黨和國家及人民軍隊的存亡問題了。

造反派的出現，並能興風作浪，毛主席的支持是起決定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組是全國造反派的司令部。六六年十月軍委《緊急指示》發佈以後，全軍文革小組也就成了軍隊造反派司令部。造反派很快就在全國各地的軍隊單位揪鬥領導幹部。在這樣的情況，軍隊要制止「造反派」的破壞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對「造反派」也要做階級分析，其中大多數群衆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毛主席號召造反，一哄而起。但在造反的隊伍中一些對共產黨有仇恨的階級異己分子、國民黨的特嫌分子、舊軍警分子等趁著文化大革命，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打著「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幌子，殘酷揪鬥老幹部，煽動派性，挑動武鬥，搞打砸搶，對文化大革命本身起到了很大的破壞作用。而這種以「造反有理」為幌子的破壞活動，都倒了全軍文革的縱恿和支持。

究竟怎樣制止造反派的破壞？這裏僅以軍委炮兵機關文化大革命為例。軍隊大軍區以上的領導機關，造反派奪取了領導權，並成立革委會的，軍委炮兵是唯一的一個。即使象總後機關成了大亂的典型，造反派也並未敢奪取領導權。

六七年一月間，炮兵司令吳克華，仿照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方法親自起來造反，組織了「造反突擊團」，一舉奪取了領導權，把炮兵政委陳仁麒，副司令吳信泉、匡裕民，參謀長丁本淳打成「反黨集團」並處罰到農場勞改。

中央軍委對炮兵的「造反奪權」是十分關注的，但處理起來也是棘手的問題。從文化革命總的形勢來說，對造反派不能公開反對，從制止造反派對軍隊的破壞來說，對造反派應當堅決反對和取締，這就是尖銳的矛盾。怎麼辦？「祇做不說，心中有數，決不手軟」就是辦法。

從六六年底，到六七年三、四月間，我記得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對炮兵的文化大革命討論過三個問題，對每個問題都得到了「處理」。(1)關於批准炮兵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葉帥一看到報告的題目就說：「對這個問題，由全軍文革按照規定辦理。」

全軍文革劉志堅說：「按規定，就是要中央軍委批准呀。」葉帥根本沒有再理睬，就說其他問題，這樣，也就算「處理」了問題。

(2) 關於接見炮兵造反派問題。炮兵造反突擊團成立後，全軍文革提議中央軍委接見一次，以鼓勵軍隊機關的文化革命，並列為軍委辦公會議的一個議題。會議開始大概祇有五分鐘，聶帥就大聲說：「葉帥，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很多，要抓緊時間。」葉帥會意，就連聲說：「是的，是的。」在討論完其他問題後，葉帥就宣佈散會了，把全軍文革關於接見炮兵造反派問題放在一邊了，也就算「處理」了。

(3) 關於批准成立全軍科技戰線造反團的問題。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葉帥祇看到全軍文革報告的題目，連內容都未看，就大聲同聶帥說：「這個問題怎麼辦？」聶回答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戰線！」葉帥說：「由全軍文革辦理。」這也就高明地「處理」了。

從處理上面三個問題完全可以看出，中央軍委對「造反派」的立場、態度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了。當時，公開反對是不成的，公開反對立即就會變成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

上海「一月革命」之後，反派奪取了領導權，對全國各地，對軍隊的影響很大。

上海奪權之後，全軍文革一幫人和軍隊的造反派更加手癢的不忍耐了。二醫大的造反派頭頭如錢信莎等人，都特別想當軍隊的聶元梓，李曼村、謝錚忠這些人就想當軍隊的張春橋。而且，他們望著的「用武之地」是整個的軍隊。他們給徐帥出了很多壞主意。

六七年一月初，趙爾陸、李天煥、王秉璋、杜義德和我同在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躲反」。當時，能夠到西山躲反的，都是經過葉帥或林總批准的。趙爾陸是林彪要他到西山躲起來的。但徐帥以不要怕群眾爲由，把我們都趕下山去，當時是最亂的時候，我們都遭到殘酷武鬥，我幾乎被打死，趙爾陸在同造反派的鬥爭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臨下山前幾天，我們兩人在趙的住處，從晚飯後一直談到快拂曉才散的。趙說：「羅瑞卿倒了，賀龍也不成了，他們把我整的厲害呀。本應把工作好好抓一下，現在又躲在這裏。誰怕群眾？徐向前在說風涼話」。幾天後趙人命就沒有了。林總知道趙爾陸死後，竟然不信，他反覆說：「不是在西山嗎，怎麼就死了？」

趙爾陸是不怕造反派，而又死在造反派手裏的。誰願意戴上怕造反派的帽子？！趙一回到機關就被造反派抓起來了，並用極其惡毒的手段，對趙搞長時間的批鬥。趙患有嚴重心臟病，身體終究是支持不住的。造反派把趙關進了他自己的辦公室，同外面不能聯繫，甚至連一口水也喝不上。他死的時候，左手的中指和無名指之間，還夾著一支燃著的紙煙，手指的肉都被燒焦了。開趙爾陸同志的追悼會，大家都傷心地流了淚的！

六七年五月「五一三」開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爲第三階段。在將近四年半的時間裏，軍隊極大多數都是穩定的。軍隊的穩定，是中央軍委、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副主席的功勞。這裏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楊成武、黃永勝兩個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對穩定軍隊都是有很大貢獻的，尤其是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貢獻更大。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不但很好穩定了軍隊，還支持周總理、和老同志一道支撐著黨和國家，同時，還在極其複雜和艱苦的環境下和中央文革、江青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以黃永勝爲組長的軍委辦事組是有大功的。軍委辦事組堅決抵制了江青插手軍隊，也不許軍隊有江青的代理人。沒有江青一夥插手軍隊破壞搗亂，軍隊才能穩定。

這個時期，軍隊整治、處理了造反派，和後來整治「三種人」是一樣的。治理了他們對軍隊的嚴重破壞，健全了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軍隊的文化大革命、三支兩軍、戰備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六九年三月，我軍取得了珍寶島邊防戰鬥的勝利，是對軍隊的文化革命和戰備的一次很好的檢驗。

附：「一〇五」緊急指示

中共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各軍區、軍種、兵種、院校、總參、總後黨委、政治部：

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院校作為重點之一，總的說來形勢是好的。但是，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的領導過分強調了軍隊院校的特殊性，至今還有壓制民主的現象，不許班、系、校串聯，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動學生鬥學生，打擊左派，嚴重地違背了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因此，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面，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

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要充分信任群眾，不要怕群眾，要敢字當頭。要相信院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的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好的，他們是聽毛主席的話的，聽黨的話的，他們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也要看到軍隊院校領導和教職員中，確實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傢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東風，把他們揪出來，徹底鬥，徹底批。同時要確實掌握林副主席對領導幹部所提出的三條標準，即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擁護不擁護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幹勁，進行檢查。還要注意，要文鬥，不要武鬥。

以前軍委總政對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個別規定，如關於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關於指揮學校的學員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與連隊相同的規定；關於祇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內不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外和地方學校串連的規定等，已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佈取消。今後各院校應按照十六條的規定由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選舉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這個指示，應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軍委、總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八條）

中央軍委命令

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毛澤東

一月二十八日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全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為了適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的新形勢，特規定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展開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

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以上規定，從公佈之日起，立即生效。全體指戰員、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同志，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紀律處理。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十條）

中央軍委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澤東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這是一個偉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決定，是一個嶄新的歷史任務。我軍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們檢查了某些軍區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應當及時引起嚴重注意。為此，特發佈命令如下：

（一）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槍，祇能進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對於確實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須證據確鑿，經過批准手續。

（三）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犯有某些錯誤的群眾組織，要積極進行幫助教育。對於確實查明被反動分子控制的群眾組織，要做分化爭取工作，孤立其最壞的頭頭，爭取被蒙蔽的群眾。必須公開宣佈其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的，要經中央批准。

（四）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祇對業已查明特別壞的右派頭頭，要追究，但應盡量縮

小打擊面。不能僅僅根據是否衝擊過軍事機關這一點來劃分左、中、右。

(五) 對待較大的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應就地深入調查研究，進行階級分析；採取重大行動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

(六) 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群眾自動寫的檢討書，退還其本人。有些長期不覺悟並且堅持錯誤觀點的群眾，不要急於要他們認錯，而要給以時間，讓他們在鬥爭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

(七) 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學習毛主席著作，必須結合兩條路線的鬥爭。廣泛搜集揭露反動路線和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各種具體材料，印發到連隊進行教育，使廣大指戰員瞭解他們的反動事實，進行徹底批判，肅清其惡劣影響。

(八) 對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幹部，要詳細交待政策。要防止趙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是一個混進黨內軍內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陰謀手段，篡奪軍權，對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或思想很右的人來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有事同群眾商量，善於採用說服教育的方式，而不應採取簡單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對業已違反了上述諸條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積極進行善後處理。今後，堅決按以上各條辦事。

這個命令，要在我軍所有機關、連隊內部用電報、電話迅速傳達，廣泛張貼。

第二十四章 全軍文革支持造反

總政李曼村與總後結「冤家」

從六四年開始，中央佈置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般也稱「四清」：總後是一個在京直屬單位很多的領導機關。由於歷史的原因，總後又是一個在編制上「矮人半頭」的單位，所以政治運動一來，總政往往在總後直屬單位做試點。

五九年，林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三八作風」等一系列建軍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全軍上下一致叫好，總後也是堅決貫徹，堅決緊跟的。但是，總政長期高高在上，他們在工作中往往不是說服而是壓服，這樣「突出政治」便是壓服別人最好的大棒，實際上他們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頭政治」。總後是一個幹具體工作的後勤保障部門，一切工作都是實的，來不得半點「空頭政治」。這樣，總政和總後形成的對立情緒是很大的。

「空頭政治」。這樣，總政和總後形成的對立情緒是很大的。
軍事醫學科學院（後字二三六部隊）是一九五一年在上海成立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後字二三六部隊）是一九五一年在上海成立的，後遷來北京。這說明中央及中央軍委對軍事醫學的研究是非常重視的，楊立三、黃克誠、洪學智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工作都是很重視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醫學科研機構，當時好像設有放射醫學、基礎醫學、微生物流行病、藥理毒理、部隊衛生營養等研究所。主要從事平、戰時特殊環境、特殊損傷醫學防護和衛生防疫技術、裝備及相應基礎研究。這裏彙集了一批專家和優秀的科研人員，但他們中間的不少人來自舊社會，因而階級成分和社會關係不可避免有些問題，這是客觀事實，關鍵是我們做領導的要正確對待。

總後系統文化革命開始於軍事醫學科學院六五年的四清。總政直接領導「四清」的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是點，三〇一醫院是面，以點代

面。總政派出了以宣傳部長李曼村為組長的工作組，總後政治部主任盧南樵為副組長。李曼村是個「三八式」幹部，山東大漢，有點文化，參加革命後進步較快，解放戰爭時期就當了師級幹部。李曼村應該說是有工作能力的，就是思想左得要命，文化革命開始後更左，害了總後，也害了他自己。

軍事醫學科學院是全軍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不少骨幹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總政工作組沒有注意到這一特點，他們不是對知識分子「搞社會主義教育」，而是對知識分子「搞階級鬥爭」。總政工作組一進駐軍事醫學科學院，就把矛頭對準了知識分子，從院裏到科室對專家、教授搞清查，甚至進行圍攻批判，不少科室的科研工作都被迫停止下來，並且牽動了三〇一（解放軍總醫院）的知識分子，弄得人心惶惶。比如說，有個專家工作表現是不錯的，但他信天主教，就去整人家；再比如，有個專家參加搞原子彈，他說：「我熱愛和平，反對搞原子彈」。可是他說歸說，工作照樣在做，爲了這句話就去整人家。

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上，李曼村怕總後黨委和他們對立，特意請總政主任蕭華到軍事醫學科學院去講話，李曼村向蕭華匯報談到知識分子時說：「都是蔣介石丟下不要的，邱會作當寶貝，每年春節邱會作都要去給專家拜年，送東西，紅軍幹部都撈不上，專家卻都有，專家的工資比紅軍幹部高。邱會作對知識分子太右了。」蕭華的講話受李曼村影響很大，當他在講話中說到「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時，有人遞條子問什麼是當權派？蕭華說：「室主任以上就是當權派」。這一下全院嘩然！因爲室主任都是專家知識分子，而且都是由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一下全被嚇住了，有幾個人立即表示「不配當」室主任這個當權派，大大影響了工作。我知道這個消息後，對總政工作組很有氣，立即由我口授，由司令部資料處秘書科長劉明璞記錄搞了個講話稿，並拿去給盧南樵徵求意見，盧南樵說：「邱部長講的道理很對，但肯定會被扣上和總政鬧對立，對抗工作組的罪名。」我並沒有在乎這些，盧南樵開玩笑說：「你要會搞科研就去當室主任，我們不會嘛。歷史會證明誰對誰錯，現在不去管它。」然後，我親自到「二三六」去講了話。

我首先說軍科的「四清」搞左了，矛頭對準知識分子是不對的。我也講到有些專家想「擲挑子」也是不對的，要振作起來，敢於擔責任；我也

講到科研任務不能停。在講到知識分子問題時，我說了這樣的話：「你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舊社會就是國民黨的天下嘛，不為國民黨做事為誰做事呀。知識分子不論是在舊社會還是新社會，要報效國家，但也首先要搞到飯吃，你們為國民黨政府服務過，這有什麼關係！這不算歷史的污點。……你們現在是在新社會、新中國為人民服務，不少人說，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還是新社會好，還是共產黨好，這就不錯嘛。你們祇要認認真真工作，搞出成績或一時沒有搞出成績都是報效國家，把自己本職工作做好就是擁護共產黨。有的人認為我太右了，我看他們是太左了，不符合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我還講到了紅與專的關係，我說：「又紅又專很好，……『紅』不一定就等於『專』了，『專』了不一定就不能『紅』……」我的講話知識分子是歡迎的，對穩定知識分子的思想有作用，對穩定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工作有作用。我認為我的講話和總後黨委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正確的，文革當中，全國不少知識分子都吃了苦頭，而軍事醫學科學院和解放軍總醫院的知識分子是在比較平安的環境下度過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知識分子為我國的尖端科學研究做出了貢獻；解放軍總醫院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尊重老幹部、盡心為老幹部治病，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然，我的講話也得罪了總政。

文革開始後，總後黨委往軍事醫學科學院派了工作組，總後政治部主任新斧為組長，兩個二級部長羅文、王希克為輔，他們是貫徹總後副主任新斧為組長。但文革的極左思潮刮起來後，全軍文革神氣了，李曼村這黨委方針的。全軍文革李曼村這些人直接搞亂的，他們採取了如下三種手段，一是派全軍文革的「記者」去該院，以採訪的名義煽動搞「四大」，發動機關行政工作人員與科研人員對立。例如，記者說：「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根本問題是知識分子領導了共產黨，而不是共產黨領導知識分子。這是因為你們邱部長重用知識分子造成的。不久前，他在你們這裏講話，把知識分子寵上天了！對『軍科』存在的問題必須通過『四大』來解決」；二是，通過後勤學院造反派組織「星火燎原」把該院政治部副主任鄭洪泰拉過去（鄭原是後勤學院的幹部）。去的人說：「我們後勤學院文化大革命原來也很落後，現在全軍文革直接管，蓋子就揭開了，文化大革命要靠全軍文革，靠總後是沒有用的」；三是，通過二醫大「紅縱」派人去該院串聯，

把少數「積極分子」組織起來了。但上面三種辦法效果不大，軍事醫學科學院還是亂不起來。

但是，全軍文革下了決心要搞亂「軍科」的。六六年十月間，軍委《緊急指示》下達後，全軍文革從政治學院調了五十餘人的工作組進駐「軍科」，「幫助」搞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進院後，採取了搞四清的辦法，把一切權力都奪過去了，院黨委成了他們的辦事機構。

工作組進院不久，全軍文革把他們在防化兵學院搞的「科研單位文化大革命經驗總結」用通報形式印發全軍，並要求立即傳達。我知道後命令該院暫不傳達，我說「這不是經驗，是一桶汽油」。全軍文革知道我的態度很生氣，他們強行通過工作組傳達了。在傳達之後，「軍科」立即亂了，鄭洪泰等人在混亂中奪取了院裏的領導權。把院長、政委關了起來，後來還強迫他們勞動。在工作組支持下，鄭洪泰還當上了「軍科」革命委員會主任，統一掌握全院的領導權力。「軍科」亂了，使人十分擔心。為了立即解決「軍科」的問題，我向中央軍委、全軍文革寫了正式報告，提出了兩點建議：一，「軍科」的文化大革命由全軍文革直接領導，不和總後搞雙重領導；二，仍由總後領導該院的運動，並立即停止搞「四大」，鄭洪泰停職反省；三，如果上面一、二兩條不能實行的話，對「軍科」這樣特殊科研單位，由衛戍區派部隊「看管」。聶副主席很瞭解該院的情況，他在我的報告上的批示是：「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文化革命，同意總後黨委的第二條。」葉副主席完全同意聶的批示。

全軍文革對聶、葉副主席的指示不表態。在急得無法可想的情況下，我上聶副主席的門求援。我向他提出現在急不可緩的就是要派部隊對「軍科」這樣特殊科研的單位先「看管」起來。因為「軍科」有防原子的科研任務，正在聶帥所管轄的工作門下，聶帥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我們二人共同向秘書口述起草看管命令，直接送給林總簽發了。衛戍區很快執行了命令，我可放下了一個大包袱。

六七年四月間，我回總後重新主持工作後，向中央軍委提議，對「軍科」實行軍管，軍委批准了。軍管組進院後一個星期，提出把鄭洪泰離職反省，總後黨委在兩小時內就批准了。軍管約一個月就結束了，工作和生活秩序也恢復正常了，被造反派奪取了領導權構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恢復了黨委領導。

二醫大「紅縱」發難

一九六六年的全軍文革，祇是總政領導的一個辦事機構，主管軍隊文化革命的具體工作，總政副主任劉志堅為組長，他同時也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劉志堅畢竟是個老同志，辦事還有原則，李曼村、謝鐘忠這些人就不同了，特別能接受文革中的極「左」思潮。因為總後和總政關係一直不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李曼村搞總後的勁頭大得很。當時，全軍文革還專門下了文件說：三總部不許衝擊（不包括總後）。葉帥對此很生氣，他對劉志堅說：「你們說三總部不許衝擊，括號不包括總後。總後不是三總部嗎？是三總部就不許衝。現在戰備任務很緊，總後衝垮了怎麼搞戰備？」全軍文革這一條沒有得逞，又決定總後是全軍文化革命三大試點單位之一。葉帥關心地對我說：「你的問題是從你反對空頭政治來的，但你不必擔心。林總說過，看他們（指全軍文革）怎樣來，我們就怎樣去，這就是鬥爭。」對葉帥的話，我完全理解。林總對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都是不感冒的，因為他不願意這些人打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牽著他的鼻子走。

從文化革命開始，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全軍文革就特別注意發展造反派，從而代替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軍隊院校的文化革命，原來也祇搞正面教育，不准搞四大，在這樣的情況下，二醫大少數文化革命的「先進分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上海二醫大成立了造反組織「紅縱」，從後來審查錢信莎得知，她通過潘國平同張春橋聯繫上了。

二醫大的文化革命得到了張春橋的支持、關心之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張春橋為了便於插手和控制上海駐軍的文化革命，對二醫大「紅縱」表示了特殊的寵愛。二醫大「紅縱」也特別賣勁，一直支持張春橋。張春橋第一次接見錢信莎等人時，錢信莎就向張春橋提出請求：「在我們學校有全軍文革派來的記者，他們希望我們派人去北京到總後上訪，但學校不讓走。請春橋同志批准我們去北京！」經過潘國平的活動，以錢信莎為領隊的「上訪隊」終於組成了，並在張春橋的幫助下與全軍文革取得了聯繫。

錢信莎等人在全軍文革暗中支持下，跑到北京來上訪。這個上訪隊是未經總後黨委批准來搞造反的，也違反軍委的有關規定，總後文辦

予接待，但還是安排他們住到總後大院外的前門招待所去。全軍文革得知後指示總後文辦，讓上訪隊要住在總後機關大院之內的招待所，我當時沒有在意。這樣，全軍文革就在總後機關內為造反派安下了一個「白色堡壘」。總後機關的災難也就從此開始了。總後機關成為全軍大亂的典型，是中央文革支持全軍文革指揮軍內造反派搞亂的。

上訪隊住進總後大院後，機關幹部根本沒有人理睬他們。因此，上訪隊力爭做三件事：一是能生活下去；二是與機關的造反分子秘密聯繫；三是要用肇事的辦法，「讓邱部長犯錯誤」。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前，經軍委批准各地軍隊院校的師生來京參加國慶活動，接受毛主席的接見。軍委對來京的軍事院校有嚴格的紀律和規定，並要求先行到京的「傘兵」（散兵）統一歸建。二醫大參加國慶活動的大隊伍到京之後，住在後勤學院，學校通知住在總後大院內的招待所的上訪隊歸隊時，他們竟拒絕歸隊，總後文辦再三動員都無效。原來全軍文革的記者早就跟上訪隊串通好了，要他們一定要在機關站住腳，以便起到院校和機關串聯的作用。我們「先禮後兵」的工作是做到了，我就向總後文辦交待三條：第一強行歸隊；第二嚴格管理；第三學校實行集體活動。

「強行歸隊」就是上訪隊非回學校住地不可。九月二十六日我下令給學校，限他們在中午十二時前一定要把上訪隊帶回去，學校堅決執行命令。最後上訪隊祇剩下五人，他們逃竄到招待所附近的油料化驗室閉門固守。我立即批准破門抓人。但是由於警惕性不高，學校隊伍回營時，全軍文革三名記者混入隊伍同錢信莎等人聯繫上了，引起了後來更複雜的鬥爭。

「嚴格管理」就是所有人外出一定要有學校的假條，否則一律不准外出，這一條就把上訪隊管住了。他們的反抗力也很大，上訪隊的學生王香谷（號稱「軍師」）公開昂首挺胸向外走了，我立即依軍紀下命令把他關起來了。錢信莎外出很晚歸隊遠遠超出請假時間，我同樣立即下令把她禁閉起來了，上訪隊不敢動了。

「集體活動」就是學生一律不准單獨外出活動。在國慶節前不准訪友，外出參觀則集體行動，這一規定，限制了全軍文革在學生中煽動造反肇事。

經過上述工作之後，二醫大基本平靜下來了。除了少數造反派之外，師生都高興。全軍文革活動的餘地小了，他們必須另想辦法。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全軍文革派了五名記者拿著正式介紹信到二醫大師生住地去「採訪」。當時學校領導並不知道這是個陰謀，按照工作關係接待了他們，並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新去的五名「記者」同原來混進去的三名「記者」匯合後，與學校的「紅縱」頭目通宵策劃後，於二十八日上午，向學校提出晚上要舉行全校辯論會，主要內容是：國慶節軍隊院校在首都怎樣做好樣子。學校未向我請示報告，就舉行了大會，結果學校上當受騙了。

全軍文革派去的「記者」，對「辯論會」計劃得很周到，辯論會的主

要目的就是要象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一樣，把造反派的牌子亮出來，逼我要公開表態承認造反派的革命性和合法性。辯論會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把會場衝亂到校領導無法控制的程度；第二步要廝打，打傷得越多越好；第三步造反派衝到圖書館的樓上集中在一起固守。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張家口技術工程學院的造反派已經準備好了，他們接到通知後即可前來支援。

由於學校極大多數學生都反對造反派，學校的軍事生活又嚴格，因

而辯論會開始後，全校幾千人的會場秩序井然。造反派分散在自己班級的隊列中不能隨便活動。在一小時多的時間裏，發言的都是正面意見，造反派一個發言的也沒有，因為他們根本得不到發言權。「記者」到底

是造反派急得沒有辦法。

書生，他們的計劃基本上沒有實現，「記者」急得沒有辦法。

此時，幾個「記者」在一起嘀咕了幾句後，其中一人立即走到擴音機前，向主持會議的人說：「我以全軍文革記者的身份說幾句話」，然後記者大聲說：「今天的會議不是辯論會，是說教會。我們要民主，要說話，要造反！不怕挨打受傷的人衝破束縛就是勝利！」記者說話之後，錢信莎要造反！不怕挨打受傷的人衝破束縛就是勝利！記者說話之後，錢信莎所在的地方亂起來了，此時八個「記者」裝著給學生送水，一起衝到騷亂的地方與錢信莎等會合，他們一起向外衝，而學院隊幹部和學生幹部則在往裏拉他們，互相打起來了。學校立即命令：散會！隊伍回宿舍，不准在院子裏活動。學校用了兩個學員隊把鬧事的地方包圍起來了。此時，「記者」示意，錢信莎等人是女同學，要求進室內整理衣服。不久，錢信莎等人把自己動手撕破的衣服拿出來了，還有帶血印的，作爲她們遭受圍攻

被打傷的證據。「記者」拿著「證據」，帶著錢信莎到全軍文革控訴總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去了！全軍文革策劃的陰謀得逞了。

九月二十九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拿著二醫大學生被圍攻、武鬥的「證據」到中央文革去開會。江青看了證據之後說：「一個跟著毛主席長大的人（指我）今天也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革命造反派，真是不可想像的事。這是全軍活生生的典型！軍隊的文化革命，不能不使人擔心呀！」

但是，國慶節之前，總後機關一直沒有亂，工作井然有序，幹部上下團結。

軍隊院校進京

八屆十一中全後，地方的大學都在批鬥工作組，勒令工作組交出整學生的「黑材料」，當時把學生分成一、二、三，三個等級。三等的學生就是反動的學生了，運動後期是要處理的，就像反右時處理右派一樣，每個學校搞上幾百個反動學生，全國就是幾十萬，後果也很嚴重。不言而喻，當時按照劉鄧的搞法也是不成的。

按照總政的指示，總後也在一些大學派了工作組，也把學生劃了等級，學生提出「黑材料」問題，也無可厚非。但部隊是組織紀律嚴格的，總後就這個問題請示了總政，總政答覆是：「等通知。」自然，總後對下面的答覆也是：「等通知。」這就引起了學生的不滿和對立情緒，想上北京告狀的學生大有人在，學校不穩定的因素急劇上升。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全軍文革於六六年九月藉機向軍委報告說：軍隊院校的學生們也想念毛主席，前幾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沒有參加上，國慶節的時候希望能批准他們來北京，總壓制下去會產生不良結果。在軍委辦公會議上，大家意見不一，全軍文革的態度很堅決，我們反對這個報告，並認為這是真心支持和愛護葉帥，全軍文革堅持這個報告也說是真心愛護葉帥，葉帥最後同意了這個報告，但心裏有些猶豫，我記得散會時，葉帥還重複說「會產生不良結果，會產生不良結果」，然後邊走邊自言自語開玩笑地說：「現在做事怎麼防賊似的」。軍委雖然同意了這個報告，但要求軍隊院校來北京要由校長、政委親自掛帥，各隊大隊長、政委親自負責，嚴格管理，嚴格遵守紀律。全軍各院

校到北京參加國慶節，這是全軍文革搞亂院校的一種手段，他們利用全軍各院校都在北京的機會，逼著中央軍委批准全軍院校搞四大。

爲了院校參加國慶紀念，總後黨委常委做了認真的討論和具體佈置的。對二醫大參加國慶節則做了周密的安排，力爭做到不出事；萬一出了事也能立即處理。

二醫大校黨委，對參加國慶節的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們的意見是「紅縱」骨幹分子一律不許去天安門廣場參加國慶活動。總後常委討論了二醫大的報告，認爲他們對防止造反派在天安門鬧事的精神是好的，但具體政策上有欠妥之處，總後常委的決定是：所有來京參加國慶的學校師生員工，一律參加國慶，但必須是嚴密組織，嚴格紀律，嚴格管理。總後黨委常委、副部長張賢約爲總後勤部參加國慶活動的總指揮，親臨現場指揮，而且二醫大還組織一支有能力的糾察隊，由張賢約直接指揮。

天安門上被告了一狀

十月一日國慶節，我一登上天安門，就有一位老戰友大聲叫喚我說：「老兄！你人還沒有上來，城樓下就有你的光榮榜了。」我順著那位戰友的手向下一看，原來是造反派兩張鬥大字的標語，鋪在金水橋北面的地。左邊一張是張家口技術工程學院造反派寫的：「強烈要求李天佑停職反省」。右邊一張是上海二醫大「紅縱」寫的：「強烈要求邱會作停職反省」。後來，我同李天佑兩人一起看了那兩張大標語。在文化大革命的氣氛下，我們倆人，當然都有思想負擔。

天安門廣場開始群衆遊行的時候，我看到毛主席手指城樓下，向著總理在說話。由於我站的比較遠，他們說什麼，我不可能聽到。但看毛主席的表情，同平時談笑風生的態度是一樣的。

不久，鄧穎超大姐走到我跟前來，對我說：「你看標語會有壓力吧？不要去管那些事，那是小孩子的事。總理對你都是很瞭解的。紅小鬼什麼風浪都經過了，還有什麼可怕的！」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也在天安門上，他看見毛主席進了休息室，就跑進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狀，陶斯亮說邱會作「鎮壓群衆運動」，他以軍隊紀律爲借口「定了很多條條框框」，不許我們到北京串聯，趕我們回去。

我們「在總後大院連飯都吃不上」。陶鑄看見女兒跑到毛主席身邊去說話，怕她影響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說：「我想聽聽，做調查研究嘛。」陶鑄和我甚好，他出來後走到我跟前，摟著我的肩膀說：「嘿，亮亮在主席那裏告你的狀，你對亮亮管教不嚴，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氣地說：「我前幾天就給她寫了一個條子叫秘書送去，我寫的是『亮亮你不要跟著鬧，要退出，否則我告訴你爸爸了』，她不但不聽，還在大會上念了我的條子，表示要堅決和革命群眾在一起。」陶鑄說：「她怕曾志。」他邊說邊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後曾志批評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在這裏我想特別說幾句：陶鑄是我的老領導，我對他是很佩服的。他思想水平很高，工作魄力很大，能力強、辦法多、充滿革命激情，對同志非常熱情、關心。陶鑄在文革中不幸去世後，我是很揪心、很難過的。亮亮是他和曾志唯一的女兒，她祇是在文革初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加運動，但很快就退出了。亮亮畢業分配去了艱苦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我當時是完全有權力、有條件關照這件事的，但我沒放在心上。現在想起來有些對不起陶鑄和曾志。

大約在十二時許，總參謀部臨時設在城樓上的值班參謀來同我說：「總理指示，遊行結束後要您稍等一下。」在下午一時左右的時候，總理在天安門上同我和李天佑作了簡單的談話。他說：「從最近全軍文革的材料上來看，你們的日子不很好過。不過，也不要想得過多了。剛才，主席還指著城樓下的兩條標語在說，好人受點衝擊是難免的，這是群眾運動的特點。你要找李、邱談一下，要他們兩人不要有什麼負擔。」

在天安門城樓上發生的事，我的思想當然是不平靜的，我始終就認為造反派本身是烏合之眾，並不可怕。當時造反派還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敢把大標語搞到天安門，沒有人背後支持是辦不到的。祇有當權派利用造反派來興風作浪，造反派是會吃人的！

十月四日，中央軍委舉行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除辦公會議成員外，各總部、各軍兵種首長都到會了，會議由葉帥主持。

開會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幾個人在京西賓館葉帥的房子裏閒談，葉帥斷斷續續講了很多的話，他以詩人的風度，著重講了「勢頭」的問題，他說：「形勢和勢頭兩者有關係，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形勢理解成是

客觀存在，那麼，左右這個形勢的力量就是勢頭了。我的看法，現在是造反的力量比革命的力量大得多，造反和革命有聯繫也有區別，大家必須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勸你們對這個問題，應當做必要的分析，這也可以說是適應形勢發展的問題。」對葉帥的話，我們祇是聽，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幾個人走出葉帥的房間之後，都不約而同地有悲歎的情緒，但沒有說什麼就各自走了。

在四日的會上，對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當時有三種不同的意見。即：一律搞四大：一律搞正面教育；或者在兩者之間闖出一條新路子來。第一種意見，即搞四大，這是全軍文革獨一家的意見；第二種意見是極大多數人的要求；第三種意見是葉帥考慮的意見。有幾個堅持正面教育的熱心人，我記得有許光達、李天佑和我等。

由於有葉帥頭一天的談話，我在四號的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一言未發。

在會議上，李曼村對軍隊院校在國慶期間，對機關文化大革命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為主題，做了長篇發言。接著文革組長劉志堅對文化大革命就提出了搞四大的方案。到會的人，對他們的發言，也一言未發，葉帥知道大家的情緒，並沒有要大家發表意見。當時有些冷場，過了一會葉帥請聶帥講話，聶帥在沒有精神準備和情緒不高的情況下講了話，聶帥說：「我這幾天到各機關去走了走，看了一些單位的大字報。我看那些大字報的內容，有的寫得很不錯。對工作上的缺點和領導幹部提出了批評，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建議。在此同時，大家也都在堅守崗位，工作進行得很正常，這些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的。我看各級黨委既能搞『武化』革命，也能搞『文化』革命。」聶帥當然是反對搞四大的，但他沒有說出來就是了。

李曼村在聶帥發言之後，繪聲繪色地講了陶斯亮國慶節在天門上向

毛主席告我狀的情況，他強調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最痛恨鎮壓群眾。」然後他宣讀了一個學生給全軍文革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要求搞「四大」的，我記得信的內容的大意是：「現在不少領導幹部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還不能做出本質的區別。其實它的區別就是照『我』的意見搞文化大革命，還是照毛主席和革命群眾的意見搞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反動路線，後者就是革命路線……」李曼村宣讀這封信，是因為全軍文革對聶帥講話的不滿。當時李曼村這些人挺猖狂的，

不愧是軍內造反派的最好後臺。他這樣猖狂的目的，就是也想在軍隊搞一個什麼「風暴」，以便自己成爲「文革英雄」。

全軍文革把葉帥、聶帥推到大風大浪的浪尖上，暴風雨的風口上，葉帥終於同意全軍文革對今後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拿出一個具體意見來。這個意見就是軍委「一〇五」緊急指示。

「一〇五」緊急指示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發佈了《緊急指示》，批准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一律搞四大。

過去，軍內都稱十月五日軍委《緊急指示》爲「一〇五」命令。造反派把命令稱之爲「救命令」。從命令的錯誤性質來說，確實是救了造反派，害了極大多數的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我自始至終都認爲，「一〇五」命令是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錯誤，但這個錯誤也是不得不犯的錯誤，因爲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是首位的，毛主席是支持四大的，大家明知道這種態度要產生極大的惡果，也要支持這種態度，至於產生的惡果，祇有在用加倍的努力工作去挽回、去彌補。林總也祇能同意了這個命令，道理也是一樣的。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一〇五」命令不是林彪搞的，是全軍文革搞的。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葉帥、聶帥沒擋住，林總也沒擋住，誰也擋不住罷了。

十月四日深夜，即「一〇五」命令發表的頭一天晚上，當時的全軍文革組長劉志堅還親自同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興高采烈並帶著諷刺的味道同我說：「學校搞四大的命令，明天就要見報了。我特意同你打一個電話，盡量爭取一點主動，又要精神準備。估計二醫大造反派對你會有些意見，葉帥指示，要我打電話告訴你，先召集小型會議，做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樣可以爭取主動。我的意見供參考。」不一會，葉帥又來電話，他說：「要說的話，劉志堅都同你說了。我知道你對軍委的決定是有意見的。邱老弟同志，你知道我心裏是什麼滋味嗎？但不這麼搞就是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了得起呀！現在有意見和無意見都要照命令行事。下決心多做點工作，對你可能會有好處的。」由於葉帥同我打了電話，我得立即行動，我分別召集兩派各四、五十人在總後開了兩次會議。我做了簡短的自我批評。「紅縱」的人，聽了我的講話之

後，報以熱烈的掌聲。臨退席時，不少人還同我爭著握手。接著「紅旗」也是四、五十人來開會。我同他們講話之後，沒有一個人鼓掌。退出會場時，有的人同我握手說：「邱部長保重！」有的則哭泣而走，當時，我內心裏也是十分難受的，特別想到總後的幹部群不可避免地會受我的牽連受一場大的災難，心裏就更難受！

「一〇五」命令發表後，軍隊院校的學生在北京有組織的活動就散攤了。我記得除了大同的汽車學校，還是由學校帶隊回去了之外，其餘的學校都在北京象決了堤的洪水一樣潰散了，學校的領導職權立刻崩潰瓦解，小」領導當時就做了造反派的「俘虜」。

解，不少人領導當時就喊「這次要搞『四大』」。這時，由於全軍文革的李曼村給「紅縱」透了信，在五日清晨，「紅縱」打著旗子在總後大院進行了遊行，慶祝搞「四大」。接著「紅縱」有三百餘人，高舉「紅縱」的旗子，整隊步行去三座門全軍文革慶賀「一〇五」命令的頒布。此時，全軍文革的工作人員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他們不知道「一〇五」命令的頒布，二醫大紅縱就捷足先登了。

同時，「紅縱」發佈了第一號命令：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紅縱」領導，學校的一切權利由「紅縱」行使，學校的原有領導幹部由「紅縱」集中辦學習班。踢開黨委鬧革命，一切權力歸造反派。二醫大的極大多數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幹部，積極分子，對學校搞四大都沒有思想準備，也根本受不了。他們保持沉默的態度對待「一〇五」命令。學校有備，也根本接受不了。幾個學生，聯名向葉帥寫了一封最簡單的信。信上大意說：「葉副主席，我們對您十分尊敬！我們認為『一〇五』命令是錯誤的。我們對命令不公開反對，但我們也決不執行。」

中央軍委「一〇五」命令，在當時就是錯誤的，從它的後果來看，也證明了完全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源頭，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林、葉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讓步了。直接的罪魁禍首是全軍文革。第一，院校搞「四大」，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打開了一個亂軍大的突破口。院校是軍隊的組成部分，同軍隊院校人數眾多當時約在二十萬人左右。院校搞「四大」，直接影響機關有密切的關係，同部隊也有一定的關係。院校搞「四大」，直接影響領率機關的正常工作，對部隊甚至作戰部隊也有極大的不良影響。按原定的方針，軍隊搞正面教育是非常正確的。第二，院校搞「四大」，給了造反派一個陣地，他們有了這個陣地就可以上衝下連。大軍區以

上所有的機關都是院校造反派衝亂的。有些部隊也是造反派衝垮的。第三，許多院校被造反派搞垮了。不能成爲培養部隊幹部的機構。後來對院校進行整頓是必要的，完全正確的。

江青接見「紅縱」頭目

軍委「一〇五」《緊急指示》後，北京的軍隊各領率機關就亂了，全軍文革操縱、支持的軍隊造反派真是揚眉吐氣了。在李曼村縱惠、支持下二醫大「紅縱」串通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和總後機關的「造反派」在總後禮堂、各飯堂到處貼大字報，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鎮壓學生運動的人絕沒有好下場」，這主要指我和副部長饒正錫。說來也奇怪，總後機關很奇怪並沒有亂起來，學習和工作井然有序，「造反派」妄圖搞亂總後機關，反而把總後機關鞏固起來了。機關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數是在群眾監督和包圍之中，反對「造反派」成爲機關絕大多數人一致的行動。全軍文革很著急，他們竟然請到江青來接見二醫大「紅縱」。這裏的內幕我一直沒有搞清楚。

十月八日，在全軍文革的陪同下，江青在軍事博物館學習館，接見了二醫大「紅縱」勤務組全體成員，這是江青第一次接見軍隊的造反派，這次接見的「壯觀」是空前未有的。全軍文革的全部工作人員和軍事博物館的全體人員，在博物館的廣場上，排成了很長的歡迎隊伍，全軍文革負責人站在隊伍的最前頭。當江青的車來到時，迎上前去給江青開車門，並摻扶她下車。江青下車之後，「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志致敬」，「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口號，響徹全場，直到江青進到室內，口號還沒有停止。

江青進到接見室時，「紅縱」勤務組、全軍文革的記者等人，又在呼同樣的口號。當江青同被接見的人見面時，錢信莎等人則哭成一團，「泣不成聲」。主持接見的李曼村再三說：「我們要高高興興地聽敬愛的江青同志指示」。這時，江青說：「造反派是英雄，不怕流血，也不要流淚！」江青的話音一落，這些人哭得更厲害了。這下可把江青感動了。她站起來，掏出手帕去給錢信莎擦眼淚，並連說：「英雄不哭！英雄不哭！」江青的舉動令全場沸騰起來，江青坐下之後說：「我首先祝賀軍隊也有了革命造反派！你們在北京敢反大人物，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敢造你們上司

(均指我)的反，這是了不起的。這就叫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軍隊過去把你們壓得死死的，中央批准軍隊院校搞『四大』，把你們解放了，希望你們大力發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

這時李曼村站起來舉臂高呼：「向敬愛的江青同志致敬！」之後又說：「我們全軍文革接受江青同志的批評，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搞好，應由我們負主要責任。過去，江青同志就批評我們沒有到文化大革命第一線去，我誠懇接受批評！」

在接見的當場，全軍文革院校組向江青遞交了一份「紅縱」在京「鬧革命」的報告，其主要內容是邱會作打擊造反派的罪狀，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拒絕接見「紅縱」上訪隊，致使來訪人員吃不上，喝不上，更沒有休息的地方。機關人員把造反派視為眼中釘。

二、「紅縱」的負責人如錢信莎、王香谷等人被抓起來關押過，這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

三、總後對「紅縱」的活動有嚴密的監視，「紅縱」的小將遭到了學校組織的圍攻，這是群眾鬥群眾的典型。

四、「紅縱」搞的學校領導幹部鎮壓學生的材料，全部被總後文辦沒收了。

五、總後文辦整理了「紅縱」在京活動的黑材料。

六、總後對二醫大自行離京人員，一律不發路費和糧票。

江青看了報告之後，即發表了講話：「一，我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今天是第一次接見軍隊的第一個造反派。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都是支持革命左派的。二，『紅縱』在北京的革命精神，我們給予高度評價，特別是敢於批判大人物（指我）。三，文化大革命才開始，希望你們繼續努力。今後可能遭到比現在更大的困難，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正在接見的時候，二醫大「紅縱」的對立面「紅旗」派出五人代表去要求參加接見。在外面擔任警衛的衛戍區一個副司令員，把條子遞進去。江青看到條子後說：「我祇接見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江青拒去了。江青看到條子後說：「我祇接見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江青接見之後，「紅縱」不接見擁護中央軍委、擁護總後黨委的「紅旗」。江青接見之後，「紅縱」印了上萬份傳單。除了在北京、上海大量散發之外，他們還派人到全國各地去散發，造成的輿論之大，在當時是罕見的。這次接見，對搞亂軍

隊起到了極壞的作用：（一）鼓勵軍隊也搞「造反派」，起來大造反。（二）「紅縱」的地位提高了。全軍文革院校組的會議，「紅縱」是經常列席的。在全軍文革那裏，錢信莎比我的地位高多了，當時「紅縱」就有人向我勒令：「邱會作的吉姆車應當交給錢信莎使用」。（三）從十月五日之後，軍隊院校在一個星期之內全部亂了，黨委垮了，造反派奪去了領導權。

國慶節之後，軍委決定軍隊院校都要回校鬧革命。迫於形勢，二醫大也要回去，為了搞亂總後，全軍文革還是背著軍委特別批准「紅縱」在京設了留守處，全軍文革特別批准「紅縱」可以留守五十人。

全軍文革把江青接見「紅縱」的指示奉為聖旨，他們要求葉帥立即召開有三總部、軍兵種首長參加的會議，傳達江青講話精神。在當時的形勢下，葉帥同意並參加了會議。在會上全軍文革建議傳達討論了三個問題，一是江青的指示；二是以全軍文革的名義發出了堅決貫徹江青講話的指示；三是以軍隊院校「造反派」的名義向江青發了致敬信。「紅縱」有三個人列席了全軍文革的會議。

全軍文革在會上主持討論江青的指示，引起了高級幹部思想的分化，搞亂了部分幹部的思想。當時有位司令員就是倒向造反派，他在發言中說：「今天，全軍文革的會議開得好，使我學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江青同志的指示，完全表達了毛主席的思想。今後我們是反對造反派呢，還是站在造反派一邊，這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根本問題。」

全軍文革的領導人對這位司令員的發言大加讚賞。但此人發言的時候，葉帥向他瞪了兩三次眼，暗示他為什麼要說這樣無原則的話，此人則毫無反映。在會議結束時，全軍文革再三要求葉帥做指示，他一句話沒有說，祇是打手勢，表示沒有什麼話可說。

當天晚上，我記得有王樹聲、許光達、陳錫聯和我等幾個人去京西賓館葉帥住處打聽消息。今天同往常有些不同，我們一進門，葉帥手上拿著一份什麼文件自言自語地在說：「拍馬屁也要找個好對像呀！」接著，他把文件遞給秘書手上，並說：「你附個條子，說這個文件我不看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事。我好奇地挨到秘書跟前去看那個文件的標題，原來是一份向江青的致敬信。大家都知道了葉帥不高興是怎麼一回事了。

我們幾個就在葉帥那裏隨便談了一會，葉帥對別人談的問題，提出
的問題避而不談，他最後說了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問題，他說：「共產黨的
事要共產黨領導，這是常識，也是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我想文化大革
命祇要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下，就什麼都不怕。任憑風浪
起，穩坐釣魚船。有人說我們確實不怕文化大革命，就怕不讓領導文化
大革命，這個問題，我有同感，……」

十月月中旬，《紅旗》雜誌又發表社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軍
文革直截了當的提出了，邱會作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之一。
此外，李天佑等人也是在批判之內的。在中央軍委常委討論時，葉劍英
副主席不同意把我們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來批判。他說：「在文
化大革命中，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是不可免的，不少人都犯有不同程度
的錯誤，我也犯過錯誤。我不同意公開批判這幾個同志，如果在軍隊一
定要批判反動路線的典型，我自己願意當典型，我代表犯有錯誤的領導
幹部接受批判。」在當時的情況下，葉帥和中央軍委常委還是有一定的權
威的，擋住了全軍文革企圖批判一批高級幹部的惡浪！中央軍委始終沒有
同意對我進行公開批判。

第一次昏倒在批鬥場上

在江青接見之後，二醫大「紅縱」真是瘋狂到了極點。他們被中央
文革，全軍文革封為「革命造反派」，這在當時是最高的「榮譽」了。緊
接著，「紅縱」把矛頭指向了三個方面，這就是：打垮二醫大「紅旗」；在
總後機關組織同盟軍；打倒邱會作。這三者又是互相聯繫，齊頭並進，但
以打倒我為主要目標。「紅縱」打砸搶的能量真是不可一世的！

「紅縱」在江青接見他們的第二天，即從十月九日開始，到十一月
十七日，在全軍文革縱恿、支持下，對我連續批鬥了四十多天，經常都
是晚上八時開始，到次日六時結束，名為要我解答問題，事實上是對我
進行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當時，我既要參加軍委辦公會議的日常工作，
又要主持總後的工作，對我的身體和精力來說，早已是滿載超軸了。他
們說，「邱會作是鐵人，也能把他燒軟了。」

全軍文革還指使錢信莎組織了「全軍院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觀
摩大會」，實際上是對我的批鬥會。從十一月十六日晚八時開始，先在機

關食堂進行批鬥「預演」，到十七日上午轉到總後禮堂批鬥，下午三時我自己就感到頭暈，支持不下去，祇有硬頂，六時左右就一下昏倒在批鬥場上了。總後門診部立即把我送三〇一醫院搶救。

我到醫院兩小時以後，葉帥就給三〇一醫院下了命令：(1)要全力搶救邱部長；(2)要保護邱部長的安全；(3)不准任何人干擾邱部長的治療。

造反派除了執行全軍文革打擊老幹部的指示外，其餘任何人的話都不聽的。為了確保安全，二十日晚上，葉帥就派軍委辦公廳科長杜海舟把我接到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絕對禁區）養病去了。當時，葉帥是有條件保護我的，也是真心保護我的。十一月十三日，葉帥等人在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師生時就說：「二醫大那些同志，搞過了頭就錯了。」

二醫大「紅縱」在總後機關鬧了幾個月，除了批鬥了我幾十次之外，其餘什麼也沒有撈到，由於軍委一再催促軍隊院校的師生要回到學校去鬧革命，十二月底他們灰溜溜地回上海去了。他們是被迫回去的，當然是心裏不服的。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立即接見了紅縱的勤務組，張春橋說：「你們在北京得到了鍛煉，學到了造反本領，也出了名。特別重要的是得到了江青同志的接見。你們現在的任務是搞好學校的文化革命，隨時接受新的任務。文化革命才開始嘛，英雄還能無用武之地！現在上海的形勢很好，在學校你們是沒有多少事可做了，你們還是要準備上北京的。你們那位部長是又臭又硬的，現在躲在山上同元帥住在一起享清福來了。這就是他們這些人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紅縱」很理解張春橋的指示，果然一個多月以後，「紅縱」奉全軍文革的命令，又殺回總後機關來了。

「紅縱」把總後變成鬼蜮世界

造反派利用「四大」的武器是搞打砸搶的能手。他們反對黨委領導，打倒老幹部，打擊革命群眾，搞得天下大亂。造反派的興起，大都是從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開始的。最初起來造反的人，最大特點就是被劉鄧鎮壓過的「冤者」，他們誓死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看來，按劉、鄧搞運動的方法也傷害了大量的群眾。當然，文革中的亂，毛主席支持造反是決定性的因素，毛主席支持「群眾」反劉、鄧，「群眾」中的一些壞蛋就藉著毛主席支持造反，卻去反對共產黨。形勢越搞越亂。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二醫大「紅縱」按照全軍文革的旨意第二次進到總後機關，到三月中旬，大約鬧了兩個月，他們的主要行徑是：

一、勒令總後黨委不准「擅自」開會（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並要監督黨委會議的召開，他們的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在總後政治部造反派的點撥下，和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去搶保密室，企圖搶走黨委常委會記錄。

二、宣佈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死不改悔。大肆造輿論說：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過去對邱會作是器重的，現在不保了，並把他交給了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處理。

三、佔領邱會作的家和辦公室，並數次抄家搶劫。

四、大肆抓人。總後機關二級部副部長以上的大部分、處長級的一部分和邱會作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抓起來了。對抓起來的人，成天進行批鬥、遊鬥、陪鬥，到處都是打砸搶的聲音。

五、以總後政治部造反分子為主成立了「紅色造反總部」，妄圖統一領導總後的文化大革命。

六、開支大量公款滿足造反派的需要。

七、對機關實行管制。機關工作人員白天不准外出，晚上不准出門。

八、機關內所有房子的牆上，大馬路上都寫滿了大字報、大標語。

整個機關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同垃圾場無異。

九、大肆破壞。黨委辦公室、俱樂部、大禮堂休息室，招待所的電話和用具極大部分都砸壞了，連招待所的被單子上都寫上大標語。

經過造反派的糟蹋，總後機關狼藉不堪，成了鬼蜮世界。

後勤學院的造反派「星火燎原」，是二醫大「紅縱」一手搞起來的。就其本質來說，「星火燎原」、「紅縱」是一樣的。「星火燎原」的特點以頑固著稱，是一部分教員和勤雜人員聚集在一起的。在一九六七年的「五一三」之後，一直負隅頑抗到十月才解體的。當時，軍隊的這種造反派，在北京祇有測繪學院、軍事博物館和後勤學院等三個。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後勤學院就沒有學生了，學院的教職員工不足千人。學院的政治質量很好，向來的政治運動都是很平穩的。文化革命開始不久，我還去學校看過大字報，在院長戴金川、政委閻捷三等陪同下，我同指揮系的幹部還開過座談會。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間，學

院還是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二醫大「紅縱」在學院禮堂對我進行批判時，學院的幹部也參加了，他們還處處保護我，雖然「紅縱」的批判會對我很兇狠，在臺上也放了高帽子，但始終沒有敢給我戴上。學院的政治質量很好，那為什麼「星火燎原」會成為全軍院校的八大左派之一呢？這個問題非常簡單，那就是全軍文革直接豢養的結果。「星火燎原」開成立會的時候，祇有七、八個人，二醫大「紅縱」是受全軍文革的委託，主持「星火燎原」成立會議的，並立即得到全軍文革院校組的支持。

「星火燎原」成立後，在「紅縱」的控制下，立即加入了「打砸搶」的行列。當時，在造反派流傳著這樣的話：「星火燎原」是大膽打了三棒成為軍隊造反派的後起之秀。

第一棒是對總後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方針性的意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間，全軍文革機關組在後勤學院俱樂部樓上召集二醫大「紅縱」，後院「星火燎原」和機關的「造反」分子開了一個會，討論了總後機關文化大革命怎樣辦的問題。這是動員造反派搞亂總後機關的會議。

全軍文革機關組組長謝鎧忠首先在會上說：「總後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十月間的形勢是較好的，江青和全軍文革都有評價，也很滿意，但現在發生了變化，形勢反而變壞了，已經起來的造反力量也有被撲滅的可能。今天在座的造反派對怎樣幫助機關搞好文化革命負有責任，要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來。」

「星火燎原」說：「總後文化大革命能否搞起來，最主要的是上級對邱會作的態度問題，要是把邱會作的威風打下來，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就成功一半。」全軍文革機關組完全同意「星火燎原」的意見，同時，謝鎧忠還讚揚他們是：「有思想，有見解，有能力的造反派。」

「星火燎原」成立之後，學院政委閻捷三，教育長李汎山，政治部主任王澤聲就倒向他們了。大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他們還登門對我「勸降」。他們說：「學院『星火燎原』是新生力量，並且得到了全軍文革的信任和重用。我們特來請求邱部長支持『星火燎原』，這是對學院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沒有多說什麼話，祇挖苦說：「我要是支持你們學院的『星火燎原』，他們就會立即垮臺的。因為他們的後臺是二醫大『紅縱』，而我是『紅縱』要打倒的領導幹部中的主要對象。」為了教育造反的幹部群眾不要陷得太深、少犯錯誤，我派總後文辦的王永久去找「星火燎原」

的頭頭談話，告訴他們：「你們大都是教員，應比學生的水平高。現在總後的領導病的病，休息的休息，祇有邱、張（池明）、饒（正錫）在主持工作。你們可以貼大字報，可以開批判會，但不能剝奪他們的行動自由，影響他們的履行職責。現在戰備任務這麼緊，影響他們對全軍後勤的指揮，是會造成嚴重後果的。」這本是一番好心的話，「星火燎原」的頭頭向全軍文革匯報了，第二天全軍文革的簡報上就刊載：「邱會作同志派總後文辦幹部威脅革命造反派，用戰備之名壓制群眾。」可見，全軍文革和造反派是什麼關係了。

第二棒是幫助高等軍事學院造反派沒有被吃掉。一九六六年冬，高等軍事學院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幹部發動起來的。一派（革命派）是院務部長劉忠為首；一派（造反派）是政治部主任為頭目。兩派進行了長時間的武鬥。雙方都建立了戰場、營地、堡壘、工事和路障等。全軍文革院校組要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去支援高院造反派的鬥爭。他們積極完成了任務。高院造反派是一個小派，很有可能被吃掉。但在全軍文革的支持下，後勤學院「星火燎原」支持該院造反派不僅沒有被吃掉，反而發展起來了。全軍文革很滿意，並對他們大加獎賞。

第三棒是對總後機關核心要害處，如黨委辦公室、機要保密室、打字室和我的家等處進行打砸搶，企圖搶走檔案，黨委常委會議記錄本和總後的大印。「星火燎原」的頭子王述臣解放前當過偽憲兵隊長，搞這些勾當是行家，比二醫大「紅縱」這些青年學生高明多了。當時總後急需給軍委打一個報告，聶帥收到報告非常詫異，他生氣地對我說：「你真是亂彈琴，給軍委的報告，怎麼是手寫的？！」我說：「聶帥呀，打字室都被造反派搶佔了，實在沒辦法呀。」這樣聶帥才消了氣。

五大部長

部隊的政治部門也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些人有文化，政治上比較敏感。在文化革命中，除了院校、文藝團體、科研單位外，政治機關一般是先亂起來的。

二醫大「紅縱」是通過總後政治部「五大部長」把機關「紅色造反總部」組織起來的。「五大部長」是總後機關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他們對搞亂機關，批鬥領導幹部，奪取領導權，起到了決定的作用。

一九六〇年以後，林彪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這是完全正確的。但總政治部打著林彪的旗號，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頭政治，並把空頭政治提高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了鞏固空頭政治的權威，總政用「空頭政治的大棒」整人是很兇的，人們都說：突出空頭政治，就是突出整人。總後是一個必須務實的機關，所以和總政的關係一直不好，總政想利用文化革命打擊我。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們知道「紅縱」的後臺是全軍文革（班底就是總政）。於是他們就站在「紅縱」一邊。堅決反對我，一定要把我置於死地，這就是「五大部長」的本質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大部長」通過各種渠道，同全軍文革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對搞亂機關起到了真正的核心作用。

第一，在搞亂總後的問題上，「五大部長」是同二醫大「紅縱」緊密勾結。他們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利益，共同把總後機關搞成了全軍大亂的典型。「五大部長」、「紅縱」是互相依存的。沒有中央文革，全軍文革支持，「紅縱」就不能打開總後機關的大門，把造反派引到內部來，起到衝擊機關的作用，但同時，沒有「五大部長」在內部「造反」，機關就亂不起來，這就是他們起的不同的作用。

第二，興風作浪。總後機關文化大革命，從開始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給邱會作下一命令之前，都是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很正常的。這段時間，雖然全軍文革直接指揮，二醫大「紅縱」衝擊了機關，但都沒有亂起來。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給「紅縱」關押起來，總後幹部的思想就不會發生混亂，總後機關是亂不起來的。這當然是個「奇跡」！這個奇跡是在黨委領導下，經過幹部群眾堅決鬥爭取得的。

一是粉碎了秘密組織造反派的陰謀活動。六六年八月「紅縱」進駐機關之後，「五大部長」就同「紅縱」秘密接觸，準備組織造反派。但當時全軍都不准搞四大，而且機關的政治思想工作、行政管理都很堅強，造反派根本無法活動。政治部少數造反派分子，一有活動都立即就被發現，如公安部立案監控的國民黨特嫌分子陳政就被抓兩次。

二是拒絕造反派進入文辦。參加文辦工作的人，都是對黨的事業忠實可靠的同志，但政治部參加文辦工作的人很少，他們對此恨之入骨。「五大部長」控制的政治部與總後文辦一開始就處於對立狀態。總後文辦

「忍事」。後來，我批評文辦說：「光怕引起事端並不能解決問題，要旗幟鮮明地進行鬥爭，不鬥爭。鬧事的人會越來越兇！」有一次，政治部對一份總後文辦的簡報提出了書面抗議，經過據理鬥爭，他們把抗議書收回去了，從而囂張的氣焰也被打下去了。

三是不准在機關慶祝《緊急指示》。六六年十月五日軍委發佈了軍隊院校搞四大的《緊急指示》。總後政治部的造反派高興極了，爲了在機關發動造反，「五大部長」策劃以政治部的名義召開慶祝會，總後文辦不同意政治部舉行慶祝會，在開會前還相持不下，我親自出面制止。我說：「機關同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樣，對《緊急指示》總後機關無須慶祝！」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的話還是很有效的，慶祝會果然沒有舉行。「五大部長」事先已與「紅縱」串通好了，「紅縱」以慶賀《緊急指示》爲名，在機關遊行，宣傳「造反有理」，並準備了大量的大字報。

四是禁止與「記者組」聯繫。全軍文革派出「記者組」到總後機關，是搞亂總後機關的偵察隊。他們的任務與「五大部長」的意願是完全一致的。記者組要來，他們真是高興極了！但事與願違，總後黨委規定：作爲紀律不准任何人單獨與記者接觸。陳政秘密與記者接觸過一次，不到十分鐘就被抓走了，記者在總後機關活動期間，造反分子根本無法同他們接觸。機關管理之嚴密，是記者預料之外的，也是「五大部長」沒有預料到的。

五是不准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典型。六六年十一月間，全軍文革提出了樹立軍隊院校八大造反派爲革命左派，其中包括二醫大「紅縱」和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同時，全軍文革也提出了要在全軍廣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定邱會作爲全軍執行劉、鄧資反路線的典型。對上面兩個問題，葉劍英副主席不同意。但要批判我的資反路線典型，「五大部長」指使總後政治部的造反派對我所謂鎮壓學生的「罪行」秘密印了一本很厚的材料並急於要開批判會，但軍委當時有指示：「要點名批判總後領導人，則一定要有中央軍委的指示。」「五大部長」無可奈何，祇好泛泛地批判一番就算了事。

總之，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給「紅縱」關押起來，總後幹部的思想就不會發生混亂，總後機關是亂不起來的。

第三，控制政治部爲獨立王國。總後政治部，由於跟著總政搞空頭政治，在群眾中「有威無信」。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政治部「五大部長」的成員之一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網破就是魚死，別的出路是沒有的。」陳政則說：「死也好，活也好，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政治部不要被『零的』。」陳政則說：「死也好，活也好，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政治部不要被『零的』。」陳政則說：「死也好，活也好，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政治部不要被『零的』。」控制政治部爲獨立王國就賣』（意思是把他們這些人拆散，調動工作）。」控制政治部爲獨立王國就是由這種思想而來的。他們控制政治部的主要措施是三條：自己鬧革命，保護盧南樵，打倒周長庚。

保護盧南樵，打倒周長庚。

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舉足輕重，對這點我是有充分認識和思想準備的。但怎樣加強對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我則始終沒有想出一個好辦法，權衡利弊還是決定由他們自己管比較妥當。我曾經這樣想過：通過文化大革命，爭取政治部大部份同志站到正確方面來是有可能的。政治部成立文革辦公室之前，他們採取了一個特別的行動，政治部黨委集體向我請示匯報文辦的人選。在匯報會上，我指定陳靜爲政治部的文革辦公室主任。我的決定完全符合政治部多數幹部的心願。這一決定雖是平常問題，但對政治部則起到了爭取、分化的作用，以宣傳部長、副秘書長爲首的很大一部分同志逐漸站到黨委一邊來了。

兇惡的武鬥昏天黑地

「紅縱」二次來京的當天晚上，就在總後機關俱樂部樓上（「紅縱」的辦公地點）與總後機關的「五大部長」，後勤學院的「星火燎原」開了一個決策會議，他們經過分析說：「現在的形勢很好，主要是全軍文革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打倒邱會作的條件是成熟的。現在的中心問題是把邱會作弄到手，我們把他控制起來就好辦了。」

爲了實現他們的目的，他們一是在機關大抓擁護黨委、擁護我的「老保」，一共抓了四百多人，辦公樓全部成了臨時監獄。二是到三座門全軍文革辦公地圍攻糾纏徐帥，逼著他把我交出來。三是大造輿論。造反派在群眾中對我大造輿論，主要內容是：邱部長變了，他變成「反革命」了；敬愛的江青同志定邱會作是「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全軍文革準備把邱會作交給「紅縱」，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現在不保護邱會作了，交給「革命群眾批判鬥爭」。這些謠言，對不明真像的群眾起到了很大欺騙作用。

在造反派橫行的時候，破壞是由亂而來的。造反派把機關搞得到處狼藉不堪，其中黨委辦公室，招待食堂，院內招待所被破壞的最為嚴重。上述三個地方，我都親自看過現場。房內各種設備沒有一件是完好的，黨委辦公室的幾部電話都砸爛了，連喝水的杯子也全部打爛了，院內招待所的被褥大部分被撕爛了，暖水壺全部砸爛了，食堂的桌凳都砸了。上面三個地方所有牆壁上都寫上密密麻麻的罵人的所謂大字報。更使人難於理解的是，招待所的不少被褥上用墨汁寫上了「大字報」。

造反派的另一種破壞，就是對廣大幹部群眾的人身摧殘。在造反派橫行的時期，機關被抓的幹部幾百人，佔機關全體人員的三分之一多，死在造反派屠刀下的，僅機關就有十餘人。這裏祇說工廠部部長張和，電工李爲和禮堂公務員劉其三個人之死，就可見造反派殘忍到何等程度了。

工廠部部長張和，湖南平江人。一九三〇年參加了彭德懷領導的平江暴動參加紅軍。他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並在戰爭年間失去了右腿。他在抗日戰爭後期做過旅一級的職務，一九五五年評定軍銜時，授了少將軍銜。

自從我當了總後部長之時起，對於軍需生產就存在兩條方針的鬥爭。原軍需生產方針是：「低耗，高產，完成計劃」。我則反對這個方針，因爲沒有質量要求，不符合軍需品的需要的。我提出的方針是：「優質，高產，質量第一」，這是從軍需品特點提出來的。有的人堅決反對我提出的方針，張和（當時軍需生產部副政委）則堅決擁護我提出的方針，大大改變了軍需生產的面貌。

正是因爲張和是支持總後黨委的，支持我的，造反派就把他定爲「邱會作的死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張和了，並且對他進行了殘酷鬥爭，直到把他逼得無路可走，死了才了事。首先是對張和戴高帽子遊鬥。他是一個殘疾人，一條腿是假肢，平時走路就要用手杖，但對他進行遊鬥時，造反派就要他把銅鑼掛在手杖上，要邊走邊打鑼喊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造反派是在對領導幹部進行人身污辱，也是對殘廢軍人，對人民解放軍進行污辱。因爲他祇有一條腿，站不住，經不住造反派的體罰，多次跌倒在批鬥場上。

張和受到造反派的打擊之後，我和張令彬還去他家去看過他一次，當時我們也毫無辦法，因為總後的文化大革命是全軍文革直接插手搞亂的，他們打著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招牌揪鬥老幹部。張和想來想去認爲沒有前途了，自己又是殘廢，實在受不了造反派的磨難，於是就一死了之。在此，我向張和部長致以沉痛的哀悼！

電工李爲之死的情節很簡單也很殘忍。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派去變電所鼓動造反，工人們把去鼓動造反的人關起來了，造反派懷恨在心。他們把總後搞亂之後，被關的那個人帶了一群人去變電所算老賬，搞報復，造反派氣洶洶地說：「以前關我們的保皇分子是誰？」李爲毫無懼色地站出來說：「是我！」於是，造反派就把李爲關到原來關造反派的那間房子裏，由於關人的房子在變電所的後面，又沒有向變電所任何人說過，大家都不知道李爲被關起來了。三天之後，家裏人去找變電所問情況，撬開後面的房子一看，李爲成了殭屍了！李爲死時才二十一歲，是部隊的復員軍人。他工作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愛他。

劉其是禮堂的服務員，志願軍的復員戰士。一九六七年一月中，禮堂有五人值班，其中兩女，三男，造反派知道這一情況之後，有兩個晚上闖進禮堂去企圖姦淫那兩個女工作人員。但造反派不知道樓上還有三個男工作人員，闖進去的那兩個人正要發洩獸行時，男同志聞聲從樓上跑下來，兩人溜走了。不久造反派來了十餘人並手持兇器，把劉其圍起來毒打致死，連劉其的屍首都找不到了。



書名：邱會作回憶錄

Memoir of Qui Huizuo

作者：邱會作

作者简介：

邱會作

(1914–2002)

江西省興國縣人。1955年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邱會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6年。1987年刑滿。2002年7月18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89歲。

《邱會作回憶錄》目錄

下冊

第二十五章 零點得救

大人物上任全軍文革組長

江青批准「紅縱」殺回北京

徐帥的命令

造反派的刑法

零點得救

全軍文革支持三座門靜坐

周總理送我回總後

正確對待造反派

第二十六章 軍委辦事組成立前後

「五一三」事件

「七二〇」事件

新的軍隊日常辦公機構

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第二十七章 楊成武倒臺

楊成武倒臺的自身原因

楊成武是軍隊的臺柱子

楊成武問題的內幕

江青要把邱會作、楊成武同罪

抄楊成武的家

「三二四」大會

棄楊留吳的問題

第二十八章 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軍委辦事組改組

批判軍隊「二月逆流」

辦事組的主要工作

「反江青俱樂部」

反江青的兩個不同時期

李必達事件

文革往事

第二十九章 八屆十二中全會

總理的開場白

全會的任務

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主席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林總的長篇講話

林彪、江青的矛盾

第三十章 九大縱觀（一）

關於起草文件的問題

開幕式

大會討論和發言

毛主席談兩條路線鬥爭問題

毛主席談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階級隊伍的問題

毛主席談關於準備打仗的問題

毛主席談關於選舉的問題

上海幫批判陳毅

江青要當接班人

第三十一章 九大縱觀（二）

軍委辦事組退選舉名額

大會選舉

三人小組

黃永勝堅決不當常委

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

江青進入政治局的影響

附：《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第三十二章 廬山戰火

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

主席通過江青拉我們

吳法憲與張春橋的爭論

高高興興上山

政治局常委會

開幕式上林彪的講話

山上的熱鬧

整個廬山都狂熱起來

第三十三章 風雲突變

晴天霹靂

林彪的態度

吳法憲檢討

黃永勝上山

《我的一點意見》

會議的最後幾天

毛澤東的苦澀

汪東興與華北組六號簡報

第三十四章 「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

關於中央政治局生活會的方針問題

吳法憲、葉群向毛主席寫檢討報告

全軍批陳整風

毛澤東「甩石頭」(三十八軍的報告)

毛主席「挖牆腳」(華北會議)

軍委座談會

江青一夥的威風

軍委辦事組整風

我們的檢討報告

毛主席第一次接見

北戴河之行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

會場上的交鋒

會議給我們下結論

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

第三十五章 毛主席南巡

不在乎，又在乎

林總的態度

毛主席為什麼南巡

在武昌的談話

在長沙的談話

林彪是冤鬼

第四篇 我的晚年

第三十六章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

十三日凌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

緊急善後處理

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略記

第三十七章 淚別周總理

北門解迷

周總理的談話

三相信

永遠懷念周總理

第三十八章 在順義的日子裏

改天換地

「特殊首長」

四組同我的關係

第三十九章 中央專案組的審查

沙河機場的兩次審問

沙河機場的第三次審問

關於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

關於國防工業問題

陝西省委常委在京舉行擴大會議問題

關於「九六」問題

第四十章 在秦城的日子裏

押進秦城監獄

老幹部的歸宿

現代黑店

監獄裏的鬥爭

黑暗中的星光

子女探監

第四十一章 中紀委的審查

審查的重點

關於廬山會議的問題

關於攻擊朱德的問題

關於搞葉帥材料問題

關於反擊徐向前的問題

關於總政的一些問題

關於醫療保健問題

關於羅瑞卿的治療問題

關於陳老總的治療問題

關於賀龍的搶救問題

關於徐海東的醫療問題

關於傅連暲的問題

所謂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

萬毅的談話

中紀委審查小組最後的話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檢與預審

補辦逮捕手續

「反革命主犯」問題

確定我為「反革命」的證據

遞交起訴書

[第四十三章 「公審」鬧劇](#)

宣讀起訴書

第二審判庭

五次出庭

判決

難友合監生活

走出秦城

[第四十四章 空前的大冤案](#)

公審是大倒退

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

造反派消滅革命派

惡毒株連是冤案的一大特點

哭老戰友黃永勝總長

說幾句閒話

[第四十五章 全家株連](#)

母親餓死在醫院

老伴受到殘酷至極的迫害

五個子女無一倖免

[第四十六章 在西安的日子](#)

安置西安

生活問題

有期等於無期

百感交集

落難中的情誼

[代後記](#)

[邱會作將軍生平簡歷](#)

[照片索引](#)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主席接見軍隊高級幹部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天安門城樓上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時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一九七〇年周總理參觀我軍新研製的 69 式 40 火箭筒打坦克表演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九大開幕式上

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九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講話

「鬧來鬧去，把帽子給我們扣上了，可憲法草案上...」

林彪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照常吃飯，照常睡覺。頂多做個彭德懷第二。」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會見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

一九七一年「五一」節

有口難辯。在一九八一年「公審」中

黃永勝總參謀長

胡敏拜見黃永勝陵墓

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邱會作的母親

一九八〇年，經過近十年的磨難，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見面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路光一家合影

和承光一家合影

和光光一家合影

和小光一家合影

光光、小光同在一個部隊、一個城市

一九九五年，胡敏和老戰友項輝方在西安家中

胡敏和林立衡（豆豆）在一起

一九九九年，和老戰友李作鵬在一起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真情實意

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邱會作回憶錄

邱會作 著

(下)

MEMOIR OF QIU HUIZUO
VOLUME 2

第二十五章 零點得救

大人物上任全軍文革組長

江青是下決心要利用文化大革命抓住軍隊的。但她知道，自己抓祇能抓到虛的。祇有在軍隊找到適當的代理人，才能抓到實權。對軍隊有些人，她認為他們還不夠「成色」。她經過認真考慮之後，突然向林彪提出了對徐向前的使用問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有關軍隊文化大革命，江青連續上林彪的門。最後一次，江青直接了當地說：「要搞好軍隊的文化革命非有元帥昇帳不可。我提議徐帥任總政治部主任，並任全軍文革組長。」對此，林彪感到非常突然，圍繞徐的任職，林彪向江青進行了巧妙的鬥爭。

林總說：「徐帥是一個指揮打仗的人，搞政治工作恐怕不合適吧。同時，他身體不好，也不能勝任這樣繁重的日常工作。」

江青說：「很合適。政治工作、文化大革命都是領導貫徹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問題，日常工作可以讓別人去做。他身體不好，對任職毫無妨礙。」

林總看到江青的意見很堅決，江青走後，立即親自向毛主席報告了。他向毛主席提出：「在當前的情況下，徐向前同志任全軍文革組長是可以的，軍委的日常工作仍由葉劍英同志負責。」毛主席完全同意林總的意見。

新任全軍文革組長的任職已經批准，傳閱件已經到了林彪手裏。林彪即派葉群去向江青報告，葉群說：「林彪同志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見，軍委徐副主席兼任全軍文革組長。」

徐帥對上任全軍文革組長，開始有點受寵若驚，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面也很動心計，他提議江青任全軍文革顧問。他認為江青

是主席夫人，消息來得快，同時有事一起擔當，這樣，江青插手全軍文革的局面就「落實」了，軍隊的大災難開始了！不過，徐帥也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徐帥剛當全軍文革組長時，我以為分了葉帥的權，去安慰了葉帥幾句，沒想到葉帥哈哈大笑，說：「這是主席、林副主席關心我，讓我好好掌握部隊，讓他去當文革組長，挨炮轟。」徐帥積極了一陣子，開始明白了一些，就開始「有病」了，後來也給他戴了一頂「二月逆流」的帽子，再後來全軍文革也倒臺了。

在徐帥上任文革組長的第一次會議上，他提出了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三條方針：一是不要怕亂；二是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是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這三條核心的就是要正確看待一個「亂」字。全軍文革熱烈地擁護這條方針，並且提出了：「在徐帥指揮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軍隊的造反派對徐帥的方針如獲至寶。

一九六七年一月間，軍委常委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到會的有各總部、各軍兵種、院校和各大軍區在京的首長，會議由葉帥主持。

會議開始時，徐帥講了話。他除了講了他的三條方針之外，並對向地方造反派學習做了充分的發揮。他說：「現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帥特別點到蕭華是膽小鬼。大家對徐帥的講話氣憤極了！

這次會議很特別的是，沒有人講話，大家祇是喝茶、上廁所。在冷場很久之後，陳老總用調侃的語言說了兩句話：「徐帥今天說不要怕群眾的話，我們是理解的。過去你也同我們害一樣的病吧？現在你的病好了。」聶老總說：「我確有病，但我決不怕死！」他們兩人說了幾句話之後，還是一個講話的也沒有。葉帥祇說了一句話：「今天的會到此結束。」他說了這句話，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會開的空前的短，大約祇有一小時。會議冷場情況，是對徐帥最好的諷刺！

新的全軍文革成立後，即向江青匯報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得出的主要結論是：軍隊的造反派沒有發揮作用。新的全軍文革立即建議，調幾個造反派來幫助軍隊機關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准了。不出兩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後，徐帥在全軍文革歡迎各造反派頭目的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我們執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請大家來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現在的革命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不怕亂的路線，一條是怕亂的路線。一個「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新的全軍文革執行毛主席不怕亂的路線，由大亂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對徐的講話，快要捧到天上去！會後造反派通宵遊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徐帥致敬！」的大標語貼滿了北京城。全軍文革就成了江青在軍隊不折不扣的最得力的代理人！

在新的全軍文革領導下，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確實出現了「新的局面」。全軍院校，從亂到徹底垮掉了；省軍區以上的機關，除總參機關沒有亂之外，其餘的都亂了，有的亂透了；作戰部隊也有部分亂了；高等軍事學院兩派對壘，戰火不息；三座門持久靜座；總後機關成了全軍大亂的典型；測繪學院造反派殺進葉劍英元帥的住處。

全軍文革組長同江青確實沒有什麼歷史關係，江青選中這位組長為軍隊的得力代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問題。江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頭面人物之後，她要搞亂軍隊、趁亂插手軍隊唯一的障礙就是林彪，她對林彪才確實是當面說好話，背後卻根本不聽。江青在軍隊是毫無地位的，她要直接插手軍隊是不可能的，祇有用找代理人的辦法。從當時軍隊的實際情況來看，葉帥、聶帥都不會買她的賬的。在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徐帥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他的情緒變了，江青也注意到他了。

江青批准「紅縱」殺回北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林總出席了在人大會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擴大會議，到會的有幾十個人，各大軍區、各省市在京西賓館「躲反」的領導幹部，如宋任窮、陳錫聯、李井泉、黃永勝、韓先楚等都到會了，當時，我在北京西山養病亦得到了通知，也到會了。到會的有幾十個人，在會場上的人們如同過去開幹部會一樣的談笑風生，尤其部隊的幹部，老粗多，見面就開玩笑。

會議開始時，毛主席對著李天煥說：「給你戴高帽子是錯誤的，我是反對這樣搞的。但是，大家不要怕到群眾中去，頂多就是戴高帽子。經過較量，好人、壞人就會清楚的，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就在這裏。」毛主席這些話，中心意思是告訴大家們都不要怕文化大革命，都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的講話是以一種隨便談的方式講的，總理、林總、陳伯達、康生等都插了不少的話。林總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現在還要加上一條，要正確對待高帽子。」周總理還特別講了黑龍江哈爾濱市商業局局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就被戴上了高帽子，還畫了花臉。他不和群眾搞對立索性戴著高帽子上下班。

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總參作戰部的值班參謀來向江青報告說：「上海二醫大有個叫錢信莎的學員，要求同江青同志通話。」

我聽到值班參謀的話之後心裏很納悶，為什麼錢信莎能夠直接給江青打電話，她又敢同江青打電話？其中的奧妙，我當時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電話，回來後對著徐帥說：「你們全軍文革建議，要調造反派來京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這個建議很好。上海二醫大『紅縱』要求盡快到北京來，春橋要錢信莎直接向我請示報告。」徐立即表態：「感謝江青同志關心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江青接著又說了一句：「老將怕小將是沒有理由的！」

「紅縱」為什麼又來北京，至此情況就算清楚了。一九六六年十月軍隊院校來參加國慶活動，在機關鬧了一陣子，但沒有鬧出大名堂來。學生回校之後，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很正常。不僅如此，各機關對造反分子都進行了打擊，例如空軍一高專的造反派頭子彭謙（是一個教員），帶一些人造空軍黨委的反，並在駐京各單位到處煽動造反，彭謙是軍隊造反派的總頭目。因為彭謙鬧得太兇，引起了軍委的高度重視，葉帥親自和吳法憲、余立金到前門打磨廠空軍招待所找彭謙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主席接見軍隊高級幹部。前排左起：江青、李富春、聶榮臻、康生、陳伯達、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徐向前、李先念、葉劍英。二排：左一陳明義、左二葉群、左三粟裕、左四謝富治、左五杜平、左六陳再道、左七袁昇平、左八皮定均、左九丁盛。三排：左一楊成武、左二蕭華、左三李成芳、左四曾思玉、左五王恩茂、左六李作鵬。四排：左七楊得志。五排：左一汪東興、左二吳克華、左三張震、左四李天佑、左五李天煥、左六江文、左七張池明。後排：左二許世友、左三王力、左四戚本禹、左五關鋒、左六吳法憲、左七韓先楚。邱會作因在西山養傷未有出席。

談話，彭謙依仗有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的支持，竟揚言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支持我決不回頭。葉帥大為動怒，當即下令把他抓了起來。

中央文革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有批評，全軍文革很著急，全軍文革組長提出，搞文化大革命要是怕亂則一事無成，建議中央文革批准調幾個軍隊院校造反派來帶動北京各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質是依靠造反

派炮轟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黨委和主要領導幹部！「紅縱」是全軍文革培養起來的主力軍之一，自然是必定來京的。

二醫大「紅縱」由上海乘火車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到達北京總後大院，他們一進總後大院就把機關的辦公室、俱樂部、禮堂都控制起來了，並且佔領了院內的招待所。在「紅縱」到達的當天晚上，全軍文革副組長李曼村向「紅縱」交代任務時說：「總後的問題就是邱會作的問題，你們祇要解決了邱會作的問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可見調「紅縱」來北京，並非「幫助」總後機關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來打倒我的。

為了打倒我，二醫大「紅縱」於一月十八日凌晨在總後系統造反派的會議上宣佈了三條方針：一要認定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二要打破群眾對邱會作的信任；三要發動群眾和幹部同邱會作劃清界線。

一月十九日，「紅縱」發表了很長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內容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任務，讓我們走上了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我們要就是打倒邱會作，要就是被邱會作鎮壓。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我們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

中央軍委同中央文革、全軍文革直接指揮的造反派在搞亂總後的問題上進行了一場嚴重的鬥爭：全軍文革要揪邱會作，中央軍委要保護邱會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全軍文革為院校造反派樹立了八個左派組織和提出了要批判四個高級領導幹部（邱會作、李天佑、李天煥、杜義德），邱會作是要受批判的頭一名，軍委未予理睬。葉帥在軍委常委會上說：「文化革命是新鮮事物，很難不犯錯誤，我是軍委秘書長，比他們四個人犯的錯誤還多，如果要批判典型的話，應當對我進行批判，才是公正的。」

全軍文革碰了釘子，一肚子的氣。《緊急指示》下達時，全軍文革鼓動葉帥出來講話，由於軍隊造反派鬧得太不像話，葉帥對造反派徹底轉變了態度，葉帥兩次在工人體育場講話，對造反派非常不滿，還對總後的造反派發了火，這之後全軍文革又鼓動造反派糾纏葉帥，葉帥是很聰明的，當時既不能冒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要把學生搞回學校，葉帥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京西賓館小禮堂進行了約二十分鐘的自我批評。此後，軍隊院校的學生就基本上回校鬧革命去了。

全軍文革亡我之心不死，積極策劃，搞亂總後機關，對我要下更大的毒手。

徐帥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紅縱」在張春橋的建議下，江青批准他們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來，如同受了傷的老虎，特別的兇殘，他們到總後大院之後，首先是搞白色恐怖，當然，主要目標是對準我的，也把總後機關徹底搞亂了。

「紅縱」是打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的旗子進入總後的。在隊伍的前面有十幾個標語牌，其中寫著「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同總後革命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打倒邱會作解放全總後」等等。

「紅縱」到處煽動遊說，「中央已經決定把邱會作打倒，不能回總後了（當時我還在西山養病）」，「中央文革定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林副主席把邱會作一腳踢開了」，「毛主席，周總理再也不保邱會作了」等等。這些謠言，既狂妄又惡毒。

「紅縱」在總後機關把大字報貼滿了各個角落，抓了數十名各級領導幹部關在辦公樓裏，設了臨時監獄，被關的人受盡百般折磨。凡是不同意「紅縱」觀點的幹部都被抓起來批鬥。被抓的人中，極大多數都是堅決與之鬥爭到底的。

「紅縱」捲土重來之後，雖然用盡了各種毒辣手段製造白色恐怖，但機關還是亂不起來，這時「紅縱」很著急，全軍文革更著急。全軍文革院校組召集「紅縱」的頭頭開了一個會，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不把邱會作抓出來示眾，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來。就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之下，他們策劃了徐向前對我下命令的事件。他們的步驟是李曼村先向徐帥匯報，然後「紅縱」立即要求徐帥接見，圍攻、糾纏徐帥不放，直至把邱會作交給「紅縱」為止。

全軍文革院校組組長李曼村向徐向前匯報了總後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情況時說：「江青同志調造反派來，幫助部隊機關搞革命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二醫大『紅縱』對總後的局面已經打開了，但機關還很穩固，大

家再看上面對邱會作的態度。邱會作住在西山，對總後的保守派進行遙控。」

徐向前發問：「你們說，對邱會作應當怎樣辦？」

李曼村即說：「要邱會作到『紅縱』去三同（同吃，同住，同搞革命）是最好的辦法。」

「林副主席、葉副主席以軍委的名義安排他在西山養病，現在要他出來，還要報告軍委批准。」

「你也是軍委副主席，可以下命令嘛，領導幹部到群眾中，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的，是中央文革再三強調的。」

徐向前回答說：「我同江青同志商量一下。她是中央文革的領導，又是全軍文革的顧問，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很關心。」

徐向前和李曼村談話以後，「紅縱」就闖進了徐帥的接見室，糾纏徐帥不放。

以上這些話是李曼村被關起來之後交待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時，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親自打來的電話，我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接到他的電話。他對我的身體情況如何連一個字都沒有問，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還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適的，總後系統的革命群眾對你的意見很大，你應立即回去參加文化大革命。關於你的問題，江青同志都認為你的問題不簡單，你是頑固執行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現在你立即下山，回總後去參加文化大革命。我現在不是以全軍文革組長的名義和你談話，而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向你下命令，你必須堅決執行命令，立即回總後去！」我一聽也就起火了，祇回答了一句：「堅決執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對我下命令，我也沒有說話的餘地了。

我接了電話之後，立即向秘書說：「晚飯後，回總後！」晚飯後我即步行下山，去軍事科學院葉帥的家中辭行。我原以為葉帥知道我要回去，便對他說：「我這就回去了，看葉帥還有什麼指示。」

「你到什麼地方去？」

「回總後去！」

「『紅縱』在總後鬧得很厲害，你現在不要回去。過幾天看情況再說。」

「不行呀葉帥，徐向前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向我下了命令，我祇有堅決執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啊！有這回事嗎？我根本不知道！」我把徐帥命令的全部內容說了一遍。

此時，從來不說髒話的葉帥脫口而出一句「他媽的！」他皺了一下頭眉並歎了一口大氣說：「我打個電話問一下情況。」一會，葉帥從內間出來向我說：「你說的情況屬實。現在就這樣辦吧，其中的微妙你是會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後的事就由我來管了，我就叫傅崇碧做具體的佈置。」接著葉帥就要他的秘書通知西山管理科長杜海舟把我的秘書、警衛員、司機等帶到葉帥家裏來。葉帥說：「我要向他們交代幾句話。」我的工作人員到了後，葉帥對大家說：「邱部長回機關去領導文化革命，你們隨他回去，對這個問題，你們要正確對待。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還有我們幾個對邱部長是心中有數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們頭上，你們要站穩立場。」

同葉帥分別的時候，我緊緊握著葉帥的手說：「我什麼都不怕，請葉帥放心！要是我被『紅縱』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過，徐向前給我下命令的實質問題，並非命令我個人，是發出了一個信號，林總、葉帥叫各大軍區的領導到北京『躲反』，徐帥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裏趕，我看軍隊要亂了。請葉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處境。」葉帥心情沉重，一句話沒有說，祇是眼眶濕潤地站在門口，看著我走去。

在回總後的途中，我向秘書呂玉潤、警衛員蔣平安、司機張自貴說：「你們回去，要做遭殃的準備。運動來了，你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有缺點錯誤你們可以揭發，沒有關係。文化大革命之後，對有意整我的人，我一個也不要。」我的話他們都記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松的時候，總後文辦派司令部戰勤處長魯智在那裏等候，攔阻我不要回去。我向魯智說：「不要緊，我要回去！我要讓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兵是啥樣子？我不能給他們丟人，更不能做膽小鬼。」

魯智勸我說：「部長，不是膽不膽小的問題。你回去有生命危險！另外，總後日常工作量這麼大，任務這麼重，機關一亂，你再出意外，那總後就全完了！」

「你說得對嘛。徐向前他對我負不負責是小事，對總後不負責是大事！不過，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麼樣？不要怕。走！」

在五棵松，魯智還說：「你現在不能回去了，徐帥的命令一傳開，機關大亂了，機關二級部長、副部長以上的幹部很多都被『紅縱』抓起來了。」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的部下都被抓起來了，我更要回去。」我同魯智開玩笑說：「造反派祇打我，就不打他們？我的肉打了就痛，他們的肉打了就不痛？刀山火海，我去闖一下嘛！」

正在這時，葉帥的秘書帶著衛戍區的幾個幹部戰士，趕到五棵松堵住了我，說葉帥還是叫我馬上回西山，全軍文革也要聽軍委的，請部長不要意氣用事。我很冷靜地說：「請轉告葉帥，我謝謝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顧全大局，已經牽涉到元帥們的關係了，我必須顧全大局。」那時的情景，真是含淚而別。

我要魯智先回去，告訴文革辦公室向廣大幹部和群眾轉達三點：「一，我們要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大家不要為我擔心；二，大家要團結起來，同違犯黨紀國法的行為鬥爭到底，三，黑暗是暫時的，別有用心的人是打不倒我的。」到了機關之後，我有意繞到東門（生活區）進機關大院，車開得很慢，我看到禮堂門口到處都是戴著袖章的造反派，這時我乾脆下了車，走路回家，機關的幹部看見我回來了，並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驚……到了我的家附近，到處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並跟著進了我家中，我剛坐下，造反派就說：「現在請你去同我們一起搞文化大革命。」我還未見到家裏任何人，就被帶走了。「紅縱」預備好了一輛大卡車，把我拉到衛生部辦公室三樓關起來了。我通過辦公區時，看到各個辦公樓燈火通明，裏面吵叫聲很厲害，原來各個辦公樓都關了不少幹部。

在我的房間裏，有六個人同我「同住」。大約是十九日晚上九時，即把我關起來之後不到一小時，「紅縱」的高音喇叭就播送了他們的戰報，內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軍文革的支持下，邱會作被捉拿歸案了。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總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我關起來之後，心裏非常坦然。第二天下午起，就讓我觀看「紅縱」和機關的造反派押著幹部戴高帽子在遊行，我記得起來的有饒正錫、羅

文、傅連暲，陳龐，王用久等人。造反派要傅連暲邊敲鑼邊說：「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這樣做，既是在糟蹋幹部，也是在做給我看的。看管我的人問我說：「你對他們受到應有的懲處有什麼看法？」我回答了一句話：「按照毛主席的教導造反，才算有理。」從第二天晚上起，造反派每天晚上都要對我審訊一次，每次的時間都在四小時以上。他們的審訊，除了謾罵什麼內容也沒有。

一月二十一日晚上，「紅縱」押我去工人體育館「觀看」了一次批鬥大會。那次主要是批鬥劉震、劉志堅、廖漢生、成鈞等人。劉志堅自己「左」了一番，現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階下囚。我親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對革命幹部的殘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鬥大會（實為武鬥大會）由「紅縱」的副手汪志杰主持，在批鬥開始時他指著我說：「邱會作你老實一點，他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同我一起陪鬥的有還有黃志勇。批鬥開始不久，有人斷了電，批鬥就被迫停止了。

一月二十二日，我的孩子承光，以為我換衣服為名闖到我的房間裏來了。孩子進來之後，看到我真像個囚徒一樣，祇是流淚，說不出話來。他在手掌上寫好了幾個字：「上頭態度好，很快解決。」他伸開巴掌給我看，但我花眼，看不到。我即要孩子給我剪手指甲，孩子理會我的意思，再次伸開手掌，也就看清楚了。孩子知道我看清他手中的字，他也就走了。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看管我的學生想請假出去，他們的小頭目沒有同意，他問：「不是二十八號再開批鬥大會嗎？」小頭目說：「聽李部長說，上面要保，我們要爭取主動，提前開會，連續作戰。」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總後禮堂和二十四日上午在總後機關大操場，二醫大「紅縱」分別對我搞了各達四小時的殘酷批鬥。

批鬥大會開始之前，即把我由衛生部辦公樓押進了會場。會場沒有搞什麼佈置，祇是在舞臺上掛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大會」。會議將要開始時，全軍文革副組長謝鎧忠帶著兩三個工作人員來到會場，坐在人群中觀看批鬥。

批鬥大會開始時，「紅縱」主要頭目錢信莎在臺上大喊一聲：「把邱會作押上臺來！」頓時，兩個兇手要把我拉上臺去，我掙脫了他們的挾

持，毫無畏俱地走上臺去了。此時，臺下的人鴉雀無聲，都在睜大眼睛看我的行動。

我上臺之後，錢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領章、帽徽扒掉了。同時一個高大個子的人用勁搊了我一個耳光子，我不由隨即側身倒下去，臉部恰好磕在臺前的梗子上，當時我祇覺得頭上嗡的一聲，就不省人事了。他們用一杯水潑在我的臉上，我醒來之後，爬不起來，還是那個打我的大個子把我提像東西一樣地提起來，我站起來之後，感到頭暈、半邊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裏往外流血，此時，全場還是鴉雀無聲，恐怖氣氛籠罩著會場。錢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聲宣佈：「批鬥開始！」

造反派的刑法

幾個劊子手兇狠地來到了我的跟前，他們是來執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的。

(1) 向毛主席請罪。這要兩腿併攏，兩手垂直下伸。用細鐵絲在脖子上掛一塊二十多公斤的鐵牌子，鐵絲嵌入肉裏，疼得難以忍受。這還不算，劊子手還要把鐵絲左右拉動，每三、五分鐘拉一次，鐵絲嵌到肉裏鮮血直流。開始拉鐵絲的時候，疼得難忍，後來麻痺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2) 向「造反派」認罪。這要雙腳跪下，兩個人將我雙手反擰，頭低下，掛在脖子上掛的那塊大鐵牌子，下端還不准挨地（因為鐵牌子挨地重量就輕了）。在難以忍受時鐵牌子自動落到地上，他們就會把我的頭髮向後一揪，牌子也就離地了。

(3) 向「造反派」致敬（噴氣式）。這一刑法要六個人協同動作，四個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來，前面站一個人揪著我的頭髮，後面一個人推著屁股，揪頭髮的人叫出口令：放！六個人協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拋，整個人猛地懸空落在地上。

向「造反派」致敬不容易做好，指揮官是總後政治部文化部俱樂部主任申茂功，他們為了達到應有的效果，在武鬥之前曾經領著打手練習過多次。

其他的刑罰還有：

(4) 打倒鎮壓「群眾」的劊子手。

- (5) 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6) 打倒「反革命分子」。
- (7) 「造反派萬歲」。
- (8) 向「革命」群眾請罪。

這次武鬥，從開始到結束在四小時以上。「紅縱」對我執行每種刑法之後，劊子手們都要對著我喊三句口號：一、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二、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

在對我搞了三次噴氣式之後，我也就昏厥過去了。他們把我拖到後臺，我醒來後，他們叫來事先在後臺值班的三〇一醫院的心臟病專家黃宛給我做檢查，黃摸了我的脈搏和聽了我的心臟，我當時眼睛直盯住黃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臟有問題還是沒問題，面對殘酷的武鬥，你祇要說聲「有問題」，我也得救了。我畢竟是你的部長呀，你們這些專家是我費了多大的勁，才要到總醫院來的。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黃宛竟說了兩個字：「無妨」。這樣，我又被拉上臺，繼續向我進行武鬥，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後，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動了，「紅縱」的三、四個人把我抬上一個三輪板車，拉到總後衛生部辦公室三樓。

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是我遭受最大災難的日子。

二十四日上午在總後大操場的武鬥，基本上同頭天下午在禮堂上是一樣的。劊子手給我剃了一個陰陽頭。這一刑法，除了醜化人之外，沒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飯的時候，看管我的人，又在用上海話在互通情報，我能聽懂一些。一個人從門外氣沖沖地進來說：「李部長批評我們祇是打人，不注意擴大政治影響。今天連夜要把廣場上的舞臺加大，要鬥得像個樣子。」從他們的話裏，可以知道一場更兇殘的武鬥明天就要來了。

本來，我對生死根本就無所謂了。但二十四日下午一個人躺在地板上，思緒萬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現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犧牲品。我要爭取活著，祇有活下去才能同他們鬥爭到底！」爲了活著，當即採取了兩個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總、周總理求救；二是爭取晚上回家一趟，設法搞點防身的用品。

當時，我是由總後保衛隊的戰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從外面回來時，看管我的戰士回去吃飯了，他看到祇有我一個在房子裏，以爲保

衛隊把人撤了。於是，他們立即打電話到總後保衛隊，要派人來值班。保衛隊的人真是聰明，他們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衛員蔣平安，我告訴小蔣，我要給毛主席寫信，小蔣很機靈，他在樓道裏轉了一會，找來一個大前門的煙盒和一個鉛筆頭。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動彈了，左手還勉強可以動一點，於是，我用左手給毛、林、周寫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內容大意是：「每天對我武鬥。明天死活難測，請救我一命，我會同過去一樣，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寫好之後，小蔣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夾層裏，他回去換班時，跑到我家裏把信交給我的炊事員劉玉勝。劉在解放戰爭中就是我的炊事員，我們有幾十年的革命友誼，他立即把信交給我的兩個小兒子光光和毛毛並叮囑他們把信轉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裏去了。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並被霸佔，成了「全軍批判彭、黃、賀、羅造反聯絡站」的辦公室。胡敏被趕到通信兵去了，她當時是通信兵衛生處處長。通信兵與總後是一牆一路之隔，總後武鬥現場的大喇叭不斷傳出揪鬥我的情況，胡敏心急如焚，不斷到處打電話求救。當時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後勤的郭政委，軍委一號臺的同志們，還有胡敏的兩個助理員，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幫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電話到楊成武處，他知道我和楊關係很好，但趙志珍接了電話給推了。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楊還沒有聽到毛、林、周的聲音，在那樣混亂的情況下，說錯一句話就可能導致自己的垮臺。胡敏祇得把電話打到葉帥處，值班秘書很負責、很著急，叫胡敏不要放電話，立即用另一部電話找葉帥，但一時聯繫不上。胡敏又打電話到京西賓館的黃永勝處，警衛員說：「首長在上廁所，請等一會再打。」黃聽到後，沒有上完廁所就跑出來接電話，胡敏說：「能不能請黃司令給徐帥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裏鬥。」黃說：「徐那裏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講通。你不要急，我馬上想辦法找到葉帥，並親自到葉帥那裏去。」黃果然找到了葉帥，葉帥當機立斷，一方面命令衛戍區準備搶人，同時火速到毛家灣向林總報告。此時，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說來也巧，我的信到時，胡敏剛好要通了林辦的電話，林辦秘書郭連凱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說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這樣我的信送給林彪辦公室了。

葉帥到了毛家灣向林彪一報告，林大為震怒，立即說：「備車，我要去接邱會作！」葉帥和葉群一聽就急了，好生相勸。葉群馬上要通了總

理，總理甚為著急，他說：「我正在大會堂接見群眾，等到會完了就誤事了。我讓伯達同志立即趕到毛家灣。」周總理在大會堂就立即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我是保邱會作的！」總理心裏就更有底了。

陳伯達到毛家灣後，林對陳說：「你是文革組長，對群眾有說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會作！」陳可能是第一次見到林彪下命令的樣子，有些緊張，馬上用紅藍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立即放出邱會作，陳伯達。」葉群拿著陳伯達的手令，火速趕往總後大院的武鬥現場。葉群正在途中，葉帥派去救我的衛戍區指戰員早就趕到了總後機關偵察情況，準備搶人。

零點得救

爲了應對更大的武鬥，我要求回家去了一趟，擦擦有血跡的身子。晚上警衛員扶我回到家裏，令我慘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全家的東西被搶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佔了。全家的人，兩個小男孩光光和毛毛由老炊事員帶著躲在灶房，小女兒被老戰友接走了。我看到家裏這種情況，更加鼓起了我的鬥爭勇氣，我決心爭取活下去。爲此，我要阿姨用小孩的舊棉褲給我做了兩個厚的護膝，還增穿了棉衣。這是爲了保護心臟和膝蓋骨所採取的措施。我臨走時，兩個小男孩躲在灶房裏跑出來，叫我爸爸，造反派擋住不讓我們父子相見，我也祇有忍心走了。

我回到衛生部三樓之後，盡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動，爭取睡好，以應付明天的苦難。在我睡得尚好的時候，有人用急促的聲音把我叫醒了，並說：「快起來，有急事。」

「到哪裏去？現在就去批鬥場嗎？」

「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接你來了！」

當我聽到毛主席、林總派人來接我這句話時，十分驚喜。我當時走路已經很困難了，是衛戍區兩三個戰士把我由三樓背下去的。當時，在一邊扶著我下樓的戰士很激動地對我說：「我們奉葉副主席的命令，在這裏幾天了，是在這裏保護你的。」我祇有向他們點頭致謝！我上了汽車之後，先是順著太平路一直向西走，兜了個圈子，再向東把我送到翠微路五號院去了。

到了五號院之後，葉群已經在那裏等候，葉群向我宣佈：「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陳伯達組長、葉劍英副主席的命令來搶救你的。現在，我完成了光榮的任務！」葉群又說：「這是楊代總長暫時住的地方，你現在就在這裏休息。你以後到什麼地方去，葉副主席已有安排。」我祇有點頭致謝，心裏感激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不久，衛戍區的幹部和總參管理局嚴俊政委的夫人丁超到通信兵把胡敏和我的大兒子路光接來了；緊接著路光又帶著衛戍區的幹部及幾個戰士偷偷摸到總後保衛隊把冒著危險給我送信的警衛員小蔣也接了出來。

二十五日上午，楊成武夫婦到我的住處來看我。楊成武在樓下就「老邱呀！老邱呀！」喊我的名字，我身子動不了，我躺在床上也激動的喊：「老楊呀，我在這裏。」他們上樓後，楊撲到我的面前，抱著我邊哭邊說：「老邱呀，我們來晚了，你受了大罪。」我向楊指著我的傷，並指著我被剃的陰陽頭，楊氣憤地說：「一群暴徒，一群暴徒！！」他們為我流下了滿腔的熱淚，向我表示了真實的感情，我是永遠感激的，永遠不會忘記的！

晚上，葉副主席派身邊的工作人員杜海舟科長帶了三輛汽車來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 21 號。我們的車還沒有到，葉副主席、聶副主席和西山的工作人員，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當把我由車上抬下來之後，有的工作人員哇哇地哭起來。葉帥摸著我的手（傷勢過重，不敢拉手）向我慰問，一直把我送到床邊。聶帥一個勁罵造反派：「法西斯！法西斯！這就是法西斯！」這是革命家庭的溫暖，這是首長對下級的愛護！這也是長者對晚輩的關心。

二十六日下午，劉伯承副主席、汪大姐來看我。劉帥的眼睛不好使了，祇能聽我講和用手摸我的全身。當摸到我身上的受傷處我有反應時，他把手勢放輕，並邊摸邊說：「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毛主席察覺到了問題，斷然派人去搶救你。這既是對你的關心，也是對部隊幹部的關心。」接著，蕭華、劉志堅、黃永勝、陳錫聯和正在葉副主席處開會的各軍區、各軍兵種首長都來看我了。

二十七日，葉帥親自叫來了軍事科學院門診部主任、醫生、護士給我治病並親自主持議定對我的治療方案。葉副主席自己用的一點人參、三七藥也給我用了。以後，葉帥幾乎每天早晚都要來看我一次，有時來幾次。我被打得傷殘，是在葉副主席的關心之下，得到了及時治療的。

更為可貴的是，葉帥每天都會向我傳達中央的一些時政消息，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安慰。

毛主席、林總、周總理、葉帥救了我一命，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救命之恩的！

全軍文革支持三座門靜坐

一九六七年年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我被接走，對造反派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打擊。如果說，一月十九日下午，全軍文革給我下命令，是用突然襲擊的手段給革命群眾一個嚴重的打擊，那麼，時隔不到一個星期我被搶救走，也是用突然襲擊給造反派以及支持他們的全軍文革一個嚴重的打擊。全軍文革組長下命令，天塌了；邱會作被搶救，天晴了。在新的形勢下，這幫造反派恐慌萬丈，預感到末日的來臨。

我被救出後，李曼村嚇唬錢信莎說：「你們把邱會作幾乎打死，他要是保下來，你們就真正犯了大法。」「紅縱」認為李曼村言之有理，祇有一不做二不休，再一次拚命把我拉下馬。

一月二十七日起，二醫大「紅縱」在三座門製造了震驚中外的「靜坐」事件。這是一次同毛主席、黨中央相對抗的事件！把文化革命醜化到了不能再醜化的程度！

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把我搶救出去的當天晚上，徐向前在京西賓館禮堂一樓會議室，接見了「紅縱」召集來的總後系統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這次接見，全軍文革再次不惜犧牲老幹部，倒向造反派一邊去了。

錢信莎：「徐帥，你不是支持批鬥邱會作嗎，為什麼又要保邱會作？」徐向前不說話。

錢信莎：「請你說一下，保邱會作的理由是什麼？」

徐向前：「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錢信莎：「我們要求徐帥再次下命令把邱會作交回給我們繼續批鬥。」

徐向前：「你們不是有『四大』的權力嗎？要批判誰都是可以的，至於我再次下命令就沒有人執行囉！」他不久就藉故身體不舒服，就宣佈接見結束了。

造反派正在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時候，一月二十五日晚，全軍文革派人同機關「造反總部」、二醫大「紅縱」、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在

總後禮堂化妝室開了一個秘密緊急會議。會議的中心問題是：毛主席保了邱會作，造反派怎樣辦？李曼村首先說：「徐帥是支持你們的，這點你們聽懂了。現在你們要考慮的是怎麼樣達到你們的目的。」

錢信莎說：「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保邱會作，這就難辦了。」李曼村說：「辦法還是有的，你們可以在機關搞簽名運動，在三座門全軍文革門口組織靜坐。這些辦法，都是表示群眾的意願和力量。毛主席是最相信群眾的。」「紅縱」完全接受指示，立即照辦。

三座門靜坐是全軍文革一手策劃的，參加靜坐的人數多達幾千餘人。靜坐「前線」的總頭目是二醫大「紅縱」錢信莎等人，後勤學院「星火燎原」管對外聯絡，機關「造反總部」負責全部的支援保障工作。歷時二十多天的靜坐，耗費了大量的資財。造反派從上至下對靜坐是全力以赴的，機關造反總部成了支援靜坐的「後勤部」，在領導幹部中，李耀副政委對靜坐的造反派給了極大的精神支援，他們每天要去慰問一次前線的「戰士」。

三座門是在一個三岔路口上，靜坐的造反派就在路邊安營紮寨，嚴重妨害了交通，造反派還把大標語刷在故宮的牆上，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群眾都說「解放軍鬧起來比老百姓厲害多了，還讓我們學習解放軍呢！」錢信莎他們靜坐的目的就是讓徐帥再一次把我交給「紅縱」。

周總理、葉帥密切注意三座門靜坐。在靜坐四、五天之後的一次中央碰頭會上，葉帥提出了用衛戍區部隊強行解決，陳伯達不同意。毛主席最後說：「讓他們鬧去吧，三座門鬧跨了，再蓋一座就是了。」

在實在鬧得不像話的時候，徐帥和陳伯達再次接見造反派時，都不同意他們的做法。陳伯達的話當時是管用的，造反派由三座門灰溜溜地撤走了。回來之後，就轉入地下活動，垂死掙扎。

周總理送我回總後

我被搶救出來後一直在西山養傷，我的肋骨被踢斷了，肝部被踢腫了，牙被打鬆了三顆，兩臂的韌帶都被撕裂了，鼻青臉腫、被剃陰陽頭就更不在話下了。由於總後的具體事情多，在那麼混亂的情況下，不少事情其他領導不敢做主，如總理辦公室間到的一些外援情況他們也不太瞭解，很多事情又轉到我這裏，我是躺在床上處理的。經過一個多月的

治療，我能下床了，但雙臂還抬不起來，有時總理來電話都是警衛員拿著話筒，我對著話筒講。

有一天，葉帥對我講：「主席非常重視外援工作，很多情況都在你腦子裏，你再休養一段時間能不能堅持工作？」我毫不含糊地說：「現在讓我回去，我也堅決執行命令。」葉帥聽了很高興。不久，由葉帥主持，總後團以上幹部在京西賓館開會，為我回總後工作創造條件，聶帥、蕭華、楊成武、葉群等人都參加了，他們都發表了講話，表明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對我的看法。聶帥說得更具體，他要求「科級幹部要找兩個人談話，處以上幹部要找三個人談話，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保護邱會作同志的指示認真落實，確保邱會作同志能順利回總後主持工作。」林總、葉帥、聶帥對我的關心我是永遠銘記在心的。

我當時雖然傷勢還較重，胳膊還吊著繩帶，但因工作需要，我即奉命回總後主持工作。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總理打電話讓我先到釣魚臺集合，到了釣魚臺，江青在那裏，那時我還沒有和江青面對面說過話，總理看見我的手，忙對江青說：「邱會作同志手還抬不起來，沒有辦法給你敬禮呀，你能參加今天的大會，大家都很高興！」說完周總理一行就前往總後禮堂。

周恩來、葉劍英、江青、蕭華、楊成武等出席了大會。總理在後臺休息室對大家說：「總後像個小國務院，邱會作同志幫我做了不少事情。」臨開會前，總理看見我還吊著繩帶，就對我說：「會作同志，您能不能把身上的吊帶取下來，我們也要展現革命者的風采嘛！」總理說完，我立即叫警衛員把掛在脖子上的吊帶取了下來。大會一開始是葉帥主持的，然後葉帥突然對我說，這個大會還是由邱會作同志來主持，這時總理帶頭鼓掌，全場也鼓掌。我非常激動，沒有講什麼，就即請總理講話。周總理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講話。總理說：

同志們！首先，讓我代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你們問好！

因為今天是你們的部長邱會作同志身體的健康在開始恢復的時候，回來主持工作，我們借這個機會講幾句話。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風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們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這場大風浪中，要學會鬥爭。當然，我們的矛頭是對準我們黨政領導機關和其他的單位中間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是要徹底批判在過去一個時期內執行過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些人，這樣來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更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來進行這樣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解放軍中進行這個鬥爭當中，我們每個解放軍指戰員同志們，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們既要參加這個鬥爭，成為革命的一分子，同時又要把自己做為革命的對象，就是要去掉我們思想中的一些私字。……實際上在大風浪中，有時我們這些負責同志，即使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說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經過一些風浪，這也是考驗我們。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你們的部長，我們的戰友邱會作同志，是經住了這次考驗的。

我們要識別幹部嘛，不僅要看幹部的一個時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個歷史。在這個階級鬥爭中，我們要區別兩類矛盾嘛！究竟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是資產階級當權派，還是執行了一個時期的錯誤路線，或者是其他的嚴重錯誤，要區別這個矛盾嘛。同時，要看我們幹部的整個歷史，不要看一個時候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許多革命的小將，在中央和中央軍委十月五號緊急指示的號召下，起來在解放軍內部來鬧革命，特別是軍事院校，後勤工廠，醫院，以至文藝隊伍，實行大串連，允許他們到北京來，除了接受我們偉大的領袖接見以外，自然他們也要到我們解放軍各個地方看看。後勤所管的軍事學院、醫院、工廠、文藝部隊，他們也要到後勤大院來看一看嘛。所以你們這裏住滿了人，就鬧了一場大的風波。……這樣，當然你們後勤大院最高的負責同志——邱會作同志，他就要首先變成了一個鬥爭的目標了。……這些小將們他也不清楚整個歷史，也沒有辨別兩類矛盾，有的就做得有些過了。但是呢，我們負責的人、指導全軍的人，應該站出來給他們解釋。……現在，許多院校回去了，他們

自己整風，就會把兩類矛盾，一個領導的整個全面地來觀察，他們就會得出應該得出的結論。毛主席號召每個人要獨立思考嘛，在鬥爭中是站在哪一邊？是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是挺身而出，敢於指出別人的錯誤，也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敢於向小將們講清道理，幫助他們，還是不管是非，就那麼隨便地煽風點火？那麼我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煽風點火的，比如說，煽社會主義之風嘛，點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這是必要的，也是對的，但是，也不要在有些時候去煽陰風，點陰火，那就不許可了。這都是考驗，這場鬥爭考驗每一個人。……這就要求我們總後系統的後勤部門工作人員要繼續學習，繼續參加這個鬥爭。我相信，邱會作同志健康開始恢復，重新來領導我們後勤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因為他有了經驗嘛！

我曾經說過，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蘇區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紅軍被迫地離開了老根據地，轉戰北上，集聚在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了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轉戰到西邊，所以那一陣子我們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基本上沒有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後勤，然後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解放戰爭，轉到東北，然後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後在林彪同志主持軍委的時候，他又來做總後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紅軍老戰士。這是他整個歷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沒有缺點，有可能在某些方面還有嚴重的缺點。所以，毛主席的學生，林副主席的戰友，不可能在我們一生中不犯錯誤，我就是一個嘛，也犯過

多次錯誤嘛！但是我有決心，有了錯誤，敢於正視錯誤，而且決心改正錯誤。不但是中年嘛，現在到了老年，我還是這樣想嘛。……不是說緊跟毛主席嗎？按照林彪同志的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好學生。我相信我們後勤的戰士，要學會這個精神，希望你們學會這個精神。同時，也希望邱會作同志現在又來領導我們後勤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我們長期的後勤工作，遠的不說了，就是我們解放以後，和平的十七年，後勤工作可以說，有三個時期，初期是剛開國，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個時候，我雖然做政府工作，幾乎也是大部分時間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別在後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個時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楊立三同志，恐怕是你們第一任的後勤部長，解放後不久，這位老戰友是病故了，他管後勤工作的那一段時期，在抗美援朝上是盡了很大力的，今天在座的還有跟他同事的嘛，這是我相當熟的那個三年多。後來，彭德懷從朝鮮回來了，他管國防部、軍委，那時任何人都不能過問的，主席的話他都不聽嘛，所以我們就沒接觸了。這個時期，先是黃克誠，後是洪學智，那時他們就是開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錢，要東西就是了。那是一個長時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會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軍委，那麼我們的關係又密切了，又協作了，可以說，凡是需要部隊支援的，祇要黨啊，政府啊一要求，他總是支援的，你們做後勤工作，都會感覺到，都會想的到嘛，支援了許多，所以這點，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後勤部長，是歷屆後勤部長最好的一位。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所以，在工作上也有個比較嘛。因為鑒定一個同志的全面工作，也還得跟別的比較，跟好的比較，跟壞的比較。對立面有個黃克誠，洪學智。那麼一樣好的，有楊立三同志，但是他超過楊立三同志，因為他時間長，楊立三同志時間短，成績也超過他，因為現在管的方面大，現在管的不僅僅是我們解放軍嘛，我們解放軍現在擴大的，已經包括許多工程部隊都進來了。現在，目前在奪權的階段，我們偉大領袖給我們解放軍的偉大任務，要我們

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農業，支持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等，實行軍管，實行軍訓，不僅對大、中學校實行軍訓，小學的高年級，乃至工廠企業事業單位，最後乃至機關都要實行。這個五大任務，非常的繁重，光榮，既光榮而又繁重，在這個上頭，後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後勤工作在邱會作同志領導下，學主席的著作，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是高的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給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為後勤提出來的報告得到稱讚的嘛，得到推廣的嘛！現在的五大任務，確確實實是要使我們的軍隊從各方面去接觸人民，更進一步地跟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所以這樣的工作，對於我們解放軍來說是光榮的，對後勤工作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現在可以說，應該是我們後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開始。我的話完了。

正確對待造反派

總理講話之後，總後的形勢很快就轉過來了，治理整頓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總後黨委始終是堅決反對造反派，尤其是全軍文革御用的造反派，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取得了一個一個的勝利，由於文化革命的複雜情況，在鬥爭中也有失誤的地方。在當時極「左」的思潮影響下，有些人和事搞過了，對於領導責任，我全部擔當。再有，例如對造反派借刀殺人這個問題，我就發現的晚了，上了造反派的當。

我們對造反派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把多數人都爭取過來了。總後機關亂的程度是全軍的典型，但造反派受到處理的人數並不多。出現這種好的情況，最基本的就是執行了黨的政策，為了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對執行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措施。例如，在機關我釘了四個不能打倒的「界樁」。這就是：丁力（大同辦事處政委），羅文（運輸部部長），保衛部一個幹事（機關造反總部一號頭子），衛生部一個統計員（造反派骨幹，專門喊口號的），這四個人很有代表性。丁力在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同大家一樣，有某些錯誤，但後來轉變了，並且一直工作很好。羅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站在黨委的一邊，我對他一直很欣賞，在文化大革命中，開始很好，並成為二醫大「紅縱」要打倒的十個人之一。這十個人：五塊字漢通印制

邱會作，張池明，饒正錫，楊恬、王希克，羅文，陳龐，陳念棣，王用久，王佐邦），但在關鍵時刻，即在全軍文革組長下命令之後，說了一些錯話，幹部群眾對他有意見，我也沒有把握住，沒有再重用他，現在看來是很遺憾的事。其餘兩個人都是「五大部長」利用的人了。軍事醫學科學院造反派頭子（該院三所一個技術員），也是因我保護而沒有被打倒。用具體的政策指導鬥爭，產生了極好的效果，造反派的大多數轉變了。

湯平是總後副部長，是紅軍老幹部，我們在長征中就見過面，在延安就熟悉了，相互關係一直比較好。五九年，我當了總後部長，湯平當時是財務部長。他對我當部長很高興，對我寄予希望也很尊敬。他對我說：「你老兄當我們的部長，很合適，後勤建設大有希望！」中央軍委真正用人唯賢，希望你大展宏圖，取得成功！」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湯平對我是很合作很支持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湯平主動提出：「我是地主出身，解放後我回家時又犯過立場的錯誤，我的錯誤總政還未給我做結論（現在看來也不算什麼問題）。今後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常委會，我就不參加了吧。」常委同意了湯平的意見。二醫大「紅縱」在總後鬧事時，全軍文革組長對我下了命令，他的秘書張彬建議他立即向造反派表態，這樣，湯平就被迫對造反派表態了。毛主席、林總、周總理保了我，總後的形勢又變了。湯平很懊悔，我也確定要保他，因為他一直是一個業務幹部，思想水平比較高，雖然在總後領導幹部中年紀是最大的，但工作始終很積極。那個時候，站隊的問題看得很重，很難擺平，我自己也沒有堅持。

六七年下半年總後機關開展大批判，財務部對湯平進行重點批判。批判進行了幾個月都很正常，湯自己也做了檢討。在批判將要結束時，湯平的秘書張彬起來「反戈一擊」，揭發了湯平的三反言行。張彬把他們平時談話的內容，如毛主席整三軍團和彭德懷、整劉少奇等都用大字報貼出來了，這在當時對湯平來說是引爆了一顆原子彈。當我知道此事時，曾立即交代文辦要注意張彬是否有什麼「奧妙」。文辦還沒有來得及做工作，湯平就先看到了張彬的大字報，一回到辦公室就跳樓自殺了。事後，我已經指出了，湯平是死在張彬之手的，他是借刀殺人的。不過，一個老幹部和自己的秘書扯亂談，應該是兇多吉少的。正好張彬要

反戈一擊找出路。對於湯平的死，我一直很難過，因為我當時是有能力有條件保他的。但這和加在我頭上的罪行完全是兩回事。

六七年冬，毛主席發出了：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群眾和正確對待反對過自己，又證明反對錯了的人。這「三個」正確對待，事實上就是怎樣對待造反派的方針。

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就軍隊來說，造反派又是在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直接指揮下搞起來的。造反派骨幹分子是少數，極大多數是跟著趕時髦的，也有不少是受蒙蔽的。總後是在全軍文革直接指揮下，由二醫大「紅縱」，機關「造反總部」，後勤學院「星火燎原」搞亂的，是全軍大亂的典型。這三個造反派合起來有千餘人，對他們總的是教育問題，不是打擊的問題。人們似乎會這樣想：既然三個造反派把總後搞的成爲全軍大亂的典型，那麼，他們大多數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的。其實，對他們處理，受到了紀律處分的，包括處理錯了的，爲數是不多的。後來公審時的起訴書真是造了無數的謠言，鄧小平這些人爲了政治需要，是需要謠言的。他們一方面整肅反對過他們的「三種人」，同時又撈起反對我們的「三種人」作爲工具來打擊我們。

錢信莎、陳政、王述臣、申茂興等人是總後系統十分典型的造反分子。

一、錢信莎。她是軍隊第一個造反派頭子。她的罪行不僅搞亂了總後機關，二醫大，後勤學院，軍事醫學科學院等單位，而且也是「鬥羅籌備處」的頭子，武鬥羅瑞卿、彭德懷、黃克誠、廖漢生、劉震、成鈞、劉志堅、李聚奎等人的兇手。她是軍隊造反派罪行最大的頭子之一。

對錢信莎這樣罪大惡極的造反派頭子，我們對她一直是進行教育改造，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兩三年的時間裏，都沒有對她進行處理，在學校學生分配時，並沒有讓她脫軍裝，錢信莎是正常分配的並且是分到總後直屬的青藏辦事處工作的。

錢信莎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搶，搞武鬥，殘酷迫害老幹部，他對自己的罪行認識態度不好，她說是按照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號召幹的，是按照全軍文革的指示辦的。在全國在清查「五一六」時，才對她隔離審查。

二、陳政。他是東北遼寧南部金縣人。日本投降前，他在醫學院學醫，後來分配在總後系統工作，長期任總後政治部幹部部幹事。

東北解放後，發現日本投降的時候在遼南地區潛伏了一個很大的特務網，公安部認定陳政是該特務系統的中層骨幹分子。公安部將該案件列為重點案件，陳政即定為重點監察對象。一九五九年，我當總後部長之後不久，保衛部向我匯報工作時，他們詳細匯報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總醫院、幹部部三個特殊的偵察案件。後來，我考慮到在總後機關內部留下一個大的偵察案件，是很不妥當的，最容易洩露軍事機密，我提出了要調動陳政工作。保衛部又向我報告說：「陳政是一個大的重點案件中的重點監察對象，公安部要求對涉案人員，原來在哪裏工作就在那裏工作，動一個就容易牽動整個案子」。因此，對陳政不能提拔，也不能調動，祇有長期在幹部部工作，並且是總後機關內參謀、幹事、助理員中唯一的團級幹事。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陳政就同二醫大「紅縱」秘密勾結上了，成為總後機關最早的造反分子。後來，又是「五大部長」的主要「軍師」，他對搞亂總後機關，是犯了嚴重罪行的。這樣的老特嫌分子，新造反分子，是堅決反對共產黨反對新中國的，他們趁文革之亂搞翻天的勾當，應當受到法律制裁。一九六七年四月間由總後常委提出報告，經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批准，並由衛戍區執行逮捕法辦了。陳政逮捕法辦是應該的。

三、張錦昌。張錦昌是總後營房部的助理員，是個「不平凡」的小人物，因為他是總後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參加過營房部一次學習會，聽到他在會上發過一次言。他說：「從各地的情況來看，這次文化大革命同過去的政治運動基本不同的就是：過去是上面整下面，現在是下面整上面。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是革修正主義的命，而修正主義又是發生在上面，不在下面。我們掌握矛頭對上的大方向就行了。」

張錦昌是言行一致的。二醫大「紅縱」一開始在總後鬧事，就發現了張是可靠的盟友，他們就密切合作了，後來並成為「五大部長」的「張軍師」。砸總後黨委辦公室，搶總後保密室，抄我的家，張錦昌都是先鋒。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被林總、葉帥搶救出來以後，張錦昌積極

參加組織三座門靜坐，到全軍文革接待站要挾中央軍委。在三座門名爲靜坐，實爲要賴，當時，全軍文革接待站從部隊調來了一批工作人員，觀點已經全部變了，他們根本不正式接待所謂「靜坐」的人，並且還用諷刺的語言進行了批評。張錦昌等人在三座門接待站，前後大概混了二十多天，熬不下去了就自己散伙了。

三座門靜坐失敗之後，張錦昌在造反派的骨幹會議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看來三座門靜坐是盲目的行動注定要失敗的。形勢變了，我們的鬥爭方式卻沒有變，我們過去對邱的認識太不夠了，全軍文革親自出馬都沒有打倒邱會作。現在看清楚了，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元帥們確保的人物。我們對邱的鬥爭不能就此結束，反而要在鬥爭中求生存。我們的政策可歸結爲四個字：『明擁暗鬥』。這就是說，明的不要再去惹邱會作了，但暗的還要鬥，否則我們就會被全部『吃掉』。」現在，我還能記得張錦昌帶著幾個殘餘的造反派幹得幾件事。

第一，衝擊會場。六七年五月初，陸海空三軍在總後大院廣場舉行大會，參加會議的群眾三萬餘人，各總部、各軍種、兵種、院校的領導幹部出席了大會。

大會臨要開始時，由於大會工作人員很忙，工作有疏忽，致使張景昌帶著總後機關的造反派一共十幾人，打著一面旗幟混進了會場才被發現的。文辦向我請示處理辦法我即命令：「收繳大旗，人員聽便。」爲了防止造反派藉機搗亂會場，大會工作人員強行收走了旗子，並宣佈參加會議可以隨便。造反派是不識時務的，他們在退出會場之前企圖鬧一場。總後文辦是預先有準備的，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拉到會場外進行說服教育工作，接著就有一半的人覺悟了，公開聲明退出「造反總部」，並反戈一擊。

第二，抵制發毛主席像章。六七年冬，人民解放軍製作了一枚全軍統一的毛主席像章，並規定在發放的時候，各單位都要舉行簡單的儀式，借此在全軍進行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育。營房部發像章時，本來進行得很好，但在佩戴像章時，沒有舉行集體向毛主席致敬的儀式，張錦昌立即在現場發動了一場搗亂。他說：「在佩戴像章之前，不向毛主席致敬，就失去了儀式的意義。在我們這裏擁護毛主席的口號喊的很

響，事實上不是那回事。今天應當停止發像章，改天重新舉行儀式。」他的意見雖然沒有得到什麼人的響應，但會場上起哄了一陣。

營房部主持會議的人是有水平的。他立即宣傳：「張批評在佩戴像章之前，沒有舉行向毛主席致敬，是禮節不周到。現在，大家都不許動，我們來補上這一課。」張景昌等人看到搞亂是不成了，就灰溜溜地走了。

張錦昌等人正在溜走的時候，主持會議的人又立即宣傳：「張錦昌等人拒絕接受像章，現在隨隨便便走了，至少是無組織無紀律。他們口頭上喊著擁護毛主席，事實上連像章都不要，這是什麼問題，大家都應當看清楚的。」造反派又吃了一次敗仗。

第三、抵制夜間巡邏。為了保障軍隊各機關的正常工作，軍委命令各機關都要組織糾察巡邏，確保機關安全，限制造反派的活動，各機關還加強了夜間巡邏制度，楊成武還專門指出總後要特別加強力量。造反派對此十分惱火，極力進行抵制和破壞。張錦昌等人發動營房部很少幾個人在司令部門口靜坐，抗議夜巡。我們還是做說服工作，等到祇剩下張景昌一個光桿司令時，嚇得他也跑掉了。

公審時，張錦昌還去控訴我，公審的實質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王述臣。王述臣是後勤學院油料教研室的教員。他有嚴重的歷史問題，當過敵偽警長，有民債，與血債案有牽連。王對共產黨充滿仇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是一個堅決造反分子並決心要奪取後勤學院的領導權。王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後勤學院「星火燎原」的頭目之一。當時中央有個《公安六條》，王述臣這樣的人屬於「祇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階級異己分子。但王述臣按捺不住對共產黨的仇恨，趁文革混亂之際，大幹反革命勾當，這和青年學生造反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全軍文革組織造反派幫助搜捕內蒙古軍區來京潰散的警衛營時，王述臣藉機毒打警衛營戰士多人，並且還參與打死過人，王述臣又有了新的血債。

六七年一月下旬，「紅縱」正在總後禮堂對我進行殘酷武鬥的同時，「星火燎原」在該院東院的小山（黨委會議室）召開了「形勢分析」會議，「星火燎原」的主要骨幹分子十五人到了會，會議主要內容是通過決議，同意二醫大「紅縱」提出打倒邱會作的提議。在討論中他們發表了大量的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按照中央的《公安六條》，

屬現行反革命行爲。六七年冬「星火燎原」內部把會議全部內容揭露了，並交出了會議紀錄。為了把責任全部推到王述臣身上，「星火」的「高參」小組，策劃了致死王述臣的陰謀，王述臣在隔離審查時，自知罪責難逃，他給老婆寫條子，讓他老婆在飯裏放毒藥，兩人同時自殺，他老婆照辦了，毒死了王述臣，但他老婆沒有吃。王述臣不是自殺的，是他的同夥，經過他老婆毒死的。事發後，我的秘書到了三〇一醫院現場，解剖時看見王的腸胃已經燒爛了。公審之後當時的軍委還追認王述臣為烈士，這也是奇跡。

為了搞清王述臣的問題，對他進行隔離審查是必要的。定為壞分子也是正確的。但對王的處理中涉及的面過寬了，搞了一個五人的反革命集團，這就擴大化了。七〇年秋在複查後勤學院的案件時，我發覺了問題，應予糾正，但沒有來得及處理這個問題，我就倒臺了。

五、申茂興。申茂興是總後政治部文化部俱樂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是造反的積極分子。二醫大「紅縱」上訪隊住在總後機關內時，申就是最先與「紅縱」秘密聯繫的人之一，自始至終都是堅決主張造反的。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之後，「五大部長」把準備武鬥邱會作及其「一夥」的任務交給了申茂興。六八年初，申被隔離審查時，政治部的造反派對申茂興連續毒打，並逼他自殺，名為反戈一擊，實為殺人滅口。申就是在毒打之後絕望而自殺死去的。

此外，文化大革命中，軍隊的工作都是按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辦的，總後的工作也是這樣。如三支兩軍、進「五七」幹校和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等等，這些工作必然涉及到幹部調動和處理。這些工作，不是對造反派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所有人的問題。公審時說成是迫害，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有責無罪」的。這就是說，從領導責任來說，在總後死了人，不管是怎樣死的，我都負有領導責任。當然，我不僅沒有直接害死過任何人，也沒有授意過要整死任何人。比如說，我對李曼村是很痛恨的，但他是一個領導幹部，又沒有叛徒問題，也只能一般處理了。現在想起來，死人問題有當時文革混亂的實際情況，但從領導的責任來說，這樣看是很不夠的，如果我當時清楚地發覺了造反派新的破壞手段，我是有條件，有能力保護任何人不致被整死的。

去「五七」幹校鍛煉，當時是幹部教育制度，每個幹部都必須執行的。總後在寧夏賀蘭山建立了一座幹校，在校鍛煉的幹部千餘人。幹校學習的有兩種辦法：離職學習和在職輪訓。在機關整編之後，幹部多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這些幹部，除了參加三支兩軍工作之外，祇有到幹校學習。無論哪一派的人都要去學習，祇有先後不同之分。從比例上來說，造反派去學習的人當然多一些的。我們不能把擁護總後黨委和領導幹部的人都搞到幹校去，把反對總後黨委和領導幹部的人留在機關工作吧。當時，各單位都辦了幹校，中央辦公廳都辦了幹校，總後不可能不辦幹校。毛主席的女兒都上了幹校，其他人沒有理由不上幹校。對於上幹校，誰去誰有意見，上幹校離開北京，到了基層生活條件苦多了，尤其是家屬的工作難安排，子女上學有不少困難，這都是事實，但這不是總後一家子的問題，是整個中央的決策問題，這也說成迫害不是實事求是的。上幹校比後來鄧小平清理「三種人」應該是好多了。復員轉業也是全軍一致的行動，並非專門整造反派的。犯了錯誤作復轉處理的幹部當然有，部隊歷來也是這樣。

對投降造反派的老幹部問題，我向來最痛恨三種人：黨內鬥爭的兩面派，對敵鬥爭的叛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投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領導班子和老幹部隊伍中發生分化，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痛恨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還一定要犯錯誤。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對總後一批投降造反派的領導幹部的處理持慎重態度。對他們的處理也是寬大的。這裏我祇著重說一下對饒正錫的處理。

一九五九年我擔任總後部長，饒是總後副部長。他對我的工作，是支持的，我們的工作關係是比較好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提議他為總後文化大革命小組組長。我們兩個都是二醫大在「紅縱」反對的對象。一九六六年冬天，全軍文革通過「紅縱」向他傳達了什麼人的「意圖」之後，他的態度變了，投到「紅縱」一邊去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談賀龍的問題時，順便點了「李聚奎，饒正錫是彭、黃漏網分子」。軍委常委會是在大會堂四川廳舉行的，記錄是蕭華的辦公室主任鄭漢濤、軍委辦公廳秘書處長陳某（名字記不起了）。會議開始時，由林彪自己主持，並傳達了

毛主席對賀龍問題的指示，後來由葉劍英主持進行了討論。元帥們發言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決策。

對李聚奎，饒正錫的問題，我在總後黨委會上並沒有正式傳達，祇是向常委們分別談了一下，我也同饒個別談了。並向他出了一些點子，一是要他寫一個表態的報告，通過葉帥轉給林彪；二是自己不要盲目去做檢討；三是要他辭去文革小組組長，省得惹事。我的意見他都同意了，並且照辦了。當時，饒正錫對自己的問題，表現得很緊張，我給他出的點子，他也表示感謝。

饒正錫寫給葉轉林的信，是我修改的，由當時的秘書科長劉明璞（饒原來的秘書）抄寫，他自己簽名上送的。葉帥收到信之後，曾經同我說過「饒的態度是好的。你對他的保護和幫助是同志式的。他的信，現在壓在我這，等適當的時候，我帶著他的信去向林當面說一下。現在不是解決問題的時候，你轉告饒不要過於緊張……」葉的指示，我原原本本向饒說了。

第二十六章 軍委辦事組成立前後

「五一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上，後勤學院「星火燎原」以「向邱部長提問」為題，向我提出了「十四問」，大喇叭連續廣播了十餘次，他們所問的中心內容是問我為什麼要打擊造反派。他們說：我們造反派是堅決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是革命的大方向，你為什麼不支持？這難道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嗎？！

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造反派，在該院政治部副主任鄭洪泰的策劃下糾集了軍隊科技戰線造反聯絡站的千餘人，衝進了總後機關，以辯論為名，把總後勤部政委張池明抓走了。張池明被抓走後，我去向蕭華報告了情況並求救。蕭華回答說：「我是泥菩薩正在過河，你是金菩薩，香得很，自己去辦吧。」

總後營房部和該部設計院的造反派，在助理員張景昌的策劃下，糾集了一百餘人，在總後司令部門口靜坐，他們提出的理由是營房部發毛主席像章時，沒有唱《東方紅》歌曲，也沒有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整個儀式都不莊重，要求營房部領導作出公開檢討。

軍委《八條命令》頒布後，軍內形勢有所好轉。對於軍隊造反派造反奪權、打砸搶，各領率機關的廣大幹部群眾是堅決反對的，為了各領率機關的正常有序地工作，也紛紛組織起來和造反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到了一九六七年初，空軍、海軍、總參、總後勤部及所屬的駐京機關、院校、文藝團體中的群眾組織，已經形成了旗幟鮮明的革命派，各領率機關的領導幹部，前一階段那種「造反派」動不動就要揪鬥，並非常兇殘地強迫低頭彎腰、揪頭髮、掛牌子的日子也熬過去了。

但是，「二月逆流」以後，軍隊的造反派又鬧騰起來了，造反派最囂張的是炮兵、軍藝、後勤學院，海軍、空軍、北京軍區文工團、二炮的文工團。他們幾乎同時對各單位的領導幹部搞揪鬥，對反對和制止他們破壞機關正常工作的同志搞武鬥，打傷了很多人。

雖然，這次與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到一九六七年初有所不同，各機關的黨委多數都有人管事了，但在毛主席號召造反的大勢下不是很堅強；機關的革命派對造反派也有了反擊的力量，但整個解放軍應該怎麼對待文化大革命並不明確，又要擁護毛主席，又要穩定軍隊，事情很難辦。總政的蕭華，全軍文革的徐帥都明顯支持造反派，同時全軍文革對造反派的行動也不像以前那樣指揮有力了，造反派在自己找出路，所以更具有破壞性。

當時，空政文工團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務，該團的演員劉素媛，有機會同毛主席說話，她把為慶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週年，在京的部隊各文工團想聯合演出的事對毛主席說了。毛對劉說：「你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辦」打招呼，把此事告訴葉群。

這件事葉群報告了林總，林總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一下就抓住了機會。什麼機會呢？林總和軍委不是通過發指示的方式，而是通過支持誰搞文藝演出的方式表明林總和軍委的態度，支持革命派，打擊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領率機關迅速穩定下來，從而使各大軍區及全軍部隊迅速穩定下來。這是林總的高棋，也是險棋，因為在文革中直接打擊造反派還是第一次。事後，葉群跟我們說過：「林總反覆掂量，主席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林總最後說：『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興。』林總抓住了這個機會，徹底扭轉了軍隊的局勢，為黨、國家、軍隊立了大功。這也是「五一三」能夠取勝的主客觀條件。

葉群馬上答應約見劉素媛等人。劉素媛說起她們想搞慶祝《講話》發表二十五週年的文藝演出，並表示要聯合各派共同演出。葉群明確表示不要聯合軍隊內搞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可以聯合北京軍區、海軍、二炮等其它軍兵種文工團的革命派組織共同演出。葉群說：「林彪同志和你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要怕當『老保』，祇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葉群還說：「軍隊和

地方不同，地方衝擊的是劉鄧司令部，軍隊衝擊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即使有壞人也不許亂衝擊。」葉群的話等於林總已經對軍隊的大局亮相了。

吳法憲、李作鵬和其他駐京機關的領導得知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奮。空軍、海軍、北京軍區和各兵種的主要負責人（當時稱「三軍黨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並成立了「三軍聯合演出委員會」。總後沒有文工團，因此「五一三」沒有參加進來。但我的態度和他們是一樣的。

造反派得知這一消息也不示弱，認為這是「老保翻天」，他們聯絡清華「井岡山」等地方造反派發表聲明：如果對方膽敢單方面搞演出，就要衝擊演出會場，砸爛會場。武鬥一觸即發，這一派以後被稱之為「衝派」。

蕭華聽說以後，感到問題嚴重，分別給兩派群眾組織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現在看來，也不能說蕭華就是錯，但林總的決心是軍隊不能存在造反派！蕭華抓了芝麻，林彪要的是西瓜。

演出的時間是五月十三日晚上，地點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海軍黨委事先開了會，決心一定要打勝這一仗，李作鵬、蕭勁光、張秀川還到了現場，空軍的余立金也到了現場，衛戍區的傅崇碧帶部隊也到了現場。造反派也不示弱，他們請來了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地方造反派，決心要與「老保」血戰到底。

演出開始不久，造反派就鬧事了，造反派衝擊會場，但全場秩序井然，根本無人理睬，臺上也還是照樣演出。待造反派衝進會場有上千人時，李作鵬才下命令實行反擊。反擊一開始，造反派就被革命派分割起來了，他們也無能力反抗了。革命派預先規定的政策界限是對被包圍起來的造反派，祇准文鬥，不准武鬥，更不許打人。革命派嚴格執行了政策。

造反派乘混亂的時候，有少數人鑽空出去了，叫來了千餘人的支援武鬥隊，造反派一來就亂打亂衝，但造反派到底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都被革命派擊退了。革命派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雙方受傷有幾十人，整個戰鬥經過了幾小時才結束。革命派勝利了！

當時，毛主席還是支持造反派的，還是相信造反派有力量的。展覽館「激戰」時，劉淑媛在毛主席處，她告訴主席說革命派勝利了，主席說：「你高興個屁！過一會造反派還會翻過來。」但毛主席是支持劉淑媛的，

幸好劉淑媛是個革命派，是擁護空軍黨委和吳法憲的。如果劉淑媛是個造反派，毛主席也會支持她，那軍隊的情況就會更複雜、更惡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確是一步險棋。

總理、陳伯達、蕭華、張秀川他們都在大會堂，當時他們同意兩派聯合演出已經是很了不起了，蕭華當時也是這個態度，現在看來，這個態度也是無可厚非的，蕭華擔心的是無論哪一派演出，另一派被拒之門外，發生武鬥是難免的。總理當時不知道主席的態度，也不知道林總的態度和林總要打擊軍隊造反派的用意，他還是根據蕭華的意見以聯合演出的態度，在大會堂給兩派頭頭做工作，造反派不依不饒一直在糾纏總理。當張秀川知道了林總的態度後，轉告了總理，總理很快就明白了，尤其是劉淑媛趕到人大會堂，告訴總理毛主席是支持他們的情況後，立即嚴厲制止造反派不要衝演出會場了。但大會堂亂哄哄的，總理的講話沒有什麼效果，總理立即站在椅子上，高喊：「不許衝演出會場，再衝就衝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造反派聽到這麼嚴重的話，除少數頑固分子外很快就散了。總理還立即叫陳伯達、蕭華趕往現場處理，走前總理對陳、蕭點撥地說：「這不是演出，是鬥爭。今後的工作反而好做了」。總理是太智慧了，他知道了主席和林總的態度後就立即轉向了，陳伯達和蕭華並沒有所悟，仍然批評三軍革命派不應演出，這樣就引起了三軍革命派的不滿。恰恰楊成武又抓到了蕭華這一點，蕭華的厄運很快就來到了。

五月十四日凌晨，周總理、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蕭華等分別在人大會堂和北京展覽館劇場接見了兩派代表，對「衝派」進行了嚴厲批評。以海軍「紅聯總」為中心的三軍革命派，十四日拂曉之前在北京全城張貼了無數的大字報，散發了大量的傳單。通過大字報、傳單等，對造反派衝擊演出的事實進行了徹底的揭露。十四日早上，三軍革命派數千人，以新北京（公主墳地區）為中心，在軍隊各機關進行遊行示威。接著又組織了規模浩大的摩托化遊行，走遍了全城。造反派在強大的攻勢面前，一點應對的辦法沒有。其實，軍隊的造反派祇要沒有全軍文革的支持，是不堪一擊的。

五月十六日，楊成武、葉群、吳法憲等人深入海、空軍總醫院、三〇四醫院慰問被造反派打傷的傷員，贈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語錄》，等於公開表明了態度。五月二十日以後，三軍演出隊在天安門前搭起了臨

時舞臺，進行了長時間的演出，每天觀眾很多。同時，演出隊還分別在各機關進行了演出。

六月九日晚，三軍演出隊，在人大會堂小禮堂演出。林總、周總理、中央碰頭會議成員、駐京三軍負責人都看了演出並上臺與演員合影。新華社發表了新聞，《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登載了首長接見的照片。這次演出，實際上成了三軍演出隊的祝捷大會！

從「五一三」事件之後，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內，除軍事博物館的造反派和後勤學院造反派「星火燎原」兩個「白色保壘」之外，各機關的造反派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紛紛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數骨幹分子轉入地下活動以外，公開的活動基本上不存在了。各級黨委對文化大革命能夠實施領導了。

軍博、後勤學院兩個造反派是垮臺最晚的。軍博造反派百餘人，據守展覽館大樓為中心搞了堅固的設防，革命派要給予摧毀，我代表軍委辦事組沒有同意。我認為他們不會長期存在下去。一九六八年五月間，軍博造反派自己宣佈垮臺。然後，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小禮堂接見了軍博兩派全體人員，黃永勝還向他們發表了講話，對軍博造反派，包括館長在內，一個人也沒有抓，而是在對等的條件下使兩派聯合起來了。

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幾十人據守學員宿舍樓，苟延殘喘的時間就更長，到一九六八年的九月才垮臺。這是因為軍博有部隊守衛，各院校、機關的造反派分子同他們的聯繫受到限制。後勤學院「星火燎原」佔據的宿舍樓則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外面同他們聯繫的人多得很。總後文辦對搞掉「星火燎原」提過各種方案，我都沒有同意。我認為他們大勢已去，滅亡是必然的。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動都是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下進行的，「五一三」卻不是。毛主席對「五一三」的態度，並不是作為黨的指示由總理下達的，而是通過一個能與主席接近的文工團員劉淑媛傳到了總理和林彪的耳朵裏。即便主席的聲音不到，「五一三」也發生了，軍隊造反派被摧毀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這些地方造反派去支援也無濟於事。「五一三」事件是海、空軍機關和三總部、各軍兵種廣大幹部群眾站出來反對打砸搶，反對造反奪權的結果，當然從本質上也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結果，但這又是有悖當時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線的。

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對造反派的態度也亮相了，林彪是支持這一行動的，因為「五一三」是打擊軍隊造反派的，打擊了軍隊搞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軍隊才能穩定下來。

在「五一三」事件後，軍隊廣大高級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也明朗了。換句話說，在地方上領導幹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認為是支持他，可是在軍隊，廣大高級幹部認為，打擊造反派、穩定軍隊才是擁護毛主席。軍隊和軍隊造反派誰重要，毛主席心裏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線格格不入，「五一三」事件後也使江青不能帶著「造反有理」的「路條」插手軍隊。兩個月後，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對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

三年以後，也就是七〇年五月十三日，那天天氣很好，葉群建議到居庸關長城走一走。黃吳李邱是從西山坐了一輛麵包車去的，我們先到葉群後到。然後我們就在長城上面走，那時長城的遊人很少，可以說沒有遊人。我們邊走邊閒聊，祇走了一個烽火臺，照了些像就往下走了。我們走到下面的一間平房休息，林辦秘書郭連凱他們在桌上鋪了綠軍毯，桌上放了一點水果。這時葉群叫人拿來幾本字帖，分別簽了名送給我們。接著我們又閒談了一會，葉群笑著說：「你們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今天是『五一三』，兩年前如果軍隊內部反黨亂軍的打砸搶分子不壓下去，軍隊也會像地方一樣亂的不可收拾。現在好了，軍隊穩住了，才能保住全國的局勢。」記得李作鵬接著葉群的話說了幾句：「三年前的今天，要不是葉主任支持我們，軍隊反黨亂軍的打砸搶分子得了逞，軍隊還不知道會亂成什麼樣子！」葉群很聰明，李的話音剛落，葉群就說：「這要感謝毛主席，是主席叫我支持你們的。我們要共同高呼毛主席萬歲！」

從到長城到離開，整個過程都不到一個小時，臨走前，葉群又說他的字寫得不好，把給我們的字帖又收了回去，她說：「我寫的字不好，你們要笑話。我重寫後再分送給你們。」我記得葉群後來卻沒有再送。

就這麼一件事，「九一三」後，專案組說這是林彪反革命政變的預演。聽到這話我倒放心了，說明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材料，因為這是一次最普通的一次郊遊。

「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是文革進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七二〇」事件之前，武漢的兩大派是：「百萬雄師」和「三鋼」、「三新」，以陳再道為首的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當時武漢的形勢，和其他幾個比較亂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四川也差不多。上海「一月風暴」以後，全國的形勢有些亂，到處在奪權，幸有軍委的《八條命令》，軍隊頂住了造反派的衝擊。武漢軍區對執行軍委的《八條命令》是堅決的，對造反派下手也是快的，解散了武漢的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並抓了工總的頭頭。

軍隊反對造反，得罪了當時的中央文革，毛主席也是不滿意的。林總及軍委不得已，又向後退了一步，於四月間又發佈了軍委的《十條命令》，《十條命令》中，特別強調「不准隨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這樣，各地的造反派又來了一個大反攻。在武漢地區，對武漢軍區和陳再道來說是很被動的，街上有「打倒陳再道」的大標語。造反派對立面的群眾成立了「百萬雄師」，武漢軍區是支持「百萬雄師」的，尤其是省軍區獨立師中的不少幹部和「百萬雄師」搞在一起。

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坐火車由北京到了武漢，總理在這一天凌晨坐飛機先到了武漢，總理主要是為毛主席的安全，因為主席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前回到北京後，一直沒有出去視察過，這次出去，全國的形勢和一年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是亂。同時總理也想瞭解一些情況，好向主席匯報。楊成武、李作鵬、汪東興陪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記得鄭維山也去了。

陳再道反對造反派，反對打砸搶，我都是擁護的。可是主席、總理到了武漢，尤其是主席在武漢這個事實，問題就發生了變化，主席、總理他們可不是一般的領導呀，他們是黨和國家的領袖呀！因此，武漢軍區當時在處理任何問題時，聽主席、總理的指示是第一位的了，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陳沒有把這個大前提擺好，總理那麼難，總理那麼苦口婆心做工作，陳再道聽不進去，反而跟總理頂撞說：「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

執行。」早在總理來武漢之前，軍區內部就統一口徑說「沒有犯方向路線性錯誤」，總理叫他們承認「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幫助他們解脫，他們頂著不幹。總理批評他，總理最後命令式地提出要陳再道遵守紀律！他竟然跟總理拍桌子，並頂撞總理。陳再道不執行命令，我認為他的錯誤就在這裏。陳再道是軍區司令，犯了不服從指揮、不執行命令、違犯紀律的嚴重錯誤。尤其是情緒激動的群眾，為了揪王力他們，衝進了毛主席的住地東湖賓館，主席的安全毫無保障時，武漢軍區又是束手無策的。

七月二十日中午，吳法憲同我說：毛主席、楊代總長他們都在武漢。武漢形勢很緊張，除了空軍的有線電話之外，其他的有線電話都難通話。林副主席要派一個得力幹部到武漢去一趟，準備應急措施。林總考慮，黃永勝（當時在北京）、吳法憲、邱會作三人之中去一個，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黃永勝在武漢有許多人認識他，容易暴露，不宜去。吳法憲要指揮空軍，離不開，也不能去。林副主席決定要你去一趟，各方面的條件都合適。林總還交代，要我帶一個內、外科水平都比較高的醫療小組去。

二十日下午四時，我到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去見林總。李文普先帶我去見葉群，葉群和我談了一陣子。葉群說，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說：「軍區獨立師警衛不力，二十號凌晨反革命分子已經衝進來了，快衝到主席住處。」上午總理來和林總商量決定，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總理已經又回武漢了。葉群還說：江青哭哭啼啼也來找林總，要死要活求林彪、葉群親自去武漢保證毛的安全。江青已寫了一封短信，勸毛速離武漢，林總決定派你帶上信立即乘飛機去武漢。

過了一會葉群帶我去見林總。林總說：「你到武漢去一趟很好。我先說一下你的任務：一、向主席報告全國的形勢；二、建議主席轉移一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黨的安全』你就說這句話是我說的；三、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陳再道又不聽指揮，圍困了主席，就設法告訴總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著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說，「如你無法和總理靠攏就在王家墩機場建立指揮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聯繫。武漢附近的二十九師和空降軍已經做了戰鬥準備。」林彪說：「你要告訴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要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絕對保證主席安

全，避免流血事件。」臨走時，葉群交給我一個牛皮紙大信封，叮囑我帶好。

當天晚六時左右，我帶著秘書吳瑞雲、警衛員蔣平安從總後出發，路過三〇一醫院時帶上了外科主任陸維善和一個有工作經驗的護士，到了西郊機場，吳法憲還為我們派了空軍門診部主任和兩名護士，我們乘伊爾十八專機夜航，於二十日晚十一時左右達到了武漢王家墩機場。我到了之後，來接我們到場部的竟是一輛帆布篷有多處彈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總理打通了電話，總理高興地說：「好！你在機場待命，過一會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間的沙發上抽煙待命。大約二十一日的凌晨三點多點鐘，楊成武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我聽到楊成武的話後，估計主席已經安全轉移出來了，我心裏也很高興！我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車，開往主席在機場的專列。毛主席在火車上召見了我。主席見到我時，心情還平靜，他同以前一樣，首先就說：「『興國佬』來了。你那個總後勤部的人現在聽你的話嗎？文革是個好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去表演的。」接著，我把江青的信及林總要我轉告主席的關心他老人家的話都向主席做了簡要匯報。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聽我說。待我說完之後，主席說：「我要先睡一會覺了，待一會給他們寫幾個字。」我即回到機場宿舍休息去了。

天剛濛濛亮，汪東興又來了，說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專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見到我就說：「太疲勞了，又睡不著，我也沒有寫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說，我完全同意他對全國形勢的看法。有一點他沒有提到的就是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談完話，楊成武來到主席房間，記得他們在商量主席去哪裏，正在給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給主席敬了禮，回到機場住處。這時，我即向林辦打電話匯報了情況，並給吳法憲打了一個電話。

大約七點半左右，停機坪上有三架伊爾十八同時發動，接著主席坐楊成武的伏爾加來了，到了停機坪，主席下車和我們握手，也和工作人員握手，主席上了飛機，我和楊成武、余立金他們說了幾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楊成武摟著我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當時也很激動，我對他說：「你無限忠於毛主席，我要向你學習！」說完他又拉著

我上機去看主席。實話說，楊成武對我是很關心的，他讓我多見到毛主席。我一下飛機，飛機就起飛了，警衛部隊上了另外的飛機。這裏還有一個故事，就是誰開主席專機的問題，本來執行任務的是飛行團的團長王進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後他選中副團長潘景寅，團長王進忠改為副駕駛。這個潘景寅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為林彪開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飛行員。

我於二十一日晚八時乘原機回到了北京，臨走前我向總理聯繫，但聯繫不上，經向北京請示，決定我馬上回京匯報。我的飛機已經發動了，指揮塔又通知飛機熄火。過了一會艙門打開，一個幹部開車來向我報告：東湖首長（總理）來電話問邱部長走了沒有？想讓您和他一起走。我們報告飛機已經發動，東湖首長就說，請您先走吧。我聽了以後有些生氣，但一想下面的幹部不知道東湖首長是誰，氣也消了。總理是二十二號下午才回來的。

我二十一日回來後，即向葉群報告了。同時我也向吳法憲（張秀川也在場）說了武漢的問題。我說：「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擊造反派的。陳再道不聽周總理的話是紀律問題。」吳法憲回答說：「不管什麼派，我們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說的『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話辦事，否則是會犯錯誤的！」

七月下旬，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對陳再道、鍾漢華等人進行了批鬥。那天開會的陣勢是很大的，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關鋒、王力（坐輪椅進場的）、吳法憲等到了會，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也到會了，到會的還有在京西賓館住的各大軍區在京解決問題的負責人。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近百人。我和張嚴厲。我記得總理有兩句話說得非常重，一句是總理宣佈這次會議是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一句是對陳再道講的，總理說：你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爲！總理的話對全場震動很大。

陳再道被押上臺之前，一些在主席臺後面的中央首長的秘書和京西賓館的工作人員給陳再道和鍾漢華「教練」了一番並做了「噴氣式」，總理和在臺上的中央首長並沒有制止。陳再道等人站在會場的西面，面朝東站著接受批判。

陳再道一聽到總理的話嚇得立即癱倒在地上，身後的兩個衛兵又把他拉起來。因為總理講了「你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爲！」，吳法憲氣憤地給了陳再道一耳光。會議進行了一小時多的時候（他們已經站了兩個多小時了），陳再道自言自語地嘟囔：「我也是六十歲的人了，站不住了。」我坐的位置同陳再道站的位置離的不遠，他的話我聽得很清楚。我是經受過武鬥的人，對體罰的滋味完全懂得。恰好這時我看到總理起身去上廁所，我也立即起身去到廁所門口等總理。我在廁所門口對總理說：「陳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總理有些不高興，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麼。總理回到座位，他自己還沒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氣說：「陳再道坐下！」總理這句話，同樣對會場震動很大。

毛主席離開武漢實際是不情願的，他知道他在武漢是最大的敗家，什麼「無限忠於毛主席」，什麼「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被踩在腳下。陳再道不聽他的，部隊不聽他的，兩派群眾都不聽他的，個人的利益，派別的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當時，不僅陳再道他們知道主席在武漢，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頭頭也知道，可是竟發生了衝進主席住處的嚴重事件，根本視主席的安危於不顧。在文革中，中央文革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的，可是謝富治、王力在武漢遭到不信任甚至非難，毛主席關於支持造反派的指示根本沒有人聽。這種對中央文革的不信任，本質上就是對毛主席路線的不信任。毛主席心中能不有所思嗎？心中能不苦澀嗎？但是從主席後來的態度來看，他除了對造反派改變了看法，對軍隊甚至林彪也有了看法（尤其是其他軍區關於支左問題給中央的檢討報告，主席並不信以爲真），但是他對文革的根本路線並沒有改變，主席九月下旬從上海經杭州、武漢、鄭州回北京過國慶節，不久中央發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主席的話表面上好像爲自己挽回了一點面子，實際上，老幹部又多了一份擔心。這樣亂下去，好像看不到頭似的，總之一九六七年是文革最難過的一年。事後證明，主席在軍隊和造反派（江青一夥）的抉擇上，還是傾向了造反派。軍隊固然忠於他，但不能理解文革的真諦，造反派雖然令人怨恨，但他們和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血肉相連。同時，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後反而想到了武裝左派，這樣既動長

了邪氣（尤其是上海幫的邪氣），又製造了新的混亂，此後，全國武鬥又形成高潮，很多造反派是對著解放軍的，並開始搶軍火庫及軍工廠。

林彪必須對陳再道嚴厲，林彪是管軍隊的，武漢的部隊（主要是獨立師）出了問題，武漢軍區（主要是陳再道）出了問題，能不嚴厲嗎？但實際上，林彪除了參加天安門的大會和對曾思玉、劉豐有個「八九」講話外，他並沒有參加對陳再道的具體處理工作。

毛主席冷靜下來以後，對陳再道所犯錯誤的處理是正確的，是領袖式的，是胸懷博大的。陳再道的福氣在於他是四方面軍的幹部，主席對陳再道的處理已經超過對他本人錯誤的處理，是針對四方面軍的政策來的，如果陳再道是一方面軍的幹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蕭華、楊成武，以至後來我們幾個人在文革中的命運就是很好的證明。「七二〇」事件後，社會輿論錯誤地指向徐向前、徐海東，說他們是支持陳再道的後臺，這是造謠，這是沒有的事。

這裏正好聯想到楊成武這段時間的態度。主席和林總對楊成武是非常信任，非常器重的。但這一段也是楊成武由大紅，走向大紅大紫的時期，一直到「楊、余、傅」事件垮臺。他自己沒想到，我們也沒有想到。這一段楊是從「忠於」主席、林總，到「忠於」主席、江青。楊多次在軍委辦事組的會上吹捧江青，甚至幾次叫蕭力來參加辦事組的會。不過那時辦事組直接管軍報的事情，蕭力來開會也正常，但楊對蕭力的態度就不夠正常，而是有些阿諛。楊對「七二〇」事件後政策也沒有吃透，比如說對待徐向前和徐海東的問題。造反派抄了徐帥的家，楊沒有極力制止，他對徐海東的態度也很有錯。「七二〇」事件發生後不久，楊成武從上海回到北京，曾召集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在京西賓館開會，說「徐海東是陳再道的後臺」，「打倒徐海東」等，叫開會的人照抄下來，回去以後在各自機關貼大標語，並讓軍委辦公廳對徐家進行監視，好像能撈到什麼油水似的。楊成武還在軍委辦事組的會上研究批判徐海東的問題，由於徐的身體不好決定由辦公廳組織開小型批鬥會。尤其是1968年初，在總參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楊成武說：「徐海東就不是好東西。」還讓大家揭發，劃清界限。在這次會議期間，楊成武還特別安排鬥了蕭華。

毛主席完全清楚部隊一直是他的命根子，在文革中當然更是這樣。九月份主席回到北京，一次總理在京西賓館給團以上幹部學習班講話，主席祇和護士小吳（旭君）兩人來到後臺，隨便坐在一把籐椅上，後臺的工作人員看見了主席，立即抬了個沙發給主席坐下，我坐在主席臺邊上看見了主席，主席搖搖手示意我不要聲張，我認為不妥，就告訴了楊成武，楊成武立即去見主席，然後回來給正在講話的總理寫了一個條子。正好總理的話也快講完了，總理說：「在我講話就要結束的時候，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偉大領袖毛主席來了！」頓時，全場群情激奮，主席走到主席臺前向大家招手，全場不斷地喊口號。然後主席又和臺上的人一一握手，主席走到我面前時說：「這個是姓邱的。」主席剛要往前走，又退回半步，一邊拉著我的手，一邊指著我說：「娃娃都有白頭髮了。」我當時也非常激動，因為在這種場合，主席和誰多說幾句話都是莫大的榮幸。我看主席這次接見軍隊幹部，心裏似乎好受多了，軍隊還是他的，軍隊幹部也還是他的。

對於「七二〇」事件，中央決定北京要大力支持武漢的造反派，武漢造反派要派代表團來北京做報告，並指示要軍隊接待他們。我們知道這是中央文革的主意，我們實際上沒有接受，我們商量的原則是：以「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名義辦理。

當時「五一三」剛過不久，「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剛起來，這次讓北京軍隊的革命派要和武漢的造反派打交道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頭頭不願意，做通他們的工作也是很困難的，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和張秀川召集軍隊各大單位的革命派主事的人開了一個會，「申明大義」，我強調，軍隊各單位的黨委是不可能和武漢的造反派打交道的，上面又有任務，祇能由各單位「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出面。在會上我除了講武漢事件的情況之外，對武漢造反派來北京，我們特別提出了三條：第一條，站穩立場，熱情辦事；第二條，提高警惕，不准各單位的造反派插手；第三條，藉機掃蕩軍隊造反派殘餘。因為武漢來的造反派到軍隊各機關去，這對北京的軍隊造反派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轉入地下的造反派骨幹分子一定會出來活動，與武漢造反派聯繫，甚至通過武漢造反派與中央文革溝通。祇要我們事先有準備，一定能取得意外的收穫。對武漢造反派要接待好，並乘機對軍隊的造反派殘餘進行掃蕩，取得了一舉兩

得的成績，這樣他們的積極性很高了。果然如此，武漢的造反派來了之後，各單位對跳出來的造反派又給了毀滅性的打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新的軍隊日常辦公機構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軍委《緊急指示》以後，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都被造反派衝亂了，領導幹部大都遭到不斷地圍攻和揪鬥，揪鬥成風。當時，蕭華、劉志堅領導的以總政為主體的文革小組垮掉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成立了以徐向前為組長，江青為顧問的全軍文革小組，但很快也不了了之地垮掉了，部隊一時幾乎無人管，十分混亂。「五一三」以後，部隊的三軍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軍委看守小組（四人小組）和軍委辦事組，也就應運而生，軍委辦事組是向全軍文革奪回文化革命領導權的產物。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個深夜，吳法憲打電話來說：「總理讓我通知你，經主席批准，成立一個軍委看守小組，有你一個，要做好準備。」

我問：「誰牽頭？還有誰人呀？」

吳說：「讓我牽頭，可能因為楊代總長不在吧。還有葉群和張秀川同志。」

這樣看守小組就成立了，在京西賓館八樓辦公，工作人員基本上都是軍委辦公廳的同志，沒有全軍文革的那些人。

九月二十三日，楊成武、李作鵬、余立金陪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頭會上周總理親自宣佈把原軍隊四人小組正式改為軍委辦事組，成員為楊成武、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楊成武為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楊、吳同時又是中央碰頭會議成員。不久李天煥（楊成武倒臺以後，李吃了安眠藥，後被搶救過來）、劉錦平也參加了辦事組。軍委辦事組就是在這樣的時期組建的，其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有權威、有能力的領導指揮機構。軍委辦事組第二天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正式宣佈成立。軍委辦事組的成立使軍隊的文化革命開始了新的時期。對於辦事組的成立，我沒有聽到林彪有任何插手安排辦事組成員的意見，林彪也沒有召集辦事組開過什麼會研究工作。一切聽毛主席的，在總理領導下工作

我參加軍委辦事組，和在軍委辦公會議比較，我所負的責任也大為不同了。在軍委辦公會議期間，我祇管總後的工作，也具體辦了一些林總、賀總、羅總長交辦的事，軍委辦公會議開會，除總後的事外，我基本不發言，也輪不到我發言。在軍委辦事組五年，我分管一大塊工作，天天工作滿載超軸。軍委辦事組（包括四人小組，即看守小組）成立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垮臺於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歷時五個年頭。軍委辦事組對軍隊的文化革命、戰備、三支兩軍等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軍委辦事組成立的時候，全軍文革早已垮臺了，總政治部也「癱瘓」了。軍委辦事組把全軍文革、總政治部的工作集於一身。看守小組時期，其主要任務是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軍隊系統駐京機關、部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體工作。楊成武時期和黃永勝時期的前期權力有所加強，九大以後，軍委辦事組的權力確實不一般了。縱觀軍委辦事組工作的全過程，主要幹了以下工作：1、領導軍隊的文化革命。這是當時最中心的任務。2、加強戰備；領導軍隊的日常工作。這是最主要的任務。3、組織全軍三支兩軍的工作。這是當時最繁重的任務。

「三支兩軍」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軍奉毛澤東之命，支持左派群眾、支援農業生產、支援工業生產、實行軍事管制、訓練院校師生的簡稱。從一九六七年二月開始，解放軍先後派出近三百萬人，分赴全國各條戰線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時間之長、任務之巨，是我軍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後來別有用心的人攻擊「三支兩軍」，其實「三支兩軍」對於穩定文化大革命的局勢，穩定全黨、全軍、全國的局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解放軍在文革中是有大功的。

在「三支兩軍」中，重點是「支左」。但誰是左派，就很難搞清楚，在毛主席和江青的眼裏奪權的「造反派」就是左派，在各地軍隊看來，不搞造反奪權，不搞打砸搶的、堅持生產的就是左派，這樣主席又說支錯了，要轉彎子，要檢討，工作相當難做，因為有左派就有對立的一派，兩派群眾均爭相說自己是革命派，不支則已，部隊一介入就勢必造成軍

隊支一派、壓一派。直到一九六七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主席又開始講大聯合。

「三支兩軍」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體工作一直在總理手上，林彪沒有具體管過「三支兩軍」工作。軍隊支援地方的幹部，不論是參加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還是派往國務院各部委，都是辦事組從全軍挑選的，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過主席、總理的好評。

我在辦事組負責支左幹部的選派工作，工作相當難做。部隊幹部一般文化比較低，而且從參加革命開始就在部隊工作，多數人方法簡單，很難適應地方的工作，但總理一個勁的要人，祇有在部隊選來選去。我會對總理說過實在選不到合適的，總理不太高興，有一次總理到京西賓館來開會，會前我和吳法憲在禮堂前廳打羽毛球，總理來時，我背對總理沒有看見他，他悄悄走到我身後揪著我的耳朵，開玩笑地說：「你給不給我派人來？」我忙說：「給給給，一會開會，把名單給你，你看中誰就給誰！」，燃化部就是總後副部長伊文去的，國務院直屬口的軍代表就是總後營房部的副部長丁江同志，總理很滿意。可是，「九一三」之後，總後造反派把伊文、丁江同志也整得厲害。當時總理要給新疆配一把手，這麼重要的位子真是選不到合適的人，黃永勝提出龍書金去，我不同意。因為龍書金是一員戰將，做地方工作未必合適，又是少數民族地區，總理說黃選得好，也就派去了。龍書金同志去了以後，工作很努力，也很吃力。「九一三」之後，他受到牽連和打擊，竟被搞到鄭州工廠裏去勞動，龍書金同志身有槍傷，手臂是殘廢，老伴受株連的迫害患上精神病，兒子也受到迫害患下重病，困難程度難以想像。當時貴州很亂，工作很難做，總理叫我一定選一個好的幹部去支左，他還調侃說：「強中自有強中手！」亦即選個最好的去。藍亦農是昆明軍區副政委，省委第一書記，多次表揚過貴州的工作。可是，「九一三」之後，藍亦農也受到牽連和打擊，在批判他的會上當面和江青頂撞，而後被搞到鄆鋼鐵廠裏去勞動，一搞就是近十年。國務院和各省市支左的廣大幹部「九一三」後，尤其是文革結束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要說廣大支左幹部有什麼「不是」的話，並不是他們的「不是」，而是由毛主席的在文革中的戰略部署和方針、政策決定的，打擊、虐待是錯誤的。另缺字读书社区制作

混亂和困難的情況下，沒有廣大支左幹部的支撐，黨和國家的命運也是難以想像的。

加強戰備和領導軍隊的日常工作，這是最主要的任務。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主席就提出了準備打仗的號召，並提出了戰備的要求是：精神準備是主要的，物質準備也是重要的。當時，蘇聯修正主義對中國確實存在野心。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和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對戰備工作抓的都是緊的，抓的都是好的。在黃永勝時期，一九六九年發生的工作抓的都是緊的，抓的都是好的。在黃永勝時期，一九六九年發生的東邊（東北）黑龍江上的珍寶島和西邊（新疆）克利鐵奇戰鬥，都是蘇修對我們試探性的進攻，這就完全證明了準備打仗的重要性。

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楊成武領導軍委辦事組時期，在對待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方面，還是按林彪、葉劍英、聶榮臻領導軍委具體工作時期的方針進行的，由於有了「五一三」革命派和造反派的較量，以及四人看守小組的工作，在京的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領率機關很快就穩定下來。楊成武雖然和江青個人關係很好，但軍隊不能亂這一條，楊還是做得到的。這和蕭華、劉志堅、徐向前領導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不一樣的，當然蕭、劉、徐他們當時也確有難處，完全可以理解。

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是短命的，祇存在半年多點的時間。時間雖短，但除作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還做了不少影響全國的大事。這裏祇能記述幾件主要的。

第一，組織、開辦中央毛主席著作學習班的任務。一九六七年國慶節前，毛主席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全國各省、市造反派的骨幹分子都分期分批到北京集訓。學習班的行政管理工作，包括住房、吃飯、組織接見等等，一切實際工作都要軍委辦事組當作任務完成。當時，北京的幾個大一點的軍隊院校如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後勤學院、空軍學院，都擔負了接待學習班的任務。每期學員都在三、五千人，有時近萬人。造反派到北京來辦學習班，還是一直搞派性鬥爭。這些問題中央文革根本不管，軍委辦事組又管不了，結果是誰也不管。學習班也祇好有三門課程：打派仗、參觀景點、毛主席接見。這三門課程完了，也就「畢業」了。

爲了擴大學習班的影響，軍委辦事組請毛主席在京西賓館禮堂接見了第一期學習班的代表。被接見的代表中還有「七二〇」事件的當事人陳再道、鍾漢華等人。毛主席在臺上同臺下坐在前排的陳再道說了話。主席首先問：「陳再道同志來了嗎？」陳再道在臺下精神抖擻地站起來回答說：「報告主席，我來了！」毛主席很高興地同陳再道說：「你學習一個時期很好！」毛主席接見完了之後，楊成武發表了長篇講話。楊的講話沒有見報。

第二，組織毛主席接見軍隊團以上幹部。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搞得勞民傷財。但這裏的政治油水滿大，楊成武是看到這一點的。楊向林總報告，說部隊幹部很想念毛主席，林把這個意思報告了主席，主要是說給在場的楊成武聽的，沒想到主席說，「我也很想念同志們。」這樣，軍隊團以上幹部，分期分批進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爲毛主席接見）就開始了。這個大規模的接見活動，一是對主席的神化在軍隊又大大提昇一步；二是浪費了不少經費。

第三，領導《解放軍報》的出版工作。當時，軍報直接歸軍委辦事組領導，主席和江青的女兒蕭力（李訥）當時是軍報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常常拉著蕭力參加軍委辦事組的一些重要活動。祇要楊成武在場，他對蕭力都是畢恭畢敬的，一定要拉她同桌共坐，祇要蕭力答應到會而未到之前，楊總是要等她來了才開會。楊成武倒臺之後，江青用很氣憤的語言指責楊在政治上「引誘」青年。她說：「在會場上一個小孩子不習慣同他坐在一起，還親自硬拉著去！」

對軍報繁重的日常工作，如審查重要社論大樣等就不說了，這裏祇說一下組織發表楊成武的《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統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一事。

一九六七年冬，楊成武發表了《大樹特樹》的署名文章，一是頌揚毛主席，二是批判羅瑞卿。這篇文章原是總參大批判組的稿件，是楊硬搶過來的，當時據楊說話的口氣，說那篇文章是準備了好久的，易稿不計其數，陳伯達等還參與了指導和修改文稿。楊很得意地說（口氣很大），發表那篇文章的目的是爲了統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以後，楊卻說《大樹特樹》是林彪那裏搞的文章，礪逼著楊

成武以他的名義發表，這就太不夠實事求是了。爲了文章的發表，楊成武在辦事組會議上提出要下發文件，通知全軍組織學習，大家認爲這篇文章是以楊成武個人的名義發表的，下文件不太合適，吳法憲直接提出反對意見，吳法憲說下文件大家都要簽字，搞不好難負責任，其實吳的意見是對的，也是爲楊好，但楊成武很生氣，我就出來做和事佬，我說下發文件慢，不如開電話會議下達通知快，楊、吳都同意了這個意見。下發文件慢，不如開電話會議下達通知快，楊、吳都同意了這個意見。文章發表時，軍委辦事組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北京由軍報召開過新聞界的會，通告楊的重要文章要發表；辦事組對全軍召開過電話會議，在電話會議上，講了楊成武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組織收聽、閱讀、收集反映等事宜。對發表一篇文章事先做這樣的準備工作，我見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大概是十一月間發表的。文章發表後，宣傳得很厲害，標語刷了很多。

文章發表的時候《人民日報》登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轉到第三版，軍報則登在第二版爲全文的主體，新華社也以重要新聞播發了。楊成武對《人民日報》登的版面位置很不滿意。爲了此事，當時在中央文革管宣傳的戚本禹還專門上楊的門道歉。

楊成武的文章發表也就一兩天，黃永勝到北京來，他約我去看望楊代總長，我和張秀川陪他一起去了。我們到了楊成武家，一見到楊成武，他就氣憤地說：「戚本禹剛剛走掉，這個戚本禹真是亂彈琴，太可氣了，這麼重要的文章（指《大樹特樹》），他在《人民日報》上登在第二版。你們知道這篇文章多重要嗎？，羅瑞卿在衛戍區看了我的文章以後，立即給毛主席寫了《認罪書》，說自己是一個假黨員。」當時，楊成武手裏正拿著羅的《認罪書》，他如獲至寶似地手持羅的《認罪書》向上一揮，說：「我說同志們呀，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喜形於色，溢於言表。楊成武給我們看了羅的《認罪書》。羅瑞卿向毛主席檢討說，他根本沒有入過黨，他當時和黨取得聯繫心切，要求入黨心切，沒有入過黨就謊稱自己在武漢入了黨，後來與黨失去聯繩。羅瑞卿在上海用要求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方法和黨取得了聯繩並得到同意。

大概又過了幾天，主席批評了楊的文章，主席說：「那篇文章，我祇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緊接著主席又作了批示：「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

凡絕對的東西都祇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看到主席批示後，張秀川對我說：「邱部長你真是高人，幸虧祇有電話通知，我們下了文件就更麻煩了。」楊成武知道主席的意見後，開始有些緊張，後來就推卸責任，結果越描越黑，他在京西賓館講了一次話，在京西賓館「躲反」各大軍區的負責人都參加了，北京的軍隊領導幹部也參加了。楊的講話有些推脫責任，結果把陳伯達、姚文元得罪了，把林彪和辦事組的同志也得罪了，把爲他修改稿子的人也得罪了。所以主席後來叫林彪在「三二四」大會上講兩面派的問題，林彪在會上還特別講楊的品質不好。

楊真是禍不單行，福州軍區有個戰士，對文章提出了批評的意見。他說：「權威和威信是樹不起來的，這是唯心主義世界觀。」那位戰士的意見，姑且不管它正確與否，他的膽量是令人欽佩的。可是楊成武發了火，要福州軍區對那位戰士進行嚴肅批判和嚴格審查。後來把那位戰士處理復員了，楊成武倒臺之後，軍委辦事組又要福州軍區把那位戰士找回來，繼續在部隊服役了。

我對楊成武是尊敬的，我向來把他當作良師益友看待。但對他某些做法我向來也是不欣賞的。特別是對他的虛榮、愛表現自己的作風更不敢恭維。

第四、組織編寫《黨史綱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間，楊成武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組織和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編寫《黨史綱要》的工作。

對編寫《黨史綱要》（即《兩條路線鬥爭史》）的事，楊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現。爲什麼要辦這樣的大事，他沒有作過任何說明。以我的想法，編寫《黨史綱要》的工作，軍委辦事組既不能完成，也沒有資格和權威擔任這樣大的工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頭，哪能戴這樣大的帽？我曾將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楊表示過，但他避而不答。

爲了編寫《黨史綱要》，軍委辦事組調集了幾十個筆桿子在京西賓館專門從事這件事。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北京軍區、海軍、空軍、總政等單位的「文人」都調來了。負責給楊成武寫文章的秘書和他的大女兒楊毅參加了寫作班子，金敬邁都參加了寫作班子。對此工作，由楊親自掛帥，別人不能過問。寫作班子的具體管理事宜，由張秀川負責辦理。大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第一次初稿就出來了。寫黨史是必要的方块字读节社区制作

涉及到我黨我軍的一些領導人物，當時點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等這些人的名是無須顧慮的，但是要點朱德這樣一些人的名，還是拿不準的，雖然在一九六六年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老同志都把朱德狠批了一頓，但還是慎重為好。楊成武讓張秀川起草一個報告，張秀川來和我商討，但還是慎重為好。楊成武對張秀川說：「楊代總長知道上面的事比我們多，其實我也拿不準，我對張秀川說：『楊代總長知道上面的事比我們多，問題的關鍵不是《黨史綱要》點不點朱德的名，而是楊成武想不想點朱德的名，他想點你們就打報告，他不想點，你們既不寫，也不必打報告。』」事後他們還是打了報告，其中報告提到「如寫到紅四軍七次代表大會時，點不點朱德、陳毅的名？我們的意見要點。」楊成武果然摸準了毛主席的脈搏，對於點朱德的名，主席同意了。

《黨史綱要》的初稿，當時我手頭有一本，也看過。我記得，從共產黨有史以來，到文化革命都寫上了。在綱要中，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總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沒有什麼歷史可寫，也被放在「第三號」的位置上了。周恩來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現過，但不佔重要地位，更不佔創始人之一位置，其餘人就「榜上無名」了。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二月間，楊成武下令把《黨史綱要》初稿一律銷毀，一份也不准留下。誰讓他這樣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誰監督燒的。參加編寫的人員，則在楊成武倒臺之後，由黃永勝親自開過會，都回原單位去了。

第五、《紅太陽展覽》。在編寫《黨史綱要》的同時，軍委辦事組還辦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組織了《紅太陽展覽》。這兩件事，楊成武是放在同樣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展覽」這樣重大的問題，同樣不是軍委辦事組應當辦和可以辦的事。

《紅太陽》展覽在軍事博物館展出了，大約有圖片三百餘張。《紅太陽展覽》和《黨史綱要》的指導思想是一樣的，也是從有共產黨誕生到文化大革命，黨的歷史都反映出來了。毛主席、林總、江青三個人在《紅太陽展覽》中的地位，同《黨史綱要》也是一樣的。突出了毛主席和肯定了林總，江青佔有重要的地位。同樣，江青沒有什麼歷史性的照片，祇有把生活照片當作歷史照片了。我記的有幾張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納在一起照的。李納趴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邊，這種不折不扣的生活

照，也作爲政治照片展出來了。周恩來祇有陪襯別人的集體照片，沒有單獨照片。

《紅太陽展覽》同樣是楊成武親自組織領導，張秀川協助辦具體工作。江青去看過兩次，據說都表示滿意。張秀川陪我去看過一次。我看後向張秀川說了：「這個展覽，是有楊代總長特色的，總覺得以後會有些麻煩。」張秀川對我的話沒有表態。

《黨史綱要》、《紅太陽展覽》是名正言不順，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黨的第三位是錯誤的。對編《黨史綱要》和辦《紅太陽展覽》，楊成武祇是個別和我說過一次。楊說：「今後我們將要爲中央文革辦很多的事。我們現在辦的這些事（指搞黨史、辦展覽）都是爲召開九大作的重要的準備工作。我們的眼光要放大一點，遠一點。」楊的談話，很像是因我對編寫《黨史綱要》提過某些意見的回答。另外，在一次軍委辦事組會議上楊成武還無頭無腦地說了三點意見。一是軍委辦事組除辦軍隊的事之外，還要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等交給的各種事情，其中有的是最爲重要的大事情！二是軍委辦事組同羅瑞卿的軍委辦公會議是不同的。辦公會議是在軍委常委領導下的辦事結構，辦事組則是代表軍委常委工作的；三是我們軍委辦事組不要把自己的各種範圍搞窄了，我們應當立腳軍隊，面對全黨、全國。楊成武這些話，當然是有所指的，但他究竟指什麼，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楊成武倒臺之後，我們知道他同江青的關係特別密切，對楊以前說話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江青告訴楊成武，葉劍英是「二月逆流」，不要再往他那裏跑，楊成武當時也是給我們吹了風的，是好心。

第六、參加中央專案組二辦的工作。我們認爲主席最信任的人才能參加中央專案組，因此我們當時對楊是很敬重的。中央專案組的工作，是黨的工作，不是私事，我認爲黨給定的槓桿誰都要執行，祇要沒有超過黨的槓桿，都不爲大過。其實文革以前，也有不少專案性質的工作，如胡風的，潘漢年的、揚帆的，反右的等等，傷害的人也很多，這些專案都掌握在中央要人手上。

一九六七年初，我被造反派打成重傷，在西山休養，有一天葉帥來看我，葉帥剛坐下不久，楊成武就來了，接著就是他來講新聞了。楊說：「彭德懷太反動了，衛戍區給我匯報說，他們從彭的收音機後蓋裏搜出

一封信，信是寫給主席的，彭在信中問主席，我的賬已經算清了，這次又把我押到北京，要算我什麼賬呢？彭這個傢伙太反動了，總理請示主席同意把彭交給紅衛兵鬥，北航紅旗從衛戍區把他拉出去鬥，彭回來後祇在牢房裏哎吆、哎吆叫，但不肯認罪……」楊接著說「彭真這傢伙過去盛氣凌人，現在窩囊到家了。他關在衛戍區，對誰都底三下四。彭真去盛氣凌人，現在窩囊到家了。他忘戴假牙，很難受。後來，祇要牢房門是假牙，過去把他搞出去，他忘了戴假牙嘛，專案人員說，今天不出去就在這裏問你幾個問題，他還是緊緊抓住牙缸不放（楊說到此處大笑）……」楊還說：「在華北彭真自己幹的事不認賬，往聶帥身上推，我和聶帥在華北就抵制他。」

這裏還要說幾句蕭華、楊成武的關係問題。他們兩個關係一直不好，歷史的原因我不清楚，從一九五九年以後在軍委辦公會議，他倆的不和是常見到的。楊對總政的空頭政治也是不感冒的，另外，在對羅瑞卿的鬥爭中，楊成武是最堅決的，蕭華一時和羅瑞卿扯不清，林總把他拉回來了。在文革中，楊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蕭華則因管軍隊文革的事，按照左的一套來，引起大家不少怨恨，現在想起來蕭華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號召造反嘛。蕭華倒臺後，楊有兩點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蕭華的生活問題不放，親自佈置所謂受害的女服務員寫細節並簽字劃押，把蕭華往死路上推，唯恐蕭華打不到。而且還在碰頭會上向江青匯報，蕭華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蕭華的倒臺，楊起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還有就是批准鬥蕭華，蕭華被批鬥多次，有一次是總參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專門叫來一個很會講話的四川口音的人在大會發言，把蕭華糟蹋一通，而且還把總政副主任徐立清、袁子欽等人搞來陪鬥，讓人看來不舒服，對蕭有幸災樂禍的感覺。

第二十七章 楊成武倒臺

楊成武倒臺的自身原因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駐京軍事機關、部隊、院校團級以上黨員幹部萬人大會。「三二四」大會是楊成武下臺的代名詞。

楊成武的倒臺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總對楊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楊成武的確是一個軍政雙全的人，也能團結同志。但是自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後他自己就過於往主席、江青個人身上靠，沒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為黨的領袖在關心他，哪些是主席個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實是拉糊塗了。楊自己踩在林總、江青兩隻船上，最後翻船落水。

楊在辦事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關係，有一次他故意問我和吳法憲：「江青同志找你們單獨談過話沒有？」我們都說沒有。這時楊來勁了，他說：「江青同志對我太關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裏談了幾次話。江青同志說：『不是最親近的同志，我不在家裏談話；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別人講我自己的苦難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艱辛貧苦，江青同志一邊講一邊流淚，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淚。」

另外，楊成武這段時間也接連有事，《紅太陽》停展，《黨史綱要》收回銷毀，主席對他的文章《大樹特樹》不滿意，他的女兒也出了個人問題。林總對楊有所批評，但楊自以為有江青的青睞，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問題上他直截了當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對付林總，林總傷心地說：「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麼也沒有了。」他的女兒出了個人問題是個導火索，但這樣就把楊成武的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了，擺到主席和林總面前，擺到中央面前。事情發生後，最極力主張打倒楊成武的是江青認

爲從上海搞回來她過去的材料封存在京西賓館不及時銷毀，是楊成武有意而爲，是有目的的（在這個問題上，楊是冤枉的。江青交待楊辦一些無原則的事，楊不好當面頂回去，祇好拖著不辦，江青有氣。江青是個很難伺候的人。江青是很重視她在上海的「材料」的。因此抓「楊、余、海檔案館，曾管理過江青的材料）；江青還認爲，搞掉「王、關、戚」可能與楊成武有關（其實無關），是挖她的牆角。同時，毛主席不願意其他人知道他和江青「關心」楊成武這層關係，更不願讓林彪知道這層關係，人知道他和江青「關心」楊成武這層關係，更不願讓林彪知道這層關係，終於決定打倒楊成武，「殺」了愛將。楊成武的確是作爲軍隊的接班人來培養的，楊的問題端出來，毛主席召集了四次會議，很重視楊的問題，因爲楊到處講主席和江青對他如何之好，這樣，搞不好毛、江與林之間可能產生誤會。與楊成武相比，毛主席當時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

楊成武也是林總的愛將，林這邊也摸不準毛對楊的根本態度，一直比較慎重，主席召集解决楊成武問題的會議，林沒有參加，是葉群去參加的。楊成武雖然與江青走得過近，一時也醒不過來，但他畢竟是林的愛將，林想把楊的問題先掛起來，有機會再分配適當的工作，在楊成武離京時，林說楊還是副總長，並同意他帶老婆孩子走。可是情況馬上又變了，最終楊還是被撤銷了職務，也就是說被打倒了，事後中央發了文件。林在「三二四」大會的講話有些言不由衷，總理也很緊張，組織工作很倉促。

楊成武是軍隊的臺柱子

全國解放後，林總的老部下中，著名的有十大上將：劉亞樓、蕭華、楊成武、黃永勝、鄧華、賴傳珠、李天佑、楊得志、韓先楚、趙爾陸。在京工作的前面兩個在文革前後都發生了不同的問題，祇剩下楊成武一個人，楊成武已經成爲林總當然的接班人。楊成武在軍隊中有相當的威信，林總和元帥們都很器重他，大將也不會反對他，餘下的將軍們對他都很尊重。楊成武在華北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華北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員會之前的人事安排，幾乎事先都要同身在碰頭會的楊成武商量。

在文化革命中，楊成武是領導軍隊文化革命的主將。軍隊高級幹部在文化革命中沒有受到大的衝擊的，楊成武算一個。賀龍辦公室及總參

有少數人曾經衝擊過總參黨委，也就是爲了衝擊楊成武，但那是軍隊內部的問題，並且很快就反擊下去了。反擊賀辦衝擊的力量是很大的，總參內部各部門、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北京軍區各部門支援楊成武的大字報比衝擊他的大字報至少多十倍以上。賀辦的衝擊，對楊成武幫了一個大忙。

一九六五年底，中央上海會議之後，羅瑞卿下臺，楊成武上臺就成了軍隊的要人。從此之後，他幾乎參加了中央的所有的政治活動，一九六七年九月底，把軍隊原來的四人小組改爲軍委辦事組之後，楊成武就從組織上接過了軍隊的全盤領導工作。軍隊一度出現的無政府狀態的歷史結束了，以楊成武爲首的「新政府」出現了。軍隊工作，開始了新的階段。

當時，我還不知道林彪、江青之間早已有矛盾。文革初期，我從表面上看到，林、江之間的關係挺好的。楊成武在做林、江之間的「政治紅娘」。對於楊成武時期的軍隊工作，尤其是三總部和駐京各機關，由蕭華、劉志堅、徐向前領導的混亂時期穩定下來，楊是出了力的，也是令人滿意的。楊成武在軍委辦事組的會議上，不止一次地說：「軍隊多災多難的歷史過去了，太平盛世又出現了。」全軍上下都爲這一好的形勢出現感到由衷的高興！

軍委辦事組成立後，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黨中央、國務院的很多行政事務工作，都落到軍委辦事組身上了。軍委辦事組有「臨時軍政府」的派頭。除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發揮了軍委辦事組的作用外，江青也企圖把軍委辦事組抓在自己的手上。事實上，當時中央祇有軍委辦事組是能辦事的機構，中央的許多事都是軍委辦事組辦的。

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正幹得紅火之際，突然不見楊成武到軍委辦事組視事了（一般的情況下，幾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他）。接著又聽說他貴體欠安，但規定不准任何人探望。三、五天之後，吳法憲也突然「失蹤」了。軍委辦事組成了群龍無首，祇有我和張秀川兩個同桌「組員」，每天下午三點，到次日清晨三點，照常上班。我們祇能處理一些小事，凡大一點的事都無權處理。對大事，祇能寫上「呈批」二字也就算處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稍有不慎，就會給你扣上大帽子，甚至立即被打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倒。我曾對張說：「『山雨欲來』了吧？」他會意，但不多說。總之，我們總是感到有事，並且還不是小事。但什麼事，根本不知道。當時我們也有些緊張，因為楊成武一般人是搬不動的。

過了幾天，零點左右，吳法憲到軍委辦事組來了。他對我和張說：「這幾天空軍有些要處理的急事，沒有來一起辦公了。」除此之外，他「滴水未漏」。我和張秀川，同楊成武、吳法憲的關係，好像像是「在野」同「當政」人的關係一樣。我們什麼也不問，他們同我們說什麼就聽什麼，即使沒有聽明白的事也不多問。黃永勝剛來時也是這樣，我和李不是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黃和吳從上面開會回來嘴也是很嚴的。直到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黃永勝、吳法憲對我和李作鵬實行「開放」，我們就一同議事了，葉群還專門解釋說：「以前不敢跟你們說，主要是怕我們反江青他們的情況擴散太大。」黃永勝在九大以後，就幾乎沒有一天不議論江青這些人的事了。

又過了幾天，可能是三月中旬吧，吳法憲又到軍委辦事組來了。吳說：「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楊代總長和我之間發生的一點問題，同你們三個人（李作鵬也來了）說一下。我說的問題，現在絕不能外傳，所說的內容也由我自己負責。將來上面怎麼說，就以上面的為準。」

楊成武問題的內幕

吳法憲說，楊成武的問題，以前的你們都知道，搞《紅太陽》展覽，搞《黨史綱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總算過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對他的《大樹特樹》不滿意。接著吳又說：「楊同我過說，今後我的主要精力應當協助他，總政癱瘓了，還我要多管，總參的日常工作要以我為主。這樣我對空軍的工作是時間和精力都照顧不過來了，楊考慮空軍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負責，余也是老空軍，工作能力又不錯，這樣對空軍的工作是有好處的。問我有什麼需要考慮的，如果我沒有意見，他就去向林總和江青同志去匯報。這是他要免去我空軍司令員的職務嘛！」

吳接著說：「當時我以為楊代總長上面說的話祇是一種設想，不過同我商量而已。於是我就同他說：『對楊代總長的考慮，我沒有什麼意見，把我放在哪裏都是協助你作具體工作。請楊代總長把你的意見報告毛主席。』

席、林總考慮就是了。組織上怎麼樣決定，我都服從。」其實他也根本沒有向林總匯報。這樣大的事，我當然要報告林副主席。」

吳法憲說他很快就把楊成武的話報告了林總。林聽了之後，有些吃驚，楊的這種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但林不知道楊這一考慮的來頭，因為楊與主席那裏是通著的，究竟是主席的打算，讓楊先對吳吹風，還是楊自己的考慮，林一時摸不清，因此林說話很謹慎。林想，如情況屬實，對這樣大的問題，楊是會同林商量的，怎麼就一聲不吭先給吳講起來了？！何況林、楊之間，有史以來也沒有過打啞迷的事。林總祇對吳說了一句：「楊的考慮不妥，一切要由主席來定。」其餘就沒有多說了。後來才知道，楊成武上面說的話是爲了女兒楊毅的事，給余立金許了願，楊耍了小聰明。

楊成武一言既出也是「駟馬難追」呀。空軍司令易人的事根本不是楊能事先定的事，再加上楊毅的事正是和余立金的秘書單世充發生的，這種許願，一旦吳不上桿子，吳肯定會向林報告的，吳也應該向林報告；另外，一旦余立金清醒過來，報告出去，問題就更嚴重了。他祇有以稱病爲名，在家不出門靜觀事態。

楊的大女兒楊毅在空軍報社工作，她看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書單世充，單自己也願意。但好景不長，單世充的老婆發現後向組織揭發匯報了。但楊成武如日中天，楊毅有恃無恐。後來，楊成武爲了「疼愛」自己的女兒，親自向吳法憲、余立金說單世充的好話，要保單世充。

吳法憲一開始就明確表態，對楊毅可以保護，但這件事不能這樣處理，單世充是已婚的幹部，黨紀國法不容瞞。後來，楊成武不知退，不聽勸，反而態度強硬，吳也明確表示不同意楊的要求，千千萬萬的幹部盯著呢！實際上，吳拒絕了楊的無理要求。吳在楊毅的問題上一點錯也沒有。

單世充本是個鼠狗之輩，沒想到有楊的支持，也忘乎所以起來，吳身爲空軍司令，找他談話，他都竟敢不去。單揚言：沒有楊代總長的指示，我不和任何人談話。這樣問題也就越來越複雜了。當時的情況是，楊成武要橫，楊毅也要橫，單世充也跟著要橫。楊所有的本錢是他自認爲他的後面有江青，楊的致命點就在這裏。楊也是禍不單行，此間，許

世友要北京派專機，說他們從敵偽檔案裏發現余立金是叛徒，要親自給

余立金的身價一落千丈，楊成武很沮喪。

主席送材料。林總找吳去商量

大約在三月中旬，林總對楊的問題就重視起來了。具體辦法是，楊的身體不了，對解決楊的問題總的原則是：「爭取息事」。楊的身體不佳，不管病情如何，都要關心他的病。但是楊一點錯也不認，把自己頂在死角了。

在不可能說服楊成武的情況下，才讓葉群去向毛主席報告。

林總在不可能說服楊成武的情況下，才讓葉群去向毛主席報告。林總在不可能說服楊成武的情況下，才讓葉群去向毛主席報告。主席對楊的事，格外地重視，主席親自召開了四次會，反覆詳細地聽匯報，主席感到不拿掉楊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響到毛和林的關係，當時林比楊重要得多。在匯報楊成武問題的時候，江青發現了楊要橫的本錢在於她，江青對楊的拉攏，有些毛是知道的，有些是江青的私貨。當然，江青認為她在主席面前的形象最重要，楊成武在她眼裏算個屁，在江青是個極其自私自利、反覆無常的人，她一反常態，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堅決要求打倒楊。然後，毛主席、林總、周總理、陳伯達、康生等共同決定：對楊成武的問題，事情要說清楚，結論不要做，暫時停止工作。

林對楊的倒臺是挺無奈的。楊自己也太不爭氣，自己打倒了自己。如果楊留下就等於把江青在軍隊的代理人留下了。

江青要把邱會作、楊成武同罪

江青知道楊成武要下臺之後，立即上林總的家門，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楊成武品質很壞，應當下臺！（二）邱會作同楊成武關係密切，同葉劍英的關係也不乾淨，應當與楊成武「同處共論」！江青的兩點意見都是向林彪討好的，林總肯定地回答說：「邱會作同楊成武現在發生的問題毫無關係！」總之，江青堅決不同意我進辦事組，說我同楊成武關係密切，總理說：「要全面考慮問題。」黃永勝說：「辦事組一定要有總後這一塊。這一塊只能邱擔當，別人擔當不了。去年邱被造反派打傷，傷還沒有好，主席就讓他回去主持工作。這是為什麼，就是說總後的工作還是邱來主持。」總理說：「永勝同志講得好。」

三月中旬，吳法憲特意到軍委辦事組來，同我做過一次簡短的談話。他說：「你對楊成武的問題，趕快表態，越快越好。這對你有好處。

我是來向你傳話的，具體的以後再說。有點事，估計可以調整好，你也不用緊張。」我對吳說「對楊成武現在發生的問題，我沒有什麼態可表呀！」

「你祇是說過去的事就是了。在表態的報告上，對江青可以多說幾句好聽的話。」

吳法憲同我談了之後，我做了認真的考慮。首先考慮的是，楊成武下臺可能成爲定論。二是，江青可能要在我身上做文章了，如果林總看重他和江青的關係，我很可能成爲犧牲品。我想祇要上面有人要打倒我，就不是表態的問題。即使今天表了態，過了關，明天又怎樣？該死還是會死的，何況，我對楊沒有什麼態可表的。對楊成武的問題，是否表態，我考慮了兩天都沒有定下來。

我正在爲難，吳法憲又急急忙忙來催我要報告了。這次來，吳法憲的表情不緊張了，還有些高興，我估計楊成武的問題已成定論，並且對吳有利。

「報告寫好了嗎？」

「還沒有下決心呢！」

吳法憲看到我不在乎的樣子，就坐下來同我認真說了一頓。他說：「前幾天的事，不是別的什麼問題，就是江青一個人的問題。江青說你同楊成武的關係密切，同葉劍英也界限不清。她要把你擡出軍委辦事組，同楊成武一起打倒。」吳還說：「主席說，楊成武這個『障礙兵』可以搬開，以便更多的人抬起頭來。」

至此，我把問題的真相基本弄清楚了，我把對楊成武問題的表態報告很快寫好了，正巧周總理給我打來電話說：「你要寫個報告來，把你和楊成武的關係講清楚。你要特別注意，在寫抬頭的時候，把江青同志的名字往前寫，寫在我前頭都可以。」總理的話引起我對寫報告的重視，心裏也有些緊張，我想祇是毛主席、林總、總理相信我還不夠，如果江青堅持打倒我，他們又遷就了江青，我被打倒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我對楊成武的表態報告，是先送林總的。林總在我的報告上批了幾句話：「邱會作同志同楊成武祇有工作關係，不需要有任何處理。」林總又把報告直接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在他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圈，並劃了一個箭頭到林總對我的批語上，表示同意林對我的看法。文件送到周總理處，他也在我的報告上批了一句話：「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我的問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題通了天，一點事也沒有了，反而也讓我參加了處理楊成武問題的一些工作。

二十三日上午，吳法憲要我同他一起去西郊機場接黃永勝。在車上，吳法憲同我談了決定黃永勝來當總參謀長的過程。他說：「黃永勝來當總長，林副主席提的還是代總長，主席說，黃永勝夠資格，就當總參謀長，不要代字了，是毛主席把『代』字去掉的。」聽了以後我很高興。

黃永勝下飛機後，即由吳法憲陪同從機場直接去人民大會堂同周總理共商大事了。我即領著黃的夫人項輝方、秘書等住到京西賓館。吳法憲要我向黃的夫人宣佈三條：「（一）黃的任職未公佈前，不准同任何人透露；（二）要絕對保密；（三）在北京不准同別人議論政治問題。」

抄楊成武的家

三月二十三日晚中央碰頭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舉行，專門討論處理楊成武的問題。我和李作鵬列席了會議。

會議決定：（一）先把楊成武從他家搞出來；（二）在中等城市安置，對外保密；家屬由總參管理，不准受歧視。這些事都佈置好了之後，周總理決定把楊成武搞到大會堂來，他先派王新亭帶中央警衛團的人去把楊成武家的警衛部隊換掉，把楊的家全部控制起來，楊成武家原來是由北京衛戍區警衛的。王新亭和楊成武的關係不錯，可以說他平時對楊畢恭畢敬，此時他有些唯唯諾諾，表示很為難的樣子。總理看了王新亭一眼，歎了一口氣對著王說：「你怎麼搞的？」我同李作鵬離總理不遠，我們靠在柱子上閒談，總理看到我立即招手把我叫過去，總理對我說：「你們兩個人去，把楊成武帶來，你過去和楊成武關係融洽，就說我讓他到大會堂來開會。讓他（指王新亭）先把警衛部隊換掉，你去帶楊成武。我跟楊成武關係很好，我同樣也有些為難，我對總理說：「我叫他，他能來嗎？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總理給我打個條子，我把人給你領來。」總理看了我一眼說：「你去吧，就說我通知他到大會堂開會。對楊成武隻字不留。」我祇好從命了。這時李作鵬也湊過來，他報告總理說，「楊成武那裏有大量的機密資料，要搞丟了，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總理：「對呀。」他想了一下對李作鵬說：「你也去，要負責保護楊成武不發生意外，也要保護文件，先封存，現在就去辦理。」

楊成武家住在後海，從什剎海郭老（郭沫若）家那個路口進去直上去就是了。中央警衛團的部隊先我們十五分鐘到楊家，他們越牆進了楊成武的家，整個院子都控制起來了，楊的警衛參謀（平時我叫他「×胖子」）這時才知道有事了。我叫警衛員小蔣去叫門，門沒有關，一推就開了。我和李作鵬進了院子，看見王新亭正帶人在院子裏調換警衛部隊。「×胖子」一邊給我們敬禮，一邊說：「邱部長，邱部長。」王新亭和我們一起上了二樓，趙志珍已在樓梯口上等我們，對我一個勁地說：「邱部長，邱部長。」我當時也不便說話，沒有和她搭話，這時她又說：「邱部長，我們老楊對你怎麼樣，你心裏應該知道啊。」我這時祇是說：「總理請老楊到大會堂開會。」進了楊成武的套間（外間是辦公室，裏面是臥室），我和李坐在辦公室的南端，等了不短時間楊成武才出來，楊路過衛生間時，看見他的兒子東勝在裏面，就走進衛生間，我身邊的警衛員小蔣，見此情景，要去阻攔，我一把抓住小蔣，示意他不要干涉，這種時候做的點善事也不為過，我看了一眼李作鵬，他也沒有吭聲。楊大概在衛生間磨蹭了十多分鐘才出來的，並同我們相對坐下。我們之間的距離有幾米遠。我和李作鵬主要是把楊留在他辦公室，以便王新亭好查封他的家裏文件。楊的胡茬很長，頭髮既長又露出白頭髮茬（文革前的老同志中祇有個別人染髮），很像久病之人一樣的。楊平時很注意自己的儀表，今天同半個月以前的楊成武判若兩人了。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心酸起來了。

楊成武坐下之後，用很低的很沉重近於悲慘地聲音說了一句：「你們要把我搞到哪裏去？」

我回答說：「總理請你到大會堂去。一切事情總理都會同你說的。」

楊成武坐在一個長沙發上，頭向下低得幾乎要同膝蓋相連了。至少有五分鐘以上，我們互相連一句話也沒有說，房間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楊住的房子是元帥宿舍，質量非常好，祇要不開門，外面的一點聲音也聽不到。靜靜的房子裏好像空氣一點都不流通，楊成武一直沒有說話，但突然拿起電話要打，電話早被王新亭他們掐了，他把電話一摔，楊成武突然大聲說了一句：「你邱會作對我也要有良心呀！」

此時，我和李作鵬坐在那裏都沒有說話，對楊成武說的那句話，我心裏很難受！我心想，今天真是不該來。過去，楊對我的工作很支持，個人關係的確是很好的，對他的問題，我應當不沾邊就好了。方块字模中粗区制

決心，今後對楊的問題，在自己可能做到的範圍內，一定做好一點，以向他表示我邱會作是對得起他的！

王新亭把楊成武的全部家屬：母親、妻子、兒女等都集中在樓下會客廳裏後，就來通知我們。臨走之前，楊要去看一下家屬，我們同警衛團的一個副團長商量之後，同意了他的要求。楊離開家的時候，他的女兒在家屬群中站在一個凳子上，大聲地向她爸爸說：「爸爸！你要吃好飯、睡好覺，不要惦記我們。家裏的事，我們可以管好的。」楊成武的女兒，很潑辣，很堅強，我看到之後，甚為感動！

楊坐在我的車上，我和李作鵬把他夾在中間，不知是為了表示什麼，我偷偷握著楊的手，壓在我的屁股底下，怕李作鵬看見不高興，就時握時松。為了安全起見，我們繞著道走，在路過定阜街的衛戍區時，楊一下激動起來，嗚咽地說：「老邱呀，你們要把我關到哪裏呀？不要關到衛戍區去嘛。」我立即說：「不是。為了安全，我們在繞著圈子走，是總理請你到大會堂開會。」

我們到了大會堂，從北門進去，帶著楊成武坐在河北廳等總理。總理從裏間出來，帶著中央警衛局的武建華同志，楊成武見總理來了，立即起來叫總理，總理在十幾米遠就伸出胳膊，手掌對著楊成武，著急地大聲說：「你什麼都不要說，不要說。」武建華走過去帶著楊成武，跟在總理後面，又進到小房子裏面去了。

第二天晚上，楊成武離開北京之前，林總、周總理、陳伯達、江青、黃永勝、吳法憲等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楊成武，我和李作鵬也參加了。林總對楊說：「你現在到外地去住一個時期，對自己的錯誤，要認真反省；還保留你副總參謀長的職務；你現在就走，可以帶家屬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楊成武說：「我有錯誤，我永遠跟著毛主席、林副主席革命到底。」楊起身走時，林總、周總理、陳伯達等還同楊握手道別。

楊成武先被帶到武漢，可是不到幾天，就被人發現了，總理又決定用軍用飛機把楊送到洛陽。住的地方是龍門附近原來蔣介石臨時住過的地方。

楊成武離開北京後，有關楊成武的一切具體問題，軍委辦事組指定我管，具體工作由總參辦。

首先是安排生活。我要河南省軍區給楊配備了一個管理生活的管理員、一個醫生、一個炊事員。楊的生活費用由本人自理，但亦可適當補助。個人以外的費用一律由公家報銷，決不要剋扣楊成武分文。對楊的生活一定要有保證。

其次是，遵照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指示，把楊的家屬全部送去洛陽同他住在一起。路費及有關費用一律由公家報銷。妻子兒女的生活費由總參管理局照規定供應。

總參管理局對楊的妻子和他本人都按原來的制度供應，沒有改變。楊有什麼困難，總參有關部門都能及時派人到洛陽去瞭解情況和與河南省軍區共同處理。

楊成武有七個子女，並且都長大了。這些孩子長期間住在一起，問題很多，困難也不少。在徵得楊本人同意之後，所有大一些的孩子都回原單位工作，小的即在當地上學。對有關單位，總參都派人與之聯繫，辦妥孩子工作上的一些問題。如有特殊情況，涉及到孩子的處理問題，一定要事先得到總參謀部的同意。

我對楊成武生活上、家務上問題的處理，是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和按人道主義精神辦事的。如果沒有偏見，所有知道內情的人都會認為是辦得好的。當然，有的事他會認為是不近人情的。例如，楊的母親死在洛陽城裏的某醫院，楊要求去送終，周總理沒有批准，這雖然是小事，但不是我能決定的問題。

在文革中打倒的高級幹部，都受了不少苦難。毛主席安排了鄧，林彪安排了楊，不但免受皮肉之苦，還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有精神寄托，可他們還不認為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

「三二四」大會

當要公佈黃永勝為總參謀長的時候，毛主席指示，要召開駐京軍事單位團以上幹部大會，把問題說清楚。

毛主席說：「楊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上了臺的人，現在下臺了，不能消聲匿跡，要大喊大叫。要召開駐京軍事單位團級以上幹部大會，由林彪同志去作報告，把問題講清楚。」

大會的組織工作，總理指定我代表軍委辦事組一手辦理，從發出開會的通知，到組織會務工作。下午三時半，周總理來到人大會堂，他前前後後，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總理在檢查臺上坐位的時候，我向他提了一個問題，因為沒有把握，心裏有些緊張，我向總理說：「好像沒有通知幾個元帥到會。」總理聽後恍然大悟，他立即急步走出去，打電話向毛主席請示，是否要元帥們出席大會，主席同意了。總理又立即要秘書打電話通知各元帥來參加會議。大會開始的預備鈴都響了，葉劍英、徐向前、陳毅（似乎還有劉伯承）等幾個元帥來到了。此時，總理最為難的是，老帥坐在哪裏。坐在臺上嘛，要同江青商量排位的問題，同時還要驚動已經入座的各位。此時，總理靈機一動，對著我說：「通知晚了，大會就要開始了，會作你陪著老帥到臺下前排就座。」各位元帥都隨我到臺下就座，李作鵬走在元帥們的最後面。我們都挨著坐在第一排。

今天參加大會的人，都是軍隊的幹部，有些人看到元帥坐在臺下，有些不平。在會議進行中就有人向總理寫了一個條子。上面寫著：「元帥何罪？連坐在臺上的資格都沒有了？」散會後，我把條子交給了總理，周總理說：「群眾的意見是對的。這些問題，我承擔全部責任！」我說是我這個組織會務的人，沒有做好。總理說：「好，好。我們都來負責。」

會後，葉群同我和李作鵬說：「他們（指元帥）是臨時通知他們來的。要是安排他們在臺上就座，她（指江青）又會不高興。總理也左右為難呀！原來準備在臺上加偏座，讓你們兩位就座，看到他們來了，連你們都到臺下就座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九時半至次日凌晨一時半，駐京軍事單位團以上幹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禮堂舉行。林總、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碰頭會議所有成員都出席了大會。林總在大會上講了話，周、陳、康、江，這些中央碰頭會議的人都講了話。

林總對在大會上講話，事先沒有準備。開會前一天，主席倒先發話了，主席提出要林在大會上講話，講三個問題，一是山頭主義問題，二是反對兩面派，三是講一點辯證法。

林彪說：

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佈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

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裏面發生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

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決定由黃永勝同志當總參謀長；決定由溫玉成副總參謀長兼北京的衛戍司令。

林總批評了楊成武的山頭主義，他說：

楊成武他祇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關係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別人。……他祇用他那一夥子，而其他的就採取排擠的態度。如果照他這一套，那我們就要把吳法憲拿掉，把謝富治拿掉，把許世友拿掉，把韓先楚拿掉。與他相同地位的這些人，黃永勝、陳錫聯、楊得志都會被排擠。所以權衡兩個方面，我們祇有採取不是打倒別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這種山頭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放大了的個人主義，膨脹了的個人主義。表面上是顧他那一夥，實際上是個人主義，利用那一夥。

林總特別批評了楊成武的品質，他說：

楊成武是政治品質很壞，是一個兩面三刀的人，是一個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的好聽，背後又在搗鬼」，就是這種人。……大家知道的，以為他是反羅瑞卿的，實際上他是一個羅瑞卿分子，是緊跟羅瑞卿的，他當面好像是反對羅瑞卿的，但實際上不是反對羅瑞卿的；他參加了反對彭真的鬥爭，但實際上他是擁護彭真的。所以這種行為就是一種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一套、陰一套。

最後林總講了辯證法，他真是把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和哲學思想學透了。

林總在講話中特別讚揚了江青，他說：

很顯然的，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間很傑出的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採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瞭解她，在這個文化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實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看出問題、發現問題。文化革命中間樹立了許多豐功偉績，固然是主席的領導，全體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黨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獨特的作用，始終在這個運動中站在鬥爭的最前線。

周總理在隨後的講話中也讚揚了江青：

在這裏，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如果說現在或者是兩面派或者是特務、壞分子，他們所謂收集江青同志那個時候的材料，有兩種，一種是江青同志自己為戰鬥所寫的東西，那不是什麼黑材料，那是紅材料，革命的材料！至於國民黨社會上，那時候是反動派統治著，那時他們寫的東西，污蔑、造謠、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東西，把那些東西如果拿出來，作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個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說的很清楚，那就是臺灣的話，香港的話，就是應該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話，那有什麼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劉、鄧、陶，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譚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蕭華的迫害。儘管如此，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教育的時候，進行了文藝的改革，大家都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

總理講完話還領著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林總和總理的講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有意地、過分地吹捧了江青，這不但是說給江青聽的，更重要的是向主席表的態，為什麼是這個樣子，我直到現在也搞不太清楚。

江青在講話中指責楊成武指使傅崇碧衝擊中央文革駐在地：「又例如，楊成武去年寫了一篇什麼叫做《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實際上他想樹立他自己的絕對權威，他才是一個『一言堂』呢。發展到今年不得我們的允許，衝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區，不得組長、副組長的同意，當時組長請示我們的這樣一個很短的時間，他就衝進去了。身爲司令，衛戍司令，破壞人民解放軍的紀律，目中沒有黨中央、沒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楊成武三次指示他進去的，兩部車子，當時我就趕過去，我說：『你，衛戍司令，不得我們的批准，是不是來捉人呀？！』我現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這樣的事情能夠允許嗎？！就從那一天我堅決抵制了他以後，傅崇碧就賴賬，楊成武就突然間『病了』，一個『病人』天天會客，天天去那兒幹兩面派的勾當，進而進行奪吳法憲司令員的權，這就是奪空軍的權。同時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將來想打倒謝富治同志。」

陳伯達的講話，主要講了文化大革命的五個回合的勝利，陳說：「這幾次大勝利可以講一下的，從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綱』起，發表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關於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起，到現在恰好兩年。在這開始以後，我們就取得了第一次的偉大勝利，就是揭發了彭、羅、陸、楊鬥爭的偉大勝利。第二次的偉大勝利，就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我們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我們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裏面的幾個小爬蟲——關、王、戚或者王、關、戚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當時，陳伯達是文革組長，講話是有份量的，我們那時與他還不熟悉，他講打倒「楊、余、傅」也是文化大

革命的一個勝利，我當時就不太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楊的問題，是軍隊的問題，主要是上層幹部的關係問題造成的，對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沒有多大關係。

康生的講話是表態性的。姚文元同康生坐在一起，姚文元講起話來愛看左右的人，如果心急又容易唾沫四濺。他講話的時候，看著康生，邊看邊講，結果噴了康生一臉的唾沫，康生只好掏出手巾擦臉。

這些人講完話後，檯子上的幕布拉上了，事隔不久，幕布又拉開了，毛主席突然出現在主席臺上，其他人又跟隨而來，主席的出現是來表態支持大會的。頓時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

「九一三」以後，主席說，處理楊的問題是他聽信了林彪的話，這是不實事求是的，主席親自召集了四次會，是林彪聽從主席對楊成武的處理決定，按毛主席的要求在大會上講了話。

「三二四」大會之後，楊成武的問題算告一段落了。但江青對楊成武的問題，好像才開始似的，她對楊成武的處理，先後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是，不能隱居，至少要監禁起來；第二是，要公佈楊成武的罪行；第三是，要搞到北京來組織批鬥，而且要開大會。對這些問題江青不向毛主席、林總提出，也不在中央碰頭會議上提出，而是專門向黃永勝、吳法憲提出來。這真使他們兩位做難了。辦事組商量以後，立即向總理匯報了，總理都作了妥善處理。

棄楊留吳的問題

為什麼楊成武下臺，吳法憲留在臺上？

「棄楊留吳」的內幕究竟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如果簡單說來就是：楊成武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或者說楊成武是江青害倒的。楊成武如果不公開表示投靠了江青，是無論如何不會下臺的。即使問題再嚴重一點，也不會下臺。林總說過：「楊成武下臺，是不得已的事。」事實上是，林總為了不讓「上海幫」破壞軍隊，決心放棄楊，他雖然沒有參加主席主持召開的會，但林也沒有給楊求情。楊成武為什麼投到江青那裏去了呢？我分析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主席對江青的評價是高的，是信任的，主席實際上是讓江青在中央文革主事的，楊是看在眼裏的。二是他認為自己同林彪的關係是不需要多考慮的，穩如泰山；如果同江青也能密切起來，那就

是「雙保險」了。關鍵的問題是林和江不是一路人，這種「雙保險」在政治生活中是做不到的，「雙保險」變成腳踩兩隻船，結果翻了船。

如果祇從林、楊之間的關係來說，確實可以認為楊下臺是預料之外的！因為自從羅瑞卿下臺，楊成武就是林最心腹的人了。歷史上的事不去說了，就是處理賀龍、羅瑞卿的事件中，一批幹部下臺，沒有一個同楊成武沒有關係的，也沒有一個不是楊成武具體處理的。在楊成武原來的想像中，提出讓余立金多擔當空軍工作，不可能惹這麼大的禍上身。退一步說，如果余立金的問題，楊要事先同林商量好了，不要用江青壓林彪，我看十個余立金的問題也辦成了，根本不會有什麼困難。

林總對楊成武的處理，完全是無奈的。「棄楊留吳」也不是簡單不要楊的問題，而是楊不能再留了，這是不准江青插手軍隊完全必要的做法。

在文化革命開始以後，楊成武、吳法憲在林彪同江青的關係上，都辦了一些事。他們兩個人的作法則根本不同。吳法憲是在忠於林彪的前提下，去同江青打交道，吳法憲祇能做一個忠實的「傳話筒」。楊成武就不同了，在多數問題上，他和吳是一樣的，但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上，楊是夾帶自己的意見和打算的，林也萬萬沒有料到，楊對他也是兩面派。林總更沒有料到的是，楊成武竟敢以江青壓林！林總是堅決不許軍隊有江青的代理人的，這樣楊成武根本不可能繼續成為軍隊統帥的實際副手了！

楊成武是個聰明人，但他在林總同江青的關係上是個糊塗人！他對林、江之間的關係是沒有看準的。江青這個人不能成大局，楊成武也是沒有看透的。這是楊成武的最大悲劇！

楊成武是個有才幹的人，但在林彪、江青之間的關係上，楊的大才幹就少了一點，在這個問題上，也可以說，沒有才幹了！

楊成武已經是林總的代理人了，是他中途把自己給拋棄了。可能有人會說，楊成武早反林彪是有遠見的。對這種看法，當然就祇能一笑置之了！「九一三」之後，在報刊上看到楊成武的不少文章，雖然他對林總和他自己都很不實事求是，但是沒有看到他寫反毛主席的文章。

可是「九一三」之後，毛主席說「楊、余、傅」搞錯了，是林彪搞的。實事求是地說，「楊、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

席和江青聯手搞高級幹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聯手搞陶鑄後又一次聯手搞掉自己陣營的重要高級幹部。

第二十八章 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

軍委辦事組改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楊成武倒臺，軍委辦事組立即進行了改組。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了新的軍委辦事組名單。經毛主席、林總同意，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仍任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爲成員。年內，又先後增補了劉賢權、謝富治、溫玉成爲成員。

楊成武下臺之時，江青要把我同楊一起打倒，因爲在對待二醫大造反派的問題上，江青和我結下了怨。在三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新的軍委辦事組名單是黃永勝提一個，陳伯達寫一個名字，江青點頭才算過。當黃永勝提到我的名字時，江青不同意我參加軍委辦事組，就沒有把我的名字寫上，接著寫上了李作鵬的名字。會後，周總理把江青不同意我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情況向毛主席、林總報告了。毛主席說：「照過去一樣，不能變。」林總說：「邱會作要留在軍委辦事組。」這樣，江青就不能再說話了。我的名字被補在後面。

四月一日下午，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召開了成立會議。辦事組成員及全體工作人員到會了。在會上，辦事組的全體人員都以「要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爲中心內容發表了講話。當時講這樣的話並不是空話，是有所指的，我們當時誤認爲毛主席和江青有本質區別，言語間表示祇忠於毛主席、林總。我還說了：「凡是拍馬屁的人，總有一天會挨蹄子的！」葉群接著講了要「通氣」的問題（即是互通情況），她說：「通氣是革命鬥爭的需要，廣州軍區和空軍通氣是好的。」整個會議的氣氛自始至終都是非常好的。

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由於時間長，又是軍隊在文化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時期，做了很多工作。辦事組的幾個同志，個個身負重擔，天天工作滿載超軸。黃永勝、李作鵬身體都不好，李作鵬因心臟病發作，搶救了幾次；黃永勝肝病一直不好，總是在堅持工作，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他幾次都是發高燒還參加會議。黃永勝是軍委辦事組的領頭人，他跟江青是講原則的，他並不因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而遷就她，而在原則問題上和江青常有爭論和鬥爭。總理當時對黃永勝很器重也是在原則問題上和江青的問題，總理看得很清楚，而總理顧全主席，常要很讚賞，因為對江青的問題，有些同志怒都不敢怒，更不敢言了。這遷就江青，叫做敢怒不敢言吧。有些同志怒都不敢怒，更不敢言了。這樣，大家想說的話，都由黃說出來了。黃永勝的正氣是很可貴的。抵制江青對政治局工作的干擾，黃是有大功的。比如說，楊成武對蕭力是很恭敬，軍報的事蕭力說了算。黃永勝來了後，認為軍報是好的，甚至很恭敬，軍報的事蕭力說了算。黃永勝認爲軍報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很重要的部門，讓李作鵬親自抓，黃永勝認爲軍報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當權派，因此不要搞垮那麼多人，盡量多一些人工作。黃還特別提到對蕭力有不同意見，不能說目的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志，這樣別人還怎麼開展工作。誰料得到，江青馬上就知道了，跑到辦事組來發黃永勝的脾氣，黃永勝不怕江青，他拿起電話就對總理說：「一會開會我要晚到了，江青同志在這裏發火。」過了不久總理竟然到了京西賓館，勸了江青很久，等江青消了一點氣，就和江青、黃永勝、吳法憲一起去開碰頭會了。不久主席也知道了這件事，不但沒有批評黃永勝，反而把蕭力從軍報調走了。

黃永勝在不許江青插手軍隊，不許中央文革的人插手軍隊，不允許江青的代理人插手軍隊方面做得是很好的，這樣軍隊一直是穩定的。在總理領導的政治局的工作中，軍委辦事組是中流砥柱。我不是說我們這些人有多大本事，而是說，黨給了你這個位子，你就爲黨的根本利益在努力工作。有些人號稱和「四人幫」作了鬥爭，其實，他們和「四人幫」的所謂鬥爭，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後，是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後，那算什麼鬥爭呢？！我們和「四人幫」（那時還不這麼叫）的鬥爭，是毛主席健在的時候，是江青他們在臺上是領導人的時候，是肯定文革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些自詡和江青鬥爭的人，正含著熱淚向主席請罪呢。

批判軍隊「二月逆流」

黃永勝上臺之後，對他的前任楊成武的工作，沒有做太多的清理就接過去了。黃永勝是不愛整人的，但卻從楊的手中接過了在軍隊批判「二月逆流」的棘手問題，說穿了就是在軍隊批元帥，這個問題，也留下了把柄，被人利用了。其實黃永勝和我，還有吳法憲、李作鵬和葉帥的關係都是很好的。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天安門城樓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初，黃永勝、吳法憲參加中央碰頭會議回來，向軍委辦事組傳達說：「康生說：主席對我說，葉劍英的問題不少，讓搞個材料來看看，由辦事組來辦。江青說：從楊成武的問題可以看出，軍隊從文化革命以來，表演不少，但我們注意不夠，你們組織人把他的材料搞出來，我們要很好研究這個人的問題。」江青說的當然不對，她恨誰就無端攻擊誰。譬如對楊成武，她從拚命拉楊到一腳踢開楊，對楊下手很度我還不清楚。一散會我就問總理，總理說：『康老、江青交待的事還是要辦的。』」

批判「二月逆流」，是毛主席、中央佈置的事，是公事，全黨全軍都要動的，其實楊成武早就和葉劍英劃清界限了。一九六七年五月，我的老伴到西山去，碰到葉帥在院子裏曬太陽，在閒談時，葉帥特別說到：「我們出了點問題（指「二月逆流」），現在，我有事給楊成武打電話，他都不接，說病了，可晚上看電視他在接見外賓，這個人，變得真快。」

我聽了黃、吳傳達之後，立即提出了疑問。我說：「沒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我們可以搞葉帥的材料嗎？不管怎麼樣，他還是一個坐了冷板凳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啊，對我們幾位也是情長誼深嘛！我看，這樣的問題是值得考慮的！」

當時，對中央文革的「權威」，黃、吳在腦子裏是有抵觸的。但要他們違抗指示還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當時總理對老帥的態度也不夠好，有一天他到京西賓館來吃夜餐，然後和我們幾個閒談，他把幾個元帥挨個挖苦了一頓。因此，他們當然對我提的問題就敢聽不敢進耳朵裏去了，而且他們還會認爲我提這樣的問題也未免有點不懂事。對我的意見，他們祇好不理睬，並且沒有經過什麼討論就定下來了。在會上定了三條：一是，材料組，由海軍派一個得力幹部任組長，名稱就叫「一號材料組」；二是，保密，不許外傳；三是，由李作鵬具體組織領導這一工作。事有湊巧，會後祇有兩、三天，李就病了，黃、吳指定我代替他臨時管理該事。

我代管之後辦了一些具體事。首先是把材料組建起來。海軍保衛部一個處長韋建功任組長。其次是批准過材料組可以調閱軍委辦公廳、

總政治部有關檔案材料。第三是，為了保密，我要總後司令部陳龐副參謀長為材料組借用了總後的房子。第四是，我批准打印了材料初稿。材料初稿打印之後不久，李作鵬的病就好了，我也就宣佈不管材料組的事了。李看了初稿後，指示把稿子做了很大的修改，並拉成十幾條。後來黃又去向林匯報，林發話不讓搞。這樣，辦事組還未正式討論，黃就下令把材料全部燒了，一份不准留，連零星草稿也燒了，黃祇說了一句：「這件事過去了就阿彌陀佛了。」材料組解散了，各回原單位去了。這件事根本沒有擴散。

批判「二月逆流」的問題，中央通知全國都搞了，軍隊的駐京各單位也搞了，總後機關也搞了批「二月逆流」，並出了一期簡報。簡報的標題就是：批判「二月逆流」黑幹將葉劍英。簡報的內容我作了修改，指名批判葉劍英的提法都刪去了。但簡報標題忽略了修改，仍保持原樣。一九八〇年中央審查小組還對此作為一個問題，對我專門進行了審查，我作了如實的說明。其實，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二月逆流」的問題元帥們自己都認了，幾個元帥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比我們講的調子還高得多，給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

黃永勝從楊成武的手上接過來的另一個燙手的東西，就是「二辦」，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屬於部隊的專案放在「二辦」，「二辦」的工作是絕對保密的，不論是楊成武時期，還是黃永勝時期，我和李作鵬都沒有參加，祇有葉向真專案組的幾件具體事交給我辦過。關於「二辦」的事楊成武有時還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時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長。

露一點風，主要是爲了表示主席、中央對他的信任，他也帶我去看過一次在押的羅瑞卿等人。「二辦」的定案工作在楊成武時期就基本完成了，黃永勝祇是接了「二辦」主任這個官位，決策工作在楊成武出事後，都收回在總理、江青、康生手上。我認爲不論是楊成武時期，還是黃永勝時期，他們管「二辦」都是在爲黨做工作，爲毛主席、爲中央做工作，發生的對與錯問題，是與非問題，恩與怨問題，都應由中央負責。不能說黃管「二辦」時的工作就是犯罪，楊成武就沒事。你們看看黃克誠的回憶錄，黃老說黃永勝時期比以前（楊成武時期）日子好過多了。

辦事組的主要工作

第一件，加強戰備工作。

加強戰備是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一直放在主要議事日程上，始終沒有放鬆的工作。在這一時期，戰備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九五九年秋，林總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加強戰備是中心工作之一，制定了作戰方針和作戰計劃，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國防建設和軍隊本身的戰備建設，整個戰備有了比較好的基礎。在文化革命中，軍委辦事組對戰備工作，主要抓了如下幾個問題：

加強了對三北（東北、華北、西北）的戰備工作。爲了落實戰備，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以後，先後開過三次三北戰備會議。一九六九年冬，毛主席派汪東興去東北檢查過戰備，這對軍委辦事組是很實際的督促。接著，黃永勝也親自到華北（張家口至寧夏）和東北（哈爾濱、齊齊哈爾）實地檢查戰備。到華北是我陪黃去的，那次視察，對邊防部隊，第二線的野戰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軍事訓練、國防工事、通信聯絡、後勤保障等等存在的問題，都逐一進行了解決。特別是從張北到二連地區，改造地形的建設進一步落實了。這次地形的改造，對抵禦蘇修機械化部隊進攻，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對北京的安全也會起很大的作用。

在形勢逐漸緊張的情況下，對全國部隊進行了調整，在太行山周圍，包括西安、洛陽、鄭州在內，集中了全軍野戰部隊約五分之一，作爲統帥部總預備隊。對蘇修的作戰方針是：既實行邊境防禦，又實行誘敵深入的兩手準備。

物資準備是戰備工作的重要問題，在周總理的具體指導下，我軍的物資儲備是相當可觀的。在三北各個戰役方向都儲備了必要數量和品種的物資。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基本上準備起來了，對部隊物資保障能力大大提高了。為了防敵突襲，大部分物資都上了山溝，並有相當數量的物資進了洞庫。

第二件，三支兩軍工作。

關於三支兩軍前面已經說過了。當時全國很多地區和單位都軍管和支左了，軍隊參加軍管的幹部、戰士，不僅現在，就是當時也是難以統計的。可以這樣說，當時軍隊的戰備、農副業生產、三支兩軍是交錯進行的。軍隊參加三支兩軍的情況，概括起來也可以這樣說：軍隊除值班的陸軍、飛行部隊、水上部隊沒有整隊參加三支兩軍工作外，其餘的一律參加了。軍隊的幹部約百分之九十參加過三支兩軍工作。

總理對軍隊支左和辦事組對他的支持一直是感激的。他常說這樣的話：人民解放軍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我們的指戰員在三支兩軍中吃了苦頭，但受到了鍛煉，過去我們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不但講三大紀律，而且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打傷了，甚至打死了也不開槍，執行任務不帶槍，解放軍戰士在被圍、被困、挨打的時候還高舉《毛主席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世界上哪有這麼好的軍隊？

第三件，管理國防工業。

我國的國防工業，不僅是同國家的工業一起發展起來的，而且是向來都佔領先地位。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關懷下，我國建設起了比較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國防工業對我軍的裝備和支援世界革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國防工業向來都是周總理具體組織實施的，趙爾陸是建設和管理國防工業的創始人，一九六〇年以後，賀龍、羅瑞卿把趙爾陸「趕下臺」了，成立了以賀龍掛帥的國防工業委員會。以後又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羅瑞卿兼主任，趙爾陸副之，我也搞了個副主任。因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具體工作，自己把這個官帽子給搞忘了，後來中央決定我管國防工業，我對總理說我不熟悉，王秉璋他們在行，總理叫人拿來一張任命書說：「你看，這是我給你下的委任狀。」我接過來一看，是一九六二年總理簽署的讓我當國防工辦副主任的任命書。這書寫在



一九七〇年周總理參觀我軍新研製的 69 式 40 火箭筒打坦克表演。

文化革命開始後，中央、國務院派粟裕任國防工業軍管小組組長。一九六八年開始實行國防工業生產、科研、使用相結合的方針。九大以後，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了常規兵器工業等四個領導小組：常規兵器工業領導小組，邱會作任組長；航空工業領導小組，吳法憲任組長；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李作鵬任組長；電訊工業領導小組，李作鵬任組長。經總理建議，毛主席決定將國務院系統的三機部、四

機部、五機部、六機部交部隊管，撤銷國防工業辦公室，在軍委辦事

組之下，成立了國防工業領導小組，邱會作任組長，統一管理整個國防工業的生產、基本建設和科學研究。當時，五機部是我管，我藉機把邱創成同志「撈」出來，安排在總後當副部長，總後的老同志都歡迎他。

軍隊自己管理國防工業，在國防工業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龐大的國防工業，工作量很大，在軍委辦事組領導下，成了我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國防工業無論在恢復生產還是科學研究、企業管理方面，在工業行業中都是處於領先地位。

第四件，機關整編。

一九六九年中，根據毛主席「鬥批改」，「精簡結構，下放科室人員」的指示，全軍大軍區以上的機關都進行整編。這次整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涉及到了複雜的問題。

整編精減機關是十分必要的。全軍大軍區以上的機關業務部門進行了合併，精減和撤消三個方面的工作。精簡機關工作人員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經毛主席批准，軍委辦事組公佈總參謀部、總後勤部機關精簡方案。據此，總參、總後機關進行精簡整編。

總參原編十五個部、局，精簡整編為十三個部、局。即：辦公廳（軍委辦公廳兼）、作戰部、情報部、三部、軍訓部、軍務動員部、防化學部、政治部、機要局、測繪局、外事局、氣象局、管理局。

總後原編十三個部、局，精簡整編為九個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應部、衛生部、裝備部、軍事運輸部、企業部、營房部、管理局。

年底，軍委辦事組公佈總政治部機關精簡方案。據此，總政機關由原編的十三個部、院，縮編為六個部、室。即：辦公室、組織部、幹部部、宣傳部、保衛部、群眾工作部。

此前，總政機關於一九六七年中期就陷於癱瘓狀態。一九六八年十月，毛主席下令總政軍事管制，我們派了王宏坤、劉江亭，總政的幹部都集中到高等軍事學院去辦學習班了。一九六九年十月，黃志勇、田維新被任命為總政副主任。十二月，總政恢復辦公，李德生任總政主任。李的任命，是林總向主席報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為了擋住江青要將張春橋放在總政主任這個位置的企圖。林總說過：「李現在同江青還沒有更密切的關係，在同他們的鬥爭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將來如果有變化，可以立即撤下來。」「九一三」以後，李德生深受毛主席信任，在十大當選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李德生卻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職務，據說毛主席說他自己「瞎了眼」，毛主席的話是什麼意思，不得而知。

精簡下來的幹部，用三種辦法進行安置，一是進「五七」幹校；二是到國防工業戰線和參加三支兩軍；三是，轉業、復員。這三條出路，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無可非議的。總後當然也要執行中央的部署，關鍵是誰走的問題，我總不能讓反對總後黨委，反對我的人留在機關工作，把擁護總後黨委，擁護我的人去上幹校，轉業復員吧。總之精簡勢在必行，誰去支左誰不高興，誰上幹校誰有意見，誰轉業復員誰鬧情緒，公審時又被當權者利用了，把按中央部署的正常工作說成了迫害。

第五件，節約鬧革命。

文革中，不論是大串連，還是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不論是農村、工廠打派仗，工廠停產半停產，還是鐵路、航運交通中斷，對國民經濟造成極大損失，也造成了極大的浪費。但是軍隊一直堅持勤儉治軍。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隊三支兩軍任務很重，但堅持訓練從不間斷，克服困難、自製訓練器材，不能實彈訓練，就模擬訓練。部隊指戰員的軍裝、被服、用品也相當節約，每人幾乎祇有一套像樣的衣服，大家都在打補丁，但革命精神非常高漲。我看到總後編輯的一本書說「九一三」之後的一九七二年，總後向國家上繳節餘軍費 32 億元，這就是我們省下來的。一九七四年總後又向國家上交結餘國防費 30 億元。這都是我們節省下來的。

軍委辦事組，除擔任軍隊本身的工作之外，還擔任了中央、國務院交辦的很多任務。文化革命開始不久，除了中央文革這個十足的老爺機構之外，其餘的機構都不起作用了。當時，唯有軍委辦事組是赫赫有名的實權機構。黨政及大部份的日常工作總理都交到軍委辦事組身上了，很多具體工作都是軍委辦事組組織辦理的。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對軍委辦事組的辦事能力是十分欣賞的。周總理說：「中央一級應當有幾個像軍委辦事組這樣的辦事機構！」林總對軍委辦事組有過很高的評價：「機構小，力量大；人員少，幹勁大；作風好，辦事快。」軍委辦事組的歷史經過新生、興盛和末日三個時期。從四人小組到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為新生時期；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九大前後為興盛時期，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即到了末日。事物本來有生有滅，但軍委辦事組的滅亡並非「壽終」，而是「夭折」。

九屆二中全會後，軍委辦事組的處境很困難。（一）毛主席說：「要給軍委辦事組『摻砂子』」。意思是說，軍委辦事組過於「純潔」，像一塊土壤一樣板結了，要摻砂子才能通氣；（二）毛主席指示說：「要恢復中央軍委的名義。軍委是多數的，辦事組是少數。」

軍委辦事組歷時五年，它是文化革命時期軍隊的統帥部。在黨的九大之前，中央文革單獨霸佔了中央碰頭會的領導大權時期，軍隊都沒有被搞亂，這是軍委辦事組最大的功勞。在既要穩定軍隊，又要搞好軍隊文化革命的總方針指導下，軍委辦事組和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起，和擅權欺人、胡作非為的江青進行堅決的鬥爭，和中央文革的各種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是完成了歷史任務的。這是軍委辦事組的重大貢獻。「九一三」之後，加在軍委辦事組頭上的罪名就不知有多少。軍委辦事組在歷史上是功還是過，天下一切公道人，甚至可以包括許多不公道的人在內，都是不糊塗的！

從四人小組到兩屆軍委辦事組，歷時五年。為什麼用這樣一個組織機構來領導和統帥軍隊？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總同黃永勝的談話（吳法憲、邱會作在座）就可說明問題的真相。林總說：「去年，全軍文革垮了，江青幾次提議要恢復全軍文革，我都沒有表態。要恢復全軍文革，就會有人插手軍隊的文化革命，並在軍隊內部找他們的代理人。中央軍委常委的工作一時也難以恢復起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誰來管事。葉帥管事，軍隊喜歡，他們（指中央文革）不喜歡；徐帥管事，他們喜歡，軍隊不喜歡。祇好用辦事組來管大事，這是最靠得住的辦法。」軍委辦事組圓滿完成了任務。

「反江青俱樂部」

黨的領導人之中夫人作風不好的有之，但象江青這樣在全黨要霸道的，還是我黨有史以來第一個。江青的要霸道在文革中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林總的支持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是堅決反對江青的，也就是反對中央文革的，這是保衛人民解放軍決定性的鬥爭，在文革中保衛解放軍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衛黨和國家的頭等大事。歷史事實完全可以證明：在文化革命中，軍委辦事組是反對江青的英雄！反對江青成爲我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康生把我們的活動稱之爲「反江青俱樂部」。

過去有些事情看不清，現在就逐漸明白了。當毛主席爲反修防修搞文化大革命，林總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搞的是「造反有理」，不怕亂；相信群衆，依靠造反派，「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林彪希望文化革命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因此林彪從在上面的中央文革、江青一夥，到下面的造反派，都不感冒。另外，林彪看得清楚，毛主席在文革這個「公事」之外，還有些「私慮」。他要按他的「理想」行事，讓人民解放軍爲其服務時，林總就消極了怠工了。因爲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來看，在最重要的問題上背離了原來反修防修的宗旨。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現在想起來真是驚心動魄的問題，就是人民解放軍要盡力做好工作，從崇敬、愛護毛主席的感情出發，在具體工作中糾偏。鬥爭的主要形式就是抵制江青的錯誤，一心一意爲主席補臺，但客觀上、實際上就是抵制了毛主席利用解放軍辦「私慮」。但江青和毛主席在政治上的「根本」又

是一致的，這樣在客觀上又妨礙了主席的「私慮」，主席內心是不高興的。遺憾的是我們當時沒有認識到，問題十分複雜。黃永勝身為軍委辦事組的頭人，他熱愛毛主席，卻憎恨江青，挖苦、謾罵江青毫無顧忌，別人提醒他，他卻不以為然，再加上汪東興一個勁的誤導（汪總是說毛和江是兩回事），黃有一次竟說：「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們還是毛主席的兵呢！」，自以為和毛主席感情深。殊不知你就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戰一輩子，得罪了江青也是面目全非。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造反派也就同時出現了。從軍隊來說，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基本上是「空對空」，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對江青的造反路線的鬥爭就不同了，這個鬥爭是「實打實」的，是為了軍隊不受破壞而鬥爭的。我們對江青一夥的鬥爭是堅決的、認真的、積極的，當然這種鬥爭又是十分複雜的，因為毛主席對造反派是支持的態度。

限制江青為代表的造反勢力影響到軍隊，是鬥爭的中心問題。對江青和造反派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毛主席和江青的特殊關係，鬥爭又是複雜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江青除了一個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的頭銜之外之外，什麼還都不是，但她已經是以黨內第三號人物自居了，把總理根本不放在眼裏。對這個問題，她在公開場合所佔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場的場面，江青的位置總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數情況下，江青與林彪並肩出場，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後；凡是周總理領頭的場面，江青至少也是同總理並排出場；凡是中央文革單獨出場，江青當然就是「霸主」的位置，總是走在前頭，後面跟隨的人還要同她保持一段距離。當然，這祇是表面。關鍵是在當時的中央碰頭會上，江青總想「奪」總理的主位，總理對江青常常又很遷就，因此，在文革中整體的工作環境是很困難的，事情是很難辦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到四月間，毛主席在武漢派汪東興去東北檢查戰備時，來回都在北京小住。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在汪東興家長談過兩次，每次談的時間都在五小時以上，在三座門也長談過。所談的內容當時是天南地北的，但中心的是談毛主席與江青關係問題，據汪東興說，江青同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結束了。從

汪談話中，他讓我們確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並無特殊關係，當時我們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無顧慮了。現在看來，上了汪東興的當，也可能是汪出於對江青的不滿，借助我們反對江青；也可能是毛主席授意汪，要我們一頓，欲擒故縱吧。

江青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從她的舉動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凡進場見人先笑後說話，並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裏很高興的表現。凡進場不說話，也不同大家握手，氣沖沖地坐在那裏，就是心裏很不高興的表現，對她必須提防，否則誰都可能遭災。凡是坐下之後噘著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手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罵人了。

一九六八年夏的一天晚上，中央碰頭會議在釣魚臺 16 樓開會。因為要討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問題，周總理通知我也去參加會議。我到會場不久，江青來了。她入場的時候，全體的人員包括周恩來、康生在內，都要起立以示迎接。周、江、康為序的座位是固定的。坐下不久，護士給她端來一杯開水和送來一包藥。江青隨手端起開水喝了一口，水可能熱了，她隨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並大聲說：「唉呀！不得了！護士想用開水燙死我！你汪東興，這樣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呀！你心裏還有沒有毛主席呀？」我坐得比較遠，也被扔茶杯的響聲嚇了一跳。在此情況下，汪東興只好出到外間，叫護士給江青重端來了一杯開水。開水送來之後，總理觸手在杯上摸了一下，並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江青這下才息怒，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說話了。

一九六八年冬，江青病了。大概有些天，除了張春橋、姚文元去看過她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去看她，她的心裏很不舒服，要找機會出氣。一天，江青對著她的秘書、護士和總醫院去為她看病的醫生兇狠狠地問：「中央碰頭會議的那些人是都病了，還是都死了？」工作人員都知道他問話的意思。事後，她的護士同我和葉群在電話上說了，葉就要黃、吳去看她。後來，護士同江青說：「黃總長、吳副總長來看江青同志，並問江青同志好！」江青還是兇狠狠地說：「他們現在不用我保護了，有權有勢了，還來看我？我才不稀罕！」

江青為了掩蓋自己的醜事，一九六七年秋天總理和楊成武派人到上海、杭州、南京抓了一批人。江、浙、滬兩省一市的公安局_{字讀同社}_{局長}制作抓

了不少人，連她在三十年代的保姆也抓起來了，並一律用飛機運送到北京關進了秦城監獄。

江青不僅抓了自己的仇人，也提出要為別人抓人。一次，總理、楊成武、吳法憲和我在場，江青對葉群說：「傅連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過林副主席嗎？現在，為什麼不報仇！」葉群笑了笑回答說：「傅連暲還好，就是教林副主席養身之道，現在他（林）自己都會查藥典了。」江青認為葉群不識抬舉，立即說：「把傅連暲抓起來，待後再處理。」大家都認為葉群不識抬舉，也就過了一天衛戍區來了吭聲，江青就火了，這時總理說這件事我來辦。也就過了一天衛戍區來了幾個人，給我看了總理的條子：「把傅連暲交給來人，周恩來。」我看了條子之後知道總理並不是指名叫我辦的，我就給總後副參謀長陳龐打了電話，陳龐帶著他們到了香山傅的住處，翻牆進去把傅連暲帶走了，並關進了秦城。

江青的劣跡是很多的，黃永勝抵制江青是堅決的。黃的這種堅決有堅持原則的一面，也有不知毛、江深層次關係的一面；而總理常常對江青是「顧全大局」的，這種「顧全大局」有總理相忍為安的一面，也有他知道毛、江深層次關係的一面。江青鬧事常常搞得大家不得安寧，有一次江青為軍委辦事組的事對總理發了火，總理深更半夜就把黃永勝、吳法憲叫去。黃永勝的安眠藥正在起作用，為了給黃提提神，總理給他倒了一杯咖啡，黃沒拿住，撒了總理一腿，總理忙說：「沒事，沒事。」（事後黃永勝在辦事組說起這事，還為總理的處境而難過。）總理接著說了江青發脾氣的事，並說：「我明天帶上你們幾個去看江青同志，任他發火，你們一句話也不要說。」第二天，總理帶上黃、吳、李、邱去看江青，到了江青的住處，等了很久江青才傲裏傲氣地從樓上往下走，總理趕忙上去扶江青，其實江青哪裏需要扶嘛！我們都看不過眼。

反江青的兩個不同時期

軍委辦事組抵制江青是有個發展過程的。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楊成武時期；黃永勝時期。這兩個時期，楊成武時期，合作是主要的。在黃永勝時期，毛主席對江青的任何動向，汪東興會立即傳到葉群那裏去，葉又轉手傳到黃永勝、吳法憲那裏去；林彪對江青的任何動向，葉群會立即傳到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那裏去；汪東興、葉群、黃永勝、

吳法憲四個人，是運轉這種動向的中心人物。以前說過，楊成武是林總最親信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會議後他實際上成為林總的接班人了。林總的任何活動，楊成武都是瞭如指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對林總、江青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句不說，一字不漏的。從文化革命開始，到楊成武下臺，我和李作鵬、張秀川同楊成武的關係算是最親近的了，但對林總和江青之間的「關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從一九六八年三月黃永勝上臺之初，他同楊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樣的，關於林總、江青之間的關係也是滴水不漏的。黃、吳、李、邱都是同一個桌子辦公的，黃、吳兩個人挨著坐在一起，他們要是有什麼事，總是交頭接耳，或者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商量。有時乾脆要李、邱離開。究竟是什麼事要這樣辦，我們二人同他們二人相互之間，大體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的事還是範圍越小越好。因此之故，我們之間也就不會發生什麼工作上的「誤會」。

八屆十二中全會正在進行的時候，有一次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開會，黃、吳先到了，並興高采烈地在說：「……他們不止是一個宗派，是一個幫會，是上海幫。」我們聽到黃、吳正在說話，我把李作鵬拉了一下就向外走。黃即說：「你們兩個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們談點你們聽不到的話。」黃永勝接著說：「林總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義。這個問題今後會向你們說清楚的。」從此以後，關於林總、江青之間的關係，黃、吳對我們的態度確實有些變了。首先是對一些重大問題，黃、吳對李、邱就會透露一些了，其次，對李、邱有關的問題，他們也會分別同我們「個別談話」，提醒我們不要撞到江青的槍口上。

九大之後、黃、吳、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了，可以同桌共議了。關於林總、江青之間的問題，我們四人之間無話不說了，我們四個人的關係起了質的變化。黃說：「過去有些事沒有同你們說，有過去的情況。現在就會一切都同你們說的，毫無保留了。不僅如此，過去沒有同你們說過的事，也會同你們說的，補上這一課。因為事情都有一個發展過程，過去的事不同你們說清楚，就不能為你們瞭解今天。我們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出了什麼事，我們一個也跑不了的。你們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說完他自己笑了起來。

黃、吳關於林總和江青之間的問題，確實同我和李作鵬「補了一課」，而且是內容非常豐富的一課。在九大期間，有一天，黃、吳、李、邱四人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東邊大房間從晚上八時談到第二天早上六時，一共談了十個小時，我們是邊談邊議的！

我們對江青一夥的問題確實談得很多的。如有重要問題，不管是三更半夜，祇要一叫，就會風雨無阻地聚集在一起的。我們自己也開玩笑說：「我們這樣經常談論別人（指江青）的長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們五馬分屍不可！」

爲了好談論問題，我們爲上海幫幾個人都編了「代號」。康生叫「8樓」（住釣魚臺8號樓）或「兩撇」（八字鬚之意）；江青叫「11樓」（住釣魚臺11號樓）；張春橋「眼鏡」；姚文元叫「小的」。這樣，我們打電話和見面都使用代號，有時祇要打個手勢就行了。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兩個手指（11）就是指江青。

黃、吳、李、邱同康、江、張、姚之間，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人以群分」。我們之間，如果不是有意同他們湊合湊合的話，那麼，無論休息、走路、吃飯、政治局開會坐位置等等都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楚河漢界」了。

黃、吳、李、邱每人都有一本反上海幫的老賬。從數量上來說，我的賬最多。這是因爲江青支持二醫大整我和調「紅縱」來對我搞武鬥，我實在太傷心了！因此，我就裝著一付「老憨」的樣子，什麼都敢說。江青就向葉群說過：「邱會作這個人，爲什麼那樣不講禮貌！」

在反對江青的問題上，林彪的支持是一條，但最重要的是總理心中的支持和其他老同志心中的支持。在當時的政治局中，總理，黃、吳、李、邱，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等等都是一派，祇有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是一夥。其他不參加政治局辦公的人，如朱德、葉帥、董老、劉帥，在大的問題上，和大家也是一致的。在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中，總理看得清，但他怕主席、不敢得罪江青，他總以過去有賬，怕主席挖傷疤；黃、吳、李、邱都是紅小鬼出身，一直在軍隊工作，沒有歷史問題，政治上一身清，又是「雙一」（一軍團、一方面軍），毛主席、林彪、總理都信任我們，所以們敢頂碰江青。

尤其是我們反江青對總理領導的蔑視，反對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對討論重要問題的破壞。總理是非常智慧的人，他事事心知肚明，總理又是十分顧全大局的人。總理雖然不敢出面冒犯江青，但在後面支持我們，有時在會上還故意「和稀泥」。祇要是總理和了稀泥，會後他會我們說明，並教育我們有些非原則的事，不要搞得太衝突。譬如，大會堂有一個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開會休息時，吳法憲和姚文元都去搶這個地方，吳法憲雖胖，速度遠比姚文元快，我們搶到了這個地方，江青、張春橋他們就不去了，然後我們幾個再過去，其他同志也過去吃冰激凌；如果姚文元搶到這個地方，也祇有江青、張春橋過去，其他人都不過去，起來伸伸懶腰就原地休息。

這個「反」不簡單呀，是擁護毛主席，反對江青，廬山會議之前汪東興和我們又是一致的，這樣就扼制了江青一夥不少對中央正常工作的擾亂。九大以後，有一段形勢不錯，就是通過抵制江青一夥，扼制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線，被江青一夥搬弄得往更「左」的方向發展、蔓延。

我抵制江青的事例，還記得一些，例舉如下若干條：

1、同邱國光的談話。一九六八年七月間，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邱國光調任中央衛生部軍管小組組長。到任之前，黃永勝和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直截了當地向邱國光說了不要上江青的當，主要談了兩點。一是，不要他插手北京醫院「三一〇」專案。我同他說，北京醫院的專案是江青親自設立的，任何人不能插手。別人要是插了手，自己就會被變為專案對象的，你要是插了手也會變轉為專案對象的。二是，中央衛生部的文化革命，不要陷入派性。北京的派性就像你們廣州的「廣交會」一樣的，你祇要不注意，別人就會同你做交易的。我說了之後，黃永勝還接著說了：「你們一家子（都姓邱）說的問題要特別注意，又要特別保密。如果傳出去了，其後果是難以設想的。」

2、不投江青的票。選舉前的一天，辦事組的在京西賓館開會，黃永勝在會上專門講了毛主席強調要自主選舉，不要受制於他人，散會時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是不會投 11 樓的票。」黃永勝膽子好大，因為溫玉成、劉賢權等也在場，甚至記錄的秘書也在。選舉中央委員時，我沒有投江青的票，但我是自主選舉的。選舉之後，江青少了若干張票，葉群則少的不多。這個問題，對一般人來說，簡直不是問題，對江青則是大

得了不起的問題。在唱票時，江青聽到她自己少了票立即退席了，這個結果是出乎江青預料之外的。張春橋氣勢兇兇地提出要查選票，他說：「江青少了若干張票，不是「小」代表不投票，而是「大」代表搞的，這不是得票多少的問題，是政治鬥爭。」毛主席知道後，可能嫌江青他們太囂張，主席說：「你們要違背剛剛通過的黨章，你們就去查，我是不參加你們的大合唱的。」這樣這場風波才平息下去，但雙方結成大仇。

3、勸丁盛不投江青的票。九屆一中全會就要開會之時，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的外面，我同丁盛一邊喝水，一邊閒談。我說：「等一會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如果候選人名單上有江青的名字，就不要投她的票。她是一個反軍派，也是反對林副主席的健將！」丁盛回答我說：「江青是這樣一個人啊！誰反對林副主席，反對解放軍，我們不答應！誰還投她的票？」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時，江青一夥都少了好幾張票，這對他們來說，是十分意外，沒有想到的問題。

4、拒絕為江青選調護士。一九七〇年秋，汪東興當著江青的面，要我為她選換一個護士。汪東興說：「江青同志現在的護士，是我們倆人共同在總後系統選的。她快要生孩子，請你還是在總後系統選換一個為好。」我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你自己直接找曹根慧（三〇一醫院副院長）辦吧，我再不造孽了（指江青對護士太厲害了）！」江青聽到我說話之後，她睜大兩隻眼瞪著我，一時沒有說出話來。正在這時，葉群插上話來了。她說：「為江青選調護士的事，由我來辦。」這樣江青的火才沒有發出來。

5、拒絕陪江青上井岡山。一九七一年七月，江青自言自語地說：「我準備上井岡山去接受歷史教育，要有一個適當的人陪我一起去。」接著，江青對著我說：「吳法憲陪我去過海南島，李作鵬陪我去過一次青島，下次上井岡山該你陪我去了。」我調侃地拒絕說：「我沒有上過井岡山。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我脫了開檔褲子還不久呢。」江青外出，為什麼一定要解放軍的高級幹部陪同？我認為這也是她惡霸作風的一種表現。首先她認為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外出應當受到特殊的保護。其次，她認為自己是中央的「要人」，解放軍有保護自己的責任。第三，她認為祇有解放軍、公安、衛生部門保駕外出，才夠出風頭的。總之，毛主席、林總、周總理能夠享受的待遇，江青都要爭著享受。

6、拒絕為江青的樣板團做演出服。江青有意把她的樣板團打扮打扮，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此事非找我我就不能解決問題。江青對著我說：「你們部隊的毛料子的確良很好，適宜做演出服。樣板團的演出服需要解」江青有意沒有把話說完，她的意思是要我主動提出來。但我就是不決。」江青當場就感到有點難受。當時，總理正在會場上吃飯，他知說那句話，她當場就感到有點難受。當時，總理正在會場上吃飯，他知道我不會主動為江青辦事的。總理怕江青為此事發我脾氣，就一邊吃飯一邊說：「樣板團演出服，由我來同邱會作同志商量。」江青聽到總理的話，就面上帶有笑容地說：「我們大家都要學習總理辦事的精神。」

7、拒絕管電影、電視工業。從一九六九年起，我是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統管國防工業。幾年來國防工業管得不錯，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表揚我。當時的電影、電視工業廠子雖然不多，但問題很多，總理也正在考慮「兩電」工業劃歸國防工業系統管理，並徵求我的意見。我對總理說：「總理交代我辦的事，除了執行之外我不會有任何考慮的。我不想管『兩電』不是怕工作多，就怕吃冤枉！」總理同意了我的意見。江青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她直截了當地同我說：「電影電視工業由你來管，要用很大的力量來辦好這一工作，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說：「國防工業就夠我管的了，我管不了電影電視工業。」江青立即向我大發脾氣說：「國防工業的工廠數以百計，你都管得了，就管不了電影電視幾個工廠，真是豈有此理！」黃永勝看到我不好下臺了，他插話說：「電影電視工業怎麼樣管，要由總理來考慮決定，因為還有與國務院各部門的關係問題。」周總理接著說：「對！由我召集一次專門會議研究一下，再決定管理辦法。」江青聽到黃永勝和總理的話之後，沒有再發火了，但撇著一個嘴巴，一句話也不說了。我也坐在那裏不吭氣就是了。

8、要丁盛防範江青。一九七一年五月間，我陪同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黎筭去廣州參觀訪問時，我同丁盛說：「江青最近接連來過廣州兩次，從她的嘴裏可以聽到她對廣州很感興趣，對你這個司令也很感興趣。她還會來的，她可能給你什麼好處，可最終會是你的災難，你可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就要吃虧、上當的。」我接著還說了：「江青這個人是靠不住的，她要是用你的時候，把你捧到九宵還嫌低，她要是不用你，

則把你打到十八層地獄還嫌淺呢。」我最後還說了：「防範她的辦法很多，不要單獨接近她，不要向她請示匯報什麼問題。」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我不瞭解江青，沒有個別接觸過她，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對她敬而遠之。在文革中，看她那樣飛揚跋扈，我不理解；他亂點老幹部的名，我開始厭惡她，後來我知道她整我之後，我就開始反對她。我是不怕江青的，敢於對她頂撞。我認為江青不過是一隻鍍了金的紙老虎，沒有什麼可怕的！黃、吳、李、邱反江青是眾所周知的，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我是無法回憶全面的。

對江青一夥的問題，無論在我們幾個人（黃、吳、李、邱）之內，或是在更大的範圍之內，行動是統一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許多問題就是這樣的。當然，這個問題更多的事例是在九大之後。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之後，張春橋就說過：「過去中央政治局開會，有大會也有小會，大會常常搞不過小會。」他所說的就是我們抵制某些問題的統一行動。張春橋又說：「過去在福建廳（政治局會場）開會，每次開會吳法憲至少要打三次電話。」林彪、江青之間，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就存在矛盾。這種矛盾，隨著形勢的進展，一直在鬥爭，並且逐漸尖銳化了。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他們之間的矛盾明朗化了，九大之後就尖銳化了，九屆二中全會在特定的條件下，鬥爭的結果是林彪失敗了，江青勝利了。這就是林彪、江青之間的真正歷史。

話又說回來，江青遭人恨是事實，但江青的問題主要還是思想意識和思想品質問題，這裏面有江青的責任，這是主要的；也有毛主席的遷就，這也是不能忽視的。但總起來說，軍委辦事組和江青一夥的鬥爭仍是黨內問題，和公審搞的是兩回事。公審是通過搞江青否定文革，搞臭毛主席罷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間，中央專案組李震、郭玉峰、吳忠在對我審查時，就指出了我們反對江青的三個問題：（一）「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問題就是反對江青，反對江青就是反對黨；（二）你們反對江青是經常的，可以說達到了無事不反的程度了；（三）九大時有組織地減少江青的選票在黨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對他們說的，我除了沒有同意「反對江青就是反對黨」之外，其餘的我都同意了。

李必達事件

李必達事件是發生在九屆一中全會將要舉行的時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準備過程中。

李必達是黃永勝從廣州軍區帶到北京來的秘書之一，李是個大學生，在文化革命前參軍到 41 軍，各方面表現還不錯。他所在的團領導是黃永勝的老秘書，經推薦及保衛部門審查後，調到軍區不久就當了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初到黃辦任秘書，幹的不錯，黃永勝夫婦都很滿意。項輝方對李必達也很關愛，曾幾次親自出馬為他找對象。

文革中有一句話倒是很對的，那就是說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李必達的靈魂也被腐蝕爛了。李必達家境貧寒，甚至家裏因貧寒把他賣掉。在文革中，李必達名利熏心，想當出人頭地的風雲人物，幹驚天動地的大事，撈取政治資本。

黃永勝無疑是擁護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下有序進行。文革一亂，那麼多老幹部受衝擊，黃永勝看不慣，六七年初在京西賓館開會，他當著江青的面就說：「江青同志要聽毛主席的話！」那時他們就結下了仇。黃到中央以後，和江青同桌辦公了，他對江青就瞭解更多了，江青那種頤指氣使、飛揚跋扈、狗仗人勢的勁頭，她對總理那種放肆的樣子，實在讓人難忍。黃畢竟是秋收起義的老資格，他敢於和江青鬥爭，總理也樂得他和江青鬥，因為江青對黨的正常工作干擾太大了。黃除了抵制江青，和她鬥爭，背後也罵她「武則天」、「慈禧」、「惡霸」、「對老幹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達偶爾聽到黃永勝罵江青的一言半語，開始感到吃驚和好奇，後來竟發展到偷聽黃永勝與總理、與葉群等人電話的地步，他認為黃永勝這些說出去要殺頭的話，總會派上用場。果不其然，他的惡作劇終於發生了。

當時，中央安排黃永勝在北京針織總廠蹲點，黃派李必達在廠裏盯守，但他常跑出去辦私事，不能忠於職守。同時，李必達因工作中的其他錯誤受到批評，他不能正確對待，以至發展到了說是鬼迷心竅也成，說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當大英雄，終於決定鋌而走險，把他平時聽到的黃永勝、葉群等人及軍委辦事組對江青的壞話和不恭，以及把偷聽到黃永勝在軍委首長之間的電話內容記下來，向江青告狀，想扳倒黃永勝。

李必達告黃永勝罵江青的信，寫了至少有兩三封，他甚至利用職務之便，嚴重違反軍紀，假借黃永勝辦公室的名義，蓋上「黃永勝同志處」（即黃辦）的公章，從總參謀部機要局發出一封給江青的信，隨後又通過電話查問，確知他的信已經發出才放下心來。蓋上「黃永勝同志處」發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員馬元剛登記才能以機要通信發出。李必達私走機要通信的行為，不論從當時看，從現在看，都是極其嚴重的違反黨紀國法的犯罪行為。

李必達在信中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人經常惡毒地攻擊江青同志，他們是一個反對敬愛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團！」黃永勝是誰？是我軍的總參謀長；葉群是誰？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寫這樣的信，問題顯然是很嚴重的。

還有一封信是通過溫玉成轉的。李必達從北京針織總廠跑到溫玉成那裏向溫玉成做了匯報，並把信交給了溫。李要賴說，溫不答應他就不走。溫雖然收下信，但並沒有如李必達的願，李必達太卑鄙太齷齪了，溫玉成經過考慮把李必達的這封信轉到了葉群手上，因為葉群是林副統帥的夫人。溫玉成這樣處理，這是李必達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六日，凌晨三時多，黃永勝有事找李必達，派人到針織總廠沒找到，說兩天沒來了；又到京西賓館找，偶而發現了他的問題。李必達的房子裏，在未燒盡的紙灰裏發現了一張燒殘的紙片，上面寫著：「敬愛的江青同志，我是黃永勝的秘書……」這樣簡單的兩行字，完全可以說明問題。黃大吃一驚，馬上派了幾路人馬找李必達，終於在住京西賓館的總後九大代表王瑞華（他的未婚妻）的房間內找到了。但李究竟寫了什麼具體東西，送到哪裏去了，則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由於李的未婚妻是總後三〇一醫院的，想從她嘴裏瞭解一些情況，於是黃把我叫去了。我到了京西賓館會議樓一層東廳，黃、吳、葉坐在那裏，有些木訥，一句話也不說。還是葉群開始同我說話，她說：「黃總長的後院起火了！」接著葉群就同我說了事情的前後經過。我聽後也有些緊張，畢竟搞到了江青頭上。葉群急切地說：「你這個一精明人，提點解決的辦法吧！」我回答說：「大家一起想，刀山火海也要過呀！」此時，黃也精神起來了，我們就一起談起了解決的辦法。

毛主席對此事的態度黃、吳、葉也不知道，三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但大家分析，信肯定不祇寫了一封，災難絕沒有過去。我說：「根據李必達的態度，不是很快可以把問題搞個水落石出的，目前應做做三件事：1、找小王（瑞華）談話，看看是能否找到材料的底稿；2、要立即向總理報告，以防被動。此外還要考慮「闖江青」一下。」

黃永勝說：其他的都好辦，唯有闖江青難辦？

葉群說：這關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從江青的態度就可以看出個大概來。現在就要給江青那裏發一個電話記錄稿過去，內容就寫：「十時整，黃總長要向江青同志匯報一些情況。」他們同意了，電話記錄立即發出去了。

十點多一點，江青向黃永勝直接來了一個電話。她開口就說：「你要來抄我的家嗎？」祇說了一句，電話就掛了。

根據江青在電話上的態度可以得出如下的判斷：李必達給江青寫的信，已經送到了江青的手中。但信的內容是無法知道的。這時黃、吳、葉就更憂慮了。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大禍將要臨頭了。

我們幾個共同商量 1、要找小王談話，看李是否在她家存有什麼東西（李同王的母親很熟悉）；2、立即把李必達看管起來；3、今天就要去向總理匯報。

四月二十八日，九屆一中全會剛結束，黃永勝對警衛參謀李學金說：「我命令你把李必達抓起來！」抓了李必達即派飛機把他送到廣州軍區關押。事後，黃辦的人到北京針織總廠收拾李必達的東西，在紙簍裏搜到李必達給江青、張春橋寫信的碎紙片。

我親自找小王談過話，所得情況非常重要。她說李必達直接同江青寫了材料，其內容都是黃總長、吳副總長、葉主任罵江青的一些具體記錄。材料有二十多頁，材料寫好後，李親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隨後，我和一名工作人員帶著王到她家去一無所得。

「五一」節後的一個晚上，約九點多鐘，我去向總理匯報了李必達的事。總理聽了我所講的情況之後，說了兩點：1、江青曾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她說「我可能要遭到暗害！」祇說了這一句，她就把電話放下了。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們（指軍委辦事組）有什麼

爭論：2、對李必達暫可以這樣處理，我知道就行了，現在還不必寫報告。

此後，黃、吳、葉、邱又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東邊大房間裏共商對

李必達事件的處理。

大家認為，第一，對情況已經基本上搞清楚了。李必達向江青直接

寫了材料，所寫內容就是有關我們反江青的問題。

第二，江青收到材料之後，估計會送給毛主席一閱的。主席會表什

麼態，現在還不知道。但軍委辦事組反對江青，毛主席是早就知道一些

的。

第三，周總理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很好的。

九屆一中全會之後，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開會之前，江青怒氣沖沖、自言自語地說：「有些人天天罵我，打電話都在罵我，他們對我恨之入骨。現在『九大』開過了，我看會罵的更厲害的！」她說了一頓之後，就從自己的皮包裏拿出一封信，擺在總理面前的茶几上，並說：「信的內容，現在不能看。」總理拿著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話也沒有說，也沒有看江青一眼，繼續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說：「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後，也多一個見證人嘛。」她說完話，把小手巾往桌子上一摔，這是她心中有氣的時候慣用的做法。黃、吳、葉、李、邱和大家一樣，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橫寫的字是：「送釣魚臺十一樓交江青同志親收。」下面寫的是黃永勝同志處。黃永勝一看就是李必達的字。江青用了一個比較大的信封並寫上：「即送主席親閱。江青」（這是豎寫的）。毛主席用鉛筆在「主席」二字上劃了一個圈，一個箭頭劃向江青的名字，並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寫了一個「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們看了一下之後，一句話沒有說，也沒有什麼表情，但心中高興！在這裏得到了三點證明：一是，李必達寫的材料毛主席看過了；二是，江青承認了材料是罵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沒有寫為江青做主的話，江青收到退回來的信之後，沒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在政治局會議結束後，黃永勝留下吳、葉、邱一起向總理談了李必達的問題。總理說：「事情的發生與處理我都知道了。你們有意見，我也是知道的，但隨便議論是不好的。今後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李必達的品質太壞了，一個小小的秘書，竟想借江青之手搞倒總參謀長！而且用的手段是偷聽，這屬於嚴重違反工作紀律和秘書的職責。當秘書是受首長信任的，利用首長的信任幹陷害首長的事，這真是天理不容。李必達想出大彩，「造反精神」太強了，李必達是因為造反、投機害了自己。對李必達要處理是沒有什麼非議的，這種人任何時候也是被唾棄的一類。辦事組用飛機把李必達押送回廣州軍區，但他心不死，在飛機上，他在《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寫了「誰拾到語錄本，請交中央文革轉江青同志救我」幾個字，故意把《毛主席語錄》丟在飛機上，幻想乘務人員收到後會交給江青。乘務人員的確在打掃衛生時拾到了，最後交給了吳法憲轉到辦事組。事後，我要三〇一醫院把王瑞華送到軍醫大學學習了。這樣既離開了北京，又沒有傷害王本人，我認為對王的處理是正確的。

反江青並不等於反毛主席，我看當時主席也是這麼認爲的，但主席心裏肯定也不高興。後來主席就不這麼看了，他把反江青反張春橋和反對文化革命連在一起，也和反對毛主席連在一起了。

文革往事

對文革這個時期的回憶，不能不想起我的大兒子路光當年的婚事。路光的婚事得到了周總理最爲誠摯的關懷，也得到林彪、黃永勝、葉群的關心和幫助。

路光和克非是大學時期的同學，而克非的父親張霖之是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一直在極其惡劣的環境和條件下堅持革命鬥爭，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冀魯豫區黨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第二野戰軍五兵團副政委，解放後任三機部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八大時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

煤炭工業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是極爲重要的，那時稱「鋼煤糧棉」。張霖之對我國煤炭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對於這樣一個老革命，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沒有把他放過，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她在大會上公開點名誣陷張霖之，張霖之隨即遭到兇殘的揪鬥、毒打、抄家。

張霖之在文革中遭到了滅絕人性、罄竹難書的摧殘。當張霖之反抗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時，這些窮兇極惡的傢伙竟用燒鍋爐的通條直刺

他的頭部，頭骨戳穿，鮮血從頭部流到脖子，再流到背上。張霖之飽嘗了人間最大的苦難，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被江青、戚本禹一夥支持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張霖之是文革中唯一被活活打死的共和國部長。

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下了紅頭文件，定張霖之爲走資派。

路光和克非大學畢業後，天各一方了。克非被分到江西勞改農場，一家在文革中是受了大難的，在困難無告之時，克非向我們寫了信。我和克非的父母可以說是素不相識，除了在中央的會議上見過外，沒有來往。在文革那麼混亂的情況下，政治氣氛又那麼嚴峻，一有不慎就會惹來大禍。但我認爲克非是個好孩子，就算大人有問題，幫助孩子不算什麼吧？！我們把克非接到上海，調入總後華東物資局，進而又調到西安的總後裝備研究院，入伍穿上了軍裝。不過我也叮囑我老伴：「辦這些事要特別小心，走一步三回頭，沒有問題再前進。」因爲讓江青、張春橋一夥抓到辯子，他們會借此興風作浪的。我們和江青一夥是死對頭。

七〇年春節後，總後在北京舉辦全軍科技成果展覽，地點設在後勤學院。克非也做爲工作人員來京參加會務工作。克非是個很勤奮努力的人，當時工作條件很差，打地鋪睡在大教室，再加上工作勞累，她肺部出血，常有鮮血從口中吐出。我老伴知道後立即派人把她送往三〇一醫院。

當時，路光也快 28 歲了，他堅持這份婚姻，正好也有了機會。在國務院體制改革時，煤炭部、化工部等合併成燃化部，由總後副部長伊文去當革委會主任。我借此機會讓伊文深入瞭解一下張霖之的情況。經調查後，伊文向我匯報說：「張霖之沒有什麼問題，與彭真屬工作關係，沒有什麼更深的個人關係。張霖之歷史清白，在煤炭部威信較高，我國的煤炭產量在世界上的名次不斷提昇，張霖之是有一定貢獻的。究竟江青爲什麼要點名說張霖之是彭真死黨，還搞不清楚。」

我聽了伊文的匯報，心裏有數了，決心摸一摸總理的態度。在一次首都體育館舉行的大會上，我向我老伴「面授機宜」，叫她在大會中間休息時，找總理匯報一下路光的婚事。她對總理說：「總理呀，我不得已打擾您一下，我要向您匯報一件事。」

在總理的同意下，我的老伴接著說：「我們的大兒子，就是路光，這孩子不懂事，她和張霖之的女兒是大學裏的同學，兩人很要好。」

總理聽到「張霖之的女兒」，楞了一下，打斷她的話說：「張霖之同志的女兒？」

胡敏說：「就是呀，張霖之的問題這麼嚴重，我們都不同意他們的事，可路光還在堅持。」

胡敏心裏沒底，她「戰戰兢兢」剛說完，沒想到總理竟說：「堅持好嘛！應當堅持。現在，xxx 和 xx 散了，xxx 和 xxx 也散了，臺上、臺下幾乎都散了，這一對要保住，要保住嘛！」

胡敏對總理說：「會作說，我們孩子的事情況比較特殊，要經過您批准才成。」

總理說：「可以呀。」接著總理又說：「你去找葉群，葉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們結婚。這是好事情。」

經我同意，我老伴向葉群細細講了路光和克非的事，沒想到這件事打動了她，葉群還掉了眼淚。她說：「這一家可真夠慘的，點一個名就要人家一條命。憑什麼打倒人家？這麼多老幹部都打倒了，不成。張霖之哪叫打倒呀，這叫草菅人命。我堅決支持這門子婚事，我去跟總理講。」

葉群接著又講：「很多事我都不敢給首長講，一講他就發火。前幾年，首長知道趙爾陸死了，氣得他不吃飯，在屋子裏轉來轉去，一邊走一邊罵。叫我把郭子瑞（趙爾陸的夫人）接來好幾次。他知道王秉璋經常遭武鬥，他罵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見王秉璋。我說王秉璋在七機部，是國務院管，你見他不好，他說為什麼見不好？你懂個屁，我們是戰友，是戰友！我負傷從馬上掉下來，是他和蘇靜把我搞回去的。」

我把葉群的態度告訴了周總理，同時我也把燃化部革委會主任伊文瞭解張霖之的情況，向總理做了匯報，接著我又跟總理說：「我壓力很大，得罪了江青可了不得呀，張霖之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我不清楚，但搭上一條命，也很不幸。現在克非家很困難，這個時候我們拆散他們，也不講良心。如果總理認為可以，能不能給張下個內部結論，有了總理的支持，我就準備把路光和克非的事辦了。」

總理是個非常精明又精細的人，他自言自語道：「內部結論……內部結論，這個提法好。」總理對我說：「你能否叫燃化部革委會，打個報告上來。」

燃化部革委會的報告很快就上來了。

周總理在一次國務院業務組的會議前，讓紀登奎提出研究燃化部革委會的報告，並讓紀提出要給張霖之做個簡單結論為好。在會上，紀提出這個問題後，大家都感到有些詫異，提出給張霖之做結論，也祇有由總理來主持辦理了，總理在會上就答應了。會後總理還專門交代大家，這件事是國務院業務組的具體工作，就不必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起。

國務院業務組的會，稍微重要的，或者和軍隊有關的，我幾乎是每次必到的，這次開會，總理有意識不讓我參加。會後總理告訴我，國務院業務組同意給張霖之做個內部結論，並對我說：「你先提出個意見給我。」

我說，我不太瞭解張霖之的情況。總理笑著說：「嘿，你還是『高見』勒，你把你要求提出來嘛！」我頓時才有所領悟。

我回去以後就叫秘書起個草，也讓克非提出了幾點意見，最後主要提出兩條，一是說張霖之是被毒打致死的；二是說張霖之是人民內部矛盾，家屬子女按革命幹部家屬對待。

總理接到稿子後又做了認真的修改。總理沒有同意「被毒打致死」這個提法，因為當時的上報材料中，關於張的死因不夠明確，造反派為了掩蓋罪行，編了不少假話，做了假證，總理怕有人告狀，捅到江青那裏，引起事端，事情「擱淺」，反而因小失大。最後，總理用了一句很高明的話「在武鬥和逼供的混亂中死去」；「按人民內部矛盾」總理沒改，同意了。這個結論現在收入了《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82頁：「會議認為，張霖之同志的歷史是清楚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張被非法關押在北京礦業學院時在廣播中聽到戚本禹威脅和煽動的語言，張因連續受批鬥和迫害，身體已受到重傷，自不能不陷入極度緊張的狀態，因此，致張在武鬥和逼供的混亂中死去。」

「根據當時情況，礦院專案組的報告祇涉及各項經過的表面現象，還需要依據煤炭工業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認真地予以澄清」。「茲決定，張霖之同志的死亡，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張霖之同志的家屬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牽連，應按革命幹部家屬對待。」

這個結論文件祇印了為數不多的份數，而且存檔的份數較多，以防江青知道後鬧事。總理還特地給我個人一份，在文件的左上角用鉛筆

寫上，「會作同志存。周恩來。」同時，總理還給我打了電話說：「會作呀，事情我給你辦了。」

我也說了不少感激的話。然後我又「得寸進尺」地說：「總理，這些都是講張霖之同志的，路光和克非結婚的問題，還請總理做個批示吧。」

總理同意了，親筆做了批示「同意邱路光和張克菲（非）結婚。願你們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線奮勇前進。周恩來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路光的婚事簡簡單單地辦了。

有一天，總理到京西賓館來開會，會後他要見一見路光和克非。因為克非要上班沒有來成，祇路光一人來了。總理伸出手來與路光握手時說：「還有一位呢？」

我忙說：「克非上班去了，接到她再來，怕耽誤總理的時間。」

總理握著路光的手，搖了幾搖，深情地說：「青年人！」

我知道總理很忙，立即對路光說：「好了，你回去吧。」

路光又給總理敬禮，就離開了。

我非常感謝總理對我極大的關心和幫助，沒想到總理卻深情地笑著說：「會作呀，你滿足了我一個心願。」總理是一個體察用心的人，也絕不會在江青面前惹麻煩。毛澤東和江青都點過張霖之的名，總理一清二楚，他這麼「膽大妄爲」，原因何在？總理的用意是很深的，他支持了路光的婚事，也等於在「亂世」中暗暗幫助了張霖之的家人。

記得是臨近年底時，葉群知道路光回京參加全軍馬列學習班，她告訴我說，林總要見見我們一家。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到了毛家灣，葉群把我們一家人帶去見林總，林總正在會客室裏等，我們依次給林敬禮。大家坐下以後，林總說：「張霖之是好同志，他為什麼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

接著葉群說：「我想請克非媽媽也來坐坐。」

林彪說：「好嘛！」

張霖之的老伴李蘊華是一九三七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她是北京的大學生，接受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沒想到最後革了個家破人亡。到了毛家灣，她激動的很，葉群拉著她的手說：「這幾年你吃了苦了。」

接著葉群提出照相。她的話音一落，林彪竟高聲說：「把黃總長請來。」大家都沒想到林彪今天興致這麼高，這麼給面子。黃來了以後，林大概是受到張霖之間問題的觸動，他對黃說：「軍隊的幹部能解放的盡快解放，能解脫的盡快解脫。」

黃說：「我們已經列了一個名單，有幾十人呢！在會上（指政治局會議）那些人（指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兇得很吶，一個勁往下拿。」

林彪看上去很生氣，沒有說話。

黃接著說：「我們還要努力。藉著要召開四屆人大的機會，爭取多解放、早解放一些人出來。」

我插了一句話：「軍隊各單位也有阻力，他同意這個，不同意那個，我們正在深入做工作。」

遺憾的是，由於四屆人大的推遲，由於「九一三」事件的發生，軍隊解放幹部的工作，都已走上日程，卻沒有來得及實現。當時，經過軍委辦事組的努力，已經解放的和解脫的幹部有張震、王必成、林維先、謝勝坤、江文、張宗遜……已經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楊勇、梁必業、吳克華、張賢約、李雪三……還有不少人的名字記不起來了。

接下來就是照相。葉群忙著安排座位，她先讓林彪坐下，再安排其他人。大家剛坐定，林彪突然站起來，讓克非媽媽坐在中間，林彪和黃永勝在其左右，李蘊華簡直不知所措，極力推讓，葉群知道，林決定的事是不能變的，她勸李蘊華說：「快坐下吧。」

這張鮮為人知、意義深遠、令人驚歎的照片，是林彪的絕唱。一個毛主席的親密戰友，黨章上確定的接班人，竟然和毛澤東點了名，江青點了名的「走資派」、「彭真死黨」、「三反分子」、「黑幫」張霖之的夫人一起照相！稱張霖之為好同志！

第二十九章 八屆十二中全會

總理的開場白

一九六八年十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毛主席親自主持了會議，林總在會議結束前，做了長篇講話。我認為這次會議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比九大還重要。九大是在通過準備好的結果，而八屆十二中全會是主席力爭拿到他想要的結果。因此為開好這個會，總理為主席作了精心的準備和組織，當然首先是組織準備。

總理在開幕式上，對會議的組織準備做了詳細的說明。從總理的態度來看，他是堅決支持主席的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方針政策的，堅決支持主席對劉少奇的鬥爭的。沒有總理的精心組織，十二中全會是開不好的，解決劉少奇的問題，也未必能那麼順利。

總理說：「今天開的是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決定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人數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這次出席的中央委員，原有能到會的為四十位（十一中全會時參加會議的中委是七十四人），要補選十位，因為從十一中全會到現在已死去十人。通過無產階級司令部商定，提出下述十位同志補為中央委員：黃永勝同志、許世友同志、陳錫聯同志、張達志同志、韓先楚同志、潘復生同志、劉建勳同志、李大章同志、吳德同志、劉子厚同志。他們原來是候補中央委員，今天在十二中全會上補為正式中央委員。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五十位。中央委員原來定額是九十七人，現有五十人出席，過半數了。其他能出席的還有九位候補中央委員。這次出席十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一共五十九人。」

這次會議要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從七大以來就立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且從八大以來，一直在第一線領導全黨的全面工作，因此，處理劉少奇這項工作要萬無一失。最起碼在組織程序上是這樣。

參加全會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列席，從事後看，基本上都是九大準備安排的中央委員。對列席的與會人員，總理宣佈說：「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中央文革是我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一個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兩年前十一中全會上已經肯定了的。那個時候，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下，中央文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前線發動群眾的機構。經過這兩年工作，逐步地擴大為中央文革碰頭會。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員。五位以外，參加成為碰頭會成員的有：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這七位同志，一共十二人。」「再次，在軍委處理日常工作的，在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成立了軍委辦事組，得到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批准了的有六位同志，就是：黃永勝同志、吳法憲同志、葉群同志、李作鵬同志、邱會作同志、劉賢權同志。」「這次出席會議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同志。」「現在除臺灣省外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除了與上面重複的以外，每省出席兩位，共五十二人。各省、市革委會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力量。他們是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直接領導下的地方的革命權力機構。」「人民解放軍的大軍區各出席一個人。有的大軍區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別的任務，也就沒再來人。舉例來說，福州軍區韓先楚同志、皮定均同志就是福建革命委員會的正、副主任，那個大軍區就再沒來人了。這樣例子別區也有。所以，全國十二個大軍區祇出席九位同志。」「最後一項，就志、郭玉峰同志。」「總人數合在一起，重複的不算，共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這是出席會議的全體成員。」

全會的任務

八屆十二中全會，是毛主席對劉少奇司令部的決戰，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比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是有所好轉，造反派對文化大革命的猖狂破壞，受到了不小的限制，學生造反派也逐漸被主席所拋棄；軍隊的造反派在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之後，基本上被打垮，整個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比較穩定的階段。毛主席已經說過：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已經過去了，今後是有領導的進行深入的「鬥批改」，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因此，籌備召開黨的九次代表大會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十二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發展；通過對劉少奇的結論；深入批判「二月逆流」；審議為九大起草的新黨章；決定召開九大的有關事項。大會的目的都達到了。

十二中全會，是在十一中全會後兩年多的時間召開的。但以我的感受來說，兩次全會的政治空氣是完全不一樣的。十一中全會是：緊張、恐懼；十二中全會是：輕鬆、踏實。這兩種不同的精神狀態，是與會的大多數人都有的，像我這樣的人也不例外。在十一中全會的時候，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對全軍文革不摸底。我把全軍文革看成與一九三〇年中央蘇區的「肅反委員會」一樣，我當時已經準備隨時被全軍文革關起來！我考慮到的問題都成了現實。但到了十二中全會的時候，我的疑慮基本上都消除了。在十二中全會上，我是以受害者、被解放者的姿態出現的。

十二中全會涉及到的問題很多，這裏主要說三個問題。（一）對劉少奇的結論；（二）批判「二月逆流」；（三）林彪、江青的矛盾公開化。

（一）對劉少奇的結論。在十二中全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和路線方面的問題已經肯定，不存在什麼新的問題了。全會開幕的時候，毛主席用簡短的講話再次肯定了文革，他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因此，全會的時間主要就放在批判劉少奇和「二月逆流」的問題上了。

給劉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為「叛徒、內奸、工賊」。關於劉少奇在瀋陽被捕的問題，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崗去調查^{方块字}，結果給高

崗惹下了致命的麻煩。現在，把叛徒的帽子給劉少奇直接戴上了，在討論的時候，大家也未必都相信這三頂帽子，但表態的時候，大家基本上都是義憤填膺的樣子。開除劉少奇黨籍時，祇有五十名中央委員有表決權，那就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蕭勁光、張雲逸、王樹聲、李雪峰、王震等。當時，會議表決是一致通過的（陳少敏的投票情況沒有什麼印象了，事後才知道她不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在五十名中央委員中，後來祇有林彪、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六人被打入另冊，還有四十四人（佔近 90%）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其中，近半數以上的人去世後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說是江青迫害了劉少奇，理由有些不足；各有各的賬，大賬是黨的全會通過了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議。

對於劉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問題是現在對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問題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對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全部推翻，但不論怎樣，總不能說成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捏造的。這樣說，不能令人信服。對劉少奇的批判，材料之多，時間之長，在群眾中之深入，在我們黨內都是空前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的鬥爭是最主要的。我認為劉少奇是有錯誤的，應當批判，也可以下臺，但打倒是萬萬不應該的。一個政黨內部不可能沒有不同意見，不可能沒有鬥爭。鬥爭可能基本正確，或正確錯誤皆有，或基本不正確。不正確的鬥爭，在一定條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打倒一個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其實，在開幕式和閉幕式上毛主席都講到鄧小平，為鄧小平說過好話。譬如在閉幕式上，毛主席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保留。……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為什麼毛主席對劉少奇「激進」，對鄧小平「保守」就不得不知了。不過，從最後結果來看，對劉少奇「激進」，對鄧小平「保守」對毛主席都產生了極為嚴重的結果。

平心而論，文革按毛主席的搞法，傷害了不少人；但回過頭來說，文革若按劉、鄧的搞法，也很不可取，也會傷害更多的人，文革中高級幹部受衝擊，毛、林、周和中央，主要是毛主席，是要負責的。下面的幹部主要是群眾的衝擊，這種衝擊也是毛主席的路線決定的。支塊字读书社接鄧的

搞法，是工作組代表黨組織劃定反動學生、反動幹部。以學校爲例，當時每所高校都劃了幾十名反動幹部和學生，全國就是幾十萬，和反右差不多。所以，總結黨歷史上的教訓，不要祇盯著毛主席，也要反省自己。

毛主席去世後，有人詆毀八屆十二中全會，其實會議的議程是按組織原則辦的。雖然，對劉少奇同志做了錯誤的結論，但也是按組織原則辦的。毛澤東、周恩來在這些方面是不會出差錯的。

會議有三點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是堅持組織原則。會議的各項決議都是中央委員的法定人數通過的。因爲有些中央委員靠邊站了，會議還從中央候補委員中增補了十位中央委員，會議通過組織決議時，列席代表均未參加表決。

其次，是認真發揚民主。在會上，真是暢所欲言，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如葉劍英對朱德就發表了系統的批評意見。胡耀邦對劉少奇做了長篇的批判和在劉少奇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的自我批評，王震批劉少奇也相當厲害。還有不少人，對劉少奇和「二月逆流」都提出了系統的批判，特別是對劉少奇運用職權打擊老幹部表示出極大的憤恨！

第三，是對劉少奇的結論。全會對劉少奇進行了認真的批判，印發了大量審查材料。周總理對劉少奇也說了很重的話。那些材料，極大多數有時間、地點、事實真相，並有旁證材料和實物照片。當時，對材料本身是沒有不信的理由的，後人對那些材料的否定，從政治上講也是正常的，劉少奇受了極大的冤枉，現在平反完全應該。問題在哪裏？問題在於冤枉劉少奇的問題上責任不能亂推，不負責任地推給林彪、江青，使別人對我們黨的公信程度有質疑。

(二) 批判「二月逆流」。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是重點。這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其實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時候，大家發言都很積極，被批判的人也是什麼都承認，自己罵自己，罵得狗血噴頭，尤其幾個元帥，他們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們的人調子還高。

總理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頭戲，他挨個批判了這些老同志，尤其是幾個元帥，總理批的很厲害，也很具體。在我的記憶裏，總理對聶帥特別不滿意，說他把國防科委系統搞得亂七八糟，甚至說他把趙爾陸給逼死了。對於總理的講話，我當時就有些不同的看法，因為我

認為在堅持部隊不能亂，在保護軍隊老幹部方面，葉帥、聶帥和徐帥的態度和做法是有區別的。

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

十二中全會主要的時間是開小組會。小組是以原來的大區劃分的，我分在西北小組。黃永勝、姚文元是中央碰頭會議成員，是出席西北小組的領導人。

在小組會上，我以親身經受造反派的摧殘，揭露了全軍文革鎮壓老幹部的錯誤。我的發言分為三個問題：

(1) 全軍文革怎樣對待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打砸搶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敵，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兇手，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殘酷揪鬥老幹部。

一九六七年初，江青與全軍文革相勾結宣佈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是：不要怕亂，怕亂就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依靠造反派就是大方向。在一思想指導下，全軍文革在十多天之內，向造反派發了六支「令箭」。

第一支令箭，發給總參測繪學院「紅色造反團」。他們得令後，立即到軍事科學院內，闖進了葉劍英的院內（七機部「九一六」造反派也去了）。由於受到了警衛部隊的抵制，造反派祇在院內鬧了一通，未曾闖到住所裏去。院內的牆上和庭院馬路上寫滿了「打倒葉劍英」的大標語。聶帥住在軍科上面的西山，「九一六」要揪鬥聶帥，但未得逞。雖然兩個造反派的目的均未達到，但卻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全軍文革通過造反派之手，是敢抓解放軍元帥的！

第二支令箭，發給國防工業辦公室造反派。他們得令後立即揪鬥趙爾陸。他們把趙連續鬥了幾天幾夜，趙因心臟病發作，身邊無人照顧，死在自己的辦公室。

第三支令箭，發給高等軍事學院的造反派。他們得令後，對該院副院長楊至成進行圍攻。楊因長期患心臟病，被揪鬥而死於非命。

第四支令箭，發給海軍機關的造反派。他們得令後，對蘇振華、李作鵬、杜義德等批鬥起來。李因患嚴重的心臟病，被鬥得暈倒在地上，因機關搶救及時而脫險。

第五支令箭，發給空軍二高專的造反派。他們得令後，把吳法憲圍門起來了。由於這一天打下來了一架美制高空無人駕駛偵察機，吳以指揮作戰重要為理由，要求暫停批鬥，以後「補鬥」。

第六支令箭，發給上海二醫大「紅縱」。他們得令後，把我關起來，進行了大小十餘次批鬥，把我打鬥的滿身傷殘。

這是全軍文革直接操縱造反派搞的批鬥。至於在全軍文革「不怕亂」的方針指導下，軍內各個造反派自己搞起來的大小武鬥就無法計數了。當時，北京的軍隊機關真是成了鬼域世界。軍隊無數幹部慘遭摧殘，災難是空前未有的。這就是全軍文革打擊老幹部的「偉大戰績！」

(2) 全軍文革的命令。上級運用職權，命令下級到造反派裏去受批

判，受武鬥，甚至去斷送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黨、全軍、全國都沒有發生過的事。徐向前命令我到第二軍醫大學「紅縱」去「同革命」是全國獨一無二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軍隊院校搞四大後，二醫大「紅縱」連續批判了我四十多天，被造反派鬥昏在地上，心臟病發作，經搶救後林總、葉帥命令我在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養病。當時正同時住在一起的還有：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蕭華、劉志堅、趙爾陸、李天煥、王秉璋、杜義德、林月琴等人。六七年初上海「一月風暴」後二醫大「紅縱」奉命捲土重來，是專門來打倒我的，就是全軍文革指使幹的。當時毛主席、林總、周總理、葉帥、聶帥、劉帥對我都是保護的，大家也是很清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全軍文革為什麼還要借造反派之手打倒我？很顯然，這就不是對我個人的問題了，而是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了。

(3) 全軍文革鎮壓老幹部主要手段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本來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很好，軍隊黨委也如同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完全能夠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全軍文革則一腳把黨委踢開了，堅決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全軍文革從來沒有召集過各單位常委負責人的會議，我就根本沒有進過全軍文革的門。相反，全軍文革對造反派則親熱得很，成天開會，接見，直接佈置任務。

各單位的造反派都是人數很少，能量很大的。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流氓成性、打、砸、搶成性、兇殘成性的品性所決定，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就特別厲害了。對造反派的行徑，本來是應當堅決制止和批評的，但

卻得到了全軍文革的寵愛。依靠這樣的造反派就必然會打擊廣大幹部群衆，幹部群眾就一定遭殃。

為了搞亂機關，全軍文革特別調來了幾個造反派到北京「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所謂「幫助」就是打倒老幹部的代名詞。造反派就是要打倒黨委，就是打倒老幹部。因為極大多數老幹部同造反派是勢不兩立的。不打倒老幹部，造反派是不能稱王稱霸的。軍隊所以大亂，並非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現象，是全軍文革指揮造反派搞亂的。全軍文革是完全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軍隊的文化革命引導到了搞亂軍隊的道路上去了。

在會上，徐帥發言時承認：他上臺主持全軍文革工作，部隊就亂了。

主席在閉幕會上的講話

十月三十一日，在閉幕那天的會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

主席認為這次全會開得好，他說：「我就沒有什麼話講了。林彪同志講了那麼多，同志們也都講了很多。這一次會呀，我看是開得還可以。特別是有些同志，特別是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就不大瞭解。像高級幹部都不大清楚，我們過去也沒有通風。在這個全會上，由他們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又再說明他們的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麼幾次反覆嘛，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主席前一段在全會上對「二月逆流」講了很多話，講得老師們灰溜溜的。等到把這些人批得夠嗆後，主席在閉幕時又以他特有的語言方式說：「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因為他們有意見嘛，就是要談一談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黨內生活也是許可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嘛。他這個大鬧嘛，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倒是細節無須多過問，還是大綱節目要緊。那些細節呀，比如講往來多少次呀，倒是不需要那麼看重。如果黨內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而把大問題反倒不大注意了。但是說

是那樣天就會跌下來呀，或者地球就不轉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還是照樣轉。你那六、七個人反對，這個地球讓它不轉嗎？」

關於當時正在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主席說：「對於這一批人

呀，請你們注意，在清理階級隊伍裏頭，對於學者，這個學者，無非是比較好的、中間派，比較右的這麼三種。我現在著重講的就是這個比較

右的，我們怎麼對待他們？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嘛，你沒有右，你這個左那兒來的呀？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太純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講九大嘛，九大代表，這個『二月逆流』的同志們

如果不參加呀，我看就是個缺點。所以，我們還是推薦你們在各地方把他們選舉為代表。陳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講話，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就是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

最後，主席說：「我主要就是這麼幾點，就是一個講清理階級隊伍。

清理階級隊伍，注意調查研究，注意一個「準」字。對於黨內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還有三看嘛。所謂保者，就是幫助他們嘛；看嘛，就是看他們以後的情況嘛，改不改嘛。我的意見，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強迫人家改，我就不那麼贊成。你有這麼幾位有啥要緊啦，我看，我剛才不是講了嗎，地球照樣轉的。」

依我看，主席在十二中全會上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批「二月逆流」，也是為九大做組織上的準備的，用批「二月逆流」方法掃了那些老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等的威信，九大他們雖然還進中央委員會，但大都進不了政治局，進不了中央領導層了。

毛主席在會上還講到鄧小平和劉少奇有區別，說者是有意還是無意我不得而知，但我這個聽者也沒有更多的在意，認為主席是一般性的講政策。散會後回到京西賓館，張秀川也和黃永勝一同來了，黃永勝剛坐下就面對張秀川說：「總理剛才問我，主席講鄧小平和劉少奇有區別聽到沒有？我說聽到了。」黃接著對張說：「原來有些對鄧揭發材料，總理交代是放在賀龍專案組一起的，你先把他撤出來，全部材料發到總理處，總理收了就好。如總理退回來，不許開包，放到你那封存。」我們幾個在一邊聽，沒有說話。

林總的長篇講話

十二中全會期間，林總發表了長篇講話。林總的講話印有記錄稿，紙發給了中央碰頭會成員。後來，毛主席指示，把林總的講話錄音給各省市、各大軍區都發一盤，並在群眾中播放。

林總在講話中說：

現在我要講的問題，有以下六點：第一個，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個，是文化革命的勝利、意義和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第三個，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線、做法的問題；第四個，是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革命怎樣繼續前進的問題；第五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個，是今後怎麼做法。

林總在講到：

我要說到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中間的歷史地位。要講一講，才能看出我們這次的文化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最廣泛的最有深遠意義的革命。祇有通過比較我們才能看得出它是最廣泛，是最深入，是最能影響人類歷史進程和影響中國今後的命運的。

林總說：

在我看，世界上的歷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紀、四世紀，希臘的奴隸制度是處於繁盛的時代，希臘的古典文化，也處於這種那個時候出現了影響全世界上兩千多年來的思想，那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那時出現了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亞里斯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伊壁鳩魯，他們是影響整個歐洲的文化，也影響後來中國的思想。但是，那種文化是為奴隸主辯護的文化。這個是奴隸制度的文化，同我們的文化革命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有一句話叫什麼，就是小巫見大巫吧。看到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才知道是大巫，知道它那個是小巫。而沒有這個比較的時候，我們腦子覺得，它那個了不得，但實際上同我們的一比，它那個沒有什麼了不得。

後來，世界第二次的文化運動是什麼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資產階級出現，就出現了以意大利為首的文藝復興運動。到了十六世紀上半期，文藝復興進入繁榮的時代。這個時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對神權，提倡人性，他不敢聲明他是什麼階級的人性。他提倡自由，也不敢說是誰的自由。這個意大利的運動，以後傳到英國，傳到法國，傳到德國。這一次文化運動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一次文化運動，文化的革命。當然在意大利之後，法國的啟蒙運動，傳到英國是英國的樣子，傳到德國是德國的樣子，而到法國，就是法國形成一個啟蒙運動。我們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鳩、盧梭這麼一些人。還有其他什麼費爾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們是主張唯物論，但是也有主張唯心論的。後來這種思想，也成為馬克思主義產生的來源之一，社會主義思想是來自於法國的，就是聖西門、傅立葉，也來自於英國的歐文。更早一點，還有英國的烏托邦。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繼承了人類的先進思想。

第三次是什麼呢？……第三次就是馬克思主義產生，是人類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西歐的無產階級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法國發生了起義，英國發生了憲章運動、法國就是里昂工人起義，德國也發生了紡織工人的罷工。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了工人運動的鬥爭的經驗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這是人類歷史上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個代表新的階級的新思想體系，是為新的階級利益服務的，是為新的階級指明任務，指明前途的，是新的階級的革命的科學。而列寧的思想是緊接著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人類第三次文化革命運動。可是馬恩列他們的思想沒有象毛主席的思想這樣子能傳播到七億人口當中去，他們合共起來祇有那樣多人口，而中國這次文化革命，是在七億人口中廣泛地傳播。不僅如此，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廣泛地傳播。

這三次世界性的，一個是奴隸主的文化運動，一個是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無產階級的文化運動，如果同中國這一次的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比較起來，那末，規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們要看明白中國這次這種文化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歷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不僅僅是七億人口中廣泛流傳，而且是幾十億的地球上的人口、勞動人民樂於流傳，樂於接受。

林總說：

現在，我們可以高瞻遠矚地看到全世界上的遠景，可以看到一個國家能夠空前地影響全世界歷史、人類命運的，推動世界向前進的，促進世界革命的影響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的，那就是中國。所以，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它超過西班牙，超過英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革命的國家，最影響人類歷史命運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很光榮的，很偉大的。但是，我們必須堅持革命路線，堅持毛主席的路線，堅持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一切工作，堅持文化革命的這種精神，堅決地不斷地來批判、打擊反動的思潮，不斷地普及代表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那麼我們的國家就不會變色，一切反動派，無論是內部的顛覆和外部的武裝進攻和這種和平的顛覆，都會遭受失敗的。我們國家有兩個前途，一個，變成對使勞動人民受二遍苦，重新復辟資本主義、半封建主義。但是，只要我們能夠堅持這次文化革命這個方向，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這個方向，把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下來，把社會主義堅持下來，把對世界革命的援助堅持下來。

林彪的講話拿文革與文藝復興媲美，旨在讚揚文化革命，毛確認為貶低了他，主席是不高興的。江青同樣是不高興的，江青認為文化的「版圖」是她的，林彪的講話事先沒有與她商量。

林彪、江青的矛盾

林彪講話的時候，不僅沒有稿子，提綱也是東一張、西一張。他的講話近四個小時，毛主席坐在林總旁邊一直聽到底，他聽得很入神。全場鴉雀無聲，都在用心聽講。唯有江青聽得不耐煩，她一直帶著方塊字連書社印製的一張臉

子，很顯然是心裏有氣。因爲林彪講歐洲資產階級文藝復興問題佔了她

的「地盤」。江青是在向林彪出氣的。

聽完林彪講話之後，我們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黃、吳、李、邱等）回到京西賓館吃晚飯，準備晚上還要集體辦公。我們沒有料到，江青在後面也跟著到京西賓館來了，江青進門坐下之後即說：「這樣大的事（指林彪的講話）也不事先商量一下。根本不是那樣一回事嘛。」

黃、吳大體上知道江青發的什麼火，但他們有意裝作不知道，不把事情挑明。爲了防止江青找黃、吳談林總講話的問題，吃了晚飯之後，還特意請她看電影。在當時的情況下，在沒有得到林總許可之前，黃、吳也是不敢向江青表態的。

江青對林彪早就有意見了。據事後黃說：十二中全會以前，江青對

林彪主要有三個意見。一是，陳伯達當著江青、葉群的面說過兩三次，他要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可是林總採取不理政策，根本不表態也從來不提及這個問題。二是，江青已經下了決心要搞掉楊成武，林彪毫不客氣地回答說：「這樣的問題祇有毛主席才有決定權。」把江青當面頂回去了，讓她好不惱火。三是，在十二中全會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過：「十二中全會要考慮補選中央委員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問題。」林彪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們不議。」江青提這樣的問題，很顯然她是想在九大之前就當上中央委員。江青跟各地說：「八屆五中全會，很顯然她是想在九大之前就當上中央委員。」江青在十二中全會之後不幾天，對著黃永勝、吳法憲、葉群三人發了一次很大的火。她說：「轎夫並不是好當的，今後江處，今後就不吹了。其實，江青是完全不識時務的，林彪根本不需要江青抬什麼轎子。」

當林彪知道江青對他的講話（關於文藝復興問題）有意見時，林彪就講過：「我就是要她有意見的。要不然，她總是以爲自己很了不起！」後來，江青看到對林彪的講話做不出什麼文章，她又向林彪討好說：「文藝是專門問題，不容易講好。」

林彪、江青的矛盾，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但當時都處於「心照不宣」的心態。當面都是客客氣氣的，背後各自都有主意。江青能夠難爲到林彪的事不多，頂多她能控制一個上海方塊林彪本來很喜歡

上海，過去經常在上海休息。文化大革命後就不到上海去了，寧願在蘇州，在北戴河休養也不到上海去。林彪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全國都在放錄音，江青則下令上海播放樣板戲，不准放林彪的講話錄音。有一次我同王洪文開玩笑說：「你們上海人不喜歡聽漢戲吧？」（指湖北人、林彪講話之意），他當時沒有聽懂。以後他就聽懂了，爲了此事，王專門向我解釋說：「對放林副主席講話錄音之事，我們在幹部中放了，沒有在群衆中放。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我們是存在困難的。」

從十二中全會之後，林彪對江青的態度就逐漸變了。林彪同黃永勝、吳法憲說：「我們過去對江青的態度完全是爲了黨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關係），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因爲毛主席對待江青就是公事公辦的。」以後又說：「他們幾個人（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是一個宗派。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反宗派主義是很必要的。」我們個人（黃、吳、李、邱）插話說：「他們幾個是上海幫。」從此之後，我們在背後根本不叫他們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幫。可悲的是，宗派的帽子，林彪沒有給江青一夥扣上，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反被主席給我們扣上了。

林彪同江青的矛盾，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知道的人的圈子很小，嚴格局限在楊成武、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幾個人之內，其餘的人是絕對不能知道的。以後，除了上述人之外，陳伯達、謝富治、李作鵬、邱會作也參加進去了。我還擔任了向周總理匯報的「聯絡員」。九大以後的中央政治局，康、江、張、姚等是上海派之外，其餘的都站在林彪一邊，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等不參加政治局辦公，但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都是說話公道的。毛主席以前高高在上，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才開始真正知道毛是支持江青一夥，維護文革，打擊林彪。毛主席實在是公心不夠。

林彪對江青一夥的基本態度之一，就是不許他們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有市場，是亡黨亡國的開始。」九大之後，防止上海幫插手軍隊真如同防止盜賊一樣的嚴格。軍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也同總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總理，由他轉送主席之後，再在政治局傳閱。看起來這是小事情，其實是大事，這樣可以減少江青一夥的干擾。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軍隊同中央文革就有一定的矛盾，黃永勝當總參謀長後，這個矛盾就突出來了。不少人知道中央內部存在的矛盾，實質上就是林彪、江青的矛盾，總理和政治局大多數同志都支持林彪。

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的獨立王國就形成了。江青一夥死死霸住上海不放不讓別人沾手，國務院各部門對上海都畏懼三分，就連我分管的中國防工業，在處理上海國防工業的事情時，也感有幾分棘手。例如，中央部門有事只能同上海的有關部門打交道，不能同工廠直接打交道。上海三個師的警備部隊，都是上海自己掌控的，南京軍區很難插手，真正實現了張春橋的指示「上海的事，上海自己辦」的方針。

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林彪講話之後，張春橋嚇得差點尿褲子，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見到軍委辦事組的人就說：「我們同軍隊的關係，上海要負主要責任。」這是張春橋說的一句老實話。

由於江青和主席的特殊關係，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周恩來對她又有抬舉，加上江青自己的霸道作風等，她在群眾中，特別是在造反派中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確實到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同周恩來平起平坐了。以我的看法，在黨內的高級幹部位，中，由於她和主席的特殊關係，就沒有不尊敬江青，不買江青賬的。即使，由於她和主席的特殊關係，就沒有不尊敬江青，不買江青賬的。江青也特別需要別人看到她同毛主席的親密關係。在毛主席出場的時候，她想盡辦法要走的同毛主席近一點。發表照片時，總是選擇她與毛主席的特殊鏡頭。在文藝晚會上，江青總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不能如願，她有時就去用毛巾給毛主席擦鼻涕，整整衣服等。江青這些做法都是迷惑別人的手段。

十二中全會時，有一次會間休息，我和黃永勝在閒談，胡耀邦同志走過來，他和我們都很熟悉。他對黃永勝說，能不能搭個橋，他想向江青同志匯報一下自己的情況。黃這個人說話很直，說我幫你給總理搭橋可以，江青這個橋我搭不上。胡聽後有些尷尬，我這時倒給他出了個主意，我說：「江青同志天天大搖大擺地走，你就迎上去和她說話，她現在很『聯繫群眾』。」耀邦說：「對，迎迎她。」後來他見到了江青，說很高興很激動。所以說，面對江青，不論真假，當時是要買她賬的，因為江青的後面有毛主席。

這裏要特別說一下，溫玉成副總長投向江青的問題。溫玉成本來是黃永勝的器重的人，他能到總參任副總長，也是黃永勝建議，林彪點頭，否則是決不會有如此「官運」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江青還能迷惑他，確實是不簡單。

他到北京後不久，就以副總參謀長的資格在北京市「支左」。並且也就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裏拿著兩張通向江青的「通行證」，一張是支持造反派，一張打小報告。前一張通行證起的作用不很大，因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控制之下的御林軍。後一張起到特別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報告特別多。例如，葉劍英、聶榮臻等人對中央文革和對造反派不滿的問題；他無中生有的向江青報告了葉劍英汽車上裝有特別電話，並有偵聽作用；報告聶榮臻在西山大興土木擴建自己的宿舍；報告邱會作支持清華「四一四」派反對中央文革等等（我的兒子在清華讀書，但「四一四」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江青看到他有特殊的作用，於是，就直接向毛主席建議：溫玉成爲中央碰頭會議成員。這樣，溫玉成的官運也到了「寶塔尖上」。溫玉成的問題出來以後，爲了割斷溫玉成和江青一夥的聯繫，連他的家人在北京住都不行，全家都送到成都去了。

林彪敢反江青也是很爲難的事情，畢竟有主席的關係在那裏，對江青的錯誤，小事情也忍了，但原則問題林彪就不讓。林、江之間矛盾的本質是什麼呢？就是保衛軍隊不亂的問題。其他問題，林總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總起來的說，林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觸怒了江青，引起了很多的問題。林彪、江青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問題，在後面還會多次說到。

第三十章 九大縱觀（一）

關於起草文件的問題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決定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風浪之後召開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獨霸對大會的領導。爲此以林彪、周恩來爲首，以軍委辦事組爲骨幹，以及當時在前臺工作的同志們和江青、康生、張春橋一夥鬥爭的中心問題，就轉爲在九大爲保衛黨的領導權和江青一夥奪取黨的領導權的鬥爭了。

按照常規，黨的代表大會之前必須起草好兩個文件：《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的報告》。誰作政治報告沒有什麼可爭的，毛主席早就指定林彪代表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按照慣例，修改黨章也要向大會作正式報告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但關於修改黨章的問題是否還需要在大會上作報告沒有定下來，誰作報告沒有談過，一切都要主席來定。

關於修改黨章的問題，早在六八年三月間中央碰頭會議就決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爲修改黨章的起草小組，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是上海幫一手包辦的。六八年九月間，我代表軍委辦事組參加了一次張春橋主持的新黨章的座談會。在會上，張春橋首先說：「今天大家看到的新黨章草稿，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集體創作。完稿後，又在群眾中廣泛地徵求意見，大家一致贊成這個稿子。大家可以提意見，可以局部推翻，也可以全部推翻。」稍後，張春橋帶有得意的神態說：「新起草的黨章祇有三千多字，恐怕是我們黨有史以來最短的黨章吧。大家還可以增加與減少。增加容易，減少就有困難了。」他講完後就起身走了，由一般工

作人員收集座談意見。結果是座談會變成了「無言會」，一個發言的也沒有，「座談會」也就結束了。

我看到的新黨章第一稿就有「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字句。林總看到之後，甚為吃驚！六八年九月間，新黨章在提交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之前，林總主持了一次中央會議進行討論。這次討論，到會的人比較多，除了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之外，還有各單位的一部份負責人到了會，我也代表軍委辦事組參加了會議。林總在會上提出：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刪去。但是會場上關於「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呼聲是一邊倒的，對新黨章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了，會議開了不到兩小時就結束了。

新黨章經過中央文革建議、中央碰頭會議討論之後，將新黨章提交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毛主席同意了。這樣，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認林總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了。但林總自己還沒有接受，在九大開幕之前，即新黨章將要提交大會審議通過之前，林總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從新黨章上刪去。對此，毛主席沒有從正面回答問題，但在會上說：「一個人過分謙虛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比如說，大家要選我當主席，我硬是不幹，就不能說服人了。」這很顯然，主席就是要林總不要再提出在黨章上刪去「接班人」的字句了。從此以後，林總就再不提意見了。

這裏，還要說明的是，張春橋等人在起草新黨章的時候，原來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黨章。例如，提林彪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為「文化革命的旗手。」這個問題剛一提出，連黨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堅決制止了。康生說：「你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大家若不謹慎，搞不好就會把得到的東西也丟得一乾二淨。」因為康生是他們的靈魂，他們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見了。江青的名字沒有上黨章，她是很不滿意的。

起草政治報告的鬥爭，同樣是複雜而又尖銳的，陳伯達向我們靠近後，講過這方面的事情。八屆十二中全會後不久，陳伯達就向毛主席請示了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但一直沒有得到毛主席的具體指示，起草時間就拖到六九年春節之後了。主席叫陳伯達去談了一次起草報告的

問題。主席說：對這個問題，現在就得做準備了，凡事趕早不趕晚嘛。主席指示，由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張春橋、姚文元輔助。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陳伯達同林總去商量。其實主席決定由林總做政治報告後，林總自己就開始拉條子，並告辦公室的同志們他已有一個基本構思，陳伯達來了可助一臂之力，這個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很快就定下來，標題定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提出這樣的思想，對經過幾年暴風驟雨的文化革命來說無疑是正確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林總「克己復禮」的思想就很重了，毛主席把「劉、鄧」和「彭、羅、陸、楊」這些人打倒了，應該滿意了，文化革命這幾年確實搞得很亂，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全國上上下下搞奪權、搞武鬥、搞派性，經濟形勢不好，應該「復禮」了，全國應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生產，發展經濟。陳伯達也注意到不要「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現在看來，他們的想法是對的。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陳伯達初稿的第一部分就出來了。

對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討論是由總理主持的，總理看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樣的標題，應該是同意的，但總理深知，這樣的主題，在主席那裏是通不過的。他明明知道陳伯達是對的，但他還是以陳伯達延誤了時間，並且祇拿出第一部分為借口，否定了陳伯達。總理的確是智慧超人的。

這樣，江青一夥來勁了，他們明明知道是主席指定林彪做政治報告，也知道林、陳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但江青裝著不知道，指著陳伯達的鼻子大發脾氣，把他大罵了一通。

江青說：「中央文革向來是集體領導，為什麼起草報告就連屁都不放一個。我認為你陳伯達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還說：「稿上子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你搞的是唯生產力論，你是以修正主義的觀點起草報告的。」江青講了之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像放連珠炮一樣地指責陳伯達。

主席同意了江青的說法。現在看來，是不是主席本來就對陳伯達失去興趣，青睞張春橋、姚文元，從而對陳伯達來了個「欲擒故縱」就不得而知了。但從事情的結果來看，是這樣的。爾後，主席又讓康生、張春

橋、姚文元三人重新起草，從此，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權力，上海幫就奪到手了。

其實，張春橋、姚文元早就在上海組織人起草好了政治報告。三兩天之後，稿子就拿出來，直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對稿子做了很多的修改。江青看到他們起草的九大的政治報告毛主席都看過了，也就是「過關」了，她高興極了，在一次會上，江青對陳伯達用「商量」的語氣挖苦說：「對我們起草的政治報告，請你在毛主席修改的稿子上再修改吧！」

陳伯達還老實巴交地說：「我擁護毛主席的修改！」他的用詞也很有意思：不說同意稿子，祇說擁護修改！

林總知道江青把他和陳伯達共同起草的報告「槍斃」了之後，對報告的問題，就當「閉口道士」了，此後有關報告的全過程，林總一句話不說，一個字也沒有寫過，政治報告是上海幫包辦的。

開幕式

九大開幕之前，九大代表都來了不短的日子了，可是會議還沒有召開，總理解釋其原因是汪東興病了。其實，九大的準備工作，主要是總理、黃永勝、張春橋和吳法憲他們幾個，汪東興作用並不大，汪主要是聯繫主席那裏。汪東興病了是不是會議延遲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清楚，但他確實病了。葉群帶我們去看過汪，之後葉群還叮囑我們再去看汪。記得我們去看汪時，他不但很感謝，而且很激動，說著說著又哭又罵，什麼「過河拆橋了」，「卸磨殺驢了」，「不要我了」……，江青沒去看他，也沒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沒派人去看他，汪東興有這種看法並不奇怪，那個時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汪東興在我們面前敢對主席不敬，我們是很吃驚的，看來主席和汪東興也有很深的私密關係，這在廬山會議上，得到了切實證明。汪東興在「楊、余、傅」事件以後就和我們走近了，九大以後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實際上，汪東興也是腳踩兩隻船，其他人屢屢翻了船，汪東興確實踩穩了，真是技高一籌。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了。

我參加過黨的三次代表大會。這就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在延安舉行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舉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九大開幕式上。

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和在文化革命中舉行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我參加過三次代表大會，感受是不同的。參加七大感到很光榮；參加八大軍隊幹部就感到很平淡；參加九大的印象最深刻。在黨的九次代表大會上，我當選為中央委員，後又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我十四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經過四十年的革命鬥爭，我從一個普通戰士成長為黨的高級幹部，並成為黨的最高領導集體中央政治局的成員之一。

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召集了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那次會議事實上是決定九大的方針。到會的除了中央碰頭會議的全體成員之外，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也參加了。毛主席在會議上講了話。當匯報到珍寶島地區敵人炮擊到我縱深七公里時，毛主席說：「打進七公里有什麼要緊，最好是打進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蘇修，要給他一點面子，讓他打進來，進來就好了，我們就有理由了。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它也需要動員，它有一個缺點，就是紀律不好，一個是要東西，一個是要女人，他們同國民黨一樣，他們的軍隊很窮，發一套衣服還要家裏出錢。我們的衣服是國家發的，也是人民的。這次會議要動員一下，請總理講一講，請總長也講一講，動員大家。」

主席說：「日本人打敗了，就是國家小，沒有根據地。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們的領導機關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蘇聯知道我們不會到他那裏去，他們那裏很冷。我們是後發制人。原子彈基地要有準備，防止他用飛機轟炸。抗議他不聽，雙方都在搶時間。他們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們有的人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應當改為我必自衛。人家犯我，我為什麼不能犯人？無非是東西，罇罇罐罐打爛，把人消滅一半，地球還是照樣轉。」

主席又說：「一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二是負責人要抓點，心中有數。」「報告上（指九大政治報告）不要講二月逆流了，這次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他們一肚子氣。祇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現在與那個時候不同了，那時他們是公開發表的。」「有些犯錯誤的，過一兩年還是要解放他們，就是不讓他們掌大權。」「（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劉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資產階級。給了宋棐卿很多錢，結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次會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二月逆流這些人選成九大代表，地球還不是照樣轉！『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就是這些，主要是落實政策問題。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勝利的。」

四月一日下午五時，毛主席主持了九大開幕式。

毛主席站起來宣佈：「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此時，臺上臺下的掌聲經久不息！毛主席接著說：「今天要選舉大會主席團，通過大會議事日程。大會議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項：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大會主席團的名單，在預備會上已經通過了，現在請主席團各位就座。」主席扭頭向後一看，笑著說：「大家趕早不趕晚，都坐下了！」

在主席臺的前排，毛主席右邊是黨內的老同志：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左邊是林彪及中央碰頭會的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這樣的坐法，總理是費了一番心思的，如果不這樣坐，江青的位置就很難安排了。那

時主席基本上還公允，但要對江青安排適當，他也是記在心上的。當時的座位，劉伯承排在朱德前面，主席是有用意的，部隊的老幹部都看得分明。

然後，毛主席說：「現在，我們還要選舉大會主席團主席。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志當主席。」

林總立即說：「毛主席當主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

主席還是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個副主席，好不好？」

林總站起來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主席萬歲！贊成的舉手。」緊接著，林彪自己說：「全體一致通過。」

這時主席說：「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贊成的請舉手。」

代表們一致舉手。

主席：「沒有意見，通過。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大家鼓掌通過。

在選舉了大會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長之後，毛主席發表講話。主席說：「我希望我們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能開得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接著，主席簡單回顧了黨的歷史代表大會，說明黨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對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二個代表，主席說：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董老（董老站起來，向大家致意），再一個就是我，其他好幾個犧牲了，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武漢的陳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有四個：陳公博、周佛海、劉仁靜。還有一個李達，武漢大學的校長，早兩年去世了。

主席特別講到七大，認為七大開得是好的。主席說：七大是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清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那時有人提議，不選王明路線的人到中央。我說服大家選了他們，團結他們。結果呢，有幾個人表現不好，王明跑到國外去了，反對我們！張聞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維漢不好！（總理插話說，還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錯誤。其他幾個，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這些人，那時不知道他們不好。對他們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 方塊邊進來了，

從八大以來，現在搞清楚了。他們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比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們這次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在九大會議期間，毛主席特別強調大會要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以後則把「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定為九大的政治路線。這個口號無疑是對的，但主席正是在大大破壞了黨的團結的情況下提出團結的口號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時，中央委員不過半數，這個情況

主席當然知道，但主席並沒有把大多數同志團結起來。

以我的親身經歷來說，我們黨是遭受過三次嚴重打擊的，這就是：王明的左傾宗派、文化大革命打擊一大片和毛主席去世後對毛主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徹底否定。這三次打擊，一次比一次厲害。三次打擊的共同點是黨的肌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主席講完以後宣佈：「現在請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

作政治報告也是一種象徵，七大是主席作政治報告，八大是劉少奇，九大是林彪。

前面說過了，關於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從撰稿人到《政治報告》的內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林總對張春橋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無論在起草過程中，還是在大會上宣讀的時候，都沒有增加或減少一個字。林總原來打算提議，把《政治報告》印發大會，他在講話時對《政治報告》說幾句相關的話就行了，林總同我們提及此事時，黃、吳、李和我建議一定不能這樣做，林總經過考慮之後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並下決心承擔宣讀報告的任務。

在大會上，林總與其說是作報告，還不如說是讀報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為，林總事先根本沒有看過《政治報告》的內容，所以念起來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應付差事。回來後，林彪說我就是要念得磕磕巴巴的，這是林總極為難得的調侃。

林彪講話時，毛主席一直聚精會神地聽著。我親眼看到毛主席在七大、八大、九大的神態。在這三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的神態是不同的。

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基本是自己動手。主席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的講稿是主席親自寫的，甚至會場的佈置都要親自過問，會議期間，毛主席不僅深入到各代表團去聽取發言，而且還深入到各小組與

代表談話。王稼祥、王明在正式選舉落選之後，毛主席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再次補選才選上的。

毛主席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情況，我不太瞭解，後來主席說過，他在八大基本是一個閒人。像對《政治報告》這樣的文件，我們看見毛主席是在主席臺上修改的。文件上原來寫的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落後的生產力」……毛主席不同意這種提法，毛主席修改之後，先給坐在右邊的周總理看了，再給坐在左邊的劉少奇看的。周總理還在那個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時，印發了周總理的那個批注。

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的基本表現是放得下心。周總理都能注意到各方面的問題，許多具體的問題，周總理在夜以繼日地處理。毛主席在九大期間的精神是很好的。

江青一夥在九大開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們是毛主席的親信，未來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其目的沒有別的，就是了為拉選票，他們的做法，對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騙性。

首先是出場、退場的問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入主席臺的時候都儼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領導的神態，他們跟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一起出入場，江青有幾次是跟周總理並排入會場的。元老派則是跟在中央碰頭會議成員之後出入會場。「左」、「右」兩派劃分得很嚴格。不僅如此，在江青一夥控制的新聞報道上，還特別發表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入會場的大幅照片。

其次是江青搞政治投機，在江青的預先策劃下，她抓住機會在主席臺上同毛主席照了一張合影。後來據江青自己說是二樓的攝影師用望遠鏡頭為他們兩人拍下了「非常好的一張照片」。在九大開幕式的新聞報道的清樣裏，附有這張照片。發表這樣的照片，周總理沒有把握，但又不敢去掉，祇好把《人民日報》的清樣送給毛主席審批，毛主席看到清樣後，用筆在照片自己的頭上打了一個大叉，主席沒有同意發表這張照片。

大會討論和發言

開幕式之後就轉入小組討論，四月十四日下午又開大會。

毛主席主持了大會，他宣佈：「今天的議事日程有三項：一是要通過林彪同志代表黨中央的政治報告；第二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章；三、還有幾個同志講話。」

在十四號大會上發言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等人，他們分別代表軍隊、工人、農民、戰鬥英雄、革命幹部發言。每個人的發言都比較短。周恩來總理首先在大會上發言，總理的發言主要就是兩點：擁護毛主席，讚揚林彪。

總理說：

我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開幕式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我熱烈慶祝在毛主席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導下的新黨章的產生。

毛主席在講話中要我們回顧黨的四十八年歷史，我們應該經常回顧黨的歷史，特別是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劉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的歷史，回顧黨在四十八年所積累的勝利和失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回顧黨在國際關係中的鬥爭經驗，回顧我們為什麼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接著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二十年後的今天，又面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要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祇有懂得了這些，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林彪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精闢地闡明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承革命的學說，論證和證明了毛主席的這一偉大學說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不斷革命的理論，並且從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具體實踐中證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倡導，並發動群眾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等为代表的

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面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林彪同志主持了軍委工作以後，在一九六一年首先在軍內出版了《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就推廣到全國，直至全世界，可以說，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這一紅寶書把毛澤東思想所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眾化了，使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以至於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廣泛傳播，從思想上武裝了億萬群眾，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輿論動員，並且具有深遠的影響。

……

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一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反對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全國解放後，反對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的鬥爭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堅決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彭德懷的篡軍、篡黨陰謀被揭發後，林彪同志親自主持軍委的工作，林彪同志發揚毛主席古田會議的建軍思想，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重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提倡把我軍建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有力地宣傳了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眾性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方法，這就是他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一套作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及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國內外形勢是大有利於人民的，而不利於敵人的，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牢牢團結起來，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周圍，落實政策，奮勇前進，就一定能從勝利走向勝利！

總理發言以後，林彪有些坐不住，因為總理都是讚揚他的話，因此他即席發言。林總原來沒有準備講話，是為回答周總理的講話而發言的，林總說：「總理的講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這就是：我們黨的勝利都是毛主席領導的勝利；任何人祇要執行毛主席的路線，擁護毛主席的領導，都能夠取得成功的。在這裏，還要指出一個問題就是不要學賀龍。如果賀龍還在的話，我的腦袋早掉了。在黨的領導下，賀龍在湘西搞起了一點武裝，就據為已有，對部隊實行『軍閥主義』的統治。如果有毛主席早就沒有我林彪了。我們全黨要永遠跟著偉大領袖毛主席。」

陳伯達的發言最有水平，提到「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這在當時全黨都頭腦發熱的時候，說出這樣的話是不容易的。

康生的發言主要是說修改黨章的問題，其內容等於是做了修改黨章報告的摘要。張春橋他們在完成了政治報告的稿子之後，就以康生掛帥準備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們想爭取康生擔任修改黨章的報告人。江青一夥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九大會議中更多的東西的都攬到自己的名下來。九大沒有安排人做修改黨章的報告。在九大周恩來做修改黨章的報告是

合適的，但大會卻安排康生做這樣的發言，這樣的安排，肯定跟主席的考慮有關。

孫玉國的發言受到了大會的熱烈歡迎，大會的氣氛達到了高潮！當時蘇聯對中國的政策，中蘇邊境可能會發生衝突，但在珍寶島發生戰鬥則是突然的。我邊防部隊是被迫應戰的。

孫玉國把珍寶島的戰鬥經過，生動地在大會上講了一遍。他的發言常常被代表們的掌聲打斷，會場上出現了非常熱烈的景象。珍寶島戰鬥的勝利，為大會增添了很多光彩。

當孫玉國講到「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來的」時，毛、林彪、周總理帶頭鼓掌，他講完話，毛主席當場問了孫玉國的年齡、籍貫、家庭等情況。

毛主席指著孫玉國說：「他叫孫玉國，是趙錢孫李的孫，玉字上加一點的玉，國是國家的國。這次珍寶島打仗就是他指揮的，打退敵人三次進攻。敵人打仗用了飛機、坦克、指揮車，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的戰士除了一個副營長，都是沒有打過仗的。這次破除了一個迷信，沒有打過仗的，也可以打勝仗。蘇修他們開的烏龜殼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烏龜殼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們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副主席的勇敢。三月十五日來了許多輛烏龜殼，五百米我們不打，一百二百米硬功夫。三月十五日來了許多輛烏龜殼，五百米我們不打，一百米還不打。五十米來了，我們一開火，他們的烏龜殼就翻了。我們過去打仗沒有烏龜殼，打勝了，還得靠人，靠步兵。烏龜殼我們有一點，但主要不靠他們。裝甲兵司令來了沒有？（林彪說：『裝甲兵政委黃志勇來了，在下面。』黃站起來。）我不是說不要裝甲兵政委黃志勇了，也不是說不要吳法憲的空軍了。是說還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準備打仗。我們不出去，邊境上小打。可以放進來，給他些甜頭，放進來後再打。」

大會發言之後，會議通過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政治報告》，《政治報告》通過後，毛主席很高興，說：「都贊成，有希望了，通過。」大會審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也得到通過。

毛主席談兩條路線鬥爭問題

這期間，主席幾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組的召集人、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開會。主席不厭其煩地多次講話，這麼上心，這麼用心，是少有的。

的。雖然主席的開場白都是慣有的、滿不在乎的調侃，但講著講著就講到路線問題上，中心意思就是，從陳獨秀開始，歷屆黨的領導人都是不成的，都是錯誤路線。當時我們也聽得津津有味，認為主席是無比正確的，主席是偉大的。主席的談話距今已經三十年了，有些情景還歷歷在目。下面我不是按主席談話的時間，而是按內容加以回憶。

第一次談話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主席說：「會議已經開始了幾天了。大家對大會有什麼看法，這樣開下去行不行？」

許世友說：「大會開得很好。大家在小組會談得可熱鬧了！參加會議的人，心情都很舒暢。」

毛主席又問：「今天在坐的同志有多少參加過七大的？」

周總理插話：「參加過舉手。」

毛主席說：「啊，人很少，除了當時就在中央工作的人之外，祇有許世友、陳錫聯、黃永勝、楊得志、邱會作等人（毛主席一個一個點名的）。當時是戰爭環境，很多人都在前方，打仗第一。參加過七大人的可以對比回憶一下，看看兩個大會有什麼主要的不同？」

我說：「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

黃永勝、陳錫聯先後說：「我們大家都感到，我們的黨所以能夠這樣有力量，同人民群眾關係那樣密切，黨內上下那樣團結，最主要的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深入人心！」

周總理說：「領袖的力量是無窮的！」

陳伯達說：「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的，所有力量就是從這裏來的。過去沒有好好宣傳這個問題，我們做宣傳工作的感到很慚愧！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應當歸功於林副主席。」

許世友楞頭楞腦的說：「好的要說夠，壞的也不要隱瞞。我們黨內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老幹部對造反派不滿，有苦難言！所有老幹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頭的。對這個問題，沒有鬧起來，就是所有老幹部都聽毛主席的話的結果。老幹部並不反對文化革命，但都反對造反派！」對許世友提的這個問題，沒有人敢附和。

接著，主席像往常一樣，都是扳著手指，把黨在歷史上的各次路線鬥爭，一口氣講下來，把每次路線鬥爭的主要問題，主要負責人和黨受到的主要損失都作了簡明扼要的說明。毛主席這樣的講話，我已經多次聽了，因此，我聽得很熟悉，也能理解。

主席說：「我們犯路線錯誤，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不從實際出發，祇是照書本行事，或者搬用別人的經驗。例如，在中央蘇區反敵人第五次『圍剿』，提出保衛每一寸土地。好不好呢？但哪裏保得住啊！所以路線問題，是起決定作用的問題。」

主席說：「我看黨內最危險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陳獨秀的右傾，二次是王明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三次是劉少奇。其他都是局部的錯誤，如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彭德懷。張國燾是局部的，在軍隊自搞一套，張國燾以勢力大小為依據，這是標準的軍閥主義，他看四面軍的力量大，一方面軍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搞兩個中央就是分裂黨，其實一方面軍出發時力量也大。我們是為了黨不分裂，團結張國燾，最後也祇是他一個人跑了。羅章龍、張國燾都另立過中央，他們都沒有搞幾天。」

主席在談話時提到黨內三次「左傾」的問題，主席說：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還在世，他們和我們有一條口號是一樣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後來蔣介石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又和國民黨鬥爭。我們在土地革命時期三次「左」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王明反李立三，說是三中全會搞得還不夠，王明不是反他們的「左」而是反他們的右。一次比一次厲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厲害，王明比李立三厲害，把紅軍搞得差不多了。李立三沒有搞幾天，主要是王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發生在黨的創建時期。這時期黨員不多，我們也沒有軍隊。但造成了思想混亂，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界限模糊了，妨礙了黨的發展；「八七」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錯誤，以後主要是「左」傾了。中間黨派有些可以聯合的但沒有聯合，城市小作坊主，不該沒收的也沒收了，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有另外的作用，就是逼著一部分黨員，在大城市呆不下去了，要「上山下鄉」才能活命，才能發展。

王明的「左」傾，損失就大了。當時，我們有了大小不同的好多塊根據地，有了幾支相當大的軍隊；白區的黨也發展起來了。這些都讓王明送掉了。這叫做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紅軍被迫長征。他們都是用「左」的面目去糾正別人的右傾，所以越反越「左」。六屆四中全會後更「左」了。王明的「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小冊子就是為反李立三的「左」傾而寫的。當時，紅軍總數十萬，王明在莫斯科一指揮就剩下三萬了，他也舒服了。

一九三八年王明由莫斯科回國後，就由「左」變為右傾機會主義了。當時黨內有一種思潮，就是國共合作就不要獨立自主了。什麼「抗戰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就成了這種思潮的頭子。國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蓋了獨立自主，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搞根據地。延安整風時，批判了「王明路線」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路線。

我覺得這次大會，總結這幾年的經驗，總之，沒有劉少奇這夥人了，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存在著一個全黨變修的問題。其前途就是亡黨、亡國。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我們早有察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還有兩句，鄧小平和劉少奇要有區別。鄧作了許多壞事，一條是棄軍逃跑；一條是到北京後與劉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蘇聯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但總打過些仗。

在主席的談話中，他對劉少奇是不滿意的。主席說：「除鄧小平沒有發現歷史問題以外，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國民黨有一些關係。大革命時，劉少奇搞總工會，讓工人糾察隊向敵人交了槍。一九三七年三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劉少奇、彭真等不贊成。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請我們去談判，開頭是我去，沒有結果就回來了。然後就是董老、總理他們去了。劉少奇在延安黨校作了報告，說抗戰勝利是『和平民主新階段』到來了，並向各地發了電報。我們按照七大團結勝利的路線，進城以後，把劉、鄧團結起來了。」看來毛主席對劉少奇的問題，是瞭如指掌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了，我本以爲九大時要追認一下，畢竟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呀，但九大沒有這個議程。

主席說：

朱（德）、陳（毅）是經歷過中央蘇區的鬥爭，吃過苦的，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現在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困難，許世友說朱、陳反我反了幾十年，其實有時也不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後，他們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篡奪了軍權，但心裏不踏實。陳毅到上海向中央請示，受到了批評，中央批評他們是極端民主化。陳毅又請我回軍隊了。我不是又「復辟」了嘛！項英奪了軍權，不會指揮，要請外國人指揮。至於王明沒有搞過一個根據地，沒有打過仗，農民運動也沒有搞過。那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吃得開，我們這些人都是右派。項英一個時期沒有轉過來，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才接受教訓。在對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不能不利用他們，不能不限制他們，也不能不改造他們。對待富農的問題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學會歷史地看問題。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是個複雜的問題。祇聯合不要鬥爭是右傾；祇鬥爭，不要聯合是左傾。大革命時期在武漢，劉少奇、向忠發、項英、李維漢就祇講同國民黨聯合，國民黨的代表人物就是蔣介石、汪精衛。蔣汪叛變了就不要聯合了，打倒一切！

第二天繼續談路線問題，毛主席說：

黨的七次代表大會，是開成了團結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之後，確實團結起來了，比中央蘇區，內戰時期更加團結了。七大時還有幾個人聯名寫信，不選王明他們，我說要選他們。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錯誤的人，我們不在大會上批評他們，事先把他們的問題給大家講清楚。他們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但在蘇區吃過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其實他們在蘇區與朱德、陳毅差不多。七次大會，王稼祥，王明都落選，是經過做工作第二次選舉才選上的，這種團結，是在正確路線之上的團結。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當時，還在打仗，沒有機會同大家講字讀^廣_大群眾。

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消滅。劉少奇他們還是講利用，不講限制和改造。

主席在會上講：要把朱德、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陳雲、李富春、李先念等老同志選進去。這當然是很好的，當時我就認為團結的人還不夠，那個時候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主席說到鄧華，鄧華就是中央候補委員，再能多團結一點人就好了。如李志民、胡耀邦等人，都參加了八屆十二中全會，選進來應該是可以的；再如張聞天、王稼祥這些人，主席也掛在嘴上好幾次，最終還是沒有把他們選進中央委員會。其實他們在黨內早已沒有太大的影響了，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們也都是繼續革命努力奮鬥的。選進來主席威信會更高，這的確是一種遺憾。

毛主席談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階級隊伍的問題

毛主席說：

文化大革命同四清運動的不同點是：四清運動主要是搞基層，搞經濟基礎；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層建築，搞反修，也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現在基層怎麼搞，祇提出了「鬥批改」，但是還沒有落實。

搞社會主義，比打仗困難多了。搞建設實在不容易。社會這個東西，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是違背不得的，它老大得很，不管什麼「主義」管它，一概不理。要是違背了它的發展規律，是要受懲罰的。我們把制度和方法，總死死捆在一起。比如，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應當堅持，這是對的。但我們共產黨辦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來，祇讓他們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結果是包而辦不好。我看要把它倒過來。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們自己來辦，我們祇包百分之二十就好辦了。

到九大的時候，「天下大亂」的時期基本過去，「天下大治」的階段應該到來。主席還是反覆講要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鬥批改」中，要注意防止擴大化的問題。主席說：

「鬥批改」是中央提出來的，下面一搞就擴大化了，這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一個傾向，我在碰頭會上談過好幾次了，清理階級隊伍是要把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找出來，要搞這樣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擴大化，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引起重視。

主席說：

我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的時候，就提出了清理階級隊伍要「穩、準、狠」。「准」是最主要的。有些專案組的材料不一定準確，這個問題要注意，搞專案的人總想多搞幾個才好。好像過去我們行軍，沒事捉虱子，總想多捉幾個，專案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一點好說話。一個大學捉了九百多人，怎麼得了？人關起來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個理由。至於關在牛棚裏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蘇聯人講我們整知識分子，王明在莫斯科發表文章說我們不要知識分子。秦始皇殺了四百幾十個人，我們比秦始皇好一點，沒有殺，搞噴氣式，戴高帽子，遊街，掃廁所。噴氣式也不要搞，我們不主張戴高帽子。我說罪魁禍首還是我。我在十二中全會上講了：我在一九二七年的文章上說了，地主戴高帽子遊鄉，既然給地主可以戴，為什麼不可以給彭真戴？給牛鬼蛇神戴？我們幾十年沒有搞了，這次紅衛兵就翻出來了，搞這一套。抓人還是大部不抓，抓了怎麼辦？還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嘛！現在擴大化了，許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們黨的歷史，總是在主要傾向掩蓋之下，另外一種傾向就忽略了。

主席講到文革時特別強調說：

文化大革命是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叫文化革命也可以，因為是從文化開始的。不管叫什麼名字，觸及上層建築，中央機關，到學校、工廠。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恐怕還要一個時期要認真抓一下。這次文化大革命，由歷史作結論。

各個時期都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要使同志們瞭解我們黨的歷史，以免犯錯誤。現在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傾向就是，不僅沒有預見，事情來了不考慮，總是屎急子擦廁所，屎急子讀書社區網

沒有不出事的。北京有個單位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抓起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講個理由，為什麼抓我，又為什麼放我。抓人容易，放人難啊！對有的人，關在『牛棚』裏，長時間無人過問。知識分子，打掃廁所是可以的，但長期無人過問就不好了。我們現在搞的『三支兩軍』又使軍隊與群眾融合了。」

主席在談話中提到很多同志及這些同志主管的部門和地區，如李雪峰、謝富治、韋國清、楊勇、鄭維山、陳先瑞、許世友等很多同志。我感到毛主席是認認真真在搞這場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像鄧小平他們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說得一無是處，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無是處。主席說：

這場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眾中有無政府主義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機破壞，打倒一切。我看這都無關大局。武鬥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幾萬人武鬥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有人認為軍隊穩不住了，其實沒有那回事，軍隊很鞏固，文化大革命穩坐釣魚船。軍隊本身也有派性，野戰軍，地方軍各支一派，如保定、四川、貴州、雲南都是如此。對這些同志，過去搞了武鬥，現在應聯合。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必記仇。

將來有些幹部犯了錯誤群眾諒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楊勇。當然他也有錯誤。是哪裏下的命令？至今我還不知道。（江青：幾個老帥下的命令，叫鄭維山執行的。他們倒打一耙，嫁禍中央文革，我們哪裏能下命令抓人呢。）蕭華是有問題的，他在山東的問題現在是紅衛兵搞出來的，原來中央知道的不是那回事，叛徒是肯定的。楊成武也有問題，不過他沒有歷史問題。余立金不僅是皖南事變本身的問題，主要是到了上海自首的問題。楊、余、傅，楊、余大一些，不過傅也不是老實人，不講真話。

對清隊問題，主要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把政策落實，要幹一年左右，大家都要親自抓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機關。工人宣傳隊，軍隊宣傳隊都不能壓群眾。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不是壓倒一切。反對軍代表，就說別人反解放軍，反工宣隊就說別人反工人階級領導，這是不對的。對問題要實事求是，不要隨便扣帽子，對提意見的人可以做工作。現在有些謠傳很厲害，中共黨史出版社編制

在街上看到貼了誰的大字報，就說某某人打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張春橋、張國華、打了半天，他們還在這裏開會。

毛主席談關於準備打仗的問題

毛主席說：「幾年來，林彪同志抓戰備抓出成績來了。有人說，現在不是『有國無防』，而是有防了。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對準備打仗一點也不能放鬆。」

毛主席接著說：「準備打仗，思想準備是主要的，物質準備是重要的。我們不能沒有思想準備，也不能一點東西都不存起來。準備好了，仗打不起來怎麼辦？這完全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有準備沒有仗打，這是經常的。蘇美搞那麼多的原子彈，花的錢不計其數。他們的原子彈並非為了展覽的，將來打不起核戰爭怎麼辦？我們還沒有為他們找到出路。」

「過去就提出了『大辦民兵師』，這個問題還是要抓緊，這是戰備的重要問題。我們說，祇要有人就可以辦大事。我們國家有千千萬萬孫玉國，一個年青人可以指揮打仗，這是蘇修最難對付的。他們可以在邊界上打仗，也可以到任何地方打仗。總之我們不怕打仗，要有準備就是了。」

林副主席插話說：「除了物質條件不如蘇修之外，我們都比他們好。特別是毛主席的威望更是強大的戰鬥力。」

周總理插話說：「我們的生產，包括軍工生產在內，比起抗美援朝時期，還是好多了。祇要一打仗，毛主席一號召，生產可以很快上去，滿足作戰部隊的需要不是很難的。同時，我們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物質儲備，現在邱會作手裏的東西，夠三百萬人打一年。」

毛主席對著我說：「啊，你這個後勤部長不簡單，懂得準備打仗就好！我們總的戰略還是積極防禦的，這條不能變。有一條原則是：不管出現什麼情況，都不要慌張，要搞清情況才打。解放戰爭在陝北的仗就是這樣打的。胡宗南初來的時候，如入無人之地，一個兵也見不著。待敵人走來走去，欲進不能，欲退不得的時候，我們才打的。這就是說，敵人主動進攻，勢頭洶洶的時候，我們不打；等待敵人被動，我們主動的時候，我就打。無論全局，局部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是作戰指揮員不可忘記的。」

毛主席談關於選舉的問題

毛主席說：「我建議有幾個同志都選進去，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王明大家不會選他了。王稼祥犯過大錯誤，他是王明『左』傾路線的積極支持者，但也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的。這些人選進去，多他們不多；如果留在外面，少他們就會顯得少了，我是贊成選他們的。」

毛主席指著一份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名單說：

這個名單很難排。有的同志參加了會議就榜上有名了，沒有參加會議的就名落孫山，例如，北京軍區有六個軍，來了一個軍長參加會議，名單上排上了，有的參加了省革命委員會，也排上了。沒有排上的也不一定比排上的差。排上的也不一定個個都那麼好。人們都說，辦事要公道。什麼是公道，祇有天知道！在名單上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為什麼要這樣分，我講不出來一個道理來。

從工廠、農村來的人，選上了中央委員的，也要回原單位去，不要脫離勞動。有人提出，新走上政治舞臺的人，不要在中央，就要在基層。基層是馬列主義大學。

張聞天、王稼祥沒有排上，值得考慮。在名單上排上的人，也有人提議要拿下來，我看還是要選他們。（許世友插話：他們反毛主席幾十年還選他們？）反幾十年難說，有時反有時不反。比如彭德懷是反對我的，但反張國燾和我是一致的。陳昌浩拉彭德懷沒有拉過去，這應是他的一功。當時，如果彭被拉過去了，就剩一個一軍團了。我們北上是肯定的，祇剩一個軍團，也是會北上的。這裏還提一下葉劍英這個人。葉在歷史上有二功：廣州暴動和張國燾分裂紅軍。在草地，如果沒有葉劍英把張國燾的密令搞出來，我們大家當了俘虜，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呢。

那些反過我的人，要選他是困難的，要你許世友投他們的票也是困難的。那些人，資格很老，功勞也有，錯誤不少，有的還犯過大錯。他們的檢討也有，但群眾不通過。我看以後就不要檢討了，主要看行動。我們看他們的行動，他們也看我們的行動。（許

世友插話：毛主席下命令，我們就選他們）那不行，祇能說服，不能壓服。

黨的七大時，我們要選王明，王稼祥，他們不信，我們真的選他們了。我們選了王明，後來他又跑到莫斯科去反我們，這並不是選錯了。我們要不先選他們，可能早就反了。他們繼續反，是為自己做了結論，大家都看清楚了。選一些反對過我們的人，不要緊，祇要大多數是好的就行了。黨內總會有矛盾的，中央委員會也有矛盾，沒有矛盾的事是不存在的。

上海幫批判陳毅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曾說過：「你搞別人的材料，別人也可以搞你的材料」，這句話讓張春橋自己給說中了。上海解放軍二醫大革命組織「紅旗」搞到了張春橋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張春橋的老婆歷史問題的材料；同時還有姚文元父親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這些材料不知道怎麼處理，因為處理不好，小則給自己造成被動，大則要犯政治錯誤，甚至被打倒。因為張春橋、姚文元不僅是江青的紅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開會的機會，給總理嘀咕了幾句，總理很慎重地說：「這個材料你不要轉給我。」稍等片刻總理又說：「群眾來信我是可以收到的。」總理的話提醒了我，二醫大革命組織，把張春橋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給了總理。但事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在九大期間，好像是進入選舉程序的時候，黃永勝悄悄告訴我：「告訴你，眼鏡（指張春橋）是個叛徒，材料轉到主席那裏去了。」主席好像並不重視這些材料，因為在選舉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時，張春橋仍然榜上有名。

早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有一次黃永勝在辦事組說：「……搞不清張春橋、姚文元是怎麼回事，說多了主席肯定不高興。但抓住『眼鏡』（指張春橋）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李作鵬好像知道什麼內情，立即提醒黃說：「我看我們少提『眼鏡』，是香是臭我們說了不算。」黃永勝本是個較嚴謹的人，但提起江青一夥又沒有顧忌，甚至挖苦完江青，別人還沒反應過來，自己就哈哈大笑。他聽了李的話就說：「方不說了，區制做不說

了。反正我們沒當過叛徒。」其實他對李的話還是漫不經心，這些話也不避秘書，為他的秘書李必達給江青寫告狀信創造了條件。

在大會期間，上海代表團對陳老總進行了多次批判，大會選舉的頭一天晚上，還進行了通宵達旦的批判，這與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對陳老總錯誤的批評，是有密切關係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對陳毅批判的話也確是說得過重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挖苦陳毅是右的代表也是十分錯誤的批評，九大沒有把陳毅留在中央政治局裏也是十分不妥當的。陳老總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災難，主要是由毛主席對陳總的態度所決定，幾十年前的恩怨，主席嘴上說不計較，實際上心裏還是沒忘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行將結束討論九大的準備工作時，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等都出席了會議。在會上審查通過九大代表名單時，胡克實和陳老總、陳雲等人，都在席位上做了表態性的發言，胡克實說：「在文化革命中，我是犯錯的……不應當當九大代表。」胡的話音剛落，毛主席就面帶微笑很風趣地說：「啊，你這個胡克實，為什麼『實』都克了呢？」接著陳老總發言：「我犯過幾次反對毛主席的大錯誤，我是沒有資格當九大代表的。保證今後再不反毛主席了！」當時毛主席雖然沒有發怒，但很嚴肅地說：「你陳毅有資格當代表，你是右的代表！」毛主席講話後，全場一片靜默，鴉雀無聲。毛主席講了陳老總一通之後，陳雲可能有所思，也講了一句話：「我今生永世不反毛主席！」對陳雲的話，毛主席沒有表示任何態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海代表小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一會議室開小組會，會議從晚九點開到凌晨五點。我看到陳總的隨行醫生，才知道陳總在開會，我先後進去了兩次，都向他們提出過：「陳老總是個病號，三〇一總醫院是要對病號負責的。」王洪文還同我開玩笑說：「我們也會照顧病號。」

上海代表小組的會已經開到凌晨四點多了，我祇好向總理報告了，總理接到我的電話，感到很驚奇，並說：「真有那樣的事嗎？你去給王洪文同志打個招呼，做點工作，我馬上就去。」

這樣我即進去向王洪文說：「我受周總理的委託，對陳老總的健康是負有責任的。你們的會已經開了快八個小時，一個病號能受得了嗎？會出事的。」我向王洪文談這番話時，陳老總看著我幾乎要流出淚來。

王洪文把我拉到會議室外邊說：「江青同志和春橋同志指示，陳毅這個人很頑固，對自己的錯誤基本上不承認，更使人氣憤的是他發言名爲自我批評，實爲教訓人。明天就要選舉了，他選上了中央委員，又會尾巴翹起來的，這點事就不要干擾總理了。」他回會議室繼續開會。

不久，周總理來到會議樓休息室，我向他簡單說了一下情況。總理對我說：「我們不要指責他們，祇設法把陳總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複雜，一句話說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總理同我說了幾句之後，就把王洪文、陳老總都叫來了。周總理當著王、陳的面若無其事地對我說：「邱副總長呀，我肚子餓了，想吃東西，還有他們兩個（指陳、王）也一起吃一點，搞點東西吃。」

陳老總一隻手捂著肚子，向總理說：「我不必吃什麼東西了，我這就回醫院，好嗎？」總理祇是點頭，一句話也沒有說。我把陳老總送上電梯去了。

陳老總走後，王洪文要向總理說明爲什麼這樣開會，總理都用別的話堵住了他的嘴，沒讓他說下去。王洪文不理解總理的意思，還要嘟嘟噥噥地講。我就直截了當地向王洪文說：「你不要說了，總理是到這裏想吃點東西，並休息片刻，總理的腦子早就裝滿了，你再說也沒有地方放了。」我說了之後，三人一起笑了起來。此時，夜餐送來了，王洪文也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江青要當接班人

大會將要進入選舉之前，江青向林彪進行了一場「藝術性」很高的戰鬥。一天，大會秘書處通知，江青要在京西賓館舉行一次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人選，姚文元早已佈置好了：每個大組派五個人參加。姚文元是座談會的主持人。因爲軍委辦事組承擔了會務工作，我斷斷續續地進入會場聽到了一些講話和發言。

座談會開始時，姚文元首先講了話。他說：「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開座談會，是很有意義的。江青同志時刻都關心彈築造

反派的進步和成長。現在請敬愛的江青同志講話。」這時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會場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在掌聲中，江青開始談話了。

江青說：

我是一個不宣傳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別人宣傳我。大家很清楚，對我的宣傳就使人把我與毛主席聯繫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隨便說。今天在座的都是我的戰友，我有責任向你們簡略地講一下我的歷史，除此之外，我今天準備向戰友們講三個問題（一）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問題；（二）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問題；（三）要有一個無產階級戰鬥司令部的問題。

關於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問題。全會把劉鄧的問題端出來了，劉、鄧是不可能再擔任當時的職務了。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個考慮過程的。一天，毛主席對我說，誰來接替劉少奇的工作，你有什麼想法嗎？我一時不敢回話。在毛主席再三問起之後，我才敢大膽回答毛主席的問題。我向毛主席說：範圍不超出現有的中央常委，但要有三個條件：一是歷史上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人；二是貫同毛主席親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當的馬列主義水平的人。我說了之後，毛主席笑著說，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人了。我有意讓主席散散心，即說：「那好，現在我們把考慮的人各自寫在條子上面。」我們都各寫了一張條子，互相看了條子之後都笑了。林彪同志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當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來的。

關於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問題。在十二中全會上，擔任主要講話的人（沒有點林彪的名字）對文藝復興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對這樣的問題，我是顧全大局，維護中央領導同志的崇高威信的。我不想出來公開反駁那些不正確的觀點，祇是想經過一定的工作，使講話的人懂的錯在什麼地方，並自己出來糾正，我的態度是善意的。這裏，我還要指出的是，我的講話引起了軍委辦事組對我不公正的看法，對他們我同樣是不做公開申明的。對這個問題，我把所採取的態度向毛主席報告了，主席對我是很讚揚的。

關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我們的大會很快就要進行選舉了。我的願望是能選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這就是說

這個司令部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又是在毛主席指揮下，能夠進行戰鬥的司令部，這是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大問題。

什麼人可以到這樣的司令部裏呢？我看最關鍵的就是對文化革命的貢獻問題。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開創了這條路，就找到了建設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我們就是要理直氣壯把對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選到中央委員會去，選到中央政治局和黨的核心領導，中央政治局常委裏去。我們的江山是革命造反派從修正主義的手裏奪回來的，保衛我們的江山就歷史地落到革命造反派身上了。

毛主席的接班人，應該不止一個，我們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選到核心領導裏去。祇有這樣，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也決不止一個人，這個問題，在文化革命中已經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來了。

江青講話之後，姚文元接著講了話。他直接了當地提出，江青同志也應當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他說，我們在黨章上，雖然祇寫了一個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的革命的旗手，是當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講話的記錄整理好，就送給康生了。康生邊看邊冒大汗，他把記錄留下來，再沒有轉手。但記錄以後怎樣處理的就不知道了。後來在簡報上看到「江青同志召開部分代表座談會，對到會代表鼓舞很大」。

第三十一章 九大縱觀（二）

軍委辦事組退選舉名額

在九大期間，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對選舉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央文革要控制選舉，軍委辦事組則堅決反對。

毛主席對選舉問題的指示，前前後後所說的有三個問題。

第一，歷史的必然問題。

毛主席說：我看凡是正式黨員都可以當選。當然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是優秀的，但沒有選進中央委員會的，也有很多優秀的同志。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這個時代的特點。這也是一個歷史必然的問題。

第二，老中青相結合的問題。

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一定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各級領導班子也要實行這個原則。老中青三種人，在中央委員中大體上要各佔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們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黨員中佔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革命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對這些人好好培養出來就是未來的希望。對青年的培養主要是在基層。那些人要是離開了基層，也就可能成廢物了。

上次我們在各組召集座談會上，談到的那幾個人還是要考慮的。比如朱德、陳毅，他們兩人是不分上下的，南昌失敗後，從廣東到井岡山，能夠把剩下的人帶上山，祇有朱德是不夠的，陳毅出了很大的力量。在歷史上，朱、陳是分不開的。現在我們要朱德，也就不能不要陳毅了。

第三，選舉自由的問題。

沒有自由權就不叫選舉，而是奉命行事。我們不能搞那一套。拉選票，這是古來有之。資本主義社會，主要靠金錢。我們共產黨不搞這套，也搞不起呀！誰能用錢買選票？我主張在選舉之前對候選人要多討論幾次，讓代表有充分的發言機會。但我們的民主，是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

毛主席對選舉問題，從原則到具體都說得清清楚楚的。本來是照著執行就是了，但江青一夥還是另搞了一套的。在下列問題上，都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江青一夥的所謂選舉方針。江青在中央碰頭會上，以「學習」毛主席對選舉問題的指示為名，對毛主席的指示進行了肆意的歪曲。江青說：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革命造反派當權是根本問題。沒有革命造反派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地位。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也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因此，在九大的選舉的問題上，如何對待革命造反派就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就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問題，

江青他們看到候選名單上還是老同志佔優勢，大為不滿。她說：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中央委員會，應當是朝氣蓬勃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把基礎打好了。

對這個問題還是康生比他們高明，康說，中央委員會應當有許多老同志參加，要是沒有那些人就不是中央委員會，關鍵是權力掌握在馬列主義者手裏，爭中央委員的名額是祇圖虛名。康生這一席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夥最後還提出了別人說不出口的問題。江青說，在選舉中保證中央文革成員有足夠的票數，所以做好預選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威望問題。我提議中央碰頭會議應召集主席團開大會，說清楚這個問題。

周總理「啊」了一聲說：「中央碰頭會議還能召集主席團開會？」但總理馬上又緩和下來說：「我們應當開一個主席團大會，專門說下有關選舉的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中央辦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軍委辦事的就是「軍委辦事組」。這兩個「小組」的意見常常是對立的，當時，還沒有另外的任何中央一級機構可以與中央文革對立。國務院的業務組，名符其實，祇管「業務」。從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下臺之後，黃永勝上臺，軍委辦事組同中央文革就「貌合神離」了。對九大選舉問題，軍委辦事組對江青一夥提出的謬論，都進行了抵制與鬥爭，我們對待中央文革的辦法是很多的。其方法有的是直來直去，有的就照我們「自己的辦法」行事。在代表的總數中，軍隊代表佔三分之一以上，如加上各省市的軍管幹部，數字就更大了。軍委辦事組提出的選舉條件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和老中青三結合，堅決反對把造反派作為選舉條件的觀點，對大會震動很大，對整個選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我們堅決主張多一些老同志參加中央委員會。老黨員不僅過去有功，也是我們今天的需要。中央委員會沒有部分老同志參加，就不能反映我們黨的光榮歷史。對老同志有些不公正的看法，必須澄清。老同志中，對造反派搞打砸搶，揪鬥老幹部是反對的，對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胡作非為也是反對的，但這決不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反對毛主席。

軍隊安排中央委員的原則是三條，一是現任職務。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種，各兵種的軍政首長，都是考慮的「當然」委員；二是資歷。各總部，各軍區，各軍兵種的副職和軍事院校的主要領導幹部都是在被考慮之列；三是才能。除上面所指的正副職幹部之外，有些比較有才能，有發展前途的幹部也是被考慮的。為了慎重起見，軍委辦事組召集各大軍區，海軍、空軍，各總部的有關首長，進行了數次會議，除了一致同意上面所提三條原則之外，對所提名單也是逐個通過的。

周總理在各大組的會議上，讓軍委辦事組首先介紹了他們在部隊系統推選候選人的做法，各省市負責人也一致同意軍委辦事組的做法。最後，周總理肯定了軍委辦事組的做法是正確的。各省市的負責人也提出各省市的候選人由自己提名的要求。這樣就打消了江青一夥企圖壟斷提出候選人的特權。

江青一夥對軍委辦事組提出的產生候選人的做法很惱火，她問周總理說：「難道對各省市革命造反派優秀人員的名單也由軍委辦事組提出

嗎？」周總理直截了當回答說：「這個仍由中央文革提出來。」江青一夥得到了滿足，他們也就不說話了。

中央碰頭會議，對中央委員的總定額，經過反覆考慮定為二百多人

不到三百人，對總定額又進行了具體分配。軍隊的定額不到九十人。但

不包括擔任各省市第一把手的軍隊幹部。這樣實際上就超過了三分之一

以上。軍隊佔有這樣大比例的中央委員數額是空前未有的，各省市根據

大小不同，分為三等（具體數字記不起了）。各省市除了幹部之外，都要

有工人、農民參加中央委員會，毛主席批准了這個分配原則。

軍隊中央委員的總額在安排上進行了多次反覆研究安排，但按上面

所定原則名額用不完。各軍區，各軍兵種首長也再三表示，完全滿足了

要求，不能再安排了，他們說：如果再多安排一個就會產生連鎖反應，互

相攀比，影響一串。經過反覆考慮，有的軍區祇是多安排了一兩名，有

幾個人的名額和四名戰鬥英雄（陸軍兩名，空、海軍各一名）就是在這種

精神之下打破常規安排的，但名額還有多。在軍委辦事組的會議上，有

人提議，把名額退回中央碰頭會議，我向黃永勝擠了擠眼睛說：「名額先

不退回去，還是我們自己掌握為好，不然冒出來需要安排的人，我們就

被動了。」當時如果把名額退回去了，江青他們就會把名額搶走，中央委

員會中的造反派就會增多。黃永勝完全領會了我的用意，他說：「不夠格

的不能往裏塞。先把名額按住，等到這個工作結束時，我們再把名額退

回去。你（邱）去同總理說一下。」我去同總理悄悄講時，總理笑了，他

說：「好呀。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預選是以各大代表組為單位進行的。西南大組在京西賓館會議樓一

層東廳舉行。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分別參加各大組的預選，周總理，江青

參加西南大組的選舉。周總理、江青得了全票，西南大組的預選是我主

持的，江青得了全票非常高興，選舉結束時，再三向我說：「今天的預選

工作組織得很好，你的組織工作能力很強。」

西南大組的預選前後祇有一個半小時，江青在這段時間內，演了三

出小「戲」。一是進場時同全體代表每人握手、問好；二是選舉開始前發

表了簡單的講話；她說，我很忙，沒有時間來看望大家。今天利用這個預

選的機會，我代表中央文革向大家問好；三是選舉結束時又去發表了簡

短的講話。她說，從今天的預選結果來看，我們代表的思想覺悟是很高

的，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大家一致把中央文革成員選到中央委員會的深厚階級感情，我是很感動的。

溫玉成在中南大組，得到略超過半數的「保證票」。他在選舉後連家都沒有回，跑到京西賓館向黃永勝告狀。他說：「今天在中南組預選，李作鵬壓了我八十票！」黃永勝若無其事地說：「他頂多能壓你一票，為什麼能壓你八十張？」溫又說：「我要求把我的名字，從預選名單上刪去！」黃又說：「刪去不好，你不能意氣用事，江青同志不會同意的。她對你是非常欣賞的。」

溫又說：「啊！是這樣一回事呀！她越欣賞，我的票越少。」

黃開懷大笑說：「辯證法，辯證法。」

大會選舉

主席在九大的時候，將黨內歷史上的路線鬥爭，講得很重，已經離開政治舞臺的且不說，就是參加會議的朱德、陳毅等老同志，主席也是口沒遮攔，年輕人（多數是造反派）聽了很新鮮、很激憤。我們這些人，尤其部隊的同志聽了，往往不知所措。但是，主席又強調要把老同志選進中央委員會，根據毛主席既要保證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這些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批歸批，選歸選，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總理分頭找人談話，也貫徹這個精神，告訴各大組的負責人，工作一定要過細，哪些人投同意票，哪些人投不同意的票，都要落實到「人頭」，預選時這十位老同志都過了關。但是總理還是不放心，二十四日下午正式選舉，上午總理專門召集了主席團擴大會議，特地講老同志要當選的問題。總理說：老同志有錯誤，不論是文革中的還是歷史上的，都應批判，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團結、批評、團結」的教導也要把握好，特別是這次大會要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我們首先要 在黨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些老同志，可能對自己的錯誤有個認識過程，我們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幫吧。

散會後，總理把我們幾個留下，心事還是很重，自己輕輕拍著腦門，沉思很久才說：「下午就要正式選舉了，有把握吧（指老同志當選）？」我們說預選通過了呀。總理說：「不見得穩固！青年人不懂得黨的歷史，

不懂得大局觀念，吹一股小風就垮了。你們都是老同志，軍隊的同志原則性強，辦事組的同志威信高，你們馬上給部隊和你們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幾個人的票，不然時間來就來不及了。」

吃午飯時，黃、吳、李和我不僅給總參、總後、海軍、空軍、廣州軍區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們也給自己的老戰友打了招呼。黃永勝專門叫了袁昇平，談完以後，袁昇平開玩笑說：「哦，原來不是給自己拉選票呀。」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選舉。

全場設有五個票箱，臺上一個，臺下四個，投票開始了，毛主席第一個在臺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個，第三個應當是林總，周總理。但江青在投票的時候，又藉機出一個小小風頭，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時，她也站起來了，江青待林總走到自己跟前時，她邁出一步就跟在林總後面了。周總理完全知道江青的習性，還是讓她在林副主席的後面投票了。

投票結束之後，大會休息了約二十分鐘。接著在大會工作人員監督下宣佈選舉結果：一、大會主席團提出的候選名單，全部超過半數以上的票數都當選了；二、毛主席以全票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三、按照以姓氏筆劃的順序，每人得票多少都公佈了。

毛澤東以全票當選。林總少兩票，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自己和葉群投了反對票。周恩來少一票。前面提到的十位老同志全部當選了。從文革開始，到八屆十二中全會，再到九大，主席把這些人的臉皮掃盡了。主席認為把他們選進中央委員會，他們會感謝主席的，其實正相反，彼此結下很大的怨恨，主席去世以後，鄧小平等否定了毛澤東的時候，這些人誰也沒有站出來為主席說話。

公佈選舉結果的時候，江青一直在比較注意聽，當宣佈到她自己的票數時，她停了一小會即退席了，以後再也沒有出場，因為中央文革的人得票情況並不佳。江青可能少了八票，張春橋，姚文元各少十餘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X」，江青知道後大為震怒，說誰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誰是現行反革命。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得票的情況比他們好，溫玉成可能是少了幾十票。

選舉結果宣佈完之後，林總站起來宣佈，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在文化大革命中期舉行的這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國際歌聲中閉幕了。

九大閉幕時給我留下三點難忘的記憶。

一、上海幫的憤怒。散會的時候，張春橋、姚文元、溫玉成等人都低著頭跟著向外走，他們不像往常那樣，昂首到處張望。在九大選舉時，江青一夥全部當選為中央委員了，但沒有一個得全票的，特別是江青沒有得到全票，他們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

二、高級幹部的議論。九大期間，主席團成員進出大會會場，都由人大會堂東門出入。大會閉幕後，我同蕭勁光、粟裕等一起緩步向東門走去，我們幾個人，邊走邊閒談起來。我說：選舉的中心問題是當選與落選的問題，多幾票少幾票毫無意思。粟裕說：對一般人毫無意思的，對特殊人意思就大了。

三、代表的熱情。九大的代表，自始至終都保持著飽滿的熱情。會場總是表現的熱氣騰騰的景象，對毛主席，幾乎每個舉動都報以熱烈的掌聲。散會時，不少代表走到會場的主席臺前面，要仔細看看毛主席的容顏。毛主席也站起來，數次向大家致意才離開。

在大會閉幕的當天晚上，中央碰頭會議照常進行。四月二十五日凌晨黃、吳回到京西賓館。黃永勝把中央碰頭會議的詳細情況都向我們說了，他說，對選舉問題的最後解決就要看毛主席的態度，我們同他們（指江青一夥）又多結了一個疙瘩。但一反常態的是，在會上唱主角的是張春橋，幫兇是謝富治，江青反而情緒和悅，基本沒有說話。

張春橋說：「選舉中，有人搗鬼。要徹底查個水落石出！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這不是少選票的問題，而是一種見不得人的政治鬥爭！」

溫玉成在張春橋提出問題之後，唱了很高的高調。他說：「不投江青同志的票的人，數量雖然不多，但看出了嚴重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是新的修正主義向無產階級進攻。從大會的選舉可以看出，同修正主義鬥爭是長期的鬥爭！」

姚文元說：「同意徹底查清選舉中的問題，在中央碰頭會議也可以來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

周總理向坐在他旁邊的江青說了一句話：「你說幾句嗎？」

江青：「我是受害者，不說話！」

康生接著說了話，他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問題。毛主席指示，選舉自由。另外，我們實行的是無記名投票，無法調查，這個問題，要向毛主席報告，經主席批准的才能查。這裏還要順便說一句，什麼新修正主義？這是美國共產黨加在我們頭上的，我們不要去搭理，更不要引用。」

陳伯達：「康老說得好，我們不懂的問題不要自以爲是地信口開河。」

溫玉成本來是要唱高調來效忠江青的，江青又不說話 這就夠他難受的，又遭到陳、康兩位理論家的批評，心裏就更難受了。

周總理：「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見。不要斤斤計較票數的多少。此事，由汪東興先報告毛主席。在必要時，我還會向毛主席匯報。」

江青一夥對選舉問題表現出來的憤怒情緒，使黃永勝略有不安，他對著李和我說：「可能惹禍了，你們看出來了沒有？」

吳法憲補上一句說：「本來就不應當去搞那些事。」

李作鵬一下生氣了，用一種很粗魯的語言說：「在暗角裏說話，嘴巴邦邦硬，現在又屁股稀鬆鬆！」

我也說：「別人少了選票。我們擔憂幹什麼？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我的話是有意給黃永勝壯膽。

黃永勝說：「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諷刺人。好漢做事好漢當！」

江青一夥提出要查選票的事，周總理還是向毛主席匯報了，並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人違犯黨章的大合唱。」這樣，事情算是最後了結了。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機會同周總理見面，總理對我說：「你回去同黃、吳說一下，選舉中的問題，主席有指示，已經解決了，不要有什麼擔心。原則問題你們要堅持，在些小的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住辯子，要吃大虧的。軍隊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的，這次關於的選舉問題就有人同我寫了一封信，揭露了這個問題。但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我將總理上面說的情況，同黃、吳說了，並建議他們兩人在順便的時候，向總理說一下在選舉中的問題，他們同意我的建議。

江青這個人也不是處處胡鬧，對選舉問題，她不僅不表態，還在知道了毛主席的態度之後，反轉來對張春橋，姚文元不指名地進行了批評。她在二十五日晚上的中央碰頭會議說：「在選舉的時候，發生了一點小小的問題，有人過於重視了，這有什麼必要。至於有的人提出，不投我的票是大代表所為，這事是毫無根據的。」

張春橋指的不投江青的票是大代表所為，就是指的軍委辦事組。江青對選舉問題似乎是「公道」的。這是為什麼？原來是康生早就同她說了：「小不忍則亂大謀。」康的意思是：一中全會的選舉才是大問題。江青對康生，基本上能做到「言聽計從」，對大會選舉問題，雖然痛恨在心，但也忍耐下去了。

三人小組

四月二十五日晚，軍委辦事組正在開會，汪東興來電話通知：主席要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裏開會。主席召集周、康、黃開會，並不新奇，但九大剛閉幕，一中全會還沒有開，新的政治局尚未產生，這樣的會就不是一般的會了。黃去開會之前，黃、吳、李和我在一起議論了一會，我們各談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見。

我們正在談得熱鬧的時候，葉群來了。她一進門就笑笑地對著黃永勝說：「你要去參加組閣了。」她又說：「今天你們要開的會，十一樓根本不知道。怕她干擾組閣工作。今天的會議主要談準備一中全會的問題。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單初步定下來。」

葉群接著說：「林總說，這屆政治局的組成，比以前都困難。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黃永勝剛要出門，林辦來電話報告：「江青同志來電話要到京西賓館去。」葉群爲了迴避江青，她從後門走了，黃說：「我也走。」

江青來了之後，一看黃、葉都不在，就有點心不在焉了，除了問黃永勝、葉群的去向之外，就談了幾句，她說：「現在大家都是中央委員，這是革命的成果。一中全會就要開了，要產生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要產生一個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關於組織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則問題，毛主席已同我商量過，具體情況，現在就不談了」

黃永勝開會回來，詳細給我們介紹了在主席那裏開會的情況：林、康、周、黃四人幾乎是同時到達了中南海毛主席住處。毛主席首先說了話，他說：「一中全會怎麼開法？我看全會沒有別的議題，就是選舉中央政治局。選舉政治局可以有兩種方法：一是走群眾路線，由下而上的辦法，不提名單，祇提一個數目範圍，這個辦法叫民主，但這又要時間；二是先搞出一個名單出來，爲了避免個人獨裁，還是由恩來、康生、永勝三人先商量一個名單出來。我同林彪同志不參加你們提名單的工作，我們兩個是幕後。」

林總說：「對政治局人選的方針，原則請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據。」

毛主席說：「那祇好叫獨裁，那我們還是五人獨裁吧！」

周恩來說：「一中全會，大約在什麼時候舉行？」

毛主席說：「這個月底之前吧。『五一』好上臺。」

周恩來說：「政治局委員定多少人，請主席定個數字，這對考慮人選有密切關係。」

毛主席說：「我看政治局委員，可以定爲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難安排，平時開會也不方便。」

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的三人小組，這樣就算是正式成立了。這個小組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領導下執行一中全會的籌備工作。

黃永勝堅決不當常委

三人小組接受毛主席的委託後，立即開始工作。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內，幾乎同外界不產生任何聯繫。周總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電話可以接之外，其餘任何地方的電話都不准接。

一中全會之後，我同黃有過一次閒談：

邱：「周、康、黃三人受命組閣也即是黨政軍聯合辦公吧？」

黃：「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是參與毛主席決定的問題。四月二十四日大會閉幕後，毛主席決定：由周、康、黃組成三人小組，先拉出一個政治局委員、常委的名單。」

邱：「你這個軍委辦事組長參加了，爲什麼中央文革沒有人參加呢？」

黃：「康生事實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邱：「你參加了『組閣』工作後，我們曾經議論過，你將是中央常委之一。」

黃：「這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曾經定了七個人的名單：毛、林、周、陳、康、黃，還有江青或張春橋等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點生氣，忙問：「為什麼呀？」
黃爽快地說：「那麼多老資格，人家會戳你後背。另外，我當了江青

也會鬧著當，因此，我不當也不能讓江青當。」

黃說，政治局委員名單的產生是有個過程的，每走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步，號稱工作名單。這個名單不怕大，對需要考慮的人力求一個不落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當然的啦，其他人，一是上屆中央政治局沒有倒臺的老人：陳伯達、康生、朱德、陳雲、董必武、陳毅、劉伯承、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徐向前、聶榮臻、李雪峰等人。二是中央文革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三人。三是軍委辦事組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溫玉成等六人。四是各大軍區和軍種，各省市和中央機關可以考慮的人：蕭勁光、許世友、陳錫聯、汪東興等。

第一次上報時就沒有溫玉成，總理和康生對他印象都不好，我沒有吭聲。康生提了王效禹，總理和我也沒有吭聲。我提了汪東興，總理和康生也沒有吭聲。這個上報的名單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董必武、朱德、劉伯承、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許世友、陳錫聯、汪東興、葉劍英、謝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二十三人。這是一個比較主動的名單，這個名單同毛主席提出的定額二十五至三十人相比較，還有比較大的變動餘地。

黃還說：我開始一點不摸底，我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應講功勞，但不一定要當選政治局委員，這是為了主席，為了大局。康生一聽我的話就火冒三丈。會後總理對我說：「你太不懂了！」不懂什麼？總理也不講。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報名單。主席對上報名單基本滿意，祇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加上了葉群。在王效禹、葉劍英的名字下面劃了一個橫槓。後來主席說，我看王效禹就不考慮了。原稿有註：在王效禹名字下划一横线

林總看到名單後，在葉群的名字上面劃了一個大叉，但林總沒有加

上江青，這真是神來之筆，可以摸摸主席對江青究竟是個什麼態度。

在三人小組會上，周總理說：「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單上刪去的名字，但我們還是要考慮的。我們堅持把這兩個人列上，這也是從當前的大局來考慮。」總理指刪去的名字是江青、葉群。這樣又加上了江青、葉群的名字。

康生說：「總理的意見是對的，但困難比較大，我們硬著頭皮留下來。」

黃永勝說：「我同意總理和康老的意見。」

在新的名單上，毛主席還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在名單的旁邊寫上李德生、紀登奎的名字。

林總同上次一樣，收到名單即在葉群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組繼續在一起工作。主要是談論江青、葉群兩人的問題。

周總理說：「整個名單就是江、葉二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整個名單就定下來了。從當前的情況出發，江青、葉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從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誠懇表示我們的態度。我們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匯報，十二時後向林副主席匯報，爭取在明天，把問題分別談妥。」

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周恩來、康生、黃永勝三人到了毛主席住處。周恩來說：「我們誠懇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之內。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不列入也會產生政治影響，甚至會產生的更大的政治問題。權衡利弊，我們提議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選名單之內！」

毛主席：「你們要那就要吧。不管怎麼說，列上了責任在我身上，就這樣吧。」

周總理等三人接著就到林總家裏去了。葉群接待了總理等三人之後，自動迴避了。

周總理說：「關於葉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的問題，從現實的政治情況來考慮，我們三人認為一定要列入，否則會產生另外的政治影響，請林副主席同意我們的意見。」

黃永勝接著說：「我們剛才到主席那裏去了，對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我建議對葉群的問題，你也要同意我們的意見！」

康生說：「總理，黃總長把我們研究的意見都說了。請林總從政治上考慮，同意我們的意見。」

林總：「無論同意或不同意把葉群列入政治局候選人，我都聽從毛主席的決定。」

最後，在毛主席住處開會。九屆中央政治局候選人的名單定下來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姚文元、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等二十五人。

主席說：「今天下午談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單。」主席接著說：「政治局候選人名單祇好就這個樣了。有責任由我承擔！」

接著，毛主席、林總、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等五人，在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上簽了字。

毛主席又說：「中央的領導機構，力求簡單權力集中的原則。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組成，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請大家考慮是否合適？」林總、周總理帶頭，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則。

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後也說：「我也同意！」臨走時，主席對黃永勝沒頭沒腦說了一句：「你也能統管三軍。」

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半，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由京西賓館一起出發去出席一中全會。臨起身之前，黃永勝笑著說了兩句話：「等一會就真相大白了，榜上有名的人，可以自己選自己。」在選舉之前，我同李作鵬也都沒有想到自己也是政治局委員候選人。

九屆一中全會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舉行的，會議議程就是選舉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開會時，坐在主席臺上^{读书社}_紙有主席和

林總二人，總理當時按照筆劃排列坐在下面，這時主席叫總理上臺時，大家才發現這個問題，大家對總理熱烈鼓掌，肅然起敬，總理這才走上臺去。主席說，九屆一中全會就是選舉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員、政局常委，可以選自己。

不一會，就發選票了，我這時才看到自己名字在候選人之中。選舉

很快就結束了，總理宣佈選舉結果：我們主席，當黨中央主席；林副主席當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主席、林總、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一共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四名候補委員。所有候選人全部當選。這次選舉江青少好幾票，張春橋、姚文元各少十多張票。由於自己可以選自

己，得全票的不少。江青沒有想到自己會少幾張票，心裏很不舒服，但沒有發火也沒有退席，祇是坐在那裏像一塊木頭那樣運動也不動一下。

選舉結束後，就在主席臺前召開九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陳伯達、

康生也坐到臺上去了。新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全部坐臺下前排。江青邁著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後一個到達臺前的。

主席說：「下面是什麼議程呀？軍委怎麼組成？」

總理說：「下面是政治局第一次開會，我們對軍委的組成有個建議名單，四十九人。軍委主席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據毛主席建議原來五位副主席（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還任新軍委副主席，進行實際工作的，還是軍委辦事組。軍委辦事組由十人組成，辦事組增加李天佑、李德生、劉賢權。」

總理剛說完，林總就說：「贊成。」

此時，黃永勝就抓緊時間發放軍委辦事組準備的關於中央軍委委員名單，軍委主席、副主席名單，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政治局會議以鼓掌形式通過了上述名單。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組織機構和人事任命名單，固然在全黨提高軍委辦事組的威信有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是向中央文革宣佈：軍委辦事組，是在中央領導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的獨立機構，根本不受中央文革的管轄。在九大之前，中央文革是否存在，沒有正式議論過，江青一夥是力爭中央文革繼續存在。一中全會之後，中央雖未明文取消中央文革，軍委辦事組則從未向他們作過任何請示報告，都在政治局日常辦公會議上解決，軍隊本身的工作，按軍委系統呈辦。

議事日程完後，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又進來開會。主席說：「我沒有話講了。叫別人講嘛。董老，你講幾句，老資格嘛。」

董老招招手表示不講。

主席接著說：

我的話是些老話，就是大家知道的，沒有什麼新話。無非是講團結，團結起來的目的，是要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蘇修攻擊我們，什麼塔斯社的廣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產黨人》的長篇大論，說我們現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叫做「小資產階級的黨」。說我們搞一元化，就是講倒退了。什麼叫一元化呢？他們說就是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們一看我們這個名單裏頭，軍人不少，這就叫「軍事」；還有什麼「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來呀，康生呀，陳伯達呀這批「官僚」。所以叫做「軍事官僚專政」。這些話嘛，我看讓人家去講！但他有個特點，他就是不罵我們叫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叫「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我們呢，就說他是資產階級的專政，恢復資產階級專政。

主席說：

此外，過去講過的了，就是要準備打仗。無論哪一年，我們要準備打仗。人家就問了：他不來怎麼辦呢？不管他來不來，我們應該準備。手榴彈，到處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麼步槍、輕武器，每省都可以造。這是講物質上的準備。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精神上的準備，就是要有準備打仗的精神。不僅是我們中央委員會，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有這個精神準備。……人家打來，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要使全世界看到我們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至於什麼飛機、坦克、裝甲車之類，現在到處經驗證明，可以對付。

主席又說：

大家要謹慎小心，無論是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都要謹慎小心。不要心血來潮的時候，就忘乎所以。從馬克思以來，從來不講什麼計較功勞大小。你是共產黨員，是整個人民群眾中間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是無產階級裏面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贊成那樣的口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不怕死」。這個口號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對立的。你看也有疲勞」。這個時候，江西蘇區，井岡山蘇區，贛東北，閩西，湘鄂西，陝北，經過戰爭有很大的犧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們都是沒有啥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制，就是吃飯有個定量，叫三錢油、五錢鹽、一斤半就了不起。至於菜呢？大軍所過，哪裏能夠到處搞到菜吃呀？現在進了城。這個進城，是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這些地方了；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麼好了。所以，有些外國人、新聞記者說，我們這個黨在重建。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

主席最後說：

這次全國代表大會，看起來開得不錯。據我看，是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我們採取發公報的辦法，現在外國人撈不到我們的新聞，說我們開秘密會議。我們是又公開又秘密。北京這些記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們把他們混到我們裏頭的什麼叛徒、特務搞得差不多了。過去每開一次會，馬上透露出去。紅衛兵小報就登起來。自從王、關、戚、楊、余、傅下臺之後，中央的消息他們就不知道了。

一中全會散會的時候，會場上的情緒總的來說，是相當熱烈的！會場起立，久經不息地鼓掌，毛主席向左向右數次招手。

主席究竟對九大滿意不滿意？對林彪接班滿意不滿意？從九大當時的情況來看，主席好像是滿意的，但從九大以後主席的一系列做法來看，主席是不滿意的，他可能還是信了蘇修「軍事官僚專政」的說法，認為軍隊上了臺，掌了權。主席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方塊字轉換社區制掉了劉鄧的

司令部「彭羅陸楊」，及在各地的「代理人」，劉少奇的權力奪回來了，怎麼又送給了林彪？！其實權力還是百分之百地在主席手上，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第一把手，都由軍隊幹部出任，這是毛主席自己的決定，這是「三支兩軍」的自然結果，這是主席打倒劉少奇在各地的「代理人」必然結果。而且，雖然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第一把手都由軍隊幹部出任，但他們並不聽命於軍隊，從不向林彪和辦事組請示工作，而是聽毛主席、總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但九大以後江青並沒有得到多大實際權力也是事實，這和毛主席的初衷相不相符也難說。現在看來，九大以後，對主席是一個機會，「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立即「克己復禮」，落實黨的政策，認真甄別幹部，大搞經濟建設。但是主席並沒有這樣做，不知是主席沒鬧夠，還是江青沒鬧夠，他們又開始鬧林彪，鬧軍隊了。

九大以後，碰頭會沒有了，中央文革沒有了，政治局在總理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張春橋一個時期回上海工作了，江青沒有具體分配重要工作，中央的日常工作是順利的。但好景不長，張春橋回來了，又成立了中央宣傳小組，對政治局的通盤工作影響很大。這時主席開始挖苦林彪（四個偉大討嫌啦，締造不能指揮啦，三個副詞啦，等等）——然後是國家主席問題——然後是九屆二中全會問題——然後是拋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然後是華北會議——然後是中央工作會議（批陳整風匯報會）給黃、吳、李、邱下結論，戴上緊箍咒——然後是南巡，點了林的名，準備在九屆三中全會拿下林彪——然後是「九一三」。「九一三」以後，主席又輕信鄧小平的「永不翻案」，重用鄧小平，繼而批判投降派（實為批總理），等等。主席去世後，鄧小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繼而毛澤東思想沒了，共產黨沒了，社會主義沒了。主席一生幹的兩件大事，祇剩把蔣介石趕到臺灣一件事了。

江青進入政治局的影響

江青從九大選舉到九屆一中全會選舉，心裏都很不痛快。整天吊著一張臉，好像別人挖了她的祖墳一樣。為什麼？主要有三件傷心事。一是沒有委託她參加中央的「組閣」工作；二是沒有當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沒有在一中全會明確宣佈中央文革的存在。

四月三十日晚上，江青通知中央碰頭會議照常開，新選的政治局委員也通知參加，我們是列席碰頭會的「常客」，也如往常一樣，規規矩矩都去開會了。黃永勝原來就是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但黃永勝不想去，又不請假，黃永勝說：「現在還開這樣的會，算什麼？」我們勸他說，這樣不好，容易引起毫無意思的糾紛，小媳婦的地位快結束了，多當幾天沒關係。黃永勝這個人，是容易聽人勸說的，他還是開會去了。

今天的碰頭會議，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會最早，並且是坐在總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會議。她說：「今天的會是我讓召開的。我要向大家說一個重要問題，現在有人在搞陰謀，一切事情都不告訴我，連電話也不打一個，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在坐的人都知道，她指的「搞陰謀」，就是周、康、黃籌備一中全會的問題。對她的話，沒有人理睬。

江青看到沒人理睬，她接著又說：「你們以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了，當了什麼委員就保險了？你們的歷史賬還鎖在我的保險櫃子裏，有種的，我們就來較量一下吧！」江青放了上面兩段狂言之後，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東興就得到報告：「來人了！」這是江青進中南海的代號，汪東興立即回到主席那去了。

在場的人知道江青不回來，情緒就變了。喝水，抽煙，說話的都有。周總理完全知道碰頭會已經毫無意義了，他略為考慮了一下，就對著陳伯達、康生說：「散了吧？」他們兩個點頭同意，大家起來陸續都走了。周總理還沒有吃晚飯，就同黃永勝先後到京西賓館來了。

周總理對著黃永勝說：「永勝呀！今天晚上發生的事，還僅僅是開始，後面的文章還不知有多少！」總理在同黃說話時，吳、李和我想走，總理打個手勢：「不要走，一起談談，」我們就坐著聽了。

黃永勝說：「怕倒沒有什麼可怕的，就是纏著總理不好辦事。我的意見，要報告主席宣佈取消中央碰頭會議，改變中央的工作方法。」

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在人大會堂福建廳舉行。周總理傳達毛主席、林總的指示說：「中央今後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體領導並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主席點名參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先念、葉

群、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這樣，九大政治局集體領導就實際上取代了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

在九大，林總同江青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林總勝利了，江青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這種勝利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正是因為這樣，九大後的鬥爭就更為激烈了，進入了白熱化的鬥爭。

黨的九次代表大會，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召開的，政治局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特點是必然的。但人們對江青、葉群進入政治局是有議論的。對其餘的人也有不同的意見。但對其餘的人的意見，都容易說得清楚，唯有江青、葉群兩人進入政治局影響很大。人們也知道，葉群是江青的陪襯，論影響，也就是江青進入政治局影響大。

江青、葉群進入政治局，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對黨的團結不利，也是無法解釋清楚的問題。尤其對老同志來說，主席的威望相當有損。

那麼，江青進入政治局應當作何解釋比較合符歷史情況？雖然在組成政治局的過程中，負責組織工作的三人工組，自始自終都是建議江青進入政治局的，但這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願意不願意，沒有毛主席的點頭，江青是絕對進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認為，毛主席是因為個人因素把江青塞進政治局，這也不對。毛主席不會這樣做，我認為他點頭讓江青進入政治局，還是從文化大革命的角度來考慮的，當然也有主席對今後政治格局的考慮。至於葉群進入政治局，無須多說，她是江青進入政治局的「陪襯」。江青不進入政治局，葉群連邊也沾不上。江青、葉群進入政治局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影響，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不為個人謀私利。但九次大會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時進入政治局就是大問題了。當然，這個責任在主席，總理也很遷就主席，林彪是沒有什麼責任的。

對江青進入政治局，我沒有聽到一個人說好話，當然也沒有聽到說壞話的。對軍委辦事組的讚譽倒是不少的。九屆一中全會閉會後，我同王樹聲、粟裕、蕭勁光等好幾個人同時從人大會堂河北廳向北門走去。他們熱情洋溢地向我說：「軍委辦事組幾個有才幹又年輕的人都進入了政治局是大好事，很好。」他們的話，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是承認，同時對我們也寄予更大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產生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傷害了廣大幹部，高級幹部除少數之外，幾乎沒有不受衝擊、不受傷害的。但大多數受傷害的老幹部仍顧全大局，對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偏激和過火鬥爭的錯誤採取原諒的態度，對毛主席還是誠心擁護的，這是我們黨團結的象徵。但是把一些應當進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陳毅、李富春、陳雲、聶帥、徐帥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進政治局，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納新了」。這與七大相比有些相形見絀了。七大時連王明這樣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大損失的人，是與毛澤東極其對立的人，毛主席還極力做工作，甚至用補選的方法，把王明和王家祥選入中央委員會，如果九大能把陳老總等人當成「右」的代表選入政治局也是好的呀。還有富春同志，他一直是擁護毛主席的。他是八大的政治局委員，文革開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又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把富春同志「劃掉」，也是遺憾。沒有把富春同志和陳雲等人選入政治局，說明毛主席對九大以後，大力抓經濟建設是認識不夠的。當然，林彪、陳伯達起草的關於九大以後應大力建設的政治報告被毛主席否定，也就不足為怪了。

進入政治局的人，大多數都得到全黨的擁護。這裏說幾句心裏話，我對自己進入政治局有兩比：與不如我的人或同我差不多的人相比，我心安理得；與應當進入政治局而沒有進入的人相比，我心中慚愧。一中全會之後，我有機會同周總理談到自己進入政治局的感想，我說：「像我這樣的人，當政治局委員對加強中央領導不會有什麼作用。」周總理祇說了一句話：「歷史的必然。」總理沒有作任何解釋，也不讓我說下去，我也就不好繼續說下去了。

九大過後不久，林總思想還是有些壓抑，有一次他對我們說（當著葉群的面）：「葉群當個中央委員就足矣，足矣。她在軍委辦事組也祇是我的一個聯絡員。你（指著葉群）在外面要謹慎。」林彪講完，我們都沒說話，葉群也沒有說話。在軍委辦事組的實際工作中，雖然葉群的排名在李作鵬和我之前，但葉群很少參加辦事組的會，九大以後幾乎沒參加過。對葉群的安排，還是主席的決定，總理的用心罷了。

從九大的結果來看，毛主席革劉少奇的命成功了，權力卻給了解放軍（林彪）很大一塊，無形成爲了「軍政府」，這是毛主席始料不及的。外電也是這樣評價和攻擊的，毛主席嘴上在調侃，其實空席心有疑慮。

以後的事是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形成「軍政府」的結果，是毛主席倚靠解放军搞文革，「爲了打鬼借助鍾馗」的結果，另外解放軍在全國搞三支兩軍，並三結合到地方的領導班子中去了，不少軍隊幹部九大時是以地方革命委員會領導的身份當選中央委員，這個結果是水到渠成的，並不是軍隊要如何如何，三支兩軍工作，在主席和總理手上，在碰頭會，林彪根本沒具體管過。九大以前主席幾次講過要取消中央文革，同時要保留和加強軍委辦事組並代替軍委常委的工作，況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九大是寫進黨章的，形成這種局面，毛主席應該是高興的。主席的不高興，說明他內心並沒有想把班交給林彪。九大以後本應「消停、消停」，但人們的思想反而越搞越混亂，「設國家主席」就是典型一例。尤其毛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現林彪實際上並不支持文革，大部分中央委員實際上並不支持文革，真正支持文革的祇有江青一夥和造反派。這樣林彪的麻煩就來了，黨和國家的麻煩和也來了。

附：《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邱會作同志在參加全軍戰備會議的各軍區、軍種後勤部長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

今天隨便和大家談一點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年多了，我們一直沒有開後勤部長會，還是一九六五年開過會，直到現在。同志們對於今後怎麼辦？也提出了意見，已經發給大家看了。海軍、空軍提的一些問題，有的還沒有提出解決辦法，我們以後再研究。關於戰備方面的一些大問題，昨天黃總長已經說過了。我今天主要講講加強後勤工作戰鬥化的問題。

當前，我們全軍的中心任務就是加強戰備，準備打仗。加強戰備，準備打仗，我們後勤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一個中心的問題，就是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為什麼要這樣提呢？這是根據我們後勤工作戰時擔負的任務提出的。我們後勤工作在戰時擔負的任務，首先是保障任務，

就是要保障戰爭的勝利。同時，也有直接的戰鬥任務。現代戰爭是立體戰爭，打起來就不分前方後方，也可能先從前方打起來，也可能先從後方打起來，還可能前方後方一起打起來。我們做後勤工作的同志，首先要考慮是先從後方打起來。因為敵人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很可能首先襲擊後方的城市、交通樞紐。這樣，我們後勤戰線就要擔負直接的戰鬥任務了。但我們擔負直接的戰鬥任務還是為了實現保障任務，對於我們來說，擔負保障任務還是主要的。我們考慮問題要把這個主次關係搞清楚。這就是說，我們主要的任務是保障任務，同時也有直接的戰鬥任務；直接的戰鬥任務還是為了實現保障任務。簡單地說，我們的戰鬥任務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保障任務，另一方面是直接的戰鬥任務。為了完成我們的戰鬥任務，就必須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

在現代戰爭中，後勤的保障任務是很繁重、很複雜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有三方面：一個就是保護部隊的有生力量，保證我們的部隊能夠戰鬥，不至於非戰鬥減員太大。過去在朝鮮戰場上不是有這樣的事情嗎，華東有的部隊一上去，還沒有打仗就減員一大批，大大減弱了戰鬥力。保護有生力量，不僅是醫療衛生工作的問題，也還有其它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任務就是保障部隊供應。在戰時，不管是前方後方，特別是前方，要保障部隊的吃、穿、用、打。第三方面的任務就是保障部隊「開得動，打得準」。我想，我們戰時的保障任務雖然是很繁重的，是很複雜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來無非就是這三方面的問題。

從我們後勤的直接戰鬥任務來說，最主要的就是反空降、防空襲。現代戰爭，打擊對方的後方是進行戰爭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國對越南就是這樣，它打越南的運輸線、倉庫、機場，等等。所以，一旦打起來，我們後勤戰線必然要直接擔負戰鬥任務。

根據我們的戰鬥任務，遵照林副主席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指示來看我們的工作，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的。我們大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瀋陽部隊更先進、做得更好，但是從戰備的要求來說，我們的工作還差得很遠。我看這裏面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工作要從平時狀態轉到戰時狀

態需要有一個轉變過程。全國解放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有個抗美援朝戰爭，有個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還有一個東南沿海的緊急戰備。抗美援朝戰爭是全國性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是局部的，東南沿海備戰雖然華北的部隊、瀋陽的部隊都動了，但也還是局部的。所以解放二十年來，我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的。現在要把全部工作從平時狀態轉入戰時狀態，適應打仗的需要，這就有一個轉變過程。如果我們抓得緊，這個轉變的時間就會短一點，如果抓得不緊，轉變的時間就會拖長。你們的座談我沒有參加，我從材料上看到，現在有的地方感到束手無策，個別地區的同志還有點愁眉不展。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說明要從平時轉入戰時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昨天黃總長講的八個問題，基本精神就是一切工作都要轉入戰時狀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切不可把它看輕了。第二個原因，我們後勤戰線在全國解放以後，從蘇聯搬來不少資產階級教條，中毒比較深，後來雖然改了不少，但是餘毒未盡。本來我軍後勤工作是有自己的光榮傳統的，可是有些同志學了蘇聯的那一套以後，把我們自己的那一套好的東西丟得差不多了，而且現在習以為常了，你要把它改過來阻力很大。因為習慣了，對那些不好的東西看不清楚了，習慣成自然嘛！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問題。有許多的事情辦起來有阻力，大家的看法不那麼一致，這裏面有思想問題，也有習慣勢力問題。比如說，我們要求按照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組織供應的辦法去辦，現在就有點阻力。對於這件事，我們在一九六三年春福州島嶼戰備會議時就提出來了。再就是支援越南的組織供應的形式，我們也是想通過這樣一個實踐來總結一些經驗。因為我們的經驗總結得還不夠好，所以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不夠深刻。支援越南的辦法就是過去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組織供應的辦法。支援越南是兩條供應線，也是兩條運輸線，一條是從廣西進去的，一條是從雲南進去的。我們在越南的部隊最多時到過××萬到××萬人，主要擔負工程任務、防空任務。這雖然和打仗不完全一樣，但組織供應的形式打仗時是可以採用的。這兩條運輸線的後勤人員，充其量佔出國部隊的百分之十。我希冀廣州軍

區和昆明軍區後勤部很好總結一下支援越南的經驗，要搞一個比較完整的材料。我們應當承認，支援越南同將來的戰爭情況不會一樣，因為支援越南還是在和平環境，還不是直接的在戰場上，但組織供應的辦法將來還是可以用的。我們現在考慮將來戰時供應的辦法，組織供應的形式，大體上就是採取支援越南的辦法和形式。第三個原因，我們有不少的幹部缺乏戰爭經驗，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戰爭生活，對戰爭還沒有感性認識，缺乏經驗。這就要靠總結我們的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解放戰爭幾大戰役後勤保障的經驗，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東南沿海緊急戰備、支援越南這些方面後勤保障的經驗，都值得好好總結。用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很實際，容易啟發大家把問題考慮得比較周到些。總之，我們當前戰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一個是從平時狀態轉到戰時狀態需要一個過程；一個是沒有用我軍後勤的傳統做法，來組織我們的工作。再一個就是幹部缺乏戰爭經驗。是不是這三個方面的原因，供同志們參考。

應該說，經過幾年的建設，後勤戰備工作現在也有一定基礎了。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我們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開始考慮戰備問題，特別是沿海的幾個軍區，過去抓的是比較緊的。華北方面，過去主要是對海了，面向東了；面向北的問題沒有考慮，大家都沒有考慮。東北過去是對朝鮮了，也是面對海洋的，對西面的問題，大家同樣沒有考慮到。蘭州、新疆，過去都是大後方，現在變成了前線。這當然是情況的變化了。

下面我就講一講，怎樣從平時狀態轉變到戰時狀態，也就是怎樣加強後勤工作的戰鬥化，使後勤工作適應戰爭的需要的問題。

（一）首先一個問題，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用加強戰備、準備打仗的思想來考慮我們的一切問題。

加強戰備，準備打仗，是全國、全軍的中心任務，當然，也是我們後勤戰線的任務。我們要把準備打仗的思想貫徹到我們整個工作中去，首要的問題，就是要政治掛帥。我們全軍後勤戰線的同志，都要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學習林副主席指示。學習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學活用。要用毛

澤東思想建設後勤，把毛澤東思想和後勤工作的實際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毛主席教導、林副主席指示在我們後勤戰線發揮威力。學習理論如果不同自己的實際聯繫起來，那就學不通，也學不到手，這個道理我想同志們是知道的，都很清楚的。積極分子代表的名額，後勤戰線佔的人不少，後勤戰線的好人好事很多。應該說，全軍後勤戰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是做得不錯的。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就是對後勤工作厭惡的情緒比較少了。過去，提到後勤，有的人總是搖頭，不大感興趣。現在這種情緒是不是大大減少了？在我看來，這幾年有很大的轉變，很大的變化。現在，後勤工作在部隊的地位提高了，就是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好了一點，突出政治，為部隊服務，做出的成績大一點的結果。不然為什麼過去討厭你，現在不太討厭了呢？為什麼有好多部隊，對後勤的同志很歡迎呢？

我們後勤工作本來就是為部隊服務的。可是，有一個時候，特別是全國解放初期，我們搬了別人的好多條條框框。這些不合理的東西，歸結到一點，就是不為部隊服務，把部隊卡的很死，管的很死，沒有群眾觀點。現在發揚了我軍的光榮傳統，為部隊服務，關心部隊廣大指戰員的生活、工作，為他們服務。過去和現在的變化，歸結到一點就是這個問題，請同志們考慮對不對。

我到總後整十年了，頭幾年聽到的總是後勤和人家對立的比較多，就是同黨委對立，同部隊對立，黨委不歡迎，部隊不歡迎，搞的很孤立。為什麼呢？原因很複雜，但從思想上考慮，從方向上來考慮，就是為部隊服務不夠，或者服務得太少。我們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為部隊服務，做得好了一點，就受部隊歡迎嘛！所以，要轉變我們的工作，首先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毛澤東思想來建設我們的後勤。當前，用毛澤東思想建設後勤，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要準備打仗，為戰爭服務，為部隊服務，我們要在這個總的思想指導之下，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光輝的《五七指示》，林副主席對後勤工作「四個加強」的指示辦事。這兩個指示，是我們後勤建設的方向，什麼時候都

不能丟。貫徹執行這兩個指示，有兩條具體方針：一條就是「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第二條就是「軍民結合，全民辦後勤」。抓住這兩個指示做為我們的思想武器，用這兩條具體方針貫徹這兩個指示，就能使我們的後勤工作更好地為部隊服務、為戰爭服務。同志們考慮，這樣個說法對不對？

執行「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這個方針，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同黨委對立、同群眾對立這樣一種情況。從我們後勤工作來說，我們什麼時候都要掌握為部隊服務、為戰爭服務這個方向。從我們為部隊服務的具體思想來說，就是過去我們提過的，要勤總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軍民結合，全民辦後勤。」這是瀋陽的同志創造的。這個方針提得很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是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當然有前方的問題，但是從數量上來說，很大一部分是一個支援戰爭的問題。解放戰爭中有多少支前委員會啊！我們後勤工作，無論在物質上，運輸上，救護傷病員上，技術保障上，都要依靠人民。這個問題，過去我們考慮的不夠清楚，這個觀點不鮮明，瀋陽的同志提的好。

這是我提的第一點意見：就是在我們後勤工作中，首先要實行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掛帥。

（二）物質準備的問題

毛主席教導我們，準備戰爭，一個是精神準備，一個是物質準備。精神準備是主要的，物質準備是重要的。從我們後勤工作來說，搞好物質準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的物質準備就是為了能夠保證前線部隊取得戰爭的勝利。當然，我們的物質準備要建立在國家的經濟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建立在國家工業、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國家沒有東西，我們自己這一點東西算什麼呢？所以我們考慮問題一定要有全局觀念，不可以祇從局部利益出發。如果我們的戰備工作與整個國家經濟建設發生矛盾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要為國家經濟建設讓路。因為國家經濟發展是一個長遠的問題，當然我們搞戰備有問題是當前急需解決的。這個問題就要看需要與可能，需要是需要，但是國家不

可能，或者滿足了你今天的需要，明天他就沒有了，那我們是考慮今天的問題，還是考慮明天的問題？當然主要還是考慮明天的問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整個國家的經濟也是為戰爭服務的。比如，明年的國家計劃提出了三個第一：首先是國防生產第一，第二是三線建設第一，第三是工業生產配套第一。這就說明國家對整個國防建設是非常重視的。我們具體考慮問題的時候，就要從長遠來考慮。這就是我們要有全局觀念。昨天晚上我講國防工業問題時，就講了一個洛陽機械廠的例子，它是礦山機械廠，要他那個廠子明年生產××門三七高炮，如果這××門高炮一起加進去，那不僅這××門高炮沒有了，礦山機械也沒有了，那我們怎麼辦呢？那就應當讓這××門高炮讓路，讓礦山機械上去。沒有礦山機械，基礎工業怎麼上來呢？高炮固然要緊，那或多或少××門、少××門總還是個小事吧，無非是多少的問題嘛。我們應當有全局觀念、國家觀念。不僅要顧今年，更主要的是要顧明年。有了國家的經濟基礎，我們的國防力量就加強了，就有保障了。我們考慮問題要有個前提，一句話，我們總不要因為眼前利益而妨礙了國家經濟建設，我們要顧大局，有了大局就有了我們的小局。大河裏漲水小河裏滿嘛！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點，就是在國家物質基礎許可的條件下，我們要盡可能多地儲備一點東西。這裏面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要用最大的努力來建設倉庫。當然，這裏有投資的問題和材料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很大，一般的可以滿足，沒有材料可以先打洞嘛。還有一個勞力的問題，主要還是依靠群眾，依靠民兵，不要老打部隊的主意。現在有好多民兵工程團技術是很高明的，現在國防工業有很大一批是民工建設的。在湖北有一個五一三三工廠，規模相當大，建設速度很快，就是民工建的，今年「七一」開工，明年「七一」就試產，所以同志們不要老打部隊主意，主要還是民工。建設倉庫主要考慮防空襲，當然也要防空降。

第三點，就是「藏糧於民、藏富於民。」也就是「軍民結合、全民辦後勤」的問題。這個問題要考慮兩個方面，一個方面，首先要軍民結合，把軍用民用結合起來。目前，大多數地方不能光

搞軍用，離開民用。比如糧食，大部分都送到山溝裏去了，你要不用，又怎麼運出來呀！所以還是從軍民結合這個問題來考慮。當然「三北」地區有些地方首先儲備一些物資，無非是糧食吧，彈藥吧，鹽、蔬菜吧。有重點地區，根據作戰方案要堅守的那些地方，重點地儲備必要的東西。現在全國總不能把糧食都送到山裏去呀，都送到山溝不打仗怎麼出來？所以，要從軍民結合這樣一個思想出發，按照作戰方案，有計劃地重點地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方面。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就是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加強全民辦後勤的問題。為了實現全民辦後勤，特別是按照我們的作戰方案預定的一些戰場，那些地方是將來部隊集結的地方，那些地方是部隊要堅持的地方，對這些地方從現在起就要有計劃的加強。比如說，派醫療隊下鄉，就可以下到那些地方去，把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搞起來，幫助地方培養一些醫生，培養一些護士。比如說，加強那些地方的加工能力，機械加工，糧食加工。比如說，加強那些地方的農業生產，支援農業。一句話，要依靠群眾，首先我們要幫助群眾。前些時候，我看了六十四軍一個材料，他們在本溪的一個地方搞「軍民公路」、「軍民大寨」，就是幫助當地群眾搞起來的。

（三）加強後勤部隊建設的問題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重視。無論在平時，在戰時，後勤部隊都相當大的。後勤部隊都是專業性的，無非是醫院、倉庫、汽車部隊、工程部隊、修理部隊吧。對這些部隊的建設，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要適應戰時的需要。就是要用保障戰爭勝利這樣一個觀點來建設部隊。舉個例子來說，醫院，現在全軍都講醫院少，都要建醫院。那麼我們建醫院的重點應放在什麼地方？我考慮應當放在部隊。應當適當擴大師的醫院，其次就是野戰醫院。這樣才能平戰結合，平時自己能夠解決問題，戰時能跟著部隊走。我們再也不要搞又是野戰醫院，又是駐軍醫院，又是中心醫院，又是總醫院那一套了。現在有好多地方提出來總醫院怎麼辦？我說，到了打仗的時候上前線，這就是辦法。醫院過去分這個科，那個科，結果又都不行，分什麼科呢？過去解放戰爭期間，一個

俘虜來的醫生，帶上幾個文工團員，幾個炊事員，這就是個醫院，就是個收容所。那個時候可憐得很，一個師、一個軍也不過一兩個醫生。又比如說，修理機構，是建修理工廠，還是建修理分隊？修理工廠是要的，像海軍、空軍要一點，不然解決不了問題。但大量的，還是靠部隊的修理機構。那天我聽了海軍十一支隊的發言，那個材料很好，很能夠說服人。像海軍還是建十一支隊那樣的修理機構，還是統統都建大船塢，這是個方向問題。至於軍械修理廠，汽車修理廠，照我的觀點，關了門是最好了。你還建修理廠，打仗的時候，把坦克、汽車拉到後方來修？修好了再去打仗，根本沒有這個可能。這都是和平環境下搞起來的。我們應當重點建設修理分隊，他能跟著部隊走，他自己能修理。我們現在有的修理工廠，主要的任務要成為修理分隊的後方，要供應部隊零配件。再說我們的倉庫，應當成為供應部隊的勤務分隊，它應當既能收，又能存，又能擔任部隊的供應。倉庫這支部隊，在我們後勤量很大， \times 百個倉庫， \times 萬人，應當說是 \times 萬供應部隊。我們要這樣考慮，才能適應戰時的需要。

我們建立勤務部隊是很需要的，是很大量的。抗美援朝時，入朝部隊是 \times 百萬，後勤部隊就有XX萬。這樣大的後勤部隊，就是要擔任戰鬥任務，不然，要後勤部隊幹什麼呢？它應適應戰爭的需要，這就是個轉變。過去我們倉庫，好像老和尚看廟一樣的，那就不對。其他的部隊，工程部隊，汽車部隊，都有個適應作戰需要的問題。

其次，要搞好勤務部隊的訓練，使之熟練業務。什麼都不懂，怎樣執行任務呢？昨天黃總長說了，要加強軍事訓練。他講的軍事訓練當然是廣義的，包括戰術、技術、業務，都要訓練。

再一個就是培養幹部的問題。勤務部隊的幹部要培養，總的方針，黃總長都說了，就是兩條腿走路。一是開辦各種各樣的訓練班，各種內容的學習班，你們自己辦；其次，總後還有六個學校，四個醫人的，一個醫馬的，一個工程技術，就這六個。我們考慮，大部分學校明年下半年招生。招生採取兩個辦法，一是都招部隊的，二是代訓，你們送什麼樣的人就訓什麼。將來都回

去。當然，總得留一點吧，一百個人留一、二、三個，不然學校就辦不下去了，無非是百分之一、二、三嘛！至於還有什麼學制、教材問題，主要是我們來辦，也要同志們一起來辦。這是第三點。

(四) 加強裝備管理問題

武器裝備和軍需裝備兩方面都有問題。我們武器裝備的狀況怎樣呢？一個是很雜，一個是很老，一個是很少。「雜、老、少」。現在我們的裝備，除了步兵武器比較規格化以外，其它的裝備還是比較雜的。拿汽車來說，幾朝元老都有，蘇式的、美的、我們自己的。再一個就是很少，少得可憐。這裏特別要講講汽車的問題。現在運輸車還需要××輛，我們倉庫有多少？祇有××輛車。就那麼個家當。明年國家準備生產××輛運輸車。××輛，我們得個四分之一就了不起了，要是戰鬥緊張點，就給一半，××輛，明年也祇能解決部分問題。牽引車我們還少××輛。這××輛怎麼解決呢？準備進口一部分，現在訂了合同的是××輛，但交貨時間還很長，有的是明年，有的是後年。還準備再訂一部分，準備進口××輛，這個週期也不會短，賣不賣給我們還是一個問題。明年我們生產××輛，少得可憐，主要是給我們的，還給廠礦一些。再一個就是小車，現在要補足缺額××輛，國家明年出產××輛，準備給我們一半，這個明年就有希望了。軍需生產，情況比較好一點。當然還有規格的問題，質量的問題，我們還要努力。軍需生產今年的計劃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五，比去年超產百分之五十二。同一九六六年比，幾乎超產一倍，生產是不錯的。看起來，很有希望，軍需生產戰線的革命職工。經過文化大革命，精神面貌是比較好的。

解決裝備問題，第一，還是要重點解決問題，不要「撒胡椒面」。要集中力量，重點解決一個部隊的問題，兩個部隊的問題。辦事情總是要分先後，分輕重緩急。這個問題，黃總長昨天晚上都講了。第二，要解決零配件。軍隊一定要擔任零配件的生產任務。現在的修理工廠，一定要轉過來。這是個全局的問題。因為國防工業工廠要大量生產零配件，就要減少生產成品。所以部隊自己要以最大的努力來解決零配件問題。第三，解決修理部隊的

裝備問題。按我們企業部提的計劃，明年可以多解決一點問題，可以裝備得更好一點，主要的東西基本上可以裝備起來。再一點，要教育我們的部隊愛護裝備，一槍、一彈、一雙鞋、一雙襪子都要愛護。

(五) 戰時的交通運輸問題

這是保障部隊供應、保障部隊開得動的關鍵性問題。從全軍的戰備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理出一個頭緒來。現在我提一提，我們各個軍區，自己能夠考慮的問題，一定要考慮。大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比如說，戰時如何保證鐵路通車，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朝鮮戰場有多少公里鐵路，用了×個師，才勉強保證通車。將來打起仗來，國家鐵路怎麼保護，這是個大問題。現在各區要做的有那麼幾件事：第一，要掌握各種運輸條件，要搞清情況，鐵路、公路、水路等都要掌握資料。同志們要重視水運，水運是最保險的，打不爛，炸不斷，比公路、鐵路都保險。第二，要考慮整頓交通運輸的組織，使之適應指揮戰時運輸。過去軍事運輸是屬於司令部掌握的，現在屬於後勤部系統了。應當研究不同後勤分部、辦事處怎樣結合起來。交通運輸指揮是個好大的問題，弄得不好就癱瘓了。我們後勤沒有交通運輸系統，那還有什麼戲唱呢？那什麼也沒有了。軍事運輸部門的工作搞得是不錯的。今年的運輸量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來最大的一年，任務完成得很好，這與全軍都有份。但裏面還有點問題，主要是指揮系統要加以整頓，加以改進，使它更加適應戰時的需要。你們各軍區也有這個問題。第三，就是戰時怎麼掩護交通運輸的問題。這個問題後勤本身解決不了，但我們應當考慮。總之，就是管後勤的同志決不要忘記：交通運輸是我們保障供應、前後聯繫的中心環節。打起仗來，總有個前方後方，後面的東西要上去，前邊的傷病員要下來，通過什麼東西呢？就要靠交通運輸這個環節。朝鮮戰爭的時候，美國人說我們搞「禮拜攻勢」，祇能打一個禮拜的仗。這還不是當時沒有運輸條件，東西送不上去！

(六) 科學研究，技術革新問題。

應當說，加強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是提高我們的保障能力，提高業務工作的質量，提高生產力，提高為戰爭服務、為部隊服務的水平，很關鍵的一個問題。第一，同志們要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第二，要有計劃有目的地去解決我們當前存在的問題。比如從地區來說，北方主要解決防寒問題。南方無非是解決防暑問題，高原地帶要解決能夠生存的問題。從各行各業來說，既有共同性的東西，又有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三，要解決這些問題，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專業技術人員一定要同部隊廣大指戰員相結合，一定要同生產相結合，不然就搞不出名堂，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第四，對技術革新要有計劃地穩步地推廣。你們參觀了技術革新展覽，那裏面有很多好東西，但是怎樣用於部隊，怎樣推廣，還是個很大的問題。一定要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七）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問題

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部隊本身的，一個是同國家有關的。軍隊本身的問題，我們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改，因為它不合理，束縛我們的業務、束縛生產力嘛。像軍隊的在編職工，在定額之內，就可以逐漸改為戰士。部隊的伙食標準，對國家影響不大，在不降低部隊現有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我同意象瀋陽軍區那樣自己先改。凡是軍隊本身的問題，對國家沒有影響或影響不大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改。國家有關係的，那應當是國家統一改的問題，我們不能馬虎。比如工資改革，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不等國家統一改革，我們就不能改。職工家屬的醫療問題，也是同國家有關係的，如果我們解決職工家屬的醫療包干問題，就是鼓勵農村人口入城市，所以我們考慮問題不能那麼簡單。總之，對於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我是贊成改的，不要讓它把我們的手腳捆得死死的。但是在改的時候，一要考慮國家的情況，二要考慮我們軍隊的歷史，三要不降低部隊的生活水平。在這樣的前提下，你們盡量想辦法改，改的越徹底越好。

（八）農副業生產和軍辦工業的問題

黃總長昨天講了，明年的生產不得少於今年，有條件的還要提高，由各軍區自己辦。軍隊搞農副業生產，不單純是_{讀書社}生產

問題，而是貫徹《五七指示》的一個方面，是辦好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課程之一。我們要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不然，就成了消極的東西。應當承認，搞生產與戰備有一定的矛盾，但是組織得好，就不會有多大的矛盾，就可以統一起來，這個問題由各軍區自己安排。大家提的指標，我看還是積極的。但是，要抓緊，如果搞得不好，那就是《五七指示》不能落實的問題，是有責任的。當然《五七指示》不僅是生產問題。今年增加兵員，就已經考慮到部隊調防，考慮到生產問題，我們再搞不好，就有問題了。

發展農副業生產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搞好農田基本建設，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從我們現有土地來看，不應當產那麼一點糧食。全軍有 \times 百 \times 十萬畝耕地，其中水稻地 \times 百 \times 十多萬畝，好的旱地 \times 百萬畝左右，比較差的祇有 $\times\times$ 萬畝。如果畝產能提高到四百斤，那就是 $\times\times$ 億斤，可是現在祇有 $\times\times$ 億斤。如果提高到五百斤，就更多了。這是完全可能的。昨天報紙報道石家莊有一個大隊，平均畝產一千斤。昔陽縣是平均畝產八百斤。這都是土地較差的地方。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就要加強農田基本建設，加強管理，希望同志們好好考慮。

關於軍辦工業的問題，首先是要辦，但是，它應該是為部隊的農副業生產服務，為部隊的生活服務，為保障部隊供應服務。這是主要的。同志們還提到軍隊的工廠、農場可不可以招職工的問題。我看招少數專業人員未嘗不可，但這不是方向。軍隊兼農、兼工嘛！如果都搞成職工，那不就改變性質了，變成國家工廠、民辦工廠了，何必要軍辦工廠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軍隊本身的作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部隊生產的糧食、節餘的糧食，大部分要交給國家，進國家的糧庫，或者乾脆頂口糧。有的邊防部隊，或運輸不方便的地方，就可以自己搞點加工機械，自己種自己吃。現在我們一年生產 $\times\times$ 億斤糧食，可是交給國家的並不多。現在，又創造了「中曲」發酵飼料，用糧食當飼料的就少了。如果生產的糧食不入國家的倉庫，就必然造成很大的浪費。

（九）節約鬧革命的問題。

節約鬧革命，這是我軍的光榮傳統，什麼時候都要注意，不能丟。特別是搞戰備，更要注意，不能大手大腳，像舊軍隊一樣，「槍炮一響，黃金萬兩」。

現在各軍區、軍種、兵種共有節餘款××億元，這個錢我們一個也不要。我們早就有這個觀點，希望你們有點錢，有點錢好辦事，你們不會浪費。你們管好，還是我們管好？還是你們管好。廣州軍區發個電報要上交二千萬，他自己的存款是九千萬到一億。我們還是不要，你們管著好。我當了十年後勤部長，大概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搞備戰，一九六〇年開始；第二件是搞吃的，就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第三件就是用毛澤東思想建設後勤，包括改革規章制度。過去把你們管的死死的，左一個制度，右一個預算，你們沒有就向我們伸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三年後勤工作會議，同志們都說那次會開得好。究竟好在那裏？我想來想去，就是給了二千萬預備費。過去，要出差費可真了不起，一下就是多少百萬，多少千萬。以後包干了，少了不增加，多了不上交，就是那麼多錢，都分給你們管，把責任、權力都交給你們，就管好了。到一九六五年就大有節餘。這幾年你們都不向我們要錢了。你們管，浪費不了。如果浪費，就不是錢的問題了，就是政治問題。

節約的問題，首先還是個政治掛帥的問題。從業務上說，主要是抓好四件事情：一是要抓重點。經費物資是有限的，那個該辦，那個不該辦，那個先辦，那個後辦，應該有個統籌安排，抓住重點。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有限的錢和物資的作用，辦更多的事。二是要有計劃。後勤工作，要錢要物的工作，不能沒有計劃。沒有計劃就會造成浪費。三是要有制度。經濟工作要有制度，國家有國家的制度，軍隊有軍隊的制度。四是要勤於檢查，要不斷發現問題。

（十）工作作風問題。

工作作風很重要。工作作風是工作方法，也是思想方法，是個世界觀的問題。這個問題毛主席、林副主席有許多的精闢論述，同志們應當好好地有針對性地帶著問題學。特別是在戰備情

況下，更要注意工作方法，更要改進工作作風。這個問題我著重提三點意見：

一是工作要統籌安排，抓住重點。不要顧此失彼，也不要平均對待，一個時候要著重解決一個什麼問題，這是要首先考慮的，各行各業，各個部門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二是要注意總結經驗，以點帶面這個問題，有些軍區是很注意的，開了許多現場會議。各個軍區，各個軍種、兵種都要注意這個問題。群眾創造了許多好的經驗，你就要注意總結，注意推廣。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就十分注意典型經驗，重視以點帶面。我們要學習好毛澤東思想，學好林副主席指示，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就是要通過總結經驗。不通過總結自己的經驗，毛澤東思想就進不了我們腦子。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真正發揮毛澤東思想的統帥作用，就要聯繫實際；聯繫實際，就要通過總結經驗。所以總結典型經驗，我們要特別引起注意。

三是要深入實際，實行面對面的領導。上面的同志要下去發現問題，幫助下面解決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堅持群眾路線，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你不到下面去，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接觸不到新鮮事物，腦子就空了。經常到下面去，有了實際，看問題就比較深刻，指導工作就比較有力，講問題就比較有道理。今天我說的這些意見就比較一般化了。因為文化大革命三年多了，基本上沒有和同志們接觸過。近兩年管後勤業務也很少，許多事情不如過去那樣熟悉了，就說不太清楚。

剛才張令彬同志提到，有的軍區的同志對工廠管得還不夠好，希望你們下點本錢，下點力量，把它管好。有的同志問軍需工廠將來怎麼佈局，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更多的考慮，整個國家的大工業，國防工業的佈局，都還在考慮。所以軍需工廠的佈局怎樣適應戰時需要，我們把它放到以後考慮，同志們也不要催。同時，軍需工廠疏散也比較容易，反正機子搬到那裏都可以生產。現在還是先擴大的事情辦。

第三十二章 廬山戰火

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

早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楊、余、傅」事件發生以後，汪東興就和我們走近了，過去他還擺點「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後他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我說的站在一起，是指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夥而言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其主要內容是聽取汪東興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汪是專程從武漢（主席當時在武漢）趕回來的。汪說：「毛主席考慮要開四屆人大了，請總理和政治局的同志們研究一下，九大召開一年了，『鬥批改』正在進行，有些政府機構可以考慮邊整改邊恢復。主席還說，戰備問題也要研究一下。……」

接著汪東興還是說主席的指示：「召開人大就有一個修改憲法的問題，可以成立一個修改憲法的小組。這裏必然涉及到國家主席的問題，國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見是不要。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我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那麼誰來當呢，祇有林彪同志來當。」主席要改變國家體制，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國家體制，這麼大的事先沒有和林彪、周總理商量，更沒有讓政治局拿出幾個方案，供他決斷。

我清楚地記得，在汪東興說「不設國家主席」的時候，總理有點愕然，他抬頭看了一下汪；當汪說到「祇有林彪同志來當」的時候，總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樣子。我當時的認識是：主席對林彪這個接班人很關心，很周到。其實，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萬八千里。散會時，汪還真有些餘興未盡的樣子，對著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我說：「走走走，時間還早，到我那裏再坐坐。」我們都欣然同意了方塊字读书社区制作

在汪東興家裏，大家開始也是扯亂談。後來，吳法憲又請汪去核實剛才在會上講的「要設國家主席，毛不當，要林彪來當」的話，汪東興很認真地又重複了一遍，聽後大家都很高興。我們要起身走時，汪說：「不要著急，搞點東西來吃。」不一會，工作人員端上兩盤子紅薯，吳胖子和葉群吃了，我沒有吃。我說：「我看見紅薯胃裏就反酸水，給我們吃碗麵條也好。」汪說：「你嘗嘗就知道了，甜得很。」

三月八號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立即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小組負責修改憲法，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一個小組負責組織會議的工作，由總理、黃永勝、張春橋、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由總理抓總。因為我當時主管援越、援阿（爾巴尼亞）、援羅（馬尼亞）的具體工作，任務很重，兩個小組的工作我都沒有參加。

三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問題，主要是確定參加會議的人員，同時也討論了修改憲法工作小組請示的幾個問題。討論的都是一般性的問題，比如新的憲法要比一九四五年的憲法大大壓縮，要短。並且要求修改憲法工作小組月底要拿出草稿來。會上沒有討論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更沒有要討論誰當國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見後，立即表示：我認為國家主席還是要設，並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讓秘書給毛主席那裏打了電話，但主席並沒有正面表態，祇讓秘書打電話問候林彪。四月十一日，由林彪口述，秘書記錄後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條意見：1、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問題都不大。3、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

三月八日，汪東興傳達的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這種同意是擁護毛主席的慣性，大家並沒有深想。現在林彪的意見來了，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唸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設國家主席並由主席來擔任的意見，包括江青在內。我現在都認為，林彪的意見是正確的、中肯的，是維護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對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於提出自己不同意見的，在「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不是毛、林之間有什麼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見相左，林和大家的意見

是一致的。現在想看來，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見，是他知道毛提出讓他當國家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開九大時主席讓林當大會主席團主席是一個樣的，林考慮問題是深思熟慮的，他不願讓主席牽著鼻子走，更何況林的身體根本當不了國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對林的建議（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見的報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是設國家主席這個體制不妥呢，還是讓他當國家主席的建議不妥，主席自己也沒講清楚。

葉群告訴我們，林提出三條意見後，大概是四月二十五號，主席在路過蘇州時，林和葉還到專列上去看了主席，讓主席住下，並給主席騰出了林住的南園賓館的房子，主席說不住了。他們交談得很好，主席還對林說起黃、吳、李、邱，並大加讚揚說：我就是信任這幾個跟我南征北戰的紅小鬼。那天正好我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葉群讓主席聽了人造衛星上的《東方紅》樂曲錄音，毛主席很高興。他們之間沒有再提起有關國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見，當面卻不說。

可是，時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他不當國家主席，主席還講了一個典故，大意是：三國時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想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主席講完以後大家都笑了，我當時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謙虛，二是主席雖然又上了一線，但他還是不想當國家主席，不想當國家主席的原因是不願管具體事務，願意多考慮重大問題，具體工作由林彪和總理擔起來，一個當國家主席，一個當總理。現在想起來，我的意見真是幼稚可笑。其實主席講的這個典故，還是說他不當國家主席，並沒有說不設國家主席。我清楚地記得，主席雖然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但後來主席也說過，叫董老當，叫陳永貴當，叫工農兵當等等。不設怎麼當呢？！總之，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主席的態度也是多次反覆的。

五月中旬，軍委辦事組去向林彪匯報工作，當扯到國家主席問題時，林彪說得非常中肯，他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的，但祇能主席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沒有國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順嘛。」我們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當國家主席時，林彪立即說：「這種話你們不能在我這裏說！我不能當這個主席。方塊字你個以後也

不要再提，還是我們的毛主席來當。我身體不好，出個門都要下好大的決心，如設副主席我也不能當。」

當時我們幾個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根本沒當成什麼了不起的事，雖然，此期間主席也提出過不設國家主席，他也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但我們並沒有認識到主席的心思，汪東興三月八號的話給我們印象很深，誰當國家主席也沒感到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毛主席當很正常，毛主席不當也沒少了什麼；毛主席不當，由林彪來當也很正常，也沒覺得林多了什麼，因此主席怎麼說都認為是他的謙虛。林彪則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讓林彪當，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

總理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是費了苦心的。七月上旬，總理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主要是準備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事。會後中央發出《通知》，在七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在北京召開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在會議期間，主席說過「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因此總理也說：「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怕言之有誤，他還是反覆強調新憲法主要是突出「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全軍的最高統帥」，這等於政治局的意見又被否定了，又順從了主席個人的意見。總理的心真累。

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看得最清楚，他祇提了一次建議，以後再也沒有發表意見。關於建議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幾次都是來自下面，如三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如在全國各地徵求意見；如七月中旬的憲法修改小組全體會議。我認為總理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們爲了國家體制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廬山，八月二十二日的常委會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還是又一次提出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祇是附和他們，並沒有發表具體意見。可以看

出，後來扣在我們頭上的「設國家主席是反動的政治綱領」，這個「政治綱領」，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林彪四個常委都擁護。

毛主席在會上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

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

我不做這個主席。」主席最後的結論，還是不當國家主席，對不設國家主

席沒有定論，不過主席不願意要國家主席，誰還敢要。林彪並沒有出來

勸幾個常委來維護主席的意見，因此主席早就不高興了。即便是這樣，

在當晚傳達常委會精神的時候，總理仍沒有傳達主席不同意設國家主席

的意見。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開幕式上，又提設國家主席，

並建議毛主席當主席，他竟然還說：「如果毛主席不當，請林彪當國家主

席。」

林彪同意設國家主席，全國基層同意設國家主席，幾個常委都同意

設國家主席，全黨全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從國家體制去考

慮，建議設國家主席。祇有毛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雖然他說是為改變

國家體制，實際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讓林彪當。也許毛主席把「國家主

席問題」和接班人問題連在一起去考慮了。毛主席從七大開始就考慮接班

人，立了劉少奇，幾年後毛主席就對劉不滿，因高崗問題，劉少奇躲過一劫，文革重新算賬，給劉戴了「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死於非命；林彪跟隨毛主席幾十年，九大剛立為接班人，祇一年工夫，主席又不

放心，又不滿意。其實，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立林為接班人，

林彪不想當，打了報告，主席硬是讓他當。林不會覬覦國家主席這個虛

職，去搶一張空頭支票幹什麼？！如果國家主席是有實權的職務，毛主席

是絕對不會放過的。可是，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南巡時卻說，「有人

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九一三」以後，主席

又說，「設國家主席是他們的政治綱領」，這就是毛主席不實事求是了。

至於「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這句話本來是汪東興說的，這

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話，但為了「說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吳法憲，結果

吳胖子被迫把「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說成是葉群說的了。吳法

憲亂說一頓，造成了很大的麻煩，也給林、葉栽了贓。「九一三」之後，

毛主席就是利用吳的這句假話，發出多個中央文件。廬山會議本來是幾

乎全體的中央委員對江青一夥的不滿，由此引發出對文革的兩種制約結果

毛主席卻說成林彪有野心，想當國家主席，黃、吳、李、邱和軍隊幹部就是爲了林彪的野心，才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其實，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沒提國家主席。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根本沒有提「國家主席」，毛主席對我們的「政治綱領」都不批判，不是沒有批到點子上嗎！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們軍委辦事組的黃、吳、葉、李、邱幾個人都做了檢討。在我們的檢討中，根本沒有檢討「設國家主席」問題。試想，如果「設國家主席」是我們的「政治綱領」，我們不針對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寫檢討，能行嗎？！主席那裏能過關嗎？對於我們的檢討，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過了關，主席還接見了我們並風趣地談了話。「九一三」之後，毛主席說我們是「反黨集團」，「稱天才」是我們的「理論綱領」，「設國家主席」是我們的「政治綱領」，都不是實事求是的。

關於國家主席問題，過去是以主席的錯誤爲正確的標桿，現在國家主席早恢復了，楊尚昆、李先念幾任國家主席都當了，但是爲了政治上的需要，他們還是誤導人們去想：毛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提議設，因此林反對毛主席，林錯了，甚至是有野心。爲什麼不反過來想，毛爲了不讓林當國家主席，竟提出不設，破壞國家原有的體制，也不讓林當。其實，林並不想要國家主席這個虛職，但林希望維護國家體制。

主席通過江青拉我們

九大以後，黃、吳、李、邱進了政治局，並參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總理從愛護、關心、教育我們出發，和我們講了幾次什麼是「中央政治」以及屬於「中央政治」範圍裏的問題。什麼是「中央政治」？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我們聽後都笑了起來，本以爲「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麼「中央政治」就是這麼一句普通的話。我起先對總理的話理解不深，後來有所理解，還是不夠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以後，我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瞭恰到好處。六七年我被搶救出來回到西山時，一次葉帥對我說：「總理很顧全大局，又很能抓住問題的關鍵，他說：『葉參座，委曲求全不是貶義詞。關鍵是把軍隊院校的人勸回去，把軍隊在搞亂了，我的工作就更難了。』」

我們對江青的蔑視，總理看得很清楚，他內心是支持我們的，但他也非常清楚，這樣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這個說法來教育我們。

總理的誠心誠意和大局觀念，使我們也大有領悟。

一、對江青的態度不是對她個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連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對江青，我們沒看清，受汪東興誤導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沒有城府。

我們這些人從心眼裏認爲林總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因爲毛主席和林總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親密的，林總爲毛主席打江山，戰功顯赫，立下汗馬功勞。所以毛主席向林總「起事」時，我們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麼用意，也盡量往好的方面去想，毛主席的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說出來的話，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說完也在等著看，對他有利則前進，否則就當成說了點幽默，所以毛主席九大以後說了很多對林總的話，我們並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廬山會議才如夢初醒（或半醒）。諸如毛主席說「四個偉大討嫌」，去掉「三個副詞」，去掉大會堂的語錄，「締造的不能指揮呀」，等等。我們沒有往毛主席和林總之間有隙處想，反而認爲是毛主席謙虛。我們沒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鬥爭中是幼稚的。當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實關係我們也沒有看清楚。

後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以及會後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對中央政治越來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沒有用了。

從一九六九年底以來，江青找黃、吳、李和我談了幾次話，前幾次談話都是罵陳伯達的，而且把陳伯達罵得一無是處。我們把這



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告了總理，總理說：「她這個人，叫你去如果不去麻煩更大。你們去祇帶著耳朵就是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又叫我們去釣魚臺十一樓，這次可大不一樣了，江青主要是攻擊總理。這次去，除了黃、吳、李和我之外，還有謝富治、李德生、姚文元。江青上來就說：「總理也不是一個百分百的好人，有兩次大的路線錯誤，一次是把蘇區的百分之九十搞沒了；第二次是喊蔣介石萬歲，一切經過蔣介石，跟蔣介石搞統一戰線。另外，解放後還有一個馬鞍形，就是經濟建設的『兩高一下』。」江青就這樣說了一串一串的事情。

當時，黃永勝越聽越激動，他突然對江青說：「總理辛辛苦苦領導我們工作，你怎麼這樣說他？！我們對過去的問題不瞭解。」黃永勝說完就提著皮包往外走，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鵬坐得靠後一點，我們當然是支持黃永勝的，我們也附議了黃的話，也就站起來走了。吳法憲坐得靠前一點，他也站起來嘟嘟囔囔地說：「叫我們來就是搞這個？！」說完也站起來走了。

黃永勝走到門口，江青就向黃永勝大聲說：「哎，還有明天《解放軍報》的事！」黃沒有理她。有關《解放軍報》的事是這樣的，郭沫若給江青寫了一首頌揚樣板戲的詩，準備明天在《解放軍報》發表，李德生把校樣都拿來了。這時李德生也急了，他說：「黃總長，不行呀，還有明天《解放軍報》的問題。」黃永勝說：「你是總政主任，這個問題你決定，你自己處理。」

我們出來以後到了毛家灣，向林總作了匯報。林總很生氣，他說：「江青攻擊過中央常委的大多數，今天是直接攻擊總理，這個事情你們應當向毛主席報告清楚。」

這時吳法憲就給汪東興打了電話，說有緊急事情要向毛主席匯報，並簡單向汪說了一下，汪一聽是對著江青的，立即去報告主席，主席同意了，並叫馬上來。本來是黃、吳、李、邱一起去，葉群說都去不好，不要興師動眾，最後林總說黃、吳一起去。黃、吳走了以後，我和李作鵬、葉群到三座門去等。

不久，黃、吳就回到三座門來了。黃永勝傳達了毛主席對他們說的幾句話，當黃永勝向主席匯報了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情後

一句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一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你們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話是：「你們今天同我說的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你們就不好混了。」這幾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話，黃永勝的熱臉蛋貼到主席的涼屁股上，主席對江青攻擊總理不以為然。現在想起來，總理告誡的中央政治，我們還沒有入門。

這時我提了一個建議說：「你們兩個應當去找總理說說這個問題。如果總理先知道了，咱們還沒說，總理會傷心的。」黃永勝認為我說得對，但他考慮了一下說：「老邱還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們想想，我剛從主席那裏出來，又去找總理有些不妥。」大家都認為黃說得對。黃有點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點多鐘，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廳總理的家裏，我把整個過程都向總理說了。總理對江青的話、主席的話都不吃驚，但聽我的話時很激動，眼眶都是濕潤的，總理拉著我的手連說了兩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著總理又說：「老同志是能夠理解大事的！」我望著總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憊的雙眼心裏也是很激動的。

不久，李先念跑來找總理，總理還有事，我就沒有和總理一起去大會堂開會，我先走了。

過去我總是把這件事孤立地看，並總以為是江青目中無人，口出狂言。現在看來，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則江青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另外，這也是主席通過江青在拉我們，主席希望我們按照他的意圖來進行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主席不是沒有拉動我們，而是我們腦子裏根本沒有這根弦。

吳法憲與張春橋的爭論

我看到過汪東興寫的一本書，叫做《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主要是講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直到「九一三」這段時間的事情，可以說汪嘴裏吐出來的東西，在關鍵的問題上都是假話。其實，毛、林交惡造成的悲劇，汪東興是要負重要責任的；在當時惡劣、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總理、黃永勝、李先念和軍委辦事組的同志，也包括汪東興在內，這些當時在臺上工作的同志與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國改革

那些人的鬥爭，很多是在原則問題上不可調和的鬥爭，這些鬥爭在思想基礎上，和所謂的「二月逆流」是一個樣子的，那就是：擁護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厭惡江青、康生、張春橋等這些中央文革的傢伙。而且這些鬥爭和矛盾，很多緣由都和汪東興有直接關係，汪東興不能實事求是地講清事情的本來面目，口口聲聲是維護毛主席，實際上是用假話保護他自己。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在討論憲法的時候，吳法憲與張春橋確有爭論，而且爭論得很厲害，吳法憲在辦事組講得清清楚楚。周恩來、陳伯達、黃永勝、葉群、李作鵬和我都堅決支持吳法憲，林彪也支持他。

張春橋在會上提出，把憲法討論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等詞句刪掉。張說，「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個諷刺，連赫魯曉夫都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吳法憲一聽就火了，張春橋那個傲慢和陰陽怪氣的勁頭實在可憎，吳堅決反對張春橋。他告訴張春橋「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同時，吳認為三個副詞是衝著林彪來的，張春橋和吳法憲都動了氣。

陳伯達也是修改憲法小組的，他表示支持吳法憲。陳是我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者，修改憲法本應由他牽頭，但主席沒讓他幹，而讓康生、張春橋主辦。因為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時候，他起草的稿子提出發展生產的意見（林彪支持了陳的意見），沒有突出繼續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沒有用陳伯達的稿子，此後毛主席就更冷落陳，而對康生、張春橋表示青睞。

會後，吳法憲報告了周恩來總理，周聽後對吳法憲的意見表示支持，周總理明確地說：他從來沒有聽毛主席說過「赫魯曉夫天才、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一個諷刺」的話。周總理還說他同意設國家主席。

周總理關於同意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不止和我們說過一次。有一次汪東興也在，總理說主席當國家主席是肯定的，副帥當國家副主席也是肯定的。但主席不願意參加一般的國務活動，副帥身體不好，也不能多參加活動，那可以設幾個副主席，出國訪問也好，接待人家的國家元首也好，都由副主席來出面。汪東興說：總理想得很周到，其實這個問題並

不那麼難解決，主席願意見外賓，主要的來賓主席也都見了，主席見外賓都很高興。我們也認為總理和汪東興說得很好。

關於這次會上的爭論，吳法憲也報告了葉群，葉群很快就傳回了林

彪的話：吳胖子說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張春橋的尾巴。當然，張春橋會後立即報告了江青，江青又詳報了毛主席。

兩天之後，八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由周恩來總理

主持，對憲法修改草案最後定稿。會前，軍委辦事組特別召回了在外地

檢查工作的李作鵬，以加強戰鬥力量。葉群沒有參加會議，她從北戴河

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等人，讓他們準備好，在會上跟張春橋鬥。周

總理估計會上要爭鬥起來，他也做了思想準備。周恩來是支持林彪，支

持軍委辦事組，支持吳法憲的。周總理的思想是，這些評價是正確的，

寫就寫上嘛，張春橋又在人為添亂。周恩來最討厭人為添亂，使正常工

作難以進行。

周總理在會上是很小心的，他拿著憲法草案，一條一條地唸，唸一條討論通過一條，唸下面一條時，總理總是提醒大家「聽好啊！」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當總理唸到「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時，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一言不發，根本沒有爭起來，他們表示同意，總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問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見呢？」沒想到從來是頤指氣使的江青，竟很和氣地說，「大家討論」。這樣帶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些詞句的憲法修改草案被順利通過了。

周恩來如釋重負，終於鬆了一口氣。

林彪知道會議的情況後卻緊抽了一口氣，林彪太瞭解毛澤東了，會議出現這樣的結果，肯定有人點撥張春橋、江青等人。他認為到廬山（九屆二中全會）會有更大的鬥爭。

歷史證明，這次會議的結果，是毛澤東主席以虛掩實的戰術所致，他搞不清林彪在想什麼？毛說不設國家主席，林主張設；毛說他不當國家主席，林推舉毛當；連同一九七〇年七月下旬討論「八一」建軍節社論時的爭論，這是第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把不同意見放在了大家面前。再加上大家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中央文革一班人的怨氣，毛澤東不能沒有更深的考慮……誰對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利呢？誰對捍衛「文

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有利呢？毛主席對張春橋表示青睞。林彪也一直想抓住機會給文革降溫。雖然，林是被毛主席拖進文革的，但林畢竟在文革初期說了擁護毛、擁護文革的話，現在文革搞成這個樣子，林是不願意的。降溫關鍵在於削弱中央文革的「極左」路線，這樣才有條件給文革降溫，黨內有了思想基礎，林就好在適當的時機建議毛澤東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

但是，在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雖然認識到了這場鬥爭，並沒有把握好怎麼鬥爭，他爲了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垮臺了，這是大家和林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毛主席卻抓住這次機會，削弱了林彪，也徹底改變了林彪的命運。

高高興興上山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省廬山舉行，故稱廬山會議。一九五九年也有一次廬山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罷了彭德懷元帥的官，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定爲反黨集團。七〇年這次會議，在黨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出奇的會議，引起了黨內一場重大鬥爭，並導致後來重寫黨內歷史。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成爲毛澤東的死敵；「接班人」成爲「叛徒賣國賊」；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浴血奮戰、一身槍傷的林彪成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首領。我的冤案，也是從這次會議開始的。

這次會議所要審議的幾個報告，在會前都形成了文件，並經中央政治局審定通過了。會議無非是要舉手通過這幾個文件，因此，大家稱這次會議是「蓋橡皮圖章」的會議，還有人說是「讀書休息」的會議。會議期間能有休息的機會，我內心很高興，文革以來，工作十分繁忙，精神緊張，又十分勞累，一直得不到休息。

在會前的半個月左右，我就知道毛主席的決定，全會在廬山舉行。對此，心裏很高興，祇待會期的到來！但臨要上廬山的前三天，即八月十八日，黃永勝通知我說：「周總理決定，全會初期你帶閻仲川留守北京。紀登奎也留在北京。待全會討論一九七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時，由李作鵬下山來換你上山。」對周總理的決定，我沒有什麼意見。這一決定，到二十日又變了。毛主席是八月十九日到廬山的，林彪和周總理是二十

號到的，毛主席聽了總理的匯報後指示說：「邱會作不留北京，黃永勝留守北京。」

我對這個變化感到很高興！

我同李作鵬及軍委辦事組的工作人員，於八月二十一日一起上廬山了。在盛暑的夏季，北京雖然不很熱，但也並不舒服。經過六小時的航程就可到達江西廬山這樣的避暑勝地，自然心中很高興！同時，我也知道，在參加會議期間，不會有繁重的工作，有時間可以遊玩遊玩廬山了。我雖然去過兩次廬山，但並不熟悉，這次大概可以瞭解廬山的「真面目」了。因此，從北京出發時，心裏什麼想法也沒有，身上什麼負擔也沒有，高高興興地離開了北京。

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留京「看家」了，吳法憲八月十九日已陪江青上山，辦事組剩下的主要成員就是李作鵬和我兩個人。江青外出，總要找個軍隊的負責人陪著，搞不清她是什麼意思，總理每次都給我們做工作，讓我們把這個「任務」完成好。

早飯後，我從家裏從容地到達北京西郊機場，李作鵬也幾乎同時到達。由於九江機場停不了大飛機，我們乘坐的專機是伊爾 18 型大飛機，由北京先到達安慶機場，由安慶換乘安 24 小飛機。到九江之後，換乘汽車上山。在安慶、九江我們都受到了當地部隊的熱情接待。當時的軍委辦事組在軍隊的威信很高，我們出門，愁的是部隊同志迎接的禮遇太高了！

在九江機場看到吳法憲，他不是來迎接我們的，他是陪江青上廬山後，又回到九江機場指揮空中運輸的。參加全會的各路人馬都是乘飛機來的，他今天親自來指揮，吳這個人對工作一向是很負責任的。

在九江，我和李作鵬分乘汽車上山。軍委辦事組成員（李德生住在國務院的住區）和葉、陳、聶、徐四個元帥住在福州軍區療養院，我們住得很近，相距最多不過百米，來了以後，我和李作鵬就一一看望了四位老師，他們都很高興。在葉帥那裏坐的時間稍長一點，他說他也剛到，對我們的拜訪，葉帥很高興。他特別說到：「一九六七年我們出了點問題（指「二月逆流」），我有事給楊成武打電話，他不接，說病了，可晚上看電視他在接見外賓，這個人，變得真快。」

我們在山上住下之後，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適，江西省軍區，省革委會對招待工作組織得很好。軍委辦事組的人除了黃永勝、李德生之外，都是江西人。我們看到家鄉的工作做得很好，心裏很高興！

晚上無事，我和李作鵬來到吳法憲的住處吹牛皮，吳說：「差點見不到你們了。」我們忙問是怎麼回事？吳說：「翻了車。」吳站著邊說邊比試。他接著說：「主席是八月十九日乘專列到達九江的，我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當日主席即換乘汽車上了廬山。汪東興是隨從毛主席到的，當他見到我和程二人後，祇做了簡單寒暄，就很高興地說：『在討論憲法時，要提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呢？』（意即林的位置已在周總理之前了，再擔任副總理，顯然不合適了。）

我們三人吹了一會，就一起散步去看林總。我們是九點以後才去的。因為林總早休息了，就沒有去打擾，葉群接待了我們。這次是禮節性拜訪，我們在那裏閒談到次日一時左右回來的。

葉群同我們一起，在一個不大的客廳裏談起來了。她說：我們二十日從北戴河來，比你們早一天到。從準備好的文件來看，這次會議是沒有什麼重要工作要做的。我們大家都要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這個好機會，看一下廬山怎樣？我可以當個導遊。我們當場還約好了，第二天下午四點一起遊仙人洞。

臨走時，在葉群的會客室裏，葉、吳、李、邱擠在一個長沙發上，照了一張相。

政治局常委會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休息，沒有辦什麼事，也沒有什麼人來走動。由於沒有事，昨晚本想睡早一點，但沒有這種福氣，睡不著，二十二日這天比在北京起得還早。

午休之後，吳、李和我一起出動遊玩仙人洞。我們到了仙人洞就同葉群會合在一起了，照了幾張像。我們去遊仙人洞的時間晚了一些，到達的時候就暮色來臨了。本來準備多照幾張相片，但光線不夠用了，葉、吳、李和我祇在仙人洞合照了幾張相片（這張相片，後來也成爲罪證）。

大家在仙人洞休息了一會兒，招待我們的人，還上了廬山的雲霧茶。我們坐下之後，很自然就談起中央文革這些人來了，這都是我們的習慣了。這次談的主要吳法憲做了「女皇副官」，即他陪江青上廬山的一些笑話。

我們說：「吳胖子真有福氣，已經做了女皇副官，不知道是否加了賞金。」

葉群笑著說：「你們不要把胖子氣死了。他也是沒有辦法呀！」

我們說：對這樣的人（指江青）就是要口是心非。如表面上對她不好，是要挨罵的，划不來；裝著對她恭恭敬敬的，她會說你好話。江青不是很喜歡吳胖子嗎？

吳法憲說：「我當空軍司令倒了霉！」

大家哄笑一陣就算完了。天黑了，雖然遊興未盡，也祇好回家了。

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他的住處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會議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頭，並確認一下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在政治局常委會中，還專門討論了有關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是本次常委會最重要的內容。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之首、國家主席。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是毛主席自己提出來的，各省、市、自治區領導班子都是按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實現了黨的省委書記都兼任省革委會主任的一元化領導，黨的主席兼任國家主席也是一元化的領導吧。毛絕對沒想到在全會還沒有召開，四個常委的就一致提議設國家主席，與林副主席的提議是一致的。因此他剛一上山，就氣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為倚重的康生，也主張設國家主席。毛澤東主席在會上說：「……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毛澤東還警告說：要把這次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分裂、失敗的會。毛講話的弦外之音就是，你們不聽我的意見就是破壞黨的團結。後來毛澤東還說過：「關於國家主席，這個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我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可是，為什麼不設「國家主席」，毛一直沒有講，一直沒有給大家最高指示和諫導教導。

晚上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主要是總理、陳伯達、康生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精神。我記得總理祇是說了會議怎樣開的問題，並沒有說什麼大的問題。會議的議程早已定了，會上當然不用再說這個問題，總理在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傳達常委會上，主席和四常委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的態度。但是可以看出，後來扣在我們頭上的「設國家主席是反動的政治綱領」，而這個「政治綱領」，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林彪四個常委都擁護，絕大多數中央委員也擁護。

總理說：「今天下午，在主席那裏開了常委會。確定全會明天下午三時開幕。主席同林副主席說，他以前說過的那些問題（沒有點明什麼問題。後來汪東興補充發言時給點出來了），這次好好說一下，這次中央全會除議程之外，應當談點實質的問題。明天下午三點是開幕式，會議從二十四日開始，主要是小組會。我們大家都要參加小組會議，身體不好的，還是以休息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棄這次休息的好機會。」

吳、李和我同時提出：「我們最希望總理能休息一下。」

總理講完後，對汪東興說：「你來做補充。」

汪東興接著發了言，他說：「我首先聲明，我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列席了中央常委會。主席在會上談的問題，我做點補充傳達。主席說：『九大以後，有的人在後面搞了一些活動，這些都是見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總理和伯達同志頭上去了（指五月十七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的事）。這些事，在中央全會上應當講清楚，這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主席還說：『最好再講講形勢，套話人家不愛聽。』並且對林副主席、周總理說：『你們誰來講一講？』總理立即謙讓的推舉：『請林副主席來講吧。』主席又說：『可以把問題講得寬一點。』」

汪東興平時還是一個挺嚴謹的人，今天的確比較隨意，也許他有意找機會抨擊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補充中說的內容，總理都沒有講到，汪東興竟然敢「補充」出來。當時康生就很生氣，鬍子翹得老高。散會後，康生走過汪東興身邊時說：「革命這麼多年，還是個警衛員的水平。我看當時汪東興樣子，有些不以為然。後來，陳伯達下臺之後，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指責了汪東興。

汪東興這個人過去黃、吳、李都不瞭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較多，不過都是些具體事務，對他也不很瞭解，我認為這個人的主要特點有兩個：

一是裝腔作勢；二是肚子裏事不少。至於他的辦事能力，康生說他祇是個「警衛員的水平」，當然有點挖苦人，汪還是有能力的。

晚上政治局會議散得很早，這在北京是沒有過的。我回宿舍後，沒有什麼事可幹，也沒有什麼地方可走。吳法憲房子人來人往，我不願去。李作鵬因身體不好在輸液，不便講話。我信步走到聶老總房子裏去了。他住的地方離我約二十米遠，我把剛才政治局會議的情況都同聶帥說了，他很高興。九大以後，我仍然上葉、聶兩帥的門，他們兩人對我的做法都很滿意。他們說：「我們現在都是閒人，你主動來同我們聊叨聊叨很好。」葉帥有時還主動叫我去「閒談」。實話說，因為「二月逆流」的原因，我並不大情願，但一般地我仍然照辦了。

廬山會議就人數來說，是個小型會議。到會的人數，連工作人員在內也不過三、四百人。會議的主要分工是：會務工作，由中央辦公廳負責；招待工作，由江西省軍區、省革命委員會負責；安全警衛工作、空中運輸等，由軍委辦事組負責；廬山周圍的外部警衛工作，由江西省軍區一個獨立師擔任；廬山內部的警衛工作，由中央警衛團擔任。另外，由空軍在廬山開設一個防空指揮所，並準備兩架直昇飛機，以備必要時專用。除此以外，廬山及其周圍沒有任何部隊。

開幕式上林彪的講話

據陳伯達講，八月二十二日晚，他到了林彪住處，他非常希望林能在會上講話。陳認為九大以後，「無休止的運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我們國家長期處在這樣的無政府狀態下是極為不利的，會承受不起。陳認為，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裏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林彪沒有對陳伯達表態。林祇說，如果要講，明天開會前向主席報告一下。實際上，我認為陳伯達還是把林彪說動了。事前，吳法憲向林報告了他與張春橋在修改憲法問題上的爭論，也是促使林要講話的原因。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全會在小禮堂開幕。但常委們一直沒有出來，大約等了四十分鐘，毛主席、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才走出來在臺上就座。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坐在臺下前排。 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九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講話。

全會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佈：「我們的二中全會，現在開幕！」然後，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來，之後即說：「請林彪同志講話。」

林總對毛主席笑笑地說：「好，我說幾句。」

毛主席又接著說了一句：「現在，請林彪同志講話。」

林彪的講話，不到兩個小時。平心而論，林彪的話講得很一般，問題也不是講得很清楚，但事後產生這麼大的反響，真是意料之外。他講話的內容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講憲法修改稿的特點；第二個問題是憲法修改草案體現了毛主席的國家學說；第三個問題是憲法修改草案體現了毛主席倡導的群眾路線。林總對憲法修改稿的評價是比較高的，他說：

全會這次的三個題目，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間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的特點，一個是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

常好！這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間最重要的一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

毛主席的這種領導的地位是在幾十年的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的較量中間來比較出來的。所以，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為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中國革命，半個世紀的歷史都證明，祇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確的方向，代表歷史發展的要求，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是大量的鐵一般地證明了的事情。可以說我們的工作的前進或後退，是勝利或者是失敗，都取決於毛主席對中央的領導地位是鞏固、是不鞏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貫徹的時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敗；得到貫徹的時候，就蓬勃地發展。我們同志們必須記住，必須把這種迷迷糊糊的思想，變成自覺的思想。必須，特別是年老的這些同志，要把這些思想向下傳播，傳下去。……

勝利以後這二十年，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來，繼續和更加證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子，不管什麼地方，不管什麼部門，毛主席的威信比較高一點的地方，對於毛主席著作比較肯學一點，人的精神面貌就改變，跟之而來的就是物質的強大變化。原來認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這就是毛主席的這種革命的精神，具體的政策、具體的指示，一旦深入群眾的時候，一旦群眾領會的時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主觀世界的變化引起客觀世界的變化。……

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另外還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學思想，這些都起作用。幾十年嘛！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我們這些人都是參加革命嘛，毛主席幾十年寫的東西。我們現在水平高，是有創造的。……毛主席個人的這種天分、學問、經驗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來。而毛主席這些著作中間所發揮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東西，你們翻開馬列著作中間他不可能有的。這也很自然的，他沒有那個客觀嘛。因此，不能對於新的問題作出預先的答覆和解決。所以不能說是沒有發展，這還是形而上學的觀

點。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的原則的，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在我們這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的事情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值得把腦筋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

林彪說：

第二點，就是突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也是體現了毛主席的國家學說這種發展。沒有一個憲法，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政權不是階級性的。如果真正到了沒有階級的時候，就沒有國家了，也沒有政權了，也沒有黨了，也沒有憲法。那麼有憲法，有政權，有黨，有國家，這些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是階級不可調和的表現，不是階級相互妥協的表現。不是什麼聯合政府，總是一個階級壓迫一個階級，總是階級對階級專政。……我們這個憲法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體現了階級性，是階級專政。

林彪講第三點時說：

這次憲法，還有一點，就是突出了群眾的路線，集中了群眾的智慧。主席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歷來如此。大家是知道的，到處街上都有的，「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是一句言簡意深，概括了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之一。所以，主席一再地強調把這個憲法交給人民討論呀，修改呀，這都是相信工農兵和教育工農兵的一種表現。反覆徵求群眾的意見，集中了群眾的智慧。憲法是他們提了意見的，成為他們自己的東西，這個是有很大的好處。主席要求憲法簡單扼要、通俗易懂，使群眾容易掌握，這也是考慮群眾的需要。從一〇六條壓縮到三十條，一萬多字壓縮到四千多字，這都是適合群眾需要的。這次我們的草案經過我們這裏全會討論了以後，還要經過群眾再去討論和人大討論。所以這次憲法可能成為全國人民奪取一個新的勝利的一個戰鬥的綱領。

林彪的講話沒有稿子，一口氣能講這樣長的話，是不容易的。我聽過很多林總講話，他基本上不用稿子。

林彪結束的話聲剛落，全場爆發熱烈的掌聲。坐在主席臺下第一排的許世友、陳錫聯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這時葉帥和陳老總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爲了表示尊重，蹲在檯子上和兩個老師說了幾句話。

毛主席對林彪的講話聽得很認真。

林彪講話之後，康生講了修改憲法的問題，尤其講了對設國家主席的態度。康生在發言中表示對林的講話「完全同意」，「完全擁護」。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汪東興在他的書裏說周總理和康生聽著林彪的講話「表現出著急的神態」，你說汪東興是不是說謊，康生比誰的調子都高，他著急個屁。

接著，周總理講了開會的問題。因爲時間晚了，總理講話比較短，他說，關於《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已印發了材料，就不具體講了。總理也對林彪的講話表示擁護。

會議結束後，毛主席一邊站起來，一邊說了兩個字：「散會」

其實，我認爲林彪的講話比較一般，話講得也含含糊糊，但林彪講完話以後受歡迎的情況並不一般，好像有一種「勢」，毛主席看到此景，肯定心裏別有滋味。

山上的熱鬧

今天開會的座位，張春橋坐在我的左邊，我們緊挨著。林總評論憲法時，他總是張開口，無聲笑著，一個字也沒有記錄。當林總講到「我們同志們必須記住，必須把這種迷迷糊糊的思想，變成自覺的思想」時，張春橋有些敏感，立即緊張起來。他越聽越不是滋味，沉默起來，拚命做記錄。林總講完話之後，他掏出香煙，自己沒有抽，第一支先給了我，他的手都有點發抖，拿著煙對我說：「老邱抽煙」。這是我們認識以來，他第一次遞給我香煙，我有點好笑。這雖是小小的舉動，但也可以看出張春橋當時的心理狀態是「做賊心虛」。我和張春橋是「老死不相往來」的，

六七年一月，他支持上海二醫大「紅縱」，造我的反，我對張春橋是憎恨的。

會場的臺上有個後門，由臺上回我們的住處比出大門近多了。散會時，大家陸續退場，吳法憲、葉群、李作鵬、汪東興和我不約而同地走在最後面，並往主席臺的後門方向走，陳伯達在臺上等著沒走。此時，我們後面的幾個人，有的已經上臺去了，我還在階梯上，汪東興就講開了，他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會前林彪報告毛主席要求講話的情況，及林彪報告後主席說不要點名的情況，這時，葉群忙提醒大家「會上發言不要點名啊，林總講話裏指的是陸定一式的人物，是不點名。」葉群還講：「林總說主席是偉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實踐太豐富了，主席比馬克思、列寧還懂得多。我就是堅持天才的觀點。」

其實，「不點名的點名」我們聽得懂，林總講話是指張春橋的。當然，葉群、汪東興一開始就是唱主角的，他們通報這些消息並非多餘，他們一講，起到了聯絡感情的作用。臨走前，葉群又提醒大家：「會上發言不要點名啊」。林總的講話，是批評張春橋這些中央文革的人，我們是完全擁護的，但這次林總講話，我們事先一點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鵬擔心的是陳伯達、吳法憲、葉群三人把林總「推」上臺的。如果真如此，是沒有不壞事的。我又想，林總是一個非常縝密的人，他的講話一定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支持才講的。我和李作鵬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問：「老邱怎麼樣呀？（指林總的講話）」我說：「不知道為什麼？」李：「是呀！事先連個招呼也不打！」

晚飯後八時許，我同北京黃永勝打了一個電話。我拿起話筒就問：「山上的熱鬧，你知道了嗎？」

黃說：「剛才，吳胖子來過電話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說了，真高興啊！晚上還多吃了一碗飯。」

我們在電話上談笑了一陣，就掛電話了。

晚上九時許，召開政治局會議。今天會場的空氣與往常不一樣了。張春橋、姚文元坐在後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樣總是坐在前面，並要同周總理並排坐下；江青和康生雖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總是吊著一張臉不說話；康生翹著小鬍子，不斷地抽煙。陳伯達、吳法憲並沒有什麼具體事，他們卻在會場上來回走動。兩種不同心情的人，表現出兩種情緒顯得

格外分明。我與李作鵬同往常一樣，其餘的人情緒略有不同，但不是很明顯。

今天的會議，主要是研究明天開小組會的問題，沒有別的議程。吳法憲提出：「對林副主席的講話，各小組應當好好學習討論。」李德生、許世友、陳錫聯等人隨聲附議。總理說：「這個意見很好，請汪東興同志報告主席。」我想，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也在情理之中。

汪東興接著提出：「各組反映，對林副主席的講話，不少地方沒有聽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錄音。」總理同樣簡單地對汪東興說：「此事，也請報告主席。」

總理對著張春橋說：「憲法草稿，有關國家主席的章節，要準備一下，備用。」

張春橋急忙回答說：「現成的，現成的。已經準備好了，請總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會議沒有更多的內容，自然散得很早。

散會後，我和李作鵬示意吳法憲到葉群那裏瞭解一下情況。吳回來後，對我們說：葉群講，林總本來在開幕式上不準備講長話，開會前，主席和林總交談了很久，林總向主席反映一些問題，主要是我（吳）和張春橋吵架的事，主席說：「張春橋的後臺是江青。」主席對林總說可以在會上講一講，但不要點名。

然後，吳法憲又說請「老夫子」（陳伯達）到他的住處來閒談。不久，陳到了吳的住處。我們聽陳、吳談話，主要是陳談的，一直談到二十四日凌晨三時才散伙。

從陳伯達談話的內容、口氣來說，陳伯達對張春橋不僅是貶低，簡直是到了鄙視的地步。可見他對張春橋的仇恨是很深的。

陳伯達說，張春橋是個無名小卒，沒有什麼本事，寫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還好表現自己。如果他寫了一篇什麼東西，總怕別人不知道，到處瞎吹一通。張春橋寫的東西都是在上海請人搞的，在上海那個地方搞文字吃飯的人有的是。陳伯達說，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風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揮的，安亭事件發生後，是他派張春橋去處理的，連張春橋在上海的講話都是他在北京寫好，用電話傳過去的。群眾起來了，張春橋當時並不敢去，是他寫了幾條要張去宣佈的，並由上海警備區派

部隊保護張春橋才去了。然後上海召開一個群眾大會，張春橋也是不敢出去見群眾的，又沒有什麼主張，還是他同張春橋直接打電話告訴他的辦法（似乎也說告訴了幾條），結果大會開成了，奪權成功了。張春橋還吹什麼他創造了「上海革命」，這是貪天之功爲已有。陳還說：「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張春橋吹的那樣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況下，把張春橋的對立面鎮壓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價的。中央支持，又允許鎮壓，哪有搞不好之理！」另外，陳伯達還談了張春橋參加「九大」修改黨章就到處吹噓自己，我寫的文章很多，我從來都不說。

此外，陳伯達還講了張春橋的許多壞話，有的我就記不起來了。

我們大家在一起聽陳伯達講到二十四日早上三時，吃了夜餐。

我回到宿舍之後，劉秘書同我說：「張池明政委、張令彬副部長，今天下午來看部長了。」我即想到要給他們回個電話，否則，他們會有意見的。但說什麼呢？我稍微想了一下，就向他們回電話說：「對林副主席的講話，可能還要組織聽錄音，這樣便於小組會上發言。」這是個極其一般的電話，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是搞什麼「陰謀」，祇是想到給他們一點可以談的「內情」，但後來追個不停，大家都知道，兩張在政治鬥爭中，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整個廬山都狂熱起來

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許，在廬山小禮堂聽林總講話的錄音，毛主席昨天晚上就同意聽林彪講話錄音。除毛主席、林總之外，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全部到場了，元帥們也來了。江青這個向來「自由自在」活動的人也來了，坐在第一排中央。從她的行動就可看出林總講話對江青的震動有多麼大！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即使出轎子抬也是抬不來她的。錄音放了一遍以後，總理說再放一遍。中央委員們聽了林彪三次講話（上午聽了兩遍錄音），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大家僅從聽錄音這件事，就知道要發言表態和怎麼表態了。於是大家紛紛在小組會上發言，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汪東興和陳伯達在華北組都發了言，尤其是汪東興的發言牽動了整個全會，汪東興在發言中提出揪人是發言的要害之處。隨著汪東興和陳伯達的發言及隨後出的華北組的_{漢字標題}_{簡報}，從

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整個廬山都狂熱起來了。這是毛、林、周都沒有想到的。

聽完錄音之後，葉群在昨天同樣的地點，向同樣的人說：「昨天晚上，總理交代張春橋，在憲法草稿中準備好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

散會時，我看見陳伯達塞給汪東興幾頁紙，說是搞了幾條馬列「語錄」打出來請常委審查，可是，下午我去開會前，劉秘書已經交給我這份「語錄」，我就帶在身上去開小組會了。

我下午去參加西北組的小組會。開會前，吳法憲打來電話說：「姓汪的來電話說，他已經發言了，叫我們快發言，也叫空軍、海軍、總後及其他軍隊同志發言。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表示你自己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明天發言就算隨大流了，今天發言很重要。要盡快發言。」我說：「姓汪的都指揮到我們頭上了。」吳說：「人家也是好心嘛！『語錄』你拿到了吧，這是汪主任親自給我的，讓軍委辦事組『近水樓臺先得月』，先睹為快了。」我說：「對對對，知道了。」

西北組的簡況（二十四日下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小組會上，我是第四個發言。我記得在西北組，洗恆漢、張達志、康生、鄧穎超、董必武、粟裕、張秀川、李瑞山都發了言。

我的發言主要是三個內容：一是，熱烈擁護林副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二是，嚴厲譴責反毛主席的人。我指出，在九大之後的中央委員會內部還有人反毛主席，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我們要提高警惕。三是，宣讀了陳伯達搞的馬列論「天才」的「語錄」。

我發言的具體內容並不很多，時間也不長。我的發言主要是講對毛澤東思想態度問題。我說「林副主席說過『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這次說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為什麼在文化革命取得勝利，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個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創造性發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為什麼在這次會上林副主席又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為什麼又提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動搖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謬論。不能利用主席的謙虛來反對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問題。」

小組會上對我的發言，反響不很大。大家對我的發言有三點評論。第一，認為我是知情人，對我的發言十分重視，即使一句半句也是有用的。第二，認為我也是文革初期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毒打的重要受害者。他們說：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解放軍是三位一體的。他們這樣反，當然也就把矛頭指向軍隊了。邱會作同志也是被反的一個。第三，認為我的發言，內容雖然不多，但講得實在，沒有「譁眾取寵」之意。大家對我宣讀的論「天才」「語錄」不特別感興趣，但一致提議要將「語錄」印出來。

我發言之後，康生、董必武、粟裕、鄧穎超等都做了發言。

康生說：「我同意邱副總長（他叫我的職務）的發言，他用的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態度。這是很好的態度，對問題應當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馬列主義學得比較好。」他還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有三種人，一種是學習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樣；一種是學習還可以，但用不好，我就屬於這種人；一種是不好好學習的，這種人不是個別人，但也不是多數人。康生在西北組的發言中，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

董必武說：「我很熟悉邱會作同志，他從年青時期就愛學習，他的文化不是老師專門教的，主要是自己努力學來的，他今天的發言還是學習的精神，很好！」董老也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

鄧穎超說：「我同邱會作同志長征就在一起，他是一個很使人喜愛的幹部。很多同志就很喜愛他。他剛才的發言，是很能啓發人的。」鄧穎超在發言中也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她還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的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

大家差不多都發了言後，由鄧穎超、粟裕牽頭集體通過了擁護林副主席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意見。鄧穎超說：「我們都發言了。現在我們再用全組通過的辦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議，這樣我們小組的態度就更加鮮明瞭。」鄧提議後，立即一致通過。我因知道一點關於「設國家主席」的情況，調子不是很高。全組通過之後，粟裕還對我說：「邱副總長！對設國家主席的問

題，你好像是棄權了。怎麼樣？不會有兩本賬吧！」我忙說：「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見，我是不會脫離群眾的。」

蘭州軍區政委洗恆漢同志是西北組的召集人，會上沒有機會發言。

「風雲突變」之後，大家在檢討時，洗恆漢同志還坦誠地展示了他靈魂深處的思想，他說：「我是在小組會上沒有機會發言，如果我發言，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晚飯後，政治局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我在會場的電話室門口與總理相遇，總理笑著對我說：「你下午很有力量！」「你怎麼知道？」我問。

「跟你一組的人（指鄧穎超）同我說的。她還問我說，邱的發言，很顯然是話中還有話的，話並沒有說完，是怎麼一回事？我叫她獨立思考。」我說：「我的發言，還祇是一個開頭，我準備清算造反派對我的摧殘！」

總理說：「不要心血來潮，要考慮成熟再說。」

我說：「這次林總的講話，我事先確實不知道。因此沒有向總理匯報，我要有什麼打算，肯定會事先向總理報告，並得到總理的指示！」

總理說：「這次發生的問題，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這點，我不會有任何懷疑的！現在事情才開始。」

我說：「我一定聽總理的話！」

晚上，我繼續去參加小組會。會議還沒有開始之前，張秀川同我咬耳朵說：陸定一式人物就是指張春橋吧？我回答說：「獨立思考！」張碰了我的釘子。事後我感到對不起他，小組會正式開始時，我用紙煙盒子給張寫了一個條子。大意是：「你指對人了，但不能點名，可以表示憤怒！」張看到我的條子後表示滿意。

小組會的中間，我在廁所裏碰到曹里懷。我問他發言沒有？並鼓勵他對林總的講話要趕快表態。曹回答說：「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一定會表示自己的態度！」

從上述情況來看，我在小組會上是比較活躍的。造反派把我整得太慘了，我對他們的後臺中央文革是不滿的，這也是我能夠活躍起來的思想基礎。我是堅決反對造反派的，這點是眾所周知的。但對林彪的講話，我確實是不知原委的。在會前，連林彪要在全會上講話，我也是不

知道的。至於林總同江青的鬥爭，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我知道的不多。

汪東興、陳伯達在華北組（八月二十四日）。在華北組，陳伯達到會參加討論，陳伯達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一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有的人說世界上根本沒有天才，但是他認為他是天才。我們知道，恩格斯多次稱讚馬克思是偉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寧多次稱讚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稱馬克思、列寧是天才。我們也稱過斯大林是天才。否認天才，是不是要把馬克思、列寧全盤否認呢？更不用說要把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筆勾銷。我看這種否認天才的人無非是歷史的蠢才。」

汪東興在陳伯達發言之後也發言了。汪東興在發言中，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還說「根據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

在會上，汪東興很嚴肅地說：「我們再也不要糊裏糊塗的。這裏面問題嚴重呢。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是他對問題發覺得早，又一次出來捍衛主席，不然問題可就嚴重了。」

當有人問汪東興：「你說有人反對主席當主席，這樣講，主席知道嗎？」

汪東興說：「當然知道，就是不讓點名。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現在是筆桿子壓槍桿子，可厲害著呢！」

汪東興發言後，從華北組出來就碰到了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汪說：「王主任，要抓緊發言喲，我已經發過言了。我們就是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表明我們的態度。」

晚上，蕭勁光同志來了個電話，他說：「你那裏怎麼樣？」

我對蕭勁光的電話有點奇怪，心想怎麼問到我這來了。蕭勁光是我的老上級，關係一直很好，我隨便回答說：「馬馬虎虎。」

他不滿意地說：「什麼叫馬馬虎虎？今天汪東興來到我這個組，大講了一通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我記得以前不是傳達過不設國家主席嗎？現在他又主張設，這是怎麼回事？汪東興口氣很大，他說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能糊塗。我可真糊塗了。」

我不太願意回答他的問題，我就說：「你問李瞎子（李作鵬）就行了。」

蕭說：「問他問得出來我還找你！？」

我看他有些動氣，就立即說：「兩種說法都有，就看自己的階級感情了。常委都說設，主席沒有同意。主席是太謙虛了。」

過去，汪東興給我們通氣，一般是給吳法憲打電話，由吳轉告我們。可二十四日晚上，汪東興逐個給吳、李和我打電話，詢問我們發言的情況，汪很亢奮。汪東興的發言是全會發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議設國家主席」，並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筆桿子壓槍桿子」，總之他提出揪人。這刺痛了毛主席的心，後面毛主席的做法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大會秘書處印發了各個小組的簡報，華北組的簡報（八月二十四日小組討論的情況），編為大會的第六號簡報提前印發了。簡報寫到：「大家熱烈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語重心長的講話。認為林副主席的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批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在東北組，陳錫聯、曾紹山、周恩來、尉風英、李素文、汪家道發言。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周恩來總理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天才」的觀點。周恩來說：「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儘管毛主席叫我們不要總強調三個里程碑，但客觀上就是這樣。」周恩來還就黨的歷史發展經驗說：「要勿忘過去，警惕現在，教育後代，要夾著尾巴做人，知錯就改，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此前（七月十八日），關於修改憲法，周恩來在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言，提出修改後的憲法要「突出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黨是全國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國武裝部隊的統帥，林副主席是副統帥。」在開幕式前二十二日的常委會上周總理同其他三個常委再次提出要設國家主席。

在華東組，許世友、杜平、韓先楚、楊得志、王震、陳雲、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陳勵耘、韋祖珍、彭沖、王洪文、王秀珍發言。在華東組的發言中，許世友義憤填膺地抨擊了張春橋：「造反、造反，你們造誰的反？黨和國家都被你們搞亂了！……」陳勵耘在發言中指責中央文革迫害老幹部，反對解放軍。陳還沒講完，許世友又插話說：「老陳，你講的對！我同意你的意見」。連江青、張春橋的親信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也在會上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堅持「天才」的觀點。王洪文說：「林副主席講話非常重要，給我們敲了警鐘，不承認天才，就是不承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華東組發言非常熱烈，幾乎人人搶著發言。搶不上話筒的人就站起來喊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到誰！」「誰反對毛主席決沒有好下場！」要求「揪出來示眾」，「鬥倒批臭」，「千刀萬剮！」……張春橋坐在那裏一根接一根地低頭抽煙，一聲不吭，都不敢抬頭看一下是誰在發言，誰在喊口號。

在中南組，劉興元、丁盛、葉群、葉劍英、李作鵬、孔石泉、任思忠、曾思玉、劉豐、華國鋒、李震、于桑發言。葉群說：「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得多，懂得得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擋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鵬說：「本來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

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公安部長李震和副部長于桑爲了爭先發言，爭先對林彪的發言表忠心，竟然搶起話筒來。

在西南組，張國華、梁興初、周興、藍亦農、張銓秀、陳康發言。

吳法憲參加了西南組的討論，吳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是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說法，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肯定下來的，怎麼能不寫呢？……關於天才的說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毛主席對馬克思和列寧也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林副主席關於毛主席是天才的論述，並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陳老總在華北組發了言，他的言辭是激烈的，因爲他對江青、張春橋一夥反黨亂軍、禍國殃民是痛恨的，他說：「誰反對毛主席就同他鬥！我雖然身體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站起來同他們鬥爭。九大之後，我是被打在陰溝裏的，現在我必須爬出來，跟著林副主席一起戰鬥。」

除了陳老總外，老資格的中委，如聶榮臻、陳雲、李先念都發了言，雖然他們不是很激動，但也都表了態，表示對江青、張春橋一夥的行徑不滿。

在二十四日那天的下午開始，廬山的戰火確實是燒得很旺盛的，實際上是對中央文革實行了討伐！在二中全會上，並不祇是陳伯達、汪東興、吳、葉、李和我等反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中央文革的要員，而是極大多數中央委員共同的思想和行動。大多數人對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總帶頭反對中央文革，極大多數人都感到由衷的高興！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們是眾矢之的，真有「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之勢！尤其是汪東興和陳伯達的表現，使毛主席不能接受。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人，是在毛主席身前身後辦事的人；陳伯達是黨內理論家，是「最能準確表達毛澤東思想」的人，他們都是毛的人。他們卻站在林彪一邊，帶頭發江青、張春橋的難，發中央文革的難，毛主席是不會答應的。

第三十三章 風雲突變

晴天霹靂

會議正在進行時，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突然發生了變化。會議由「蓋橡皮圖章」變為「蓋冤案圖章」了。後來，竟捏造事實說，什麼廬山會議期間出現了一個「反黨集團」，林彪搞了什麼未遂的「陰謀政變」。我亦被列入該集團成員之一。但我參加了什麼政變？過去十幾年不知道，現在仍然不知道。因為這是捏造出來的，除了捏造者本人知道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二十五日下午，我繼續去參加小組會。臨走時，秘書對我說：「皮包裏，放有華北組的簡報，到會場上可以先看一下。」

到了會場之後，我就把包裏的華北組簡報拿出來了。我邊看，內心邊發笑。華北組的簡報寫得實在好！他們的小組會，真是「炮火連天」。原來反對中央文革的竟大有人在，這是我過去所不十分知道的。

這時，各小組的發言已經遠遠超出討論林彪的講話，整個會議已經形成一種勢，即反對江青這些人，甚至不滿文化大革命的「勢」，情緒相當大，這種「勢」觸痛了毛主席。雖然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個共識：毛主席搞文革是繼續革命，祇因為江青一夥的破壞，對老幹部無情打擊，才使眾多老幹部遭殃，文革才亂成這個樣子。事實證明這種看法也大錯而特錯了，因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是主席的方針，江青是執行主席方針的。

我準備提議，在小組會宣讀華北組的簡報。但我抬頭一看，康生沒有來，小組召集人洗恆漢也沒有來。我立即想到，毛主席那裏是不是開什麼會？因此，我多了一個心，到了嘴邊的話又收了回來了。「禍從口出」的諺語，這次對我真起了作用。

各小組的討論情況，毛主席肯定是知道的。當時，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個大軍區司令員也給毛主席和林彪寫了信，堅決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許世友還直接了當地點了張春橋的名，並提議要把他們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三年。尤其是華北組的六號簡報，火藥味十足，並以汪東興的講話為主。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時間早於許世友等人，他在發言中，不僅堅決提出要設國家主席，而且提出要揪人。汪東興還說：「現在是筆桿子壓槍桿子，可厲害著呢！……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對問題發覺得早，又一次出來捍衛主席，問題可就嚴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點名」點的是誰了。汪東興的話實在是太露骨太有份量了。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毛主席在山上的住處召開了中央常委會（各組有一個召集人列席會議）。會上毛主席決定，收回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的簡報），各小組停止開會。毛主席召開的這次會議，是廬山會議的轉折點，矛頭指向江青張春橋一夥的熊熊戰火開始被毛主席熄滅。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西北小組的召集人洗恆漢，參加了中央常委會回來說：「毛主席決定小組會暫停，以後怎麼開會，待通知。」

下午五時，各組都宣佈暫停開小組會。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時大家都不清楚。這對全會的極大多數人是一瓢涼水，澆得大家昏頭轉向；可中央文革這些人興奮極了！參加會議的人在林總講話之後的情緒和停止開小組會時的情緒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前一種情緒，多數人興高采烈，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惶恐不安，憂慮重重；後一種情緒，多數人垂頭喪氣，中央文革少數幾個人興高采烈。

下午五時，我從西北小組會場回來後，對廬山會議二十多個小時（二十四日下午四時起）以來，發生兩次突然變化完全想不通。我同李作鵬商量，必須再次嚴肅問一下吳胖子，問他究竟知不知道林總要在開幕式上講話。如果他知道林總在開幕式上講話，又不同我們打個招呼就可能有什麼新的內幕，那樣，葉群、汪東興、吳法憲他們就是一夥了，我們就不是林總最信任的人了，汪東興在會上講話那麼露骨，究竟原因何在？如果吳真的不知道，就是過去鬥爭的繼續。

晚上，我們一起到吳法憲住處去了。對上述問題，我們直截了當地問了吳法憲，他有點莫名其妙。吳法憲說：「我真不知道林總在開幕式上

提出張春橋的問題。如果我知道，以前不跟你們說，現在再不講實話就不行了吧。要是我知道林總要反張春橋不跟你們說，這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你們應該相信我說的話是真的。我可以給你們立個字據，連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擔保之內。」他說得很誠懇。

我們認爲吳法憲的話是誠實的，我們相信了他的話，也就放心了。然後，我們三個人就一起回憶準備開二中全會以來的一些主要問題。

我們經過仔細回憶，想起的主要問題就是：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關於在憲法上寫毛主席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問題，關於搞「天才」論的語錄等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即使有錯誤也是思想認識問題，完全不是什麼政治問題。經過回憶之後，我們自己認爲根本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事，也沒有擔心的必要！

我們一致認爲，當前還看不出毛主席對林總的講話採取什麼態度，可能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我們擔心的是，今後江青、康生、張春橋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會更神氣，甚至可能從九大以後的政治局集體辦公退步到中央文革時期那樣的程度；這些人不懂又愛管，把該辦的事搞得一塌糊塗，總理又那麼「顧全大局」。如果廬山這樣轉向的話，林總講話權威性會不如過去，甚至有針對江青的話也會不便說出來，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充分的認識，也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江青不把總理放在眼裏，今後也不會把林總放在眼裏，對我們就更不在話下了。

以後事態的發展，證明我們當時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

這時，汪東興、葉群前後來電話。

汪東興這個人，九大以後經常給辦事組打電話，有機會就往辦事組跑，跟葉群就更緊密了。上了廬山以後，他天天給吳法憲打電話，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況下由吳再轉告我們。汪東興說：「看到全會上各組的氣氛，他們真害怕了。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車闖進了毛主席的住處。江青並不知道下午三時中央開常委會，她是帶著張、姚去向毛主席告狀的。江青進毛主席的門時，衛兵擋了她的車。江青說：我自己的家裏也不許進去嗎？衛兵、江青正在爭議時，張耀祠出來了，這時江青才進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說：我帶春橋、文元來見你一面。他們快死了，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們表面上是對著春橋和我，實際上是對著你來的，現在各個小組都有劉少奇的陰魂。」汪東

興接著幸災樂禍地說：「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個傢伙，見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著主席一條大腿痛哭，這兩個傢伙把主席的褲子都哭濕了。毛主席對他們說：『對開會的事，中央就要開常委會討論了。』」汪東興還胸有成竹地說：「我看開會也是主席讓大家給他們一條生路。」汪東興還專門說：「主席已採取措施，今後我們暫停電話聯繫，你們之間也少打電話，有話當面說。」汪東興還說：「許世友來開會時，主席說：『我不能當國家主席，你為什麼一定要我擔任國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的手去給許摸），我每天能睡著覺的時間很少。我不能擔任國家主席那個職務。國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輕人擔任都可以。你許世友也可以，你許世友擔任國家主席就足足有餘。』許世友說：『我聽毛主席的話，我再不提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了。』主席笑著說：有希望！祇要對你許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餘的人就沒有不通的。」

但是，毛澤東聽進了江青告狀和求援的話，聽信了江青的話！主席是反對「天才論」的，還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評陳伯達。毛主席還說過不當國家主席。「九一三」以後，專案組從吳法憲嘴裏壓出了「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的假話，毛主席又把「設國家主席」杜撰為我們反黨的政治綱領，「天才論」是我們的理論綱領，事情越搞越假，越搞越亂。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主席真正的心病在哪裏呢？一個是林彪因不滿中央文革在會上不指名地點了張春橋，那麼多人都擁護林彪的講話，林在會上的威信，使毛主席難以接受；另一個就是除造反派的中央委員外都反對文化大革命，會上提出揪人揪張春橋。主席很自然會把反對張春橋和反對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和毛澤東自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主席後來不是講過，他一生幹過兩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一件。因此，反對文化大革命，對主席來說是一件要命的大事。這樣，林彪在大會上不點名地點了張春橋一事，就顯得嚴重了。

接著，葉群也來了電話，她說：下午三時，林總去開常委會。她想到林總去開常委會，必須追上林總去叮囑幾句。葉群在毛主席住所門口不遠的地方追上了林彪的車。葉群向林總說：「今天，如果有什麼很麻煩的事，一定要保汪東興！」葉群驅車趕林總時幾乎翻了車，但她趕上了林總，對發生過的驚險也就不在意了。不過，葉群下車下得急，車腿

一軟就坐了一個「屁股蹲」，受了傷，以後幾天開會，她都墊個小游泳圈在屁股下面。

二十五日晚上，政治局開會，擴大到各小組的召集人，會議由總理主持，這時江青、康生、張春橋他們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又來了，因為主席的決心還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對林彪的態度還不知道，總理看到他們那個樣子也不高興。我當時就隱隱感覺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邊了，可我萬萬沒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後的一切都是對著林彪來的。總理在會上說：「會議的日程做一些調整，根據主席的指示，休會兩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還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去遊一遊，換換空氣。」

散會以後，吳法憲要到林總那去，我們勸他不要去，他還是堅持要去，為了等消息方便，我們就坐在吳胖子住處等，不久他就回來了，吳說：「我去時林總剛從主席那裏回來，主席召集開常委會，各大組的負責人也到了，林總說主席對會議不高興，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起哄，並說以後不要再提天才了，國家主席他不當。林總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我回到住處，總理給我來了電話，他同我說：「主席說廬山問題還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但發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嚴重性。這就是說，在陳伯達身上發生的一般的問題，也必須嚴肅對待。你沒有什麼大事，但要化被動為主動，因為你究竟有沒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總理的話，都說到這種程度，我仍然沒感到自己會有什麼事，祇是我感到陳伯達可能要倒霉了，可是為什麼要搞到陳伯達頭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毛主席宣佈停止小組會後，從八月二十六日開始，大家可以自由活動，有的人在家裏看會議相關的文件，有的去遊廬山，晚上還安排看電影。實際上，主席自己忙乎得很，天天找人談話；江青他們也忙乎得很，而且打著主席的旗號，拉攏人心。我們幾個則沒有給任何幹部談過話。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吳法憲通知我到總理的住處開會，這個會除吳、李和我之外，還有康生、汪東興參加。總理說：「按主席指示，召集你們來談一談，把有些情況搞清楚。」

總理的話音一落，康生就氣勢洶洶得對汪東興說：「你汪東興所在的華北組六號簡報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簡報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沒有給你汪東興戴上，你敢做不敢當，不但推卸責任，還陷害別人。在華北組起哄！」汪東興沒有看康生，沒有吭聲，也沒有低頭折服的樣子。這下康生更火了，扯著嗓門說：「你汪東興在華北組點火，陳伯達跟著你起哄！吳法憲撒謊。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也跳出來了！你們想幹什麼？」康生講話時，總理一直看著他，沒有傾向性的表情，也沒有說一句話。因此，我們心裏也有些底，李作鵬是個有膽識的人，他首先頂了康生一句：「康老呀，總理說，按主席指示找我們來，是把情況搞清楚，你怎麼上來就下結論呢？」康生一下就啞火了，吳法憲見到此情景，立即跟著說：「康生同志，你是代表中央下結論嗎？這個結論有點早吧。」康生老到得很，他自知話說過了頭，一句話也不回答。總理趁勢說：「今天就到這裏，明天上午接著談。」總理又強調：「主要是把情況搞清楚。」在會上我也沒說話。

第二天（八月二十七號）上午繼續在總理那裏開會。吳法憲拿著一本《黨章》對我和李作鵬說：「這是林總給我的黨章，黨章上明明寫著『黨內允許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我才不怕康生呢！毛主席說我錯了我才承認。」在會上康生把我們當被告一樣，又是追又是訓，大放厥詞。康生竟說：「你們也是『軍事俱樂部』！你們要交待這個俱樂部都有誰？怎麼成立的？為什麼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也跟你們在一起？陳伯達起哄很得意呀，他把林副主席也綁在自己的戰車上了！」

我聽康生簡直在胡說八道，況且我昨天也沒有發言，我應有個態度，便反擊康生說：「我在西北組發言時，你康老也在場嘛，你同意我的發言，你還表揚我馬列主義學得比較好，我還受寵若驚呢，你自己說的話都忘了嗎？黨的會議，大家都可以發言嘛。設國家主席，祇是傳達過不同意見，究竟是哪種意見，也沒有定嘛，就是讓大家在會上提嘛。你自己也同意設國家主席嘛！」聽了我的發言，康生氣得滿臉通紅，但我說的話比較平和，康生想發作也發不起來，他傲慢地揚著頭，鬍子翹老高。吳法憲緊接著說：「你今天又說陳毅是反革命，而且和我們搞在一起了。這是中央定的嗎？你是常委，說話要負責呀！我們沒有『軍事俱樂部』，沒有！我們祇有軍委辦事組，這是毛主席定的！」吳法憲說著

激動地站起來了。總理一直沒有發言，這時總理立即說：「康老的話說過了。」總理就說了這麼幾個字，又讓大家說。李作鵬對付康生是有辦法的，以前的政治局會議上，一有機會李作鵬就挖苦康生。李作鵬說：「康老呀，我記得在九大時，主席說陳毅是右的代表，現在怎麼成了反革命了？這是創造性的，還是諷刺呀？」我們三個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頓，康生那個囂張勁頭才下來，不過我們也祇是嘴上痛快，因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來的，他是代表毛主席來的，我們這些人不諳世故。總理說話一直沒有傾向性，總是說：「平心靜氣，平心靜氣，主要是把情況搞清楚。」

下午四點左右，陳伯達叫吳、李和我到他住處去談了一次話，時間約一小時。對此我們有點猶豫，吳法憲說，陳伯達告訴他是主席叫他找我們的。

我們到他住處時，我們看到陳伯達精神十分緊張，很沮喪。大家坐下之後，喝了一點熱茶，他精神的緊張程度稍微紓緩一點。他說：「我叫你們來是經過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談了一下，對我有批評，對你們也有批評，主席要我找你們幾位談一下。」

陳伯達顛三倒四地說了不少話。我記得，主要內容是談的毛主席批評天才論，說陳伯達給我們語錄，把我們騙了。在談話的時候，吳法憲拚命記錄，我也幫他記了一些要點。整個談話的內容都是重要的，但如下幾句話，我認為特別重要。

陳伯達說：「毛主席指責我參加了『軍事俱樂部』！說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裏去承認錯誤，爭取他們的原諒，搞好團結。」陳伯達說：「毛澤東一出此言，我腦子就懵了。『軍事俱樂部』是一九五九年毛澤東講彭德懷的話，怎麼在十年以後又拿同樣的話講起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來了？我是罪孽呀，怎麼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線了。」

陳伯達說：「康生指責我把林副主席綁上了戰車，甘願當叛徒，投靠了軍委辦事組，我準備你陳伯達殺我的頭！」

臨走時，陳伯達向吳法憲宣佈：「我犯了錯誤，從此中斷電話聯繫！」這幾句話，把當時發生的問題的性質都點明了。例如：「軍事俱樂部」一詞，是上次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用語，康生的話是再明顯不過了，我們問題的性質和彭德懷是一樣的。

我們三人都認為，問題一下就嚴重了。就決定到林彪那裏去一下，準備走時，吳說給葉群打個電話，陳伯達聽見後像嚇丟了魂似的，懇求吳胖子千萬不要在他那裏打電話，我們就離開陳的住處。吳說我們就直接去林彪的住處，如林不肯見就回來，李說如果不見，那問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林彪的住處，葉群依舊很熱情，說：「快來，快來。」林彪也親自出來了，我們把陳伯達的話講了一遍，林彪還是很鎮靜，好像對這些是非非的話有反感，林總祇說了一句：「那是講陳伯達。」

對於毛主席同陳伯達的談話，我又專門打電話向總理匯報。他聽到後也非常吃驚，他認為主席把問題搞嚴重了。

周總理真是不辭辛苦，立即找吳、李和我談話，總理說：「話的份量是相當嚴重的，要超過『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對陳伯達說的，與對你們說，是有區別的。要是有什麼需要你們注意的，我會向你們打招呼的。但你們講話要慎重，別人豎著耳朵聽你們講話，搞不好要影響林副主席。」

我們對總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為在最高層搞這些名堂，我們的確一竅不通。

不管怎麼樣，從陳伯達這次談話起，我們才真正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對我震動很大！從此，我就比較認真考慮問題了。我考慮來考慮去，腦子裏「翻箱倒櫃」，各方面的問題都認真想過了，在廬山除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外，大家對林彪講話的態度都是一樣的，開始也包括康生在內。因此，不是誰有錯誤的問題，而是主席說誰有錯誤的問題。我認為不管廬山的問題有多大，對我們都是「提起千斤重，放下無四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毛主席「提起」還是「放下」的問題。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毛主席把我們和汪東興分開，把我們和全體中央委員分開，把我們孤立起來，其實也就是把林彪孤立起來，再扣上幾頂帽子，進行打擊。

林彪的態度

總理宣佈暫時休會以後，林在等主席表態，也沒有主動要求去見主席，因為不知道談什麼，也不知道錯在哪裏？主席反而天天找人談話，主席還想了一個方法，叫林彪給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方榮、李作鵬、邱會

作、汪東興開會，說我們犯了錯誤，都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把問題談通了，問題也就解決了。

林彪是不願意出面開這個會的，他認為主席不夠誠懇，但主席發了話，林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從八月二十八日開始，林彪就召集陳伯達等六人，在他的住處開過三次會。每次會九時開始，十一時結束，每次會約兩小時。第一次會議開始時，林總說：「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談談，做點思想工作，我們的會要開兩三次，每次會的情況，請汪東興向主席口頭報告，我就不另寫書面報告了。」林總當面批評了陳伯達：「你的書生氣太重了，考慮得太多。主席批評我能不能再看張春橋兩年，主席說得對。我們部隊的幹部要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就是這些嘛。」對於讓林主持這樣的會，後來林彪說主席在「要」他，他也祇有應付差事。

到會的人都說了話，說的內容都是有關團結的問題。當時，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還沒有印發出來，所以大家都沒有批判天才論的問題。大家的話都說得很簡單，都是屬於表態的話，實質性的話一句也沒有。這種會是純粹做樣子的。

第二天開會的時候，林彪有些調侃地說（我從沒有見到過林彪開玩笑，林說話向來認認真真）：「你們說說，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你們為什麼在同一時間，講了同樣的話？」三天的會，林彪沒有多講一句話。

葉群對我們說林總的態度是：「不改變自己的觀點，不干擾毛主席對問題的處理。」從此他基本上都是這個態度。葉群還說：「林總說，吳法憲提出檢討，這是他的權利。如果他要問我（林），我就說檢討是因為有錯誤，你吳法憲沒有錯，你檢討什麼？！」從我們比較知道內情的人來說，林彪在廬山的確沒有單獨進行過任何活動。他的心情總是坦然的。他說過：「一個人搞鬼還是沒有搞鬼，自己說的不算數，要別人說的才算數。我不出門，不說話，不找人談話，就沒有什麼顧慮，也不給別人製造緊張局勢的話柄。」在廬山，吳、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開的場合同林彪見面說過話之外，基本上都沒有單獨同林總講過話。事後我想了一下，林總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好像是軍事上的「火力襲擊」。林總的「火力襲擊」的目的，不是對準整個中央文革，而是對準他們的幹將——張春橋。這仗如果成功了，對中央文革以後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總的火力襲擊還沒有完，戰鬥就宣告失敗了。

林總在廬山反對中央文革是未遂政變嗎？這完全是鬼話。那麼林總為什麼失敗了？毛主席支持江青，支持中央文革是林總失敗的根本原因。林總的命運就抓在毛主席手裏。

毛主席支持張春橋，是爲了江青嗎？這也不全對。其實，毛主席支持張春橋，這是關係到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問題，也關係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幹部。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從文化大革命產生出來的代表人物，這就是說，如果張春橋被打倒了，就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文化大革命產生出來的一批人的問題。林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領導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決定後，他對打倒賀龍在九大說過幾句話之外，在文化革命中沒有欠下什麼需要還的賬。

吳法憲檢討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總理給我來電話說：「我已通知吳法憲寫個檢討，這樣爭取主動，主席對於肯做檢討的人，一般是原諒的。我看吳法憲的精神有些緊張，恐怕他寫不好，你和李作鵬都去幫他起草一個稿子拿給我看看。」我說：「我馬上照辦。不過這裏面有個問題，吳法憲寫檢討一事，是否要報告林副主席？吳一檢討，勢必影響到葉群，也就等於影響到林副主席。」總理說：「你考慮得周到。但檢討還是要寫的，不然主席那裏不好交待，兩邊都要兼顧到。關鍵是檢討怎麼個寫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鵬去嘛。」

我給吳法憲打了一個電話，講明情況，吳表示感謝，說自己先搞。吳的思想壓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書搞，吳又不滿意，主要是怎麼說林，拿不定主意。晚上我和李作鵬到了吳的住處，共同商量檢討稿怎麼寫，大家商量了一個框架，吳當時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從心，我就執筆給他寫了一個稿子，吳認可了，又拿給李去看（李身體不好，先回去休息了）。吳法憲向總理交了卷後，總理又把我們三個人叫去親自談、親自動筆修改後才定稿的。總理還說：「你們幾個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順利嘛，要經得起挫折。」吳的檢討稿很簡單，一是說對林的講話，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發言中有錯誤，自己發言中的錯誤自己承擔。總理說：「這個提法好，要自己承擔，保護副帥（指林彪。這是總理的專用語）」。

一是說討論林彪的講話是吳提出來的，吳說他的提議干擾了大會的議程。這個提法就等於替總理開脫了，因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討論林彪的講話和聽錄音畢竟是總理同意的。總理對這一條特別滿意。

總理這個人，對人還是很誠懇的，而且精力特別充沛，對大局的事，對有利於團結的事，他都會盡力去做，他對黨內的團結有美好的願望，從不好勝。比如說，葉群二十五日下車時坐了個「屁股蹲」，開會時很不方便，他想請假，總理說：「這個時候千萬不能請假，不然別人會有很多想法。」葉群聽了總理的話，開會時搞個小救生圈墊在屁股下面。當然，祇要主席的態度已明確，對總理來說，上面那些就不算數了，他是無條件聽毛主席的，總理知道主席是太好勝了。

當時，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康生、張春橋他們，把前一段在北京討論憲法時，做記錄的人（也是這次會議會務組的）找來寫了一個材料，說「在憲法修改小組的討論會上，吳法憲和張春橋確有爭論，但這個爭論，不是原則上的爭論，而是文字上的爭論」，這個材料是他們為張春橋找退路的。二十五日以後，形勢變了，江青、康生、張春橋他們又把這個材料，捅到主席那裏去了，並大肆宣揚說吳法憲造謠說假話。吳法憲當時已經「潰不成軍」了，他沒有和我們商量竟承認自己說了假話。這件事引起了林總、周總理的極大注意，我和李作鵬對吳則極為不滿。林總在吳困難的時候，真是幫他，林認為吳法憲不會說假話，並為他專門說了一段話。林總還叫把他的話傳出去。

林總說：「吳法憲沒有說假話的問題。吳跟我幾十年，我就沒有聽過他說過假話，也沒有聽別人說過吳法憲是一個說假話的人。吳法憲對毛主席、對黨都是忠誠老實的，是不會說假話的人。」

林總還說：「在憲法小組，對運用毛澤東思想編寫憲法，確實有過爭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現象。我們決不能說，提出不同的意見就是說假話。這樣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時，總理在東北小組也做了文章。雖然，總理沒有象林總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吳法憲是不會說假話的人。」但說的話是很有份量的。總理說：「吳法憲是一個很誠實的人，對爭論的不同意見不能簡單地認為就是說假話。懂得內幕的人，對總理的話是完全理解的。吳法憲說假話風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黃永勝上山

二十九日上午，李作鵬和我在吳宿舍閒談，葉群也來了，葉群說她拾到了三個「險球」。這三個「險球」是指周總理轉給葉群的三封信，並附有條子說：「此件存你處不必再呈、轉了。」

信是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寫給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轉去的還有其他省、市中央委員的信）。信的內容是打擊張春橋的。許世友提出，要把張春橋下放農村改造三年。楊得志、浙江的南萍、熊應堂提出要公開批判張春橋，韓先楚原來沒有寫信，聽許世友一講，他立即響應，他說：「我也給這個鱠魚眼（指張春橋）補一槍。」葉群對我們說：「與此事不搭槓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們。」

這樣的信不轉到毛主席那裏去，不去火上加油，祇有周總理能夠做到，同時也祇有總理能夠把事情向著好的方向解決處理。

晚上，李和我建議吳求見毛主席。吳立即向毛主席秘書打了電話。不久，秘書回了電話說：「主席說，現在不要談話，以後主席會找你談話的。主席交代了三條；一，不要緊張；二，要犯得起錯誤；三，我們要以孔夫子打牌『和為貴』的辦法處理問題。」

八月三十日，黃永勝到廬山，李德生回到北京值班。黃永勝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處，我們一直在吳法憲的住處等他。黃從主席那裏出來，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黃才回來，而且是和葉群一起來的。黃祇簡單地講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談話的情況，有些情況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評吳法憲的話沒有多講。

黃永勝說毛主席估計山上的情況他已經知道一些，因此談話一開始主席就問：「到廬山來緊張嗎？」

黃永勝：「我剛到，就來主席這裏。」

毛主席：「搞突然襲擊，還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搞他幹什麼？」

黃永勝一聽說的是張春橋，也直言回答道：「張春橋不得人心，我們確實有些意見。他特別倚重江青同志，我認為有些事是給主席臉上抹黑。政治局實際上是不團結的，張春橋起的作用不好。總理一直在努力做工作，擔子很重，很吃力。過去，沒有向主席報告清楚。方塊我應當負責！

毛主席：「你當然要負責，你是一個頭。張春橋拍江青的馬屁有什麼用？」

黃永勝說：「江青自以爲有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張牌嘛！她總認爲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總認爲自己會贏。」

毛澤東：「大王出過了，小王就當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的嘛！人不多嘍。爲什麼連你都不向我報告江青的情況？」

黃永勝是個政治上挺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麼看江青，他還沒摸透，因此他沒有順著毛的思路往下說，黃說：「我們不想干擾主席。」

毛澤東：「你們能不能讓我看張春橋三年？」

黃永勝：「我是在主席領導下參加秋收起義的。幾十年來的槍林彈雨，艱苦歲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擁護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爲人爲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處衝擊，到處奪權，到處打、砸、搶，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問題最難辦。」

毛澤東：「你也不贊成文化大革命？」

黃永勝：「我堅決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搶。」

毛主席說：「現在問題都解決了，不把問題帶下山去。今後主要是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大家都要執行九大路線，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搞徹底！」

黃永勝：「我聽主席的話，在主席領導下，努力學習，努力工作，搞好團結！」

不過，黃永勝的態度，也決定了事後毛對林彪，黃、吳、李、邱的取捨。毛當時已經很清楚了：要林彪、黃、吳、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們骨子裏都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須拿掉林彪！有沒有以後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樣。

黃永勝到廬山之初，因爲毛主席同他談了話，開始他有點「局外人」的態度，他不主動向別人打聽情況，別人同他說話，他也不太感興趣。同時他負擔也並不重，因爲毛主席已經說了，「問題已經解決了」。我觀察到這一情況之後，除了有事之外就很少到他那裏去了。祇是三十日晚上，黃、吳、葉、李和我在一起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葉群把廬山問題，向黃做了比較系統的介紹，並從林副主席對廬山問題的態度說起。

黃永勝與總理的聯繫比較多，受總理的教育和點撥比較多。黃對廬山的問題瞭解多一些了，也漸漸找我們談話，並且在對待中央文革一幫人的態度上，黃比我們還堅決，對維護大局，他和總理作了不少工作。黃強調：一個是保護副帥；一個是叫吳法憲在檢討時祇說自己，不要扯別黃強人；一個是要保護陳伯達和汪東興，問到自己頭上就實事求是地說。黃強調說，老夫子（陳伯達）也是手無寸鐵；一個是強調山上山下沒有聯繫，在廬山我們和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不承認我們是一夥；一個是和張春橋有鬥爭而且是原則性的鬥爭，批評張春橋沒有錯，不是祇有我們幾個對張春橋有意見，政治局很多人對張春橋都有意見。我現在想起這些往事，仍然認為黃永勝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貴的，如果他被毛主席拉過去，問題就複雜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來。

《我的一點意見》

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這個文件是八月三十一日下發的，政治局進行了學習討論。

《我的一點意見》是毛主席看到華北小組的簡報而寫的。在原稿上，除了關於搞語錄的問題，還有陳伯達、吳法憲的名字。後來，周總理說：「語錄是陳伯達搞的。」毛主席又把吳法憲的名字刪去。

《我的一點意見》，我記得文字並不長，主要內容有：對廬山發生的問題，提高到「炸平廬山」的說法。在天才論的問題上，諷刺了陳伯達，保護了林彪。文中關於天才論的問題，有一句「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一致認為……」整篇文章，初讀起來好像學術味還是相當濃的。但細細一看，就是對陳伯達的宣判書了。

在政治局討論《我的一點意見》時，江、康、張、姚高興得不得了，姚文元說：「毛澤東思想是無價之寶，可以戰勝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戰勝權威人士（暗指林彪），我們要很好學習毛主席這一重要指示。」

張春橋說：「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是偉大的馬列主義的又一光輝文獻。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打倒了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司令部。同樣，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也一定是戰無不勝的。我們要以批判『天才論』為中心，學習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建議文元連夜寫出個大綱來。」

吳、李和我除了表態擁護之外，一句話也沒有說。姚文元帶著諷刺口吻說了一句：「不表態也是一種態度！」我也說了一句：「表態也並不是最好的態度！」周總理怕吵起來，就用其他的話把問題引開了。

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對《我的一點意見》如獲至寶！江、康、張、姚召集華東地區的造反派中央委員，如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賢等十餘人，在張春橋的住處舉行了慶祝會，光茅臺酒就喝了幾瓶。

小組會恢復後，姚文元在他所在的東北組發言，講了幾小時，主要是批判天才論。消息傳了出去後，其他小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員也不守紀律，竟然脫離自己的小組，都跑到東北組去聽姚文元發言了，中央文革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是不可低估的。

毛主席派張春橋到華北組，有人請他批判天才論。他祇說了兩句話：「唯心主義大師是馮友蘭（北大教授），黨內的蹩腳理論家是陳伯達。祇有他們兩個人，才有資格講天才論的問題。」除此之外，他還擅自參加了各個小組的會議。他的舉動沒有別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統帥親自上陣也沒有把我張春橋打倒。還有什麼人可以把我打倒嗎？」周恩來知道會場被他們搞亂了，非常生氣。他告訴張春橋：「回到華東組去。」張對總理不屑一顧。毛澤東知道這一情況後，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噁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個小組（不固定）的會場上去。她到西北組的時候，一進門就笑起來，表示非常高興的樣子。坐下之後，她說：「我來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協助毛主席處理會務的許多問題之後，才能出門。我是來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覺很好！」

我在小組會上也做了簡短的發言。我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了自己學習差、理論水平低，識別不了真假馬克思主義，今後要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主席著作，愛護黨的團結。我的話音一落，康生就對著我面帶冷笑地講話了：「善於觀察時勢的人，應當多說一點嘛。上一次在小組會上，不是說得很好嗎？」

「把時間留給理論家康老用。聽說，康老已經準備了長篇發言稿。我是以平常的態度回敬康生的。」

大家對我們兩個人的幾句對話，報以哄堂大笑。

康生在西北組除了把我諷刺了一頓之外，還以「反對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為題講了大約兩小時。

會議的最後幾天

九月一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省市、大軍區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吳法憲、陳伯達做檢討，會議由林彪主持。林彪能主持會議也是我沒有想到的，我以為他會稱病，但他卻來主持了會議。

陳伯達發言時，張春橋做「翻譯」，這雖是一件小事，但對他們來說，卻是一件大喜事。他們在展示：「你陳伯達打不倒我們，你今天怎樣了？」

九月二日，繼續昨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陳伯達、吳法憲檢討後，還有幾個人發了言。

張春橋發言，除了盡情謾罵陳伯達之外，還說了：「以吳法憲為戒，努力學習努力工作。」

林彪在會議結束時，對陳伯達說了兩句話。他說：「陳伯達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對這樣的人應當與之徹底劃清界限……」

會議至此，「廬山戰火」就暫時平息了。會議轉為全會原來的議題了。

九月三日，總理回北京了，會議似乎沒有人管，各小組名為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實際上都在亂扯談，大部分人拿著審議文件當閉口道士。

九月四日，總理回來了。主席在他的住處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主席說不要搞得太緊，會議再延長兩天，然後對到會的陳伯達說：「閉幕式你就不要參加了，你如果參加，別人會把你從主席臺上攆下來。」主席說完話，陳伯達當時非常窘迫，他低著頭坐在那裏不動，這時總理走過去，給陳伯達咬了咬耳朵，陳伯達站起來怏怏不樂地退出會場了。陳走了以後，主席又接著說：「陳伯達的歷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這裏向中央揭發陳伯達，陳伯達是個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僚家庭，陳伯達有變節行為，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國民黨特務，一貫追隨王明反共。……」主席還說：「對陳伯達還要看一看，可以給他當個中央委員。」

毛澤東的講話，大家聽了很不是滋味。過去，陳伯達號稱馬列主義理論家，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三十多年，周恩來也說過：「伯達同志最能準確地表達毛澤東思想。」前幾天，陳伯達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現在怎麼又是「托派」，又是「變節」，又是「叛徒」，又是「反共」方块简体字可以檢

討嘛，怎麼一得罪，就搞成這個樣子？張春橋也是叛徒，為什麼一字不提！？林彪揪張春橋就是分裂黨，毛主席揪陳伯達就是團結勝利的大會？大會討論林彪的講話就是改變大會的議事日程，大會學習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不也是改變大會議事日程嘛。聽了毛講完話後，人人面面相覷。不過主席講到：「對陳伯達還要看一看，可以給他當個中央委員」時，葉帥突然發言。他說：「我看陳伯達的事不能這樣就完了！」毛主席聽進了葉帥的話，遂決定對陳伯達審查，並由葉帥具體負責。

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氣，表現得淋漓至盡。毛主席已經站在黨和國家之上了。這是毛澤東主席晚年所犯錯誤根本原因之所在。

最後總理又徵求大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的意見，這個時候大家哪有心思討論這些，都說沒有意見就散會了。

九月五日，討論通過了《關於加強戰備的報告》。

九月六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議由林副主席主持。

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總主持會議的。毛主席說：「你要不主持會議，大家會有很多想法的。」

會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和《關於加強戰備的工作報告》。會上也通過了全會的公報。

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他在講話中，暗指陳伯達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當。暗指張春橋是紅秀才，在會上公開給張春橋撐腰打氣。接著主席說：「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是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事實上，誰也沒說過「代表人民的標誌就是要當國家主席」，大家提議設國家主席的目的，是為了健全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

但在閉幕式結束前，周恩來講話時說他代表毛澤東主席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全會閉幕了，服務員在打掃會場的衛生時，竟然從地上拾到「打倒張春橋——幾個中央委員」的條子。周恩來看到條子後，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條子後，一定也非常吃驚。

九月六日晚，中央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簡短會議，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廬山的問題不下山，傳達會議精神要控制範圍。回到北京後，政治局舉行一次學習生活會，各自做自我批評。『孔夫子打拳，和為貴』。康生則提出：「廬山的問題並沒完，要追查到底，落實到人頭，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周恩來祇說了一句「應照主席指示辦。」就散會了。與會者陸續下山了。

九月七日，林彪下山了。周恩來去看望林彪，兩人緊握雙手，面面相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我下到九江機場向林彪送別，在飛機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照常睡覺，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你們有事情多向周總理請示報告。」從此以後林彪就很少和我們聯繫了。

周總理九月九日上午下山。

毛澤東九月九日下午下山，毛澤東走在所有中央委員之後。

九月六日晚，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叫黃、吳、李和我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吳說，他們可能不願意去。葉群說去做做樣子嘛。

黃、吳、李和我幾個到了江青住處，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江青才從樓上下來，而且穿著睡衣，我們幾個真窩火。江青象女皇一樣，邊走邊說：「我向來是反對陳伯達的，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舒服了吧，過去你們不聽我的話，犯了錯誤，今後聽主席的話就是了。主席和我對你們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的。你們主要是上了陳伯達的當。」從江青家出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戲子，戲子！真他媽窩囊。」

毛澤東的苦澀

我認為主席內心是苦澀的，主席對高級幹部的情況，心裏都清清楚楚，文革中應不應該打倒這麼多老幹部，他心裏最清楚。「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團結不同意見的人，甚至反對過自己的人一道工作」這是毛主席經常教導的，可是，在文革中這些他都不要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否要用「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法解決黨

內問題？黨內搞這麼大一場革命，是不是應該由江青掌重權來做領導文革的工作？主席心裏都清清楚楚。現在，他又以否定林彪的正確意見為代價，以否定四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確意見為代價，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數同志的正確意見為代價，以否定二百多個中央委員的正確意見為代價，換取了江青、張春橋的「安全」，這種代價也未免太大了。爲了一個造反派張春橋（林彪稱之爲小記者），竟然打擊了跟隨他一生，南征北戰，出生入死，一身戰功、一身槍傷的林彪，究竟是爲了什麼？

林彪講「天才」是不是就是說毛澤東是生而知之，主席心裏很清楚。林彪講天才是對毛主席的歌頌和稱道，是崇敬！在大家都在說劉少奇好話的時候，毛主席多麼希望有人讚揚他，希望「要一點個人崇拜」。林彪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並且舉起來以後，他又說「討嫌」，令人無所適從，祇有認爲主席是謙虛，而且是偉大的謙虛。毛主席在廬山把「天才」和唯心論的先驗論搞在一起，純粹就是爲政治服務了，有意把水攬渾了。

究竟國家主席有多重的份量，毛澤東清楚，林彪也清楚。如果國家主席是一個要職，在毛主席退居二線的時候，是決不會把這個職務讓給劉少奇的。林彪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很清楚，他這個人一天保持健康地生活，正常地飲食起居都很困難，哪有精神去考慮非分的事。他非常清楚，雖然給他戴上了「接班人」的帽子，就他的身體狀況來說，也是接不上班的，林彪對國家主席這樣的虛職，根本就不感興趣。

廬山會議的實質問題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是林總爲了扼制江青、康生、張春橋等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後，仍然堅持搞極「左」的一套，就以張春橋爲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實行了火力襲擊，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從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在二十多小時之內，廬山燒起了熊熊烈火！出席二中全會極大多數的人，都興高采烈，沉浸在歡樂之中。但好景不長，毛主席於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就把戰火撲滅了。出席會議的極大多數人，從興高采烈變爲臉無喜色了。主席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用「殺雞給猴看」的辦法，犧牲了陳伯達，暫時撲滅了戰火。

九大以後，形勢好多了，如果能夠開一個比較成功的四屆人大，情況就會更好一些。沒想到毛主席又提出在四屆人大上不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毛主席不顧國家體制，一個人說了算，大家又爲因人廢事而忙乎。林提出設國家主席，並要毛當國家主席，正是「克己復禮」的建議。方块字建议区制毛主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 条 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

「鬧來鬧去，把帽子給我們扣上了，可憲法草案上還是寫上毛澤東主席
『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

席不但沒有採納，反而給林彪扣上「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的大帽子。

其實，毛澤東主席在文革的問題上，在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問題上「有病態」，他才造出了不設國家主席的「理論」。召開四屆人大，必定要涉及到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必定要涉及到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必定要涉及到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必定要涉及到最高人民法院

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等。可劉少奇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已經死了，朱德委員長不能在人代會上當家，副委員長、副總理多數已打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找都找不到了……我看毛主席想開一個馬馬虎虎的人大，不要開一個認認真真的人大，不然上面這些問題不好交待。這就是毛主席的苦衷，設不設國家主席根本不是問題的實質。

毛主席還有一個苦衷，就是文革的問題。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講張春橋的話是含含糊糊的，並沒有什麼更重的味道，而且也沒有點名。所以聽林彪講話的錄音，討論林彪的講話，毛主席都同意了，總理也非常積極，而且總理、康生還整理了林彪的講話。主席沒有想到的是在討論林彪講話的時候，對張春橋形成的討伐，實際上就是對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的討伐。而且，幾乎全體中央委員都擁護林彪的講話，幾乎是一呼百應。這種號召力毛主席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江青說得對，表面上是對著張春橋來的，實際上是對著江青來的，也就等於是對著文化大革命來的。正如毛主席後來所講，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幹的兩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於否定了他。

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打擊的是林彪和我們。從道理上講這是不對的，從政治打擊來說毛主席是早有考慮的。在小組會上，我們祇是念了馬列稱天才的「語錄」，擁護了林彪在開幕式上稱毛主席是天才的講話，擁護天才的觀點，這既無什麼大錯，也不比別人調子高。為什麼我們同意稱天才，一個是林彪在開幕式上講他「堅持天才的觀點」，一個是「天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林彪講的，張春橋反對，我們是反對張春橋的。在小組會上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我們祇是一般的提及。

從廬山會議上各小組的發言來看，汪東興、許世友、陳伯達等人是最積極的，汪東興、許世友提出了「揪人」。毛主席為什麼要翻臉，就是因為「揪人」！揪誰呢？揪張春橋。毛主席認為對著張春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對著文化革命來的。在廬山汪東興、許世友、陳伯達等人跳得最高，毛主席為什麼卻搞黃、吳、李、邱呢？因為毛主席不是按誰跳得高打分的，而是按人劃圈子。毛主席借「天才問題」和「設國家主席問題」為由頭，把林彪和黃、吳、李、邱劃在一個圈子裏，先扣上帽子然後進行削弱和打擊。這種削弱和打擊不是在廬山偶然形成的，而是大以

後毛主席對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機會削弱和打擊林彪的，在廬山正是機會。

汪東興與華北組六號簡報

我跟汪東興的關係一直都是工作關係，平時接觸也不多。一九六八年「楊、余、傅」事件以後，汪東興和軍委辦事組的來往越來越密切，九大以後汪東興就主動向軍委辦事組靠攏，經常和我們一起吹牛皮，有關主席和江青的關係，都是從他嘴裏說出來的。吳法憲經常問他的一個問題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汪東興和江青關係不好，他每次都說：「完全是兩回事！」其實，主席和江青關係很深，毛澤東從來就沒有真正批評過江青，更沒有想過要打倒江青。留心歷史的人就會發現，毛澤東每次講批判江青的「壞話」，都未必是動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後來對鄧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讓我們衝在前面和江青鬥。

汪還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間隱私的第一手材料來巴結黃、吳、李和我。有一次，汪東興從東北出差回來，還沒有休息，就把黃、吳、李和我請到汪東興家裏來「吹牛」、「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東興說：江青做了婦科手術後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後來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經常氣主席，主席幾次外出都是掉著眼淚離開北京的。不過主席也有不方便之處，其實就是有短處，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議，主席有些是反對的，有些也祇好默認了。比如，江青要反田漢、周揚、夏衍，陽翰笙四條漢子，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還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東興說：如果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批車爾尼雪夫斯基，你們不要表態。汪東興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他以為巴結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伯達他們指揮的，張春橋既滑頭膽子又小、張想在上海搞什麼衛星中心，主席沒有同意。汪東興還說，穩定全國的局勢就靠軍隊了，你們幾位老總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後，不怎麼提中央文革了，這個江青、張春橋，就是念念不忘 中央文革……如果張春橋靠邊站了，江青也很難有什麼搞頭。

汪東興在廬山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1、開幕式後他就告訴吳、葉、李和我以及陳伯達，主席說對張春橋「可以講，但不要點名」。這樣，使大家增強了對張春橋、江青一夥鬥爭的決心。

2、為陳伯達印馬列稱天才的語錄，陳叫他印五份給常委做參考，汪自行印了二十份，首先發給了吳、葉、李和我，並沾沾自喜地說：「近水樓臺先得月」。

3、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是全會調門最高的。一，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二，在華北組的會上，汪東興很嚴肅地說：「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對問題發覺得早，挺身而出捍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然問題可就嚴重了，我們再也不能糊裏糊塗的了。」汪東興的話等於告訴大家，有人在反對毛主席，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不是泛泛地在講有人反對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動大家起來鬥爭。三，當有人問汪東興，有人反對毛主席當主席，這個情況毛主席知道嗎？汪東興說：「當然知道，不過主席不讓點名。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現在是筆桿子壓槍桿子，壓得很厲害呀！」汪東興說是不點名，實際上已經等於點了名，大家都知道「筆桿子」指什麼，指誰！中央全會就那麼二百多人，汪的講話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難怪毛主席說華北組的簡報是反革命的簡報，把大家都煽動起來了。

4、汪東興開會前，就給吳法憲打電話，叫吳、李和我發言，還叫吳、李和我鼓動各自所在單位的中委發言，汪還強調說：「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是旗幟鮮明，明天就是隨大流了。」二十四日晚上，汪東興還親自給我和李作鵬打了電話，汪幾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動。

5、搶先出華北組簡報。

6、「風雲突變」以後，汪東興欺上瞞下，推卸責任，陷害別人，對陳伯達尤甚。

汪東興的表現真正是「汪東興一聲炮響，給全會送來了假毛澤東思想」。真正起到了轟動效應！也把大家害得很苦。憑良心說，廬山會議，汪東興、葉群關係最密切，在會上態度最積極，調子最高。吳、李和我及部隊的同志，如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調子也高，但與葉群、汪東興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沒搞清問題，上了汪東興的當，把事情搞

亂了。主席在處理廬山問題時，把吳、李和我裝進去，把汪東興拉出來，名義上把矛頭指向陳伯達，實際上指向林彪。結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東興給「漏」掉了，汪東興和葉群的關係也沒有搞清楚，葉群和林彪的關係也沒搞正確。

這裏也要指出，六號簡報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簡報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沒有給汪東興戴上，汪東興敢做不敢當，不但推卸責任，還陷害別人。關於六號簡報，毛主席也在幫汪東興喊捉賊。

我放出來以後，一九八九年到北京，我的一個知己來看我，他說聽吳旭君同志說：王良恩被逼死後，汪東興去給毛主席報告，汪離開時，主席指著汪的背影說：「這傢伙又到了人家一條人命！」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為什麼那樣積極，把我們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還是汪自己所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說，沒有「設國家主席」，沒有林彪堅持「天才」的觀點，沒有陳伯達搞的稱「天才」的「語錄」，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嗎！？

會議一結束，林彪就下山了。他對前來送行的黃吳李邱說：
「你們照常吃飯，照常睡覺。頂多做個彭德懷第二。」



第三十四章 「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

關於中央政治局生活會的方針問題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廬山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首先說：這次廬山發生的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處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說對廬山會議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人，要搞好讀書學習，應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總理接著說：我現在傳達主席的兩點指示：一、主席決定回北京之後，中央政治局舉行學習生活會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政治局本身首先要好好讀書學習，開好生活會，進行整風。二、要領導好全黨、全軍、全國的批修整風。

另外，周總理在會上還說，爲了工作的便利，主席已經決定張春橋主要在上海主持工作，有事即來北京；江青到上海休養一段。這句話好像是專門說給黃、吳、李、邱聽的，因爲主席在廬山幫了江青一夥，反了多數中央委員的「潮流」，扭轉了形勢，但人心未必服氣，江青又是個鋒芒畢露的人，主席這麼說主要是要她避避風頭。其實我們心裏明白，這項決定是辦不到的，江青是決不會到上海去閒居的。

對政治局生活會議，存在兩種不同的態度。江青一夥一直抵制召開中央政治局學習生活會，因爲他們並不滿足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去解決問題，他們不願意把套在林彪脖子上的「套索」拿下來，這根「套索」對江青一夥是無價之寶！由於康生「抱病」不出門，政治局生活會議一直開不成。這也是他們抵制會議的最好方法。如果江青一夥認爲會議對他們有利的話，即使康生有病，他也會「抱病」與會的！

這期間，黃、吳、李、邱對主席的指示都是豎著耳朵聽的。主席再三指出，廬山的問題不下山，叫我們「想通了再檢討」。其實主席在觀察我們，我們卻以爲主席是給我們吃「定心丸」，這是因我們政治上幼稚而

產生的幻想。老實說，對廬山的問題，我從沒有害怕過，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但又不能不怕。一是怕江青一夥象豬一樣不停地拱來拱去，不知什麼時候總會拱出事來；二是怕葉群這位「高明夫人」要小聰明惹事，因為無論出什麼樣的事，黃、吳、葉、李、邱都是綁在一起的，哪一個都很难逃脫。

軍委辦事組希望在政治局生活會上能夠徹底解決問題，讓江青一夥牽著鼻子走，實在難受！鑑於廬山會議的教訓，對準備開政治局生活會議，黃、吳、李、邱幾個人的思想，也是經多次研究才基本統一起來的。對會議採取什麼方針？我們四個人存在三種思想：黃永勝對主席感情很深，雖然他十分痛恨江青，但他對主席會偏袒江青認識不足，因而思想重視不夠，也比較急躁。他的基本思想是五個字：不理與反擊。黃永勝說：「對即將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議，不需要有什麼準備。先不理睬，必要時就反擊。好來好之，壞來壞之，沒有什麼可怕，我們和主席也是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呀。」吳法憲的思想是悲觀的，他說：「人家勝利了，並且得到了『上帝』保佑！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同李作鵬的思想是三個字：「自衛戰」。祇要過得去，我們就當「閉口道士」；要是他們欺人太甚就堅決反擊。

李作鵬對黃、吳的想法不滿，並使用了激烈的言詞，他說：「你們兩位組長，一個是左傾，一個是右傾，你們要把軍委辦事組引到哪裏去？」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前排右三黃永勝、右一邱會作。



李還一針見血地說：「她（指江青）和主席不是個人關係，主席搞文革，她是旗手，怎麼是個人關係？！我們的思想能統一就統一，不能統一就各打各的！」我也特別注意研究了鬥爭方針的問題，並向黃永勝提出了建議。

黃永勝聽了我和李作鵬的意見之後，思想震動很大。他感到對會議確實需要準備，毫無保留地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他說：我急躁是不對，吳法憲沒有出路的思想也不對。我們就以李、邱二人的意見為準，對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做準備。這樣，我們的思想基本上統一起來了。

但是政治局生活會一直沒有開成。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會見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前排右三邱會作。

吳法憲、葉群向毛主席寫檢討報告

在林總同江青的鬥爭中，汪東興一開始就是堅決站在林彪一邊的。如果說，林彪有什麼「集團」的話，汪東興就是那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汪東興的主要任務就是向葉群、黃永勝、吳法憲傳遞情況。正因此故，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主席變臉之後，汪東興就立即告葉群、吳法憲「暫時停止聯繫」。汪東興過去總以為毛和江是兩回事，這次廬山會議，在關鍵時刻，汪才看清毛和江其實是一回事。因此，他不再反江青了，更順從主席，聽從主席擺佈。當時他的主要做法，就是要從「林彪集團」裏逃出去。

廬山會議之後，大概在九月中旬，汪東興又向毛主席寫了一個檢討報告。他的報告很短，內容也很簡單，祇說了上了陳伯達的當，受了騙。主席對汪的檢討報告除批了「政治局傳閱」外，還授意總理和康生拿著汪的檢討到毛家灣給林彪看，並提議黃、吳、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寫檢討」。總理已經把話說開了：雖然主席說等你們想通了再寫檢討，實際上主席希望看到你們的檢討，這也是我們親自登門的目的。林總也祇能同意周、康的意見，並順手推給總理和康生跟我們幾個談。

周總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給我們幾個談話，總理說（大意）：汪東興做了兩次檢討，這很好。你們幾個應向主席、林副主席寫個檢討，副帥認為這樣很好，希望你們盡快拿出行動來。總理的談話是誠懇的，但黃永勝堅決不檢討，他認為他在廬山沒有發言，因而沒有犯錯誤。更重要的是黃認為江青、張春橋一夥會因我們檢討而幸災樂禍，為此更不能檢討。我和李心裏也不服氣，認為我們在廬山不是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在發言，而是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在發言，我們的調子並不算高，至少比汪東興、許世友等低多了，我們也沒有表示要寫檢討報告。李還說：「這不是檢討，是給別人送把柄。」總理和康生把我們的情況向主席匯報了，主席說：「這幾個人沒有想通，也不急於寫檢討，他們與陳伯達的問題性質不同。」聽到主席的話我們很高興（事後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們一無所悟，思想很麻痺大意。

但吳法憲在汪東興得到「解放」的啓示下，九月底也向毛主席寫了個檢討報告，這是他的權利，如果我們阻止他寫檢討報告的話傳到主席那裏，問題就了不得了。吳法憲寫檢討之前並未同大家商量過，寫好之後也沒有給大家看過就送上了去了。吳法憲的報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見批回來。他很著急，又去鼓動葉群給主席寫檢討報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吳法憲報告的作用。葉群回京參加國慶節，在天安門她找主席談話，因為與主席談話談得「很好」，以為寫了檢討就能過關，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寫了一個檢討報告。

葉群給毛主席的檢討報告，確實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十月十四、十五日，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的報告同時批下來了，毛主席對他們兩個人的檢討報告批得很嚴厲，劈頭蓋腦地打下來。例如，毛主席在吳法憲報告上的批語是：「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_{一块字被刪}整個中央

委員」，在葉群的報告上，毛主席批語是：「『九大』勝利了，當上了中央委員，尾巴翹到天上去了！」主席對兩個檢討報告的批示，同在廬山他說的「問題不下山」的精神完全不一樣了，嚴厲多了。

吳、葉的檢討報告，毛主席都批給政治局閱。江青他們看到了毛主席對吳、葉報告的批示，如同在廬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是一樣的高興，對他們起到了極大的鼓勵作用！張春橋在會上就叫服務員給他拿茅臺酒喝，十分囂張；姚文元也舉杯向江青說：「我們向江青同志祝賀，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最後勝利！」

從毛主席對吳、葉的檢討報告批示來看，實際上已經向江青、張春橋一邊倒了，開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團結，已經毫無意義了，因為毛主席支持他們的調子已經明朗化了。

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檢討報告的批示，尤其對葉群檢討報告的批示不給面子，實際上就是不給林彪面子，這對黃永勝震動很大，對黃、吳、李、邱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批示的內容，同在廬山下山時講的並不一樣，在解決問題的方向上並沒有減輕「份量」，而是加重「份量」。當時我們在政治上還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個批示，還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還沒有提到敵我問題。想起來當時我們也太天真了，毛主席連林彪都不想要了，我們還有什麼舉足輕重之處呢！

全軍批陳整風

廬山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對廬山會議怎樣傳達，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因為當時不知道主席是什麼打算，主席是按照自己的主意一步一步走，中央政治局也祇有跟著主席一步一步走，主席指示什麼，中央就貫徹什麼。軍委辦事組對軍隊怎樣傳達，同樣沒有發過文字的東西和做過佈置。當時我們想的與主席的打算是不合拍的。我們認為，如果說林彪在廬山的講話不適合，甚至講錯了，希望毛、林之間談一談，消除誤會就成了，當然還是「親密戰友」。至於我們，當然是維護林彪了，有事自己擔，不往上推。

主席則不然，主席內心已經不想要林彪了，因為林彪並不擁護文化大革命。從廬山下來以後，主席就精心搞他的「拋石頭，摻沙子，挖牆腳」，全力削弱林彪，然後看全黨的反應，再視情況處理林彪。九大才開

了一年多，就從「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到處理林彪，這是黨和國家的大事。我想，林彪心裏是明白的，總理也很快明白了。那時候，我們哪裏能想這麼深，祇覺得無所適從。

軍委辦事組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的問題上，也是不順利的。當時，黃永勝情緒很大，對傳達廬山會議精神時批判陳伯達也結合自己進行自我批評有抵觸，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錯。他說：「怎樣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雙方的（指江青一夥），祇叫我們做自我批評很困難！」

對傳達廬山會議的問題，蘭州軍區黨委，向軍委辦事組提出了傳達廬山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我們軍區對廬山會議，還沒有正式傳達。軍委辦事組是否發傳達提綱或發傳達指示？以便我們遵照執行。對這個問題，因為主席和政治局沒有定大的原則，總理從來沒有明確說過這個問題，軍委辦事組很無奈，軍委辦事組的回電是：「廬山會議的問題，由各大軍區自己傳達。」

在政治局會議上，姚文元把蘭州軍區的來電和軍委辦事組的復電都提出來了，姚說：「廬山會議幾個月了，軍委辦事組還沒有發出傳達指示，真是難於想像！」張春橋以諷刺的口氣對著吳法憲補了一句：「怕引火燒身吧？是不是，老吳！」吳法憲說：「不是。」

我立即脫口而出：「中央組織宣傳組不怕引火燒身，你們對傳達的問題講過一個字嗎？」對我的話，他們無法反駁，祇好兩眼一瞪一句話也不說了。

江青突然說：「在廬山，我們沒有參加陳伯達搞的突然襲擊。」

張春橋說：「陳伯達是政治騙子，也是小醜。這種人一見太陽就原形畢露了。」

此時，全場一點聲音也沒有，氣氛略有緊張，周總理不斷地喝茶沒有講話。軍委辦事組祇有黃、吳、邱三個人在會場。黃永勝情緒不好，不願意同江青一夥多費口舌，最難得的是吳法憲沒有說話。

我略為思考了一下，說了兩句話：「今天的會是廬山會議的繼續，還是政治局開會？要是廬山會議的繼續，我們就不發表意見了，因為這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如果今天再提廬山的問題就是同毛主席唱反調了。」

江青聽到我的話後，火冒三丈，她說：「就是你們擁護毛主席，我們不擁護？！你們參加長征，打過仗，擁護毛主席有特權？我們也不是吃乾

飯的。文化革命是誰革的？沒有文化革命的勝利，我今天還能在這裏開會？早就被劉、鄧關起來了。」

周總理看到氣氛越來越緊張，就以比較溫和的口氣說：「互相之間一些不同的看法，今天就不說了，待以後政治局進行生活會議再說。」總理說完之後，大家也就沒有繼續爭下去。事隔幾日，全黨批陳整風就正式開始了。

軍委辦事組提出了全軍以批判「天才」論為中心，進行批陳整風的學習運動，並向全軍發出了指示。

在指導全軍的學習運動中，我們提出了三點要求：政治氣氛一定要濃；結合實際一定要緊；在廣泛學習的基礎上，一定要出典型。軍委辦事組在全軍的威望是相當高的，號召力是相當大的。軍隊的學習運動很快就搞起來了，各軍區、各軍兵種、各大單位的報告相當多。儘管報告都是抄書抄報的居多，但從報告中可以看出，軍隊學習運動的聲勢是很大的。雖然毛主席對吳、葉檢討的嚴厲批示，給我們又是一次打擊，但我們還經得起。毛主席說我們不批陳，就批吧；毛主席說我們不懂馬列，那就學習馬列吧。

關於軍隊的學習運動，軍委辦事組向毛主席寫過兩次報告，並附了典型材料。毛主席讚揚了軍隊的學習運動，並表揚軍委辦事組開始抓住了大問題。軍委辦事組決定舉辦全軍宣傳處長參加的馬列學習班，學習馬列的六本書。辦事組對學習抓得很緊，黃永勝的兩個兒子都參加了學習，我的大兒子也參加了學習。我也很注重這次學習，叫秘書把講課的內容錄了音，每天後半夜散會回來都要聽一段，有時間就看看書。

我在總後黨委和國防工辦聯合的黨委擴大會上傳達，採取了說「真話」和說「假話」相結合的辦法。主要是把陳伯達的政治騙子和自己上當受騙結合在一起說的。陳伯達騙人則放開說，自己怎樣上當受騙說得很輕，且祇說自己的事不涉及別人，這樣也就有了一定內容的自我批評。

周總理問：「你的傳達寫成了稿子嗎？」

我回答說：「記錄稿，我已經送給您一份呀。」

周總理從皮包裏取出了我的「記錄稿」，很快就看完。總理看文件的習慣是愛用紅筆邊看邊劃上槓槓，對我講話的「記錄稿」也是這樣的。

周總理問：「你的稿子上報中央了嗎？」

我回答說：「請總理過目後，再正式上報。」

周總理說：「大家對陳伯達都不瞭解，批判是比較困難的，但祇要多研究，還是可說出一些道理來的。你的稿子不錯，比周興（雲南省委書記）的無論在內容或思想性方面都好多了。你看過周興的稿子嗎？」

我回答說：「看過。」

周總理說：「中央要轉發周興的稿子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提醒我一下，看一下你的稿子？」

我回答說：「我不願給總理添麻煩。」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間，毛主席找黃永勝去談過一次軍隊的學習問題。黃永勝向毛主席報告說：「軍隊批陳整風的學習運動確實搞起來了，現在我們正在總結經驗，把學習運動提高一步。」

毛主席說：「從現在來說，軍隊的學習成績是好的。但成績總是相對的。主席說成績是相對的，主要指我們沒有檢討在廬山的錯誤，主席處理問題是要先把你握在手上再處理解決，我們沒寫檢討主席是抓住不放的。」

毛澤東「甩石頭」（三十八軍的報告）

軍委辦事組對中央的部署是緊跟的，但主席心裏還是不滿意，因為我們沒有給他寫檢討。我們沒寫檢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在檢討中，要涉及到汪東興主席不願聽，因為主席已經放過了汪；要揭發陳伯達和涉及到葉群，又勢必牽連到林彪，這是我們不會幹的。主席耐不住了，用三十八軍揭批陳伯達的報告作為石頭甩過來，想震醒我們。

三十八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之一。該支部隊及其前身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時期都有很多戰功。在抗美援朝時期，彭德懷曾稱該軍為萬歲軍。三十八軍是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從東北調到華北來的，是經林總提議，毛主席批准的，把三十八軍調駐保定，也符合當時要在中原地區集中相當數量的戰略預備隊的安排，並負有直接保衛首都的任務。

在文化革命初，三十八軍在支左問題上與瀋陽軍區有矛盾。林總很重視這個問題，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同志是四方面軍的幹部，三十八軍是林總的老部隊，關係處理不好有林支持之嫌。但三十八軍進駐保定

之後，他們又一頭栽進了派性之中，原來河北省軍區和當地駐軍六十九軍對群眾組織的觀點是一致的，三十八軍來了以後，和河北省軍區有矛盾，楊成武時期就給三十八軍做工作，但幾乎沒有效果，這給河北，甚至華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增加了極大的麻煩。該軍同北京軍區、河北省軍區處於對立狀態；對北京軍區、河北省領導機關和軍委辦事組的指示執行不力，他們存在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爲了糾正三十八軍的派性，六七年下半年陳伯達巡視河北時，對該軍有誇獎有批評，但無效果；軍委辦事組曾派任過該軍軍長的劉賢權去專門解決支左的問題，也毫無效果。軍委辦事組召集該軍的黨委到北京開過數次會議，請他們的老軍長李天佑做工作都沒有解決問題。總之，三十八軍的派性是根深蒂固的，在軍委辦事組倒臺之前沒能根本解決問題。

廬山會議之後，主席看到三十八軍對批判陳伯達和搞掉北京軍區都有很大作用，於是，秘密把三十八軍的領導叫到北京，由江青親自組織三十八軍寫報告，江青說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三十八軍的人特別賣力氣。報告寫好以後，毛主席又以三十八軍主動寫報告的形式，對報告做了批示，作爲石頭向軍委辦事組打了過來。毛主席和江青的這些做法，我們看在眼裏，對主席的做法感到震驚，疑惑。但那時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對江青、張春橋之流更加痛恨。

三十八軍向中央寫了長篇報告，對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的所謂「派性」進行了大量揭發。報告寫得有聲有色，陳伯達在北京軍區吃過幾次飯都有統計。爲了批判陳伯達的需要，毛主席批發了報告，並定爲全黨、全軍的學習材料。他們的報告對華北會議和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下臺起了重要作用。

周總理向軍委辦事組傳達了毛主席要「全軍學習三十八軍」的指示。總理說：「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說一下，軍委辦事組和全軍都要好好學習三十八軍的報告，辦事組要首先學好，在全軍做模範。毛主席說，軍委辦事組的幾位不砸爛枷鎖就不能解放自己。軍委辦事組的人，同陳伯達是不一樣的，他們是認識問題。」主席說的「枷鎖」是什麼？就是林彪。但是在廬山會議之前和廬山會議之中，林彪從來就沒有讓我們「堅持設國

家主席」，也沒有讓我們「堅持天才的觀點」。我們是很難的。主席也是在其後的南巡中才點了林彪的名，而且還不讓我們知道。

三十八軍的報告就其立場觀點來，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對這一點，我們心裏很明確。學習三十八軍的報告又不能支持他們的派性情緒，但陳伯達也要狠批，這是一個矛盾。總理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在二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總理說：「下邊一些地區和部隊領導人的驕傲自滿和對一派群眾的歧視可能還有所滋長，這要不斷提醒他們；而其他地方，特別是內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覆會大些，已要北京軍區注意這一情況。」

軍委辦事組在學習三十八軍報告的問題上，提出了兩個學習重點：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騙子，對這個問題大家同李德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李德生說：「批判陳伯達的派性應當是學習重點，陳伯達是支一派，壓一派的典型。」意即陳伯達壓制了造反派。

我說：「我是堅決反對李的觀點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陳伯達主要是政治騙子問題。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觀點帶到軍委辦事組來。」

李德生說：「難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後臺了？」

我說：「對不起！不僅我是革命派的後臺，軍隊的高級幹部中，除了極個別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這點難道你還不清楚嗎？」

黃永勝看到我們的爭論很激烈，就說：「軍隊是決不允許造反派存在的，這一點不能含糊。批判的內容還是對準陳伯達和『上當受騙』的問題。如果超出這個界線就要把葉群也拉到裏面來的，要漏底。這樣就引起問題的複雜化。」

李作鵬說：「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別人總以為我們有見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兩位（指李德生、劉賢權）也不會相信我們是清白無辜吧？」

我說：「我同意老李的意見。我還主張應當『翻箱倒櫃』讓大家看個清楚。比如說，我是反對造反派的，反對某些人（指江青、張春橋）支持造反派整我的。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於在廬山葉群說的那些話，也要漏底，否則別人真會懷疑我們搞了『炸平廬山』的什麼事。現在，大家都還活着，這個底必須漏，而且要漏的連一點渣子也不留。」

黃永勝說：「請李德生、劉賢權也向我們提些意見，揭發更好。」他們兩個人搖頭說：「沒有什麼意見。」李德生還補了一句：「你們的職務、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們的。」

李作鵬說：「你們不要搞臺上握手，臺下踢腳。」

黃永勝最後說了兩句話：「要有自我批評，要說自己的問題。」

毛主席「挖牆腳」（華北會議）

華北會議是廬山會議之後的第一次重要會議，毛主席稱之為「挖牆腳」。會議表面上是解決廬山問題的主要當事人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是對著林彪的。其實，北京軍區並不是林總的「地盤」，他也從沒有「安插」過幹部。主席開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主要是為了北京的「安全」，也就是為了他自己的「安全」。這個「安全」是高過一切的，為此李雪峰、鄭維山和不少幹部受到了冤枉。

為了搞陳伯達，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旬，中央下發《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和毛主席批陳伯達的《我的一點意見》。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對批判陳伯達的指示。其內容大致是：對廬山發生的問題，現在看的更清楚了，是陳伯達興風作浪搗的鬼。他不僅是一個政治騙子，在歷史上也還有不清楚的問題。陳伯達的問題講清楚，這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後，政治局會議的會場上，立即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情緒。軍委辦事組幾個人一句話不說；張春橋祇說了一句話：遵照主席的指示辦。這時江青來勁了，她說：「以牙還牙，過去他們怎樣整我的，我就怎麼還擊，我是不管他姓什麼。一，陳伯達的老底我是清楚的；二，陳伯達在廬山那樣的表現是仗勢欺人，他自己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要批判陳伯達的幕後人和驕夫。」江青的話很顯然是指批判林總和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等人。

周總理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他立即帶有情緒的口吻說：「我們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辦事。」黃永勝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態說：「我們擁護毛主席批判陳伯達的指示，我們的一切行動都以毛主席的指示為準則。」他說話的音量相當大，也略有點神氣。

周總理看到會議難以繼續開下去，於是就採取老辦法：「今天的會到此為止。」一邊說一邊起身就走了。

過了兩天，周總理又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說：「主席指示，要召開華北地區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會議。」這就是華北會議的由來。

華北會議表面上是解決陳伯達對華北的影響，實際上是爲了奪北京軍區的權。人們都稱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是華北三巨頭，主席對他們不信任不放心了，換上主席信任的謝富治、李德生、紀登奎去掌管北京軍區。李雪峰、鄭維山他們，經過華北會議之後都下臺了。

廬山會議以後，北京軍區決定召開黨委擴大會，因不少軍隊幹部支左後在地方任職，因此會議定爲華北會議，參加的範圍是華北地區三省兩市（河北、山西、內蒙、北京、天津）地方地（市）委書記，軍隊師級以上黨委負責人，約四百多人，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主席對召開華北會議的批示是「建議李德生、紀登奎二同志參加會議。」這是開始公開重用李德生、紀登奎的決定。可能主席又覺不妥，批示「永勝、作鵬應同德生、登奎一道參加華北會議。」會議從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到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結束。

會議對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都進行了充分的揭發。所揭發的問題也無非是文化革命中出現的那些問題。整個揭發的材料，與三十八軍的報告中的內容差不多，並無多少新的問題。要揭發的問題也不能實事求是，如廬山會議華北組六號簡報的問題，明明是汪東興的責任，一幫人卻喊捉賊地追李雪峰和他的秘書。

對李雪峰、鄭維山的下臺，黃永勝、李作鵬同李德生、紀登奎持不同態度。前二者認爲會議沒有揭發出李雪峰、鄭維山和陳伯達有什麼非組織活動，錯誤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上的一般錯誤，因此他們主張批判不作人事變動；後二者則主張堅決搬掉，否則華北問題難於解決。李德生、紀登奎這麼大的決心其實也並非他們自己的意見。

劉子厚是揭發李雪峰最得力的人物，華北會議之後，李雪峰被撤銷職務，劉子厚即代替他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鄭維山也被撤銷職務，李德生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爲第一政委，紀登奎爲第二政委。

華北會議結束的時候，周恩來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做了總結，並宣佈了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毛主席稱讚華北會議開得好，解決了主

要問題。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華北會議，江青在會議上表現得非常不像話，動輒訓人，甚至罵人。揭發的問題也無非是一些是非非的問題，甚至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樣的問題也要撤銷職務，是不妥的。現在看來，華北會議不能說開得好。當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軍區和北京地區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鄭維山就不重要了。

毛主席一直掌握著華北會議。在華北會議期間，毛主席找黃永勝、李作鵬、李德生、紀登奎匯報過數次，毛主席每次都有指示。對毛主席的指示，黃永勝都在辦事組傳達了，我現在還能回憶起來的大意有如下幾點：

關於領導方法問題。毛主席說，領導幹部的工作方法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調查研究。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就祇有進行調查研究了。學會調查研究，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走出去；二是腦子能起「加工廠」的作用。比如，你們幾個人參加了華北會議，這本身就是調查研究。你們的皮包裏可能裝滿了材料，有無用處呢就看你們的腦子這個加工廠的作用了。

你們搞軍隊工作的幹部，除林彪同志等少數人抓大問題之外，其餘的人都不善於抓大問題。我看你黃永勝這個總參謀長就不善於抓大問題。

在過去戰爭年代，差不多都由我自己當總參謀長。整個解放戰爭，我就是總參謀長，總理就是總後勤部長。中央軍委除了情報、通信、機要等專業工作人員之外，機關工作人員很少。幾年的解放戰爭就是這樣打下來的。在戰爭時期，我瞭解軍隊，現在當然就如過去瞭解了。

關於團結多數人的問題。毛主席說，我們的原則是團結的人數越多越好，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好。

毛主席講到這裏一時沒有說話，然後不知為什麼突然說：「你們的政治，又多又兇，在廬山海陸空軍都出來了，搞突然襲擊。你黃永勝雖然沒參加前期會議，但你的責任是跑不了的。你是軍隊的頭子。」

毛主席這番話，把黃永勝打得昏頭轉向，一時不知所措。接著毛主席又補了一句：「當然，廬山發生的問題，還是思想認識問題。」這樣，才又把談話的氣氛轉過來了。主席又說，宗派這個問題，難於完全搞掉。比如說，我同你黃永勝熟悉，從井岡山到現在幾十年了。總不能否認我從井岡山就認識你，總不能說我們從井岡山認識就是宗派嘛！有缺字據下文補我們要是

搞宗派主義就錯了。鄭維山祇喜歡華北的幹部，對外來部隊另眼看待，這就不對了，不注意就會成爲宗派主義，這就危險了。

關於批陳整風問題。毛主席說：批陳整風是我們當前的主要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九大路線就實現不了。

毛主席最後對著李德生說：軍委辦事組幾個人（黃、是、李、邱），他們有思想問題。你是總政治部主任，要多給他們做思想工作，提高他們的思想、路線覺悟。這樣軍隊的工作是會有希望的。

李德生說：他們現在的思想覺悟都提高了。我們互相學習。

此外，毛主席還說了批判「天才」論的問題，軍委辦事組要「摻沙子」的問題。四月初，紀登奎、張才千參加了軍委辦事組。主席後來還說李先念要參加軍委辦事組。

軍委座談會

毛主席對三十八軍批示沒幾天，華北會議就召開了。這樣，軍委座談會也倉促上陣了。

廬山會議之後，軍隊要召開一次適當的會議來解決廬山發生的問題，是勢在必行的。但在一個什麼時機開會就大有「學問」了。我認爲廬山的問題主席有了基本調子後再開爲好，現在開等於白開。因爲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出現了信任危機。

對廬山會議的問題，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之前，我始終是兩筆賬的。就我個人來說，我有什麼問題，自己是最清楚不過的：「提起千斤重，放下無四兩」，但就整個的問題來說，我始終是心情沉重的。因爲廬山的問題，是不能簡單了事的。這是爲什麼？是由下列三個問題決定的。

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是軍隊反江青一夥的鬥爭，由於林總不點名的批了張春橋，問題就不一般了。對廬山問題的處理，關鍵是毛主席對林總的態度。在當時的條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樣說一句話的問題，林總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裏提著的，這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毛主席在陳伯達身上開刀，是沒有辦法的最好辦法。這樣可以一舉兩得：保護林彪；滿足江青一夥的需要。還有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殺雞給

「猴看」。如果江青一夥再搞點風浪，我們幾個人就可能同陳伯達同罪論處了，至少吳法憲可能是這樣的，對這一點，我的估計總是比較壞的。

對主席解決廬山問題的打算，黃、吳、李、邱是非常關心的，因為這是關係到我們的政治命運的問題。但我們經常在一起談論的是，如問題昇級到涉及林總，就是黨內的大局問題，也涉及到九大路線問題。

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結局，可不可能出現？

我對廬山問題的前途是兩點論，既要看到當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壞的方向變化。（一）廬山的問題，可能隨批陳整風結束而結束，我想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夥興風作浪之下，對我們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對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李雪峰不是廬山問題主要當事人，現在不是也下臺了，但他與林彪沒有什麼關係。

我是堅決反對倉促開會的，我曾對黃永勝直言不諱地說：「軍委座談會要開失敗了，就會出現嚴重的後果，我們會錯上加錯，他們（江青一夥）會喜上加喜，這一錯一喜加在一塊，就有埋葬我們的可能。」我認為如果隨便召開一次影響全軍的高幹會，就有一招不慎，全盤皆輸的危險。對廬山會議的問題，主席那裏沒有相對明朗的態度之前，召開全軍高幹會是不適當的。現在繼續抓緊全軍的批陳整風比什麼都好。要是軍委辦事組能夠在全軍批陳整風學習的基礎上，加上軍委辦事組向毛主席寫出一個有份量的檢討，大家都有做「汪東興」（解脫）的可能。

我們幾個人（黃、吳、李、邱）都是廬山問題的當事人，毛主席現在究竟信任我們，還是不信任？這是我們自己不能回答的問題。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軍高幹會能行嗎？說話能有人聽嗎？

黃、吳基本上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們說：「你對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對可能發生變化的問題估計得太多了。這樣也未必能正確處理問題。」由於軍委辦事組多數人都同意召開軍委座談會，開會的問題就定下來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至二月十四日，軍委座談會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為：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各大軍區的首長和業務部門負責人，近一百五十人參加。軍委辦事組討論決定會議的任務是「批陳整風」。

佈置七一年度工作」。但會議一開始主席就決定參加軍委座談會的人全部參加華北會議。

軍委座談會開幕的前一天，軍委辦事組召集各組負責人討論黃永勝在開幕會上講什麼話的問題，又是一場爭論。

我說：「黃總長明天說什麼好辦，關鍵是會議怎麼開，我看這是大問題。我主張，在廬山會議犯了錯誤的人，要首先做檢討，我的理由如下：

一、軍委座談會，提出了批陳整風的方針。我們批評陳伯達就是包

含進行自我批評，我們沒有自我批評就不算批判陳伯達。其實，我們和陳伯達什麼『關係』也沒有，我們和陳伯達祇是非議過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犯過自由主義，為此江青不滿，毛主席也不滿。現在是毛主席把我們算成陳伯達『一夥』了，在這種情況下，祇有自我批評才能同陳伯達劃清界線，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會議對我們的批評能否搞起來，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們的自我批評了。祇要我們有自我批評，到會的人自然就會對我們進行批評了。

祇要出現了這種局面，批判陳伯達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這次軍委座談會開的成功或失敗，唯一的標準就是我們要以陳伯達為對象，有自我批評，從而引起到會的人對我們幾個人的批評。對我們進行批評甚至過火的批評，會議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會的人對我們沒有批評，會議就失敗了。」

我的意見講了後，大家對我的意見提出反對的意見，但也沒有什麼熱勁。有人說：「廬山的問題，大家看得見的，是沒有什麼好說的。」對我的這種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們說：「什麼看得見看不見？對軍委辦事組採取懷疑態度，是毫無根據的。」這些說法，對會議進行和開展批評都起了很大障礙。在會上不少人給軍委辦事組評功擺好，就是有點批判，在批評的話之後，又補充一些好話。比如洗恆漢在會上說：「軍委辦事組威信高，軍委辦事組犯了錯誤，但我們對軍委辦事組還是完全信任的。」事實上，廬山會議之後，對軍委辦事組同中央文革的鬥爭，有不少人對主席的態度內心持有不同看法。總之，大家就是這麼一種情緒，在這種情緒下，怎麼能按照毛主席的心願開好軍委座談會呢？

黃永勝對我的意見，則用另一種說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說：「我們幾個人做檢討是大局，需要請示報告。」我對黃的話是明白的，他說的

「大局」就是指林總反對江青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是同意黃的觀點的，不應該把林總同江青的矛盾擺到毛主席面前去，這樣反而把問題複雜化了。黃還說：「自我批評祇能說自己，不能涉及別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過了幾天，黃永勝召開了小組長聯席會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黃說：「關於我們做檢討問題，我請汪東興向毛主席請示了。主席指示說：『在這樣的會議上，不要做檢討。』黃說了後面這五個字之後，還稍停了一下，並且略有點「神氣」。我對黃的性格是熟悉的，對他也是很相信的，他是絕不會假傳「聖旨」的。但我又很難信服，我當時如同在頭上澆了一盆涼水，對「不要做檢討」的問題，我感覺這不是毛主席的真心話。我雖不敢再說話了，但想法依然如故。

在會議進行到中期的時候，黃永勝又召集小組長聯席會議，傳達毛主席指示。黃說：「毛主席指示說：『整風還可以，但批陳不夠。』」接著黃提出，會議從明天起，專門用兩天批陳，軍委辦公廳要把簡報辦好。針對黃的傳達和提出的措施，我發表了一點意見。我說：「完全同意增加批陳的時間，但在批陳的同時，軍委辦事組不做檢討，能夠叫做批陳嗎？」我說出這句話後，大家都瞪著我。發言後，我自己很後悔，但又覺得自己的話是應該說的。

以後的兩三天會議中，對批陳確實「搞起來了」。儘管簡報內容都是大同小異的，可是簡報的數量確實如同雪片一樣的滿天飛。有的人一天發三次言，就上三次簡報。我在一個小組會上發表了簡單的自我批評。我向小組長洗恆漢首先提出：「你們應當像三十八軍批判陳伯達那樣，批判軍委辦事組犯了錯誤的同志，這才是真正批判陳伯達。陳伯達是政治騙子，但我們在不少問題不是受騙，而是同流。陳伯達是大騙子，我們起碼當了小騙子。例如，陳伯達搞的『天才』論的『語錄』，我在西北小組就全部宣讀了。為了保護陳伯達大騙子，我還聲明『語錄』是自己查書搞出來的，這不就是小騙子嘛。再如，廬山會議開始頭兩天，有人說林總的講話是對陸定一式人物不點名的點名，對這些話，我又去對別人講，讓他們也這樣說。」我的發言雖然很簡單，但受到了小組熱烈的歡迎。

我的發言也登在簡報上了。周總理看到之後很高興，並且把那份簡報留在自己的皮包裏。後來，總理同軍委辦事組談話時，還談到我的發言的問題。黃永勝看到我的發言，祇獎給了我一個「先進分子」的稱號。

加強了對陳伯達的批判之後，黃、吳認為太平無事了。軍委座談會二月十五日就結束了。會後，黃永勝還是不肯檢討，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廬山沒有發言，因此沒有錯誤。公道地說黃永勝說得對，但主席那裏不這麼認為。總理叫我給他做工作，我也沒有做通。我向總理匯報時總理就把問題的實質給點穿了，總理對我說：「什麼會上沒有發言，發言不發言，在主席那裏都是一樣的，主席要打你們的宗派主義！」我一字一句地把總理的話傳達給黃永勝，黃永勝說：「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們檢討吧。我不檢討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檢討，把你們憋得夠嗆吧？」接著黃又說：「我們不是宗派主義，他們才是宗派主義呢！」看來黃永勝還是沒有想通。不過，這時黃永勝肯寫檢討了，我和李作鵬也前後寫了檢討。

江青一夥的威風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總理有關計劃會議的報告上批示：「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這個批示象晴天霹靂一樣，把軍委辦事組多數人的腦袋都打昏了。寫下這樣的批示，究竟爲了什麼？當時我是不清楚也不理解的。毛主席說的和做的不一樣，而且經常變。

黃永勝在會上唸了唐朝詩人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然後一個勁地埋怨軍委辦公廳沒有把簡報辦好，其實他心裏是著急的。我用較溫和的語氣說了一句：「不是這樣的問題。簡報也許沒有辦好，但問題不在那裏。」黃永勝急得嘴唇也抖動了，他說：「你說問題在哪裏？」

我說：「散會再說。」

散會後，我到了黃的房子裏，黃很沮喪地坐在沙發裏。我說：「我來犯點自由主義。我們的會開了這麼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陳伯達的材料批判陳伯達，我們自己沒有新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沒有揭發陳伯達，也沒有檢討自己。主席是天天看簡報的。我想在主席看來，軍委辦事組是否批判了陳伯達，唯一的標準是我們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評。我們犯了錯誤的人不進行自我批評就是不批判陳伯達，我們的座談會，是開了一個大失敗的會。」黃說：「軍委座談會，主席有幾次指示都還不錯嘛。」我說：「那是你老兄的理解。」

主席的批示對大家震動很大，我們給主席寫檢討，不但勢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二月二十日，我們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向主席寫了檢討報告。毛主席當天就做了批示：「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

毛主席在批示中，強調讓我們作檢討，又表示讓我們過關，毛主席還批道：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各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由黃、吳、葉、李、邱作檢討，讓他們下臺過關。並將此情況告訴林彪同志。」

我們當時的思想是：有抵觸情緒又認真作檢討；想不通又對毛主席感激萬分。

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不批陳」的批評，是廬山會議以後最嚴厲的批評。這一批評對軍委辦事組極為不利，對江青一夥是非常有利的。毛主席的批示使江青一夥對廬山會議問題的態度有了新的發言權，也有了一定的操縱權。江青一夥的鬥爭方針是力爭把廬山會議的問題重新提出來，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在政治局會議上，對全國計劃會議的問題沒有提幾個字，主要是對黃、吳、李、邱的批鬥。從後來主席南巡的談話完全可以看出，原定的「開政治局生活會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問題」的方針原來就是一個泡影，而廬山會議以後再把「廬山會議的問題重新提出來」，則是勢在必行的，可我們一點認識也沒有。

當時軍委座談會已經結束，大多數的人還沒有走，參加了「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國計劃會議。經我們商量後，軍委辦公廳又通知各地軍隊領導幹部來開會，因為我們對主席的批示要做檢討，沒有人聽也不行呀。軍委辦事組成員，按排名順序做了「檢討」。我們幾個說的大意是：陳伯達是個政治騙子。我們上當受騙了。現在我們也還沒有認識到他對我們的危害性，因而在軍委座談會上沒有做自我批評。主席對軍委辦事組的批評完全正確，完全擁護。會後黃又報告總理，請總理安排我們幾個人在一定的範圍作檢討。總理考慮後說：「就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檢討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開的「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國計劃會議，於一九七一年二月間在人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周總理主持，總之，要給軍

委辦事組一個下馬威。總理在會上說：「在廬山會議時，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國經濟計劃會議在結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到會共同對國民經濟計劃『拍板定案』。今天的會議，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辦的。這是今晚第一個內容。今晚的會議，同時還要傳達毛主席對批判陳伯達問題的指示，這是今晚會議的第二個內容。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有批評的批示。我看現在請黃永勝同志先發言。」

黃永勝事先有準備，他代表軍委辦事組首先發言。他的發言是經過軍委辦事組討論的。由於黃、吳、李、邱，尤其是黃對毛主席的批評，是口服心不服的。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要寫好一個高質量的稿子是有困難的。因此之故，黃永勝的發言不管好壞都會成為上海幫批判的靶子。在黃永勝發言之後，以江青一夥為主對黃、吳、李、邱進行了猛烈攻擊。總之，要給軍委辦事組一個下馬威。要是意志軟弱一點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是會被嚇倒的。

張春橋發言說：「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當他知道了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的批評後，表示非常關心。他要我為他帶三句話到今晚會議上來。這三句話是：軍委辦事組不批判陳伯達，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諒；陳伯達同軍隊究竟是什麼關係一定要搞清楚；對軍隊往何處去不能等閒視之。」張春橋接著說：「我認為軍委辦事組不批判陳伯達，不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問題。為什麼對陳伯達連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對你的批評，我看就是向你們提出了希望。你們同陳伯達不一樣，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們自己不要硬往陳伯達那裏鑽你們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要陳伯達那個政治騙子？這是你們必須抉擇的問題。」

廬山會議之後，江青一夥選了幾個當選了中央委員的「文藝戰士」經常參加黨的高級會議。今天他們帶進會場的打手是於會詠、劉慶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們三人聯合發言：「一、軍隊少數人把陳伯達當成國寶，不批評，我們表示憤怒；二，軍隊少數人，同陳伯達究竟是什麼關係？你們在廬山搞的什麼名堂？應當無保留地交代清楚；三，軍隊是保衛毛主席的，還是保衛陳伯達的？對這個問題，軍隊幾個掌握大權的人一定要表明態度，否則我們是睡不著覺的。」

接著，列席會議的毛遠新發言，他說：「軍隊幾個人為什麼不批判陳伯達，可能是不傷同類吧！現在來看廬山的問題就更清楚不過了。廬山沒

有被炸平，是陳伯達動手太早了，你們內部也協調不好。廬山問題的質質是未遂的政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們把劉、鄧司令部打垮了。那麼，出現另外一個司令部怎麼辦？我們的回答是：像對待劉、鄧司令部一樣的老辦法！我勸你們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於一切的。」

毛遠新的發言，影響是很大的。他似乎等於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認為毛遠新的重頭話是不敢亂說的。

再下來是列席會議的馬天水的發言。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黃永勝即席做了很簡短的發言。從總理的眼神看有些吃驚和擔心，我真是手心裏捏出汗來，黃說：「今天的會議活像造反派的鬥爭會，連說話的語言都是造反派慣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掛牌子了。現在，我要問的倒是：毛主席說的話算數還是你們說的算數？我是堅定不移的擁護毛主席的，有錯誤我們會誠懇向毛主席檢討。所以任何人企圖打著毛主席的牌子來嚇唬人，對我都是無效的。」關鍵時刻黃永勝還真扛得住。

最後，周總理說了幾句話，他說：「毛主席原定對廬山會議問題處理的方針、政策都沒有變，也不能有任何改變。我們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話，即最高指示為準。」

軍委辦事組整風

在「拍板定案」的小型計劃會議上，黃、吳、李、邱受到了廬山會議以後最為嚴重的打擊。在會後清晨四時回到京西賓館，我們幾個人議論了兩個問題：一是，將情況向林總匯報（葉群未參加會）；二是，我們無論如何，要從被動爭取主動。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我發表意見說，應當向林總匯報，但決不能請示解決辦法。因為，當前即使請林總出來講話，對問題的解決不僅無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提議請周總理同我們談次話，主要是接受總理對我們的批評。這個提議，大家同意了。對第二個問題，我們商定，軍委辦事組一面進行整風學習，同時要盡快向毛主席寫檢討。另外，還是要樹立鬥爭的信心，不鬥是永遠受欺負的。我們的信心和爭取主動是一回事，祇要爭取到了主動，信心就來了。我們爭取主動的唯一辦法就是「自我批評」。祇要有比較好的自我批評，並獲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們就主

動了，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上海幫越橫行，對我們越有利。經過討論之後，大家的精神狀態比較好了。

軍委辦事組整風會議，開得是比較成功的。在會上以自我批評為主，也有批評。大家對吳法憲提出了不少意見。對黃永勝主要批評他「對廬山問題，以局外人處之，領導和處理問題，很不得力。」對我和李作鵬也若干批評。

李德生的發言還是比較好的，一是說對廬山的問題沒有信心不對；二是說對原中央文革的領導人，有不尊重的態度是不應該的。

黃永勝根據大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講了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同陳伯達的關係問題。陳伯達是什麼問題，有待中央對他的結論，可以肯定我們同陳伯達沒有反黨、反毛主席的關係，但我們同陳伯達又有一些關係，即對一些人犯自由主義的關係。至於說我們同陳伯達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擁護「天才」論，陳伯達是黨內的理論家，我們對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們同陳伯達不是怕不怕受牽連的問題，而是早就牽連進去了。雖然我們的交往並不多，但我們相互之間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廬山會議開始的當天晚上，陳、吳、李、邱一起就在吳的房子裏，長時期談論過張春橋的問題、中央文革的問題和上海的文化革命問題。開幕式散會後，葉群談的「陸定一式人物」的問題，陳伯達也是在一起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第三，我們怎樣同陳伯達劃清界線的問題。我們同陳伯達劃清界線的唯一方法，就是揭發陳伯達的問題和進行自我檢討。這兩者是統一的。只有徹底的揭發，深刻的自我批評，界線才能劃得清楚。

這是廬山會議之後，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比較有思想水平的一次講話。記錄稿很快整理出來，並立即送給周總理了。總理看到記錄之後，很高興。

在我們整風的基礎之上，周總理同軍委辦事組（包括李、劉）談了一次話。

總理首先說：「我看到永勝同志發言的記錄稿，這是一篇很好的講話，在這個記錄稿的基礎上，可以寫一篇較好的檢討報告。你們應立即

向毛主席寫個報告。」接著總理談了兩個問題。一是，毛主席對我們幾個
人的態度問題；二是，自我批評問題。

總理說：「毛主席對你們仍然是很關心的。我剛才就是從主席那裏
來。主席交代我說，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精神狀態比較好了，這就很好。
你告訴他們，要犯得起錯誤，要做得起檢討。有了這兩條，你們還有
什麼顧慮？」

總理說：「你們的問題，當然不僅同陳伯達有關，同政治局其他人（指
汪東興）也有關。這就是問題的複雜性和處理的難度。」

總理接著說：「大家對自己的問題要心中有數，有信心。自我批評
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毛主席最恨結伙整人。對你們整人是如此，別人整
你們也是如此。不過現在關鍵的問題就是你們要有自我批評，自己解決
自己的問題。要沒有這條，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們應當看到，主席
對你們抓得很緊，你們應當從正確的方面來理解主席的精神。」但事實證
明，不抬出林彪，主席是不會罷手的。

根據周總理的談話精神，我們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是由
我同李作鵬起草，辦事組集體審查、修改，再經總理審查修改之後上報
的。緊接著，我們幾個就向主席寫了檢討報告。

我們的檢討報告

對於要我們幾個人寫檢討報告的問題，在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提出
了三點要求：「一要旗幟鮮明。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邊同陳伯達作鬥爭；
二要觀點和材料統一；三要有自我批評。你們一定要掌握住寫檢討報告的
精神，沒有自我批評是寫不出檢討報告的。」

江青在會場上，表現得特別「和藹」。她首先說：「毛主席的話，我早
就向你們傳達過，你們同陳伯達的關係，沒有什麼包袱可背的，放下包
袱才能寫好。毛主席瞭解你們。」她還說：「寫檢討主要是注意思想性，那
些囉嗦的事，多一件少一件關係都不大。」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黃永勝召集吳、李、邱開了數次會議，從
談思想開始，到要自我批評和互相幫助都說到了。黃永勝說了不少話，
但中心是說：「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和統一口徑」三個統一。對三個統一
的前兩個，大家沒有多少意見，對統一口徑意見就不一致了。黃、吳、

李、邱幾個人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是廬山會議以來辦事組第一次這樣激烈的爭論。

李作鵬說：「統一口徑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黃永勝說：「祇說自己，不涉及別人。」

李作鵬說：「不涉及別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寫報告。我們的事是從你們正、副組長那裏來的。」

吳法憲說：「過去，我同你說的事，也沒有聽你說過什麼不同意的話。」

李作鵬說：「要是你都同我們說，也許不會有今天的事。憲法小組爭論的問題，我在場你也沒有同我說過一句話，就向各方報告了。難道你做得對嗎？」

黃永勝說：「我說的不涉及別人的意思，你們會理解的。除了林總這個大局之外，其餘的人無論怎麼說都可以。」

我說：「我同意黃總長的意見，我們一定要顧全林總這個大局。除此之外，自己負責。因為這是個人的檢討，個人可以盡情寫自己要寫的事。」

我說了話之後，黃永勝怕吵起來，就說：「今天不談了。」

過了幾天，大家又在一塊談。這次主要是談吳法憲新寫的檢討稿。他自己向大家讀了一遍，然後黃讓我們發言。

我說：「稿子寫得很『文氣』。」

李作鵬很生氣地說：「什麼『文氣』，應當是『憋氣』，這是什麼檢討稿？」

黃永勝趕緊說好話，他說：「我們好好商量，互相幫助。老吳的稿子是一定會寫好的。」

吳法憲聽了李作鵬的話，手拿著他的稿子，抱著一個皮包，起來就走了。他邊走邊說：「我的稿子好壞，我自己負責。你們不要為我操心了。」吳法憲走了，我們也就沒有談下去了。

黃永勝最後說：「看來在一起要談得好，是不可能的。在一起不僅談不好，還容易傷和氣。」從此以後我們四人就沒有再在一起談檢討報告的事了。

黃永勝、李作鵬和我三月中下旬都分別向毛主席寫了檢討報告。方檢討報告制作

關於我自己的檢討報告問題，在軍委座談會的時候，我就寫好了一個發言稿，準備在會上發言用的。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要我們寫檢討報告的指示之後，我立即把發言稿加以修改就成檢討報告了。我的報告主要寫了兩個問題。一是和陳伯達的關係問題。我同陳伯達根本沒有歷史和工作關係，六七年夏天才同他面對面第一次談話。我為什麼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論家」，還有就是對張春橋不滿有共同犯自由主義的關係，陳伯達是大騙子，他騙了我這樣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語錄」在小組上宣讀，我既是上當者，又是受害者，還是害人者；二是和張春橋的關係問題。我同張春橋雖然沒有爭吵過，但不來往，不接近。陳伯達就把我當作他反對張春橋的同盟軍了。

我的報告寫好後，於七一年三月中旬就送給周總理。總理看到報告之後，認為寫得不錯，他很高興。他轉給了毛主席。

毛主席第一次接見

毛主席收到黃永勝、李作鵬和我的檢討報告，很快就批了下來，主席的批示是：「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很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其實，我們的檢討寫得一般，但滿足了毛主席的心願。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和周總理、康生接見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

毛主席是在他的臥室接見我們六個人的，主席坐在沙發上，向我們進去的人微笑招手。我們進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禮、握手，然後在兩旁坐下。我們坐好之後，毛主席說：「早就要請你們幾位來談談，今天才實現。中國人有句話叫做：禮多人不怪，有禮不怕遲。」毛主席總是帶著笑容說話的。正在談話時，毛主席忽然想到：「為什麼不叫汪東興來呀？」一回兒，汪東興來到了。

毛主席說：「中央準備召開一次會議。主要內容是講批陳整風問題，你們之中的一些同志也發言做點自我批評，名義上討論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給你們做點自我批評創造條件。這樣做好不好？」

黃永勝立即說：「我們完全擁護主席的決定。我們犯了錯誤，應該進行自我批評。」

毛主席說：「進行自我批評，我不反對。我反對的是對犯有錯誤的人採取不公平的辦法，結伙整人，硬要把別人一棍子打死，我是堅決反對的。」

周總理說：「我們要發揚延安整風精神，用自我批評和批評的武器來解決問題。」

毛主席說：「延安整風精神很好，但現在是否還有效，就值得考慮了。」

周總理說：「這是毛主席創造的馬列主義的精華，是永遠有效的。」

毛主席說：「我們黨快五十年的歷史了，但對待犯錯誤的問題，還沒很好解決。在我們的隊伍內，作為犯錯誤的來源，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貪生怕死，貪污公款等，為個人利益犯錯誤；另一個是思想問題，為革命犯錯誤。除了為個人打算的錯誤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都是為革命而犯錯誤的。每個人犯的錯誤都有當時的具體環境，有對立面，祇一面是不會犯錯誤的。」

「我是贊成不怕犯錯誤的。一個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錯誤，怕這怕那還做什麼工作？當年，我們上井岡山，黃永勝也是跟著上去的一個，就沒有事先考慮錯誤與正確的問題，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慮會犯錯誤，還能上井岡山？」

「我是贊成犯得起錯誤的。每個人的經驗都有正反兩方面的。祇有一面，不能成為經驗。反面的經驗，常常比正面的經驗用處還大。當然，我也不是說，犯錯誤越多越好。但犯一點錯，又能認識錯誤，也沒有什麼不好。其實改正錯誤，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正確認識。」

「剛才你們說，延安整風經驗很好。但是，對犯錯誤的人沒有正確看法，不是熱心去團結他們，整風經驗就沒有什麼用處。大家知道，我們講的整風經驗，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正確總結經驗和與人為善。如果離開了這樣一個目的而不是總結經驗和幫助犯錯誤的人認識、改正錯誤，還有什麼整風精神？」

「延安整風並非一帆風順，是經過嚴肅鬥爭的。首先是領導人不能整人，其次是動員全黨不能整人。我們沒有整王明，是做了_{子規書社}的工作的。」

比如，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這場生動的黨內鬥爭，今天在坐的多數人都在場吧。（周恩來插話：除了兩三個人外，其餘都參加了七大）對廬山幾個犯錯誤的人，也是一樣的。我們不要他們很簡單，要他們退出中央委員會，退出政治局也不難，但這就不是黨的政策了。黨的政策的核心問題，是人民的利益問題。不要他們幾個人，是違背人民利益的。

「我們將要開的會，要開成像延安整風會議一樣。祇准做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准搞別的什麼名堂。總之，是要實事求是，不准搞歪門邪道的東西。共產黨應當是光明磊落的。」

周總理說：「主席今天的指示，也就是我們政治局領導開會的基本思想。誰要是離開主席的指示，去另搞別的什麼東西，他就是我們的對立面了。」

康生說：「任何人想背離毛主席的指示，都是沒有出路的。」康生坐在那裏沒有多說話。

接著，毛主席手持報告，對著我說：「這個報告（指我的檢討報告）是你自己寫的嗎？」

「是我自己寫的。」我立即回答。

對我的回答，毛主席既不認可，也不否定，好像還要說別的什麼似的。

周總理接著說：「是他自己寫的，他是可以寫一些東西的。這次他的檢討報告就概括為三個問題，概括得很好。把陳伯達視為大騙子，自己是小騙子；自己是受騙者，又是害人者。文字不長但把問題比較生動地說清楚了。」

毛主席說：「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識字牌背出來的。他還很年青的時候，在長征的路上我們就熟悉了。」

周總理說：「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長征的路上，他是我們的青年小科長。」

毛主席說：「啊，不簡單，報告寫得不錯，你的字也寫得不錯嘛。我死後你可以來這裏當中央委員會主席！」

主席的突兀之語，全場都震驚了，我反應還算快，立即站起來大喊一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周總理對我非常滿意，大家也發出了笑聲，全場的氣氛很活躍。毛主席說：「我提議，恩來同志帶你們幾個人（黃、吳、李、邱、紀、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開會的問題。林彪同志這個個人，想問題常常比我們想得都深刻，對開會的問題，先徵求他的意見再做決定，是很必要的。」

毛主席的話音一落，汪東興就說：「我就不去了吧？」

毛主席說：「你不是也沾了邊嗎？好，不去也可以。但自我批評還是有好處的。」

北戴河之行

爲了籌備召開一次最後解決廬山會議問題的中央會議，進行了一個半月的準備工作。北戴河之行是準備工作的重要行動。

在上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就提出了要召集一次專門會議，最後解決廬山會議的問題。江青、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立即贊成張的意見。其餘的人不表態。黃永勝說了一句：「開什麼樣的會議，由總理考慮決定。」

由於周總理對開會的問題還沒有考慮成熟，故對張春橋的提議未加理睬。後來，總理認真考慮了開會的問題，並同黃、吳、李、邱通氣之後，才正式提到政治局討論召開會議的問題。

周總理提出：「同意上次大家的意見，召集一次中央會議最後解決廬山會議的問題。可以提出兩種會議形式：政治局擴大會議或小型中央工作會議。究竟開什麼會議好，請示主席後最後決定。」黃、吳、李、邱及先念同志立即擁護周總理的意見。

總理向主席請示後，向我們傳達說：「毛主席說開會的問題，暫還不要定下來，要做必要的工作以後再定。第一是，由周帶黃、吳、李、邱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並要得到他的同意，開會的問題，等總理去北戴河回來後再定；第二是，黃、吳、李、邱等各人要寫好一個檢討報告，中央對他們的報告要有批示；第三是，政治局開會要約法三章，主要內容是祇能搞大動作，不能搞小動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周總理領黃、吳、李、邱、紀、李等六人，由北京乘專列火車到北戴河去了。

在火車上，周總理同大家說：「我們去北戴河，是去向林副主席集體匯報、請示，特別是向林副主席請示中央開會的問題。同時，也是去看望林副主席的，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到北戴河，得到最為熱情的接待。葉群親自到北戴河車站去迎接周總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總理、黃永勝各單獨住一棟樓，吳、李、邱、李、紀等五人，住在空軍療養院。晚上，黃、吳同葉群談話去了，其餘的人都同總理一起，在他的住處看電影。

四月一日下午三時，林總主持了在他的住處舉行的匯報會議。那天的天氣還是相當的冷，但我們到達時，林總皆葉群在門口等待周總理。總理到了之後，林、周進房子，還互讓了一會。林要周總理走前，總理讓林走前。正在相讓時，還是葉群說：「我走前面給總理引路。」在葉群引導之下，林、周才並排走進去，互相之間十分親切。

林總主持了匯報會，他簡單乾脆地說：「歡迎總理講話。」會議開始時，葉群還在走來走去，林副主席用嚴肅的口吻說：「葉群，你坐下來聽總理講話。」

周總理說：「毛主席要我領他們幾位，到這裏來向林副主席匯報和請示中央要召集一次會議的問題。主席說，廬山會議的問題到現在都有半年多了。本來問題已經處理了，但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還需要做一次處理。」另外，總理還談了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問題。周總理說完之後，他要黃永勝簡要說一下戰備工作方面的問題。

黃永勝說完之後，李德生和紀登奎也作了匯報。周總理又要我簡要說一下國防工業的問題。

最後，林總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廬山會議後半年多來，批陳整風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完全贊同。國內的工作很有成績，國際活動打開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戰備工作有成績，國防工業生產情況良好，都是好事。全黨、全國、全軍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我們在毛主席領導下，可以克服各種困難，勝利前進。」林總還說：「同意毛主席對黃、李、邱的批示。對三人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局面檢討。他們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還說絕沒有想到陳伯達的問題那樣嚴重，這次把陳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

在林總住處開完會之後，我們即上原來的專列火車回北京。葉群到車站歡送周總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總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席匯報和商量問題，這即便不是「史無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裏，又一次接見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汪東興。這是周總理領黃永勝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談後的接見，陪同接見的有周總理、康生。

我們被接見的人走進毛主席住處時，主席正坐在沙發上看黃、吳、葉、李、邱寫的報告。我們坐好之後，靜候毛主席說話。

毛主席首先說：「在北戴河挨罵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總批評之意）

黃永勝很聰明，腦子反應很快，按主席的思路，為取悅主席，黃立即回答說：「受了批評舒服。」總理如釋重負地向他點頭。

毛主席說：「批評也是武器，同槍炮是一樣的。前者用來打錯誤的東西，是思想武器；後者用來打敵人，是戰鬥武器。槍炮可以打敵人，也可以打傷自己的人；批評也是一樣的，可以用來打錯誤的東西，也可以傷自己人。」

周總理說：「在歷史上的王明路線，就是打著批評的武器，傷害很多的好同志。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受害者。」

康生說：「誰不接受歷史上的教訓，誰就不能接受毛主席的思想，執行毛主席的路線。」

接著毛主席的談話進入了正題。主席一口氣說了三個問題。

第一點說的是路線問題。主席說：「我們黨從第一次路線鬥爭，到粉碎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已經有九次路線鬥爭（毛主席扳著手指，從第一次講到第九次路線鬥爭）。歷史證明祇要路線正確就能取得勝利，革命是失敗不了的，祇要路線正確就不怕失敗。路線正確，沒有根據地會有根據地，沒有槍桿子也會有的。王明上臺，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

九十，最後我們解放了全中國。張國燾搞分裂，最後還是團結起來了。劉少奇搞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是勝利了。」

第二點說的是批陳整風問題。主席說：「文化大革命已經五年了，我們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義。不破不立，祇有破了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才能立起來。批陳整風一定要搞好，我說的搞好就是既要搞清楚問題，又要團結同志，不講團結的人就一定搞分裂。在廬山有的同志犯了錯誤，現在問題都清楚了，就是團結。如果現在抓住別人某些錯誤不放，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要換位置了。」

第三點說的是陳伯達問題。主席說：「陳伯達是一個反共反人民的老反共分子，托派分子。我對他的問題寫了幾句話，寫在黃永勝的報告上的。」

「此外，你們幾個人的報告（黃、吳、葉、李、邱）我都看了。報告寫得都好。我在黃永勝的報告上批了幾句話，也是對你們大家的報告批的。我批的是（手拿黃的報告，照念的）：報告寫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後就是實踐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後，又說：「他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裏就全部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具體問題，請總理去辦。」

周總理說：「完全擁護主席對黃永勝等五位同志的報告的批示，這是毛主席的重大決策。毛主席的批示，對全黨團結起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康生說：「完全擁護主席的批示，我們決心努力學習毛主席的教導，改正錯誤，改造世界觀。毛主席的批示就是我們行動的準則。」

周總理說：「大致方針定下來了，現在，向主席請示有關開會的幾個問題。」

接著，周總理說：「第一個問題，會議的名稱問題。這個問題在北戴河沒有多說，我考慮可以稱為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簡稱為中央工作會議。因為批陳整風的問題，在計劃會議上已經佈置了，現在稱為『匯報』會議是比較合適的。」

毛主席說：「可以同意用這個名稱。」

「第二個問題，會議規模問題。這個問題，我同軍委辦事組和政治局一些同志人商量過，會議規模以小為宜，大約不超過百人的會議制倒會

的有各省市自治區約黨委正副書記（每省兩人），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北京中央黨政機關部分中央委員，包括一些老同志，做好老同志的工作，對全黨團結有重要作用。」

毛主席說：「同意這樣一個規模的會議。總理提到做好老同志的工作，對老同志的工作，不要要求過高，但中央對他們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則要盡量滿足需要。當然，這樣做還會有少數人不滿意的，這就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了。」

「第三個問題，對會議的領導。周總理說：我們考慮，中央工作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集體領導，不另設什麼會議班子。在會議進行中，如果有重要問題，及時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匯報請示。」

毛主席說：「這樣好！」

「第四個問題，會議編組。會議同廬山中央全會編組的方法一樣，以原來的大區為單位，編為六個小組。黨政軍參加會議的人員編到各個小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編入各個小組，但可以自由參加各小組的會議。」

毛主席說：「同意這樣辦。」

「第五個問題，會務工作。會務工作全部由憲法小組承擔。張春橋同志提出，這次會議與憲法小組有密切關係，我考慮可以同意這樣辦。」

毛主席：「好嘛。」

此外，還有一些具體問題，如會議開多久時間，周總理都提出來了。毛主席也都點頭同意了。為什麼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周總理這樣細緻地向毛主席請示匯報？就因為這是廬山會議的繼續，這其中的奧妙關係很多，周總理是有意這樣做的。

我們正要起身起時，毛主席又開口說話了：「在會議開始的時候，總理還說幾句話。你向大家宣佈：中央對他們報告的批示，可以同意也可以推翻，受批評的人，可以接受批評也可以不接受；對黨的團結可以維護，也可以破壞。」

周總理：「在毛主席關心之下，我們一定能夠開成團結的會議。」

我們臨走時，毛主席坐在沙發上，向大家招手致意。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黃、吳、李、邱的心情是難以描述的。可以說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從廬山會議，到「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已經八個

月了，在此期間，可以概括爲八個字：「坐臥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們談了之後，問題就解決了，哪有不高興之理。

晚上九時，中央政治局照常進行會議，周總理向大家傳達了下午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傳達得很詳細。當周總理說完，並要黃永勝、紀登奎等人補充時，江青發火了。

江青大發雷霆地說：「你們把毛主席牽制起來作爲鎮壓我的工具，你們少數人都把問題決定了，還要開會幹什麼？」

周總理對江青的怒氣，根本沒有理睬。還好，那天晚上的會算是平安無事地開下去了。對「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一系列的問題都定下來了。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定在四月十五日正式開始。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工作會議（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軍隊各總部、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共九十九人參加了會議。周總理代表中央對軍委辦事組幾個犯「錯誤」的人做了政治和組織結論。

會場上的交鋒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我們之後，可以說是「一錘定音」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毛主席的話真是「一句頂一萬句」。我們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思想，基本上是樂觀的，但也有盲目樂觀的成分。

黃永勝是我的老戰友，是兄長一樣的老戰友。我認爲他身上擔子太重，我心裏是很願意支持他的。對開會的事，我經過認真考慮，向他提出三點建議，也就是「戰前」的三件大事，黃永勝同意了我的意見。（一）我們幾個人要恪守毛主席批示的口徑，不要超過原有報告而承認新的問題。對別人的提問，即使追問也不能回答。（二）軍委辦事組應先做思想工作。對這個問題，大家很同意，但又怕惹起麻煩。主要是怕江青一夥指責軍委辦事組搞小動作。經過研究之後，找到了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軍委辦事組以召開檢討會爲名做思想工作。批陳整風匯報會議開始的前兩天，軍委辦事組召集了出席會議的軍隊全體人員開會。這次會議，黃永勝以檢討爲名，詳細傳達了毛主席兩次接見軍委辦事組所做的指示，使大家心中有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三）向周總理建議，應當在會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總理完全同意了黃永勝的建議，於四月十四日在會議的預備會上，用他自己的話，比較詳細和有力量地傳達了毛主席兩次接見軍委辦事組的指示。

周總理對毛主席的指示傳達得很詳細，發揮得也很好，極大多數人都完全擁護總理的傳達，對會議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認識到毛主席的批示是鬥爭的「武器」並不是過關的「通行證」。祇有拿起武器堅決鬥爭，才能過得去這一關。

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召集與會人員的會上說：「今年二月間軍委座談會，我們應當向大家做檢討，但沒有這樣做。這是我們的錯誤，我代表軍委辦事組在廬山犯了錯誤的同志，向大家承認錯誤！今天，我向大家做檢討，並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在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連續接見了軍委辦事組兩次。參加接見的有：黃、吳、李、邱、紀、李等六人。我的傳達，如有遺漏的，他們可以補充。」黃永勝對毛主席的指示，傳達得很詳細。據到會的人後來說，這次傳達，對統一思想真正起到了重要作用。

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思想準備是很充分的，江青一夥的抵制力量也是很頑強的。這也就是說鬥爭是非常激烈的。軍委辦事組「恪守批示」，江青一夥「先露鋒芒」。

這次中央的會議，名義上是批陳整風，實際上是和江青一夥的較量。到會人數不足百人，就其政治情況來說，擁護軍委辦事組的人約三分之二；擁護江青一夥的三分之一不到。由於會議是「結束廬山會議」的會議，因此整個會議過程都鬥爭得很激烈。鬥爭的主要問題是對會議的方向、對小組會的控制和對吳法憲的追擊三個問題。

會議開始討論的是什麼問題，這就是會議的方向。四月十四日晚上，政治局會議檢查中央工作會的準備情況時，發現已經印發的文件，祇有黃、吳、葉、李、邱的檢討報告，批陳整風的文件一份也沒有印發。這樣，會議很自然就會從批「黃」（黃、吳、葉、李、邱）開始，而不會從批「陳」（陳伯達）開始了。會議批判的目標變了，從而也就會影響會議的方向。

周總理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著急了，總理問張春橋說：「為什麼不先印發批陳的文件，而祇印發他們的檢討報告？現在立即趕印批陳文件，

並通知各小組照原定計劃辦。各小組祇能批陳，不能隨便批判別的什麼人。」

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的主要形式是小組會，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都在小組會上作了檢討，因此控制小組會的導向成了主要鬥爭場所。由於軍委辦事組和周總理對毛主席指示的傳達，大多數人對江青一夥的一舉一動都是眼明心亮的。

第二天的小組會上，出現了一個異常情況。江青一夥的姚文元、毛遠新、徐景賢等人，竄到各小組發言，他們說：「這次會議不是『批准』檢討，而是『聽取』檢討。要是前者就不用開會了，印發他們的檢討就行了。」他們一個勁煽動，要大家逼著黃、吳、葉、李、邱在大會上做檢討。他們認為陳伯達已經打倒了，繼續批判毫無意思。

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組來遊說了半天。他在西北小組主要說了三個問題。一是他說九大以後的路線鬥爭，不僅沒有結束，而且鬥爭更加尖銳了，特別是文藝方面，簡直是寸步難行。例如，去年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通知，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受到壓制。二是廬山會議的問題。今天在坐的人都參加了廬山會議，事情的發生發展大家都還記憶猶新。問題是誰挑起來的，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應當搞清楚。第三個是，這次會議是把路線問題搞清楚，還是把路線問題鎖到保險櫃裏去，這是原則問題。我們一定要經過鬥爭，去達到新的團結，這才是真正的團結。

姚文元講話之後，胡煒等熱烈響應他的講話。

然後，粟裕、鄧穎超先後發言：「主席的批示（對黃等人的檢討報告批示）就是我們會議的指導思想，另外提出任何問題都是不合適的。」

姚文元說：「從實際出發，是理解執行主席批示最根本的問題。」

胡煒說：「在小組會發言，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的話。每個人都說一樣的話是不可能的。」

粟裕說：「我們的小組會，可以與毛主席的指示對立起來嗎？這是不可想像的。我是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

鄧穎超說：「我們不應當接受與毛主席批示相違背的任何東西！」

氣氛緊張了，小組會開不下去了。小組召集人冼恆漢祇好宣佈：停會看文件。

我把小組會情況，特別把姚、粟、鄧、胡等人的發言的情況，立即向周總理報告了。

四月十七日晚，在政治局會議上，總理明確了如下兩點：（一）會議只能提批陳。當然，在小組會上有對其他人批評的自由；（二）從廬山會議以來，毛主席和中央沒有說過的話，不要說。誰要想提誰報告毛主席批准。

各小組會的形勢，第四天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所在的西北小組，在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極大多數人都同意總理的指示，也有少數人不同意總理的指示。

在小組會上姚文元向我挑戰說：「邱副總長，你是不是也像在廬山會議開始時那樣，同我們說點內情嘛。」我一句話也不說，祇是抽煙、喝茶。我在小組會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著我發言，我就是不開口，會議已形成了僵局。這時鄧穎超走出會場去叫總理，總理來後，簡明扼要地說：「我們要批陳，這是首要的！會上可以進行同志式的批評，不是批判。」總理說完就走了。姚文元看總理動真格的了，他也不說話了。

針對小組會情況，我們幾個研究的方針是堅決鬥爭，具體措施：一是，堅守檢討報告界限，多一個字不說；二是，建議葉群立即回北京參加會議；三是，對一些錯誤的言論，除在各小組鬥爭之外，要立即上報總理。我們的鬥爭方針，每人都做到了。

追擊吳法憲的問題。江青一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吳法憲猛打、猛追，爭取「戰場繳械」。他們取得了很大的收穫。

會議的第三天上午，毛遠新、徐景賢等人就到西南小組圍攻吳法憲。徐景賢對吳法憲的下馬威是：「你要把你肚裏的髒東西都亮出來見見太陽。你不要裝糊塗，我們是決心同你鬥爭下去的。」

吳法憲由於對此沒有思想準備，在徐景賢等人逼迫追擊之下，由於過於緊張，心臟病發作了，當時就倒在小組會場上，並實行緊急搶救。下午三時，周總理趕到會場坐鎮，小組會上才基本停止了對吳法憲的追擊。

江青一夥除在小組會上追擊吳法憲之外，還派人追到吳法憲家裏去了，看看他是不是裝病。可見，江青一夥對軍委辦事組是絕不手軟的。林總得知吳法憲被迫害的消息，於當天晚上八時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了。葉群由西郊機場直接到了人大會堂，並且遊走了兩三個小組。她在各小組都說：「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來加強對會議的領導。我們都回來了。」林總回京後，對我們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總理知道林總回到北京，很高興。他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會議期間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使會議開成一個真正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會，說穿了就是調節好主席和林彪的關係。爲此，二十四日，總理將會議情況報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澤東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林總也表示不參加會議。這樣，總理工作的難度是很大的，他也祇有按毛主席的心願了結這次會議。

會議給我們下結論

本來，批陳整風匯報會對黃吳李邱不需要有什麼結論，祇是給黃、吳、李、邱一個檢討的機會。毛主席向周總理交代說：會議結束時，說點批陳整風的問題就行了，不要專門對軍隊幾個人搞什麼結論。毛主席還提出了：「要結論和不要結論都可以。請恩來同志代表中央講幾句話，也就是結論嘛。」

總理是深知主席的，他很慎重，在政治局會議上還是決定由周恩來、江青、張春橋、黃永勝、姚文元、紀登奎六人成立了起草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結束時的講話大綱的小組。說是「講話大綱」，其實，關鍵內容就是給黃、吳、李、邱下個結論。「講話大綱」實際上就是江青、張春橋起草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願起草的。但這個結論畢竟是很難下的，說輕了，毛主席那裏交待不過去，江青一夥也要鬧；說重了，雖然是打在黃、吳、李、邱身上，實際上是刺在林彪心上，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廬山會議，心裏也不服。所以，總理事事都是向主席報告的，主席同意才算數。對我們的結論是毛主席同意後，總理才講的。我看總理是違心的。總理就是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主持了這次批陳整風匯報會。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大會堂河北廳，召開了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全體會議。周總理代表中央宣讀了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的政治和組織結論。結論的內容，還能記起的有：「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

根本不同。他們之所以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站錯了立場，走錯了路線」。會議時間前後不到一小時，除了周總理講話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講話。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到此正式結束了。

會後總理來到京西賓館，深情地對我們說：「還是要振作精神。我還

指望你們一起工作呢！沒有你們我是寸步難行呀！」因為我們同總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點，我說：「他們在會上的做法，比廬山厲害得多，我們反他們的宗派沒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倒我們頭上，我們今後怎麼工

作！」我說了「我們今後怎麼工作」時，黃永勝坐在沙發裏傷心得落了

淚（他這天還正好發燒，帶病去挨「板子」）。總理看著我沒有說話，他也不便把話頭展開。他看見黃永勝那麼難過，就過去拉黃永勝說：「開飯的時間到了，我們一起去吃晚飯吧。」其實，總理是眼見肚明的。中央正式

公佈了對黃、吳、葉、李、邱的結論。時過境遷，到現在就是我們反江青一夥的歷史證據，我們上了反江青一夥，後稱「四人幫」的光榮榜。

毛主席去世之後，鄧小平、彭真有他們特別的政治目的，硬是人爲地樹起了一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是根本違背歷史事實的。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反對江青一夥的禍國殃民是完全正確的。沒有軍隊抵制江青一夥，就沒有軍隊的穩定，沒有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江青一夥就要奪取更大的權力，這不是危言聳聽。黨的十大，上海幫奪取了中央很大部分權力，不就是事實嗎？但奇怪的是，毛主席去世後，對我們過去反江青一夥的歷史事實不僅不承認，反而要把江青一夥同我們捆在一起，實行公審，這連江青都不承認。他們硬要把林彪與江青綁在一起進行審判，實際上就是要審判毛主席的九大政治局，從而把我們做了這些反毛主席「英雄們」的墊腳石，這就我們黨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

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

批陳整風匯報會，對黃、吳、葉、李、邱作了結論，我們祇有組織服從，但在思想上想不通。對主席的言行不一，想都不敢想。會後怎樣傳達會議精神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政治局經過研究，對傳達定下了三條：

一是，祇限於傳達到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軍種、各總部黨委常委，各兵種祇傳達到司令、政委。傳達時祇照文宣讀文件，不得隨意發揮。

二是，今後在報刊上一律不得透露對黃、吳、葉、李、邱的檢討和批評的問題。

三是，在傳達文件之後一律清退，由印發機關清點銷毀，不准存檔。軍隊駐京各總部的傳達，由軍委辦事組統一組織實施，在三座門統一聽傳達。李德生宣讀了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的結論，然後以各總部、海空軍為小組分開討論。各兵種司令、政委參加總政小組的討論。

在傳達的前一天晚上，總後小組（即黨委常委會）就聽了我的檢討，向常委做了簡要的自我批評。各常委都發了言。大家的發言，不外是兩點意思：擁護毛主席對黃、吳、葉、李、邱檢討的批示；擁護周總理代表中央做的結論；同意邱會作同志的檢討。常委會不到兩小時就結束了。聽後大家有些懵頭懵腦的，似乎很不理解中央為什麼要這麼做。

一九七一年「五一」節，邱會作（中）、紀登奎（右）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傳達之前，軍委辦事組特別強調保密的問題。當時，對保密要求如此嚴格，主要不是爲了黃、吳、李、邱幾個人的問題，而是爲了人民解放軍，爲了林彪的問題。因爲祇要知道了我們幾個人的問題，就同林總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是不利的。

在傳達之後，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軍種、各總部黨委都向毛主席、林總寫了兩個擁護的報告，一致擁護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幾個領導同志的報告的批示，擁護周總理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的結論；同意黃、吳、葉、李、邱的檢討。不少單位在報告中都提出了：我們一定要如過去一樣，尊重軍委辦事組幾位領導同志的領導。奇怪的是上海市委的報告，還特別強調了軍委辦事組做了好的「自我批評」，真是虛偽至極。所有報告都表現出團結的氣氛，不利團結的字眼，在報告中是看不到的。據王洪文後來在秦城對我說，這點也得到了主席的教導。主席說：「下了結論以後，就要講團結。」

五月初，我和耿飄（當時爲中央聯絡部長）陪同越南的總書記黎筭去南方參觀。我們住在韶山時，一天早晨我同耿飄、卜占亞（湖南省委第二書記）從宿舍信步去食堂吃早餐，我對卜占亞說：「我已經看到你們省委常委對傳達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報告。你們對軍委辦事組幾個犯了錯誤的人，採取了原諒的態度，說了很多好話。」

卜占亞說：「事實就是那樣嘛，我們祇能實事求是。你們畢竟是上當受騙，才犯了錯誤呀！」

我問：「華國鋒書記本人有什麼意見沒有？」

「沒有。常委會都是他主持的，他的意見包括在報告之中。」

「你們看到或聽到什麼意見，都能及時告訴我就好了。同志的幫助，對一個人防微杜漸會有很大作用的。」

「我對敬仰的老首長不會有什麼保留的。」

耿飄說：「老邱呀，千萬不要背包袱啊！我們都團結起來努力把工作做好，少讓他們挑刺。我們不挑起擔子，總理就更難辦了。」

在廣州，我一直忙於陪同外賓參觀，除聽取省國防工業辦公室匯報，時間不多。我離開廣州回北京時，劉興元、丁盛送我去機場，我們在車上簡單說了幾句有關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問題。

我說：「在廬山我們犯了錯誤，影響很不好。對你們這些老戰友，也不能說一點牽連都沒有。看起來，我們幾個人在政治鬥爭中，還是很不成熟的。」

劉興元說：「現在好了，問題解決了。不論是按什麼水準解決，也算解決了。這次中央的會議，鬥爭是尖銳的，但在廣州軍區不會留下任何影響的。在人們的眼光中，現在的林副主席，現在的軍委辦事組的形象更高大了。但在少數人心中就和過去不一樣了，不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大家對誰是泥鰍，是很清楚的。」

這些老戰友的話，我心裏都明白，但當時是絕對不能交流，大家也不會交流的，多說一句就犯自由主義了。

在歷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廬山會議，經過批陳整風匯報會就結束了。鬥爭的結果，我們失敗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關鍵的問題都是毛主席決定的。具體來說，有如下三個問題。（一）在廬山主席已經把黃、吳、葉、李、邱同陳伯達捆綁在一起了，林總的威望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二）江青一夥操縱了會務工作。他們是做了「合法」的壞事，造成既成事實。（三）主席內心支持江青一夥。其實我們並無宗派，我們和很多老幹部對文革的看法，對江青一夥的看法都是一樣的，反而被打成宗派；江青一夥是文革中最大的宗派，卻得到不斷的放縱。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我的思想確實起了很大的變化。會議之後，確實有個包袱了。我的包袱主要是「想不通」。興師動眾地處罰了我們，這是「大局」服從了「小局」。這也就是說，以犧牲林總為首的軍隊的威望，去服從江青一夥的利益，這就本末倒置了。不過，我的這個包袱是裝在我的「公文」包裏的，我認為為江青一夥背上一個包袱是完全不值得的。我一直還是在努力工作。

我自己也認真想了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毛主席和林總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切問題核心的核心。祇要這裏不存在什麼問題，其餘一切問題都不必考慮。毛主席同林總的過去，我是知道的。從過去看現在就沒有什麼問題需要考慮了。但現在要想的是今後的問題，這是當時還不可能想清楚的問題。

我想過，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林總上臺，是因為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而把他「黃牛當馬騎」，還是真正的「親密戰友」？我考慮的

結果是後者，是歷史必然。林總確實是黨內的排頭兵，無論打仗、執政都能勝任的。在上述的思想基礎上，對毛、林之間今後的問題，就沒有更多的考慮了。我也確實沒有想到還有什麼需要疑慮的問題。這不是我觀察的問題深度不夠，而是從歷史事實得出來的結論。

第二個問題，自己的學習和工作問題。我向來都有這樣的思想「做

官靠運氣，吃飯靠本領」。當然，這裏說的做官，是做自己連想都不敢想的大官。因為有史以來，任何大官都離不開「運氣」這個基本條件。要是沒有運氣，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吃飯靠本領，這是我一貫的思想。在全國解放前的革命時期，吃飯靠「兩條腿」，祇要跟著黨幹革命就想。在全國解放後的建設時期，吃飯就靠「一雙手」了。在建設時期，我從有飯吃。解放後的建設時期，吃飯就靠「一雙手」了。在建設時期，我從沒在「有我不多，無我不少」的那群人之中混過。我是靠努力學習和工作掙飯吃的，過去，我的這個思想起過積極作用。

第三個問題，「改邪歸正」的問題。過去，我參加議論江青一夥，反對江青一夥的事不少，自己愛說別人（江青一夥）的閒話總是不好的。

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了，我們對毛主席還是情深得很，因為我從十五歲參加革命，一直都奮鬥在他老人家領導的革命事業之中，我們永遠都是主席的兵。

總之，歷史總歸是歷史了。

第三十五章 毛主席南巡

不在乎，又在乎

林對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對主席的思想、意志瞭解，對主席的個性也瞭解。我們則一無所知，總把主席當成神聖的領袖。廬山的事，林對主席遠了，其實對我們也遠了。林總深知祇要把問題攤開了，在毛和林之間，不論誰是誰非，我們肯定會選擇毛。所以林對我們也不說話，不向我們提任何建議。

在廬山會議之後，我們感到林總同毛主席的關係，不比以前了，因為林總觸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根神經。對這個問題，我們提出過建議，林總採納了。

一是，注意上毛主席的門。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林總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從機場就到毛主席住處去了。這是在廬山會議之後，他們第一次見面。

二是，林總很注意向毛主席選送材料。這種辦法是林總向來同毛主席保持密切關係的一種好辦法。林總選送了貴州軍區政治部關於「三支兩軍」的一個報告，毛主席對那個報告做了批示。

三是，有關戰備問題，林總向毛主席的報告就更多了。關於戰略預備隊的組成，三北（東北、華北、西北）的戰略方針，三北各省市要建立自己的後方基地等問題，都分別向毛主席寫過專題報告。毛主席對那些報告都有批示。

軍委辦事組對毛主席、林總之間的來往關係，都向總理及時報告。為了穩定人心，七一年一月間，毛主席找葉群和周總理分別談過一次話。

黃、吳、李、邱對廬山會議發生的問題總的態度是：不在乎，又在乎；或者是口裏在乎，心裏不在乎。這就是說，除反了江青一夥之外，其

餘問心無愧，毛主席若以我們反了江青一夥「定罪」，則願意吃冤案，這就是我們的共同心願。正是由於存在這種思想，所以對問題的複雜性想得不多，更想得不深。我們在精神上，還是希望到林總「平安」就好。大樹不倒，矮的總是壓不死的，毛主席對林總的態度是我們注意的中心問題。在這方面祇要有一點什麼情況，對我們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因為廬山問題的實質問題就是毛主席對林總的態度問題。江青一夥的「勝利」不是他們自己取得的，同樣的，軍隊的「失敗」也不是自己無能的結果，這些都是毛主席決定的。

我們的心情實在不好，我們的思想情況，我都及時向總理匯報了。周總理對我們是非常關心的，除了經常向我們做工作之外，一九七一年二月（春節的第二天）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周總理同黃、吳、李、邱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從晚上九時起，一直說到天亮。

總理說：廬山會議到現在幾個月了，政治局生活會議也還沒有開，你們的情況，會作都同我斷續談過。今天就同你們再談一次。總理談話的要點如下：

1、你們提出了「自衛戰」的方針是正確的。廬山的教訓是可貴的。對張春橋的問題，沒有想到更嚴重的後果就是失誤。你們緊跟毛主席是不成問題的，但怎樣跟法，過去你們不清楚，現在清楚了就很好了。毛主席對你們幾個不僅無惡感，而且是關心的。

2、關於江青的問題。對待她這樣的特殊的人，是要費點腦子的。我的經驗就是「忍耐」兩個字，其餘的辦法是沒有用的。這樣做是必要的，這個問題很特殊，就不談了。

3、關於批判「天才」論的問題。你們認識了這點很好。這個問題全部核心是涉及到副帥，不是「天才」論本身的問題。因此，不管你們對「天才」論的問題懂得不懂得都要批判，不批這個問題是交代不了的。而毛主席對陳伯達的問題不僅僅是「天才」論。

4、關於批判陳伯達的問題。這個問題你們應當抓緊。吳法憲更要準備做比較深刻的批判與自我批評。你們是可以寫出比較好的東西來的。如果有必要，我還願意幫點忙。

毛主席說打撲克最主要的是要有不怕掘底的精神。你要是怕對方掘底，顧慮就多了，那還能贏別人嗎？這如同一個人心裏有事是一樣的。

你總怕別人知道你的心裏的事，想講又不想講或者講一點留一點，這還有能講清問題之理？

毛主席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我把問題徹底講清楚，也祇有講徹底才能講清楚。我就是照著毛主席不怕「挖底」的精神才把問題講清楚的。我想你們掌握這個精神也一定能把問題講得清清楚楚的。

5、關於軍委辦事組要「摻沙子」的問題。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要「摻沙子」的意思是從軍隊的歷史來考慮的。考慮過別的方面軍的人參加軍委辦事組。主席的考慮也是爲了軍隊的團結問題。

周總理接著說：你們在想什麼？對這些問題有沒有系統交換過意見？今天，我們可以互相談一下。

黃永勝接著說：我們幾個人主要有三點共同想法。第一，有怨氣。我們認爲在廬山並沒有做壞事，祇是說了幾句話，雖有不妥也沒有大錯。第二，他們幾個人（江青一夥）太霸道。現在更趾高氣揚了。第三，我們都認爲很難用自己的口說清楚自己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思想上存在的問題。

黃永勝又說：軍委辦事組是軍隊的統帥部，這是一條大船，駕駛得好壞，是一件大事，我們感到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有信任的問題，不是能力問題，因此我們壓力很大。

周總理說：你的想法是不對的。毛主席、中央對軍委辦事組根本不存在不信任的問題。如果有這樣的問題，毛主席早就會採取斷然措施的。

周總理最後說：「我同軍委辦事組是心心相印的，我也感激各位對我的信任！」

葉群、吳法憲聽到總理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突然哭起來。他們表示非常痛心，不僅一把鼻涕，一把淚，還哇哇叫的哭出聲來了。當時的情景非常淒慘！總理走了以後，黃永勝也很傷心，他說：「葉群在這裏我也要說，我們不怕掘底，但要告訴我們掘誰的底，又要講團結，又要掘底，怎麼個搞法？我寧願再過一次草地，也不願意這樣走不到頭。」葉群祇說了一句：「不要倒苦水了。」說完她就走了。

林總的態度

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正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林總在全會開幕式上講話的時候，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毛主席在各小組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突然決定：停止討論林總的講話，這是急轉直下的變化。

林總對廬山會議總的態度是：聽毛主席決定。

泰然自若。林總對各小組停止討論他的講話，以我所觀察到他的表現是泰然自若。除了擁護毛主席的決定之外，其餘什麼話也沒有說。從此他的態度就是：「不說話，不干擾，不自責。」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都是這種態度，一直沒有變化。林總採取這種態度，是真正執行九大「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的路線。

林總確定自己的態度，是有堅實思想基礎的。(一)林總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在主要論點和組織觀念上都沒有錯誤。據葉群說：八月二十三日全會開幕前，在小禮堂休息室主席和林總議論過講話的問題。毛主席對林總說：「不要講稿，放開說。照稿子念都是講不好的。」這些情況，在八月二十三日晚的政治局會議上得到了證實。周總理傳達了小禮堂常委會的情況後，汪東興接著作了補充，他說：「我是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列席了二十二日的中央常委會。林總今天的講話講得好，是主席要林總講的。主席還交代要放開講，才能把話講好。主席還讓在會上講講形勢。」汪講了這段話之後，康生表示好不高興。八月二十五日晚，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康生就不客氣批評汪東興說：「做了這麼多年的工作，還是像個警衛員一樣的水平，對中央常委會的問題也隨便說。」由此看來，林總講話的論點是先得到毛主席點頭的。二十三日開幕式前，林在後臺對主席說，要講一講，是對主席二十二日要他講話的再確認，林對主席是尊重的，是守規矩的；(二)林總對我們黨要有自己的領袖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他堅決擁護毛主席為黨的領袖。一九五九年，林總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一定要學到手」提到了建軍路線的高度。從軍隊開始，學習毛主席著作成為全國人民重要的政治生活內容。當時，從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彭真、康生、陸定一、陶鑄等等都是經常稱讚：全國掀起了學習毛主席思想，林總是立了大功勞。我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毛主席反對過林總提

出學習毛主席著作問題。林總確實認為，毛主席是馬列主義的「天才」，他這種思想從來也沒有改變過。林總用很大的精力宣傳毛主席是「天才」，是歷史的發展，黨的利益的需要。對這些問題的提法，即使有些不妥之處，也祇是適當糾正提法的問題，決不是反黨問題，更不是政變綱領。(三)林總說：「我在全會上的講話，毛主席在場都聽了。」二十四日上午重放錄音，也是毛主席批准的。各小組經過兩天多的討論，沒有聽到毛主席說一句什麼話。為什麼二十五日下午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闖進了毛主席的住處之後，就發生了新的問題？這裏的新問題，其實也是老問題，就是「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但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林總沒有提及，我們在發言中也沒有提及。

不說話。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會後，林總就沒有參加中央常委的領導工作，等於「一邊站」了。毛主席後來對林總下的「狠心」也是源於這裏。

以我的記憶，從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二日與全會有關的話，林總祇說過四次話，每次也祇有幾句。

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要林總召集：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等開個會，作思想工作，提高認識。林總照辦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三天連續開過三次會，每次會議九時開始到十一時結束，林總在會議開始時，祇說：「毛主席要我召集各位開個會，提高認識。」每次會議結束時，林總也祇說：「開會的情況，由汪東興向毛主席口頭報告，我就不寫書面報告了。」會議中間，林總一句話也沒有說。

八月三十一日，林總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由陳伯達、吳法憲作檢討，會議開始時，林總祇說了一句話：「政治局會議開始。」會議結束時，林總也祇說：「陳伯達這個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應當同他劃清界線。」其餘什麼話也沒有說。

另外，毛主席指責陳伯達的話，康生攻擊陳伯達的話，都直接指向了林總。大約是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叫陳伯達去談過一次話，他指責陳伯達：「你參加了軍事俱樂部。」可能是同一天，陳伯達去看望康生等人，遭到了一頓大罵。康生憤怒地指著陳伯達的鼻子說：「你把林副主席綁上你的戰車，我準備你陳伯達殺我的頭。你給我滾出去。還有，毛遠

新、徐景賢指責：「廬山出現的問題，是未遂政變。」上面這些話的份量夠重了吧，但是林總聽到仍若無其事，不理睬、不吭氣。

林總對毛主席的性格和爲人是很清楚的。祇要毛主席認定的問題，而自己又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別人提任何意見是聽不進去的。況且，隨便提意見還可能出現料想不到問題。林總從來不隨便多提意見，更不會輕易進行爭論。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常委會是否照常開會我不知道，但周總理、康生則每天晚飯後都要到毛主席的住處去。以我所知，林總一次也沒有去過。事實上林總就被排除在中央常委領導之外了。

不干擾。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在廬山舉行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一、廬山的問題已經在山上處理完了，沒有什麼問題需要帶到山下去處理；二、回到北京後，政治局開一次學習生活會議，大家就都照常工作。這裏指的學習生活會議，意思是黃、吳、葉、李、邱作檢討，通過批判，達到團結。但這次會議未曾開成。

回到北京後，康生裝病，會議開不成。據王洪文後來說，康生對上海幫說：「政治局的生活會議不能開，在山上對他們都沒有搞到什麼東西，回北京就能搞到？會一開，他們脖子上的套索就拿下來了。」康生在文革中的行爲比陳伯達更甚，陳伯達出了事，他裝病避「風頭」。「九一三」之後不幾天病就好了，就神氣十足地露面了。

從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七一年四月十五日「批陳整風會議」之前，林總一直住在北戴河，祇回過北京兩次，一次七〇年的國慶節，一次七一年的五一節。林總國慶節回京時，從西郊機場直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處去了。他對毛主席說：「這次在廬山，如同擦了一根火柴，差點把房子都燒著了。」毛主席祇簡單說了一句話：「沒有那麼嚴重，擦火柴的目的不是燒房子。」我認爲林總向毛主席說的那句話，是試著做自我批評的，可是沒有得到毛主席的反響，於是就沒有說下去了。

批陳整風會議中期，毛遠新、徐景賢等「追剿」吳法憲很厲害，吳犯心臟病倒在會場上。江青一夥派人從會場上追到吳法憲家裏去。此時，林總帶著葉群從北戴河突然回到北京。他們回來的當天晚上，葉群接連在三個小組露面，並宣佈：「林副主席和我回來參加會議_{讀非國家學}」

習。」林總回來後，江青一夥原定「抓住吳法憲，戰場上繳械」的企圖就沒實現。

七一年五月一日之夜，毛主席、林總在黃永勝陪同之下，同時登上了天安門。放了一輪煙火之後，林總指著自己的頭向毛主席說：「我頭痛，早點退場。」毛主席同答說：「好。今天沒有什麼題目了。」此時，毛主席也進休息室去了。

葉群很機靈，她抓住這個機會，跟著毛主席進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葉群談了將近兩個小時。葉群出來之後，非常高興地同我們說：「主席同我談得很好，談笑風生地和我說了很多問題，還是和對我報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沒有加新的東西。」

廬山會議結束，到七一年四月的批陳整風會議，北京發生了好多的事。其中毛主席的口頭指示或批示，有的都直接指向林總，政治份量相當嚴重，但林總都沒有說話。例如：

(一)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兩人報告的批示，批的內容都很嚴厲。

(二)對三十八軍報告的批示。三十八軍的報告是主席、江青授意的，在形式上指向陳伯達，事實上是指向軍委辦事組和林總的。對該軍的報告，軍委辦事組是兩本賬，對外向他們學習，對內根本不予理睬。

(三)對軍委座談會批示。批評軍委座談會「不批陳」的批示，起了強力爆炸的作用。對軍委辦事組打了一記悶棍，給了「上方寶劍」。這是廬山會議以來軍委辦事組受到的最大打擊。

(四)政治局一九七一年全國計劃會議拍板會上對軍委辦事組批判、攻擊。出席會議的一小部份人，對軍委辦事組當做敵人般進行了嚴厲打擊。正是因為有他們對軍委辦事組的打擊，毛主席就決定召集另一次中央會議來解決問題，「批陳整風匯報會」就是從此而來的。當然，現在看來，也可能是主席安排的。

(五)北戴河會議。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批陳整風會議之後，毛主席決定要周總理帶部份政治局委員黃、吳、李、邱、李德生、紀登奎等人去北戴河向林總匯報，並對批陳整風會議進行研究和決定有關事宜。林總對周總理的匯報，基本上紙說了四個字的話：「同意，擁護。」其餘就沒有說什麼話。

批陳整風會議結束時，中央常委討論對黃、吳、葉、李、邱五人的結論。林總祇說了一句話：「凡是不需要留檔案的問題，以不留為好。」很清楚，林是不贊成做結論的。對這個問題，毛主席沒有考慮林總的意見，周總理代表中央對黃、吳、事、邱、葉還是做了結論：「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對上面這些問題，林總基本上沒說話，更沒有提出過什麼建議性的意見。

不自責。從廬山回到北京後，政治局會議久久未能召開，但對黃、吳、李、邱的責難，則不斷發生。針對當時的情況，我同黃永勝交換過一次意見。

邱：你好受嗎？

黃：不好受，又有什麼辦法。

邱：我看現在的溫度（指毛主席的指責）比山上還高了，「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可能是空話。

黃：完全是空話，現在還看不出來。但對我們抓住不放，同在山上是差不多的。

邱：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麼？

黃：要我們做自我批評。

邱：我們的自我批評是需要的，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帥的態度。我看，林總要表示自己的態度，可能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黃：你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誰能開這個口呢？

邱：我看你就可開口。為慎重起見，可以先向葉說，如果說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說。

黃當時情緒還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過了大約三天，黃主動對我說：「北戴河回話了。」

葉群傳達了林總對黃永勝建議的回答。林說：「（一）自我批評本來是我們黨的正常生活，祇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麼可自責的。全會開幕上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才會說：『不要奉命講話，要講自己的話，才能講好。』我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講話的。（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麼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舉行動員會

了幾天，還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前者是老得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

最後，林總還說了幾句：「告訴他們，要是晚上睡不著，可以加點安眠藥。」

黃永勝要我把林總的話，向周總理匯報。我把黃永勝的建議和林總回答，都向總理匯報了。周總理祇說了一句話：「林總善於把複雜的問題條理化。」其餘什麼也沒有說。

從後來的事態的發展看，林總堅持不做檢討是有理由的。事情本來是一般性的問題，即使話是從林總口裏出來的，問題的本身也還是一般性的問題。以我的看法，毛主席對廬山問題的處理是不計後果的，毛主席一定要佔上風，林彪就是不說話；林越不說話，主席就越要幹到底，這樣事情就越搞越重、越搞越亂。可以說對廬山問題的處理，等於又進行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劉、鄧後，又對著林彪。

毛主席為什麼南巡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在汪東興陪同下，由北京出發，在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進行了巡視，史稱毛主席南巡。

毛主席外出巡視，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是常事。那個時候，毛主席為了不讓江青跟著走，多數都在毛主席離開北京之後，總理才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同時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總參謀部、空軍、海軍主要負責首長都是知道的，因為軍隊對毛主席負有相應的保證安全的責任。這次則很特別，毛主席外出後，周總理祇說過一句話：「毛主席外出了，現在在武昌，要華國鋒到武昌去。」毛主席離開北京時，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過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談話，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都是及時傳達的，這次則沒有做一個字的傳達，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常說，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毛主席這次南巡大家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南巡，是決定黨的命運的問題，也就是決定黨是團結還是分裂的問題，同時也是決定許多老幹部的政治生命問題。我們社的人受到

了空前未有的打擊，是同毛主席的南巡密切相聯的。因此，搞清楚毛主席南巡，對研究這段歷史很重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周總理帶黃、吳、李、邱、李（德生）、紀（登奎）等人去北戴河向林總匯報回來之後，在四月一日，毛主席接見了去北戴河的人，並做了重要講話，對廬山問題拍板定案了，當時認為是解決了問題。從四月底到八月下旬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裏，中央太平無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負責的工作，軍委辦事組主要是抓戰備。四月下旬「批陳整風」會議之後，我向黃永勝提過一次意見：「我們應當放下包袱，認真工作，不然別人（指江青一夥）在工作上抓住我們什麼辯子就不好辦了。」黃同意了我的意見。至於周總理，他對軍隊的關係還是同過去一樣的密切。

這時，關於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也在正常進行。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吳、李、邱都有所安排，黃為第一副總理，李、邱為副總理，吳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且，在總理給主席的報告中，還專門講了「請林副主席在國慶節和四屆人大上講話」，「因為兩個會日期比較近，講一次長話，講一次短話，避免內容重複。長話、短話怎樣安排，請主席指示。」看來一切都很正常。

八月下旬，當我知道毛主席南巡以後，覺得沒有什麼可驚奇的，但九月六日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訪問了韶山之後，從武漢回到北京，講了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同他講的有關主席在武漢與他和汪東興等人的談話內容之後，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動。但我同李是一樣的想法：「心中有數」，在思想上並無太大的負擔。

毛主席為什麼南巡，目的是什麼？南巡的導火線是什麼，我當時和現在都不清楚。但從他在各地的講話來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發動「群眾」，要大家站在他一邊，在三中全會上開始重新處理林彪的問題，三中全會臨近，主席也走得匆忙。一九七〇年毛主席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講話時說：「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回北京後政治局開一次學習生活會就行了。」七一年四月一日又講：「他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裏就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事（即批陳整風會議）請總理去辦。」毛主席說的那些話，都不算數了，自己全部推翻了。

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戰壕裏成長的，不論是艱苦歲月還是槍林彈雨，不論是挫折還是勝利。林彪一生中功績很大，沒有什麼「污點」。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臺」，毛主席對這樣一個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總拉下來，在黨內是要有基礎的，尤其是軍隊。因此出去遊說是必要的。

以我的看法，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發現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林彪問題」。在毛主席看來，「林彪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最主要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林彪的威望很高，而江青一夥不得人心。廬山開了這樣久，對林彪沒有大的影響，林本人也沒有什麼思想負擔。另一方面就是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問題，林彪在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把矛頭對準張春橋，毛在江青的提醒下，也認為對著張春橋就是指向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命根子。在毛主席的思想裏，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和搞文化大革命是一生最大的事業，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要在這兩個方面有所指責，必定是輕則路線錯誤，重則反革命。

根據上述的歷史與現實情況，毛主席對「林彪問題」，是經過廬山（山上），北京（山下）和南巡三次不同辦法處理的。

廬山會議的問題，在山上基本上已處理了。毛主席是犧牲陳伯達，支持和保護了江青一夥，批評和壓制了軍委辦事組，在當時的情況下，江青一夥得到了滿足。

主席南巡時，批陳整風會議已結束將近三個月，即對「林彪問題」進行了第二次處理。這次處理是在對軍委辦事組進行了廣泛徹底批判之下，又召開了「批陳整風」會議，給軍委辦事組戴上了帽子，即做了犯有「宗派主義錯誤」的組織結論。這次處理，江青一夥得到了預料之外的大滿足，軍委辦事組則抬不起頭。而且，當時政治局對三中全會、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已經就緒祇待開會了，主席視這些黨和國家的大事於不顧，執意要走。

毛主席南巡，在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處的談話，直接指出了林彪的問題，這就是說，毛主席借南巡對廬山問題要進行更高級的處理了。毛主席南巡，無須多說就是對「林彪問題」的處理不滿足也不滿意，因為林彪經過廬山會議的折磨，並沒什麼損失，地位和威望並無損失反而提高了。大家本來就對江青、張春橋十分怨恨，廬山上的

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心裏也明白，主席心裏也明白，以陳伯達換張春橋本來就有些不值，保護張春橋傷害林彪就更不值。事情往往物極必反，廬山會議以後，主席不停地張羅，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搞張春橋和擁護文化大革命本來是可以分開的，搞「王、關、戚」就是這樣。這次因為有江青的問題，主席非說反張春橋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對著他自己。毛沒有繞出這個怪圈，非要叫林彪從他的胯下爬過去，林就是不從。主席會想：這樣的林彪能夠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嗎？這是毛主席南巡要重新處理林彪的主要原因。

在武昌的談話

毛主席在各地的談話，在「九一三」之前或以後都沒有聽到過傳達，應不算光明正大。我所知道的主席南巡講話，除了李作鵬講的在武昌的談話內容外，其餘的都不知道。真正瞭解毛主席南巡講話是近二十年以後，我已經被扒了幾層皮，下了地獄，成為階下囚之後才知道的，是保外就醫後聽劉豐、卜占亞告訴我的。

一九九〇年，我和老伴到武漢去看女兒，見到劉豐。劉豐的境況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難。劉豐提起往事說：「我們對主席真是無限熱愛和忠誠，最後還鬧了一個家破人亡的下場。」

我望著劫難二十年以後又重逢的劉豐同志，心裏很難過，他那麼困難、那麼落魄、那麼無助。劉豐是我的老戰友，我在延安當軍委供給部長時，他是處長。劉豐同志對黨忠誠，對革命忠誠，工作任勞任怨，吃苦耐勞。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

劉豐說，八月十六日、十七日毛主席兩次找他們談話。參加談話的人有劉豐和汪東興，還有劉建勳、王新。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當時不在武漢。

毛主席講了一大段黨的歷史，很快就把話題轉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廬山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個問題還沒有完，陳伯達後面還有大人物。在三中全會對這個問題要講清楚，你們不講，我來講，總是要把問題講清楚的。我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毛主席又說：「軍隊的幾個人，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廬山跟著起哄，他們搞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他們看到我老了，急於想當國家主席，實際上是想奪權，分裂黨。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三個辦法。批發三十八軍的報告是甩石頭，叫紀登奎參加軍委辦事組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是挖牆腳。軍委座談會開了那麼長時間，根本不批陳。犯了路線性、方向性錯誤，爲首的改也難。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們做了檢討，但吞吞吐吐並沒有把問題講清楚。因爲廬山會議以來，有的人一句話都沒有說，大人物不開口，其他的人即使講，也是講無關重要的問題。」

毛主席還說：「我就不相信軍隊會跟他們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軍隊來，他們會聽嗎？……廬山的問題，林彪同志要負一些責任的，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什麼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我不是天才。……從去年下山到今天，一年多了，我一直都睡不好，很難休息好。但你們要保護林彪同志。」

毛主席還說到：「反對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

毛主席最後說：「今天我們的談話，你們要進行座談，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出來，你們討論之後，寫個簡要的報告給我，我們還要談一次。」

劉豐說，主席還叫汪東興把華國鋒從北京叫到武漢來。主席也和華國鋒進行了長談。

劉豐說，二十七日，他去看望主席，劉豐對主席說：「我們完全擁護毛主席的指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認爲，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講話影響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議林副主席在適當的小範圍內，向主席做個檢討。」

聽了劉豐的講話，毛主席立即興奮起來，拍著自己的大腿說：「你說得好！這個意見在北京是沒有人提的，黃永勝是不會提的！你的態度很好，在九屆三中全會上，就由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希望你實踐自己的申明，表裏一致應當是一切共產黨員的態度，但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貫做到。」

毛主席還讓劉豐他們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劉豐說到這裏非常激動，他說：「我是在劫難逃啊。如果沒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難保。想想看，主席讓我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林的問題提出來，這不是找死嗎！？我提吧，林不會放過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會放過我。」

在長沙的談話

毛主席是八月二十七日到長沙的。在長沙和當地的軍政主要領導人談了話，參加談話的有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廣西自治區書記韋國清、還有任思忠、華國鋒、卜占亞等人。從主席的談話來看，矛頭已明顯指向林，指向黃永勝，指向軍委辦事組。主席離開長沙後，在南昌、杭州、上海、豐臺都和當地的軍政主要領導人談了話。這些情況我當時是一點也不知道的。我到西安以後，卜占亞同志給我講過毛主席在長沙談話的情況。主席談話總的精神就是「處理林彪問題的動員令」。不管以後有沒有「九一三」，主席南巡的講話，都使黨分裂了。毛主席反劉少奇時，分裂了黨；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黨。

其實，主席在各地談的和在武漢談的也差不多，基本上還是那些問題。

第一，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大家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

第二，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

第三，點名說了黃永勝。毛主席說：「黃永勝調動軍隊造反，各軍區都聽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還對著丁盛說：「黃永勝要是打倒了，你們怎樣辦？你們和黃永勝的關係那麼好，黃永勝倒了你們怎麼得了啊？」

第四，唱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

第五，毛主席希望把鍾赤兵調到廣州軍區當副司令。劉興元說我們馬上報告軍委辦事組。汪東興聽到後立即說，你們不要報告了，我去和軍委辦事組說（汪東興是怕劉興元漏了風聲）。

第六，我的談話你們不許給北京講，也不要傳達，但可以在常委之間吹吹風。

卜占亞說：「主席談完話，大家回到賓館，我問丁盛：『主席問你黃永勝打倒了怎麼辦，你就說跟著主席幹革命嘛，怎麼一句話也說不出去？』

來？」丁盛說：『太緊張了，太緊張了。主席對我們是進行路線教育，怎麼突然說打倒黃永勝？』我對丁盛說：『黃永勝祇是個代名詞，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亞還說：「接下來我們幾個就開會，研究主席的談話。主席說：『我的談話你們不許給北京講，也不要傳達，但可以在常委之間吹吹風。』主席究竟是希望我們傳達，還是不希望傳達呢？大家一致認爲主席是希望傳達的，我們應該傳達。於是廣州軍區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開了黨委擴大會，傳達了主席跟我們談話的內容。」

對於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在廬山我就有這種想法：廬山的問題看起來有一定的複雜性，但核心問題祇有一個，這就是：毛主席對林彪的態度問題。如果毛主席對林彪態度未變，什麼事也沒有；如果毛主席對林彪態度變了，就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連根本不敢想的問題都會出來的，在廬山，毛主席終於發現林彪原來對文化大革命，對中央文革的江青、張春橋等人是否定的態度（姚文元稱廬山會議是「八月逆流」），主席對林彪的態度就徹底變了。總之，提起來千斤重，放下來僅四兩。

林彪是冤鬼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晚以前，我沒有聽到周總理傳達毛主席對林彪問題的任何說法，政治局會議照常進行，照常處理各種問題，照常是凌晨三點以後才能散會。從十五日晚起就變了，當得到我駐外蒙使館關於林彪等人全部在溫都爾汗摔死的報告，毛主席要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這句話實際上就是一錘定音，也就是對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處理了。從十七日開始什麼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轟炸機、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漸出來了。林彪是頑兇，是「現行反革命」的頭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對林彪是先定爲武裝政變的現行反革命頭目才處理的，不先給林彪定下罪名就無法處理，也沒有什麼可處理的，所以，當時搞清林彪的問題毫無意義；如同八屆十二中全會處理劉少奇一樣，不先在他頭上扣上「叛徒、工賊、內奸」三頂反革命性質的帽子，也是無法處理，道理是一樣的。先「殺」後示眾，是對劉少奇、林彪處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確實幫了主席一個很大的忙！接著「二月逆流」，「賀龍問題」，「楊、余、傅」問題，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擔當了。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大功臣，中、外有名的軍事家慘死了，這就是林彪的下場。

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談話，葉群是能及時知道的，但葉對林彪有封鎖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決定了，這就使問題越搞越亂。葉群進入了緊張的階段，林立果瞎張羅，林彪則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葉群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挾持外逃了，這是我對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終認為林彪是決不可能外逃的。

林彪真正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

第一，武裝政變是特殊戰鬥，古今中外都一樣，這種戰鬥來不得半點差錯。我們所看到林彪搞武裝政變的「證據」，就是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這根本不能說明林彪有什麼問題，這些材料不僅不能說明問題，更不能證明任何問題。

我們不要忘記林彪是大軍事家，也是最有實戰經驗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麼武裝政變，就沒有不成功的。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況。當時，毛主席還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祇有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要搞武裝政變，還不是可以隨心所欲，水到渠成嗎？因此，假的東西要說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裝政變要有最有力的指揮。林彪搞武裝政變怎麼好像是小孩做遊戲一樣的？

林彪要搞武裝政變，他沒有動用統帥部的任何指揮機構，沒有動用各軍種各大軍區，也沒有動用任何作戰部隊。這樣象搞武裝政變嗎？林彪搞政變都不依靠我們，「林彪死黨」的帽子白給我們戴上了！

同樣不要忘記，當時林彪不僅可以通過指揮系統指揮全軍部隊，而且也可以指揮任何作戰部隊。林彪沒有動用任何部隊，這也是搞武裝政變嗎？

第三，全國平靜。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

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這算搞什麼名堂！？難道林彪祇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政變是爲了活，而不是爲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爲了死的兒戲。那麼，爲什麼都說林彪是搞武裝政變失敗而外逃的？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來處理「林彪問題」的手段，祇有把林彪先定爲反革命集團搞政變的頭目，才有處理的根據。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晚八時，當確悉林彪出走的飛機在外蒙溫都爾汗機場機毀人亡，機上九人全部喪生。接著，汪東興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毛主席的心情很好，並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對「林彪問題」可以隨心所欲放手處理了。說「九一三」是林彪搞政變，對毛主席是飲鴆止渴，並爲鄧小平否定毛主席準備了炮彈。

然而歷史是不能改寫的，林彪對中國人民革命偉大勝利的貢獻終究還會永遠記錄在史冊上。

第四篇

我的晚年

第三十六章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

十三日凌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是星期六，我住在總後的家中。十三日凌晨三時許，公務員張軍到臥室來叫醒我說：「劉秘書來電話說，總理通知，在人大會堂四川廳開政治局會議，要你立即去。劉秘書一會兒就會送公文包來，小朱（警衛員）也起來了。」

文革當中，各種事情繁多，無論什麼時候開政治局會議都是常事，我也沒多想什麼，馬上就起來了。當時，我被總後造反派打傷的胳膊和左腿都還沒有完全恢復，為此，張軍即協助我穿衣服。我因剛吃了安眠藥，腦袋暈暈忽忽的。

到了人大會堂四川廳，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經先到了。先到的人同平常一樣，有的抽煙，有的像一尊菩薩一樣，靜坐在那裏。我看到人還沒有到齊，估計一下子還開不成會，即就到四川廳外面去活動了一下，回來後又坐在原位置上。

四川廳是人大會堂一個比較大的廳，在大廳東南角擺了一圈沙發，成橢圓型。我到了不久，張春橋也到了。同時，李作鵬才在警衛員的摻扶下進入會場，他也服了安眠藥，他站不穩，在警衛員的摻扶之下還晃晃悠悠的。紀登奎，李德生也是後到的。在這個時候，政治局究竟開會幹什麼？誰也不知道。李作鵬清醒一些之後，他還問了鄰座的江青：「江青同志，今天開會是什麼事呀？」

江青的回答是：「等一會就知道了。」她的回答是很妙的。這種說法，既不能說她知道開什麼會，也不能說她不知道。但江青肯定是不是知道的。她要是知道了，早就會同先到場的人說了，以表示自己知道的事多。

我們大概等了近三小時，於十三日早六時，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線，天都快大亮了的時候，政治局的會議才開始的。周總理隨即進入大廳，葉劍英，黃永勝，李先念，吳法憲等人也跟在總理後面進來了。總理坐在南面的正中間。他坐的位置是可以眼觀「全場」的。周，葉、黃、張、李等原來就在人大會堂河北廳修改《政府工作報告》。發生了「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們就在那裏集體辦公。

周總理剛進來時，我觀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別，他看起來不光是疲勞的問題。但我萬萬沒想到，竟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總理坐下之後，習慣性地掃視了一下全場，就特意對著江青說：「江青同志，今天凌晨發生的事你不會感到突然吧？」江青當時不可能理解總理的話，因此她沒有回答總理的問話。總理看他的話毫無反應，又補充了一句：「林彪坐飛機走掉了，飛機出境到外蒙古了。」

當時全場立即變得鴉雀無聲，真的肅靜到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臟在跳動的地步。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張著嘴巴，有的豎起耳朵，但每個人的雙眼都盯著總理。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樣，思想上震動極大。我的腦子都麻木了。

江青對總理特意向她問的話，不僅不搭理，連看也沒有看總理一眼，她半天連身子沒有動一下。江青為什麼會對周總理持這樣的態度呢？她可能想到的是：發生了林彪出走這樣的大事，你周總理為什麼不早告訴呢？我為什麼和大家吃一樣的「飯」呢？

周總理宣佈了林彪的事後，眼皮就幾乎打不開了，他合眼有兩分鐘，然後就拿起茶杯喝茶。此時，江青大聲說：「有什麼事就講吧，不要讓大家跟著受洋罪。」周總理仍採取不惹她的辦法，對江青的話，總理連理也不理。

更使人氣憤的是，政治局會議進行到後半段的時候，周總理正在斷續續講林彪走的經過，江青聽得不耐煩，就和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竟三缺一地打起撲克牌來了。周總理看到此情此景心裏很難受，但也沒有予以制止。這說明江青不把總理放在眼裏，這也說明，因林彪的出走情況，還沒有落定，因而還沒有定性。

這次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但大家的心情又是不一樣的。江青一夥內心很高興，江青、張春橋兩人不斷地交頭接耳說什麼

事，他們連說帶打手勢，並且臉上常出現笑容，有時姚文元也湊到江青那裏小聲說上幾句。其餘的人都很規矩，沒有一個隨便說閒話的。這次四川廳的政治局會議，是江青一夥走上了「宏發」道路的會議；是軍委辦事組走上了下「地獄」道路的會議，是黨內重寫歷史的會議。這在事後看是很清楚的。

緊急善後處理

四川廳政治局會議，分前後兩段，前段是宣佈「九一三」的問題，後半段是緊急處理一些應急的事情。「九一三」之後，需要處理的問題很多，這裏講的僅是一些需要緊急處理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林彪座機出走的經過。

周總理說：「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發生之前，不僅沒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沒有人敢想。」

周總理接著說：「十二日晚上十一點半的樣子，葉群來電話說，一〇一想動一下，去大連住幾天再回北京開三中全會，特向總理報告。」

總理問：「什麼時候起身？」

葉群答：「今晚走，準備空中走。」

總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不要坐飛機走。三叉戟才進口，駕駛員還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飛機。」

葉群說：「你知道，那個急性子（指林彪）很難說服得了。」

總理說：「爲了安全，必須這樣做。你應當耐著性子做說服工作。」

總理接著說：「十一點半多一點，接到北戴河中央警衛團（林彪隨身帶的警衛部隊）的報告說：葉群宣佈，周總理同意首長今晚起身去大連，葉群一宣佈就上汽車走了；接著，林豆豆從北戴河中央警衛團打來電話說：『他們（指葉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車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總理說：「接到豆豆第三次電話，也是十一點半多了。」

總理說：「這個人的脾氣是很怪的，很難說服他不走。但爲了安全，我還是命令警衛部隊要把他們追回來。晚上無論如何不准放行，出了問題怎麼負得了責！」

周總理繼續說：「葉群他們到山海關機場之後，是採取緊急上飛機的辦法走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基層單位是很難攔得住的。」

林彪上了飛機之後，機組的人並沒有到齊，飛機就發動了，林彪乘坐的飛機，是在沒有機場放行命令的情況下，強行起飛的，起飛的時候可能是十三日零時三十分左右。

周總理說：林彪的飛機強行起飛之後，是在京山航線飛行的，空軍的雷達看得很清楚。但到了接近承德時飛機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達搜索到一次，飛機調頭向北去了。

總理最後說：「十三日零時左右，還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衛團的報告說：林彪的老警衛員，現在的保衛處長李文普，從北戴河到山海關的途中被打傷了，又據林豆豆的報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藥，在北戴河上汽車都是兩個人扶著上去的。這些情況都還有待查清楚。」

總理說：「他們上車後，不久李文普跳下車來，受了傷。」

總理最後說：「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飛機是強行起飛的。」

總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較遠，因此，他既沒有說他和吳法憲、李作鵬想辦法阻止飛機起飛的情況，也沒有說主席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話。總理有政治態度的話，都是在九月十四日確認林彪摔死之後。

周總理剛講完話，江青以他慣用的手法，把小毛巾向茶几上一摔就起身上廁所去了。她邊起身邊說「林彪歷來都是鎮壓我的。」對她的話，當時沒有一個人呼應。

第二個問題：關於發表聲明與戰備問題。

周總理講完話之後，工作人員就進來送中午飯了。

在吃午飯之後，葉劍英向周總理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林彪不會去蒙古，有可能到蘇聯去了。我們要發表一個聲明，在軍事上後發制人，但在政治上要先發制人，我們的公開聲明，主要是給蘇聯人看的。」對葉的提議，周總理表示同意。

周總理說：「可以發表一個聲明，祇有幾句話就行了。」葉劍英、黃永勝等都同意總理提的原則。葉劍英當時很積極，他一邊說政治局作記錄的秘書一邊記，聲明很快就寫好了，稿子很短，祇有百把十個字，周總理認真看後，派人去打電話，問毛主席睡了沒有？很快得到報告說，主席沒有睡覺。

聲明稿送到主席那裏不久，周總理就去接主席的電話去了，他回來後傳達說：「主席指示，聲明現在不要發，看看情況再說，林彪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主席說，即便到蘇聯去了，他就能當他們的國防部長？就有指揮軍隊的權力？……」大家聽了之後，沒有一個說話的。

接著會上就談到防止蘇聯乘機從空中和地面突然進攻的問題。這個問題別人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主要是黃永勝講的。他講了三點：

一、三北（東北、華北、西北）進入戰備狀態。三北的國境線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

二、各戰略方向的二梯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統帥部的總預備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三北的空軍部隊的戰備請總理親自部署。

三、北京要對空進行戰備。

黃永勝說完，總理要黃永勝趕緊搞一個全軍的應急作戰部署。緊急戰備文件就是我們搞的，這真是可笑，我們搞「政變」，我們又對我們自己搞戰備。

第三個問題：中央領導人的防空問題。

總理要求中央所有領導人都要住在有防空設施的地方，以防蘇修用原子彈突然襲擊，周總理規定如下：

一、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黃永勝、張春橋、姚文元、吳法憲等入住人民大會堂，這裏亦為中央和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指揮所，閻仲川為戰備值班室的總負責人。

二、李先念、李作鵬、邱會作、華國鋒、余秋里住京西賓館。

三、紀登奎住北京軍區機關。

四、李德生住空軍機關。

五、康生仍住玉泉山，暫時不要回釣魚臺。

最後，周總理還說，毛主席的防空問題，由他向主席請示後再定。

防空問題，包含著總理的智慧和複雜的政治問題，一是把對軍隊有指揮權的黃永勝、吳法憲（包括閻仲川）都控制起來了。二是向江青一夥示好。因為江、張、姚同周總理一起，住在人大會堂是毫無必要的。三是把華國鋒、余秋里提到了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樣的待遇。總之，中央的政治情況開始改變了。

第四個問題：對山海關未能走成的人的審查問題。

凡是到了山海關沒有走的人，集中管理，這批人一律由海軍李作鵬負責組織專門人進行審查，然後再處理。

第五個問題：撤消三中全會的工作班子問題。

這個問題由我負責處理。一，通知王良恩全會推遲進行，把工作班子一律撤消。二，把京西賓館通往空軍辦公大樓地下室的防護門打開。一旦需要時，住京西賓館的人可以進入地下室，經過空軍地下室向外疏散。三，通知鐵道兵在空軍地下室通往地下鐵的出口處停一列火車。

周總理對大小問題都做了具體的佈置。

周總理把所有緊急的問題都處理完了，最後鄭重宣佈：「偉大領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來了，並已進住中南海。」但總理並未宣佈毛主席什麼時候進住中南海的。

江青無頭無腦地說：「昨天下午，我已經到中南海把主席臥室的窗戶打開了，換了空氣。室內也做了衛生消毒處理。」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她也根本不會知道毛主席的行蹤，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價。

周總理用帶有調整的語調說：「啊！我是主席回到豐臺以後，才知道這一情況的。」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之後，不僅不臉紅，而且一點也不感到難爲情。

從十三日凌晨三時，到下午五時半，歷時十五個小時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此結束。

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略記

九月十三日 下午六時，我去京西賓館處理周總理交代的幾件具體工作。一，撤消三中全會的工作班子，是交代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辦的。二，安排李先念、李作鵬、華國鋒、余秋里等人的住宿，是交代總參管理局副政委辦的。三，打開京西賓館地下室通往空軍地下室的大門。我親自走了一遍，我是京西賓館的防空總指揮，必須親自預先察看路線。

晚上九時，我又由總後大院去了京西賓館一趟，檢查了李先念等人的住宿，他們都睡下了，我祇在每人房門口同他們說了一句話。我敲李

作鴻門時，他還沒有睡，我就約他到會議廳的休息室聊天，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時。他的精神狀態同我一樣：有思無慮。我們天南地北、過去現在等，雜七雜八談了很多。現在還能回憶起來的，有如下一些。

關於事實真相問題。

我說：「林彪真的叛國投敵了嗎？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事呀！」

李說：「從現來看，走掉了已經是事實了！今後在這件事上的性質，也是要看怎麼說了，是方是圓都由人說了。」

我說：「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他自己決心要走，臨走的時候，下幾道命令，在短時間之內也會大亂的呀！林彪走的原因，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以我的估計，還是高明夫人腦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的，真是糊塗透頂了。」

我說：「這個問題，我也這樣想過，但現在還無法自圓其說。」

李說：「是夫人的事，問題可能就在這裏，現場還有好多人，特別是

豆豆瞭解的事會比別人更多，更確切。我想事情很快就可以搞清楚，現
在怕的就是以權說話。」

我說：「關於林彪的問題，我們是否要向主席、中央寫個報告？」

李說：「報告是要寫的，但寫什麼就是難題了，我們什麼事也沒有。」

我說：「江青他們幾個的鼻子要長到腦門上了，他們真神氣！看來很
難有什麼黨的政策可講了。」

我說：「事實上，他們不光對我們神氣，對總理和其他人照樣神氣。」

我說：「他們神氣，我們受氣。」

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凌晨三點了。我們之間的閒談就此結束。

我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說：「很好。我已知道了。」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時就起來了，一個人坐在家中辦公室苦思。

腦子裏好像裝滿了雜貨的箱子一樣，好像什麼都有，但又好像是一個空箱子，裏面什麼也沒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說了一下。他們聽了之後，除了震驚之外，要說的話很少。

我同往常一樣在家裏的辦公室一一翻閱文件，我在《三部要報》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通報，昨凌晨一時許，中國一架大型運輸機入侵，在肯特省溫都爾汗墜毀……」

我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說：「很好。我已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沒有開會。晚上開會時，周總理宣佈：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墮毀了，機毀人亡，飛機上九個人都死了。

張春橋聽到周總理宣佈林彪死了之後，親自到外間服務臺拿出一瓶茅臺酒和數個杯子。他手拿著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乾一杯！」他給每人斟了一杯酒，並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好工作。」當他走到吳法憲面前時，還特別說：「我們誠心共事合作！」他走到總理跟前時，也說了一句什麼話，但我沒有聽清楚，總理沒有站起來同張春橋碰杯。張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說了一句雙關語：「我要再喝酒就更迷糊了。」我沒有同張碰杯，張也沒有再去和黃、李及其他人的碰杯。總理宣佈完林彪的死訊後，就叫汪東興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來了，他向大家說：「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興！還與我們碰了杯。並且說了『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此時，張春橋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陣子。

散會後，我又到京西賓館去同李作鵬閒談。剛說話不久，李的秘書送來海軍政治部保衛部發回來他們對扣押在山海關機場人員的審問記錄。李一頁一頁地看，並一頁一頁的遞給我看，記錄稿很長。在一張記錄稿上有兩點：一是被審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們交回空軍，以免被殺人滅口；二是，被審的人交待：他們聽林立果說，在空軍學院開過一次會，會上決定李作鵬，邱會作的任務是解決釣魚臺，要抓住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務。我看完那頁記錄之後，李作鵬問：「你害怕不？」

我說：「說得越邪乎就越好，沒有什麼好害怕的。現在不是害怕的問題，是主席怎樣對待我們的問題了。」

我說：「我們現在是在下地獄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計是非下去不可的！我們軍委辦事組已經垮了。中央軍委已經由葉帥接管了，空軍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軍區由紀登奎控制了，黃、吳、李、邱都成了閒人了。」

九月十五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先是傳達了毛主席對當前情況要做分析的指示，毛主席說：「過去也不知道，現在的材料像雪片

一樣的飛來了。你說信吧，天下哪會有那麼多的怪事？你說不信吧，這些材料又自己飛來了。張國燾逃跑後，就是沒有注意分析情況，結果打擊面過寬，傷害幹部太多了。這是歷史的教訓，現在對我們很有用處。」

接著，總理叫公安部長李震，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十餘人來到福建廳，繼續開會。會場中間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間擺著一個大搪瓷盤子，裏面放著一個大黑本子，本子上有兩頁白紙，貼著很多碎紙片拼起來的有數行紅字的一張條子。這就是號稱林彪寫給黃永勝的那封信，信上寫道：「永勝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 保護身體 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 敬禮 林彪」。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這裏的，我現在能記得起來的不完全。信是用紅鉛筆寫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寫的，但疑點一看就能看出來。當時就有人（不是黃、吳、李、邱）提出：「這是手跡嗎？」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後，搖了搖頭，表示懷疑。看完我一抬頭，看見周總理就在我旁邊，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沒有說話。老實說，這封信是不是林的手跡，我當時是持懷疑態度的。黃永勝氣得坐在那裏不說話。

會上吳忠介紹了這封信是動用了大量民兵，經過一天才收集起來的。

然後，由周總理主持，吳法憲介紹了一直昇飛機企圖出逃和迫降的經過。直昇飛機由沙河起飛，到了張家口「迷航」了，又折回北京。到了密雲上空，才被迫降落的。

李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直昇飛機上的情況，直昇飛機迫降後周宇馳、于新野自殺了，唯一還活著的是李偉信。究竟這件事與我們有沒有關係，李偉信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活證據。

九月十六日 在今天的政治局會議上，主要是討論張春橋代中央起草的關於林彪事件的通知。通知裏稱：「林彪叛黨叛國」，「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陳伯達路線，實際上是林彪、陳伯達路線」，並把林彪問題上升為黨內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把林彪說到這種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也難以接受。但我們都沒有發言，總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主要是講和林彪劃清界限的政策。文件通過以後，報毛主席批准，是十八號發出的。

九月十七日 從昨天開始，我在總後的家中向毛主席、中央寫報告。寫了一個開頭就寫不下去了，寫報告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寫些什麼。除了工作上的事以外，我與林彪、葉群的私交並不多。在目前這種嚴峻的情況下，自己間接知道的更不能亂說，其實也無法說清楚。關於「廬山會議」一事的檢討，主席那裏已經通過，這之後我祇在周總理帶領下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過工作，沒有單獨談話；「五一」在天安門上向林彪敬了個禮，也沒有和林彪單獨談話。除此我與林彪沒有見過面，也沒有通過電話，我和林彪之間沒有新的問題。因此，報告沒能很快寫成，怎樣寫報告成了我當時一個大難題。

下午四時，周總理給我打電話。總理說：「剛才，我同黃總長打電話，他理發去了。現在，我把要同他說的話，先同你說一下，等會兒你到山上去同他說一下，我現在就去睡覺了。」

周總理說：「現在有好多跡象表明，三北邊防是有些情況的，值得重視，你告訴黃總長今晚召開一次各總部、軍兵種首長會議，把三北情況很好研究一下，並要盡快落實。一切工作都要具體化，戰備工作還是由黃總長負責。告訴黃總長可不許擲挑子呀！」

我回答說：「總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黃總長報告。」

周總理又問：「你現在幹什麼？」

「我在想問題，準備寫報告。」

總理說：「想問題就很好。對歷史上的事，不想是回憶不起來的。會作呀，你的水平怎麼這麼低呀。你怎麼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說：「總理呀，我不祇是水平低，我的覺悟也很低。對現在發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說不清楚，更是寫不請楚。」說完，我的眼淚就隨之流下來了。因為，總理都說出「你怎麼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這樣的話，可見總理的態度在變化，他是在林的問題上自己在找退路，總理太不容易，能退出去最好。那我們這些人祇能坐以待斃。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是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我不和他搞在一起，還能和誰搞在一起？！

「啊！」總理叫了一聲，有些吃驚地說：「你還說不清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想，這是不對的，你的事沒有多少，黃，吳麻煩一點，黃總長是橫豎看不起江青。你過去同我說過的那些問題，現在證明你說的是對

的，對那些問題，我是不會忘記的（總理說到這裏我的心裏很感謝他）。最近兩、三天內，我會抽時間來找你談，你的情況我還會同毛主席談。據我現在瞭解的情況，你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是保你的。一會你見到黃，也要給他做工作，盡快向主席表示態度。」

我說：「這個時候做黃的工作有難度。總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

江青要要霸道，有意挑釁，黃肯定不幹了，也幹不下去了，黃是個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總理說：「你去做工作嘛！批陳整風會上，黃不肯檢討，說他在廬山沒有發言，還跟我們講黨性原則。後來，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檢討，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好，照總理的指示辦。」

接完總理的電話，我一時感到輕鬆多了，我對在場的胡敏和路光說：「這下好了，總理保我了。快搞飯吃，我們上山。」

我在總後的家中吃完晚飯，就和胡敏、路光上西山了。我的剛出生的小孫女在山上，也想去看一看。到了山上，我叫路光先到黃家看看他理髮回來沒有，黃住在西山最高處的9號，9號下面是龐大的地下工事，是軍委前指的所在地。過了一會，路光回來說：「黃伯伯回來了，請你去呢。」

我問路光：「你黃伯伯在幹什麼？」

路光說：「他在批文件，並對我說，他要站好最後一班崗。然後他放下筆，從桌子上拿起一個相框給我看。他說，路光呀，這是我在我井岡山當排長時照的，像不像我？」

提起井岡山，我對黃永勝的敬意油然而生，路光還沒有講完，我就起身去黃處了。

約六點半鐘的樣子，我到9號同黃永勝見面談了話。這次談話是「九一三」之後，我們第一次談話，也是此生我們最後一次談話。

兩人坐下來之後，反而沒有立即說話，這時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最後還是黃開了口。

黃說：「老邱啊，我們以後談話的機會不會多了。」

當我講了周總理的態度後，黃說：「話是這麼說，文章不一定這麼做喲，總理做不了這個主，江青不會罷休的。我們過去上了汪（指汪東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興)的當，他利用我們看不慣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慣江青對老幹部沒有感情，她到處出口傷人啊，看不慣江青在政治局頤指氣使，爲難總理啊，汪東興老鼓動我們去反江青，說主席討厭江青。那次(指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對江青根本不是汪說的那麼回事，其實主席很在意江青。」

黃接著說：「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來，總不能都抓起來，難道都不要了嗎？黨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來，我什麼都不會說。江青會算老賬，要算老賬也還是那些，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說：「就是沒有什麼可怕的，才難辦呢！問題就難在這裏。」

黃說：「我們也有嘴嘛！我們反江青、張春橋，有道理嘛！不頂住文革小組那一套，不行嘛！況且，張春橋還是個板上釘釘子的叛徒。不讓她插手軍隊，是怕軍隊亂了，這也不對嗎！？支持總理工作有什麼不對！？過去主席是不會出面管這些的，現在不同了，他們會騎在我們頭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當時黃永勝對林彪是十分有氣的，他說到這裏站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然後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圖的牆前，大聲疾呼：「你跑什麼跑，害死人呀！」

黃喊完坐下來後又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們還沒有吃夠苦頭？我看，林彪的下場就是反江青的結果，現在該輪到我們頭上了。」

黃永勝說著說著有些不耐煩了，突然說：「說這些王八蛋幹什麼，算了，不說這些了。」

過了一會，黃又換了一個話題，黃說：「老邱呀，我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我說：「我在江西蘇區就知道你，我剛參軍時，你就當團長了。」

黃說：「打張輝瓈時，我就當師長嘍。」

黃問我：「你們家窮不窮呀？」

我說：「窮的就差光屁股了。我們家窮是窮，不過，從辛亥革命時就是老根子了，革命黨人常逃到我家歇腳，江西蘇維埃時期，我爺爺，我父親、母親都一齊上陣搞革命。紅軍撤離蘇區後，敵人把我們家的房子都燒了，全家躲在山洞裏。四九年方強他們南下時，一個團部指揮所就設在我們家。」

我們倆你一言我一語，從江西蘇區、五次反圍剿、長征路上、延安、熱河、東北、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廣西剿匪、十五兵團、華南軍區、中南軍區…，說著說著，我們都開始流淚，邊說邊流，黃則大哭起來，當談到我們在敵人的炮火下生死與共的情景時，兩人淚眼相望，激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但心裏痛快極了。

後來，參加戰備會議的人陸續來了，我們的談話也就結束了。

黃是湖北咸寧人，我是江西興國人，我們都是不同地方的窮苦人，我們真是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在幾十年的烽火硝煙、槍林彈雨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黃是威風凜凜，有大將風範；有長者胸懷，一副熱心腸，對人特別好。黃會打仗，判斷準確，能下決心，總是打勝仗。我給他當政委，心情特別舒暢。

晚上散會後，我住在西山3號。

九月十八日 下午三時，總理又給我打電話，問昨天晚上戰備會議的問題。在電話上，我向總理簡要報告了一下，他表示滿意，沒有多問什麼。總理就轉爲問黃永勝的精神狀態了。總理問：「黃總長的情緒怎樣？」我說：「怎麼好得起來，總的來說是悲觀的，還做了最壞的打算。」

「主要是什麼問題？」總理問。

我說：「最主要的是，他說祇知道難受，不知道『病』在哪裏。林彪給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負擔很重的問題。」

「你同黃總長再談一下：一，光難受不行，還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給他的信，是林寫給他的，並且又未收到。這些問題，我早就注意到了。你還要告訴他，過去你和他同我談過的問題（指江青攻擊總理），我是不會忘記的！」

晚上，在人大會堂福建廳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發生了姚文元欺負葉劍英的事。在會上張春橋提出：「有的省、市對林彪事件的傳達，認爲範圍太小了，各地的中委和候補中央委員應當聽傳達。」對此，張春橋也沒有提出自己究竟是什麼主張。

葉劍英提出：「爲了保密，目前還祇能傳達到省、市自治區的常委，不能擴大。」葉帥談話的口氣，當然有點像主持會議者的態度，江青一夥自然不會買賬的，他們現在神氣得不得了。

姚文元立即反擊說：「一個黨中央的副主席跑了，為什麼不向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傳達？我們作為政治局委員，有責任提出這樣的問題。」

姚文元的「高論」發表之後，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等人，都同意他的意見。葉帥坐在那裏半張著嘴，一句話也不說了。黃、吳、李、邱坐在那裏，一個字也沒有說，心裏想我們鬥了幾年，你葉帥接著幹吧。今天，葉帥吃了姚文元一記悶棍，不知有何感想？葉帥是江青一夥打擊的對象，但當面受姚文元的悶棍還是第一次。

最後，周總理也祇有同意姚文元的意見。

九月十九日，總後黨委常委會於晚上七時開始。會議由我主持。參加會議的人，除常委之外，還增加了裝備部長苑化冰和國防工辦副主任李如洪列席會議。

總後黨委常委會是邊開會邊寫簡報，會議完了簡報也就出來了。我們的第一次簡報，印在中央辦公廳印發的簡報上了。

我原來打算通過總後黨委常委會議，把自己的問題說清楚，常委多數人不同意。他們說：「你在總後沒有什麼林彪的問題，在中央是否有問題，我們不知道。你的問題不要在總後講，中央需要你講就到中央去講。」於是，我在總後就沒有機會講清楚自己的問題。

總後副部長、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邱創成參加了國務院業務組的政治學習。

九月二十日，晚上，人大會堂福建廳政治局會議。

今晚的會議我看沒有什麼主題。周總理說了一下對「批林整風」要抓緊的問題。凌晨二時左右周總理宣佈：「大家要是沒有什麼事就散了。」接著又說：「李德生、紀登奎留一下。」

我記得，這是我最後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

九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 這幾天，我就開始成爲閒人了。昔日我是因忙的不可開交而難受；今日閒的無聊，實在使人更難受。我告訴胡敏和路光把桌子上玻璃板下面的有關林彪、葉群的照片都取出來，燒掉。我也叫秘書們把辦公室的資料、材料，有關林彪的也整理出來燒掉，文件登記本上有登記的，對我有影響、無影響都不要動。我還對胡敏說，你沒有什麼事，給豆豆介紹對象的事今後肯定要問到你頭上，你要有思想準備。我還對路光說，我練字寫的那些東西，整一下都燒掉。

過了一會路光拿來兩件東西，問燒不燒？一件是陳伯達送我的字「天地馳驅客，英雄清淨身。留心千古事，不厭一寐塵。」還有一件是葉群的詩「繁霜冷雨仍從容，晚節尤能愛此功。寧願枝頭抱蕊老，不能搖落墜西風。」我是個不懂詩的人，過去對這些東西也不太在意，今天看到後反而對我刺激很大，懂也罷不懂也罷已經過去。我告訴路光統統燒掉。

從「九一三」到九月二十三日十天的時間，對林的問題怎樣處理，毛主席、周總理、葉劍英等人是費了腦筋的，因為在黨的歷史上，林的把柄是很少的。我考慮當時處理的辦法祇有兩條：一是「暫緩」處理；二是以「反革命」處理。結果是採取了後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就是抓住林彪「外逃」二字做文章。這在當時是最簡單、最順手的辦法，但又是極端錯誤的辦法，我說的錯誤並不是完全針對我們幾個人，而是說主席爲了他的文革，爲了江青一夥，政治上完全失去平衡，從而爲他自己變成孤家寡人創造了條件。雖然，抓我們的時候，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沒有來，可是中央文件發佈的「林彪反革命罪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等，有大量的謠言都是出自這幾個傢伙之手。

林彪決不可能是反革命，但又「外逃」了，怎樣解釋？這不僅是後來，就是現在很難說清楚的。林彪爲什麼會「外逃」？我認爲是葉群、林立果不惜犧牲林彪的一切，爲了自己的私利造成的。一是，對林彪封鎖一切消息，林彪本人什麼也不知道；二是，葉群把林彪控制起來了，他的女兒和工作人員都不能接近林彪；三是，葉群採取惡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禮品」送給蘇聯。與其說林彪是外逃的，還不如說林彪是葉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我的看法以後會得到證明。

第三十七章 淚別周總理

北門解迷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四日，整整十天的時間了。在這十幾天時間，我的腦子整天都是嗡嗡響的，像做夢一樣。但不管怎麼想，把我關起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待到二十四日約八時半進了人民大會堂的北門，我的迷夢才醒過來。

二十三日晚上，我還在給主席寫檢討報告，劉秘書就來向我報告了第二天的外事和內事活動。第一件是：早六時去東郊機場送李先念出訪越南；第二件是：下午有外事活動，主要是談軍事援助問題；第三件是：早八點福建廳政治局會議。對早八時福建廳的會議，我倒稍微愣了一下，按慣例政治局會議都是晚上開，為什麼改在早上開？但我又想，這是非常時期，可能有緊急事要處理，也就沒有多去想了。

對周總理安排的活動，我向來是一不請假，二不誤時，二十四日我早早就起來了。我如同過去一樣，帶上警衛員小朱坐車按時向東郊機場去了。雖然沒有睡好覺還有睏意，但在北京秋高氣爽、涼風宜人的季節，很快也就精神了。

我到東郊機場貴賓廳之後，來的人還不多。因為今天有外賓，我還是選擇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坐下。為什麼要坐在適當的地方呢？這是吃過苦頭的。大約是六八年的什麼時候，也是在東郊機場貴賓廳的外事活動。那天我去得稍晚了一點，除了挨著主賓席還有兩個空座位之外，其餘都坐滿了。我看著主賓席就不敢去坐，另外找了一張凳子坐在別人的後面。周總理來了，他看到還有一個空位子，兩眼一掃看見了我。他走到我跟前，二話不說，把我拉去同他坐在一起，並且還說：「我又不是老

「我祇好推托說：『我是抽煙的。』」總理說：「你儘管抽就是了。」此時，全廳的人都笑起來了，我真難為情。

我坐下之後，服務員照樣送茶來，煙就在茶几上可以隨便抽。我一邊喝茶，一邊抽煙，所看到的一切，都同過去是一樣的。不久，李德生來了，他挨著我坐下了。李德生是一個開始紅得發紫的人，我當然不會主動問他任何問題。但他還是主動問起我來了。

「你們總後的常委會開得很好嘛，中央的第一號簡報就登的你們的會議情況。」李德生首先這樣說。

「第一號，第幾號還不一樣，號數不起任何作用！」我的回答，其中略有意思。

李又說：「這也可以看出你對毛主席、中央的態度嘛！」

我祇「嗯」了一聲。沒有同他細說下去。接著，我補了一句：「我準備發動總後的常委對我搞揭發。」李德生對我說的「揭發」一詞沒有做正面回答。他祇說：「能搞起來嗎？」又說：「即使搞起來了，也祇能說些柴米油鹽的事，這有什麼用？」談話稍停片刻，李又問：「你們總後常委是怎樣分工的？你哪有多少時間管總後的事，日常工作是誰管？」

「家裏的工作由張池明政委抓總。」

此時，周總理來到了。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系統談下去。從事後來看，李德生同我談話是有目的的，他在做調查工作，我是一點也沒有在意。

總理來了之後，不久起飛時間就到了。臨去機坪時，李先念憂慮地跟總理說：「我很擔心主席和總理的安全。」因為我坐在旁邊，總理聽到這個話，有些尷尬，他順手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一邊拍著我的手，一邊對李說：「你放心去，一會政治局要開會，研究今後的工作。」

在停機坪上，我和總理並排站在一起，記者拍了不少的鏡頭。送走李先念後，總理主動對我說：「八點鐘福建廳有會，知道嗎？傳達主席的指示。」我回答說：「知道。」

總理又說：「我就直接去大會堂了，你還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說：「那我也不回家了。」

總理說：「你不回家，還不給胡敏打個電話。」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把我們抓起來，隨即笑著對總理說：「給她打電話幹什麼。一块字读书社区制作不用。

總理說：「那好吧，到大會堂，我們先談一談。」

上了汽車之後，我又抽起了煙。小朱勸我不要再抽了。車開出機場不遠的地方，司機告訴我說：「後面有隨車。」我說：「讓開，讓他先走。」過了一會，司機又說：「停了，不走。」我們邊走邊停了三次，隨車都跟著走。中央辦公廳規定，政治局委員都要有隨車，我也沒有起懷疑，其實，大禍已經臨頭，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相反，我還想過總理說的「向你們傳達主席指示」，很可能是福音，給我們卸包袱的！

人大會堂北門有內外兩重門，門與門之間有個短過道（其他門也一樣）。我一進外面的一道門，在過道上就有警衛幹部一把把我拉到旁邊的小房子裏去了。我以為是有緊急電話呢，一進小房子就搜摸我全身，我來不及說話，搜摸我身上的人就說，今天要檢查一下。我進到裏面的二道門時，看到警衛員小朱的後影，有兩個人把他連拉帶拽地向西走去。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解謎了！然後兩個人把我押進了福建廳。（我九二年從西安到北京，跟隨我多年的老司機張自貴來看我。在回憶往事時，他說：「當時也把我扣押在人大會堂地下室，我又氣又納悶地對小朱說：『還敢扣押我們，準是反革命政變了！』我看著忠厚、老實的張自貴，笑得肚皮都痛了。）

一踏進福建廳，一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變了。

福建廳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辦公地，今天可成了法場了。廳內過去的佈置是東西一圈橢圓形佈置的沙發，對著門是敞口，離門不遠的地方還有一扇屏風。今天的佈置是：東邊祇有兩張單人的沙發，南邊四張沙發，北邊還有兩排若干張沙發。廳內沙發後面有若幹警衛人員像西安臨潼兵馬俑的泥人一樣，面無表情地站立在那裏，每個人手扶著腰上的手槍。葉劍英、李德生、紀登奎、張才千、劉賢權在北面的沙發外站著。他們對我視而不見，我也沒有同他們打招呼。還有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走來走去。這種場面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我是一個沒有被敵人俘虜過的人，今天倒被自己的人「俘虜」了，這種場面就是讓我們「見識見識」。

我被押進福建廳被指定坐在南面的四張沙發靠東面的最後一個位置上。剛坐下，總理的警衛員小高進來對我說：「總理叫邱副總長到河北廳去談話。」我剛起身，楊德中立即對小高說：「現在不談了，等會一起談。」

我給總理解釋。」過了一會，小高又來喊我。楊德中有些不高興地說：「告訴你不談了，怎麼又來喊？一會我跟總理解釋！」小高邊走邊嘟囔說：「是總理叫我來的。」

我是第一個到福建廳的，不久，吳、黃、李先後到了，他們進來時，同我的神情幾乎一樣。

周總理的談話

大約九時，總理在楊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廳。看上去，總理心情沉重，很疲勞，步伐也不十分穩健。楊德中有意坐在總理和我們之間，這種坐法就是爲了「安全」，把總理和我們分開。他是中央警衛團的副政委，專門負責總理安全保衛工作的。楊德中這種做法，在我們來看是多餘的，在他來看是必要的。

總理坐下之後，首先喝了一口茶，並掃了我們（黃、吳、李、邱）一眼，即開口說：「主席對你們的問題有決定。這幾天各省市和各大軍區的電報，你們都看了。上海、陝西、天津的意見很尖銳，政治局內部的意見也很尖銳（指江青一夥），這樣就祇好先對你們採取一些措施了。黨內發生過許多重大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都處理得很好。這次對你們的問題會處理得更好。」總理的講話很平靜、很客氣。

總理說到這裏又喝了一口茶，並略微思考了一下，說話時前後並不連貫。總理主要指責我們不該跟著林彪反對江青和中央文革，「九一三」之後，又久久不表態。總理說：「出事都十天了，你們幾個人一言不發，一字不寫，不知是什麼原因？這樣，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你們暫時離開工作的崗位，認真考慮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林彪叛國，造成很大的被動，上了黨章嘛，幾乎要毀掉我們的黨。」此時，吳法憲支吾地說：「我昨天晚上向主席、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凌晨五時送出去的。」總理對吳法憲的話沒有做任何表示。

總理接著說：「不知你們在想什麼？九大時該照顧的都照顧到了（指都是政治局委員了），還有什麼想法嘛！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新力量（指江青一夥），是好事，這有什麼不好嘛！？」接著，總理又補充了一句：「政治局的產生，你黃永勝是參與其事的。」

總理歇了一會又說：「過去有人（指江青）在病中說了幾句話，（你們）就懷恨在心，那些問題都可以說清楚嘛！」總理的話是指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對林彪發脾氣說：「蔣介石搞了一個黨國，我們現在搞了一個軍黨，軍國。」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問題。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勝利之後，林彪不能獨吞果實，中央文革是出了力的。總理在廬山會議之前和以後都不同意江青這樣提問題。因為主席沒有批評過江青這個問題，江青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很傲慢。但不知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之後，在我們走背字的時候，江青反而自己在政治局會議上主動說：「我在患病的時候，說過一些話，可能欠妥，但那是病人說的話呀。」總理當時就批評她：「話不能這樣說，不能把說了不適當的話都推到病的問題上去。」現在總理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又變了，有些袒護江青，這完全可以想得通。

總理說：「主席說過，出事之前，什麼都聽不到，現在情況象雪片一樣飛來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說得出來；完全聽吧，又實在觸目驚心。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讓你們幾個離開工作崗位一段時間，專門反省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你們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總理接著又重複說：「主席說等了你們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時間，你們怎麼一個字都沒有給主席寫？」

我們都默默無語。寫什麼呢？難啊。關於廬山會議的檢討，在主席那裏已經過關了，主席還跟我們開玩笑。在主席那裏檢討過關以後，我們沒有犯新的錯誤，「九一三」的事，的確一無所知。寫什麼呢？總不能說我們也搞「政變」吧！？實際上，我們被關起來以後，主要挖我們的就是「政變」問題。

至此，總理停了好久沒有說話。他至少三次拿起茶缸子喝水，一邊喝水，一邊在想什麼。他對著葉帥和其他在座的軍委辦事組的人說：「大家都說說嘛，祇我一個人說？」葉劍英張了一下嘴，但一句話也沒有說。紀登奎即說：「今天總理多說一點，我們以後同他們談話的機會還有呢！」

然後，總理先問了黃永勝幾件事，主要問的還是前幾天辯認的那封林彪給黃的信，黃完全否認，態度很強硬。總理又問起李必達的事，黃此時有些激動，黃氣憤地大聲說：「總理啊，我們對江青同志是有自由主義，但是你清楚，在座的也清楚，這是因工作中和江青同志有矛盾給逼

出來的。如果是主席批評我，我接受批評。總理您想想，一個秘書有意偷聽首長的電話，這樣的人能要嗎？你們在座的能容忍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總理不好再往下說，從座位上起來，一邊說：「你先走吧。」一邊走上來和黃握手，並叫吳忠跟黃走。黃快走到門口時，總理又說：「你們聽好，你們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閃失，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實，沒過幾天我們幾個人的老婆、孩子、親屬和秘書、司機、警衛員都抓起來了。總理已經不能控制局面了。

接下來，總理問吳法憲：「林立果大學沒有畢業，就當了什麼副部長。林彪的子女都在你們空軍工作。空軍搞得很亂，你吳法憲是有責任的。你把空軍搞得一塌糊塗！」

總理剛問完，吳就站起來說：「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我們軍委辦事組反對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

因為吳提到了軍委辦事組反江青的事，李作鵬突然大聲說：「吳法憲胡說八道！是他自己討好林彪、葉群。」李心裏認為，反江青算什麼錯！事情發展到今天，可以說與反江青有很長的歷史淵源，今天，不但有一肚子苦水和冤屈倒不出來，反而馬上就要被抓了，李激動得不能自己。

總理沒有顧及李，馬上對吳說：「你也走吧。」並與吳握手。由楊俊生跟吳走了。

總理又坐下來對李說：「不要急，有充分的時間讓你們考慮問題。」

總理接著說：「張學思是怎麼死的呀？」

李是一個頭腦很清醒的人，他有板有眼地講了張學思的情況，說是中央專案組直接搞的，辦案子和海軍沒有關係，也沒有插手。一聽中央專案組，總理就沒有往下問了。總理又問李：「聽說海軍層層站隊搞得很厲害？」

李說：「總理的批評是正確的。海軍不團結，基本上就是一個派性問題，是有些擴大化，沒有控制住。我有責任，我檢討。」

我同李作鵬的關係，可以說是非常好的，相當真誠。但我聽到他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可見我們是多背吧。

總理先後問他們三個人的話，問到的都是一些工作上的問題和「雞毛蒜皮」的事，我聽著聽著突然腦子裏「嗡」的一響，好像開了殼似的。我這時才想到主席早就決定抓我們了，所謂等了十天，不是胸懷大度，而是在收集我們的「罪狀」，以此來降服我們。

李作鵬走時，總理也上去與李握手。

總理有些生氣地問我：「你怎麼也搞進去了？」我沒有吭聲，也沒有正視總理。接著，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給豆豆、林立果找對象的事講了一下。

總理又問：「盛玉華怎麼搞到總後去了？什麼忙都亂幫一氣。」

我向總理做了檢討。

總理接著說：「你們抓了李必達，連李必達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了。王瑞華同志搞到哪裏去了嘛？」

王瑞華是三〇一醫院高幹病房的護士長，工作表現很好，她是李必達的未婚妻。李必達事件發生後，我沒有叫三〇一醫院處理她，因為她是九大代表，要慎重一點，就把她送到四醫大學習去了。總理幾次都問李必達的事，我知道我們要倒大霉了，因為李必達的事是和反江青直接有關的。

我走前總理和我握手，我含著淚對總理說：「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總理那雙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說：「好。」我就要離開福建廳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我雙手握住總理的手，從肺腑裏吐出一句話：「希望再見到總理！」總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氣說：「到那裏去，好好住下！」

我從十六歲就認識總理，黨把我從一個紅小鬼培養成一個高級幹部，轉眼四十年過去了。在文革中，我被造反派多次打得死去活來、遍體鱗傷；傷還沒有好又投入到夜以繼日的工作中去了，忙得有時身體都難以支撐，但還是咬著牙幹。真沒有想到最後反而成了反革命。不過，我向來都有這樣的思想：不管在什麼情況下，相信黨是不變的，今天同樣不變！一個老共產黨員，如果連黨都不相信，也就不是具有革命意義的人了。而相信黨不祇在一般情況下要這樣，特別是自己處在嚴重困難的情

況下，嚴重受冤屈的情況下，在黨不相信你的時候，更是要相信黨。祇有這樣，自己活著才有信念。

三相信

下午時多一點，也是由中央警衛局的人把我押走，由福建廳到地下室，在地下室有預備好的汽車，車門對著電梯口，下了電梯就上車了。

與我同車的有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我不認識，他坐在前面駕駛室裏。我坐在後面，兩旁各一個警衛人員把我的手壓在座墊上。車出正陽門往東走，拐向北，再向東，走在去東郊機場的路上。因為警衛戰士對我的手越壓越緊，我向大隊長提出：「應該壓得松一點。」大隊長即下命令：「放鬆一些。」我們一共三部汽車，徐徐開進了部隊的營房，把我關起來了，我的政治生命，從此宣告完結。

這裏是北京的順義縣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部，我被安置在二連營房中間的一間房子裏。房子裏有單人木板床一張，小木凳子一張，小桌子一張，舊搪瓷臉盆一個，一個飯盒子和一雙筷子，一隻搪瓷飯碗，這就是房間的全部設備了。

進了房間之後，因為太疲勞了，便躺在床上。我眼睛一閉，過去的事活生生地一幕一幕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裏。我使勁不想那些，但怎麼樣也擋不出去。

不久，看管的人給我打來了飯。一個三層的飯盒子，一層是大米飯，一層是白菜，再一層就是湯了。一菜一湯。可是大米飯裏，稗子和砂子很多。我的牙不好，我最忌諱飯裏有砂子，祇要吃上一粒砂子，整個牙都酸了，根本不能嚼東西。於是，我就把開水倒進飯裏，用筷子一攪，砂子沉底，吃上面的就是了。這是我在衛戍區的第一頓飯。

可能是下午五時多一點，又打來了晚飯。除了米飯換成饅頭之外，菜餚是一樣的，打飯的人對我說：「這是招待所打的飯。伙食不很好，你忍著吧。」我祇看了一下盒子裏的飯，一點也沒有吃，就放到桌子上了。一天沒有進幾粒米，看管的幾個人有些著急了。站在我旁邊的人說：「你不要過於焦急，有什麼問題，組織上會解決的，還是要吃飯，要注意身體。」我抬頭一看，同我說這番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送我來的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接著，他這乘機又悄悄說：「我們快要回去了。」

總理都把話給你說清楚了，你不要忘記總理說的話，時間不會長。你還是要吃飯，不然總理是不會放心的。你還有什麼話要我帶回去？」我向那位大隊長表示感謝之後，請他回去後向總理轉報三點。第一點，請總理放心，我不會胡想，也不會胡爲。我決不會做那種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周總理的事（指自殺）。第二點，我對自己的問題心中有數。第三點，我很惦念我的妻子、兒女。我永遠不會忘記總理在福建廳對我們的家屬問題所說的肺腑之言。在我剛參加革命的時候就認識了總理，以後又多次長期在總理直接領導下工作，能夠經常得到總理的教導，真是三生有幸。我在大會堂對總理說過：「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我堅信到底，也請總理記住我的話。

永遠懷念周總理

押送我到順義的那位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走了之後，我就上床躺下了。大約到了七時多一點，我就向看管的人要了安眠藥。過去，服「速可眠」很管用，吃了之後至少可以睡六小時，可是今天服了安眠藥一點作用也沒有，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睡。

由於睡不著，我就要來紙和筆，向總理寫了一封長達十幾頁的信。其中主要內容就是回憶我同總理的關係。我同總理的關係確實是不尋常的。信寫好之後，我看表已經早上六時了，我第二次要來了安眠藥，這次睡了五小時以上才醒來。我腦子比較清醒之後，把寫好的信又看了一遍，我立即醒悟到，目前寫這樣的信完全沒有必要，有可能給周總理造成困難，便立即把信撕了。

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是一九三〇年冬，在福建的泰寧。我們紅五軍團部隊開大會，周總理當時是中央蘇區紅軍的總政委，他來給部隊講話。我祇有十六歲，個子還矮，又在隊列之內，離講話的地方可能有幾十米遠。除了看到周副主席的大鬍子之外，其餘什麼也沒有看到，講的什麼內容也聽不太清，即使聽到一些也不太懂。例如，周總理說的兩條戰線鬥爭我就不懂。

一九三二年，我被選送去瑞金紅軍學校特科團學習。由於我的成份好，是黨員，學習成績又好，畢業時，被選送去總部供給部做機要統計員，管理全軍的實力統計。這是絕對秘密的工作，因為要掌握全軍的人

數、馬匹、槍支等數字。總供給部有我這樣一個人，周副主席早知道，但沒有見過。一九三四年三月間，一天早飯後，總供給部部長葉季壯突然告訴我說：「等一會，我們一起到總司令部去。」在路上，葉部長才告訴我是到周副主席那裏去開會。我心裏很高興，但也有些緊張。我們到了周副主席的辦公室，不一會，一個大鬍子從內間出來了，葉部長向周副主席介紹說：「這是我們的機要統計員邱會作。」

周副主席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啊，是個小年輕。」接著周副主席把國家政治保衛局一個人也叫來了，然後就開始向我們交代任務。

周副主席說：「你們兩個人帶一個保衛班，由邱會作總負責，去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把兵工廠、衛生材料廠、紡織廠和七個倉庫一律炸毀。有些東西沉到河底。這個工作要做得徹底，要採取夜間行動，要絕對守秘密。」我們接受任務後，做了必要的準備就出發了。我當時祇有十九歲，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們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大約是一九三四年八月間，我隨同葉季壯部長去向周副主席匯報工作。周副主席見到我就說：「我已經看到了你們的書面報告。小人辦大事，任務完成得很好。」

三四年十月，長征出發前的一天黃昏，政治保衛執行局長張炎和到總供給部來，要把我抓去處死。因為我辦了與長征有關的重要事情。可是葉季壯不在，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但真是湊巧，在押我執行的路上，正好周恩來、鄧發、葉季壯三個人騎馬迎頭而來，葉季壯看見我大吃一驚，立即問周副主席是怎麼回事，周恩來也有些驚愕，但沒有說話。祇是面向鄧發，鄧發向周恩來擠擠眼睛（示意是按老規矩辦），我則死死地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略加思考對鄧發說：「他還是個孩子！交給葉季壯帶回去吧。」這樣又給我鬆了綁。周副主席把我的命保下來了，並指要帶我長征。這些事，我當時不可能知道，長征到了陝北之後，周副主席、葉部長才對我說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長征到了江西、廣東交界，通過了第一道封鎖線的水口地區。中央縱隊五千多人的運輸部隊，大部分垮了，軍委縱隊由我管的一千多人的運輸部隊大部分未垮。周副主席就在這緊張的情況下，把這兩支運輸部隊合併成立運輸指揮部，並任命我負責（沒有正式

職務)，統一指揮三千多人的運輸部隊。這支部隊到貴州還有一千五百餘人，並不比戰鬥部隊減員更多，周副主席非常滿意。

三四年十二月，在貴州南部，周副主席親自授權我組織向五軍團運輸銀元、煙土的護送隊，並任命我為隊長。為了防止萬一發生情況，還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給了我一張遊擊司令委任證書。我們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義，周副主席親自選調我到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物資分配處工作。我去工作的時候，周副主席對我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依我看，你這個小青年會管得好的！」

三五年五月間，在四川的天全縣，周副主席親自任命我為軍委第四局三科科長，主管行政、軍務和供應等業務。從此，我同周副主席就在一個單位生活了，朝夕可見。在一個時期，周副主席有時就叫我「小青年科長」。

一九三六年，紅軍東征期間，周副主席任陝北後方辦事處主任，我是總供給部駐辦事處的代辦處長。在不短的時間內，我同周副主席除了工作關係之外，都是同住一個院，共同生活，有時一起娛樂，在生活上非常密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周副主席在南京電告毛主席，對葉季壯、楊立三、邱會作三個人的工作提出了具體建議：葉季壯主要搞統戰，任十八集團軍軍需處長，楊立三以第十八兵站分監的名義到前方總部任供給部長；邱會作任中央軍委供給部部長。

一九五四年，由黃永勝建議，周總理批准，調我任總後方勤務部副部長兼副政委（黃克誠是部長兼政委）。

一九五六年，周總理親自要我到國家經委任第一副主任。後來，我要求先學習後到職，總理批准了。我和武競天等人到蘇聯溜了一大圈，回國後彭、林、黃都不放我走，未曾到職。

一九五九年，周總理先後同林彪、羅榮桓商量，建議我任總後勤部長，總理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對我做了讚揚性的介紹。我任總後勤部長後，雖然在國務院沒有職務，但我是固定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在國務院會議上，我能得到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央的許多指示。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期，造反派在全軍文革縱慾下對我進行了嚴重摧殘，總理對我是大力保護的。從六六年十二月到六七年一月底，周總理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發表過多次對我保護性的講話。由於造反派根本不聽總理的話，對我的保護未曾免去我的災難。

周總理曾經派人讓上海的造反派向二醫大「紅縱」做工作，要他們無論如何不能對我進行武鬥，並對我作了肯定性的講話。但全軍文革沒有執行總理的指示，同樣沒有解除我的災難。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總理、葉帥的關心下，才把我從造反派的手中搶救出來。

從六六年十一月開始，到六七年三月，我被造反派多次打傷。我傷

之後，總後黨委舉行兩千多人的幹部大會，歡迎我回總後主持工作。

毛主席派周總理送我回去，總理並在大會上對我做了很高的評價。他說：

「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經過長征的，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

我還在江西的時候就跟和他相識，差不多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

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是到了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

主席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時候邱會作同志也就參加後方

工作，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

工作，渡黃河東征的事情，所以那陣子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爲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

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證

實，覺得我的看法是沒有看錯的……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

出色的後勤部長。」總理的講話，對我本人，對總後的工作，對全軍後勤

工作都是很大的鼓勵！

一九六八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以林彪爲首的軍委辦事組和以江青爲首的中央文革開始了激烈的鬥爭。我從軍委辦事組的角度，經常向總理個別匯報林彪、江青之間的鬥爭情況，直到我下臺爲止。總理是完全站在林彪一邊的。

一九六九年周總理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建議，要我主持國防工業的工作。我開始任常規兵器小組組長，後任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主管全國的國防工業。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釣魚臺召集黃、吳、李、邱、李德生、姚文元談話反總理。兩小時後我就把情況向總理報告了（江青以前的

三次談話，我都及時向總理匯報了）。總理拉著我的手說：「感謝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九大以後到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期間，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表面上對江青一夥和我們是「公正」的，但實際上又是支持我們的。有一次總理找我個別談話，他說：「今天晚上，你有什麼話要同我說的嗎？」我懂得總理說話的意思，把我知道的事（總理不知道的）全部對總理說了。總理很高興，說：「你幫助我做了心中有數的事。」從此以後，總理對我們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上都沒有變。

從廬山會議以後，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陳整風會議之前的半年時間裏，總理曾經同我個別談話兩次。一次是詢問我在總後黨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廬山會議的情況；一次是詢問我在軍委座談會上對主張對有關廬山的問題要做自我批評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總理嫌我沒有及時向他報告，失掉了向毛主席提出建議的機會。總理還對我說：「你要同過去一樣，有什麼事及時對我說，為我爭取工作上的主動。」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的當天下午，總理有意分配我做與我的工作關係不大的工作。例如，收拾三中全會的會務工作攤子，組織京西賓館的防空等等。

九月十七日，周總理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下，還藉故給我打電話，主要是對我做鼓勵工作，表示是保我的。

九月二十四日，我就要隔離審查之前兩三小時，周總理還想到要同我個別先談談，但受到了楊德中的阻攔，未曾談成。

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在衛戍區隔離受審查期間，總理對我依然很關心的。例如，要衛戍區給我送蚊帳、涼席、電風扇等用品。據衛戍區看管的人同我說：「總理除了沒有批准你喝酒之外，一切都辦到了。」

七二年五月間，當時的江青一夥控制的專案組，對我的審查告一段落時，總理還要專案組向我傳達了三條：一，你交代的那些問題，不要有什麼負擔，中央主要負責人對你是瞭解的；二，利用機會多讀幾本書；三，注意身體。從此之後，江青一夥控制的專案組，對我的審查就基本結束了，我也就安心在衛戍區警衛三師等待處理。

我一九三〇年第一次見到周總理，到一九七一年同周總理最後分別，將近半個世紀。我從一個普通戰士成長為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領導幹部，同總理同桌辦公，這是不可想像的事，但又是歷史事實。周總理是我的領導人，是我的長輩，是我的良師益友，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三四年周總理救了我一命，時至今日，使我多活了五十二年。

一九七一年我被隔離審查之後，周總理陪外賓去廣州，會召見當時還在廣州軍區工作的我的二兒子承光。他除了鼓勵我的孩子之外，還當著我的孩子的面，向軍區首長交代：「對孩子要一視同仁！」一九七三年我的女兒直接向總理寫了報告，總理有批示，當時解決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

總理對我的家屬是關心的，我根本不相信總理對我們會下狠心。我同總理的關係是誠摯深切的，總理對我是關心和器重的。我永遠懷念周恩來

總理！在衛戍區經過不幾天，我的情緒就穩定下來了。我想到的是：在這裏不是「住幾天」的問題，而是長期受審查的問題了。

第三十八章 在順義的日子裏

改天換地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從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把我押送到順義縣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部關起來了，在警衛三師，我度過了五年又三個月，於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離開，押送到了秦城監獄。

七〇年廬山會議之後，主席是很信任江青，很信任江青一夥的。林彪不吃香了，我們也不會太吃香了，這是預料之中的事。但要我們下臺，還沒有想到。因為我們不僅是林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是毛的人，是黨的人。我想到的也頂多是政治上慢慢淘汰，「文明」下臺，根本沒有想過會把我抓起來。對我的審查，七二年五月底就基本結束了，以後再也沒有找我系統地交代過什麼問題。毛主席在世時，出現了林彪那麼大的問題，可毛主席也沒有把我們送進秦城監獄，江青一夥也沒有在把我們關進秦城的問題上興風作浪。現在倒好，「四人幫」打倒了，我們正在高興時，卻把我們關進了秦城監獄，這就錯上加錯了，想來想去不得其解。

八九年在北京見到李作鵬和吳法憲，得知他們的情況也和我差不多。可見，毛主席、周總理健在時，主要是清查我們與林彪有沒有「兩謀」（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之類的反革命關係，因為我們和林彪根本沒有兩謀的關係，審查多久也不會審查出來的（退一步說，林彪知不知道、有沒有參與林立果搞的「兩謀」問題，直到現在也是沒有證據說清楚的）。毛主席是下決心不要我們了，但還沒有要徹底打倒我們，對我們還是審查。當時，可能解脫我們的「火候」還不到，也有江青一夥的阻力，也只能「掛」著了，到七六年底進秦城前，幾年內我們一直關在著。看快序讀書

剛進衛戍區那幾天，我心裏還有點「吊著」，因為說我們要跟林彪搞政變，但過了國慶節，全國是穩定的，沒有什麼「大新聞」，我的心就放下。我從那時起，從來沒有相信林彪要搞什麼政變，這完全是爲了搞倒林彪，搞臭林彪，給他戴的一頂大帽子。

在衛戍區，我一天能接觸到的客觀事物就是吃飯，看報紙，在房子裏走步，這是見天如此的「三三」制。吃三頓飯要不了多少時間；讀每張報紙，即使從頭到尾一字不拉地讀，也要不了多少時間；一棟空房子，走上一小時就走膩了。每天都是度日如年，精神上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

不管怎麼樣去想，都沒有想通，這是最痛苦的。在順義五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裏，祇有在書本子上找出路，我讀了厚薄不同的書上百本，馬列的書，中國歷史書，文藝書，三種書都讀。例如，毛主席提出的三十本馬列主義書，外加馬恩選集、列寧選集等；還有能找到的中國歷史書；文學著作，有《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外加《東周列國志》，現代文藝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我都讀了。讀書時，越是難讀的，則更喜歡讀。一天到晚，祇要讀通了一頁書，或搞通了一個什麼問題，時間就過去了，心裏也感到很高興！讀書成爲我「度日」最好的方法了。我用讀書的辦法，解決了時間之「多」。

家屬情況怎樣？這是我不能不關心的問題。當時，我一家四代九口人，老的是八十多歲的老母親，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殘酷武鬥，說我頑固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老母親在家聽說後，又氣又急，瘋掉了。「九一三」時，小孫女祇有十幾天，小女兒也剛剛十三歲，他們怎樣活下去？這是我不可能不想的問題，現在雖然還不知道他們的處境，但家屬不受株連也是不可能的，「家破人散」是肯定的。

我明明知道自己事實上成了一個階下囚，那裏還顧得上家！祇有讓他們聽天由命了！可我越控制不想，他們可越「來」的勤快。祇要一閉眼睛，家裏的親人就會浮現在我的腦際。

我住的房子外面的樹上，有一窩老鴉，它們好像在故意逗弄我，每到黃昏的時候，都吱吱喳喳在叫喚，直到把它們「家裏人」都叫回來了。鳥都知道「全家福」，這對我鉤起了好多念家的心思。

爲了試探胡敏是否在家，我用讓看管人員從家裏拿東西的辦法去試探。七一年十月六日，從我家裏第一次拿來了日用品，都是普通的物品，裏面還有口罩、手帕等，說明胡敏還在家，其他任何人都不會這麼細緻。後來我指定要拿《王雲五字典》，這種字典非胡敏或路光在家裏是找不出來的。他們連續去過幾次人，都沒有把我要的東西拿來，我就斷定胡敏不在家了，連老婆也抓起來了，我是沒有想到的。

一九七二年三月間，專案組對我的「閻王氣」就比較少了，我們之間雖然不可能有共同語言，但見面之後閒話就比過去說的多些了。因爲我與林彪沒有「兩謀」關係，查來查去也無用。有一次，我硬著頭皮問專案組：「胡敏，現在什麼地方？」專案組說：「可以告訴你，胡敏另外給她安排了住處。你母親還住在三〇一醫院。你的小女兒還在上學，小女兒很有禮貌。」對專案組說的話，我確實是信以爲真的，因爲他們說的好像真有那回事一樣的。這段時間我對總理講的「三相信」，對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特殊首長」

在順義看管我的幾個人稱「四組」，我估計是按黃、吳、李、邱排下來的。七二年元旦過後不久，在閒聊中我才知道他們稱呼我「特殊首長」。我說：「你們十多人，辛辛苦苦爲了我一個人！」他們有人脫口而出地說：「這有什麼辛苦，你是特殊首長！」我又說：「你們年青人，很會說開心話。」接著，他們的負責人就比較慎重地同我說：「我們自己說話時，稱你特殊首長，這並非惡意，是我們師長同我們開會做指示時這樣說的，後來我們就照著說開了。」

在衛戍區的五年多，我一直同看管人員的關係很好，特別是後四年「住閒」之中，同他們的關係更好，他們幾次同我講了一些周總理對我們的指示。

他們說，總理對看管工作經常有指示，七二年過春節的頭一天，總理召集看管黃、吳、李、邱的全部人員和有關的師團首長開過一次會，總理在會上做了重要指示，把看管工作提高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還講得很具體。

總理說：「對黃、吳、李、邱的看管工作，可以概括為三條方針：第一條，保證安全；第二條，保證身體；第三條，保證生活。」

總理說：「我是看管工作的第一組長，李震是第二組長，你們的吳忠司令是第三組長，你們各個工作小組就是第四組長了。我們一致努力就可把這件事辦好。這件事是不能辦壞的，如果讓我們看管的人都病了或者死了，我是無法向毛主席交代的。這裏，我要同你們交個底，毛主席對他們幾個人都是很瞭解的，他們是路線問題嘛。你們瞭解了這個底，就會更好辦事了。」

我初來這裏的時候，師長每天的多數時間都同看管組一起度過。我親的一切情況，從吃飯、睡覺、拉尿、散步、抽煙、喝茶等等師長都要親自過問。凡遇到困難，如燒煤，建廁所、搞火牆等都能立即解決，都是師長現場指揮的。

我的看管組變更過二次。第一次一律是師部的科長以上的幹部，政治部主任是現場的帶班人。這個組的時間不長；第二次一律是連以上幹部，這個組持續有一年多的時間；第三次是幹部和老戰士各一半，這個組直到把我送進秦城都是這樣的。

看管組對我的態度，從開始到最後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七三年秋天之後，我基本上是閒住了，生活的「花樣」多了一些。例如，他們同我一起打羽毛球，他們打乒乓球，我給他們當「裁判」。他們打撲克，我給他們當記分員。

警衛三師師長是華東野戰軍的幹部，同我一樣都操客家話，客家人是很講義氣的，我們互相交談都很高興。因此，我關在警衛三師之後，他從他的工作出發，對我是很關心的。他多次到我的房間來看我，在話語中有安慰之意。例如，他第一次到我房間來就同我說：「現在就要管自己了！我規定，你每天上、下午要走廊裏散步兩次，多活動對身體好。」他說完之後，拉著我就往房外走，並同我一起散步。師長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生活問題之一。我對生活需求很簡單，祇是要求能吃得飽，睡得著，拉得出。這三件事在進衛戍區之初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從剛到衛戍區直到十一月底前伙食是非常不好的。每天在戰士食堂打飯，除了洋蔥、老白菜之外，最好的菜就是煮土豆。飯食壞無所謂，

祇是米飯裏的砂子多，我都不敢下嘴，咯一次牙要難受好幾天。我每天早上，祇好祇喝一碗稀飯，留一個饅頭中午吃。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的體重由掉了二十多斤。當時的政治氣氛非常嚴肅，他們明知我吃不好也沒有辦法，上面沒有指示他們也無可奈何。如對我稍有照顧，很可能被扣上階級立場不穩的帽子。

有一天，吃豬肉燒土豆，這是很好吃的菜。如果換上牛肉土豆，就是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了。晚上，把飯打來之後，香味使我高興極了！我把幾塊瘦肉吃了之後，還不解饑。於是，我就把幾塊肥肉也吃了，香得我幾乎把碗都吞到肚子裏去了，我的饑勁，連自己都不相信。可是我的腸胃享不了「大福」，把肚子吃壞了，拉肚子拉了一個星期才好。

這樣，在幾十天之後，我瘦的不像樣子了。就在此時，周總理派專人來到我的住處秘密察看我的身體情況，來的人是認識我的，一看嚇了一大跳，恰在這個時候，黃永勝向毛主席寫了信，要求改善伙食，毛主席批准了。看管的人同我說了，毛主席講：「他們幾個人應當吃好，有資格吃好。」從此以後，伙食就大為改善了。

從七一年十二月一日起，我的伙食就是新的標準了。當時，中央規定的是每天伙食費一元。師首長讓我在師小灶打飯吃，每天晚飯還為我加一個菜。從此以後，我就不是吃不飽了，而是吃不了了。每天打飯的時候，我總是交代少打一點。為了我的吃飯問題，師長經常在我吃飯的時候就來到我住處親自察看。要是不滿意，就立即採取措施。中央專案組的人也經常問到我的生活情況；有時也要親自看我的飲食情況。總理對他們說過：「今後他們要再掉磅，專案組要負責！」此外，總理還規定，搞專案的要管三條：管審查，管思想教育，還要關心生活。在總理的關心下，我的伙食一直很好，直到離開衛戍區都是很好的。

住房問題對我來說，實際上就是冬天取暖問題。房子沒有暖氣，燒爐子容易中煤氣，師長決定用做火牆的「土」辦法了，並限期三天內要辦好，人要能住進去。由工兵營設計施工，限期辦好了，經過實驗，效果很好，取暖問題解決了。

師長還派車到山西省陽泉拉運一種好煤，每年冬天都是燒的好煤並派了個鍋爐工專燒爐子，取暖問題，解決得非常好。按照氣候變化的需要，有的年份，十月初就燒火牆；有的年份春天一直燒到四月才停止。

在衛戍區我穿的還是按軍隊的供應標準發衣服的。在五年多的時間裏，七一年冬天給我發過一套新棉衣。七二年春天，還為我做過兩件麻的確良襯衣。對穿衣沒有發生過困難，日常用品也沒有發生過困難。看管組的人，看到我需要了什麼東西，總是主動同我買來了，他們對我的生活考慮得很周到。

七三年的國慶期間，師長來到我的住處問我：「你為什麼臉色也不夠好，是否營養不夠？」其實我對生活是滿意的。

可是，第二天中午不到，看管組的人提回來了一籠子活雞。晚飯就打來了一碗雞湯和適量的雞肉。打飯的人關心地說：「好好吃吧，多吃一點，長胖一點。」以後就接連幾天晚上都有一碗雞湯。

一天，我問對我特別同情的防化連 H 副連長說：「現在伙食已經改善了，為什麼每天都有雞肉吃？」他很驚奇的回答說：「啊，你還不知道呀！這是我們師長特別為你改善伙食的，要把你的身體搞好……。」我說：「現在我不是好好的嗎？總理還會有什麼批評嗎？」H 副連長說：「我們師長最近到中央去開過一次會，主要是討論你們出路的問題。到什麼地方去，什麼時候出去都還沒有定下來。周總理有指示，要注意你們的生活，不要搞得很難看。這就是給你加強營養的原因。你祇要能吃下去就放開吃。我們師裏農場東西也多得很……。」

生活問題之二。醫療問題，師長也是很關心的問題。

為我看病的醫生是師屬醫院門診部主任。開始的時候，他的工作崗位是專門招呼我的並同我住在一起，對我非常好。我這個曾經的總後勤部長對全軍基層的醫務力量不足是瞭解的，我個人的病情畢竟是不多的。於是，我對師長說把他的工作方法改變了一下，白天仍到門診所去上班，晚上同我住在一起，白天對我則隨叫隨到，師長同意了。

為了治病，我用藥是非常方便的，幾乎要什麼藥都有，後來我才知道，中央保健小組同那位主任有直接的工作關係。貴重的藥品隨時可以要來，高明的醫生隨時可以請來。七二年初，在澡塘洗澡我不慎在室內跌了一下，當時很疼，兩小時內北京醫院的外科專家就來到我的住處，為我看病。醫生對我的健康也非常注意，每月至多三個月要給檢查一次身體，還注射過胎盤球蛋白。衛戍區對我的醫療，我同樣是十分滿意

的。由於衛戍區對我的生活照顧得很好，在幾年之內，除了患過輕微的感冒病之外，其餘沒有患過什麼病。

師長指示，要看管組特別注意我的室外活動，要運動，要曬太陽。對這個問題，看管的人抓得很緊。師裏還將師直托兒所的小院於全部騰出來了，我搬進去後，晴天都可以在院子裏活動。

洗澡是每個星期一次，我都是在師首長的塘盆裏洗澡。我同師長一起就洗過若干次操。我的住處到澡塘，距離祇有二百米。要是天下雨、下雪，非讓我坐汽車去。

理發是指定的專門理發員給我理。半月一理，到時候還非理不可。

這裏還要特別說一個小問題，在我的房子裏擺了一張質量很好的小沙發。這個問題，可謂小吧，但從這裏可以看出師長對我的關心了。

我的穿著也是按照「規定」辦的，每個星期一定要換一次內衣，半個月一定要換一次外衣。內衣我在洗澡時自己就洗了，無論如何不要看管組的人同我洗。外衣他們是非洗不可。有一次，我自己在洗外衣，他們看見後立即端走了，並且說：「你又要我們挨嗑了吧！」

我用的被褥一個月換一次，是師部招待所管理的。我墊的和蓋的都足足有餘。我的房間，他們每天給我打掃一次，每月至少要消毒一次。桌子等處要擦一次，並且都做的很仔細。

我在衛戍區期間，正趕上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爲了我的安全，在將近四個月的時間裏，從師長到四組的全體人員對我的安全都是十分關注的。

七六年七月中旬早晨，我已經穿好了衣服正在下床，突然感到房子有些動，就在這時，值班的人猛推開我的房門，連拉帶拖地把我搞到院子裏。此時，值班的人才喘了一口大氣說：「地震！」我剛要問什麼地方發生地震時，師長就站在我跟前，並用緊張的聲調說：「安全就好！」他還向值班的人交代了暫不要進房子等注意事項。

值班的人員說：今天早晨的地震是突然而來的。在此之前由於沒有比較具體的消息，又怕妨礙你的睡覺，所以師長指示不要同你說有關防震的問題。他們說：師長還沒有起床，地震就發生了。他從床上滾下來，衣服都沒有穿好就到我們這裏來了。他一進門就看到你站在院子裏，心裏很高興！師長先親自瞭解了你的情況之後，才到作戰室去指揮全師的

防震。在發生地震的當天中，師參謀長就來到四組開會，討論研究我的防震措施。會後，他們同我說：「今天早飯後，參謀長專程去中央專案組請示對你的防震問題。總理去世了，現在沒有人管事了，根本沒有人解決問題，我們師長指示，按照中央的原定精神辦事，一定要保證我的安全。」經過討論，研究決定採取如下辦法：

第一是，在我住的院子內安裝警報器。

第二是，在院子裏住宿。從地震的當天晚上，我同四組的人，一起都住在院子裏。

第三是，防震車。師長批准撥給四組大卡車一輛，在大卡車內架有行軍床，晚上在車上睡覺。

第四是，住防震棚。從十月底開始，在外面露天睡覺就吃不消了，但防震又未結束。師長派了一個工兵排，一天之內就為我和四組的人搭好一個防震棚。我們在防震棚一直住到十一月中旬才搬回房子裏。

我們在防震棚過得很好，四組的人成天都是撲克和象棋，我除了當觀眾之外，就是當義務記分員了。在住防震棚期間，師長，副師長、師參謀等都不止一次地來看過我，我對他們的好意，總是表示感激之情！

第五是，準備轉移到無震區。四組的人向我透露過，師黨委已經寫了報告將黃、吳、李、邱四個人都轉移到無震區去。上面對這個問題總是不表態，所以一直沒有走成。

四組同我的關係

前面說過了，四組大變過三次，人員調整的小變就更多了。他們雖然變動很大，但對我的態度，除了個別人有時態度稍微生硬之外，絕大多數人，對我的態度都是很好的。衛戍區對我是認真執行政策的。

為了說明四組對我的態度，這裏祇說三個典型事例就可見一般了。一個是防化連 H 副連長，一個是老戰士小 G，一個警衛連 J 副連長。

第一「好友」是防化連 H 副連長。他同我一起的時間四年還多一點，對我的幫助特別大。一九八四年他到西安出差還到我的住處來看過我。

H 副連長是在防化學校畢業的優秀生，分配到警三師擔任副連長的。他很聰明，對政治有自己的見解。他來了之後不久就同我談過一次，他對我說：「我看你內心負擔還相當重，這完全沒有必要。」方東漢輯 開頭毛主席

席、周總理清楚，你自己清楚。我來的時候，師長向我介紹了你的情況，我們師長對你的看法是沒有偏見的……」

H副連長對我的真誠，對我的心靈是莫大的安慰，也使我瞭解一些我不可能知道的情況。

第一件，周總理對李德生的批評。我關起來之後，李德生在總後大院我的家裏辦了一個「展覽」，他們的目的沒有別的，就是為了對我的醜化。展覽之後，總理派王洪文、華國鋒去看過之後，立即下令停止展覽，並對李德生進行了批評。

總理說，在邱會作家辦展覽，這種搞法，過去是沒有過的。這樣大的事我事先並不知道，也沒有報告毛主席批准。尤其是把公家的東西搬進去展覽，說成修正主義更是不對的。對黃、吳、李、邱的問題，我是要對毛主席負責的。

第二件，對我的安置問題。「十大」以後，雖然把我們都開除了，具體的內幕我不知道，但H副連長說：「中央決定對黨的歷屆犯了錯誤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作了安置，都是每月二百元養起來。中央定的二百元，純粹是生活費用，其餘一切費用，如水電費等等都由公家包下來。現在你住在這裏，就是每月二百元的費用。你每月祇花五十元左右，多餘的存起來了。……」

「這次安置的共有六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李雪峰。一九七四年二月間，春節前四天，看房子的回來了。本來農曆二月二十八日，你就要離開這裏到新的地方去，我們二十九日就回家，每人放假一個月。但江青這些人反對周總理的意見，你們的事，也就沒人管了。在此之前，我們曾經得到過兩次通知，準備要你走都沒有走成。」

第三件，李震之死。李震死了對你們的審查也就停下來了。對你們幾個人怎麼辦？有人提出，黃、吳、李、邱就是那些問題，可以處理了。對這個提案毛主席、周總理都同意了，但中央專案組的汪東興提出李震之死可能與「四大金剛」有關，要待李震的問題搞清之後再處理他們四個人，這樣就拖下來了。可見汪東興之壞，他爲了和我們劃清界限，落井下石，無所不用其極。

粉碎「四人幫」之後，有人提出：黃、吳、李、邱是反「四人幫」的，問題應予以解決。軍隊的當權派堅決反對解放黃、吳、李、邱。汪東興則提出，現在主要是集中精力搞「四人幫」，把他們先搞到秦城「放」起來。

J副連長說：「從我知道的情況來看，幾年以來你都是處於多災多難之中的。毛主席逝世之前，本來對你們做了安置，但「四人幫」堅決反對，沒有實現；粉碎「四人幫」之後，本來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又未得到實現。我們都是同情你的。」

第二個好友，師直工兵營戰士小G。他是河北省井陘縣人。他同我相住的時間約三年，他是使我知道女兒一些情況唯一的一個人。

小G很老實，很勤快，很愛學習，對我的幫助就等於是我的「警衛員」一樣的。祇要他在值班的時候，對我的一切事情都包攬了，連我的褲叉、襪子都是他同我洗的。他的時間是不虛度的，每次值班都要向我學習一點什麼東西。從文化知識，到哲學知識等都是他學習之列的，有時他問到我毛主席的詩詞，我也同他說上幾句。祇有我們兩人一起時，他也總是稱呼我「老師」。

七四年，我幫小G辦了一件好事。小G探家臨走之前就同我談了我的女兒在井陘3502廠所知道的情況。小G說：「你的女兒七四年春節前就被總後從北京搞到3502廠。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孤身一人在那裏生活，困難加上歧視，慘狀可想而知，我過去不同你說，是怕你會傷心的。」

二十天之後，小G從家回來了，他對我女兒在工廠的情況講得非常清楚。但他對我女兒受罪的情況還是一帶而過，不肯吐露真情。我聽了之後真是悲喜交集。

第三個好友，師直警衛連J副連長。他給師長當過警衛員，J副連長也同我相處約三年的時間，從他口裏我知道了許多師長對我關心的一些具體問題。由於師長對我的態度好，他對我特別好。

我在衛戍區的五年又三個月裏，在衛戍區，從師長、政委、副師長、參謀長和全體看管人員，以及同我有關的工作人員對我都是很好的，我對他們對我關心的話是說不完的，也沒有恰當的言語來表示我的

感情，我祇從肺腑裏發出一句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是一支好部隊！

從關在衛戍區的幾年來看，毛主席不管多麼對不起我們，還把我們當人看，我們的問題雖然還沒有解決，但還是有餘地的。毛主席說過：「死黨可以不死。」汪東興最對不起我們，九屆二中全會後及會後，葉群及軍委辦事組都極力保汪，他和我們的密切關係，我們一個字都沒說過。毛主席、周總理去世了，江青一夥打倒了，解決我們的問題有了條件，可汪東興卻極力對我們下毒手，把我們「昇級」關進了秦城，真正是下了人間地獄。

第三十九章 中央專案組的審查

沙河機場的兩次審問

從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把我關起來之後，對我進行過各種不同的審查，這就是：「江青一夥」控制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四人幫」倒臺後，中央審查小組的審查；彭真控制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的審查。這三種審查的時間、目的、手段都各不相同。我從中央專案組的審查開始，來分別說明三種不同的審查。

一九七二年年初到四月間，在三個多月時間內，公安部部長李震、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北京衛戍司令員吳忠對我進行過四次審問。四次審問的前三次地點在北京沙河機場裏的所謂「林立果公館」，第四次是在通縣到順義的張家灣進行。前三次審問是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長陪同我一起去，後一次是師的參謀長陪我一起去。每次出去都是三輛小汽車，前面一輛是師長的車，中間一輛是我坐的車，後面一輛是警衛車。

李震部長的四次審問，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目的。前三次主要審問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葉群家「搞陰謀政變」的問題，第四次審問的是在廬山許世友等向中央寫的三封信問題。

沙河機場的第一次審問。這次開始的時間比較晚，寒暄的時間比較長。對我吃飯、睡覺、治病、散步、洗澡等問題都問到了，還問得比較詳細。然後才問到案情的問題。

李震說：「你寫的材料，我們都看過了，其實那些材料是多餘的。那些問題你不寫我們也知道。雖然問題是很複雜的，但不管再複雜也會有主要問題核心問題，你祇要把主要的說清楚了，一切問題也就了結了。……」

郭玉峰說：「中央對你是寄予希望的，這是對你的審查的有利條件。」

李、郭、吳三人對我審問的時間並不久，就開始吃飯了。我一個人單獨吃飯，吃了飯之後，李、郭、吳三人和我說了一陣子閒話，然後我們才回順義的。當時，警三師師長、看管我的組長、醫生也在場。

第二天上午，中央專案組兩三個工作人員，又到順義來了。他們說：「昨天談話的精神，你是一聽就懂了，你需要向中央交代清楚的是主要問題。」

「什麼是主要問題？我還想不到。你們要認為可以的話，希望你們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他們笑著說：「嗯，你會想得到的。老實說，吳法憲聰明不如你，但他早就說清楚了。」

我有意對他們的提問表示冷淡，我不知道他們究竟要什麼。至於他們後來說的主要問題就是所謂「八八」問題，我是根本沒有想到的。他們怕同我搞僵了，沒有多問，啞謎也沒有打開，我們的談話就結束了。

沙河機場的第二次審問。這次同上次談話的時間，大概隔了一個星期的樣子。這次見面時雖然還有寒暄，但又有一些「火藥味」了。李震說：「黃永勝、李作鵬是死硬反革命……中央領導對你是很瞭解、很關心的。你的許多事情，中央領導同志說得清清楚楚。你祇要把主要問題說清楚了，我們就好辦了，我們會妥當處理的。不是你的問題我們決不會放在你的名下。同黃、吳比較起來，你的問題是很少的。任何問題都不會孤立的，你的問題，即使你不說，我們也知道。」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你同吳法憲在葉群家談的話是一個重大問題，你祇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其餘就沒有什麼重大問題了。這樣的重大問題，我們是要專門向中央報告的。因為你在場，報告裏要沒有你的態度（實為口供）是不行的，這些道理你是完全懂得的。」

「吳法憲爭取了主動，把問題早就說清楚了。他曾再三說，那天晚上到毛家灣去是他叫你去的，你沒有多說什麼話。中央考慮對吳法憲從輕處理，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你把問題講清楚會得到更好的處理的。」

郭玉峰說：「『八八』問題，吳法憲是說清楚了，也說得很好，幾句話就把核心問題說清楚了。」

李震說：「吳法憲不會害你的，他寫的材料把與你有關的問題都說清楚了。老實說，中央領導同志對你是心中有數的。」

吳忠說：「『八八』那天晚上，你們四個人在葉群家談話，現在活著的還有三個，至於你們周圍有關的工作人員那就還有不少。現在，我們要你把自己的問題說清楚，與其說爲了向我們說清楚問題，還不如說是爲了你自己和你全家。你說得越清楚，對你越有利。你這個大明白人應該完全懂得。」

他們說完之後，我即說：「你們說的『八八』問題，我當然不能理解，因爲那天的談話都是很平常的談話，但根據你們說的意思，我可以猜到幾分。我猜想你們說的意思是兩點：一是『八八』問題是屬於搞陰謀，搞政變，搞謀殺之類的問題。吳法憲已經承認並且交代了，中央準備對他寬大處理，將得到很好的安置；二是我要是同吳法憲一樣，也承認自己的『罪行』，你們會給我說好話，中央會對我更寬大更好的處理，對我的安置也會更好。可是從葉群回京治病到她離開北京，我參加的事，我可以給你們寫一份詳細的材料。我相信，我是可以回憶得起來，也會寫清楚的。」

李震說：「你猜的有……（有什麼沒有說出來，立即轉口）你再好好想想吧。你祇要願意寫，什麼問題都可以寫清楚的。我們幾個人認識你都多年了，對你的才能是很清楚的，今天就談到這裏爲止。」

第二天，專案工作人員又到順義來了，關於「八八」問題，我用了不長的時間，已經把材料寫出來了。他們看到我的材料之後，祇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沒有實質問題。」我也動了氣：「實質問題是什麼？我不清楚，你們可否乾脆給我點出來？」

「我們點出來好？還是你自己交代好？你看怎樣好？」

「你們說吧？」

「我們認爲還是你自己交代好，這樣可以看出你的態度來。」

「我寫的材料就表示了我的態度，我寫的材料對毛主席負責，對黨中央負責，對你們專案組負責，也對我自己負責。」

「老實說，你寫的材料嘛，雖然把過程交代清楚了，但沒有用！吳法憲是直截了當的交代了，八月八日在毛家灣葉群和你、吳法憲策劃陰謀政變！」

我當時雖然腦子裏有潛意識的思想準備，但聽到「陰謀政變」幾個字，頭還是「轟」的響了一下。吳法憲爲了得到「很好的安置」讀書社圖，把大家

都送上「陰謀政變」的臺階上，再加上「九一三」的突發事件，林彪又摔死在外蒙溫都爾汗，你說毛主席和中央是信還是不信呢？信是有理由的，但吳說的是假話；不信是沒有道理的，畢竟是吳的親自交代。問題既然見了底，我心裏就不怕什麼了。

我說：「吳法憲怎麼交代的，我不管，但我決不向你們說假話！違背事實，違背黨的政策，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我是決不會幹的！」

「中央領導同志（指李、郭、吳）對你抓得那樣緊，還能讓你違背原則嗎？對吳法憲的交代，中央領導同志向他問過數次都沒有推翻，我們對吳法憲沒有逼供信，你看這是吳的補充交代，沒人逼他呀，是他主動補充的（他們按住正文，祇讓我看了吳主動交代的標題），對吳法憲這樣一個人物的話，我們能不相信嗎？對你們這個案子很快就要了結了，現在主要是等你對這個問題的交代了。」

聽了專案人員的話，我心想：吳的假交待害了黃、李、邱，甚至害了林彪，其實也害了他自己。因為吳的假話，毛主席和中央很容易把林立果的「謀殺」和吳法憲說的「政變」聯繫到一起了，把林立果和林彪扯到一起，又把林彪和黃、吳、李、邱扯到一起，江青一夥再煽動去鬧，問題就複雜了。如果沒有吳的假交待，這個根本沒有的問題就不能成為問題，祇要講清我們和林彪的政治關係，我們的案子就基本會了結了，總理也好幫我們說話。在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就會給我們一個結論。

此時，我又氣又無奈地說：「你們要我交代的實質問題，我已經明白了。」

專案人員說：「這個問題，其實也並不複雜，你寫三點就可以了。第一點是，葉群策劃你們必要時準備到廣州去另立中央；第二點，葉群動員你們準備在三中全會上繼續反黨；第三點，你對吳法憲的交代可以寫『同意』，或者寫沒有聽清楚他們說什麼，都可以。」

我按照他們提出的三點，祇用了半小時就把交代材料寫出來了。第一點，在吳法憲轉達了廣州軍區首長很想念林彪時，葉群回答說：「我們也很想念他們，今年冬天準備到廣州去過冬」；第二點，葉群說了：「在三中全會上，他們（指江青一夥）要是把廬山會議的問題再端出來，我們以端對端，決不要怕他們。」我們同意葉群的意見；第三點，晚了夜餐之

「我再三提議要散，因為我對他們繼續談下去有點不耐煩，幾次到走廊裏轉了轉，吳法憲、葉群說的話，有的我沒有聽到。」

「專案組看到我的材料，沒說什麼，就收場了。」

沙河機場的第三次審問

這次審問的時間，同第一次相隔一個多月了。一見面，他們就說：「我們去接張國華（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骨灰去了，來得晚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葉家談話的問題，是決定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問題，也是決定黃、吳、李、邱，軍委辦事組，甚至關係到解放軍廣大指戰員的政治生命的重大問題，但問題又是那樣簡單，因為「八八」去毛家灣見葉群，沒有談任何問題。

李震等對我的審問集中的是「八八」問題，其餘的問題，有時也順便提到，但沒有專門問過。後來，李震部長的專案組把問題理成三個問題：一是「八八」問題；二是「九六」問題；三是「九一二」問題。這三個問題也就是審查我的反革命問題。在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上旬，到四月中旬，中央專案組的工作人員幾乎每天都對我進行審問。

在一個多月中，專案小組對我的審查就是直接了當的使用「壓供、誘供」。我當時祇要說一句話：「同意吳法憲的交代」，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但我自始至終在原則問題上都沒有說假話，沒有做自己害自己的蠢事。這段時間，每天對我審查的內容，甚至說的話都差不多。現在，我就綜合寫在這裏。

李震和專案組說：「吳法憲已經把主要問題交代清楚了，中央領導同志很讚賞。吳法憲有出路，正在給他找房子，安排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你本來是排第四位的，為什麼要向前擠？這對你毫無好處嘛。對你的問題，中央領導人（指李震等人）已經向你交了底，在你的名下不會放什麼東西的。我們考慮到『八八』問題，吳法憲已經說清楚了，你祇是證明一下就是了，這有什麼難於辦到的呢？」

李震說：「周總理對你是很瞭解的。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在他們幾個人之中，邱會作雖是跟著走的，但他並不是盲目的，不會主動辦什麼壞事。吳法憲交代『八八』問題之後，周總理大吃一驚，老實說他對你

也有了新的看法，我又一次找你親自談話，就是總理要我來的。我們認為對搞清你的問題是很有利的。」

李震和專案組說：「你不是說過八月八日晚上，吃了夜餐之後，常出到外廳去，有時還在電影室門口看一看嘛，你說的情況我們是得到了證據的。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排除吳、葉說了什麼，你沒有聽到。你也可以把當時的情況再說一下。」

專案組說的上面三點意思，我是完全理解的。他們把周總理也抬出來了，作為對我誘供的手段。我當然決不能上當。

接著我就提出了我交代的辦法：「專案組提問，我回答；或是專案組提具體要求，我自己寫。」他們聽了我的意見後，立即說：「稍休息一下。」

不久，又繼續談。他們說：「你提的辦法，可以商量。我們的具體要求就是，你把當時的問題如實說清楚就行了。」

「我以前寫的就很清楚了。」

「以前寫的不能解決問題。」

談話到此就僵持了好一會，互相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忍耐不住了，即向我提出了具體問題。他們說：「在毛家灣，你們吃夜宵之前，不是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嗎？」「話是吳法憲提出來的。」

「我在以前的材料上，寫了當時的情況。吳法憲說了什麼根本辦法，我確實沒有聽見。」

對我的話，他們久不表態。我知道他們在「誘供」，我即故意主動開口說了一句他們愛聽的話：「對吳法憲的話，我沒有聽到，不等於他沒有說。」他們對我的話很感興趣，又提議「休息一會兒再談吧。」

不一會兒，又繼續談話。他們說：「你可以把當時的情況寫個材料。」

我立即回自己的房間寫材料。我把吃夜宵前的情況寫了一下：「當時，祇有吳法憲、葉群（胡敏在沙發上睡著了）和我在場。我不願意聽他們談一些無關重要的問題，我經常出到外廳去有時也去電影室看一會電影。我祇聽到葉群說：『不要怕他們，也沒有什麼可怕的。開三中全會時，他們怎麼來，我們就怎麼去！』」

他們看到我的材料之後，沒有反感之意，但也沒有什麼高興的表示。當天談話結束了。

第二天上午，專案組又來了。他們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坐下。」他們接著把我以前寫的材料和昨天寫的材料都拿出來了，並要我把兩個材料合在一起，湊成一個材料。我拿著材料回我自己的房間去了，大約半小時我就交稿了。他們看了我的材料之後，說了「可以了」，就讓我回房間去了。

中央專案組對「八八」問題，以後再也沒有提了。

我以為「八八」問題就算過去了，沒想到他們又對我搞了一次大圍攻。大概是七二年四月下旬，中央專案組在我的住處，專案組來了十二人，除原來同我接觸過的四人之外，新來八個人，主持審問的也是一個新來的瘦高個子，我沒有見過。那次審問真是殺氣騰騰，我一進門主持審問的人就大聲說：「坐下！」我從容不迫地坐下了。他們的恐嚇，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

「邱會作，你要老實交代！八月八日你們在葉群家談的和九月六日李作鵬同你說的都是反革命活動！」「我們掌握了材料，你賴不掉！」主持審問的人，氣勢洶洶地這樣說。

「那肯定有人胡說八道！」

「你要無賴！」

「你們也不要太威風！」

他們沒有奏效，接著有三個人對我進行批判，像紅衛兵一樣的氣勢，有的還用拳擊桌子，表示他們的憤怒！我則照樣喝水、抽煙，根本不予理睬！

另一個人用比較緩和的口吻說話了，以似乎「關心」我的態度，向我交代政策，他說：「你還是寫了材料吧？這樣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把沒有交代的問題寫出來！」

針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我斬釘截鐵地說：「沒有新的問題可寫了。」我說了之後，先後兩個主持審問的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宣佈：「今天到此結束。」

不過使我難於理解的是，自那次以後，中央專案組再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了。

在審問中出了什麼「名堂」，我早已猜到了幾分，特別是「八八」問題，他們追得如此之緊，話又說得如此之明顯，例如，李震方塊郵局、王峰說：

「吳法憲是不會害你的！」對此，我就從相反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基本判斷他們得到了假材料，這個假材料很合他們的口味，也幫助毛主席把林彪打成反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證據，他們捨不得撒手，當然也不會輕易撒手。其實，吳的假交待，不僅害了我，害了黃、吳、李、邱，害了解放軍，從而也害了搞專案這些人他們自己。不出所料，一九八一年七月吳、邱、王、江在秦城合監之後，吳法憲首先哭著向我說了真話。他說「八八」問題，一九七一年就說了假話，直到一九八〇年「公審」之前才作了糾正。

當然這不僅是害苦了我們的問題，同時也干擾了毛主席、周總理、中央對「黃、吳、李、邱」的判斷，給江青一夥鑽了空子，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沒有政變的證據，但按「政變」對待我們乃是必然的。

第四次審問時間大約是一九七二年四月下旬，地點北京以東通縣到順義縣之間的張家灣，警衛三師的一個團部。

這次審問陪同我去的負責人是警衛三師的參謀長。大約晚上七時我被押送到張家灣，同我去的看管人員陪著我一直等到次日凌晨五時多，李震才派來的兩個工作人員才同我談話。談話開始前，祇聽到李震頻繁打電話的聲音。他們說：「李震部長要你把在廬山看到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南萍、熊應堂等人，向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寫信的情況和內容寫個交代材料，現在就在這裏寫。」

我祇有按專案組的吩咐辦，約半小時就寫好了。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個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寫的信，是周總理交給葉群，葉群讓吳法憲、李作鵬和我看了。葉群有一次同吳、李、邱三個說：「這三封信是周總理轉過來的，並交代信就放在我這裏，不要再轉手了。」葉群又說：「這是三個險球，如果落在『最高』手裏，特別是落在江青手裏，還不知道要起什麼風波呢？」我瞭解了這一情況後，自己內心想：「周總理是在做黨內團結的大好事，總理真是一個好總理！」

我記得他們信的總的精神是：熱烈擁護林總在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並提出了要堅決鬥爭下去。許世友還提出要把張春橋下放勞動（實際上要求罷張春橋的官）。楊得志、韓先楚基本是照許的口氣寫的。

中央專案工作人員看到我寫的材料之後說：「同過去寫的差不多。」

我回答說：「歷史事實祇有一個，祇要不說假話，寫十次也祇能是一樣。交了材料之後，已經天亮了，我們也就原路回順義警三師師部去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專案組原來的那四個人一起來了。他們用平和的態度對我說：「今天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祇是向你傳達三條：一、中央認為你是交代了問題的，你所交代的問題說得比較清楚，對自己交代的問題不要有什麼思想負擔；二要注意身體；三要利用這個機會多讀幾本書。誰能說這樣的話你是會想得到的。」

然後，他們就把帶來的尼龍蚊帳，涼席，電扇給我了，並且還說：「這些東西，誰讓我們給你送來的，你也應該想得到。」從此之後，中央專案組對我的審問就停止了。

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七二年五月初，審查我的問題，共花了七個多月的時間。即使林彪有「兩謀」問題，我們也沒有；林彪沒有「兩謀」問題，我們就更沒有了。即使吳說了假話，他其實也沒有「兩謀」問題，吳不說假話，他就更沒有「兩謀」問題。中央專案組第一線的總負責人是紀登奎，經過嚴格的反覆審查，紀登奎代表中央專案組向政治局報告說：「經審查，黃吳李邱沒有『兩謀』（發動政變，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問題」。主席、總理都是超人，這裏面的真實情況我想他們會做出判斷，為什麼不解脫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從七二年五月到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關進秦城，共四年半的時間，無人過問。再到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審查小組來，又是三年時間，共七年半時間無人過問，我都快不會說話了。

關於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對軍委辦事組是支持和大膽使用的，對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更是大力支持，非常信任，非常倚重的。七一年四月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之後，周總理向黃永勝說過：「『中央政治』徹底解決了，軍委辦事組要發揮更大的作用，今後，邱會作的主要工作時間，應放到國務院方面來。」從此，到「九一三」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國務院的工作佔了我的不少時間，例如，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國防工業系統的整頓和領導機關的改組，陝西省委在京舉行常委會等事。這些工作在「九一三」之後都成了我的「罪證」。

建國初期，我軍在學習蘇聯軍隊時，就有了軍隊「在編職工」。例如，機關炊事員、汽車司機、維修工人等等都是。部隊存在「在編職工」，一是不好管理；二是工作效率太低。針對這種情況，改革就是出路。

把軍隊職工改為穿軍裝的小分隊，這樣的「工改兵」先在後勤系統試行，經過試點之後，效果良好。六二年全軍的編制裝備會議肯定了這種辦法，軍隊的「工改兵」解決了一個「老大難」問題，得到了全軍上下一致贊同。羅瑞卿也當著我的面對大家說：「老邱！你這個人鬼點子真多，就是會辦事。你算為軍隊解決了一個長久以來未解決的問題。」

周總理知道我搞「工改兵」，很感興趣，先後找我談過兩次，詳細詢問了各方面的情況和問題，有一次還要我帶上專業幹部去匯報工改兵的問題。

周總理說：「現在全國的基本建設隊伍上百萬，存在三個主要問題。一是工效低，二是家屬多，三是調動不自如。用軍隊搞工改兵的辦法，如果把上百萬基本建設隊伍，改建為基本建設工程兵，可以說會有如下的優點：一、可以提高工效，並且可以解決勞動力更新的問題；三、家屬按規定隨軍可以控制隊伍中隨隊家屬數量；三、可以調動自如；四、便於組織施工，並可以為戰時做好準備。」周總理最後說：「工改兵是一個大問題，等於增加了幾十萬部隊，應當向毛主席報告，得到原則批准之後，再研究實施。」過了不久，大約是在一九六四年秋冬的時候，周總理領李先念、我等人向毛主席專門匯報了「工改兵」的問題。

毛主席肯定了「工改兵」的問題，周總理指定我搞試點組織領導工作。具體事情，由建委機關做。我們初建三個支隊，共計三十多個團及一些附屬分隊，約二十萬人，經過不到一年時間試點工作結束。這支隊伍在文化大革命中，轉戰東南西北，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在試點工作的基礎上，周總理即決定：全國基本建設隊伍要逐步改建為基建工程兵。進行的步驟則先中央，後各省市。周總理說：「我向毛主席提出，要找一個得力的人來管『工改兵』的工作。主席說，『誰發明這個辦法就讓誰來管，邱會作抓總不是很得力的嗎！』」

六九年冬周總理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改兵」的方案，並指定我負責組織實施。為此，我指定國家建委軍管會主任李良漢等連我自己七人組成規劃小組，進行規劃工作。經討反覆研究，規劃做出來了。

周總理看到規劃之後，很高興並大加稱讚。由於發生了廬山會議的問題，「工改兵」的問題也就壓下來了。

七一年「九一三」之後，中央專案組爲網織罪名，對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的問題，對我進行打擊並對我進行了反覆審問。

「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是林彪以全國皆兵爲幌子，搞陰謀的組成部分，以便實現你們的軍國論。」

「全民皆兵的口號不是林彪提的，是毛主席提的。至於組織基本建設計劃工程兵是毛主席、周總理批准、支持的，林彪當然知道，但林彪根本沒有過問過這個問題。『軍黨、軍國』是六八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江青提出的，林彪是堅決反對江青這一提法的，這與組建基建工程兵毫無關係。」這是我的回答。

「你邱會作篡奪了組建基本建設工程兵的規劃領導權。這是搞武裝暴動的力量之一。你就是企圖憑籍這支力量來控制全國的大後方。」

「我是受周總理的委託，搞組建基建工程兵規劃的，我每次受托總理都是在正式會議上交代任務的。有很多的問題，我也是同李先念、余秋里一起處理的。在規劃初稿上，起草小組提出了基建工程兵的隸屬關係歸總後或軍委工程兵。我修改時，明確提出了歸國家建委。」

「你表面上擁護總理，事實上是反對總理的。你曾逼過總理，批准你搞的組建基建工程兵的規劃，企圖把總理拉到林彪的圈子裏去。你指示過李良漢要解放原中央基建政治部主任謝友法，這也是反周總理的。」

「你們提的這些問題，真是無稽之談。你們要想從我口裏搞周總理的什麼東西，即使你們解剖了我的屍體也找不到。」

現在看來，「工改兵」不能認爲是絕對正確的，但也不能說是錯誤的，在當時的條件下，有當時的作用，而絕不是什麼「政治陰謀」。

關於國防工業問題

全國解放以後，毛主席、周總理、林彪、賀龍、聶榮臻等就注意建設國防工業，並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國防工業系統是造反派衝擊的主要戰線之一，整個國防工業亂得難以收拾。當時，戰備工作緊張，而國防工業的工廠幾乎都在打派仗，很多工廠停產了。爲了扭轉局面，周總理建議派粟裕爲國防工業軍管小組組長，並由軍隊

派了數萬名幹部擔任軍管工作。六八年下半年開始，周總理提出了新的國防工業的領導方針，即將使用、生產、科研以使用為主，分別管理國防工業的方針。周總理的建議得到毛主席的贊同。為了實施新的方針，中央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由總部和海、空軍分管；第二步由中央軍委統管。

第一步先成立四個國防工業領導小組。以邱會作為主成立常規兵器工業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為五機部）；以吳法憲為主成立航空工業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為三機部）；以李作鵬為主成立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為六機部）；以李作鵬兼管（周世忠主管）成立電訊工業領導小組（具體辦事機構仍為四機部）。四個工業領導小組名義仍屬國防工辦，但事實上各自為政了。這種辦法是過渡辦法，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步，國防工業歸中央軍委統一領導。為了加強對國防工業的具體領導，經毛主席、林彪批准，決定在軍委辦事組之下，成立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並決定由我任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從此，國防工辦軍管會宣告結束，原來的國防工辦一分為二。一部分由陳華堂帶到國家計委（陳任計委副主任）成立專管國防工業的機構；一部分由李如洪帶到軍隊（李任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副組長）並任中央軍委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從六八年下半年開始，到七一年秋我倒臺為止，我搞了三年多國防工業的領導工作，都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和支持下工作的。

第一恢復生產。從六九年開始，國防工業戰線的生產就大部分恢復了，絕大部分工廠都能正式生產了。以七〇年上半年為例，國防工業完成全年生產計劃百分之四十八點五，在整個國家工業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當時，國防工業生產恢復得那樣快，得到了毛主席的讚揚。

第二健全領導機構。從中央到各大軍區、各省市都建立了以軍隊為主的國防工業領導機構統一領導國防工業（包括小三線）。為了加強各大軍區對國防工業的領導，各大軍區成立了國防工業領導小組。

第三制定了發展規劃。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根據生產的可能性和戰備的需要，提出了「四五」期間國防工業的發展規劃。當時的

計劃今天看來是高了，但當時在主席經常告戒「要準備打仗」的決策下，這樣的計劃恐怕還是低了呢。

第四整頓了國防工業的科研機構。航空、艦艇、通訊的研究院進行了整頓，調整了科研項目。常規兵器的研究機構，把分散的研究所集中組建了兵器研究院，並制定了科研計劃，這對兵器工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之後，江青一夥控制的專案組對我進行了惡毒的攻擊。他們主要審問了我「奪取國防工業的領導權」等三個問題。

關於奪取國防工業領導權的問題。專案組說：「你要交代是怎樣取得了國防工業的領導權的？」

「我是服從中央的決定，擔負起領導國防工業的重大責任的！你們要是認為還有什麼問題，你們去問周總理。」

「你為什麼要用國防工業來搞垮國家的整個工業？你必須交代你的陰謀詭計！」

「對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國防工業生產、基建、科研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條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周總理親自抓國防工業的結果。難道周總理祇要國防工業不要地方工業嗎？」國防工業由軍委辦事組管，軍委辦事組是完全支持周總理工作的，抓好國防工業就是支持周總理，為周總理分憂。國防工業也是國家工業的一部分。國防工業有成績，黃永勝也是有份的，因為他是軍委辦事組組長，他大力支持我們抓好國防工業。但軍委辦事組抓國防工業，首先要清除國防工業系統的打、砸、搶分子，清除堅持鬧派性的造反派頭子，這是抓國防工業關鍵的關鍵。不是吹噓什麼工作成績，但成績又是存在的，軍隊的裝備改善了，戰備庫存增多了，工廠能夠正常生產總是事實吧。國防工業的一切成就都與周總理親自過問分不開的。其他工業系統為什麼落後，就是造反派在作怪。總理又受到有些人（指江青一夥）的牽制，所以生產恢復是有些慢。

陝西省委常委在京舉行擴大會議問題

陝西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是在「九一三」發生前夕召開的，由於會議是由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主持的，因此「九一三」之後，就當做重大問題之一，對我進行審查。

七一年八月間，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召開了全國國防工業工作會議，討論和制定國防工業「四五」期間的發展規劃問題。西安地區是全國國防工業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陝西國防工業存在的問題必須爭取盡快解決，否則就會影響全國國防工業的生產和整個發展規劃的實施。

陝西國防工業存在的問題我向周總理做了簡要匯報，引起了總理的重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提出了陝西的問題，並要我先說了一下國防工業的問題。之後，紀登奎補充說了兩個另外的問題：一是延安地區沒有飯吃，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二是供應西安燃料的銅川煤礦停產，西安整個城市將成爲「寒窯」。討論中大家一致指出：陝西的問題非常嚴重，是九大之後全國最落後的省份了。

聽了紀登奎的話，周總理掉著眼淚說：「在戰爭時期，陝西人民寧可自己不吃小米、酸菜，讓給軍隊吃了。現在他們連飯都沒有吃，我這個總理真是對不起他們呀！我怎麼向毛主席交代！陝西問題一定要立即有效地解決。」周總理的話，感動不少人，使黃永勝這個很重感情的人也流了淚！大家一致擁護周總理的講話，會上立即決定三條：

一、採取最有效的辦法解決延安地區的糧食問題，絕對保證不能再餓死人。糧食調動由國務院業務組負責，具體的由紀登奎辦。運輸問題，由軍委辦事組負責，具體的由邱會作辦。

二、陝西省委全體常委到北京來舉行常委會，集體匯報和討論陝西的工作。

三、由邱會作、紀登奎兩人領導陝西省委在京的常委會。這就是陝西省委在北京召開常委會的來由。

七一年八月中旬，陝西省委在北京舉行了常委會，中央指定蘭州軍區政委洗恆漢參加。常委會開了幾天之後，揭露的問題很多，他們自己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他們就提出了要擴大到會的人員，改爲常委擴大會，中央同意了他們的建議。

陝西的會議經過了三個階段。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省委常委會，他們感到壓力很大。我同紀登奎經常參加他們的會議，經過反覆的思想工作和認真交換意見之後，一致認識到主要問題就是三個。

一是農村吃飯的問題。延安附近的幾個村子都有餓死人的問題。全省其他山區，也出現了餓死人的問題。二是，全省相當多工廠停工、停產。其主要的原因又是原料、動力、交通三個問題。更嚴重的是，造反派還在公開破壞生產，甚至舉行武鬥攔截生產車輛。三是全省城鄉人民生活都很困難。

對以上三個問題，除了胡煒說「不要看成漆黑一團」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異議。陝西省的工作為什麼會落後，大家的思想基本上統一起來，綜合起來有三點：一是派性干擾破壞；二是工作重點沒有轉到抓生產上去，特別是農業生產沒有很好抓；三是省委軟弱無力，等於沒有政府。

對上面的問題，大家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派性問題，造反派專了共產黨的政。這個問題不解決，要想轉變全省的工作面貌是不可能的。再一種意見是胡煒的意見，他說陝西的問題不是派性問題。

紀登奎、洗恆漢同意陝西的主要問題是派性問題，但祇同意一半，即同意派性的干擾，但對造反派專政的問題則從來不表態。我向紀、洗再三表示：「我對陝西的主要問題就是造反派的問題的看法不變，但在措詞，即表態的語氣上可以斟酌。」我們之間的看法顯然不一致。

會議的第二階段是省委常委擴大會。當時，國防工業工作會議還沒有結束，我忙不過來，周總理派李先念參加陝西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此後，對陝西省委擴大會議，李先念負主要責任。

常委擴大會議開始時，李瑞山首先傳達了常委會的精神。他說：我們工作落後最主要的原因是派性的干擾，由於派性干擾，全省基本上還是處於混亂之中。由於派性干擾，全省的工業生產、交通運輸情況都很不好。生產不好就影響了人民生活。由於派性干擾，迫使我們工作沒有重點，每天都忙忙碌碌窮於應付，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和時間抓主要問題。

李瑞山說：對派性的問題我們省委常委存在認識不一致，我們常委多數人對造反派基本上是害怕的，不敢管，更不敢碰。從我個人的思想來說，害怕碰了造反派，會影響省委常委內部的團結，影響軍政關係。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省委就表現軟弱無力。

李先念聽了李端山的講話後，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他對我說：「老邱呀，對造反派的問題能這樣提嗎？怕有問題吧？」紀登奎也說：「我同老邱說過，對造反派的問題，我保留意見。」我對他們兩個人說：「我認為造反派的破壞是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我們軍委辦事組兩年以前就是這樣說的。事實就是這樣的，為什麼不講，有什麼可怕的？陝西的派性問題得不到解決，這次會議就不能達到預期目的。」他們對我的意見沒有表態。

會議的第三階段是討論今後的工作方針問題。

在會議開始之前，李先念、邱會作、紀登奎三人向周總理和黃永勝做了匯報。我們提出了，以胡煒為首的造反派對李端山提出消除派性的問題，心裏接受不了，這樣省委的思想還是統一不起來。

李先念說：「對造反派的問題怎樣提法請總理考慮。」

黃永勝說：「陝西的要害問題就是造反派搗亂，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個問題，可能會有來自其他人（指江青一夥）的阻力。」

周總理說：「邱會作在國防工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李瑞山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紀錄稿我都看過。對造反派的問題，李的講話是根據邱的講話的精神而來的。邱對陝西工作的要害確實是抓住了。但又要防止阻力太大反而妨礙了陝西問題的解決。可以考慮這樣辦：(1) 邱的講話稿暫不印發；(2) 對派性和造反派的問題，由李瑞山自己提出來；(3) 對省的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的思想工作要做好，力求他們在思想上、行動上一致。」對總理的意見，大家都同意。周總理又提出：為了很好解決陝西的問題，我們幾個人分頭同他們的黨政軍領導幹部談一次話，做細緻的思想工作。

常委擴大會議對今後的工作方針和怎樣貫徹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根據會議的討論，李瑞山做了總結發言，他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四條方針。

七一年九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接見了陝西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全體人員。李瑞山代表省委做了全面的匯報。李講完之後，胡煒接著發言。他發言的基本精神都偏向為造反派叫苦了。這時張春橋插話缺字處造反派是革命

派幹革命不能沒有錯誤！胡煒聽到張春橋的插話之後，他聽出了中央政治局對造反派有不同的看法，於是就停止了發言。

張春橋發現了他的兩句插話的影響，他即興火上加油地發表了很激烈的講話。他講話的重點是與李瑞山的匯報針鋒相對的，他不同意提造反派的破壞作用。他說：「革命造反派在鬥爭中發生某些錯誤，同省委書記在工作發生某些錯誤，是一樣的道理，為什麼造反派就不能犯錯誤？今天對造反派的錯誤不是指責的問題，而是教育的問題。」

此後會場反倒無人發言了，周總理對著我說：「你講幾句話。」

七一年四月底，批陳整風匯報會時給我們下了結論，說我們在廬山「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這樣江青、張春橋他們神氣了。我當時思想肯定也有顧慮，但為了工作我也沒服軟，我說：「陝西存在問題的要害是『派性干擾，造反派的破壞』，這兩句話是我講的。我的講話並不是憑空說的，我們派了以裝甲兵副司令員林彬同志為組長的調查組，在西安做了一個多月的調查，材料是確實的。」沒想到這時總理態度突然變了，他插話說：「所謂的材料！林彬來了沒有？」林彬坐在比較遠的地方大聲說：「邱副總長講話的材料是我提供的，由我負責。我的材料是確實的。」黃永勝坐在我的旁邊，他看出我還要講話的樣子，於是，他咬我的耳朵說：「不要再說話了。」我也祇好忍下去了。陝西的會議這下給張春橋攬黃了。

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之後，我拉著黃永勝一起同周總理說話。我對總理說：「陝西的問題，我認為我的看法是正確的，並無惹禍之心。總理對我的間接批評我是不會在意的。我擔心的是，這次會議之後，陝西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反覆，我建議總理注意陝西事態的發展。」周總理說：「我沒有否定你對陝西問題的看法，你的看法是對的，祇是不要把造反派這個問題提到桌面上來，那樣越搞越被動。林彬同志也是對的，你給他講清楚，我心中是有數的。對陝西的問題，我們都要注意。該省的問題同戰備關係比較大，軍委辦事組還要同過去一樣，多注意一點。」

黃永勝說：「我們也很困難啊，搞了半天讓別人兩句話就吹了！」

周總理說：「這是暫時現象，三中全會以後你們就會更好工作了。」

七二年五月間，中央專案組把陝西省委在北京舉行常委會的問題，對我進行了難以想像的誣陷。

「企圖奪取陝西省的領導權，是你搞的陝西省委在北京舉行常委會的主要目的。」

「陝西省委在京舉行常委會，是周總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大家一致同意的。有的人還讚揚說，這種辦法也是解決地方問題的一種方法。」

「你為什麼要堅持陝西問題的要害就是派性問題，就是造反派的破壞。」

「事實就是這樣。我當然要堅持我的看法。」

「黃、吳、李、邱你們幾個人人都有分工，你是負責鞏固後方的。你的計劃是首先佔據陝西，進而佔領整個西北和向西南進軍。」

「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還有這個說法。你們這麼搞，我就沒有什麼可回答的。」

「還有，你打擊胡煒就是打擊西安的造反派，你的罪責是逃不脫的。」

「你說過，西安地區的造反派是胡煒一手搞起來的。陝西工作落後了，胡煒要負主要責任。」

「我說過這樣的話。實際上，我們辦事組對胡煒是重用的。九大安排了他為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後來又當了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按照軍隊的幹部情況，對胡煒的使用，不僅不高還略為高一些。他畢竟是個抗戰時期的幹部。」

「胡煒在廬山會議是反對你們的。你們對他懷恨在心。」

「我是參加西北小組的。我祇知道胡煒旗幟鮮明地擁護林彪的講話，他在小組會上第一個提出要點名批判反對毛主席的人。」

關於「九六」問題

七一年四月底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中央的政治情況是比較「太平」的。周總理除了不斷傳達毛主席對國際問題（主要是對美國）的指示之外，沒有發生什麼新的問題。

毛主席在七一年五月以後到八月中旬以前，都在中南海沒有外出，也沒有發表過重要指示。主席還是很關心戰備的，七月底曾叫黃永勝去談過戰備問題。

林總在北戴河也不外出，不說話。幾個月來，林總連軍隊的具體工作也沒有發表過任何指示。我同北戴河除了半月二十天打個電話問候一下之外，其餘就沒有過什麼聯繫。

最能看出問題的是江青一夥的活動了，江青兩次去海南島休養，然後去青島，還計劃要去井岡山，張春橋也回上海住了不短的日子。

周總理是一個老練的領導人，他是中央政治的「寒暑表」，中央內部祇要有事，我們是能夠從各種不同的側面觀察出來的。即使不能搞個清楚，也會知道一個大概。

周總理對林總同江青的鬥爭，在「九一三」之前是一貫站在林總一邊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周總理對軍委辦事組態度同過去完全一樣，軍委辦事組對總理的工作依然如故地支持，在生活上也是很關心的。

周總理沒有休息時間，這是眾人皆知的。在文化大革命緊張的時候，我們也會考慮過要設法拉著總理略為休息一下，這種打算曾經實現過，但多數時候都實現不了。我們每個月總有三兩次，拉著總理一起休息，在一起吃飯、看電影。每次總理都可以休息兩三小時。對我們關心周總理的生活，鄧穎超很清楚也很感激。她有一次對我說：「你能拉著總理休息，你們能辦到的事，我們都辦不到。」

周總理能夠「順從」同我們一起休息，是可以說明問題的。如總理早就知道毛主席的打算，即使他不說，也會同我們疏遠一些的，能夠同我們在一起休息，可以說明總理同我們之間是沒有隔閡的。另外，從工作上的問題也可以觀察到政治情況，我們同周總理的工作關係依然很密切。

第一件是國防工業會議。在會議開始之前，即八月上旬周總理到軍委辦事組來聽取匯報，在匯報開始的時候，我說：「總理今天來聽取國防工業工作的匯報，對我們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我們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向總理致謝！」總理笑著說：「你不要謝我，我倒是要謝你的。你為我挑起了三個擔子；一是，總後的工作不用我管了，特別是供應上不找我的麻煩了。二是軍事外援的日常工作全部擔起來了，我很放心！三是國防工業問題，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是十分關心國防工業問題，這個問題過去佔我的時間很多，現在邱會作同志管起來了，並且管得很好。」周總理最後說：「軍隊對政府工作是大力支持的，我向軍委辦事組表示謝意！」

黃永勝說：「總理對軍委辦事組，對軍隊的工作鼓勵很大，我向總理表示感謝！今後我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領導下，努力學習，改正缺點錯誤，爭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周總理情緒很好，心情愉快，對國防工業工作會議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詢問。然後對一些主要問題，如工業佈局的問題，鐵路支線建設等問題都當場拍板定案了。

第二件是聽取了閻仲川對「三北」戰備的匯報。這次匯報由黃永勝主持，對修築工事等三個問題，總理當場拍板定案了。這對戰備工作是一個有力的支持。

第三件是對四屆人大政府的人事安排問題。周總理提出來的四屆人大政府人事安排，黃、吳、李，邱都在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領導人的名單之中，對這樣的問題，如果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有什麼戒心的話，周總理是不會向毛主席提出這樣的人事名單的。事後，有人說這是毛主席的煙霧彈，這我就搞不懂了。

毛主席八月下旬南巡期間，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去武漢、湖南參觀，是九月五日下午回到北京的。九月六日下午軍委辦事組，各總部、軍兵種的有關負責人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然後即隨周總理一起去朝鮮使館參加代表團舉行的答謝宴會，我下午不到三時就到了北京廳。

我走進北京廳就看到黃永勝、李作鵬兩人在西南角上談話，我本也想去湊熱鬧，但怕影響他們談話，就沒有去。我想他們肯定是談毛主席南巡有關的問題，因為李作鵬才由南面回來，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外賓將要來之前，黃、李各自歸位了，李作鵬同我挨著坐在一起。我問李他們剛才在談什麼？李說：「你要知道了，準會把你嚇死！」

「你知道了都沒有嚇死，為什麼我知道了就要嚇死？」

「我可以同你說，但有兩個條件：一是，不准同北戴河（指葉群）打電話；二是，不准同胖子（吳法憲）說，要不遵守這兩條，我一句也不講。」

「可以！」我說。

在去朝鮮使館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鵬的車，在車上他同我談了在武漢劉豐同他談的毛主席談話的內容。毛主席在武漢找到劉豐、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主要是說「廬山的問題還沒有完，……陳伯達之後還有

人，……反對自己的老婆當辦公室主任，……」，並讓劉豐在三中全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等等。

我完全遵守李作鵬提出的「條件」。他同我說的話，我不僅沒有同北戴河打電話，也沒有同吳法憲說，更沒有同別的任何人說。但是，我心裏的感覺是沉重的，我的心裏沉重倒並不是自己怕什麼，祇是感覺主席這種做法欠妥，有什麼問題，如果在會上談，當面談，什麼問題都好解決，這樣在背後搞，越搞越亂。當然，這也是我模模糊糊的想法，是不敢深想的。一句話：聽毛主席的就是了。

第四十章 在秦城的日子裏

押進秦城監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八時，由衛戍區警衛三師把我送進了秦城監獄；八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八時，我被「保外就醫」離開了監獄。我在秦城監獄關了四年九個月又十天，加上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到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衛戍區關押的五年三個月的時間，到我出獄時，已經同社會隔離了整整十年了。

我出獄時是六十六歲。這六十六年我是這樣度過的：在家鄉，窮苦農民的孩子十四年；在革命隊伍裏，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打敗蔣家王朝，創立新中國，槍林彈雨、南征北戰，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積極工作、努力奮鬥，四十二年；在「自己」班房裏，忍辱為黨、含辛茹苦，十年。這是多麼慘痛的歷史。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飯後，我正在院子裏散步，突然從有線廣播裏，發出了緊急通知：四組的全體人員，除留一名值班的之外，其餘人一律到司令部辦公室開會。

過了好一會，H副連長回來了。他支開值班戰士後，他就同我一起在院子轉圈子。

稍過片刻，他對我說：「你八點鐘要離開這裏！」
「到哪裏去？」我問。

「沒有想到，是到秦城去！」他看了我一眼，又說：「要有遠不如這裏的思想準備，但也不要太悲觀。」

我聽後的確很震驚。但我故意若無其事地說：「我到哪去都可以，我們相處四年，我是什麼樣的人，你還不知道？他媽的，有什麼了不起！」

「正因為如此，我才敢跟你說。今天我鄭重叫你老首長，我相信黨，也相信老首長！對你們幾個人（黃、吳、李、邱）的問題，我們衛戍區的人不管接觸過你們沒有，都對你們表示同情。粉碎『四人幫』之後，你們是應該解放的！」

他接著說：「周總理去世後，你們就由葉帥管了。周總理管得很具體，總理去世後，實際上就等於無人管了。我們曾接到過通知，一九七四年『五一』節就決定要把你解脫，安置到外地去，後來沒信了。七五年春節前，又決定把你們送到外地去安置，後來也沒信了。總之，對你們幾個人，毛主席、周總理生前還是當作大事來抓的。我說這些是讓你有信心。」

H副連長擔著風險和我說這些話，實在難能可貴！

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之後，我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仍然鎮定自如。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我進了人大會堂北門，才知道災難臨頭了。但毛主席、周總理在審查我們時，不論給我們戴上什麼「帽子」，把我們還是當成黨內問題審查和對待，生活上一點不虐待。而且，七三年以後因為沒有查出什麼名堂，審查也就停止了，一直閒呆著。就是這樣，主席也沒有說把我們關進秦城呀。

大約晚上七時半，師政委和四組的幾個人來了。除此之外，還來了兩個不認識的人，他們戴著口罩向我宣佈說：「你今天晚上離開這裏，到另外的地方去。日常生活用品帶上，學習的東西一律不帶。」他的話音一落，由外間進來兩、三個人，清查我的東西，那兩個新來的人一直盯著。我的東西分兩部分，一是書籍，二是寫的材料的底稿。把我的東西收拾好以後，新來的人指著爐子下面殘存的紙灰說：「有用的東西都沒有了！警惕性不高呀！」新來的人對四組表示不滿是很顯然的。臨走前四組的人給我送來了最後一頓晚飯。其飯堪稱豐美，有燒雞、蒸臘肉等幾個菜。新來的人一看，又不高興。我知道到秦城是要吃苦的，管你媽的高興不高興，先吃了再說。

大約晚上八時整，師政委發出命令說：「上車，出發！」在院子門口的路上排了一串汽車和摩托車。我坐在一輛吉普車裏，車前面坐著常給我看病的師醫院的老所長，我和兩個看管幹部坐在後面，他們一邊各一個。大約走了一個小時之後，能看見監獄的大門的時候，我就感到有些

熟悉了，我們在離監獄大門幾十米遠的地方，司機加大了油門，汽車加速前進，連續進了三道大門，等進到監房區之後，汽車慢了下來，車停在二十一號監樓，因怕人看見，秦城的監管人員，把我連拉帶推地推進了監樓院子內，從監獄的樓門，一直推到樓內三層的監房裏。

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約十時，進入秦城監獄五道鐵門之後，才知道自己成了囚徒。這是自己無知吧？不是！最主要的是自己對黨忠誠。我對毛主席，對共產黨，對自己，無論過去和現在，在什麼時候都是相信的。因此，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自己會變為共產黨的「敵人」，我相信我的信念是正確的。我過去、現在和將來，永遠都不會是共產黨的敵人！也不會成為國家和人民的敵人！

老幹部的歸宿

由衛戍區把我押進了秦城監獄。從此，我進入了最黑暗的地方！

這究竟是為什麼？我的腦子裏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但無論從什麼角度來考慮也想不通。如果打倒「四人幫」之前，把我關進監獄，我是決不會想不通的；在打倒「四人幫」之後，我真是比誰都高興，認為起死回生的機會來了！怎麼還把我關進秦城監獄？真是毫無理由。因為我同華國鋒、葉劍英既無公仇，更無私債。我甚至夢見葉帥通知我重新工作，鼓勵我放下包袱好好幹。現在我對他們完全失望了！

不久，監獄一個穿便衣的人，開始查點物品。對我帶去的物品，凡是帶有帶子的物品都把帶子絞斷。在交接完物品後，他們要摘掉我軍衣上的領章和帽子上的帽徽，這些本來對我毫無意義的東西，但我也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勁，向獄方進行了頑強的反抗！我從小參加紅軍穿上軍裝，從來沒有離開過軍隊，從來沒有脫過軍裝，現在要扒我的領章、帽徽，真跟要我的命一樣！監獄的人兇狠地指著我身上的領章和帽徽說：「這些東西你自己扒下來！」

「辦不到。我的領章、帽徽國民黨沒有扒下來過，因為我沒有當過俘虜！」

「這是什麼地方？！所有命令你都得執行、服從！」

我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他們年輕力壯訓練有素，我雖然扭不過他們，但他們也沒有扒下我的領章帽徽。正在爭執得激烈的時侯，外面進

來了一個人說：「不要搞那些事了，以後不穿就是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就停止了。

衛戍區押送的人，臨走時都站在我的牢房門口看了我一眼。他們的眼裏都充滿困惑，我望著他們每個都很熟悉面孔，都充滿感激之情。H副連長站在人群的後面，一直在向我遞送友好的眼神。師政委站在大家的前面真誠而又無奈地看著我，他對我說：「我們走了。希望你像過去一樣，一定要相信黨，有信心！」我聽到師政委的話，眼淚一下就流出來了，因為他們待我還像同志，有親切的感覺。衛戍區和監獄的人都走了，但還有一位軍官在我的牢房踱小方步，他自言自語地說：「看來你精神很不好，這是可以理解的。你過去常要別人正視現實，你的話是對的，現在就輪到對自己了。希望如同過去一樣，正確對待自己的問題。你到這裏來，可能會發生一些你想不到的困難。」

由於房子太冷，怎麼也不想躺下，我就到走廊上去小跑步。快天亮了，實在支持不住才睡下。我躺下之後，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那位軍官進到牢房站在我床跟前，自言自語地說：「房子確實太冷，暖氣管子不好使，溫度上不來。」他出去一會就抱來了一床被子，並提來一個電爐子。牢房裏沒有插銷，電線是從外面拉進來的，電爐子接通後，那位軍官對我說：「電爐子由值班的管著，這點你要遵守！」我什麼話也沒有說。牢房祇有幾平方米寬，電爐子插上後，房子立即暖和了。

現在想起來，當時的當權者是匆匆忙忙決定把我們關進秦城的，秦城方面幾乎毫無準備，暖氣都是壞的。沒有準備好就把我們關到秦城，可見這幫當權的傢伙多狠心。把我們關進秦城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錯誤，完全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們既然已經把我們放到斜坡上往下推，那就收拾不住了，後來鄧小平、彭真等人又借勢踏上一腳，一踹到底了。

現代黑店

「秦城」這個地方，位於北京以北的沙河鎮，離城裏約四十五公里，大概是六〇年蘇聯援建而成。在毛主席生前，主要是關國民黨高級戰犯；從文革開始，國民黨高級戰犯，一個個釋放、優待；共產黨高級幹部一個個關押、嚴懲，共產黨的老幹部去秦城「接防」了。八一年我離開秦城

時，監獄長和我談話時開玩笑說：「想開一點，就當這裏是高幹療養院。」我當時心裏一怔，我們的黨怎麼搞成這個樣子，你在臺上，他去秦城「療養」；他在臺上，你又去秦城「療養」。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之後，以葉劍英元帥為首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組」，由楊成武牽頭，對首都的要地進行實地勘察，我參加了這一工作。城裏的許多高層建築物，如郵電大樓、電視大樓、中南海周圍的建築物、城外的玉泉山、西山、秦城等地都查看過。參加勘察的有：楊成武、王尚榮、李靜（作戰部副部長）、萬里（北京副市長）和我等人。我們去秦城是一天下午四時左右，因為時間晚了，對整個監獄就沒有全面觀察過，祇在辦公室聽監獄的負責人匯報情況。我還同王尚榮兩人到監區的門口去望了一眼，我同王尚榮開玩笑說：「你看這麼仔細幹什麼？是不是來為自己看房子的！」王尚榮說：「我這輩子是不會來住的，這點是肯定有把握的！」他說得對，名副其實的老革命，身上又無半個反革命「細胞」，哪裏會去想要進「自己」的監獄呢？沒想到跟著共產黨打了一輩子反革命，最後自己竟成了共產黨的「反革命」，關進了「自己」的監獄，真是千古奇聞！

監獄區一律是按一個圖紙建造的三層樓房。樓房的結構都是「丁」型的。北、東、西三面是樓房，南面是敞口。監房都是一面走廊，一面是牢房。每一層監樓之內，有十一個監房，每個監房約有九平方米，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安裝了一個抽水馬桶和一個小水池；不到四分之三的地方放了一張地鋪一樣的單人矮床，其餘的就什麼也沒有了，即使有也沒有空間了。房子要比一般房子高很多，窗戶是毛玻璃，窗臺很高。裏面看不到外面。我在監獄期間轉過幾十個監房，大體都是一樣的。

我關進監獄之初是「三九」天。室內的暖氣幾乎沒有，凍得全身疼痛，祇有鑽在被子裏過日子。關進監獄的第三天下午，那位軍官來問我說：「你怕不怕冷？」我回答說：「又怕又不怕。落到這個地步，就什麼也不怕！」他沒有再說話，就領我走到樓底下的院子去散步。這是我進監獄後第一次見天地。在整個院子裏，除了看到很高的圍牆和電網之外，就看到了一排一排沒有屋頂的房子。對那種「房子」，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是幹什麼用的，一年半之後，我光顧那「房子」時，才知道是囚徒的放風場。所謂放風，就是讓你從牢房裏出來透透氣，時間半小時。每個

放風圈約有十米見方，囚徒在裏面活動。監獄對放風的規矩很多，颳大風、下雨不放，天太冷不放，監管人員有事不放，星期天照例不放，監管人員不高興不放。總之一個月平均能放十次風就很好了。有一次，我有二十多天沒有放過風，走出監樓的時候，立即感到眼睛被陽光照得很难受。放風是囚徒的享受之一，囚徒在放風場裏放風，彼此可以聽到咳嗽的聲音，但見不到人。放風場圍牆上面有警衛走動，祇要看到你不「規矩」，就會馬上被制止。

在秦城度過了將近五年的時間，過的是真正的飢寒交迫的囚徒生活。所謂囚徒生活，就是同豬狗無異。吃什麼、吃多少在獄方看來都是監獄「施捨」的。在衛戍區是愁吃不了，在秦城是愁吃不飽，而且吃得太差。在戰爭年代，我得了嚴重腸胃病；在文化革命期間，我被造反派打成重傷，因此，我是很怕吃冷食的，受涼就渾身痛。我並不講究吃什麼，穿什麼，中心問題是保護肚子，不至於天天拉肚子，但恰恰相反，我在監獄裏住的是寒室，吃的是冷食、粗食，這對我的身體是嚴重的傷害。

每次飯來了，我用手一摸，祇要冷的我就不吃了，吃了就拉肚子。這樣持續了有三、四個月。大約是七七年四月間，監管員突然問我：「打來的飯，你為什麼不吃？」「太涼了，我不能吃冷的，我進監獄之初，衛戍區的醫生不是向你們介紹過，我吃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吃冷的。因為我在戰爭年代得的腸胃病，一直沒治好。」「這裏就是這樣的伙食，要別的沒有！」聽到監管員的話，我就冒火了！我大聲地說：「給我吃什麼，是你們的權力。我決不吃冷的豬狗食！這是我的權利。」囚徒的死活，監獄是根本不在乎的。

爲了解決不吃冷食的問題，每天早晨送飯時，我有時就要兩個饅頭，吃一個，留到中午吃一個，泡點開水就可以吃下去。有一次，我放風去了，回來一看，我被子裏的饅頭給沒收了。這下我可憤怒了！當天，晚飯我也沒有吃。這樣，他們心裏倒有些著急，晚上，一個沒有見過面的人，提來了一飯盒熱氣騰騰的麵條。他一進門就說：「飯很熱，快吃點吧！」我也很「知趣」，一句話沒說就吃開了，因爲我的肚子已經餓得相當難受了！對我們這些人，政治上壓迫我們，生活上總不該受虐待吧！？但上面態度惡劣，不把我們當人看，下面就胡作非爲。

從關進監獄起，到七七年的九月，飯食是直接送到我的牢房裏的小桌上，後來突然把房門關了。監房門的下端有一個約二十公分見方的小洞，和我的家鄉狗進出的洞一樣。監管員送飯來的時候，一定要我自己把碗從洞裏送出去，這是新的送飯方式。第一次是一個女監管員，她在外面叫喚：「拿碗來打飯。」我根本置之不理。她提著飯盒就走了。不久，換來一個男的又把飯送來，在外面照樣叫喚，我還是不理。後來，他打開門把飯送到我的桌子上，並且說：「監獄就是這個規矩……」我當時很氣，即說：「我永遠不從狗洞裏要飯吃！」此後，他們送飯照樣送到我的桌子上。自從進了監獄，伙食總是一個樣。主食就是饅頭、窩頭、米飯，米飯裏沙子還特別多，副食就是水煮白菜、水煮土豆，有時裏面有幾片肥肉。

十月一日的晚飯，監管員送來了兩飯盒餃子，提進牢房來時還冒熱氣，心裏當然有幾分歡喜。不過，我高興得太早了，餃子是羊肉餡。我向來不吃羊肉，可是饑得很，就決心勉強吃下去，但事不由人，吃了兩三個之後，就反胃了，全都吐了。不久，監管員來了，他一看沒有吃就不高興地說：「為什麼不吃？」「我不吃羊肉。」他提著飯盒就走，過了一回兒，監管員送來兩個冷冷的窩窩頭，我把冷窩窩頭用開水泡了一個，由於吃了冷窩窩頭，引起腸胃病，上吐下瀉。但國慶放假，沒有醫生，這就是我的國慶節。回想起四九年開國大典時，在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下，我們正在進行衡寶戰役，並取得了殲滅白崇禧鋼七軍的決定性勝利，我在《紅旗飄飄》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向新中國獻禮》。江山都打下來了，萬萬沒有想到，二十多年後的國慶節是在秦城監獄這樣過的。

公審以後，從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起，我的伙食標準更囚徒化了。監獄對我有三條明顯的變化：一是伙食變得更糟了。主食，每頓早飯是稀飯和饅頭，中午是窩窩頭，晚上是粗米飯。副食，就是大白菜幫子加白水，別的什麼也沒有。這種伙食，實在是苦呀；二是無論如何不給安眠藥了；三是房子更冷了。凍得實在睡不著，我就起來在房子裏踱步，走累了又睡。

關進秦城近五年時間，起初我的衣服和用品還是夠用的，到七八年底，我的用品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除了還有一套破棉衣、破罩衣

之外，就什麼也沒有了，連背心、褲頭等都沒有了。從七七年秋天起，我就想到了冬天的穿著問題，我曾經無數次提出要衣物。監管員從來也不說給或不給，就是不予解決。

「為什麼我自己存在監獄的衣服都不給我穿？」我直截了當問他。

「自己的？還有什麼東西是你自己的？你是糊塗了？」他也是直截了當地回答。

「又沒有宣佈沒收我的用品，為什麼不是我自己的？你們也太殘忍了吧？」

「殘忍！對你們幾個比對別人還好十倍呢！」

天快冷了，為了解決肚子受凍的問題，我把所有破爛共有大、小十餘塊從床頭櫃裏拿了出來，試圖做條「圍巾」，能夠圍在肚子上護著肚子就行了。我向監管員借來針、線，連續好幾天才拼縫在一起。我有生以來從沒用過針線，在縫製的過程中，多次刺破指頭，鮮血直流，並且還常把破爛和褲子縫在一起，縫了又拆，拆了又縫，自己既心酸，又苦笑。但經過艱苦勞動，終於把「圍巾」縫成了，我感到很滿意，護肚子的問題解決了。圍巾縫好後獄方知道了，他們認為有長度的物品是危險品，就向我嚴厲指出：「把你的長布條交出來！」我堅決拒絕。就在爭執、互相扯起來的時候，布條被扯斷了。那天晚上，我把床單子撕下來了一半，睡覺時圍在肚子上。第二天上午，來了兩個監管員氣勢洶洶地向我要起威風來了。

「你把床單撕下來幹什麼？」

「我有胃病，你們連個背心都不給我穿，肚子著涼就得病。圍在肚子上就好多了。」

「你這是破壞公物。」

「什麼破壞公物！？你們是迫害！」

七八年的十一月底，監獄讓我出去放風，我赤著腳就走了。因為我從衛戍區穿去的一雙棉鞋穿透底了，襪子根本沒有。我走到監樓門，監管員看到我赤著腳就一把我拉回去。那位監管員看了一下我的棉鞋破得實在不像樣子，就給我拿來了一雙舊鞋墊，我就靠著那雙鞋墊子過了一個冬天。七九年冬天，監獄待我似乎稍微為好了一點，給我發了一雙舊棉鞋和一雙線襪子，解決了凍腳的問題。

在監獄得病是最苦的，我的腸胃病和腰痛病根本得不到治療，我是長期服用安眠藥的，但獄方根本拒絕提供安眠藥。睡不著覺的苦楚，不失眠的人是根本不理解的。有個男醫生，對我要安眠藥，總用侮辱的語言給予拒絕。例如他說：「安眠藥不治病，是高貴人圖舒服的！我們監獄供不起安眠藥。」

我的腰和肩胛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重傷，一直未好，一著涼或不小心，就發作，疼痛難忍。我要求治療，獄方理都不理。我的腸胃病也經常發作，黃連素對我的病效果比較好。關進監獄之初，還給過幾次黃蓮素，以後不給了。如果我要的次數多了，醫生就會說：「這種藥不便宜……」其實黃連素是最便宜、最普通的藥。

監獄每半月洗一次澡，但有幾次都是下午洗操，水是冷的，我祇好不洗穿起衣服又回來了。一次值班的問我：「為什麼那麼快就洗完了？」，我回答說：「水冷了，沒有洗。」他對我說：「是監管員先洗之後，才叫你洗的。水當然冷了。」我聽到他的話，真是火冒三丈，我心想，囚徒的「福利」本來就很有限，現在連僅有的一點福利都被剝奪了。

監獄裏的鬥爭

在近五年的時間裏，從我接觸到的監獄工作人員來說，大換有三批。首先接觸的是軍人，一個穿便衣的也沒有。其次是監獄的老工作人員，他們年齡比較大，同囚徒打交道很有經驗。第三批是衛戍部隊的復員戰士。從我的實際接觸來看，最後這一批人最好，我在監獄裏的鬥爭，主要是第二批人，即「老監獄」居多。

一是關監房門。監房有兩重門，裏面還有一層鐵柵門。鐵門很重，開關都很費勁。一次放風回來，我在前面進了監房，監管員在後面說：「進去自己把門關上。」進了門之後，我即坐在床上，不予理睬，監管員站在外面一個勁叫喚：「全監獄祇有你不聽管理！」我對監管員說：「你讓我自己關自己，這辦不到！」

二是擦地板。監房每週要擦一次地板，並且要同監管員一起進行。這點勞動，爲了自己衛生一點，是可以辦的。但有一次，一個監管員腦子裏不知發了什麼「熱」，他不給拖把，祇給一塊破布，硬要我彎著腰跪著擦地板。我不幹，連破布也不接。於是，我們就對著幹了。

「你為什麼不擦地板？」他神氣十足地問。

「把拖把拿來，我就擦。」

「今天要用布擦。」

「那我堅決不擦。」

事有湊巧，我們正爭執得熱鬧時，有三個人一起來查監了。那個監管員，不知爲了什麼，轉身就走，不同我吵了，我的災難也就免除了。

三是理髮。囚徒是監管員給理髮的。理髮時，要是遇到了比較好的人就少受罪，否則就遭大罪。「心狠手毒」的人借理髮整人。他把腦袋理得狗咬一般，還有意從脖子向衣服裏弄進去好多短頭髮，理髮之後，不僅沒有熱水洗澡，即使弄點熱水擦一擦身也難。理一次髮就是受一次大罪。爲了理髮少受罪，我堅決要求剃光頭。

四是放風。如果遇到惡毒的監管員，他可以晚放風，早收回；冬天可以把你放到背陽的放風場去，夏天則相反。

五是扒在地上寫字。七九年十二月，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重新審查以後，寫資料的時間很多。我的房子祇有一張矮桌子，寫字時幾乎要彎成九十度。我的腰痛得難忍，我祇好扒在地上寫資料。事情真巧，有一天中紀委審查小組的劉寶慶、祖連坤（可能是正副組長）到監房來看我，恰好我正扒在地上寫字。姓劉的進門看到此情此景「啊」了一聲，扭身就走了。但壞事變成了好事，一小時後，監獄就給我送來了一張高桌子和一把椅子。從此，我就可以坐在凳子上寫字了，直到審查完畢都是這樣的。

六是同小法西斯的鬥爭。七八年夏秋之交時，一個年齡不大的監管員領我出去放風。他讓我進到一個長久無人去過、雜草叢生的放風圈裏，並惡狠狠地向我說：「你把圈裏的草給老子拔了，要不我就不客氣了！」說話時還把拳頭伸了出來。

我進到放風場後，就坐在小凳子上連動也沒有動一下。不久我把馬扎的木條拆下來，準備自衛！站在放風圈牆樑上的值班警察看見了，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很懂政策，可能報告了。就在一觸即發之際，兩三個人趕來了。他們到了之後二話不說，就把那個監管員拉走了。然後，另一個監管員把我拆掉的馬扎凳子及兩根橫檔收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昨天那個風圈裏放風，風圈裏的草已經拔乾淨，衛生也打掃好了。在風圈上面值班的還是昨天的那位警察。他樂呵呵地向我說：「今天不需要準備戰鬥了。如果再有昨天那樣的事，大指揮官就要親臨戰場了！」他說的「大指揮官」就是監獄的領導。

到關我們的時候，秦城關的人可以說都是共產黨自己的「囚徒」了，受到屈辱大家都忍耐著，如果發生了衝突，那的確是忍無可忍了。

有一次在我的監樓內，發生過持續時間不短的爭吵聲，爭吵是因吃不飽引起的。

「多打一點。」

「糧食有定量！」

「為什麼不讓吃飽？你們所謂的定量，就是餓不死吃不飽吧！」說完有人就把碗砸在地上，並高喊「你們是吃人的法西斯！」很清楚，爭吵是由於囚徒吃不飽引起的。這個問題，以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可得到解釋。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判後，每天早飯是一碗稀飯，一個饅頭，中午是一個玉米窩窩頭。

囚徒吃不飽飯，是古今中外的老問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囚徒也吃不飽飯，尤其是對我們這樣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也不給吃飽飯，就不是平常的問題了，應當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七九年，我搬回二十一樓北樓，在西樓和東樓都各有一個女囚徒，她們幾乎每天都要唱歌。那兩位女囚徒似乎有「預約」，差不多每天都是同時唱歌。她們唱的歌大都是延安時期的歌曲和抗戰時期的歌曲，雖然我不太會唱歌，但這些歌曲畢竟伴隨過我的青春，那個戎馬生涯的時代，因此我聽了是又氣憤又酸楚。

除了女囚的聲音之外，還聽到男的歌聲，他唱的好像是京劇《紅燈記》。

另外，還有一個能顯示囚徒精神的是春節之夜，特別是女囚徒的精神，更使人敬佩。我在秦城監獄渡過了五個春節，但七九年的春節令我印象最深刻。

七九年春節，除夕之夜的晚飯後，監獄的有線廣播放播了音樂節目，女囚徒跟著音樂都唱起來了。不久，監獄給我發了兩個蘋果，三、五塊糖和一小把花生。發食物後，女囚徒還是在唱，但是不久女囚徒的歌聲就變成哭聲了。她們都以念及自己的父母、丈夫、孩子作為哭的內容，例如，她們自言自語地說，「爸爸沒有被關押吧，姥姥還抱著你吧？」等等，並反覆念說，其淒慘的程度，連我都被深深感動了！我也同樣的想念我的母親、妻子、兒女。監管員對女囚徒痛哭的態度，開始是不理，然後就是咒罵了。監管員不理她們的時候，那兩女囚徒哭得還不那麼厲害。監管員鄙視她們的時候，她們就哭得更厲害了。監管員兇相十足叫嚷著說：「哭什麼，哭也不頂用！哭得再兇也出不去！」秦城監獄這種情況比國民黨、比帝國主義的監獄，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我都不得而知，但監獄對我們之狠，我是有親身體會的。

這裏要說的是，囚徒為什麼會有這樣好的精神？因為他們不是反革命。比如我自己就是這樣的。十四歲參加革命，幾十年來一心一意為革命，身上連一個反革命的「細胞」也沒有，哪裏會是反革命！路線問題、政治問題都是黨內問題，黨內問題應該在黨內解決，而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搞「一陣子」是可以理解的，如關衛戍區。但關到秦城這個情況就變了，雙方的性質都變了。後來又用玩弄所謂的「法律」的辦法，搞公審來解決路線問題和政治問題，事情就越搞越糟。我們幾個人吃了苦，固然很悲哀，但對黨的事業就更悲哀。路線問題，政治問題，這些黨內問題和犯罪都混為一談了，而且，可以用權力來隨意改變它。

黑暗中的星光

在監獄近五年時間，我接觸過的監管人員，總有幾十人之多，就他們對囚徒的態度來說，對囚徒極壞的是個別的，對囚徒好的也是少數。即使這樣，我也確實看到不少好的工作人員。他們對囚徒抱什麼態度，在日常生活中是能夠表現出來的。從監獄生活來說，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大事，個別監管人員整囚徒，少數工作人員幫助囚徒，都祇能通過小事才能表現出來。

第一是，吃飯問題。這個問題他們可以做很多有聲有色的文章。例如，打飯的時候，主食、副食的量是否打夠了；偶爾吃肉的時候，是給瘦的，還是給肥的；給饅頭是大的，還是小的；送來的飯食是熱的還是冷的等等，都是問題。例如，吃肉的時候，有的監管員給我打一碗較瘦的肉，然後向我微微一笑，我也祇有還以一笑向他致謝！

爲了解決我冬天不吃冷的食物的問題，監獄設有電爐子給我加熱食物。但這樣差別還是很大的。有的送來的飯雖然加過熱，但並未熱就送來了；有的不僅加得很熱，並且還是跑步送來的，飯放在我的桌子上，還是熱氣騰騰的。這種差別是顯示出監管人員的不同態度。

第二是看病問題。前面提到過，對囚徒要安眠藥，監獄向來是不重視的，很難辦得到。在監獄我見過的護士有兩、三個，其中有一個對我的態度特別好。年齡不算大，人很精明，作風也潑辣。一天，她給我送藥來，值班的監管員同她說：「他晚上總睡不著，你給他要點安眠藥吧！」那位護士笑著回答說：「晚上包給！」晚飯後，她果然把安眠藥送來了，這真是雪中送炭，解決了我的大問題。我有生之日都不會忘記那位護士對我的幫助！

七八年冬初，我的肩胛骨痛得難忍，腰椎骨也很痛。在我要求之下，醫生給開了一個療程的理療單，但祇限於肩胛骨一個部位。第一次給我做理療是一個年輕的女護士，她問：「肩胛骨是怎麼傷的？別處沒有受傷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打的。受傷的還有腰椎骨！」她給我做過肩胛骨治療之後，立即主動把理療儀器移到我的腰的部位，說「把腰也做一下。」我高興地向她表示謝意。當我做完一個療程後，護士說：「休息三天繼續做。」我說：「醫生沒有開理療單。」「我去叫你就是理療單！」我連續做了三個療程，很解決問題。在做理療的過程中，我們相互熟悉了，她就同我談了自己的情況。她說：「我是由三〇四醫院調到這裏來的。我聽過你兩次報告，我們大家對你的印象是很好的。你是我的老部長，現在能爲你盡點力，心裏特別高興！」

第三是理髮、洗澡等問題。這是一些小得不能上口，但又有必要簡單說一下。理髮重要的不是理得好壞的問題，而是對我們的態度和什麼時候理髮的問題。監管員以他的時間爲主來安排囚徒的理髮。每人理髮的時間頂多十分鐘，剪短了就行了。對我態度好的監管員_{字讀音}^除理得仔細

之外，還特別選擇在洗澡前給我理髮，理髮後立即洗澡，這真是囚徒的幸福！要衛生紙也值得一提。有時要衛生紙幾乎要不來，都沒有辦法揩屁股。遇到好的監管員，一要就要來了，並且還拿得特多。

八一年九月十一日，我由秦城到西安時，送我的有三個人，其中有一位男醫生。他說：「在沒有公審之前，我對你的確是仇恨的，以為你真同林彪搞反革命活動。公審之後，我們就清楚了。我會真正認為你是個好人。」

送我的三個人都這樣表示：「我們是在專政的第一線，但我們專了什麼人的政，是在公審以後才清楚的。」對他們的談話，我感到很受教益！

子女探監

七九年九月間，獄方就向我提出：「讓你的子女來看看你，如何？」聽到這樣的話，我真是激動了一陣子。家破人散已經八年多了，老伴和孩子們都毫無音信，哪有不想之理！可當時是又想又怕，想是主要的；怕是不願意增加孩子們的痛苦和受到牽連。我的孩子都是共產黨員，在當時嚴峻的政治情況下，如果他們來看我，政治上勢必對他們有很大影響，違心地劃清界限，那個年代人人都會。

「不需要。」我斷然拒絕了。

「為什麼？」

「他們來對我毫無作用，反而會增加孩子們的痛苦！你看我這個樣子，這麼冷的天連雙襪子都沒有，他們有嘴巴會說，說出去會給黨抹黑的。」

「也許見一見有互相鼓勵作用。對你的問題會有新的認識。」

「什麼新認識？！我的子女什麼時候也不會認為我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強加在我頭上的。孩子們見到我，是會痛苦不止的！」

他們知道我不讓子女來探監的態度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提這個問題了。快到年底了，不管我願不願意，我的子女真的來探監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兩點多，兩個監管員突然走進我的監房來。他略有喜色地對我說：「走，出去一下，有事。」開始我跟著監管員走，後來監管員索性拉著我的一隻手，急速地走出三道監門。待到監樓外的大路上，他才同我說：「你的子女來看你了！」我聽到他說這句話時，立即興

奮到頭暈眼花的程度，兩條腿突然軟了下來，兩個監管員就架著我走，當時這個大的，那個小的都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但我突然想到自己穿得太破爛了，腳上連襪子也沒有，每隻布鞋上都有兩個大洞，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我立即對監管員說：「我穿得太破爛了，孩子們看到會很傷心，對黨的形象也不利。」監管員說：「顧不上這麼多了，八年了，見一次親人多不容易呀。」邊說又邊架著我走。不一會兒，監管員把我帶到了探監室。事後才知道，監獄接受了黃永勝不願見的教訓，監管員怕我不見，才採用這種辦法。當我踏進探監室的門，首先看到一屋大大小小的人。轉眼之間，京京、光光、毛毛、新平、路光就出現在我的眼前，除了承光因路遠沒趕上之外都來了。大兒子路光我還認識，其餘的真是都不認識了。

京京喊出一聲爸爸，就撲到我懷裏來了，我聽到後面叫爸爸的聲音，一個接一個而來。當時，我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簡單一句話就是：「苦中之喜！」但我忍著淚水，同每個孩子都抱著親吻了一下。我和路光擁抱時，我在他的耳邊問：「你媽還活著嗎？」路光本來很堅強，他要求弟弟、妹妹不許哭，聽到我這樣的問話，他立即感到很辛酸和悲愴，他騙我說：「媽媽很好。」其實，自「九一三」之後，路光至今還沒有見到他媽媽，我的老伴在經過了中央專案組的關押審查後，當時正在陝西大荔農場監督勞動。幾年後，路光回想起這件事對我說：「你在秦城時問我，『媽媽還活著嗎？』我感到非常傷心，這個國家是你們打下來的，你們是國家的主人，你們最應該幸福愉快地生活，你卻問『你媽還活著嗎？』這樣的話，真叫人不可思議！」

是京京扶著我坐下的，我從一進門就拉著京京的手沒有放開過，八年了沒和任何人握過手。「九一三」時，京京是一個祇有十三歲的瘦小的女孩，現在長到一米七多的青年人了，我祇有一個女兒，她無疑就是京京了。我坐下之後，路光向我介紹：京京的愛人新平，毛毛、光光的愛人和躺在籃子裏祇有三個月的小孫女——小愛。這時我重新看了一下所有的兒女們，八年了，把我搞得家破人散！

我指著光光、毛毛問路光：「這兩個是誰呀？」

「我是光光」，「我是毛毛」。

女兒的心真細，她一邊流著淚，一邊解開我棉衣上的扣子，用手一直往裏摸，發現我沒有毛衣，也沒有棉毛衫，身上有臭味，還問了我是

否有虱子？女兒邊問邊淚流不止，她說：「爸爸你怎麼祇穿一件棉衣殼呀？」我是一個十足的「囚徒」，胡茬很長，身體又瘦弱。身上穿的衣服是補了又補，各種顏色都有。黑顏色是我的爛褲叉上扯下來的，黃的是原來軍衣上的口袋撕下來的。我渾身襤襠，孩子們是想不到的，這時大家忍不住內心的痛苦，竟放聲哭開了！我也跟著哭了，真想哭個痛快。

這時路光解開衣服脫下自己的毛衣和襯衣一定要給我穿上。路光是個敢說話的人，面對著監管員說：「他怎麼穿得這麼破呀？！光著身子穿棉衣，大冬天襪子也沒有，穿一雙單布鞋，還有兩個洞，大街上撿垃圾的比我爸爸都穿得好！我也被關過監獄，也沒到這種程度呀！能不能送衣服來？」兩個監管員都不說話。

孩子們帶來很多的食品，他們都希望我多吃點。由於我患有腸胃病，又沒有吃零食的習慣，祇好每樣都吃一點，以了孩子們的心願。我們一邊吃東西，一邊零零星星地談起分別八年的事來了。孩子們來探監，對家人受株連的情況，他們是「滴水」不漏的。對家屬受株連的情況，我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保外就醫」到了西安後才知道的。孩子們爲了使我寬心，還特別同我介紹了他們結婚的情況。

好景不長，監管員提醒我們注意：「大約還有半小時，還有什麼話要說的，現在就說吧。」頓時，整個房子沒有聲音。我打起精神向大家說：「你們都不要悲傷，我不是還活著嗎？現在，我應當向你們說幾句話。首先，對你們媽媽說，要她注意三點：一是，好好活下去，活得長一點，也許還有見面的機會，要是活得短，在八年前就算最後分別了；二是，要把天下的大事都想開了，我們所遇到的事也就想通了；三是，不要掛念我，我會活下去的。對你們也說三點：一是，要老老實實地生活，不要同別人比；二是，要扎扎實實地學本事，本事就是飯碗；三是，要遵紀守法。對我自己也說三點：一是，我的問題是時代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二是，我永遠相信黨，相信我自己；三是，我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兒女的事。」

我說了之後，也情不自禁地忍不住淚水。孩子們反轉來安慰我。他們說：「爸爸不要難過了。我們看到爸爸還活著，就非常滿足了！爸爸遇到的那些事，我們早就懂了。兩個月之後，我們又會來看爸爸的。」

監管員已經催了兩三次。我祇好忍著痛苦，同每個孩子再親吻了一下，就離開他們了。我提不起腳步，祇好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慢慢走進監管區。我不願回頭，不敢向監獄區的大門外面看一眼。出來時，孩子們成爲我最大的吸引力，把我吸引得一切都顧不上了。返回時，孩子們成了我最大的拉力，把我拉得連腳步都拖不動了。我回到監房後，沒有吃晚飯，祇喝了一口水，什麼也不想吃。第二天早晨和中午什麼都沒有吃，心想這場災難怎麼是這個樣子！？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用開水泡了一點饅頭吃。此時，由於中紀委審查小組已經開始審查，監獄對我的態度，同以前相比是好多了。獄方注意到我的痛苦，他們除了勸說之外，晚上還主動發給我安眠藥，第三天的中午，還特地給我做了一碗雞蛋湯。

第二天晚上，一個監管員值班時到我房間來，同我說了一席話，我懂得其意，對我啓發很大。他說：「不要因孩子來看你而過份傷感。要看東方，久雨也許有晴的可能；當然這祇是可能，現實還是看不到的。你不要因我的職業同我格格不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對問題都會有看法。以後有什麼事，可以同我說，可能對你精神上會有一定的幫助……」

探監對有的孩子卻造成了災難。我的女婿是部隊幹部，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壓力，總政治部對他進行了通報批評。指出：「這種行動是敵我不分、喪失立場的錯誤。」

過了兩個月，孩子們又來了，承光夫婦也來了。「九一三」之前，承光和雪巾祇是一般的朋友，一共才見過幾次面，承光在廣東部隊裏工作，部隊在惠陽羅浮山深處，雪巾在重慶四醫大上學，可以說他們天各一方，雪巾連我是幹什麼的都不太清楚。這對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他們自己的信念，也有專案組「幫了大忙」！「九一三」之後雪巾竟然也被關起來，一關就是六、七年，而且比承光關得還久。專案組故意給雪巾戴上「邱會作兒媳婦」的大帽子，她不嫁給承光嫁給誰？我不感謝專案組又感謝誰？！

這次探監後預審工作就開始了，第二次探監時，我拿大便紙給路光寫了一個條：「可能要進行審判，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我的態度是：不懼怕也不抱幻想。他們是什麼貨色，我非常清楚，可難就難在他們是打著黨的牌子，怎麼對他們是小事，但怎麼對黨就是大事了。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第四十一章 中紀委的審查

審查的重點

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時許，監管員走進監牢來對我說：「中紀委來人找你談話。」他還把「談話」二字的聲音說得特別大。很顯然，他們是有意不用「審查」二字的。

聽了監管員的話，我當時心裏一楞！我心想：「從七二年夏天到現在，由衛戍區警三師到了秦城監獄，七年多的時間對我無人過問。現在還有什麼人找活著的死人談話？」當我來到審問室，審查組的人就正式向我說：「我們是中央派出的審查小組，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對你進行審查，處理你的問題。我們對中央負責，也對你邱會作本人負責。」

審查組問我：「你最近想些什麼？」

「不想什麼，我進了監獄後，即進了『三無世界』，一無人問，二無人審，三無人管。」

他們聽了之後說：「何必這樣悲觀嘛！」

「事實就是這樣嘛。我遭受到的摧殘，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嗎？這些你們比我還清楚！」

「所以我們要對你重新進行審查。例如，錯誤與罪行。錯誤與罪行是有界線的，但又常常分不開。」

「我對自己的問題，用四個字就可以說清楚，那就是，『有錯無罪』，錯也是有當時條件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我們是擁護毛主席的，但我們思想上與毛主席的一些政策有不一致之處，比如我們反對造反派，反對打砸搶，反對踢開黨委鬧革命。毛主席也批評江青，可實質上又是支持、維護江青的，現在看來我們反江青一夥並沒有錯。但毛主席健在時，以他的文革路線為是非標準，我們就叫有錯。現

在，毛主席去世了，中央也認為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線、政策有錯誤，那扣在我們頭上的『反對毛主席』的錯又在哪裏呢？請你們審查，應該給個結論。林彪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我們在林彪領導下工作，但我們與『九一三』的任何事情毫無關係，這就叫做無罪。關於『九一三』問題，我希望中央再審查，我不怕再審查，怕的就是審查清楚了，也不給結論，這才真正叫做沒有政策了。」

接著他們提出了三個問題。

「你對江青有什麼看法？」

「過去我看不太清楚她和主席的關係，又有人（我沒有說出汪東興的名字）在中間煽動，犯了反江青一夥的錯誤，也就是犯了反『四人幫』的錯誤，這多麼可笑。現在，主席去世了，江青也垮臺了，談談也無妨。從思想作風上來說，江青是個惡霸，有些狗仗人勢。現在想起來她的『本事』，就是靠兩條，一是她與主席特殊的關係，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受到了不少人的吹捧，甚至林彪、總理對她也有過抬舉，其實這種抬舉是說給主席聽的；二是她自己也有品質不好的思想基礎，作風很霸道。她把這兩條運用得很好。」

「說得不錯嘛。你再說說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林彪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本來是建議，應不為過。當時的中央常委周總理、陳伯達、康生都同意設國家主席，五個常委四個同意。林本人並不想當國家主席，我們心裏很有底，徒有虛名的東西他並不要。當時大家都同意設國家主席，我們這些人也擁護設國家主席，但那是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根本沒有想到讓林當，在這個問題上汪東興是最大的積極分子。後來編造的謠話很多。」

「你再說說，你反徐向前的問題。」

「徐向前的事你們竟然也作為問題提出來？因為徐是元帥吧？而不是因為是非曲直。我沒有在徐帥領導下工作過，我過去對他印象很好，也很尊重。在六七年文化革命最混亂的時候，徐帥他自己頂不住造反派的糾纏，就利用職權下命令把我送到二醫大『紅縱』老虎口上去，他不是以全軍文革組長的名義指示我回總後參加運動，他特別強調他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命令我回到準備把我往死裏斗的造反派手裏，葉帥、聶帥是堅決不同意他的。結果助長了造反派的氣焰把總後搞得大亂，把我也幾

乎打死，徐帥是有很大責任的。既然事實如此，我為什麼不可以批評他的錯誤？徐向前整我在先，我的反擊在後，事情是由徐向前引起的，他應當承擔後果！我過去對徐帥有意見是公開的，沒搞什麼陰謀。徐帥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作了檢討，把自己罵得一塌糊塗，並向我道歉。他特別說：「他當全軍文革組長時，軍隊亂了。」

第一次審查到此結束。

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的審查，一反李震時期中央專案組的方法，是從文化大革命問題開始的，而不是祇追「九一三」的問題。這說明了他們不是孤立的抓什麼「罪行」，而是通過調查研究，力求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對我的審查，他們分為三個單元，即：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廬山的問題，林彪集團的問題。在整個審查過程中沒有提過「兩謀」問題，可能他們認為，這頂反革命的大帽子是扣不到我們頭上的。

審查組從一九八〇年一月開始，到七月間談完了文化大革命問題之後，即轉為揭發「四人幫」的問題。

審查組說：「廬山及以後的問題，你寫了很多的材料，也寫得比較清楚，我們對廬山問題，瞭解得也比較多，就不問你了。現在，你即對『四人幫』的問題進行揭發。有多少說多少，相信你也不會保留的。從材料上來看，你們很早就同『四人幫』對立，現在就不要怕犯反『四人幫』的錯誤了。」

我已經向他們談了三、四次反「四人幫」的問題，他們聽得也很感興趣，但又突然停止了，轉為談廬山問題。

關於廬山會議的問題

審查組說：「對廬山的問題，我們畢竟是局外人，現在，還需要把廬山問題，從頭到尾談一下。」

對廬山的問題，我寫了三份比較厚的材料，他們基本滿意。但有兩點，他們不太相信，這就是：一、對林彪在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他們感到，林彪在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事先不僅沒有同黃、吳、李、邱商量過，而且林彪講話事前我們都不知道。二、九月七日，在九江機場送林彪走，祇擠在機艙裏和林彪照了一張合影，林彪沒有給我們交代什麼任務。對這兩點他們不相信，又提不出任何證據。

對我寫的材料，審查組重視過的似乎有：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釣魚臺十一樓向黃、吳、李、邱、姚文元、李德生等攻擊周總理的問題；七〇年四月間和六月間，汪東興在他中南海的家裏向黃、吳、李、邱先後談過設國家主席和江青的問題；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廬山林彪去毛主席住處開中央常委會，葉群驅車追上林彪要他保護汪東興的問題；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周總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宣佈對黃、吳、李、邱隔離審查時的講話等等。對其中的兩個問題，即「江青攻擊周總理的問題」和「九二四」周總理的講話，他們還要我分別口頭再講一次，並搞了錄音。他們聽了之後說：「對這兩個問題，你還要講兩次，我們要請我們的上級也來聽聽。其目的不是別的，正是為你創造一些條件，爭取寬大處理減少阻力。你可以放開講，時間不限。」

第一次講的時候，聽的人不少。除了審查組的人之外，其餘的都沒見過。聽的人很感興趣，有人邊聽還不時點頭。聽完之後，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說：「你的揭發材料寫得很好，今天講得更好。注意身體。這對我們爭取對你的寬大處理極為有利。」但我對此除沒有抱幻想之外，總感到他們「好的態度」是一個不解之迷。

第二次講的時候，除審查組的人之外，還有穿軍裝的人在聽。聽的人的興趣比上次的人小多了。當我講到：「江青攻擊周總理時，她的話音一落，黃永勝就表了態說：歷史上的問題我們不清楚，總理領著我們辛苦工作，我對總理沒有意見。吳、李和我也跟著表示同意黃的講話。」我的話音一落，那位穿軍裝的人站起來說：「你們有這種覺悟嗎？」他說完就走了。我心裏想：「你這個小兔崽子！除了當劊子手之外，不會有什麼用。」我對他十分鄙視！

審查的第一遍，也就是「過濾」性的審查，到此告一段落。以後就轉為重點問題審查了。

關於攻擊朱德的問題

五九年十月間，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我第一次聽到林彪批判朱德。他說：「朱德能力不大，可是還想當領袖。人大委員長不願當，要當國家主席。什麼總司令，是假的，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林彪對朱老總的批判，我當時並不以為然，但感到其中必有問題。在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人都批判朱德，他們的調子都比林彪高。

六八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葉劍英對朱老總作了長篇批判發言，批判的主要內容與九年前林彪講的基本相同，而且還大有過之。從簡報上看，批判朱老總的人就多了，發言的調子也高，不少老同志都批判了朱德。現在看來，批判朱德應當是來自毛主席，所以大家講的是否是實話也難說，我看主要是講給主席聽的。

我還清楚的記得，在楊成武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搞《黨史綱要》時，其中提到朱德的錯誤，但點不點名楊成武拿不準，就給毛主席打了報告，毛主席在批示中同意點名，而後以中央文件下發。

六八年十二月，我在總後常委擴大會議上，講了朱老總的「問題」。我講的內容主要是根據葉劍英在會上的發言為依據的。我對朱老總的批判是完全不必要的，是帶有趕「潮流」、趕「時髦」的性質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唯獨總後不傳達，恐怕也是不成的。總之，對朱德的批判是工作性質，不是我一人批他。好在我當時還遠遠沒有面對面批判朱德的資格，朱老總也聽不到我的講話。

關於搞葉帥材料問題

六八年四月初，黃永勝上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不幾天，康生在中央碰頭會上就要黃搞葉劍英的材料，康生說：「主席對我說，葉劍英的問題不少，對他的問題，搞個材料來看看。」

對搞葉的材料，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傳達後，我發表了在當時的情況下可以表示的態度。我說：「葉是政治局委員，雖然是坐冷板凳的，但搞他的材料應由主席或總理交代才好。」對我的意見大家都不表態，黃永勝說：「從感情上講我和葉帥不錯，從工作上講整材料費力費時費人，但康老何許人也？他在會上講是主席讓搞的，當時總理也在場，康老給我們搞陽謀。」

黃永勝還說，他會後問過總理，總理說：「會上佈置了的工作是要辦的。」

這樣，對搞葉的材料，黃永勝決定：先搭架子搞起來再說，但不要太牽扯我們的精力，要絕對保密，由軍委辦事組直接管。誰負責抓這件

事，吳法憲提議由我來抓，我不接受這個任務。我說：「我以前跟葉帥關係很好，甚至有人說我是葉劍英死黨，我怕涉嫌，對工作不利。」黃永勝即決定：「老邱可以不管，由老李來管，由李在海軍調選主要辦事的人。」我記得，李作鵬指定海軍政治部一個處長管這件事。

搞葉帥的材料組成立後李作鵬恰好病了，黃、吳要我臨時管一下。我不能推托，就辦了如下幾件事：第一，除組長之外，由空軍、總參、總後選調的工作人員是我審定的，並由我召集全體人員開了第一次會議。第二，我批准材料組的辦公地點設在總後機關大院之內。第三，我批准材料組調閱過軍委辦公廳、總政治部的有關檔案材料。第四，我批准印發了材料組第一稿材料，我一個字也未改，即批：「印發軍委辦事組審議」。在我辦了上面四件事之後，李作鵬病好了，從此對搞葉帥材料之事，我也就「移交」了，再沒有過問。後來對葉帥搞成了一個素材稿，基本上都是空話。黃永勝和葉帥關係也很好，他多了一個心眼，把這件事向林總匯報了，林總堅決不讓搞，黃永勝立即下令把材料全都燒了，一份不准留，搞葉帥材料的事也就結束了。

關於反擊徐向前的問題

六七年初，我在西山養病，因為我被總後系統的造反派批鬥得很厲害，心臟病發作，昏厥在批鬥現場，經搶救後，葉帥叫我到西山休養，這個情況徐向前是完全清楚的。

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時許，徐向前突然給我打電話，他在電話裏說：「我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命令你回到總後去參加運動。」這個時候，徐帥要我回已被造反派搞得大亂的總後機關接受群眾批判，實際上是讓我去送死。對徐向前的命令，我感到很震驚、很突然，這個時候到群眾中去，意味著什麼，我心裏很清楚，但他畢竟是軍委副主席，我還是很認真地回答：「堅決執行命令」幾個字，其他什麼也沒說就下了山。上海二醫大「紅縱」是唯一支持上海「一月風暴」向上海市委奪權的軍內單位，是江青、張春橋勾結起來，把造反派勢力引向軍內的禍水，他們來京是專門衝擊總後黨委，專門整我的。這些徐向前是很清楚的。徐帥身為軍委副主席、軍委文革組長，頂不住造反派的壓力和糾纏，又向江青示好，他竟利用自己的權力，把我送到「虎口」上去，方括號裡是錯字這樣的問題

題？！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中央軍委的支持下，在總後黨委的領導下，打垮了總後系統打、砸、搶的造反派以後，清查禍根，勢必涉及到徐向前。我要總後文辦搞了徐向前的材料也是事實，材料搞好了，但沒有散發。為什麼沒有發？是黃永勝勸阻了。

八〇年，中央審查組對我的審查將要結束之前，審查組全體同我做過一次政策交底。他們說：「對你的問題的複雜性，你應該想得到，對徐副主席的問題，你說的情況是事實，但這樣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也不能這樣向上報告。我們提議，你對這個問題做個簡單的檢討，這對整個審查是有利的。」

審查組談話的精神我完全理解。我即表態說：「對徐向前的觀點，我是不能改變的，但爲了支持審查組的工作和顧全大局，我可以向軍委，向徐副主席進行自我批評！」審查組對我說：「可以！」對這個問題的審查也就結束了。

平心而論，徐向前是害了總後不少幹部的，這和「四人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類似的。中央決定批鄧，不批是不成的；鄧東山再起，不處理批鄧積極分子也是不成的。當時，總後絕大多數幹部群眾是擁護總後黨委，擁護我的，在混亂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堅守崗位，認真工作的。徐帥的命令一下，把我推進造反派的虎口裏，不少幹部誤認爲中央對我的態度變了，甚至認爲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對我的態度變了，這樣，幹部隊伍發生了動搖，一些人倒向造反派。其實，毛主席、中央是保我的、肯定我的，並派周總理親自送我回總後主持工作，這樣，把一些幹部裝進反總後黨委、領導的圈子裏，審查和清理造反的幹部也就勢在必行了。

關於總政的一些問題

從五九年秋我當總後勤部長以來，總政某些人就一直反對我。由於軍委對我的器重與支持，他們沒有能達到目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總政把我列入羅瑞卿的圈子內一起打倒，也未能得逞。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政某些人就策劃利用造反派之手把我打倒。

審查組：「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你要同我們談清如下問題：一是搞總政的材料問題；二是看總政的檔案問題。」

根據上面的問題，我分別簡要做了如下交代。

關於搞總政治部的材料問題。我指示搞了總政一份長篇材料，並分發到了各大軍區、軍兵種、院校後勤機關。搞這個材料的目的，主要是揭露總政的空頭政治，使後勤機關的工作能夠更好地實行政治統帥業務的方針。

六七年三月底，總理在總後開大會送我回總後主持工作，四月間，在總後機關，把由全軍文革支持的，對總後黨委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被打垮了。為了總後機關能夠盡快投入正常工作，認識造反奪權、搞打砸搶的危害性，對幹部群眾進行路線教育，我親自佈置要搞材料：一是總政、全軍文革迫害總後的問題；二是二醫大「紅縱」的罪行；三是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現在看來，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當時的材料難免有不夠切合實際的地方，甚至錯誤的地方。

接下來我還說，你們提出看總政檔案的問題，我認為是來自總後造反派的，好像抓到了我的辯子。我實事求是地說，如果真抓到了辯子也不要緊，有錯我就承認。但請你們注意，我當時是軍委辦事組成員，又管幹部工作，我不僅是同意了總後文辦派少數人去總政看檔案，我還有權調閱總政有關檔案的，比如調軍隊支左幹部的檔案進行審核，我完全不需要偷看。有件具體事是這樣的：六七年秋，總政文辦的同志爲了支援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就把總政有關迫害總後的現有存檔材料同總後文辦說了，並同意總後派人去看檔案。總後文辦向我匯報了上述情況之後，我就同意了文辦派少數人去總政看檔案。總後文辦把全軍文革有關總後文化大革命的幾個記錄本拿來給我看了，我還交代：文辦拿回來的所有檔案看後立即退回，要做到一份不能少。

文化大革命中，我並沒有害怕全軍文革（班底還是總政）支持造反派整人，是同他們公開干的。六九年十月間，軍隊整編機關的時候，軍委決定：總參裝備計劃部、軍事交通部撥歸總後建制。在總後歡迎兩部到總後的會議上，我講到機關作風時，確實講過「機關要有好的作風，但決不能學總政的壞作風」，「總政同國民黨特務機關差不多」的話。這句話，雖然是我一時的氣話，但這是不該說的，對此，我應承擔責任。但把我說的某些錯話，作爲我的「反革命」罪證，我是永遠不會接受的。至於「砸爛總政閻王店」的事，與我毫無關係。

在我說完之後，審查組的人說：「對總政的問題，我們搞清楚了。你把看總政檔案一事寫個材料。」對這個問題的審查就結束了。

關於醫療保健問題

對這個問題，主持審查的人要求我交代的有：徐海東、羅瑞卿、陳毅、賀龍、傅連暲等五人的問題。我當時情緒也比較大，這是上面爲了打倒我們故意讓總後造反派醜化我。但他們抓我的辯子沒抓到，反而披露出文革時搞專案的一些情況。

其實，老帥的治病問題，都是由總理專管，我沒管，我也沒資格、沒權力管。在賀龍、羅瑞卿等人治病的問題上都是中央專案組報總理直接管，總後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聽的。三〇一的領導也不向我匯報，這是黨的工作紀律。在這個問題上，三〇一醫院僅是總後的直屬單位而已。這如同你租用了我的房子，但房子裏死了人，並不能算到我頭上。另外，這個問題我也是很難啓齒的，因爲這些事是由中央專案組辦的，一說就扯出主席、總理，我當時真不知怎麼說好。我繞了一個彎子說：「爲了便於說明這些問題，要先將當時醫療管理的情況簡要加以說明。」

對軍隊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衛生部規定：軍隊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上將以上的醫療保健由中央衛生部保健局統一管理，並由北京醫院承擔醫療任務。後來，軍隊幹部提出在北京醫院看病諸多不便，於是不少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則轉爲以軍隊爲主，總醫院承擔醫療任務。

在文化大革命前，軍隊的醫療保健工作，有些不成文的規定。對元帥配有保健護士，外出時派保健醫生，並定期供應保健藥品；大將按需要也能享受元帥級的待遇；上將以上在三〇一醫院住院時，可以住南樓三層的套間大病房，看病可以在南樓高幹病房就診；對中將以下的則沒有什麼規定，由各單位的醫療機構負責。多年來大家都能自覺遵守那些不成文的規定。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北京醫院的醫療保健機構被造反派砸爛了。此後，不僅軍隊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完全由三〇一醫院負責，中央黨

政機關的高級幹部，也經過不同的渠道轉到三〇一醫院來了。但原來整個醫療保健的管理制度，則尚未改變。

一九六七年五月間，周總理召集我、汪東興、以及搞保健工作的醫務幹部吳階平、蒲榮欽（三〇一醫院副院長）李晉（三〇一醫院南樓醫務主任）等在京西賓館會議樓第三會議室開過一次會議，專門討論了醫療保健工作。在會上，周總理同大家一起商定了五條。

一、成立中央醫療小組。小組的主要任務是負責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的醫療保健工作。為了保證中央領導人保健工作的需要，在中央警衛局三〇五醫院內設立特別小型藥房。周總理還宣佈：「中央醫療小組的工作，由周恩來、邱會作、汪東興、吳階平統一負責。」

二、軍隊所有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由周恩來、邱會作、汪東興負責，以三〇一醫院為主，北京醫院、協和醫院量力而行，擔負醫療任務。取消純粹保健藥品的供應，需要者可以代辦，自己照價付款。中央舉行會議時的醫務工作，列入保健工作範圍之內，統一領導管理。

三、對中央原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以上的領導幹部，正在受審查的人員，涉外事項的醫療保健工作，一律歸周總理批准，由三〇一醫院，北京醫院、首都醫院、公安醫院，按照總理批示執行任務。對上述人員的醫療保健，沒有總理的批示各醫院不得自行辦理。

四、對外的醫療工作，由外交部承辦，經總理批准，委託有關人員辦。例如，一九六八年派去阿爾巴尼亞為霍查治病的醫療小組，就是周總理委託我一手承辦的。

五、從國外進口醫療器材和藥品，一律經周總理批准，交由外貿部承辦。

六九年，三〇一醫院在深入「鬥、批、改」之後，對軍隊領導下部的醫療保健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和措施。在報告中，對個別人的特殊化提出了批評。總醫院提出的改進措施，包括徹底取消純粹的保健藥品，私人不得佔用總醫院過多的醫療人員，總後黨委批准了總醫院的報告，並報告軍委辦事組審批。軍委辦事組鄭重其事地討論了總醫院的報告，並原則上予以批准。其中還特別指出：對老帥的醫療保健工作一定要做好，但對不夠合理的要求，要做耐心的工作。還指出對新調任中央領導工作的幹部醫療保健工作，要認真做好。

以上對醫療保健歷史情況的簡要敘述，目的是便於說明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醫療保健工作是怎樣進行的。

這裏還要指出的是，賀老總的治病問題，及羅瑞卿，陳老總，陶鑄的政治問題，三〇一醫院都盡了全力，他們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複雜的政治情況造成的，不是三〇一的醫療造成的。這裏要說有責任應該在毛主席、周總理和林彪，與總後無關，與三〇一醫院的專家教授及醫護人員更無關。靳來川、曹根慧及三〇一醫院的其他領導同志，都是我軍優秀的醫務工作者，靳來川是寧都暴動的紅軍幹部，長征過來的。遠的不說，在文革中，他們給老師治病，給總理批准送來的中央領導治病，給軍隊的高級幹部治病是有功的。他們忠誠黨的事業，品德好，工作任勞任怨，每天常常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三〇一醫院的專家、教授、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愛護，有人甚至說文革中知識分子在三〇一真是在天堂一樣，因為他們的老同學、老同行，在文革中大部分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受到「牛棚」之苦。

在文革中，中央衛生部被冠名爲「老爺衛生部」，衛生部直屬的大醫院如北京醫院，協和醫院，造反很厲害，老幹部住院很困難，住進去也得安寧。記得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總理把中央的醫療保健任務交到了三〇一醫院，這是爲什麼，就是三〇一醫院信得過嘛！因此三〇一醫院收治老幹部的任務很重，爲了更好的給老幹部治病，在醫院南樓（高幹病房），又設了專門及時搶救老幹部的「小門診」，要求隨時做到實施搶救任務，醫院南樓還專門設立了藥檢室，藥品經檢驗室檢驗後才能給病人服用，尤其爲主席進口的藥都要經過嚴格化驗才給主席服用，有一次爲主席在香港進口治支氣管炎的藥，曹根慧坐飛機晝夜兼程，不辭辛苦順利完成了任務。爲了老幹部治病，他們還專門搞了一個全國、全軍專家聯絡名單，當時，地方的專家、教授、知識分子，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很多，蹲「牛棚」的也很多，爲了解決醫院領導的顧慮和困難，我說：「管他是不是牛鬼蛇神，能認真治病就成。」這句話也成了我的罪狀。黃永勝總參謀長對老幹部很關心，對三〇一醫院的工作很支持，他對給他出診的醫院領導說：「你們不要管外面收進來的人是怎麼回事，總理叫收進來就是病人，你們祇管認真治病，不能出任何問題，一出問題就要『通

天」。病好了也不要催人家出院，要聽安排。」三〇一醫院對所有住進來的病人都進行了認真的醫治。

但是，「九一三」之後，他們受到了極大的冤屈和災難。

關於羅瑞卿的治療問題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羅瑞卿在家中跳樓「自殺」，人未死摔傷了腳。羅瑞卿屬於總理親自管的中央專案，具體事情由楊成武管事，他的去向我根本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羅瑞卿先是送到北京醫院搶救治療的，並在那裏做了第一次腿部的手術。

六七年四月初，羅瑞卿才到三〇一醫院住院，住在十四病室，專案組給他起名叫「郝少平」，中央警衛團派來的警衛人員，日夜不斷地看守。十四病室是南樓高幹病房蓋好前的高幹病房。

大約六七年六月間，我去總醫院看望住院幹部和醫護人員時，第一次知道羅瑞卿在外科病樓十四病室住院。靳來川院長對我說：「周總理叫我們去，親自交代說：『這是特殊病人，到了醫院之後，除了向管他的人報告和向我這裏報告之外，其他的地方不必報告。對他的治療，要經我批准，才能執行。』遵照總理指示，我們沒有向邱部長報告。」

我說：「總理有交代，我就不管不問了，你們做的對。對這些人的醫療，應當遵照總理的指示辦理。對這種特殊病人，應當特別經心。」根據周總理對總醫院的指示，我對羅在總醫院治療就根本不能過問了。羅什麼時候開刀，什麼時候開的第二次刀，什麼時候出院，出院後到什麼地方去了等等，我都不知道，也沒有聽人說過。

從上面的情況來看，羅瑞卿在三〇一醫院的治療，是好是壞都同我毫無關係。不能因為我是總後勤部長，是三〇一醫院的領導，就在我的頭上加上一切莫須有的罪名。應當肯定，羅瑞卿在三〇一醫院是得到了好的治療的，因為醫院是堅持執行總理指示的。羅瑞卿自己都說過：「要不是三〇一醫院給我做了手術，恐怕我連命都保不住了。」

當時，軍隊造反派成立了一個「鬥羅籌備處」對羅瑞卿進行了多次殘酷的批鬥，在住院期間也把羅瑞卿搞出去批鬥，為此，羅瑞卿的治療常常中斷，傷口不能癒合，形成股骨頭壞死和骨髓炎等病症。羅瑞卿自己向中央寫報告要求做截肢手術。同時三〇一醫院非常負責地組織專家

會診後，給中央寫了報告，周總理看了三〇一醫院的報告，看了X光片和特別畫的手術示意圖，周總理批准了這個手術報告。

六九年初，給羅瑞卿做了手術，手術前三〇一醫院又給周總理打了報告，總理批示要保證治療的效果和安全。主管醫療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長主持手術，由骨科副主任黨廣博和主治醫生王一德主刀、主治醫生宋運琴負責麻醉，著名專家外科主任陸惟善在手術室指導，雖然羅瑞卿患有心臟病，由於組織周密，認真負責，手術很成功。若干年後他到世界上最先進的西德去做手術，卻死在那裏。

可是，連命都差點保不住的卻是為他認認真真做手術的這些醫務人員。羅瑞卿重新上臺後，把這些做手術的醫務人員幾乎全部抓進監獄，並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當場扒掉他們的領章帽徽。靳來川院長關進秦城，曹根慧副院長關在白廟監獄，他患有嚴重的胃病，在監押期間做了胃切除手術，還要吃監獄的窩窩頭和白菜幫，我現在想起來都很寒心。其他的醫務人員有的判了刑，有的被開除黨籍，著名外科專家陸維善也被整治，擡出軍隊。

後來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聶帥拯救他們，才最後落實了政策。

關於陳老總的治療問題

陳老總是我尊敬的老首長。他是一個在革命戰爭年代英勇戰鬥，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嘔心瀝血，為黨的事業奮鬥終生的人。在工作中，他批評了你，你都心裏舒服。

陳老總得病是積勞成疾的結果。七〇年陳老總在石家莊，因身體不適總理批准他回京治病，是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直接給三〇一醫院管首長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長打的電話，曹根慧立即答應並做了準備。陳老總是十月二十六號去住院的，住在南樓三層的套間，這是三〇一醫院當時最好的病房了。陳老總住院後，我到醫院去看望過他，因為陳老總沒有帶警衛員和秘書，南樓的醫護人員對他照顧得很好，這下把陳老總感動了，他對我說：「我說一句倚老賣老的話，這些醫護人員，比我孩子對我都關心周到。」當時陳老總還說了一句貌似玩笑的話，他說：「總理這個人呀，別人把他當驢使，他還尾巴翹得高高的往前跑。」這句話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現在看來陳老總的話是對的。

葉帥和吳法憲也去看過陳老總，黃永勝知道陳老總住院後，叫我替他去看一下陳老總，我也照辦了。因為黃永勝也病了，剛剛出院，經檢查排除了胃癌，是肝硬化。黃永勝就是帶著這樣一個身體，「九一三」前在夜以繼日的為黨工作，全力協助總理，並在第一線和江青的錯誤對著幹，「九一三」後也是拖著這副身子蹲了共產黨自己的十年監獄。

經過專家會診和腸胃鋇餐透視等檢查，並請北京的放射科專家對陳老總的光片進行了會診、討論鑒定，認為「不顯示腸癌跡象」。這不是三〇一醫院一家鑒定的，是和北京的專家共同鑒定的。

一個多月後，即十二月二十二日，因沒查出病因，陳老總要求出院，曹根慧副院長希望他多住一段時間，再繼續觀察和檢查，陳老總不從，他說：「毛主席快過生日了，我要去為毛主席祝壽。」曹根慧從病房一直把陳老總送到車上。

陳老總出院後情況不太好，他感到腹部很痛，二十天後，也就是七一年一月十六日他來南樓要求做理療，幸虧理療科的醫生讓他先檢查一下，如果做了就壞了，這樣會加速癌細胞的擴散。經南樓值班的陶醫生檢查，立即決定陳老總住院，醫生都很熱愛陳老總，先收留住院再說，並立即報告了曹根慧，曹根慧立即讓著名的腹外科專家陸惟善給陳老總會診，同時請了北京醫院的周光裕主任。專家們摸到陳老總腹部有塊狀物，但X光片沒有發現問題，拍片才不到一個月，即便有腫瘤也不會長得如此之快，大家分析，根據疼痛的情況急性闌尾炎的可能比較大，應立即進行手術。為了搶時間，簡便請示手續，三〇一醫院直接給總理打了報告，並直接送往中南海，總理立即批准了手術，並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一同去醫院為陳老總手術做準備，卞志強也是專家，他是中南海的保健辦主任。陳老總和張茜都同意做手術，靳來川院長，曹根慧院長，卞志強醫生都親自督陣。打開陳老總的腹部一看，不是闘尾炎，塊狀物是因腸梗阻積聚的糞便，病灶沒有找到，找到病灶是必須的。但原來是為闘尾炎手術開的是一條豎的小口，現在要在腹部擴大探察必須再開一條橫的刀口，這樣就形成了一個「T」字形刀口，陸惟善和周光裕都同意這個方案，為了加強力量，靳來川院長又調來心腎科主任黃宛，外科副主任周明禮，病理科主治醫生游聯璧參加手術，同時讓卞志強立即給總理報告，周總理同意了專家們的方案。

在進一步手術中，在陳老總結腸部位發現腫塊，並與肝臟粘連，經快速病理檢查確定為結腸癌。這時總理又打電話來指示：「組織全力搶救，需要哪個醫院的醫生馬上去請！」陳老總的手術做得非常細心，做了五個小時後順利完成。

手術後，總理對陳老總很關心，親自安排到日壇醫院做放療，每次都是吳桓興院長親自給陳老總做，每次三〇一醫院都有專人陪同。經過幾個月的治療陳老總身體有好轉，體重增加，「五一」節上天安門還見到了毛主席。夏天陳老總從北戴河休養回來，特地把北戴河院子裏的蘋果帶回來給南樓的醫護人員，以表示感謝，是張茜親自送去的，並且送給王錦聯護士長一張陳老總和張茜的合影。陳老總在北戴河時，總理去看過他。在專家醫療組給陳老總檢查時，發現癌細胞開始擴散，回到北京陳老總又做了第二次手術，但陳老總得的畢竟是癌症，於七二年一月六日去世。不過，那時我已因「九一三」事件被關起來了。

事後看來對陳老總的病有「不到」之處，但根本不存在「迫害陳老總」這個主觀故意，這跟當時的技術水平和醫療設備的條件有關。發現不是闌尾炎後，採取措施得當，有人指責開了「T」字形刀口，試想，如把開闌尾的口子縫上再橫開腹部，這樣會耽誤更多的時間。事後第二天，三〇一醫院就以曹根慧副院長的名義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先送到我這裏，我想了很久做了批示：「暫不要寫報告，以後需要寫時，再研究。」我做這樣的批示有兩層意思，對上保護總理，對下保護醫院領導和醫護人員。因為一寫報告就要在政治局傳閱，江青他們就會攻擊總理，別看他們對陳老總那麼惡劣，但有辯子可抓時，他們也不會放過。陳老總住院時江青去看過陳老總，但總理到醫院看王進喜時，本打算去看陳老總，由於時間緊得實在來不及就走了。這樣江青會借此說她是多關心陳老總等等，而且江青他們特別會做戲，一定會追查醫院的責任，在文革的環境中，醫院領導和專家、教授有的是做不完的檢討，很耽誤工作，靳來川、曹根慧這些人經常忙的飯都吃不上。事後我向總理說明了情況，並以我的名義向總理檢討了，總理表示滿意。

這裏還要附帶說一個問題，就是陳老總搬病房的問題。這確有其事，但被傳的沸沸揚揚的所謂對陳老總「不恭」，則完全是造謠，總後造反派利用此事為「由頭」，搞派性打擊別人是實質，對醫院的具體工作人

員都進行了處理是不當的，也肯定是陳老總不願意的。事情是這樣的，陳總在總醫院南樓三層北病室住院，他住在進門的頭一個病室，因為陳老總住院沒有帶服務人員，安排這個病房離護士站近，便於照顧。後來李作鵬也住院了，同陳總住在同一病室，並且住在最裏面的一個病房。李作鵬住在醫院還要工作，一天到晚去送文件的人很多，都要經過陳總病室門口。總醫院從陳老總能安靜養病考慮，同我報告了這個情況。我當即回答：「把陳老總搬到南病室去。」陳老總理解了搬病室的意思，很高興地同意搬了。

關於賀龍的搶救問題

六五年十二月，解決羅瑞卿的會議以後，賀龍就不主持工作了，改為葉帥主持，但軍委的事，賀老總還在管，那時主席對賀龍還是很好的。但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變化很大。記得是六六年九月初（肯定是一前），林總在大會堂召集軍委常委會，除賀龍外的元帥都來了，我也列席了會議。林總說這個會是毛主席讓給軍隊的高級幹部打招呼。在會上，元帥都發了言，擁護毛主席的決定，擁護林總的講話。這個會是蕭華在具體張羅，會後蕭華對我說：「賀老總（蕭還是這樣稱呼賀龍）經常表揚你，但你也不要背包袱。」我沒有搞清蕭華這樣無頭無腦的話，我沒有吭聲。賀老總對我的工作的確是很支持的，文革初期造反派也抓了我這一條，他們把我和賀老總的照片拿去示眾，我心裏還是有些緊張。為此我去楊成武那裏探探底，沒想到楊成武大笑起來，楊說：「他（蕭華）在嚇唬你。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賀龍的事跟你毫無關係。」

大概在六六年秋天，在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車到京西賓館後由蕭華，楊成武帶隊換乘兩輛大轎車到葉帥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上車後還拉上窗簾，蕭、楊在車上說，臨走前總理特別打電話交代，到葉帥家看材料重點是看通敵問題。我想總理的話也是在賀龍的問題上給大家一個態度，畢竟總理和賀龍一起領導了南昌起義，並把賀龍引上革命道路。關於所謂賀龍的「通敵問題」，總理是認真的，這個認真想必是來自毛主席的認真。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中指出「中央當時認為把賀龍同志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當時

毛主席、周總理還健在，這個「中央當時認為」肯定就是毛主席和周總理了。如果不是這樣，而如毛主席說的，是林彪搞的，那就直接點林彪名字了。

到了葉帥的會客室，葉帥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來看一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蕭華、楊成武提到投敵問題，葉帥又強調，大家都爭著去看這份材料。蕭華忙說：「不要亂，不要多拿，每人祇拿一份，然後交換看。」會客室的桌子上放著十幾份材料，這些材料都是賀老總比較親密的部下說了一些事事非非、捕風捉影的事。祇有一件是總理提供的一封信，這封信是賀老總寫給國民政府裏任職的舊交的，信裏也沒有太實質性的問題，這可能就是總理所謂的「通敵」問題吧。

賀老總的專案問題我是一點不知道的，中央專案組是極其嚴格和保密的。在楊成武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我祇聽到楊成武說過一句話，「總理叫把鬍子放到象鼻子溝去了」。象鼻子溝和西山是一個山坡之隔，是國務院系統的戰時指揮部所在地。在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我也祇聽到黃永勝說過一句「彭德懷和賀龍的案子楊成武的時候就基本定下來了」。

賀老總的夫人薛明說了我一些不好的話，是她不瞭解情況，看在賀老總在天的冤靈，我也就不多說什麼了。我保外就醫後在北京見到了當時三〇一醫院的負責同志，他專門給我講了賀老總的治療、搶救和死亡問題。

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〇一醫院副院長曹根慧接到中央二辦打來的電話說：「賀龍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衛戍區的醫院，這次黃總長因你們條件好，技術力量強，指示你們立即派醫生出診治療」。曹副院長立即進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經給賀老總看過病的主治醫生黃秀琴和南樓（高幹病房）護士姜輝永帶著搶救器械和藥品趕到了賀龍的住處。黃秀琴診病時，薛明和專案人員都在場。黃醫生經過診斷立即向曹副院長匯報，因為曹副院長根本不知道賀老總的住處，他說：「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醫院搶救；如路途遠，道路顛簸就增派醫護人員去現場搶救。」黃醫生認為賀老總的住處不具備搶救條件，這裏去三〇一的路途不遠路況又好，請示送三〇一搶救，曹副院長立即決定「把病人接回來，路上不

間斷地搶救治療，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長又立即向斬來川院長匯報，斬說：「關鍵是確診，然後進行搶救！」

賀老總到三〇一時，樓裏樓外已經是戒備森嚴，顯然是中央佈置的。南樓（高幹病房）主任李晉率醫生進行搶救，確診賀老總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長立即組織專家會診，大內科曾誠富主任，放射科高育墩主任，心腎科黃大顯主任等趕到病房，當時比較先進的移動式X光機也由蕭志達醫生推來給賀老總拍片，發現賀老總肺部感染。再經過驗血後，決定輸液。輸液的藥劑是5%的葡萄糖和胰島素，胰島素適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併發症的病人；對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劑量葡萄糖，直到醒過來為止。這個用藥方案是可以經得起檢驗的。三〇一從領導到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但賀老總沒有搶救過來，於六月九日下午三點去世。

賀老總去世後，黃永勝指示一定要薛明去見一見，並指示一定要找到在京的子女也去見一見。黃永勝是冒了一點風險的，因為讓子女去見面，他沒有向政治局報告，是不是向總理報告了，我就不知道了。薛明和他的兒子、女兒都見到了賀老總的遺體。賀老總去世的當天，三〇一醫院就向中央寫了報告，賀老總的後事都是按中央的指示辦的。

「九一三」以後的七三年底，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講到賀龍問題時說：「我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整錯了賀龍」。整錯了賀龍是事實，但是林彪聽了主席的一面之詞，還是主席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在六六年九月，林總關於賀龍問題的打招呼會議之前，我從來沒有聽到林總講過賀龍的話，祇是在九大時，我才第一次聽到林總講賀龍的不是，雖然祇是幾句話，林總說話還有些嗚咽，看來是主席給林總打過什麼招呼，說過什麼「小話」，把林總給說傷心了。

但是，毛主席說賀龍就多了，例如，六八年楊、余、傅到臺前後，毛主席接見軍隊團以上幹部學習班時說（大意）：我原先是保賀龍的，後來我知道他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尤其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主席又專門講了賀龍，主席說：「過去我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不能保了，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人的揭發看，他是有反黨篡軍企圖的，但沒來得及。……」

現在，在賀龍等老同志的治病問題上，說林彪（也包括我）是誣陷，是犯罪，而毛主席是犯了錯誤，周總理是做了違心的事、說了違心的話，這是對歷史的編造。

關於徐海東的醫療問題

徐海東是多年以來的老病人，他離不了醫療條件，也離不開氧氣；對他的病情，我早就知道。五九年，我當總後部長後，徐海東的老部下、總後營房部部長蘇煥清陪我去過他家，我對他的病情就更清楚了。我向來主張對徐海東應有很好的護理、醫療和生活條件。

我曾經當著徐海東和夫人周東屏的面向蘇煥清交代過：「今後除總參管理局門診部常規管理外，需要有什麼特殊辦理的事，可以直接同總醫院辦，也可以告訴蘇煥清辦。」徐對我的交代很感激。

徐海東的醫療保健，五九年以前由北京醫院直接管理，具體的醫療工作由總參管理局一門診管理，同總醫院沒有發生過醫療關係。徐海東需的藥品和氧氣，總參一門診部可以向北京醫院直接辦理；需住院可以直接住北京醫院。這種關係已經行使多年了。六四年我批准給徐海東的家重新修理房子，翻修好之後，我又看他時，曾問過他對醫療和生活還有什麼問題。他的回答是很好，表示很滿意。在閒談中，徐海東還對彭德懷表示了極大的氣憤，對林彪進行熱情歌頌。

徐海東在文革中的不幸首先是在於他的秘書陳玉炳，文革初期陳玉炳就寫信誣告徐海東，對徐海東的精神和身體造成極大傷害。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楊成武對徐海東是不感冒的，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後，楊成武召集會議，佈置軍隊各單位刷徐海東的大標語，其內容能回憶起來的有「打倒徐海東」，「徐海東是陳再道的黑後臺」，等等。楊成武還在軍委辦事組的會議上佈置開徐海東的批判會，楊在會上說：「徐海東不是好東西，你們誰和徐海東有關係，趕快劃清界限。」楊成武還佈置軍委辦公廳金濤、路陽對徐海東家進行監視。

在這樣的情況下，徐海東的醫療工作勢必受到影響。六七年在周總理親自主持下，對醫療保健工作進行整頓，徐海東的醫療保健工作一直在北京醫院，這時就轉到三〇一醫院管理了。總醫院南樓的醫務主任李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未提出過什麼要求。可是徐海東的秘書陳玉炳又寫信誣告三〇一醫院，說三〇一醫院對徐海東太熱情，這裏面可能有陰謀。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對總醫院報告的批示是：「徐海東的醫療由他們本單位（總參）自己管，今後三〇一不管了。」事後，我專門對靳來川院長說：「我那個批示是給楊代總長看的，徐在楊的手上，不要因這件事得罪楊。對徐的醫療保健由總醫院管理，由總參門診部執行。你去和徐本人和周東屏講一講。」

後來徐海東的家屬不准總參門診部的醫生護士進門，一定要總醫院的人才能給徐做醫護工作，徐海東的家屬同總參門診部嚴重對立，徐的護理確實受到過影響，但這後面的政治問題，徐海東的家屬並不清楚。楊成武倒臺後，周東屏給葉群寫信說（大意）：「總參門診部不管徐海東的醫護工作了，連氧氣都不供應。」徐海東的子女也給江青寫信反映情況，黃永勝還見了徐大將的兒子徐文伯，黃表示會很好照顧好徐的生活。黃永勝還叫總參政治部、管理局派人檢查，但當時雙方情緒比較對立，檢查的結果報告是：「家屬報告的情況不實」。對此，總參門診部的群眾對徐海東的老婆寫了大字報。經過檢查之後，黃總長的指示是：「徐海東的醫療保健工作仍由總參門診部負責，並要把工作做好；在醫療中有什麼困難，立即請總醫院解決。」我的指示是：「對徐海東的醫療保健工作，按照總參首長的指示辦理。並要同總參門診部一起把工作做好。」

這就是對徐海東醫療保健工作的簡要情況。

關於傅連暲的問題

傅連暲是總後衛生部原掛名副部長（一九六四年已免職），他住在香山。文化革命開始後，衛生部主要批判傅的「養尊處優」，「修正主義」。後來在他家抄出一個箱子，傅把他死後的碑文都擬好了，並親筆以他十幾歲兒子的名義寫了一篇悼念自己的文章，引起了衛生部幹部群眾的不滿，在文革那種「革命」的年代這是可以理解的，總後黨委和我都批評了傅，這也是正常的。我和傅連暲關係很好，長征路上天天走在一起，我更知道他是一個閒人，而且主席前不久在傅連暲給他的信上做了「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以保護」的批示。黨委和我沒有一個人要動他。但傅這個人和不少人有過節，如在延安時，衛生部買了十個熱水袋，因

爲工作疏忽忘了給主席分一個，因爲傅連暲告訴了主席，主席發了姜齊賢的火，並調動了姜的工作。

六八年初，總理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衛戍區去人馬上要帶走傅連暲，衛戍區的來人，竟帶著總理寫的條子「把傅連暲交給來人。周恩來。」有了總理的指示，事情是必須辦的，我讓秘書告訴衛戍區的人去找來。陳龐在總後是管專案的。陳帶著衛戍區的人到了香山，由幹休所長帶路，翻牆進了傅的院子把他帶走。過了幾天（那時我不在碰頭會，不是天天見總理）我見到總理，問爲什麼抓傅連暲？總理祇說了一句話：「和你們沒關係。」不久傅連暲就死在秦城。

傅連暲被中央專案組關進秦城後，總理向葉群透了氣，葉群爲了順應中央對傅連暲的嚴厲態度，特地從外地調來當年的林辦原秘書趙川寫過一份傅對林彪治病情況的材料。因爲林辦沒有打字機，葉群便叫胡敏和我的秘書吳瑞雲去把材料拿回總後打印幾份。胡因爲初到總後不久，不懂得辦事規則，便把材料交給吳瑞雲去辦。這僅僅是一件具體差事，胡敏根本不知道葉群要他們辦這件事的底細。關於傅連暲的問題曾對我多次審問，我都如實說清楚了，但我沒有提起總理。

聽完我的話，審查小組當即就說：傅連暲之死與你無關，你對傅連暲在文革中說過的一些批評的話，不能和專案混爲一談。

所謂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

中央審查組，對所謂我在總後機關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的進行了反覆審查。本來這並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經過總後造反派的搗亂，破壞，顛倒黑白，把事情的本來面目搞亂了。

總後機關是全軍文革支持造反派的發源地，全軍文革學著中央文革所謂「相信群衆，支持群衆，尊重群衆首創精神」的調子，縱恩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的造反派「紅縱」，在六六年八月底就到北京進住了總後機關大院。全軍文革依靠這支隊伍，把總後機關搞亂了，成了全軍大亂的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軍委發佈的《八條命令》，是軍隊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打擊了造反派的反動氣焰。六七年五月十三日，駐京各機關的革命派站出來了，把反黨亂軍、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打垮

了。總後黨委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對造反派進行了堅決的打擊。中央發出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後，造反派的首惡和骨幹分子受到審查和處理。

第一，總後黨委決定，對二醫大「紅縱」，後勤學院「星火燎原」，機關造反派三個造反派，實行徹底搞垮的方針。當時對造反派的打擊，同文革結束以後清理三種人是一樣的。

第二，動員廣大群眾，對上述三個造反派的罪行，實行徹底揭發批判，對造反派頭子進行了整肅。

第三，對造反派後臺進行了堅決批判。總後政治部充當造反派後臺的領導幹部停職反省，歷史反革命分子陳政由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元帥批准，由衛戍區逮捕法辦。充當各大單位造反派後臺的領導幹部也受到了應有批判。我們對造反派的鬥爭是堅決的，否則，造反派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一直到六九年機關整編才基本告一段落。總後機關打擊造反派，對總後機關正常工作和機關建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在這樣一個大規模的運動中，整過頭，甚至整錯了的情況肯定會有的，這在運動後期會甄別和糾錯的。但我們在運動中就被打倒了，很多工作並沒有來得及做。

總後死人的問題是重點審查的主要內容。審查組問：「總後死人不少，以我們掌握的材料來看，有的人與你有直接關係。」

我回答說：「總後死了多少人，我的確不知道。雖然文化大革命是特殊的政治運動，但我是總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我有領導責任。人命關天，死了人總是大事，要深刻汲取教訓。」

「不完全是這樣。有的人之死你有直接的責任！」

我說：「總後死的人，除後勤學院的王述臣是他老婆利用送飯的機會，用藥毒死的，屬他殺，周長庚是病故之外，其餘的人都是自殺的。這總是事實吧！如果說有直接責任的話，全軍文革比我的責任大得多，全軍文革不把總後搞亂，那些自殺的人不造總後黨委的反，不搞打、砸、搶，事後也不會被審查，自然也不會自殺了。」中央審查小組的人把話題一轉說：「這樣談不解決問題。我們談具體的人吧？」

審查小組提出，有八個人之死與我有直接關係。這八個人就是：湯平（總後副部長），周長庚（後政副主任），楊樹聲（後政保衛科長），申茂功（後政文化部俱樂部主任），王述臣（後勤學院教員^{據字譯}顧承華（營房

部設計院工程師），畢迪平（軍械部助理員），張凌鬥（工程學院秘書）。他們提出八個人的名單，我感到有些突然，因為這八個人，我認識的人祇有湯平、周長庚、申茂功。王述臣祇知道其名，沒有見過面，其餘的我根本不認識。

關於周長庚之死。周長庚是六九年冬戰備疏散到四川廣元總後倉庫的，因心臟病突然發作，送到成都軍區總醫院，搶救無效而病故的。

周長庚是紅二方面軍老醫務幹部之一。原為軍事醫學科學院政委，後調總後政治部任副主任。五九年我當總後部長之後，才認識他，他對我當總後部長真誠擁護，在工作中合作很好，周長庚在總後的工作中，始終都是站在黨委一邊的。六三年，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賀誠，反對總後副部長饒正錫，我和李聚奎找賀誠、周長庚談過一次話，周堅決站在總後常委一邊，對賀誠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周長庚即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徐向前給我下命令把我送到二醫大「紅縱」的虎口上的第四天，即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周長庚找了少數幾個人研究過「總後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問題」。他們認為我肯定要被打倒，他準備對造反派表態支持；但他們的大字報還沒有公佈出去，毛主席、林總、周總理就派葉群把我搶救出去了，周長庚等人的態度又變過來了。後來，政治部的幹部群眾就抓住周長庚的這個問題不放，一直過不了關。

六九年冬，中央決定實行戰備疏散，「閒人」一律送到北京以外地區。在軍委辦事組的戰備疏散計劃之下，總後也搞了一個戰備疏散名單，我在該名單上劃了一個圈，周長庚就是這樣被送到外地去了。

周長庚死後開了追悼會，《解放軍報》發了消息。在文革的情況下，我和總後黨委算是盡到力了。我在疏散的文件上劃了一個圈就要抵償一個人的命，我認為是不適當的。後來的總後王平政委，依從了造反派不符合事實的意見，不僅把周長庚的病死算我的罪行，還對政治部關廣發、周子健等同志進行了嚴懲。

關於申茂興之死。總後政治部文化部俱樂部主任申茂興是在六九年自殺死的。申茂興我是認識的。六十年代初，正在困難時期，我對俱樂部經常搞舞會曾經提出過批評。當時，總後政治部的領導，在批評申時也話裏有話地說：「邱部長不會跳舞，你們搞這麼多舞會幹什麼？」俱樂

部對我的批評不滿，他們認為，我是不會跳舞不參加舞會，才批評他們的。

六七年八月間，上海二醫大「紅縱」進駐總後機關之後，申茂興就是造反分子之一，他秘密同二醫大「紅縱」聯繫，曾經被保衛部門抓過。當時，總後政治部要把申茂興下放基層去鍛煉，我沒有同意。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徐向前給我下命令之後，總後政治部立即成立了機關造反總部，申茂興是造反派的武鬥隊長。為了對我進行批鬥，申茂興領著武鬥隊進行了三次演練，並多次用活人做道具演練「噴氣式」，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醫大「紅縱」在總後禮堂鬥我，申茂興擔任武鬥總指揮，並親自上陣對我搞「噴氣式」，幾次指使人揪我的頭髮，他叫囂「要揪掉才是對三反分子的階級感情」，並叫人穿上大頭鞋踢我的肝部和腰部。造反派垮臺之後，他自知罪過太大，認為檢討也過不了關，精神高度緊張。當時，毛主席正好有「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批示，我認為申茂興的問題不是清理階級隊伍中的叛徒、特務那樣的歷史問題，因此，我在總後政治部一份簡報上批示：「對申茂興實行群眾專政。」

總後俱樂部是造反派武鬥隊的主力，他們見申茂興被專政了，怕申茂興把他們都供出去，為掩蓋他們自己的劣跡而過關，紛紛起來揭發申茂興，把罪過都推到他一個人頭上。這些「群眾」賊喊捉賊地毒打申茂興，申茂興深知這些「群眾」的意圖，他感到無望，又忍受不了毒打，就自殺了。

關於王述臣之死。王述臣是後勤學院的教員，在文革中是後勤學院造反派組織「星火燎原」的主要頭子之一，是第一勤務員。六九年冬或七〇年春，組織上查出王述臣解放前當過偽警長，根據當時的中央《公安六條》，他屬於不准參加群眾組織，祇許老老實實，不許論說亂動的階級異己分子，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對他實行隔離審查。

王述臣是個不折不扣的階級異己分子。他趁文革之機，堅決反對總後黨委，堅決反對後勤學院黨委。他帶領「星火燎原」幹盡了當時所有的壞事，如衝擊國防部，參加圍困中南海揪劉少奇，與外交部造反派一起造陳毅的反，自稱反了九個元帥（除林彪），更嚴重的是他帶人砸了總後保密室。

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總理代表毛主席、林總在總後召開幹部大會，總理對我發表長篇鼓勵的話。「星火燎原」感到末日來臨了，爲了把罪行推到王述臣的身上，他們就決定對王述臣下毒手，實行殺人滅口。王述臣自己也認爲在劫難逃，在隔離審查期間，他叫他老婆利用給他送飯的機會在飯裏放了毒藥，共同自殺，王述臣自己吃了，中毒而死。

星火燎原的「高參組」、「勤務組」在後勤學院小山會議室開過一次會，那次會是瘋狂攻擊毛主席的。這樣的惡毒攻擊，我看到的還沒幾個。對這樣的問題，我不僅當時站在黨的立場上，現在要是遇到這樣的問題，也還會站在同樣的立場上的。對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我相信，除了反革命分子之外，都會站在黨的立場上的！

過了幾天，審查組說：「對死人的具體情況就不再說了，今天著重談認識問題。對死人的問題，希望你在認識上能提高一步。」

根據審查組提出的問題，我講了自己的看法，我堅持如下三點：

第一，總後死了人，是由於造反派把總後搞亂了，被揪鬥的各級領導幹部太多了的後果。造反派不把總後搞亂，就不會發生治亂的問題，廣大幹部群眾對造反派仇恨太深，歷史事實就是這樣。另外，如果全軍文革不下命令，不要說一個造反派組織，十個造反派組織也搞不亂總後的。所以把死人的責任加到全軍文革頭上，是合適的，因爲是全軍文革下命令把總後搞亂的。

第二，總後死了人，不管出自什麼原因，我都承擔責任，因爲我是總後主要負責人。清理階級隊伍，雖然當時有分工，但我決不把領導責任推給別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的指示，當時，說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全國都按中央的指示搞，總後不可能不搞。

第三，總後死人，除王述臣是他殺，周長庚是病故的之外，其他的都是自殺的。其中有的是造反派借刀殺人，把人整死。死了人是當時執行黨的政策中出現的問題，總後死了人我負責，全國死了人主席負責，這是對的，但這不涉及到法律問題。如果有人企圖用法律手段處理文化大革命中死人的問題，這是否定毛主席的惡毒手段。

萬毅的談話

八〇年四月下旬，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萬毅到秦城監獄來同我談過一次話。地點在二十一監樓預審室，時間三小時以上。

一天早飯後，一位監管員走進監房來，笑著同我說：「走，中央來人找你談話。」對此，我並不驚訝，中央審查小組早就告訴了我中紀委會來人同我談話。我走進預審室倒驚訝了，因為擺設的格局都變了。原來長條形的預審桌，變為方形的談話式的桌子，桌上還擺了一瓶花，原來我是坐矮椅子，今天同他們一樣都是坐軟椅子，原來我喝水的杯子不一樣，今天也一樣了。在約二十平方米的預審室裏，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就算了不起的大事。

今天同我談話的是三個人，萬毅和隨員二人。其中一個隨員還是後來的法官。我在萬毅對面坐下。有一位隨員首先說：「今天萬毅同志代表中央來同你談話。」

「啊，還認識嗎？」萬毅首先說話。

「嗯，不敢認了。」我回答說。

「不用客氣，今天我們在一起談話。我們都在四野嘛，你在八縱我在一縱。」

「啊，想起來了。你是萬毅司令員。過去我們在一起打仗。打天津時我們還在一起吃過飯。」

「對呀！過去我們在一個戰場上打仗。今天又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下，看到你了。」

「事情常會有變化的。」

「你穿得那樣破爛，這是為什麼？」

「沒有穿的呀。冬天更難過，現在天氣暖和了，好過一些了。」

「唉，事情使人難以想像。可否讓你的孩子搞點衣服來穿，這是比較方便的辦法。其餘的辦法都要費很多周折的。」

「孩子恐怕自身難保，他們都還在受株連，不會有什麼辦法的。」

「聽說，你想要讀點書都很困難，我們設法給你搞點書來。在生活上，還有什麼困難嗎？」

「謝謝你。此一時，彼一時，想不到有什麼困難。」

「好。我們就開始談正題吧。中央審查小組給你搞逼、供、信了嗎？」

「沒有。」

「我們先談林彪問題。林彪的問題，牽扯到很多人，但牽連其中的人和人是有很大差別的。正是因為有這些差別，中央處理問題時就要分別對待了。我說的意思：你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我準備了：活著當囚徒，死了當野鬼。」

「開了十一大之後，還是這種想法嗎？」

「我對十一大不瞭解。」

「中央的政策，現在也在變化。對黨總該有信心嘛？」

「我永遠相信黨。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總理宣佈對我審查時，我當即向總理表了態。我說：擁護中央對我的審查措施。我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同時也相信我自己。」

「啊，三個相信很好嘛！現在也還要有這個信心才好！」

接著，萬毅談了我交代的問題。

「你已經關了八年多了。現在是你的關鍵時刻了。現在對你的審查，與其說是對你的改造，還不如說是對你的挽救。你的問題很快會得到處理的。這點你還是要有信心！」

「你寫的材料，我看了不少。總後死了人，從領導責任上來說，個個都可以追到你的頭上，從法律上來說，你沒有殺一個人。何況，你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立場轉過來了，決定不追究刑事責任（還念了我的交代材料的一大段）。你相信中央的政策嗎？應當相信。」

「你跟著林彪，不能說沒有幹一點壞事。但全案攤開之後，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你的問題同別人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差別。實事求是的處理問題，這就是現在中央的方針。」

「任何人都會相信真理！」

「你的問題，很快會得到處理，總不再需要兩三年了，這點你有預感嗎？」

「毛主席、周總理在世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問題總會得到解決的。打倒『四人幫』後，我想立即會解決我們的問題。現在，我就不再想這些問題了。」

題了，因為想也無用。我可以直率地說：把我們關進秦城本身就不符合黨的政策。」

「中央對你的問題，會處理得很好的。對你的寬大，連你自己都不會想到。通過你的問題的處理，要使大家看到，實事求是是中央的基本方針。最後，希望你對自己的前途不要失掉信心。你不是抱怨看不到什麼報紙嗎？過不了多久，你什麼報紙都可以看了。……」

「好。今天就談到這裏。以後還會有見面的機會的。」

自從中央審查小組對我開始審查後，獄方對我的態度就大大變化了。對我好的更好了，不大好的人都改變了態度，要安眠藥，不僅不困難，而且每天都送上門來；對我態度最冷淡的監管員，打好飯之後都要問一句：「夠了嗎？」夏天放風的時候都要為我選個最陰涼的地方；監獄當官的進到監房來同我談話等等。

八〇年大約是四月底，或五月初，監獄一個負責人來到我的監房，談笑風生約兩小時。據說，他是監獄第一把手（我稱他為光頭主任），以後還同我接觸過三、四次。

這位監獄負責人來監房時，一行三人，進來之後，我用唯一的一張小馬扎請他坐下，我同他的隨員都坐在床上。他坐下後即說：「今天來看看你。這裏並不是個好地方，也很不平靜。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公安部的壞人經常在這裏挑起武鬥。這裏也有造反派，被他們搞得亂七八糟。你認識的傅連暲，這裏的造反派不給他飯吃，活活餓死了。公安部的楊奇清副部長關在這裏，鬥了他半個多月，打得非常厲害，後來連站都站不起來了，總後那裏的造反派打你，我們都聽說了。」

「你沒衣服穿，我們知道，也向上面報告了不知道多少次，但都沒有人管。我們也看到了你穿的破爛得不成樣子，但就解決不了。我們這裏，是別人來不了的地方，但也是有問題也解決不了的地方。」

「你們吃的伙食，祇要抓得不緊，問題也就出來了。可能你已經感覺到，伙食是時好時壞。」

對那位「光頭主任」的話，我祇是聽，別的話一句也沒有說過。

八〇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監獄的另一位負責人，又同我談過一次話，他同我談話的時間有一小時多，從他對我談話的態度來看，似乎是有「送行」之意，可是從後來的事實來看，又不是那回事。

中紀委審查小組最後的話

審查一開始是對我嚴格執行政策的，他們對我審查的基本方針是：搞清問題，爭取對我寬大處理，這和李震時期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成了鮮明的對照。李震時期的中央專案組主要是抓「兩謀」的「反革命」的材料，中央審查小組是落實真憑實據的材料。

他們說：中央對你的審查是很重視的，我們用了將近一年時間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工作，對你的案情做了反覆研究。

他們說：「我們這樣做，是從『事』求是、而不是倒過來從『是』求事。」

他們說：對我這樣的人物，要以搞清問題就要先搞清楚事實，並用黨的政策界限去分析事實，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如果以搞到什麼材料為滿足，就必然走上逼供信。因為對被審查的人，要抓住一點半點材料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把問題搞清楚就不很容易了。

中央審查小組基本上堅持了回到當時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歷史情況中去考慮，放到與當時的政治形勢聯繫起來考慮，把我放進包括毛主席、周總理在內的領導集體之中去考慮，我認為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他們注意到了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我的問題，對我的問題有則有之，無則無之，忘記就是忘記了。對問題寧可交代不完全，也不可以想當然湊「完滿」。

八〇年七月上旬，中央審查小組的審查就宣佈結束了。

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的審查結束的時候，全組人同我做了一次比較長的談話。主要說了如下兩點。

他們說：我們接觸已經八個多月了。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對你的問題已經搞清了，其問題的性質同我們預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們搞清楚了你的問題，也認識了你這個人。前不久，萬毅同志代表中央又同你談過話，我們相信你是心中有數的。對你的問題，目前是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我們認為，你的問題已經清楚了，無論用什麼形式審查也是變不了的。對這個問題，我們完全負責，你儘管放心。我們很欣賞你過去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堅決相信黨，特別當黨不信任自己的時候，更要相信黨。對這個問題，你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

點是根本的。過去，我們同你說過多次，能夠爲你爭取到寬大處理，我們感到高興，對黨也是一個貢獻。對你的審查，我們可以拍著胸脯說：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也對得起你邱會作本人！我們的工作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但對你的處理終究是要服從組織決定，要遵守紀律的。這個道理你也是很清楚的。

他們還說：我們接觸之初，你同我們說過的兩句話：「心中無愧，不怕見閻王。」這是你的態度。這句話我們理解，但是我們還是要送你一句話，那就是：「不要爲自己幫倒忙！」我們的話對你會有用的。另外，記錄問題你是很不注意的，你存在「記錄無用」的思想。你要知道，是有用的，用處很大，可以作爲處理問題的根據，並不是一張廢紙。

當然，這段歷史的內幕我是不知道的，如果說這只是爲了捉弄我一番也大可不必，但他們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願望畢竟沒有實現，有些人還參加了公審。回想起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實事求是是共產黨人的根本所在，是黨的光榮傳統。可是這個根本，這個傳統，往往被自己破壞。廣大幹部群眾是能堅持實事求是的，但無濟於事。職務越高的人，甚至是很高的領導人，往往不能實事求是，他們習慣用個人意見代替政策，用權力代替實事求是。

對於公審，我自己認爲我沒有什麼罪行，中央審查小組也認爲我沒有什麼罪行，雙方都應是按照這個思路走的。可是公審自己吃了大虧，發生在文革中這樣一個特殊的、複雜的環境下發生的事，而且這些事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部署相關，爲了顧全大局，自己當錯誤來認，結果法庭當罪來辦。實事求是到底在哪裡！？「大局」、「態度」一直困擾自己，自己本質還是幼稚，我堅信黨而不是某些人，而某些人卻能左右黨，這就是悲哀。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檢與預審

補辦逮捕手續

中紀委審查組的審查剛結束，我對中紀委審查小組「美好的話」還沒有來得及深想，僅隔十幾天，就宣佈對我補辦逮捕手續，這也是我沒想到的。可見上面鬥爭是激烈的，實事求是地解決黨內問題、路線問題是很艱難的。

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在秦城監獄以總政治部保衛部的名義，為我補辦了逮捕手續。我在衛戍區關了五年又三個月，在秦城監獄關了近四年，關押快十年了，才辦逮捕手續，真是古今中外的大奇聞。毛主席和周總理祇把我送進了衛戍區，隔離反省。毛主席、周總理不在了，我又被關進了監獄，現在又進一步要把我公審了。這說明鄧小平這些人是不願意實事求是地解決我們的問題，他們從法律上抓辯子，利用軍隊原來的造反派為骨幹，來打擊我們，他們並沒有從黨內鬥爭的錯誤方法中走出來，而是「現在輪到老子了」。

宣佈補辦逮捕手續的人好像天生祇會板著面孔，特別兇。在補辦的逮捕證上，我簽了一個名，並寫上「服從中央決定」幾個字。他們不願意我寫這幾個字，我堅持要寫。另外，非要給我照一張相。對我逮捕的「法律」手續就算完成了。我對逮捕不逮捕是無所謂的，關著就是實質，其他都是花活。

過了兩三天，在預審組長陪同下，來了六七個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來人的面部表情，嚴肅到了使人害怕的程度。組長對我說：「今天專門談『八九』問題。」

我從口袋裏，把過去寫交代的底稿拿出來了。他們打開錄音機，我就一字不漏地念開了。我大約念了二十分鐘就念完了。此時，他們說：「你的稿子還是過去的，一點新內容都沒有！」

我回答說：「過去我就把情況全部交代完了，當然不會有新內容的！」

「不盡然吧！何必同我們對立，把問題搞清了對你有好處。」

「要是有好處的話，早就該有了。這個問題在八年以前，即七二年三月間，我就向當時的中央專案組交代清楚了。」

「不要過早封口。吳法憲交代了過硬的材料。你是在場的人之一，能與你無關嗎？」

「我希望你們有過硬的材料，完全可以定罪的材料，這樣，我就可以不受罪了。因為這個材料我已經寫了幾十次了。我同吳法憲是兩個人，這總該是事實吧！」

「我不知道他交代的內容。」

「根據你們提供的情況，我認為不排除兩點，一是，吳法憲、葉群可能利用我不在的時候說了什麼。二是，也不排除吳法憲說假話的可能。」

他們聽了我上述意見之後，一句話沒有說，就宣佈：「談話到此為止。」

又過了兩三天，預審組又同我談了一次話，他們首先說：「你前幾天對『八八』問題對我們有啟發。」以後他們就沒有再問了。

由於總政保衛部的預審就要結束了，他們又鄭重其事地同我談了一次話。他們要我談談補辦逮捕手續之後的感想。我說了兩點：

第一，屈從中央的決定。前幾天，獄方就向我宣佈了七三年十大的決議：邱會作是林彪反黨集團的成員，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不是說要光明正大嗎？怎麼對我們的決定七年後才通知我。

第二，對即將到來的審判，我毫不害怕。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一定堅持：永遠不反對毛主席，永遠不反對黨，永遠不說假話，我對自己心中有數。

又過了十多天，即到了九月初，預審組負責人劉寶慶，監獄一個工作人員，在秦城監獄二十一樓預審室向我宣佈：「現已查明，邱會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移交檢察機關。」這次宣佈，前後祇有五分鐘，並且祇是口頭的，並未立記錄，我也沒有在任何地方簽名。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反革命主犯」問題

八〇年九月上旬，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在秦城監獄開始對我進行了連續十多天的預審。

預審組由三個組員、一個記錄，共四個人組成。我一見到組長王瀑聲，即大吃一驚。

王瀑聲原是後勤學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幾易其主的人，文革開始的時候曾經多次表示：學習毛主席著作，要遠學林副主席，近學邱部長，堅決跟著邱部長一起鬧革命。但後勤學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後，他又投降了造反派，當毛主席、林總、周總理派葉群把我從武鬥場上搶救出去之後，王瀑聲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來。「九一三」之後，王瀑聲又轉回造反派一邊去了，這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組長王瀑聲的本來面目。組員孟恩慶，從他對我的兇惡態度來看，很可能是軍隊政法部門的。

看到這樣的陣容，我真是一肚子氣，但對鄧小平、彭真的路數也就清楚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的目的是兩個：（一）為確定我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二）為確定我的反革命找「證據」。

其實，搞來搞去，內容還是那些東西，不過，不同名義和目的的審查，各取所需，各有各的利用角度就是了。

高檢預審組主要的是企圖抓到我在文化革命中同林彪有「反革命」關係和參與「南逃另立中央，謀害毛主席」的「兩謀」問題。

高檢預審組對我審查一開始就說：「現在我們對你的審查，是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問題的審查。你是這個集團的主犯，也應當受到國法制裁。你必須如實回答我們向你提出的問題。」

我說：「江青是什麼樣的反革命集團，我不清楚。有沒有林彪反革命集團，我很清楚。」

「你不認為林彪搞了一個反革命集團，你說說你的理由吧。」

我說：「現在，我就借你們對我審查的機會，說說我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看法並希望你們記在記錄上。」

「第一，我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政治集團，總會有綱領，有活動和有罪行。對這個問題你們能指出事實嗎？第二，林彪反革命集團成立於何時？第三，我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的

根據是什麼？我的罪行又是什麼？我在林彪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很長，哪些是工作關係，哪些是反革命關係？對這個問題，請你們指出來。」

「你是林彪的親信，當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這還有什麼疑問嗎？」

「親信就是反革命集團關係了？我是不能同意的。什麼叫親信，希望你們有個明確的概念。」

「親信就是結幫、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這樣對你的嗎！」

「我知道你們所謂親信的概念了。九大之後，周總理同我談過一次。我說我參加政治局是黃牛當馬騎，總理回答說：這是歷史的必然。我現在也祇能用總理的話來回答你們。」

「你是政治局委員就決定了你的問題的性質！這點你總不能否定吧！」

「現在我又多明白了一點你們的邏輯了。政治局委員就等於反革命，這就是你們決定問題的根據。」

根據他們提出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一致」的問題，我說「根據歷史事實，林彪、江青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爲了維護毛主席，有過工作的關係，但主要是鬥爭。這裏，我不講林彪同江青鬥爭的全部問題，祇簡要說四點。」

「第一點，不准造反派奪權。林彪對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沒有表過態的。正是因爲如此，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還有人指責林彪是後臺，這點你們可能不清楚。」

「第二點，不准中央文革插手軍隊。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軍隊是像防賊一樣的。不准他們進來；也不准軍隊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當總政治部主任，就是爲了擋住中央文革的張春橋進軍隊的。」

「第三點，不准軍隊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間，中央發表《五一六通知》之後，中央軍委立即決定，軍隊不搞『四大』，祇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軍委發佈了八條命令，三月間，中央軍委又召開了全軍軍級幹部以上的高級幹部會議，對穩定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六六年十月，林彪確實同意了軍隊院校搞四大的《緊急指示》，這當然是錯誤的，給軍隊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這個文件是誰起草的？是全軍文革起草的，用來將老帥軍的，林彪、葉帥、聶帥是不得而知而爲之。」

「第四點，不准江青一夥橫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夥沒有奪去軍隊更多的權力和軍隊沒有亂，林彪是有功的，軍委辦事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後，江青一夥大發橫財的主要『資本』就是他們抓住了『林彪反黨集團』反江青一夥的事實。」

「你說的那些，不在我們審問的範圍之內。根據你同林彪的關係，我們認為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確定我為「反革命」的證據

高檢預審組在先給我戴上「主犯」帽子的前提下，進一步就要找到我的「反革命」證據。他們指出如下五個問題，其實都是撈稻草。

第一，關於燒燬材料的問題。

「為了掩蓋你同林彪的反革命關係，『九一三』之後，你燒了很多的材料。你應當老實交代！」

「『九一三』之後，我的老伴和大兒子確實燒過一些和林彪、葉群合影照片，葉群、陳伯達寫的詩詞等無關重要的東西，有些東西也是我交代秘書辦的，燒了什麼，在秘書的工作日記上有記錄。要是反革命材料，我還能讓秘書經手去辦嗎？我的工作文件、資料，有關工作方面的檔案，不會少一件的！」

「既然你燒的是不重要的東西，為什麼又要燒？」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後，燒了一些東西，主要目的是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和林彪、葉群關係密切。現在想起來，毫無必要。李作鵬就沒有燒，難道他就不是你們所說的主犯了嗎？」

第二，關於反對徐向前的問題。

「你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就惡毒攻擊徐帥。你反對徐帥就是犯罪！」

「徐向前利用職權，把我推到二醫大『紅縱』的虎口上送死，我就不能反對他的錯誤？況且，徐帥不止一次向我道歉，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徐帥也向我道了歉，當時很多人都在聽。如果是犯了罪，我根本不能推脫。可是，我的犯罪是從徐向前那裏來的。他利用軍委副主席的職權，把我推到二醫大『紅縱』虎口上去，當時正是造反派搞武鬥最厲害的時候，『紅縱』是要把人往死裏整的，這是什麼問題？難道我就不是老

幹部，就可以讓人任意宰割，而且，當時陪鬥的還有很多總後的其他領導呢！當時葉帥、聶帥對徐向前極不負責的做法是很氣憤的。這個問題，如果我同徐向前的關係打個顛倒，我要是有權力把徐帥推到二醫大『紅縱』的虎口裏去挨鬥挨打，今天扣到我頭上的帽子就是不折不扣的謀殺徐帥了！隨著文化革命的結束，我和徐帥的疙瘩早就沒有了，徐帥在歷史上是有大功的。我看你們未必是爲徐帥『伸冤』，徐帥也未必同意你們這樣做。你們祇不過是藉著徐帥的牌子打擊我就是了。」

第三，關於「砸爛總政閻王店」問題。

高檢預審組指控我：「你是參與砸爛閻王店的積極參與者」。

「這是毫無根據的。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林彪說了『砸爛總政閻王店』的話，這句話當時是氣話，當然也是錯話。後來總政軍管了，這是毛主席親自決定的。我倒沒有看到林彪有什麼批示。」

第四，關於「看總政檔案」問題。

「你派人偷看總政的檔案，要老實交代！」

「不是我派人，是我同意了總後文辦的建議。況且，也不是偷看，檔案還能偷看得到？檔案保留下來就是給人看的。關鍵的問題是我當時的職務有沒有批准看總政檔案的權力，如果有就是正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檔案的不計其數，比如說，不看檔案，群眾怎麼知道不少老幹部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問題呢？我看那些砸軍隊機關檔案室，搶走機密檔案的造反派才是違法犯罪呢！他們搶檔案幹什麼？就是爲了看嘛！」

「看總政的檔案就是爲了砸爛總政。」

「這說不上，我沒有看總政檔案之前，總政早已被『砸爛』了。總政若是不爛了，也看不到總政的檔案。」

高檢預審組最後嚴厲地說：「按照中央的有關規定，被審問的人拒不承認，也可以定罪。」

第五，關於總後「死人」的問題。

「死了人總是錯誤的，但這個責任怎麼負？由誰來負？作爲總結教訓，我這個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是要負責的，但把死人問題別用心地作爲『犯罪的證據』，我是不能接受的。在文革這樣複雜的情況下，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政治局常委陶鑄，彭德懷、賀龍兩個元帥都死了，死人的教訓是很大的。」

因為除了總後死了人之外，不僅找不到我的「反革命」證據，也找不到我的觸犯刑律的證據，所以在總後死人問題上，他們特別賣勁。高檢預審組對湯平、周長庚、張樹聲、申茂興、華迪平、顧子莊、張凌門、王述臣等八人的情況都問了。但對上面的情況，我早就向中央審查小組交代清楚了，他們根本提不出什麼新的問題。

高檢預審組，關於總後造反派的問題也對我進行了審問。

他們說：「革命造反派要打擊的主要對象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在總後的代理人邱會作，總是事實吧。」

「造反派要堅決打倒我是事實。但他們打倒我的理由是先在我頭上扣上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資反路線的帽子，然後又定我為中國赫魯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文革中，造反派從來沒有指責我是林彪的什麼分子，也沒有消滅一個什麼林彪反革命集團。但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搞亂了總後機關，對領導幹部進行了兇殘的批鬥，是全軍大亂的典型，這些是最基本的歷史事實。」

「反對你就是和林彪反革命集團做鬥爭！」

「『九一三』之後，這麼說可以。『九一三』之前這麼說是不對的。」

可以說，他們的審查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他們是不會罷休，即使是搞清楚了的問題，他們在起訴書中也會照樣作為所謂「罪行」起訴的。

在公審之前，不知是證據不足，還是需要找到更多的證據，在秦城監獄對我進行了兩天的突擊審訊。對我的審訊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進行的，他們來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原來見過。唱主角的是新來的，他們說：「今天是談話，不是預審，不做記錄。」他們首先說：「文化大革命對黨、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是難於估量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政策及個人的罪行都到了需要徹底清算的時候了。對這些問題，應當用法律肯定下來。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和看法，都可以說。」他們對問題的提法，可以說是十分尖銳的。

我說：「我首先提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嗎？」

「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中央將會正式做出決定的。但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是肯定的。」

「對我的審查，除了江青一夥在位時期的專案組和高檢預審組逼問我，搞我的反革命證據之外，中央紀委審查小組並未向我提出什麼反革命問題。因此，我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怎麼一回事，並不清楚。」

「林彪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叛國投敵；江青搞陰謀奪權，不是反革命嗎？」

「現在是公審，不是給林彪下政治結論，每一句話都要有證據。林彪即使有這個陰謀，那個謀害，我是沒有的，我對自己心中有數。那麼，為什麼還要扣在我頭上一頂反革命帽子，對我的反革命能夠舉出事實來嗎？」

說到這裏，那兩個生面人一個突然站起來說：「這是我們審問你！」

那個主持審問的也嚴肅地說：「我們問到哪裏，你就回答到哪裏。現在你說自己有什麼問題。」

「我的問題，說來很複雜，但又很簡單。在文化革命中，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我按照中央和軍委的調子攻擊過朱老總；二是，反對過全軍文革極左的一套和組長徐向前；三是，在總後清理階級隊伍中，造反派死了人，對有些人我負有執行政策上的領導責任。」

「這些就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行。」

「六七年初，在全軍文革指揮下，把全軍省軍區以上的機關和軍隊院校、文體單位都搞亂了。有很多幹部被造反派打傷、打殘，也打死不少人，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那是群眾運動！」

「現在，我已經知道你們的觀點了。凡是你們決定劃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不管大、小錯誤都是反革命罪行；反之，造反派不管犯了多大罪行，都是群眾運動而了之。」

下午開始審問時，他們說：「今天下午，我們把談話的方式改一下。先由我們向你提出問題，你祇能按照我們提的問題回答。」

他們接著問了我如下問題。

第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問題。

他們說：「林彪、江青兩反革命集團，必須用法律制裁，否則就不能割除禍根，全黨就不能團結，社會就不能穩定。」

我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教訓，有錯誤，但根本不存在一個『林彪反黨集團』。」

「江青的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能夠把全國和全軍許多單位搞得亂七八糟，就是依靠你們所說的群眾組織，依靠這些造反派搞亂的。造反派這樣的群眾組織是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利用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的提法搞出來的。這些造反派組織被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所利用，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老幹部，搞垮黨委，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革命派也就在同造反派的鬥爭中產生了，因為大多數幹部群眾反對打倒老幹部，反對搞垮黨委嘛！機關幹部要正常上班嘛！革命派是擁護毛主席的，是擁護黨委領導，擁護抓革命促生產。沒有革命派與造反派對立，造反派就更無法無天了。」

第二、全國全軍大亂的問題。

他們說：「搞亂全國全軍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對這個問題，你要有足夠的認識，否則就不能深刻認識自己的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就出現了。造反派自稱自己是什麼「左」派，其實就是打砸搶派，這是歷史事實。造反派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搞起來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是中央造反派的著名頭目。他們都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又是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他們是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指揮搞亂全國、全軍的。而林彪和我們軍委辦事組是擁護毛主席的，但對文革不理解，對江青一夥的中央文革做了鬥爭。軍隊是反對亂的，反對打砸搶的，是堅持在黨委領導下搞文化革命的。」

第二天上午，他們集中審問了我關於「迫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審問，同高檢預審組審問的內容和方法都是一樣的。同我「有關」的八個死人都扼要問了一遍。

下午繼續審問來的是兩個新面孔的人，我走進預審室後，足足等了幾分鐘，那兩個人才吞吞吐吐地說：「總政寫了一個報告，提出開除黃、吳、李、邱的軍籍，中央軍委已經批准了。時間過去很久了，報告可能沒有帶來（還假裝摸了摸皮包），要不可以給你看一下。」說完我鄙視地看著他們，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們也就起身就走了。

整個審查也就這麼結束了。在將近十年時間裏，我經過了江青一夥在位時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中紀委審查小組的審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審查。這三種審查，出現了兩種鮮明的對照。中紀委審查小組（包括偵察預審）的審查基本上是執行黨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問題搞清楚了。江青一夥在位時期的中央專案組和高檢預審組的審查，是一樣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審成反革命。高檢預審組的審查手段，搞的是訛詐，並且是掛著中央牌子和穿著法律外衣的訛詐。預審組的孟慶恩幾次把煙灰缸子用勁在桌子上一敲（如同驚堂木）並說：「我們現在是在審問你！你必須老實！」

搞到這般地步，我心裏就越來越明白了。說我的罪行就是三條：

一、說我們和林彪搞政變。這種話，在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在「四人幫」擅權的時候，扣個政治帽子也可以，但毛主席活著的時候他老人家並沒有下定論（他心裏明白，哪裏有什麼政變），這個問題更沒有和我們見面，從七三年起，我們就被掛起來了。但政變問題，現在作為法律問題提出來，就不簡單了，要有證據嘛！結果什麼證據也沒有，唯一的證據就是吳法憲的假話，在公審前，官方自己也否定了。不過大帽子並沒有拿下來。

二、說我們是反革命。因為我們攻擊了老帥，用醫療手段整老帥。其實呢？我們攻擊老帥都是在黨委會上、幹部大會上，傳達主席、林彪、總理、葉帥的講話精神而已，而且是按中央的部署辦的。在老帥治病的問題上都是毛主席、總理親自領導的中央專案組辦的，根本不經過總後，也不經過我。

三、說我們迫害幹部群眾。這個問題的確教訓是很深的，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進行的。全黨、全國都亂了，幸虧軍隊相對保持了穩定，為了部隊的穩定，必須清理整治反對黨委，搞造反奪權，搞打砸搶的造反派，和後來清理三種人是一樣的。當然，在這麼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整過的、整錯的肯定會有的，如果我們仍在工作，我們也會在運動後期進行甄別。在這裏我也坦率地說，我是部長、黨委第一書記，這個賬記在我頭上，我承擔責任，我向整錯的人道歉。對鄧小平來說，反對他們的人是「三種人」，的確也是「三種人」。可鄧小平卻藉著公審的牌子，利用反對我們的「三種人」爲自己服

務。他們爲了打擊我們，說我們跟著林彪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他們爲了打擊毛主席，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說我們跟著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如果說毛主席晚年有什麼錯誤的話，他最大的錯誤就是看錯了鄧小平。鄧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勢後掘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祖墳」。

遞交起訴書

爲了公審所謂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遞交起訴書是公審的第一步，特別檢察廳向特別法庭遞交了起訴書。

八〇年十一月十日上午，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秦城監獄辦公區，向我遞交了特別檢察廳起訴書的副本。

早飯後，監獄的工作人員手持鏡子和刮鬍刀，到監房來向我說：「今天上午，特別檢察廳向你遞交起訴書，你把鬍子刮一下，把衣服換一下，做點準備。」

「刮了鬍子，換了衣服就不像囚徒了？」我故意說了兩句。

「什麼囚徒囚徒的？上面有交代，你們到底同一般反革命有所不同，還要發新聞照片。我們要使中、外人士都看到，對你們的生活總還是照顧的！」

「最虛偽！」

「不管虛也好，實也好，我們是要按上面的指示做的。爲了管理好對你們的公審，上面派來了工作組。」

上午九時半，一個監管員，兩個穿著制服的武裝警察，來到我的監房。警察向我宣佈：「今天向你遞交起訴書，現在就走！」

我們出了監樓的院子大門就上小汽車。從監樓到遞交起訴書的地方，距離不到五百米，這樣近也要坐汽車，不知道是什麼「規矩」。

遞交起訴書的地方，就在監獄區大門外的左邊。我們到了那裏之後，先在一個房子稍微停一會兒，就由前後各一個警察把我押出場。進場的時候，一個警察向一個官長模樣的人報告說：「被告邱會作帶來了！」這時就有不少攝影機對著我，閃光燈一個接著一個，卡嚓卡嚓響個不停。

法院的工作人員說話了：「你是邱會作嗎？我們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記錄員，今天向你遞交起訴書。」

在宣讀什麼文件的時候，我心裏湧起一股特別反感的心緒。我不知道起訴書是什麼一回事，它的作用是什麼？可以說，我是個法盲。我的心緒是怎樣來的呢？是我對我們黨真實的感情而來的。我心想：「我們好端端的共產黨，現在為什麼搞成這個樣子了？共產黨的法庭審判自己人，難道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民主法治』嗎？這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嗎？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什麼都不是。這是當權者開創的用法律手段解決黨內問題、鎮壓共產黨老幹部的先例。審判我一個人是小事，但在我後面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到殘酷鎮壓了。」

宣讀完文件之後，他們問：「你聽清楚了嗎？要沒有聽清楚，可以發問。」

我祇搖了一下頭，什麼也沒有說。

此時，監獄的工作人員把起訴書副本給了我。要我在一張印好的什麼證件上簽上名字。

「你要辯護律師嗎？你的律師，可以由你自己聘請，也可以由法院給你指定。」

律師是怎樣一回事？我祇從字面上瞭解一點，具體的根本不瞭解。在當時的高壓政治下，律師怎麼可能為我說話？！

我搖了一下頭。

此時，法院的工作人員好像很為難。他們不知道怎樣繼續說下去好。他們稍微想了一下，又說：「法院的新制度，被告可以有律師的。」

「我要說的話，連我自己說都不夠，何必還要律師代勞？」

「律師說的同你自己說的，其作用是不同的。」

至此，我就根本不說話了。法院兩個記錄員相對看了一下，他們就宣佈：「對邱會作遞交起訴書到此結束。把被告帶下去。」此時，攝影記者的拍攝又開始了，跟我進場時一樣。

我回到監房後，本來想把起訴書看一下，但怎麼也看不下去。監房門上的窺鏡總是不斷發亮，外面不斷有人在觀察我的情緒。我心裏難受極了，但什麼辦法也沒有，祇好在房子裏反覆踱起步來。這樣一則可以解悶，同時也使他們看不清楚我的面部的表情。

遞交起訴書後的當天下午三時，有兩個人到監房來同我談話。「今天怎樣，感覺如何？」監管員先說話。

「大姑娘上轎，頭一次。我心中無愧，不怕見閻王，何況今天見的還是小鬼。」

「你可以談談你的真實的思想。」

「我對起訴書總的印象是，寫起訴書的人不是實事求是的。」

「中央是會有正確決策的！」

「現在世道不同了，一切都變了！毛主席、周總理要是健在，根本不可能發生公審的事。當然，現在自己要面對公審了，我還是要向毛主席請教的。我想起了毛主席長期教育我的兩句話，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對我特別有用處。我就以這兩句話去對待公審！」

「我祇粗略翻了一下。我對起訴書本身的感覺就是亂說一頓，起訴書開頭就寫的什麼『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這樣的帽子扣在任何人頭上都必死無疑！說也奇怪，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我在臺上工作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我真的很痛心。出毛主席的氣，方法多得很，怎麼非要這麼搞呢？」

遞交起訴書後的第五天，最高法院來的三個人，主持談話的人，曾經陪同萬毅來同我談過話，後來是公審的法官。另一個是許宗琪，原總後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公審時的法官。另一個人別人稱他吳老。談話時間，從上午八時開始到晚上十時才結束。

他們首先確認了我不要律師後，主持人接著說：「現在談談一個與公審有關的問題。」

「七一年九月六日，李作鵬從武漢回來，同你談了毛主席南巡的問題。所談內容，你以前已經交代了，若沒有新的內容就不必說了。現在主要說一下，他同你談的背景是什麼？」

我說：「你們說的背景指的是什麼？我不理解其意。」

「我們問的是李作鵬同你說的目的是什麼？」

「毛主席的指示誰都想瞭解，更想瞭解毛主席對廬山問題有無新的指示。」

「你們聽到毛主席南巡的指示緊張嗎？」

「這祇能說我自己。我是一點也不緊張，因為我有什麼問題，自己心中有數。」

他們看到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可問的了，就說：「在公審時李作鵬同你談話的問題，你準備出庭作證。」

下午繼續談。他們說：「今天下午主要聽你對起訴書的意見。你大膽說，我們會如實匯報的。」「首先感謝你們準備聽我的聲音。過去是林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們不可避免會遭殃；現在是毛主席『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同樣，我們不可避免會遭殃。我知道我講的你們是不會認同的，即使你們心裏認為我說得道理，你們也不會認同的，我就過過嘴癮吧。下面就是我的意見：

「第一點，對我的關鍵性問題，就是在我的頭上扣了一頂反革命的帽子，但在我名下的具體內容，則一條反革命事實也沒有。

「起訴書上首先指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罪行。他們有也好，沒有也好，都與我毫無關係。因為關了十年，事出有因是『九一三』事件，但審來審去我沒有『兩謀』問題，我沒有『兩謀』問題剩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臺上工作的問題了。可是，你們拿一頂『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公用的大帽子，也扣到我的頭上來了，這也就是問題的關鍵。這頂帽子，如果能扣到我的頭上，那也可以扣到當時領導文化大革命的許多人頭上，這樣就不是什麼十個主犯了！

「這裏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起訴書在表面上好像是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起訴，實質上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起訴（我沒有提是對毛主席的起訴），是用法律手段判處文化大革命『死刑』，這就是起訴書的核心問題。但是你們對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責任人則避而不談，那你們還大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對法律的不恭了。在文革中打倒了『劉鄧陶』，『彭羅陸楊』，還有賀龍、彭德懷等等，祇算犯錯誤，我們跟著中央的調子對朱德等不恭的話，就是攻擊，就是犯罪，我想不通。法律就是準繩，你們對同一件事用兩個準繩。用人爲的辦法確立了兩個『反革命集團』。說句不該說的話，其實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就是毛主席的代名詞。

「第二點，主犯的問題。起訴書上定我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這是奇怪得不可思議的問題。一個人成爲反革命，一定會有

反革命綱領，反革命活動和反革命事實。這些為什麼在起訴書上不寫出來。既然我是『主犯』，我在反革命集團中是什麼位置？給我的任務是什麼？對這些任務我幹了哪些？公審畢竟不是扣政治帽子，而是要有根據，你們也該給我做個定論。你們定我『主犯』的唯一根據，就因為我是黨的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你們又不敢寫出來。這就是起訴書的虛偽。你們能說不是嗎？！

「再次，我是反對江青和以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革，後來叫『四人幫』的，也是反對造反派的。我是受過造反派的嚴重摧殘的，這些你們未必不知道！從起訴書上來看，你們恰好把當時革命派和造反派的位置對調了一下，用權力能改變歷史事實嗎？就總後的具體情況來說，你許宗琪（同我對面坐著）也不會忘記六七年一、二月間的具體情況的。造反派為什麼要把我往死裏整？就是因為我是共產黨的總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

「受審的不是你們幾個人，是一批人。中央文革、中央碰頭會議成員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周總理也是中央碰頭會議成員！」

「周總理是違心的！」

「我怎麼就不是違心的呢？」

「你後來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現在我懂得了。你們把我定為反革命的根據就是因為我是政治局委員。」

「第三點，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運用職權命令我到二醫大『紅縱』虎口上去送死，把我打成重傷，幾乎打死，這是什麼問題？這就不是犯罪？我是總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我就不是老幹部？我就不是受迫害？上級對下級怎麼做都是應該的嗎？何況，我祇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過徐，通過黨組織搞過他的材料，這就是罪大惡極？這裏還需要說一點是，徐向前的材料，並未公開。當時，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不同意公開徐向前的材料。同時，我考慮到徐向前為黨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當時還是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元帥。我對徐帥當時是顧全大局的。我承認有個別問題的提法，有失之過重的地方。但徐向前對我打擊的手段，也不是我們黨的政策吧？」

「第四點，對迫害幹部和群眾的問題，過去對這個問題，我說的很多，今天祇簡單說些問題。起訴書上指控我迫害了 462 人。對這個問題，不知你們是怎麼計算的。如果我反對造反派就算『迫害』那就大大超過上面的數字。對造反派，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和是同他們同流合污，一條是嚴肅治亂。我是堅決同造反派鬥爭的，在治亂中，我也『傷』了一些人，這是損失，我承擔責任。但你們說當時該不該治亂？你們說爲了機關能正常工作，應該怎麼辦？」

許宗琪說：「你迫害群眾的數字祇算你點過名，有批示和劃過圈的。」

「好，這裏我說三點：一是，上級對下面報告的批示，即使有批錯的，是工作上的錯誤，還是觸犯刑律？二是，如果批錯了就是犯罪，那麼你們就加到比我職務高得多的人頭上了。例如，陳政逮捕法辦就是徐向前批准，由衛戍區執行的。三是，那些經我批示的人，我能認識幾個？你們能說清楚點吧。」

「總起來說，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麼主犯。」

這次談話，他們主要是要我的態度，拚命記錄。

從此以後，我對公審一點信心也沒有了，他們完全是在做戲，我不能陪著他們演戲。我想到了彭老總當年的一句話：「要什麼給什麼。」我祇想趕快走完每一個過場，生死都不在乎了。

第四十三章 「公審」鬧劇

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公審，就是公審文化大革命，更確切一點說就是公審毛主席。正是因為如此，審判的法庭才掛上一個「特別法庭」的大牌子。

宣讀起訴書

十一月十七日晚，我在監房內接受了受審的傳票。什麼叫傳票？過去連這個名字也沒有聽說過。看來，越虛偽的行為，其表面做法還越周到。

晚上八時許，一位特別法庭的工作人員到我監房來了。由於腰痛，我躺在床上，那位官員一進門，我就掙扎著起來，但起來得稍微慢了一點。就在此時，那個傢伙怒火萬丈地向我命令說：「你給我站起來！」他離我很近，說話的唾沫都噴到我臉上來了。

我也是怒不可遏，索性不起來了，立即回答了一句：「老子就躺在這裏怎麼樣？」我想，你要想用兇惡的辦法來對付我，連門也沒有。

為了便於公審，八月十九日晚八時，就把我送到公安部院內去了。這是我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關到秦城以來，第一次出監獄的大門。

下午三時多，監管員一手拿著鏡子，一手拿著刮鬍子刀來到監房裏，對我說：「今晚上，可能要到出庭的地方去，提早把鬍子刮一下，做點準備。」

我的衣服裏外都爛得不像樣子了，監管員看到我穿得那樣破爛說道：「這樣還能出庭嗎？」

「為什麼不能？又不是走親戚！」

公審兩天以前發給了我一套藍色的罩衣。

我對監管員說：「我真想穿著一身破爛去，這麼多年都在吃苦，快公審了才給件衣服，不是替他們貼金嗎？況且，衣服也沒有扣子，怎麼穿？」這下，來了兩三個監管員，忙了一陣子。有的給我縫扣子，有的趕緊去給我找鞋子。我的棉衣爛得不成了，一個多月以前，我自己把它稍微縫補了一下，結果是兩邊長短不一。穿上罩衣露出一塊很長的破布，接著監管員又立即把我的棉衣修補了一下。我心裏想，公審「很好」，幾年未解決的穿衣困難問題在兩小時之內就解決了。

晚上八時半，把我押出去了。上汽車之後，由秦城到沙河有一處大轉彎的地方，可以看到車隊的燈光照的像一條長龍，我在車上看，前後都看不到頭。一路上，除建國門立交橋沒有見過外，其餘的都似曾相識，對依稀聽到的和看到的都覺得很新鮮。在「井底」下生活將近十年了，現在第一次到「井面」上來了，哪有不新鮮之理！

當汽車駛過長安街後，不到幾分鐘，就從公安部大院的東門進去了。五五年鎮反運動時，我來公安部開過若干次會議。那時我是鎮壓反革命的領導幹部，今天我自己倒成了「反革命」了，這是當權者製造的大冤案！現在的中國，什麼事都可以發生，想不到的怪事，還在後面呢！

我在公安部住的地方是一個筒子樓，衛生間是公用的。好像住得很擠，我在房子裏聽到過陳伯達、吳法憲的說話聲，但我沒有見到過他們。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時整，在公安部禮堂正式開始審判十名「主犯」了。這十名主犯，除了江騰蛟之外，其餘八名是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洪文是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這是震驚中外的大事，是我們國家空前的「創舉」。

在開庭的幾小時前，法院有兩個工作人員，到房子裏來同我說過話。他說了很多個「不准」，例如，不准說話，不准東張西望，一切行動都要聽法警指揮等。他還說：「在法庭上，法警對被告有權按法律行事！」對他們的話，我不僅沒有回答，連聽也不願聽。我這個人最討厭煞有介事，裝洋蒜。

我住的地方離公安部禮堂祇有一門之隔。我由三個法警押著，到了禮堂門口稍為站了一會兒，從擴音器裏傳出江華的聲音：「傳被告邱會作到庭。」兩個法警左右押著，我泰然自若地走進了法庭。方块字进入社区制作

禮堂坐無虛席，黑壓壓的一大片都是觀審的。法庭裏，對著我的攝影記者，多得不計其數。

在法庭裏，被告一字形坐在臺下。陳伯達是用手推車推進法庭的。

陳伯達是大革命時代的老黨員，在毛主席身邊工作幾十年，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立過大功。他一生最大的業績就是花了很大心血整理好了毛澤東選集一到五卷，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對陳伯達，人們都稱之為老夫子（有學問之意），現在也上了法庭。

被告全都到齊後不久，臺下的法警向臺上報告說：「報告庭長，被告李作鵬心臟病發了！」江華一句話都沒說，祇稍微揮了下手，意思是推出去就是了。

當聽到李作鵬心臟病發時，我不顧法庭有多少個「不准」，扭過頭去看他，一直看到他被三輪板車推走為止。李作鵬心臟病發作的慘狀實在令人慘不忍睹！他痛得坐不住了，身體縮成一團，連眼鏡也掉了下來。他用手抓住胸前的衣服，頭靠在地上抬不起來了，簡直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我親眼看到兩個法警，一個在前，一個在後，重手重腳地把他抬上三輪板車。

公審開庭，江華院長主持，黃火青、史進前一前一後，宣讀了起訴書，史是照本宣讀，看起來精神很緊張。黃比史更緊張，黃宣讀時滿頭大汗，用濕毛巾在腦門上擦了多次。黃是一個比較正直的人，他很可能由於職務的關係，不得不執行命令。史就不同了，從他宣讀的表情來看，對被告仇恨極大。江華、黃火青、伍修權都是我們的老戰友，我們之間無怨無恨，他們在文革中受了苦，不是我們造成的。鄧小平讓他們出來文化大革命的氣，出毛主席的氣，沒有膽量，就拿我們出氣。臺上坐著還有不少軍隊的反黨亂軍、打砸搶的代表人物，文革中為了穩定軍隊，為了清理他們這些「三種人」，他們受到了黨紀軍紀的制裁，現在反過來說承受了我們的迫害，這是最讓人氣憤的！也使我對當局失去信心。

今天開庭就是宣讀起訴書。宣讀完起訴書之後，江華即發出命令：「被告退下。」江青退下時，有人要扶著她走。她神氣十足地說：「我自己能走！」我向後一看，她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了。接著，我聽到黃永勝的咳嗽聲音，扭頭一看，真把我嚇一跳，黃穿了一件長短、大小都很不合身的軍裝，腰彎得像個月牙，比過去好像矮了一截。他有氣無力地拖著雙

腳，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從他走路的神態來看，邁出每一步都十分困難。我當時心裏很難受。

黃永勝是參加秋收起義的著名的戰將，今日竟成了「自己」法庭的囚徒。這真是天翻地覆呀！早在江西蘇區時期，由於他作戰有功，在瑞金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獲得「紅星」獎章。當時，獲得獎章的人不多。大家都在傳告，誰得了「紅星」獎章，誰就永遠拿到了免死牌，可見「紅星」獎章含金量之高。解放後，他又獲得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這三枚勳章說明在中國革命的漫長征程中，黃永勝是頂級的英雄！但這一切並沒有為他消除奇冤大辱。

七一年「九一三」以後，除查我們的「兩謀」問題外，還說我們反對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反對江青一夥。十年後的公審，又說我們和「四人幫」是一夥的，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可見他們的思想是多麼混亂！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由公安部返回秦城。為什麼沒有受審就回秦城，當時是不得而知的。

第二審判庭

第二審判庭設在空軍學院，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進行審判。

大約是十一月下旬我們就住到了空軍學院，我沒有手錶，也沒有報紙，是無法知道日子和時間的。每天的白天、黑夜之分，也只能是以窗戶透進的光線為準。這種黑暗生活的滋味，沒有身臨其境的人，是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的。

對空軍學院我是比較熟悉的，從建院開始我就參與其事。特別是該院要建個禮堂，是空軍司令劉亞樓同我具體商辦的。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周總理處理西北問題的助手。我還陪同周總理，在學院禮堂接見過新疆、陝西、寧夏等省區的來京代表。我同空軍學院禮堂是有歷史緣份的，但萬萬沒有想到今天竟成為審判我的法庭所在地。

在空軍學院，我住的好像是圖書館，我睡在一個大房間裏，用木板給我隔了一個「房中之房」的小間，我就睡在裏面。

在空軍學院的物質生活，比秦城好多了，除了被褥是軍用品之外，其餘的一切都是新的。特別使我感到久違的是，有吃飯的筷子、磁碗、勺子等，這些在秦城都是禁用的。伙食雖然一般，但與秦城也有天壤之別。特別是使人難於忘記的是，在學院期間，還吃過兩次囚徒不能吃到的水果，看到水果我都感到稀奇！

我是晚上到空軍學院的，第二天早飯後，有兩個監管員到我的房間來，其中一個就是原來中紀委審查小組的負責人劉寶慶（不知是否真名，也不知他的職務）。姓劉的說：「我現在負責對你的監管工作。中央對你的政策是不會變的，包括萬毅同志代表中央向你說的政策性（寬大處理）的話，都不會變的。對你的處理，還是要經過一定的法律形式就是了。」從此之後，劉寶慶幾乎每天至少都要到我的房間來一次。都到了這個份上了，他們還在忽悠我，但也不排除他真心希望我有個好結果。因為自從七月二十三日對我補辦了逮捕手續之後，我的一切想法都變了。他們所說的所謂寬大，也祇是多判幾天，或少判幾天徒刑之別罷了，這對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事，與我過去對此事的認識完全是兩回事了。

當時，我祇有一條褲衩子，一條破爛不堪的長襯褲和一雙襪子，有時洗了褲衩子，光著屁股睡覺。一天在澡塘洗澡，我先洗長襯褲，放在暖氣片上烤乾，再洗澡。警衛戰士看我的破爛襯褲後，十分驚奇地說：「你的褲子不能穿了！」在場的兩三個警衛戰士和工作人員，看到這種情況，對我表示了同情。他們說：「真是不可想像呀！」過了一兩天，他們給我拿來了兩條軍用褲衩，一件化纖襯衣，一雙襪子，這下算解決了大問題。我對他們表示了謝意！

爲我看病的醫生、護士都是解放軍總醫院派來的。他們是認識我的。一位年青的醫生，在看病的時候，同我主動說話：「我是二醫大畢業的，我當然認識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遭受的災難，我看到了很多，真殘酷呀！我親眼看到你的身上都是地上的塵土，還有血淋淋的斑痕。現在我也做不了什麼，趁這個機會，我們能做到的，保證做到。」

在空軍學院的警衛部隊，是衛戍區警一師派出的。他們的領導幹部多數都認識我，對我的態度、作風、禮貌，同秦城的警察實在是不可相比。警衛戰士在值班的時候，他們不僅不會爲難我，還盡量給我方便。

即使遇到一時不便辦之事，也會給我說明。像秦城那樣管囚徒的惡劣做法，在他們身上是難於找到的。

我的洗臉水和洗腳水都要從外面打來，每次都是值班戰士給我打的。我洗澡換下來的衣服，戰士們就在澡塘給我洗好，放在暖氣上烤乾，並且還疊得整整齊齊。我每次都誠懇地向他們點頭表示感謝！他們幾乎都立正站著回答說：「我們的心情，你不一定完全理解。我們能為你做點小事，感到很高興！」然後他又悄悄對我說：「是指導員交待我們盡力做好工作。大家都同情老首長。」

在空軍學院，祇要不颳風下雨，我每天上下午都到室外散步，在院子裏曬太陽，除值班戰士之外，沒有監管人員陪同。

五次出庭

在我的記憶裏，到空軍學院之後，差不多有二十天都沒有出庭。我每天也就是吃飯、睡覺、散步三件大事。事不湊巧，我在要出庭的頭天，在室外散步時跌倒，磕壞了牙和臉部，略有輕傷。

第一次出庭時，警衛師的幹部同法警辦了移交手續，並在一個本子上簽了字。以後出庭也是這樣。

我走路有兩手後操的習慣，進了法庭沒走兩步，左邊的法警在我兩手後操交叉處，猛的擊了一拳，並說：「把手放下！」我回頭怒視警察，我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他們再敢動手，我就要拼老命與他們對打一頓，可是他們推了一下之後再也沒有動手了，我仍然兩手操後走路。

第二審判庭的佈置，同公安部禮堂的佈置是一樣的。左邊是檢察官，右邊是法官，左右兩排中間的頭一名，左邊是史進前，右邊是伍修權。舞臺的下面臨時拆去了若干排椅子，顯示出了一塊很大的「空地」。對被告還特別做了一個框架式的籠子，裏面放了一張凳子，被告人就坐在裏面，框架外面還左右站了一個法警。

我進入被告人的籠子坐定之後，副庭長黃玉昆就宣佈：「對被告人邱會作的法庭調查，現在開始。」黃玉昆是我的老鄉，不僅我們之間熟悉，連我的母親、弟弟都認識他，因為他每次回家探親都要到我家裏去。我們之間毫無恩怨，他肯定是奉命行事的。

在整個法庭審訊中，我共出庭五次，每次多則兩小時。在法庭上就是捉弄你，如同貓捉到老鼠，在吃之前，一定要戲弄夠了才吃掉是一樣的。我們根本沒有講理的條件，所謂法庭調查就是陪著臺上的人走過場，我已經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這就是所謂的法庭「調查」的實質。回想起我的態度，認罪不是認罪，自棄也不是自棄，我之所以基本上都認了，因為你認不認都是那麼回事，我不願意和他們共同演這個蹩腳的戲，讓他們要弄我。他們別有用心一問，我心裏就有火，真是懶得回答，不回答又不成，那就認吧，快點結束吧。因為誰判幾年早就定好了，還調查什麼？就是調查清楚了，他們就敢採納？他們就不判你的刑？可能嗎？！多少年後我才知道，在公審時就是很小的事都要請示中央批准。

第一次出庭主要審問我在「九一三」之後，燒材料的問題。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但對我的用心是十分惡毒的。「九一三」之後，我確實燒過一些相片之類的東西，根本沒燒什麼材料。燒東西也只是避林彪這個嫌罷了。對這個問題，在過去的一系列審查中，我都做了交代，都是十分清楚的。

那麼，法庭上為什麼又這樣虛張聲勢地做呢？因為「燒材料」可以迷惑一點人，好像我們燒了什麼「罪證」，從而可以同「反革命」掛上鉤，



有口難辯。在一九八一年「公審」中。

因此，起訴書上寫的是：「邱會作爲了掩蓋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九一三」之後燒了大量的材料。」這完全是以假亂真，虛張聲勢！

在這次出庭中還提到我送給葉群的一個硯臺，葉群很喜歡這個硯臺，她讓我書寫了一首她自己寫的詩，刻在了這個硯臺上。詩文是：「繁霜冷雨獨從容，晚節尤能愛此功。寧可枝頭抱蕊老，不能搖落墜西風。」我以前並沒有注意這首詩，現在看起來，這首詩寫得不錯。

第二次出庭主要是審問我「誹謗」朱德的講話和搞徐向前材料的問題。

法庭向我提問：「在六八年十二月總後黨委擴大會上，你誹謗過朱德委員長，是事實嗎？」

我一聽心裏就火得很，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講朱德的問題是在黨委擴大會議上講的，即使有錯誤，能算犯罪嗎？而且我講朱德的問題，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後，按中央的佈置講的，而且都是鸚鵡學舌的。法庭不是實事求是，而是把事情孤立起來，然後套法律條文。

但一想對著幹也沒用，我說：「我誹謗了朱德是犯罪。我的確在總後黨委擴大會上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時講過，朱德從井岡山就反對毛主席，他那個總司令實際上一天也沒有『總』過，朱德野心很大，想當領袖……」

接著，法庭向我提問：「是不是指使總後文辦主任王希克整過徐向前的材料？」

關於搞徐向前的材料問題，從開始審查我就說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材料是普遍問題。實話說，這個問題的確是徐帥錯了，總後大亂是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下命令要我去二醫大『紅縱』那裏送死，才大亂的。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徐帥向我道了歉。對這個問題我想未必是徐帥的意思，而是總後造反派向法庭提供的炮彈而已。

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不少，當我還要講下去時，法官立即粗暴地用很大的聲音說：「你不要講了！」並同時用手一揮，示意關掉擴音器，頓時法庭似乎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晚上，我很激動，也很氣憤。我早就說清的問題，法庭還當成罪名來審我。

第三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審問所謂迫害總後領導幹部的問題。
李漢東社區制作

第四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審問所謂「鎮壓」群眾的問題。

法官首先說了一些煽動人心的講話。他說：「邱會作和總後副部長陳龐在文化大革命中私設監獄，搞刑訊逼供，迫害了總後四百五十七名幹部和群眾……」。

聽了法官的話，我氣就來了。文革中整人，有整對的也有整錯的，整對整錯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來的，都是在文革中複雜混亂的環境中造成，都是在黨委常委會上研究的，都是當時的工作，法庭拿出來的證據都是各種會議上我的講話。在文革中就是按照中央清理階級隊伍的部署辦事，現在否定了文革，就是承認錯誤、總結教訓。當然整錯了人，整過頭了，整死了人，我這個後勤部長、黨委第一書記是要負責任的，負責是為了接受教訓，但法庭是作為炮彈向我們打來。毛主席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究竟怎麼個專法？「九一三」以後把我關起來是不是私設監獄？把我關到秦城近十年才宣佈逮捕，又算什麼？但心裏想的這些話又不能說出來，一說出來就上了當，引到反毛主席上面去了。所以快認快結束算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然後，法官就把總後常委會的記錄，我的講話，給林辦的電話記錄，我在總後佈置工作的講話等等，讓我辨認。這些當然都是真的，我只能認下來，關鍵是這些東西怎麼對待，怎麼用。是孤立的用法律條文卡住，還是根據文革中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的分析。

提到「迫害」，不提緣由，不提「受害者」當時的所作所為，那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比如庭控訴我迫害總後政治部幹事陳政，他解放初期就是公安部的內控對象，文革中又反總後黨委，搞造反，究竟應不應該對他審查？！況且逮捕陳政是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批准的。還有到庭控訴我的總後營房部助理員張錦昌，他在文革中是造反派頭子，反黨委，揪鬥老幹部，打砸搶。這就是貨真價實的應該清理的「三種人」，祇不過當時為了軍隊的穩定我早就把他們清理了而已。

法庭上指出的總後死了八個人，我有一半不認識，當然不認識並不等於我沒有責任，關鍵是怎麼對待這些問題。從中央來說，劉少奇、陶鑄、賀龍、彭德懷等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死於文革中，應該說責任在毛主席，但不能說毛主席犯了罪。文革的問題對我們不能搞兩個標準，

尤其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發明者彭真，在領導公審時更不應搞兩個標準。

法庭提到湯平的死，我是感到非常痛心和追悔莫及的。湯平的老婆劉伯音上庭控訴，話不算很長，有些話也不夠真實，但過頭話也不多，主要說的是湯平死的經過情況，對湯平怎樣死的卻避而不談。湯平是我的老戰友，對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因此，劉伯英的話音一落，我立即說：「湯平部長之死，在執行政策上我負有責任和沒有保護他過關。我是有能力保護他的，但我沒有及時做到。我現在向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戰友湯平的妻子請罪。」

對於法庭指控的事，你不認法庭也不會罷手的，所有問到的事，記得起來記不起來的我都認了，認了也不能說就是事實，法庭不是我說話的地方。晚上，劉寶慶等來我房子「閒談」。我說：「運用職權，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像鄭洪泰、陳政、張錦昌這樣的反軍渣滓，都拿到法庭上來做為真槍實彈使用，真是無聊到了極點！他們的本領太低劣了。」

第五次出庭的審問是結束式的。提到的問題很多，沒有什麼主題，時間祇有一小時多一點。今天法庭的特點是：法警川流不息的傳什麼「證據」給我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法庭開庭進行了所謂的公開「辯論」。辯論時間共四十五分鐘，檢察官王瀑聲，用什麼「公訴人」的身份對我「公訴」的時間佔去約三分之二。我的發言和伍修權的問話一共才十五分鐘。

王瀑聲對我的「公訴」共分四部分：（一）積極投靠林彪，參與林彪的反革命陰謀活動；（二）積極參與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三）積極追隨林彪「砸爛總政」的活動；（四）迫害幹部獨霸總後領導大權。

在王瀑聲「公訴」之後，法官即要求我做最後的陳述。我知道法庭的什麼所謂「辯論」是虛偽的，故不參與辯論。我祇簡單的說了幾句話：我是從小在革命隊伍中長大的。我的一生看到了我的上兩代和下兩代，連我自己五代人受到了共產黨的恩。今天，我還是相信共產黨，並且永遠相信共產黨。現在，在我們「自己」的法庭上，我從肺腑裏發出我的聲音，高呼：我們偉大的共產黨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高块寡读书社区制作

審判後，我這樣想：公審是中央決定的，雖然是鄧小平錯誤的決定，但也畢竟掛著中央的牌子。自從「九一三」之後，無論把我送進衛戍區、關進秦城監獄、公審，我都是服從中央決定的。我根本不會與中央對抗。因為，文化革命的整個路線及文革中的具體方針部署，毛主席要負很大責任的，這是很明顯的。在法庭上，你一辯論，很容易就被他們利用去做一個反對毛主席、反對共產黨的小醜，這點我是絕不會做的。

判決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在北京公安部禮堂，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宣佈判決。震驚中外的「公審」到此結束了！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佈黃永勝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吳法憲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李作鵬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邱會作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所有人判決前的關押期間，均抵押刑期。

一月二十四日晚，由秦城監獄去公安部禮堂接受判決的情況，同兩個多月以前去受審的情景是一樣的。不僅大的方面一樣，小的方面也幾乎是一樣的。例如，事前監管員照樣給我拿來刮鬍子刀和鏡子，要我把鬍子刮一下，去受判決也要「打扮」一番。到了公安部，一切都同上次受審時也一樣。睡覺、拉尿都在原地方。不過，宣判那天早上那頓早飯還是不同的，吃的好大米乾飯，有一個很大的紅燒丸子和一塊醬豆腐。從空軍學院受審回秦城之後，伙食就太差了，後來才知道公審時吃得好一點，是為了讓我們公審期間身體別出事，是為了他們，不是為了我們。

在宣判的四小時內，我看見李作鵬兩次服用過硝酸甘油，他身體不好，真可憐。

宣判大會由江華主持，一開始就是宣讀判決書，判決書從頭至尾一字不漏都讀完了。江華宣讀判決書的前部分，伍修權宣讀中間部分，最後判決部分又是江華宣讀的，宣讀判決部分，他頭上一直是冒大汗，整個臉部都是通紅的，他不斷用毛巾擦汗，江華把昔日的戰友，變成今日的專政對象，可能有些想法。

宣判的第一名就是江青。江華宣佈：「判處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話音一落，江青立即站起來，用最大的音量並拉長嗓音說：「革命無罪！打倒以鄧小平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此時，江華有點措手不及。坐在他旁邊的副庭長伍修權，同樣漲紅著臉，他也大聲說：「江青胡說！住口，把她拉下去！」江青是壞人，但江青是硬骨頭。

江青是鎮壓過我的，我也是堅決反對她的。但我認為判處江青死刑是給她樹碑立傳。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自己的錯誤之外，主要是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在個人作風上雖然也令人討厭，但這些仍然是黨內路線問題和個人品德問題。我認為，要堅決制止把路線問題當作反革命問題來處理，這在黨內是重要的大問題，一個黨的主要領導者，要具備的條件很多，但有一個絕對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祇能有公敵，不能有私敵。一個人無權的時候，受到別人鎮壓，這是別人的問題；但當自己又有權的時候，就用職權進行報復，這是十分惡劣的行為，萬萬使不得，而且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同時，這樣做也是黨內和社會長期不能安定的主要因素。

對我的判決是大錯特錯的，是空前的大冤案。因為用「公審」這樣的辦法來解決黨內路線問題，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評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錯誤，從根本上就錯了。在我的判決書上除了前面的大帽子外，對我的「罪行」滿打滿算不到三百字，而且一條反革命的事實也沒有，一條觸犯刑律的事實也沒有。

宣判結束後，我立即被押回秦城。我記得，我由空軍學院回秦城監獄是十二月十九日還是二十二日。

這次就不是坐小轎車，和我同車的有王洪文、姚文元、江騰蛟等。在車上，有三、四個警察，有一個手持一根黑警棍，那是一個什麼東西，幹什麼用的，我當時並不知道。

回到秦城監獄，我還是住在原來的監房，我進了監房就看到桌子上有一小碗白菜幫，兩個窩窩頭；當時，我還以為是誰在這裏臨時住過，吃過飯剩下的食物。我坐在床上，大約有半小時，一個監管員進來同我說：「你吃飯啊，這就是你的飯！」此時，我才知道，伙食變了，變得更差了。我沒有吃就睡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經六十六歲方塊字模由杜區制作參加

革命，到判決的時候，已經有五十二年的革命歷史，這樣一個老革命、老黨員、老幹部，就無辜地死在自己人手下。

難友合監生活

公審後，監獄似乎有許多的變化。其中可以使人感覺得到、看得見的有如下幾點：

一是，工作人員的態度有很大的變化。幾個「兇惡」監管員沒有再露面。過去對我的態度好的，現在也同樣很好，所有工作人員的態度都好了起來。

二是，從六月三日中午起，伙食變了。中午開飯的時候，送飯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同時推來了三輛車子。吃的兩菜一湯，並還有小菜(醬菜、豆腐乳、辣子)。菜的數量可以隨便要，主食是大米、白面，沒有粗糧了。每隔一天的晚飯，不是包子，便是餃子。

三是，注意囚徒的衛生防疫。我住的房子，每個星期都要用藥水噴灑一次。醫生每天都到牢房來一次，需要什麼藥，可以立即開處方。此外，還督促幫助洗衣服和曬被子。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這幾年裏，是從來沒有過的新鮮事。

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監獄不是沒有條件對我們「好」，而是願不願意對我們「好」。當然願不願意的權力在上面，這些人，被別人打成反革命時，天天喊冤；可是，他們把別人打反革命時，一點不客氣，心狠手毒。這還算共產黨嗎？！

公審之後，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中午起，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和我四人，合監住在二十二樓。那天上午約十時許，監管員突然叫我：「你到這裏來一下。」我跟著他，走進一個房間就看到他們三個人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對吳法憲，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對其他人怎麼也想不起來。

監管員說：「從今天起，你們四個人就住在這棟樓。你們相互間可以來往，可以談話，可以在一起活動……」我們四個人共同生活就開始了。二十二樓的監管員很快送來了象棋、撲克，還搬來了一張小桌子放在走廊裏。獄方不斷來人督促我們在一起玩。但我們四個人，剛開始對監管員說的幾個「可以」，一個人也沒有可以一下。大家都呆在自己的監房裏，不出門，不來往，不說話。

合監後第二天下午，我們稱他爲光頭主任的監獄的負責人，在兩三個工作人員陪同下，到我們監樓來了。他在走廊裏大聲說：「你們怎麼都在自己的房間裏，爲什麼不出來走一走，大家在一起玩玩？」聽到他的說話，我們都先後到走廊裏來了，光頭主任很自然的同我們大家坐在一起閒談起來。

光頭主任好像很有感慨地說：「把你們幾個搬在一起，就是要改變一下你們的環境。幾年了，說話的機會都很少，這些我們哪能想不到呢？不能這樣了，大家若不在一起說說，將來到外面去都不會說話了。」對他那句「將來……」的話，我倒真的楞了一下，認爲是一句有用的話。

光頭主任走後，我們還是各自回自己的房子裏去，根本無心走在一起。人人心有餘悸，「共產黨」的臉說變就變，大家怕上當。

祇要天氣好，每天上、下午都放風。監管員幾乎每天晚飯後都來叫喚：「出來走走呀！」有一兩個監管員乾脆到各人房子裏去把人拉出來，並且還陪著我們一起玩撲克，下象棋，說閒話。除了颱風下雨外，天天都是如此。我們這種生活待遇好像上升到同沈醉寫的《我這三十年》的監獄生活差不多了。從沈醉的書上來看，他在監獄比起我們來，還自由多了，待遇高多了。例如，他可以抽煙，還有什麼文藝生活等等。可見共產黨的監獄，對國民黨、共產黨有區別的。對國民黨戰犯、特務寬得很，對共產黨的老幹部嚴得很！

我記得，在八月什麼時候就開始允許看電視了。開始是黑白的，後來就是北京出產的十四寸彩電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自己國家產的彩電。開始，每個星期看一次，後來每隔一天，或兩天看一次。我們曾要求多看點電視，監獄的人直接了當地回答說：「輪不過來。你們又不能在一起看。」這句話說明，關在二十二樓的不止我們四個人，還有別的人。

我們住在一起之後，江騰蛟好像成了「組長」，監獄裏有些什麼小事都找他辦。監獄讓學習，我感到很好，因爲在此之前很久沒有看報紙了，什麼也不知道。一天，監獄讓宣讀《解放軍報》一篇文章，其內容說鄧小平是學習毛主席的榜樣。宣讀之後，進行了討論，但沒有人發言。

八一年八月一日，我同王、吳、江和好幾個監管員及護士等人在馬路上拔草，這是我在監獄唯一的一次勞動。這次可以說是勞動，也可以

說是遊戲。拔草的時候，大家有說有笑。那天還適逢空軍表演，吳法憲看得津津有味，一個空軍司令看飛行表演，不是在主席臺上，而是在監獄的放風場上。

合監以後，在生活上確實有些變化。從自己的小牢房能夠自由自在地踱到走廊裏，對囚徒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解放」，從形影相吊改為多人相見。當然，這種改變祇是生活環境的變化，對個人思想來說是毫無作用的。對我公審就是最大的冤案，在我有生之日是改變不了我的觀點的！

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和我四人合監的時間不到兩個月。我們除了在一起「玩玩」之外，最主要的還是互相瞭解各人不同的境況，有些這些問題，我是有生以來聞所未聞的。我們幾個人在一起，主要談了吳法憲的「假交代」，王洪文的「痛苦難忍」和江騰蛟的「有苦難言」三個方面的問題。我則說了生活上暗無天日的問題。通過這些問題，使我進一步瞭解到，中央專案部門對老幹部打擊之殘忍是前所未聞的！

這裏首先說吳法憲的「假交代」。吳法憲是一個容易被引誘上鉤的人，在交代自己的問題上也是這樣的。他對我們三人（吳法憲、葉群、邱會作）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毛家灣葉群家裏一起談話之事就做了假交代。

七一年八月八日，周總理要吳法憲到葉群家去拿毛主席寫給林彪的「龜雖壽」手跡，想送給「病」中的康生看一看，吳法憲叫我同他一起去了。對這個問題，我沒想到吳法憲竟會說假話，而且他把假話說成是我們商量策劃陰謀政變的反革命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江青一夥在位時期的中央專案組和公審前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對我都是作為重大問題，決定我「反革命」的關鍵問題進行審問的，追得特別緊。他們為什麼對這樣一個普通問題追得那麼緊？我懷疑過其中必有什麼原因，但沒想到是吳法憲說假話引起來的。

一天，我們在一起閒談，我說起了「八月八日」在葉群家談話的問題。吳立憲立即緊張起來，並一下擁到我的肩上流著眼淚說：「老邱！對不起你，我說了假話，可能對你有連累。我交代過，八月八日，在毛家灣，葉群和我們說的主要就是『要準備政變的問題』。」

「為什麼要說這樣天大的假話？你不祇是連累我，你還連累了黃永華，連累了解放軍！你給江青（沒敢說主席）幫了大忙。他們找不到定我

們參與『政變』的臺階，你把大家送上了這個臺階。你的假話，對我不能沒有影響。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對得起對不起都沒用了。我心裏很明白，對我們的公審決不是僅根據你的假交代決定的，沒有你的交待他們照樣幹。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

我這麼說後，吳哭的更傷心，他說：「是他們逼我說的。他們說這是給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著他們的需要說的和寫的。結果什麼也沒搞到，還是關到現在。」

王洪文說：「我想起了，一次李震、郭玉峰、吳忠三人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時，曾經說到你們在葉群家談話的問題。總理最後是這樣說的，八月八日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在葉群家議論的問題，是目前已經發現的最重大的問題，起決定作用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吳、邱的口供不一致，對他們處理問題，今天就不討論了，待把『八八』問題搞清楚後再討論處理。我記得對你們的問題也就拖下來了。」

吳法憲說假話當然不對，但說明他們很需要吳的假話，想把我們往「兩謀」、「政變」上連。如果他們有了林彪「兩謀」、「政變」的確鑿證據，也不會無數次地追問這個『八八』問題了。

王洪文被捕後，所經受的痛苦是駭人聽聞的！我們合監之時，王洪文因腦子受創傷還不能做系統的談話。他說的常常是東拉西扯，詞不達意。

我們的談話是從談粉碎「四人幫」開始的。江騰蛟同王洪文比較熟悉，江對著王說：「現在你房子裏鋪著地毯，還有專門值班的警察，把飯送到你房子去。你還是副主席待遇嘛！」

王洪文苦笑著說：「你怎麼挖苦都可以！其實，我能夠自己走路，時間還不長，我每天都會跌倒在房子裏，這些日子是怎樣活下來的，我祇能模模糊糊地記起來。」

王洪文接著說：「毛主席去世後，我們考慮會被排擠出去，沒有想過會被抓起來。七一年『九一三』之後，特別是黨的十大之後，我們特別相信毛主席的威望，我們把自己的命運同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聯繫在一起。其實，康生去世後張春橋比較沉悶，江青過份相信自己的夫人『尊嚴』，在毛主席去世前，我們已經是比較鬆散的了。」

「我現在的身體為什麼那樣壞？要詳細說，話就長了。他們給我上的刑具是現代化的，那種手銬一動就會自動緊固。你不掙扎還罷了，要是

用力掙扎就會隨之加緊，手緊箍得腫脹，疼痛難忍。我開始是關在人民大會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覺的房子內裝有一個可以定時自響的儀器，聲音不算很大，但有鑽心的感覺，對人的精神刺激特別厲害。聽了這種聲音之後，無法入睡。這樣無論晝夜都不能睡覺，我瞌睡的程度，別人是難於想像的。有一次我在喝開水，水還沒有進口就睡著了。接著就『啞』的一聲響，我睜開眼睛，開水還是溫的。到了監獄之後，是每兩小時『查房』一次。他們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說話，即使睡著了也要叫醒，從不例外。

王洪文說：「爲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著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祇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裏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絕打針，他們就強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祇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這時吳法憲突然說：「媽的，也給我打過針喲！」很快吳好像發現自己「失言」，起身就走了，邊走邊說：「我不參加你們扯亂談。」

對我們幾個的問題，他前前後後，同我講了不少。

王洪文說：「七一年『九一三』後，很長時間我還在上海，把你們關起來的情況，我是不瞭解的。我能想到的，多數是後來李德生同我說的。」

「據說，毛主席對林彪的問題是既重視又慎重。毛主席說：『林彪的問題，比歷史上任何一問題，其影響都大』。毛主席還說不能用處理楊成武的辦法對你們。對你們的問題，要急於處理，除張春橋、江青以外，最積極的是汪東興。」

王洪文說：「對你們四個人的組織處理，總理提過兩個方案。處理吳法憲一個人；處理黃、吳二人。在很長的時間內，主席也總是在考慮區別對待。主席開始基本同意祇處理吳法憲，保護黃、李、邱。主席還風趣地說：『以少換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們始終同總理持不同意見。葉劍英、汪東興、李德生等也不同意總理的意見。在對你們的處理問題上我也講了不少不實之詞，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對不起你們，其實，黃、吳、李、邱的事，大家心裏都明白。」

過了三四天，我們坐在院子裏「放風」，王洪文最後一個出來，他剛走了沒幾步，人就像門板一樣，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們剛

要去扶他，監管員立即說：「千萬別動，動就很危險，祇有讓他自己慢慢緩過來才成。」過了兩三分鐘，王洪文才慢慢側過身來，鼻子磕出血，半個臉都是灰土。王洪文見我們幾個坐在那裏，祇是一絲苦笑。

走出秦城

八一年九月十一日，我終於離開了關押了四年又九個月的秦城監獄。當我走出二十一監樓西樓時，吳法憲、江騰蛟兩人站在走廊的出口處，他們祇是微笑，點頭示意，不敢同我握手。我倒沒什麼怕的，很大方地伸出手去同他們分別握手，並說：「不要難過，你們也很快就會離開這裏的！」走出監樓，監管員、警察、護士都在門口送我，我向他們點頭致意。

從監房起，到離開監樓要走過四道鐵門，離開監獄區共有三道鐵門。從監房到離開秦城監獄，共計七道鐵門。當我們的車子駛到監獄區的大門口時，我自言自語地說：「願這裏今後關押的是真正的反革命！」

秦城的高個子副主任，一直送我到火車上，並在我的車廂裏坐了不短的時間，臨開車才走的。獄方派兩個監管員，一個醫生，把我直接「護送」到西安。應當說，監獄的「禮節」是周到的。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時，我乘北京經太原的火車，到達陝西西安。恰好，這天是中秋節。我和大兒子路光在一起過的中秋節，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

第四十四章 空前的大冤案

公審是大倒退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時，我由北京抵達西安。到了西安，我從十八層地獄底層昇到首層，但還是地獄。

與社會隔絕十年有餘了，當時我就好像初懂事的孩子一樣，一切都似懂非懂。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對過去的事情都逐漸回憶起來了。

我從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到一九八一年的五十二年中，我經過了黨內五次大的「自己打自己」的運動。一次是一九三〇年江西蘇區捉 AB 團；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延安的搶救運動；一次是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肅清林彪反黨集團；一次是一九八〇年的公審。這五次運動，無論叫做肅反也好，整人也好，總之是自己殲滅自己的大戰。這是我們黨內最悲慘的苦難歷史，對黨造成過不可估量的損失。

我又看了一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這是一份絕好的審判文化大革命，用法律手段反對共產黨，反對毛主席，指責周總理的文件。《起訴書》人爲地把老幹部分成「黑榜」、「紅榜」，這種用法律的形式製造派別，是我們黨有史以來最大的「創造」。凡當局需要的人，不管是當權的、在野的、活著的、死了的領導幹部，也不管是什麼時候下臺，爲什麼事下臺的領導幹部，都一律放在「紅榜」之內，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這樣就把一個反毛主席的同盟建立起來了。通過《起訴書》，完成了把共產黨分爲擁護毛主席和反對毛主席的兩大派。「黑榜」刊出名單，也就是所謂的敵我矛盾，是由當權者圈定的。這次審判在形式上是法律，主宰者卻是當權的領導人。黑白、曲直、是非依循的根本不是法律，而是當權領導人的指示，這在我們黨內開創了借法律手段解決黨內問題公開審判黨內高層領導人的先河。事後才知道，公審的一切事

情，包括很細小甚至很瑣碎的事情都要通過當權的領導人的批示才能實施。

很可悲的是，公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否定文革，但公審的主導思想方法又和文革中的思想方法是一樣的。與其說是公審，不如說是「現在輪上我們上臺了」罷了。先定罪後收集證據，用誣陷的方法審判別人誣陷。所以公審的思想體系和文革是一樣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審是文革的一部分。喊一句徹底否定文革的口號有什麼用，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黨還沒有真正地、實事求是地總結文化革命的教訓。公審祇能叫「鬧劇」。

公審的思想脈絡相當混亂。為了打擊我們，他們延續並利用了毛主席對我們的錯誤，把莫須有的所謂「政變」仍扣在我們頭上，好像我們為了反對文化大革命不惜謀殺毛主席；但他們為了反對毛主席的需要，又說我們擁護文化大革命，說我們在文革中是執行毛主席路線的。

公審並不是審判什麼「反革命」，而是審判共產黨在文革這個時期的工作，審判毛主席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實，列入主犯名單的，除江騰蛟外（把江騰蛟列為主犯的目的，是為了穿鑿林彪和小艦隊及「兩謀」的關係），都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把這些人作為毛主席的替身。從審判的陣勢來看，軍隊系統參加「兩案」的人員多是造反派登場，當權者利用他們的怨氣或仇恨，把軍隊的是非界限搞顛倒了。因此，對待公審我有原則性的兩點考慮：一是決不反毛主席，事情不往主席身上推；二是決不反黨，事情不往中央身上推。上面兩條如果有一條做不好，都會被利用，把我做為反毛主席的工具。今天當局能夠把我拿去公審，與毛主席生前對我的錯誤處理是有一定的聯繫的，他們利用了過去在「四人幫」極大干擾下的錯誤結論。即使這樣，我也決不反對毛主席。不反毛主席和糾正毛主席生前所犯的錯誤是兩回事。

另外，在正常的黨內鬥爭中，打擊「四人幫」我雙手贊成，「四人幫」的確錯誤很多、很嚴重，但他們畢竟還是黨內問題、路線問題。因此是不是要公審他們，我持否定態度。

我認為，公審決不是為了所謂的「加強民主與法治」，而恰恰是大倒退，本來打倒「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重整山河，司法工作有一定的恢復和前進，一搞公審，這些都毀於一旦。法律有相對的獨立性，有相

對的規則，但公審事事聽黨的領導人的指示，甚至判多少年都由有黨的領導人來確定，這難道不是倒退嗎？這難道是進步嗎？

對公審來說，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把死人（毛主席）作為活人的墊腳石。像我這樣的人算什麼主犯，我們祇不過是政治上的小石子，但不管再小的東西，放在他們脚下，也會有墊高作用的。

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

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共產黨內，根本不存在一個包括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內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但確實存在一支以林彪為首的、在文化革命的混亂形勢中奮力支撐黨和國家的人民軍隊，確實存在一個保衛人民解放軍不受破壞、堅決抵制中央文革江青一夥的軍委辦事組。

應該說，我這一生都是堅決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但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我確實是不理解的，主要是對踢開黨委鬧革命不理解，對依靠造反派不理解，對受毛主席重用的江青、張春橋一夥飛揚跋扈、頤指氣使看不慣，我想部隊大多數幹部也都是這個看法。對於林總和軍委決定部隊的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全軍都是擁護的。但主席讓介入，讓搞「四大」，怎麼辦？林總和葉帥、聶帥及軍委，把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放在首位，還是順從了毛主席的意旨，現在看來也有遷就老人家的因素。六六年國慶節後，軍委發佈了《緊急指示》，軍隊的軍以上單位搞「四大」，這樣部隊從上到下一個時期也亂了。我一直認為《緊急指示》的發佈是錯誤的，但不發佈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毛主席那裏是過不去的。但這麼快就搞出「緊急指示」，內容也很左，這和全軍文革李曼村、謝鎧忠這些全軍文革的人，一心一意搞極左是密切相關的。《緊急指示》發佈後，軍隊造反派在全軍文革的縱恿、操縱和支持下，砸遍全軍！解放軍三總部，國防科委，海軍，空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領導幹部都被揪鬥，全軍正常工作難以進行。在這樣危機的時刻，林總一方面把各大軍區領導搞到北京來「躲反」，又在六七年一月底發佈了軍委《八條命令》，有力抑制了軍隊的混亂。但是軍內造反派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的，由於主席支持造反還是當時大的形勢，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也是支持軍隊造反派的，李曼村、謝鎧忠這些全軍文革

的人就在暗地裏煽動和支持他們的亂軍行徑；同時，軍隊在執行軍委《八條命令》時，也有過火的地方，對造反派打擊面過大，「辯子」被江青一夥抓住，在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文革大勢下，軍委不得已又讓了一步，軍委《十條命令》出臺了，軍隊造反派又鬧起來了。當時，中央機關亂了，國務院各部委亂了，各省市亂了，軍隊這時也亂了，總之，全國都亂了。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林彪通過「五一三」事件堅決支持了軍隊擁護黨委、維護領導幹部軍隊的革命派，反對打砸搶的造反派，「五一三」事件後，軍隊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派被徹底打下去了，軍隊的工作很快就恢復正常，軍委辦事組，也應運而生。不論是楊成武時期的軍委辦事組，還是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都是保持軍隊穩定的，黃永勝則做得最堅決！保持軍隊的穩定，不許江青一夥插手軍隊搞破壞，也不許江青一夥的代理人在軍隊搞破壞，黃永勝和黃永勝領導的軍委辦事組同江青一夥做了堅決的鬥爭。軍委辦事組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一）穩定了軍隊；（二）反對和抗衡了江青一夥（中央文革）；（三）承擔了三支兩軍的艱巨繁重的任務；（四）在總理領導下及政治局大多數老同志努力支撐著黨和國家。這些使命的完成，和林彪的支持、總理的具體領導是分不開的。可以肯定地說，沒有軍隊的穩定，全國不僅會更亂，而且以江青一夥為中心的造反派，會奪取更多的權力，會給黨和人民造成更大更多的災難。人民解放軍是黨領導下真正的人民軍隊，當時掌握軍隊大權的軍委辦事組，是堅定維護黨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派，在文革中是有大功的！根本不是什麼反革命，更不是什麼「林彪反革命集團」！鄧小平審判我們，真是天理不容。

很多人說自己和「四人幫」進行了鬥爭，試問你們是怎麼鬥的？！黃永勝和黃永勝領導的軍委辦事組和江青一夥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健在時，是在高度肯定文化大革命時，是在江青一夥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時；你們和江青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去世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後，是在江青一夥成為階下囚後。

我們的「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樣帶上的呢？

「九一三」事件的確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這樣的事，毛主席把我們抓起來隔離審查，我們雖然有想法，但還可理解。命運也就一步步演變下來了。

第一，停職反省。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在人大會堂福建廳，周總理代表毛主席宣佈：黃、吳、李、邱四人停職反省，並關進了衛戍區。這是毛主席決定的，並沒有宣佈什麼反革命。

第二，反黨集團。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對黃、吳、李、邱定為反黨集團，撤消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做出永遠開除黨籍的政治和組織結論，雖然這個結論和處理是錯誤的，但並未定為反革命，仍然在黨內問題的範圍內。因為審查了幾年，並沒有查出黃、吳、李、邱與「兩謀」有任何關係。

第三，投進秦城監獄。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黃、吳、李、邱四人從衛戍區關進了秦城監獄。我到秦城之後，監獄當局的宣佈是：「奉華主席的命令，你到秦城來是集中學習，繼續審查」，仍然沒有直截了當地宣佈為反革命。但關進秦城是一步致命的錯誤，也許他們的本意是把我們「圈」起來以後再說，先集中力量去對付「四人幫」。結果把我們搞了個有去無回，並給鄧小平事後鑽了大空子。這一步對我們的命運是關鍵的，華、葉及汪東興要負歷史的責任。

第四，補辦逮捕手續。關在秦城期間，中紀委審查小組對我們的問題進行了「不帶框框」的重新審查，並有實事求是的結論，因為對我們的問題來說，祇要我們沒有「兩謀」，就是文化革命特殊而複雜情況下的路線問題。鄧小平不能接受這個結論，八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在秦城監獄以總政治部保衛部的名義，對我補辦了逮捕手續。從此就把「反革命」的帽子給戴上了。這也就是說，從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從衛戍區到秦城，關了將近十年，才把我們變成「反革命」的。

祇有把我們變成「反革命」，才能審判，而且硬要煞費苦心地把江騰蛟這個小艦隊的人和我們扯到一起，從而要把我們和「兩謀」扯到一起，他們的用心太險惡了。

第五，起訴與判決。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和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除了把我判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和給我戴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罪行的「大帽子」之外，其餘各個地方，特別是在我個人的

「罪行」名下，連半點「反革命」的事實和一個「反革命」的字眼也沒有找到。

起訴和判決又是文不對題的！起訴書中起訴我們是「反革命」，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結果審來審去，什麼也沒有審出來，就連吳法憲說的假話他們自己也給否認了。判決的問題都是文革中一些具體事情，用誣陷的手段來起訴，用兩個標準來對待文革中發生的死人問題。比如說，總後死了八個人，起訴我負有責任，但負的是什麼責任？在什麼樣的前提下負責？如果大家在嚴肅認真地總結文革的教訓，我一定會承擔這個責任，死人總是不好的，應當總結教訓，我做為總後勤部長是要負責任。但是他們不是這樣，他們是為了打倒我，而利用所謂的法律讓我負刑事責任，這就是完全錯誤的了。在文革中我處理這些問題的具體手段就是對審查人做過批示，這種手段和毛主席，和周總理處理問題的手段也一樣的，也和鄧小平、彭真在文革前製造了那麼多冤假錯案的手段也是一樣的，即以領導的身份做批示。我們「迫害」的人都是教員，文化幹事，俱樂部主任這些小人物；你們「迫害」的都是元帥、大將，省部級以上的幹部，以及文化界、知識界、文藝界，民主黨派中最負名望的人物，還是他們的譜大呀！

為什麼要人為的決定一個「林彪反革命集團」？這是為他們的政治服務的。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搞了一個「劉、鄧司令部」，搞了一個「彭、羅、陸，楊」，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司令部」，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對此，鄧小平是懷恨在心的。而林彪事件又發生在文革之中，在毛主席並沒有最後處理就去世了，林彪的問題就成了毛主席生前遺留下的問題。因此，鄧小平為反對毛主席的需要，先編造出一個「林彪反革命集團」，再利用這個「林彪反革命集團」作為毛主席的替身，或作為他們反毛主席的靶子，是很方便的。這樣就把一切問題都可推到「林彪反革命集團」身上去了。公審是一個「政治垃圾坑」，無論什麼樣的東西，不論是歷史的，現實的都往裏倒就是了。

「兩謀」問題指的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一夥人，要謀害毛主席，南逃廣州，另立中央。這個「兩謀」問題，「九一三」以後的中央文件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根本沒有給我們傳達過，我是保外就醫到陝西後才知道

的。「兩謀」問題，《「五七一」工程紀要》問題，「手令」問題，究竟有沒有？如果有，和林彪是個什麼關係？多少年來也沒有搞清楚。不過，有一個問題是肯定的：如果林彪和「兩謀」問題、「五七一」問題沒關係，我們與之就更沒關係了；如林彪和「兩謀」問題、「五七一」問題有關係，我們仍然與之沒關係！

既然沒有關係，我們的問題就是文革中的黨內路線問題，我們在文革中的歷史地位和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楊得志等是一樣的。可悲又可恨的是，沒關係仍按有關係整我們。

造反派消滅革命派

六六年十月，軍委《緊急指示》後，軍隊各領率機關就大亂了，總後是大亂的典型。造反派住進總後大院後，和機關造反派一起，天天揪鬥各級領導幹部，搞打砸搶，黨辦被佔，各部辦公樓被佔，保密室被搶，造反派中午就到食堂搶飯吃。

六六年底，二醫大「紅縱」開始對我揪鬥。軍隊其他領導幹部，如張池明、饒正錫、吳法憲、余立金、李天佑、蘇振華、李作鵬、杜義德、趙爾陸、崔天民、陳仁麒、黃志勇等等都被揪鬥得很厲害，各大軍區的領導也被揪鬥。解放軍廣大幹部是反對造反奪權、反對打砸搶的，在這種混亂的時期，他們組織起來，和造反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是真正的革命派！這種鬥爭不是像地方那樣，是兩個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而是正確與錯誤的鬥爭，是保衛人民解放軍的鬥爭，也是在黨和國家生死存亡之時的鬥爭，試想，全黨全國都亂了，解放軍再亂了，將是個什麼結果？！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林總堅決支持了革命派，「五一三」之後，軍內造反派就敗陣下來。軍隊要不要穩定？當然要穩定。軍隊各機關要不要恢復正常工作？當然要恢復正常工作。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派要不要清理？清理勢在必行！這和鄧小平們上臺以後清理「三種人」是一個道理。當時的清理是在文革的環境之中，事事要按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辦，當時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就是「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五七」幹校，三支兩軍，等等。全國都在清理階級隊伍，有歷史問題的同志都要清查，總後一家不清不成；全國都辦幹校，毛主席的女兒都上幹校，總後一家不辦幹校不成；全國都在精簡機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構，總後不精簡不成。關鍵是誰去？我總不能把反對黨委、反對我，搞打砸搶的人留在機關工作，把擁護黨委和我的人搞到幹校去吧！當然，客觀情況也是誰下去誰吃苦，生活條件差，要參加勞動，子女上學困難等等，這都是事實，但這是文革時期的總的政策決定的，不是我個人決定的。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派首要人物要不要清理，當然要清理，比如總後政治部幹部陳政，是個不折不扣的階級異己分子，文革以前就是公安部的內控對象，他造反很厲害，上串下跳，煽風點火，完全是借文革之機解對共產黨的仇恨。這樣的人，公審時竟讓他到法庭去控訴我對他的迫害，豈不怪哉！再比如總後死的八個人中，有一個後勤學院教員王述臣是造反派的頭子（第一把手），此人當過國民黨的警長，他主持造反組織「星火燎原」開黑會攻擊毛主席被舉報了，我能不能批示嗎？我不對反毛主席的人批示，我成了什麼立場？當時有《公安六條》，總後能不抓他嗎？《公安六條》有明確規定，他這種人根本不許參加群眾組織，更何況當第一把手搞反黨委，搞打砸搶，完全是對革命政權進行報復。他被抓起來後，他的同謀把他當過爲警長的情況調查出來了，自知問題嚴重，怕王述臣把大家供出來，就把他當過爲警長的情況通過他老婆告訴了王述臣，實際上是威脅。王述臣自知罪惡重大沒有活路，他讓他老婆在飯盒裏放了毒藥，他老婆送飯時，王吃後身亡。此人後來竟被鄧小平追認爲烈士。他是誰家的「烈士」！？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江青一夥對我們進行了殘酷的打擊和報復，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繼承了江青一夥的衣鉢，他不惜違背歷史事實，硬把軍隊造反派與革命派的位置顛倒過來了，從而把革命派變成打擊對象，把錯誤嚴重甚至罪惡纍纍的造反派變成革命力量。鄧小平是旗幟鮮明地依靠軍隊打砸搶、反黨亂軍的造反派的。在所謂清理「三種人」中，他們以人劃線，把革命派當成「三種人」清掉了，總後150餘名軍師級幹部全部下臺，隔離審查、開除黨籍、判刑勞改、清出軍隊；降級、降職、給予處分的就是「寬大」了。這麼一大批優秀的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結果全給「割了韭菜」，總後機關及其所屬各單位成了清一色的造反派。那些反黨亂軍、打砸搶的造反分子又被作爲反對我們的生力軍重用起來，鄧小平利用這個怨氣，根本不講黨性原則。鄧小平並不瞭解軍隊在文革中的情況，他也不願意認真瞭解這些情_{執筆連載}，由

鄧小平骨子裏對毛主席有怨恨，他不分是非，把文革中在臺上工作的人統統搞掉，使我們在打倒「四人幫」以後，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機會，他反以我們作為毛主席的替身，搞公審，反對毛主席。

一想起這麼多軍隊幹部因為受我的株連，蒙受冤屈，家破人亡，我就感到萬分痛苦。如果我一人坐了牢，殺了頭，能免除廣大幹部的災難，我是心甘情願的！我們這個黨冤冤相報太厲害，很多人沒有死在敵人的刀槍下，沒有死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上，卻成了黨內鬥爭的祭品。這是多麼大的教訓啊！

毛主席對黨、對人民、對國家的偉大貢獻是任何人也磨滅不了的。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也確實犯了不少錯誤。我們說，對文化大革命是應當很好總結的，這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完全必要的，但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來反對毛主席、否定共產黨就是錯誤的，也是別有用心的。打著共產黨的旗子反對共產黨，也是毛主席身後某些領導人的一大「創造」。他們別有用心地把黨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說成毛澤東個人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儘管毛澤東個人對文化大革命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還是黨的歷史的一部分。

惡毒株連是冤案的一大特點

惡毒株連是冤案的一大特點。在軍隊中總後勤部幹部受株連的情況是最為廣泛的。「九一三」前總後正副部級首長十三名，沒有受到大的牽連的有張天雲（當時患癌症）、封永順（整編時總參過來的）、張令彬（秋收起義的老同志）等；關進秦城監獄的有邱會作、王希克、戴金川、陳龐，還有三〇一醫院的正副院長靳來川、曹根慧等人；被趕下臺以後處理的有：張池明、邱創成、張明遠、嚴俊、伊文、丁先國等人。

各二級部和軍級以上各大單位的約有三十多個，軍政首長受株連的佔三分之二之多。師一級領導幹部受到株連的也很多，機關處一級幹部亦有不少人受到株連。我和其他領導幹部的家屬及身邊工作人員，包括：秘書、保密員、警衛員、司機、炊事員、護士等一律都受到株連。

他們進行株連，首先扣上「邱會作死黨」的大帽子，然後進行政治迫害。「邱會作死黨」的真實情況是怎麼一回事？其實這是以人劃線的借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口罷了。以人劃線的實質問題就是：凡是同邱會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工作的都是反革命；凡是反對過邱會作的人都是依靠力量，對邱會作搞武鬥、砸爛總後機關的造反分子都是「革命」的領導骨幹。這樣一劃分，就陣線分明了，也是造反派株連革命派的政策依據，革命派的災難也就不可避免。

劃了這條線，總後的幹部受到株連的數以千計。對受株連人的處理：有的逮捕法辦；有的開除黨籍、軍籍，撤消職務；有的勞動改造；有的連降三級；有的以轉業、復員的辦法處理。不少應轉業的幹部強行按復員處理，削職爲民。

以我的秘書吳瑞雲爲例。吳瑞雲是五八年入伍的青年同志，表現一直很好，六八年選調給我當秘書。「九一三」後，林彪辦公室和黃、吳、李的秘書都進了中央專案組。總理原有把我分化出來的想法，因此我的四個秘書沒有進中央專案組，由總後代爲審查，這樣總後的造反派就鑽了大空子，對他們進行了瘋狂的迫害。林彪辦公室和黃、吳、李的秘書七五年經毛主席批示就解放了出來，分配工作，我的秘書反而被關到八〇年公審以後。吳瑞雲本應轉業，卻讓他復員，他愛人在北京工作，卻讓他回老家在屠宰場當工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屠宰場認爲吳瑞雲是個不錯的同志，有點文才，就調到科室工作。總後知道這一情況後，派專人到屠宰場批評。屠宰場憤怒了，反問總後來人：「吳瑞雲是你們的人你們帶走，是我們的人，我們有權決定他的工作崗位！」

我們的冤案是個人作用造成的，他們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決定與處理都不是根據事實和政策辦理的，而是以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辦的。所以我們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政策問題。鄧小平爲了政治需要，要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定成死案，這就是說，在他沒有死之前，不要說平反，連鬆動一下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說，黃永勝的死就很能說明問題。

黃永勝是大革命時代參加革命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代名將，中外著名的戰將。我得知他去世之後，立即提筆寫了一篇悼文，現在把悼文記錄在這裏。

哭老戰友黃永勝總長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路光從北京發來電報說：「冬父四月十六日在青島逝世。」噩耗傳來，令人心碎，老英雄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

黃永勝同志闊了十年，患了肝癌，他留在人世的時間不會很長了，這我是能想得到。我異想天開地想過：希望在他去世之前，我們還能見一面！對黃永勝同志之死，祇有淚水為悼了！

我同黃永勝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當然，我們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們的政治生命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刻而「死」的。從政治生命來說，歷史上劉、關、張希望同時而死，未曾實現，我們可實現了！這樣的戰友，確實是少有的。四人幫認定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是林彪的「四大金剛」，後來鄧小平又決定，黃、吳、李、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四大主犯」。不管是金剛也好，主犯也好，苦難兄弟也好，革命戰友也好，黃永勝都是處於「大哥」地位的。

我同黃永勝同志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間，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前在延安偶爾認識的。我們都是七大代表，都住在中央黨校一部。但我們不是一個代表團，原來並不認識。一天，我的小孩患痢疾，我和楊梅生到友人張令彬家裏問有什麼藥沒有？正好黃永勝也在那裏，黃聽到之後，好像對待很熟的老朋友一樣對我說：「我可能還有幾粒痢特靈，是治痢疾的特效藥。」他馬上叫人拿藥去了。

因為我同黃永勝同志是第一次談話，根本不好意思回答他的話，當時也還不習慣說什麼道謝的話。我正在不知怎麼樣是好的時候，拿藥的人就把藥取來了。黃永勝手拿著藥對我說：「這是痢特靈，治痢疾病很有效，但祇有三粒了，估計可以治好你孩子的病。」他就把藥給我了。我祇是回答說：「好、好。」別的什麼話也說不出來。黃永勝自己有小孩，在延安這樣的條件下，能夠把特效藥贈給別人是了不起的，而慷慨贈送我這個初相識的人就更了不起！我接過藥來之後，心裏久久不能平靜。我心想：黃旅長（他當時是教二旅旅長）是一個能誠懇幫助別人的人。他具有我軍高

級幹部典型的優良作風，是值得學習的。黃永勝同志的這種好作風，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在延安同黃永勝同志一面之交之後，四六年六月間我們在熱河承德又見面了。我當時由軍調部北平執行部回到承德，黃永勝任熱遼縱隊司令員。當時冀熱遼分局決定把熱遼縱隊改為熱遼軍區，黃永勝任司令。他建議我任軍區政治部主任，我們就第一次共事了。此後熱遼縱隊改為熱遼軍區，下屬十六、十七、十八三個旅和熱中、熱東、熱北，遼西四個分區。這是準備國民黨軍隊佔領承德後的作戰部署，此後，在解放戰爭期間，我同黃永勝先後七次共事。我們之間，從共事開始，到同時關起來，同時投進監獄，同時受審，同時在鬼蜮世界度日都是親密戰友。現在，黃永勝同志成了一個冤鬼，我還是一個活著的冤犯。我應該留下一篇哪怕是很蹩腳的文字，也要來悼念我親愛的戰友，以表我的哀思！

黃永勝同志是一個有很多優點的領導幹部。擇其要者來說，他就是一個有領導能力，軍事指揮才能很高的高級指揮員，是一個軍政雙全的高級領導幹部。在這裏，我對他不能做全面的評述，祇能談幾個主要幾點。

自願參加革命，英勇奮鬥。黃永勝同志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到武昌中央國民革命政府警衛團當兵。警衛團內有很多共產黨人。他去當兵是為了謀生，但從當兵開始就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到警衛團就成了革命戰士。一九二七年秋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了秋收起義並上了井岡山，成了中國工紅軍最早的部隊之一。警衛團出了一批紅軍高級幹部，黃永勝也是「井岡山的同志們」之中的高級領導幹部之一。

上井岡山的時候，黃永勝還是一個班長。後來在中央蘇區幾年的鬥爭中，他由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一步不缺地當到了師長。黃永勝在江西瑞金，還當過軍委特務營營長保衛中央，日夜與毛主席相處，很年輕的時候就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教導。



黃永勝總參謀長。

中央蘇區的部隊並不很大，當過師長的也不多。黃永勝當然是紅軍中最為先進，最有能力的人物之一了，否則就不能成為年青的師長的。

黃永勝上井岡山的時候，武昌的形勢是比較混亂的。他是湖北咸寧人，離家不遠，地理人情都很熟悉。如果沒有自願革命，自願上井岡山，自願當紅軍的決心，他是很容易溜回家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能夠走上革命道路是十分可貴的。他革命的世界觀，在年輕的時候就確立了。

在革命隊伍裏，黃永勝是努力學習的。他參加革命後，能夠得到黨的器重，固然有時勢造英雄的一面，但與自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六十年代初，羅榮桓元帥在談到高級幹部的優缺點時，其中就說到黃永勝。羅說：「黃永勝是武昌警衛團的，我們一起上井岡山。這個人有很多優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對工作很努力，不甘落後，打仗勇敢，同群眾關係很密切。當然他也有缺點，沒有缺點不是更好嗎？這是不可能的。沒有缺點的人是沒有的。」羅對黃永勝的評價是正確的。

一九三三年，在江西中央蘇區，黃永勝當團長時，他作戰勇敢，屢建戰功。為此黃永勝被授予紅星獎章一枚。當時，能得到這種獎章的人是很少的，這是黃永勝歷史上的重大光榮。據說這種獎章不僅榮譽很高，而且還可能「保命」，當時有不成文的規定：獲獎人如果犯了殺頭之罪可以降罪一等。一九五五年黃永勝授上將軍銜，還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這是黨和人民給他的最高榮譽。可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冤案中，黃永勝所得到的是重刑，即十八年有期徒刑！

「討飯」過草地，艱苦奮鬥 黃永勝同志吃過的苦，同紅軍、八路軍、解放軍、抗美援朝志願軍是一樣的多，一樣的苦。他一生的經歷，主要是艱苦奮鬥。

在共同的艱苦奮鬥中，黃永勝同志還吃過特殊的苦，長征過草地就是一例。差幾天就要走過草地時，發生了預料之外的情況，他的坐騎陷到草地裏去了，糧食、行李全部完了。當時，要得到補充供應是不可能的，怎麼辦？祇好將警衛員、飼養員兩人的口糧三人吃。這是無論如何不夠吃的。由於黃永勝人緣好，他的許多戰友都寧願自己少吃一口「救濟」他。就這樣他沒有餓死在草地裏。

黃永勝在中央蘇區，從當團長起就騎馬。長征開始後不久，他當時在一軍團，部隊減員很大，祇有縮編了，補充一匹牲口並非不可能，他是一個顧全大局的人，從「騎馬」變為自己走了。黃永勝同志過草地，基本上是步行的。後來一軍團的部隊打敵人騎兵，繳獲了一部分牲口，黃永勝才又有乘馬。

傑出的軍事指揮員，我軍的名將黃永勝同志是真正身經百戰的指揮員。在他一生的戰鬥生活中，打過的大小仗數以千計。他的指揮才能是全軍聞名的，熟悉他的人都稱他「黃忠老將」。這裏僅記述他在解放戰爭中的三個典型戰例。

第一個戰例，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東北錦州以西的第二次楊杖子戰鬥，是運動戰的典型。

當時，國民黨四十九軍，剛從江蘇北部增援到東北來。敵軍在葫蘆島登陸後即奉命掃蕩錦州以西地區，確保北寧路運輸線。我縱開始得到的情報是敵軍祇有兩個團出來那掃蕩，軍長王鐵漢率軍主力在錦西未動（戰鬥打響了兩個小時東北軍區才更正為敵人是兩個師各欠一個團）。我縱決心消滅出面之敵，戰鬥在楊杖子西南打響，經過七小時的戰鬥根本打不動。敵人不進也不退。我縱在數量上佔優勢，但火力很弱。當時，除本縱隊三個師外，還指揮冀察熱遼軍區一個獨立師。部隊的裝備，除了少量的迫擊炮和六〇炮之外，就是步槍和手榴彈了。我們對敵人的陣地多次攻擊也攻不動。我軍決心在黃昏時，撤出戰鬥，班師向北撤退，再尋找戰機。撤退命令下達後，黃永勝和我及參謀長黃鶴顯在指揮陣地上戲耍，搶香煙抽。就在此時，敵軍猛烈的炮火向我指揮所射擊，在我們跟前不到兩三米的地方就落了一發炮彈，但我們命大，那發炮彈是瞎火，我們三個人，都祇落得一身灰，並未受傷。黃永勝還沒有拍乾淨身上的灰塵，點燃一支香煙就哈哈大笑地說：「我們都沒有見馬克思。」但他對此時敵人炮火猛烈射擊，又有所思。此時四個師的指揮所同時報告：「敵人的小分隊向我出擊。」根據上述情況，黃永勝立即判斷：「敵人要撤退，是假進攻。我軍要力爭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黃永勝對敵情的判斷和決心，完全正確。一小時左右敵人果然開始撤退了，但我縱各作戰部隊已經奉令撤出戰鬥，電臺拆線了，電話收線了，現在又要部隊調回頭去追擊敵人，遇到難於解決的通信困難。黃永勝陷入了沉思，就在此時，我說：「現在立即集合司令部、政治部的科長，每人手拿縱隊首長的親筆命令，分頭出去傳達，所有部隊都要執行追擊殲敵的任務，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我現在立即到

先頭師去。」黃永勝聽到我的話之後，把手上正抽的香煙向地上一摔說：「老邱，你的意見好極了，立即照辦。」這一招做對了。很快全縱所有部隊都轉為追擊了。我們縱隊部警衛連，除留下兩個班外，也參加了追擊。在追擊戰中取得了重大戰果，敵軍兩個師（各欠一個團）、一個軍部，全部被殲滅，共殲敵兩萬餘人，敵軍長王鐵漢祇帶幾百人逃跑了。這是東野殲敵過萬人的第一仗。

第二個戰例，一九四八年九月遼瀋戰役中，瀋陽以西新民的車家窩棚戰鬥，是阻擊戰的典型。

東北軍區決定攻打錦州之後，全軍區主力向遼西開進。長春到瀋陽之間祇留下一個主力縱隊（六縱隊）和一個新編起來的縱隊（十二縱隊），準備殲滅長春可能向瀋陽逃跑之敵。我軍開始攻打錦州時，瀋陽之敵廖耀湘主力兵團（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向西出擊援敵錦州。錦州被我軍攻佔後，四野總部決心在瀋陽以西，錦州東北地區，殲滅廖耀湘兵團。

這一戰鬥的關鍵問題是阻止敵人西撤龜縮瀋陽。為此，總部命令六縱隊司令員黃永勝並指揮十二縱隊，急行軍星夜兼程南下，擔任阻擊廖耀湘兵團西撤的任務。

黃永勝向來執行命令是堅決的。他率部按命令規定的時間還提早一點到了指定的新民地區後，偵察員報告拒流河以西敵人有佔領鐵橋的企圖，他立即想到敵人有東撤瀋陽的企圖，現在關鍵問題是搶佔拒流河鐵橋，於是就命令縱隊先頭師，即該縱主力師第十六師立即搶佔拒流河西岸，並炸鐵橋。六縱副司令員兼十六師師長李作鵬同黃永勝的看法一致，他帶領先頭部隊猛插拒流河以西鐵橋附近的車家窩棚。我軍是一邊作戰一邊構築野戰防護工事，在我軍還立腳未穩的情況下，廖耀湘兵團東撤的先頭部隊就到了新民以東地區，都是主力對主力的戰鬥，都是成功或失敗的戰鬥，敵人搶佔不到鐵橋，退不回瀋陽就必遭殲滅；我軍不能阻止敵人東撤就不能殲滅敵人。因此，鐵橋的爭奪戰和反爭奪戰的就開始了，戰鬥打了將近兩天兩夜。在我軍的歷史上，這次戰鬥的激烈程度和傷亡之大，都是空前的。

六縱隊的阻擊戰是遼瀋大會戰全部殲滅廖耀湘兵團的關鍵。由於阻住了敵人，爭取了時間，打錦州的部隊極大部分都趕上了。車家窩棚阻擊戰的勝利，首先是戰場指揮的決心完全正確，其次是部隊英勇作戰，不怕傷亡，再就是部隊各級指揮員高超的指揮。黃永勝，李作鵬的指揮，阻住了廖耀湘兵團東撤瀋陽，對遼西會戰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個戰例，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戰役，這是攻擊戰的典型。

天津戰役是「甕中捉鱉」，沒有敵情顧慮，照著上級的命令打就行了。指揮員的組織指揮才能，最主要的是減少自己的傷亡。黃永勝充分發揮了自己的作戰經驗，對戰役進行了細緻的組織指揮。天津城外都是開闊地，沒有任何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在戰役準備階段，最主要的是改造地形。黃永勝命令部隊從東向西挖戰壕，並且要挖「之」字形的戰壕。這樣就能夠接近敵人城牆，進行突破。在戰壕挖好後，還要進行適當的訓練，使部隊能比較熟練地進行各種戰鬥。

天津戰役，我們八縱隊與七縱隊在東面的東局子、民權門並肩攻擊。二月十五日早上八時發起攻擊之後，我軍很快就突破了敵人的防線，但發展很慢。就在此時，黃下決心，將總部配屬我軍的三輛坦克用於擴大突破口作戰。結果發現敵人的防護工事是雙層的，就像舊城市的牆有內外兩層一樣，內層是主要防護陣地，這種防禦工事，過去是沒有見過的。查清情況後，黃永勝立即命令攻擊部隊轉為陣地防護，並立即使用預備隊另開突破口。因為除了民權門之外，其餘的地方可能都是單層防護，我們很快就突破了敵人的防線，並向縱深順利發展。黃永勝解釋說：「民權門的防護，不僅工事堅固，地段也比較寬，另開突破口，地段比較窄，工事也可能不會那樣的堅固，容易突破。」這樣我縱隊三分鐘就突破了民權門，黃永勝的判斷和決心都是正確的，我們勝利地完成了作戰任務，減少了傷亡。有經驗的指揮員，才能起到這種作用。

黃永勝同志除了是一個好的指揮員之外，也是個好的領導幹部。例如，他組織觀念很強，特別是對毛主席，林副主席感情很深，對人誠懇熱情，堅持原則，不怕打擊。

黃永勝同志在歷史上受過不應有的打擊。五二年的「三反」運動就是一次。在那次運動開始時，中南軍區（中南、華南軍區尚未合併之前）領導中就有舉足輕重的人，主張把黃永勝搞倒，抓住他「大手大腳」「愛花錢」的問題不放，華南軍區不同意，一直頂住。愛花錢屬於浪費，並非貪污。遵照中央的政策，浪費是屬於批評教育問題，不是打倒的問題。黃永勝這個浪費，其實也是為別人而「浪費」，解放了，大量幹部回家探親，當時機關有規定，師級幹部每人發 60 元，這些幹部不夠就去找黃永勝求情，黃認為這些幹部離家二十多年了，第一次探家要有點革命勝利光榮回家的味道，幫家裏修修房子，添些農具都在情理之中，他出於對下級的關心，來者不拒，總是多批些路費，這樣機關對他有意見。當時華南軍區的主要領導人葉劍英在外地休養，整個三反就是我負責。我頂了兩個多月，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陶鑄來到了廣州。陶完全支持我的意見，我就對中南的意見頂得更緊了。不久，中央派公安部長羅瑞卿來華南檢查三反運動。我單獨向羅匯報了中南軍區準備打倒黃永勝時，羅當即回答說：「完全是胡來，我相信陶鑄同志也會同意我的意見。我馬上就向毛主席請示報告。」第三天上午羅就告訴我，毛主席批准了，「確保黃永勝同志過關」。當天晚上，華南軍區召開幹部大會，羅瑞卿以中央檢查團團長的身份，陶鑄以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幹部大會上講了話，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黃永勝的問題徹底解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黃永勝同志堅持原則，堅持鬥爭，頂住了江青一夥一次又一次惡流。黃永勝剛來北京不久，江青就說總長選錯了。他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期間和在總參謀長的崗位上，根本不吃江青那一套，中央文革江青一夥企圖插手軍隊，搞亂軍隊根本不能得手，黃對穩定軍隊、加強戰備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過去奪取政權的「武戰」他是英雄、戰將，立了很大的戰功；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戰」，又立了新功。在半個世紀的革命

鬥爭中，他是一個立下很大功勞的高級領導幹部！

在反毛主席的惡浪中，少數別人有用心的人把黃永勝推上了反毛主席的審判臺。他在這場特殊的鬥爭中，頭腦是清醒的，看透了問題的本質，

沒有被法庭利用為反毛主席的工具，寧願自己認，也不往毛主席、周總理身上推。他在法庭上做了很好的鬥爭，我對他甚為佩服和尊敬！

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禮堂，在受審判退場結束時，我們有機會互相看了一眼。我看到了黃永勝同志走路都很困難，背是駝的，小步向前走，真是可憐極了，可是他精神很好，沒有被壓倒。當我們兩個人的視線相交時，他的表情還是同當年一樣：先微笑後說話。不過這次我們互相「說」的話，沒有聲音就是了。但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見！我們是在「自己」的法庭上永別的！

老戰友，親愛的黃永勝同志，你是帶著傷疤，又是光著「身子」去見閻王的。

半個多世紀革命的光榮歷史一筆勾消了，什麼也沒有了，連勳章也被剝奪了。但歷史是任何人都勾消不了的，人民會永遠紀念你的！

老戰友，親愛的黃永勝同志，你死是默默無聞的。老革命，老幹部，老功臣為革命而死了，什麼也沒有得著，不僅在報紙上沒有得到立錐之地，連花圈也沒得到一個。但人民在讚頌你一生的功績。



胡敏拜見黃永勝陵墓。

老戰友，親愛的黃永勝同志，你自己走路去見馬克思的，沒有人給你送行，也沒有人給你發一個錢的「路費」。這不要緊，你所經過的地方，人民會熱情歡迎你，很好招待你的。你到「家」時，你的老戰友，老同志，老上級會熱烈歡迎你的。毛主席、周總理、林副主席一定會同過去一樣，立即接見你的！

安息吧！親愛的黃永勝同志。我會永遠悼念我的老戰友黃永勝同志！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晚於西安



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說幾句閒話

實事求是地說，剛剛發生「九一三」事件時，我心裏是非常震驚的，意想不到。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怎麼坐飛機到蒙古摔死了？！正因為我們當時知道毛主席和林總對文化革命，對江青、張春橋有不同看法。我們既是林彪的部下又是反對江青的，所以，「九一三」之後，毛

主席給林彪扣上什麼樣的帽子，編造什麼樣不實的話，我們當時沒有多想，更何況我們很快就被關起來了，也沒有條件和權力去爭辯什麼。

現在，「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對於主席、對於林彪、對於總理、對於文化革命，我心裏是清楚的。但是到目前為止，在我黨的政治生活中還是不願意清楚的。其實，歷史已經讓「九一三」事件基本清楚了，再捂、再蓋、再說假話也就沒有太大意義了。人民解放軍廣大幹部，尤其是數以十萬計以上受冤枉、受株連的人，是希望黨能對「九一三」事件有一個實事求是的、公正的結論，對他們落實一點政策，使他們不要再過著家破人亡、極度困難的生活。何況，眾多受冤枉的人也快死光了。

有幾點看法留給後人，我想是有益的。

一、說林彪發動反革命政變、謀害毛主席，一直沒有證據，仍堅持原結論，這是不合法理。事實已經證明，黃、吳、李、邱是沒有搞政變的，即沒有參與「兩謀」（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所謂的公審，也只是在起訴書中給我們戴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帽子，審判時根本就沒有審這個問題。另外，林彪究竟和誰在搞政變呢？！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待命或緊急戰備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一艘軍艦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待命或緊急戰備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軍艦，這算搞什麼名堂？難道林彪祇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況且政變是為了活，而不是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的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為了把自己搞死的兒戲。目前還堅持這個說法，這就是不合情理。

二、說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就是叛國，這種結論是不對的。叛國有其定義和內容，並不是大人物說什麼就是什麼。批彭德懷的時候也說彭總「裏通外國」，其實也是亂說一頓，可是那些骨幹分子硬是堅持說彭總「裏通外國」。這些骨幹分子都是當時職務、地位比我們高很多的人。

三、林彪有政變或沒政變，林彪叛國或沒有叛國，都不能說文革中產生的錯誤，發生的問題都是林彪造成的。也就是說，那個《關於健全黨

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講的，文革是好人毛主席發動的，被壞人林彪利用了，壞事都是林彪幹的，是犯罪；毛主席在文革中是犯錯誤；周總理是不得已做了違心的事，而不是犯罪。比如毛主席說，「二月逆流」、「楊、余、傅」事件、賀龍的問題等等都是林彪搞的，這是不對的。我們是過來的人嘛，這些事情都是毛主席做主搞的。

四、根本不存在所謂「林彪反黨集團」（後又稱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不要說林彪領導我們搞「反黨」，搞「反革命」，其實，林彪幾乎都沒有領導軍委辦事組幹過什麼具體工作，林彪對所有文件的批示，無論是中央的、地方的、軍隊的都是在毛主席批示後他才劃圈或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這樣無作為的話；而軍委辦事組也從來沒有給林彪單獨打過報告，軍委辦事組所有的報告，不論是作戰的、訓練的、部隊調動的、幹部任免的等等，都是報主席、林（副主席）、總理、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的。在這裏我要說林彪，說毛主席一些「難聽」的話。對林彪來說：林彪在文革開始是不想介入的，他知道毛主席要搞劉少奇，也深知毛的謀略，因此，他不想從大連回來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硬是被主席幾次電話叫了回來。文革初期林也說過頌揚毛主席，頌揚文化革命的話，但隨著文革的發展，混亂加劇，黨和國家嚴重受損，對毛主席的搞文革的一系列做法，對毛主席重用江青一夥，林彪有了看法。但他不說，對我們也從未說過毛主席半句不是（他心裏明白，我們是因為林擁護毛主席才擁護他的），他用「主席劃圈我劃圈」的辦法來應付，對我們也就是說「照主席指示辦」，「要堅決支持總理工作」這樣的話。實際上，林已經對文革「開小差了」。比如說，像三支兩軍這樣的工作，林彪從來也沒有像打仗那樣，指示什麼什麼部隊到哪裏執行什麼任務，什麼什麼幹部到哪裏完成什麼使命，林彪這個主持軍隊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根本沒有具體管過三支兩軍工作，三支兩軍工作一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手上，對軍委辦事組祇是操辦他們的決定而已。毛主席軍權在握，調動一個排都要毛主席批准，任命一個軍級幹部也必須毛主席批准，毛主席還對軍隊「締造的還不能指揮呀？」耿耿於懷，真是搞不明白。對主席來說，當時我們對主席是無限熱愛的，熱愛毛主席和熱愛黨是一體的，主席的指示就是黨的指示，主席在我們心中最崇高的。但在實際工作中，在主席處理的一些具體人和事中，尤其從主席對江青的態度中，我感到主席也有私

慮、私爲，這是非常痛苦的事，但當時想都不敢深想，更不要說去找誰傾訴了。比如說。主席是很看重看好軍委辦事組的，但主席又有他很大的私心，他想把軍委辦事組拉在他的手上，並希望我們去遷就江青、維護江青、支持江青，爲此主席多次拉黃永勝，可黃永勝不爲所動，這不是說黃永勝不願意離開林彪，而是沒認識到主席的用意，毫無「悟性」。黃永勝把毛主席、林彪、總理，看成是黨中央這個集體的領袖，而軍委辦事組是爲黨中央工作的，爲黨的事業工作的。再有黃永勝對江青的人品特別反感，根本不可能搞到一起的。尤其是汪東興多次向我們講「毛和江完全是兩回事……頂她怕什麼！」因此，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抵制江青一夥的錯誤是很堅決的，支持總理的工作也是很堅決的。試想，如果毛主席拉動了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並和江青一夥結合起來，那黨和國家的歷史就要改寫了。林彪、總理在主席那裏就是螞蟻一樣了，輕易就可以捏死。這一步難以實現，林彪是障礙，黃永勝是障礙，軍委辦事組是障礙。「九一三」之後，林彪死了，軍委辦事組倒了，主席就隨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證明，批周公就是證明，把第二號走資派拿出來就是證明，十大王洪文、張春橋、李德生都當了常委就是證明。

我想，以上這四個問題解決了，林彪的問題也就基本迎刃而解了。

第四十五章 全家株連

母親餓死在醫院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關起來之後，全家人先後都受到了嚴重株連，甚至連出生未滿月的孫女都無一倖免。我的母親活活餓死了，十三歲的女兒無家可歸，最後趕出北京。

七二年三月八日八十高齡的老母親活活餓死在解放軍總醫院。我的母親是我國農村貧苦勞動婦女的典型，勤勞一生。一九二八年，我們家鄉就開始了蘇維埃革命，當時，我爺爺是高興區長逕鄉土地委員會的委員，我父親是墩丘村土地委員會的委員，我哥是赤衛隊長，我自己是村兒童團副團長，我母親是婦女運輸連的排長，是蘇區土地革命時期，最早參加農村革命的基層幹部。我的家庭是革命之家，三代同堂幹革命！

一九三四年，紅軍撤離江西長征，國民黨軍隊立即進攻江西蘇區。國民黨軍隊用了很大力量修建公路，公路修到我的家鄉時，隨國民黨軍隊回來的地主還鄉團，指定要拆我家的房子取木料修碉堡。我的母親性格很剛毅，同拆房的敵人展開了鬥爭，被打得全身是傷，暈倒在地上。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家當時三代老小五口人祇能棲身在山洞裏。我的父母一直在苦難中受煎熬。

全國解放後，第一次見到母親時，望著她清瘦的臉，我非常難過，她卻笑著說：「我相信紅軍一定會勝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因執行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遭到了多次揪鬥，上海二醫大「紅縱」並不就此罷休，竟然跑到我的老家和當地造反派勾結在一起去殘害我的母親。

造反派在我老家，從室內到室外的所有牆壁上，院子裏都貼滿了大字報，甚至樹上都掛滿大標語，然後，即向我母親宣佈了三條

一、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已由造反派實行革命專政。

二、這裏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的老巢，應當徹底摧毀。

三、造反派有權處理邱會作老家的一切問題。

我的老家自有革命歷史以來就是軍屬、烈屬之家。鄉親們、鄰居們對我的家向來都極為尊敬。除了國民黨和還鄉團搗毀過我家外，去我家的都是鄉親們和回鄉探家的老革命。他們路過我家時，都到我家去看看我的老母親，就連公審時審判我的副廳長黃玉昆也去看過我母親。造反派搗毀和抄家真是禍從天降！

我的老母親跑到院子裏和造反派論理，老母親話音未落，一個個子高大的造反派一腳把她踢倒在地，母親即不省人事了。母親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成了一個瘋癲病人。一九六八年秋天，組織上把母親送到北京來治病。

「九一三」之後，總後的造反派同總醫院的造反派共同對我母親下毒手，他們首先把我母親搬出病房，搞到一個簡陋的小房子中，在房門上還特別張貼了什麼「通告」之類的東西：「對黑幫家屬，自即日起取消特殊護理。不准家屬探親」，停醫、停藥、停食，「九一三」之後不到半年，母親於七二年三月十八日離開了人間。

周總理知道我母親去世後，派人來瞭解過情況。總理對李德生還說過：「邱會作母親是紅軍的老根子，整死她幹什麼啊！」



邱會作的母親。

老伴受到殘酷至極的迫害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們被抓起來時，總理專門對我們說：「你們聽好，你們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閃失，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實，沒過幾天，我們幾個人的老婆、孩子、親屬和秘書、司機、警衛員都抓起來了。總理已經不能控制局面了。

從七一年的「九一三」到八一年，我的老伴胡敏受到關押、管制、監督勞動，歷時十年有餘，在落實政策的過程中，又受到總後掌權的造反派的嚴重迫害，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十多年胡敏都是在苦難和殘忍的折磨中苟延下來的。

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對我採取停職審查措施後，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家被衛戍區的部隊接管了。九月二十六日，我的炊事員被調走。國慶節前，中央辦公廳賴奎等人對我家和我的辦公室進行了搜查。九月二十七日，胡敏的管制組住進了我的家，胡敏同外界完全隔絕了，從此就失去了自由。十月六日，我的大兒子路光從家裏被抓走。接著，胡敏被押送到豐臺倉庫附近關起來了，對胡敏立即採取了突擊審訊的措施。

「九一三」之後，周總理指定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余秋里兼管總後的工作、國防工業和軍事外援。正是因為這種關係，余秋里就參與了審問胡敏。余秋里、李震、郭玉峰三人代表中央專案組曾經多次審問胡敏和誘供。比如，余秋里說：「我和邱會作的關係是很好的，過去我們是革命的關係，但他現在要殺毛主席呀！你必須揭發他，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你祇要很好交代，是一定會有出路的。」

專案組逼供、誘供，完全採用了造反派那一套「土辦法」對待胡敏。無非是「車輪戰」，有時一天二十四小時，胡敏滴水不進。

在胡敏心中，毛主席和黨是遠遠高於我的，但她肚子裏的確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問題，她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調總後司令部工作，對我工作上的事，她確實知道不多。她所知道的事，即使是我同她個別講的事，她也都交代了。但千說萬說也說不到「兩謀」問題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八月，胡敏被關押在中央專案組設在北京西山八大處亞非學生療養院的臨時監獄。在那裏度過了七個年頭的監獄生活。

進了監獄，胡敏就編爲第六號，從來不叫她姓名。監獄生活是很殘酷也很單調的，有戰士日夜嚴格監管。完全與外界隔絕。

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吃不飽。監獄規定：飯食多了，不准退回，不准留下，一定要吃掉，即使吃不了也硬要吃掉。爲了遵守規定，有時主食要多了一點反而誤事，吃不下也有人看著，硬要往肚子裏塞。爲了不受脹肚噁心之苦，胡敏領飯食的時候，就寧可要少點也不敢多要。這樣又常常吃不飽，就祇有喝開水充飢。

「準時」睡覺起床。監獄規定：每天六時起床，晚上九時睡覺。在規定的時間內，遲早幾分鐘都不行，要是違犯規矩，都得重來。例如，早睡五分鐘，看管的人要逼著起來，把衣服穿好，可剛剛穿好衣服，甚至還沒有穿好，睡覺鈴響了，看守人員又叫立即脫衣服躺下。同樣，早起幾分鐘也是不行的，必須脫了衣服上床再睡下，剛一上床，起床鈴響了，又必須立即起來。這並不是嚴格按時作息，而是不把囚徒看成人，隨心所欲要弄人就是了。除睡覺、起床要按時之外，拉窗簾的「規矩」也是特別嚴格。晚上睡覺，一定要先拉窗簾後開燈，早上一定要先關燈後拉窗簾。如果沒有按照規定的程序做，除了重來之外，還要受嚴厲的訓斥。

黃、吳、李、邱的夫人，都遭到同樣的迫害，沒有起碼做人的尊嚴。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多得難以想像，審查的範圍也是無邊無際的。凡是同邱會作和胡敏有過關係的事和人，凡是去過我們家的人，都在審查之列。

一九七八年八月，匆匆忙忙給胡敏下了一個三開除（開除黨籍、開除軍籍、開除公職）的結論，趕出北京，押送到陝西大荔縣農場監督勞動。作爲一個自小參加革命的共產黨員，對黨組織無限忠誠和信任，她含辛茹苦地等待組織的結論，卻鬧了一個三開除和監督勞動的下場。不僅如此，關了七年，家破人散，連家人和子女的音信都沒有。

一九七八年八月，胡敏被押送到陝西渭南地區大荔縣農建師六連勞動改造，在那裏勞動改造將近四年。胡敏幼年參加革命，她自己並沒有什麼錯誤，因爲受我的株連，從囚徒又變爲勞改犯。

胡敏在農場管制勞動，分給她一個約六平方米的房子，房子是土地太潮濕，蟲子、老鼠太多，晚上，蜘蛛和蟲子常在面部及被子上爬，整夜無法入睡。

胡敏到大荔的頭一年，每月祇給生活費四十元，困難的程度可想而知。胡敏是一個極為堅強的人，也是一個克勤克儉的人，她自己養了雞，把雞蛋留起來等待子女們來看望時吃，也攢了幾斤大米留給子女，可是子女去時，雞蛋早變臭了，裝米的袋裏有一隻脹死的老鼠。

由於長期的關押，精神上巨大的壓力，再加上惡劣艱苦的生活環境，使胡敏心臟病、腿腫、哮喘常有發作，最重要的是，免疫力急劇下降，她全身各處得了白癜風病，本是一個白白淨淨的人，竟被摧殘到如此地步。

在農場一段時間之後，連隊的基層領導幹部和工人，對胡敏給予了人道主義的關懷。得到了大家的幫助和照顧，生活上的困難和痛苦也就減少了一些。胡敏對六連的幹部和工人是很感激的！

一九八〇年冬，當時的中紀委書記黃克誠就向中央提出了報告，認為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個人老婆的處理是錯誤的，要進行複查，重新處理。中央批准了中紀委的報告。

一九八一年七月間，胡敏回到了北京。在公安部招待所，公安部門的負責人當著總後的幹部和胡敏本人宣佈：從現在起，胡敏就不歸公安部管理了，還是總後的幹部。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胡敏政治上的問題由總後複查處理。本來，重新複查是一線希望，可又落入總後的「虎口」，反而使胡敏更加災難深重，當時總後操縱複查的是副政委李耀，一九八三年，總後黨委對胡敏的「複查」結束，結論是：開除黨籍，撤消職務，降為地方十五級，安置到西安市與邱會作一起生活。這個結論比「四人幫」時期下的結論還有過之。我還在服刑期間，胡敏怎麼能和我生活在一起？而且總後並沒有安排具體單位管理胡敏，那時的供應是以「票證」為主的時代，胡敏沒有任何副食票證和補貼，沒有烤火費，沒有公費醫療等等，一切都沒有，祇是在北京的兒子在總後按地方十五級每月領一百多元的工資。發放工資的人都感慨地說：「胡敏還沒有辦理離開軍隊的手續，她還應該享受軍隊的待遇。胡敏按軍人吧，沒有軍人的證件，按地方吧，沒有地方的戶口。」八一年起胡敏就等於是流浪在西安，變為

無人過問的「黑人」了，她從一個強制勞動的「勞改犯」，變為無人管理的「流浪者」了。

胡敏為什麼會受到那樣殘酷的株連？對這個問題從黨的政策來說，是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也不能得到回答的。因為株連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也是根本違犯黨的政策的。

關於胡敏同志所犯錯誤的結論和處理意見

總後司令部常委：

(82) 司黨字 28 號《關於對胡敏同志結論和處理的報告》，軍紀委 1983 年 5 月 19 日，(1983) 軍紀委復字第 60 號批復：同意對胡敏所錯誤的審查結論，決定開除其黨籍。撤消原中央專案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關於胡敏的審查結論》，其它處理，根據審批權限，由總後決定。

對胡敏的其它處理，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總後黨委決定，給予撤消總後司令部辦公室主任職務的處分；定為行政十五級（自結論批准日起按地方行政十五級發給工資，以前工資不再補發）。退出現役辦理退休，安置到西安市與邱會作一起生活，其政治生活按縣團級待遇。

中共總後勤部黨委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胡敏真正的錯誤是爲葉群家「選美」跑了不少腿。「選美」是極壞的風氣，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應當誠懇承認錯誤，接受教訓。當時，爲葉群家「選美」的高級幹部老婆不乏其人。正因爲這是一種壞風氣，中央紀委黃老就說過：「選美是工作關係，不是搞政治陰謀。」儘管如此，對「選美」胡敏從來也沒有推脫過自己的責任，早已向中紀委、軍紀委做過檢討，承認錯誤，並且認識到「選美」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之，胡敏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選美」有錯誤之外，其他方面根本沒有什麼錯誤。因「選美」問題對胡敏進行批評教育，甚至給予黨紀處分是可以的，但對胡敏給予「三開除」的處理，就是典型的株連！

其實，總後對胡敏的結論，與對我的「公訴」除文字上多少有些不同之外，綱目、基調、內容都是一樣的。幾乎每件事，都是從我的頭上搬過去，即是把對我的問題的帽子，戴到胡敏頭上去的。加到我頭上很多都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又加到胡敏頭上就是雙重冤案了。

從八一年下半年開始，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裏，總後司令部辦案人員祇裝模作樣地對胡敏做過兩次很短的談話，每次談話之後，胡敏都有很多意見要說，但都被拒絕了，胡敏根本就沒有申明的機會。祇要對審查稍微提一點異議，就會立即被指責為「態度」不好、「對抗」、「翻案」等等，總後司令部有一個姓閻的參謀，是胡敏的審查人員，經常是謾罵，吹鬍子瞪眼訓胡敏。每次談話之後，即向胡敏宣佈：「沒有通知不准到北京來，即使來了也不接待。」八二年在西安又向胡敏宣佈：「結論就這樣了，你不接受是你的態度問題，不是結論本身的問題。你不接受，照樣可以給你做結論。沒有命令，你不准到北京去。」在「結論」中，還指出胡敏「態度」不好，因而加重了處罰。

總起來說，對胡敏的審查和處理不是把她當做一個老幹部，把問題搞清楚，實事求是地做出正確的結論，而是把胡敏當做「反革命主犯的老婆」，任意進行株連。

胡敏早在三六年就參加了西安地下黨領導的革命工作，三七年即由地下黨送上前線參加了八路軍。胡敏是抗日戰爭之初，有名的西北抗日醫療隊上前線參加八路軍的隊員之一。她三九年入黨，一直從事醫務工作，為人民解放事業積極工作，做出過自己的貢獻。

對胡敏的處理，對黃、吳、李、邱四位夫人的處理，對黃、吳、李、邱老戰友、老部下，甚至秘書、工作人員的處理，由於造反派在軍隊三總部、海空軍掌了權，偏離黨的政策是很遠的，大部分同志仍然是開除黨籍，降級降職，轉業復員。為此，中央再一次指示複查，落實政策。軍委張震副主席、國防大學段蘇權政委等老戰友對胡敏的複查問題進行了真誠的幫助。為了複查的公正性，不少單位都換了人，可總後還是原班人馬。好在總後黨委已經換了班子，在審查中，決定恢復黨籍，對胡敏的不實之詞也有所糾正，總後黨委也將結論上報總政。由於胡敏對某些問題堅持自己的意見，讓專案審查人員找到了借口，說胡敏態度

惡劣，拒不認錯，他們又鬧到總政。在黃、吳、李、邱四位夫人中，相對來說胡敏事最少，錯最輕，最後反而對她的處分最嚴厲。

五個子女無一倖免

我有四個男孩，一個女兒，五個孩子無一不受到株連。我的大兒子一九六七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學院，二兒子畢業於清華大學，畢業後他們都分到部隊鍛煉去了。兩個小兒子分別於六七年、六八年參軍，在基層也都提拔為幹部。他們在部隊，思想、工作等各方面都表現很好。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之後不久，四個孩子都被先後被關押、株連，最後一律清除出部隊了！

我的大兒子路光，在文化革命中是學校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等人的骨幹。路光畢業以後，原北京工業學院軍宣隊收集到路光大批反江青、反中央文革的「黑材料」寄往部隊，被部隊頂住。「九一三」之後，軍宣隊又將路光告到江青那裏，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將路光抓回北京關押，由總後負責審查，一關就是三年。而後又以「闖進釣魚臺，欲謀殺江青」的罪名，關進北京第一監獄，在那裏上了刑具，留下傷殘，經受了非人的生活，一關又是三年。

一九八〇年，經過近十年的磨難，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見面，共同寄住在向朋友借的僅十平米的平房內。



一九七六年，路光被武裝戰士押送到甘肅河西走廊祁連山下的山丹軍馬場監督勞動。總後的造反派指令軍馬場成立了一個對路光六人監督小組。路光是強制勞動，常常是超負荷的。例如，搬運青稞麥麻袋，每袋 160 斤，從踏板裝上汽車。他每月祇有 9 元錢的伙食費，他又不能吃牛羊肉，嚴重的營養不足，身體被折磨得不成樣子。路光在軍馬場勞改了三年，真正成了一個勞改犯。

在中央專案組審查的人如林辦的秘書，黃吳李的秘書，及黃的子女，七五年在毛主席的批示下都解除審查，重新分配了工作，而由總後代管的路光，從七一年到七八年，總後對路光審查了將近八年，那時「四人幫」已經垮臺，他們認為：「攻擊中央文革，攻擊江青，不予追究，但仍有攻擊社會主義的嚴重問題，送回原部隊處理」。把人關押勞改折磨了八年，就送回部隊處理了之，這真是草菅人命的典型。

一九八一年，部隊決定路光轉業。他是從北京入伍的，按照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有關規定，理所當然轉業到北京市工作。但軍隊轉業辦公室不准路光回北京，硬要他「回到」我的老家江西興國縣去，這是毫無道理的。路光祇能復員回到北京，後來在萬里副總理、北京市副市長葉子龍和商業部副部長張永勵、趙發生及邱國光副司令等老戰友的關心下，才把路光安排在北京商學院工作。由於路光是復員回來的，到了商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學院不能承認他原來的行政十九級的級別，給他定行政二十二級（降了三級），每月 60 元工資，生活極為困難。路光在商學院已經工作四年，但轉業手續都沒有恢復。由於白天要上班，對自己的事祇有在工作之餘奔波，不幸遭車禍，骨折八處，幾乎喪生。在困難無告之時，一九八八年趙紫陽總書記對路光的來信作了批示，恢復了行政十九級，並分配了住房。「做一善事如造七級浮屠」，我永遠感謝趙紫陽總書記對路光的關心。

溫玉成是我的老戰友，又是興國老俵，關係一直很好。但溫玉成到北京後，不知爲了什麼，一頭栽向江青。在文革打小報告盛行的時候，他向中央文革告了我三狀，其中之一就是有關程光在清華參加文化革命的問題。溫給江青打的報告說：「清華兩派之所以鬧得很厲害，邱會作的兒子邱承光是該派的重要成員，邱本人是 414 派的後臺。」這是純粹捏造事實的報告，承光哪一派都沒介入。幸好這個報告江青轉給黃永勝了。黃永勝知道底細，當天他就要我一起去向周總理把問題說清楚。周總理當即定了兩條：一，對溫的報告，如果有人追查就直接了當地指報告是誣告，根本不是事實。二，邱承光立即離開北京，到部隊鍛煉去。承光到廣州軍區去當兵，是周總理親自決定。

「九一三」之後，在十月底，周總理陪埃塞俄比亞皇帝去廣州訪問時，還有意專門召見程光等幹部子弟。但總理突然有急事回北京走了，



路光一家合影。



和承光一家合影。

特委託李先念談。李先念當著廣州軍區首長和程光等人說：「你的父親現正在接受審查，他的問題會得到很好解決的，你要如同過去一樣相信毛主席，不要失去信心，在部隊很好學習鍛煉。」李先念又對軍區首長說：「現在就把孩子交給你們了，要一視同仁地對待，不得歧視。我們共同把孩子管好。」軍區首長當著李先念的面承諾了。由於周總理委託李先念有指示，承光本人也下決心堅決執行總理「在部隊很好學習鍛煉」的指示爭取在部隊呆下去。但承光後來得到的就不是「一視同仁」而是「另眼看待」了。承光受到了嚴格的審查和嚴重的打擊，但他非常堅強，沒有向整人的傢伙屈服。

一九七八年，承光請假去北京打聽父母、兄弟、妹妹的情況，他已經八年沒有假期。他費了很長的時間，才找到天各一方弟弟和妹妹。由於時間不夠，承光就發電報和寫信續假。但部隊以超假為由，使承光遭到了開除黨籍的沒頂之災。並強行以轉業處理到蘇北的小縣城當教員了。

承光女朋友陳雪巾，「九一三」前祇見過一兩面，她六九年參軍，在解放軍總醫院做藥劑護士。由於工作好，軍醫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時，總醫院送她去第四軍醫大學學習。陳雪巾學習成績很好，「九一三」事件



和光光一家合影。

之後，她已經學習期滿，可以正式畢業了，但學校不僅沒有發給畢業證書，總後還把她抓去審查。一個女孩子，和程光祇是普通的朋友關係，也要關押，七六年承光都可以探親了，雪巾還在關押之中。她同樣是無家可歸的人，「九一三」後，僅因為女兒是承光的朋友，雪巾的父母竟被從無錫市趕到農村去了。

後來承光經百般周折來到雪巾的家鄉無錫。他們夫妻都是共產黨員，兩人都如同過去一樣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在工作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承光在無錫採煤機械廠將近十年時間，他和他的小組自己查資料，自己設計，自己製造主要部件，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成功設計出薄煤層採煤機，這種機器填補了我國採煤機械的空白，機器的質量也相當好。為此，一九八七年春，國務院煤炭部授予承光科技進步三等獎，江蘇省授予二等獎。承光這個孩子天資較高，初中、高中、大學，他學習成績都是名列前茅。因為受我的株連，耽誤了孩子，一想起來，我心裏就很難過。

三兒子光光，於一九六七年當兵，當時祇有十五歲；四兒子小光於一九六八年當兵，當時也祇有十五歲。兩個小兒子在軍隊的大學校裏，



和小光一家合影。

學到了知識，得到了鍛煉，他倆都被提拔為基層幹部，光光任師司令部參謀，小光在連隊任排長。他們兩個人本來就出生在軍旅之家，是適合在部隊工作的。但他們當兵的權力被剝奪了，「九一三」後就以辦「學習班」的借口關了起來，後來又下放農場五年。部隊不是按黨和國家的政策安排他們轉業，而是叫他們復員，於一九七八年五月被擡出軍隊了。

他們在北京是無家可歸，舉目無親，真是痛苦難言。他們借住在同學祇有九平米的小平房裏，常常睡五六個人。他們在辦理就業的過程中，碰到了一個又一個困難，三兒子光光最後在工廠幹了幾年的裝卸工，小兒子在工廠幹修理工。

我唯一的女兒京京，一九五八年出生，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祇有八歲，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時，還是一個尙未成年的孩子。但總後造反派對她的株連是十分殘忍的，女兒是我們全家最可憐的人！

「九一三」以前，京京住在西單小醬坊胡同，「九一三」之後，就被迫離開了。離開那天下著小雪，京京小小年紀，畏縮在卡車上，不知所措，因為去哪裏，她也不知道。我的全家都被抓起來了，總後的人把京京搬到一間放雜物的小房子，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開始了獨立的人生道路。京京在總後五號院受盡了屈辱，房門上貼滿恐嚇和謔罵的大字報，

並聲稱「膽敢撕掉就採取革命行動」，京京上廁所時，調皮的男孩子經常裝神弄鬼，在廣場看電影也不得安生，經常有人向京京扔髒東西，甚至遭到小石塊和土疙瘩的襲擊，京京很少能夠看到一場完整的電影。

京京在精神極端痛苦的情況下，一天晚飯後，由她嫂子的娘家無目的地出走。當時已經是寒冬臘月，她身上穿得很單薄。她由住處走到了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轉來轉去，然後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來了。當時想了很多的事，但主要是想媽媽，為什麼不讓看媽媽，根本想不通。她想來想去，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天安門廣場換早班的戰士，把她叫醒了，才知道自己在這裏睡了一夜。

七四年二月七日，總後竟然把京京攆出了北京，隻身到河北省井陘縣3502工廠繼續「上學」，每月給20元生活費，這是「九一三」事件之後京京遭到的第二次嚴重打擊。

京京高中畢業了，不予安排工作，在困難無告的情況下，京京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信，胡做了批示：「對子女的問題不能再不管了，要確切解決邱會作的女兒上學或就業的問題。」這個批件到了總後，在總後政委王平那裏就壓下來了，但終究要解決問題，最後不讓京京回北京，硬性

光光、小光同在一個部隊、一個城市。「九一三」時一個十九歲，一個十八歲，也被隔離審查，下放農場，五年後才讓相見。



第四十六章 在西安的日子

安置西安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我被送到西安，到現在已經十年有餘。我是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送到西安的，但是我在西安不僅沒把身體保護好，反而幾乎「保外送命」了。我對生活要求很低，能過得去就行了。就是這樣低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

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秦城監獄的副主任（我稱之高個子主任）就開始同我談「保外就醫」的問題，連續談了兩三次，我記得最後一次談話是九月六日。

高個子主任說：「保外就醫的問題，中央已經定了。你是安排到西安，房子也準備好了。你如果沒有什麼意見，過幾天就走了。」

我回答說：「我服從中央的安排。不過剛公審完我們，馬上又搞保外，不知是爲了什麼！對於保外後的生活，我祇有一條要求：有暖氣，有衛生間，能在家裏洗澡。因爲戰爭年間我有傷有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造反派打得一身傷殘，一受涼就全身痛。」

高個子主任笑著說：「你的要求不高，是合理的，這些你就不要顧慮了。」

九月十二日早八時我到了西安。陝西省公安廳郝副廳長和公安廳八處張科長到車站來接我。我進到我的住房時，心就完全涼了。我在北京提出的住房要求一條也沒有落實，心裏很難過。

房子裏一共有四張木凳子，一張木板床，我們坐下之後，郝副廳長開口對我說：「房子不算好，但也費了勁才買到手的。今後你就同這位張科長打交道，他是專門負責你的事務的。」因爲當時還正是深秋期間，沒有暖氣的房子究竟是個什麼滋味，還沒有實際感覺，祇能這樣住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我到西安後同公安廳的關係就是：每月一百元錢（扣去七元房租，祇剩九十三元），三十斤糧票，半斤食油。另外，還可以報銷藥費。

八一年十月間，中央公安部來了檢查組，檢查組的組長就是秦城監獄的主任（即光頭主任），據說他也是公安部八局局長。一天，公安部檢查組，陝西公安廳郝副廳長和張科長等六、七人都到我的住處來了。

光頭主任首先說話：「我們是經過濟南、青島到這裏來的，然後到太原去。我們看到的三個地方，房子的質量、設備、面積都差不多，都可以住下去……」

我說：「住下去，當然是可以的，比這再差的也可以住下去的。我在秦城監獄曾經向你們提過，住房要有暖氣和一般的衛生設備要求，一條都沒有做到！」我說得很激烈。

光頭主任避開回答我提出的問題，他說了一段解釋的話：「房子條件不是很好，但也來之不易呀！這個房子是由中央撥款專門買給你住的，取暖問題會解決的，保證你冬天不挨凍。至於洗澡和馬桶的問題，更好解決。你要有信心，情況會越來越好的。」

我說：「你們的話能不能落實，我不知道。趁你現在著這裏，我現在祇提一個要求：要求回秦城去。在秦城有暖氣，可以洗澡……。」



一九九五年，胡敏和老戰友項輝方在西安家中。



胡敏和林立衡（豆豆）在一起。

此時，光頭主任看到情況並不妙，他祇說一句話：「你不要多想那些不可能的事。」說完他起身就走了。臨走時，光頭主任還交代我的大孩子路光說：「你要同你父親好好談談，不要失去信心。」

從公安部檢查組在我住處談話的態度可以看出：檢查組是例行公事，不是來解決問題的。不出我的預料，檢查組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一九八二年春節，我們家是大團圓之日。全家除了大孫女未到之外，其餘五個孩子每家三口共計十五人全部到齊了。加上我們老兩口和女兒帶來的保姆共計十八口人。我們的住房沒有取暖設備，大家都是挨凍過春節。除此之外，我們過的真正是窮人節。當時，我祇有一百元生活費，孩子們的工資也很低，除了勉強度日之外，也是身無分文了。

生活問題

在生活上，我們經歷過的辛酸事是多得難於計算的。

取暖問題。八一年冬，公安廳八處在我的住房廚房內，安裝了一個小鍋爐，有兩個房間可以取暖。白天不停地燒著房間還暖和，晚上不燒就一點熱度都沒有了。由於燒的是煙煤，不僅廚房內牆壁熏得黑溜

秋，而且整個室內煙灰很大，對人的身體傷害更大。我的鄰居，尤其住在樓上的鄰居，對我們燒煙煤也提出了意見。小鍋爐對自己對鄰居都不利，於是我就堅決不同意再用了。

從八四年冬起，他們把小鍋爐改為燒爐子（又名土暖氣）。但仍然祇能給兩個房子供暖，溫度稍高一點，可以燒到 19 度，而且燒的方法也比較簡單。可是這種爐子祇能燒無煙煤，因為沒有煙筒，中煤氣的危險很大，一次我們全家都中了煤氣，小阿姨爬到門口喊人才轉危為安。鄰居都很關心我們，第二天早晨就有不少人來看我們。派出所也知道我們中了煤氣並報告了公安廳八處，過了兩天張科長才來了，他看到我躺在牀上還沒有死，心裏也就「放心」了。

我說：「人中煤氣不好，但『中人氣』更難受。這次是你們公安給我的『福份』。你們常說，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現在算是兌現了。如果多中點煤氣，我就享天福去了。」

改變燒爐子後，供應無煙煤就發生了很大的困難。因為陝西不產無煙煤，加上八五年起，我的生活費用，是由中央撥款包干的，他們對我捨不得，供煤就更困難了。

八四年進入冬天之後，八處送過兩次煤。大約有兩個月了，煤也快燒完了，還不見煤來，我就向八處張科長寫信報告，但一直沒有見送煤來，我著急了。八五年一月一日一早在大雪紛紛的情況下，我到派出所去給八處打電話，向他們報告沒有煤了。接電話的人祇回答一句話：「我們這裏沒有煤。」電話就卡嚓一聲掛斷了。

不供應無煙煤，停了兩三天沒有燒爐子。當時正是寒冷天氣，凍得實在難於忍受，我的外孫女在我這裏，小孩凍得整天都哭。沒有辦法，我只好去派出所，董所長即說：「這樣吧，我們給煤場寫個條子，要他們在煤票之外供應你們二百斤蜂窩煤，以應急需。他們會辦的。」

我當時很感動！用勁先說出「謝謝」二字，接著我又說：「公安八處不會報銷的，我自己是無力負擔這筆開支的，去年的煤錢公安廳還沒有報銷。」「這真是怪事！」董所長是帶有濃厚感情說這句話的。他又說：「這次買煤，我們會給你報銷。你放心去辦就是了。」煤場離我的住處很近，很快就把事情辦妥了。當晚又燒起爐子來了，全家老小都高興。

由於公安廳八處對我的生活太不經心，八五年的秋天，我就向張科長提出：「今年冬天的無煙煤，由我自己找人採購。」他很乾脆地答應了。從此，連續幾年都是我自己找人買煤。給我幫忙的人很多，我對熱心的鄰居表示由衷的感謝。

冬天燒爐子，因為不會燒經常熄火，熄火之後要重燒，就要用柴火才能燒著。公安廳八處不給我們引火柴的費用，自己買又不起，祇好自己動手找出路。當時，我們小區裏就是建築工地，有不少木材下角料是上好的引火柴。我硬著頭皮向木工師傅說：「我的爐子滅了，你給我一點無用的木柴下角料，好嗎？」工人對我很客氣，他說：「隨時可以來拾嘛。」工地的負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後，特地為我預備了一堆劈柴，都是五、六寸長，並且還劈得好好的，這樣就解決了我很大的困難。

燒爐子取暖的時候，每半小時要向爐子裏加一次煤，是很勞力費神的，我家有個小阿姨，她要做飯搞衛生，還要帶我的外孫女，一天忙得不可開交，不能再讓她搞爐子了。我曾向公安廳八處提出要給我們配一個燒鍋爐的工人，他們聽到後祇冷笑了一聲，根本不理睬。我和老伴就自己動手，每天用破臉盆把煤一盆盆從一樓端到二樓，再把爐灰一盆一盆端下去，我們用自製的小鐵耙，把未燒盡的煤扒出來，西安人稱為拾爛炭，搞得我們老兩口滿身是灰，而且腰酸背痛。但每天拾十幾斤爛炭，對我的生活能夠產生很大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我當時處境的困難了。

洗澡問題。洗澡這個問題，對一般人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但對我來說，卻是大問題。我初到西安時，公安廳八處每個星期用汽車送我到城裏澡塘去洗一次澡。祇有一個月，他們就不來車了。不來也罷，因為我自己對坐汽車去洗澡心裏也不是滋味，總覺得這是一種浪費。

初到西安時，路光請了半年假，繼而我的女兒京京請了一年假來照顧我們。他們就用自行車帶我去洗澡，或者是借別人的三輪車，全家同去洗澡。孩子回去後是我老戰友的兒子邱輝用自行車帶我去洗澡。邱輝工作實在忙，我不忍心總麻煩他，我就提出不要他來接我去洗澡了。我自己每十天或半個月，背上一個包，帶上衣服就去洗澡。我總是洗大池子，因為窮，要多花一角錢都是困難的。洗澡有兩個最大的問題：一是擠不上公共汽車；二是洗澡之後必感冒。

西安公共汽車之擁擠是難於形容的。我每次去洗澡都要用很長的時間等公共汽車，常常因為擠不上去就回來，第二天再去。鄰居護著我上公共汽車的次數也不少，因為小伙子力氣大，我祇要跟著在他的屁股後頭，就沒有上不了公共汽車的。等公共汽車是件煩惱的事，但也有好處，可以聽到很多的新聞、怪話、笑話。

我是最容易因洗澡而得感冒的，幾乎每洗一次澡回來都要頭痛，咳嗽甚至發燒。這些情況張科長很清楚，但他就是不說話。八六年的冬天，我就直截了當向他說：「冬天，我半個月去洗一次澡，用你們的汽車可以嗎？」張科長回答說：「用油限制很緊，恐怕困難，我回去匯報一下。」實際上沒有答應。

我是偶爾遇到第四軍醫大學政治部一個姓周的幹部才真正解決了洗澡問題。那位周同志原是總後政治部的，文化革命中還是反我的造反派，現在他對我很關心。周同志為我辦了一個四醫大的臨時入門證，進去洗澡就非常方便了。

四醫大管澡塘的是一個姓李的年輕人，他知道我的「身份」後，不僅不要我買票，而且每次去洗澡，他事先把澡盆、房間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小李祇讀過小學二年級，還寫不了信。小李每次回信都是我給他起草的，我們成了好朋友。

票證問題。八十年代是票證年代，當時的票證是數不清楚的，如糧票、油票、肉票、粉絲票等等。我沒有戶口，自然是「無證居民」，什麼票也沒有，連冬天貯大白菜的票也沒有。公安廳應該知道這個情況，但他們根本不管。我們吃的副食品就是靠鄰居、朋友、親戚給我們送點，過。例如，從七十年代開始，由於提高了糧價，吃商品糧的居民，每月都補助五元。關於五元糧食補助費之事，我向張科長提出過，他回答我的問題，祇反問了我一句：「在秦城有吧？」他這是對我的挖苦，我也不客氣地說：「你們西安的公安機關什麼都是先進的，連地獄都是十九層，比別的地方深了一層。」

八三年十一月開始冬貯白菜了。我們沒有冬貯白菜的票證，一天，我同老伴在菜場看到賣菜的時候，掉在地裏的葉子很多，老伴隨手拾了

一些，捨白菜就是這樣想起來的。賣菜的工人師傅也很同情我們，有時把大片的好菜葉扒下來給我們，真是天無絕人之路！

我的孩子對我們非常孝敬，當時路光還在部隊，他也就請假不歸了，在西安照顧我們半年，忙裏忙外。我的女兒也請長假從武漢來照顧我們，雖然困難，大家心心相依，給了我們很多溫暖和安慰。

鄰居如親人。我在長樂路安仁坊住久了，群眾中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官家百姓都認識我，鄰居碰到我幾乎都說：「注意身體，有健康的身體度過晚年是最幸福的事。」有些人在大街上相遇，不便多說，也要在我耳邊小聲說：「不要想那些事，要注意身體。」我也總是點點頭，向他們致謝。

八十年代初，副食品還是國家統銷為主，當時採購副食品並不容易，買不到東西是常事。我要是在排隊買副食，人們總是讓我到前面去是很受優待的，我則堅持不搞任何特殊化，前面的人前進一步，我也跟著前進一步。每次買菜的師傅和買菜的鄰居非要我不排隊，我也就領情了。商店經理還決定一次賣給我兩包火柴。事情雖然很小，但從這裏還是看到了人民對我的照顧和幫助。

刷房子。由於燒了兩年的土爐子，我們房間的四面牆上都熏得黑黑的，尤其是廚房。我向八處提出來粉刷一下，他們沒拒絕但也不辦。

一天，鄰居三個小伙子，偶然看到我的房子黑得很難看，他們當時就合計要幫我們粉刷一下，並預定下個星期天上午九時動工。但到星期天那天，我忘記了這件事，出去散步去了，待我回來時房子已經刷好，小伙子們準備走了。當時我感動得不知怎樣是好，我說：「在我這裏做點飯吃了之後再走。」他們回答說：「我們不吃飯，我們三個人吃一頓夠你吃一個星期的，我們知道你招待不起。」

我又說：「你們為我刷了房子，不付工錢，料錢總要付吧。」他們回答說：「既不要付工錢，也不要付料錢。因為這點錢，你同樣負擔不起。我們為你做點事，心裏很高興。我們這些工人子弟永遠不會忘記為我們打江山的老革命，這就是我們的心意。」

幾個小伙子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坐在房子想了很多，真是思緒萬千，祇有人民才會叫我老革命，知道我為人民打過江山。我想來想去想出來一個真理：人民萬歲！

有期等於無期

我的十六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就期滿了。我和我的家人也都盼望到期之後生活條件能夠得到改善。我自己對到期之後，也不是一點想法都沒有。刑期到了，苦難也應該受盡了。革命本來就是自願受罪的，甚至自己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其目的就是爲了廣大的窮苦人民的解放，包括自己在內也得到解放。爲革命而受罪是應該的，是光榮的，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非常正確的，不管受過多少苦，永不後悔！但是除了革命的苦之外，我現在還受了另一種苦，一種更難於忍受之苦，是共產黨「自己人」給我的人爲之苦。這種苦是不應該的。我們黨對黨內幹部處理的傳統向來都是思想從嚴，組織從寬，在生活上從來也沒有把人搞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現在雖然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在世了，但黨的傳統總還是應該存在的。何況我的問題究竟有多大，中央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戰友都知道。

我希望我們的黨，能夠從對我們的錯誤處理中取得教訓，糾正錯誤，能夠使後人再不受「自己人」之苦，這是我的唯一希望。

到期釋放。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是我十六年刑滿到期的日子，這對我個人來說是一件大事。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許，陝西省公安廳突然到我家來了三個人。領頭的是公安廳馬顧問，他們三人坐下後說：「明天是九月二十四日，你的刑期到了。今天我們還未向你宣佈，就犯法了。今天我們正式向你宣佈兩條：一、按中央公安部的命令，你的刑期到了，決定對你釋放。二、刑期到期後，對你的安置中央尚無決定，待後再宣佈。」上面的內容，他們照原來寫好的稿子，一字一句說的。

宣佈上面那兩條之後，他們接著說：「你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來？」「這樣就叫做釋放嗎？判決的時候，興師動眾，現在釋放是不倫不類，我們國家的法律就是這個樣子嗎？」

對我提出的問題，他們不說話。

我說：「十六年來，無論關進衛戍區，押進秦城監獄，公審等，都是服從中央決定的，並沒有多說過話。因爲我不是反革命，我是老革命。現在刑期到了，相信中央會按照政策，對我的生活給予安置的，但怎樣安置，我還是服從中央決定的。過去，我沒有多說話，其實，我有

很多話要說，現在沒有人聽我說話，祇要有一天有人聽我說話，我會說得清清楚楚的。」我的話音一落，馬顧問連忙站起來說：我們走吧。其態度真是冷若冰霜。宣佈對我釋放的「儀式」就結束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公安部八局處長姜耀山到西安來，在陝西省公安廳八處會議室找我和胡敏談話。

姜耀山處長是個年輕人，他的談話要點如下：

邱會作十六年徒刑已經滿期，九月二十三日公安部委託陝西省公安廳對邱會作宣佈正式釋放，這是完全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辦的。對你的安置，中央政法委有批示。按照批示的精神，現就有關安置的問題，向你宣佈如下：

一、安置的地點，原則上在保外就醫的地點，邱會作期滿後，即在西安安置。除京、津、滬和沿海地區、沿邊境城市之外，其餘的地方有親朋可投，可以去。要是自己自願，可以回原藉。

對邱會作在西安的安置，我們已經向省委省政府匯報了，由省政府負責安置。對要求住有暖氣的房子，並有衛生洗澡等設施，公安廳已經向省政府提出來了。政府的態度是好的，用積極的辦法把問題解決好。

二、生活費二百元不增加。國家的經濟改革雖然已見成效，但幹部生活水平還是不高的。你每月二百元，包括物價上漲因素在內，不僅可以過得去，還綽綽有餘。當然，生活好壞是相對而言的。

三、按照判決，從釋放之日起，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並按照刑法有關條文執行。

姜耀山處長講話之後，我說：「對姜處長的宣佈，我不發表意見，祇提三點要求：

「第一點，要求回北京。回北京不是什麼政治權利，是投靠子女，我們老兩口隻身在西安，生活的確是困難的。你們可以關我，可以公審我，現在刑期到了，不讓投靠子女，這是什麼法律？

「第二點，要求改善生活條件。我現在每月二百元生活費，除了僱個人做飯，房租、水電、書報等費用佔去了一大部分，真正能落到生活上的就不多了。剛才，姜處長說了，『生活好壞是相對而言的。』這個道理我懂得，但我同誰相比就不清楚了。我相信，我的生活同你姜處長就不能相比。」

「我現在住的房子條件很差，要求能搬到有暖氣、衛生間能洗澡的房子去住。」

「你們知道，我十四歲就參加了革命，時間快六十年了。我是以革命為職業的，除了依靠共產黨之外，其餘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我這樣一個人的處理，比你們對真正反革命的處理嚴厲多了，對老革命和對老反革命的處理，你們真正做到了旗幟鮮明。例如，你們對沈醉的處理就寬宏大量，仁至義盡，對我的處理，你們就殘酷得不可復加了。」

「第三點，要求解決家屬株連的問題。我的全家老至八十歲的母親，小至十三歲的小女兒都受到了株連，無一倖免。株連是空前未有的，但現在無人過問，很多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我們真正叫天叫地也解決不了問題。」

姜處長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百感交集

我的刑期到後，沒什麼動靜就算過去了。判決我的時候，當局是大張旗鼓的，全部招數都用上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釋放我，我同樓洞的鄰居都不知道。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真是百感交集，思緒萬千。我認真回顧了歷史，在將近半個世紀內，我所知道的中央對其他人的處理包括對高級幹部的處理，我一個一個都想過了，以我的經歷來看，對我們這樣狠毒的先例一個也沒有。對我的處理，肯定是我黨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

我要求自己在任何時候都要維護黨的利益。因此，我始終都把自己置於老革命、老黨員、老幹部的位置之上考慮問題。正是因為這樣，我就能正確對待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所遇到的一切苦難。而我能忍受一切苦難，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相信黨、相信中央、相信自己。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自己對要下臺是有充分的精神準備的。但怎麼個下法？頂多也祇考慮過，與我的前任洪學智下臺大致差不多，其餘的都在預料之外。

進了衛成區之後，我想到：發生了林彪這樣大的問題，在事情不清楚的情況下，把平時同林彪工作關係比較密切的人進行審查是需要的。



一九九九年，和老戰友李作鵬在一起。戰友難友情意深重，市井布衣榮辱不驚。

即使對我採取了過激的審查措施，我還是可以想得通。於是很快就平靜下來了，對自己的前途並未失望。

真正意料之外是關進秦城監獄，我進監獄的牢房之後，自己也還是半信半疑的狀態。毛主席去世之後，華國鋒、葉劍英上臺，他們全力去對付「四人幫」，對黃、吳、李、邱的事擱在一邊。在這種情況下，就把我們投進監獄關進了「倉庫」。後來即使他們想管也管不了了，因為他們自己也被鄧小平拱倒了。

更可悲的是公審。這個問題除了專權的人能夠想到之外，任何人都絕對想不到，我自己也是沒有想到的。

刑滿釋放，就是「放」了而已，一切根本無人過問。釋放後同過去不一樣的就是：發了一張釋放證書，領了一個身份證，上了戶口，其餘一切都沒有變。

公安廳八處要把我推出公安，這當然也勢在必行，為了把我移交給民政廳，八九年二月間，公安廳八處、民政廳復員轉業處，雙方都來人到我的住處談移交的問題。

公安廳八處說：「不管有什麼困難，公安廳是不能再管了，這是原則問題。」他說的中心意思是，我的徒刑期滿已經兩年多了，再由公安管就要違反法律了。

由於民政廳對我的移交毫無準備，也不瞭解中央以往的政策，他們祇能按一般政策對我。民政廳復轉處長張百發說：「由民政廳管，住房和生活費用不變，醫療費不能實報實銷，祇能補助。」他解釋說：「中央對老幹部的醫療費有規定：一種是實報實銷，一種是酌情補助，你祇能享受第二種。」

我聽到張的話之後，立即火冒三丈衝口而出說：「我們的黨中央對我決不會對我有這種規定，這是你們的『中央』的規定吧？這點藥費，對我這種受過大難的人也卡，實在沒良心。公審時兇得很，大張旗鼓，現在對我的生活安置就像打發一條狗一樣！對我的生活，在沒有解決我生活的問題之前，我不同意公安廳馬馬虎虎就把我交給民政廳。我堅持說，主要是解決有暖氣的房子、治病和改善生活等問題，祇要解決了，把我交到任何地方都沒有意見。我並非喜歡由公安管，而是要求解決問題。」後來他們經請示決定「藥費還是實報報銷」。

這次談得很不好，無結果而散。這次談話之後就沒有再談話了，公安廳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也就把我交給民政廳了。

當時我的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附加刑尚未期滿，什麼權利和權益都沒有。從八七年到九二年四年多的時間，我看病太難了，看病要自己先墊錢，報銷時既艱難又麻煩。在省公安廳移交到民政廳之前，我生了一場病，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使我的身體越來越壞。到了年底，我又病了，由於發燒一直不退，老伴陪同我去四醫大門診部看病。醫生根據我的病情收留我住院。但在沒有單位介紹的情況下，祇能住普通病房。普通病房，一個房子住十多人。吃飯好辦，但睡不著覺就是大問題，上廁所也困難，我根本蹲不下去。醫院院長對我治病的問題很同情，但受制度所限，還是祇能住普通病房。

還有一次我發高燒到 39°C ，天氣連續下雨，因為沒錢花了，我去八處報銷，但竟然沒人管，回來的路上還掉到溝裏去了，成了個落湯雞，幸好一個路過的工人師傅把我救起來，用三輪板車把我送回家，結果燒到 40°C ，接著又看病打針，真是受盡折磨。

省公安廳把我交給民政廳管，但他們之間沒有協調好，九〇年冬天取暖煤就無人管了。我去找公安廳，他們的回答是：「我們早把你的關係轉到民政廳去了。」我去找民政廳，他們的回答是：「公安廳沒有向我們移交取暖的費用。」無奈之下，我向中央趙紫陽總書記發電報，要求解決取暖煤的問題。內容大致如下：「現在已經進入嚴寒，我的取暖煤還沒有解決，也無人過問。特向中央求救。」電報發出去之後第二天，民政廳就來告訴我說：「買煤的錢已經解決了。」十二月三十日，就開始生爐子了。

由民政廳管理之後，他們對我的態度一般的還是好的，像公安廳八處的「閻王神氣」沒有了。正是因為他們的態度比較好，我就抓緊請他們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固定一家醫院看病並發一個醫療證，一是要調換一個有供暖的房子。這兩個問題後來都得到基本解決。看病固定在四醫大了，四醫大特診室對我很好，對我甚為尊重，我每次去看病都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調換房子的問題，費了很大的勁，差不多經過三年的時間才解決。對我要調換有暖氣的房子，民政廳是採取積極同情的態度的，他們認為我的要求完全合理。

省委辦公廳一位姓溫的處長首先去山西、山東考察過李作鵬，吳法憲的住房情況，對解決我的住房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李作鵬在山西從開始就是住的省政府幹部宿舍，房子條件尚好；吳法憲住的是省政府給他新建的獨門獨院一棟小樓，條件也好。根據山西、山東的情況，對我的住房省委辦公廳召集會議進行了討論。公安廳八處的意見是祇能調換普通住房，不能給較好的住房；辦公廳的意見是住房條件要同山西、山東大體相等。公安廳八處把我推出去很積極，現在又來多管閒事。

經過了五年含辛茹苦的生活，到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我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附加刑也到期了，開始公安廳沒有動靜，我向他們寫了信後，陝西省公安廳發了一個文字通知。

通知全文抄錄如下：

陝公預發【1992】12號

陝西省公安廳關於恢復邱會作政治權利的通知

邱會作：

你因系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於1980年經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服刑期滿，已辦理了釋放手續。其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五年（1987年9月23日起至1992年9月22日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規定，對你的剝奪政治權利已執行期滿，從今年9月23日起恢復其政治權利。特此通知。

陝西省公安廳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接到此通知後，我做了批註：此件，九二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半，由陝西省公安廳兩人送來的。這個通知可以說增加了我的附加刑十多天。當省委批准我搬到朱雀路省政府省級幹部宿舍時，八處極力反對，甚至還提出要撤掉宿舍內原有的電話機。省委辦公廳對八處不合理的意見，甚為不滿。省委辦公廳說，你們都下了文件宣佈邱會作恢復政治權

利，為什麼電話都都不讓用？他年紀大了，快八十歲了，子女都不在身邊，沒電話不成，更重要的是我們也不便管理，犯了病我們都不知道，總不能天天往他家跑吧。

陝西省公安廳欠我的冤枉賬太多了。現在我身上有三個大毛病，心臟病和腸胃病是在過去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國民黨給我的；一身傷殘、關節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毒打造成的；常年自己捅爐子得了肺氣腫是在西安「保外就醫」期間，陝西公安廳給我的。

落難中的情誼

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我到西安是居住在長樂西路安仁街 21 樓。為了「保密」，公安部門要我改名為邱季龍。在八二年之前，鄰居知道我「身世」的人很少，但不到兩年時間，知道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大家都稱我邱老。

戰友子弟

西安有不少幹部子弟，他們都想認識我，也想見見我。原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桂紹忠的兒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軍醫科學院的造反派鄭洪泰，奪了軍醫科學院的領導權，把院長桂紹忠、政委程坤源都打倒了，並強迫他們勞動改造。六七年五月底，我向軍委報告，經請示葉帥、聶帥批准，立即決定對軍醫科學院進行軍事管制，鄭洪泰停職反省，院長桂紹忠，政委程坤源立即解放，並恢復工作。

小桂是四醫大的研究生，八二年回北京過春節，把我在西安的情況向他父親說了，他父親說了一句話：「有機會可以看看他。」在當時嚴酷的政治情況下，這句話也是值千金的。

八三年六月一個下午，我外出散步後往家走時，小桂在我的後面一個箭步走上來對我說：「我是桂紹忠的兒子，現在四醫大讀研究生，我來他常買些東西，自己動手做飯給大家一起吃，實際上是在幫助我。」

小桂給我做了很多事。例如，我讀的書就是他從學校的圖書館一次又一次帶來的。我在西安進過兩次電影院，有一次就是小桂硬拉著我去

的。小桂一直把我當成尊敬的長輩，當成老革命看待，這給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支持。

小桂說：「您倒臺了但您的影響還是存在的。這是您的最大成功。全軍特別是後勤系統對你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對你不懷惡意的人都說，你在主持後勤工作期間，做了很多工作，後勤戰線在全軍的威望最高。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總理在總後機關幹部大會上指出：『邱會作同志是我軍最好的後勤部長』，總理的話，代表了全軍共同的看法。總後機關除造反派之外，真正反對邱部長的並不多。」

小桂說，我們研究生中，有不少人認識邱部長，大家在閒談中一致表示：「希望邱部長保重，長壽！」

意外來客

一天晚上約七點鐘，有人敲我的門，進來一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坐下後他反覆問我認不認識他？然後他又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可能認識我啦，我是平津戰役時你的俘虜呀！平津戰役時，我們去收容所之前，你給我們講了話，有一句話對我終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觀，努力就有前途』。我聽說你現在很困難，我也沒有什麼思想水平，祇想用你過去教育我的這句話來回贈給你。」我除了謝謝他也無言以對，臨走前他拿出五盒蜂王漿送給我。客人走了以後，我坐在椅子上突然不能動了，可能這件事對我刺激太大了，激起了難忘的征戰歲月。平津戰役，炮火連天，我四野八縱三分鐘突破民權門，第一個衝佔金湯橋……。我作為縱隊政委給敵人俘虜講話……可我現在卻在困難中求生……，一切都顛倒了。

催人淚下

胡敏出身貧苦，十三歲就在陝西省立醫院做工。醫院有一對老夫婦都是醫生，但他們沒有孩子。這對夫婦看到胡敏（原名胡秀英）勤勞乖巧，就收養了她。這對胡敏來說是天大的喜事，胡敏就此有了溫飽。老兩口還教她識字，介紹她去當護士。三六年胡敏在醫院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掩護過省委書記崔廷儒。三七年抗戰爆發後，胡敏參加了抗日醫療隊上了前線。臨走前並沒有給老兩口講，是偷偷跑掉的。事後老兩口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刁難。人生滄桑，幾十年後胡敏又回到了西 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安，她是從這裏參加革命，反而作爲反革命回到家鄉。他一生都惦記老兩口，解放初期有過聯繫，因爲工作忙一直沒有見過面，文革中又斷線了。到西安後經多方打聽老兩口還健在，而且都是教授一級的專家。胡敏去拜謝時，進門就給老兩口跪下了。胡敏說：「我是感謝你們的恩情今天來拜恩，同樣，出於感謝你們的恩情，今後不能再來了。」老兩口愛憐地拉起胡敏，三個人都在落淚，臨走前他們留下了電話並送給胡敏500元錢。胡敏哭著到了郵局把錢寄回並留言道：知恩不能報，全做無此人。

戰友情誼

我的一生，除了公敵之外並無私敵。在革命隊伍內部，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堅決反對造反派之外並無仇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我同上級、同級、下級都結下了友誼。我流放到西安後，來看我的人很多，凡老戰友到西安來，都要到我的住處來看我。

原中央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是我的同鄉。我們在長征的途中相識，到了陝北之後，見面的時間多些，解放之後在業務上的聯繫很多。我們是老戰友，他對我很尊重，很關心。

趙來西安是搞陝甘寧邊區解放戰爭時期的軍糧供應資料，準備寫一本軍糧供應的專著。他祇知道我在西安，但並不知道住址。爲了要見我一面，他一到西安就打聽我的住址，但市糧食局也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爲了搞清楚我住的具體地方，市糧食局派專人到省公安廳才搞清楚，並到長樂西路派出所問清了我住的樓號和門牌號數。

一天下午，趙副部長在糧食局的工作人員和他的秘書陪同下，突然來到了我的住處，當時我真是不知所措了。趙怕我激動，一進門就說起笑話來。他觀察到我還平靜，我們才開始談話。

趙說：「我到西安來搞點資料。既然到西安來了，一定要來看看你。有一次開會後胡耀邦同志把我和張永勵留下說，你們有機會見到姓邱的，告訴他：『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要向前看。我認爲我們的黨不應把圈子搞得很小，要把圈子搞這麼大（兩臂張開），多團結一些人總是好的。這個意思你可告訴他本人。』耀邦同志還說：『有些人別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臺，打別人反革命有下手很重，搞

怨怨相報。其實，很想發他們幾個的財（即給我們落實政策，在幹部群眾中贏得更好影響）。」趙說：「今天，就把話當面向你轉達了。」

孔瑞雲是原山東省軍區司令員，是福建的老革命。整個解放戰爭我們都戰鬥在一起，他是東野八縱的後勤部長，我們的革命情誼是很深的。他路過西安，決心一定要看到我。但不知道具體地方，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後來就乾脆到長樂西路派出所去問我的住處。

派出所的人聽他的口音和派頭就知道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孔說：「邱是老革命，也是我的老領導，除了看看他之外，還要看看他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他。我們是一起出生入死打敗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人啊！」

派出所長說，我心裏想的也和你一樣。所長不到五分鐘，就把老孔領到我的住處來了。

孔瑞雲一進門就給我敬了個禮，然後緊緊抱住我不肯鬆開，我激動得也掉了眼淚，他說：「我們來看看你。今天我來看你同過去看你，在我們心裏是一樣的，你永遠是我的老首長！你不要難過，要高興！你要是難過，我們就更難過，你的許許多老戰友，老部下，都很關心你！」

我聽了老孔的話，心裏有很多的話，都說不出來了。由於老孔找我花的時間過長，上火車的時間快到了，我們談的時間不很長他就要走了，臨走時，他給我留下幾百塊錢和糧票，我們互相熱淚盈眶地分手，我心裏的痛苦祇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老戰友任思忠到西安，是卜占亞帶他來看我的。他一進門也是緊緊地抱住我，他說：「你過去是我的老首長，現在還是我的老首長！」我們談到了很多，從戰爭年代一直談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大革命，也常常激動地雙雙落淚。老戰友的真情和友誼對我在困難時期支撐下去是巨大的力量。

我在北京郊區順義縣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部關了五年又三個月，防化H副連長同我相處了三年多，整個警三師對我都是關心和敬重的，同樣，H副連長對我也是關心和敬重的，這給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力量。他能到西安來看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個看管你的人，還能來看我，而且是在公審之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相識是因為我被打倒了，被他看管了，他從我身上得不到一點「油水」，他能關心我，這是為什麼？



真情實意。

我想了很久，就是我們都是「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的人民解放軍。我對 H 副連長是感激的，佩服的。

九二年我來到北京，張震和段蘇權知道後都看過我還請我吃了飯，之後段蘇權還多次看我。張震在國防大學請我吃了飯，他自己帶了一瓶茅臺酒，並對管理人員說：「我請我的老同學吃飯。」為什麼是老同學，我真是不得其解，張震說：「我們是抗大的同學嘛！我們是一個隊，一個支部。」我笑了起來，他這個理由想得好。席間，張震對胡敏落實政策很關心，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對搞株連。他們對

我的老伴落實政策都盡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動。胡敏的戰友經常來看她，很多人都問寒問暖並給胡敏錢和糧票，給胡敏買衣服，胡敏每次都熱淚盈眶。段蘇權對我的關心，使我非常感動。我當時住在大兒子家裏，他幾次驅車來到寒舍看望我，說了很多關心和鼓勵的話，他還把我接到他家裏去敘舊，我對段蘇權同樣是感激的。

這一生使我永遠感激的是我的老戰友張文。張文同志是三七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一生都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黨的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平津戰役以後，解放軍大舉南下，她愛人就犧牲了。她這一生是很不幸的，一生都很艱辛，日子過得很清苦。文化革命以前，我們兩家常有來往，但在那個年代，都是依靠組織，互相並沒有多少關照。「九一三」以後，我是家破人散，我的兒女無處可歸，尤其是我的小女兒，更是無人照顧。在我們全家最困難的時候，他對我們的幫助是很大的，她收養了我的女兒京京，我的幾個兒子到北京，沒有落腳之處，都是住在張文同志在家裏，她自己並不寬裕，但是她把家裏的好東西都拿出來給我的孩子吃，對他們問寒問暖，非常關心，使我的孩子得到很多溫暖和慰藉。她的身體不好，不幸走到我的前頭，我和胡敏及全家都很悲痛，我永遠都感謝和懷念老戰友張文同志。

九二年我搬進了省委幹休所，並由省老幹局管我，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費也有所增加。九九年，幹休所還給我買了一輛紅旗車用。幹休所李所長，還有老幹局的文處長對我的生活十分關心，幾乎是有求必應，我們不吭聲他們也主動關心我們。我幾次住院都是安排很好的病房。幹休所的醫生、財務、司機及所有工作人員都對我尊敬和關心。幹休所還專門安排我和老伴回延安看一看，胡敏還找到了當年在半山坡上住的窯洞，我們站窯洞門口，望著熟悉的寶塔山和遠處延綿起伏的一道道黃土高坡，真是心潮起伏，熱淚奪眶而出。我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兩萬五千里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產……。我對老伴說：「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陝西人，不參加革命我們怎麼能認識呢？我們共同革命，共同患難，為革命獻出了畢生，有這一點就夠了。榮辱都置之度外吧！」



邱會作將軍銅像。

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



邱氏宗親聯誼會會長邱家儒先生講話。

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在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



在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左起：吳新潮、李亞寧、邱家儒、陳友西、黃春光、劉衛兵、邱建軍。



在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胡敏和來賓合影。

方块字读书社区制作



路光（長子）、光光（三子）、京京（女兒）、胡敏、毛毛（四子）在邱會作將軍銅像前。



懷念父親（女兒京京）。



胡敏和老管理科長汪波（左）、警衛員蔣平安（中）在邱會作將軍銅像前。



京京、新平一家在父親銅像前。



胡敏一家和家鄉的親人在一起。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差不多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所以那一陣子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是沒有看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後勤，然後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解放戰爭，轉到東北，然後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後他又來做總後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紅軍老戰士。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工作。接近年了，可說，他也是一個堅定的紅軍老戰士。

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一位。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摘自《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差不多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所以那一陣子共事最密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為的，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是沒有看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後勤，然後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解放戰爭，轉到東北，然後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後他又來做總後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紅軍老戰士。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後勤部長，是歷屆後勤部長最好的一位。這不僅是我的看法，也是黨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代後記

家人在邱會作將軍骨灰安放儀式上的講話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貴賓、各位老俵鄉親：

謝謝您們的光臨。

今天我們的母親帶著全家，把我們父親的骨灰送回故鄉安葬，魂歸故里。

八十年前，我們的父親不到十五歲，就從這個小山溝參加了紅軍。在共產黨、毛主席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是偉大的，是艱苦卓絕的，無數革命先烈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許許多多革命前輩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我們的父親就是這支偉大隊伍中的一員。

中國革命是英雄輩出，群星燦爛的。我們的父親生前說過：他只是燦爛群星中的一顆小星。但是，他從參加革命一開始，一直就是積極工作、努力奮鬥的，並貢獻了他的全部力量。

願我們的父親安息在故鄉，安息在生他養他的青山之中。

胡敏 率子孫：

邱路光、蕭瀟、邱承光、陳雪巾、邱光光、李卓雁
 邱小光、龐淑凡、邱小京、吳新平
 邱燕恆、邱小宜、程曉愫、胡曉愛、蕭楠、吳丹

邱會作將軍生平簡歷

1928年6月	參加兒童團
1929年11月	參加紅軍，在地方部隊「興泰警衛連」當戰士
1930年1月	在「興泰警衛連」當文書，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12月	參加第一次反「圍剿」腿部負傷
1931年5月	參加第二次反「圍剿」
1931年7月	參加第三次反「圍剿」
1931年11月	五軍團宣傳隊長
1932年10月	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期學習參加第四次反圍剿
1933年2月	軍委總供給部會計、機要統計員
1933年6月	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機關黨支部書記
1934年8月	兼任軍事工業局的黨總支書記參加第五次反圍剿
1935年5月	軍委四局三科科長
1936年1月	中央軍委供給部糧秣處處長
1936年6月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供應局長
1937年1月	抗大二期學習
1937年8月	中央軍委供給部副部長
1938年5月	中央軍委供給部部長
1940年1月	中央財經工作團團長
1941年3月	豫皖蘇邊區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四師供給部政委
1944年2月	中央黨校二部學習
1945年4月	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5年12月	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	北平軍調執行部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人事組組長
1946年8月	赤峰地委地委書記兼二十二分區政治委員
1947年8月	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8年3月	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政委
1949年3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45軍政委
1949年12月	廣西省桂東南軍政委員會主任

- 1950年12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1年5月 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1952年7月 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1954年10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
1957年9月 高等軍事學院學習
1959年10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1962年4月 兼任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
1967年8月 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1968年10月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
1969年4月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